

# 20世纪俄罗斯

---

## 档案文件

新经济政策  
是怎样被断送的

(二)

#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

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  
（五卷本）

- 第一卷 1928年4月6—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第二卷 1928年7月4—1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三卷 1928年11月16—2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四卷 1929年4月16—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第五卷 1929年11月10—1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 第二卷

1928年7月4—1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Как ломали нэп.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ов ЦК ВКП(б) 1928—1929 гг.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атерик»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Фонд Александра Н. Яковлева), 2000.

© В. П. Данилов, А. Ю. Ватлин, Е. Е. Кириллова, Л. Н. Малашенко, О. В.

Хлевнюк.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введение, примечания.

本书中文版版权取得俄罗斯国际民主基金会授权,由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

图字:01-2007-0782号

责任编辑:魏 华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马 杰 责任校对:吴海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二)/[俄]A. H. 雅科夫列夫 主编 李方仲

宋锦海 李永庆 译 李方仲 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A. H. 雅科夫列夫院士 主编)

ISBN 978-7-01-006794-0

I. 新… II. ①雅… ②李… III. 经济政策-研究-俄罗斯 IV. F1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3537号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二)

XIN JINGJI ZHENGCE SHI ZENYANG BEI DUANSONG DE

[俄]A. H. 雅科夫列夫 主编 李方仲 宋锦海 李永庆 译 李方仲 校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53.25

字数:920千字 印数:0,001-3,000册

ISBN 978-7-01-006794-0 定价:110.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内部发行)

ISBN 978-7-01-006794-0



9 787010 067940 >

#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主编

А. Н. 雅科夫列夫院士

编辑委员会：

А. Н. 雅科夫列夫（主任）

Е. Т. 盖达尔    В. П. 科兹洛夫    В. А. 马尔丁诺夫  
С. В. 米罗年科    В. П. 纳乌莫夫    Е. М. 普里马科夫  
А. Н. 萨哈罗夫    Г. Н. 谢沃斯季亚诺夫    Н. Г. 托米林娜  
С. А. 菲拉托夫    А. О. 丘巴良    А. А. 雅科夫列夫

本卷编辑出版委员会：

В. П. 丹尼洛夫 О. В. 赫列夫纽克 А. Ю. 瓦特林 (以上为主编)

М. С. 阿斯塔霍娃 Г. В. 戈尔斯卡娅 И. М. 扎科莫尔基娜  
Е. Е. 基里洛娃 Л. П. 科舍廖娃 В. С. 列瓦诺维奇  
Л. Н. 马拉申科 Н. В. 穆拉维约娃 Л. А. 罗戈娃娅  
Н. А. 西多罗夫

李方仲 宋锦海 李永庆 译  
李方仲 校

##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翻译出版委员会：

主任：李铁映

副主任：戴秉国、李慎明、李静杰（常务）

委员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钊贤	王钢华	乌传袞	冯育民	李方仲	李京洲
李慎明	李静杰	汪宁	郇中建	张达楠	赵永穆
赵仲元	赵国顺	徐葵	黄书元	鲁桓	戴秉国
魏华	臧乐安				

## 序

### 1928年七月全会

1928年4月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速记记录已在前一卷(《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第1卷,莫斯科2000年版)发表了,从那时起到1928年中央七月全会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国内局势进一步尖锐化和“非常”政策在强化。首先面临的仍然是粮食收购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对待农民的政策问题。在评定四月全会的结论和最初造成的后果的时候,我们指出了,通过的决议在形式上谴责“冒进”的同时,又强硬地要求保证完成不可能完成的粮食收购计划,这里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政治局1928年4月25日《关于加强粮食收购的指令》和在此前由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在中央会议上向地方领导人提出的要求,再度给农村施加了压力<sup>1</sup>。

关于1928年4月20日至6月1日收到的、来自农民的声明和请求,有一份概述材料,全俄执行委员会收到的这份材料里有一个总的结论:在春季推行的粮食收购、征税和捐献、推销国债运动中,农村被“目无法纪的浪潮”所笼罩。当然,写出这个概述的人无法知道,这个定义将更适用于1930年春天的局势,他们所描述的“仅仅是”最初的猛烈打击……这些打击的具体表现是这样一些“过火行动”:“根据第107条,凡运不出500普特粮食就追究责任的事件已经不计其数,而在5月的运动中,已经是因为几十普特的粮食就要判罪,剥夺自由和没收财产了”<sup>2</sup>(而根据正式规定,农户的商品粮储备至少达到2000普特时,才会采取这样的措施)。

在暴力越来越盛行的条件下,采用“过火行动”的机制开始显露出来了。推动它的主要力量是已开始实施的《俄联邦刑法典》第三章,那些“纪律涣散、粗枝大叶、无所事事和玩忽职守的国家的、社会的(党的?——编者注)和集体机关的”工作人员运用了第三章。关于农村的暴力源于何处,编写向全俄执行委员

会递交的农民声明和请求的概述材料的作者完全肯定地得出了结论：“在有了来自上面的这种压力的情况下，基层机关对谁也不会客气了；他没有时间，他也不想因为玩忽职守被送上被告席”。除此以外，农民也逐渐开始懂得了这一点。那个概述说：“一些声明说出了这样的思想，认为地方上的这种粗枝大叶是与中央通了气的”<sup>3</sup>。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官方语言里，用“地方上的粗枝大叶”解释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中的“过火和歪曲”，并不是在1930年才出现的，而是从1928年春天，在斯大林的“来自上面的革命”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农村的暴力和向私人贸易的进攻导致了城市保障系统的完全瓦解、大量排队现象的出现以及自发实行凭证供应制度。联共(布)中央新闻部的通报指出，由于粮食的匮乏，关于饥荒、行将来临的战争和推翻苏维埃政权、关于国内各地饥饿的暴乱和罢工的“反苏”谣言不胫而走。“宣传失败和不信任共产党员”的情况，在政权视为自己支柱的工人中间时有发生。工业企业纪律涣散，工人们为寻找面包而离开车间。“罢工情绪”在增长，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的确导致了罢工。在城市里，群众性的示威和游行越来越多，起主要推动作用的，经常是失业者——城市居民和进城市打工的农民中最有社会爆炸危险的那部分人。1928年4月19日，两千名群众摧毁了列宁格勒的劳动交易所，5月10日，大约三千人在莫斯科交易所举行暴动，殴打警察，摧毁商亭等。仅自5月20日至6月15日的这段日子里，各城市的劳动交易所就总共发生了13起冲突。最严重的城市动乱发生在塞米巴拉金斯克。5月15日，数千名群众举行了游行并闯进了市执委会大楼。城里的商店被捣毁<sup>4</sup>。

像平时一样，当局十分关注军队，它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由于农村暴力，军人从亲戚那里得到大量信件，这些信件详细地描述了紧急状态的种种可怕的情景并发出了求救的呼吁。在军队里，像官方文件里所说的“农民情绪”，对当局的不满，对来自家里的消息和信件的广泛议论，越来越强烈。军队领导加强了检查，7月16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将社会异己分子清除出军队的指令<sup>5</sup>。

充斥了全国以及国外出版物的无数传言中，也有关于政治局里斯大林与李可夫分裂的传闻<sup>6</sup>。细心的观察家确实能够发觉，苏联领导人们甚至在公开的讲话里用语也有所不同。然而，苏联领袖们自己认为最好是否认存在分裂。1928年4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显然是在回答伏罗希洛夫所说的关于党的某次会议收到有关分裂问题的便条时，写道：“我想，是那些经常潜入积极分子会议



的、(隐蔽的)反对派分子在写李可夫派和斯大林派的问题”<sup>7</sup>。

斯大林向自己消息灵通的战友发出的这个声明很能说明问题。斯大林知道,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占主导的情绪是要求“团结一致”,他怕公开地成为分裂的发起者。大多数工作人员担心领导层出现新的冲突,不仅是因为国内正在形成紧急局势以及对整个政权的威胁在不断加剧,而且还因为,上层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使得党的官员们自己的政治前途成为问题,上层分裂意味着必须站到某人一边、被卷入斗争、冒失败的风险。

然而,在四月全会之后,政治局内的对抗变得更为激烈,扩大到了越来越多的新领域。引起布哈林与斯大林之间直接冲突的,似乎是非常具体的和甚至是局部的问题,是关于“工业品出口”的问题。1928年5月17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米高扬提出的进口计划草案。布哈林的疑惑到了极点,为使自己所持的反对态度能够得到严肃的对待,他给斯大林写了便条:

“我极其害怕下列情况。

米高扬的三张便条总的倾向是:(1)强化工业品出口;(2)放弃粮食(谷物)出口。接着便是:(1)我们要拖长国内的商品奇缺状况;(2)我们要在国内商品奇缺的情况下迫使工业为出口服务;(3)我们将不采取措施发展农产品(谷物)的出口;(4)农业国家从事工业品的出口。

取代这种做法的应该是:(1)加强工业化,面向国内市场;(2)实现农业的工业化,提高它的生产率(并使谷物生产机械化),为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而把农产品出口作为方向。

没有农业的某种积累就不可能有任何集体化,因为机器是不可能白白得到的,而一千个木犁也换不来一台拖拉机。

我非常害怕这里存在固有的毛病:建议搞的不是包括农业工业化在内的工业化,而是工业化脱离农业和谷物生产的稳定性等。

这项政策将只会加剧巨大的困难”<sup>8</sup>。

而斯大林的回答是:“对。米高扬有这种(不正确的)倾向,他有这种想法并不是由于他有意识地采取了这样的方针,而是由于某些(我不知道的)经验主义的实际考虑。但这并不可怕,因为在这里不是米高扬在决定问题。斯大林”<sup>9</sup>。

现在就这个独特的出色文件评论几句:布哈林对斯大林式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批评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致斯大林别无选择,只得同意(“对”)并把一切推到米高扬的身上,说他有了“不正确的”倾向。但是,布哈林显然不知道突然出现的“加紧工业品出口”的倾向的真正内容,因此不能评价它的真实含义。斯大

林则相反,他非常了解这里提到的倾向来自什么样的“经验主义的实际想法”,它的内容是什么。1928年做出的种种计划要求加紧从苏联出口,这些计划实际上是在1929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这里指的是出口木材,其中包括依靠广泛动用犯人采伐木材。

过了一些时候,布哈林又给斯大林写了信,晚些时候他自己在1929年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上确定,写这封信的日期是1928年6月1—2日。信中谈的是重新考虑农村政策的总方针问题:“我认为国内外局势非常严重。我想,我们需要考虑出一个完整的计划,特别是关于销售新收成的时间……如果我们进入一个新收获期却同农民的关系极其尖锐,我们就会在新的运动中又有失败的危险……我们的非常措施……在思想上已经失败了,变成了一种新的、与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路线不同的政治路线……”。这封信主要要求的是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政策。布哈林问道:“如果一切问题在于富农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承认是神话的9亿又该怎么办?而如果我们的粮食压根就很少的话,那么,富农怎么来为我们‘调节’呢?如果所有的生路在于集体农庄的话,那么,哪儿来钱去搞它们的机械化呢?总之,说我们的集体农庄应该在贫困和分散的情况下成长是否正确呢?吸引小额存款的方针是否还有效或是已经过时了呢?鼓励个体经济的方针是否还有效或者已经过时了呢?你过去批评过的伊万·尼基托耶维奇·斯米尔诺夫的错误,那么,在有了新的事实的情况下,他又错在哪里呢?等等,等等”<sup>10</sup>。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土地政策的关键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将决定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党和国家活动的方方面面和性质。布哈林提出的问题已经包含了完全明确的答案,因为它们涉及了一点,那就是正在推行的政策已经出现的和正在迅速发展的矛盾——与国内真实状况的矛盾。到了1928年7月,甚至过去不知道有关谷类饲料平衡情况的那段历史的人都开始明白,“我们的粮食压根就很少”,富农的“罢粮”不会产生粮食收购危机,然而,斯大林旨在同富农作斗争和搞集体化的方针已经开始在左右总的路线,把发展合作社(“吸引小额存款的方针”)以及“推动个体经济”撂在了一边,甚至取消了。与此有关的还有И.И.斯米尔诺夫1925年提出的关于开始农民经济集体化(绝非是采用斯大林式的方法)的建议。斯米尔诺夫那时受到了猛烈批评,并且由于加入了“联合反对派”,于1927年年底被开除出党。

上面提到的信件尽管问题提得尖锐,最后结束时仍然是呼吁和解:“我向你声明,我不会也不想打架。我太了解打架会意味着什么,而且是在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所处的这种条件下。我请你现在好好考虑一点:让代表大会能够安安

静静地进行,不要在这里再制造更多的裂痕了,不要再制造流言蜚语的气氛了……我们把代表大会结束了……我也将准备没有任何打斗、无声无息和没有任何斗争地离去,随便到什么地方去”。<sup>11</sup>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要在夏天举行,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的非正式首领<sup>12</sup>,坚持要求召开这次会议,而且这有可能成为宣传他的政治路线的合适讲台,所以援引这次大会是一个很有力的论据。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状况促成了在1928年春夏这段时间里,斯大林和“右派”是在继续用隐蔽的打击互相交手,借助于别人的手在行动。被提上中央六月全会的种种有关共产国际的情节,在这场隐蔽的冲突中开始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根据共产国际的章程,它的代表大会应该至少两年举行一次<sup>13</sup>。在党内发生尖锐冲突的条件下,政治局里由斯大林和布哈林领导的大多数不愿意为托洛茨基或者季诺维也夫提供国际组织的舞台。所以,例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一再被推迟,这引起了外国共产党的不满和流亡国外的新闻界的嘲笑。在1925—1927年的政治稳定时期,共产国际显然不是联共(布)领导关注的中心。如果说“联合反对派”总是没完没了地向共产国际呼吁,坚持要让俄国革命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的话,那么,斯大林则宁肯保持距离,扮演“国家主义者”的角色,不倾向于在国外进行冒险的实验。从1927年中起,在他的倡议下,政治局开始了一场把共产国际的特使从苏联驻国外的代表机构中剥离出去的运动,批评外国共产党人在财政问题上和秘密活动问题上漫不经心。<sup>14</sup>

4月23日,根据斯大林的报告通过了一个很长的《关于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建议联共(布)的领导人在参与外国共产党的事务时要最大限度地保密。只对布哈林有例外,在季诺维也夫被从共产国际排除掉之后,他满意地接受了扮演世界革命战略家的角色——在布尔什维克的官员们看来,和外部世界打交道是一种特别令人敬佩的工作。除此之外,领导共产国际执委会意味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政治局里的“日常事务”,这不能不让倾向于从事理论工作的布哈林感到称心。

但是到了1928年初的时候,“世界革命”的各个战场上的局势极不顺利。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继续迫害共产党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起义没有成功造成的,把苏联的范例定为方向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也正经历着尖锐的危机。欧洲的共产党人也没有能打入群众,在绝大多数国家里依然是一些从属于莫斯科的左翼激进分子集团。世界经济在继续高涨,而苏联的报刊要写资本主义的危机和革命运动的又一次高涨变得越来越难了。区域性的社会和政治冲突被鼓吹得神乎其神,当成了无产阶级政变的先声(例如在维也纳发生的1927

年7月事件),结果是苏联的和共产国际的宣传家们被自己的乐观搞得越来越被动。随着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政党每一次的“背叛”,也就是说它们和自己国家政府的新的忠诚合作,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是世界资本的附庸和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退出政治舞台的提法就越来越失去了说服力。

相反,西方报刊转入了进攻,他们反复宣传外国共产党在财政上依附于莫斯科。在英国,当地的共产党人手里有莫斯科人民银行的账户,在发生了又一次丑闻之后,政治局的专门委员会抓了这个问题。这个委员会决定从苏联的机关里解雇英国的共产党人,招致了他们如此强烈的抗议,以至不得不“平息”局势——1928年6月2日,布哈林和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向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波立特做出答复的方案,坚持说委员会的结论是有根据的。<sup>15</sup>要通过共产国际新纲领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筹备召开的。

在共产国际的全部历史中,此前一直都在议论着如何制定纲领,把它作为20世纪的《共产党宣言》,若能成为这个纲领的作者,那就意味着可以加强自己作为主导理论家的优势,由此而来的是种种政治上的好处。布哈林在这些问题上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还在1922年,他就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草案,成为共产国际内部进行进一步讨论的课题。<sup>16</sup>制定纲领的工作实际上的最后收尾被推迟到了十五大粉碎“联合反对派”之后。1928年1月1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用征求意见的方式通过一个决定,成立内部的纲领委员会,成员是:斯大林、李可夫、莫洛托夫、瓦尔加和布哈林(就在同一天,通知了托洛茨基要把他流放到阿拉木图去)。只是在一个月之后,才通过了一个专门决定,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委托联共(布)代表团成员提出新的纲领草案的方案。

制定这个纲领的工作是采用了全体紧急动员的办法进行的。有意思的是,布哈林最初草拟的东西是在分析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的,而社会民主党在党的正式宣传中则被戴上了“理论上一文不值”的帽子。斯大林对这个问题意外地表现出了兴趣,他对这个文件展开地谈了自己的意见,提出了自己的文章结构<sup>17</sup>。斯大林很清楚,共产国际的纲领将不仅是一份政治文件,而且是一份树立个人崇拜的文件,所以在这条战线上,他也要加强自己的阵地。1928年7月,像加米涅夫证实的,布哈林曾说过,“在许多地方,斯大林把我搞的纲领弄糟了。他自己想在全会上宣读关于纲领的报告。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夺了过来。他非常渴望成为一个公认的理论家。他认为,他所缺的只是这一点。”<sup>18</sup>但是在准备联共(布)七月全会日程的时候,布哈林自己建议斯大林来做关于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报告(见补充材料4)。

在制定这个文件的最后阶段时,布哈林保持了平静并准备要合作:“斯大林提出的所有建议和修改(我没有收到其他同志的意见)几乎全都注意到了并吸收到文件中了”<sup>19</sup>,——他在4月3日随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写给政治局就这个问题组成的委员会成员的信里,就是这样写的。略过了一些时间,布哈林又同意了一个妥协——根据政治局5月7日的决定,纲领草案应该由布哈林和斯大林签名,提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sup>20</sup>

对比第一个和第二个方案就可以看出,布哈林依然是把重点放在了分析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各种进程上,从中得出了共产国际的战略和战术。由此得出了比较有伸缩性的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和保持世界革命的欧洲路线的提法。斯大林提到首位的是,苏联是“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雏形”,是“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无产阶级将来联合成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世界统一经济”的基础。这里说的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而是世界历史今后的进程将完全要取决于如何利用这个胜利的成果。

4月的草案和5月的草案的第二个不同,涉及的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政策基本原则”的阐述——实际上说的是如何解释“俄国的经验”,具体说就是新经济政策。布哈林的说法不仅是重复了,而且是发展了他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市场杠杆”的思想。“走向胜利的无产阶级应该在那些可以进行集中的和计划性的领导的生产领域之间,以及在有可能成为他手中的平衡手段的那些领域之间取得正确的比例。后者应该让个体发挥首创精神”。“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相互竞争的经济形式进行经济斗争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这些经济形式有可能会是平行发展的”。“在涉及城乡关系的领域里,无产阶级应该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和极端的慎重,绝对不要去破坏农民个人的活动动机,要逐渐地——通过农业的集体形式的示范和对它们的支持——用同志式的经营动机来取代这些动机。”<sup>21</sup>

4月方案中的上述所有引语都是引自递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纲领草案的。布哈林在一步一步地后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紧急召集的纲领委员会已经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胆量严肃地研究草案了。这个委员会召开了3次会议,斯大林一次也没有参加。布哈林向与会者解释了基本改变的意义。被叫到莫斯科的委员会成员简直就没有可能注意地阅读他所提交的文件,于是不得不相信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权威了。委员会提出的所有45条修改意见都带有编辑补充的性质,既没有涉及草案的结构,也没有涉及它的基本条款。

政治局里在讨论弗鲁姆金的信时发生了冲突,这也是按照类似的脚本发展

的。老党员、苏联副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1928年6月15日向政治局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写了一封信,请他们注意由于农村的非常政策形成的紧急局势。

弗鲁姆金在1928年6月15日的信里首先具体分析了农业的条件和“紧急状态”的致命后果。信里说道,“最近采取的方针导致中农群众感到暗无天日和没有前途。由于担心被划为富农,对改善牲畜和农具都失去了任何兴趣。农村中是一片压抑,这不可能不反映到经济的发展上来”。后来农村以及整个国家发展的全部进程证实了弗鲁姆金的实际结论是正确的:“……应该清楚的是,无论是从哪里得到的,每得到100万普特的粮食都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业化,而每失去100万普特的粮食又都会削弱我们”。

弗鲁姆金说,他是试图用自己的信“引起政治局注意那些成千上万的党员都在极其关注,每次相遇都会谈论……的事情”<sup>22</sup>。弗鲁姆金的这番话的主要的政治意义也就在于,它是和已经广泛散布的情绪相通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明白这一点,所以马上做出了强硬的回答,用长官的训斥和政治上指责“右倾”和保护富农来偷换严肃的和实事求是的论证。

虽然我们不掌握任何证据,说明弗鲁姆金的行动和布哈林或李可夫有联系,但是显然出现这样的一封信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努力利用对这封信的讨论作为在政治局审议国内总的局势的理由。从布哈林对加米涅夫的讲述判断,领导集团曾决定把弗鲁姆金的信散发给政治局的所有成员并编写出一个总的答复稿。但是这种做法对斯大林不利。一方面,再一次讨论严重的社会经济局势有可能影响政治局委员中那些动摇的人的情绪。另一方面,协调一致的声明只可能是妥协性的,因此不会是像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强硬。6月20日,斯大林不顾达成的协议,散发了自己给弗鲁姆金的答复,指控他保护富农<sup>23</sup>,从而打破了布哈林的所有计划。布哈林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是赶紧轻轻地刺斯大林一下。“我们通过了指摘违反决议的决议。认为答复是正确的,但是不完全。我没有能继续支撑下去”,——布哈林对加米涅夫说。<sup>24</sup>正如政治局会议的记录证明的那样,1928年6月25日的确通过征求意见的方式通过了决定,认为“斯大林同志对弗鲁姆金同志的信的答复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并不完整。”<sup>25</sup>这个决定本来就没有多大效果,而且还由于在当天(25日)(无疑是和斯大林商量好的)莫洛托夫散发了自己的一份内容广泛的、支持斯大林答复的声明,效果就更被削弱了。这份声明也附在了政治局会议的记录上。<sup>26</sup>

既然“右派”没有能争取到结合弗鲁姆金的信讨论普遍性的问题,他们也就只能组织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进行这样的分析了。布哈林对加米涅夫是这样谈

到这件事的：“1. 我要求讨论总的问题。斯大林不干：需要的是工业财经计划等等。2. 我给斯大林写信要求进行一般性的讨论。他跑来找我：布哈林，你甚至能够把大象的神经搞坏，但是他就是不同意讨论。3. 我写了第二封信——他把我叫到他那里去。他开始说：我和你是喜马拉雅山，其他人都不值一提。4. 我们去见‘七人小组’。一副野蛮的场面。他开始对我大喊大叫。我讲了他说的喜马拉雅的话。他叫道：‘你说谎。这是你编出来的，要让政治局委员们反对我’。我们不欢而散。5. 我没有松手地读20页的声明。莫洛托夫宣布说，这是反列宁主义的、反党的。斯大林说：有十分之九我可以接受。莫洛托夫走了。作为基础通过了。我去写决议。他们也一样。出乎意料地拿来了从我的宣言上偷来的决议。我做了3处修改。李可夫改了一处。全部一致通过了”。<sup>27</sup>

托姆斯基在联共(布)1929年4月的中央全会上完全证实了加米涅夫转述的布哈林的证词。他说，召开政治局的秘密会议讨论粮食收购决议这件事被长期推迟了，在最后可以召开这次会议的时候，提出来进行讨论的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提纲，布哈林提出了自己的文件，莫洛托夫表示反对，但是斯大林同意了“十分之九”。<sup>28</sup>在为六月全会准备的材料中，保留了对这个问题上的各种不同的决议草案。在全会速记稿的补充材料里，我们也公布了布哈林最开始的决议草案，这是在“七人小组”上讨论过的那个草案，也是中断了编写的那个草案。

布哈林建议把包括个体农户的基本群众在内、全面发展粮食经济作为“经济政策最主要的指令之一”。坚决否定了“进一步采用非常措施”(见补充材料11和12)。我们还要指出的是有一项硬性规定的条款，那就是必须既要和资产阶级的倾向，“又要和那些力图让非常性的和临时性的措施变成经常的或者具有长期方针性质、从而将威胁到工人和农民的基本群众的联盟事业的成分”“进行坚决斗争”，这是李可夫加进了决议的。<sup>29</sup>

总的来说，从形式上看，可以认为政治局提交给党的七月全会审议的“联系到总的经济局势的粮食收购政策”决议草案是李可夫-布哈林集团的胜利。其中说到了“城乡之间分裂的危险”，说到个体经济“在很长时间将是国家粮食经济的基础”，承认了在推行1927—1928年的粮食收购运动中的错误，宣称不能允许再采用非常措施。有一个事实具有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决议里有具体的指示：禁止“巡查农户，非法搜查和各种破坏革命法制的实际做法”，禁止关闭集市，规定要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和加强向粮食地区运送工业品，等等。不难发现，这些建议实际上重复了弗鲁姆金的信提到的许多条款，而这是在不久前斯大林和他的同伙严厉谴责过的。

虽然在全会开始的前夕对全会的基本决议达成了妥协,政治局里存在深刻矛盾的消息还是透露到了党的高层官员中。全会的调子侧重了有关共产国际的各种情节,就把斯大林集团和“右派”相互关系中最痛的各点引到了一旁。日程上的前两项是曼努伊尔斯基通报共产国际的“策略性迫切”问题和布哈林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把这两项异乎寻常地分开了,而且对每个报告的讨论也是分开进行的,这也多少促成了上述情况的出现。不能排除的是,这样的程序是布哈林提出来的,为的是集中到理论问题上,避免指控日常工作中的错误。

曼努伊尔斯基是要承受猛烈批评的,他的讲话相当的淡然无色,着重点不是放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4年来革命进程总的状况上,而是放在了1928年上半年的各种事件上。说到的是新的“阶级对阶级”战术的最初结果,也就是共产党人拒绝和社会民主党结成竞选联盟和进行议会合作。报告里提到了所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陈词滥调:新的革命高潮的发展,“改良主义的领袖们的右转和群众的左转”,共产党本身的右倾危险,——这就谈不上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评价了。联系到共产国际的新策略,对德国和法国议会选举所做的分析堆砌了各种统计,显然是不符合革命进攻的精神的。甚至曼努伊尔斯基在共产国际的同事皮亚特尼茨基也承认,报告“过于理想化地评价了选举的结果”和进一步斗争的前景。

在讨论第一个报告的过程中,第一个打破沉默的是洛米纳泽。这个年轻的格鲁吉亚共产党员是斯大林推举的人,早就是反对布哈林的人了,<sup>30</sup>1927年时,他是共产国际驻德国共产党的代表,后来成为了1927年12月在广州失败了共产党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共产国际里有传言说,“广州起义”应该成为对联共(布)十五大的一种特殊的礼物。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洛米纳泽和他的战友沙茨金批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纵容了“右倾”,后来又一直在培植它。事实上这是对作为共产国际首脑的布哈林的挑战,但是后者没有放过机会,提到了洛米纳泽在中国犯的错误。<sup>31</sup>虽然洛米纳泽的对立面不是没有根据地强调他的立场接近刚刚被粉碎的“联合反对派”的观点,但是他还是没有倒下去。从全会上争论的过程可以预料到,站在洛米纳泽背后的是斯大林本人。

洛米纳泽展示了共产国际各个支部日益增长的右倾危险,特别着重指出了德国共产党的局势。从他的观点看,拥护“右派”的人提出的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结盟是“机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消灭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提出的建议是不仅要打击这些分子,而且要打击“在德国党的基本领导干部和把它拖向机会主义道路的右派集团之间架起桥梁的中派”。事实上这里说的是德国共产党中站



在布哈林一边的人——克拉拉·蔡特金、阿图尔·埃韦特等人，这些人在1928年秋就被戴上了“调和派”的帽子。<sup>32</sup>

洛米纳泽冲动的批评中有许多公正的东西：他表示了反对把欧洲无产阶级左转的提法绝对化，指出了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理论准备薄弱，但是他处于了骄傲的孤立地位。洛米纳泽也没有忽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他声明说，托姆斯基在工会国际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被“右派”用来抵制罢工斗争。托姆斯基立即对这个攻击做出了反应，声明说，主要的不是进行过多少次罢工，而是它们有怎样的实际结果。

对曼努伊尔斯基的通报没有通过决定，讨论结束时有些个人的声明。洛米纳泽的进攻没有成功，但是在斯大林的战略中，这个进攻只不过是一次火力侦察，向聚集在一起的联共（布）中央委员表明，共产国际里并不是一切都平安无事。这为全会的第二天布哈林做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制造了一定的背景。

在七月中央全会上没有对共产国际纲领进行认真的讨论。由于纲领草案下面有两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斯大林和布哈林，这就让与会者失去了就原则问题进行争论的愿望。在中央全会上，布哈林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引起注意的有两个问题，面临着政治行情的变化，在这两个问题上，他明显地失去了自己的分析能力。第一是对欧洲的社会民主党采取强硬的和毫不妥协的路线，把共产党人自己的失败都归结为社会民主党的“卑劣”。第二是对战争危险的评价。布哈林坚持说，有苏联参加的战争已经逼近和不可避免，在这些战争之后，“我们将不得不书写另一个纲领”。1927年春，国际局势更加尖锐了，这使得党的机构在面临与“联合反对派”的决定性冲突中能够团结起来，这个事实导致的结果是，在苏联可以不断利用战争危险的思想维持一种氛围，好像它是处于被包围的堡垒中。这个政策有助于统治制度解决策略性任务，但同时最终导致了扭曲评价外部世界对苏联的态度，使得人们看不到德国纳粹执政之后欧洲局势发生的急剧变化。

1928年7月16日，俄共（布）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团认为必须要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一个完整的共产国际纲领。<sup>33</sup>从外表上看，这是一个对布哈林有利的决定，是对“右派”放弃在七月中央全会上公开为自己的路线斗争的一种补偿。

好像在全会日程的中心问题上，也是布哈林和他的拥趸者的立场取得了胜利：重申了要保持新经济政策，首先是要保持发展中小个体农户、广泛利用和发展经济中的商品市场联系的方针。甚至也提高了（虽然不太多）粮食的收购价格。

但是在全会上,斯大林集团就已经做到了阉割批评自己的农村政策的精髓,同时做到了既为它辩解又声明要放弃它。官方对非常状况的说的这种典型的两重性(“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调子,就像在四月全会上一样,是由米高扬的报告定下的,那个报告话说得更多了,也更充满了泛泛之词。声明说“新经济政策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要调节商品的流转”和“限制资本主义”,这些都暴露出了在偷换对新经济政策实质的理解: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经济调节,其中特别是对城乡之间的商品流转的调节,原来是用行政命令的调节偷换了,甚至不惜采用迫害手段(搜查、没收、逮捕等等)。

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它和“非常措施”的彼此不相容导致的结果,不仅是破坏了商品流通,而且也破坏了生产。报告提到了逮捕私人皮匠,就像米高扬所说的,“不是由于有必要,因为我们有許多可以施加影响的经济措施”。他通报说,1927年“在11月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反对逮捕……后来,已经是在没有我们参与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解决的决定的”。结果是一个得到最大发展的和人民需要的手工生产部门从实际上被消灭了。报告的一个特点是没有提到逮捕私人粮商的事,而这是规模要大得多、结果也更严重的一件事。米高扬不可能不知道,到1928年4月初,国家政治保安机关逮捕了1780名皮匠,3971名粮商,还有一些从事其他职业的私商(总共是6542人)。<sup>34</sup>在春季运动过程中,逮捕的人数就更多了,特别是在粮食私商中。

对私商的镇压是破坏商品流通、小城市的粮食中断以及工业中心居民甚至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肉类和其他食品供应中断的因素之一。报告对这类现象做出的解释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使得排斥私商和我们的财政与组织条件相匹配。我们今后也还应该排斥私商,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要让人们埋头于此事,要严格地使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条件相匹配”。这里说的不过就是“做得过分了”……在这样确定了任务之后,对保留新经济政策的所有许愿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保障国家基本人口粮食的,是农村和小城市的粮食市场,斯大林的领导班子可能是第一次能够估量到这种地方的粮食流通的实际规模和意义,懂得了如果关闭地方上的粮食和其他产品的交易,那国家就是自己在承担力所不能及的义务。许多参加七月全会的人将会说到这一点。只是在这一点上,米高扬的报告现实地论证了在例行的粮食收购中放弃“非常措施”的理由:“要在更加正常的组织这件事的轨道上,在恢复地方上的粮食流通的基础上,保障新的运动。我们应该用灵活的调节市场的措施取代行政施压和随心所欲的措施,不要破坏地方

上的粮食流通。”

但是,非常状态的消极结果使得斯大林的领导班子不得不为自己辩解。唯一可以辩解的理由依然是对农民的粮食储藏的统计。4月时,米高扬就坚持认为这种统计是正确的,从而证明了必须要继续进行粮食收购。<sup>35</sup>在七月全会上,能够为斯大林政策辩解的理由就是大家都承认的粮食饲料平衡表上的错误。米高扬在解释春末粮食收购的困难时说:“当我们来到农户家里时,我们还是看到粮食并不像可以期待的那样多……粮食收购计划是建立在中央统计局的粮食饲料平衡表的基础上的,可这个平衡表原来并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5月和6月的收购触及到了农民的保险储备<sup>36</sup>,这当然是不会没有痛苦地就过去的……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农民自然的不满和抗议”。实际上,就像俄联邦农业人民委员库比亚克在四月全会上就已经说到的,冬季的非常状况就已经完全触及到了保险储备,而米高扬是在千方百计地辩解。联系到这一点,我们要指出的是,农民的抗议不是在5月、6月,而是在1月、2月就已经又继续进行了。<sup>37</sup>

正像我们看到的,从统计上对农民的粮食储藏做欺诈,这在七月全会上也为斯大林的领导班子用上了。只是米高扬的结束语把这种统计的欺诈表现得淋漓尽致。别人提出了要求更准确地考虑农民的粮食储藏,米高扬回答说:“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不能去考虑农民的储藏,我不会这样做的”。原来是说,采用非常措施是因为农民那里有大量储藏的粮食,现在又有了一个说法,是因为发生了“粮食危机”,这种说法不仅是在为非常的粮食收购提供根据和辩解(虽然这些储藏是没有的),而且也是在为加紧改变生产的结构提供根据和辩解,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说到。

米高扬报告的两重性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全会上争论的尖锐程度:大家都赞成新经济政策,赞成取消“非常措施”。在讨论了这个主要题目之后,加里宁证明说:“在这里”,也就是在全会上,“在私下的谈话中,大家都说,所有的发言都是只说了一半的话”。但是在发表的速记记录里,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奥新斯基、索科利尼科夫、乌格拉诺夫、斯捷茨基、克鲁普斯卡娅的批判性发言,特别是后来成了“右倾”的首要人物,但暂时还是主要在危言惑众的人——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发言。由于这个要公布的有争论的速记记录的导言篇幅限制,只能点出全会上对立的立场中最重要的情节了。

奥新斯基在1921—1922年曾积极参与了新经济政策的制定。新经济政策要“严肃地和长期地”采用,这是他说过的著名的和经常被引用的话。奥新斯基坚决驳斥了“粮食经济危机”的说法。他认为危机状况是由于“城乡之间的脱

节”，并认为这是一种“高度危险的现象”。粮食播种面积的增长停滞了，这并不是因为缺乏现代的技术设备，而是由于错误的粮食收购价格政策，由于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削弱了经济的刺激作用”。奥新斯基认为，农民拒绝按照收购价格缴出粮食是“俄罗斯大量的乡下人而不是富农专门对我们的一次考试。在这方面，富农是在那里推动，而选择是中农做出的。”按照奥新斯基的意见，要改正“计划调节”的粗暴错误，就要在考虑到农村消费的情况下发展工业，这是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索科利尼科夫、乌格拉诺夫和克鲁普斯卡娅的发言也都是谈的这些问题。

李可夫的发言引人注目的地方，首先是保护了各种不同意见都能公开发表出来的权利，不要像索科利尼科夫、乌格拉诺夫和斯捷茨基先前在全会上的发言那样，受到政治上的指控：“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我们这里没有发生过这种采用大规模地对农民施加行政影响的经验。所以可以而且需要分析这个经验，得出结论，找到它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但是决不能只是没有针对性地相互谩骂——不能只是一个人说这个、那个不好，而另一个人则‘反驳’说，你是在制造混乱，你不能这样干。但是，说起来，为什么就是‘制造混乱’，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干’？”

李可夫说，党的最高领导对“过火行为”和对“扭曲”负有责任，这是具有原则意义的，他说：“……对于我们所说的扭曲，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不能推卸掉自己的责任。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为自己的地方组织承担责任的”。对这一点，斯大林抛出了一句话：“对”。但是没有过很长时间，他就开始在地方的“过火行为”和“扭曲”上为自己开脱了，好像这些都是由于“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缘故。我们还要指出的是，虽然有斯大林的这句话，积极推行非常措施的鲍曼批判的，就是李可夫的这个说法：“根据第107条受到谴责的中农要比富农多。这是一种歪曲，但这决不是由我们的方针产生的，因为我们的方针是采用第107条对付富农的”。

李可夫决不是仅仅停留在承认党的领导的集体责任上，而是也强调了自己的个人过错：“我个人曾坚信行政措施会消除粮食危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而且也没有能出现我们和贫农以及中农的关系不受破坏的情况……对于所发生的情况，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人之一。”

这样，人民委员会主席就事实上否认了全会上多次重复的关于“非常措施”是必须的，可以克服1928年冬的食品危机的说法。这种公开和诚实的自我批评的立场就使得李可夫能够坚决地反驳和谴责斯大林主义者论证非常措施是合法

的企图：“卡冈诺维奇在这里把行政措施和第 107 条排除在了价值规律和在我国经济条件下的有限作用之外，对采用非常措施的实践进行令人怀疑的‘理论’论证的时候，他的一席话是彻头彻尾地对非常措施本身的辩解（而不是分析）”。接下来：“卡冈诺维奇的讲话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在所有时间和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这种非常措施”。

布哈林的长篇发言可能看上去太一般化和有矛盾，特别是他承认了有必要进行 1928 年冬季的非常粮食收购（从所有情况看，是为了“不致当众打起来”）。但是布哈林的报告对非常措施的后果、取消这种状态和真正恢复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的分析是相当深刻和有说服力的。争论的内容只是限于粮食收购、非常措施和在与农村的关系中保持新经济政策，在这样的总背景下，如果指出布哈林报告的一系列突出的地方，在我们看来是适宜的。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布哈林得出了一些概括性的结论：“现在我们的局势是这样的：的确，我们的经济问题十分突出，马在吃烤好的面包，而一些地方的人却在吃糠秕；一部分农民得不到邻近的城市里去买粮食，一个农业国要进口粮食和出口工业产品。很清楚，这种令人毛发悚然的经济也会使得各个阶级变得毛发悚然”。

布哈林说到可能会发生阶级的抗议，这不是偶然的。但是，在一个自认为是革命党的中央全会上，发言的人中间，谁也没有提到农民反对暴力的群众性行动，除了布哈林以外，谁也没有这样做，这已经不奇怪了。在他谈到对农民采用暴力和农民愤怒的事实（游行，向工人发出的呼吁，150 多起群众活动，等等）的时候，有一段对话是非常典型的：

“布哈林：需要事先就知道事实，每一个这样的事实都需要调节。

伏罗希洛夫：谁否认这一点呢？你在说服谁呢？

布哈林：我不知道谁否认这一点，但是只知道我自己是昨天才知道这件事的……专门为了这件事就需要我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呆上两天。

伏罗希洛夫：我是由于职责的需要知道这种情况的。

克维林：你是因为什么把他捉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去的？（笑声）

缅任斯基：因为张皇失措。（笑声）”

布哈林的总结论关系到对国家经济管理体系的评价和这个体系的官僚主义蜕变。布哈林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说，“我们应该提出经济领导和经济管理的方法问题。我感觉，我们的中央机关和党的中央委员会承担了太大的包袱——有‘小的’，有‘中等的’，也有‘大的’领导。我们不是限于领导一系列已经经过深思熟虑、斟酌和经过很好研究的基本的经济问题，而是在数十次地解决小工

厂、小租赁合同的问题。但是我们在粮食上失算了……但是对于我们的经济机关,对于我们自己的机构来说,我们用一种形式的主动性,来自国家的和完全是上面的主动性取代了所有类型的主动性。我们把下层的合作化的主动性、地方的主动性以及任何其他的主动性都压抑了。由于我们把所有事情都过分地集中化了,就得到了这样过度集中的官僚主义的机构和这样的上面负责,以致它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

从总的方面来说,粮食收购问题是这个关系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关系到与这个国家机构的官僚主义斗争的大问题的一个部分”。

在全会上,和“右派”对立的斯大林集团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自己任命的地方上的人士——边疆区和州党委会的书记们,他们反驳了关于农村情绪恶化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开始压缩的“议论”。A. A. 安德烈耶夫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反驳地声明说,“和我一起在北高加索工作的所有同志”并不认为可以“对我们在农村拥有的一切做出悲观的结论……好像有一种什么严密的反苏维埃战线”。他解释说,“我们那里的局势尖锐了”并不是由于在进行粮食收购时使用了暴力,而是“由于秋播这一块遭到了很大的失败”(由于冬天不下雪,播下去的种子都死了)。M. M. 哈塔耶维奇竟敢直接扯谎,说是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农村,在采取了非常措施之后,一切“比去年要好多了”,从全州的情况看,“播种面积……增加了15.6%,而在奥伦堡——增加了30%”,却没有说1927年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特别是在奥伦堡,由于自然灾害,很大一部分播种面积都没有成活,而它们在1928年的“增长”并没有能完全恢复原来的水平。B. П. 舍博尔达耶夫(伏尔加河下游地区)、Ф. И. 戈洛谢金(哈萨克斯坦)以及另外一些人,也是按这样的精神说的。对批判“非常措施”提出的反驳靠的不是证据和事实的逻辑力量,而是假信息和“有组织的机器”的力量。

斯大林在七月全会上的讲话里说到,取消非常措施就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他从意识形态上论证了采取这些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就事先规定出了后来的整个斯大林农村政策的主要内容。斯大林的出发点是一种假设,要为了工业化而保留和利用“剪刀差”,让农民“由于相对高的价格为工业商品多支付一些……和由于农产品的价格少得到一些……这就是说,工业是服务于全国的,为了提高工业,就要对农民征收更多的税,而这种服务的对象也包括了农民。这是一种‘贡赋’,一种‘额外税’”。布哈林1929年1月30日的声明和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2月9日的声明分析了斯大林为了工业化的利益从农民身上征收“贡赋”的口号的真正含义。布哈林解释说,这种贡赋是在对农民进

行“军事封建剥削”，这是完全有根据的。在七月全会上，对于斯大林要从农民和工人身上征收“贡赋”用于工业化的思想，托姆斯基在讲话里到底还是提出了反对意见。

“剪刀差”只是这种“贡赋”的一种形式。斯大林曾允诺要“逐渐减弱这种‘剪刀差’……（而）在若干年之后根本消灭这个对农民的附加税收”。这个允诺一直就没有兑现。遗憾的是，那时建立起来的城乡之间非常不对等的交换制度一直保留到了今天。正是它葬送了国家的农业。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上的第二个思想上的“发明”是，说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会越来越更加尖锐：“随着我们的前进，资本主义成分的反抗将会越来越大，阶级斗争将会更尖锐，而苏维埃政权的力量也会越来越大，它将推行孤立这些分子的政策，镇压剥削者反抗的政策，为工人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的进一步前进创造基础”。斯大林的这个“发明”的真正实质是要论证采用行政的、非常的、紧急的措施“镇压剥削者将会增强的反抗”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须的。

在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之后，斯大林的“来自上面的革命”只是稍微减缓了速度。虽然在全会之后，许多因为 107 条和其他非常措施遭难的人回到了家里，甚至归还了部分被没收的财产，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够让自己的经营完全恢复元气。由于 1928 年粮食作物收成减少造成的商品率下降，农民经济蒙受了损失，而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并没有能充分给予补偿，这样也就不可能保障农村躲过新一轮非常状态。耐普曼在继续收缩自己的活动，不仅是在粮食和皮革市场上。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保留下来了，但是被阉割了，而私人的商业和工业（手工业）也只是在小打小闹。新经济政策还没有被彻底消灭，但是要恢复它就需要对国家的经济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

农业中的非常状态不仅仅是关系到粮食收购和保留新经济政策的问题。这种非常状态的直接延续是加里宁所作的、引起了尖锐争论的《关于建立新的国营农场（谷物农场）的报告》。报告开始时通报说，根据斯大林的倡议，1928 年 4 月 23 日通过了政治局决议，要在 3—4 年里，在俄联邦和乌克兰闲置的土地上组织能生产 1 亿普特商品粮的粮食国营农场。委托加里宁召集的委员会制定出了一个组织 100 个粮食农场的计划，每个农场的播种面积为 3 万—5 万俄亩<sup>①</sup>，总开支为 3.35 亿卢布。还没有等到委员会工作结果和中央全会做出决定，就向南

<sup>①</sup> 一俄亩相当于 2400 平方俄丈或 1.09 公顷。——译者注

部和东南部的相应地区发出了政治局的指令,要在当年就划出土地并种上过冬作物。

设备问题,首先是拖拉机问题,当然显现得更复杂得多了。后来搞清楚了,在3个工厂生产出来的“不是数千台,而是分别为150、180和100台拖拉机”……只有普梯洛夫工厂,在斯大林本人对厂长施加了“压力”之后,才在1928年承担了义务,要生产1200台拖拉机,到1929年生产2000—3000台。结果就像H. M. 安采洛维奇证实的,“在北高加索,新的国营农场的土地是用农民的马,使用农民的劳力耕种的。一句话,就像给地主干活一样……我们开始的时候谈论的是机器经营,是拖拉机,结果用的是牛和驴”。安采洛维奇告诉我们,伏尔加河中游州的任务是“开垦1.8万公顷秋翻地”,开始时答应给144台拖拉机,而过了一个月就把已经答应的减少到了80台,而且同时指示说:“其他的地……要搞到牛,用牛耕种。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得到80台拖拉机。”

但是我们还是回到加里宁的报告上来吧。它的相当大的部分说的不是国营农场,而是农民的经营。“我还是要维护个体经营”,按照整个联盟的领头人当时的想法,它“还是要长久存在的”。面对开会的人,他问道:“……当经济遭到破坏的时候,你们心疼吗?有没有想到把这部分生产恢复起来呢?”他的主要要求是悲凄的:“……给农民定个框框,让他知道他的经营可以扩大到什么范围,给出法律来,用法律来限制富农的剥削气焰,——没有这些是不行的……要知道,个体经营的基础是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加里宁就是把按非常的程序组织粮食农场和希望减轻对农民经营的压力联系在一起。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明,既可以说明他个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明斯大林在需要的时候把政治局委员拉到这边来所采用的手法。加里宁冒出了一句话:“问题在于有多少资金我们是由于没有搞明白就投进去的。为了不出现这种事情,我们需要非常地小心翼翼。但是最终建设国营农场这件事是不可能干不成的……斯大林同志在个别谈话中说过,如果我们能把国营农场发展起来,那我们就能更自由地对待个体经营了。(笑声)那时我们就不需要残酷了(我们是被逼得成为残酷的)”。想必这个“个别谈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加里宁为什么没有成为“张皇失措的人”中间的一个,后来为什么没有成为“右派”中的一个。

主要反对采用非常的程序和以非常的规模建设国营粮食农场的,又是奥新斯基。有一个发言的人称他是“一贯在所有问题上表示怀疑的人”,而另一个人则指责他“在恐吓中央全会”。奥新斯基是20年代联共(布)中央委员中最有教



养的人之一,总是以分析和评价所发生的事时想法独立而与众不同。奥新斯基以他特有的勇气肯定说,要在没有草田轮作和根本不遵守农艺的起码要求的情况下,而且在开始时又没有现代技术设备,甚至没有专业化的干部的情况下,要在干旱地带建立“大量的、面积巨大的粮食国营农场”,这样的方案“不仅是农艺上的无知”,而且也是“经济上的无知”。特别重要的是他批判了依据美国的“粮食工厂”的经验种种说法。此前不久,奥新斯基曾受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委托访问了美国,特别是有目的地研究了本世纪初那里存在的“粮食工厂”。到了20年代中期,这些生产形式在那里已经早就不存在了。唯一的“肯普贝尔小麦工厂”是设计中的粮食农场的样板,就像奥新斯基在全会上解释的那样,实际上这是为了宣传新的农业机械的一个广告企业。他在发言的最后说道,“我想,现在不应该按照这样程序通过这个方案”。

克维林提到了老的国营农场,正如他说的,它们“能够用较少的花费生产出5 000万普特的商品粮……”,还有就是甚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缅任斯基在这里也忍不住冒出了一句:“而且要快得多”。

但是任何论据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斯大林排斥了所有的反对意见,认为它们在意识形态上是不能成立的。组织非常规模的“粮食工厂”的决定就以非常的程序通过了。在过了4—5年之后,当新的国营农场应该满负荷地工作的时候,1932—1933年的歉收和饥荒对这些农场所在地区的打击最严重。(我们要指出的是,无论是1928年的批评者还是本文作者,都不属于反对在国家的干旱地带发展粮食生产的人。这里说的是这种发展的途径和形式。)

全会对日程上的第三个问题——“关于改进培养新专家的工作”的决定,虽然意味着要对高等教育体系进行重大的改组和在今后的许多年里将决定着它的发展方向,但是“在政治上是最没有危险的”。研究这个问题根据的是四月全会的决定,在那次全会上,讨论高等学校的问题是和“沙赫特案件”相关联的,也是和宣布了加强用无产阶级的专家取代资产阶级的专家的口号相关联的。

实质上,在四月全会上,一切只限于号召提高警惕。唯一的实际建议是作为实验把几所高等技术院校从各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部转交给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这个建议受到了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人的激烈反对,没有通过。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主要论据之一,也是他们的反对者难以反驳的,是转交高等技术院校的问题就像高等教育的改造方向的一般性问题一样,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根据这一点,四月全会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授权研究这个问题并准备在中央的下一次全会上审议。

1928年4月17日,政治局重新审议了全会决议中关于委员会组成的那一部分内容。重新建立的、由莫洛托夫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在1928年5月12日开始开会。

在一个半月里,到6月底为止,委员会开了10次会。同时,按问题分成的各个分委员会也在活动。在委员会工作的范围内准备了各种证明材料,对一系列高等学校进行了调查。<sup>38</sup>实质上,注意的中心是3个问题:高等学校的资金、缩短学制和把一些高等技术院校转交给经济部门管理。对这些问题的实际决定其实很少取决于委员会本身。从讨论委员会为中央全会准备的决议草案的速记记录上可以看出,基本问题是国家领导事先就已经决定了的。

先是委员会,然后是政治局和中央全会通过了决定,把6所高等技术院校和5所中等技术学校转交给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2所高等技术院校转交给交通人民委员部,而在四月全会上说的只是有可能转交3—4所高等院校,而且只是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俄联邦和乌克兰的教育人民委员部代表提出了抗议,但没有引起关注。教育人民委员部在减少高等技术院校的学习年限问题上也败下阵来了。

总的来说,七月全会通过的方针是最大限度地让高等技术教育适应工业的直接需要。为了迅速克服工程技术干部的极度短缺,国家领导决定牺牲教学质量。全会的决议包含了组织几个新型高等技术院校的条款,特别是对于紧缺的专业,学制为3—4年。总的在各个高等技术院校里,学制减少到了4—5年,同时限制在高等技术院校学习的时间为5—6年(以前,由于物质状况艰难和底子薄弱,许多大学生在高等学院里一呆就是6—8年)。生产实习大大增加了(不少于10个月)。对于高等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规定了必须根据经济机关的指示从事为期3年的生产工作,等等。

新方针优先考虑的一个方面是最大限度地用党员、团员和工人填充高等学校,限制其他阶层出身的人(职员、老专家的女儿,等等)上学。早在1928年就规定了,要争取做到工人占高等技术院校接纳人数的比例不少于65%,并且要向高等技术院校派去不少于1000名共产党员(建议在最近的几年里每年都要招收“千名人员”)。

这次全会做出的所有这些决定预先就规定了以后许多年国家对高等学校的政策。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数量以及大学生数量都在急剧增加。由于有几个高等技术院校转交给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所有高等教学机构被许许多多的经济部门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瓜分了。吸收工人子弟上大

学的实际做法也兴起来了,其中包括借助提供很大的优惠条件吸收学生,直至不经过考试就录取。到了1932年初,在高等学府里注册的大学生就达到了39.1万人,而1928年初时是15.98万人。同时,增长最快的是工业高等院校的学生队伍——在1928—1932年间,从4.89万人增加到了20.14万人,在同期内,医学院的学生只是从2.61万人增加到了3.21万人。工人在所有高校中占有的比例从1928年的25.4%上升到了1932年的58%。<sup>39</sup>

虽然从表面上看全会是和平地结束了,但是在政治局内部,隐蔽的斗争在继续着并且在准备着更加具有决定性的公开冲突。“布哈林的取代方案”变得越来越明显了——那就是非斯大林式的、以保存与发展新经济政策为基础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案。但是,布哈林和斯大林的立场上的冲突不仅仅是表现在解决20年代末国家面临的那些任务的方案上。在这个冲突的背后存在的,是对新社会的理解上的原则性差异。在这些方案的背后,还有着对目标和手段、政权和群众以及对自己的使命的理解上的、极其深刻的不同。在所有这些方面,对立的双方之间有一道鸿沟。加米涅夫在自己的那份对1928年7月11日的谈话所做的倒霉的记录里,表达得很准确,他转述了布哈林的话:“我们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要比我们和您原来的所有分歧都要严重好多倍”。<sup>40</sup>的确也就是这样。

和加米涅夫的这次谈话是根据布哈林的倡议准备的,布哈林的打算是什么并不大清楚。他未必是在准备反攻和在摸索党的对立一翼的情况。那里还在继续起作用的是托洛茨基的一道死命令:“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和斯大林联手,但和布哈林站在一起永远不可能。”

布哈林本人后来也没有否认加米涅夫记下的东西,从这些记录判断,会面的目的是要防止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可能结成联盟反对“右派”。反对派分子已经完全身败名裂了,而且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值得考虑的支持的可能,斯大林和他们联盟是不可能的,除了惊慌和沮丧外,很难再找到什么解释,为什么布哈林会预料有可能形成这样的联盟。“他非常震惊。有时嘴唇都激动得发抖。有时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已经知道自己注定要完蛋的人”,——加米涅夫看见的布哈林就是这样的。布哈林非常坦白。除了上面提到的准备共产国际纲领、政治局讨论弗鲁姆金的信和中央全会的决议这些情况外,布哈林还向加米涅夫转达了许多其他情况的细节,证明在政治局里有尖锐的对立。加米涅夫详细记录了布哈林说的话,其中可以得出的看法是,布哈林很懂得斯大林在七月全会上的让步真正的含义何在。



(许多发言的人文化水平低,而且又是即兴发言),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原因引起的,例如听不清楚(原始的速记记录上不断会遇到注有“听不清楚”的空白)和速记员水平不高。看来这类原因都有。无论如何说,不能公布这样没有修改过的速记记录。发言人自己做出的也正是这样的修改,使得文字起码是可以看得懂了。

第二,通过对各种不同样式的文字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第二种(有作者修改的速记记录)和第三种(速记报告)样式之间实际上没有区别。这样,我们如果选择速记报告作为公布的基础,就有可能同时公布第二种和第三种样式的速记记录了。同时,中央机关的编辑人员所做的不多的编辑修改就很容易在每页的注释里说明了。

作者对原始速记记录稿所做的修改很大,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完全把它恢复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并列发表两种文稿。但是,既然作者的修改基本上是修辞性的和语法上的,也就没有必要完全考虑它了。同时,意思上的修改,也就是将文字写完或者删除有实质意义的段落,要全部考虑进去。新写进去的文字用加重号标明,删除的段落放在括号里恢复。中括号表明的是编撰者加入的文字。

编撰者认为,通过这样的工作,做到了相当对应地恢复所有3种样式的速记记录。

斯大林发言的原始速记记录曾被从全会的材料中取出,保存在他个人的档案里。正如这些文件所证明的,斯大林的发言经过了实质性的修改。速记员记下的根据“话声”的记录文字先由斯大林的助手 И. П. 托夫斯图哈修改。然后托夫斯图哈改过的稿子由斯大林修改(改动不是很多)。该卷对斯大林在全会上的3次讲话全部公布了改稿和原始记录稿。

这次出版发行依据的是《历史文献出版规则》(莫斯科1990年版)。在最大限度地保存原始资料的所有特点的同时,在一系列情况下,根据现行的正字法校正的文字和明显的笔误没有再加以说明。

这次出版的参考资料有导言,其中有对这段时期以及与全会有关的事件的总评价;有对发言中提到的具体事实的注释;有人物简介和文中提到的姓名查询表;还有缩写词表<sup>①</sup>。

除全会速记报告本身的附件外,编撰者在“补充材料”栏目下还附加了一些

<sup>①</sup> 译文省略了姓名查询表和缩写词表。——译者注

文件。除已经提到的对斯大林的讲话的原始解释外,在“补充材料”里还包括了苏联领导人的几封信和便条,可以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和评价在全会上展开的争论。

*B. П. 丹尼洛夫 A. Ю. 瓦特林 O. B. 赫列夫纽克*

## 注 释

- 1 《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莫斯科1999年版,第255—262页。
- 2 同上书,第313—314页。
- 3 同上书,第228、314、316页。
- 4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85号目录,307号案卷,第28—31、41—45张。
- 5 A. 罗曼诺、H. 塔尔霍娃编:《红军和苏联农村的集体化(1928—1933年)》(文件集),那不勒斯1996年版,第120—138页。
- 6 见M. 列曼:《斯大林的生日,在“二次革命”前夕的苏联》,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
- 7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74号全宗,2号目录,38号案卷,第30张。
- 8 布哈林:《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莫斯科1989年版,第300—301页。
- 9 同上书,第301页。
- 10 同上书,第298—299页。
- 11 同上书,第299页。
- 12 在季诺维也夫被解职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务被集体领导机关——政治书记处所取代。见Г. М. 季别科夫、Э. Н. 沙赫纳扎罗娃、К. К. 希里尼亚著:《共产国际的组织结构(1919—1943)》,莫斯科1997年版,第107页。
- 13 《共产国际文件集(1919—1932)》,莫斯科1933年版,第48页。
- 14 Г. М. 阿季别科夫、Э. Н. 沙赫纳扎罗娃、К. К. 希里尼亚著:《共产国际的组织结构(1919—1943)》,莫斯科1997年版,第133—134页;另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2号目录,6号案卷,第4、6、99、101、102、110张。
- 15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2号目录,6号案卷,第102张。
- 16 A. Ю. 瓦特金著:《共产国际对纲领的争论》,《历史问题》杂志,1999年第4期,第97—110页。
- 17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493号全宗,1号目录,42号案卷,第87张。另见补充材料1。
- 18 Ю. Г. 费尔什金斯基著:《和布哈林的谈话》,莫斯科1993年版,第34页。
- 19 《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的思想》(文件集),莫斯科1998年版,第629页。
- 20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86号案卷,第7张。
- 21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493号全宗,1号目录,42号案卷,第61张。

- 22 《苏联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莫斯科1999年版,第290—295页。
- 23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01—110页;《苏联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莫斯科1999年版,第297—301页。
- 24 Ю. Г. 费尔什金斯基著:《和布哈林的谈话》,莫斯科1993年版,第36页。
- 25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3号目录,736号案卷,第42张。
- 26 莫洛托夫的声明已经公布。见《苏联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莫斯科1999年版,第297—301页。
- 27 Ю. Г. 费尔什金斯基著:《和布哈林的谈话》,莫斯科1993年版,第35—36页。
- 28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417号案卷,第23张。
- 29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715号案卷,第36张,以及第12—20,24—31,32—38页。
- 30 1927年1月,洛米纳泽曾从柏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了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布哈林的不满:“在中央委员会上,我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不能容忍这样用布哈林的名字闹着玩……而且坚决抗议企图在这两条路线之间画出一条什么界限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495号全宗,19号目录,75号案卷,第4张。
- 31 见《1928年2月9—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前夕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共产国际和中国(文件集)》第3卷,1927—1931年,第一部分,莫斯科1999年版。
- 32 详见《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和共产国际的斯大林化——1928年12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德国问题的会议速记记录》,莫斯科1996年版。
- 33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08号全宗,1号目录,61号案卷,第1张。
- 34 《苏联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莫斯科1999年版,第231页。
- 35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第1卷。
- 36 同上书。
- 37 《苏联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莫斯科1999年版,第63页。
- 38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4号目录,80,81号案卷。
- 39 《苏联的干部培养(1927—1930)》,莫斯科1933年版,第13,19页。
- 40 Ю. Г. 费尔什金斯基著:《和布哈林的谈话》,莫斯科1993年版,第32页。
- 41 同上书,第30—37页。



## 目 录

序 1928 年七月全会	
…………… B. П. 丹尼洛夫 A. Ю. 瓦特林 O. B. 赫列夫纽克(1)	
<b>1928 年 7 月 4—12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速记报告</b> ……	( 1 )
第一次会议 ……	( 4 )
第二次会议 ……	( 42 )
第三次会议 ……	( 86 )
第四次会议 ……	( 127 )
第五次会议 ……	( 164 )
第六次会议 ……	( 214 )
第七次会议 ……	( 256 )
第八次会议 ……	( 297 )
第九次会议 ……	( 326 )
第十次会议 ……	( 374 )
第十一次会议 ……	( 408 )
第十二次会议 ……	( 460 )
第十三次会议 ……	( 507 )
第十四次会议 ……	( 556 )
第十五次会议 ……	( 593 )
<b>附 件</b> ……	( 661 )
1. 1928 年 7 月 4 —12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会议	
记录№3 ……	( 661 )

2. 声明 ..... (665)
  3. 米高扬同志在1928年7月4—12日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关于在总的经济局势下的粮食收购政策的报告图表 ... (667)
  4. 在总的经济局势下的粮食收购政策 1928年7月10日联共(布)中央全会根据米高扬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 (670)
  5. 给全会主席团的便条 ..... (675)
  6. 关于组建新的(谷物)国营农场 1928年7月11日联共(布)中央全会根据加里宁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 (679)
  7. 关于改进对新专家的培养 1928年7月12日联共(布)中央全会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 (681)
- 补充材料** ..... (687)
1. И. В. 斯大林和 Н. И. 布哈林就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往来信函 ..... (687)
  2. И. В. 斯大林关于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意见 ..... (689)
  3. Н. И. 布哈林关于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意见 ..... (692)
  4. Н. И. 布哈林和 И. В. 斯大林关于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就共产国际问题作报告的人选的便条和建议 ..... (696)
  5. И. В. 斯大林在1928年7月5日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发言的速记记录(原始记录) ..... (698)
  6. В. М. 莫洛托夫致 И. В. 斯大林的信(1928年6月4日) ..... (710)
  7. И. В. 斯大林致 В. М. 莫洛托夫的信(1928年6月10日) ..... (712)
  8. В. М. 莫洛托夫致 И. В. 斯大林的信(1928年6月13日) ..... (714)
  9. И. В. 斯大林在1928年7月9日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发言的速记记录(原始记录) ..... (716)
  10. И. В. 斯大林在1928年7月11日联共(布)中央

---

全会上发言的速记记录(原始记录) .....	(741)
11. Н. И. 布哈林关于 А. И. 米高扬在 1928 年联共(布) 中央七月全会上的报告的札记草稿 .....	(747)
12. Н. И. 布哈林 中央全会关于 А. И. 米高扬报告的决议 草案 .....	(755)
13. 政治局会议第 21 号记录摘要 .....	(758)
14. 政治局关于高等技术院校问题委员会会议记录№1 .....	(760)
15. 政治局关于高等技术院校问题委员会会议记录№9 .....	(763)
16. 苏联副财政人民委员 С. М. 库兹涅佐夫给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的便条 .....	(765)
注 释 .....	(768)
人物简介 .....	(791)

绝 密

按密件存放  
用后归还  
禁止复制

# 1928年7月4—12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速 记 报 告

第一期

原编号№5500/c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1928年7月4—12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议 程

1.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问题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
2. 共产国际纲领  
(布哈林同志)
3. 在总的经济局势下的粮食收购政策  
(米高扬同志)
4. 关于组建新的(谷物)国营农场  
(加里宁同志)
5. 关于改进高等技术院校对新专家的培养  
(莫洛托夫同志)

## 第一次会议

7月4日上午

**鲁祖塔克**:同志们,现在开会。建议委托李可夫同志主持这次全会。有没有反对的意见?

**喊声**:没有。

**主席(李可夫)**:大家都拿到了全会的日程吗?谁想发言?现在表决全会的工作程序:赞成的请举手。通过。

关于议程。迄今为止理论上的议程是这样的,会议从11点到3点,晚上从6点到10点,虽然从来没有做到,想给每个报告人40分钟,发言的人有时也超过时间,还是每人给10分钟。有没有改变议程的建议?

**柯秀尔**:我想,粮食收购的经验教会了我们掌握现实的数字。(笑声)

**主席**:这个议程可以通过了吗?

**柯秀尔**:无论如何不行。

**喊声**:增加时间。

**主席**:给报告人增加到1个小时,发言的人还是原来的时间。有没有反对的意见?没有。这样,就给报告人的时间增加到1小时,在其他方面议程照旧。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有1小时时间。

##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问题

**曼努伊尔斯基**:在共产国际存在的9年里,我们在获得的经验基础上,积累了大量原则问题,既有纲领性问题,也有策略性问题,需要在最近的第六次代表大会<sup>1</sup>上做出某些总结。布哈林同志将给你们做关于代表大会各项工作的纲领方面的详细报告。我的任务要简单些:主要是谈谈现在共产国际面临的迫切的策略问题。

同志们,我当然不能单独涉及共产国际的66个党面临的所有问题。我不得不主要谈谈现在对于每个个别的党共同的和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最主要的问题。

## 自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的变化<sup>2</sup>

自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在国际局势上和工人运动本身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你们知道,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是在1923年德国革命遭到极其严重的失败之后召开的。<sup>3</sup>大会的工作是在考虑到中欧经历的失败、批判性地分析德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的情况下进行的。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太多地偏重欧洲了。和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相比,我们的任务变得复杂得多了。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第一个变化是最近几年英美矛盾在成熟。在华盛顿签署了海事协议的3个大国在日内瓦会议<sup>4</sup>上发生了分裂,开辟了帝国主义发展的一个全新时期。因为在1914年前夕,战争事实上是两个国家——德国和英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而现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这样的时期,轮到了美国 and 英国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只要读读英美的报刊就足以看到,这些矛盾在日益积累起来。许多同志依据现在英国在橡胶问题上让步,倾向于认为这些紧张的关系有缓和的趋势。这是不对的。英国不得不在橡胶问题上投降。它企图在自己的殖民地削减橡胶的生产,迫使美国付出更多的钱,但是被荷属印度破坏了,它抛出了足够数量的橡胶,消除了英国施加压力产生的后果。在英国的报刊上,在《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sup>5</sup>这样的报纸上,你们肯定可以找到完全确定的、要和美国资本主义达成协议的倾向。这是由于英国帝国主义正处于防御状态。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这种成熟完全推翻了当年托洛茨基在自己的那本《欧洲和美国》<sup>6</sup>的书里提出的理论,说什么由于欧洲生产不足和美国生产过剩,将会建立一种美国对欧洲的经济专政,欧洲将只能坐等一份有限的口粮。不该忘记的是,英美矛盾的这种成熟是在欧洲——经济上正在从战后危机中抬起头来的欧洲,发生托拉斯化的局势下发生的。

国际局势发生的第二个变化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的瓜分。<sup>7</sup>对于这种瓜分的形式和期限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写道,帝国主义列强围绕瓜分中国展开的斗争现在已经如火如荼,是把这些活动的进展速度描写得太快了。这样提出问题是错误的。问题在于,比如说,《中国新



闻报》是主张在中国采取积极行动的一个没有多大影响的团体的机关报,不能只是依据这样的报纸。如果你们读读美国的大报,那你们就会相信,这种对中国的瓜分暂时是以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默默地支持日本的武装干涉这样的形式进行的。这种默默的合作会持续多久,将要取决于一系列条件。但是暂时美国的侵略主义者遵循的是日本的政策,而在香港冲突<sup>8</sup>之后,当中国和英国之间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日本扮演的是旁观者的角色。毫无疑问的一点是,那就是在中国存在着帝国主义者争夺的趋势。将来这种争夺是不可避免的,但暂时,在当前时刻,这些矛盾的发生所采取的形式,并不能让我们说,在1929—1930年我们将会看到大国在太平洋上发生冲突。在这场将要发生的太平洋冲突中,中国不仅可能是对象,而且可能会是为自己的民族解放进行斗争的主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是不是能够对这样的决定性战斗有所准备。

第三个新的因素是,现在全世界的帝国主义矛盾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这样强烈的矛盾在4年以前还未曾有过。这些矛盾到处都在发展。法西斯主义是欧洲最强大的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它推行的带有战争威胁的政策我们是知道的。这场斗争现在正在围绕着争夺爱琴海、萨洛尼卡、亚得里亚海、丹吉尔,在地中海、巴尔干、中欧和在边缘国家,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尼加拉瓜等地进行着。现在可以算出在地球上有着20个这样的点,它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可能起到当年萨拉热窝所起的作用,带来噩运。有人说,现在世界帝国主义害怕战争,企图化解矛盾,以便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作为一种趋势,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不应该忘记,资本主义的天性可能会比日内瓦的外交官们的意志更有力。我们知道,国际联盟最主要的任务是靠着牺牲苏联尽可能在个别的小国之间达成一定的协议。

但是波兰和立陶宛之间冲突的历史<sup>9</sup>表明,这是一个多么困难和复杂的任务。帝国主义的矛盾就是这样汇集起来的。

矛盾发展的另一个渠道是帝国主义和革命人民之间的矛盾。这里的中心是帝国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间的矛盾。关于这一点,在我们的报刊上和我们的提纲里写得很多了,不需要再谈这方面的情况了。应该指出的只有一点:资本主义世界现在非常注意地盯着我们国内各种关系的发展,如果现在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复杂情况,如果我们现在陷入了什么党内的争论,那么无可怀疑的是,资本主义世界就会利用这一点来加速对苏联的进攻。这会成为加速战争到来的因素。这是需要考虑到的。

第五个新的特点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殖民地将起到的作用就和它们在1914年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时不一样了。从1914年起,有些东西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得相当大。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高涨说明,如果发生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殖民地将不仅仅是被分割的对象,殖民地将同时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成为革命战争的主体。如果说我们在1914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看到的是爱尔兰的表现,那么能不能想象,如果资本主义世界现在陷入战争,那么,像印度这样的大殖民地,像中国这样的大的半殖民地,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殖民地,会安安静静的呢?未必会是这样吧,同志们。由此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第二国际<sup>10</sup>至今一直忽视殖民地问题,而现在,在最近这段时间里,企图要加强在殖民地的地位。你们知道珀塞尔的印度之行,你们知道日本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团被派往中国。所有这一切发出的信号是,第二国际现在理解了殖民地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就像世界资本主义在国内的劳动和资本关系中寻找自己在工人阶级内部的代理人、通过社会民主党树立这样的代理人一样,它也追求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树立代理人,以此来破坏殖民地的这种革命作用。现在,在8月即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上,第二国际将提出殖民地问题,这也不是偶然的。这反映出的是,现在殖民地具有了重大的意义。

在唤醒殖民地人民这件事上,中国革命具有多么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我们共产国际不容抹杀的一种优势。如果说失败了俄国1905年革命在东方和亚洲人民的觉醒中曾起到了巨大作用的话,那么,中国革命虽然遭到了暂时的失败<sup>11</sup>,能不能就想象它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呢?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在1905年革命之后曾写道,俄国革命将唤醒中东和远东一系列国家的人民。这些话后来被证实了。我们看到了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1911年的中国革命<sup>12</sup>。殖民地的人民群众被动员起来了。现在中国革命把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许多国家的人民带入了这场运动,在印度尼西亚的起义之后,印度的民族革命运动在成熟,在那里,英帝国主义者为了镇压反对西蒙委员会<sup>13</sup>的游行不得不采用了武力。埃及的斗争在继续。就在不久前,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派出巡洋舰让埃及政府能更好说话些。所有这些说明,未来的战争将会和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战争极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这就是第二个方面的矛盾。

最后是必须要谈到的第三个方面,即自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国际舞台上劳资矛盾的尖锐化。那个时候,在1924年召集会议的时候,在德国有巨大的

革命战役和失败,但是欧洲的其他地方已经沉静下来。现在我们碰到的是另外的局面。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的这4年里,我们经历了一系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如果你们翻开这个时期的一页页革命日历,那么你们就能看到位于首位的英国全面大罢工。<sup>14</sup>虽然它失败了,但它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近10年里,它无疑是继我国和德国的革命之后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在1926年5月1日之后——1927年7月15日发生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惨遭损失的维也纳起义。<sup>15</sup>接下来是在萨科和旺策基运动中的活动。<sup>16</sup>

最后,就在不久前,在巴尔干的帝国主义战线的—一个地段上,爆发了希腊总罢工。这场罢工从卡瓦拉的烟草工人中开始,几天时间里就蔓延到了一系列城市、输水管道、发电站、一部分铁路,并且提出了在这个好像还没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经济基础的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如果在这4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事件之间,你们再看看在工人运动中间展开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进程,那么你们就能看到,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发生过一系列的工人罢工。我们知道,现在北美合众国正在发生矿工罢工,已经持续几个月了。德国也发生了一系列罢工,其中最大的是萨克松冶金工人的罢工。我们看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矿工和纺织工人的罢工,几个月前发生了法国交通业工人的一系列罢工,在农业工人中间,一场大的运动正在酝酿,在国家职员和银行职员中间也是同样。所有这些都是国内战争的一个个小的策源地,这种战争的各种成分正在逐渐地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积累起来。

与此同时,现在我们在农业国家也可以看到农民左转的进程。我们很久没有看到像保加利亚农民1919年的运动那样的农民运动了。<sup>17</sup>在罗马尼亚,现在,在布勒蒂亚努政府和民族农民党之间斗争的基础上,在保护本国资本阵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受到英国各种影响的那些资产阶级派别之间的斗争基础上,农民群众的类似运动正在成熟,展开了一场已经超出了领导人对其规定的范畴的群众运动。

在阿尔巴-尤利亚的运动属于那种不会不留下痕迹的运动中的一个;它在其他国家也得到了反映。现在南斯拉夫农民运动的高涨也提上了日程。农民运动像是一个震中,波及了巴尔干地区,就像当年1848年的巴黎革命点燃了一系列临近国家一样。来自保加利亚的最新消息说明,那里的农民运动新浪潮也正在成熟。

第七个变化。1923年的德国革命失败之后,在欧洲的和平主义时期之后,在中西欧形成了一个共产党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合法存在的时期。特别在和苏联

交界的国家和在巴尔干,白色恐怖占据了统治地位。最近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们看见,资本主义世界现在不仅是在一步步地走向全面镇压工人运动,而且首先是打击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现在我们在全世界几乎没有合法的共产党。现在,在那些一直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国度里,对共产党员做出的是服苦役的判决,如果你们看看这种状况,你们就会看到,这个进程不是偶然的:它也是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联系在一起的。

谁是这个进程的牵头人呢?走在这个进程前头的,首先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第六次代表大会将需要研究我们打击法西斯主义的方法问题。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是一种耻辱(我现在是从自我批评的角度说的)……是的,同志们,我们也需要自我批评……

有人喊:我们欢迎。

**曼努伊尔斯基:**虽然我们是一个在国际上没有合法地位的党。一些年来,我们没有能展开广泛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群众斗争,这对共产国际是一个耻辱。我们的运动带有帮助革命战士的国际组织<sup>18</sup>的性质,而不是政治运动。看看对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它的罗马组织的判决吧:26—30年监禁,这就像沙皇制度给民意党做出判决的那个时期一样。这实际上是在削除现在共产主义运动最优秀的先锋队的上层和在政治上将其窒息。我们在许多国家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以前我们的党在那里还多少可以公开行动。就拿法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吧。在历史上,哪怕是在最近的50年里,哪里听说过在资产阶级民主的第三共和国,会像我们的杜克洛同志得到的那样,给工人运动的革命活动家判处30年的苦役。许多法国同志不理解这是一个正在到来的新时期,他们想这是偶然的和很快就会过去的现象。例如,有这样的事实,警察冲到各个支部的会议上去,大打出手和逮捕。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迫害时期,在选举之后就会消除的,议会的“合法性”会重新得胜。现在完全显然的是,法国的反动派就和法西斯主义一样,正在走上疯狂迫害共产党员的道路。你们就拿德国来说吧,最近共产党员在那里呼吸还多少比较自由,再说凯特尔企图关闭红色前线人员联盟吧。<sup>19</sup>你们以为明天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企图了吗?在社会民主党政府执政的条件下,红色前线人员联盟就能够保险不被查封了吗?不会的。如果德国的阶级斗争将进一步尖锐的话,而这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就将会一再看到这种企图的出现。你们看看捷克斯洛伐克,那里曾是一种寂静的、平静的政治气氛,我们的党在那里曾是合法的——这个党也正在被卷入阶级的炎炎烈火。

对于一个小小的运动会事件<sup>20</sup>,反动派就如此疯狂。7月6日我们将很可

能见证到捷克的工人和马萨利克的民主共和国之间的一场流血冲突。<sup>21</sup> 报刊检查猖獗,工人的报刊被窒息。在共产党人至今可以自由工作的维也纳,库恩·贝拉被逮捕<sup>22</sup>难道是偶然的吗?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正在走向最主要的共产党处于非法和半合法存在的状态。我们正在走向共产党的领导人将会在大街上被人从角落里和直接对着胸膛枪杀的时刻。帝国主义的矛盾在成熟,在推动着资本主义世界走向战争,殖民地和帝国主义世界之间的革命矛盾在成熟,国内的矛盾在成熟。如果多少想一想这种彼此交织的情况,那就会看到正在形成一个极其复杂的症结,只能用革命的办法把它打碎。战争、革命、殖民地——这是我们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基本问题和核心。这次代表大会的日程安排也就是要让这3个基本问题现在就成为世界代表大会上关注的中心。

### 关于左转问题

有必要简短地谈谈这些问题。我首先从左转的问题说起。在英国的罢工遭到了失败的时候,我们曾在一系列的決定和决议中预言说,“领袖们将右转,群众将左转”,这写进了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sup>23</sup>。这是不是得到了证实呢?现在,在我们到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获得的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说,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完全正确地评价了局势。我们通过英国的例子可以最鲜明地看到这个过程。在总委员会<sup>24</sup>叛变之后,领袖们向右转了。立即就提出了工业和平的思想<sup>25</sup>。国际著名的化学联合公司巨头蒙德召集了有工业代表人物参加的一系列会议。总部也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了这些会议。唯一的一个斗胆在总理事会内部抗议这种虚伪的阶级合作的,是英国矿工代表库克。在兰开夏郡资本向英国纺织工人的生活水平展开疯狂进攻的时候,整个总理事会所持的都是工业和平的观点。读一读齐特林印发的、作为英国自由党的某种政治福音书的那些文章,也就足以看到,这是改良主义的工会和企业家组织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机构沆瀣一气的完整纲领。与此同时,在阿姆斯特丹起重大作用的英国改良主义者<sup>26</sup>给出了工会运动分裂的信号,这个信号被其他国家的改良主义者接过来了。我们到处,甚至在瑞士这样的小国,都可以看到对这种政策的回应。在共产党人在巴塞尔协议中取得了一定影响并紧紧把握住了它之后,瑞士的改良主义中心提出了一个分裂的口号。<sup>27</sup>在希腊,虽然改良主义者在工会代表大会上处于少数,但他们依靠警察,把受共产党影响的大多数开除了。<sup>28</sup> 这些事实不是孤立的。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我们将看到一场争取工人阶级人心的

疯狂争夺。

但是,在领袖们右转的同时,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少数派运动在增强和巩固。你们可能已经在报纸上读到了关于梅克斯顿和库克的演说。这个演说不完全是个人的,它是梅克斯顿和库克以及政府的前部长麦克唐纳、威特利在向共产党发问,在现今的局势下,当工人党改变了纲领,正在成为自由党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办。代表共产党和这个集团谈判的加拉赫同志建议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他们这样做了。现在独立的工人党在做什么呢?它在企图把这个运动掌握在自己手里并让它失去作用。“领袖在右转,群众在左转”不仅在英国党内,而且在整个国际舞台上,正在通过每天的经验得到证实。

### 什么决定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采取的方针<sup>29</sup>

这种领袖的右转和群众的左转是决定了我们要无情批判社会民主党的因素之一。反对派对事态的看法是这样的:在走向稳定的基础上,改良主义取胜的先决条件正在形成,我们只能是在革命的局势下取胜。反对派认为,英国的罢工是在创造直接的革命形势,甚至在这场罢工失败之后也是如此。在资本主义走向稳定的基础上(这是我们在提纲里说过多少次的),现在发生的是国际资本的托拉斯化。国际康采恩在更多地奴役工人阶级。合理化冲击的是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每一个小的冲突都有变成整个阶级冲突的危险。既然资本的联合具有了国际性,每一个地方的冲突就都有变成国际冲突的危险。现在,在资本主义稳定的基础上发生的是阶级斗争的加剧。第二,需要注意到社会民主党的法西斯化。就用最近这些年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来说吧。不要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党了,就是战争最初几年的党,最新版本的社会民主党和它们相象吗?社会民主党坚持的是在帝国主义的战争中保卫资本主义祖国的立场。但是从那之后,社会民主党走得更远了。就拿摩洛哥战争来说吧。法国社会民主党保卫的是什么样的祖国免遭“加拿大的”\*部落的侵犯呢?<sup>30</sup>能够严肃地说这些部落进攻了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法国吗?完全清楚的是,在这场战争中,社会民主党事实上公开地和虚伪地持有殖民掠夺的观点。

接下来再看看法国总工会演变这样的新事实吧。<sup>31</sup>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建立了“行会国家”。附着在这个国家身上的是意大利的改良主义,它实际上是和法

\* 原文如此。——编者注

西斯工会联在一起的。你们可以看看,比如说在法国,现在国际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者是在怎样推行这种实际做法的。你们知道,茹奥和彭加勒提出了建立民族经济委员会的思想。这将是一种法国资产阶级的国家计委,但是,这是比我们的国家计委拥有更多职能的国家计委。

李可夫:是按照托洛茨基的方案吗?

曼努伊尔斯基:可能是吧。这个民族经济委员会应该这样组成,就像法西斯的议会一样,按照行会代表制的原则。

完全清楚,既然对议会制度做出了这样的修正,那就证明了法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有向法西斯主义发展的趋势。改良主义的联盟是怎样对待这一点的呢?他们不仅接受了它,而且在自己发表的“积极”竞选纲领中维护它。社会民主党人也是同样的情况。社会民主党人就和改良主义工会一样,正在成为资产阶级国家中的组成部分。彭吉尔是法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却在国际联盟里代表法国政府。彭吉尔的立法,一旦发生战争就搞全民的军事化,这也是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国家沆瀣一气的明显例子。然后还可以举出阿尔伯·托马访问意大利的例子,还有他在法西斯主义工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这样的事实。他在那里说,法西斯主义积累的大量经验如果转用到欧洲来,那将是不坏的。这是不是偶然的呢?一点也不。这是和社会民主党的整个演变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国际改良主义的无情批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西欧的同志中,有许多人不是马上就考虑到了这些变化。可以想到的是,甚至推行在十五大上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央全会第九次扩大会上我们采取的路线,也不是那么顺当的,我们甚至在一些党的内部还可能要经历危机。我们还不得不打破惯性。我们不得不和雷诺·让同志辩论,他抱怨我们,说我们把当年德国共产党人在登兴堡的再次选举中采用的竞选策略<sup>32</sup>强加给了法国共产党。他说,共产国际为这个策略狠批了德国共产党,那为什么共产国际却建议我们采用它呢?雷诺·让没有懂得,当时在德国完全是另一种局势,关于兴登堡的问题也不是这样提出来的。我们向德国同志的建议提出了一个有回旋余地的做法。我们说:可以向社会民主党建议搞统一战线。如果他们反对,你们就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德国同志没有提出这个建议,我们为此批评了他们。我们不得不既要和法国同志,也要和英国同志一起,按照这个方针指出的路线,把这场斗争坚持下去。现在我们有了一些结果,很小的结果,就像一切在我们这里一样,进行得都很慢,没有能很快产生效应,但是我们可以现在通过这些结果检查我们的方针。我们应该首先看看,党的十五大预测工人阶级会左转是不是正确。其次,我们在法国采取了新的竞选

策略,这样做是不是对?我在这里要谈到选举了。我要事先说明,如果我要比较详细地谈到这方面的情况,请不要指责我有议会倾向,但是,这是一次检查。在共产党的实践中,选举总是起着次要的作用,这些选举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是对新策略的一种检验。我们应该在选举中检验这个策略:不仅是我们对法国的,而且是我们对其他国家的总的方针是不是正确。现在,在德国、法国和波兰的选举基础上,可以完全确定地说,我们的方针和我们的新策略是绝对正确的,它们已经被百分之百地证明了是正确的。但是不必简单化地想象左转的过程,不必想象工人阶级已经大批大批地转入了共产主义的营垒。这个过程要复杂得多,缓慢得多。

### 左转的种种进程是怎样发生的

稳定时代的这种进程的典型特点是,我们现在的发展表现在广度上而不是在深度上。比如说英国的罢工吧。共产党员在罢工的时候是很有影响的。看来好像在总部叛变之后我们应该能把几万工人吸收到共产党里来。英国共产党吸收了多少呢?它从5 000人发展到了1.2万人,而在罢工后和在迫害后的这段时间里,这个数量下降到了7 500人。或者说另一个例子:共产党在维也纳的7月事件之后的地位。在O. 鲍威尔写到幻想和革命的浪漫时期已经过去的时候,好像在“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些事件中这样可耻地投降了,而社会民主主义党的工人撕掉了自己的党证,扔到了官僚们的脸上的时候,我们应该能赢了。但是我们的党只赢得了300个人,而社会民主党在7月15日之后却赢得了2万多人。

最近这些年,我们不能夸口说我们的党员数量增加了,在法国劳动同盟里,我们在一些地方蒙受了严重损失,例如,在巴黎冶金工人联盟里,我们失去了大约30%,而同时我们总的影响扩大了。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我们的思想影响和组织条件之间的不平衡。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稳定时代的典型的群众左转现象。

再有,正在发生的左转的第二个特点是,左转的种种进程是同时平行发展的。我们有所赢,但是社会民主党人也有所赢。这里有一些能够最清楚地说明这些进程的数字,它们在德国反映了出来。

有意思的是,在5月20日的选举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挑起了关于共产党是靠什么人发展起来的争论。他们证明说,共产党人主要是靠资产阶级政党



发展起来的,而他们是靠工人区赢的。要想能证明出是类似的情况,除非真正具有《前进报》<sup>33</sup>的铜脑门和虚伪,除非是把自己的读者看成是大白痴。我可以举出工人居民占大多数的工人区选举的几个数字来说明共产党是靠什么取胜的。

我们就拿柏林的一个区——韦丁区来说吧,那里的“反对派”是很强的。那里的工人居民占57%。社会民主党人在这里赢得了11%,共产党人赢得了54%。

另一个区是瓦谢齐。工人居民占53%,共产党人赢得了57%,社会民主党人赢得了21%。

施潘道集中了西门子的企业。共产党人赢得了73%,社会民主党人赢得了21%。

腓特烈海恩。工人居民占53%,共产党人赢得了65%,社会民主党人赢得了7%。

最后,诺伊克林是我们的堡垒,当你到了诺伊克林的时候,你会感觉好像到了罗戈日—西蒙诺夫区或者克拉斯诺普雷斯涅斯克区一样。

有人喊:或者是在扎莫斯科沃列茨克区。

有人喊:在哈尔科夫更好些。

**曼努伊尔斯基:**我不怀疑在哈尔科夫更好。在诺伊克林我们有51%的工人居民。我们在那里赢得了67%,社会民主党人赢得了11%。

这些数字非常好地表明了共产党现在的成长靠的是谁。我们要说,根据德国和法国的选举,特别是根据德国的选举,我们有一种成为德国无产阶级唯一政党的趋势,这不仅是说在思想上,而且是在组成的数量上。P. 菲舍尔过去所说的不过是一席空话;不能说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任务,但是我们肯定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就拿犯有极左毛病的柏林选举来说吧,我们多得了70%的选票。社会民主党人在那里多得了10%。

我们现在把柏林牢牢地掌握在了手里。在柏林,每4个选民就有一名共产党员,这是非常大的胜利。这表明我们在德国正在成为真正群众性的政党。再拿波兰看看。比如说看看栋布罗瓦区的选举吧:共产党员有6.7万,波兰社会党是2.9万。在华沙,共产党有6.5万,在最近的市政选举中,共产党也是有6.5万。波兰社会党在1927年最近的市政选举中有7.1万,现在只有4.3万。在这里也是无可争议的,我们的成长靠的是影响工人阶级。我们看看,社会民主党人是靠什么成长的呢?

如果我们拿来最近德国选举的数字,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例如像德国民族

党<sup>34</sup>这样的党,它过去是有历史和传统的,但是遭到了一个政党在某个时候未必会遭到的那种失败。他们在600多万的选票中失去了近200万,也就是30%,而且甚至把自己选举的组成人员大多丧失了。而谁赢了呢?社会民主党赢了200万——这是在德国资本主义垮台的年代向法西斯主义倾倒的小资产阶级,现在它正在离开法西斯主义并走向社会民主党。现在中小资产阶级在左转,在走向社会民主党;工人阶级也在离开和向我们走来——正在发生的是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

但是同时也不能把事情想象成是只在发生左转的单向进程。还发生着一定程度的极化:同时反动派也在一些地方有所加强。就拿法国选举的结果来说吧。社会民主党人是如何大嚷大叫地说我们在和反动派调情等等。就拿法国议会最近的投票说吧。绝大多数的人和激进的社会党人一起,投了彭加勒的票。那些投了反对票的社会党人考虑的是自己要保护的选民,而事实上支持了彭加勒的整个政策。彭加勒拥有稳固的大多数,这是第三共和国的任何一个政府所少有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之前对工人们说,“如果投共产党人的票,那就是在为分裂,为反动派的胜利投票。”难道上面的情况不能让这些工人睁开眼睛吗?在波兰,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我们的地位加强了,波兰社会党的影响减弱了,但是皮尔苏茨基分子<sup>35</sup>有了非常大的增长。就说4个大区吧:栋布罗瓦区、华沙、罗兹和山区西里西亚。在这些区里,皮尔苏茨基分子有36.4万,共产党员有19.9万,波兰社会党人有18.2万。你们看见了,右翼是靠波兰社会党人得到加强的。这就是为什么要考虑所有这些因素。不能只是对我们的胜利做出总结和得出匆忙的结论。

### 从德国选举得出的结论

例如,你们知道,德国共产党收集到了323.2万张选票,换句话说,就是接近了1924年5月的数字,当时革命事件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着。有一些地方我们有了很大的巩固。我们得到加强首先靠的是最大的工业中心,而首先是由于我们在柏林得到了加强。德国的选举揭示出了什么呢?我们看到,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在德国都有损失,例如像中心党这样的党,损失了大约40万选票。需要了解这个党的选民的保守情绪才能理解发生的变化有何意义。在资本主义稳定的条件下,当资产阶级政党失去选票而社会民主党获胜的时候,这个进程表明了一点,那就是现在社会民主党正在成为促成资本主义稳定的政党。资产阶级政党

正在离去,资本主义的命运现在委托给了社会民主党。

第二个结论。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获胜了呢?德国是由36个州组成的,在社会民主党人实践联合政府政策的那些地区、那些州,在这些地区我们获胜了;相反在那些社会民主党人推行反对派政策地方,我们的成就却非常小。必须要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表明,现在,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加入大联合政府的时候,我们共产党的面前出现了广泛的条件,可以加强在群众中的影响,我们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的瓦解将不会宛如灾难,这种瓦解将会是比较缓慢的过程,但是我们的高涨将会是更系统化的和稳固的。

第三个问题:我们在什么地方输了呢?第一,我们的运动在巴伐利亚是非法的,我们在那里输了;我们在图林根,在汉诺威、法尔茨也输了。在那些有极右危险的地方,<sup>36</sup>在那些极左分子从组织上破坏了我们的运动的地方。但是你们是不是在想,极右分子提出自己的名单,就为他们收集到了选票呢?不,同志们,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大多数人没有投极右派的票,而是投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票。结论是,德国的极右派不过是在我们队伍里的社会民主党的代理人。这是今天德国的工人阶级通过经验已经熟知了的。

第四个结论。至今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是在用共和情绪做文章:它一直在证明,无产阶级首先应该巩固共和国;它一直是在用君主制的幽灵搞投机。在5月20日的选举之后,就不能再继续玩这种游戏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随着资本主义的稳定而得到了加强,现在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是经济斗争。例如,《每日先驱报》在评价德国选举的意义时写道:现在,在共和国得到巩固之后,德国工人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经济斗争。而这就意味着,如果德国的工人阶级不得不求助于罢工,那我们将会有可能就像在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府问题上一样,把新的工人阶层拉过来。最好的例子是萨克松的胜利。改良主义者在那里背叛了冶金工人的罢工,只是在论证这一点的基础上进行了必须的调解,我们就在萨克松赢得了胜利。

第五个结论。是什么样的政权许诺要给无产阶级一个以社会民主党的总理为首的联合政府呢?现在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是不是意味着对共产党人来说已经有了一个“合法的忍耐”时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扩大了”,社会的“和平”的时代到来了呢?在德国共产党内,对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有些同志在那里证明,工人阶级正在进入一个共和自由的时期,现在生活将会轻松些,将会有制度的极大民主化,等等。这些同志是绝对不正确的。正是随着德国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在有了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情况下,对内对外的反动将有所增强。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以及它“民主化”的程度取决于阶级关系尖锐的程度。诺斯克在1918—1919年革命中的例子就足够令人信服地勾画出这种状况的情景了。

[关于情绪说两句。我应该说,同志们,如果从我们和上层分子进行的那些谈判来判断,波兰工人中间现在的情绪,德国工人中间的情绪,法国工人中间的情绪——都是相当好的。说实话,当我来到这里并看到这里无疑是在制造某些惊慌情绪的时候,我感到吃惊了。现在欧洲的情绪是好的,在波兰也一样。]

### 从波兰的选举中得出的某些结论

现在我来专门谈谈波兰的情况。我对波兰想说的,是以下情况。波兰的选举是在完全独特的形势下进行的。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波兰这样的迫害活动。名单作废了,候选人被逮捕了,等等。我不详细谈这些情况了,这是众所周知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党从1100万投了票的选民中收集到了84万张选票。这些选票的价值是巨大的,这些选票的价值要比那些在公开的舞台上活动的党得到的选票的价值更大。但同时这次选举给我们发出了一系列很危险的信号,现在闭口不谈这些危险是有害的。特别令人不安的是皮尔苏茨基在科列斯地区<sup>37</sup>赢得了最多的选票,这是因为,至今为止这里一直是起义运动的堡垒、革命情绪的堡垒和居住着少数民族的边界省份。当然,这里曾竭尽全力对选举大力造假,欺骗行为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指出一点也就足够了:沃伦省的省长在选举前的3天就摆出了放满选票的投票箱。国会指出了这个事实,那里发生了游行;再比如,乌克兰的激进分子要求皮尔苏茨基把偷来的选票交给他们。在这些边境地区,厚颜无耻的做法是彻头彻尾的。但是除了这些伪造外,皮尔苏茨基分子在边境地区的强盛是事实,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这意味着,一旦发生战争,这些边境地区可能起到的作用将不是限制波兰地主和资本家的胃口。接下来,皮尔苏茨基不仅在边境地区变得强壮了,而且在一些工人区也是靠了损害波兰社会党强壮起来的,这是一种很具特点的情况。我从华沙的几个区引用两三个数字。例如,像莫卡托沃这样的区。在市政选举上,共产党人收集到了2935张选票,在议会选举中得了1935张选票,波兰社会党分别是2700张和1200张。皮尔苏茨基分子是1200张,在1927年的议会选举中是6000张,也就是赢得了比谁都多的选票。这表明一部分工人从波兰社会党转向了皮尔苏

茨基。这些选举还表明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说波兰共产党员在我们向华沙进军<sup>38</sup>的时候所面临的<sup>38</sup>任务,他们现在也还没有解决。我指的是波兰当地农民的问题。共产党人主要是在华沙、罗兹区、栋布罗瓦区取得了胜利,但是在波兰农民中间赢得的选票很少。我们的党在波兰的农民中的工作做得少。第二点是,我们相对稳固地在少数民族的无产阶级中站住了,但是对波兰无产阶级的基本骨干,特别是在那些过去属于德奥帝国版图<sup>38</sup>的地区,我们触及的还不够。在波兰进行了过度的宗派斗争,这妨碍了实现这个任务。现在共产国际需要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

同志们,现在我来专门谈谈法国的选举。

主席:你要转向所有其他内容和结束一切只剩下5分钟了。

喊声:延长时间,延长。

曼努伊尔斯基:我现在就可以结束,但是我还是想详细地讲讲……

卡冈诺维奇:讲讲各个党的状况。

斯大林:还得给30分钟。

主席:您还需要多少时间?

曼努伊尔斯基:我认为还需要45分钟。

斯大林:要么40分钟,要么50分钟。

曼努伊尔斯基:如果你们给我一个小时,我将努力在少些时间里讲完。

主席:表决。谁赞成给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增加45分钟?谁反对?谁弃权?  
(喧闹,交谈声)

通过,45分钟。

## 法国选举的教训

曼努伊尔斯基:我现在来谈法国的选举,按我的看法,这次选举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我们第一次采用了新的选举策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软弱的方面。你们知道,在法国,我们增加了21%的选票,我们收集到了100多万张(107万张)选票,我们主要是在工人区获胜了,我们在巴黎站稳了脚跟,在北方赢得了2万张选票,那里此前一直是法国社会民主党的堡垒,我们在那里的得票数从6.5万增加到了8.4万。我们在作为法国的顿巴斯的加来海峡这样的地区,把选票从1.9万提高到了2.8万。我们在卢瓦尔这样的地区取得了胜利,我们在这个地区把选票从6500张提高到了1.5万张。我们在一向毫无疑问地掌

握在社会民主党人手里的奥特-比恩\*这样的地区获得了胜利,在那里,我们把自己的选票数量增加了1/4。我们在工人区到处几乎都得胜了。我们首先是在农民居多的省份的农民中间失败了,这是由于通货膨胀时期已经结束了,1924年倒向我们的农民现在正在离去。

还有一件非常有特点的事,那就是在巴黎选举时,共产党人围绕在不久前的审判中被指控搞间谍活动的那些候选人收集了大量的选票。<sup>39</sup>资产阶级报刊掀起了疯狂的运动反对譬如说像麦纳特里·德布伊、普莱沃这样的人;它公布了许多应该是能够让选民信服这些人损害了法国国防的文件。好像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期待共产党人会失败,但是在再次选举的时候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例如,如果说我们在第一轮为德布伊收集了1万张选票的话,那么在第二轮给他投票的就多得多了。由于被指控搞间谍活动今天还在坐牢的其他候选人,也是同样情况。这表明,在工人地区,我们不仅有牢固的支柱,而且还有已经消除了的关于资本主义发祥地的成见,这是反对派和社会民主党想要用来投机的东西。

但是这场运动也向我们揭示了一系列弱点。它表明我们对策略的运用并不总是那么到位。首先是在一系列地区只是形式上采用了纪律,在第二轮时,法国同志的确支持了自己的候选人,但是就在同时,在支持自己候选人的同时,他们在一些地方不吱声地提出了口号:要么投社会党人的票,要么投激进的社会党人的票,就是不要把全国联盟的代表放过去。可以说新的策略在巴黎推行得很漂亮,在北部和在其他一些工人区的情况也不错,但是在远离中心的省份事实上并没有推行我们的策略。但是,既然我们的支柱是由工业中心构成的,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说我们的新的选举战略并没有失败。

但是选举也揭示出来了腐败的地方。这次选举机械地在法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内部进行了某些清洗。我们在过去曾采取过一系列办法来医治犯有议会主义毛病的法国党。在过去的选举中,我们主要是提出让在机床旁干活的工人当候选人,但是这样的措施没有能得到我们所期待的效果。议会主义的毛病在党内扎根很深。现在,经过这次重新选举的运动,这些病灶被揭露出来了。有一批书记和地方上的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政党“同流合污”了,不得不在最近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把他们开除,这也就像我根据总结报告所知道的那样,事实上揭示出了像是在我们这里的粮食收购中发生的情况一样。

我们的新策略有多大的成功率呢?用数字来表示,情况是这样的:虽然在一

---

\* 即上维埃纳。——编者注

系列省份我们征集到的选票数量不大,在第二轮里,我们在工人区里在很大程度上补回了我们的损失。在北部,第一轮时,投我们票的有 8.4 万;第二轮的情况非常复杂,当然我们得到的要少些。但是需要了解工人的心理。你们可以想象:在鲁贝或者在里尔,一方面是候选人卢舍尔,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人。工人知道卢舍尔将能当选,但是又不得不投共产党员的票。要和这样的情绪斗争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在第二轮里,我们在北部得到的选票减少了 25%。如果拿总的情况来看,我应该说,在第二轮,在 612 个选区只剩下 183 个选区要重新选举之后,我们在第一轮得到的选票是 88.2 万,在第二轮里得到的是 183 个选区里的 81.5 万,也就是说,在整个战线上减少的只有 7.3%。这表明工人理解了我们的,右翼的同志们吓唬我们说群众和我们拉开了距离,等等,那是徒劳的。

接下来,我们的策略是成功地运用握着顶在对手太阳穴上的手枪和套在他脖子上的绳套的统一战线。

我们迄今为止是怎样推行统一战线策略的呢?我们是照死板的公式写信称:“尊敬的公民们,选举就要开始了:资本在向工人阶级进攻。让我们在选举中一起来反对资本,争取工人的要求吧。”通常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己机关报的第 4 页上回答我们说:“这些分裂工人运动的伪善者们竟敢建议我们和他们一起行动。我们当然要拒绝这样的建议。”这样也就完了。以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用新的策略把社会民主党人逼到了墙角。我们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说:要么你们现在和我们一起前进,要么你们的领袖将拉着你们和资本一起走。界限划出来了。现在你们可以想象一下社会民主党人在北部的某个地方的处境,他们在那里把所有的自治市政府都把持在自己的手里了;如果我们推行这样的策略,那么在下一轮的选举时就不会有一个自治市的政府还留在社会民主党人手里了。[完全清楚的是,在这里必须要运用握着手枪的统一战线策略,因为问题非常尖锐地提出来了,这样提出问题群众是能理解的。]而且完全清楚的是,在和我们分开之前,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会好好想想,会三思而后行的。现在谢马尔同志从法国来了,我们询问了他,我们和北部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们的关系是不是尖锐起来了?一点也没有。在最近的选举中,在某些工人区,例如在加来海峡这样的地区,彭加勒类型的反动分子得逞了,而在这次选举之后,我们在自筹款项支配人的选举中获胜了。在一系列地区举行了部分选举,我们建议地方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和我们结成统一战线。地方上的组织和我们站在一起了,而省里的委员会因此把它们开除了。工人们说:“共产党人是诚实的。这是一些并不关心委任状的人。如果是根据选票的数量,他们应该得到 70 个委任状,但是他

们只有9个,那么,这就是一个并不是对委任状感兴趣的党。这样的党应该支持。”

接下来必须要指出的是,党的领导权威增强了。你们应该明白,我们在西欧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党的领导,有这样的资历,有多次战役的经验,有和各种倾向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经验。国外的领导是薄弱的,年轻的。不要忘记,我们俄国的领导是有革命经验的,而西欧的领导没有这些有利条件。党的领导在法国的坚定路线在选举的时候极大地提高了它的权威:在法国选举之后可以看到,工人对自己的党的领导的决定是怎样反应的。在第二轮和第三轮之间出现的谢马尔的文章简直就像是炸弹爆炸了一样。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从来就不相信我们的确要推行这样的策略。需要看到,当所有的法国资产阶级政党见到我们采取这样的策略是认真的之后,他们是怎样惊慌失措。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工人们像现在这样阅读谢马尔写的社论文章。他们是这样抓过来读这些文章,就像在我们这里有某个争论的时候阅读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的文章一样。他们期待的只是谢马尔说了什么,提出了什么样的路线,共产党人是怎样回答了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据的,等等。

现在来说说英国党。英国共产党有整整一年时间准备采用这个策略,但是担心的是英国共产党还没有能把新的策略消化好。我们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还不得不认真地对英国党施加压力,不要再重复出现我们在法国有过的那些考虑不周的地方,这些考虑不周的地方表明,这个策略没有能在那里推行,是因为我们的党的委员会没有进行系统的解释工作。

## 我们的各个支部的缺陷

再说几句我们运动的弱点:

第一,我们的工会工作做得不够。我们在各个国家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工会运动:有的国家工会被分裂了,有的国家有统一的工会,在一些白色恐怖的国家里有红色工会,那里把它们说成是共产党的分支机构。我应该说,在所有国家(请洛佐夫斯基同志不要见怪),我们的工会工作都做得很糟。在德国,我们在工会里没有巩固的阵地,在法国,我们的党员数量在减少。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数字没有增长。在白色恐怖肆虐的国家,我们的工会组织基础很狭窄。共产国际在代表大会上不得不更坚持所有共产党都要把脸转向工会。

我们需要把极大的注意力集中到我们的工会工作上来。用优秀的工作人员



加强工会部门,学会领导罢工,学会进行日常工作,要让工人们习惯于把我们看成是真正保护他们利益的人。

第二,对战争的危險不够理解。我们在第八次全会上就这个问题通过了决议。<sup>40</sup>如果你们要问我们,都做了什么来执行这个决议的话,我可以开诚布公和直截了当地回答你们:至今没有一个共产国际的支部严肃地贯彻了这些决定。我们曾建议在议会门前举行反战游行,我们曾号召对化学工业组织监督,加强军事工作,等等,但是没有一个党在这方面做了任何严肃的事情。我们应该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指出这一点。

在华沙发生了对利扎廖夫的暗杀<sup>41</sup>的时候,在帝国主义的战线开始联成线的时候,曾决定召开在德国的苏联之友国际会议。我们的共产党由于忙于选举,没有足够注意这次会议。在这方面犯错的,不仅是需要为此稍微打一下的德国共产党,而且有法国的、英国的、波兰的和其他的共产党。

当日本进攻中国的时刻,我们的共产党也没有对这一点做出足够的反应。我们的共产党是这样看待战争危险的,说是如果战争来了,我们是会有所表现的。他们不理解,和战争危险作斗争就是每天都要打击帝国主义战争的所有表现。就拿这样一个例子来说吧:伯肯黑德<sup>①</sup>来到了德国。要是在过去,当沙皇尼古拉来到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就会声明说:让他表演吧,我们会给他喝倒彩。现在仓科夫和其他的工人运动的刽子手在欧洲到处自由地游荡,我们的党什么行动也没有采取。

第三,还有一种病,那就是我们的党内至今还存在着各种在个人的名下建立的集团。从历史上说,它们常常都有自己的渊源。在一定的阶段上,斗争就会在各种流派之间展开,通过和右的倾向斗争,我们的党布尔什维克化了;在未来也应该进行反对右倾的原则性斗争,但是常常是各种集团还会是依靠惯性保存下来。没有更多的原则分歧了,可是集团斗争却变得空前尖锐。在这方面,这些集团成了人为制造“各种分歧”和“立场”的现成骨干。共产国际应该采取措施消除这些集团情绪的残余,特别是在像波兰党这样的政党里。那里过去曾有右的和极右的倾向,但是我常常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波兰什么更危险:是波兰党在发生战争时胆小怕事,还是因为打架而变得实际上不存在了呢。我认为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所以需要能下狠心,多少刹住一些我们党内的这种集团之争。

<sup>①</sup> 伯肯黑德——当年的英国殖民事务大臣。——译者注

**卡冈诺维奇:**是刹住左派还是刹住右派?刹住谁呢?

**曼努伊尔斯基:**两方面都要刹住,因为,卡冈诺维奇同志,如果您想找到右派和左派的话,即便是抱有最真诚的态度,也是会被搞得一塌糊涂的。问题在于,哪里是什么派别已经极端混乱了,就是这样的一种局面,比如说吧,在波兰,右派和左派在5月就都犯了错误<sup>42</sup>。就拿应该面向谁这个问题来说吧,是该面向整个农民还是面向贫农和中农、加强和中农的联盟,牢靠地依靠贫农呢?比如说在白俄罗斯,就是右派支持了正确的政策,而左派则认为我们应该带着整个农村和我们一道前进。

**斯大林:**搞颠倒了。

**曼努伊尔斯基:**我再举一个例子。譬如,在南斯拉夫党里,那里存在着C.马尔科维奇和P.伊万诺维奇集团。在共产国际粉碎了马尔科维奇的右的错误之后,这两个集团多少年来一直在进行着无原则的争斗。在那里,所有的原则性问题都能没有任何分歧地解决,可是在提出安排谁到什么地方去这样的问题时,就开始打架、对骂了,弄得鸡飞蛋打,党完全处于涣散状态。需要集中火力对付这种集团斗争。需要坚决地说,这种无原则的斗争应该结束了。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应该减弱反对右倾的斗争呢?不是,同志们,我应该说,这些右倾现象在共产国际里正在成熟。首先是在我们的法国共产党内就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倾向。让·雷诺反对共产国际的方针并不是个人行为。让·雷诺只是有勇气公开说出来罢了,但是在他的背后有一个集团,没有吭气,隐藏了下来;在竞选战略问题上的一句话也没有说的同志大有人在。

同志们,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开玩笑的。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不能在极其困难的局势下保持沉默、躲到一边、等待了。应该是清楚和明确地支持共产国际的政策,支持谢马尔集团所体现的领导的政策。英国共产党直到最后时刻还在和我们争论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能不能做出这样的转折,工人们能不能理解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在争取群众方面会制造困难,等等。这表明这种右倾的倾向是存在的。它采取的形式是对新的方针发牢骚。或者是拿这样一个争取群众有着非常有利的客观形势的党——奥地利党来说吧。在维也纳的工人采取了7月行动之后,创造出了非常良好的揭露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你们读一读我们的奥地利同志们的决议,这些决议写道,社会民主党巩固了,现在采取揭露社会民主党和与它进行疯狂斗争的方针会削弱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等等。会出现危险,一种独特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民主党那里失败之后,可能会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冒出来。打击这些右倾倾向,及时地打击,让它不致演绎成严重的危

险——这就是现在共产国际面临的一项任务。

## 殖 民 地

现在我想转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来,关于殖民地的问题。关于殖民地的决议还没有准备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得不首先把在中国革命期间积累的经验收集起来。这个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在正在发生的战斗烽火里,曾就中国问题通过了一些决定,已经为我们的殖民地委员会的各项决定指出了方向。但是还必须发出一个危险的信号。现在,在我们共产国际内部,就像在1923年的德国革命失败后一样,有过要修正统一战线策略的倾向,有要重新审议我们在殖民地政策问题中的基本条款中的某些东西的倾向,想要多少修正一下列宁。拉狄克搞明白的一些老的倾向在一些地方又在复活,这些倾向归结起来就是说,在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的作用已经结束,原因是资产阶级的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已经合二为一了;所以它在一切情况下都是一个反动阶级,不可能起任何反对派的作用。在一些地方开始说出,不仅是资产阶级,而且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因素也已经不再存在了,在这方面需要面向无产阶级和农民。而还有一些人走得更远,证明说农民发生了阶层的分化,所以需要面向贫农加上中农,也就是事实上把我们的政策非殖民化和建立这样一种类型的殖民地政策,让它甚至在德国这样的工业国家也能够运用。现在不得不特别坚决和果断地反对这样的趋势,同志们。关于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关于小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现在需要完完全全地在我们关于殖民地的讨论中提出来。这不是一个无聊的问题,不仅是考虑到它在我们的中国经验中是有意义的。现在我们在印度有着正在成熟的革命形势。一个基本问题正在提出来:在印度,资产阶级是不是将在这次高涨中起到某种作用?有些同志在中国的经验之后倾向于一种想法,认为印度的资产阶级根本就将只是一种反革命力量,需要让它永远寿终正寝了,甚至对于它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态度也是如此。斯大林同志有一次在制定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提纲时曾正确地指出,印度的资产阶级在力图 and 英国帝国主义妥协。这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有人想从这个论断得出结论,说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完全被从民族解放运动中勾销了,而这就是一个非常匆忙的概括了。

斯大林:难道我说过这个吗?

曼努伊尔斯基:你没有说过这个。有人现在准备把资产阶级从印度的民族

解放运动中勾销掉。例如,列宁写到过立宪民主党人。你们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吗?是在1908年,当立宪民主党人起着最鲜明的反革命作用的时候:“我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但是,如果有谁根据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这种反革命性作出结论,说他们的反动派立场和不满情绪、他们同黑帮地主的冲突或资产阶级各派之间的竞争和斗争在新高潮的酝酿过程中都不可能有什么意义,那就是极大的错误,真正是改头换面的孟什维主义。”<sup>43</sup>

而我要重申的是,在我们这里有的地方有人想把这种真正的孟什维克主义反过来用到殖民地国家身上。对于印度的资产阶级需要说些什么呢(而这是最迫在眉睫的问题了,因为提上了日程的是印度的革命运动问题)?

英国帝国主义在那里推行的是典型的、旨在扼杀它的生产力的殖民主义政策。有人说到资本输出,说是向那里输入了资本,英国帝国主义事实上是在搞印度的工业化。理论上说,引进资本是搞引进的国家的工业化,这是对的。但是应该看看这种引进的数字和这一类的工业化的形式。你们把自治领,奥地利\*或者加拿大引进的资本数字和印度可以夸口的那些数字拿来比较一下吧,今年印度引进的是60万英镑。你们说说,这是怎样的数字!这是什么形式的工业化呢?印度的资产阶级在追求的是,除了纺织工业外,还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例如冶金工业。英国帝国主义能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吗?不会,它为了伯明翰的利益要制止冶金工业的发展。就拿现在印度资产阶级为了关税利率进行的那场顽强的斗争为例吧。在这里,它撞上了英国帝国主义设置的障碍。比如,关于不仅保护纺织工业,而且要保护冶金工业的问题。提出了一个用关税税率在印度保护冶金工业的方案,这些税率应该在1924年生效,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执行过。甚至英国的资产阶级也允许在印度生产那些不能和曼彻斯特的布匹竞争的纺织布匹。这就是英国帝国主义的政策。最后,你们可以拿卢比的改革来看看,这场改革是英国搞的,在于要让英国政府能在印度随意确定卢比的比价,为自己的商品建立向印度进口的奖励。

**洛佐夫斯基:**英国人对大多数欧洲国家也是这样做的。

**曼努伊尔斯基:**请原谅,洛佐夫斯基同志,这里说的不是经济依附的形式,而是殖民依附的形式。而什么是殖民依附——这可以从英国和它的自治领以及印度的相互关系的差别看出来。现在就拿棉花的情况来说吧。英国资本主义可以从印度得到棉花,也可以从南非得到棉花。但是它是这样计划的,现在要从南

\* 原文如此。可能指的是澳大利亚。——编者注

非得到棉花并从而努力窒息印度的棉花生产。这个政策自然会引起印度资产阶级的抵制。由此就可以明白了,为什么这个政策在最近动起来了。大家知道,在印度,西蒙委员会受到了怎样的接待。如果我们不利用印度资产阶级的反对态度来削弱英帝国主义的阵地,那我们就是天真的、缺心眼的人了。

要说的不是印度资产阶级是不是在印度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应该说,在印度这样的国家里,资产阶级是不能也不会起领导作用的,它在民族革命运动高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积极性提高的情况下,将会力求妥协,将会积极地反对革命群众,但是这里说的是不要把资产阶级完全略而不计。对小资产阶级来说就更应该是这样了,不仅是在印度,而且在一系列其他的殖民地国家,都是这样。

我们不得不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在第九次全会上曾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活跃的讨论。洛米纳泽同志持有的观点是,中国革命已经或者正在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国际全会没有采用这个观点。这种上升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是完全清楚的,但是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这是另一个问题。这种上升必须有什么样的前提呢?洛米纳泽同志的错误在于,他没有考虑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以苏维埃形式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上升为工人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有可能,那就是如果共产党能够带领广大群众跟着自己走。而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威胁,那就是在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的情况下,我们的同志们就倾向于只是空谈“上升”。而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所有关于上升的议论都只是一句空话。没有准备好群众就起义的方针是暴乱。

洛米纳泽:在广州是暴乱吗<sup>44</sup>?

曼努伊尔斯基:不是,广州不是暴乱,但是如果您把广州的行动推而广之而忽略在群众中的组织工作,那就会滑到搞暴乱上去了;应该非常坚决地反对这种搞暴乱的做法,应该有一个猛烈的扭转。不能想象用手枪组织一场罢工。严肃的殖民地革命不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只要是头脑健康,谁也不会维护这样的方法。联系到中国的革命,需要注意到和中国革命有关的那些困难。我们这里现在非常普遍地传播着这样一种成见:中国的革命没有成功是中央的责任,是它搞乱了。我们的策略中的一些东西遭到了怀疑。我们应该考虑到中国革命进行时的国际局势。请回想一下,关于华沙的失败<sup>45</sup>列宁说了什么。我们为什么在华沙失败了?因为在华沙我们撞上了凡尔赛的神经中枢。完全就是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们碰到了这个世界帝国主义的神经系统。西欧的同志

们在中国革命失败后对我们说,这是共产国际的过错,那是他们不明白国际局势的复杂性。一个苏维埃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呢?这会是一种改变整个世界面貌的变化,会把整个资本主义的稳定化倒转过来,会改变整个力量的对比关系。世界帝国主义和革命的焦点就是围绕着中国的。他们不懂得这一点。

联系到中国的革命,还必须提出一个关于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现在中国革命正在经历危机,城市里在大规模地杀害共产党人,但是我们知道,在远离中心的农村工作起来要轻松得多;那里正在创造出数十种条件。但是当一方面城市里在杀害共产党员,另一方面农民运动在发展的时候,需要考虑的是不要出现脱节,要建立真正的条件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也应该想想怎样有效地帮助中国革命。至今来自欧洲党的,是帮助革命战士的国际组织的帮助。需要考虑对中国革命的政治帮助。需要把各个党的共产党员动员起来,让他们去从事地下工作和帮助中国的同志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帮助革命战士的国际组织的帮助对于有着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革命是不够的。共产国际不断地做工作来加强中国共产党,它对于所有殖民地国家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将对他们起到联共(布)对西欧党起到的那种作用。这是在革命的烈火中成长起来的、在这场斗争中经受过锻炼的党。我们需要在中国锻造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它犯了很多错误。但是它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我们知道,封建的生活方式对中国党的状态是一种压制,它的宗派集团常常有着区域的色彩,而且反映出来的是这些封建的条件。所有这些都需要消除、克服,锻造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这在现在是我们应该在中国向自己提出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

接下来联系到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用,我们应该还要提出工人阶级和殖民地的其他阶级联盟的形式问题。国民党阶段是不是其他国家也可以采用呢?我们想,国民党阶段<sup>46</sup>是中国的特殊形式,而且它未必适合于其他国家。至于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联盟形式,在这里,从理论上说,可以想象的有3种形式。(1)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各走自己的路;在资产阶级彻底失去了反对派性质的那些国家是这种情况。(2)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达成临时协议。(3)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到一定的阶段建立长期性的统一战线。所有这些可能性需要在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里详细地审议,做出结论,对我们在殖民地国家的年轻的党给出一定的指示。

接下来我想对战争说上几句并就此结束。

有人喊:关于右的危险。

## 关于战争的提纲问题

**曼努伊尔斯基:**关于欧洲党的右的危险我说了。第八次全会的提纲你们读过了。就战争问题作报告的是别尔同志。他准备了概括原则性决定的提纲,这些决定是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各个不同阶段上,我们的代表大会以及全会通过的。这是总结性质的提纲。这些提纲审议的是关于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以及帝国主义战争问题,关于对帝国主义军队的态度问题,考虑到了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失败之后发生的那些变化,等等。详细地传达这些决定会占用过多的时间。

我想只是指出某些方面,照我的意见,这些方面对于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都有着重大的实际意义。首先,我想对李维诺夫同志的发言<sup>47</sup>说几句。李维诺夫的发言是那些发言中的一个……

**斯大林:**什么发言?在哪儿?

**曼努伊尔斯基:**是在日内瓦的发言,我们共产党如果考虑到战争的危险性,应该集中对这个发言给予极大的关注。我们国家,苏联,第一次这样有力地把资本主义世界逼到了墙角并说道:“我们准备废除武器,你同意废除武器吗?”我们得到了非常有利的宣传地位:面向着欧洲的所有无产阶级,利用我们的建议揭露了资产阶级政府,也揭露了社会民主党。

如果你们看看我们在各国的共产党刊物,那你们就会看到,恰恰是这一点没有得到足够的利用。这种消极可以用什么来解释呢?我感觉有一种解释。我们的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害怕犯机会主义的错误。现在我们的兄弟党总的来说有一种很大的担心:有时会落入右倾,总是害怕,在对新的问题做出决定时可别犯了什么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的同志们读过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1916 年的文章《论“废除武装”的口号》<sup>48</sup>,他在那里抨击了中派,他们是在共产党刚刚诞生、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政权的时代提出这个口号的。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的状况和刚刚在争取得到政权的共产党的状况之间的区别。他们开始的时候并不懂得,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的国家,这样的国家的确是可以提出废除武装的口号的,当然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废除武装的条件下。但是因为只要存在着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废除武装,那么完全清楚的是,我们的建议完全是宣传性的。但是同志们没有明白这一点。他们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是做出了某种原则性的让步。但是事实上这是我们的各个党对战争的危险估计不足的一种表现,而第二,是不善于为宣传找到适当的由头。

接下来,同志们,我想谈谈帝国主义世界准备反对我们的战争采用的是什么问题。同志们,帝国主义世界是打着和平主义的旗帜准备反对我们的战争的。现在要在欧洲工人阶级面前揭发它,就需要明白这一点。这就完全像1914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在争取保卫祖国的旗号下,在争取“权利”、“公正”等等的标记下进行的一样,反对苏联的战争也完全是这样在惩罚破坏和平的罪人的标记下进行的。譬如说,当波兰社会党人在波兰议会上发言,说到了红色帝国主义,说到我们在开足马力地进行武装,我们的化学工业正在全速工作的时候;当法国的议会上发出同样言论的时候;当某一个英国的勋爵在国联发表演说,说我们在宣传国内战争和殖民地的战争,所以我们是战争的策源地的时候,这是在让无产阶级的舆论有所准备,把苏联看成是和平的破坏者。为了考虑这种宣传的危险性,需要知道欧洲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的情绪。我们认为欧洲的工人阶级是先锋队,但是不能说它是人数特别众多的。但是除了先锋队外,我们有工人阶级内的各种不同的阶层,他们有各种不同的心态和各种不同程度的战斗能力。有很广泛的阶层并不希望打仗,它根本就不希望有任何动荡,所以也不希望有革命。可以这样说,他们在所有方面都是“和平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也就是用这些阶层和他们的情绪在搞投机,社会民主党人在殷勤地向这些阶层灌输一种神话,说革命和殖民地的起义是战争的渊源。回击这样的宣传是我们最需要完成的任务了。我们应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锤炼。我们应该进行大量的解释工作,不是去搞运动,要做的是在若干年里在国际工人阶级的内部都能起作用的大量工作。所以宣传保卫苏联现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不是当战争的危险变得特别尖锐的时候持续几天或几个星期的运动,——这是一场斗争,在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保持不稳定的平衡和“共处”的整个时期,都会是充满着这种斗争的。

最后,作为结束,必须把废除武装问题专门提出来,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在废除武装思想的旗帜下实际上正在进行备战。在这方面,第二国际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争论很有意思。第二国际执委会内部的争论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哪一种“废除武装”方案更好:彭吉尔主张全面军国主义化,或者是以建立国防军的形式“削减”军备。德国的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维护的就是这后一种形式的废除武装。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也都主张这后一种观点。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在最近的时期内将维护这样的军队组织,它将是一支针对工人阶级的、雇佣的法西斯军队。现在实际上是在废除武装的旗帜下推行建立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军队的政策。完全显然的是,这种军队是为资



产阶级社会保证不受无产阶级革命威胁的一种手段。

我不可能涉及所有问题。我只是在自己的通报里指出那些共产国际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主席：谁要发言？

喊声：休息！

主席：现在表决。谁赞成宣布休息？很少。安采洛维奇同志要求发言。

安采洛维奇：首先对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报告的性质本身的问题提一个一般性的意见。我看，曼努伊尔斯基同志虽然也做了努力，但是并没有能对国际局势得出一个评价。我的感觉是，联系到对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准备，这是需要谈到的基本问题之一。对于解决代表大会日程上的其他问题来说，如何评价整个国际局势是很重要的。当然，从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所做的个别描述可以形成总的概念，但是对于代表大会来说，我看需要的不仅是搞清楚个别的方面，而是必须对国际局势、工人运动状况、各个阶级的对应关系和阶级斗争做出更完整的评价。布哈林同志在中央全会日程上的第二个问题上可能将不会涉及所有这些问题，所以这就更有必要了。那时将是讨论共产国际的纲领，而不是评价国际局势中发生的种种日常变化。我想，中央全会作为共产国际最大的支部的领导，需要知道工会运动的状况，在工业和农业中出现的一系列世界性的现象，也需要知道，在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问题将从什么样的角度提出和进行讨论。而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并不是提出这些问题，而是为各个事件做了一个大事记。当然，报告人对个别的倾向还是做出了相当鲜明的评价的，但是我想重复的是，报告人并没有能做到清楚地评价局势和由此产生的任务。可能他是准备在结束语里再做出评价吧？但是到那个时候，全会的成员就不可能搞清楚自己该对提出的问题采取什么态度了。

同志们，现在，在我提出了一般性的意见之后，请允许我转到一个更个别的、但是无疑是重要的题目上来。这个题目就是在农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中做工作的问题。我认为，就是在共产国际纲领的草案里，也有对农业无产阶级在工人和革命农民运动中的意义估计不足。我的感觉是，要让我们的共产党（我曾在国外参加过一些时间的工人运动，并且考虑到了在苏联工作的经验）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列宁主义政党，需要让它们在消除其他缺点的同时，把爱尔福特主义也消除掉，也就是说要把本着爱尔福特纲领<sup>49</sup>精神对待农民和农业无产阶级的态度消除掉。而这样的情绪还没有消除。这些倾向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还很强，甚至可以看到，在共产国际领导人中间也还很强。你们看，曼努伊尔斯基同

志无论是对农民、对工人阶级中像农业无产阶级这样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什么也没有讲,虽然我曾警告过他,我打算要批评共产国际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C. 柯秀尔:没有害怕。

安采洛维奇:我并不可怕,而且也不打算吓唬谁,但是这样重要的问题在报告里甚至没有提到。

斯大林:绕过去了。

安采洛维奇:是的,把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绕过去了。要知道,如果不考虑到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农民运动的,如果不考虑到这个党首先是对农业无产阶级有多大程度的影响,等等,那么,无论是从保加利亚的事态中还是从其他的事态中,都不可能得出真正的教训。联系到这一点,我想提出几个实际问题。我认为,在最近这些年里,如果我们能注意观察共产国际个别支部的工作的话,得到的结果是,他们对农村说得越多,这些党对农村本身做得工作就越少。越是宣扬必须加强对农民及其各个阶层的影响,在农业无产阶级中的工作就越薄弱。通过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的例子,可以指出这一点。例如,在最近这一年里,一系列专门为农业无产阶级办的报纸被取消了。在对共产党来说如此重要的群众工作领域里积累了相对经验的同志被调去从事其他的工作,没有任何人来代替他们。同时需要直接指出的是,自从我们成立了农民国际<sup>50</sup>以来,我们在农民中的工作越来越糟,关于农业工人就更不用说了。好像是我们由于建立了国际组织——农民国际,也就向自己提出了一项任务,要与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一样,把各个共产党在农村的精力集中起来,安排好对这项工作的国际领导和研究农民运动和雇农运动中的一系列实际问题。但是结果相反。从农民国际建立之日起,共产国际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大大减弱了。我不打算详尽地评价农民国际的工作,但是我感觉,在它的编年史上只记下了和南斯拉夫富农拉迪奇的会面,而且是不成功的,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了。

现在来谈谈农民群众左转的问题。曼努伊尔斯基同志说,农民群众在最近一年里向左转了。但是他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呢?要知道这是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曼努伊尔斯基甚至没有试着证明一下,而是在另一个地方证明了相反的东西。例如,他一方面说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农民左转了,而另一方面却说在法国发生的是右转。共同的结果是什么呢:农民是左转了还是右转了呢?我希望曼努伊尔斯基在自己的结束语里能更多地关注这些问题。我认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需要更严肃地对待在农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中加强工作

的问题。特别重要的是要在农业无产阶级中加强工作,因为如果党不能影响这些群众,那就不可能加强在农民中的影响,也就不可能保障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斗争中的一致。要知道,整个地球上的农业无产阶级不是一两亿。只是在欧洲,农业无产阶级就有2 000多万人。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那就不能不注意到,法西斯最先打击的就是有组织的农业无产阶级。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农业国家,共产党对农业无产阶级影响的薄弱极大地减轻了反动派取胜和开展工作的难度。我要说的是,还没有一个共产国际的支部在自己面前提出了严肃地组织农业无产阶级的任务。我还要说的是,竞选讲坛和议会讲坛以及工会代表大会并没有被利用来把受到如此剥削的这些群众的目光吸引到共产党身上来。甚至在有农业无产阶级成千上万地集中在大型的地主庄园和其他企业里的地方,农业工人和林业工人也没有被用来向农民、向最贫穷的农民阶层推广无产阶级的影响。除此之外,一些共产党推行农村阶级路线的状况也不好。往往提出的是一些最为机会主义的口号。根据各个国家的斗争条件提出的共产党的近期任务并不明确。殖民地国家里的农民和雇农工作情况更糟糕,在这些地方,例如在印度和中国,雇农本来应该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而且在一系列国家应该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在农民国际的日常工作中更多地注意在农业无产阶级中的工作,而实质上共产国际也是要对它的工作负责的。更重要的是,要让工会国际集中精力搞好这项工作,因为工会是把农业工人联合起来的、最带有群众性的形式,这项工作应该在工会国际中占有荣耀的地位。然而遗憾的是,工会国际只是年复一年地通过一纸决议。农业工人的罢工主要是区域性的,只需要用很少的钱就可以在资金上给予帮助了,在这些地方需要把这些资本主义的被压迫者,这些农业工人的注意力引向一点,让他们知道是可以顺利进行反对地主的斗争的,可是,无论是工会国际,还是农民国际,甚至是共产国际,谁都没有给予支持。结果是,在欧洲的农村,我们常常是贪多,结果把小的也失去了。我们在争论: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跟着革命的口号走,可是甚至并不会组织欧洲农村的无产阶级,我就不去说美国的或者其他地方的农村了。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我們能不能带动中农,而我们并不会组织地对雇农或者贫农施加影响。

斯大林:说的对。

安采洛维奇:当然,农村工作问题绝不能排斥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提出的那些极其重要的、总的工人运动的问题。但是需要记住的是,就是为了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斗争,就是为了顺利发展群众性的工人和农民运动,我们共产党也应该更严

肃地开展农村中的工作。不该忘记,在华沙墙边打我们的,也有被民族主义和地主的宣传所迷惑的雇农。波兹南的雇农跟着地主走了,而地主是知道拿雇农作炮灰具有什么意义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雇农是发动战争和搞工贼行动可以利用的很好的材料。而我们甚至一点儿也不想去对这些群众有什么严肃的影响。至少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本身至今还没有高度重视这项任务。我认为,俄罗斯支部应该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这项工作中的缺点提出质问。共产国际农业委员会什么事情都干,就是不解决这些实际任务。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在共产国际的日常工作中,也只是偶尔注意到了这项任务。

我想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所有这些任务在共产国际的纲领里反映得很少。农村中的阶级斗争的意义,特别是雇农反对大农场主、富农的斗争的意义,没有得到必要的明确阐述。我不是主张要机械地采用俄罗斯的专用名词。如果需要的话,我赞成专用名词的美洲化和欧洲化。(笑声)叫什么都可以,但是清楚的是,如果共产党不是一方面领导工业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经济斗争,另一方面天天领导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与地主、林业工业主、大农场主、放高利贷者等等作斗争,共产党就不会有必要的影晌。

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在共产国际的纲领中得到详尽的研究。所有这些思想可以很简短地表达出来。但是与农民运动有联系的所有问题,都应该在共产国际的纲领中得到足够明确的反映。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与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辛迪加主义者等等的运动的实质性区别之一。

我不打算就议程上的第二点发言了,就谈一个与共产国际纲领有关的问题,希望布哈林同志能考虑这个意见,虽然从形式上说,我是就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说的。

最后,我想就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指出以下的情况。他在自己的报告里把战争、革命、殖民地称作渠道(笑声)。他把“渠道”这个专用名词使用得非常广,而且我感觉有非常多的假设。战争、革命、殖民地不是渠道。但是为了和越来越逼近的战争危险作斗争,顺利地组织、领导和动员殖民地的工农群众,需要的是不要忘记群众性的农民运动,不要忘记像农业无产阶级这样的革命斗争的因素。

主席:请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发言。

皮亚特尼茨基:我从安采洛维奇谈起。我感觉两个人说的都对。曼努伊尔斯基同志说的对,因为农民中间存在着向左转的情况,主要是在巴尔干,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所以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强调这一点是对的。但是

我认为安采洛维奇同志说得也对,他说农民中间的工作有毛病,这里当然还有着老的社会民主党思想的再现,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在农民中间没有什么可做的,我们主要应该在无产阶级中间工作。为了不空口无凭,我可以引用法国、德国和波兰的选举情况。在法国,共产党在8个农业选区里<sup>51</sup>失去了1.76万张选票。在德国的9个选区里,我们的党得到的要比1924年的选举少10万张选票,而有4—5个是农民选区。在波兰也是同样情况。在波兰,我们的党也是在农业区比以前的选举得到的票数要少。所以我认为,安采洛维奇正确地指出了农民工作的弱点,而且,在我们的各个共产党里,将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补上这个缺陷的,因为这些党对农民工作的经验很少,但是我能证实的是,如果各个党在农民中间开展工作,是会有成就的。我可以引用法国选举为例——在一系列的农业区里,法国共产党有过不容置疑的成功。现在我想只就几个问题谈谈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我得出了这样的印象,他对法国、德国和波兰的选举结果得出的评价太平淡了。他说得太一般化了,没有强调什么真正是成就,我们的党在什么地方蒙受了损失。我就拿德国的选举来说吧。1924年5月,我们在德国得到了370万张选票。是的,当时我们的工会工作做得比较好,当时革命的浪潮还没有降下来,因为本来期待着在1923年10月会有行动,而选举是在1924年5月发生的。这就是说,德国共产党在今年的5月选举中得到的票数比1924年5月选举时少了50万张选票。这可以用两个原因来解释:在党的领导人是P.菲舍尔和马斯洛夫的那个时期(1924年中到1925年),工会工作大大地削弱了,德国共产党现在正在赶上来,当时革命的浪潮还没有完全低落下去。

如果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德国共产党是不是做到了在选举中打击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么我们就应该回答说:没有,没有做到。做到的是略微把他们挤出了工人区,但是他们还没有被打碎。我们是不是能说,社会民主党现在不再是依靠工人了,它没有得到工人的选票呢?不能,无论如何不能这样说。例如,就拿柏林、波兹坦一区 and 波兹坦二区这样一些大的工人区的选举来说吧。我们的党在这3个区里得到的票数比1924年多了24万张(总共是65万张),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在这3个区得到的选票也比1924年多11万张。他们在这些区里总共得到了95万张选票。可能一部分赢得的选票不是工人的,但肯定有一部分是工人的。德国共产党在柏林是站稳了脚跟,但是它没有能做到把社会民主党完全挤出去。另一方面,我们的党在9个选区失去了10万张选票,其中有3个是工业区(图林根、南威斯特伐利亚和符腾堡),这是工人区,只是在一个区我们做到了把社会民主党人挤出去——在黑森—达姆施塔特——社

会民主党人在那里失去了3.2万张选票,而我们在那里得到了1.9万张。我认为,我们的党在柏林和在其他的工业地区得到了很大的巩固,这无疑是一个胜利,但是我期待着德国共产党将得到不少于1924年5月时得到过的选票,因为我们在1927—1928年间做到了重新在工会里安营扎寨,我们做到了建立一系列群众组织,这是在鲁特·菲舍尔时期所没有的,而且社会民主党人在最近这些年里几乎是公开地每天出卖工人的利益。

现在来说一说波兰的情况。波兰有着很不好的征兆。虽然曼努伊尔斯基同志说到了这一点,但是我觉得强调得不够清楚。就拿华沙的选举来说吧。我们的党在1927年的市政选举中按被废止的名单得到了7.7万张选票,而在议会选举中只得到了6.5万张选票。但这还不是主要的。我们在市政选举时,在华沙的11个工人郊区得到了22 038张选票,而在议会选举中只得到了14 997张。是的,和市政选举相比,波兰社会党人也有损失。他们在市政选举时得到了13 740张选票,而在议会选举时只有9 348张,但是皮尔苏茨基赢了,他在市政选举中得到了4 448张选票,而在议会选举中,他在这些工人区里得到了31 843张选票。我认为这是危险的。这可以用什么来解释呢?可以部分解释的是,皮尔苏茨基分子加强了在工人中间的工作,因为他们中间有不少是过去的波兰社会党人,现在和工人阶级还有联系,但是也还有另外的原因,其中的一个便是我们的党没有能在工人中间做足够的工作,它完全忙于无原则的掐架了,这种掐架是我在其他党没有见到过的。

**斯大林:**是在党内吗?

**皮亚特尼茨基:**是的,它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事实上那里有两个党:可以说是“少数”党和“多数”党。照我的看法,两部分没有一个在党内是占多数的,但是他们什么原则性分歧都没有。在代表大会上看来是不得不就这个问题通过一个什么东西了。令人高兴的是,在西乌克兰共产党内部的那种分裂很快就得以消除了。西乌克兰共产党是波兰党的一部分,它不仅治好了自己的创伤,而且站到了正确的立场上,没有参加宗派斗争。

西白俄罗斯共产党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它也是波兰党的一部分。在那些没有宗派斗争的区里,在那些中立的同志所在的区里,是有成就的,但是在其他区,共产党的工作削弱了。

现在来说一说法国。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确定的新策略在法国采用的时候,是冠以了“阶级对阶级”的称谓的。在德国的选举中采用的是按比例的体系。那里只有一轮选举。我们的党进行了反对社会民主党和反对政府集团的

斗争。在波兰也是这种情况。所以不能说在那里是采用了“阶级对阶级”的新策略。新策略暂时只是在法国采用了。采用这种策略是那么容易的吗？不是的。要搞明白为什么在法国采用新的策略并不那么容易，应该了解法国共产党。社会党人没有坚强的地方组织，我们的党公开活动的那些地方，就是我们的党组织也还不够强壮。以前是地方组织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而且他们要签订各种各样的协议。例如同社会党人要签订协议：你们在什么地方投我们的候选人的票，我们在那些地方也投你们的候选人的票。新的策略放弃了这种做法。在许多选区做到了推行新的选举策略，但是在一些地方，这种策略遇到了地方党组织的抵制。有意思的是，在党的队伍里，在党的积极分子中有动摇，而且是不小的动摇。工人阶级相反是积极支持这个战略的。我认为，法国的选举是完全可以令人满意的。我应该说，在法国，我们的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并不比德国小，虽然我们的党在德国得到了320万张选票，而在法国却只得到了110万张。第一，那里的妇女没有选；第二，那里有大批的外国工人，他们没有选举权。

**洛佐夫斯基：**我们的党在法国得到了11%的选票，而在德国是10.2%。

**皮亚特尼茨基：**您计算出来了，这很好：我没有计算，但是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样，如果外国人有选举权的话，那我们得到的选票就能比那里多得多了。

但是就是在那里也有阴暗面。我们在德国首都得到的选票多了13万张，可是在巴黎我们损失了6000张（1924年法国共产党在巴黎得到了13.1万张，而在1928年是12.5万张）。这是因为由于住房危机，工人们从巴黎搬到了郊区去。我们在巴黎的郊区多得了1.1万张选票，但是在塞纳省（巴黎市及其郊区属于这个省）主要是工人们在那里居住，我们在那里得到的选票比1924年选举时多出了4533张，而我们的党在全法国得到的选票多了19.2万张。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够的。巴黎是我们不能放弃的，我们应该把它牢牢地把握住。我不同意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意见，认为我们的党在巴黎占了统治。我们在巴黎比社会党要强，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那里有一个不坏的组织，而对社会党人就不能这样说了。但是对于统治来说，这还太少。我还想指出法国共产党的一个弱点，那就是在选举活动中有不少于30万的工人非党员积极地帮助我们。但是至今还没有从他们中间把像样的一批批人吸收到党内来。而且至今也还没有能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步骤。而在竞选运动之后，本该是开展一个招募运动的，把广大的工人人士吸收到党里来。这件事却没有做。

另一方面，在法国也有好的方面。法国共产党做到了把社会民主党人从工业中心排挤出去。我认为这是法国共产党的最大成就。例如，在上维埃纳省，社

会民主党人失去了1.2万张选票,而我们获得了1.3万张;在北方,社会民主党人失去了1.2万张选票,而我们获得了2万张;在塞纳和卢瓦尔省,社会民主党人失去了1.9万张选票,而我们获得了9400张;在加龙河上游,社会民主党人失去了2.5万张选票,而我们获得了4000张;在下莱茵和上莱茵省,他们失去了1.6万张选票,而我们获得了1.8万张。这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在这些工业省份里,我们的党不仅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斗争,而且也做到了让工人摆脱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在法国,我们在这个领域里有着比在德国更大的胜利。

现在我转到英国的情况。在这里,最困难的将是推行反对工党的新策略,在那里,这样的策略总的来说还没有采用。有些地方已经采用了这个策略。直至今日,我们在英国不仅是在议会选举中,而且在市政选举中,还是投工党的票的。过去我们的党没有独立地在选举中采取行动。那个时候,英国共产党还有希望被接纳加入工党,那么它就将有可能在内部影响工党的政策,工会的左转也就会继续,而且它们对工党的影响也将会加强,——这样的策略在当时是正确的。而现在,在选举中支持工党的策略就不正确了。它不正确是因为,已经臭名昭著的改良主义者为首的工会以及工党都已经表明了,它们不是工人阶级的保卫者,而是它的利益的最臭名昭著的出卖者,所以,现在无论如何也必须由我们共产党独立参加选举,要带着明确的阶级路线,不仅要反对保守党和自由党,而且要反对工党。我们的党在选举中独立行动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工党会因此而失去许多候选人。工人的广大阶层还指望工党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由于即将进行的选举结果,会重新掌权,所以工人们虽然不同意工党的策略,还将在选举中支持它。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关于我们的党独立参加局部选举的数据,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伦敦的市政选举的补选中,保守党人在12个选区里得到了10.5万张选票,自由党得到了7.4万张,工党得到了4.9万张,而我们党用自己的名字和在“左翼工党”的旗帜下得到了2.2万张。在英国的其他15个城市里,得到的选票分配情况是这样的:保守党是9381张,工党是11024张,共产党是9018张。我认为,这个结果对我们的党来说是相当可以忍受的。但是得到的是什么呢?在重新选举时,工党通过了自己的6个候选人,但是由于我们党提出了单个候选人,它失去了7个委任名额(我们党选上了2个候选人)。如果我们支持了工党的话,那么工党和我们一起就能得到13个委任名额了,还不算我们赢得的2个名额。委任名额的这种损失有可能会把工人吓跑的,因为由于这个缘故,工党就不能当政了。所以我们的党应该有明确的路线,现在就需要展开广泛的运动,证明工党和工会在现在执行的是自由党人的那种政策。自由党



人公开声明说,工党打的是他们的口号,自由党和工党之间没有差别。

我们党在英国工人阶级中的影响要比它的党员数量大得多。我这里有统计。1925年它有4398名党员,1926年有10730名,1927年有7377名,而1928年是5556名。党员的损失怎样解释呢?这是由于我们党几乎可以说一半是矿工党。在罢工期间,它在矿区得到了加强。如果你们关注最近的选举的话,矿工在工会里也是支持我们的。但是大量的失业,而且不仅是矿工失业,还有不可想象的恐怖,都在迫使人们退党。不过,无可怀疑的是,工人是支持我们党的,可是它不会扩展自己的组成。而只有当它扩展了自己的组成时,才有可能走上广阔的舞台。它参加了所有的左派运动,既参加了工党,也参加了工会,但是它不会巩固自己的组织。当然,很好的是它到处都得到了巩固,它在所有的群众组织里都有影响,但是要把这种影响固定下来,它的党员不够。如果我们看看在英国有多少工人组织的话,那么可能一个共产党员要摊上两三个这样的工人组织了。党员赶不及到处出现,当然,在同样的会议上,一个党员不得不就日程上的5个问题发言,而且是同一个党员。你们知道,如果他在一个问题上失败了,那你就很难在其他问题上发言了。所以任务是这样的:无论如何也要扩大党的组成和开始进行反对工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斗争。只有在那时,英国共产党才能够顺利推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上制定的路线。

主席: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发言。

斯克雷普尼克:遗憾的是,我没有听到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整个报告,因为火车晚点了,关于报告第一部分的内容,我只是根据我所询问过的同志们所说的来评断了。遗憾的是,没有必须加以确认的提纲,这就妨碍和阻碍了对日程上的这一项内容组织讨论。由于时间非常少,我只谈一个我所面临的问题。

现在局势的轴心何在呢?什么是所有问题的根本问题呢?什么应该确定共产国际联合起来的各个共产党的策略和战略呢?

当然,现在资本主义的相对性正在显露出来和暴露出来,世界资本主义将要对苏联进攻,这就是这样的问题。

今天提出的所有问题无疑都要归结到这个问题上来。所以共产国际和它的所有政党当前面临的,就是直接对这些将要发生的事变做准备的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共产国际的策略确定了这种当前的需要。关于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党的新策略问题的提出,关于“阶级对阶级”策略的问题,是直截了当地回答了我們如何准备将要发生的战斗的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关于这个策略以及它的推广问题应当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法国和英国党的经验是迈出的第一步,还必须接下来检查其他党的情况如何,特别是在美国,这个经验运用得如何,共产国际的指令落实得如何?必须用更牢固的线索把自己和广大的工人群众联系起来,并且用这个策略获取和广大群众联系的途径,当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在所有背叛了的社会民主党支持下反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时候,能够让自己有所准备。

需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反军国主义的部队工作问题。我询问了同志们,自己也听到了,这个问题在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里没有涉及(当然,因为在一个报告里不可能什么都涉及)。但是需要承认,这项工作是所有共产党都应该足够地给予严肃关注的。我们有法国共产党反军国主义工作和反对殖民战争斗争的相当丰富的经验。我们在德国也有一些经验,虽然不很多。必须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的兄弟共产党要继续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应该写进议事日程。如果不动摇我们一时的敌人——部队的基本力量,如果不加强和那些被征用到部队里去的年轻的无产者以及农民的联系,我们就不能指望在未来不可避免的战争中获得成功。我现在不能说,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能够总结这个经验并加以推广,让各个共产党都能了解。这个工作是完全保密的。但是至少必须坚决承认:在部队中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工作现在应该被提高到一个应有的高度。

现在我们面临的准备工作的第三部分,就是对直接的战斗活动的准备。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处于战争的前夕。现在可能甚至不是前夕的前夕。但是同志们,需要记住社会民主党老的合法主义传统可诅咒的遗产,它们还在滋养着我们各个共产党的许许多多的党员,特别是西欧共产党的党员。既然已经看到了必须有一个激烈的转折,那就必须事先让我们所有的党组织对策略和组织路线上的急剧转折有所准备。

需要承认,第二国际发生的分裂,各个叛卖集团的离去以及一些领袖从它的队伍里走到我们这里来,都给我们帮了大忙。这一切使得组织更加团结了,使得组织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了,甩掉了那些一旦出现军事行动会成为挂在我们的党组织,法国、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党脚上的沉重铅锤的分子。

一旦发生决战,我们的党组织对新的策略和新的组织活动方法应该有所准备,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应该提出来了。现在已经到了及时提出这个问题的时间了。

我们当然完全可以期待,就像我们这里1905年的情况一样,在西方各个共产党内可能会提出关于这个活动的路线问题。在这方面,在布哈林和斯大林同志制定的纲领草案里给它以相应的位置是完全合适的。在这个地方,他们说到

了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1905年俄国所处的情况。草案的这个地方我认为是错误的,在研究纲领问题的时候,我会说到这一点的。但是,就是像1905年一样,在兄弟共产党面前,特别是在西欧共产党面前,将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要转向直接领导投入了斗争的群众的有组织活动,这是肯定无疑的,这个问题就是以这样的形式提出来的。孟什维克的观点是,在面临战斗的时候,不是应该用武器去武装工人,而是应该用对自我武装的激情和渴望来武装他们,我们可以期待这种旧病是会复发的……

**斯大林:**用对自我武装的炙热要求。

**斯克雷普尼克:**正是这样:“用对自我武装的炙热要求”。这样的旧病复发是完全可能的。所有材料都说明,在西欧的各个党里,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十分大,我们将会遇到这种情况。必须事先就让我们的党对这种情况有所准备。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很有分量的组织了,它们将在未来的冲突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说的是红色前线人员协会,他们能对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军事行动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活动还只是在德国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还都不够发达,在英国只是刚刚起步,还没有多大的起色。解决红色前线人员协会的活动的任务是我们例行的有组织活动的任务之一,也是在西方国家用我们的影响去争取广大工人群众中具有战斗力的成分的例行任务之一,这个问题应该提上我们现在活动的日程了。

将来在我们面前还会出现其他的途径,我就不说这些了。我现在说的只是,我们要准备未来的战斗,这个问题正在被提上世界无产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日程。

与此相关的是,共产国际和各个兄弟党的活动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某些转折。我要再说一遍,“阶级对阶级”的策略应该得到更广泛的推行和筹划。关于从意识形态和组织上让我们的党对进一步的活动有所准备的问题,也应该提出来了。

否则情况可能会很危险,特别是在有的地方,世界资本主义最近的进攻有可能会从那里开始。我说的是波兰,在那里,我们可能会有个别的、微弱的军事活动的尝试,但是却没有对这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有组织的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完全同意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提出的呼吁,波兰党内的这些分歧和宗派割据已经是成熟了的脓包,我们必须对它们狠狠地和利索地划上一刀了。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这个问题在西乌克兰共产党内没有讨论,我不认为这是特别大的成就。这样的好事最好还是尽快地让它扛过去吧。

**柯秀尔:**他们病的时间也太长了。

斯克雷普尼克:小团体主义应该根除了。我说的是波兰的一个州的组织——西乌克兰的组织。这是在波兰共产党队伍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宗派割据,它是当地条件所特有的,最好还是让波兰共产党的这场病很快地过去吧。共产国际自己应该想方设法在这方面帮助它。

我所持的观点是,必须做到现在就对未来不可避免的复杂情况有所准备。我要再说一遍,因为我们不是在作战前夕,可能也不是在作战前夕的前夕,但是准备作战,从组织上、思想上做好准备的问题应该提出来。应该向兄弟党提供我们的运动的丰富经验、1905年和1917年的经验,让他们根据今天的条件,根据这些国家的情况加以运用,让无产阶级对未来不可避免的战斗有所准备。

主席:现在休息到晚上6点。

## 第二次会议

7月4日晚间

主席(李可夫):格伊同志发言,下一个是洛米纳泽。

格伊:可以同意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所说的,对工会工作只能有一个说法,那就是这项工作进行得很不得力,甚至是在所有国家都非常不好。但是如果关于工会工作就没有更多可以说的了,如果与此同时,关于共产国际工作的报告的调子却是温和的和乐观的话,那么,形成的印象就是,共产国际一切都好,而工会国际<sup>52</sup>则不好。我坚决不能同意这样的结论,因为工会工作的弱点是共产国际工作的薄弱方面的反映。这后一方面的弱点是表现在与工人群众的相互关系方面的,是表现在对工人群众的领导方面的。如果就最近一年西欧的历史上如此丰富的罢工和经济冲突的问题来说,如果对领导这些罢工中犯下的错误做个分析,那么很难说,这是工会工作的错误还是党的领导的错误呢?工会工作的弱点在什么地方呢?关于这一点,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并没有说,虽然根据我的感觉,对这个问题是应该给予更多得多的关注的。为了描述一下我们的弱点的性质,我举法国的工会运动为例。

5月18日,法国冶金工人联合会的一位书记写道:“我今天给不出最后的数字来,但是在确认了我们的工会状况现在和1926年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同时,我得出的结论是,成员数量在一些地区减少了75%,只是在不多的地区,减少的数量少于25%。总的来说,从发出去的选票看,我们损失了50%,而按照威望的大小来说”,——他继续说道,“我们处在从来没有过的最低水平,甚至在1922年也没有过这种情况”。这可能是一个表现得比较鲜明的情况,但是它很好地说明了法国的单一工会经历的危机,这个危机已经持续相当长时间了。而且这个危机我们既不可能用右倾也不可能用左倾来解释。可以解释这个危机的是,我们的同志们不懂得工会工作,没有熟练的技能,背后还拖着无政府主义和辛迪加传统的陈旧负担,不会在工会运动中工作。恰巧就在这封信的同时,法国共产党

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很长的关于工会运动的决议。这个决议一句话也没有涉及工会衰落的原因,甚至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这种衰落。这个决议只达到了学生作文的水平,写的题目是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除了有一些错误的提法外,重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许多正确思想和领导机关正确的决定和决议,但是就是没有提出中心问题,而法国工会将向何处去是要取决于它的,在法国共产党政治局的决议里,对这一点甚至连暗示都没有。这表明,如果我们在工会里工作得不好,那么是因为党的机关并不知道,也没有能给我们的工会工作人员指出,应该如何工作。现在是该做自我批评的时候了,我可以继续说下去,而且要说的是,共产国际也没有能显示出,它自己是有足够的关于工会工作问题的知识的。当然通过了决议,严肃的决议,但是在共产国际的这些起领导作用的决议之间的空隙里,我们见不到日常的领导和平时对工会工作问题的关心;看不到在这些问题上必不可少的内行的人。共产国际应该自己学习一下工会工作,并且教会欧洲的党,该怎样在工会里工作。

我们的弱点还有第二个来源,是和我们在策略问题上的混乱有关的,这是我们现在就可以部分看到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完全正确的方针。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和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sup>53</sup>的决定继续发展了这个方针,可以说它们是实际采用十五大的这条路线的经验。现在,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已经传到了各个地方并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共产党的反响怎样呢?各个地方形成了怎样的情景呢?来自右面的对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的批评更明确了,右的反对派对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表现也更清楚了。在德国,可以举出的是瓦尔赫尔和恩德勒同志的小组,他们完全否认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应该在括号里指出的是,恩德勒同志参加了代表大会并为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投了票,好像是同意这些决定的。但是在来到德国之后,他投票反对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这个反对派的基本出发点是,对改良主义该有另外的评价,而这种评价是和共产国际的评价背道而驰的。由此而来的是对改良主义有不同的策略。这个集团的发展趋势可能会导致它自己,也就是这个集团,转向左翼改良主义的立场,直至和党分道扬镳。可能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也是德国共产党内相当广泛讨论的一个题目。在美国,我们有佩佩尔同志领导的一个反对派,他在我们这里也是小有名气的。佩佩尔同志也是从右的方面批评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的。他指望美国劳联<sup>54</sup>,这个出卖性的和官僚主义的劳联,会变成一个真正群众性的组织,会吸收广大阶层的工人,他还抹杀了现在对于美国的运动是决定性的基本任务,那就是在加入了美国

劳联的路易斯工会<sup>55</sup>瓦解之后,应该进行组织矿工的工作。

如果注意到实际上组织新联盟的工作在美国是落到了一批共青团员的身上,他们没有多少党的工作和工会工作的经验的话,如果考虑到党的领导人在这个时刻注重的恰恰不是应该成为注意中心的那些任务的话,那么我们就又有了一个党领导工会工作的例子,说明这种领导不是有助于这项工作,而是给这项工作制造困难,在拖延这项工作。

我认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基本路线和随后的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说,我们有动手推行这条路线太迟了的危险,至少在工会工作领域里是这种情况。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已经过去了半年时间,只是现在,我们才把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的那些由十五大的方针产生的决定传达到地方上去,传达到欧洲各国去。只是现在,我们才迈出了一步,开始在积极分子中间讨论这些决定。改良主义分子在这方面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他们考虑到政治局势,决定也要转入进攻。当我们凑到一起讨论怎样进攻的时候,当我们正在和人为不该进攻的各种反对意见斗争的时候,改良主义分子已经部分地在向我们进攻了。现在,在所有国家都广泛掀起了开除出工会的浪潮,在英国,由于总委员会打算推行禁止共产党党员和少数派运动在工会里占据领导职位的方针,情况很严重;在苏格兰,共产党在矿工联合会里是多数,占据着领导地位,而改良主义的上层人士并不愿交出自己的阵地,而且威胁要分裂苏格兰的运动;曼努伊尔斯基同志说到了在瑞士和希腊已经分裂的事实,——所有这一幅幅场景都说明,现在改良主义分子正在加紧进攻。他们能够比我们更快地准备好并展开自己的进攻。在一些地方,现在相当多的打击正在向我们袭来,由于这些打击形成的印象,正在出现一些情绪,有可能会发生与右翼反对派的错误相反的错误。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没有让我们知道,在十五大上发生的是45度还是90度的转折。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受来自改良主义的那些打击形成的印象,有一种倾向是要来一个180度的转折。

**斯大林:**在哪里?

**格伊:**例如,几乎是一下子,第四次代表大会几乎是刚结束,就提出了洛佐夫斯基同志的新提纲,让工会国际的俄罗斯代表团讨论,其中有一系列完全错误的论断。这里不是对这些提纲进行实质性讨论的时候,但是在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立即就搞清楚了,有必要提出新的提纲,改变和部分修正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这个事实表明,有一些人对这些决定感到不满,还想要继续扭转。我虽然可以不提提纲里包括的那些错误的问题,但至少我还是要维护一个提法,

它也许可以没有争论地被接受。我的想法是,提纲越多就越乱,而基本的问题就在于,要实际做工作来贯彻十五大制定的那些决定。

**李可夫:**您是指我们的十五大吗?

**格伊:**是的,是我们的十五大,因为它突出了加强和改良主义作斗争的基本方针,而且对左转做了分析……

**斯大林:**是对国际问题吗?那么第八次和第九次全会呢?

**格伊:**第九次全会发展了这个方针,贯彻了这个方针。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重复了第九次全会的决定并把它们变成了工会的语言。

除了第九次全会和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遇到来自右的反对之外,还有个别的倾向认为我们的策略总的转折还不够。我的感觉是,对于工会运动来说,可以而且应该把任务规定为认真贯彻第九次全会和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无须再一次从根本上重新研究和进一步改变这个路线。

我想在结束时指出,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把工会工作的任务和工会国际的任务看成只是关系到工会国际的任务。我对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不满意,因为共产国际现在应该更多注意讨论围绕工会工作中出现的那些困难、那些障碍和那些争论。对于西欧各共产党来说,要解决整个左转的局势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整个局势向我们提出的那些任务,工会工作是关键。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应该是从实质上研究工会工作的各种问题,领导工会工作的问题,搞清楚我们犯过的错误,搞清楚困难和消除在一些党的内部围绕着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出现的意见分歧。

**主席:**现在洛米纳泽同志发言。下一个是洛佐夫斯基同志。

**洛米纳泽:**同志们,我感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没有足够严肃地准备要召开的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我感觉代表大会有一个危险,那就是它做不到具体地和按需要的那样充分地审议世界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关键的问题。这里很少有谁会满意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它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对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准备是不够的。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讲话(我完全不想对曼努伊尔斯基同志个人有什么怪罪)可以称做是国际评述,并不十分深刻,有一点粗糙,就像是我们在我们的宣传鼓动员周刊上可以看到的那一类材料,但是要是说这该是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或者俄罗斯代表团的代表的总结报告,是一份要阐述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以及代表大会所面临的其他问题的报告,那么对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就不能这样说了。如果在执委会向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总结报告里提出这种范围内的问题,而且是用这种提法



的话,那我的感觉是,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就会沉闷得要死了,因为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所涉及的所有问题已经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七次全会<sup>56</sup>上研究过了,而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几乎甚至没有顺带地考虑到第七次全会后发生的新情况。最近一次讨论总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局势问题是在第七次全会上,第八和第九次全会没有讨论过这些一般性问题,而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还是停留在了这个第七次全会的水平上,只是有几处提到了中国革命和印度尼西亚问题等是新的东西。最近这些年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果问题,这种发展的趋势问题,这样的问题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自己的报告里完全没有涉及。世界经济最重要的部门的状况如何,对这一点曼努伊尔斯基同志什么也没有说。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对英美冲突的发展说了几句,说是英国还在继续衰退等等。我的感觉是,重复这种千篇一律的论断是搞不清任何问题的。恰巧在英国,最近,也就是在1928年,我们看到的正好不是衰退,而是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如果只是限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甚至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就已经有清楚的论断,那当然是不行的。关于稳定的问题,关于资本主义的合理化的结果问题,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完全没有涉及,而这是代表大会应该解决的问题,是代表大会必须全面面对的问题。如果说到政治问题,那么在这里,我们从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里得到的只是非常贫乏的材料。其中,像国际改良主义的当代社会政治基础和新职能这样重大的问题,照我的看法,将是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基本问题之一,但是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却完全没有涉及。如果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对这些问题不做出回答的话,这将是它的工作中的一个缺陷。曼努伊尔斯基同志说,领袖们正在向右发展,而群众是在向左发展,这个公式看来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公式正在得到生活的证实。我感觉这是把这个问题的提出搞得太简单化了。说领袖们正在向右发展,这是完全正确的;还需要提到的是,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和特别是以工会组织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正在同国家机构沆瀣一气,而后者则是正在沿着法西斯主义的轨道发展。不过,对于群众在向左发展的过于简单化的观念是可以争论的。选举的结果根本就没有提供出这样简单的画面,说明群众正在不可遏制地向左发展。我绝不是主张持悲观看法的人,绝不是要对资本主义的稳定力量俯首称臣的人,而且我和我们的党一样,认为这种稳定是不牢固的,在它的基础上会发展出巨大的矛盾,我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至少是在欧洲是这样,已有的转折虽然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但已经是完全显而易见的了。但是在分析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时,绝对不能限于这样简单化的提法。是的,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自己讲话的第二部分指出了,虽然有这样的提法,在

奥地利,我们的共产党在7月起义之后损失了一些党员,照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话说,社会民主党是赢得了2万,而根据我了解的材料是4万。他说,这种状况就像英国的党员数量减少一样,是可以矛盾来解释的。一切都是在矛盾中发展的,这我们知道。但是什么样的矛盾呢,在现在,在当前时期,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里一个字也没有提。我不认为这是曼努伊尔斯基同志个人的缺点;不能为这个抱怨他个人,但是我感觉,这是准备工作的缺点,共产国际执委会没有能像样地做好这项工作。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日程怎样呢?我认为,第六次代表大会日程中唯一做好了准备的问题就是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问题。我们有布哈林同志和斯大林同志的纲领草案。它在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委员会里讨论过了。草案准备好了,就这个问题将有报告和讨论。这里提不出更多的要求了。而所有其他问题,照我的看法,没有准备好。正如我已经说到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之后,没有讨论过一般性的政治问题,恰好也就是这种状况给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打上了烙印。在这一年半时间里,世界局势发生了许多变化。要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不仅要过去的一年,而且要对整个4年的情况做出总结,应该对这段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总结,应该确定当代发展的基本趋势。最近共产国际执委会没有过问这个问题,我担心,可能就是在代表大会上,我们也会陷入一般性的论断和我们每天都听到的一般性的议论,而对周围的整个局势,对任何新的东西,都搞不清楚。

至于殖民地问题,我的感觉是,对这个问题的准备情况更糟糕。要知道,这里要做的是我们最近这些年拥有的中国革命的巨大经验;然后就是试图更具体地提出殖民地的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问题,也就是列宁早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表述过的东西<sup>57</sup>;然后是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一大堆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所有这些都没有什么准备。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的20天里,成立了殖民地委员会,并没有特别清楚的计划就着手讨论这些问题了。我想,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殖民地问题将会是一团糟,更何况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委托给了这样的同志(当然他们是很好的工作人员),他们从来就没有管过这些问题。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插话没有听清楚。)

洛米纳泽:如果是委托给从来没有管过殖民地问题的人,那就应该哪怕是在代表大会前半年这样做,而不是在20天前。

臧声:您也没有管过。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插话没有听清楚。)

洛米纳泽:例如,我就最坚决地拒绝在代表大会上就总的殖民地问题发言,而且我想,就是你们也不可能拿这个题目发言。

斯米尔诺夫:那中国事务呢?

洛米纳泽:就是中国事务我也不同意当报告人。

还有一个关于日程的意见。我想,关于俄罗斯问题的报告应该委托给我们党的政治局的代表。瓦尔加同志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学家,但是关于俄罗斯的经济、它的发展法则、它的特点,最好还是让联共(布)中央的代表就这个题目提出报告。这里可以把两个报告结合起来,而现在的报告是分开的:一个是关于苏联经济发展的报告,然后是关于我们党内状况的报告——这两个问题是不能分开的。第二,照我的看法,没有任何严肃的理由不把这个报告委托给我们党的政治局代表。瓦尔加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有许多工作,他需要阐述世界经济问题——最好还是有一个分工,俄罗斯的问题让联共(布)中央的代表去阐述。

我想就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涉及的那些问题的实质说几句,因为我的时间很少,我就谈两三个主要问题。

喊声:延长时间。

洛米纳泽:我已经说过了,工人群众的左转不是以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所说的那种极其简单化的形式进行的。我感觉,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把这个左转过程说成是在最近一次执委会全会上发生的欧洲各共产党策略转变的唯一原因,这是不对的。他说:不得不让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党的策略左转,因为我们在欧洲看到的是左转的过程。不仅是因为这样。这里有一系列原因:第一,国家正在沿着法西斯化的道路发展等等原因;第二,改良主义的运动,包括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正在和国家机构同流合污;第三,改良主义对我们进行的那种极其残酷的斗争,等等,等等。正是因为英国、法国和德国共产党的策略有这样的转折的必要性已经成熟了,不是很骤然的,但是无疑是在向左转折,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感觉,我在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说到现在威胁我们的主要是来自右的危险并不那么正确。要知道,在党的十五大前,局势是这样的,已经可以感觉到必须要有这样的左转了。我记得,在十五大上,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是怎样抨击我和沙茨金同志的,证明当我们说到共产国际各个支部右的倾向在发展的时候,几乎是陷进了左倾。但是经验证明了,正确的是我,不是曼努伊尔斯基同志。也许在十五大上就这个问题发言是不合时宜的,当时正在和反对派斗争,但是这是另一回事,不过实践总还是证实了,我们是正确的,而不是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我想引证几个例

子,它们可以证明,在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里,党内的发展是一种怎样的状况。来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各共产党将比以往任何一次代表大会时更加团结。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我们的各个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极其尖锐。到第六次代表大会时,无疑已经有了团结,共产国际队伍里的统一也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极左的倾向完全克服了。你们知道,极左运动变成了什么。它变成了和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连通一气,变成了直接背叛和直接的叛徒。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党是托洛茨基-马斯洛夫类型的极左集团或者极左派别在那里还多少有些力量的了。没有一个国家还可以让他们在那里起到某种多少严肃的作用了。这不是说就不需要再继续和他们斗争了,和极左集团个别残余分子的思想 and 组织进行斗争的坚决措施还是必须的。这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一些共产党内有右的错误的某种复活和复发的情况。就拿十五大后的最近一段时间来说吧,我们看到,在一些党的内部不得不进行反对右倾的斗争。你们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九次全会上经受住了怎样的反对英国共产党的斗争。英国党一致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一致贯彻了这些决定,虽然在英国形成的整个形势中根深蒂固的右倾倾向有时还会表现出来。不久前,萨克拉特瓦拉作为唯一的共产党议员,和其他党(既有资产阶级政党,也有工党)的代表一起,恭恭敬敬地对议会里更换的议长表示了感谢。这是我们党内唯一的议员,不能说他在议会里的活动是非常革命的。关于法国我就不详细说了,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已经说到这方面的情况了。我只是想指出,在法国的工会里,一段时间曾有过所谓积极的改良主义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改良主义的工会和我们工会的区别就在于,改良主义者是在消极地争取改革,我们共产党人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则是积极争取改革。当然,党否定了这个积极改良主义的理论,但是这个理论在共产党人中还有存在的空间,可是在法国工会的工作中,看不到什么特别的左的倾向。大家都知道,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是有机机会主义错误滋生的沃土的,而捷克斯洛伐克党现在所面临的那些考验将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一部分领导人和具体的执行人员将会阻碍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革命斗争。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党正在进入一种非常尖锐的局势。甚至可能会发展到转向地下的状况,而且这里将会爆发一场机会主义分子反对革命策略的斗争,这是无可怀疑的。

关于巴尔干我就不详细说了。这里无论是什么党,都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右倾,而且甚至是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在南斯拉夫党内,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在那里犯机会主义的错误。几乎可以毫无例外地说,所有国家都是这种情况。在

十五大之后,我们这里发生了挪威的舍夫洛集团的活动,他被开除出党了。而在瑞典,一些显赫的同志建议在未来的选举中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结成反对反动集团的联盟。在美国,美国共产党人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猛敲了他们一下之前,曾以最机会主义的方式进行了竞选运动的。这甚至不能说是通常意义上的机会主义了。收集签名的指示是用那种完全与共产党不相称的、美国的事务主义的腔调编写的:这里既放弃了对共产主义的宣传,也放弃了对共产主义和革命的宣传,而且根本就放弃了和我们想要得到签名的那些人的政治谈话,——这是一种前所未闻的情况。是的,美国党在共产国际指出后谴责了这种做法,但是在一些党的内部冒出了这样的倾向,这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我根本不是想用这些来说明,我们正在和某种有威胁性的右的危险打交道,我们致命的危险是从这里来的,但是我感觉,在一些党的内部,右的方向正在成形。当然,这是在更加健康得多的基础上,在共产主义运动更高的层次上发生的,是在我们的运动比前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时更牢固地联合起来的条件下发生的。但是,各种机会主义的趋势还是在一系列党的内部有所表现的。而且让我吃惊的是,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谈到各种右的倾向时,对德国却一个字也没有说,由于工作关系,他对那里的情况是很熟悉的,而且这种右的旧病复发在那里也表现得最鲜明不过了。在德国共产党内,我们能见到的,的确不仅是右的色彩,也不仅是右的流派和方向,而且我们所见到的如果不是宗派的话,那也是一个完全抱得很紧的右派集团。这是老的布兰德勒集团,它认为自己在1923年没有犯任何错误,不同意共产国际对1923年的评价,在所有问题上,也包括在社会主义党的问题上,是和德国党背道而驰的。

德国党内的右派集团认为,我们应该同马克思主义类型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结盟,借助他们战胜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然后再去瓦解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当然,这是机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消灭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而且不仅是在这个问题上,在其他的基本政治问题上也一样,在德国共产党内存在不可调和的、尖锐的政治分歧。

最近在德国党内形成了一个中派,它想要在德国共产党的基本领导干部和那些企图把这个党拉到机会主义道路上去的右派集团之间搭桥。我感到吃惊的是,为什么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对这一点只字不提。挪威的历史以及其他的一切,和我们在德国遇到的相当严重的右派集团相比,都是区区小事。无论是在德国的各个组织面前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右派的代表人物,特别是中派的代表人物都是会反对党的领导的。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里的德国代表团和联共(布)代表团的联席会议<sup>58</sup>谴责了右的倾向和企图为右派的错误辩解的中派代表。但是,虽然这个决定是放在天平上的一个很重的砝码,是对德国党的领导有利的,但是在德国,党内的斗争并没有减弱,而是更加强了。最后一次全会强调了这一点。没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没有截然对立的分歧的。我可以举出一系列的例子,说明是怎么回事。

例如关于罢工斗争的问题。托姆斯基同志在工会国际的代表大会上有些片面地强调了没有准备的罢工行动的危险性。他在自己的讲话里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事情的一个方面了:如果没有成功的希望就不要号召进行罢工斗争。德国的右派人士把您的讲话印出来了,利用了它并企图用它——用您单方面地提出问题这一点,来掩饰(当然这是不对的)一种情况,那就是如果改良主义的联盟\*反对罢工,共产党人就会拒绝领导罢工斗争。那里存在着一种右派的理论:如果共产党人没有占据整个工会机构,至少是在基层,如果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掌握工会,那么无论是怎样的自发性群众运动,他们都没有权利也不可能违反改良主义工会的意志去领导罢工运动。人家想竭力用您在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有些片面的发言掩饰的(当然是虚假地掩饰),是彻头彻尾的、完完全全的机会主义的理论。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在选举的时候,当改良主义的工会联合组织根据章程是该在政党斗争中保持中立的,却违反工会运动的章程,建议选民们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共产党人建议我们占有多数的工会投共产党人的票。在斯图加特,我们共产党在地方的工会联合组织里占有多数。但是斯图加特的共产党人却放弃了以工会的名义号召选民投共产党人的票,而全德的联合组织是号召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的。在另一个城市,埃斯林根,共产党人执行了党的指令,得到了很好的结果。我就不说德国的右派疯狂地反对工会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了,关于这一点,格伊同志已经说了。

有意思的是,在这里,曼努伊尔斯基和皮亚特尼茨基同志都说到了德国选举的结果,但都没有指出一个情况,那就是恰恰是在右派掌握的那些选区里我们没有成功。我感觉这是一件相当带有先兆性的事情。在图林根和梅克伦堡领导地方组织的是右派,他们主张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结成联盟,恰恰是在那里,我们得到的选票最少。在中央全会上应该说到这一点。在奥地利,现在正在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不再说这一点了,因为把所有事实都罗列出来要费太多时间了。

\* 指德国工会联合总会。——编者注

我不同意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提出的公式:最近各个共产党是在向广度,不是在向深度发展。用普通的话说,就是它们是在数量上扩大。实际上不是这种情况。只是在瑞典党内我们有所增长,而在其他党内没有这种情况。这种公式不完全准确。

然后再来说说共产国际建立的附带组织。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这里批评了德国党,而且不是没有一些根据的,说它完全没有参加苏联之友的科隆会议<sup>59</sup>。我感觉,科隆的这次会议失败了,共产国际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因为共产国际既没有邀请红色前线人员协会,也没有邀请工人的体育组织参加,没有邀请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组织。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过去2—3年的经验表明:我们建立像苏联之友协会这种类型的组织都没有能取得很大的成功。我们在组织殖民地人民反帝同盟组织<sup>60</sup>这件事上,在组织“统一”集团这样的工会组织的时候<sup>61</sup>,就没有能成功。

**斯大林:**您不知道为什么德国共产党中央拒绝帮助苏联之友代表大会吗?

**洛米纳泽:**和我交谈的那些德国人说,因为红色前线人员协会、体育组织、革命的参战人员联盟以及其他的无产阶级组织都没有被吸收,所以很难对参加科隆会议的教授们有什么影响。我的感觉是,我们曾企图建立这种附带的组织,把半改良主义的、左翼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吸收进来,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我想,这个实验是应该做下去的,但是现在应该确认的是,这样的企图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结果。我记得,曾经对殖民地人民反帝同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一些同志认为,这个同盟有着伟大的未来,等等。但结果是,把兰斯伯利、菲缅、库克等等这样有些好像是同情共产主义的改良主义者吸收进来了,虽然他们实际上当然并不是这种情况,把他们吸收到了工人的群众运动的组织里来,或者是让他们参加到西欧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团结起来的事业中来,是不可能指望获得成功的。这种做法有可能得到一时的效果,但是不可能有多少像样的基础。而且这个结论现在是从过去的年份的教训中得出的。

对殖民地问题说几句。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声明说,想象资产阶级在印度的作用,它的革命作用,已经完全消耗尽了是一个错误。

**臧声:**那中国呢?

**洛米纳泽:**中国问题我不讲了。这个问题很大。在这里,有些地方我是错了,其他同志在一些地方也错了。这个问题我暂时放在一边。

回到印度的问题上来。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声明说,如果想象资产阶级在印度的革命作用已经完全消耗尽了,那是错误的。我的意见是,谁也没有说资产阶

级的作用根本就消耗尽了,可以把它略而不计了。在印度,资产阶级的作用没有耗尽,但是这是反对革命的、反革命的作用。如果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想要证明,在未来的斗争中印度资产阶级的作用还将是革命的,那他就需要更清楚地说出这一点来并且不惜时间来论证这个观点。不能把印度资产阶级的作用略而不计,但是应该说,它将会站在英国方面,因为它和英国帝国主义的接近,和它连为一体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其他的殖民地国家。仅印度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大党的全部工作经验,也就能完全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了。说印度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还没有耗尽是完全错误的。印度的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是清楚的事。印度的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之间有冲突,这也是清楚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清楚的是,只要是阶级斗争一激化,只要是革命斗争一开始,印度的资产阶级将会站在英帝国主义者一边,反对工人、农民运动,反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运动。从这个观点出发,当然不能把印度资产阶级略而不计。但是留下这样模棱两可的公式,说是它的革命性还没有耗尽,这是极大的错误。

当革命运动高涨的时候,我们在印度将提出什么样的口号呢?我不知道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是不是将决定这个重大的问题。我感觉,更正确些的做法是宣传苏维埃的口号,在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开始的时候,着手组织苏维埃。我不知道我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代表大会应该涉及这个问题了。

最后,在结束的时候,我应该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机构的工作说几句。我自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里工作了很长时间,我不想责怪谁,但是我要说的是实际上存在的情况。我想,一些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解决得太迟了。就拿印度尼西亚的问题来说吧。<sup>62</sup>结果是这样的,同志们从印度尼西亚来了,提出了起义的问题。9个月没有任何人和他们谈,他们从一个委员会跑到另一个委员会。这时在印度尼西亚已经发生了起义。只是在起义之后才做出了决议,说到是怎样起义的等等。这件事一拖就是9个月。

南斯拉夫党内冲突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里讨论了5—6个月。几乎没有一个重大的问题,特别是党内生活的问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里能够很快地和及时地解决。我不是怪罪谁,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构里的人力太少了。十五大提出了用联共(布)的工作人员加强共产国际执委会。但是在十五大之后,只给了斯列普科夫一个人——这还是不够的。和到目前为止所做的相比,应该用我们党的更多的工作人员加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构。

**主席:**洛佐夫斯基同志发言,下一个是托姆斯基。



洛佐夫斯基:对于共产国际来说,现在从国际局势可以引出一系列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而且我的感觉是,这些任务,特别是组织方面的任务,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在我们党的帮助下解决的。如果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对局势所做的总的的评价是正确的话,——而它是正确的,是符合我们党的评价的,——那么,国际冲突的加剧和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紧张关系的加剧就应该决定我们的整个政策的。现在,为了真正实际地而不仅仅是用宣言和决议,是在实践中,动员工人群众反对日益逼近的战争,反对日益逼近的封锁的话,就必须关心让我们在苏联以外能有很重要的支撑,一方面是各个共产党的支撑,另一方面是那些对于共产国际来说起到辅助作用的组织的支撑。在苏联以外,有这样的辅助组织,他们在合法地、半合法地和非法地工作着。这些组织中的第一个就是共产国际西欧局<sup>63</sup>。我想,建立这样的局的想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需要得出进一步的结论:需要加强这个西欧局,在冲突加剧和与苏联的相互关系变得激化起来的情况下,让它能够在各个地方直接进行领导。国际关系越是更加复杂,即便是通过电报,领导起来也会变得更加困难,甚至通过电报和相应的党联系也会更加困难。在各地直接指示和直接领导是今天的局势提出来的要求,所以从分析局势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要扩大职权,要从组织上加强共产国际西欧局,使得它有可能真正在各个地方发挥领导作用,能够协调西欧各党的行动,能够及时做出指示。

需要得出和可以得出的第二点是,我们在去年做到了建立称为工会太平洋书记处<sup>64</sup>的太平洋工会的联合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被镇压了,那里是一片超级恐怖;太平洋工会书记处处于地下,正在进行组织和联合日本、中国、菲律宾和整个太平洋沿岸的工人的工作;而现在,联系到即将发生的种种事件,从组织上加强这个机关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做到了在太平洋书记处这条线上,在澳大利亚建立一个称做“太平洋工人”的合法机关。近期内召开太平洋工会代表大会的方案和《太平洋工人》的出版,在澳大利亚的上院引起了一场风暴,因为这个机关对于澳大利亚的工人运动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它提出了世界工人运动的问题,太平洋的战争危险的问题,等等。不仅是澳大利亚的资产阶级,而且澳大利亚的改良主义者都开始了反对太平洋书记处的运动。

但是不仅如此:最近几个月里,我们做到了把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联合起来,建立了拉美工会联合会临时委员会。这有多么重要,日内瓦的阿姆斯特丹国际不久前的决定就可以表明了。阿姆斯特丹分子在劳动局的最近一次会议是在日内瓦召开的,决定也要成立一个自己的联合会,显然是要和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成立的那个联合会抗衡。在这方面,在整个拉丁美洲,包括墨西哥和古

巴在内,建立一个特别的联合组织,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太平洋沿岸和拉丁美洲的工人联合起来的工作有多重要,这未必是可以争论的,但是遗憾的是,没有人从事这项工作。我应该说的是,如果我们不从我们党内汲取力量,那么就非常难以好好地推动工作,在面临正在来临的种种事态的情况下,应该把这个最最重要的工作摆在应有的高度。

在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涉及的所有问题中,我只想谈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的殖民政策问题,而且我事先要说的是,在殖民政策的各种问题中,我的感觉是,曼努伊尔斯基同志要么是对印度的表述不对,要么就是他想的是这些措辞是正确的,但是表达得不特别正确。事实上,如果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殖民政策的一般路线拿过来,把共产国际的一般路线拿过来,那这个路线就是,要把殖民地人民争取自己民族解放的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运动,和苏联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正是这个总的路线决定着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和农民运动的所有问题上的整个策略。如果我们举出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国家,也就是说最重要的冲突策源地,那么从最大的国家中,我们将可以看到3个国家,那里的运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一个是中国,接下来便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至于剩下的那些大的殖民地:中东、非洲国家或者拉丁美洲和太平洋的半殖民地国家,那里的革命运动没有像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那样,具有这样的意义。我们在最近两年管的是中国。我现在不谈这个问题。我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次全会提出了完全正确的路线,而且中国共产党在这之后做出的那些决定也提供了中国问题上的正确路线。

至于印度,在那里,我们见到的是,运动肯定有发展,而且是在有着强大的、组织良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下的发展,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是弱小的,而且组织得不好,只是在最近一些年才开始在群众性的罢工里有些行动,才开始形成一个阶级。印度局势的特点在于,资产阶级不仅对工人群众具有巨大的政治和思想影响,而且有巨大的组织影响,在印度的任务并不在于提出印度的资产阶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于革命,而在于提出并在实际上做到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让它脱离印度资产阶级;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在印度出现的那些工人—农民政党是和国大党中的自治主义者左翼<sup>65</sup>联系在一起的,要让这些工人—农民政党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明确和清楚的纲领基础上形成阶级的和政治的政党。我回想起在3—4个月以前,当共产国际在制定有关印度的运动的呼吁书时,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对于农民来说,基本的口号应该是怎样的;而且我也记得,当我们提出了没收土地的口号时,非常左并且很革命的罗易犹疑了。他说,没收土地的

口号会把民族资产阶级中进步的那部分人——自治主义者推开,这样一来,在一定程度上和这个左翼结合在一起的工人—农民政党现在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口号而削弱自己。共产国际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关于没收土地的口号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用这个口号可以锻造出,可以提炼出一个真正工人的共产党来,而且可以从政治上让现在正在印度发展壮大的农民运动形成规模。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觉,在印度,焦点和倾向并不在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所说的那些地方。问题并不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或者反对革命的,它是不是能被利用来反对英帝国主义。印度的反革命和它的队伍中的分歧不是在怎样反对英帝国主义的问题上,而是在于怎样才能更好地和它达成协议。我们不要忘记,印度的大金融资产阶级是和英国资本联系在一起的,它甚至不提自治和自决,它是打算和英帝国主义分享由于镇压民族运动能得到的好处的。和英帝国主义没有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自治领权利的范围内提出关于自治的问题的。但是资产阶级的所有队伍都是强烈反对革命、反对阶级斗争的。

我们在印度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工会里领头的是和自治主义者有联系的资产阶级律师。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工会联合会里清除资产阶级的、自治主义者的律师,必须在那里建立起由工人自己领导的、真正的工人组织。在这样的形势下,印度资产阶级能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成为反对派,它可能在什么程度上成为反对派,这样的问题现在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共产国际的工作重点不是在这里,而是应该创建一个真正的印度共产党。那里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3年前,那里出现了一个祖巴托夫<sup>①</sup>式的、警察类型的政党,它的一部分是和警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已经把可疑分子清除出去了,现在那里形成了共产党,但是它在思想上还没有成形,也还极其脆弱。在这种还没有成形的运动中,在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运动的时候,当数十万工人在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反对本国资产阶级、英国资产阶级的时候,在这种形势下,必须要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要最大限度地划清阶级界限。我的感觉是,在这个问题上,曼努伊尔斯基同志说得不大清楚,而这个问题是需要搞准确的。

现在来说一说最近在选举中取得的成就。我想,这些成就不是特别大的,也不该把它们夸大了。你就拿那个德国来说吧,一位德国同志做了这样有趣的统计。他统计到,在3 000万投票的选民中,有2 000万是雇佣劳动者,而在这

<sup>①</sup> 祖巴托夫是20世纪俄国沙皇暗探头子,曾组织过破坏革命工人运动的伪工人组织。——译者注

2 000万雇佣劳动者中,有900多万是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的,有320万是投共产党人的票的,其他人投民族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等人的票。如果注意到,有1/3投社会民主党人票的人不是工人,而是小资产阶级,那么得到的结果是,只有一半的工人投了工人政党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票,而一半的工人投的是民族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和其他人的票。

**斯大林:**这不是政治的计算办法。

**洛佐夫斯基:**但是这种计算提供了一个线索。它指出了向左转的情况进行得非常缓慢。这种转移在发生,这是对的,但是它暂时还只是涉及了不太多的类别,不太大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而相当大量的各个阶层,大量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向左转。如果说这些统计计算的数字还不能百分之百地回答一个问题,说明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左转,那无疑这种统计上的研究也是可以给出某些提示的。应该说,现在世界工人运动中发生的种种事件的特点,不仅是改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工人组织的进攻更加强了和更尖锐了,它们的特点也还在于(而且这也就是它们毫无疑问的特殊性),对共产党、对革命工会的进攻形成了国家、司法、社会民主党和阿姆斯特丹的工会官僚们的统一战线。

这个统一战线现在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应该指出,甚至在我们的党还处于合法地位的那些国家里(而这样的国家剩下的很少了)企业里的共产主义组织现在是非法的。它们非法是因为,甚至在法国、英国等国,支部的合法存在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支部通常是完全被从企业里抛了出来。在法国甚至有这样的情况,支部一个接着一个地被从工厂里抛了出来。一个有20—30—50人的支部会被从工厂里抛出来,虽然在这个工厂有几千名工人。在改良主义者的背后有国家机构,如果我们想要现实地估量我们的共产党、革命工会、革命的少数派等等不得不经受的那些困难的话,是应该注意到这一点的。联系到这种对工人运动的革命的一翼的集中的和有组织的进攻,我们现在面临的事实不仅是绝大多数的党已经不能合法存在了,而且还有就是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共产党在工厂里的支部已经都是非法的了。不仅如此,在工人运动革命的一翼还有某些合法的可能的国家,特别是在重工业里,革命工会的存在引起的是对它们如此集中的打击,以致这种状况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削弱和成员数量的减少,等等。现在我们在法国和在其他一些国家,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现在社会民主党人和阿姆斯特丹的工会运动领导推行的政策是要和国家一起扼杀所有的革命工人运动,包括共产党、革命工会,等等,等等。正是需要从当前时刻的这种特点出

发,在群众工作方面为我们共产党和为我们的工会得出的一系列组织上的和政治上的结论。

同志们在这里说到了缺点。这些缺点是有的,但是也有一系列不容置疑的成就。我们就说意大利共产党吧,它在非法条件下,在严重恐怖的条件,做到了建立整个来说非常有条理的工会运动。是的,这个工会运动人数不多,是的,这是些非法的工会,他们在整个意大利有1—1.2万人,但是这些工会领导着工厂的经济斗争。工会的人数不多,但这是因为群众性的工会运动不可能在地下存在。历史上没有过这样的情况。能够包括几十万工人的群众性的工会运动是不可能合法存在的。而且我们有这样的事实(这不仅是在意大利,而且是在一系列其他国家),我们的共产党建立了非法的工会,他们在那里领导着工会运动,他们通过这个特殊的齿轮系统和群众联系。这就是只是最近才有的一些特点;如果我们想搞清楚困难也搞清楚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做过的工作的话,这些特点也是应该仔细研究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工会运动的状况,它的缺点、弱点等等问题。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和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详尽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代表大会是在3个月前才结束的,所以我现在就不在这个问题上说很多了,但是我想把一个在这里被格伊同志搞乱的情况解释清楚,而且这里的许多同志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怎么回事呢?格伊同志在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制定的关于组织问题的提纲里,有一个提法是争取工会的改良主义机构。我是坚决反对这个提法的,反对争取工会的改良主义机构的,反对是有以下的理由……

**斯大林:**争取工会也不坏嘛!

**洛佐夫斯基:**我们应该争取群众,而改良主义的机构是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而争取工会的时候,我们是要把社会民主党人赶出去和让共产党人进去。我们可能是要把改良主义者赶出去,建立自己的机构取代改良主义的机构。(喧闹声)这远不是同一件事。

**斯米尔诺夫:**这太好了。(喧闹声)

**洛佐夫斯基:**“争取工会的改良主义机构”的提法意味着我们希望把社会民主党人的机构工作人员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希望把改良主义者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而我们的口号是——把社会民主党人赶下来,把他们从工会的领导中赶出去,提出由共产党人、革命的工人取代他们。一句话,是用革命的机构取代改良主义的机构。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引起了分歧。它没有能在高层讨论,但是它将会得到讨论的。在我们更详细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让我们看看谁对谁

错吧。至少现在谈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正像你们知道的,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在共产国际专门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通过的,正像格伊同志所说的,在一些国家引起了一定的抵制、积极的和消极的抵制。这种抵制主要是来自右翼。右翼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了决议,不让承认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拒绝这些决议,等等。无疑这个问题也将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

作为结束要说的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应该解决许多政治问题。这里有总的国际局势,有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纲领问题、殖民地问题,等等。这一次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专门的组织问题。没有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通过了很好的决议。但是基本的,共产国际所需要的,所有共产党所需要的,所有革命工会所需要的,所有国家的所有革命少数派等等所需要的,是位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它在国外的代表机构在组织上的加强,组织上的巩固,所有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巩固、加强和工作的开展。这个组织问题是不能用一个好的决议解决的——它要在实践中解决。要解决组织方面的问题,要让各个共产党能以更快的速度通过发展所必须经历的各个阶段——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的共产党有着党的建设方面、基层机关建设方面、群众工作等方面最丰富的和广泛的经验,可以做许多事情。我想,在代表大会期间和特别是在会后,将有必要让我们的党严肃地注意到从组织上加强共产国际和它的代表机关,因为正在向我们逼来的各种事件要求我们在工作的所有方面,既在内部工作方面,也在我们的对外政策和共产主义政策方面,都做出最大的努力。

主席:托姆斯基同志发言。

托姆斯基:我想提几点意见。第一个意见是关于洛米纳泽同志的。我不知道,不明白,洛米纳泽同志为什么要在发言里提到什么好像是我在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出的不正确的措辞。洛米纳泽同志是一个很接近共产国际的人,知道我并没有要争取做这个发言,而且我根本就不喜欢在隆重的场合发表讲话,我是受了委托的,更何况是我的中央委员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常设局要我在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上讲话的。我作为完成委托发了言,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中央委员、工会国际委员、共产国际委员对我的讲话有任何实质性的意见。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洛米纳泽同志在过了半年之后跑出来说,右派在利用我在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某些部分?我为什么要说话呢?洛米纳泽同志,原因就在这里。完全不负责任,完全不理解罢工在工人阶级总的斗争中的作用和意义,不理解工人阶级是在通过罢工的经验评价这些或者那些领袖的领导

作用的,其中也包括对共产党领导人的评价,检查他们领导工人阶级的能力,在一些国家,其中包括在德国和其他国家,有的同志开始在拿罢工开玩笑,就像一个孩子在耍一个锋利的刀子一样:把自己的指头割了,还有把指头完全割掉的危险,因为有些集团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理论,认为在改良主义者不承担起领导罢工责任的地方,每当发生经济冲突的时候,共产党人应该把事情转向罢工并自己承担起领导责任来。早就需要反对这样轻率的理论了。因为如果您在没有计算力量,不了解和没有对问题进行过研究,就去号召工人举行罢工,虽然能唤起哪怕是上百名工人并带领他们搞起罢工的话,那么在这之后,他们会失败地离去,没有了首领,被打得零七八落,要按照羞辱的条件重新回来工作,那么在您让工人们见到这些领袖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听他们的,虽然这些领袖们也是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帜活动的。如果以后这样的共产党员要尝试着来到工会,并要像权威一样就某个经济问题发表演说的话,工人们简直就不会听他们的。这里在座的人进行过的罢工不比我少,而且知道我们早先是怎样进行罢工的。这里不能从抽象的革命性观点出发来看待罢工:谁要是主张罢工,他就是革命者,谁要是反对罢工,那他就是反革命分子。我们在从事工会工作的过程中,而有时是在反动时期,没有工会,那么一般来说就是要在对广大的工人群众开展工作的过程中,通过用这种工作和改良主义的办法对比,在工人阶级广泛的日常斗争的经验基础上,检查我们的革命方法了。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这个阶级在眼前看到的是: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方法,这是改良主义者的方法,工人阶级选择我们的方法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口头上是革命的,而是因为它们能够引导着人们更接近目标,因为我们能更好地考虑客观条件,能团结工人阶级,能既把他的最终目标也把例行的日常任务都给他解释清楚,能够最彻底地斗争到底并能够及时向工人阶级说,他应该怎样斗争。我并不羞于承认,在我过去的革命活动历史上,我也有时曾不得不说服工人放弃罢工。这并没有导致降低我的党的权威,而是相反加强了这种威信,因为我们知道而且工人也明白,在现有的条件下罢工可能会失败,而在经过半年后,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领导着工人取得了可信的胜利,预防了轻率的行动和惨重的失败。难道不是这样吗?当这种理论正在建立的时候,在所有情况下,无论状态如何,总是引导革命的工人去罢工,而在有了一两次失败之后,把共产党人的鼻子都打坏了的时候,改良主义者就会说:“工人们,你们看看,这些共产党员是些轻率的毛孩子,总是引导你们吃败仗。”罢工斗争的理论还没有写出来,但是这个斗争的实践说明了什么呢?工人在多数的罢工中都是输家,赢了罢工占有的比例小,除了苏联外,到处如此;在我们这里,当事情发展到了这

样地步的时候,则是工人取胜的罢工更多些。(笑声)

喊声:这是理论还是实践?

托姆斯基:是实践。但是到处都是,如果你们开始无论什么样的罢工,即便是经过了最谨慎的算计,更大的可能还是它将会被打败。统计的结果就是这样说的。而当这里在说要不顾一切地领着工人进行罢工的时候,也就是说要把斗争铺开的时候,我要说,这是在有系统地把共产党人赶出工会运动。

你们可以看一个小小的例子……我手头上没有材料,我本没有准备要发言,就让同志们来纠正我吧。在鲁尔州,在冶金工人的斗争展开的时期,在当时是布尔什维克的企业里,也就是说是一直跟着德国共产党人走的企业里,总是投他们的票,共产党人来了,那里在对罢工问题投票的时候,没有得到支持;当在德国南部的一个德共区委会宣布了要在全区举行冶金工人的总罢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参加这次罢工。如果我们的党——不管是在哪里,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我们的党向工人提出罢工的口号,而工人们没有回应,我认为这是我们党最不能允许的失败,是由于对罢工轻率的态度引起的。我们事先没有讨论好这件事。我认为,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的整个策略中最危险的错误就是对罢工斗争的轻率态度。这样的态度是不行的。我们对罢工是有统计的,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在罢工斗争之后,我们拿来有关罢工、有关德国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罢工斗争的统计,那你们就应该知道,每一次罢工给工人阶级带来的是解雇,群龙无首,最好的工人被从企业中赶走,这对它是最重大的灾难。除了武装起义外,这是最尖锐的斗争形式之一。所以特别是工人们认为,轻率地发动工人进行罢工是一种最大的罪过。这里是需要计算的,需要看一看,需要事先的组织,这里不能只是某些代表人物招摇过市地露上一面就算完事了。当然我现在所说的,可以用剪刀从速记稿里剪下来,拿过来贴出去,然后说:“你们看,这就是托姆斯基根本反对罢工的讲话”。现在就从速记稿里把这段话拿来,用剪刀剪下来,贴在一起,说有什么右倾。但是,如果企图利用我的发言给我加上什么右倾的罪名,这样的企图是一钱不值的。难道从我所说的关于罢工的情况可以得出结论,说是在做了准备,在工人准备搏斗和经济行情有可能提供成功的希望的时候,在经过了计算,有了事先的组织工作的情况下,在改良主义者不想做的时候,难道共产党人就该不顾他们的愿望,应该拒绝罢工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不仅如此,他们应该是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把这样的罢工组织好。我想要的只是让共产党人学会赢得罢工。如果改良主义者拒绝了罢工,而你计算了力量,了解这个工业领域的经济情况,从心理上和物质上做好了罢工的准备——从各个方面



准备好了,那当然你也还不能保障不会失败,但是你在哪里就有了更大的可能获得成功;你做了一切来保障成功,——那这个成功就将是巨大的。这个成功会比40多个个别的、大胆开始但大多数是失败的罢工更有价值。整个转折都将是朝你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了。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也就是我在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上所说的,在罢工问题上的这些错误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各种一般性的错误,因为我们对工会运动的总任务问题写得太多了,我们写了非常多的关于工会工作的提纲,但是却很少在这些工会中进行实际的工作。

最后是格伊同志和洛佐夫斯基同志提出的问题。请格伊同志和洛佐夫斯基同志不要见怪,问题在于,如果在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之后的5—6个月时间里,你们从写新的提纲开始做起,我怕工会国际的实际工作状态不会好。应该不是从提纲开始做起。我们的提纲,很好的提纲,多得不得了,但是这些提纲在还没有推行的时候是很好的。这些提纲一旦开始推行下去,立刻就会有“右派”和“左派”开始彼此揭发并按照自己的看法评介提纲,结果是需要再写新的提纲,而这些提纲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不值得再去推行它们了,因为它们已经过时了。如果有谁想象,在不知道什么是工会,什么是工资登记表,什么是集体合同和保护工人经济利益的一系列其他问题的情况下,就能争取到工会的话;如果谁想我们在没有进入工会日常的实际工作的情况下就能让我们在工会中取得更好的成就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问题在于,每一个在工会运动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都应该知道这个工作的特点和特殊的地方,应该明白,需要计算每一个小钱不仅是因为工人的孩子们能喝上什么样的牛奶就取决于这样的小钱,而且因为我们是在通过这种为小钱所做的斗争教会工人需要怎样进行和资本家的斗争,因为在争取小钱的斗争中,我们能教会他们争取解决更重要的问题,争取达到工人阶级的最终目标,会比改良主义者更好地教会他们。但是,这当然不是说需要满足于这样的小钱,不是说小钱应该是至高无上的;当然,需要更进一步,需要教会工人在阶级的利益需要的时候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谁要是不明白这一点,他就不明白,没有实际的工作就不可能争取到工会,这样的人就不得不从字母学起。看来在我们经历了1905年革命的经验之后,在我们看到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非法工会之后,在1909年的经验之后,在工会被粉碎和它们又重新复生之后,在所有国家的工人获得经验之后,我们还是不得不需要重新说起非法工会来!非法工会在自己的组织规模上将会重复共产党的情况——基础不会很广泛。

在斯托雷平进行迫害的局势下,我们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我们是咬紧牙关捍卫了自己非法的党,而同时去到合法的工人组织中做工作,把改良主义

者赶走并利用合法的条件。对利用合法条件的态度是我们和召回派之间的分水岭,当然是另外一种倾向。人家对我们说,应该利用,但是应该是这样,不要让合法的组织有被沙皇反动派摧毁的危险。我们回答说:这是胡说,是孟什维克的理论,是“保护杜马”,我们没有这样去做,而且做到了利用合法条件。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了我很好的教训,——阿列克谢可能记得这个情况,好像这是在泰里约基<sup>①</sup>,当时我和诺根是主张工会工作的左的路线的;我们说,你们很快就会把我们派到巴拉莱卡琴手的演出组合里去工作了,而他回答我们说:如果不会有更好的情况那又怎么办呢——就去找巴拉莱卡琴手吧;如果工人们到那里去,那里也就应该有布尔什维克在。

**雅罗斯拉夫斯基:**说说对法西斯工会的态度吧。

**托姆斯基:**叶梅利扬<sup>②</sup>同志,我不谈法西斯工会了,我对它们的组织类型和社会成分知道得很少,我认为我对法西斯主义知道的非常少,我想,在座的也不会有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知道的比我多。(笑声)我们根本对法西斯主义知道的很少。但是如果说到争取改良主义工会,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但是尽管如此,在我们这里还是可以看到一种对这个问题无所谓的态度。就拿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来说吧。他对法国和德国议会和市政选举斗争的结果做了很好的分析。不过报纸上有一篇对德国工会代表大会选举的评论,大体上是这样说的:总共选出了300—400人,而左翼是10个人左右。这篇评论继续说,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改良主义者,搞了什么手脚,做了偷换,欺骗了工人,等等。这篇评论的结尾是一个和弦,其中个别的调子在曼努伊尔斯基的讲话里也有,像是“下层的风暴在加大,它将扫除右翼的领袖们”,等等。难道不能多少做些批判性的分析吗?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领袖们在向右转,群众在向左转,改良主义者在失去权威,而我们不知为什么每年都是在原地踏步——他们欺骗了我们,搞了竞选手脚,于是我们在工会代表大会上就只有2%—3%的选票。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他们自己有什么倾向,无论是右的还是左的倾向,当然都是不好怀疑的。)对这个问题还是很少注意的,不明白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争取工人群众的战斗。而改良主义者能够敲打我们共产党人,是因为我们就像巡回演出人员,像参加礼仪的客人,像是匆匆的过客一样地对待工会工作。我们只想说世界性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是需要说的,这是对的,但是如果问

<sup>①</sup> 泽列诺格拉茨克的旧称。——译者注

<sup>②</sup> 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全名为叶梅利扬·米哈伊洛维奇·雅罗斯拉夫斯基。——译者注

题涉及的是小钱,那就需要也说说这个。但是只是想带着这样一个世界革命前进,不愿意过问工人群众的那些日常需要和那些寄以为生的利益,这就意味着脱离工人群众,这就意味着自己注定会制造出这样一个理论来,说是工会是改良主义者的堡垒,改良主义者是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的,他们会把我们赶出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原来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

现在来说一说关于迫害的事。当我读到提纲的时候,我们的提纲总是一切都好。当我听到发言时,大多数的发言也是好的。

**斯大林:**周围一切都好?

**托姆斯基:**当然,大多数的决定是好的,至少是漂亮的。而在说到来自改良主义者的迫害时,得到的结果总是说,这是一种命中注定的东西,没有法子反对它,在我们的实践历史上也未曾有过。难道孟什维克没有企图机械地把我们从工会中赶出来过吗?这样的企图是有过的。那我们是怎样做出回答的呢?我们把类似的事实拿给工人群众去评断,把群众动员起来,进行鼓动,于是孟什维克就不得不退步了。当我们要赶走孟什维克的时候,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当我们试图要机械地打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对我们进行了反抗,而且有的时候也不得不挨上几记敲打。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我们没有学会创造出这样的人来,让他们在工会运动中成为普通工人知晓的人,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作成为著名的人,和工人群众共命运;我们甚至不会创造出这样的人来,让他们能做到围绕着改良主义的官僚们的每一次迫害发动起整个运动来,能做到在每一次开会的时候都抓住被开除的人的问题不放,总的来说,就是能够安排好有系统的工作。就是因为这样,群众才沉默不语,才会对改良主义者摊在我们个别同志头上的迫害完全不闻不问,而我们却是在做出很好的决议:说是工人群众在左转,右派领袖们很快就会滚蛋了。当然,他们会滚蛋的,但是现在落地的是我们的头颅。这该怎么解释呢?能解释这一点的就是全然的消极,就是不懂得怎样接近工人群众并和他们一起进行有组织的回击……

**斯大林:**对。

**托姆斯基:**我们不懂得怎样和群众结合起来,不懂得把他们动员起来,不懂得对改良主义者的厚颜无耻的行径给予还击。

我占有了很多时间,请原谅,但是我想再就波兰,就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只说一句话。我给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写了一个字条,想让他给我们说说,为什么我们俄罗斯的工会工作人员总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完全荒谬的感觉,好像波

兰离我们的距离比澳大利亚还要远。你们可以发现,所有经过苏联的代表团都是经过整个苏联的。我们这里曾经有来自各地的代表团:墨西哥的,加拿大的,印度的,但是就是没有一个波兰的代表团。

**斯大林:**很远。

**托姆斯基:**是很远。

**雅罗斯拉夫斯基:**波兰社会党人打算派一个代表团,而且好像是已经派出了。

**托姆斯基:**他们准备的时间太久了。体育上的联系和全世界都有,而和波兰怎么就断了。

**柯秀尔:**好像是在波兰没有体育活动。

**托姆斯基:**好像是他们什么也不干。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集中向波兰共产党提出来,如果他们不会建立苏联的工人和波兰的非党群众之间的某种联系的话,那要么就是我们这里是一个脆弱的共产党,要么就是它不愿意和不理解这种联系的意义,有用十道墙把波兰工人同我们隔开的危险。这就是我想提出的那些意见。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发言,不是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托姆斯基)发言。

**彼得罗夫斯基:**我想只就3个问题提一些意见,是作为一种情况通报,不是作为辩论。第一个问题是科隆的苏联之友集会。洛米纳泽同志顺带讲到了会议失败了,而且匆忙地得出了结论,说是总的来说这样的设想和组织注定是要失败的。甚至只用一分钟的时间,我就可以证明不是这样的,不能说科隆会议完全失败了,得出这个结论在当时并非是有根据的。我们联系到保卫苏联有一个很大的代表大会和一个小型的实业会议<sup>66</sup>。没有一个人说过,11月举行的代表大会辜负了我们的期望。我们知道,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进行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们的期望。例如,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我们在苏联之友协会里有2.3万交纳会费的会员。正如大家所知,法国的工人更容易做到的不是交纳会费,而是参加游行,甚至在游行和打架有联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在英国有一个很大的组织。在英国,这个协会曾在各种工人组织中举行了1700次关于苏联的会议。我们有关于在南非顺利举行了各种会议的报告。在那里,这些会议是在极为高涨的情绪下进行的。

**托姆斯基:**那在波兰呢?

**彼得罗夫斯基:**你很清楚,我们这里几乎没有波兰的代表。这样一来,在两

种经验中,我们这里至少有一种经验,它无疑是成功的。现在该说说第二种经验——科隆会议了。这次会议我们是匆忙组织的。为什么和由于什么原因呢?首先我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我们的感觉是,有人策划要在6月前准备搞一次多少比较严重的对苏联的攻击。我们觉得,代表大会的各个不同的代表团在不同国家的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如果能够在所有这些经验的基础上,考虑建立一个经常性的国际组织,将是适合时宜的。为了这个目的,召开了一次落实的会议,应该是有最重要的国家的代表出席,建立一个国际常设局。这次会议的任务就是这样的。它完成了这个任务。当然,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提到了这一点,这是对的,在主席团的会议上也说到了一点——如果不是说得更激烈的话,各国共产党对这件事并没有太注意。现在洛米纳泽同志企图通过德国同志的话做出新的解释。原来这个解释就是我们没有邀请红色前线人员的代表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我应该说的是,由于这次会议,我在德国度过了一段时光,曾在那里和德国同志们交谈过。遗憾的是,他们总是想出各种理由,甚至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最后一个理由是洛米纳泽同志在这里说到的,想出来的时候已经很迟了。这个理由是在和洛米纳泽同志的谈话中提出来的,不是在和我们谈话的时候提到的。他们对我们是不可能提出这个理由的。问题在于,给了德国同志最完全的权利,可以邀请随便什么样的组织的代表,可以邀请所有组织的代表参加苏联之友代表大会。红色前线人员是不是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呢?参加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者参加了吗?参加了。可能所有这些组织都完全有可能派自己的代表到科隆来。但是全部实质在于,不是德国共产党一家在这方面有过错,法国的同志们也同样有,还有捷克的、比利时的同志们等等,也同样有。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举办第一次苏联之友代表大会我们要花费很大力气。会后我们的同志们的想法是,我们说,必须随时要让广大的群众对讨伐苏联有所准备,而这多少都是一些空泛的议论。在我们筹备新的会议的时候,他们想:又是一次空泛的想法,不应该在这上面花费很多的力气。这是对战争危险和对反对苏联的战争危险的一种独特的态度,其中也暗含了各个党对科隆会议采取那种态度的基本的和具有决定性的原因。由此得出的结论应该是,科隆会议实质上并没有失败。国际常设局我们建立起来了,一系列的正在建立,将能够把一定数量的群众吸引到这项事业中来。我们需要苏联之友组织的原因是:共产党远远没有把那些广大的群众包括进来,不是知识分子群众,洛米纳泽同志,而是无产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是那些同情苏联但同时又不是处于共产党的影响之下的群众;把保卫苏联的事业作为自己唯一目的的协会是可以把这些群众联合起来,动

员起来和组织起来的。

我想就第二个问题提出几个通报性质的意见,这就是关于印度的问题。在这里,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如此吝啬,甚至很难完全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不很清楚的还有,他是在把石头扔到谁的园子里去了,当他说……

**柯秀尔:**这是通报!

**彼得罗夫斯基:**我在这之后会通报的。

**斯大林:**这是辩论。

**彼得罗夫斯基:**他说到有这样的同志,他们想把印度资产阶级从天平上拿下去。我很清楚地知道,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殖民地委员会呆了一个小时,抓起了几个意见,于是就想依据这些得出结论。随便什么人,其中也包括曼努伊尔斯基,在这里是想要把印度资产阶级从天平上拿掉的。而我们很明白,这不是那么简单的,只有动用武器的力量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当时谈到的完全是另一个话题。是不是可以说印度资产阶级有什么革命作用呢?那些和印度的工作有联系的同志已经说了,而且也将会确认,现在印度资产阶级是存在的,不能这样就轻易地把他从天平上拿掉,但是它是作为组织得很好的反革命力量存在的。在我们的所有推测中,都需要从这一点出发。由此绝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个资产阶级将不会和英帝国主义有裂痕和冲突。冲突是会有有的。但是甚至现在,当由于西蒙委员会而发生的冲突达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时,我们在印度看到的也是这样一幅情景,资产阶级运动的领导人们企图完全粉碎还很年轻和脆弱的共产主义运动。应该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不详细谈了。我只补充以下的情况。印度已经经历了1919、1920和1921年的一定的革命高涨时期,当时这个运动的中断正是由于已经开始呈现出了一个广泛的农民运动,而资产阶级的金科玉律是不能允许出现任何可能把广大的农民群众吸收进来的运动的。有一个以巴尔多里决议<sup>67</sup>著称的决议,声称无论如何也不能触及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和特权。给所有在印度研究和审议农业问题的委员会规定了一定的界限:不要涉及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就是这样的条件。而且印度资产阶级有中国革命的经验。在这种条件下,谈论印度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而不去说它具体的、明显的和肯定无疑的反革命作用是不行的。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萨克拉特瓦拉的问题。是的,他是说了非常庸俗的话,他说议长是英国最优秀的正人君子,他,萨克拉特瓦拉,不仅是代表他自己,而且是代表了自己的印度朋友们这样说的。

**斯大林:**是自由主义的假话。

**彼得罗夫斯基:**是假话,是庸俗的讲话,所以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在共产国际面前提出对他进行严厉谴责的问题。

**曼努伊尔斯基:**我们提出了开除出党的问题。

**彼得罗夫斯基:**这是对的,我知道这个情况。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把这记在英国共产党的账上,那是罪恶,也是不能原谅的,因为英国的同志们和我们的同志们一样,非常清楚萨克拉特瓦拉是个什么人。萨克拉特瓦拉在印度做了许多蠢事和龌龊事。我们要和英国人一起为把他派到印度去负责。在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但是当我们把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做了对比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正面的东西超出了反面的东西。

**斯大林:**说的对。

**彼得罗夫斯基:**英国同志们也知道这一点。简单地把他开除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可能的。这是英国议会中唯一的共产党员和唯一的印度人。我想让洛米纳泽同志试试和他一起工作(笑声)。我不能担保他们的共同工作会是怎样的结果。未必会是什么好结果。但是,同志们,谴责萨克拉特瓦拉是一回事,把萨克拉特瓦拉的罪过归到英国同志们的头上是另一回事。英国同志们有过失,我不否认这一点,可能是相当严重的过失,但是应该是完全分开来,单独谈这件事,根据英国同志们确实做了什么,而不是凭着他们和我们同样严重地犯有那种过失。

**主席:**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第二次发言。

**皮亚特尼茨基:**首先我想就托姆斯基同志的发言说几句。应该说,托姆斯基在很多方面是对的,但是他在一个意义上并不完全正确,那就是没有考虑在境外的共产党员在工会工作中的那些困难。我想指出两个事实。就拿苏格兰来说吧,那里的矿工把共产党员选进了理事会,他们在那里得到了相当的多数,但是矿工中央用了各种狡猾的手段不让被选上的人工作;它这样提出了问题:说是先要讨论一下,共产党员能不能当选,等等。

而在捷克,建设工人工会主席特坚科夫在理事会里和在工会里都占少数,但抓住了工会的财会和工会所有的财产,而警察局和整个国家机构都支持他,工会结果是既没有钱也没有财产。

**有人喊:**我们3年前就知道了。

**托姆斯基:**那就不该还是我行我素,而是需要善于有组织地进行工作。

**皮亚特尼茨基:**您可以随意怎么组织,但是当警察局和国家机构支持改良主义的分裂分子和侵占者的时候,共产党员工作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这是需要考虑的。托姆斯基同志说,在德国工会代表大会上,共产党员被选上的很少,但

是他没有说,在柏林,冶金工人是以2.2万张选票选举了共产党人参加自己的全德代表大会的,而改良主义者只得到了1.7万张选票,虽然他们以前是多数。

有人喊:这不对。

**皮亚特尼茨基:**改良主义者去年得到了1万张选票,而我们是1.3万张。相当多数的矿工没有投票。而在这一次,我们得到了多数。我只是想用这一点强调一下,不能片面。我同意托姆斯基的结论,但是他忘记了那里存在的困难。

**李可夫:**而如果是一个肩膀被砍掉了,那就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单臂了。(笑声)

**皮亚特尼茨基:**现在我来谈谈洛米纳泽同志的发言。我不知道这里该怎样理解他的话。一些人当然是这样理解的,认为共产国际是一个空架子。他什么没有讲到呢——到处得到的都是绝对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准备,问题一拖就是10个月,等等,但同时他自己也是矛盾的。他指出党在犯错误,而共产国际给出的指示是正确的,对他们进行了斗争,等等。在这个问题上您是前后矛盾的。您说了代表大会的准备吗?

**洛米纳泽:**说了代表大会的准备。

**皮亚特尼茨基:**在筹备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在筹备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几十次全会的时候,我已经在共产国际了。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当时和现在都是怎样筹备代表大会的,那就未必能说现在不如当时。

有人喊:对。

**皮亚特尼茨基:**如果需要的话,我能引用一些事实。洛米纳泽同志是怎样介绍德国共产党和所有其他党的呢?到处都是右的危险,右派分子在其中占有统治地位。我认为,在德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里没有一个右派,在柏林委员会里没有一个右派分子。在柏林组织的会议上,那里有几百位代表,19位代表投票赞成右派的建议。同志们可能得到了这样的印象,认为无论是在柏林还是总的来说,在德国,领导党的是右派,他们在领导,他们在左右政策。然后是这样一个言之无物的申明,说是在所有的9个区里,德国共产党在选举中得到的票数都比1924年少,在那里领导的只有右派。对图林根的情况这样说是对的,但是比如说是对德共也是得到了少数的南威斯特法利亚的话,那就不对了。洛米纳泽同志拿出的是一个照他的话说说是两年前的事实,是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显然其他的事实他就没有了。从印度尼西亚来了两位同志。你们是怎样想的呢?你们以为在共产国际里都是专家,他们既了解经济,也了解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的、英国的和其他的资本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吗?当然,他们不了解。我们这里没有这样



的专家。开始研究问题了,把它研究得很细,这当然就需要时间,而洛米纳泽同志说,印度尼西亚的这两位同志是在起义之后才到这里来的。不对。

洛米纳泽:不,这是对的。

皮亚特尼茨基:不对。他们是在新加坡被逮捕的,他们是因为这个缘故被扣押的。如果是说事实,那就说得正确一些。

他在这里说到没有联盟,什么都没有。当然,困难是有的,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主要的是在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盟是一个应该得到加强的组织,但是我们还没有能做到处处都打进去。在谈到代表大会的时候,谈到游行示威的时候,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可以把事情安排好,但是如果是需要在地方上搞起坚强的组织,当然,这方面就有困难了。不能想象坐在莫斯科写出决议来,用这些就能建立组织了。把这些决议贯彻下去不是那么轻松的事。

既然我已经要求发言,我就想说,我们给我们的党下达了太多的任务,给跟着我们的党走的红色工会下达的任务也是一样。我们感觉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完全明白的,而完成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不是到处都能像我们在苏联这样,有着这样强大的党。我们没有这样的党。它们是需要用多年的时间建立的。应该记住的是,我们的这些党的构成在多数情况下是原来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有旧的习惯,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是很困难的。我有一次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团打交道,它是来参加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在26个人的代表团里(这里有的同志是和我一起代表团的)有不少50—60岁的老人。他们可能参加工人运动已有30年的历史了,他们曾经是在改良主义的工会里的,你们想想,把他们改造过来,让他们走上新的轨道,这容易吗?要知道,柏林市的有些组织里的党的积极分子,很大一部分是原来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党龄有15—25年。我不是说他们不执行德共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令,但是要把他们从老的社会民主党的传统转变过来,要比转变年轻的党员困难得多。而当我们在写我们的提纲和决议的时候,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和全会上通过了多少提纲和决议,让我们的党把它们都贯彻下去是非常困难的。我感觉,现在需要的是少给些任务。最主要的是,先下了指示,然后还要帮助把指示贯彻下去。

我还想提出的是奥地利。奥地利共产党的党员不是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所说的,有3000人,而是有6252人。最后,关于向美国共产党发出的关于收集签名的指示。这个指示没有被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我们确定了,这个指示是一个委员会散发的,它制订了收集签名的指令,需要这些签名是为了让我们的党能够根据法律参加选举运动。洛米纳泽同志说的对,这个指令明显是社会民

主主义性质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询问是谁指定和批准这个指令之后,美国共产党政治局谴责了它,也谴责了那个把它发给地方组织的同志。

主席: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希望做总结发言吗?

有人喊:休息。

主席:如果我们现在宣布休息,那我们今天就来不及听取布哈林同志的报告了。谁赞成休息?谁反对?少数。现在休息。

(休息后)

主席:佩佩尔同志发言。(佩佩尔同志说的是德语。)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同志作为翻译发言。

彼得罗夫斯基:要不要大声翻译?

主席:大声不大声都可以,但是翻译的时间不要比讲话的人用得更多,而是要用得少。

喊声:大声翻译。

彼得罗夫斯基:佩佩尔同志说:“请原谅,我是在讨论的末尾才发言的,但是我有点迟到了,没有听到格伊同志的讲话,也不知道他在和我争论。格伊提出了一种肯定的说法,好像我从右面批评了工会国际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格伊同志主要是不同意我在美国共产党的理论杂志《共产党人》上提出的前景,提到不能排除有更多的群众会投到反动的美国工会中去。这篇文章根本就不是反对工会国际决议的。我在这篇文章里是和洛佐夫斯基同志争论他的一篇文章。就是从物理学的角度说,也简直不可能是在这篇文章里反对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因为文章是在决议公布之前写的。我批评的只是洛佐夫斯基同志在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之前,甚至是在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之前就写成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洛佐夫斯基同志在某些方面维护的是不同于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那条路线。我感觉,不能把工会国际和洛佐夫斯基同志混为一谈。

这篇文章说的是什么呢?美国党和洛佐夫斯基同志一致的是,在不存在工会的或者老的工会已经完全颓败了的那些生产领域里,我们应该建立新的工会组织。我们也同意他说的,在当前时期,我们工会工作的中心应该转向组织成千上万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但是我们不同意洛佐夫斯基同志所说的,要反对继续和加强共产党在老的、反动的美国工会中的工作,因为他的文章的政治意义就在于这里,而不是在什么别的地方。他在这篇文章里指控我们说,美国共产党人

除了围绕美国劳联的工会跳卡德里尔舞外,不干任何其他的事。我的文章的意义在于:在美国应该考虑到3种可能的前景。

(1)在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条件下,虽然有反动的领袖们怠工,新的群众是会再次涌向美国劳联的。对这种可能性不能简单地否定。我们看到,在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有数百万的新工人参加了英国和德国的工会,甚至美国劳联的成员在这个时期也从250万上升到了500万。那时向美国工会靠拢的,是数百万没有专业技能的工人,尽管这些工会是反动的,尽管工人贵族有意识地回避把没有组织的数百万人组织起来并用尽一切手段抵制进行这种组织。新危机将会把工人震撼起来,在这种条件下,不能排除这种现象会重复出现。

(2)第二种前景是,新的群众既会投向老的反动工会,也同时会投向新的、我们建立的工会。这样的可能性将会导致反动的和革命的工会同时发展。

(3)我在那篇文章里考虑到的最后一种可能性是,在资本主义进攻的压力下和由于老的反动工会领袖们的背叛,它们会完全瓦解,工人群众将会只进入我们的革命工会。

我在自己的文章里写了,我们共产党人应该为这第三种,也就是最后一种前景工作,把重心转移到组织没有组织起来的和没有专业技能的工人上来,但同时要不放弃对上百万的有组织的工人的领导——在各种不同的老的反动工会里还有300万工人——他们是在工人贵族和工会官僚们的手里,应该在他们中间组织起一个强有力的左翼。我曾强调了重心应该转移到组织新的、没有组织的群众上来,而老工会中的左翼应该成为我们在解决基本的中心任务——组织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时的辅助工具。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以把这种对局势的评价说成是“右的”,那就是如果根本就否定新的群众在将来有可能会涌向美国劳联,如果你想要把老的工会完全留给反动分子们去支配。格伊同志的批评更让我吃惊的是,我很清楚,在对工会工作的整个路线上,他是同意我的看法的。

现在我来谈谈洛米纳泽同志的批评意见。洛米纳泽同志对美国共产党的竞选运动非常严厉地大批特批了一通。他甚至如此全神贯注,以至提出了一种肯定的说法,好像美国党在这次竞选运动里拒绝了任何共产主义的和革命的宣传。这是非常严肃的指控,同志们!但是这种指控是不公正的和严重违背事实的。洛米纳泽同志在这里提到了关于选举的一个指令,这个指令建议要收集党能够被允许参加选举所需要的签名,他说这不是建立在共产主义宣传基础上的,而是靠耍各种手腕。但是,如果洛米纳泽同志坚持说这个公文说明了美国共产党进

行的选举运动的性质的话,那他说的就不是实话。洛米纳泽同志虽然完全有可能在共产国际读到美国共产党的竞选著作,但只字不提这个愚蠢的、非共产党的公文从来也没有,连一瞬间也没有能和党在竞选运动中的路线相吻合的事实,在这个涉及兄弟党的问题上要把联共(布)中央引入迷途。相反的是,在中央工作的技术人员制订的公文是违背中央委员会的严格指令的,而且党的书记在刚刚发现的时候,立即就制止了散发这个公文。洛米纳泽同志闭口不谈的一个事实是,恰巧是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在这里已经说到的,那就是这份公文受到了美国党政治局的一致谴责,被认为是一个反共产主义的和与党格格不入的文件,对它的作者也提出了最严肃的谴责。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正确地阐述了整个这件事,只有一个地方说错了,那就是这份公文得到了推行竞选运动委员会的赞同。这份公文是在这个委员会组织起来之前炮制出来的。我可以让同志们相信,美国党的竞选文献——它的公文和号召书,它的立场——都是符合共产主义的和革命的精神的。

总的来说,洛米纳泽同志在这个讲台上发表的讲话产生的是有些奇怪的印象。洛米纳泽同志对整个共产国际大批特批。他在这里搞的是广泛的“自我批评”。按照他的意见,共产国际的政治领导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全世界的代表大会的准备有许多要进一步改善的地方,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是委托给了两个对这个问题什么都不懂的同志去编写的,右的危险在所有的共产党内都获胜了。对这种以一概全的指控和谴责共产国际的做法是应该回击的。

共产国际是不是真的没有和右的危险斗争呢?要知道,共产国际的整个第九次全会没有做其他任何事,只是和英国党和法国党的右的错误进行了斗争。为什么洛米纳泽同志没有提到在那个德国和俄国代表团的最最重要的联席会议上,俄国代表团坚决地表示了反对德国党内的右的思潮,而且阻止了台尔曼同志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回到德国去呢?

洛米纳泽同志企图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共产国际对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极其重要的问题之一——殖民地问题的态度,就像是对待一个不大重要的和次要的问题一样,把编写报告委托给了不合适的人。我要向中央全会声明,这种说法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殖民地问题是有一个广泛的筹备委员会研究的,还有一系列的分委员会彼此间做了分工。编写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是委托给了库西宁同志和爱尔科里同志,他们无疑是属于共产国际里最优秀的和最有经验的同志之列的。我不明白,在中央全会面前不正确地阐述事实,从这中间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政治上的好处呢。

洛米纳泽同志激烈地和毫不留情地对整个共产国际以及它的所有支部大批特批。谁都没有能够得到这位不可求饶的法官的赦免。他只是没有说到一个问题：关于中国的问题。他甚至绝对声明，他将不谈中国问题。怎样解释这种奇怪的沉默呢？要知道，中国问题可是属于非常重要的问题之列的。要知道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一直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中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的。但是洛米纳泽同志不谈中国问题是有一个简单的原因的，那就是联系到中国革命，共产国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恰好是要批评洛米纳泽同志在中国问题上犯下的粗暴的错误，要改正洛米纳泽同志在中国革命中坚持的那个错误的策略。洛米纳泽同志摆出的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自我批评”的架势，批评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和共产国际的政治领导，避而不谈的只是他自己在共产国际里在中国问题上犯下的那些错误。<sup>68</sup>

最后我想再简单地涉及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党的媒体的一部分——甚至《真理报》在一两篇文章里——依据一定的分析写道，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将会爆发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公开冲突。照我的看法，这种分析是错误的。现在可以看到的几乎是相反的情况。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在中国的合作成分现在超过了冲突的成分。当然，在这个合作中已经蕴藏着未来各种冲突的萌芽，但这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美国在中国并没有采取任何积极反对日本的步骤。美国默许了日本占领山东和对满洲的“半占领”。《中国每周评论》和其他自由主义的和平主义的杂志是站在南京政府<sup>69</sup>方面的，是美国政府官方政策和日本政策的反对派，不能根据它们的文章判断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美国资产阶级的“大”报刊——《纽约时报》、《纽约先驱报》、《纽约先驱论坛报》——无论自己的党派和政治立场有什么不同，都一致赞同日本占领山东，并且声明日本在山东的所作所为不外是美国在尼加拉瓜的所作所为。凯洛格<sup>①</sup>甚至正式驳斥了好像美国政府批评日本武装入侵的传言。不应该忘记，客观的局势——至少是现在——在更大程度上是在促进日美在中国的合作的，而不是日美的冲突。美国在满洲投入了巨大的资本，是指望日本将在那里维持“秩序”。美国越来越扩大对日本的资本输出，而且在许多方面是关心它的经济繁荣的。另一方面，日本越来越落入对美国更大的经济依附。日本整个出口的一半是到美国去的。对日本来说，这种出口的危机就相当于严重的金融危机。日本出口的主要是丝绸，如果一旦发生冲突，美国会拒绝

① 凯洛格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译者注

接受这样奢华的东西,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把日本出口的丝绸全部吞下去的。老的、传统的日美对抗现在有了某些变化。总的来说,如果不考虑英美的对抗,就不能理解美日之间总的相互关系。英美不断的和迅速加剧的对抗在今天主要是左右美国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不联系英美在大西洋的相互关系,也就不能理解帝国主义列强在太平洋的相互关系。在未来的大冲突中——在英美战争中,日本是英国或者美国潜在的盟友,而且美国也把日本看成不仅是一个竞争者,而且还是可能的盟友。

主席: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做总结发言。

曼努伊尔斯基:我主要说说洛米纳泽同志的讲话。如果洛米纳泽同志只是指出我的报告的缺点,比如说强调了对这个报告中的原则性的方面阐述得不正确,指出个别疏漏的话,我的任务就要简单得多了。我就不会占用你们大家的注意力了,因为我可以表示同意,比如说就可以不再谈经济局势了,——我在后面会说明,为什么有一系列的问题我没有谈。但是洛米纳泽同志不仅是做了这样的批评。当然,对报告满意还是不满意——这是个人评价的问题和报告人个人的品质问题。但是洛米纳泽同志并不是局限在这个方面,他把注意的重心从对我的报告的个人评价转到了共产国际的活动上。同志们,我是要维护共产国际的活动的。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洛米纳泽同志需要在此时此刻,当我们的党在党内经过了一系列的争论之后,在我们的党在西方经历了一系列危机之后,在共产国际的权威有了很大削弱的时候,在共产国际的领导集团人员减少了的时候,在我们的队伍里失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大批伟大的工作人员已经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洛米纳泽同志需要攻击共产国际呢?他可是知道的,我们面临着极其巨大的任务,我们的力量是很有限的,而我们同时也不是总能看到我们的领导中心能够及时进行领导的时候,为什么洛米纳泽同志需要用这样的指控来反对共产国际呢?这是为了什么呢,是谁所需要的呢?是为了我们党的利益?是为了共产国际的利益?我不这样想。

洛米纳泽同志说到了代表大会的筹备。如果我的报告他不满意的话,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的是整个工作系统的状况。洛米纳泽同志一般性地提出了代表大会的筹备问题。他指的是,在现有的局势下,筹备代表大会这件事做得很差。同志们,我在共产国际是一个相对不算年轻的工作人员了。我工作了4—5年。(笑声)我想,许多人在地方上做了更多的工作。但是,同志们,我应该说,我参加了各次代表大会和扩大全会的筹备,参加了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筹备,我应该说,虽然我们的力量很有限,我们的积极分子也非常有限,但是我们还是做到

了筹备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要比第五次代表大会更好。我们准备好了关于战争危险的问题——有提纲,纲领草案也有了。关于共产国际活动的报告我想布哈林同志已经准备好了。最后,同志们,是关于殖民地的报告。我们任命了两位我们在共产国际的积极分子里优秀的工作人员——库西宁和爱尔科里。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是像洛米纳泽同志所做的那样,来了之后就把所有的人都扒拉了一遍,然后说,最好是把准备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委托给另外的什么人,这至少是一种奇怪的做法。因为洛米纳泽同志和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都了解我们所有的积极分子。我们可以把这个报告委托给谁呢?可以委托给政治局委员中的一个人。我认为现成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人是斯大林同志,但是原来有过一个决议,说到了让我们的领导同志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言不是特别合适<sup>70</sup>。

有人喊:报告人应该是俄国人吗?

曼努伊尔斯基:我想,最好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如果俄国的同志们能更多地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那也是不坏的。但是,同志们,能把这个报告委托给另外的什么人呢?洛米纳泽同志为什么要指控我们把这个报告委托给了两位共产国际中优秀的工作人员呢?这样做是出于诚心吗?合适吗?我看不是这样的,而且我认为这样的声明绝对是不负责任的。

我现在转到洛米纳泽同志对我的报告的一个批评上来。如果李可夫同志允许我来谈谈经济状况,而为了说明它,我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做这样的报告,那我能谈这个问题。但是我拿了日程并读到了我的报告的题目: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当我从政治局得到这个条子的时候,我想了一下我应该在全会的会议上说些什么:我是不是该把我们报告的题目写成世界经济、政治局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或者我应该严格地把我的报告限制在共产国际日程上的问题的范围之内。同志们,我是一个很守纪律的人和一个普通的同志。

柯秀尔:一个中农。(笑声)

曼努伊尔斯基:这件事我是通过布哈林同志提出来的:我应该说些什么。给我的回答是,在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想到的就是要检查一下1928年选举中的第九次全会的方针。我没有仅仅限制在这一点上,而且扩大了我的报告的题目。可能我犯了错误,但是我认为,有一系列问题是必须要阐述的。在这之后,洛米纳泽来了,指控我没有谈到世界的经济形势。我对许多方面的情况没有谈及,因为如果我做的是一个和布哈林同志的报告并行的报告,那我是应该涉及那些布哈林同志将要涉及的提纲的,也就是说我应该既谈到经济形势,也谈到合

理化的过程,谈到各个国家之间在舞台上的阶级力量的重新布局,关于无产阶级运动内部的重新组合,关于共产国际在1924—1928年这段时间的各种决定。同志们,这就是布哈林同志不得不要解释的所有问题。当然,既然我是局限于谈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问题,我就努力把这些问题和左转的问题、殖民地问题、战争的问题联系起来,而且是力图做一个给全会提供我们是怎样提出这些问题的信息的报告,不是追求提出指令性的建议。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洛米纳泽同志在这里提出的那些指控是误会的结果。洛米纳泽同志走了上来,并且是用非常慷慨激昂的调子开始的。他开始说到一系列非常严肃的问题没有得到阐述,曼努伊尔斯基重复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决定了的东西。我注意地听取了所有同志的发言,其中也包括洛米纳泽同志,我一面听一面在想,洛米纳泽同志将提出什么样的实际建议。难道能想象,的确是在我们面前坐着的同志们不注意我们党的问题吗?我没有提出关于改良主义的作用和新的职能问题。他指的是什么呢?可以把我们十五大的速记总结报告拿出来,翻到布哈林同志做报告的那几页。你们就能看见,布哈林同志在自己的报告里阐述了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在他的报告里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我们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甚至怪罪了布哈林同志,说他在这方面有些不大对称。而您,洛米纳泽同志,一到这里就像是发现了美洲一样。您在这里发现不了任何美洲。

第二个问题。洛米纳泽同志在说到曼努伊尔斯基没有谈到像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沆瀣一气这样非常大也非常重要的问题的时候,是企图开辟第二个美洲。

洛米纳泽同志,如果您不明白这一点,那就不是我的罪过,而是您的罪过了。当我说到关于现在正在发生的那些过程时,例如,在法国的工人运动中,还有在专门谈到按照行会原则建立的民族经济委员会时,这也就是改良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沆瀣一气。工业和平的思想是什么?这就是改良主义和企业家的组织沆瀣一气。所有这些都是的,您干什么还要站出来挖掘这些新闻呢?照我的看法,这是因为这对您是一个新的问题,但是对于全会不是。您想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而情况远不是这样的。我注意地听了洛米纳泽同志说了些什么,于是想到可能我的确放过了什么重要的环节,值得说说的环节,但是我可以举出十来个问题,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是会说到它们的,但是洛米纳泽同志并没有提到它们。

洛米纳泽同志说,左转我提出的太简单化了。我要说的是,不能简单化地看待这个左转。我们的运动是在向广度发展,它不是在向深度发展。洛米纳泽同志站出来说,这里没有解释。是需要搞明白什么是针对什么说的。我说的正是



今天的工人阶级的左转——这是稳定时期的典型的左转。稳定时期的左转和灾难的革命时期的左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我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来：比如说工人阶级在我们的革命时期发生了左转，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时期发生了左转，我们的影响就不仅是向广度发展了，而且也在向深度发展，具体的体现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等等，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把3—20万的人吸收到我们党内来了。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党不仅向广度，而且向深度发展了。我举一个1923年在德国的例子。发生了社会民主党的解体，迅速的、灾难性的解体，同时在这种解体的背景下，新的成员迅速地投向了我们的党。我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由于战争的结果，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的哈雷会议<sup>71</sup>之后，发生了灾难时期的左转，我们党内又来了40万人。这是革命性的左转的典型时期，党的影响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都发展了。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左转——这也是需要理解的，就是这个过程是通过分子运动的方式，也就是比较慢的方式发生的，——我们有这样的例子，那就是在英国总罢工后的英国共产党的状况。那就是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影响在英国有广度上的发展，但是它没有向深度发展，——这就是稳定时期左转的典型形式。我只是一带而过地说了这些，因为我没有预料到我需要对洛米纳泽同志解释这样起码的道理，共产国际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知道的道理。[有一个成语说到，一个离婚的妻子是对自己原来的丈夫最不忠诚的妻子，而正如众所周知的，洛米纳泽就是离了婚的妻子，而如果要确定离婚该怪罪于什么人的话，那么这个离婚该怪罪的就是洛米纳泽。但是洛米纳泽是一个相当有经验的政治家，不会神经质地把离了婚的妻子带到政治里来。

**彼得罗夫斯基：**是由于什么原因离婚的？

**曼努伊尔斯基：**好了。现在继续往下说吧，洛米纳泽。您说是一个表面化的报告和一个不好的、表面化的结束语。我对这是很平静的。我不是聪明绝顶的人，但也不傻，我作了政治局委托我作的报告。政治局知道什么时候委托我作报告和我会怎样作报告。]为什么还需要有洛米纳泽同志的发言呢？为的是向全会表明，洛米纳泽同志的预测是对的。你们看见了，他在十五大上说的是右的危险并不大，可是他到处看到的都是这种危险，而这在后来得到了证实。同志们，你们知道，这样的真话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就算是洛米纳泽同志站出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有右倾，而且在发生了各种重大的复杂情况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个别的一伙共产党人是会胆小怕事的。有谁从理论上否定这个事实了吗？当然没有。洛米纳泽同志还说，在某个党内会有这样的危险。有谁

从理论上否定这个事实了吗？没有。反对派总是把一切说得一片漆黑、总是说只可能发生坏的情况，如果您也是持这种反对派的观点，那您就应该同意，您在某个时候就可能会是说对了。但是这种说对了就像是一只坏了的晴雨表只能显示出坏天气一样。

柯秀尔：就像我们这里的地上都长满青苔一样。

曼努伊尔斯基：洛米纳泽同志就像一个坏了的晴雨表，对共产国际的工作显示出来的只有坏天气。洛米纳泽同志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当我们在图林根，在普法尔茨和在一系列其他点上曾有过极左思潮增长，而这些思潮现在已经完全失败了的时候，把德国的右的危险突出出来的。我要说的是，这不仅是由于我们的反对派已经被粉碎了，我要说的是，在国外，其中包括在德国，我们粉碎了反对派，这有一半原因是因为我们这里的方针改变了。我们是用这个新的方针打碎了西欧的反对派的。〔洛米纳泽说什么现在右的危险非常大，布兰德勒集团是一个危险，——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但是，如果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构建德国的力量对比关系，那将是一个要付出残酷代价的错误。〕

洛米纳泽在一个我想回避的问题上对我进行挑逗，但是既然在挑逗，我就应该说说了。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为什么我没有提出德国的右的危险的问题？我应该说，洛米纳泽不是把右的危险同布兰德勒集团联系在一起的，而是也把它同埃伯特\*集团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曾有过俄国代表团政治局的决议\*\*，它在一定意义上谴责了埃伯特集团并建立了明确的，以台尔曼集团为代表的领导。我在这里是第一次说到这一点，在任何一次党的会议上我都没有说过这个情况，我对这个决定的通过做了工作，但是我应该坦诚地在整个中央和在政治局面前声明，我并不完全同意这个政策。关于这一点，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在座的库西宁同志可以证实这一点。我是反对给一个集团太多权利的，我想，这可能会导致削弱党的基础，而且我的一些预料在宗派斗争的尖锐化中得到了证实。我的意见是，埃伯特是一个很好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通过一定的促进，我们现在是能够最紧密地让领导集团团结起来的，而且我坚信，这样可以建立起更广泛的党的领导基础。您挑逗我这样做，那你就拿去吧。我并不完全同意，我是坦诚地说。

斯大林：不该受挑逗。

\* 看来是指埃韦特。——编者注

\*\* 指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俄国代表团常设局。——编者注

**曼努伊尔斯基:**如果不是在中央全会上,我又能到哪儿去说这些呢?

**柯秀尔:**不该什么都说。

**曼努伊尔斯基:**不,为什么呢。]

洛米纳泽同志采用的还是在党的十五大上采用那个方法。可是您,洛米纳泽同志,要知道,一个人不论是多大年龄,是成年人也好,还不大是成年人也好,他总是要学点什么的。

可您是什么也没有学会。洛米纳泽同志采用的还是在十五大上采用的方法,他说到处都是右的危险。我说了,现在我们这里肯定是右的危险正在成熟,我举了法国党的例子,举了奥地利党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系列的例子来。但是洛米纳泽同志做了什么呢?可以说他用苏兹达里的面具画出了这样一幅图画,在它的基础上,用乌克兰的成语可以说我们的共产党:“就是这副模样”。的确“就是”。(笑声)你们就拿美国这个党来说吧。大家都知道,最近美国党取得了很大成绩。我用我的发言来对这个党的状况说几句。那里曾有两种思潮:一个是左的,在党内有影响,另一种是和福斯特所体现的工会有联系。一直都有宗派斗争,最后达到了这样一种状况,左的思潮做到了和福斯特的集团团结起来。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左派在进行领导。洛米纳泽同志抽出了一个指令,但这是愚蠢的、荒谬的指令。那里在为总统选举征集签名,于是一个机关的技术人员公开发布了这样的指令:你们在收集签名的时候要尽量努力做得更快些,不要进行任何政治谈话,不要引用任何证据,努力把事情描写成这是对你们个人的效力。纯粹是美国人的做派和美国人做广告的架势。中央委员会是左派的委员会,我们在那里没有更左的人了,这个委员会谴责了这个指令。然后来到这里说:你们看,这就是正在成熟的右的危险。

我们有其他的党。在巴尔干只有右的危险。是的,那里有右的危险。例如,我请问你们:那里是不是有这样的思潮,它们同时也拒绝采用统一战线呢?有。但是右的危险在成熟的情况也是有的。可是在你们那里得到的是什么呢?到处是右的危险,所有我们的党都是右的,而且共产国际就像一个什么都看得见的眼睛一样坐在某个地方,代表着左的政策。但是要知道,共产国际是我们的各个党发射出来的光芒。不能把事情描绘成是到处都是右的危险,唯独共产国际推行的是左的政策。我认为,洛米纳泽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的这种方法是不对的,我们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握它。

现在我想严肃地谈谈殖民地问题。我不打算和洛佐夫斯基同志辩论,原因很简单,就是洛佐夫斯基同志所说的,就像在中学里作文一样,“写出的东西文

不对题”。

**洛佐夫斯基**：我说的是一个您在这里阐述得不对的题目。

**曼努伊尔斯基**：不，不，您别发火，洛佐夫斯基同志，我将会心平气和的，不会和您争论起来。洛佐夫斯基同志说到了印度现在面临的中心任务——是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洛佐夫斯基同志还忘了一个任务，因为时间短促，我在报告里没有说。在印度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共产党，因为我们正在进入印度发生革命战斗的时期。

但是，洛佐夫斯基同志，为什么我说您说的文不对题呢？我提出的问题是，殖民地委员会正在归纳经验并提出一系列问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升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关于各种不同阶级的作用问题，其中包括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我就是在这个断面上进行解释的。洛佐夫斯基同志表示不能同意，于是开始进行修正。他认为资产阶级根本就是反革命的力量。它是反革命力量，这是完全对的。在现在这个时刻它在寻求妥协。但是，洛米纳泽同志，您是不是知道，国大党现在是赞成印度独立的？

**留京**：这是反对派的立场……(听不清楚)

**曼努伊尔斯基**：留京同志，问题就在于要区分，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力量在印度是不存在的。留京同志，问题就在于需要把资产阶级看成是反对派力量，在印度它是存在的，但是它并不总是反对派力量，它只是在一定的时刻可以起到反对派的作用。那些认为必须把印度资产阶级一笔勾销的同志们不懂得这种反对派的作用。现在我们的分歧就在这里，但是这是一个确定了方针，是将要反映到整个实践工作中去的。这在殖民地联盟中看得最清楚。我们在政治局同意的情况下，很长时间讨论了关于组织殖民地运动的问题并建立了所谓的殖民地联盟。殖民地联盟是一个辅助性的组织，就是德国人所说的“邻近组织”。聚集到这个“联盟”里的，是一系列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的代表。这个联盟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基础呢？完全清楚的是，如果我们只是在共产党的基础上建立起这个联盟的话，那就是共产国际的翻版了。不应该是这样的。例如，我们反对让我们的共青团成为第二个共产国际。而且我们将严肃地谈到这一点，就在青年国际的代表大会上。现在我们不需要翻版的共产国际。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有一个更广泛的基础，而且首先是在殖民地人民中间。结果怎样呢？我们在那里有罗伊所代表的倾向，那就是企图把基础压缩到这样的程度，就像是得到一个翻版的共产国际一样。结果是我们得到了联盟的危机。这就是您，洛米纳泽同志，维护的那条路线的结果。我们得到了联盟的危机。我们现在应该在我们的殖民地委员会

里肯定和明确地提出关于联盟及其政策的问题,提出怎样才能把这个机关变成确实有效的机关,怎样才能把所有的反对派分子都吸收到这个殖民地联盟中来。当我们建立起了这个殖民地联盟的时候,需要看到资本主义世界会怎样恐慌不安。我们确定的是,在所有可能的代表中,大体上有25%将是各种敌对国家安插的代理人,当然,在你们推动这样巨大的事业的时候,你们不可能不碰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代理人。在这里,洛米纳泽同志,请您原谅我,但是您滑到了反对派的路上去了。洛米纳泽同志关于科隆会议说了什么呢?说了那里聚集了某些贪婪的知识分子。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回想起是在身边的什么地方有谁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回想起了反对派在自己的行动纲领里曾写道,现在需要面向左翼的工人,哪怕是无政府主义者也好,而对所有这些组织,像是联盟这样的组织,应该嗤之以鼻。你们在我们粉碎了反对派之后走了出来并向我们、向中央全会建议的,也是同样的对待这个组织的政策。召开了代表大会,我们为它花费了……(洛米纳泽同志插话)

请原谅,洛米纳泽同志,我注意地听您说了,我没有打断您,您也该有耐心听完我说的。在联盟里有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我们从来就没有对这个集团有过任何幻想,我们知道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溜掉的。我们建议联盟的领导人更多地依靠来自殖民地的分子。的确,像兰斯伯利、施米特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被从联盟中排除掉了,而洛米纳泽同志的志同道合者们却恐吓我们说,社会民主党人可能会把殖民地联盟夺走。您恐吓我们,可结果相反,不过在得到了这样的经验之后,现在怎么能一来开会就说您是正确的呢。请原谅,洛米纳泽同志。我不倾向这样轻易地就对共产国际提出的那些决定嗤之以鼻。我们在我们的革命10周年的时候召开了代表大会,有不到1000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我们事前详尽地讨论了利用这些人的问题。好像洛米纳泽同志参加了这些讨论。我们对这个问题讨论了相当长的时间,用了整整一年为这些组织参加代表大会做了准备,现在,在费了这么多努力之后,来了就说这一切一钱不值。洛米纳泽同志,不能这样就放弃共产国际在和反对派的斗争中坚持的这些正确的立场。不能滑到机会主义的轨道上去,不应该这样做。

我还想就我们的工会工作说几句,说完就结束。

关于托姆斯基同志的发言。我们工作极其重要的缺点之一,恰恰就是我们在西欧的共产党员不会进行相当具体的经济斗争。如果看看任何一个罢工是怎样进行的话,譬如说萨克森的罢工。揭发社会民主党人——很好,我们对他们的揭发是坚决的,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干这个我们是拿手的。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提

出要提高10芬尼的工资,我们就提出50芬尼,然后我们就揭发他们背叛了。几乎总是这样的分工:改良主义者进行罢工,赢得2—3个芬尼,而我们就揭发。我想,应该改变我们的一些实际做法了。并不是由于我们是一些实际的人和我们总是知道什么样的罢工能取胜。我想,总也有这样的罢工,我们知道自己是要失败的,但我们还是要干。

**托姆斯基:**在考虑了之后。

**曼努伊尔斯基:**我想,想想总不会是过分的。如果洛米纳泽同志在发言之前先想想的话,那就好了。

**洛米纳泽:**关于持反对派的立场吗?

**曼努伊尔斯基:**没有必要用这样的腔调。我是用事实敲打你的,而你把这称做是污蔑。请允许我保持某些欧洲的做派,分寸得当地和你打交道。

就说罢工的战略吧,我们现在绝对需要把这种揭露的策略和有突破地积极进行罢工的策略结合起来。需要学会进行斗争,也需要学会赢得这场斗争。可能在进行罢工的细节上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现在这是一项需要向在工会工作的全体共产党员提出来的基本任务。

关于安采洛维奇,他在这里说我没有说到农民,等等。我们大家都明白在农民中间和在农业无产阶级中间开展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农业国家里。我们都非常明白,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干成革命。但是当党只有很有限的积极分子,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我们没有能力为无产阶级地区提供服务的时候,那您会不会责怪他们没有足够地把注意的中心转移到农民身上呢?很清楚,在工作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先要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我给你们说一个意大利的例子。在意大利有一段时间,党在农民中间的影响比在无产阶级中间还要大。我们在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有一个时期,当时我们在农民中间的影响在增长,而同时在工人中间的影响却有些受阻。在法国,我们事实上有我们的党组织:巴黎,北方和另外的几个大的中心。在一系列地区,例如像波尔多、马赛,却有空白。那你们让党在这种状态下怎么办呢?这种情况自然是需要考虑到的。不要责怪我们的党的这种不幸,也不要把这看成是它们的罪过吧。

现在来对预测说几句。我没有从我的报告得出任何结论,因为我认为它是通报性的,而且我认为,我们的共产国际提纲将会做出评断,而从对形势的那种评断中得出的所有预测将是在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由报告人做出的。

**主席(李可夫):**在会议结束之前,我读了一个便条,是在我们这里出席全会的波兰同志递上来的。便条说:“托姆斯基同志在自己的讲话里把一个实际上

没有的错误算在了波兰共产党的身上。说波兰共产党没有利用十月革命10周年来开展广泛的支持苏联的运动,这是不对的。相反,联系到10周年,党进行了极其广泛的运动,这是最近一年来最优秀的运动之一,把它和反对战争危险、反对进犯苏联的斗争联系在了一起,在工人群众和劳动农民中间普遍传播了10年来苏联的成就。党恰恰是在这场运动中做到了走近工人群众,在提出的口号周围,在最大的工人中心地区创造了战斗的和革命的情绪。这个运动的结果是在工人中心举行了一系列游行和在华沙、罗兹、栋布罗瓦区等地的全工厂大会上选出了30多名代表。选出来的代表中只有一部分人克服了很大的困难,得以来到苏联,他们和托姆斯基同志的说法相反,非常积极地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各项工作。在被选出的代表中,绝大多数人是非党人士,是波兰社会党人,甚至是国家工人党<sup>72</sup>(罗兹)的工人。不可能得到去苏联的护照,而另一方面也不可能非法地派出这样的代表团,所以被选出的代表团不能全部来到。列·普尔曼。1928年7月4日。”

**李可夫:**我把字条上写的都读了。如果托姆斯基同志想说他说的是波兰和苏联的工人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工会之间的联系是如此不好,以至可以想象波兰比澳大利亚离苏联还要远的话,那么,在这个话题上,这里就等于是没有什么说了。

洛米纳泽请求就个人问题发言。我们的议程上关于个人性质的声明问题没有说到什么。我建议他写出来。

有人喊:不需要给他发言的机会了。

**主席:**现在表决。谁同意给他两分钟?谁反对?少数。好,洛米纳泽同志有两分钟的时间。

**洛米纳泽:**我认为,曼努伊尔斯基同志采用的那种辩论方法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他指控我说,好像我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诋毁共产国际。这样的指控显然是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感到受了极大委屈的结果。他作了一个不好的报告,而结果是我对诋毁共产国际有罪过。在中央全会上我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不仅说到成就,而且说到共产国际工作中的缺点。让我们想想,我在某个问题上错了,而且是在这里诋毁共产国际吗?如果我们大家都是慷慨陈词,把共产国际的工作,把它的伟大意义说得天花乱坠,而不是甚至在中央全会上提到它的缺点的话,那么这样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

我抗议指控我好像在关于联盟的问题上以及在类似的问题上滑到了反对派的立场上去。应该停止这种向自己不喜欢的对手泼脏水的做法。曼努伊尔斯基

同志,在组织这个联盟的工作中,我的参与比您要多,而且我认为,做它的工作的经验是应该是有始有终地完成的。[我认为自己是并不比您差的布尔什维克。我入党比您晚,但是在1917年没有像您一样持有这样的立场。]但是我的感觉是,对兰斯伯利、菲缅或者库克这样的半改良主义者做工作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但是并没有得到特别积极的结果。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

**主席:**请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发言。谁赞成让他发言?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发言。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们,我要说的是,我表示反对洛米纳泽同志的看法,是在他企图要发动对我的报告的批判,把责任从我的身上转到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很差上来之后。我坚持我的意见。至于所有其他的东西,那么,洛米纳泽同志的年轻是可以赎回一切的。(笑声)

**主席:**我们听取了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没有这个报告的提纲。准备的决议也没有拿到。建议把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通报性质的报告备案。没有反对的意见吗?没有。那么,通过把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通报性的报告备案。

闭会。明天的会议11点开始,听取布哈林同志的报告。



## 第三次会议

7月5日上午

主席(李可夫):我们给布哈林规定时间吗?

洛莫夫:我看不用规定时间了,因为它反正是得不到遵守的。

有人喊:让他不限时间地说吧,但是只是要在午饭前结束。

李可夫: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让他充分地、长时间地自由批评了。你说吧。

## 共产国际纲领

布哈林:同志们!我应该事先警告你们,一系列问题,而且是基本问题,我将不涉及,原因很简单,我已经是第三次做关于纲领的报告了(在第四次<sup>73</sup>、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在这里),在最近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还要再就这个题目做报告。一系列需要进行理论加工和理论论证的基本的纲领条款,在第一个报告里就已经展开了,其中有许多东西在第二个报告里又提出来了,有了某些相应的修改。当然,那些构成纲领的深刻的理论基础问题,要从实质上把它们展开,在这次会议上未必合适,更何况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严重的分歧。

我现在提出这些问题中的一个,这个问题还在关于纲领的争论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在争论了,那就是关于资本积累的问题,是联系着罗莎·卢森堡的理论的。像大家都记得的,在这个问题上有过相当不小的理论争论,首先是在我们党内(我不得不自己写了有关这件事的专门著作<sup>74</sup>),后来又在共产国际的人士中展开了。总的来说可以认为,从我们对这个词理解的意义上说,这个关于资本积累的问题和罗莎·卢森堡的理论这个理论问题已经解决了;至少拥护罗莎·卢森堡的那些人最近已经少了很多。这就是我想要提出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先要提出的事关系到的,是最近在我们党内和在某些其他党内,由于纲领草案的公布所发生的那场对纲领的争论。当然,我做不到把这场争论提出

的每一个修正都在这里提到全会上来并进行实质性的讨论。我不得不只是分析现在正在进行的讨论中提出的**主要的修改意见**,或者是主要的批评意见。

**第三件事也是形式上的**。你们非常清楚,在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有一个纲领草案已经基本上通过了。但是从那时起已经过了相当多的时间。当然,实际情况本身的发展有了一系列进展、重新组合和变化,这些自然应该也在我们提交给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审议的纲领草案中得到反映。

共产国际纲领委员会的相应呼吁书列举了客观局势的这些变化。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形式改变了,各种大国集团之间的对应关系改变了;出现了像中国革命这样重大的因素,它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命运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另一方面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同样对于国际革命的整个前景也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向前推进了,而且这个建设的经验也极大地丰富了,当然这种经验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理论问题并勾画出了解决这些理论问题的基本轮廓。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我们也同样看到一系列新的现象,需要这样或那样从理论上进行说明,例如,关于法西斯问题,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方针,关于这一点我将专门谈到。最后还有,我们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了更大得多的规模;它既拓宽了也更加深入了,它包括的问题范围是以前从没有在共产国际面前这样具体提出过的。只要提到一点也就足够了,比如说,殖民地问题,这基本上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从原则和理论上解决的问题,在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上也提出来了,但是提出得不是那么具体,不是像现在这样多种多样,对我们的政治实践有着最实质性的和首要的意义。

我还要指出有关问题的形式方面——现在向我们提出的这个纲领草案该怎么通过。在最近一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扩大全会上,关于纲领的问题是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是在有所有最重要的党和一系列小党的代表出席的会上提出来的,在讨论为第六次代表大会准备纲领的问题时,所有同志的出发点都是,应该成立一个小的和面很窄的小组,它应该为未来的代表大会准备草案。在团长会议上,编写这个初步草稿委托给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俄共代表团。为了完成这个决定,任命了政治局委员会,它又从自己人中间分出了一个更小的委员会,由斯大林同志和我组成。我们又一次研究了 this 草案,变成了大体上是现在提交出来的这个样子。这个草案后来在我们党的政治局得到了批准和由我们两个人签名后提交给了执委会的委员会。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所有理论力量都被吸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委员会里来制订和讨论这个草案。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的结果,成立了一个范围比较小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编

辑委员会。在经过了外国同志提出的一系列修改之后(修改的数量相当大,但所有这些修改都不是原则性的,而是对写进了纲领草案的那些思想的珍贵的和实质性的补充),纲领草案于5月25日通过和公布<sup>75</sup>。这就是我认为在转入对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之前有责任向中央全会通报的、事先的和在很大程度上是涉及形式的意见。

**斯克雷普尼克:**在地方上讨论的过程呢?

**布哈林:**如果对你们方便的话,我想请你们在最后讨论这一点,因为我将就委员会里对问题的这样或那样的提法方面的情况做出回答。

**斯克雷普尼克:**根本没有过这样的过程。

**布哈林:**斯克雷普尼克同志,我将引用对纲领进行讨论的文章中的段落,我希望您绝不会怀疑它们是我故意臆想出来的,专门是为了在这次全会上让您伤心的。(笑声)

如果回忆一下以前对纲领中的各种问题的讨论,相应的各个报告和相应的讨论,那就不难再次想起,在论证纲领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和社会民主党在下列极其重大的理论问题上进行争论,这些问题是:关于危机的理论、贫困化的理论、伯恩斯坦的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前“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农业问题上的特殊的修正主义理论,等等,有一大堆的问题,围绕着它们还在战时远没有来到之前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里,同时也在俄国的著作中进行争论了。最后,在这场争论中还出现了一系列和战争与革命一起提出来的理论问题,像是“保卫祖国”的问题,民主和专政的问题,专政和联合政府的问题,等等。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是缓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千方百计地抹杀它的对抗性,他们的立场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另一方面,它又乔装打扮地掩饰维护资本主义。掩饰维护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最鲜明地表现在社会民主党是怎样解决战争问题以及他们对保卫“祖国”的态度上,为此我们用布尔什维克攻击的全部力量向社会民主党展开了进攻。如果把今天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方针拿来,那么上面列举的那些问题实质上已经不需要再提出了。但是不是因为它们根本就失去了自己的意义,而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它在政治和理论上的发展,已经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公开地朝着纯粹资产阶级的解决问题的方向走去,社会民主党现在的立场已经打破了叛卖的所有记录,和社会民主党(无论是右的还是左的)“最新”的口号相比,某种“保卫祖国”的口号看来就是天真无瑕的了。

我有些怀疑的是,参加这次全会的同志们是不是完全意识到了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和政治实践上的卑鄙。顺便说一下,这表现在一旦发生西欧资产阶级

国家对苏联进攻的条件下的政治方针上。对于我个人来说,无可怀疑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会站在积极作战来反对我们的立场上。他们现在的理论方针是在为未来的这种实践中的政治方针做准备。还在战争继续的时候,我们就在说社会民主党的三派了:右派、左派和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考茨基在战前被认为是“正统”的,而且几乎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你们把考茨基当时的和他现在的政治和理论立场拿过来的话,你们就可以想象出社会民主党的演变了,想象出最近时期发生的演变了。[从和布尔什维克争论该在多大程度上保护资本主义祖国到积极支持武装干涉计划和与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展开武装斗争——这就是它自己的理论上层建筑变化的幅度。]现在把批判伯恩斯坦的理论作为和社会民主党进行纲领辩论的中心,这简直是可笑的。我们当然应该进行宣传,在群众面前揭发社会民主党叛变的全部历史,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社会民主党现在已经走得更远了。劳合-乔治给英国“工党”做出的评价是尖刻的、嘲笑性的,讽刺是非常辛辣的,但同时又是一针见血的,这是对现在社会民主党的立场的一种非常典型的、非同一般鲜明的评价。劳合-乔治不久前在克拉克顿发表的讲话中说:“在卡马仁参加竞选的工党首领们是用纯粹的自由主义的腔调在说话。他们向选民们提供的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主义,甚至是温和的自由主义。可以很轻易地因伪造对他们提出司法调查;他们在自由主义的奶里加进了相当大量的水”。

劳合-乔治维护自由主义的立场,反对“被工党淡化了的和伪造了的自由主义”。还有什么能比这种评价更尖刻呢!这简直是为各种神所做的一幅图画!而且这是一个从整体上做出的嘲笑性的评价,对于评价整个当代的社会民主党来说是百分之百合适的。

最近这些年来,在改良主义的内部发生了巨大的思想上的重新组合。社会民主党从遮遮掩掩地维护资本主义转向了积极地建设资本主义:完全是有意识地、积极地建设资本主义,它的经济,它的国家政权,它的警察,它的军队;社会民主党成为了资本主义列强的对外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对外和对内政策中,社会民主党没有一个原则问题不是和资产阶级亦步亦趋的,它只是在资本主义政策的一些次要问题上有所不满和反抗,扮演着反对派的角色。在对外政策领域里,它采取的是越来越更加积极地反对苏联的侵略立场。这是需要完全清楚和明确地看到的,而且在这方面不能为自己设定任何幻想。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者”保罗-彭吉尔在法国制定的战争法则,根据这个法则,整个“民族”、所有公民都应该为法帝国主义服务。要知道,法帝国主义和波兰仆从

最有可能针对我们进行的战争就是反对苏联的战争。彭吉尔的方针就是整个帝国主义的方针,它说,世界的敌人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社会民主党现在坚持的观点是有意识地放弃阶级斗争。我要强调的是“有意识地”,如果是不值得一提的阿德勒·弗里德里希对阿尔伯·托马给墨索里尼唱的颂歌嘟囔了一些可怜巴巴的话,带来的不过是一种滑稽可笑的印象,因为实质上这种对法西斯的夸耀只是微不足道的、无关紧要的轻描淡写,和整个第二国际的主要路线,恰恰也就是这些托马·阿尔伯、彭吉尔等人推行的路线,绝没有矛盾的地方。这里已经说到了“工业和平”的意识形态、社会民主党上层和相应的工会与企业家组织等沆瀣一气。这是绝对正确的。而在理论上,这就在改良主义内部的各种思潮大的重新组合上反映出来了。还在相对不久前,改良主义人士中间的领头人、理论上的代言人和思想的提供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它至少在形式上,在用词上还有些和马克思主义的调情。现在,在改良主义者中间,变成了“盎格鲁撒克逊流派”在为各种时髦理论最后定调了。现在如果不是从个别论断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基本的理论观念的整个精神出发的话,可以说改良主义是用麦克唐纳提供的、已经被人唾弃的口香糖确定的。而对于麦克唐纳来说,这个口香糖则是美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像卡弗这样的人提供的。这些美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美国工业繁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理论,认为最大的,而且是没有流血的革命发生在了美国,工人在那里正在变成资本家。从这些美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可以直接引出一条线来,连接到当代的改良主义理论家的身上。

**奥新斯基:**卡弗已经放弃了这个理论。

**布哈林:**他是放弃了,但是他的意识形态在改良主义的阵营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比如说,麦克唐纳的“建设性社会主义”理论是什么呢?它实质上是这个理论的老调重弹。另一方面,比如说,像O. 鲍威尔的“职能性的民主”理论这样的理论又是什么呢?不就是在很大程度上从英国“理论家们”的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理论上抄袭下来的吗?奥地利人和德国人现在正在用自己的德语起劲地阐述这些盎格鲁撒克逊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们给出的东西。思想上的霸权地位现在事实上是属于后者的。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机会主义的英国人在这段时间里获得了很大的理论才能,他们放弃了自己粗鲁的、受到了我们的导师们——从马克思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谴责的经验主义。当然,不值一提的希法亭是比麦克唐纳有更多的理论功底的,但是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的内容是由带着英国痕迹的改良主义者确定的。

最近有一系列社会民主党制定并通过了自己的纲领。奥地利的和德国的社

会民主党人制定出了自己的纲领,工党也准备好了自己的纲领草案,虽然还没有公布;英国工党的纲领草案是由英国共产党公布的,结果是在英国资产阶级、工党和共产党的刊物上开始了相当激烈的争论。英国工党纲领的基本条款是什么呢?我来试着阐述一下这一点,为的是把我们的纲领草案和我们对手的草案对比一下,我觉得这并不过分,因为仙逝的奥古斯丁说了,世上创造恶是为了突显善。(笑声)

**斯大林:**他是怎么说的?

**布哈林:**世上创造恶是为了突显善。因为用逻辑的语言说,这是相关的概念:如果没有恶的存在,善也就不存在了。

工党的纲领的确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奶水”,不过是用相当多的、甚至未经蒸馏的普通白水冲淡了的。我从纲领的导言里引用下面的一段话:“工党……社会党。它要求发展工业和支配(administration)它所生产的财富不是为了很少的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所有参与了为共同的福利(to the common stock)的、对大家都有益的服务的人的利益。所以它的社会主义既不是对不可能的空想的一种伤感的希望(aspiration),也不是反对贫困和压迫的盲目的叛乱运动(a blind movement of revolt)。它是实际上承认流行的公共位置(familiar common place),也就是道义是存在于‘事物的天性’中的,所有人实质上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member one of another)”。

对纲领的理论论证就是这样的。但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身,在纲领草案里什么也没有说。与此同时他们表示坚决反对暴力。按照他们的理解,社会主义总的来说就是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已经知道的那些训条,是“大家都是兄弟”(但这并不妨碍工党对印度、中国和其他兄弟执行自己的政策)。接下来就是各种议论了,说是工党的社会主义“不是理论上的”,它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对人民的健康、教育、培养、工厂立法、发展自治、起码工资等方面的关心中得到了不完善的承认的那种社会主义的反映。他们的“社会主义”不是某种“强盗式的社会主义”,而是那种当然是并不完善地反映在大不列颠国王陛下的政府的所作所为中的!这就是在国际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中相当有分量的英国工党的典型的纲领。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在其制订的过程中,一会儿从一个方面,一会儿又从另一方面,总是不断地和系统地被阉割,而且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阉割的痕迹,按它在海德堡代表大会<sup>76</sup>上通过的样子,原则性的部分只有两小页。关于帝国主义那里只提到过一次,而且是一带而过的:“帝国主义者追求的是强盛”。关

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那里有的是典型的经典句子。在描写向垄断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时候,在海德堡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说,资本家“追求”为自己占有和垄断社会进程的结果。就是这样说的:“追求”!

从这个评论得出来的是,“原来”资本家们现在不是垄断地掌握着现代的企业和把剩余价值据为己有,他们“原来”只是“追求”、“企图”占有剩余价值。一个这样小小的公式就非常好地照亮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方针。当然,那里对苏联,对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没有说任何话。在分析当代社会民主党纲领时,“不得不”说到的就是这样的东西。而如果我们转到确定他们自己的任务的话,那么,在分析国家问题的那部分里,我们会遇到第一条,关于“宪法”,在其他要求之中,在明显的地方,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国家刑事警察”的要求。(笑声)这是一个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占有显赫位置的美妙要求,也同样非常明亮地照出了我们的社会民主党对手们的纲领性方针。

我本可以引用许许多多的地方和讲述大量这样的“理论”笑话,但是从政治实践的观点看,“笑话”就不完全是笑话了。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这就意味着社会民主党是在向维也纳的工人开枪,要是同我们发生军事冲突的话,就要向我们的工人们开枪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社会民主党的这个理论争论已经转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上。如果我们是完全公正地还在帝国主义战争开始的时候就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话,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了我们凶恶的、要把我们摧残的敌人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对它的这种卑鄙估计不足,在这方面也完全不能抱有什么幻想。

我还要向中央全会的成员指出的,就在最近这段时间,在苏联和兴登堡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更加尖锐的情况下,在国会对外事务的秘密委员会上,希法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领袖和第二国际非常有影响的理论家,提出了一个论断,实质上是非常清楚地向我们指出了社会民主党在发生战争时将会做什么。他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还有一系列经济上“衔接不上”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整个世界经济的机体里没有把苏联这样的庞大的经济机体吸纳进来。它没有被吸纳是因为苏联的“篡权者们”在对外经济关系里实践的是对外贸易的垄断。希法亭说,这是一种用来加强德国工人失业的障碍。所以,为了工人的利益,应该拆除这个障碍。我转述的不是完全准确的希法亭先生的话,但是我可以对这些话的意思绝对负责。现在我们还没有战争,而且我们还不能说什么时候会有战争,但是难道这里不是已经拿工人阶级做借口,最下贱的实际借口,奠定了从理论上为反对苏联的战争进行辩解的完全明确的基础吗?所以,同

志们,我们应该完全清楚地看到并完全深刻地理解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我们以前也知道这一点),那就是我们的纲领性宣言,我们的纲领,应该是一个最坚决地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相对立的纲领。在我们的纲领和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思潮所给出的所有一切之间,真正是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共产国际的确是这一支革命的力量,对于它来说,社会民主党是一个积极和狡猾的敌人。

现在我来论证一下一些相对比较大的改动,这是我们在老的草案的基础上或者老的草案的原则的基础上做出的改动,而且是现在应该得到这次全会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赞同的改动,至少我们是要这样建议的。

我已经说到了在最近这段时间实际上发生的那些变化。首先我要从共产主义无疑在成长的事实说起,从共产主义运动的确具有了世界范围说起。当然,就潜力而言,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从它出现时起,就是国际性的。但是在最近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确在自己的活动范围上有了很大的扩展:共产主义在思想和组织上渗透到了在过去的时期从没有到达过的地球上的角落。无可疑问的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共产党的影响在西欧肯定是增长了。

同志们,需要回忆起的是,社会民主党对稳定寄予了很大希望。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最近的基尔代表大会<sup>77</sup>上,希法亭在自己的简要报告的末尾是这样说的,在战后的混乱时期,共产党人得以上升,而现在,与资本主义的稳定同在的,是他们不再是什么工人运动中严肃的政治因素了。过了相对不长的时间,还是在德国,在议会选举中,我们对德国共产党影响的发展变化状况有了一次检查。对选举结果的数量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是共产党的影响增长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

现在共产主义影响的增长是以前所不能比的。就拿中国这个领域来说吧。直到前不久,在中国有什么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可言呢?而现在,还是那个中国共产党,却从非常困难的危机中走了出来,在翻译、阅读和研究列宁,而且劲头十足。它从自己的队伍里已经推出了好几个影响相当大的人物,相当好地学会了俄文,相当熟知我们的理论著作。可能有人觉得这是小事,但是这完全不是小事。不能忘记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全新的、刚刚初步接触到列宁主义思想的各种运动。

如果我有更多时间的话,我本可以列举出一系列非常鲜明生动的例子来,展现出这个进程有多么大的意义。

**喊声:**多说一些吧!

**彼得罗夫斯基:**根本不要限制报告人谈世界问题。



布哈林:你们现在这样说,可是以后又会用“转入7小时工作日”来刺激我。

我认为,值得最密切关注的是共产国际和一些国家的联系,在这些国家,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扎下根来,它们需要共产主义的宣传和共产党的领导。就说南美洲地区吧,在这个巨大和重要的“角落”里,就是这种情况。共产党人在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厄瓜多尔这样的国家里得到了加强,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如果考虑到像北美合众国这样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会发动各种战役来反对革命力量的话,就尤其是这种情况了。同样值得给予很大关注的,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角落里正在诞生的那些共产党。

所有这些事实迫使我们得出相应的结论,特别加强和着重指出世界的主题并把它作为整个纲领建设中的主旨和基本中心。

通常来说,以前的所有纲领,也包括我们党的纲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分析抽象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抽象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引出无产阶级专政来,但也是抽象的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概念。就一个国家的纲领而言,在共产主义运动不大发展的条件下,这样的纲领结构还多少可以令人满意。我们正在逐渐脱离开这样提出问题。我们所经历的整个时代,争取专政和实施专政的丰富经验,还有现在和组成真正世界性的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系的任务,这些都在促使我们转向另一个层面,转向强调作为整个纲领建设中的主旨的世界性的主题,而且促使我们把评价具体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对它的具体演变以及它的各种特点放在首位。这就是现在的草案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基本通过的那个草案的某种不同。我们在这里说的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也就是现在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我们说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是要说它是什么样的,它是怎样发展的,当然会带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因为任何概念都有一定的抽象性。资本主义的危机和世界性的国际运动的现实进程,革命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的发展,都是要通过国际革命的具体进程的分析来论证的。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共产主义,就是这样的题目我们也不能是作为“泛泛”的共产主义提出来,而是要把世界共产主义和世界的劳动分工、世界的生产力分工等等放在一起提出来。这里可以说我们已把手伸向了未来,并且说,我们将沿着这条完全现实的道路走下去,希望不是“泛泛的”、也不知道会在什么地方和怎样出现的共产主义,我们要夺取的是实实在在的、地球上的世界,我们要按照各种不同的地理位置、按照气候条件对生产力进行分析,我们不是“一般性地”,不是抽象地提出这一点,而是作为一种现在基本轮廓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目标提出来。如果你们想到的是在阿根廷,在古巴,在中国以及在其他国家有共产党,有

在各个不同的经济和文化条件下工作的党的话,这不是让人感觉太大胆了吗?

这样,我们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问题。这样,我们就提出了共产国际的战略、策略和组织的问题。这样,我要重复一遍,这样一来,实际斗争的需要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进程就使得我们要在纲领里强调这个世界性的主题,在纲领草案的一系列个别部分里要展开地谈到这个世界性的主题,这是你们大家,同志们,在读这个方案时可以不费力气地看到的。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形式。在制订纲领的各个阶段上讨论这个问题时,从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始,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这个问题的提出是要取决于世界发展的现实进程的。在第一个草案里,我们无疑把一切都夸大了,说到了资本主义的直接垮台。在纲领的第一个草案里,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对资本主义危机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根本就排除了发展有上升曲线的可能,甚至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个或大或小的部分也是这种情况。已经是在第二次讨论的时候,在对纲领的第二轮争论时,也就是到了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前,不得不提出了相当大的修改,因为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实践证实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提法,他在和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辩论的时候说到,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没有出路的状况是没有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的时期内,资产阶级是可以脱身的。所以在对纲领讨论的第二轮时,在这里不得不做出一定的修改。现在,当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党的和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关于对稳定性的争论的决定时,现在当然需要提出另外的措辞,需要说到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说到它是有条件的,而且要说到资本主义体系现在的危机是在有些不同的基础上发展的。由于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尖锐危机,我们有了新的对应关系,有了这种发展的新的框架(苏联、殖民地运动,等等),联系到这一点,就尖锐地提出了稳定性的问题,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非常深刻的和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发展的问题。这样一来,这里就强调了无论是在第一个草案里,还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基本通过的第二次改动了的草案里不可能强调的那些方面。当然,这些修改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我想,第六次代表大会将会是一致的,它将会认为这种改正、这种修改是完全有道理的。

从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有联系的问题中,完全自然地会把关于苏联的问题作为中心问题之一提出来。稳定化的矛盾的发展,苏联作用的加强,殖民地作用的加强,现在自然都会涌到首位。我们提出了关于苏联的特别一章,特别一段,我感觉,因为在发展的最近阶段上,正是关于战争的问题是中心问题之一,这样做就更是必要的了。作为纲领中的一个问题,同志们,怎样提出关于反对苏联

战争的问题呢？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战后，我们不得不写另外的纲领。这是清楚的，因为战争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是以我们的失败而结束的话（我是不相信这一点的），那这个纲领也将是不适用的了；如果战争是以我们胜利告终的，那我们从资本主义世界拿到的将不是小小不言的“皮毛”了，也就是说，我们将会有新的苏维埃共和国。（插话没有听清楚）我说的并没有任何过分的乐观，我甚至从理论上也可以预测到可能会有坏的结局，但是完全清楚的是，在两种情况下都不得不写一个另外的纲领，而如果是这样，我认为一定是会这样的，那么就非常自然了，现在我们面临的战斗性的问题之一，中心的问题，就是关于苏联的问题了，而从战略和策略的角度看，苏联问题是起着头等作用的问题，这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所以在我们党内发生的任何事件，我们和反对派的斗争，立刻就会具有世界性的国际意义。这表现了苏联的作用，它的国际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从经济发展的观点看，从政治发展的观点看，特别是从军事问题的特殊意义的观点看，从共产主义对东方影响的观点看，从建设的经验的观点看，我们应该对苏联写出特殊的一节，这丝毫不会损害我们的共产主义纲领的国际主义意义和含义。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应该强调，要特别加强和突出有关殖民地的主题，我们在草案里也是这样做的。联系到上述情况，在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一节里也强调了世界的主题。

我们引进了关于把各个国家进行三种分类的思想：分成高度资本主义的国家，中等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以及半殖民地国家。

斯大林：分出了类别。

布哈林：是的，分出了类别。我应该说，在上一次讨论时就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当时我们把它取消了。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信念，认为这样的分类是不能绕过的，而且现在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如何安排这些类别的问题。我们确定了这样的原则，把所有的运动都看成是向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前进的运动。所以我们是从小走向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的运动的角度看待中国等这样的殖民地国家争取工农专政的斗争的，看成是一定的预备阶段，是我们总的走向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的一小部分。

这样，就得到了掌握了国家政权的苏联无产阶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和其他类型的、由这些国家的独特状况决定了的运动的自然的协调、交织和结合。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从走向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运动的战略来看真正统一的情形，而且这一切不是靠简单化，不是靠把许多不同类型都打上同一个烙印等等办法得到的，而是通过了可能更完全地考虑到个别国家的特点、状况和独特

性得到的。同时我们有**战略的统一**，因为我们把所有的运动都看成是汇入共同的国际革命进程的各种不同的潮流。

需要说的是，我们向自己提出的和我现在讲到的这个任务，是很难解决的，而且可能这里还需要做出某些局部的改善。但是我认为，无论如何也不需要放弃这种想法本身。我通过不止一次地和许多同志谈话，特别是和来自东方国家的同志（特别是和中国同志）的谈话，具体地坚信了它是正确的。他们都指出，对他们来说最头疼的理论问题是把他们的具体的、直接的革命任务和国际革命问题联系起来。对此他们需要花费很大的努力才能理解和消化。例如，对于我们来说，提出在1905年由布尔什维克革命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怎么能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的问题是可笑的。然而你们指的是那批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的干部，他们来到我们这里，几乎被“资产阶级民主的”的称谓吓跑。他们会说，无产阶级怎么能解决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呢？这个例子表明，迫切需要从理论上提出将还没有完全“成熟”到足以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的共产党面临的单个任务，同争取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同问题和共同任务联系起来。

由此，我们还应该提出一种情况，那就是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个别队伍获胜的情况下，会出现某种国际性的联系。纲领里提出了一个论断，说是苏维埃工业国家对比较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来说，或者形象地说，对世界农村来说，是它们走向共产主义的工业—城市基础。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不充分考虑各种不同特点可能产生的危险性，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设置了一切屏障和保留条件。我们指出了，甚至是我所说的这种对国家的三类划分以及对应着这些类型国家的那些任务的安排，也只能理解成是一种明确的提纲，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免去我们进一步进行专门划分和进一步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责任，在确定这个或者那个国家具体的纲领、战略和策略的时候，甚至不能直接从这种三类划分出发，而应该考虑到每个单个国家的所有特点、具体的环境、具体的运动、具体的党，等等。所以，这种危险当然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事先不考虑到这一点，它总是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在注意阅读草案的时候，你们会看到，纲领起草委员会是高度重视这个危险的。联系到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有关的特殊问题，也是从政治斗争的观点、从我们和反对派斗争的教训的观点出发的，草案提出了一个概括性的说法，说是革命的**国际性**依靠的是世界经济的**统一性**，而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个国家取胜。这个发展不平衡性的问题是在我们党的讨论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与之联系的是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对

应关系问题以及一系列实际的政策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在纲领草案里得到阐述。这是在前一个草案里没有的。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绕过去的,无论是从实际的理论意义来说,还是从直接的政策角度来说,都是如此。从这两个角度来说,都需要把它列入纲领,因为苏联的问题和国际革命运动的不平衡性以及这些问题的衔接——是非常困难的理论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一定应该作为一个组成部分,放进我们的纲领里。有很多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是~~糊涂的:一方面是滑到了认为国际革命好像是一次性行动,而另一方面则是认为,如果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就不是国际性的革命了。这样对立的看法是需要消除的,而且纲领应该对这个问题给出正确的答案。

关于过渡时期问题是纲领草案的很大一部分,是中心部分。它也应该在提法上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纲领草案有所不同。

把国家分为三类,它们的发展有特殊规律,它们之间有联系——所有这些都应该在关于过渡时期的那一章里也有实质性的反映。所以,纲领草案需要表述的,不仅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直接过渡的所有“要求”。草案里有更进一步研究过的、我们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过渡时期要解决的全部任务。同时你们在纲领里会找到整整一大段,是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作为以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为方向的殖民地国家的任务要解决的那些任务和对它们的要求。

在新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对应关系问题上,给出了比上一个草案更有弹性的“措辞”,让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后,根据在个别的国家存在的和将要形成的各种不同条件,有可能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案。

我再来说说一些也是与对老的草案进行修改有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我们扩大了关于社会民主党的部分,不是仅仅限于涉及社会民主党理论和实践的那些一般归纳性的论断。例如,我们记录下了能够描绘出社会民主党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的那些它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叛卖行为。

我认为,我们加强了分析社会民主党的部分,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社会民主党作为我们的对手,它的作用扩大了。没有能用直接的正面进攻把这个对手降伏;就像我们在运动的第一轮里没有能粉碎资本主义一样,现在我们也没有能用正面的直接进攻把社会民主党拿下。它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敌人。我应该回到昨天对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的讨论上来。当然,工人阶级的左转正在发生,关于这一点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是我们不应该错过一个极其有意思的、需要全力强调的现象。许多人问我们,为什么社会民主党至今还能作为一个巨大的政

治力量存在呢?例如,德国是一个没有殖民地的国家,现在它的超额利润怎样呢?而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能够获得900万的选票,而且总的来说在工会运动中起着指挥的作用。

基本的原理是这样的事实:甚至是在没有殖民地的情况下,一个有着高级技术的国家也可以通过交换获得有差别的利润这样的办法剥削其他国家。另一方面,有一个事实在这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正在发生整个工人官僚阶层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机关的沆瀣一气。你把各式各样的市政顾问、警察主席、各种国家、公共事业和市政企业中的官员都挑出来,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数字。那些先前是工人阶级组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干部,在很大程度上都转移到了国家的各种小职位上去了,占据了这些国家的小职位并且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机制中的螺丝钉。甚至在那些失去了殖民地的国家里,这些干部也构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存在着从资产阶级到一定的工人阶级阶层的传送带,在收入好些的和收入差些的人之间,在失业的和工作着的人之间等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的中间阶梯。在这里,资产阶级的回旋能力被相当有力地使用起来了。

**斯大林:**他们没有资产阶级的帮助是不可能起作用的。

**布哈林:**但是这个问题是要特别分析的。我只是在这里指出了一个小问题,关于它,当然是可以说很多的。而且,同志们,应该向你们说的是,就是在法西斯主义方面,大体上发生的也是这种情况。法西斯主义的相对强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法西斯国家里,首先是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警察、市政管理部门和国家机构有一定的部分吸收的是新阶层的人,首先是来自小资产阶级的人。是他们把这些人安置在各个地方的,是他们把这些人拉过去的。法西斯主义的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不光是赤裸裸的暴力就完了,再多就没有什么了。法西斯主义采用的是一种组合的办法,依靠的甚至是某些小资产阶级阶层乃至工人阶级的一小部分人的贪污。

**臧声:**但绝不是像德国那么多。

**布哈林:**是的,在德国,这个过程是特别广泛地发展起来了,在奥地利也是。我不再对这个题目进行分析了。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在纲领草案里加强这些题目(社会民主党,法西斯主义)。[我想请同志们不要想着去削弱这个部分。社会民主党是我们主要的敌人,甚至在纲领里,我们现在也应该对它进行更具有摧毁性的打击,要比我们以前做得更多。]

最后,我们加进了新的一段,这是原先的各个纲领草案里没有的,在过去的

讨论中也未曾提出来讨论过:在关于共产国际策略的章节的开始部分,我们在那里对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的各种不同形式做了简短的评述。这里包括麦克唐纳的建设性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所谓的“革命辛迪加主义”,它尽管有过千变万化,但就是没有变成辛迪加主义,我们也说到了甘地主义、孙中山主义<sup>78</sup>,等等。可能有争论,把它们分别放在不同的段落里展开谈,不是更好吗,等等,但是我认为,我们在这里的做法是对这些思潮给出简短的评定,这是正确的。对孙中山主义和甘地主义我想指出以下的内容。我们一定需要针对中国传统的哲学,针对孙中山主义,针对甘地主义,针对一些非同寻常根深蒂固的习惯,针对来自不同阶层的我们的东方同志们特殊的思维,写出一系列的小册子来。我应该说,在中国,在印度,我们不得不碰上特殊类型的、和另一种历史以及另一种文化相联系的思维。比如说,只有在经常和中国的同志们打交道的时候,这一点才能感觉得到。为了使你们能更明白些,我举一个例子。你和中国同志们谈话。他们往往会怎样提出问题呢?他们非常经常地不是从事态实际上是怎样发展的角度提出问题,而是纯粹从对概念的逻辑分析的角度提出问题。例如,对他们说了:你们是处于两股革命的浪潮之间。他们就会用不知道多少小时的时间制订准确的“差别”,浪潮和高涨之间有什么区别,浪潮和涟漪之间有什么区别,等等。

**李可夫:**我们这里有时也有这种情况。

**布哈林:**但是整个争论有时要持续几个小时,但是不是在分析实际的事实,而是在分析这些概念。而且如果认为这是偶然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同志们,这完全不是偶然的。通过和许多同志谈话,我坚信了这和他们某些思维习惯有关,是和他们特殊的哲学相联系的,是和那些沉重地压在他们头上的先前的文化和文明遗产相联系的。我们完全正确地论证了在中国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但是需要知道,在这个基础上,那里发生的是什么。例如,在广东的组织里出现了一个中国同志的小集团,他们认定了这个圈子里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即刻就搞来了武器并且想要把这个领导除掉。

**臧声:**怎么除掉?

**布哈林:**肉体上除掉,枪毙了。但是在这个时候,“领导”知道出现了这样的小集团并把它的所有人一个不剩地全除掉了。有的时候在中国就是这样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笑声)。或者另一件事,是一个中国同志在其他同志在场的情况下给我讲的。他是这样说的,把我叫到了区委会去并给我解释说,机会主义是有自己的社会根基的,工人阶级的党里来了其他社会阶层出身的人,他们感染了党的意识形态。论断是正确的。但是从这一点得出的“组织结论”是非常独特的。

区委把这个工人叫来并说：你应该把这个女同志枪毙。那个工人问：“为什么？她是个好同志！”——“她是个好同志，但是她是从绅士阶层来的”——“那为什么要枪毙她呢？”——“你应该把她枪毙，如果你害怕这样做，你就是机会主义者”。为了不戴上机会主义的帽子，他就把她枪毙了。但是我在这里要补充：如果你们对这样的“反机会主义”的方法感到气愤的话，不要忘记了再加上一条，那就是不要由于你们的气愤而根本就停止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是说，要用另外的办法，而且是和真正的机会主义的斗争，而不是同它的幻想中的影子斗争。如果你们不做所有必要的保留——那也不好。在做各种概括、阐述任务以及确定策略的时候，需要在中国同志们面前放上各种栏杆，为的是让他们不要做出过于直截了当的、形式逻辑性的结论来。从我们的经验得来的习惯出发，这好像有些奇怪，但是在那里，这个是能起到最好的政治实践作用的。这是和一定的思维习惯联系在一起的。

**斯克雷普尼克：**这就是孙中山主义？

**布哈林：**关于草案的结构的几点意见。我们在纲领里加进了一系列新的章节。你们看到有一些章节我们是重新做了排列的，而且可能你们已经发现了，有些章节几乎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语录，有一些语录是取自《哥达纲领批判》<sup>79</sup>的，从这里面取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语录，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作里引用了一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以及一系列其他的语录。我想，从传统的继承性来看，从措辞的准确性来看，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最后，我还应该说，我们改写了导言，更着重了一个思想，那就是我们继承的是总的世界工人运动中所有好的东西，其中也包括第二国际传统中好的东西。相应的措辞我们是直接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篇文章中摘录下来的。

这样，我就结束了对我们建议的那些改动的评说，现在就该是转入回答报刊上就共产国际的纲领草案做出的反应了。

**有人喊：**休息。

**主席：**表决。谁赞成休息？宣布休息。

(休息后)

**主席：**布哈林同志发言。

**布哈林：**同志们，我想在结束的时候说一下，由于公布了我们的草案，各个国家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反应。首先是关于敌人营垒对纲领做出的反应。对纲领



草案的公布,帝国主义的主导报纸《泰晤士报》非常快就做出了反应。在纲领草案公布后的几天之内,在1928年6月1日的一期里,《泰晤士报》上就出现了报道,而你们还记得,我们是25日通过纲领的——也就是说,它是在26日或者27日公布的——1日就在《泰晤士报》上出现了有关公布的纲领草案的报道。我来谈谈对《泰晤士报》的评价,为的是说明一下,我们的敌人在评论纲领的时候目的何在?

《泰晤士报》6月1日的报道首先说到的是,我们的纲领解释了建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所必须的战略和策略。这是《泰晤士报》首先注意到的中心思想。

然后《泰晤士报》认为有必要给自己圈子里的读者指出,共产国际的纲领把苏联看成是国际无产阶级唯一的祖国。《泰晤士报》正是在让自己的读者注意这些点,其意义何在,我想你们每个人都是清楚的。

接下来这个报道包含了一个思想,就是我们好像是要消灭“中产阶级”和“丝毫不注意”有权势的上层,而且中产阶级是我们主要反对的阶级力量,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中产阶级”出现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

再接下来,《泰晤士报》认为自己有义务指出对“麦克唐纳先生”、“萧伯纳先生”和“甘地先生”的攻击。我想,对这些做出评论就绝对是多余的了。

第二天,6月2日,《泰晤士报》上出现了第二篇报道,注意到了3件事。第一是我们称社会民主党为资产阶级的工人政党;第二是我们提出了自己的任务是组织国际革命的力量;第三是我们作为纲领的一个新口令,提出了“武装无产阶级”。报道的题目是:《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我认为,评论《泰晤士报》提到的这些要点也是多余的:很清楚,在这个会上就这件事和《泰晤士报》争论没有什么意思。在我们的敌人营垒里,说了英帝国主义的领导机关之后,我要说的是社会民主党的主导报纸。《前进报》刊登了一篇内容广泛的文章,题目是《关于共产国际的纲领》。这篇文章已经是在试图对纲领进行一定的分析了。我想指出这个社会民主党的主导报纸提出的某些要点,让同志们看到,在今后的辩论中他们将攻击哪些要点和他们将怎样解释我们的纲领。社会民主党人首先谈的是关于苏联的问题。在这里,从攻击的方向来说,和《泰晤士报》是一模一样的。《前进报》强调说,纲领说的是“在俄罗斯已经是一片光明,而在其他地方还是一片黑暗。在俄罗斯已经没有无产者应该失去的锁链。凶恶的批评者们可以发现,按照纲领锻造者们的意见,俄罗斯无产阶级的锁链的存在不都是为了丢掉它们,而是为了把它们保存下来……纲领的出发点是幻想俄罗斯对于无产者来说

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文章的这个基本方向说明,是要把纲领作为一个把苏联称为所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祖国”的纲领来攻击。

说到社会民主党“批判”纲领草案的依据,我没有时间去揭发尊贵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的那种实际上的理论无知了。例如,《前进报》的社会民主党人摆出了一副架势,就好像我们这是第一次谈到无产阶级民主,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列宁当年在关于叛徒考茨基<sup>80</sup>的书里已经经典地,清晰、彻底和详尽地展开谈到了这个主题。列宁在那里对这个命题进行了极其广泛和多方面的论证。社会民主党人想要证明我们共产党人放弃了某些自己的原则性论断,于是作为一种对这种说法的“例证”,指出纲领里好几次提到了无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民主’这个词在草案里常常重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把他们的俄罗斯祖国作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展现出来,他们要回击的一种指责,那就是只把俄罗斯看成是亚洲暴君统治的继续”。

我想,对他们想拿给自己的工人看的那些东西,未必有必要在这里进行实质性的辩论。在有些地方,他们又是以自己的无知让人惊讶,这种无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例如,我们就来看看这样的地方吧:“他们在纲领里承认俄罗斯还离最终目标——共产主义,世界的共产主义非常远”。但是任何一个傻子都明白,在一个国家里根本是不可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接下来是议论这样一个题目,说是只有到现在共产党人最后才明白,最终目标——世界共产主义——是要经过整整一系列的历史时期才能实现的。我要重复的是,这更像是故作无知状,不是自己本来就无知,因为谁还不知道呢,我们一直都是懂得过渡时期等等是不可避免的。

对共产主义本身也是做了手脚的,从无知或者伪装无知的角度说,这是做得很出色的。从纲领草案里拿出了一段文字,那里说到了阶级的消亡,强制性的标准,国家,等等。于是《前进报》在这方面就大发议论了:“如果这些字眼根本还有什么意义的话,这就意味着:对所有人的政治完全平等,对所有人的政治完全自由,民主的终结”。

凡是对马克思主义有起码了解的人都很清楚地知道,共产主义根本就消除了关于政治民主的问题和一般性的民主问题,因为民主是国家政权的形式之一,在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那里是白纸黑字写着的,而社会民主党人耍了这样的一个手腕:如果你们共产党人说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平等,那么这个共产主义的目标现在就已经由社会民主党人用现今的兴登堡君主体制<sup>81</sup>实现了。由此而来的

是,在俄罗斯,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还没有到来,而在德国则是已经“万事俱备”了。社会民主党这样颠倒是非,实质上就是企图证明,因为在德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存在着形式上的政治平等(好像按照我们的解释,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而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是半亚洲的秩序,亚洲的暴君统治,那么,按照共产主义的纲领就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要比苏维埃制度高出好几个层次。在社会民主党那里,整个方针和所有证据的选择都是沿着这条欺诈的路线发展的。

我们的方针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最大的社会阶级冲突和国际战斗形成了连环套的局面,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传统的继续,而它又遇到了《前进报》的欺诈性的“批判”。关于国内战争、人民战争以及其他的战争,马克思曾多次指出过,说这是要以15—20年或者更长一些间隔时间来计算的,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谈这些论断了。我感觉,在现在这样的讲话场合,这样做也是多余的。我想要让你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是在用绝对可怜的手法“批判”这些论断。他们说:“共产主义的世界纲领指出的道路不仅是非常漫长的道路,而且是布满了瓦砾和尸体的血腥道路。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说到这一点时,‘不可避免’这个词反复重复了不少于30次——要经过新的战争,而这种战争是要上升为新的国内战争的”。“1914—1918年的战争完全清晰地呈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了……接着发生的战争就会没有止境了”。

这就是说,在我们的纲领里记载下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常识性的论断,是在所有老的社会民主党战前的纲领中都有的,说的是战争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老的社会民主党会认为这样的论断是起码的,是没有任何可以争论的,现在却被来自《前进报》的社会民主党人做了这样的解释,说是我们是以摧毁为目的的战争挑唆者。我们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被解释成是维护“接下来的资本主义战争万岁”的口号。清楚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反对我们纲领的这个论断,这本身就是起到一种服务职能作用,就是要“支撑”改良主义者的反苏“工作”,他们用手指戳着苏联、我们的党和共产国际说:这里就是需要新的战争、国内战争、世界大战、世界搏斗的那股势力。世界性的纵火者是苏联。上面引用的《前进报》的议论只能是有这样的含义。

文章的最后说到我们好像是在修正我们这里原先有过的观念,说是草案“在残酷地和彻底地粉碎对共产主义不是在今天就是在明天就可能取胜的信念。这个草案显然是抛弃了盲动方针,要求只为以后做准备工作”。

这些人好像是第一次听说我们是否定盲动方针的,我们并不认为共产主义

革命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一下子就能在所有国家取胜!所有这一切说教在结束时都是很微妙地暗示我们是亚洲出身的,我们的纲领是亚洲的产物。结束时是这样说的:“要想把纲领读完还是一个共产党人,那就需要有亚内恰尔的信念和灵魂。”<sup>①</sup>

这也是文学上叮当作响的装饰,但是它也有自己的职能和服务作用,它的目的就在于使得欧洲的“文明者”们在军事上征服亚洲的“野蛮人—亚内恰尔”“变得神圣起来”。他们用很隐晦的文学形式展现出了社会民主党对共产国际和对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苏联的那种疯狂的内心仇恨。文章在结束时说,我们的纲领是“虱子”和“斑疹伤寒”的纲领,等等。对这些文学的精彩描写我就不去说了。

至于在我们队伍里的争论,我首先要说的是在我们党内发生的争论。你们都清楚地知道,出了相当数量的《真理报》争论副刊,那里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后来在德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国际》的最近两期上又刊登了一系列争论性的文章。然后是在为共产党服务的我们的杂志《国外通讯》<sup>82</sup>上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首先是德国党的大理论家们,格尔曼·东克尔的文章;发表了一系列优秀同志的文章,其中包括克拉拉·蔡特金的文章<sup>83</sup>。也有答复性的文章。例如,出现了尤利乌斯回答东克尔文章的文章。后来在我们这里有过支部里的讨论,而且我有消息说,在我们党的一系列基层支部里(我认为,这种现象是需要指出的),纲领草案是和争论文章一起积极讨论的。

臧声:那地下的批判又怎么样呢?

布哈林:我没有得到任何东西。遗憾的是,没有任何地下批评的东西寄给我。我这里只有一个情况:这不知是托洛茨基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还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给托洛茨基的信,那里暗示说,他们应该制定出自己的纲领草案来<sup>84</sup>。我记得在一个地方说到的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想要作某些补充,因为他说,他并不愿意让共产国际的纲领里长期留下什么不准确的和不在行的地方,——就是这一类的什么东西。但是我这里没有任何详细的批评意见,我没有从任何机关得到过相应的消息。可能这种消息是有的,但是我至少对这方面的情况说不了任何东西。

同志们,正像我已经对你们说过的,我应该放弃对每一种反对的意见和每一

---

<sup>①</sup> 亚内恰尔——土耳其苏丹享有特权的步兵部队的士兵。通常是指在维护某个阶级的特权阶层利益时表现出冷酷无情和过分残酷的人。——译者注

项建议都回答的想法,所以我请你们允许我针对那些值得研究和需要我们做出某种回答的论据分成不同的类型做出回答。同志们,我将不是回答个人的提问,而是归纳起来,对那些发展成为了一定观点的提问做出回答。外国的和俄罗斯的一些文章(当然数量并不是很多)对这个草案提出了这样的抱怨或者反驳意见:同志们说,它太“俄罗斯”化了。这种抱怨是用各种形式表达出来的:有的是总的表示反对,也有的是针对某些要点,表示局部反对,例如在我国总的经济政策问题上,在过渡时期问题上,还有在其他方面。首先我想说说这种抱怨总的措辞上是不是正确的问题。我想,这样的抱怨在总的措辞上是不对的。同志们,你们都很清楚地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光辉的著作之一《“左派”幼稚病》<sup>85</sup>,在那里,一系列问题都是经过升华、压缩的,思想是非常准确和浓缩地提出来的。这本小书的开始讲述的是俄国革命经验的国际意义问题,而且列宁同志是从两个角度提出问题的:首先从俄国革命像任何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一样,具有国际意义的角度;其次从俄国革命的规律的角度,说到它的最一般的特点一定将会在其他革命中重复出现。你们记得,更具体地说到了政党、苏维埃政权和一些其他事务。怎么可以理解说纲领带有“太多”的俄罗斯性呢?首先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一点,那就是对苏联本身说得太多了,专门加进了关于苏联的一章。同志们,我认为这个抱怨恐怕是绝对不正确的。我们不是生活在什么抽象的世界里,有着抽象的任务和抽象的革命;我们是生活在完全具体的世界里,有着完全具体的任务和完全具体的革命。你们记得,还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殖民地问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肯定地说过,要脱离开苏联,不和苏联结合在一起来解决关于殖民地的起义等等问题,那是错误的,是完全不正确的。他甚至非常坚决地提出了关于殖民地运动需要围绕苏联形成集团的问题。把这种提法写进纲领是不是合适,这是另外的问题,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是完全清楚的。我们苏联现在是这样一种对整个国际政治都极其重要的因素,不把我们放在相应的位置上是绝对不正确的。这是第一。

第二,可以说我们是“高度”评价了我们的革命和我们的建设的经验的,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在这方面说,我们有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除了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经验外,大自然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经验。如果单独看,有爱斯特兰<sup>①</sup>、拉脱维亚等等的“小经验”,最后还有匈牙利革命<sup>86</sup>的经验,而且匈牙利革命的经验,正像大家都承认的,更多的是指出了什么是不需要做的。匈牙利革命

<sup>①</sup> 爱斯特兰——爱沙尼亚北部的旧称。——译者注

犯了政党方面和它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方面的错误,第二是在农业问题上,在分给农民土地的问题上的错误。这是匈牙利革命的两个最核心的错误,但是这是反面的教训,说明了匈牙利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和缺点;但是这些问题正好是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正面的解决。在这些点上,从总的情况和从总体上说,我们党拿出了样板式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是有这样一种反对意见的话,说是我们在自己开的药方里有些地方说得过头了:总结了不可能总结的东西,不正确地把我们的政治标准搬到了美洲、西欧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去了,那么这种意见可能是对的。但是这样的抱怨是不公正的。我们可以来看看任何的细节。就拿新经济政策问题来说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说到新经济政策的普遍意义。他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sup>87</sup>上发言,谈到俄国共产党的策略时,曾说过,在新经济政策上,可能对英国来说(即便是这样,可能也需要慎之又慎地考虑)将要有某些例外。

我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完全正确的。当然,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也可以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言论中找到一些地方,解释可能会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同志们,即使是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也不能要求他在任何一个新的经济政策之前就对这个还没有的和不存在的新的经济政策的国际意义做出完整的经典表述来。是不能这样要求的,我感觉也不能用这样的语录来进行论证。

另一个论断也是正确的,那就是这个新经济政策的形式和规模不可避免会发生变形。这样的表述我们在草案里提出来了。

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根本就是按照死板的公式行事的,用“俄罗斯的”政治标准去总结其他的国家。但是这是需要具体证明的。我认为,纲领草案是完全可以保险不犯这种可能出现的错误的,因为制订纲领草案的人们一直都是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论断摆在自己面前的,在没有需要的时候,“按俄罗斯的方式”来写是不能允许的,——“按照俄罗斯的方式”当然有特指的含义。所以,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那就需要具体地加以证明。

就像我已经说到过的把各种不同国家分成三类一样,在任何一个纲领草案里,一定的“死板公式化”是一定要有的。全都是具体的,我们就不可能针对所有人和所有事确定纲领了。但是,同志们,我们应该记得,还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了一个论断,而且我感觉这也是斯大林同志、我、政治局委员会、政治局和纲领委员会的意见,那就是我们不应该修正我们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得出的论断,也就是说,每一个共产党的纲领应该以共产国际的纲领为起点,然后才应该是和每一个党的任务的所有具体情况相适应的专门的纲领。

譬如说,对于中国来说,先是这个纲领(共产国际的纲领),然后是:“从中国革命发展的总条件出发……”等等。

我应该说的是,我们同时也以共产国际的这个纲领承担了一项义务,那就是在我们积累的具体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审查联共(布)的纲领,因为任何一个人都非常清楚,那个纲领中的一系列地方绝对是已经过时了,例如“工人促进委员会”<sup>88</sup>等等。现在谁还记得这个“促进委员会”是什么?所以,我认为,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有着最大的可能,保险可以不放过任何很小、很小的“俄罗斯”刻板公式或者什么甚至哪怕是近似的東西。

我要再说一遍的是,这样的理论上的危险是不能排除的,套用死板公式的可能性总是有的。但是我认为,现在提交给我们审议的这个纲领草案是保险可以百分之百地不犯这种错误的。

现在,同志们,还有一批问题,也就是第三批问题,是有过争论的,——这就是关于战时共产主义以及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对应关系的问题。就像你们从纲领草案的文本本身就清楚地知道的,在这些地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措辞是非常有弹性的,对不可能预见到全部具体情况的问题没有搞未卜先知。我们说,可能某一种政策是对的,但就在这同时,在国内战争或者外部进攻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适合的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种什么政策,它就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内容。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在纲领里决定要先搞什么:是战时共产主义还是新经济政策。我非常明白,在另外的国家,新经济政策将不完全和我们这里一样。我是做这样的保留的,而且我想,同志们是不会在这件事上吹毛求疵的。我们是不是能给出同样的答案,说是战时共产主义一定会有,首要的角色非它莫属,它肯定要先到呢?大家都明白,我们绝对不能这样搞未卜先知,也绝不能这样把自己的手脚都拴住。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当然是非常稀有的和绝无仅有的,在那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并不一定需要有战时共产主义发挥作用,虽然我要再说一遍,这将是绝无仅有的情况。而至于时间和速度,那么在这里是不可能确定任何共同的和一定会有的规律的。要知道,我们不该忘记我们自己的经验中有一条,那就是我们不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开始的。后来我们走到了战时共产主义,而后来,我们的记忆中,我们自己不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开始的这一点被淡忘了。所以,在这里,在对应关系上,可能会有许许多多各种不同的情况。一些国家将会直接展开一场斗争,而且还要加上外部的各种复杂情况,在这些国家非常可能,甚至极为可能会重复战时共产主义的情况,但是终归还是带有特殊的、“非俄罗斯的”特点的战时共产主义,这也是需要看到的,否则

我们就会犯下“照搬俄罗斯”的错误了。

在这一点上提出反对意见来自两个方面。一些同志认定战时共产主义根本就不会再有了,或者如果它会再有的话,那也将是一个短暂的插曲。他们说,在别的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决定性战役将会发生在直接夺取政权之前,或者是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所以将来,当无产阶级把自己的敌人摧毁和取得政权的时候,它就不需要这样疯狂地采用军事方法进行斗争了。所以这些同志简直就是建议根本“取消”战时共产主义。这样对不对呢?不对。我们从什么地方知道,国内战争的战役一定就是在夺取政权之前爆发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根本就不一定会是这样的。阴谋、起义、知识分子的怠工都会有的。我个人坚信,大部分西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明显的剥削者集团就不用说了,在西欧将会疯狂地、最残酷地,会比在我们这里残酷上千倍地反对、咬牙切齿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且需要说的是,他们比“我们的”傻瓜更狡猾:他们可以暂时退却,暂时躲进战壕,然后再开始进攻。从什么地方能够得出,决定性的战役一定在夺取政权之前就会打起来呢?当然不能这样说。另一个论据,如果前面的论据可以说是内部的,那这个论据就是外部的了。谁又能够事先就决定了外部力量的整个具体情况、整个轮廓呢?谁能做到把这幅图画绘制出来并且画得相当具体呢?是不是相反,这里需要的是提出一个大纲来,说明我们应该考虑到一大堆不可预见的条件和“偶然情况”呢?同志们,不要忘记了,这里说的是一个对于共产国际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遵守的纲领。我们能不能责成共产国际的每一个成员,让它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定要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或者一定不要推行它呢?难道能这样在纲领里束缚手脚,依靠靠不住的、没有经过任何验证的议论吗?如果这些议论有75%或者甚至90%是有根据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权利利用纲领把它们固定下来,因为纲领要采纳的是那些已经百分之百被证明了的东西,用它把属于共产国际的每一个人都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开玩笑的。这不是策略性的决议,可以由于已经形成了新的条件而加以变动的。我们写的纲领是要长期管用的,而且在这件事上不能有丝毫轻率。

第二种思潮。一些人说,战时共产主义将来不会有了。另一些人则说,战时共产主义肯定会有,它将起到最主要的作用,它将是一开始就有的。但是谁又证明了这一切呢?谁也没有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这是证明不了的。这里可能将会有如此多的非同一般的和独特的东西,我们不能在这条路上把自己的手脚拴住,因为纲领是共产国际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遵守的。所以,我的感觉是,我们提出了有弹性的措辞是完全对的,这就使得新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之间的



相互关系有了一种措辞慎重的提法。所以我认为,这些反对的意见是不正确的,而且我认为,保留我们在纲领草案里的那些提法要更合适得多。

现在我来谈谈第三类问题,也就是关于过渡时期我们的要求和任务的问题。有相当多的同志——也有一些东方国家的工作人员同志和一些来自我们的党的联共(布)的同志,以及一些外国同志,当然并不多——在攻击土地国有化这一点。过渡时期的土地国有化将是无产阶级战争的任务之一(因为这里说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我们在第二部分里的“a”条款说的是这个。那里说到:

“a)对城乡的所有大规模的土地资产(既包括私人的,也包括教会的、修道院的等等)实行没收和无产阶级的国有化,并且要转移到国家和市政土地资产委员会的手里,其中包括森林、矿藏、水域等,要随后实施全部土地的国有化”。

在“a”条款里说到:“禁止任何土地买卖。和破坏这个法律的人进行坚决斗争”。最后,在第48页上说到:

“在推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所有这些任务时,必须记住以下条款。

(1)完全取消土地的私有制和实行全部土地的国有化不可能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立即推行,私有制原则在那里已经在极其广大的各阶层农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在这样的国家里,只能是逐渐地通过一系列的过渡性措施推行全部土地的国有化。按照规矩,生产的国有化不应该涉及中小经营单位(农民、工匠、手工业者、中小商人等)。第一,这是因为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在专政最初的一些阶段上,不可能有足够数量的组织力量来不仅摧毁资本主义,而且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把中小个体生产单位的联系组织起来。第二,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不可能严格区分开可以而且需要逐渐吸收到社会主义建设轨道上来的普通的商品生产者的劳动财产和资本家的剥削财产,而消灭资本家的剥削财产是任何社会主义建设的必定条件”。

同志们,这一点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我应该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更详细一点,以便在这里建立起多少比较完整的对这个问题的评价。首先,一些同志肯定说,重复这样的解释是对原先的退步。同志们,我应该说的是,不是这样的。

**奥新斯基:**当然不是这样,不值得一驳。

**布哈林:**既然提出了这样的论据,那我还是应该说说这一点。

**奥新斯基:**谁要是读了列宁给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提纲,他就应该知道不是这样的。

**布哈林:**首先我应该说,这个问题在共产国际里是讨论过的。

有人喊:不要表白了。

布哈林:我要在这里力求没有多余的争论,诚心诚意地回答那些多少值得仔细分析的论据。

既然在我们的机关报上刊登了有关这个题目的文章,我就应该对这一点做出回答。

有人喊:对!

布哈林:但是这个问题是相当重要的,更何况就是在这次会上,同志们也在抱怨我们,而且我认为是公正的,抱怨共产党对土地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等等注意不够。同志们,我首先应该说的是,我们争论的前几轮,在共产国际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纲领委员会的、专门的土地分委员会。那里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争论,而且有一些党的代表,包括像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的代表,就不要说法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了,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他们说:我们不可能从一开始就直接提到全部土地的国有化,因为土地的国有化意味着不外是要消灭土地的私有制和全部土地,其中也包括农民的土地,都要转变成国家财产。他们说,如果我们向显然对土地的所有权有着根深蒂固成见的农民说:我们对你“行善”,把你的土地所有权拿过来,把它转变成国家所有,那他是会去上吊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写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里说:“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谈到无产阶级政权立即和完全取消私有制”。<sup>①</sup>我知道有些同志对这一点是这样理解的,这里说的是工具。我不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需要驳斥说,我们不是说要剥夺木犁、耙等物品。这是可笑的,甚至在提纲里写上这些也是可笑的,但是从上下文可以得出的是,这个地方是需要像我们说的这样来解释的。那么我们找到了什么样的结论呢?我们找到了这样的结论,根据我们的条款,事实上几乎是马上就要推行土地的国有化,但是要让它具有农民更容易接受的形式。在我们的党,联共(布)的纲领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手写上了:“至于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和方法,那么,在进行这种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和方法问题上,共产党有责任对农民做出让步”<sup>②</sup>。这是完全正确

<sup>①</sup> 指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俄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按原注该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418—420页,但从文中没有查到这句话)。——译者注

<sup>②</sup> 原文没有注明引语出处。——译者注

的论断。这不是路线上的让步,这是找到那些更容易“抓住”和保障最没有痛苦地推行我们想要推行的东西的一种形式。那时我们找到了什么样的形式呢?我们找到了这样的公式:因为在没收了地主的土地之后,农民从地主、寺院和各种其他的土地资源中得到了这些另加的土地,那么农民关心的就是,这些土地不要再变成更大的私人财产,不要发生法国大革命时的那种过程,让被没收的地主土地在几年之内就被“暴发户们”(新富人)买去了,被倒卖了,用来剥削和奴役广大的农民群众。我们对这一条是这样表述的,按照它,国有化的口号事实上几乎是立即就用禁止土地买卖和土地投机这样的规矩推行的。这个规矩意味着要对十分之九的土地实行国有化,因为这样一来,如果你禁止了买卖,那就取消了私有制的基础。

有人喊:在土地国有化的同时也还保留了私人使用的权利。

布哈林:也就是说,实际上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在罗马法典里有一个经典的公式:所有权是无条件的支配权(jus utendi et abutendi)。你可以使用物件,甚至把它消灭。

加里宁:再用拉丁文说一遍。

布哈林: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卖掉,你可以把它异化,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消灭,等等,等等,——这是你的权利,所有者的权利。但是恰恰土地是很难“消灭”的,只有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萨瓦<sup>①</sup>脱得赤条条的,企图把整个土地都炸掉。但是这样的好汉甚至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我们也不可能发现。

那么,有可能说的是什么呢?很自然,在土地的私有制上,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出售权,因此也就有了一块一块土地集中的可能,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可能。

同志们,我应该更详细一些地谈谈这一点。也就是说,问题在于需要怎样把财产所有者引向社会主义,而且不是像我们苏俄这里的那种财产所有者,而是更大的、更“残忍的”财产所有者。对他是需要这样来引导的,要让他在这里能够拿到某些好处,拿到他感兴趣的东西。我们说:“我们争取的是让你在革命的时候得到的土地不要从你的鼻子底下溜掉了”。事实上这是正确的。这也就是那个土地的国有化,还是很小的一步——将来是会有完全的土地国有化的公式的。

我应该说,有的时候往往会有非常可笑的爱好,比如说中国的同志们。他们

---

<sup>①</sup> 俄罗斯作家安德烈耶夫(1871—1919)的剧本《萨瓦》中的主人公,他宣扬的是把一切都消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声称要让赤裸裸的人在赤裸裸的大地上重新建设一切,好似按照新的方式,但又不知何为新的方式。——译者注

现在提出了全部土地国有化的公式,也就是说不仅仅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富农的土地,等等,而且要没收所有的土地。就直接走到老乡跟前并且对他说:“我作为共产党员来给你造福,我要从你这里把你的土地没收(拿走)”。

所以,你们自己也要看到,这里还有一系列很大的问题,例如米高扬在座位上提到的关于重新分配的问题。

我应该说,就是对重新分配的问题也不能照葫芦画瓢。我还是从中国的实践中举出一个例子来。如果我们放手让所有土地一点不剩地进行黑市的重新分配,那么……

有人喊:那就谁都会什么也没有了。

布哈林:那我们就会把几千万完全没有土地的士兵、流氓无产者等等都拉到这个分配中来了,得到的结果是,在革命后,每个人平均得到的要比他在革命前得到的少一半。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表明,关于土地利用的形式问题,关于再分配的问题等等会把什么样的五花八门的和非常大的困难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应该同样慎重地提出关于国有化的问题。[如果是像我们这样提出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应该更加慎重地对待关于土地分块的问题,放手让土地进行黑市分配的问题,并且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找到这种成为惯例的、共同的公式的,最好还是让各个国家的纲领提出这样的问题来。]

第五组是关于我们很少分析的、涉及民族问题的那些问题。关于殖民地是有所涉及的,可是关于民族问题就很少了。但是同志们说,对于欧洲各国来说,有一系列很大的民族问题是需要更详细地阐述的。我认为在这里可以给共产国际的纲领加进一些补充的内容。

有人喊:是需要的。

布哈林:如果你想这么说,那可以说是需要。

斯克雷普尼克:有没有弃权的?

布哈林:现在,同志们,我应该说,一些同志,最明显的是两位德国的同志,克拉拉·蔡特金和格尔曼·东克尔,纲领总的来说引起了他们很大的不满,我也应该向你们报告这一点。蔡特金同志非常严肃地批评了纲领草案,并且开始就说,纲领像是各种翻译文章的集子,非常长,非常散,表述上不准确,里面有许多问题没有阐述。蔡特金同志强调了整个涉及“上层建筑”的问题,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瓦解、家庭瓦解的问题、妇女问题,等等。

我们这里在一系列的章节里,首先是在关于共产主义的一章里,在关于过渡措施的一章里,涉及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问题,例如,关于宗教等等的问题。

但是我应该对你们说:如果我们过多地说到这些“文化”上的事情,那不就使整个纲领带有了“文化载体”的性质了吗。

有人喊:那可不是吗。

布哈林:譬如我们的老纲领吧;我们在那里对上层建筑讲得很少,而且我想,如果说到这些,那就需要说得多少详细些。但是,同志们,如果说得更详细些,我们本来就很长的草案就还要更长了。纲领的缺点之一就是它太长了。我非常怀疑,我们是不是应该再把这些“文化”问题补充上去,把纲领搞得更长。

还有一个意见。蔡特金同志有些旧事重提,说到了德国几年以前的事情,但说得晚了些。我本人凭自己的经验知道,在德国躺在底层的时候,玄秘主义、神秘主义、妖术等等在传播,还有各种表现为性欲的情绪,而且是用各种理论的论断等等“包装”起来的,我曾对德国意识形态不可想象地要崩溃的这种形式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都已经过去了,不能像三四年前我们所说的那样去想象这些事了。这样是不正确的。随着稳定下来,资本主义从各个方面为自己添加了润滑剂,在意识形态上变得更健壮了。这是应该承认的。

我当然绝对不是否认任何局部的改进和补充。我是把这个放在括号里的。无论是在哪里——在政治局里也好,在纲领委员会里也好,我们都不是把纲领草案看成是不能改动的。我们进行过表决,对所有的一切都是基本上通过的。

请允许我们在结束时谈谈东克尔同志的文章,这篇文章我是今天上午才收到的,早先没有来得及放到我的报告的框架里。东克尔同志提的是关于纲领的结构的问题。他总的立场是这样的,这不是一个纲领草案,而是对纲领的评述,需要从中把纲领本身抽出来。格尔曼·东克尔同志说,不该忘记恩格斯的话,他对各种纲领是直接提出过要求的,说是它们应该是简短的和准确的,任何一个不能符合简短和准确要求的纲领可以随便算是什么,但不能算是纲领。你们看到了吗,同志们,一般来说,恩格斯定下的规矩是非常英明的,是需要更简短些和准确些。

有人喊:不仅仅在纲领里该是这样。

布哈林:不过在纲领里尤其要这样。但是上一个纲领草案的经验告诉我们,非常简短地阐述纲领性思想的必要方针是非常难以做到的。

当恩格斯提出自己的要求时,他的话说的是—般性的、宣言式的声明,要么更具体些,就是各个国家的党的纲领。但是为一个党写纲领是一回事,写一个文件要对所有的党(从中国到智利)的政策做出纲领性的论证,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加里宁的插话听不清楚。)

布哈林:你认为它有可能少些,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你才是一个全俄的奇迹创造者,而我是不敢奢求能起这样的作用。(笑声)

加里宁:我说的是篇幅大小。

布哈林:我认为,就是从前可以做到的那种篇幅,现在也是根本做不到了。我还要说的是,如果是编写我们俄国共产党的纲领,你可以用一般化的句子,说“我们大家是在奔向社会主义,完全的共产主义比过渡时代要好,它会在这之后来到”,那将会怎样呢?工人们会为了这个纲领把你赶走,因为他们要求表达得更准确,要求有实际的指令,要求更具体的东西,等等,就像在其他党里一样。

我认为,“越短越好”的总论断总的来说是对的。但是你们可以试着说说,该把哪些地方甩掉。当东克尔同志说到他建议甩掉什么的时候,得到的结果是“大山里养出了个小耗子”。他说,不要重复说“压迫”和“奴役”,说一个词就可以了,在另一个地方又指出了另一个词也是这种情况,仅此而已。我的感觉是,东克尔同志是在小题大做,开始是在一层一层地“剥皮”,可是在把两个词掰开之后,却是一无所获。

至于清理、风格、消除重复,等等,我想,在这里是可以做相当多的工作的。

加里宁:我们犯的是连篇累牍的毛病。

布哈林:这在医学上称做是象皮病。(笑声)

我的报告就讲到这里了。你们很明白这个文件极其重要的意义。清楚的是,共产国际是第一次提出纲领草案,承担起了非常重大的责任。你们都很清楚,这个草案要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将是我们的各个共产党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的基础。所以一些同志有了一些担心,他们又想要拖延对纲领草案的讨论。

有人喊:是吗?

布哈林:但是我们党的乌克兰中央决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将不通过纲领草案。

卡冈诺维奇:不是这样的。

波斯特舍夫:您翻译得不准确。

布哈林:波斯特舍夫同志,我知道,您是个乌克兰语的大专家(笑声。)但是那里写的大体上就是这样的要求,要代表大会基本通过草案,然后在扩大全会上最后批准。第五次代表大会也是基本通过的。而这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波斯特舍夫:不是这个草案。

布哈林:基本通过一般说来就意味着不通过。我不认为在第六次代表大会

的委员会里再坐上几天会比再一次拒绝讨论这个草案好多少。这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我们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把草案一公布，在所有的党内就会开始可怕的、热烈的争论。这是胡说。我们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基本通过了草案。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一直在呼吁讨论、争论。我要问：提出了多少建议呢，得到了多少对草案的修改意见呢？

有人喊：也包括从乌克兰人那里。

布哈林：是的，也包括从乌克兰人那里。你们将会看到，什么也没有做，我可以凭经验请你们相信，你们未必会得到——如果你们推迟讨论的话，——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扩大全会这段时间里，你们未必会得到特别丰富的材料。

李可夫：纲领草案是什么时候用法文发表的？

布哈林：相对不久以前。我要再说一遍：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最好我们就在代表大会上再坐上几天，把一切都搞完并把所有的意见都听完，但是要把相应的纲领通过了，而不是把这个问题再推迟说不定多少时间。同志们，我想我们做过的工作总不能说是白做了，虽然有一系列个别的、不大重要的缺点，这个草案我们是完全可以完全问心无愧地通过，把它作为向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基础并最终带着一个具有很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文件到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去的，这个文件将是我们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的一面旗帜。

主席：奥新斯基同志发言。

奥新斯基：我担心在10分钟里讲不完，因为不是要说一点，而是要说好几点。但是根据我的讲话内容和我所涉及的那些问题，可能你们会给我延长时间的。

我完全同意草案的基本方针。我听到坐在附近的同志们说，他们对一些方面在根本上就不同意。我非常感兴趣的是想听到这是些什么。至于我嘛，我将不是从对基本方针做什么改变的角度，而是从改动它的个别部分，搞准表述，而有时也多少比现在更正确地确定概念的角度看待草案的。我就从下面这一点说起吧。

有些同志认为，从外部形式上看，这个草案不是完全出色的作品；我也是属于这样的同志中的一员。草案是由我们的两位出色的作家布哈林同志和斯大林同志写的。斯大林同志更多的是在进行场外指导，基本上布哈林在写。从外部形式上看，我不能说这是布哈林最出色的作品之一。从修辞的角度说，在出版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了有很多考虑不周的地方。后来，当我要为讲话的提纲写清单，

说明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等等在哪些页上的时候,我总是要把这个草案前后翻来翻去,可是怎么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在什么地方。

有人喊:谁让你促进汽车发展和改善道路协会的人呢,可不就得跑来跑去吗。

奥新斯基:总的来说,可以用以下的情况来解释这一点。你们看看,整个纲领是怎样构筑起来的。开始的一章是“关于世界资本主义、它的发展和不可避免的消亡”,然后下一章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再后来就是直接跑到了共产主义——共产国际的最终目标。然后又跑回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然后又是跑到了另一个方向:“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革命”。最后我们是在“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这里靠岸了。

我敢肯定的是,如果以“历史的”顺序作为基础并贯穿全线,终点是世界共产主义的话,如果所有的章节都贯穿了历史的逻辑联系的话,那么,这样的结构就要简单得多和可以令人满意了。现在,在阐述的时候不得不在所有的章节里兜圈子,重复,结果是产生种种误解。

布哈林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纲领制订出来是不是能长时间管用。他自己说:这个纲领要一直存在到将来的战争爆发,也就是说期限是3—5年。那就要问了,给出一个对这样长的时期管用的纲领,是不是应该用今天的内容来充实它,让它更切合当前实际呢?有人会对我说,怎么,您是想让我们给出一个具体的行动指南而不是纲领吗?不是的,我想要的是一个纲领,我不反对这样做,但是我们应该在里面把最迫在眉睫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更准确地说是今天这个时期的问题,突出出来,它们应该是鲜明的,勾画得很突出的,这样可以让这个文件具有战斗性。

我们来列举五个这样的问题。合理化的题目是要对现在经济领域里发生的事情做出基本的评述,但是完全没有展开。殖民地、战争、农民,这需要归为一类并作为一整套问题提出来。最后一个可以叫做“社会民主党的终结”。所有这些事情都应该在什么地方放在一起,放在一个篮子里。

在对这个纲领的结构提出了这样的一般性意见之后,我转过来谈谈个别的点,而且是从战时共产主义的问题开始说起。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这里需要在两个方面做出修改:在一个已经争论过的问题上,那就是战时共产主义是不是革命的一个必经阶段,还有第二个方面——什么是战时共产主义的具体措辞。

这里说的是:“由于有可能发生资本家的军事干涉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



长期反革命战争,可能会出现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必要性”。

关于什么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措辞是这样开始的。

我坚信,对于这些“可能性”来说,这样的措辞太温和了。我并不坚持说,在将会发生革命的所有国家,战时共产主义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但是纲领本身勾画出了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局势,勾画出了不可避免地会向法西斯主义靠拢的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如果你们注意到这一点的话,那我就要问了:在决定性的国家,有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不发生不可避免地走向战时共产主义的尖锐的国内战争、尖锐的阶级斗争呢?

所以这里应该说“由于有很大的可能”,不是“由于有可能”,应该说“未必是可以避免的”,不是“可能有必要”。这个措辞需要加强。

接下来关于新经济政策。这里的表述也是太狭窄了:对新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下定义都是根据该如何处置市场做的。关于战时共产主义说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不外是为了在国家生产力下降、小生产者的各种个人生产刺激因素受到严重破坏(没收和征用)的情况下,从国防目的出发,组织合理的消费”。

但是问题在于,不能把战时共产主义归结为对市场做了些什么。战时共产主义是一整套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现象。至少这是两种东西。一方面,这是最具暴力性质的方法、最坚决地剥夺原来的主人的方法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打碎原来的相互关系的一种形式;第二,从经济上说,战时共产主义不仅是分发票证,和战时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劳动义务制,而且它也延伸到了生产的组织方法上。所以这样来表述它,说这是一定的市场结构,那简直就是不对的。

我建议在这里做这样的补充:不用“战时共产主义不外是……组织合理的消费”等等,而是说“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战时共产主义)一方面是以最坚决的形式推行剥夺资产阶级的过程”,接下来说:“另一方面是组织合理的消费”等等,就像原本中所说的。

现在,接下来请允许我对新经济政策说几句。新经济政策在这里是这样表述的:“由于有相当数量的小生产单位,首先是农户、农场主的经营单位,等等,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在开始的一些阶段上,也还保留经济联系的市场形式和货币体制等等”。

也就是说,又是新经济政策要保留商品市场和货币,仅此而已,——我认为这也是不对的。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一次是怎样表述新经济政策的一个方面的呢?这是1918年4月的事,当时我们左派共产党人是反对的,特别是我

是极力反对的。那个时候列宁说:以前是“抢夺被抢夺的东西”,现在应该是另外的口号——“把被抢夺的东西结算出来,计算出来并整理出来”。与此同时,列宁提出了另一个口号:在工厂里推行工人之间的竞赛,采用计件工资制。但是当时我们左派共产党人反对这样做,就像是反对触动最神圣的东西一样:“请问,这是要干什么?!要知道,计件工资制是什么?它是资本家用来让工人彼此对抗的,为的是把他们打散,等等,而你们在我们这里想要采用计件工资制”。

为什么列宁提出了计件工资制的要求呢?因为进入到新经济政策里的不仅是商品和货币范畴,还有工资范畴。

接下来,请允许我谈一个问题:利润范畴是不是也要算在新经济政策里呢?形式上它也是要算的,因为我们是把企业建立在“经济核算”基础上的。

**布哈林:**这是货币计算造成的后果。

**奥新斯基:**请原谅,而且那时还有对经理们的奖金,这些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长期以来是在鼓吹的,为的是用他们关心个人得到的好处促使他们尽可能搞有赢利的生产。这里也有专门涉及技术知识分子的新经济政策手法,指望能对他们希望个人生活得更好的心理施加影响。

**有人喊:**共产党员也在争取过更好的日子。

**奥新斯基:**不仅是共产党员有这些想法,工人也有。这也就是列宁同志在引进计件工资制的时候想要做的文章。

**布哈林:**托姆斯基作为专家,说到了奖金就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条件下也曾有过。

**奥新斯基:**这不是彼此排斥的,一种制度是和另一种制度交织在一起的。一句话,我要肯定的是什么呢?我要肯定的是,新经济政策的概念包括的不仅是商品和货币的范畴,而且有工资和利润的范畴,所以这里需要做这样的补充:在说到“有相当数量的小生产单位”等等的地方,我要补充上“在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里有着从资产阶级社会继承下来的和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的习惯和传统”。

接下来在列举形成新经济政策的各种经济形式(市场的联系形式,货币体系,等等)的地方,我认为应该加上:“工资”。为什么要加上呢?为的是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左派共产党人,他们会反对计件工资制。(笑声)

**布哈林:**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奥新斯基:**那你就直接说——计件工资。我用工资来暗指计件工资制,是为了好听些。

**斯大林:**可能是不是还要加上关于“剥削”呢?

克维林:要把一个思想说透,是该补充的。

奥新斯基:好吧,那就用另外的表述,但是要把这个思想表达出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能清楚地把问题提出来。你们如果不是把话说透,就可能在一定的时刻造成左派共产主义一定程度的复发和阻碍在实际上提出这个问题来。

斯大林:这说的是要不要通过市场或者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组织国民经济。这是基本的。

奥新斯基:说的不是这个。联系到这段历史,在59页上分析的是个别的国家将怎样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里说到,“高度资本主义的国家”,显然是说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德国、英国,等等,说是他们更大的可能是要越过新经济政策,因为在经济领域里,对于它们来说最典型的是“相对小规模自发市场关系,迅速的社会主义发展速度”等等。

对于美国,我十分想要提醒的是,不要这样乐观。在那里,在美国,可能发生的是新经济政策会拖延很长、很长时间。在那里,第一因为各种不同的历史基本条件,第二因为在帝国主义时期工人阶级被资本家广泛收买,其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在那里个人主义的心理在工人中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是那么快就能把它摧毁的。除此之外,在美国也谈不上合作运动的发展。这样的运动在那里非常不发达。从生产力的状况等意义上说,美国现在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没有那些从社会组织的意义上说可以发生比较快速过渡的某些环节。我觉得,这一点在这里阐述得不够谨慎。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说过:这里对合理化什么都没有说到,这是不对的。关于合理化无疑是需要特别说到的,因为这会反映到某些其他事物上,比如说,反映到工作日上。我想可以把当代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规定为这样一个过程。一方面,从技术方面说,这是对技术设备的改造,越来越多地和快速地广泛采用电力,另一方面是采用内燃机。正是这些说明了战后技术转折的特点。比如说,瓦尔加在考察工业的个别领域时就肯定说,在大多数的领域里,新的工作机器、操作灵便的机器就发明得很少。这是对的。但是同时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从动力的意义上看,就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转折。电力的引进形成了增长的一个新阶段,从大量采用汽车运输和飞机这一点来说,内燃机的采用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第二个特点。

布哈林:还有化学。

奥新斯基:这可能是第三个环节了,但是要比前两个环节弱一些。

从生产组织的角度说,合理化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劳动过程的组织

上要更多地采用流水线体系。

现在要说的是,经济领域里的合理化现在有哪些进一步的反映是我们的纲领没有能涉及的?请允许耽搁一下你们,讲讲几个有意思的事情。福特1926年底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了一星期5天工作日。现在在哈德逊—埃塞克斯的各个汽车厂,由于采用了两条流水线体系(一个工人在两条流水线上同时工作),执行的是一星期5天工作日,也就是说在一个星期里不是工作6天,而是只工作5天。从这样的先例出发,美国劳联——黄色组织——已经提出了全部实行一个星期5天工作日的口号,目的是(这一点强调得比较少)让工人承受工作过程的集约化,而更多的是为了减少失业。这里可以揭示出在我们看到的美国日益不断增多的失业和这种劳动合理化之间的有意思的联系。美国劳联直接要求一星期5天工作日,为的是克服美国日益增长的失业。我们的美国党在自己的竞选纲领里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恰巧这个纲领是完全按照共产党的方式写成的,如果洛米纳泽同志在这里说的竞选指令是正确的话,那么关于竞选著作,就像佩佩尔同志公正地证实的,他就说得不对了。这样,美国共产党把一个星期5天工作日写进了自己的竞选纲领。除此之外,大约在两个星期前,我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机关报《华尔街日报》上读到一篇它的编辑巴龙写的文章,他是把一个星期5天工作日作为一项公共措施提出来的,并且向摩根建议在他的工厂里实行它。这就是由于合理化的缘故在工作时间和工作日上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而这一点在我们这里有反映吗?没有。如果说到纲领的俄罗斯性,那我要说的是——在政治上它不是“俄罗斯的”,但是从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的一些在远离这里的地方正在发展的新现象的角度看,它可能是“莫斯科的”。

有人喊:在一星期5天工作日的情况下是7个小时吗?

奥新斯基:5天工作日是8个小时。但是用7小时乘以6,8小时乘以5还是有差别的。

布哈林:这只是美国的玩意儿。

奥新斯基:当然,这暂时是美国的玩意儿,但是看来,由于生产速度的加快,采用流水线体系和极大地提高劳动的集约化程度,是有这样的趋势的。

现在我们在工作时间方面可以有些什么样的要求呢?在已经进行的社会主义转折中,工作日的标准规定为7个小时。我担心的是,这件事发展的结果可能是,到了最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到来之前,在某些地方总的工作日数量会比我们所建议的还要少。这可能会发生在非常集约化的生产领域里。所以,当克拉拉·蔡特金说到最好不要提7小时工作日的时候,她是对的。

有人喊：还是原来的工资吗？

**奥新斯基：**我对这个问题不是专门考虑过。它可能还是原来那样。是谁给我们定下了要搞7小时工作日呢？我要肯定说的是，无论这种做法现在推行得是多么无力，也无论它推行起来有什么样的错误，当我们在苏联采用了各种自动化的生产过程的时候，就是7小时工作日也会显得减少得不够的，——我们那时将不得不考虑进一步缩减了。

**李可夫：**说得对！

**奥新斯基：**我们为什么要把今天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定死了呢？而且如果需要一天有几班轮流倒换工作的话，7小时工作日是非常不方便的。从每天分班的角度说，从实际运用的意义上说，6小时工作日要轻松得多了；7小时工作日是向6小时过渡的一个台阶，而且为什么要把一个过渡的措施规定成对问题总的提法呢，我不知道。最好是把这些全删掉，或者可以这样说：“把工作日减少到7小时和调节工作日”，这里说的是“在有害的生产领域里”——要是我，就加上：“在需要特别紧张劳动的企业里和在有害的生产部门里”。那么这就更灵活了，更好了。总之，我不喜欢我们这里所说的：对殖民地是8小时工作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7小时工作日，而且根本就不知道作为一个过渡性的要求该是什么样的工作日。我感觉这里有些不连贯，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8小时工作日留给殖民地，而在其他情况下什么具体的也不说。

我拖延了，但是请允许我对农业纲领说几句。我应该说，照我的意见，它根本就写得太多了。作为例子，请允许我从不是从莫斯科的经验的角度，而是从美国经验的角度提到一点。这就是“\*”这一点，它简短地说的是：“组织农业土壤改良贷款”。我非常感谢你们——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你们只是允诺“组织”农业贷款。

请允许我对你们说，在美国，每年已经要花上几个亿的美元来搞这个土壤改良了。我自己到美国去的时候，只是到过亚利桑那州的两个灌溉区，那里用灌溉的方法生产棉花，还到过得克萨斯州。但是在美国，这样的区是很多的。在那里这些事干起来规模是很大的，是国家提供资金，而且给的资金比我们这里要多十倍。这样一来，你们只是简单地说了“组织农业土壤改良贷款”，如果和美国资产阶级政府今天的活动比较起来，就等于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来。所以这部分要么是需要重新改动一下措辞，要么就干脆删掉。

**布哈林：**那你建议怎样改呢？

**奥新斯基：**关于措辞的建议我可以在委员会里提。

斯大林：在中国情况怎样？

斯克雷普尼克：他不知道中国的情况，他说的是美国的观点。

奥新斯基：现在接下来是关于农业，关于国有化。我认为完全没有争论的是，以前就已经承认了一个论断：国有化不是一下子就可能的。但是我应该说，像是现在草案这样的表述法，它是无法达到给自己提出的目标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正确地表述出这个论断来。它说：“对城乡的一切大土地占有实行没收和无产阶级的国有化”等等，“然后是所有土地的国有化”。

请你们说说，如果你们是从不完全的国有化开始，允诺以后你们要把所有都国有化，那你们是把谁中立起来了呢？你们是在整桶的蜂蜜里给富农加上了一勺焦油，结果是把自己整桶的蜂蜜都搅坏了。

布哈林：要知道，他将要读的不是我们的纲领，而是我们的呼吁书。

奥新斯基：您别不安，《泰晤士报》是会这样向他讲述的，说是我们在自己的纲领里说了什么，他一切都可以搞明白的。

我想，需要说的是：“要和森林和矿藏一起，无需赎买地对所有土地实行国有化，同时保留或者扩大贫农和中农对土地使用的规模”。我不知道，对于一个保加利亚的农民来说，如果保障了他对他原来掌握的全部土地的使用权，他为什么还要反对国有化呢？

布哈林：你想要什么？你是怎样提出问题的？

奥新斯基：我给出的是一个反面的措辞。我是在说，可以宣布对所有的土地实行国有化，但要保障贫农和中农原来对土地的使用权。而关于所有其他的方面，我们可以不说。如果您想让富裕的农民保持中立，还可以再说上，国有化也可以从立即没收大型的土地所有权开始，逐步地进行。

布哈林同志然后引进了“r”——禁止任何土地买卖。他是这样说的：“既然我们引进了这一点，我们就是在实行国有化了”。为什么没有土地的租赁呢？要知道租赁是可以和买卖同样的办法破坏土地的国有化的。如果你立足于我们现在承认是对的东西，那你就应该说：“禁止任何土地的买卖和资本主义的租赁”。那就对了。

现在来说一说技术知识分子。

我认为，从两个方面说，关于技术知识分子的这一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方面是太有可能把这些知识分子从我们身边赶开了，另一方面是太少把他们赶到资产阶级那方面去了。这里说了什么呢？

“对于在资产阶级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技术知识分子来说，无产阶级在最

坚决地镇压来自它的队伍的任何反革命行动的同时,应该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利用这个有专业知识的社会力量”。

同志们,这里得到的是这样一个东西,请原谅我,所有的知识分子是一回事,但是要知道,技术知识分子是有各种不同的阶层的。

**布哈林:**为什么要原谅你?

**奥新斯基:**就像是我们坚持的方针是把农民打散和中立起来的方针一样,如果我们不能把技术知识分子打散和把一部分人吸引过来,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把工业组织起来。应该这样说:“对于在资产阶级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上层紧密地和资本的经济指挥机构连在一起的技术知识分子来说”(也就是说,应该进一步强调知识分子的一个阶层是直接和资产阶级连在一起的;那么下面的话也就清楚了),“无产阶级最坚决地镇压它的敌视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的任何反革命行动”(我是说:“它的各个敌视的阶层”,而不是“它的阶层中的”)。“应该同时考虑到有必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利用这个有专业知识的社会力量”,而且我还要加上:“千方百计地支持对工人阶级持中立或者友好态度的阶层”。

**有人喊:**对问题的提法太俄罗斯化了。

**奥新斯基:**不,我不这样想,这是完全国际主义的对问题的提法。

我还要对合作社的作用提一点意见。在56页上表现出了对合作社很大的乐观,好像是它马上就能往我们的水车里注水了。我坚持的是(而且不仅是在我们这里曾是这种情况,在西欧也将是这样的,)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也好,但特别是农业合作社——将会成为反动派和我们斗争的堡垒。这里应该加上:“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排除在开始的一些阶段上,消费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在资产阶级和它的社会民主党代理人的领导下,可能会代表着反革命行动的堡垒,应该对争夺它们给予极大的关注”。我对这一点的措辞很粗糙,但是这一点是应该加进去的。

我也同意斯克雷普尼克同志说的,在所谓精神生产的段落里,对文化任务完全没有说什么。说到了物质设备将被国有化——印刷厂、电影院、剧院,而且报纸将被“垄断”,但是不知道是由谁来干。写到了对电影院、剧院、报刊要国有化,可是我们对所有这一切将做些什么呢——对这些什么也没有说。需要给出一个方针来:我们做这些是为了发展各种类型的文化。不知道我们对它们将做些什么。

**有人喊:**烧掉。

**奥新斯基:**或者也许还是让他们重操旧业?

有人喊：我建议关闭。

**奥新斯基**：就算是这说得太过分了，但是这里是需要从实质上说上一段话来表述的，应该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将促进所有类型的文化在无产阶级基础上的蓬勃发展。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小小的意见，从“莫斯科的”角度说，也是非常典型的。在“工业，交通，邮电服务”这一部分里的“6”点是这样说的：“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铁路交通和水路交通以及空中交通设备（空中的商业运输和旅客运送设备）实行没收和无产阶级的国有化，并转到国家和市政的所有类型的交通设备财产委员会手里”。

你们看见了，我们多么先进呀，甚至连飞机都没有忘记，但是忘记了什么呢：在美国存在着2300万辆汽车。

有人喊：促进汽车发展和改善道路协会。

**奥新斯基**：请让我向你们证实一下，在说到促进汽车发展和改善道路协会的时候，你们只是从莫斯科的观点加以嘲笑。我从美国的观点可以引用一些可供咨询的材料：去年，汽车线路从铁路那里夺走了价值2.5亿美元的乘客运输量，公共汽车的线路总长相当于铁路线的总长；还可以引用汽车运输企业运送了多少货物的材料。这是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庞大的体系！你们即便是出于礼貌，也该写上：“私人资本主义的铁路、商业马达和水路运输业”。

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推迟通过这个草案，但是它是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再加工的——这是清楚的。得到的印象是，这个草案受到了很大的“改装”，对它的工作不仅是作家动了笔，而且还动用了剪刀，做了粘贴、拼贴，等等。但是，无论对这样的材料进行加工是多么不愉快，一个好的文学工作者应该争取让整个文件成为统一的一块，要让作者的情绪不致发生摇摆，但是这种情绪是忽高忽低的，最终是在下滑。需要做到的，不是靠卡尔·马克思建立起来的高涨，而是要靠文件的整个创作思路的升华，最终达到最高的高度。

〔主席：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有一个声明。〕

**曼努伊尔斯基**：昨天我在结束的时候犯了一个倒霉的错误。我拿来了速记稿，读一读关于德国党内状况的那一段文字：“关于这一点曾有过俄罗斯代表团政治局的决议，而俄罗斯代表团在一定意义上谴责了埃韦特集团”。同志们，当然这样的决议未曾有过，有的是完全另外的东西。根据来参加扩大会的德国代表团的主动建议，召集了俄罗斯政治局和德国代表团的会议，讨论了在党内出现的某些内部裂痕。



克维林:这是很大的差别。

曼努伊尔斯基:正是由于这样,这个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而且为了不造成错误的印象,像洛米纳泽同志说的那样,好像这个决议把布兰德勒集团和台尔曼混淆起来,放在一个篮子里,我现在宣读一下这个决议:“1. 承认右的危险……(读\*)和吸收他们参加领导工作。”由于这是我犯的错误,请允许我把涉及这个问题的那一段话从速记稿里删去。

斯大林:这个决议是谁签的字?请把名字念出来。

曼努伊尔斯基:台尔曼、列梅列,然后是埃韦特、东克尔、诺伊曼、格尔哈特、布哈林、斯大林、托姆斯基、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米高扬、皮亚特尼茨基。

李可夫:请允许曼努伊尔斯基根据他的声明改正自己发言的文字。没有反对意见吗?

喊声:对。

(休会)]

---

\* 决议的文字在速记记录里没有记录下来。——编者注

## 第四次会议

7月5日晚间

**主席(李可夫):**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发言,下一个是洛佐夫斯基同志。

**奥新斯基:**请您读一下我的声明。

**主席:**为了在以后针对奥新斯基同志的讲话发生的辩论不致出现某些情况,我来读一下他的声明。

“请宣读以下内容。我的措辞有不准确的地方,同时还有一个思想,今天说到了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和商品以及货币的范畴一样,还会保留工资和利润的范畴,这个思想也不准确。

后两个范畴的确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前两个范畴则只是形式上存在。它们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和直接的生产者相分离和生产资料变成资本——已经消失了。它们(工资和利润)的形式继续存在——一方面是因为生产参加者在社会心理上还没有适应新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商品交换和用货币结算还在继续。

联系到这一点,在罗列新经济政策的经济形式(‘经济联系的市场形式,货币体系’)的时候不能加上‘工资’这个词,而只能加上‘工人参加被分配的产品的货币形式’。奥新斯基”。

**主席:**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发言,下一个是洛佐夫斯基同志。

**斯克雷普尼克:**首先我应该声明,我们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工作人员显然需要放弃我们提出的建议,这个建议原来要求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不要基本通过已经提出来的纲领草案,把它提交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下一次扩大全会上批准。我想,需要放弃这个建议是由于以下的考虑。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在代表大会前的一个半月公布纲领草案不是特别正常的。而我们在西方国家,在欧洲的和美洲的各个党里,几乎都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如果那里有过什么的话,那我们并不知道。由于是这样提出来的,是不大正常地提出这

件事的,在这些党的这个讨论中完全没有相互的经验交流。这是需要责怪我们的共产国际的领导的。但是同时,同志们,必须承认的是,布哈林同志说到,再继续拖延通过纲领已经是有害的了,这的确是对的,因为如果推迟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扩大全会上去批准,那将在客观上等于代表大会没有接受这个纲领。

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我提出的并根据我的建议由乌共(布)中央全会通过的建议说,由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并基本通过这个纲领草案,转交到下一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批准,这是错误的和不正确的。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虽然我想到的问题是实质性的和重大的,但我没有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谈出来了,我只涉及其中的一些。首先,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我不认为纲领草案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提供的措辞是充分的和清楚的。为了看到这种情况,可以比如说读读这个措辞中的这样一个地方。例如,在55页的最后一段里说:“在有相应的领导和保障对农村里跟着无产阶级专政走的劳动阶层影响的条件下”。

这种表述不能认为是比较成功的,特别是我们有了列宁的说法,譬如说,他曾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sup>89</sup>

**斯大林:**您读一读第52页。

**斯克雷普尼克:**我现在就读,列宁说:“……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建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建立的联盟。”

在纲领草案的第55页上的一个措辞里,把农村的劳动阶层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了。这样的对立是不对的,不正确的;它应该改变,更何况在其他地方是没有这样的措辞的。它需要改变。

就在斯大林同志向我指出的第53页上,说到了以下内容:“共产党对农民的任务在于依靠农业无产阶级,把农村所有受剥削的劳动阶层都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在严格区分农民中的各种不同集团和考虑它们占有的比重的情况下,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应该千方百计支持农民中赤贫的和半无产阶级的阶层,把一部分地主的土地给他们,让他们能更轻松地和高利贷资本斗争,等等。接下来无产阶级应该中立农民的中间阶层和积极地回击与地主结成联盟的农村资产阶

级的任何进攻”。

在我读到的这一段的开始,在第53页上,说到共产党的任务是“依靠农村无产阶级”。既然我们面前有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这样一来,在这里农业无产阶级就分出来成了单独的范畴,他与其说是变成了我们活动的主体,不如说是变成了客体,——而它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然,在这方面我们有列宁的指示,他说:“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原出拉丁文的、历史哲学的科学用语译成普通的话,它的意思就是: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和总之是工厂的产业工人,才能够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第16卷第248页)<sup>90</sup>

相应地,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轴心、基本载体是工业无产阶级。但是他要实现自己的专政就不仅要依靠,而且要吸收农业无产阶级参与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这个草案给出的各个措辞不够准确。

第二,在整个草案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表述说到了生活中发生的这些辩证的变化——在非常不同的时间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要把非常不同的劳动人民和被压迫者的各个阶层都包罗进去。一个地方也没有。但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表述在这方面是非常充实的,细致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各个不同时间变化着的各种辩证的内容,只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基本的、决定性的和推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是工业无产阶级。

第二个意见。这里在第54页上说到了以下的任务:“无产阶级应该中立农民的中间阶层和积极回击来自和地主结盟的农村资产阶级的任何攻击。随着自己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无产阶级应该从中立的政策转向直接和中农群众结盟的政策,但是绝不能转向任何分割政权的观点”。

最后说的话无疑是正确的。无论是什么规模的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能是意味着,而且无论如何也不是任何程度的分割政权。但是对于中立和向联盟转变是需要做出解释的。纲领草案的最后一部分的标题是“共产国际的战术和战略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在第79页上说道:“进一步争取广大的农民阶层和中立中间集团具有重大的意义”。

由此而来的是,对于我们正在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但还没有争取到它的时期来说,我们对农民的任务是中立他的中间集团。在关于另外的时期,在我们说到我们的最终目标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从中立农民的中间阶层过渡到随着巩固无

产阶级专政直接和中农群众结盟的政策。

在我们这里发生过的,是按时间顺序从一种形式的政策向另一种的过渡,但是我想,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说,这是一种共同的和都必定要经历的过程。这样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在我们苏联,我们开始是坚持中立农民的中间阶层的政策,后来,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我们转向了和中农群众直接结盟的政策。但是这样把我们的关系转移到世界目标上去,转移到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去,在我看来,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和错误的。我可以指出的是,有这样的国家,那里有着另外的对应关系,而且不仅仅是有着中立中农集团的政策。

我要指出的这些国家是新出现的、小的帝国主义强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希腊和南斯拉夫,在那里,除了总的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压迫外,还要加上小的掠夺者对被吞并的土地上的居民的民族压迫。在这里,我们能够得到的和现在有着的,是另外一种对应关系。在领导这些国家的民族斗争、民族运动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是和可以是带领着中农阶层进行反对民族压迫和经济压迫的斗争。所以在这里必须要改动措辞。

接下来我有一个不大的意见。在第85页上有这样一个地方,在说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时候,指出的任务是:“共产党有义务进行和外国帝国主义最勇敢和彻底的斗争”。

这是正确的。可是接下来说的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把工人和农民组织成独立的组织”。这样说就不对了,因为不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要组织,这不是一个附带的任务,它是共产党最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把工人和农民组织到独立的组织里。可是草案说的是必须“在这样做的时候”组织,也就是说在进行反帝、争取摆脱本国和外国帝国主义等等斗争的工作的时候。只是“在这样做的时候”,要把工人和农民组织到独立的组织里——这种表达是不对的。显然这是可以用编辑的匆忙来解释的,也需要通过编辑的办法改正。

然后要说的是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意见,这里在民族问题上要做一些补充。这很好,布哈林同志正像他自己说的,没有什么可反对的。

**斯大林:**反对什么?

**斯克雷普尼克:**这很好,布哈林同志不反对就民族问题加进一些补充。但是,布哈林同志,光说不反对太少了,需要的是要么赞成,要么反对。而您的这种态度,您的这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态度,不是特别合适的。请您在这个问题上把牌亮在桌上,痛快地说说,您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认为的。文化革命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是在所有问题上都

像布哈林同志说到这个问题时那样,认为没有地方可以说它。如果您能找到地方指出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要培养出各自的专家来,那您怎么就找不到地方说文化革命,说对人的完全重塑、关于对他的重新改造等等呢。

布哈林同志说,关于民族问题说的不够是因为地方不够,不可能再加长了,这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和不正确的托词。在民族问题这样的问题上,是不能持这样的观点的,说这样做就会太长了,多余了。从以下的情况就可以看出,这并不是多余的。这个纲领的一系列地方说到,“民族因素具有决定性意义”,“革命的过程将包括了民族战争和殖民地革命时期”,等等。既然您说,在准备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民族战争是必不可少的和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民族因素具有决定性意义,那么就请指明吧……

**斯大林:**而殖民地就和民族问题没有关系吗?

**斯克雷普尼克:**殖民地问题在亚洲和非洲等地有,但是在欧洲,不过只是对个别国家能说存在着殖民状态,但是不能说就是殖民地吧。

就拿南斯拉夫、希腊、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来说吧。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民族问题在那里的意义了。

如果我们在纲领里说到“民族战争和殖民地革命时期”,那就很显然,就像玻璃一样透明,民族战争是一回事,而殖民地革命是另一回事。当然就需要指出民族问题和它的意义了。也必须说到我们在这方面的策略了。要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是有着许多倾向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和有害的倾向。必须让纲领能对这些有所规定。

纲领向帝国主义国家提出了关于承认殖民地有分离的权利和宣传这种分离的权利,也就是“宣传殖民地独立于帝国主义国家”、“承认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保卫自己的权利”,等等,进行起义和革命战争的权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传播和积极支持”这种保卫的权利。我们在殖民地问题上给出了这样的指令并以此指出了我们的共产党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策略路线。

还需要指出一条路线来,说明在民族问题上,在民族战争的策略问题上,我们的党应该怎样走下去。因为我们现在有,而且过去就已经有过,将来可能也还会有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在中欧,在我已经专门列举了的那些国家——在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希腊,我们将不仅会有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起义,可能还要有民族战争。所以我们需要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路线是什么。既然我们在纲领里指出了殖民地有权分离出去,被压迫的各族人民有权分离出去,而且从而提出了要为解放作宣传,那么我们为什么在纲领里就不能同样

指出,共产党必须想方设法让民族运动和无产阶级的运动在统一的反帝斗争的轨道上联系在一起,我看不到不能这样做的根据。

再对波兰说几句。纲领草案里说到三种类型的国家。第一种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种是资本主义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第三种是殖民地各国人民。什么样的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等水平的国家呢?草案在括号里解释说:“1917年以前的俄国、波兰,等等。”

1917年以前的俄国已经不存在。现在,在1917年过去了10年之后,在说到确定现代运动的类型时,未必需要回忆这段历史了。在1917年过去了10年之后,未必值得这样做了!

至于把波兰放到这个范畴里,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去年,波兰党的一位著名作家,也是领导人之一科什切娃同志,就因为她的倾向,从共产国际这里,也从我们的政治局,得到了十分沉重的打击。顺便说一下,她是因为在评价稳定性的问题上和在波兰面临的民主任务问题上都有偏向而受到批评的<sup>91</sup>。

而在这里,在纲领草案里,直接说到的是,波兰面临的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是在今后将面临着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过渡。而这是发生在这样的時候,在整个共产国际的全力支持下和在我们的政治局赞同的情况下,波兰共产党已经提出并且已经在直接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争取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了。

把波兰放在了第二类肯定是错误的。需要做的是把波兰从括号里删掉。俄国也需要从括号里删掉。我所担心的是,可别只剩下“等等”了。这个“等等”在草案里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将需要在这里给出的,是那些现实存在的国家,而不是10年前就被历史埋葬了的国家,属于这个范畴。

遗憾的是我没有时间了,该在这里结束了。

喊声:延长时间!

主席:您还需要多少时间?

斯克雷普尼克:10分钟左右。

主席:表决。谁同意给斯克雷普尼克同志10分钟?通过。

斯克雷普尼克:现在我想说的是第四部分末尾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到殖民地的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那个地方。这里提出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纲领是整个地在应有的高度上重复了斯大林同志去年在中国委员会<sup>92</sup>上提出的问题,好像是在那次会议上,完整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有苏联

的共产主义政权核心的条件下,殖民地如何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更好些。共产国际那时通过的决议持有的立场和做出的论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把我们和第二国际以及它的遗产彻底分开了。我们割掉的是把我们和我们欧洲过去连在一起的脐带。第二国际是白种人的国际。只有共产国际才成为了所有种族、所有肤色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国际。

就是在现在,轻视殖民地和“欠发达”国家也还是社会民主党的特点。社会民主党嘲笑说,在我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所有这些话你们都还记得:“它太不发达,它太落后,那里不可能成为奠定社会主义的领土,更不要说是第一个这样的国家了!”被扭曲了、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这样的,说是好像社会主义的起步只能是发生在具有最高发展水平的地方,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反抗最强烈的地方。去年关于中国问题通过的决议说到了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就是和这种“欧洲主义”的一刀两断,就是转向了世界的观点,确定了根据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他们的斗争中的对应关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可能性。当然我说的是无产阶级胜利的直接条件。

我认为,去年提出的决议是给殖民地国家照亮了现实情况和道路的灯塔。需要直接指出的是,中国,更不要说印度了,不是“最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在他们那里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在印度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工业无产阶级多多少少是有相当水平的,多多少少是有组织的。这样的无产阶级在中国也有,虽然现在那里对他进行了坚决的和残酷的放血,在那里,他由于国民党的打击而被削弱了。所以,我认为,纲领草案说到不是这些殖民地自己有着过渡的内在力量,可以用社会主义的道路引导自己的经济发展,而是只有外部的力量在把他们拉到这个方向上了,这种措辞不是很成功的。在像印度和中国这样已经比较发达的殖民地里,我们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它的帮助当然是有可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但是基本的动力只可能是在这个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带动这些国家广大的、已经扩大了劳动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何况在纲领草案的第四部分给出的措辞是带有了更多的附加条件的。纲领草案说:“在具有以苏维埃共和国以及他们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所体现的社会主义中心的情况下,如果是脱离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经济上接近并逐渐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工业发源地联合起来,越过资本主义这个国家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阶段,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他们就有可能得到经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他们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这样的表达方式说的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可能起到被吸引和被纳入的消极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不正确的观念。我要向布哈林同志



提一个问题:请您说说,我和您是不是对印度和中国有一点欧洲人的高傲态度呢?

**布哈林:**不是,在我们这里有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差别。

**斯克雷普尼克:**在我们这里,在中国,在印度,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没有一个国家的对应关系是能重复的,它们到处都是有差别的。但是我要提一个问题:在印度和在中国是不是能创造条件,让那里的中国和印度的无产阶级成为在那里争取自己的政治、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所有劳动人民群众的领导者呢?是可以的!

**斯大林:**一定可以。

**斯克雷普尼克:**这不是说一定就是在现在,但是这是会有的。整个问题取决于对应关系,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从哪里开始发生世界革命、起义和胜利,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但是在那里是能够创造出这样的条件的,而且如果这样的条件能够创造,那这就意味着是在为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创造条件。草案里给出的措辞是不完全的,而且照我的看法,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措辞更准确,草案的措辞是倒退了一步。

我再说一个问题。说到殖民地的时候,草案说,那里将会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升到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说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向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在说到“第二类”国家(1917年前的俄国、波兰,等等)的时候,草案给出的还是这样的措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升到社会主义革命”。我认为这个措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升”到社会主义革命——无需在纲领里使用。

**布哈林:**为什么?

**斯克雷普尼克:**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机械地上升,这可能是把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解塞了进来,可能塞进来的是一个纯粹机械的对上升的理解。

在另外一个地方你们说到了无产阶级的过渡,这里说的不是机械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提出一个口号代替另一个口号。这样,在这里,这个地方必须要改动。

同志们,我说完了……

**斯大林:**延长时间。

**A. II. 斯米尔诺夫:**他累了,够了。

**斯克雷普尼克:**我就这样结束吧。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纲领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力量,它将成为培养我们的党、我们的党进行斗争和争取无产阶级的武器。我

们必须要把这个武器磨光和去掉有些不足的地方,去掉所有不正确的措辞,为的是今后我们的外国党能够成功地运用它。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第一国际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几十年来是好多代劳动人民的斗争的旗帜。这个纲领草案将对数亿劳动人民群众具有同样的意义。

**主席:**洛佐夫斯基同志发言。下一位是米柳亭同志。

**洛佐夫斯基:**共产国际的纲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它不仅是为数百万共产党人准备的,而且也是为数百万革命的和正在革命化的工人准备的,所以对这类文件必须提出很高的要求。这个纲领应该成为数百万人的案头书,所以我感觉必须提出某些改正的意见,它们可以改善这个草案和在保留纲领本身理论的正确性和政治上的可靠性的同时,把它变得更易于接受。

我想涉及的是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纲领的结构;第二个是纲领中的缺陷;第三个是某些不正确的措辞;第四个是纲领本身的某些矛盾。

首先关于结构问题。第二部分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革命第一阶段”的标题下,包括了几段评价社会民主党的文字,会让人产生奇怪的印象。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得到了非常鲜明的评价,但是可以这样说,它是出乎意料地在这一章里出现的。另一方面,其他在世界工人运动中存在的或者力图影响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意识形态思潮是在第四部分“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里谈到的,也是有几个段落,说的是建设性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我觉得,所有和改良主义有联系的(建设性的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同一个改良主义的变种),——所有这些都应该放在一个地方,那样,对世界上的所有这些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变种和细微差别的评价本身就会鲜明得多了,而且工人也更容易接受,因为评价不是零星地散布在这个纲领里了。除此之外,在许多地方是顺便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工会等等做出了评价。所有这些应该集中到一个地方。

**斯大林:**那法西斯主义也同样吗?

**洛佐夫斯基:**干嘛提法西斯主义呢?不是,这里说的是改良主义,谁也没有否认建设性的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所有这些是同一个改良主义理论和改良主义实践的意识形态变种,所以把对改良主义的评价分割成一个个的小块是不合适的。

接下来也是关于结构的问题,完全没有料到的是,在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第四部分里给出了几行话,说到了工会运动,这一段说的是工会,不知怎么突然就连到了评价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确立

了无产阶级专政后各个阶级的重新改组。

纲领里缺少什么呢？纲领里缺少的是单辟一章，对改良主义做出评价，大体上可以取名为“改良主义的根源和改良主义影响群众的原因”。如果说我们在纲领里有对改良主义、社会民主党的背叛非常出色的评价，而且指出了日期和提到了国家的话，那么在这个纲领里却没有——而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缺陷——这个纲领里没有一段或者几段是向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说到或者是解释为什么改良主义还对相当多的各阶层工人有影响，而这种解释是绝对必要的。布哈林同志在自己的报告里只是部分涉及了这个问题，但是这种对改良主义影响群众的原因的解释应该在纲领里占有位置，否则就会是，我们对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叛卖等等有很好的政治上的评价，但同时我们又有缺陷。否则就不清楚了，为什么这个极其恶劣的社会民主党有过这么多次的叛卖，还有一系列国家的数百万工人在跟着它走。

除了布哈林同志指出的那个或者那些个别的原因外，改良主义对群众有影响的根本原因何在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工人阶级同时既是资本主义的创造者又是它的破坏者，而且这两种基本的趋势就反映在改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中。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因素，同时又是它的掘墓人，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地位，是改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工人群众有影响的首要原因。

**布哈林：**由此得出的是，改良主义在所有条件下都将是有力量的。

**洛佐夫斯基：**根本不是这样的。由此得出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积聚或者是在资本主义已经积聚起来的地方，在那里肯定是社会民主党会有所加强。战争等等的毁灭性影响在绝大多数国家导致了共产党的诞生和共产国际的建立。我认为这里的联系是非常清楚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和研究得很少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共产国际的纲领是唯一需要对改良主义为什么会群众还有影响做出回答的地方。

还有一个缺陷。共产国际的纲领没有充分评价共产主义的载体、历史的主体和应该建设新世界的人，也就是工人阶级，他在纲领里没有得到对自己的评价。我们有对个别的意识形态流派的评价，但是我们找不到总的对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结构、他的状态等等的评价。这个历史的主体——共产主义的载体应该改造世界，他应该在共产国际的纲领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必须对整个工人阶级，对他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和在国际范围内建立的组织有一个评价，只要那时才将能看到，在历史的进程中，工人阶级是怎样建立自己的组织的，他在实践中是怎样行动的，他是怎样前进和走向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

关于工会的问题在纲领里反映得最差,而且完全没有联系到那十年的斗争……

**布哈林:**在什么地方?

**洛佐夫斯基:**你看第54页,在那一段的末尾。和共产国际的那种经常性的、各个方面的、日常的、顽强的工作完全不相适应,这些工作是在全世界争取工会,争取它们的革命化,是要把这些工会变成摧毁资本主义的机关的。

在这里,在这部分里,说了什么呢?我现在来读读,你就能看到这是如何不够的了。

**布哈林:**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后。

**洛佐夫斯基:**为什么工会直接放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部分里,而且是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放在了一起?这里说了什么呢?我现在读读这一段说到过渡时期的纲领的地方,接下来是这样说的:“在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所有这一切任务的时候,群众组织,首先是工人组织的任务和职能在发生激烈的变化。把最广泛的无产阶级各个阶层第一次有组织地团结起来并让他们受到教育的群众性工人组织——职业(生产)联盟,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罢工斗争的基本工具,而然后便是对托拉斯化的资本和它的国家进行斗争的基本工具”。

我认为,这个措辞是不够的。说工会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罢工斗争的主要工具够不够,这意味着什么,完全不清楚。接下来说的是:“它们是反对托拉斯化的资本的群众斗争的工具”。什么样的斗争?任何罢工都是斗争,任何游行也都是斗争,任何行动还是斗争,而我们在这里需要说的是,在转折时期,在推翻资本主义时期,工会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作用是什么。

**布哈林:**所有这些在别的地方是有的。

**洛佐夫斯基:**请原谅,在别的地方并没有说到这个。

**布哈林:**在第78—79页。

**有人喊:**洛佐夫斯基搞混了。

**洛佐夫斯基:**没有,没有搞混。在布哈林指出的那几页上没有需要的东西。

**奥新斯基:**这不是您的过错,可这是您的灾难。

**洛佐夫斯基:**我认为对工会问题应该有单独的一章和更详细的评价,说明在斗争的过程中改良主义把工会变成了什么,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把工会变成什么。

现在我请你们注意几个提法,我感觉是完全不正确的。在第16页上,倒数第二段,第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它的发展和注定灭亡”,有这样

一句：

“对应着有强大组织的金融资本势力，组织起了两个主要的、有组织的力量：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另一方面是被外国资本的压迫所压抑的殖民地的人民群众（所有这些是对的，但是你们听听下面的！），在宗主国的革命无产阶级运动领导和左右下。”

难道殖民地的人民群众是在宗主国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左右下吗？这是不对的：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不是在宗主国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左右下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是说中国的革命是由英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领导的吗？

布哈林：共产国际有一些领导。

洛佐夫斯基：就是嘛，应该说共产国际，而不是宗主国的无产阶级。共产国际至今一直没有被叫做宗主国，苏联也没有被称为宗主国。这一点过去不对，现在不对，将来也不对，所以它应该改过来。说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是在宗主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是不对的。殖民地是在以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下，但是无论如何不是在宗主国的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下的，因为在这样的措辞中，苏联、联共（布）、共产国际就作为领导的因素消失了。

第22页第二部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和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在最后一段里说到革命战斗第一次浪潮没有成功的原因时，对这些原因是这样评述的。

“这些失败首先是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和工会运动的改良主义首领们的叛卖政策造成的，也是共产党人的身后没有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以及在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国家没有共产党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

我认为这里需要颠倒一下顺序。失败的基本原因当然不是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叛变，而是没有共产党。在这样的结构里得出的是，首要的原因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领袖们的叛变和除此之外还要加上没有共产党。我认为这里应该是另外一种对应关系：应该从没有共产党开始，我们没有能带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而除此之外还有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叛变。照我的看法，这样将更正确些。

斯克雷普尼克：不对。

洛佐夫斯基：现在来说一说矛盾。我觉得布哈林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很好地证明了在土地国有化问题上有必要保留多少比较一般性的提法，不采用勉强立即在所有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的那种提法。可是结果怎样呢？

关于土地国有化有两种提法：一种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布哈林同志

所说的那种形式,也就是多少要慎重一些;另一种提法是在事情涉及殖民地的时候:那里的提法是完全肯定的和绝对的。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那里有强大的无产阶级,在许多国家,农民是处于少数的,布哈林同志对那里说的完全正确,需要非常谨慎地对待所有土地,也包括农民土地的国有化。而在殖民地,那里的无产阶级阶层薄弱,有着上亿的农民,那里的公式就简单了。在第62页上说得很绝对和简单,没有任何缓冲的限制词:“所有土地的国有化”。可能也有农民的土地。我认为这里无疑是有矛盾的。

布哈林:一点也没有,没有任何矛盾。

洛佐夫斯基:结果是怎样的呢?根据这样的结构,结果是在农民占绝大多数和无产阶级阶层很薄弱的地方实行土地的国有化要轻松些,而在那样一些国家……

布哈林:问题不在这里!

斯大林:读过纲领或者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提纲吗?

洛佐夫斯基:当然,当然读过!请看关于殖民地的部分,第62页,第5点:“没收地主的、寺院的、教会的土地,对所有土地实行国有化”。

斯大林:那为什么在那里没有立即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全部私有化?显然国家与国家之间是有差别的。

洛佐夫斯基:布哈林同志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我想,殖民地也是同样需要的。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这里应该有同样的措辞,因为在殖民地进行所有土地、农民土地的国有化的时候,困难要比在有着强大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得多。

布哈林:这可是需要证明的。

洛佐夫斯基:好,再给我5分钟。

主席:没有反对的意见吗?没有。

洛佐夫斯基:是这样的,为什么正是对中国或者对印度要实行所有农民土地的国有化,为什么在这些国家实行农民土地的国有化要比在老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困难呢?首先是共产党在一个国家要依靠的是谁。我们在这里说到了直接夺取政权的时期: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直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在像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国家,在最近时期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和环境轻松一些呢?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德国、美国),既然问题在那里是夺取政权,——而这只有在大多数无产阶级将在我们一边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几千万的无产者将被卷入直接的斗争。和无产阶级薄弱

得多的阶层的国家相比,这几千万的无产者不仅是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的作用,当然,就是农村有产分子可能做出反抗,也可能被很快地摧毁掉。无论是纲领还是布哈林同志的报告,都没有能证明,在对待殖民地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国有化时,必须要有不同的方法。我认为,就是在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情况下,在殖民地国家里,农民土地的国有化也将是一个比在像德国这样的国家里更困难的过程。

**布哈林:**照你的说法,农民土地的国有化在德国要比在俄国轻松了!

**洛佐夫斯基:**如果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赞成我们的主张,是会更轻松些的。最后一个意见。这里有一部分说到了发达的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我认为,既然有这样的一个部分,就必须在这个部分里也说到,不仅是暴力制度和国家本身将会消失,作为阶级工具的政党也将会消失。

**布哈林:**如果阶级将要消失的话,那政党怎么能不消失呢?

**洛佐夫斯基:**这一点应该说上。我想,您不是在为自己写这个纲领。这个纲领是为整个地球的成千上万的人写的,在这个问题上写清楚不仅不会对苏联以外的那千百万人,而且也不会对苏联内部的那些人有害的。

这就是我想对纲领草案提出来的意见。

**主席:**米柳亭同志发言。

**米柳亭:**我不谈我们要通过的纲领的意义了,我不过是想表示同意在这里,从这个讲台上说到的有关这个文件伟大意义的那些声明。第二是,这个纲领不是匆忙写出来的纲领。我们用了非常长的时间对它做了准备,研究了它,等等。我对理论方针没有意见,但是我想,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对这个纲领都应该提出两个基本的要求。我不记得,好像是斯大林同志——我不记得是谁了——确定了纲领是工人阶级和我们党的行动指令。对纲领是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做这样的评价的。我要重复说的是,我同意纲领里对所有问题的理论解释,它没有引起我的任何怀疑。但是这个纲领应该是行动的指令。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要求是针对形式本身的:这个纲领应该写得简单、清楚和融会贯通。

**托姆斯基:**还要漂亮。

**米柳亭:**我不会这么说。我要说的是,为了纲领的发展逻辑,为了它的简单和明了,可以牺牲漂亮和美丽。

**托姆斯基:**还是漂亮些更好。

**米柳亭:**可能吧,但是基本的要求是我所说的。

关于第一个要求,不得不说的是,同志们在报刊上已经指出了,——那就是

这个纲领草案太偏重理论了。这是指什么呢？是说在一系列关于行动的问题上，问题被定义取代了。我只举两个情况。当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打开这个纲领的时候，他要寻找的是对像工会这样的问题的指令，如果是一个外国的共产党员，那就更是如此了。

**托姆斯基：**对。他是要寻找答案的。

**米柳亭：**他要寻找的是答案、行动的指令。但是如果领导工会国际的洛佐夫斯基在读这个纲领的时候都搞糊涂了，而在我看来，他的的确确是搞糊涂了，这是没什么可争的，因为他没有找到在什么地方说到了这一点，布哈林同志是对的，是在第78—79页上说的。

**布哈林：**每一个部门都会提出有利可图的要求的。

**米柳亭：**如果工会是一个部门的话，这就不是正确的态度了，因为这是一个群众组织，问题在那里会提得最为尖锐，共产党在那里犯的错误的也是最多的。如果把工会看成是一个部门——这是不对的。这里，在第54页上，你们只有三句话说的是这个定义——是不完全的，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完全，所以是不正确的。

人们都说，一般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会是群众反对托拉斯化的资本的基本工具，可是在我们的这种条件下，这难道是正确的定义吗？譬如说，可以这样对待所有美国的工会，对待所有英国的工会吗？这是不对的。这会把人引入迷途的，而这里的每一个词都是应该斟酌的。我的看法是，这里应该给出一个评价，第78—79页上所说的东西需要展开来谈，需要有所发挥。伊里奇曾教导过我们，需要怎样做这件事，而且我们的英国同志们比任何人都更知道这一点。

第二个问题——就拿合作社来说吧。对消费合作社这样极其重要的地方简直就只是说了一行半，就是那样，说的也不是消费合作社，而是工人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这样的事情给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它将是分配机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接下来草案就转向了农业合作社。在纲领里，伊里奇的整个合作社计划实质上就没有能够得到反映。关于合作社，这里应该有单独的一部分。应该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合作社和当代的合作社有一个评价。这里正确地说到，在一系列国家，合作社是从属于金融资本的，合作社是有阶级性的。但是我要再说一遍的是，如果我们不是为自己写，不是为红色教授学院<sup>93</sup>写，而是为成千上万的人写——不要说是中国人了，就像布哈林举的例子所说的，他们都搞糊涂了，但是甚至是为外国的共产党员写，——他们也不可能在这个纲领里为自己找到行动的指令。我的看法是，应该成为行动指令的那些部分需要有所发挥、需要展开来谈。布哈林说到了这一点，他自己承担了这样的义务。那就请



你们做出这样的诺言吧；纲领里没有给出这方面的内容。

对于形式，我有以下的看法：我个人注意地读了这个纲领，而且应该说，纲领读起来很困难，而且我想，我在这里表达的是大家的意见。我想，我在这方面不是一个例外或者是抱有某种成见的人。纲领读起来很困难。我想，这里给出的不是行动的指令，而是一系列的定义，是有意思的，可贵的和需要的，但是还是在理论文章里，在其他地方这样做吧，而在这里你们该给出的是纲领。

然后是我想说的最后一个意见。的确，纲领写起来不简单；所以希望从便于阅读的角度再注意看一看，不是从红色教授的角度，而是从我们共产党员，从中农的角度出发，再对它加加工，就不用说甚至是从非党工人的角度出发了。就是说，应该从这个方面把它再顺一遍，不仅仅是为了我们，因为对于除了我们以外的人们来说，它也将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我想提的意见。

主席：伊克拉莫夫同志，下一个是瓦尔加同志。

伊克拉莫夫：我想只就殖民地问题谈几点意见。虽然这个问题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是日程中的一个单独问题，但是有几个基本的方面，在纲领里还是应该说得更清楚些，因为我们在殖民地问题上看到了我们的一系列缺点，有时还有对一些问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这说明我们对这个问题本身注意得少了。

昨天洛米纳泽同志在这里说到印度尼西亚时，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发言辩解，印度尼西亚的同志们由于在新加坡被逮捕了，所以耽搁了几个月，因此他们没有来和及时研究关于印度尼西亚的问题。这不能说明问题。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蒙古的问题。不久前蒙古同志在这里抱怨说，在蒙古问题上犯了错误。对印度也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来。1921—1922年工作有了一个高潮，当时的规模很大，在那之后，在第二、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共产国际没有能足够地研究印度问题。而后来由于有了新的罢工，大约5个月前，共产国际又重新着手研究印度问题了。

这些事实说明，现在需要更深刻地提出殖民地问题，而且基本的方面需要写进纲领。现在接下来，如果你拿到纲领草案，那么可以看到的是，分析只是从宗主国的国家发生的这种进程角度出发的，这里没有分析殖民地国家发生的进程，没有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就拿资本输出来说吧；这里说到，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资本输出。这是对的，但是这种资本输出在殖民地是不是改变了局势，是不是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创造了另外的条件呢？当然创造了，因为资本输出创造出了工业，创造出了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在那里创造了帝国主义的掘墓人，我们基本的支撑力量。

问题的所有这些方面在这里都没有清楚地得到强调。所以我认为,需要把这些问题加进去。接下来,这个纲领没有清楚地说到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中,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支持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因为这个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还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提出了这个论断,而且我们至今是根据这个论断工作的。五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在一系列国家——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部分地在埃及发生的那些革命运动的经验,给了我们新的、非常有价值的材料。所以我们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来。要知道,1918年、1920年、1921年是在东方所有国家都可以看到革命高潮的年代。那时,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更积极地跟着民族解放运动走的。现在不是那种情况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系列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背叛民族解放运动。当然,纲领的第17页上说:“同样,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这里写到了这一点,但是这里对这个民族资产阶级是怎样叛变的却什么也没有说,对这样的叛变有哪些经济依据和哪些经济上的解释,——关于这一点,这里也没有说。

昨天我们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同志们把它归结到印度身上了。曼努伊尔斯基同志不是分析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而是把一切都归结为那里有无产阶级,我们在那里应该建立共产党。我们到处都是在争取建立共产党的。但是这还不够。正是现在,我们作为有经验的、有着相当多的经验的领导人,应该对他们该如何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打交道提出一个路线来。我们在这里应该不仅是提出印度资产阶级的的问题,而且还要提出埃及和中国的资产阶级问题。难道埃及的资产阶级,难道这个资产阶级的头目柴鲁尔总督,是一贯跟着民族解放革命走的吗?不是,他并没有跟着走。

我们在一些国家看到的,是民族资产阶级背叛民族解放运动事业。对这个事实,对背叛的事实,应该有解释。我想,在这里可以做出以下的解释。我们知道,殖民地国家里的商业资本、它的意识形态和它的领导,是不可能走到底,走到民族解放革命的最终结束的,它们不可能彻底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的封建主义的斗争。这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是这样的,一方面它是宗主国和自己国家被压迫的农民之间的中介;另一方面它有时是封建主和自己国家的农民以及宗主国的资产阶级之间用原料交换工业品这件事上的中介。这个资产阶级就像1905年的俄国资产阶级一样,是不会走到底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是不可能跟着革命走到底的,它跟着这个革命只能是走到一定的程度,为的是使得它能有更广阔的活动天地。这是第一。

第二,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因素,这就是我们苏联的存在。在苏联,随着在原来的沙俄殖民地结束了民族解放革命,这样的革命正在或者已经部分地上升到了社会主义革命。这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吓坏了,这个因素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因为这是把这些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吓坏了的事实之一。从这点出发,还是不能说在所有的殖民地国家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革命的因素已经完全耗尽了自己。这样提出问题是错误的。这将是一个非常片面的评价,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印度、埃及的资产阶级背叛的同时,在其他国家,资产阶级却是迈出了坚决的一步,走上了民族解放的反封建的革命:基马尔主义<sup>94</sup>就是一个例子。基马尔走出了这一步,我们支持了他,因为他是在反对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基马尔现在更多的是在和土耳其的无产阶级斗,而不是同帝国主义斗。在中东,现在关于基马尔主义的各种问题就像是一种压倒一切的思想。如果你们看看阿富汗的或者波斯的资产阶级,那他们所有的目光都是朝向基马尔的土耳其的。阿富汗的改良主义者明显是信仰基马尔主义的,由于有了他们,阿富汗和基马尔的土耳其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所以在我们的纲领里,在解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的背叛作用的同时,我们应该一定要提出基马尔主义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想说说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相比,纲领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向前迈进一步,而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着非常多的经验的。我们把所有的都照抄下来了,而且布哈林同志也说了,我们是把这部分重新抄下来的。所以我感觉我们应该深入下去,因为这个文件一方面领导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运动的武器;另一方面它又是我们基本的宣传文件。所以,我们应该一定要强调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今天当我和布哈林同志交谈的时候,在私人的交谈中,他说,都说我们的纲领有很浓的俄罗斯味道,非常像是按照俄国的方式编写的。在一些问题上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不管怎么说这个纲领是俄国味的,我们还是要把它保存下来,因为十月革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革命,它的经验是大家都要学习的。就说在我们苏联的十月革命吧。当纲领里说到三类国家:高度资本主义国家、半农业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时候,我们苏联就是所有这三个类别的结合。它的个别部分,譬如说中亚,等等,不仅是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而且我们在那里还最终结束了民族解放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我们在那里摆脱了殖民压迫,解决了土地问题,我们在那里彻底消灭了封建经济、封建主义的残余。所以如果我们一方面在这里给出了我们苏联的经典类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有殖民地

革命的经验,把这些落后的国家拉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资本主义在那里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我们有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把这些国家拉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所以这个经验,苏联的经验,一定应该在这里强调,而且让我们其他的兄弟党来学习这个经验。

这里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方面的遗嘱,不是遗嘱,在这里是一定的指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了以下的话:共产国际应该确定——我记得不准确,只是凭记忆,——共产国际应该确定并从理论上论证,借助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落后的国家可以走向苏维埃制度和经过一定的阶段,越过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基本的思想大体上是这样的。纲领也没有完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个基本指示。所以我也认为,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应该从所有方面,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在我们苏联的经验基础上,在我们的纲领里得到阐述。

主席:瓦尔加同志发言,下一个是斯大林同志。

瓦尔加:我在开始时有一个请求,如果我讲的东西你们觉得不正确,请不要妨碍我。我的俄文说得不好,而且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演说家,我做不到当场就回答反对的意见。

我想涉及一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关于无产阶级在专政开始时的政策问题。

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关于战时共产主义。我想,关于这个问题,纲领草案里写的——“关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是不正确的。我认为,任何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会有战时共产主义。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在代表大会上详细讨论,因为虽然首要的任务是夺取政权,但是就像匈牙利专政的可悲经验所表明的,政权也可能会丢失。同志们,我上百次、上千次地思考过,我们那里是怎样把我们相当坚定和牢靠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政权丧失的。虽然有50%以上的原因不是取决于我们的,但是总还是有30%—40%的原因是我们不好的政策造成的结果吧。我现在是在专政垮台了之后承认这一点的。所以不能让外国的同志们从纲领中和对纲领的解释中得到一种印象,认为他们应该无论如何也要避免战时共产主义。我认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如果无产阶级专政是被孤立的,就不可能避免战时共产主义。如果我们具体地想象一下,如果有可能在德、法、美等等国家夺取政权,那将是怎样的局势。我们大家都知道,列宁曾写过,什么是迫切的革命形势所需要的。列宁写道,需要在资产阶级中间发生深刻的危机。但是深刻危机只可能在经济危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这就是说要有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工人们已经生活得很差了,等待着共产党人在夺取了政权之后立即就会改善他们的状况。虽然我们也知道,现在,在夺取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不可能提高工人阶级的状况,但是我们如果只是依靠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没有跟着我们走的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我们是战胜不了资产阶级的,而工人群众跟着我们走是因为他们想,他们的状况将能直接得到改善。

接下来便是,在这些国家怎样才能夺取政权呢?我想,在俄国或者在匈牙利夺取政权和比如说在德国、法国、英国夺取政权,有着几个重要的区别。首先是历史的差异。资产阶级现在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什么。有经验了。在俄国当时还没有这一点,在匈牙利也还没有,现在——我不知道俄文怎么说——*überrumpeln*……

布哈林：“措手不及”\*。

瓦尔加：就是这个措手不及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首先是在匈牙利。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差异是这个阶级，中农，在俄国几乎是一个决定性的阶级，而这个阶级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几乎就不存在，或者说，这可以说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算不上很大的阶级。

请允许我给你们引用几个数字。比如说德国。在德国，农民不超过200万人，加上家属也不超过1000万人，但是工人有1500万。所以，一个在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摇摆的阶级在俄国有几千万人，而在那里几乎就不存在。现在说说质量。德国的农民不是像俄国或者说是亚洲这样的农民。德国的或者美国的或者法国的农民大多数是小资本家，这不是为自己干活、经济的商品部分只占20%的农民。在美国，农业的商品部分占有80%以上，我们这种意义上的农民根本就不存在。那里有小农业资本家，就和其他领域里的资本家一样干着工作。所以我说，资本家以及可以说是他们的尾巴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区分要比在俄国或者在匈牙利尖锐得多。这个可以拉到工人一边也可以拉到资本家一边的阶级，在俄国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

在无产阶级要夺得政权的时候将会是怎样的情景呢？将会是这样的，只有通过国内战争才能得到政权。在夺得了政权之后，我们将有的状态是，工人阶级将要求改善自己的福利，将要求提高工资，这是应该给的，因为在专政的开始阶段，不能和工人说：“是的，我们可能不能增加工资”。你们大家都很清楚，在专政开始的时候，生产会有所下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不值得去说的。

\* 也有“超过”、“越过”、“跳过”的意思。——编者注

**李可夫**:总会是这样的吗?

**瓦尔加**:在专政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为什么?工厂里没有纪律,工人们在骚动,那里在游行,那里又在备战,等等,最优秀的工人不得不派到苏维埃机关里去,派到前线去,派到非常委员会去,等等。

**伏罗希洛夫**:对。

**瓦尔加**:来自包围了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将是抵制,等等。当然,无产阶级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是立即就从实行百分之百的战时共产主义开始做起的。当然,应该是夺取指挥的制高点,但是当我们这里交通、银行、大工业等等已经现实地在我们手中的时候,就应该工作了。那资产阶级将干什么呢?一部分生产资料还在资产阶级的手里;资产阶级将生产和出售商品吗?不是的。为什么?不仅是因为将会有通货膨胀,——因为它想要把政权从工人手里夺回去。资产阶级还在想,这只是一个临时政府,不值得在经济上支持它。农民也将是同样情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农民将会更加自觉地和更加会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摆出自己的姿态来。所以将会是这样的:工人想要生活得好些,但是我们这里,在我们的手里将没有现实的条件。这样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当然,无产阶级政权还不得不继续走下去,把国有化继续搞下去,不得不征用粮食;应该对商人们拥有的大的仓库实行国有化,把衣服拿来发给工人;应该把资产阶级的房屋国有化,把它们发给工人,等等。于是就不管你情愿还是不愿意,必须按照战时共产主义的路子一步一步走下去。我不是说应该把每一种商业都百分之百地禁止,但是至少是要走下去……

**布哈林**:整个问题也就在这里了。

**李可夫**: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一定就需要走到战时共产主义呢?

**瓦尔加**:问题在于你们认为什么是战时共产主义?因为有这样一种危险:俄国同志们的威望,联共(布)的威望是很高的;如果纲领里是这样写的,有“可能”将会是战时共产主义,但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政策,就有这样的危险,外国的同志们就将有这样的心态了,应该避免战时共产主义,应该直接从新经济政策开始,那他们就将不……

**臧声**:怎么开始?

**瓦尔加**:〈将不会〉彻底打击资产阶级。他们将会更早地开始新经济政策,会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作为一个统治阶级被剥夺之前,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之前就开始。在这个措辞中是有这样的危险的。所以我想,这样的措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当然,有另一种危险:如果战时共产主义的思想将非常强烈,那就会把例如职员等等这样的阶层排挤掉。但是我想,第一种危险,不能把资产阶级彻底打掉的危险,是比这第二种危险要大得多的危险。我有这样的印象,在我们的专政政策中总会有这样的辩证过渡的:开始我们要求不要走向战时共产主义,然后又不得不走向战时共产主义,而且第三个阶段将是向倒退到新的进程、新的轨道过渡;照我的看法,无论是在什么地方,都不应该是直接走向新经济政策,也不应该是直接走向战时共产主义。所以,在第51页上的措辞中应该说的不是战时共产主义的可能性,而是也许要走向战时共产主义。

**主席:**现在休息。休息之后斯大林同志发言,然后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

(休息后。)

**主席:**斯大林同志发言。

**斯大林:**首先关于纲领草案的长短问题。有人说草案太长了,太累赘了。要求压缩掉一半,三分之二。要求在纲领里只给出一个一般性的公式并仅限于此,把这些公式叫做纲领。我想,这些要求是没有根据的。那些要求把纲领压缩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不明白起草纲领草案的人所面临的那些任务。问题在于,共产国际的纲领不可能是某一个国家的党的纲领,或者可以说是只是为“文明”民族而写的纲领。纲领应该把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所有民族、所有人民,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包括进去。这就是纲领草案基本的和最典型的特点。但是如果把纲领压缩一半或者三分之二,那又怎样能把共产国际所有支部、东方的和西方的、基本需要和工作的基本路线都包括了昵?让同志们试试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任务吧。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如果是把纲领压缩一半或者三分之二,那就意味着把它从一个纲领变成一个抽象公式的空名单了,这些公式给不了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任何东西。

编写纲领的人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方面要把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抓住;另一方面又要这样抓住这些主要的基本的东西,要让纲领中个别的论断不是空洞的公式,而是能给各种不同的国家和人民,给各种不同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小组提供实际的领导原则。你们该同意吧,在一个简短的和压缩了的纲领草案里,是完全不可能想象能解决这个双重任务的。

最可笑的是,就是那些建议把纲领压缩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同志提出的建议里,又有着把现在的纲领草案再扩大两倍甚至三倍的趋势。实际上如果在纲

领草案里要给出关于工会、合作社、文化和欧洲的少数民族等等的冗长的定义来,这样是不可能对纲领有任何压缩的,这难道还不清楚吗?现在的纲领草案就不得不扩大如果不是三倍的话,也是两倍了。对那些要求要么纲领是对各个共产党的具体指令,要么纲领就要能解释一切,直至它的个别论断的同志,也可以说是同样的。第一,没有人在什么时候说过,纲领就应该只是指令或者主要是指令。这是不对的。对纲领不能提这样的要求,更不要说是如果执行这样的要求,就要把纲领的长短扩大到了不可想象的极限了。第二,纲领不可能对什么,甚至对它的个别宣言性的或者理论性的论断都做出解释。为了这个原因,才有对纲领的各种介绍材料。不能把纲领和介绍材料混在一起。

第二个问题关系到**纲领的结构**:纲领草案内部的个别章节**安排的顺序**。奥新斯基同志,好像还有一些其他同志……

布哈林:米柳亭。

斯大林:〈他们〉要求把关于运动的最终目标、关于共产主义的一章,挪到纲领的最后。我想,这个要求也是没有根据的。在纲领草案里,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章和关于过渡时期一章之间,有关于共产主义和关于共产主义经济体制的一章。各章这样安排是不是正确呢?我想是完全正确的。不事先说到纲领建议要过渡到的那个经济体制,在这里就是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就说不上过渡时期。人们说的是过渡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向另一种经济体制的过渡。但是向什么过渡,是向什么样的体制过渡——这是要在评述过渡时期本身之前说到的。纲领应该是从未知的引向已知的,从不大了解的引向更多了解的东西。说到资本主义危机,然后说到过渡时期,但是不先说该向什么样的体制过渡——这就意味着是把读者搞糊涂和破坏教学法的最起码的要求,而这同时也是对构筑纲领的要求。是的,一个纲领就是应该减轻读者的处境,把他从不大知道的情况引向知道得更多的情况,而不是给他制造困难。

洛佐夫斯基同志想,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一段不应该放在纲领草案第二章里,因为那里说的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和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在这样说的時候,洛佐夫斯基同志想,他提出的是关于纲领结构的问题。这是不对的,同志们。实际上我们在这里涉及的是政治问题。从第二章里把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段落拿掉——这意味着在一个基本的问题上,在关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问题上,是要犯政治错误的。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纲领的结构,虽然洛佐夫斯基同志是从结构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而在于如何评价局部稳定时期的政治局势,在于如何评价社会民主党作为这种稳定的因素之一的反革命作用。洛佐夫斯基同志不可能



不知道,在关于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这一章里,我们不可能不写上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一段,因为不评价社会民主党作为稳定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的作用,这个稳定本身就不可能解释。不然的话,就要把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一段也要从这一章里去掉了,把这一段和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一段都放到关于政党的一章里去了。但是把关于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这些段落从解释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一章里去掉了,那就意味着解除自己的武装,使自己失去解释资本主义稳定的任何可能性。清楚的是,我们不能这样做,而且洛佐夫斯基同志自己想了一想之后,也没有下得了决心这样做。

关于新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问题。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目的是要通过利用市场,经过市场,而不是利用直接的产品交换,在没有市场和绕过市场的情况下,克服资本主义成分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即便是它们中间最发达的国家,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能不能没有新经济政策呢?不行,不可能也不应该。在不同的程度上,新经济政策、它的各种市场联系以及利用这些市场联系,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对于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绝对必要的。我们这里有的同志否认这个论断。但是否认这个论断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第一,出发点是,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好像我们这里就已经有百分之百现成的城乡之间、工业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分配和供应机构了,可以一下子就建立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不要商品交换了。只要一提出这个问题,就可以明白,这样的预料完全是冒险的。这意味着,第二,出发点是无产阶级革命应该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就立足于剥夺中小资产阶级,把安置工作和向人为产生的数百万新的失业者保障生活资料的难以想象的重担压在自己的肩上。只要一提起这个问题,就可以明白,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政策完全是不适当的和愚蠢的。而且新经济政策好就好在,它让无产阶级专政摆脱了这样的以及类似的困难。

但是由此而来的是,新经济政策是所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

对于战时共产主义是不是也可以完全这样说呢?是不是可以说它,战时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呢?不,不行。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环境和武装干涉强加给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指望的是建立城乡之间的直接产品交换,不经过市场,而是绕过市场,主要是采用非经济性的而且部分是军事性的措施,目的是这样来组织对产品的分配,要能够保障对前线的革命军队和后方的工人的供应。很清楚,如果没有战争环境和武装干涉,也就没有战时共产主

义了。所以不能说战时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在经济上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

如果想象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开始自己的经济工作的,那是不正确的。瓦尔加同志也滑到了这种立场上去了。但是这种立场是不对的。相反,无产阶级专政在我们这里不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开始自己的建设工作的,而是从宣布所谓的新经济政策基本原则开始的。大家都知道列宁在1918年初发表的小册子《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sup>95</sup>。列宁在那里第一次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原理。是的,这个政策由于武装干涉的局势暂时被中断了,只是在三年之后,在消灭了战争和武装干涉之后,才又回到这个政策上来。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不得不回到早在1918年初就宣布的新经济政策的原理上来,这个状况明显地说明了,在革命后的第一天,无产阶级专政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自己的建设工作,它应该把自己的建设工作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当然如果是从经济方面的考虑出发的话。有的时候人们会把战时共产主义和国内战争搅混在一起,把前者 and 后者重叠起来。这当然是不对的。无产阶级在1917年10月夺取政权,这无疑是国内战争的形式。但是说在我们这里是从1917年10月开始采用战时共产主义的,那是不对的。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如果不采用战时共产主义,如果不放弃新经济政策的原理,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那就是像我们在1918年初武装干涉之前的那种情况。

瓦尔加同志说,无产阶级革命将是在被孤立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没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少得了武装干涉,也就是说少得了战时共产主义。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我们做到了在苏联巩固苏维埃政权、共产党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成长起来和共产国际得到了加强之后,被孤立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不可能有,也不应该有了。

**布哈林:**对!

**斯大林:**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在日益尖锐,有苏联的存在,共产主义在所有国家成长都在壮大,这样的因素是不能不看到的。

**瓦尔加:**但是在匈牙利革命是被孤立了的。

**斯大林:**那是在1919年。而现在我们是在1928年。要想明白瓦尔加同志的论证的全部相对性和这种论证是有条件的,只要回顾一下1923年德国的革命就足够了,当时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准备直接帮助德国革命的<sup>96</sup>。

**奥新斯基:**德国被孤立的革命,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被孤立。

**斯大林:**您混淆了空间上的被孤立和政治上的被孤立。

**奥新斯基:**经济空间是有意义的,把运送去的東西给您截断了?

**斯大林:**当然,空间上的远近是有意义的。但是总还是不能把它和政治上的孤立混淆起来。而武装干涉国家的工人们,你们以为怎么样,他们在武装干涉的时候会沉默吗?比如说德国的革命不会打击武装干涉者们的后方吗?而苏联和它的无产阶级呢?你们以为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平心静气地看着干涉者们的胡作非为吗?要想给干涉者造成危害,并不一定需要在空间上和革命的国家联系。要这样做,在干涉者们自己领土上蜚他们的那些最为要害的点,让干涉者们感觉到危险和理解了无产阶级团结的全部现实,那也就足够了。比如说,我们在列宁格勒地区得罪了英国的资产阶级,给它带来了严重损失。是不是从这里就要得出,英国应该是一定要在列宁格勒向我们报复呢?不是,不应该是这样的。它可以在巴统、敖德萨、巴库或者比如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什么地方报复我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援助和支持一个国家采用什么形式,比如说对欧洲反对帝国主义干涉者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和支持采用什么形式,也应该说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对于所有国家来说,不能认为武装干涉,也就是说战时共产主义,都是绝对必须要发生的现象,那么,也还是可以而且需要认为,它们是可能会发生的。所以,我虽然不同意瓦尔加同志的论证,但是我同意他得出的结论,可以在纲领草案里用也许要采用战时共产主义的措辞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有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的提法。

关于土地国有化问题。有些同志建议改变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土地国有化的公式,要求在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天就宣布所有土地的国有化。我不同意这些同志的看法。我指的是洛佐夫斯基同志。我也不同意那些同志,比如说奥新斯基同志,提出的根本不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土地国有化。按我的看法是,最好是像在纲领草案里说的,接下来是对所有土地的国有化,补充上保障中小农民对土地使用的权利。这个最后的修改是可以通过的。

**奥新斯基:**我就是这样说的。

**斯大林:**不是,您说的不只是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

**奥新斯基:**我恰好读到了这个地方的速记记录。

**斯大林:**那更好了,但是我听到的是另外的什么。洛佐夫斯基同志想,资本主义国家越是发达,那里就越容易实现所有土地的国有化,这是不对的。相反,资本主义国家越是发达,实现所有土地的国有化就越困难,因为那里土地的农民私有制传统就会越强,可能和这种传统作斗争也就会越困难。你们可以读读列

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提纲<sup>97</sup>,他在那里直接告诫了,在这方面不要采取轻率的和不慎重的步骤,那你们就会明白了洛佐夫斯基同志所说的为什么全部不正确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农民对土地的私有制存在了几百年了,对于不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不能这样说了,那里的土地私有制原则还没有来得及融入小农的血脉。在我们俄国,农民有一段时间甚至说土地不是任何人的。

有人喊:土地是上帝的。

斯大林:这也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列宁在1906年就期待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我们这里提出了在保障中小农民使用土地的情况下实现所有土地国有化的口号,认为农民是能明白这一点并愿意接受这一点了。还是列宁1919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告诫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要马上提出所有土地国有化的口号,因为这些国家的农民身上,渗透着一种所有者的本能,他一下子消化不了这个口号。我们能不考虑这个差别和不注意列宁的指示吗?很清楚,我们不能。

关于纲领草案的**内在性质**问题。原来有一些同志认为,纲领草案就自己的内在内容来说不完全是国际性的,像他们说的,因为它带有“过分的俄罗斯”性。我在这里没有听到类似的反对意见。但是这样的反对意见原来在共产国际周围的某些人士中间是有的。

有什么由头提出了这样的反对意见呢?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纲领草案里有关于苏联的专门一章?这又可能有什么不好呢?难道我们的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民族的而且只是民族的革命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之为世界革命的**基地**、所有国家革命发展的**杠杆**、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呢?我们这里过去有些人,比如说我们的反对派分子,认为在苏联发生的革命完全是或者主要是民族革命。他们因为这个而折了腰。奇怪的是,在共产国际周围原来也有一些人准备步反对派的后尘。

就我们的革命属于什么**类型**来说,它可能是民族的而且只是民族的革命吗?但是我们的革命是苏维埃的革命,而无产阶级国家的苏维埃形式基本上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必定**的形式。难怪列宁说过,苏联的革命开辟了发展历史的新时代,苏维埃的时代。不仅是从自己性质的角度看,而且从革命类型的角度看,从这里不能得出我们的革命主要是国际性的革命吗?它不是提供了一幅景象,说明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基本上应该是什么样的吗?

无可怀疑的是,我们的革命的国际性质规定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全世

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有着一定的义务。列宁说,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要为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尽一切可能,他在这样说的時候,就是从这个论断出发的。但是从这里可以引出什么呢?从这里至少可以引出的是,我们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和工具。

同样无疑的是,不仅是苏联的革命有着并在履行着自己对所有国家的无产者的义务,而且所有国家的无产者也都对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有着某些非常严肃的义务。这些义务就是支持苏联的无产阶级进行和内外敌人的斗争,进行反对旨在扼杀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战争,要进行宣传,一旦发生武装干涉,就把帝国主义的军队直接转到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这边来。由此而来的,不就是苏联的革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不可分割、苏联革命的胜利就是全世界革命的胜利吗?

难道在明白了所有这一切之后,能说苏联的革命是民族的、孤立的革命,是和全世界的革命运动没有联系的吗?相反,难道在明白了所有这一切之后,能不联系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去理解世界革命运动中发生的什么事情吗?

共产国际的纲领是解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如果它回避关于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这个根本问题,关于它对所有国家无产者的义务,关于所有国家的无产者对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义务,那它还有什么价值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反对纲领草案带有“俄罗斯性质”的意见,如果说得轻些,是带有……

有人喊:坏的烙印。

斯大林:味道不大好的烙印的。

现在来说一说个别的意见。

我认为,斯克雷普尼克建议在第55页上改写关于“跟着无产阶级专政走”的农村劳动阶层的那句话是对的。这句话是明显的误会,或者可能是校对上的错误。它应该改过来。但是,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建议在纲领草案里加上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所有定义,这是完全不对的。(笑声)在第52页上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以下定义,基本上是从列宁那里拿来的: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反对外部的资本主义敌人、反对国内的剥削阶级残余、反对在还没有克服的商品生产基础上出现的新资产阶级的萌芽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

争”。

在纲领草案里还有一系列关于专政的定义,是根据专政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阶段上的这些或者那些任务确定的。

**斯克雷普尼克:**列宁的提法中有一个被漏掉了。

**伏罗希洛夫:**斯克雷普尼克不会漏掉的,你们不用担心。

**斯大林:**列宁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有好多页呢。难道所有这些都要加到纲领草案里去吗,我担心它起码要再增加一倍的篇幅了。

**斯米尔诺夫:**不是一倍,而是一百倍了。

**斯大林:**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关于把中农中立化的意见也是不对的。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里直接说到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在夺取政权的前夕,在专政的第一阶段上,共产党不能比让中农中立指望得更多。列宁直接说到,只有在加强了苏维埃政权之后,只有在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共产党才能指望组织起和中农的巩固联盟。很清楚,在制定纲领草案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列宁的这个指示,至于这个指示完完全全符合我们革命的经验,那就不用说了。

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意见也不完全正确。斯克雷普尼克同志没有根据地说,纲领草案没有考虑革命运动的民族成分。关于殖民地的问题基本上是民族问题。纲领草案相当突出地说到了帝国主义的压迫,说到了对殖民地的压迫、民族自决、各个民族和殖民地分离的权利,等等。如果斯克雷普尼克同志指的是中欧的少数民族的话,那可以在纲领里提到这一点,但是我反对在纲领草案里专门解释中欧的民族问题。

最后,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关于波兰是属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第二类型国家的意见。斯克雷普尼克同志想,把国家划分成三类: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德国、英国),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波兰、二月革命前的俄国,等等),殖民地国家——是不对的。他说,波兰应该算是第一类国家,只可以说有两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这是不对的,同志们。除了革命的胜利将立即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外,还存在着一些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国家,有封建的残余,有专门的反封建类型的农业问题(波兰、罗马尼亚,等等),那里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在革命爆发的时候一定会说出自己有分量的话的,在那里,革命的胜利是为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有可能需要而且一定要有某些过渡阶段,比如说像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我们这里也有人,像托洛茨基,在二月革命前就说过,农民没有重要的意义,当时的口号是“不要沙皇,要工人政府”。你们知道,列宁坚决和这种口号划清了界限,反对对小资产

阶级,特别是对农民的作用和比重估计不足。我们这里有些人当时想,在推翻了沙皇制度之后,无产阶级立刻就占有了统治地位。可是实际上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在二月革命之后,立刻就有数以百万计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走上了舞台,增加了小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的分量。本来微不足道的政党——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突然”成了国家的统治力量。靠的是谁呢?靠的就是数以百万计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且,在我们这里,无产阶级专政的确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较快地上升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这是事实,也是可以用上面说的理由解释的。未必能有根据怀疑,一些国家有可能经过某些过渡阶段,多少比较快地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波兰和罗马尼亚是属于这样的国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斯克雷普尼克否认在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上有三类革命运动是不对的。波兰和罗马尼亚是代表第二类的。

**斯克雷普尼克:**但不是波兰。

**布哈林:**“等等”——那里还有各种国家,例如南斯拉夫。

**斯大林:**同志们,这就是我对纲领草案问题的意见。

至于纲领草案的风格,同志们,某些个别的措辞,我不能说纲领草案在这方面是完善的。应该想到在这里还要有所改进,搞得更准确些,简单些,可能还有风格,等等。但是这是第六次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的事情了。

**主席:**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发言。

**克鲁普斯卡娅:**当然,纲领里最重要的、基本的东西是对整个局势的评价,而且当然很清楚,如果评价是正确的,那这(无论纲领有什么样的形式)对行动的统一有着最巨大的意义。所以我认为,从评价的角度看,总的来说,从基本上说,我们通过这个纲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果共产党能够在这个评价上达成一致,那就已经是向前迈出了非常大的一步。但是至于形式,我的感觉是,纲领更多是为领导层而不是为群众写的。除去评价的正确外,在纲领里应该(我不知道这在现在是不是能做到)有某些鼓动性的东西。我当然不是说的宣传鼓动的传单。但是如果拿来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么无论它写得多么有科学性,也无论它写出来有多大的困难,对这一切都不去管,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非常有鼓动性的作品,因为那里的每一章都是面向群众的,而且都散发出了激情。我也是这样想的,一个面向群众的纲领应该是这样写成的,要让它的每一个部分,不仅是整个纲领,而且是每一个部分,都是群众特别清楚的,是接近他们的。如果我们是从这样的观点看待这个纲领的话,那它是有个别部分只能算是顺带地解决这个目标的。

就拿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个问题来说吧。这一点是说到了,但是用了相当冷淡的语调,说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将没有宗教、迷信,但是对社会主义的评价不是什么很有价值的、有凝聚力的和能够激发情绪的东西。和外国人谈谈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不是说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另外回事,而是说那些我们想要鼓动的人,想要把他变成共产党员的人。在他们头脑里有可能会闪过去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共产主义,为什么它比资本主义好,它能给出什么来?在他们的国家,好像一切都已经安排得很好了,楼房很漂亮,经济也安排得很好,科学也很繁荣,为什么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呢?这个问题就摆在了一大批不是共产党员的工人面前。在我们俄国,资产阶级原来就是相当毛糙的,因为它主要就是只会对群众施加压力,但是它不会败坏群众。如果把我们的资产阶级如何行动和比如说美国的或者欧洲的资产阶级如何行动做个比较的话,那就应该说:美国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更会欺骗工人,把他们分开,把他们变坏和让他们视而不见。譬如说在教育领域里,就可以经常确信这一点。现代的资产阶级把愚弄群众的手法制订得很精确,而且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所以我认为,在纲领里需要写上: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对于工业先进国家来说,那里的经济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我们是把力气花在我们的经济上,经济问题上,而对于工业发达的国家来说,那里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主要的困难不是出现在这方面,而主要是怎样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非常巧妙地通过学校、通过新闻灌输到工人头脑里去的所有那些资产阶级的成见、概念、习惯。

这里,在纲领里,有一个地方说到对领袖的收买。收买归收买,但是不能简单化地理解它,因为如果事情只是在于领袖被收买了,那么,一两下子就可以把他们甩掉,而这里需要说的,不只是领袖被收买了,而是资产阶级善于通过这些领袖影响工人阶级。就说世界大战吧。为什么领袖们能带着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去打仗,为什么社会民主党有这样火急火燎的爱国情绪呢?——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善于广泛地影响群众,用资产阶级在保卫祖国问题上的观念去感染他们。不能是自己就把任务简单化了,说是全部问题都在于领袖。这里的问题在于对群众总体上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认为,在纲领里说到对领袖的收买时,需要补充上为什么领袖们能这样牢固地站稳脚跟,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什么。

接下来。我认为一定要说上蔡特金同志说的,一定要对妇女多写一些。是的,在好几个地方说到了这一点,但是应该说得更加有力量,应该更加统一地把这整个问题提出来,因为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因为纲领也是针对东方国家的,在那里,妇女的地位是基本的问题之一。我感觉,这个问题应该多少单独分



出来谈,而且要比现在提得更尖锐。

现在说说纲领的“俄罗斯性”。同志们,当然,说到纲领的“俄罗斯性”的人指的是纲领里考虑了俄国革命的经验,纲领贯穿了革命的精神。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有片刻怀疑,会认为,在这方面,纲领应该贯穿着俄罗斯精神。这里指的还有另外的一些东西。由于我们已经经历过斗争,我们有了经验,因此我们有可能发现、考虑那些对于外国人来说有着巨大意义的东西,这是为了他们的斗争,不过由于这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所以对于我来说,现在它们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例如,经济建设问题对我们是最大的困难,我们也在很多地方谈到了这些问题。当然,这是基础,是根本,所以不能不在许多地方谈到。但是应该有更多地方谈到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问题,应该让整个纲领更多考虑欧洲工人的心理,对于他们来说,“上层建筑”问题是有特殊意义的。

然后,我想联系到苏维埃问题,说说该如何考虑俄国的经验。当然,纲领几次说到了苏维埃的组织作用,但是,我认为,应该对这个作用说得更多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国家与革命》<sup>98</sup>里所说的,后来由俄国的经验做了出色的说明。有的时候在和外国同志谈话时,你就会发现,他们不知怎么的,看不到苏维埃的组织作用。他们看不到苏维埃在改造整个结构、整个社会组织中的巨大的组织作用。要知道,资本主义不仅仅是浮在表面上的,它是渗透到了最底层的,它是把社会组织的每一个网孔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编织起来的:工厂里的组织就是这样的,要看怎样对资本家有好处,商业、管理、学校、新闻都是这样。在这些方面,我们也应该阐述我们的革命经验,应该说到这里有什么样的困难,说到不对所有都进行深度的改造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就是要说到那些我们已经知道了的,我们已经确信了的东西,——要知道,在苏维埃政权之前,关于应该把一切都彻底重建起来,我们不是那么清楚的,不是那么明白的,——应该详细地把我们经验中的这个方面讲述出来,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在殖民地,也是完全要全部进行这样的组织改造的。而除了群众外,谁也不可能做到。只有群众才能够把这项巨大的组织工作做好,——这是应该特别强调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常常重视不够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关于每一个国家要走过的特殊道路问题。

纲领里说了,不能把世界革命看成是一次性的行动。但是我想,除这一点外,还应该说,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布哈林:这是有的。

克鲁普斯卡娅:这是有的,但是写的程度不够。

布哈林:说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

克鲁普斯卡娅:说得非常一般化,“照俄国的样子”,而应该是说得要让那些没有经历过我们经验的国家也能明白。纲领的俄罗斯性有可能就表现在,我们没有发现在某个问题上应该谈得更细致些,因为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苏联在这10年里曾经历过的这种经验的国家来说,它不是那么清楚的。这就是我想说的那些意见。

主席:留京同志发言。[下一位是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我建议今天就在现在闭会。我这里没有更多登记的人了。布哈林同志的结束语挪到明天上午和休息之后,明天上午,午饭之前,听取米高扬同志的讲话。没有反对意见吗?]

留京:同志们,这里有些人指责说,纲领的理论性太强,不够通俗。我想,这些指控是没有根据的。这个纲领总的来说是相当通俗的,至于理论问题,起码的理论问题,你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绕过的,它们在纲领里是一定要有的,是应该有的。我想,对于纲领的结构也没有必要再说了;可以加进去的,只是局部的补充、变动和修正。我个人认为,不妨加进一个严肃的补充。纲领给出的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各个阶级的评价,但是除无产阶级外,没有评述各个阶级,说明它们在帝国主义时代是怎样的,没有评述各个阶级本身的性质,我认为这是不够的。

你们就来看资产阶级吧。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时代的资产阶级——他们彼此间在本性上有很大的差别,由此而来的是无产阶级的策略也要有某些东西,当然,对于共产国际的策略也一样。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也同。没有评述帝国主义时代的各个不同阶层的小资产阶级,至少是小资产阶级的基本阶层。然后是地主阶级。你们就拿中国的情况、波兰的情况、罗马尼亚的情况来看吧,在那里,地主起着最大的作用,而对于这一点,纲领里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可是要知道,这是需要在策略问题上给出相应方向的。这样的评述没有。明显的是,纲领的编写者认为,评述出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各个阶级的状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评述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统治的时代的各个阶级,说明这些阶级在这里是什么样子的,不是什么不大重要的事情,而可能是更重要的事情。我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必要的。当然,这样会使纲领更长一些,比如说多出1—2页。某些同志主张把纲领压缩一半到三分之二。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该在损害内容的情况下削减纲领。

这些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避开的,因为一系列的策略步骤、一系列策略措施总是要以这一点为出发点的。第一页说:“帝国主义用自发的力量揭示和加深

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矛盾,把阶级压迫导致极点,把世界经济的生产力增长和民族国家屏障之间的矛盾变得尖锐,使之达到非常紧张的程度,引起不可避免的、世界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震撼着统治关系的整个体系并注定要导致发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帝国主义不仅会引起世界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而且它是和无数小的冲突和破坏联系着的,这里得出的却只是引起世界规模的战争。帝国主义用自己的联系包揽了全部世界经济,由于这一点,整个局势不仅不是更简单了,而且是更复杂了。而且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是无数大大小小的这种破坏、碰撞、冲突和矛盾。

第二页说到:“帝国主义造成了工人必须要最紧密地团结成一个所有国家无产者的统一的、国际性的、无论国界、民族或种族差异、性别或职业差别的军队。”

这样,帝国主义在为社会主义建立物质条件的同时,使得无产阶级必须要组织成一个推翻帝国主义所必需的、工人国际战斗集体。”

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已经提供了这种工人国际集体的基本的和起码的前提。在这个基础上组成了第一国际。在金融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这些前提在扩大和深化。纲领里包含的思想是正确的,但是,对这个思想的阐述就好像是,帝国主义是第一次创造这样的前提的。我认为这个部分需要搞准。

关于农业写到:“在农业领域里,它不仅表现在农民的分化和农民的各个广大阶层的无产阶级化,而且主要是表现为小农经济从属于巨型资本的统治的各种明显的和隐蔽的形式,而且小农经济只有以极其紧张的劳动和经常捉襟见肘为代价,才能保持自己独立的假象。”

我想,在这里,合适的做法是强调一下,在工业中起作用的那些规律经过一定的变形,在农业中也是起作用的。这一点必须强调,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现在已经在国际上的所有孟什维克政党和组织里得到了普遍承认。

第34页有这样的措辞:“取消私有制和阶级将消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

阶级不是能取消的,这是不正确的措辞。就像国家不是取消而是消亡一样,阶级也是随着国家制度消亡的。这里必须做相应的编辑上的修正。

最后一个更改是在74页上——对无政府主义的评述。这里说:在无产阶级斗争的最重要的各个中心,“远离任何一种群众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越来越变成了邪教,因为它的整个策略和它自己所有的行动,其中包括反对苏联的工人阶级

专政的行动,客观上把它自己纳入了反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

这里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好像无政府主义在不久前的什么时候曾经是群众运动。但是甚至在第一国际时代,在巴枯宁的时代,无政府主义也只是在西班牙曾经是群众性的运动。而如果我们拿最近15年的情况,特别是革命时期的情况来看,那我们就应该说,在这段时间里,无政府主义无论在哪里也都不是群众性的运动。我想,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够准确的。

**主席:**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发言。

**索柯里尼柯夫:**我对以下各点有4个简短的意见。第一,我认为,纲领草案在这里给战时共产主义下的定义未必是说得很全面了。这里说,战时共产主义“……不外是在国家生产力下降、小生产者的各种个人生产刺激因素受到严重破坏(没收和征用)的情况下,为了国防而组织合理的消费”。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这样确定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质(这是在第51页上),那么首先就可以同样成功地把所谓的“军事社会主义”也放在这个定义之下了,因为如果把在战争时期的德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那种经济上的实际做法拿来的话,这个定义也可以对它用得上。

**布哈林:**是带有无产阶级专政标记的。

**索柯里尼柯夫:**但是你们在这里描写的是一定的经济组织。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要走得更远了,而你们只是把情况限制在了破坏个人主义的生产刺激因素的习惯作用。破坏小生产的个人主义刺激因素的,还有国家资本主义,不仅是共产主义。

**布哈林:**这也就是战时共产主义的等价物。

**索柯里尼柯夫:**这里说的是对的,但是不完全,而且是因为不完全而变成不正确了。这里需要更准确地说到在辩论中指出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它是企图不经过市场,排除市场的经济方法,实现对经济的直接领导。这样就更接近、更准确得多了。我注意到,这种措辞是明显不完全的,由于不完全而得到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意义。这是第一个意见。

现在说说第二个意见,或者更准确些,是一种误会:我不明白,在第55和56页上,为什么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和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的合作社的作用,用的是这样假设的语言。米柳亭同志在这里指出了,需要给纲领草案做个补充,指出在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必须要和老的合作社中心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那就更不能保留这里采用的这个专用名词了。我不清楚的是,这是为什么?这里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合作社组织和改

良主义的空想相反,注定是要发挥相对微小的作用的,由于有资本主义制度总的条件,它是会退化的,会变成这种制度的多余的补充,可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会成为极其重要的分配机构的组成部分。”

可能成为——这就是说也可能不成为。这是可能性,但不是必定会是这样的。至少甚至对工人阶级的合作组织是这样说的,说它们可能成为分配机构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完全明显的是,这里需要有另外的说法,也就是说,这里应该完全准确地指出,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工人阶级的合作组织变成分配机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它们一定要起到的而不是可能起到的作用。

**布哈林:**谁知道呢,也许将建立起市政组织呢。

**索柯里尼柯夫:**如果这将是特殊的市政组织,那为什么在这里不指出呢。下面也说到关于无论如何也不会和任何一种形式的市政组织相对立的各种类型的组织。接下来是这样说的:“最后,农民的农业合作社(销售、收购、信贷、生产合作社)——在有可靠的领导和能保障影响农村中跟着无产阶级专政走的各劳动阶层的条件下,——可能会变成联系城乡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

我认为,这里的措辞也应该改变,也就是应该至少说,有一个把它变成这种杠杆的任务。这里不应该有这种有条件的可能性——“可能成为”——这样说就成了也可能不会成为。应该说得更明确一些和更准确一些,就像我们提出的消费组织,像我们提出的把农民、小生产者等等转换到大经济基础上来一样。如果我们不说这个,这里就会留下空白。我想,这个措辞会留下误会和不清楚的地方。

现在来说一说土地国有化的问题。我想,用第45页上说到农业的时候和在另一个地方说到殖民地的时候给土地国有化得出的公式,我们得不到我们需要的公式。需要直接承认,如果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把所有土地的国有化作为一个直接的任务提出来,不伴随着给小土地耕作者一定的保障——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得到小农的大力支持的可能。我们的纲领中的提法不应该是这样的,给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分子提供一种工具,让他们可以把小农和无产阶级分割开来。

我想,所以说在农业的那一点上,在说到没收和对所有大型的土地占有实行无产阶级的国有化的地方,需要改变提法。这个提法大体上应该这样改。在“接着的所有土地国有化”这句话之前加上句号,接下来是这样的:今后,随着对所有土地实行国有化的社会主义组织的发展,在极其严格地保护和保障劳动利用土地的利益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应该保留在社会主义发展时实行所有土地国

有化的公理。但是伴随着它,需要指出,进一步的国有化可以在联系着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和在极其严格地保护劳动利用土地的利益的情况下进行。至于殖民地,要是说在殖民地我们到处都要直接要求所有土地的国有化,我想,那不行的,因为并不是在所有的殖民地都保存了资本主义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更谨慎的说法应该是:在依靠保存下来的村社土地使用形式的同时,实行所有土地的国有化。那么,对于那些落后的、但是村社的形式并没有保存下来的国家来说,就没有必要让小农来反对自己了。例如在印度。在印度我们应该提出的任务就是依靠保存下来的形式,实行所有土地的完全国有化。

**布哈林:**就是在印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索柯里尼柯夫:**这不是可以用来反对我的论据,而正是赞成有这类附加条件的论据。

还有一个疏漏,第二章“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这里在第21页上是这样说的:“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震荡、阶级斗争激化的基础上和在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在欧洲大陆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生了一系列革命和革命行动。”

我认为,这几段反映的是今天的心理状态,因为按照这样的叙述,是十月革命开辟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引起了一系列的起义、革命,等等,但是并没有说到十月革命本身是靠着它们支撑下来的。这个方面的内容在这里没有,也就是说,这些起义、这些革命、这些虽然是失败了的运动,它们也是无产阶级国际革命斗争的形式,我们在苏联加强和保存了无产阶级专政,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国际革命的这种国际斗争过程的结果。这件事是完全无可争议的,是起码的。但是这里没有这第二部分的内容,而在共产国际的纲领里,这是完全必须的。看来这里有遗漏,有不周全的地方。

**主席:**今天的会议就结束了。明天上午11点布哈林同志做最后发言。

## 第五次会议

7月6日上午

**主席(李可夫):**布哈林同志作最后发言。

**布哈林:**我认为这里进行的讨论显示出了对纲领问题的极大兴趣,这也正是应该中央全会所期待的。我没有来得及,也没有能详细地回答在讨论中涉及的每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没有能对每一个发言都做出回答。我认为,更合适的办法是在这里也按照我对报刊上提出的问题做出综述所采用的那种办法,也就是说,把几个基本的问题、基本的反对意见抽出来,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它们身上;至于次要的,虽然也是正确的修改意见,可以把对它们的讨论转到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纲领委员会去。总的来说,关于纲领的工作,我建议全会基本上同意纲领草案,然后委托联共(布)代表团或者中央或者政治局,让所有在这里提出过意见的同志参加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的工作。那时我们就不会重复工作了。如果我们这里有了重大的原则分歧,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么就有必要让中央全会在代表大会委员会里根据某个修改意见采取一定的原则立场了。既然你们看到了,在中央全会上没有显现出任何原则性的或者是接近原则性的分歧,我觉得应该通过我所建议的、进一步做纲领工作的方法。

现在来谈谈事情的实质。我想,同志们在这里提出的一系列修改意见是可以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接受的。例如,我认为,可以接受并在纲领里更展开地谈到妇女工作的问题,把这个问题(像列宁经常做的那样)和必须在最落后的无产阶级阶层中和在最落后的劳动人民群众中进行特别顽强的工作联系起来。可能应该把农业无产阶级的问题作为一个重点,指出在他们中间工作的意义和性质。可以以某种形式接受安采洛维奇同志所说的,但是要记住在纲领的结构中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我应该说,昨天这里重复出现了这样一种在讨论预算问题时出现过的情况:每一个“专业”和每一个“部门”都要求扩大自己的地盘,有的时候不考虑这样的要求对预算的总结构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这样大张旗鼓、不受任何限制地增加纲领的篇幅。我们可以为它增加一页、两页、三页,但是这样增加是有尽头的。我们的眼前随时都必须有这个前提。

我认为,可以更突出地强调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多样性,它的出发点的多样性,也就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形式多样性。我应该在括号里指出,在我的第一个报告里(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专门把这一点拿出来作为重点之一,而且我在当时的报告里专门有一部分谈到了这一点,相当详尽和仔细。所以我完全不反对把这个思想的表述写得更突出一些。

我想,我们可以联系到争取跟着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走的群众,更详细地把关于收买领袖的问题展开。我认为也可以接受另外一系列的修改意见,其中包括留京同志的意见,奥新斯基同志的一些意见,他的其他建议昨天已经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回答。(我完全同意这个回答。)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讨论中的几个范围比较大的问题。我首先要谈的是社会民主党问题。许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发了言,洛佐夫斯基同志发了言,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也说到。我感觉很自然的是,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首先,关于放在什么地方。我很明白,抽象理解的逻辑顺畅需要我们在纲领里把所有各种不同的思潮集中在一个地方。我明白在洛佐夫斯基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提法里有一定的合理成分,让我们在草案的最后把我们所有的敌人,把工人阶级内部和我们敌对的所有思想政治思潮都排成队并且“合力”打击它们。这样是可以达到一定的逻辑上的顺畅的。但是我认为,斯大林同志昨天在自己的回答里引用的论据是完全有说服力的。这些论据说明了我们应该联系到分析世界革命的具体进程来描述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行动和叛卖角色,因为不然无论是关于这个革命失败的问题还是关于社会民主党在这次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就都得不到充分的阐述。但是我可以再用一个考虑来补充这样的论证,我认为这个考虑是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的。在我看来,无可争议的是,从政治上说,有必要在纲领里强调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联系。不能把这些问题彼此扯开和完全分离。如果我们只是在末尾说到社会民主党,也就是在说到工人阶级内部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政治潮流、关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关于“建设性的社会主义”等等的那一章里说到的话,那我们就掩盖了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联系,而且从思想上和政治上说,我们需要表明的是,实质上这是两种从无产阶级手中拯救资产阶级制度的方法。由于这个原因,可以牺牲结构上顺畅的种种考虑,因为正像我们正确地看到的,我们的纲领应该是共产国际的战斗文件,



而如果扯断了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联系,我们就显露出是不理解他们通过**相互的联系**所起到的作用了,不理解资产阶级是在调换或者同时使用两种方法,不理解这两种方法虽然有所区别但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政治上的考虑超过了所有其他的考虑,而且需要做到的是让所有其他的方面都服从于它们。

我想,对于某些国家一定数量的工人群众,甚至是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跟着社会民主党走的原因的那个段落,是可以表达得更鲜明些。但是我坚决反对洛佐夫斯基同志昨天联系到这一点所发展的那个理论。洛佐夫斯基同志提出了一个完全抽象的论断,照我的看法它什么也没有能解释,而且除此之外还是不对的。如果提出这样的论断,说是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存在中有着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另一个方面是破坏性的。而且社会民主党符合的是建设性的方面,共产党符合的是破坏性的方面的话,那么,我的感觉是,我们就会给出一个完全不正确的和太抽象的“解释”了,总的说来,这样的解释会把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的统治永久化。

**斯大林:**是一种类似有关善与恶的老的、说教性的东西。

**斯克雷普尼克:**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布哈林:**我不准备研究问题的语言表述方面。但是我要问,首先,这种表达意味着什么呢?说是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存在中有破坏性的一面和建设性的一面,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说建设性的一面也就是表现为工人阶级在“工作”,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难道这个方面是由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代表的吗?难道所有这些和实际情况是相象的吗?一点都不相象。工人阶级的劳动心理和思想意识是在各种生产过程的基础上培养起来的,难道这种心理和思想意识我们应该让社会民主党去垄断,用这一点来解释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吗?我感觉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心理和思想意识是将来无产阶级可以起建设作用的前提之一。我们怎么能拱手让我们的敌人社会民主党垄断这一整套思想,让社会民主党把它们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呢?这是无论如何不行的,无论从什么地方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来,这个理论是不对的。它不仅是非常抽象的和简单化的,不仅是大大地把事情“简单化”了,——它从最根本以上就是不正确的。

**古谢夫:**社会民主党总是把共产党描绘成是破坏分子的政党。

**布哈林:**当然,我们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破坏者。但是我们是破坏者是因为我们是在有意识地表现出生产力增长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禁锢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我们表现出来的。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说,革命是要解放生产力的。这样一来,无产阶级破坏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特定形式(资本主义)这个

方面,他的革命立场就是和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生产剩余价值的阶级的积极方面联系在一起的。

同志们,我认为,恩格斯在他关于英国“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著名论断里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分析帝国主义的著作里提出的那些基本原理,应该百分之百地保留。这些基本原理完全适用于解释现在社会民主党的状况,适用于解释为什么工人阶级就是在现在也还处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之下。

但是这些基本原理需要联系新的事实来做出补充。如果说到新的事实,需要首先说到的是,我在自己的第一个报告里提示到的,那就是新的贪污体制,它是和法西斯主义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前提是工会上层组织和社会民主党上层组织与托拉斯化的资本及其国家政权是联为一体的。

联系到这一点,我想,可以采纳奥新斯基同志补充的内容的某些部分,强调托拉斯化的新形式,强调工人组织的上层和国家机构联为一体,等等,——强调已经在共产国际最近一次执委会论证英国和法国新策略的决议中肯定了的思想。

我想,可以更突出地强调最近资本主义的这些趋势,可以更坚决地,而且是联系到这一点,给出一个经过一些改动的关于收买领袖等等的措辞。但是这不是原则性的新东西,这里说的只是改进草案里给出的提法。这就是昨天在中央全会的讨论中涉及的第一类问题。第二类问题涉及殖民地。这里对殖民地问题没有提出原则性的反对意见,虽然有某些“假象”,好像有带着非常严重指控的、原则性的反对意见,这就是斯克雷普尼克同志提出的反对意见。斯克雷普尼克同志总是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垄断这个论题的,他迫使我不得不提几点意见(乌克兰根本就是所有受了委屈的民族的中心!)……

柯秀尔:是在世界规模上。

布哈林:是的,“在世界规模上!”……提几点意见,它们应该是从事情的实质,而不是从某些其他的考虑出发的。我认为,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反对“吸收”提法的意见是不正确的。这个提法,“吸收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来”,等等,绝对既没有包含了什么罪恶的东西,也没有包含了什么高傲的东西。它是适合于一定的、现实的实际情况的。事实上,如果从世界的断面看先进国家的工业无产阶级运动和殖民地的边缘地区(甚至是在有独立的工人运动的那些国家)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继而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的,用百万来计算的话,那就清楚了,领导作用应该不可避免地属于各个工业中心。正是它们将在斗争中也在建设中领导上百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农民。在这个关于“纳入”、“帮助”

等等的提法里,表现出来的根本不是“文明的”人民对殖民地人民的高傲,而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也是不可能从抽象理论的角度加以议论的,为了不得罪被压迫者,我们应该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画上等号。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当纲领是一个文件,它的中心思想应该是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时,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一点写在纲领草案里呢?抛弃这一点不可能,而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在这方面所做的指控又是完全不正确的。我同意的不是理由,而是洛佐夫斯基同志企图得出的一些结论,说是在说到殖民地边缘地区应该有“宗主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那个地方措辞不够清楚。我想,我们应该把这个提法多少改动一下,但是不是照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提出的那些考虑改。这个提法是在这样的方面搞得不准确。比如说,英国有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但是如果提出这样的论断来,说现在中国的农民和中国的无产阶级总的来说是由英国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这是不对的,因为英国无产阶级自己没有前进得这样快,让我们现在就可以严肃地几乎把它当成中国运动唯独的领导者。这也就是说,第一,这里说的不是抹杀“地方”力量或者抹杀中国无产阶级自己在中国内部的领导权。但是事实还是事实:从总的情况看,中国革命是在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也体现在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中。

这样,这里就需要正确地提出并且正确地表述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群众是在无产阶级、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前进的,而不是说殖民地的群众,比如说印度的群众,是在英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前进的。[我们的措辞出现了宗主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无产阶级平行领导这样的表述。需要说出的是,一个含义更广的思想,不是要让人可能想到是这样的平行状况,但是这里应该完全保留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对这整个运动的领导权的思想。]“宗主国”这个词有可能把人搞糊涂,好像宗主国的无产阶级一定要领导相应的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并不总是这样的,将来也不会总是这样的。我认为,可以把“宗主国”这个词勾掉,放上另外的词,但是需要期望的是,要把纲领的基本方面完全保存下来,要能表达出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这个方面是一定要保留的。虽然西欧无产阶级的大部分还是在跟着社会民主党走的,这一点也还是需要做到的。因为这个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还是跟着共产党、跟着共产国际走的,而且共产国际的群众领导核心是先进的工业国家的共产党。这是需要直接说出来的。关于苏联的作用等等,我在这里就不说了,因为这是当然的,没有必要对这一点长篇大论地展开来谈。

现在是第三类问题,这是最基本的一类,也是引起了最大的辩论和最大的讨论的,——这就是关于战时共产主义的问题和联系到这一点的关于所谓的“新经济政策”问题。恰好我们在纲领草案里没有特别表述新经济政策,甚至也没有强调这个称呼。我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从逻辑上说,这个称呼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且把这个专用名词硬塞给其他国家也无从谈起。我应该说,我同意斯大林同志关于可以用“也许”这个词取代“可能性”这个词的说法。但是我应该展开最疯狂的论证来反对瓦尔加同志固守自己阵地的那些论据。我认为,瓦尔加同志的论证不仅是在几个细节上不正确,而且它在决定性的环节上也是不正确的。请瓦尔加同志原谅我,他的这些论据重复了匈牙利共产党的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匈牙利革命失败的错误。我首先应该说,我个人对匈牙利革命经验的评价是和瓦尔加同志的评价不同的。我认为不能排除的是,如果党对匈牙利革命有另外的政策,那么它是有希望取得胜利的。而且我认为,瓦尔加同志关于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不可避免的提法是不能得到证明的。请允许我对这个问题说几点考虑。我不去涉及人们在说到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合并时所说的错误。我想在这里涉及共产党在土地问题上的错误,这些错误发生在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政府和农民(加上城市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方面。首先是几个事实,是你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但是再说一遍是有益的。问题在于,农民在匈牙利革命中没有从地主的土地中得到任何一小块土地。在那里,大型的地主庄园变成了“苏维埃”庄园,形式上是由专家管理的,而事实上是由原来的地主在管理,他们是由负责管理的专家们任命的。土地问题方面的关系就是这样形成的。在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态度上,只要提醒一点就够了,那就是颁发了一个政府令,凡是敢于开自己小店的小店主们都要判死刑。同志们,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种状况,需要感到吃惊的是,从根本上说,无产阶级专政在匈牙利怎么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在一个无产阶级占少数的国家里,外部的包围又是这样尖锐地对准了苏维埃,难道能够想象把城市小资产阶级作为自己你死我活的敌人,让这个你死我活的敌人起来反对自己,把所有的农民都变成自己的敌人吗?这样说是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给他们,可是该没收还是没收了。你们说说,在这样的状态下可以稳固地维持很长时间吗?不行。正是由于贯彻的是这样的政策,匈牙利的专政事先就注定了是要垮台的。远不是所有同志都知道这些事情。我不是“泛泛地”说到这些的,我是在向瓦尔加同志论证,说明他低估了这些事实的意义。那外部的包围呢?罗马尼亚的农民是受了自己的革命的震撼(因为你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的革命影响下,罗马尼亚的农民站立起来了,于是

就轮到了罗马尼亚政府要搞大型的土地改革,把这种做法抛出来作为施舍,但在过了几年之后,这些改革又不得不刹车了),这些罗马尼亚的农民成群结队地去窒息同样住着罗马尼亚农民的匈牙利共和国,谁又能说如果这些去窒息匈牙利共和国的农民们如果遇到了从苏维埃手里得到地主土地的农民,就不会是另外的结果呢?罗马尼亚军队是由农民组成的,那里没有发生任何革命性的瓦解,你们并没有把这种瓦解带到军队里去;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直向你们扑来,那里也没有发生任何革命瓦解的情况。你们可以用来和现在的敌人厮杀的武器又在何处呢?没有吧?我要问,在那些各族人民朝夕相处的地方,在这些农民之间语言相通、种族相近、血缘相连、民族交融的地方,怎么能证明说,如果有另外的政策,那里就不会出现另外的结果呢?这是极其值得怀疑的。给这个并不正确的政策提供的理论基础是这样一种理由:小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难道能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他们,从而加强资本主义,破坏生产过程,给社会主义的大型生产带来损失吗?

可是得到的是什么呢?

现在,同志们,瓦尔加同志在论证的过程中提出的建议是什么呢?他是这样说的:第一,在周围的所有的工业国家里,农民是农业资本家。第二,战时共产主义体制是坚决剥夺的体制。第三,所以战时共产主义的体制完全是一定要有的。可以剥夺或者不剥夺,可是如果要剥夺,那就需要好好地剥夺;而如果是好好地剥夺,那得到的就是战时共产主义。这样的论证的所有部分都完全是经不起批评的。第一,说是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可以根本和“农业资本家”等同起来,这是从何说起的呢?不能这样做,因为有小农经济<sup>99</sup>,存在着贫农,存在着小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五种划分是大家都知道的,为什么你们就不把它看在眼里呢?〔但是你们可能是把它放在了那什么也不出卖和对贸易不关心的农民阶层里去了。这是不正确的。西欧和美国的结构和我们落后的、土生土长的、半亚洲式的结构的不同在于,他们那里的档次是要高出一个阶梯的。可以说我们这里的小富农是半个资本家,可是他还有一只脚差不多是该划在中农这一边的,而在人家那里,这种小富农的确就是农业资本家了。我同意。所以,在我们这里,中农的上层并不是货真价实的富农,而在人家那里是真正的富农。档次是能升降的。但是正是因为阶梯是能升降的,所以在我们这里是在比较低的档次上有着相当大量的贫农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在购买粮食的。就拿自给自足的经济来说吧。在人家那里,和这种经济相对应的阶层的商品率是比较高的,他们也买也卖。这是不是事实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所以,在这种涵盖

面很大的概念里放进去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提法(说农民就是农业资本家)是不行的。这里显露出来的是在匈牙利已经犯过的错误。要知道,如果先是说农民是农业资本家,然后又说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要求坚决剥夺的方法,那么得出来的结果就像二乘以二应该等于四一样清楚,是不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对资产阶级应该用剥夺的方法,但是对一大批广大的农民阶层应该采用的是完全另外的“措施”。而在瓦尔加这里得到的是什么呢?他提出的说法是农民是资本家,需要征收,所以就是战时共产主义。在他那里得到的是抹杀真正的农业资本家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相当广泛的和相当数量的各阶层农民,农民下层的各阶层之间的区别。当他转向讨论剥夺和征收等等的手段时,就立即同时从这些前提出发,不区分对资产阶级的施压、征收、“剥掉衣服”等等手段和对待农民的手段了,因为既然几乎把所有的农民都算到了“农业资本主义”这个“范畴”里,他就“彻底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匈牙利”观点上去了。瓦尔加同志!如果您将继续这样行动的话,您就是在穿新鞋走老路,肯定会第二次断送匈牙利的革命的。

(瓦尔加同志的插话听不清楚)

而如果不是所有农民都是农业资本家的话,如果有很多是算不上农业资本家这个范畴的话,那么,您在理论上的第一个义务就是一定要强调什么是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特征,什么是它的实质,它的基础。而这个实质,从组织的、经济的观点看,就是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定的方法,它是要在多少比较开放的市场关系的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而从社会阶级的观点看,就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当然不是无限的,而是一定程度的农民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这也就是从社会阶级方面看的新经济政策的基础,这也就是解决工人阶级和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农民之间关系问题的一定的方法。这就是实质,抽象化和脱离开这个无论如何都是不行的,而如果是对所有农民都搞一刀切的话(说他们是“农业资本家”),那当然就会是混做一团了:那么便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了,那么对所有的人——“农业资本家”就都要坚决剥夺了。这样的政策不是把问题分解开来,它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其根本的原因是不理解我们对普通的商品生产者的态度和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者的态度。这也就是老的错误,我要重复一遍,是由瓦尔加同志在这里以遮遮掩掩的形式提出来的。

同志们,我想对奥新斯基同志联系到新经济政策问题提出的论据再说几句。奥新斯基同志反对我们在这里维护的一个论据,这也是纲领草案维护的一个论据,他的反论据是:在问题出在对生产的组织上的时候,你们干什么要抓住市场

不放呢？我认为，奥新斯基同志的这个论据是不对的，说它不对是因为它把市场关系和生产分割开了。市场关系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

**奥新斯基：**问题不仅在于市场，而且也在于对生产的组织。

**布哈林：**你等一等，瓦列里扬，我会对你的所有论据做出回答的。

首先什么是市场？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市场表现的是没有组织的劳动的分散性。如果我们说得更具体些，考虑到具体的局势，那么，它所表现出来的，是存在着小的农业商品生产者。这是起码的真理。当我们说到如何组织整个农业生产、怎样把社会主义的大工业和小商品生产者的生产结合起来的时候，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来对待这个问题：要么是说我有足够的力量把这些小商品生产者都拴住，而且马上就可以用组织大工业的办法把他们组织起来，要么我就说我没有这样做力量，也没有组织上的条件，所以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合适的；所以我要在一定的界限内给出买卖的一定自由，这样就有了农业范围内的生产和大型的、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工业之间的结合。所以，市场问题同时就是生产的组织问题。这就像青天白日一样清楚。

**奥新斯基：**我说的是在大企业里的生产组织。

**布哈林：**我也会说到这一点。我应该说，这个问题早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详细讨论过了。如果我在这里念我自己的报告中的一段话，请不要责怪我，这是我做的报告。那里说道：“我肯定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成为政权的舵手的时候，既会碰上最实质性的经济组织问题，生产方式之间的对应关系问题，这些关系是这个无产阶级能够合理地组织的，也是他可以有计划地管理的，也会碰上一些他没有能力按计划进行管理的问题。这就是他不得不碰上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遵守正确的比例，也就是说，如果自己承担的太多的话，他不可避免地会落入以下的局面：生产力不仅将不会发展，而且会变得受约束。无产阶级没有能力一下子就把一切都组织起来。他不可能用自己的计划强行把从事自己的个体经营的小生产者、小农挤出去。无产阶级得不到任何东西来取代这些阶层有益的社会职能。流通的过程会停止。这意味着生产力的进一步下降和总的经济生活的衰退。

在这样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还需要面对一种现象。在自己承担了太多的时候，他不得不建立庞大的行政机构，为了完成小生产者、小农等等的经济职能，他需要太多的职员和行政工作人员。企图用国家官员来取代所有这些小的活动家——你怎么称呼他们都可以，事实上是国家官员——会产生如此庞大的机构，养活它的开支将会比由于小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非生产开支大得多，简直

就无法比较了。结果是整个这个管理形式,无产阶级国家的整个经济机构不是在减轻,只是在加重生产力发展的困难。实际上它会直接变得适得其反,所以不容置疑的必要性会迫使你把它毁掉。”

接下来有一个提得非常尖锐的地方,但是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抗议。这里说道:“这是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和积极干涉的结果呢,或者是机构将要由党自己来精简,就像在苏俄有过的那样——不管是这样还是那样,这是会发生的。如果这不是由无产阶级自己来做,那么其他的力量将会行动的。这是所有同志都应该明白的。”

所以,所有问题是国家的工业和普通商品生产者的私人个体经济组织上结合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正是用了“结合”这个词),而从阶级的观点看,这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认为,谁也还没有能证明——虽然这些现象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谁也还没有能证明,如果不是把小生产者范围内的商品周转以及小农商品生产者和城市工业之间的商品周转都百分之百地堵住,我们就不能用最坚决的方式剥夺大资产阶级和城市的中等资产阶级。谁证明了一定需要关闭这个商品周转才能“坚决地剥夺大资产阶级”呢? [由此是不是可以得出什么特别和平的政策呢。我并没有认为,十月的转折是以和平的形式完成的,我也不是想说,比如说在捷克斯洛伐克起义之前,曾经有过一个由十月、十月革命规定了日期的、完全和平的时期。]首先需要让各党都明白,整个战时共产主义经济体系和在我们这里得到了一个叫做新经济政策的怪名称的整个体系之间,是有着巨大的原则性差别的。你可以在自己面前提出这样一个小问题。当我们在1921年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既没有从“美国大叔”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补充资金、资本、资源;但是我们保障了经济运行。经济增长、恢复过程的开始正好是发生在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的那个时刻。为什么呢?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用另外的方式布置生产因素了,因为我们用另外的方式布置生产力了。你们可以用一个政策把它们关闭了,那时它们是作为死的资本到处躺在国内的,于是生产力没有发展;你们可以用正确的结合把它们拿起来,那么你们就能得到生产的发展和保障自己胜利了;你们可以把它们完全打散,也可以不正确地把它们结合起来,那你们就会遇到从小生产者中产生的资本主义的自发性把你们吞掉的危险。

这就是三种不同的方式,三种不同的方法,而且这三种不同的方法得出的经济结果和政治结果都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虽然有这里展开的论证,强调了新经济政策中的市场因素和战时共产主义中的消费因素,我们做的是完全正确的:



这是和事情的实质联系在一起,而且是不能拿这个和关于生产组织的问题对立起来的。

我认为,奥新斯基同志对问题的提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合理的成分,就像是在任何一个甚至是不正确的断言中会有合理的成分一样。合理的成分是什么呢?那就是奥新斯基同志触摸到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问题,在这里不可能完全展开来谈了,我可以这样来表述这个问题:正确的经济政策问题是各种经济因素和经济动因的不同结合。小农有个人动因,工人也有来自这种心理的某种东西。这是谁也不否认的。

**奥新斯基:**有人说甚至共产党人也有。

**布哈林:**所以可以对一个普通工人活动中的个人主义动机做专门的研究,也可以研究怎样才能抓住私人的兴趣,抓住这个个人主义的动机,也把工人引入更快速的经济生活和活动的体系。总之,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是奥新斯基同志错在什么地方呢?奥新斯基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用这样的提出问题抹杀了个人生产者及其展开的个人主义动因和工人的个人主义动因的小尾巴之间的差别。例如,奥新斯基同志的立场有点像漫画(我要强调的是这个词)可以描绘成这样:因为工人有个人主义动因,小商品生产者也有个人主义动因,那么,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各种定义以及其他的东西都需要在这些小一半的个人主义动因里去寻找了。这样提出问题就抹杀了基本的差别,而且是工人阶级和农村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他和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界限,虽然说从他们的经济相互关系以及他们是怎样被吸收到经济过程中的观点看,是有某些共同的东西的。

现在,当我们要给我们称之为新经济政策的或者是与它相适应的经济体制下定义的时候,奥新斯基同志来对我们说:你们认为(这是在他反对我和斯大林的时候说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市场,而我坚持认为,需要依靠的是别的东西。

**奥新斯基:**别的东西也需要提到。

**布哈林:**而我要坚持说的是:奥新斯基同志所依靠的东西在其他问题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不应该在这里面寻找新经济政策的定义。

**奥新斯基:**为什么列宁在1918年是从计件工资开始的呢?您给我解释解释。照我的看法,这不是小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是属于第二位的。

**布哈林:**但是你等一等,奥新斯基同志,我跟你讲,而且托姆斯基同志昨天也完全正确地反驳过你了,他说,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奖励制度或者给我们的经济工作者的、与学术有关的分配份额——这也是和这些生产者的个人主义动因有关联

的东西;但这是在任何新的经济政策之前的事;如果你是想这样从时间顺序上展开自己的论证,那可以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从奖励制度和向学者们发的个人份额上开始的,而且就是工人,他们也得到的比其他人要多一些。

奥新斯基:斯大林认为这是新经济政策的开始。

布哈林:斯大林说的完全是另外的事:他说的是,我们不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开始的。

奥新斯基:对。

布哈林:什么对?如果这是对的,那这个论据就更是反对你的了。

斯大林:我觉得他是放弃了自己的论证理由。

奥新斯基:放弃了一些。

布哈林:我应该说,从我们总的各项经济任务的观点看,瓦列里扬·瓦列里扬诺维奇当然是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至少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但是争论的不是这些任务,争论的是应该把什么看成是**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我认为,该看成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的是,必须采取一定的办法,把社会主义的工业和普通的商品生产者连接起来,也就是**通过市场连接起来**,而从社会阶级的角度看,这就是**工人阶级和普通的商品生产者——农民之间一定的对应关系**。这就是整个问题的实质,在这个问题上无论如何是不能有前后左右的偏差的,这是最基本的、最实质性的、决定一切的。正是因为这样,纲领草案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的是:因为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国家工业和小商品生产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同,所以从**数量的**角度看,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对应关系也不同,所以市场关系的规模应该是不同的。

有人喊:可能。

布哈林:甚至可以肯定将是不同的。我要强调的是:规模。这就是说,不是这里所说的什么别的东西。规模和发展速度,也就是我们要在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上窒息新经济政策,就是说**克服新经济政策的那段历史空白时间**。从数量的角度看,这些量的大小将不可避免地是不同的。

然后联系到瓦列里扬·瓦列里扬诺维奇所说的,我应该提出另一个意见。不正确的立场使得他对工资得出了一种冒险的、过于大胆的和错误的论断。在讨论新经济政策问题时,奥新斯基同志把重心转移到了资本主义报酬的各种不同形式上:像奖励制度、计件工资,等等,虽然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特别是对美国来说,这已经过时了,而且在美国实践的是在流水线制度下的计时工资。他符合逻辑地走到了声称好像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引进了**工资范畴**,同时

抹杀了基本的东西,那就是工资范畴是“非驴非马”的东西,严格说,“工资”是必须要有资本主义的利润的。从严格意义上说,工资是雇佣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一定数量的价值,而与它相反的是工业利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起码的道理。从严格意义上说,工资需要的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应关系,而在我们这里,在社会主义的工业部门里是没有这个的,工资从原则上说是一种纯粹形式上的东西。这是“非理性的形式”,非资本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实质的资本主义外壳。而这种形式是从何而来的呢?这是源于我们这里有货币计算,有表现为货币单位的价值计算。

斯大林:除此之外还有专业水平的和非专业水平的劳动。

奥新斯基:也有工人心理上的残余,使得计件工资变成是必须的了。

布哈林:你等等,瓦列里扬·瓦列里扬诺维奇。任何经济的东西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方面。我不涉及这个方面了。而货币计算本身是来自何处呢?来自市场关系。而市场关系又是来自什么呢?来自小生产者的劳动是分散的。一切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又是从形式的角度谈到工资的话,你会找到什么样的真正原因呢?找到的是市场关系,是国家工业和小生产者衔接的特殊形式问题,是通过市场的、有组织的衔接。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从哪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甚至是从你找到的那个方面——我们都是一定要把市场关系作为基础的基础,我们不应该把这种关系和生产分割开来,因为我们很清楚,市场关系就像马克思不只一次地说过的那样,是生产、商品生产的另一个方面。为此,哪怕是只要读一读《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商品拜物教那一章也就够了。这一面是和市场联系着的,而且我认为,我们在没有提到这些词的情况下给“新经济政策”下了定义是完全正确的。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和从社会阶级的角度都是确定得正确的。

现在我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对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发言提几点意见了。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说,在这个纲领草案里包含了对战时共产主义下的定义,实质上这对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战争时代出现过的所谓军事资本主义或者国家军事资本主义也是可以适用的。我认为,这个反对意见不完全正确,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非常不正确的。形式上这里有某些共同的东西,就像形式上在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有共同的东西一样。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专政,有某些形式上共同的成分:镇压的成分,最坚决的镇压的成分,等等。但是这是不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呢?不能这样说。因为阶级的标记是另外一种。当我们在这里提出战时共产主义的措辞的时候,在这个措辞里,在这儿行里,白纸黑字地写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经济体制。而这个阶级的标记就决定

了一切。所以,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论据是不正确的。不过,区别也可以从一系列和不同的“阶级标记”相联系的其他迹象找到:在军事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的是对中等阶级进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剥夺,但是没有对各种大的阶级本身的剥夺;被剥夺的资金转到了那个阶级自己的手里,也就是转到了这个阶级的上层手里;在战时共产主义条件下,我们剥夺的是我们的敌人,也就是资产阶级和地主。当然,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可以把这个差别特别指出来。但是我想,它是这样明白了,它在说到对剥夺者剥夺的所有那些段落里都已经包含了,再一次重复它看来是多余的了,这只能使得草案变得更累赘。我想,这样看来,在这方面的反对意见是不公正的。

讨论的结论是,的确可以强调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是可能的。我们在这里什么也不会失去,因为我们没有对自己有什么约束,我们有的是放开的双手,而我昨天论证的中心就在于不要把自己的双手捆住。我们用这样的措辞并没有捆住自己的双手。而为了挡住革命第一阶段“过于和平”的危险(关于这一点我昨天和爱尔科里同志说了),可以在这里说战时共产主义是可能的,而对专门的段落可以把关于必须在城乡镇压自己的阶级敌人说得更重些。我认为,这些修改是完全可以采纳的。

我现在应该对首先是米柳亭同志提出的一些论据说几点意见。米柳亭同志就像洛佐夫斯基一样,说的是自己的专业,是合作社。他说,纲领草案里关于合作社第一是说得太少,第二是给出的提法太不明确:说是工人合作社可以起这样的作用,农业合作社可以起那样的作用。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也部分地对合作社提出了这样的论据。我并没有觉得这些论据是有说服力的。在工会方面总的提出了反对意见,要求对工会单独说上一段,对这些,斯大林同志的讲话里已经驳回去了。我想在这里只提几点补充。同志们,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专业建议有专门的一段——那你们得到的就不是纲领了。你们看看,建议给农业工人写上单独的一段,关于工会要单独的一段,关于合作社要单独的一段,关于社会民主党要单独的一段。你们可要明白,用战时共产主义的语言说,那你们就要把整个纲领扯成各个“小章节”了。在它们彼此之间就没有内在的联系了。

**洛佐夫斯基:**不是变成小章节,而是变成单独的、有益的章节。

**布哈林:**好,非常“有益的章节”。但是我要说,你们的这些章节就像生活中经常有的那样,将会发展成为“小章节”,而且将会成为将来“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我们在制订纲领时是从这样一点出发的:必须要把所有最重要的方面衔接起来。我们是从一个完整的计划出发的,我的报告主要的思想是论证我们做过

的尝试——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或者不成功的,不是我们来判断的,——尝试着把所有成分串起来,尝试着能拿出在一定程度上**完整的一块东西**。同志们,我要让你们相信的是,采用把关于合作社、工会等等都分成单独的章节的做法,你们是得不到这样的完整性的,因为可以写成“一章”的东西太多了。合作社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而资本的垄断性组织不是重要的东西吗?社会民主党不重要吗?我们这里重要的东西太多了,而且需要把他们“塞进”这个纲领的小包里,让它们彼此之间有内在的联系。这是一件不轻松的任务,我认为,如果采用某些同志建议的那种方法,我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们会把注意力都分散到个别专门的、机械地联在一起的问题上去了。专家们就这些或者那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很好的,但是,我想,纲领应该是**抹平**专家们在这个或者那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片面性,从而得到总的、一定程度的**完整性**。我就是从这样的角度对待米柳亭同志提出的要求的。他说:关于合作社说的少。而我要坚持的是,关于合作社说的不少,不能再多说了。关于合作社在几个地方说到了,而且在一个地方,在第55—56页上,说了一页多。我认为,从纲领的篇幅出发,我们不能再给合作社更多地方了。所以我不认为这些段落必须要扩展。而就实质而言,请允许我在这里提出这样的意见。米柳亭同志建议做一个修改。草案里是这样说的:“工人阶级的合作社组织可以成为分配机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什么说“可以成为”,而不是一定将成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保证它们一定成为,而且我们也不能证明这一点。要知道,要求我们不要有专门的“俄罗斯精神”,这是对的,但是措辞要有最大的弹性。在这个问题上,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了,我也是同意她的发言中的这个部分的。而你们是从哪里知道的,比方说,工人合作社将一定起“极其重要的作用”呢?我不知道这一点。比如,我不知道将来一定会是这样的。

有人喊:应该起到。

布哈林:应该起到?你们自己想想,在那些工业比较强大、有可能更大程度地集中的国家里,地方上的**苏维埃**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可能将会建立全新的**市政地方苏维埃**形式,它们将承担起组织供应的任务。而在一系列的国家里,合作社也许将需要拆除。有一个人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正确的意见,说是如果它将是在敌人的手里,那可能不得不把它拆除。而难道能从理论上根本排除,说是将来不会提出由地方苏维埃建立的新的形式的组织,以它们为基础组织供应吗?这在理论上是不能排除的。

你们看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和同志们私下谈话时,虽然肯定了苏维埃

政权的国际意义,甚至也还谈到了苏维埃政权可能会有某些改动的形式呢。他曾对许多的同志,其中也包括我,完全肯定地说到过这一点。但是如果说到这样的问题,那请你们说说,能不能肯定说工人合作社一定将成为决定性的杠杆,将不会建立另外的形式呢?说它可能成为不是更慎重些吗?照我的看法是更慎重些的。

我要再重复一遍,我们这里应该有一个原则,我们可以加到纲领里的,只是我们肯定知道的,不能把有疑问的论断塞到纲领里去。

第二个问题——关于农村合作社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合作社计划问题。我应该说,如果你们想要让任何一个国家都按苏联这样的规模来推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计划,那这是不对的。

斯大林:过于俄罗斯化了。

布哈林:正是这样,过于俄罗斯化了。而米柳亭要求的正是这个。我们这里是环环相扣的。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必须要有的形式,但是它的规模大小将是不同的,因为在各种不同的国家,小生产者有着不同的比重。而如果它的比重不同,难道这不就意味着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比重”也将是不同的吗?所以我们这里说的是,在一些国家,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将有更大的规模,而在另一些国家,规模则要小一些。这些差别必须指出,为的是防止生搬硬套,而这样的防止是有着国际意义的。所以我们绝不能说,合作社到处都将是极其重要的杠杆。可能会有其他的方法,我们不知道这一点,不是一切都已经清楚了,革命性的创造可能会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形式。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在这里的做法是正确的。

米柳亭同志还有一个考虑,这也是他的讲话的基本内容。他是从这一点开始的,也是用这一点结束的:说是有人说纲领应该是指令。

我应该说,这是我说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sup>100</sup>,但是我在说这一点的时候,我指的是我们的纲领,俄共(布)的纲领。而且是从我们是掌握政权的党引出这一点的,所以我们的每一句话都在变成具体的行动。但是我不记得有什么人说过纲领应该只是指令。我认为,斯大林也没有说过这个。

斯大林:没有,没有,无论如何没有。

布哈林:我不知道,米柳亭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不能把一个国家的纲领和策略直接用到另一个国家身上。要知道,我们已经约定好了,谁也不反对构筑纲领的这个原则,共产国际的每个国家支部在总的部分之后

将有自己纲领的专门的、“民族的”部分。

而且我认为,这些民族的部分可以比总的部分变化得更快。一个党可以在两年之后就改变自己的民族部分,因为一个国家的事态变化可能会比社会主义的世界发展过程中的事态变化更快。有人说,草案非常“理论化”,但是这种抱怨是不正确的。什么是“理论化”?纲领在理论上就是,也应该是凝聚的。就是我们的老纲领在理论上也是凝聚的。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提出的问题是关于“阐述的形式”,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当然可以试试在做些工作,需要对阐述的形式再做些工作;但是如果说我个人的意见,那我认为,我们未必能够做到有大的重新改动,这是为什么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我们想有更像宣言的形式或者更通俗的形式,那这必定要同时扩大纲领的篇幅。如果我们说:“资本的有机组成的增长”,这算是通俗吗?不,不通俗。而如果想要说得通俗,那就需要不用这四个词,而用15个,还可能是20个词。

斯大林:24个。

布哈林:可能是24个。所以需要试试从更通俗的意义上做出某些修改,但是在这里未必可以期待有什么决定性的改变。这是一项如此困难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不能援引《共产党宣言》这样的东西。无论是在风格上、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等等,《共产党宣言》在所有方面都是望尘莫及的样板。但是我应该说,《共产党宣言》所发展的理论思想的数量还是较少的,因为这是对共产主义原则的第一个声明。它更少“事务性”,它更少“指令性”。为什么是这样,是可以理解的。例如,那里有没有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呢?没有,而且说起这个也是可笑的。那里有没有用展开的形式分析过渡时期呢?也没有。

奥新斯基:有。

布哈林:有,但不是展开的。有些东西那里是有的,我也和你一样,很清楚这个,但是展开的形式并没有。那里有对像殖民地、它们的特点等等这样问题的具体化吗?也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要求做到这一点是可笑的。问题不在于写得好坏,我们的纲领当然要比《共产党宣言》写得差远了。

柯秀尔:不能这样要求。

布哈林:但是我应该提醒的是,《共产党宣言》总还算是一本像样的小册子。但是在各种问题的篇幅上,清楚的是,那里的问题少。如果追求《共产党宣言》的语言和它相对的通俗性等等的话,我们应该把纲领加长一倍了,这是需要直截了当说出来的。

在过去的草案,第一个草案里,我曾竭尽全力地压缩和把阐述简单化。但是

那里漏掉了一系列问题,我们不得不补充草案。是在各党工作人员的大量要求的压力下,不得不做补充。这里有一个插曲,可以说明我们是怎样在共产国际的纲领委员会里讨论纲领草案的。片山潜站出来:你们在关于国际革命的基本事实方面列举的那些点里忘记了日本发生过所谓的“大米暴动”,在朝鲜发生过争取独立的革命斗争。然后墨西哥的同志站出来:这里对墨西哥一个字也没有提。来自南非的同志站出来:难道你们不明白,南非起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因为它是反对北美合众国帝国主义的堡垒。巨大的压力来自所有的同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们感觉到的是斗争的实际需要,他们想要在共产国际的总纲领里对他们的党“说上句话”。这是需要考虑的。他们要求更具体些。我对共产主义运动成长的报告如果不是抽象地而是具体地提出问题来,这就应该反映在扩大纲领的篇幅上和纲领的语言上。我们不可能完全迎合这些要求,我们应该给出一个概括的景象,我们不能不因此压缩纲领,而要做到,就只有靠损害阐述的通俗性了。要知道,任何代数公式都可以把算术公式压缩好多倍,但是为了用代数方式来表达,事先就需要考虑到,懂得代数要比懂得算术困难。

还有一个意见。我想,不得不这样来安排了,让国际代表大会委托制订一定的材料来介绍纲领。这个介绍材料应该是一部完整的著作,一部大部头的书,它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通俗地分清楚。同时纲领应该能够通过一系列分析纲领中的个别问题的单行本、单页、小册子等等来得到普及。纲领是经过压缩的、浓缩的著作,需要有一整套解释性的著作。否则是不行的。如果这个任务能够实现,哪怕是在一定的比例上实现,这也就很好了,因为我认为,我们最大的缺点之一,就是共产国际最近出版的理论著作相对比较少,宣传著作也少。在共产国际存在的第一阶段时,各个共产党以及整个共产国际都能非常坚决地把共产主义思想变得十分有成效,把大量新的思想“抛给了”工人运动,而社会民主党是处于防御状态的,现在社会民主党生产了大量的著作产品。我说的不是在我们苏联条件下出版的著作,它是非常单方面的,因为它是面向苏联的,但是总的来说,社会民主党出的著作现在比我们多。是叛徒的产品,但是更多。而且同时还做出了叛徒的理论总结,很大的理论总结。我指的是,比如说考茨基的两卷著作,雷涅尔的著作, O. 鲍威尔的著作。有一大批很大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正在竭尽全力地工作。而我们拿出来的太少了。这是我们的缺点之一。我想,我们从组织上加强我们的政治影响做得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这方面缺乏好的、从相应的共产党的需要出发写出的宣传作品。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也将会使宣传作品更加丰富。这是非常好的。



我代表我们的委员会请中央全会基本上通过我们提交的这个纲领草案。

**主席(李可夫):**讨论结束。我有全会的这个决议的草案:“纲领草案基本通过,对改变纲领的文字提出的建议在全会上不做决定。建议所有在全会上发言提出修改意见的同志将意见书面提交联共(布)代表团。建议联共(布)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保障在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里审议这些修改意见并尽可能有修改意见的作者参加。”

现在这样的决定是由局势产生的。最合适的做法是建立委员会和把在这里提出的修改意见用全会的决定通过,但是代表大会会议将从7月13日开始,也就是在几天之后,而且如果我们选出委员会的话,还是这些代表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他们的责任是筹备一个星期后就要召开的代表大会。所以,为了保障全会和我们联共(布)代表团以及代表大会能够最有成效地工作,虽然并不否认这里提出的一系列修改意见是正确的,合适的做法是直接把它们提交给代表大会本身的纲领委员会去讨论。而且就提交给全会的决议来说,联共(布)代表团应该力求保障那些在这次全会上提出了修改意见的代表能够亲自参加纲领委员会的工作。

**主席:**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发言。

**斯克雷普尼克:**我认为李可夫的建议的措辞不符合他的发言。发言里说到必须把建议提到共产国际的纲领委员会里去,这是正确的建议,而在书面的建议里说的是交给联共(布)代表团,这是不正确的建议,因为这里建议的提法说的是能够进入共产国际的只是那些联共(布)代表团将同意的建议。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在制订纲领的问题上不能让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就能哪怕是把某个面向整个共产国际的思想窒息了。(笑声)

**柯秀尔:**说这样的话干什么?

**斯克雷普尼克:**我的天性就是这样的,有点烈性子;为了尖锐些,请允许能够这样表达——就是故意这样说的。为了不把面向共产国际的思想给扣住了,我才建议:在说到“提交给联共(布)代表团”的地方加上“和共产国际纲领委员会”。

**主席:**在决议草案里是这样说的,在全会上提出过修改意见的同志们以书面形式将它们提交给联共(布)代表团,但是没有说这些同志不把它们提交给代表大会的纲领委员会,也没有说提交给代表大会本身。在这中间没有任何扣压和刹住的意思。我们建议给我们的联共(布)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代表团发出这样的指示:“建议联共(布)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代表团保障在第六次代表

大会的纲领委员会里审议修改意见”，也就是说，全会决定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的代表团不仅不要把斯克雷普尼克压下去，而且要帮助他并且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委员会里讨论他，斯克雷普尼克，以及所有其他人的修改意见。这里说的是十分清楚的，我再读一遍：“建议联共(布)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保障在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里审议这些修改意见并尽可能做到有修改意见的作者参加。”照我的看法，措辞是最宽的了，是能保障任何可能的民主和对斯克雷普尼克的帮助的了。

臧声：翻译成乌克兰语。卡冈诺维奇给他翻。(喧闹声，谈话声)

主席：布哈林同志发言。

布哈林：我现在应该提醒大家，共产国际的纲领委员会的决定说的是，任何一个共产国际的成员，无论是什么种族、民族、性别、信仰，都可以而且应该对代表大会的纲领委员会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而且可以用任何一种语言。

斯克雷普尼克：把李可夫和布哈林同志叫出来做出这些解释，我完全满意了。(笑声)

主席：现在表决。谁同意这个建议？谁反对？谁弃权？一致通过。现在休息。休息后是米高扬同志的报告。

(休息后)

主席(李可夫)：米高扬同志发言。

根据程序要给米高扬同志1个小时作报告。他在和我交谈时说，一小时未必能讲完。我建议，考虑到问题的重要性，给米高扬的限制只是一个条件，他要在午饭前结束。有没有不同意的？没有。

你讲吧，米高扬。

## 在总的经济局势下的粮食收购政策

米高扬：同志们，我们有一系列的困难是党无论如何不能绕过去的：粮食收购上的困难，它们在最近这段时间表现在了对基本消费地区的粮食供应困难上。粮食收购地区以及消费地区的一部分农民的情绪在恶化，这是由于最近这段时间粮食收购上的困难和对消费地带，特别是对农民的供应上的困难造成的，我们对这种情况不能视而不见。基本的工人中心地区多少还能保障粮食供应，但是这些地区的农民对粮食有着更强烈的需求，现在不能充分地满足粮食供应。在

这个基础上,一部分农民居民的政治情绪有某些恶化。当我们说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想,抹杀它们是不对的,因为抹杀这些困难就会造成它们更加深化的局势,而这有可能导致发生各种更严重的复杂情况。另一方面,我认为也不能过分地夸大这些困难和对它们做出恐慌的评价,因为任何恐慌的评价都会导致恐慌的结论。总之,恐慌在困难的条件下是要坏事的。需要的是清醒地考虑阶级力量的布局,需要的是冷静地考虑现实的经济和政治状况,需要的是冷静分析现有困难的所有原因,以便为进一步前进创造更为正常的局势。

既然粮食收购和粮食供应问题是和整个国民经济总的局势紧密联系的,所以在转向评价我们的这些困难和我们在该领域里的前景前,我想对国民经济其他领域的指标说几句,为的是确定粮食困难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和规模。我们是不是在那里也有很大的困难,或者是那里一切都很好呢?虽然粮食收购和粮食供应有很大的困难,在一系列农民地区引起了政治上的复杂情况,但是国民经济的所有其他指标,基本的指标,是健康的,而且一系列指标比去年要好。

国民经济首要的基本力量,我们的制高点之一是工业。工业发展的指标今年和往年相比要好得多。工业产值的增长在8个月里比去年提高了20%,也高于控制数字,当然,比后来批准的工业财政计划要低一些。这是巨大的增长,因为还在第十五次党的代表会议<sup>101</sup>上,就已经正确地确定了,随着进入改造时期,增长速度将会比在恢复时期慢一些。

如果我们来看看我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年在8个月里,和去年相比,我们就把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3%,但是应该说,去年计划预计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际达到的结果是有比较大的距离的。今年我们有了很大的转折,虽然这还不够。

在工资方面,计划要增长7%,而在8个月里我们把工资基金扩大了11%。所以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的对应关系比去年更好了。

工业产品的成本我们在两年来没有能有明显的降低,有些地方甚至是提高了。但是,虽然有所有这些困难,虽然在这个领域里还不是一切都做到了,我们在6个月里,在今年上半年,降低了成本5.3%。计划规定的是6%。所以你们看到了,我们是接近于完成了。

工业领域里的基本指标多少是健康的,而且表明了趋势是比去年有所改善。我想,在工业建设领域里暴露出了极其大的失算、错误、缺点和考虑不周的地方,这并不能缩小我所列举的那些良好的指标的意义。问题在于这些发现了的失算

和错误的事实并不是唯独今年才有的:它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今年以前的若干年,而且未必就能肯定,这样的事实今年就比去年多。由于沙赫特案件和其他类似案件的结果我们搞清楚的那些东西不是削弱了我们,相反是我们由于这样而变得比以前更有力了。我们今天更有力了,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经济肌体里的脓包,把它们挖出来了。我们知道了我们工作中所有的薄弱地方,它的所有缺点,我们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警惕性,把党和无产阶级的所有力量都放在了和工会、党、苏维埃和社会工作中的缺点作斗争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很多,但是如果拿所有这些和以前相比,那当然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但是这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使我们心安理得,工人的自我批评应该能保证改正错误和改善经济工作。

如果我们来看看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经济领域里的对应关系,看看表现为所谓的“剪刀差”的工业商品和农产品之间价格的对应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领域里,我们也有了比去年更良好的对应关系。要知道,事实是,今年的困难不是来自于农业经济的衰退。事实上我们的农业经济提高了,这是中央四月全会<sup>102</sup>的决议里确定下来的。

这个图解(见附件3图表1)简要地描绘了“剪刀差”的变化情况。我们在1925—1926年度和1926—1927年度的“剪刀差”有多么大呀,而且在这两年里,这种差别还是很厉害的,但是到了1927—1928年度,由于顺利地降低了工业商品的价格,我们让“剪刀”的刀刃大大接近了。至少由于降低了工业品价格,对技术作物以及畜产原料的价格有了一些提高,我们没有了剧烈的剪刀差距,甚至有了某些减少。我们做到了在工业商品非常匮乏的情况下把价格保持在了降低的水平上,这是以前没有做到的,这也应该算是好的方面。这些都能从好的方面说明局势特点的。

接下来,和去年相比,极其重要的指标之一是我们的货币流通状况,现在比去年好了。去年李可夫同志在中央全会上的通报里正确地确认了,那个时候货币流通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发行的十卢布面值货币量比应该发行的要多,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有了通货膨胀的某些迹象,这也影响到了今年经济年度开始时的状况。今年在这方面有了更良好的对应关系:十卢布面值的货币发行增加量和国民经济的需求是完全适应的,这里将不会有任何突破,因为我们肯定在将来也能够做到维持货币量和流通需求之间的相应关系。

我想更详细地说说我们的经济生活中的两个方面,这里既有好的地方,也有很大的缺点。薄弱的方面是我国的原料经济问题、农业原料问题和外贸周转及

外汇状况问题,这是国民经济最棘手的问题,也是党的十五大明确下来的。需要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些问题上来。

在原料领域里,我们在1925—1926年度有惨重的失败,其表现就是由于当时急剧降低了价格,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减少了。技术作物发展的上升曲线变成了下降曲线,这对我们工业的发展和出口是一个威胁,很危险。去年我们的工作是要消除原料经济的危机。由于采取了措施:扩大作物播种的集中化,改善肥料、种子和机器的供应,加强信贷和农业税的优惠条件,提高某些作物的价格——由于有了所有这些措施,我们很快就做到了技术作物及其收成和商品率的进一步增长。这种增长很快就延续下去了,并且最鲜明地在向日葵、烟草、棉花、甜菜和蚕茧上显现出来。但是甚至在有了这种增长的情况下,这些种类的原料还是不够我们用,因为需求仍然是很大的。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削弱,而是应该更要加强提高那些作为我们的轻工业发展基础的农业原料领域的工作。特别是在说到向日葵的时候,应该提到的是,虽然在收购向日葵的时候我们已经超过了战前的标准,我们还是感觉到葵花油不够。可以解释这种状况的是,相当数量的葵花油不得不用做工业原料了,例如用于生产肥皂,而在战前,每年是要进口500普特的各种油脂的。现在我们几乎是完全不用进口油脂了,是用向日葵、棉花和亚麻油来满足工业的需要。这也是由于今年我们有了比战前还要多的葵花油,但是并没有完全到老百姓的手里,于是我们还是在葵花油上有很大的缺口。

拿今年前8个月农业原料计划收购的结果和去年相比,说明只是在烟草方面,收购落后于去年。牛油几乎和去年收购的数量相同。我应该发出警示的是,油的收购,特别是5—6月在西伯利亚的收购,不能令人满意。许多人解释说,这是因为饲料不够,自然在收购过程上也就会有所反映。看来也还有其他来自收购单位的原因,这是应该排除的,这样才能加强我们工作的这个薄弱领域。

在所有其他种类的原料上,收购都超过了去年。棉花的收购达到了128%,烟草——138%,葵花子——175%,大牲畜皮革——131%,小牲畜皮革——132%,秋季兽毛——144%,春季兽毛——145%。这些种类的原料收购相当幅度的增加无论如何也还是解决不了原料问题,因为对它们的需求还是远远没有能满足。蛋的收购今年是去年的142%。至于肉类,应该说计划收购量很大,增加了308%,但是还有困难,而且可能是由于私人收购量大大减少和新的收成有一些特点。

我认为有必要把你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亚麻种植和亚麻收购问题上来,这里在经历了1925—1926年度的失败后,我们已经两年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困难

和消除亚麻危机了。为了改变局面,劳动国防委员会还在去年就通过了一系列决定。第一,向亚麻种植户提供税收优惠;第二,供应便宜的粮食。这样一来,我们一直到最近的几个月都还能承受住供应上的困难。推行了预约合同制的计划:当然,去年合作社对这项任务完成得不好。今年的春季播种要顺利些。我们是把预约合同制和在更大规模上(但是还是不够的)供应矿物肥料和纯种联系在一起了。以无息贷款的形式根据预约合同预支了款子。但是预约合同制包括的面积还非常小。明年将应该有力地扩大。

最后,去年我们把亚麻的价格大约提高了一个卢布,为的是加强对亚麻的生产及其商品化的刺激。我们曾经有过关于提价多少的争论,但是劳动国防委员会认为不超过一个卢布。不过所有这些看起来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能把亚麻生产和亚麻收购提高到1925年的水平,更不要说是差距很大的战前水平了。数字说明亚麻的状况是灾难性的。我们就倒霉在没有能得到关于亚麻、它的播种面积大小、总收成和商品剩余额的准确数字。虽然是这样,中央统计局的数字还是正确地反映了亚麻生产危机状况的。战前的总收获量是2600万普特,而今年是1600万普特;一俄亩的产量在战前是26普特,现在是14普特。最具有灾难性的事实是亚麻的收成实在太低。这里需要的是提高亚麻产量的系统和长期的措施:一整套的措施。

第二个问题是滞留在农户里的问题。如果可以相信中央统计局的数字,战前农民自己加工的是300万普特的话,今年就是600万了。工业的需求和战前相比,已经从和平时期的400万增加到了今年的500万,但是由于收购不上来,这些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亚麻厂有相当多的天数是停产的。至今我们要用大约100万普特的亚麻加工麻袋,除了特殊类型的麻袋外,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采用这种做法了。劳动国防委员会做出决定,从10月1日起,不再用亚麻做麻袋了,只是特殊需要的类别除外,改用比亚麻便宜很多的洋麻、黄麻、大麻作原料。

战前出口大约是1250万普特,今年只有150万普特。这说明需要在亚麻生产领域里采取特别措施,争取无论如何要提高亚麻的生产,否则就不可能发展我们的亚麻工业和出口。这个问题我们在政治局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提了出来,希望能得到根本解决。

在采取一切措施提高亚麻生产的同时,特别是联系到提高粮食价格,我认为有必要把亚麻的价格提高20%,以便在有亚麻种植的地区鼓励亚麻生产。今年的亚麻收购计划没有完成,这是由于中央统计局在考虑亚麻出路上犯了错误,而商业人民委员部在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和所有部门同意的情况下,编制了一个

夸大了的收购计划。中央统计局的数字说的是这方面比较良好的状况,而不久前得到的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材料是在反驳中央统计局的材料。财政人民委员部也考虑到了亚麻的数量,而且说在计算征收多少税的时候通常农民是隐瞒和缩小播种面积大小的,那么,既然在亚麻这件事上提供了优惠条件,农民关心的就该是不减少和不隐瞒亚麻的播种面积了。所以从财政人民委员部的这些材料看到的是,亚麻的播种比中央统计局的材料上说的要少。中央统计局在年初报的第一个数字是播种面积为115万公顷。而在12月,中央统计局把数字减少到了114万公顷,而在4月,它又把数字减少到了113.8万公顷。财政人民委员部提供的是94.3万公顷。差别很大。看来中央统计局的材料是夸大了,而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材料更接近实际情况。收成的情况也一样。我们在亚麻这件事上,在两年里没有能取得成功,上面所说的,就是这个领域里的那些最重要的事实,说明了亚麻经济存在着危机。

至于其他类型的原料,我们也将必须迅速扩大国家的原料基地,因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遇到的是原料基地的狭小。我们不能扩大棉纺织工业、皮革工业,不是因为生产设备已经满负荷了。我们有相当大的生产储备能力,由于我们的经济体制,由于缺乏国内原料和由于没有外汇资源来扩大从国外进口,我们还没有能把这些能力利用起来。

我认为,在这两年里,我们在一系列领域里是有了相当大的成就的。成就总是成就。但是应该把所有力量都放在排除我们所有的困难上。在原料领域里,首要的和基本的困难是亚麻问题。

如果回到我们的进出口、我们的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上,那么,虽然这里没有任何计划上的疏漏(如果不算粮食的话),但是我们面临的是非常紧张的局面,比最近两年还要更紧张。这是由于什么缘故呢?你们知道我们的整个出口是落后的,我不再谈它的原因了。最近政治局的计划里有一项是要审议我提出的关于提高苏联出口的报告<sup>103</sup>,我想,在那里会通过一系列措施,保障把出口恢复到我国需求的水平上来。如果抛开粮食(关于粮食我将单独说),我国的出口有以下数据能说明它的特点。如果说我们在1926—1927年度把出口的其他项目(不包括粮食)提高了12%的话,那么,今年在出口的所有其他项目上(除粮食外)我们都提高了31%。你们看见,我们这里在所有的出口项目上(除粮食外)都有很大的增长,但是还不足以减轻由于停止粮食出口造成的困难局面。包括粮食在内的总的农业出口落后于工业出口。因为工业已经恢复,工业出口进行得比较快,它总的已经超过了战前水平,而且参与出口的,主要是就自然财富而言反映

出了我国具备特别良好条件的那些工业部门：石油、铝、石棉，等等，最近跟上来的还有火柴，也是和我们的资源(原料)有联系的<sup>104</sup>。木材的出口情况不好，虽然我们国家有着巨大的、我们还没有利用的条件。我们提出了快速发展木材出口的任务。但是总的是出口状况非常困难，而提高出口的任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提高出口我们就不可能创造外汇储备，也不可能满足国家对进口我们必需的各种原料和消费品的需求，这是我们需要，没有它们我们就不可能前进。

我们今年有什么出口呢？如果粮食不能出口了，和去年相比，我们就要因为粮食而损失1.68亿卢布的赢利，那么，由于其他商品出口的增长，我们能为粮食不能出口补上1.50—1.55亿卢布。这样，我们的整个出口就要比去年少1500—2000万卢布。虽然在明年的出口计划里，我们也去掉了粮食的出口，但是认为粮食就不能出口了是不正确的。无论我们能多快地发展其他项目的出口，特别是工业项目的出口，如果在最近这些年不能把粮食的出口扩大到2—3亿普特，我们就做不到把出口恢复到战前水平或者恢复到我们的经济所需要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对所有其他出口项目的关注并不能抵消粮食出口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又是重新集中到了粮食问题上来了，集中到了粮食经济的问题上来了，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要更详细的说到。

由于在对外政策上的正确周旋，在异常紧张的局势下，中央委员会做到了把战争的威胁推迟了一年以上的的时间，而且是无须做出特别的牺牲，作为对不发生战争的赎金。这样的政策我们今后也还要继续推行。尽管是这样，我们的对外形势还是非常紧张的，而且不见得就会有很大的减轻。所有这些都直接反映到了我们的对外贸易关系上，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克服很大的困难。

我们过去克服了英国和苏联断交<sup>105</sup>引起的对外贸易上的困难。我们用减少从英国进口的业务对断绝关系做出了回答，没有限制地继续出口。英国工业和商业采取了放松贸易条件的办法来保存英俄贸易。密德兰银行签订了1亿卢布的贷款，我们也批准了这样做。它在断交的时候把贷款取消了，后来又恢复了，并且增加到了1.5亿卢布(1500万英镑)。英国的订货开始逐渐恢复，但是在断交之后发生了德国贷款局势的恶化。德国人企图利用和英国断交这件事。我们和美国的贸易有可能扩大的前景让他们感到不安，他们在这件事上非常嫉妒，想要成为我们和全世界之间的垄断的中介人。我们曾有来自德国人对我们的压力。

简而言之，这就是对外贸易紧张的那些赤裸裸的事实，它们更尖锐地提出了



必须要有外汇积累,它们集中到了粮食问题上,没有粮食的出口就不可能积累外汇。按今天的版图计算,战前苏联所有的出口是13亿卢布,其中7.02亿卢布是粮食,也就是说,战前出口的一半以上是粮食。而现在的粮食是这样不值一提的数字,根本就不能考虑。我们在今年运出的所有粮食作物是0.27亿普特(1926—1927年度是1.65亿普特),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它们运出去,那倒更好些,因为在年底的时候,局势到了如此情况,我们甚至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了。在过去的几年里,有一些粮食出口是因为收成好。而且在战前,在中等收成的情况下,粮食的出口是6—7亿普特,也就是说,如果在最近的三年里收成不是中等以上而是中等的话,那我们就已经没有任何粮食出口了。

这就是为什么不仅从保障国内需要的角度,而且从出口的角度来说,粮食问题都变得尖锐了,而出口是保障外汇储备的唯一手段:第一,万一发生自然灾害、歉收饥饿等情况时是这样;第二,在外部情况复杂、受到封锁、半封锁、施压和战争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第三,就是为了普通的经济运作也是这样。我们没有这样的基金是不行的。我们如此必需的外汇储备问题完全就是取决于粮食经济的。国家的粮食储备也是取决于它的,要有防备歉收的保险,要防备万一发生战争,要顺利地调整国内的粮食市场,对于所有这一切来说,这都是非常必需的。这就是为什么外汇储备和粮食储备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个任务是不是能实现,都集中到了粮食问题上。

作为对我国外汇状况的材料的补充,我应该指出,唯一可以松口气的,是从国外运进来的大约4000万的进口商品,它们是我们这里生产不出来的,而对于国防来说是有意义的。这样,我们这里除了纯外汇外,还有4000万卢布的进口外汇商品。这种保障是不够的,但是应该看到,去年我们是完全没有这些商品的。

我还想对我们贸易的顺差和逆差说两句。如果拿来几年的数据,我们看到的也是一幅不好的景象。战前,五年平均的外贸顺差是3.6亿,1913年是1.46亿;1924—1925年度我们有的逆差是1.65亿,1925—1926年度是0.79亿。去年我们首次争取到了顺差0.56亿卢布。今年我们又是逆差,已经是1.07亿卢布了,而且需要知道的是,这个逆差是有特殊性的。这样的逆差的得来不是因为有失算的地方,计划上的逆差或者是计划没有完成。不是的。这是因为1925—1926和1926—1927年度使用的德国的1.5亿贷款没有算到进口计划里。今年从这笔德国的贷款中来了大约1个亿的设备。另一方面,大约有4000万是超计划进口的,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进口商品储备。于是大体上是超计划的

1.4亿卢布压在了外贸平衡表上。

我们对明年规定了1个亿的外贸顺差,虽然外汇积累将不会很大,而且如果在我们的经济发展中出现不好的情况的话,积累可能就没有了。

这样,国内粮食供应的困难,进出口领域里的困难都集中到了粮食问题、粮食经济问题上。在搞清粮食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区分两种类型的原因:一种原因是长期的、根本的、构成困难基础的原因;另一种是今年的特殊原因,它们引起了局势的尖锐化和在上半年收购的失败。需要把它们区分开来,是因为两种类型的原因需要有两种排除它们的措施。排除根本原因的措施会对若干年产生后果。对于特殊的原因来说,应该是从在最近就能产生效果的那些措施中找到答案。

我们在粮食收购上的根本困难是我们的粮食经济危机。它表现为我们的农民经济落后、分散,而且农民经济越变越小的趋势还在继续,这不仅反映在收成上,而且也反映在经济越是分散,它的产品的商品率就越低这一点上。在给红色教授学院学员作的报告<sup>106</sup>里,斯大林同志对这一点做了相当清楚的论证。我同意这个报告的各个论断,就不再谈这个问题了。

斯大林同志引用了中央统计局提供的关于战前时期粮食生产者的各个不同社会集团拿出来商品粮数量,这些数字表明,分散、零碎和落后的状况在现在的农村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越发严重了,这是商品粮减少的基本原因。如果在这上面再加上播种面积所表现出来的粮食经济的落后状况,那么景象就会更清楚了。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比战前提高了,是它的130%,而在粮食的播种面积上,我们只达到了战前的92%,也就是说少播了8%,总产量大体上也就是3.5亿—4亿普特。8%没有恢复的粮食作物面积让国内的粮食总产量减少了3.5亿—4亿普特。除此之外还要看到的是,我们的人口在迅速增长,城市和农村都在增长。在最近这些年里,城市人口的增长每年大体上是6%,而国家的总人口每年增长2%,而根据中央统计局的资料,苏联人口比1914年大体上增多了1100万。这些增多的人口要多消费1.4亿—1.5亿普特的粮食。

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了粮食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农民经济的分散、零碎,它的落后,在国内,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的粮食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都在增长的情况下,播种面积没有完全恢复。结果是我们国家没有了6亿—7亿普特的粮食出口。我们不仅是在收成不好的情况下,就是在中等收成的情况下,也不能保障自己有一定数量的粮食出口。

粮食经济落后,还有一个情况是起了重大作用的,那就是粮食价格在我们这

里总是比其他农产品低。所以剪刀差很大的重担就落在了粮食经济上,而且不应该忘记一个情况,那就是在非黑土地区和在产粮区,播种面积的大小对于有多少粮食可以被分离出来作为商品粮,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例如,在中心区的各个省里,播种面积大小对收购没有多大意义;我们从那里几乎得不到商品粮。在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乌克兰、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些州是商品粮生产很高的粮食工厂。应该注意到,正是这些地区在国内战争中受到的破坏最大,那里的富农最多,从恢复和扩大播种面积的意义上说,在国内战争时没收了他们的土地,但是并没有能让贫农和中农来把这个缺口补上。这就是为什么在非商品地区的播种并不比战前少,但是在产粮区,播种面积就大大落后于战前了。除此之外,应该记住的是,我们这里的统一税收是建立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至今主要建立在对土地的征税上,而对农民的所有其他收入的征税则比较少。所有这些都为粮食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条件。

在促进粮食生产的一系列措施中,价格政策有着重大意义。但是,把一切都归结为价格问题当然是不对的。价格有着重大意义,这一点是不能回避的。但是只有这一点是不够的,只有这一点也解决不了粮食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一整套的措施,它们将会对我们的农民经济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作为例子,可以说我们对棉花种植和甜菜种植采取的措施。在这里,我们没有提高这些作物的价格,但是我们采取的所有措施加在一起,就对从事这些作物生产的农户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推动。

在评价我国国民经济的各种不足时,我们应该确认的是,国民经济总的来说是在健康的基础上发展的,超出常态的困难是从国民经济的生长需要改造调整的那一部分产生的。我们看到,危机并不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都有的,我们看到的甚至也不是整个农业的危机,因为在技术作物领域里,除亚麻外,我们是有成绩和发展的。我们看到,农业经济的收入在增长和扩大,特别是富农经济的收入增长了。这是所有的事实和数据都证明了的。富农经济的收入比其他农民群体的收入增长得相对快些。另一方面,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是粮食经济。正是我们的粮食经济发展微弱,这才是今年粮食收购出现困难的根本原因。

今年困难的特殊原因,我在四月全会的报告里已经说清楚了,而且也写进了这次全会的决议里<sup>107</sup>。所以我认为,再详细谈这些原因是多余的了。今年在粮食经济危机的基础上,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严重地破坏了市场关系的平衡:总的来说,农村收入,特别是富农经济的收入有所增加,但工业商品不足,更确切地说是工业商品价格下降,而我们的这些商品在今年的条件下本来也是不

够的\*，征税赶不上农村富裕阶层收入的增加。在这些严重的条件下，计划领导的错误更加重了困难。由于我们的收购机构有缺点，由于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农村各个阶层串通一气，而且也常常由于在我们的收购机构的支持下我们的政策执行不下去，所以我们的工业商品周转不开。\*\*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在收购上遇到了困难，而且在1月份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表现为与去年相比的粮食缺口达到了1.28亿。在我们没有储备的情况下，这个数字说明我们在1月份不仅是面临着粮食危机、征购危机，而且是面临着整个国民经济总危机的威胁，面临着最严重的危机。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个危机消除，我们就要关闭工业和所有其他的经济部门，把我们的各种经济发展计划都撕毁。中央委员会在1月采取的、4月由中央全会通过的那些措施，防止了发生这种从粮食收购的危机必然要产生的国民经济极其重大危机的危险。多亏1—3月份顺利进行的运动，我们到了4月1日的时候，和去年相比，恢复了收购的规模。这样才排除了困难。

我们这里是怎么搞的，怎么到了年末又有了新的困难呢？在3月和4月之后出现的哪些困难确定了4月之后粮食收购又出现困难呢？在今后粮食收购过程正常的情况下，恢复去年的收购规模保障了可以正常地向新的粮食收购过渡，也使得我们不必重新采取非常措施了。关于这些措施，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会不得不确认的是，这些措施应该取消，而且随着把我们在粮食收购中的困难排除掉，就可以不采取了。我们曾预计，在4月之后我们将有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我们能够摆脱掉非常措施的实际做法，可以用其他的措施来保障粮食收购的进程。但是，在这之后一系列的事实使得局势恶化了，实质上决定了我们现在出现的这些困难。这些新的基本事实在那次全会上我们还没有，而现在却成了决定新的困难的极其重要的情况之一。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事实呢？

其中一个基本情况是，乌克兰南方和北高加索是我们苏联的小麦基本粮仓，那里是可供大量收购粮食的地方，但过冬粮食作物都死了，结果这些应该收购的粮食都没有能收上来。我们认为，由于这种状况，我们在这些地区失去了本来可以收购的大约2500万普特粮食。当然，在过冬作物死了的时候，有余粮的农民就完全不出售粮食了。在受灾的地区开始了恐慌。乌克兰处于了非常困难的境地。它本是基本的供粮区，是能为苏联中央运出大量粮食的。由于过冬作物的

\* 原文如此。——编者注

\*\* 原文如此。——编者注

死亡,乌克兰不能供应给我们了,因为它自己供应自己都已经吃紧了。北高加索也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困难。

这些情况造成的结果是,在收成前景不明的条件下,我们又一次在收购上加压了,触动了农民保险储备,这在一系列地区不可能不引起农民的不满和抗议。过冬作物死去的事实使得我们必须要在这些地区重新播种,必须提高贫农和中农的播种面积来对付富农减少播种面积造成的威胁。在这一年里,我们在种子上给了农民极大的帮助,这在去年是没有的。抛出了3 000多万普特的种子帮助农户。粮食虽少,但是我们最好还是为供应少留些,分给播种用的多一些,这在3—4个月后会有的结果。应该说,这场运动搞得很好。我们把春季作物的播种提高了很多,而且重播了85%死去的过冬作物的面积。为了保障春季播种和复种运动,需要大量耗费本来是收购来用于供应的粮食。

造成局势困难的第三个事实是,特别是从1—2月起,供应上的消耗超额了。这种超出计划的供应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第一,消费者的范围扩大了,这是自发地发生的,我们从地方上到上层都没有能抑制住这个冲击。要和这种情况做斗争,那是需要经受一场非常大的斗争的,因为在一系列地区,当对富农施加压力的时候,他对贫农的回答是不卖粮食,拖延或者根本就不卖。我们不得不采取反措施:把廉价的粮食卖给贫农,保障和富农斗争的后方,让贫农有保障,而且在第一场运动里(1—3月)由于这样做了,我们在这场斗争中赢得了相当多的贫农、中农群众的全面支持。除此之外,非常措施和行政压力的实际做法压缩了地方上的粮食周转,这就引起了靠计划收购扩大供应。我们没有顶住这个冲击,这就引起了在两个基本的生产地区,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粮食大量的超额耗费。除此之外,我们还不得不最大程度地、不考虑节约地向基本的原料地区供应粮食。要知道我们是有路线的,那就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这是我们在中亚推行的正确决定、正确路线:投放的粮食量要使得在中亚播种粮食得不到什么好处,为的是让农民扩大棉花的播种面积。

有人喊:那个指令是要在那里收获粮食吗?

米高扬:在中亚有一些特别的地区,那里可以在不让棉花受损失的情况下播种粮食,其中包括了在所谓的旱地上播种。在那里,我们今年从10万公顷种植粮食的土地中集中了5万公顷。由于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想在中亚能收购到1 000万普特的粮食。在那些有条件发展棉花种植的地区,我们有意识地在棉花播种之前抛出了大批的粮食,这也就保障了在扩大棉花种植面积上取得很

大的成就。所以在1、2、3月给中亚卸下的粮食是很多的。这些卸下的数字出现在了耗费的数字里,但是这并不是耗费掉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粮食都是在卸下的那几个月里吃掉的,而如果在6月没有向那里卸下粮食,这也不是意味着那里就没有粮食吃了。在播种运动之前应该向这些地区供应这么多的粮食\*,是想让农民能安心着手播种棉花。

亚麻种植地区也是同样情况。我们想的是给他们的粮食要能让农民安心地种植亚麻,但是这条路线只坚持到了播种之前。后来粮食少了,我们不得不减少向这些地区运粮。

再后来,为了保障木材收购,我们得到了劳动国防委员会不只一次的决定,这是绝对正确的决定,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为收购木材,责成我们一定要保障供应的粮食比去年多。由于有了所有这些,木材收购没有垮掉,顺利地结束了。在对粮食每月装卸和耗费的数字进行分析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

我们曾急忙在收购地区加紧装卸,为的是把基本的粮食积累集中到消费地区。1月的装卸是5300万普特,销售了4000万普特;2月装卸5900万普特,消耗4500万普特。这里也包括了中亚,我们是加紧向那里运送的。3月装卸5400万普特,消耗5000万普特;而4月收购停止了,向中亚的装卸结束了,4月的装卸是3800万普特,而消耗是2800万普特。5月装卸的是2700万普特,而消耗是3000万普特。

柯秀尔:这只是消费地区吗?

米高扬:这是所有地区。6月的装卸是2000万普特,消耗是2500万普特。7月的装卸是2000万普特,消耗照我们的规定是2700万普特。如果我们在全年都能够严格地节约,也还是不能排除在消费市场上的断档,而如果在收购地区更严格地遵守我们的销售计划,我们费很大的力气可能节约出1500万—2000万普特粮食来。

今年计划收购的所有作物粮食的全部耗费是6.18亿普特,比去年的4.80亿普特多出了1.38亿普特。从这中间应该去掉2000万普特只是在数学上算做是今年耗费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增加的粮食耗费量。这样算起来,今年的计划供应需要比去年增加的是1.18亿普特。其中我们耗费了4100万普特,用在了中亚和外高加索以及种子的信贷上,比去年要多。除此之外,如果计算城市人口

\* 原文如此。——编者注

每年自然增长6%的话,即便计划供应的比重没有增加,也还是要增加耗费3700万普特的。如果把这一切都去掉,那我们能够消耗的就是4800万普特,其中一部分用于扩大计划范围内的增加,另一部分就是计划外消耗的了,主要是在收购市场上以及在一些消费地区消耗的。这中间也有一部分是用在了扩大对我们的市场的占有。一部分超额消耗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没有能控制在那样的水平上。增加是应该的,但是它实际发生的要比我们预想的多。

伏罗希洛夫:从4000万普特中本来可以节约3000万普特。

米高扬:3000万是无论如何也节约不下来的,最多可以节约1500万—2000万普特,就是那样也是要对供应大砍一刀。这是怎样困难的事,从我们在5—6月份由于减少了供应得到的结果中就可以看出来。不应该忘记的是,贫农是这样对待粮食收购运动的:“如果你想要让我在粮食收购中支持你,你就给我留下点粮食,让我能维持到新的收成下来。那我就能更有胆量对富农施加压力。”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方针。省委会坚持要建立供应贫农的基金,如果我们要在和富农的斗争中保障自己的后方,那我们就应该走出这一步。这在北高加索和乌克兰显得特别突出,但是就是在所有的收购地区和消费地带,也都是这种情况。

另一个能够解释春末粮食收购困难的情况是,当我们走近农户时,看到的情况总是,那里并没有很多从中央统计局的谷类饲料平衡表出发本可以期待的粮食。如果说在前半年,困难并不是因为没有余粮的话,那么到了年终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是农村中的余粮骤减。是哪些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的呢?

一个原因是谷类饲料平衡表里没有预见到,而且任何人也都没有能预见到,春天姗姗来迟,又加上饲料不足,这样所增加的农户粮食消耗比正常情况多出了1亿多普特。

结果是根据专家委员会不久前的统计,农民用于牲口饲料、重新播种等等方面的消耗超出了谷类饲料平衡表上预计的1.25亿普特,相应地也就减少了商品余粮。此外,发现了今年的谷类饲料平衡表有9400万普特的误算,也就是说,总收成比当初预料的少了9400万普特。这样一来,制定粮食征购计划依据的中央统计局谷类饲料平衡表就有2.50亿普特是不能兑现的。这是中央统计局的专家委员会提供的数字,他们是我们国家审议所有这些问题的最优秀的力量了。

收成的情况不明,南方的过冬作物死亡,其他地区的状况不清——所有这些都造成的是一种令人坐卧不安的状况,在粮食收购这件事上引起了新的困难。我

认为(虽然不能援引专家们的意见,因为他们还没有拿出意见来,他们答应了过两个礼拜拿出自己的最后意见来),在农民看不见的储藏上也有相当大的失算。根据中央统计局的计算,这些粮食剩余在1925—1926年度开始的时候是1.53亿普特。在上个年初是4.23亿普特。这个年度初是7.20亿普特;预计到这个年度末,也就是到1928年7月时,是8.96亿普特,也就是说,农民大约有9亿普特的保险储备。我认为,现在每一个实际工作者,特别是到过粮食收购地区的人,都已经清楚了,这些数字明显是夸大了的。农民那里分散了的储备未必会超过5亿—6亿普特,也就是说,这里的误算是2亿—3亿普特,这相应地也就减少了作为收购基础的商品余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收购在5—6月触动了农民的保险储备,当然这不可能是带来痛苦的。在收成的前夕,在没有搞清楚之前,保险储备被拿走,这当然应该是会引起农民自然的不满和抗议的,因为农民需要有些粮食贮备作为保险,没有它们,我们的农民就不可能正常地进行自己的那种如此取决于自然灾害的经营。

这就是决定了4月这段时间之后粮食收购困难的那些基本条件。这种状况为粮食收购事业中非常措施、非法行动和行政性的肆无忌惮的复发制造了土壤。在涉及这些困难和农民不满的时候,应该说,和我们在4月时期之前所有的和可能有的那种不满相比,这种不满在两个方面、两条线上有所不同。问题在于,一方面,我们在粮食收购地区有的是由一种原因引起的困难、抱怨、骚动、不满;另一方面,在消费地区有的是完全另一些原因引起的不满、困难和复杂情况。

在生产和收购地区,是什么原因引起了一部分农民的严重不满呢?非常措施、紧急措施、过火行为和行政压力等等都采取了什么样的形式呢?

例如,我们看见的是搜查农户,发现了粮仓里有粮食就用暴力夺走,留下的保险储备非常少,关闭集市,等等。所有这些办法实质上是粮食征集制的办法,是本来只对富农采用的,就像在4月之前那样,但是也触动到了中农,这就不可能不引起一部分中农群众的不满。

在一些地区也发生了不仅对富农而且对中农采用第107条<sup>108</sup>的情况。所有这些不能不在农民中引起很大的不安。但是,说贫农和中农群众离开了我们是不对的。例如,在西伯利亚采用第107条的情况最多,而瑟尔佐夫和埃赫同志的评价是和这样错误的评价大不相同的。既然西伯利亚的同志们和北高加索的同志们的评价是相近的,我认为需要引用一下瑟尔佐夫和埃赫同志电报<sup>109</sup>里的话了,我是同意这样说的:“在富农怀着极端敌意的情况下,如果他们感觉到其他阶层是相当大的支柱的话,那么我们无疑就会遇到大量的敌对行动。中农阶



层在运动初期被新经济政策要取消的传说所惊动,现在相信了新经济政策是不可动摇的,平静了下来。这也影响到了部队里的情绪,虽然下级军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情绪不大好。在各种组织完全不会进行起码的解释工作或者只是会犯错误的地方,富农是能够推动事态发生一定逆转的。通常的情况是,如果派出一个负责任的、能讲道理的工作人员去做解释工作,积压起来的情绪就会得到化解,被富农推出来的贫农和中农也会考虑自己做错了而离去。大多数地区的播种面积扩大了。不久前,边疆区委常设局总结了实际采用第107条的情况,得出了结论。在详细分析了每一个被判刑的人的事实材料、他的经济状况后,得出了以下的看法:93%被判刑的人肯定是富农,7%是值得怀疑的或者明显是中农农户,对后者撤销了判决。

在大多数地区是有集市活动的,虽然地方上的工作人员时不时地总要诉诸于压制。”

要说产粮区,应该区分开两种类型的不满。中农抗议的是上面说的那些压制的措施,没有了粮食的贫农也抗议和表现出不满,那是因为集市关闭了,他们没有地方去买粮食,而且富农对他们说:“你要粮食吗?去找布尔什维克要呀”。

有人喊:合作社也不卖。只卖给社员们。

米高扬:就是在合作社里,也并不总是能得到的。在市场上或者集市上不可能买到。集市几乎都关闭了,撤掉了。被运动搞得非常恼火的富农对贫农说:“要想得到粮食,你就到别人那里去找吧,如果想在我这里得到,那你得把它挣出来,那我可以分给你点什么。”富农用粮食来制服一无所有的贫农。一直都是这种情况,但是今年这种情况发生得更厉害,我们可以见到的现象是,在一些地区,贫农对执委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给粮食。粮食都收走了,我们没有什么吃的了,我们反对收购。你们一收购我们就没有粮食了。”

一部分中农以及甚至是某些地区的一些贫农的这种不满,被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子们利用了,被用来恶化农村的政治情绪,把一部分贫农和中农引向中伤苏维埃政权。这个事实是不可争论的。显然可以说的只是,这种情况有多少和有怎样不同的程度,而且应该说,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在5月初到6月的时候,这些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在南方的各个地区,受灾的是冬季作物,不好的年景也增加了农民的不安,恶化了他们的情绪。这些情绪通过工人和农村联系的各种渠道,不可能不渗透到一定的工人层次中来。这也反映在农村寄给红军战士的信里。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农民的基本群众有一定的动摇,我们在产粮地区农村的

政治状况有某些恶化,这是在最近时期采用了非常措施及其过火行为和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巧妙地利用了我们工作实践中的错误造成的结果。我们没有权利抹杀这些事实,也没有权利绕过它们,不采取措施来消除它们。

在消费地区,特别是在梁赞、卡卢加、斯摩棱斯克省以及在农民地区的一些小城市里,有大量建筑工人、外出打工人员分离出来,需要粮食。由于减少了供应,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农村,都出现了食品困难和对粮食的要求。由于这样,在小粮店前排起了“长队”,在一些地方开始采用票证或者各种代用品。这些地区的一部分农民中的不满纯粹是食品困难造成的。

于是有了两股困难,而且第二股,也就是消费地区的困难,不是和那些决定了收购地区不满的非常的和行政的措施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起作用的,是我们供应的粮食不够。虽然集市并没有关闭,但是在最临近的产粮区的粮食流通被破坏了,这样,除了计划供应外,就减少了或者完全没有了粮食流向消费市场。

非常措施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从1月到3月我们填补上了1.28亿普特的粮食缺额,这样就避免了整个国民经济最严重的危机。在收购的最后一个时期,当农村里商品粮少的时候,非常措施没有在粮食上产生很大的效益,却产生了许多负面现象。把这些措施的实际做法扩大到中农身上更暗藏了极其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危险。除此之外,既然这些非常措施从一开始采用就被算是临时性的,所以也就不可能说到要把它们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实际做法,变成经常性的政策方针,因为这样做会意味着有一种威胁,那就是恶化贫农和中农群众的情绪,而富农由于善于利用我们的错误和农民中的动摇,会变得更加活跃起来,直接威胁工农联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坚决制止采用行政上唯心所欲的非常措施和在收购上采用粮食征集制的实际做法。把各种过火行为和行政施压的做法的责任都推到地方上去,说是地方上搞了过火行动,我们警告他们不听,这是不对的。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这是绝对不对的和虚假的。在某些地方出现过个别工作人员的各种蠢事或者直接的刑事犯罪,不能让地方组织为这些事承担责任,因为他们是和这些现象作过斗争的。如果撇开这些,那么,在地方上采取的所有行政措施和各种形式的施压,都是源于综合表现出来的上述种种情况,是由中央下达的那些任务的性质决定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一切都推给地方,也没有什么是可以懊悔的。

在这段时间里,地方组织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了,清除了腐败分子,变得更坚强了,得到了锻炼,在自己的工作中表现出了英雄主义的精神。要知道,从事粮食收购工作的大批共产党员是我们工作的真正受苦人。他们中间的许多

人在农村里是在非人的条件下工作的,他们承受的是粮食收购和党的其他运动的全部重担。

有人喊:最近报纸上却在鞭答这些受苦人。

柯秀尔:那是徒劳的。

米高扬:我认为不应该放任这种现象,因为多亏有了地方组织和被动员起来的共产党员,我们才制止了极其严重的危机的威胁。需要公开承认的是,我们的组织用自己的双肩承担起了粮食收购的极其巨大的重担,表现出了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活力和坚定,完全没有辜负党的信任。现在要说的不是为什么、在哪里和有什么样的措施曾采取过。要说的是继续采用非常措施的实际做法在粮食收购领域里再也不可能得到很大的结果了,而且这中间隐藏着恶化城乡关系、恶化工人阶级和农民关系的危险,隐藏着削弱工农联盟的危险,不仅是在政治领域里,而且在经济领域里,也都隐藏着负面效应。

从已经形成的整个局势中得出的任务是,要坚决防止的,不仅是任何扭曲、过火和行政上肆意孤行的实际做法,而且还有采用非常措施的做法。需要带着这样的准备和这样的杠杆进入新的一场粮食收购运动,要能排除采用非常措施的可能性,需要创造出一种环境来,要把对市场的灵活调节和国家的经济杠杆(税收—金融体制、收割前就签订合同、大量的工业商品、略微提价,等等)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能把粮食收购安排好了。

在现在的局势下,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完成它需要全力以赴。特别重要的是要活跃地方上的粮食周转、农民集市,没有这些将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要知道,在农民的內部,粮食的周转是规模相当大的,比我们的收购还要大。关闭地方上的粮食周转就意味着自己要承担起供应新的、分散的消费群体的巨大责任,这是完全不可能完成的和没有任何意义的。特别是一些小城市,应该采用地方收购和地方粮食周转的方式来保障供应。

在党内个别同志和党的周围的各种不同的人士的头脑里,我们所经历的困难引起了混乱,这种混乱隐藏着两个方面的危险。特别突出的是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在自己的心里和呼吁书里说,非常措施以及这些措施的各种过火行为和行政施压的做法是党在农村政策的经常性方针,而且他们在努力要把党的个别分子拉回到粮食征集制的道路上去,拉回到和农民基本群众吵架的道路上去。这样解释临时性的非常措施完全是从托洛茨基主义的农村方针出发的。党内的某些分子听信了这种说法,认为我们应该把非常的临时性措施变成党的政策的经常性方针。

本来就明白的是,这不可能符合我们党的政策,因为把非常措施和行政性的随心所欲变成党的经常性政策,把关闭集市法律化,等等,以及长期采用这样的做法,就会威胁到巩固的工农联盟;它会威胁到把这个联盟破坏掉,破坏掉无产阶级专政的牢固性和顺利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和这种情况坚决斗争。但是我们的斗争应该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这第二条战线是隐藏着巨大危险的,而且可能甚至会不是更少,而是更尖锐地在某些党内分子身上表现出来。人们看到我们所经历的粮食收购的困难、国内的困难,要竭力利用这些困难,把代表大会和党的决定所确定的我们的列宁主义政策引向另外的、对他们有利的轨道上去,而这是和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是在把我们拉进资产阶级的泥潭。

这两种危险的、和我们党的路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对无产阶级专政构成特别大的威胁的倾向,是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倾向在我们党内、在它的个别分子中的反映。个别同志面对正在经历的困难,企图利用这一点来改变党的政策,取消党的十五大关于向富农和私有者进攻的决定,给资本主义力量松绑,广泛地敞开新经济政策的范围,给城乡资本主义分子更多的权利和条件,抹杀十五大把集体化作为党的基本任务之一的方针,破坏建设新的国营农场和振兴老的农场。党应该对攻击自己的代表大会决定和它所确定的列宁主义政策的任何企图给予团结一致的回击。我们反对过火行动,我们反对改变党对农村的政策方针,我们反对把非常性的和行政性的措施变成威胁到和农民结合的党的政策的经常性方针。没有和农民的基本群众的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就将遭到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被颠覆。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是基本的贫农、中农群众有牢固的联盟关系。应该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回击来自任何方面的、改变十五大确定的党的政策的任何企图。

有的时候把那些想要把非常措施、行政施压和粮食征集制的办法变成我们经常的政策的人,特别是托洛茨基分子,称为左的危险的代表人物;把那些想要把党的政策转向资产阶级轨道、想要给富农和私有者更多好处、想要不执行十五大关于进攻富农的口号、不把合作化问题作为党的一项基本任务提出来的那些人称为右的危险的代表人物。这样的划分是非常有假设性的,而且常常带来的只是混乱。列宁主义没有左的,也没有右的方面。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如磐石的学说,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工人运动中没有什么比列宁主义更左、更革命的了。离开了列宁主义的两个方面,无论是右的还是左的方面,都是反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策。难道“左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例子不是这样出色

地证明了党的理论预测是正确的吗?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确定的是,托洛茨基的“左”的反对派和共产国际的极左倾向是明显的社会民主党的右的倾向,它们是没有出路的——要么向社会民主党靠拢,要么向我们靠拢,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这已经完全被证明是对的,这是如此迅速和如此明显地得到了证明的,就好像我们在实验室里做过了一个社会实验来检验理论一样。难道极左派不是在十五大后的两个月里就转向了社会民主党,直接成为了工人阶级的敌人吗?这是得到了证明的,不仅有经验的政治家,而且任何一个不懂政治的人都清楚了,任何反对列宁主义的左的议论都是机会主义的遮羞布。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打着右的或者左的旗号攻击列宁主义的趋势,都同样是反列宁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这就是为什么应该在两条战线上争取维护列宁主义路线的纯洁,为了不让这条路线受到任何歪曲,这是我们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都应该执行的。我们应该花费更大的精力推行十五大的决定,这是因为代表大会后的实践表明,这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都是正确的。我们也应该完全地在进一步向富农进攻方面推行这些决定,但是不是用剥夺富农的措施,而是采用来源于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的那些措施。

不久前,报刊上的文章和个别同志的各种讲话在讨论的层面上提出了关于小的个体农民经济的问题。一些人说,小农经济增长的任何条件都已经枯竭了。我看,这不仅是不对的,而且简直是愚蠢的。未必需要证明的是,农民经济、小的贫农—中农经济是有条件进一步提高的,它的条件不仅还没有枯竭,而且甚至还利用得很少。难道只是向农户供应纯种种子这一项就能提高他们的收成吗?难道我们处处都有正确的草田轮作制吗?难道利用了矿物肥料吗?难道那些没有采用但十分有生产效益的农艺措施还少吗?硬说进一步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任何条件都已经枯竭了是绝对愚蠢的。这是不正确的。

如果说到小型的个体农户、贫农和中农,那就应该说,在一些年里和长时期内,个体农户都将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基础。我们的任务是让他们实现合作,促进他们的发展,用个体农户所能接受的措施对待他们,就像列宁说的,在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的地方,在对农民的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每一个问题上,就把他的小型经济提高到更高的社会和技术基础上的具体途径和他达成协议,通过这些,逐步地引导农民经济从一些比较简单的、比较可以接受的形式转向另一些更复杂的、社会化的形式。

我们应该提高个体农民经济。我们的责任是促进这种经济的发展。把农户基本群众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这是当代尖锐的任务之一。发展生产和普遍使用

矿物肥料,不仅要对集体农庄这样,而且对个体农户也要这样,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要在农业机器化的基础上发展农业的机器制造业,发展更复杂的机器;要发展签订播种合同的实际做法,不仅是为了组织农民产品的销售,而且是为了向农民供应改良过的生产资料——机器、良种、肥料,争取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用农民能够接受的、自愿协商的办法接近农民。

在中亚推行的签订合同的经验,开始是在原料作物方面实行的,今年也在粮食作物上实行了,看来是相当成功的。我们有签订合同的丰富经验,而且实践已经证明了是完全正确的。这个经验的基础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和农民签订向他供应和从他那里收取商品产品、改造农民经济的合同。我们应该更加大力地发展和继续执行这种签订合同的实际做法。具有重大意义的不仅是向农民供应消费商品。我们应该在农村开发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对机器、肥料的需求,对所有可以打开我们的工业在生产领域里的市场的需求,这样就能把农业和工业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生产矿物肥料和在农业中加以推广。我们应该对生产矿物肥料的化学工业的发展给予强大的推动。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它能解决国防和农民经济问题,把工业作为农业沿着进行根本的社会技术改造的道路前进的动力,通过工业的发展来调节农业的问题。

同志们,这就是为什么关于个体经济的问题是不能抹杀的。小型的个体农民经济还将在很长时间内是我们的党和苏维埃政权要给予很大关怀的对象。人们在正确发挥自己关于发展个体小农经济的条件的观点的同时,有的时候不够突出作为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的列宁主义合作化计划的意义,不够突出十五大作为基本任务提出的集体化任务<sup>110</sup>。在依靠贫农、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一分钟也不停止和富农斗争的同时,应该不要忘记这些阶级中的每一个的特点和性质。特别应该记住列宁对中农的提法,对于社会主义的命运来说,无产阶级和它的联盟是具有如此重大的决定性意义的。

不应该忘记列宁1921年3月27日在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对中农的特点做出的那个经典评述。列宁在提到中农化的农民时,对中农以及对整个农民是怎样说的呢?他说:“你们知道,从政治情绪来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这是一种动摇的力量。”他接着举了一个例子:“因为这一大批人的经济生活条件决定他们本身不可能联合起来,不可能团结起来。凡是不听信‘全民投票’、立宪会议以及诸如此类‘民主’这样一些空话的人,对这个问题都是很清楚的。”<sup>111</sup>

这里所说的农民指的是中农,农民的力量是一种动摇的力量。我们应该坚持不懈地加强无产阶级和他们的联盟。我们应该一直记住,这个阶级的性格中

有动摇,在社会主义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变得尖锐的时刻,他们会有所表现。他们可能会在我们和农村的资本主义阶层中间动摇。我们的责任是加强联盟和贯彻这样一种系统的政策,要能减少这种动摇的可能,要让资本主义分子难以动摇我们和中农的联盟。

在正确地确定个体经济有可能发展的同时,有的时候会缩小集体化任务的意义。十五大准确地规定了这个任务是党在实现农民经济集体化的事业中的基本任务。代表大会直接说道:“必须提出的是,在农民的进一步集体化的基础上让分散的农民经济向大生产的轨道(在耕作业集约化和机械化的基础上集体耕种土地)逐渐过渡是首要的任务,要想方设法支持和鼓励社会化农业劳动的萌芽。这样加强发展农业是提高农民基本群众的福利所必需的,是为大工业扩大市场(消费和原料)所必需的,也是对农村实行技术改造和社会主义合作化、克服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子所必需的。”(《联共(布)十五大速记报告》,第1282页)<sup>112</sup>

这就是为什么集体化的任务是如此史无前例地重要,是不能抹杀的。但是,如果想象我们可以一下子、很快地,在两三年里就取得这样的成就,让农村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实现集体化,那是不对的。这样就是夸大了,过分地夸大了。党应该采取所有取决于它的措施,帮助促进集体的成长。不说自明的是,应该排除任何采用暴力培植集体农庄的做法。集体化是通过在农民的合作化实践取得成就进行说服,逐渐随着实践证明集体农庄比个体经济有好处,在这样的基础上把他们吸收进来。我们应该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集体。但是组织起来是不够的,需要善于巩固这些集体经济,建立真正大型的经济,能够解决农民经济的商品率问题和从经济上提高最贫穷的农民阶层,让他们能够最好地和最快地通过集体、通过经济的社会化形式提高自己。

接下来,建设新的和振兴旧的国营农场是我们党的一项补充任务,是和这两个基本任务一起提出来的。加里宁同志将报告这些农场的情况。我要说的只是,国营农场应该一方面和集体农庄一道,在中农的面前代表社会主义经济的权威;另一方面要能为在粮食收购战线上与富农周旋打下一定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组织新的粮食国营农场和发展老农场应该得到全党的热烈支持。

提高小型个体经济、组织集体农庄、建设新的和振兴老的国营农场——这是农业领域里的三项基本任务,是全党都要一丝不苟地和始终如一地完成的。想要离开党所规定的这条道路或者抹杀这些任务中的任何一个,都应该给予坚决回击。如果不能同时解决这三项基本任务,也就解决不了对于我们国家具有巨

大意义的粮食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这三项任务,我们同时也就不能解决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正确的相互关系的任务,不能正确地解决城乡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

还在四月全会之前,就传播着反革命的流言飞语,说是好像中央要取消新经济政策,要推行粮食征集制,等等。这样的流言飞语有一个目的,就是拖我们的后腿,放弃对市场的任何调节,给资本主义的力量松绑。新经济政策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我们国家,而且正像在讨论共产国际纲领的时候搞清楚的,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通过它,掌握了政权的工人阶级可以让小生产者站在自己这边来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是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政策是我们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的。但是新经济政策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由,因为那样的话,新经济政策就不是通向社会主义而是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了。

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国家对商品周转的调节和对资本主义的限制是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特点。如果想象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固定、僵死的形式,而且新经济政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内容,它的实现只有一种形式,那是不对的。这样想是绝对不对的。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新经济政策具体的内容和形式,是由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和私有制成分的力量具体相互关系确定的,是由具体的阶级力量布局确定的。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冷静地考虑各种力量的阶级布局。社会主义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各种途径取得的成就将要取决于我们从新经济政策发展的一个阶梯向另一个更高阶梯过渡的速度,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离开了资本主义和接近了社会主义。从这个观点出发,不能不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现在是处在比开始时要高一些的阶梯上。如果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私人资本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社会主义成分在生产上和流通上都薄弱的话,那么,现在力量对比就已经发生了激烈的改变。如果我们把私人资本的状况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材料拿来的话,我们看到的,正是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巨大成绩。党的十五大对私人资本给出了完全清楚的指令,无论是怎样企图违反这些指令,都应该受到党的坚决反击。“对在绝对数量上增长了的一——虽然和社会主义成分相比是在很小的程度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分子,应该而且可以采用更坚决地从经济上排斥的政策”。

这就是党的十五大的指示。十五大的这个指示给党提出了一条领导路线,我们应该始终不渝地在实践中进一步贯彻这条路线。

从具体的力量对比关系来看,私人资本和社会主义成分在商业领域里的变



化情况非常值得关注。我请你们注意以下的总结数字。

在1926—1927年度的控制数字里,国家计委预料私人的周转额会是52.47亿,这将是总周转额的21.4%。这是国家计委的预计。我们在1926—1927年度事实上看到的是什么呢?私人的周转是和国家计委的控制数字一样的,但是它的比重却是18.5%,而不是计划中的21.4%。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问题在于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合作社和国家商业增长的条件,也低估了整个总的周转的增长。按照控制数字,合作社的周转增长预料是100亿,而实际上合作社的周转达到了130多亿,也就是说,这样一来,合作社在市场上占有了比预料更多的位置。合作社在总的周转中占有的不是预料的44.5%,而是47.7%。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合作社在总的周转中的比重有了相当大的增长。私人资本在总的周转中比重减少了,由合作社周转的增长和社会主义的流通成分的增长绰绰有余地填补上了。

在现在的1927—1928年度的上半年,又非常坚决地排斥了私人资本。控制数字的预料是,私人成分与去年相比将减少8%,而我们在上半年就减少了26.9%。预料合作社的比重将增长26.6%,而在上半年我们就让合作社增长了36.7%,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合作社的周转一直是在较快增长的事实,而我们的控制数字总是低估了合作社继续得到的条件。排斥私有资本进行得比控制数字预料的要快,而且是合作社周转的增长在取代被排斥的私人资本。但是在说到这一点和必须坚决完成十五大关于进一步排斥私人的指示的同时,我应该指出,在实践中,在个别的市场上和在个别的商品上,我们并不是总能做到正确地把排斥私有者的标准和比例与合作社以及国家商业的组织 and 财政条件正确地衔接起来。在这个排斥的过程中,虽然总的从全面情况来看,合作社的工作填补了私有者的减少,但是我们这里常常会有断档的情况,因为在排斥私有者的同时,合作社并不是能及时地占据他们的位置,或者说是不能很好地占据他们的位置。这是由于在和私有者的斗争实践中有过火行为,自己的财政和组织条件不能和那些由于必须替代私有者而出现的、增长了义务衔接起来。

当然,要用计划的办法把私有者的每一步后退和合作社的进攻在时间和尺度上都准确地衔接好,那是非常困难的和不可能的。结果是他把小店关了,而我们开店不是在当天,而是要过一个月,不是在那个角落,而是在另一个角落,不是两个商店,而是一个商店,等等。而且明白的是,我们在这里不是下棋,而是在进行真正的阶级斗争,不可能在我们的计划里准确地考虑到资源和对手反抗的力量。要知道,排斥私有者和合作社的增长不是一个在地方上一种经营形式被另

一种吞噬的过程,而是在发生打破一种形式和在被打破的形式上建设另一种形式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个别的不衔接、个别的中断不可避免的原因。在合作社排斥私有者的过程中,发生的是老的商品周转结构被打破,是小店在变大,集市的作用在削弱和商业点在从集市向消费群众的深处转移。以前在赶集的日子发生在集市村落的农村商业已经直接转移到了所有的村落,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合作社让商业接近了居民,打破了他们以往的习惯,减少了集市的作用,把商业转移到了村庄里的固定点上去了。

在排斥私有者这件事上,应该区分出两个领域,在那里完全是不同的斗争环境。在社会主义工业产品的销售领域里,我们的成就是巨大的,事情进行得也比较顺利,因为我们首先是向合作社供应这些商品。这是合作社对私有者的第一个优势。第二,我们推行的政策是最大限度地对工业商品采用低的商业加价和低的零售价,虽然市场行情可以让我们卖得更贵和收取超额利润。这些情况就把广泛的消费者群体从私有者那里吸引到合作社来了,因为在这场竞争性的斗争中,合作社在消费者的眼里处于了特别有利的地位。合作社销售工业商品的周转也就相应的是快速增长了。在那些国家不是作为唯一的、几乎是垄断的消费者的农业产品收购领域里(甜菜、烟草、棉花除外),就是另一回事了。在粮食、肉类、皮革、兽毛以及其他商品的收购上,私有者有可能利用行情和抬高价格,往往能破坏了我们的收购,付给农民的会比我们多,于是在作为生产者的农民眼里会显得比我们更好,就像在工业商品的销售中,他在作为消费者的农民眼里显得比我们的机关要差一些一样。我说到了我们排斥私有者的计划的各种不衔接,那是由于任何计划都不可能绝对准确地预见到阶级斗争的过程和结果,于是就会有各种一时性的断档和困难。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在经济领域里,我应该指出的是,有的时候断档是由于在和私有者的斗争中有过火行动、过分的行政化和没有把握好分寸,没有和我们的条件很好地衔接而发生的。作为一种图示,我在这里引用三个这种过火行为和错误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市委的讲话里引用的<sup>113</sup>:在和私人皮革商人的斗争中,对他们实行了大规模的逮捕,这本来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有許多施加影响的经济措施。但是把这样做的责任推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头上是不对的。应该说,11月份在李可夫同志那里召开的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表示了反对逮捕,虽然在这之前贸易人民委员部原料局长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皮革辛迪加<sup>114</sup>的压力下,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出了应该采用这样的措施。后来提出了这样的解决办法,那时我们已经没有参与了。

我们发现并在4月开始改正的第二个错误是对莫斯科的肉类供应。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用计划的办法规定了要加强国家机关和合作社在莫斯科的肉类市场上的作用,为的是把去年50%的份额争取增加到大约70%—80%,从而把对莫斯科市场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是在4—5月份发现,私有者急剧压缩了自己的生意,不是压到预料的20%—30%,而是压到了3%,迫使我们的组织要负责大大超出计划规定和他们能够承受的供应量。虽然顺利地完成了肉类的收购计划,但是莫斯科的供应出现了困难,就是由此而来的。

有人喊:为什么?

米高扬:我会说的。我们马上就 and 莫斯科苏维埃一起注意到了这个情况。虽然向莫斯科供应的计划是完成了,但我们有2—3天的断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为了把私营者挤出去,各种机关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施加了压力,没有把自己打击的力量结合起来,对他的压力超出了我们原来的计算。商业人民委员部通过税率委员会推出了正确的决定,为私营者规定了比较高的转运税率,也就是采用了通过运输进行经济调节的办法,我们认为这样就够了,而且想到的是,这样就能完全解决问题了。可结果是因为大家都想要对付私营者,我们的莫斯科贸易局决定要私营者一定要按我们的价格出售。私营者不赔钱就根本出售不出去,因为他要按很高的税率支付更多的税,而莫斯科财政局也不想在和私有者斗争这件事上落后,在抓他的超额利润的同时,用这些措施把对莫斯科肉商们的征税范围扩大了一倍。于是当税率、征税范围都扩大了一倍,而且开始规定了硬性价格的情况下,私营者就没办法干了,于是他就收摊了。我们和莫斯科苏维埃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得出了结论,现在,在我们的市场上有15%—20%的私营者,剩下的是在国家 and 合作社手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相当自由地管理市场,于是通过了相应的措施。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愿意搞突击,都想一下子就实现良好的目标。当我们决定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肉类供应上要大力提高国家机关和合作社的作用时,想的是在其他城市,特别是在小城市,私营者将会起很大的作用,可是原来这些小城市也有自己的大人物,他们决定要效仿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榜样,也要削减私营者,因为他们不愿意落在无产阶级首都的后面。可是我们的资金、手段都不足以让我们担起这样的担子,自然也就发生了断档。

这也就是我们不是总能把排斥私营者和我们的财政和组织条件对应起来。我们应该在今后也还要继续排斥私营者,但同时不能让人们太冲动了,要严格衡量自己的力量和条件。

还有第三个例子,说明一些同志已经开始在想,私营者根本就是非法的。

这个例子涉及的是扎波罗热区和闹得很凶的水山鼠。在扎波罗热区,国家进出口贸易局通过私营者收购了这种鼠。因为是通过私营者而不是通过合作社收购的,该区的工农检查院就对国家进出口贸易局的工作人员做出了警告处分。《红色扎波罗热》报在醒目的大标题下谴责了这个犯罪事实并通报了区工农检查院的决定:“工农检查院院务委员会认为通过私营者收购皮毛是不能允许的。宣布给国家进出口贸易局扎波罗热办事处主任布罗多夫斯基警告处分。”当然,如果区的领导机关甚至都认为通过私营者收购鼠皮是不能允许的,那就可以明白了为什么会在我们这里做出这样大量的、让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的蠢事了。这三个偶然的例子已经可以勾画出在和私营者斗争实践中出现的错误和过火行为了,这些错误和过火行为是我们应该排除的。

接下来我应该专门说说计划问题,也就是我们的经济政策计划工作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存在和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当然,计划领导的闪失和错误在粮食收购的各种困难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不搞清这些错误我们就解释不了困难的原因。四月全会指出这些错误是完全正确的。在那次全会上的报告里,我也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放在了经济领导的错误上。但是用计划上的闪失来解释所有的经济困难,用整个和完全是好的或者坏的计划工作来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特别是经济中的重大现象,认为所有都是取决于我们的意志的,那是不正确的。硬要说好像在我们的这种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里,一切都能预见和用计划防止,可以制订出绝对正确的计划来,是不对的。

我们这里没有起码的文化修养,仅是这样一个起码的原因,就不可能制订出准确的计划来。在一个没有文化修养的、半文盲的国家里,想象可以制订出理想的计划,这是空想。但是如果甚至不考虑这个因素,假设我们的文化修养是绰绰有余的,作计划的熟练程度也是绰绰有余的,——假设我们是做计划的理想的工作人员,那会怎样呢?

难道在这种假设能做出理想计划的情况下,就能够避免计划的突破、计划的完成遭到破坏和在制订计划的时候出现闪失吗?如果是这样想,那就意味着认为我们这里是没有资本主义包围的、完全的社会主义了,意味着可以允许对具体的实际情况做出有害的、理想主义的粉饰了。

不能不顾我国是小农性的,不顾农业的落后和它对市场自发性的依赖,不能忘记“小事”,那就是我们这里还是阶级社会,阶级的经济。所以我们的计划立足的基础是考虑经济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考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是在有数百万农民经济的条件下进行斗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为争取影响和

领导他们而进行着斗争。

我们国家存在着各种经济成分,这就事先决定了他们之间要有不断的斗争,这就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计划条件划定了客观的限度。难道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能准确地考虑到和预见到阶级之间的斗争会是怎样进行,有什么样的结果吗?难道我们的计划能够准确地考虑到各个阶级对抗的资源 and 力量,让整个经济生活都准确地按计划进行吗?如果这样想,就等于是认为我们的计划也是阶级敌人必须要执行的。

计划工作的条件有客观上的限制,这不仅是因为国内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是因为苏联被资本主义包围着,苏联的经济纳入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

如果想象可以用计划的办法预见到世界市场的行情,譬如说把纽约交易所和伦敦的金融中心区的政策都计划好,那就天真到了可笑的程度了。但是,进口和出口商品的价格摇摆不是能由我们调节的,难道这不会对计划有很大的改动吗?难道世界市场上的石油价格下降40%不是使我们失去了几千万外汇,难道美国棉花去年大幅度降价不是让我们没有得到1500万的外汇吗?

这样的例子要多少有多少。

而在缺乏外汇的情况下,这样的修改是重大的修改,是要限制我们的对外贸易的,这(也就)意味着,是要限制对整个经济的计划的。

博尔杜因、彭加勒和皮尔苏茨基的政策并不是远离我们的经济计划工作的,我就不去说了。

所以说,除了我国文化和技术落后外,和社会主义的成分一起存在的还有资本主义的成分,在它们之间有着残酷的斗争,这是事实;存在着阶级,我们的发展是要通过政治和经济上的阶级斗争进行的,这也是事实;无产阶级专政受到资本主义包围,他们之间有着经济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包围着它的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这还是事实,——所有这些基本的事实就为苏联经济计划的可能性规定了一定的客观界限。这就是为什么虽然要严厉地揭露自己的错误和通过这些错误来学习,但是不能把所有困难都算在计划失算的身上,用失算的理论来解释这些错误,忘记了以各种形式在各种地方发生的阶级斗争为我们的计划工作提出了限制和制造了各种困难。

正是因为这样理解问题,就可以论证党的十五大决议中的下面这段话是正确的了:“经济发展已经过去的阶段无疑是向社会主义方面前进了一步。但是这个带有结论性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已经排除了和我们的增长特点、和国家技术经济落后、和敌视无产阶级的社会阶级力量的进攻有关的那些困难、危险和矛

盾,只有和这些力量进行系统的斗争,才可能克服这些困难和进一步向社会主义前进”<sup>115</sup>。

无产阶级国家改善计划工作的任务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争取最大限度地预见到经济中的阶级力量的对应关系,规定出在这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更坚定的立场,找到更正确的斗争途径和战胜资产阶级分子的途径。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的每一个胜利,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的组织性以及它对农民经济的主导作用每提高一步,都会为我们的计划工作开辟新的客观条件。

我们的计划领导有这些客观的限制,但从这个事实不能得出结论说,好像我国的经济客观上就蕴藏了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和尖锐的困难。虽然我们的计划有着相当大的失误,但是在最近几年里,我们在计划领域里还是学会了一些东西,而且每年在这个领域里所犯的错误也越来越少了。就是从编制和完成出口计划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的出口计划在最近的两年里几乎是能全部完成的。但是如果拿完成出口计划的情况和国家计委的控制数字比较的话,我们看到的也是这样的变化情况:1925—1926年度控制数字规定的是11亿卢布,实际完成的是这个数字的61%,也就是说错了40%;在1926—1927年度里,控制数字规定出口8.2亿卢布,而完成了的是94%,也就是说错误不是前一年的40%,而只有6%了。今年虽然粮食的出口中断了,这个错误也只有不到7%—8%。

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这些错误已经不是那么大了,但是它们对我们的打击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是过着没有多少储备的日子,这是第一,也因为这些小比例的错误针对的是非常大的数字,所以在绝对值是代表着很大的数量的。

在我们做计划的条件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避免尖锐的困难和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储备政策。计划的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在完成计划的过程中,或者由于上述原因,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部分的断档,为了使这些情况不致引起危机或者经济上的困难,必须要在经济政策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方面有一定的储备。

在计划上,在对经济的领导上,如果没有一定的储备作为对它们的支撑,无论是有什么样的改善,我们都不能保障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不会发生失败和出现困难。要是我们有足够的粮食储备,譬如说是1亿—1.5亿普特,或者是1亿—1.5亿卢布的外汇,甚至在完不成粮食收购计划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会有今天的困难了。实质上,要想没有痛苦地摆脱粮食困难,现在我们缺的是新的收

成前的2 000万—2 500万普特的补充粮。

储备问题是党早就意识到的,而且写到了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决定里。

倒霉的就是在我们资源贫乏、必须利用和平的喘息时间最大程度地加快社会主义发展速度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足够的毅力在实际上把储备搞起来。因为要从少得可怜的资源里组织不能动用的储备,那是需要坚强的毅力的,需要把什么割舍掉的。在储备和极其尖锐的经济实际需要发生冲突的时候,考虑今天的发展速度的需要,就会忽略为未来做储备的利益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从议论转向实际行动,表现出应有的性格毅力来,争取逐渐组成在所有基本方面的储备。只有这些储备才能保障不会由于不可避免的计划和计划上的失误而出现任何困难。在万一发生外部的复杂情况和经济上的自然灾害时,它们将是一种保险,将能让我们有更大的自由在国内外经济中进行周旋。没有这些储备就不可能有我国经济不间断的发展。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改造时期,不可避免的困难有时会变得比较尖锐或者变得有所缓和,这要取决于计划的成败,而基础就是阶级力量的对应关系和它们之间的斗争。困难是从阶级斗争本身产生的。这样的状况是会引起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的。

我们提出要更加加强向富农进攻,要更坚决地排斥私营者,这些口号不是为了说起来漂亮,而是为了彻底地加以贯彻,实现这些口号不可能不引起矛盾的尖锐化。要知道,富农和私营者为了回答这些口号,不会对布尔什维克表示欢迎和感谢,平静地束手待毙或者平静地退去的。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加强自己的抵抗,要顶住或者破坏我们越来越增强的进攻。他们可能而且应该是会在某些地方转入反攻,把自己储备的力量动员起来,并且企图在我们的队伍里和在我们的同盟者的队伍里搞腐化,打击我们这个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利用我们方面的所有可能发生的错误。富农和耐普曼以及城乡小资产阶级是有联系的。所谓动员就是他们会把这些联系的绳索拉紧,让我们的同盟者的队伍发生动摇。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这样进攻和采取这样的反运作,要在很大程度上让阶级敌人的企图失效,让居民基本群众不致发生丝毫动摇。这就是为什么十五大是完全正确的了。它在指出了困难和矛盾尖锐化不可避免的同时,提出了党的任务是要巧妙地克服这些困难,而且自己要能正确地从经济和政治上领导国家。

在结束了对困难、原因及其排除办法的简单综述后,我要来谈谈粮食收购和粮食收购政策最近的前景了。

在转入评价局势之前……

喊声：休息！

主席：有人建议报告的结尾部分放在午饭后。没有反对意见吧？那么我宣布休息到6点。



## 第六次会议

7月6日晚间

**主席(李可夫):**米高扬同志讲话。

**米高扬:**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是保障新的一场粮食收购运动,要能完全不采用非常措施,要为粮食收购的发展创造更为正常的环境。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收成的年景,这决定着即将到来的粮食收购的总的范围。当然,现在,在7月的最初日子里,很难对收成说些什么肯定的话。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除了对收成的好坏等级有个评价外,没有任何谷类饲料平衡表和任何有关收成的数据。由于这个问题特别重要,今年中央统计局和专家委员会决定编造一个谷类饲料平衡表的雏形。我强调是雏形,而不是平衡表,因为平衡表现在编不出来,因为庄稼的长势还不是最终的,它们可能会有变化。

专家委员会确定,在前4年实践的基础上,任何一个谷类饲料平衡表的雏形在7月15日落实的时候大体上会扩大2.5%。战前最后几年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到了收割的时候,收成下降了10%,不会更多。所以中央统计局和专家委员会都拿出了两种可能的收成方案。按照第一个方案,7月15日时的收成年景不会是向坏些的方面也不会是向好些的方面改变。第二种方案预料平均要差到2.5%—3%。不久前你们可能从报纸上看到了气象台关于天气情况的报道。这些报道没有对天气状况做出另外的改变,只是在巴什基尔、列宁格勒州和西北州有些不大的恶化,而在剩下的地方甚至有些改善。没有预见到有比7月15日对收成年景的判断更大的变化。我应该说,既然还没有关于播种面积的准确数据,现有的关于收成的数据当然也就是假设的了。对西伯利亚是用去年的播种面积作为基础计算的,而根据预测的数据,那里扩大了3%。

有人喊:怎么是3%,有人说是14%。

**米高扬:**到7月15日为止,没有关于播种面积的最后数字。根据中央统计

局事先的总结材料,今年的春季播种面积增加了,而去年的过冬作物的播种面积由于气候条件等等原因减少了。

我们来试着以现有的数据为基础,比较一下今年的和去年的收成吧。我在这里应该说的是:根据粮食平衡表,去年(1926—1927年度)的收成比前年低1.5亿普特。现在,在彻底检查平衡表的时候搞清楚了,1926—1927年度的收成是比前一年度的收成低了2.5亿普特。

中央统计局提出了两个作为范例的方案,只是雏形。根据其中的第一个,如果年景不坏、不改变的话,总收成确定是52.33亿普特,根据第二个方案是49.02亿普特。

有人臧:是49.07亿。

米高扬:就算是49.07亿……49.02亿,也就是说按照第一个方案,收成将比去年高出4.83亿普特,而按照第二个方案是35.2亿普特。如果考虑到中央统计局的预测,农民的消费由于收获的特殊性要比去年提高的话,那么由于要满足这些提高了的消费,按照第一个方案就要增加3.75亿普特,按照第二个方案就是2.75亿普特。

这就是关于收成的数据。现在来看看新的一年的收成有哪些特点是必须考虑的,这样才能正确地评价粮食收购运动的前景和为粮食收购政策规定出任务来。暂时我要指出的是一般性的数据。第一,在饲料作物之间和各种商品粮食作物之间,我们和去年的已经是正常的情况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方面,饲料作物的总收成增加了2.80亿普特,而粮食作物的总收成比去年减少了0.36亿普特,而且特别是冬小麦的比重减少了很多,虽然春小麦填补了冬小麦的减少,总的小麦产量比去年增加了2.5亿普特。同时黑麦比去年减少了3.16亿普特。这就是新收成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收成的状况从西部倒向了东部。全苏的西部地带的粮食总收成状态要比去年差。下面的数字可以显现出这种情况来(引用图表)。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今年在黑麦极度减少的情况下,粮食作物的收成比去年减少了0.36亿普特。所有类型的粮食的收成都增加了。各类作物的情况是:玉米有很大增长,增加了1.20亿普特,大麦——1.60亿普特,燕麦——2.14亿普特,除黍子和荞麦外,其他作物也有增加,黍子和荞麦将比去年略少一点或者持平。收成的地理分布状况怎样呢?现有的图表表示了所有作物的总收成情况。在西部地带,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各个消费地区、中部黑土州、伏尔加—卡马地区,收成低于去年。东部地带,其中包括北高加索,收成比去年多,而且我们看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有特别大的收成。专家们指出,对

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已经无须再等待进一步的改善了,因为那里播种的情况是非常好的。收成的分布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今年收成的特点是这样的,如果说去年在消费地带曾经有好的收成,对要从这里购买的粮食的消费应该是减少的话,那么在今年的条件下,消费地带对运进的粮食的需求将会急剧增加。去年我们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消费地带\*收成不好——今年好些了,这就将会减少对运进的粮食的需求,但是这种状况将不会减少对运进的粮食的消费需求,而且一般也不可能补偿需求,因为损失很大了,特别是黑麦的损失。

另一方面,今年收成的特点在于,由于气候条件的关系,收割大体上迟了两个星期。由于收成向东部转移了,再加上又推迟了,收购的大量增长是有可能的,但是不会早于11—12月份。对这一点还要补充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粮食到我们这里大体上需要45天的时间。另一方面,由于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特殊条件,包括地理条件和交通条件,那里的收购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乌克兰的粮食收购地区的铁路线密密麻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在哈萨克斯坦的收购是在主干线环绕的地区进行的,但是出产粮食的整个地带离开铁路有200—300—400俄里的距离。这里的任务是要组织兽力运输,而且可能还需要动员汽车和其他设备。这些问题在商业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都研究过了——需要采用一切手段动员运输设备,需要扩大商品粮的外运。去年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收成和收购还低于今年我们规定的数额,我们在运输上就遇到了很大困难,今年应该预料到将会有巨大的困难,需要有所准备,第一是要事先就把工业货物,特别是顿巴斯的煤,以及其他的运送任务都完成了,让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运输能力在11、12月和1月都完全用在粮食的运输上,还要考虑到乌拉尔,它有一半是要靠这条大铁路生活和工作的。需要考虑到在未来的粮食收购运动中将会有严重的交通困难。

另一方面,我们的饲料作物将比粮食作物多,从这个事实出发,就必须用饲料作物来补偿粮食作物的不足。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大规模地给小麦粮食中掺进玉米和大麦,用来补充小麦和黑麦以及整个食用粮食的不足。但是由于玉米只有在10、11月才能出来,不会更早,那么在这之前,为了不损失很多小麦,我们就不能不用它和大麦掺和。为此就需要让磨房能够适应。我们现在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实验。我们在顿河上的罗斯托夫搞了烘烤面包的实验,我们还将要扩大这种实验,让我们能在大范围内把玉米粉和大麦粉和小麦粉掺和在一起。这就

\* 原文如此。——编者注

是在整整一年里我们将面临的主要困难,要在第一季度到10月份特别集中反映出来的困难。

当我们要试图规定第一季度收购的前景时,我们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我们规定了两个方案:在3个月里至少要收购1.35亿普特,第二种方案是收购1.55亿普特。在这两种情况下,局势都是很困难的,而如果是收购1.35亿普特,我们是不可能摆脱困境的。

伏罗希洛夫:是指收购吗?

米高扬:如果收购1.35亿普特,我们就不能满足国家的需求;如果收购1.55亿普特,也将十分困难,但是从体力上说,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可以在没有大的断档、危险的断档的情况下克服。这是从何而来的呢?问题在于,通常在这个时期,南方的收购正轰轰烈烈,特别是小麦和大麦。去年9月我们在乌克兰遇到了暴乱,但是由于另外的原因,不是由于粮食引起的。有人说——去拿粮食,买粮食吧。街上放着一包包的粮食,仓库不够用了,运输也没有安排好,——不知道把粮食放到什么地方去。乌克兰的农民不知道拿自己的粮食怎么办了。今年我们没有这样幸运的好事了,因为那里的冬小麦很少,小麦根本就很少。这里的小麦被用来顶替东部地带生产的小麦,转运到了还正在收割的那些地区,从9月份开始成为了商品粮,大量出现在消费市场上要到10、11月份了。这种状况使得我们在这3个月里处于了非常困难的境地,而且我们是在能够给我们提供保险的基金剩下很少的情况下进入新的运动的,这就使得状况更加困难了。我们的剩余在7月1日时大体估算是0.42亿普特。去年是0.66亿普特,而且去年的收成比今年早成熟了两个星期。我们进行了计算,搞清楚的是,即便满足最急需的需求,也还缺0.15亿普特的粮食。为了保障能拖到新的收成下来,保障种子运动,然后减轻粮食供应的负担,我们不能不在政治局里通过决定,从国外进口0.15亿普特的粮食<sup>116</sup>。但是,就是再进口0.15亿普特,也还是有很大困难的,因为需求和存有之间的平衡是对不上的。到了8月1日时,剩余就将特别少了——将有很大的削减。我们认为,我们能为供应提供出大体上1个亿,不会更多了,从去年的消费情况看,这是非常低的消费水平了。与此同时我应该说,到9月1日前,我们有义务收购到不少于0.14亿普特的小麦和少许的黑麦,并且要专门拨出来用于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播种:要给乌克兰0.11亿普特,给北高加索和苏联的某些地区300万普特。为了不破坏播种运动,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这应该是必须完成的。这会造成更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指望的是靠南方进行供应,而东部各个地区的收成还没有收上来,没有到手。这里还需要记

住,南方的农民首先要抛给我们的是大麦。我们要进行掺和。我们在第一季度总共要拿700万普特的大麦和小麦掺和。这些困难来自收成的地理状况、来自各种市场作物的另一种对比关系,而且这些困难都将压在我们头上。我们怎样才能走出这种状况呢?我们要采取措施加速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粮食碾磨。在这方面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签订了合同,让他们提前磨制自己的粮食,让我们能有回旋的基础。

我们认为,国营农场加上集体农庄,大体上能提供0.41亿普特粮食。应该说,要想搞清楚国营农场的商品剩余是很困难的,但是现在地方组织正在做这件事,而且工作的安排比以前要好。需要花费很大的努力,需要有收割机械等等,才能把这件事做好。当然,这里还有与东部地区的收成状况相关的困难。收割机械不足也很让人头痛。如果不采取非常措施加强利用收割机器和供应机器,那么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这样的地区就会剩下许多到明年还没有磨制的粮食。

上半年农业机器的销售有了很大的增长。例如,和去年相比,我们在乌克兰6个月就把机器的供应量提高了55%。在俄罗斯联邦则提高了53%,而现在机器供应的问题变得更尖锐了。

在有合适的种子的地方,我们采取了措施收购尚未收割的庄稼,对将来的价格进行补偿,根据不同的地区和作物,加价控制在15戈比以内,这当然应该能让农民乐意。这样的措施我们在1925—1926年度的运动中已经采用过了,而且是成功的。它们应该能得到好的结果。除此之外还要对那些没有合同但把适于播种的粮食运到我们的各个点上来的农民采取鼓励措施。

这是必不可少的消耗,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得到种子所必需的。

在没有种子的地区,我们对尚未收割的庄稼签订预定合同,让农民提前磨制和把粮食运来。预计这样在阿克纠宾斯克、伏尔加河流域和克里米亚地区要比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早得到0.15亿普特的粮食,在磨制的时候就能收割庄稼并得到供应所需要的粮食。所有上述措施应该能帮助发展收购这件事情。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面临的其他任务和困难。首先是关于价格政策。我们不得不把粮食产品的价格提高一些。这个问题在去年收割庄稼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政治局没有讨论它,但是在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国家计划的控制数字的联席会议上,曾有过很大的争论。<sup>117</sup>当时大多数人要求降价4%。国家计委的代表坚持总体稳定的观点。我们是主张提价的。但是我们不可能在降低价格和需求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建议推行这项规定,而且我们更不想和秋季出

售了粮食的贫农、中农群众发生冲突。在运动的中间时期推行这样的政策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政策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我们把春季和秋季的价格维持在了同样的水平上,保障了价格对于农村没有财产的阶层的对应关系。如果我们在春季提高价格,那么由此而得到好处的是农村的富裕阶层。我们没有这样做是对的。但是,随着新的一场运动的到来,我们有了可能对粮食的价格做出某些提高,而且这也是必须要做的。提高粮食价格第一应该能够鼓励扩大商品粮的数量,第二要能改善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价格比例关系,这样就能保障更多地扩大粮食的播种面积。这个措施的目的是支持个体的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

关于提价的幅度,我们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遵循几个考虑:第一,我们需要这样来提高粮食的价格,它虽然也提高了和加强了对农户扩大粮食播种面积的刺激,但是并不是对价格的对应关系造成很重大的破坏,侵害到技术作物。第二,提高的幅度应该是领工资的工人阶级基本群众能够接受的。必须是这样来提高粮食价格,要尽可能地不提高粮食的出售价格。在出售价格有某些不多的增长的情况下,必须能相应地也提高工人的工资。还必须保持我们的粮食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照我的看法,这就是对待解决提高粮食价格的幅度问题该持有的观点。

价格的提高应该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作物上有所不同,要适应个别地区和作物的特殊条件。商业人民委员部有一个设想,还没有经过任何人的批准,最近将在劳动国防人民委员会审议。但是如果大体上把提价平均划定为12%的话,这就是要大幅度地提高小麦和黑麦的价格,而对去年已经提过一些价的大麦和玉米,提价要小一些:黑麦是14戈比,小麦是13戈比,燕麦是2戈比,大麦是2戈比。这在乌克兰就是小麦1.25卢布到1.30卢布,在北高加索大体上是1.25卢布,西伯利亚的粮食可以达到一个卢布。

有人喊:那整个庄稼呢?

米高扬:这会让各个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价格,但是总的方针是一个:鼓励、扩大粮食作物的商品输出量和扩大它们的播种面积。同时最好是,而且也必须是让某些比较冒尖了的农作物产品降低一些价格,第一这是因为它们的价格太高了,第二是为了部分地补偿粮食价格的提高。为了维持肉和皮革这样的畜产品的农业价格总水平,最好还是降低价格。这些商品的价格比战前高出了一倍,我们今年进行了一些降价。在这样做的时候会遇到困难,如果草和饲料有很好收成的话,农民将不会有向市场上抛售牲畜的积极性了。

今天要对明年需求和供应的对应关系做出某种准确的计算和给出更明确的

前景,这是非常困难的。这样做有困难是因为还没有控制数字能把整个国民经济归总到一定的指标上和把它的各个成分都串起来。没有控制数字,没有可以作为基础的限额,就很难确定需求和供应。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第一将取决于技术作物的收获量,第二将取决于我们对工业品规定出什么样的价格政策,第三将取决于我们将要进行的借债等等有多大的数量,也要取决于其他一些今天还不清楚的成分,对这些成分只可能有一个前景设想,不可能有任何硬性的数字。暂时不得不以各个委员会的设想作为出发点,它们(设想)可能是不同的,是不可能归总到一起的。但是,如果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预测的那样,认为明年工资将要提高,工资基金将扩大10%—11%;如果考虑到今年房租将提高,可以达到1.50亿卢布;如果职工的工资将提高4%,就算是农村的产品大体上将增加10%;如果所有这些条件都放在一起,而且记得我们将在农村发放比去年更多一些的公债,而且如果我们用其他的形式和方法,捐献可以得到大约1亿卢布,那么得到的就是,需求可能增长5%—6%。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预测是完全可以兑现的,根据这种预测,我们国家的工业产值将增加15.5%,而如果考虑到手工业、注册工业和私人小工业的情况,整个工业产值的增长预计是10%。如果预料我们不降低工业商品的价格的话,那么供求关系将会比今年更好。我们甚至将能做到对某些商品形成一些储备。如果不是提高粮食价格,我们就不得不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了。但是我们没有能力一下子就完成两项任务:提高粮食和亚麻的价格并同时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但是就是这一个事实——提高粮食价格——对于农民来说,就将是一个相当能够感觉得到的好处了。由于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今年和在明年都不用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了。至少我们可以直到下一个农业年度,直到行情变得更清楚的时候,在降低工业品价格方面给自己留下自由。那时就可以进行这项工作了。

当我们接近这个季度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市场对来自我国经济结构的各种特殊情况反应了。我们看见,在整个一年时间里,供需的对应关系在各个不同的季节并不是那么对应的。夏季和秋季,当我们需要加强推销农业产品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这种对应关系非常紧张,而到了冬季和开春的时候,情况就会有所改善,商品也就比较多了。在这个经济年度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商品平衡方面有了某些改善。7月1日,我们的畅销紧缺商品的储备是6500万卢布。当然,在第四季度时,工业品将会比第一季度减少7%,因为要开始放假了,手工业工业的产量会有所减少。随着贮备的增加,工业品的紧缺虽然也还将是很大的,但是总归大约是相当于去年缺口的1/3。去年工业品的缺口大体上是3亿

卢布,今年是1.2亿—1.5亿卢布。当然,如果想象各种不同的商品有着相同程度的缺口,那也是不对的。一些商品是非常紧缺的,另一些商品的情况将会好一些。

我们的棉布和其他布匹比去年有所扩大。我本可以举出个别商品的数字,但是我不想占用你们的时间。不过工业品的紧缺是会有有的,而且我认为,在粮食收购的第一个季度,在10—12月,将对工业品有相当强烈的需求,因为从10月开始,农民将会展开强有力的销售自己商品的活动。棉花的收成将很好,这就需要大量的钱。农民在其他方面也会增加收入。因为建筑拖延到了秋天,而且是规模要比去年大,这个因素也极大地扩大了城乡对工业品的需求。直到1月,也就是到冬天,在工业品方面将会有很大的困难,虽然说比去年要小些。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以此来计划,甚至要拿损失城市作代价,也要向粮食地区提供工业品。劳动国防委员会有一个决议,要保存专门的储备,直到把收成的新情况搞清楚之前,是不能动用它的。<sup>118</sup>最近可能将要对这个储备进行分配,一部分要保存到10月份。我认为,工业品的供应将取决于工业是不是能够及时得到工业原料。我说这个是因为,例如纺织工业,现在就是在最低限度的剩余原料基础上运转的。

农业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由于进行了改革,它已经使得我们能够更灵活地周旋了。到今年的10月1日前,我们应该收到的农业税收将不是去年的4000万卢布,而是1.15亿卢布了。很清楚,这是一个重要的杠杆,如果正确运用的话,将能对农民的上层起到作用,刺激更早地把粮食抛向市场。然后,保险费将会是很大的数量。然后是应该采用自愿方法发放的公债。控制数字规定的公债发行量,在城乡群众中是5亿卢布,加上在经济机关中发放的,就是7.50亿卢布了。收集到这些公债是一项繁重的任务,但是给了我们时间来进行周旋和准备更没有痛苦地加以贯彻。联系到粮食收购的行情以及我们在这个第一季度由于明年的情况所面临的那些任务,现在正在形成的局面大体上就是这样的。我已经说了,对于全年来说,困难是相当大的。就供应和收购来说,我们的这个季度是最困难的,但是我们掌握了大量的经济手段,可以对市场施展影响,让粮食运出来。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正确地运作粮食收购的话,具有重大意义的税收制度、大量的工业品、采购的预约合同制等等,应该能够减轻我们的任务。我想,提纲里清楚地勾画出了我们应该推行的政策。我们应该使用这些杠杆来运作,避免必须采用让我们要付出昂贵代价的非常措施。明显的是,我们应该立即消除那些曾存在的过火行为和行政压力。特别是在集市方面。我们认为必须要同时开放集市和让粮食自由地运到集市上去,用更灵活的经济调节措施、更灵活的



国家机关调节的形式取代行政措施、警察干预。

少一些行政上的恣意妄为,恢复革命的法制——这就是我们将一定要保障的。在供应方面我们应该做的,第一是要坚决取消票证等等东西。实践表明,票证不能节约粮食,而是相反,在有了票证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认为完全使用完票证是革命的义务。除此之外,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正在形成,应该坚决地在采用了这种制度的地方放弃它,它是应该取消的。

有人喊:应该消除供应上的断档。

米高扬:这是清楚的,这是最正确的办法。如果没有断档,也就没有票证和其他一些办法了。需要有最灵活的方式向有需要的工人中心地区和一系列农民居住的地区供应粮食。关于地方上的粮食周转,我应该说,这种周转在下半年有了一些缩减。将来预计大体上有80%的粮食供应靠的是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其余的靠地方上的周转,地方上的收购,包括国家的、合作社的和私人的收购。今年我们破坏了这个标准,于是我们不得不回到在一些小的和大的城市里部分要靠地方上的收购单位、合作社和私人来保障供应。当然,对私人资本必须保持运输调节的办法,要用经济措施调节这项工作和用地方集市和地方的粮食周转来限制私营业者。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我们能够通过一个怎样的全年收购计划呢?现在说这一点还太早,因为没有制订计划所必需的所有数据。但是我认为,我们在今年应该更慎重地对待计划的制订。为了搞清楚制订计划有多困难,我简单地说一下去年的计划是怎样通过的,我们不得不克服多少矛盾。1927年7月,商业人民委员部首次讨论了计划并规定了它的规模是6.75亿普特的粮食。国家计委要求7.5亿——摊派下去的是6.75亿。8月召开了地方上的贸易局和商业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会议。他们聚到了一起说,多于5.84亿普特是收购不到的。这是一个不可能的计划,而在提出了所有这些材料之后,国家计委坚持说可以收购到7.4亿普特。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计划。商业人民委员部粮食饲料局提出了6.18亿。商业人民委员部的部务会议要求6.75亿,而且在这一年里,部务会议只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和分裂,一部分部务委员——艾斯蒙特、库利科夫和魏采尔要求6.50亿,而我们说,应该通过最大限度的6.75亿。同时根据控制数字,人民委员会通过的是7.40亿普特,后来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的是6.75亿普特——商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数字。这是为什么呢?我也理解国家计委,也理解所有其他机关。为了出口我们需要粮食,所以需要给出多些的任务让人们去拿到粮食。要多些,但是要慎重些。这我是理解的。至少粮食的消

耗是应该更慎重些的,为的是在万一完不成计划的时候有一个保险。

**李可夫:**但是劳动国防委员会并没有严格规定消耗有多少吗?

**米高扬:**没有。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的是6.75亿普特。我们不得不在今年谨慎行事。我们规定了大体上有可能收购7亿—7.25亿普特,这要看收成怎么样。如果有粮食剩余的话,我们至少要用起来构成基金和补充储存,因为没有这些储存我们无论如何是过不去的。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局面。我们面临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在整个一年时间里,特别是在第一季度,局势是会更加紧张的,这就要求收购机构发挥积极性,党和党的积极分子要密切关注,要让所有的力量和资金都用来完成计划,要灵活地运用大量商品,及时征收农业税和其他款项支付,利用所有的金融杠杆影响市场,消除过火行为和非常措施,为的是保障新的运动能在更加正常地组织这件事的轨道上、在恢复地方粮食周转的基础上进行。我们应该用灵活的调节市场的措施取代行政施压和恣意妄为的做法,为的是不要扼杀地方上的粮食周转。已经可以看出我们的粮食收购机构是有改善的,虽然工作还很紧张,但是在第一季度末,在到了秋天的时候,会使我们的粮食收购有某些改善,而这种改善将决定着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是全党用全部的力量争取做好粮食征购,要能够做到不必采用非常措施。

**主席:**列普谢同志发言,下一个发言的是丘巴尔同志。

**列普谢:**米高扬同志的报告在开始的时候说到了经济指标,而且他还引用了数字,指出工业有了一定的成就。如果对我国工业的这些成就作些补充的话,就说金融方面的情况吧,如果我们从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报告中得到了它以及我们的合作社工作方面的良好指标的话,那就可以说,我们的这个经济年度结束得是完全可以令人满意的。但是在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方面,我们还有某些考虑不周的地方。我想,米高扬同志在开始自己的报告时,应该更详尽地分析一下我们在上一个经济年度粮食收购开始时所处的状况,也就是说,大体上是在我们现在进行收购的这段时间,或者说稍微迟一些时间的状况。他主要是说了下一个经济年度的收购,说到了在今年1月到3月推行的和在最近一次全会上讨论过的非常措施,但是为了揭示出所有存在的考虑不周的地方,需要从这些粮食收购在去年秋天是怎样开始的说起。我认为,有些事情是没有考虑到的。

第一,就像全会指出的,我认为我们过多地希望一切能够自然发生,希望我们能维持得住粮食的低价。而且毫无疑问的是,正像今天从报告中得出的那样,在农民掌握的那些粮食贮备上和我们面临的收购条件上,有某些失算的地方。

除此之外,去年我们是在粮食市场局势很紧的情况下,在8—9月开始粮食收购运动的,所以就是在去年,我们在粮食供应上也是有断档的,也就是说,有这些断档是因为工人居住的中心区、城市等等,对粮食有着更高的需求。所以这些因素是应该考虑到的,也就是说,去年我们也是有更高的需求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国的农业不具备很大的商品率,和农业的其他产品相比,低廉的粮食价格不能刺激农民特别扩大粮食生产的面积。

这些事实是应该考虑到的,但是我们大家都一样,都在努力要绕过这些价格,认为我们能够维持住粮食的价格。如果我们具备相应的粮食贮备,那我们也也许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并没有这样足够的粮食储备。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能及时考虑到我们在去年所处的局势,我们就会对粮食的出口采取别的态度了,这种情况为我们的贸易平衡制造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本来是可以在国内的粮食市场上保持更平和的环境的。我想,需要做的是让现在政治局在这里建议的那些措施由商业人民委员部坚决地贯彻下去,不要有什么特别大的摇摆。米高扬同志在这里说,在关闭集市等等问题上不能埋怨地方上。我想,是商业人民委员部没有同地方上存在的和受到党谴责的事实进行足够坚决的斗争。除了关闭集市外,在一些地区还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农民可能运到市场上去的是一袋粮食,而不是两三袋或者更多。这样,市场就被人为地压缩了。很清楚,农民运来了一袋,可以为这一袋要到比运来两三袋更多的钱。这样的破坏情况是存在的,当然是需要结束的,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是得不到良好的结果的。

我认为,现在,这些粮食收购和对我们的基本工人地区供应当然还会遇到一系列困难,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克服粮食市场上的这种神经质的状况。在一系列地区我们还会遇到困难。所以我们需要非常慎重地对待各个地区的供应。我们今年有过一系列情况,可以说是合作社有了储备,但是没有能做到保存住这些储备,没有能正确地使用这些储备。这种现象也是有过的,那就是在进行粮食收购和对我们的各个地区进行正常供应的时候,在最初阶段上,无疑将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那就是人们会一窝蜂地扑向这些粮食,会千方百计地追求做到有储备,要有很多的储备……

**伏罗希洛夫:**比现有的还要多。

**列普谢:**这就会造成进一步的、很大的困难,因为很难考虑到、搞清楚和知道,谁有这些粮食储备,谁没有,而且实质上常常是有这些粮食储备的那些人比那些没有的人叫得更响。所以我们应该在这里改变一下做法,一方面加强面包

的烘烤,而且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按某种一定的标准也出售面粉,因为在一系列地区,工人已经习惯的是得到面粉了,那里并没有安排好面包的烘烤。

我不止一次听到米高扬同志说,他以前在自己的发言里总是要说到降低贸易消耗,商业机构的合理化,等等,今天他把这一点完全忽略了。既然问题是提高价格,那就清楚了——要让这种价格的提高不要对工人的预算产生特别消极的影响,需要采取必要措施减少收购的商业开支,等等。在这里我们总还是有相当多的条件的,在这个领域里,如果有决心抓这件事,我们可以做许多事。

**米高扬:**说得对!

**列普谢:**我还想,需要采取措施更好地占有我们的粮食市场。例如,我们在冶金工作者代表大会<sup>119</sup>上曾不得不和米高扬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在那里,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方针是,它能够把所有的一切都抓起来,有可能把更多的阵地抓起来。要知道,也许是能做到抓到这么多的阵地,但是将会是没有力量把一切都管起来,所以(正像提纲正确指出的那样)应该认为有必要在基本的收购单位之间和在应该满足地方需求的地方上的收购单位之间进行再分配,进行一定的再分配,让这种地方上的需求不要落在国家收购单位、基本的收购单位身上。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情景是,在商业人民委员部把粮食送来的时候,合作社站到了一边,在两手空空地等待。今后不能再是这种局面了,需要最坚决地把我们的合作社也吸收到收购工作中来,紧紧地把它吸收到这项工作中来。

我认为,米高扬同志尖锐地提出储备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个关于储备的问题不是第一次摆在我们面前了,它以前也是摆在那里的,需要的只是要坚决着手建立这些储备。没有储备我们就会常常遇到市场上的各种摇摆。在这里,我认为,只有国家总的资金是不行的,需要把工业的资金也吸收来做这件事。例如,我们在乌拉尔就有这样的情景,在我们所有的经济组织中、国家组织中,没有谁有任何的粮食储备,而同时作为租赁方的“列纳·戈尔德菲利茨”公司却有这些储备,其结果是,合作社没有面粉,没有粮食,而承租人却有这个粮食。施瓦茨同志说出了—一个思想,需要把粮食供应从合作社那里抽出来,转交给经济组织。有一个时候是这种情况,但是这样的方针是不正确的,我们不应该再退到这种做法上去了,但是吸收我们的经济组织,让它们帮助建立地方储备,帮助工人合作社有一些储备——这是必须的,因为工人合作社有的周转资金太少了,它不可能把握住大量储备。我们在布良斯克省就有过这样的情况,合作社得到了数量相当大的粮食,但是它没有能力保存这些粮食,因为没有必需的资金和仓库等等,就把这些粮食放过去了。所以,吸收经济组织参与,让它们给出一定的资金

来帮助建立这些储备是必需的。我认为,这个措施现在是非常需要的。

我在这里想提供一些材料,是刚刚从一些地区得来的,是关于现在的粮食市场状况的。例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是我国一个非常大的冶金工业地区,副主席里亚尼切夫通知说,“从5月1日到现在,粮食市场上的状况一直非常严重,在面包房里排起了买面包的长队”。

有人喊: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

列普谢:这是在几天前收到的。在彼得罗夫斯基工厂,有一批工人来到了工厂委员会,要求给他们解释,如果他们离开工作,是不是要被工厂解雇,因为他们没有粮食是没办法工作的。在塞瓦斯托波尔工厂有这样的情况。一大批工人上工晚了半个小时,当问到他们原因的时候,他们说是因为要排各种队。我们在一系列地区至今还有排队的情况,该采取措施消除这种情况了。例如,我们在乌拉尔的粮食状况非常严重,在兹拉达乌斯托夫斯克区,粮食尖锐不足的情况特别突出。在这里需要做出让步,就是说要来帮助一下乌拉尔,因为它自己的粮食储备已经维持不到新的收成下来了,而且这次的收成又来迟了。

我想,今年我们的出口不得不放一放了,而且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基本工人区的粮食保障,建立内部的储备,只有在这之后,如果粮食市场上的行情变好,局面可以得到改变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可以着手出口。

主席:丘巴尔同志发言。

丘巴尔:关于粮食收购的问题可以说许多的话,但是我想,对于已经过去的粮食收购无须多说什么了,需要说的只是,什么可以成为准备未来的粮食收购运动需要汲取的教训。从这个观点看,从根本上说,造成去年粮食收购运动中存在的种种现象的那些困难是源于我们国内的粮食资源状况的。我们在中央的一次全会上<sup>120</sup>散发了谷类饲料平衡表,那里标明了全苏联1927—1928年度各种粮食歉收1.32亿普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小麦的歉收大约是1.17亿普特,而饲料、大麦、燕麦等的歉收大约是1.29亿普特。这样,我们在小麦上歉收了,在饲料作物上歉收了,不得不更多地消耗黑麦。现在中央统计局把数字搞准确了,确定了粮食的歉收要高得多。少收的饲料作物引起了要消费小麦和黑麦来喂养畜力,而且在一系列地区由于这种情况,食品粮的消耗过多对市场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我们在乌克兰,特别是在它的草原地带,感觉到了这一点,这在其他的地区也有感觉。在消费地区,到了收购的末期时,可以特别尖锐地感觉到这一点。例如在莫斯科,是用烤好的面包喂牲口,我们在敖德萨看到的也是这种情况,因为给牲畜的饲料不够了,而且饲料的价格比粮价还要高。

有人喊：现在也还是在这样喂。

丘巴尔：显然，我们的粮食资源和饲料资源是不足以保障没有痛苦地、没有紧张状况地度过这一年的。

为了寻找粮食不够的基本原因，我想，还需要看到我们经济的商品率太小了。基础是商品率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收成低。在四月的中央全会上，我们在决议里写到了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收成。但是我想在这里坚决强调一种状况，那就是党、苏维埃政权、地方机关以及农民本身，对提高收成所做到的都还不到需要做到的十分之一。如果不提高收成，到处在所有类型的经营单位里，国家的也好，合作社的也好，个人的经营单位也好，我们都不可能提高我们的口粮资源，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粮食资源。收成高不高，在我看来是最近这些年来我们的农业生产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和最薄弱的地方，需要在这方面使劲。要从各个方面使劲：从计划措施方面，其中包括在基本投资方面，在肥料方面（既要靠在国内发展生产，也要靠进口），在机械化、拖拉机化方面，在建立纯种的和改良的种子基金方面，等等。和国家的计划措施平行的，是应该也要靠发展农民本身的，特别是组织到了合作社里的贫农和中农群众的独立性，来推行一系列措施。如果没有农民在我们的党组织领导下，在提高基层苏维埃积极分子和合作社积极分子以及整个先进农民的独立性的情况下，着手从事这个事业，我们的计划措施不可能得到我们为了顺利建设社会主义所应该争取做到的那种效益。可以举出不少的例子说明，我们对农业的拨款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效益。可以举出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乌共(布)中央全会上对于这一点说了许多话，而且我在每天的工作中也不得不遇到这样的事情——这就是种子的筛选。拨给了我们一台选种机，拨给了一个村子，建立了出租点，为的是让选种机和其他的粮食清理机能为农民服务。可是有不少的情况是，一台一昼夜能筛选200普特的选种机在整个春天总共就筛选了30普特。如果说我们后来是这样来使用这些资本，那还干什么要把钱投到机器上呢？

有人喊：这又怎样解释呢？

丘巴尔：可以这样解释，就是谁都对这件事没有给予应有的关心。我们按照计划把所有这些都写出来了，计算好了这会对农业经济有如此的改善，于是给了农村几千台选种机，可是在下面，没有能足够地组织好正确使用这些机器，农民没有能足够地动起来，以最大的效率把国家的帮助使用起来。我想，发生这种情况不是由于害怕。使用出租点的机器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在这里起作用的，更多的是不勤快，而不是任何害怕，还有就是我们没有能足够地深入到农民中去。

决议里需要特别地而不是在括号里说到关于收成好坏的问题。在把收成好坏的问题放下不说,转到决议草案第一部分里说到要把重点放在粮食问题上的那些说法的时候,我想表示一点怀疑。我的感觉是,把粮食问题上的例行任务这样突出地摆出来,在许多情况下,有可能会使得人们对这个口号做出不正确的解释,导致人们对它采取不正确的态度。在我看来,无论是在多大程度上,粮食问题都不可能是和经济的集约化任务、合理经营以及个体经济、集体和国营农场的任务对立起来。总的对于苏联来说,提出粮食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个别地区和个别经营单位来说,对于个别的联合体来说,粮食问题本身不可能被看成是一种能够排除一切灾祸的灵丹妙药。在许多情况下,粮食经济是无利可图的,而且农民的基本投资是放在其他方面的。例如,在我们的草原上,中农农户有10俄亩的土地,是一个5口之家。如果他甚至是搞四期轮作(而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农户搞的是三期轮作),有7.5俄亩种庄稼,其中一半种过冬作物,四分之一种春播作物和四分之一是中耕作物,粮食的平均收成是50普特,好的时候是60普特,从粮食地里得到的总共是250—300普特。他平均按1普特1卢布出售(我们那里今年的平均粮价是1.01卢布/普特),如果从这中间扣除自己的消费大约80卢布,在最好的情况下,剩下的是200卢布——按5个人平均是每人40卢布。这是在情况好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年景相对比较好的时候。然后就是开始满足经营上的和个人的需求了:购买机器,购买靴子,购买布匹,购买经营上的什么东西。在我们的价格条件下,他在这里的平衡状况是这样的,他不可能有很踏实的感觉,于是他当然要把住这个粮食,为的是不要没有了粮食,没有了商品和所有必需的东西。粮价和工业品价格决定着经营能有多大的赢利,在单纯经营粮食的情况下,这种赢利的水平是非常低的。这是最好的情况,是在农户能够以一个卢布一普特的粮食作物出手的情况下,而也可能会更坏。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发展经济和真正提高经济的生产率的刺激作用是很有局限的。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把平均产量从每俄亩50普特提高到100普特,那么即使在平均价格为一普特一卢布的情况下,也会对发展经济有更大的刺激力,而如果是现在这样,他就不得不为了让自己的预算不会出现赤字,把自己对粮食的经营转向对畜牧业产品和家禽业产品的经营了,用这样的办法进行补偿,从而使得投向市场的粮食要少得多了。每一个农民当然都是要计算和搞自己的平衡表的,要努力平衡到可以购买自己的靴子和购买各种经营工具,要能给孩子买些东西,让学生能上学,等等。这样,在一系列地区,如果光是经营粮食,那就维持不了这样的平衡了。就拿我们乌克兰的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来说

吧,那里的人口密度和西欧国家相当,一平方公里有116—120口人。在那里,靠粮食经济无论如何是没有出路的。农民靠甜菜、靠技术作物为生,他们在那里种植啤酒花,喂养牲畜,以此来补偿自己的经营,让自己的平衡表上不至于出现赤字。农业地区的特点是需要考虑的,而且我的感觉是,我们需要根据个别地区的情况,有区别地对待关于粮食问题的口号,要把劲用在总的经济集约化和总的提高生产、畜牧业以及其他经济部门的效率上。我个人还认为,在最近一个时期,粮食产品在我们的出口计划中不要占据很大的位置。不提高土地的收成率,就很难指望粮食作物的出口,因为正在发生的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改造过程,而要把粮食作物推到市场上去,光靠在价格的对应关系方面把农业生产的所有产品组织好是不够的,更何况未必我们出口粮食产品就的确那么无可争议地有好处,就不能用另外的产品取代它们,可能这样的产品是应该得到更多发展和鼓励的。这个问题需要仔细研究,要搞清楚出口这样或者那样的产品有什么好处。为了不把粮食问题和总的提高我们的农业问题对立起来,不和提高它的商品率以及让商品产品有走上市场的通道对立起来,也为了不把经济拉回到非集约化的形式上去,为了这些,需要给出的是这样的表述和这样的指示,要让它们在个别地区不致引起任何怀疑来。所以按照各个经济领域把任务划分出区域来是绝对必需的。

关于粮食经济是不是存在危机的问题。我的感觉是,首先我们应该认为,存在危机的是我们在最近这些年里所有的、几乎是稳定的、非常低水平的收成。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面积的压缩,不是我们不需要的其他作物挤了粮食。我们这里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这里种植甜菜,那它就是需要的;如果种植亚麻,那它也是我们需要的。这样的对立和对粮食作物的排斥是没有的。所有作物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我认为,不能把这种状况说成是粮食经济的危机,因为亚麻和一系列其他作物也处于危机之中。粮食经济的危机在于低水平的收成,在于对农民来说,它的赢利率太低,而不在于它和其他作物对比的情况如何。

如果想一想价格是怎样影响到粮食经济的发展的,它们是不是决定性的,那么米高扬所说的它们不是决定性的就不对了。在我们乌克兰,价格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规范的、按照农业税计算出来的收入状况并不取决于粮食的价格,而且因为一定的价格是已经确定了的,那么从农业的纯收入中提取就是落在了从事粮食经营农民肩头上的沉重负担了,因为他种粮的所得要少于种技术作物、搞畜产品、搞家禽产品等等的所得,而搞那些产品的所得并没有考虑在规范的收入之内。如果粮食的价格高一些,那么税收的负担就会少一些,因为税率的



确定是在价格之前。

米高扬同志说,对大田作业的税收重负是一种巨大的负担,这是对的。

除一般性的条件外,到粮食收购快要结束时,堆到我们头上来的困难是过冬作物的死亡。在乌克兰,在粮食特别是小麦和黑麦的收获推迟方面,对于消费和复种以及秋季的保险储备来说,过冬作物的死亡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到时,有许多农户就会颗粒不收。这些困难在明年对粮食市场的影响会比已经过去的农业收购年更大。

米高扬同志在这里演示的那些计算结果纯粹是大体上的和估算的。在这些计算的基础上是不可能构成一个肯定的计划的。但就是对这样的计算也需要做某些修正。例如,说乌克兰歉收了850万普特,除了联盟中央统计局的错误计算外,是绝对没有什么根据的。6月15日时,我们歉收的至少是9000万普特。根据最后的材料看,6月底在南部的各个草原大区刮起了干风,刮走了大约4500万普特。所以我们歉收的将是1.30亿—1.50亿。这也是估算的计算结果,因为今年即便是根据7月1日的材料,得出肯定的结论也是冒险的。我们到7月15日还将有一些材料,会比这些更完全些,不得不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制定出1928—1929年度的收购业务计划。如果在收割季节有雨,这也会给我们抹去几个百分点。但是那个时候这个百分比所表示的数量要小得多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整个作物少收了1.30亿普特,这还只是倒了一半霉。倒霉的是在乌克兰,食品作物的歉收大体上是2.80亿普特。黑麦和小麦歉收的是3.15亿,但是有一些东西长得还好些:荞麦、黍子等等,——这样歉收才是2.80亿。大麦、向日葵、玉米等等的收成更多了些,但是总的收成比去年少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米高扬同志在这里正确地强调了所有由于在收购的第一个时期把这2.80亿粮食作物分离出来产生的困难,而且在整个一年里不得不采用最复杂的方式进行运作了。

但是对于我们乌克兰和整个联盟来说,结论是这样的,节约小麦、黑麦和其他食品作物需要从一年最开始的时候就进行,而且不能再犯过去的一年里有过的那种错误。我记得年初的时候,在高层机关里议论过研磨的标准化问题和掺和物的问题,但是直到5月我们也没有能在实际上节约粮食的消费。这个闪失需要在年初的时候就考虑到,而且在年初的时候就镇定下来。当然说起来需要采取措施排除粮食供应上的困难是轻松的。但是问题在于困难是会有有的,非常大的困难,而为了不有始无终,不出现中断的情况,节约粮食消费需要从一年的

起始时期就开始推行。

关于储备。如果我们最重要的食品作物不足,如果我们的消费将是非常受限制的,那么还怎么可能谈得上储备呢?一个地方很薄弱的时候,那里就会穿帮的,而当我们到处都很薄弱的时候,我不相信有可能建立起共同的储备来。在用通常的方法收购的情况下,在按照苏联的各个地区来分配得到的收成的情况下,要在今年建立起储备来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我想,这样做是没有希望的。我想在这里这样提出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为秋播运动建立起种子储备并且为春季的播种运动节省下一些来帮助贫农的话,他们应该是在国家的支持下,组织成集体,用我们应该提供的好的种子播种土地,提高自己经营的东西的商品率,那这就很好了。这是一项有限的任务,就是这样也是非常难以完成的。

关于满足对好种子的需求。要知道,在今年,当我们对消费地区的粮食非常难办的时候,我们把很好的种子材料运到磨房去了,而且是不能不运去。现在我们在买小麦,需要把它专门指派来做播种用。为什么呢?因为在克里沃罗格矿区、顿巴斯、哈尔科夫、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没有吃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办法摆脱了,就不能不从专用的种子储备里拿出粮食来供给。我非常担心,如果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提出完全保障种子材料来完成一定的播种规划,那我们秋天和春天在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地区就会遇到各种新的困难。米高扬同志在这里说出的那些数字,拨出用于秋播的种子基金的规模,是绝对不能和饥饿年代比较的,因为那时是无处可以拿到,所以就没有给,而且知道这样会降低我们发展的速度。

柯秀尔:不就是吃掉了。

丘巴尔:就是吃掉了。但是就在今年,我们乌克兰提出了秋季播下1400万普特冬季种子的计划。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恢复1927年秋季播种面积的规模所需要的不到50%的种子。我们希望我们能保障50%,而剩下的50%农民自己能够保障。但是根据现在草原上的收成情况看,这些大区的农民自己要保障50%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砍掉种子供应计划的时候,也就是有意识地在削减秋播地,也就是说减少明年的过冬作物的收成。这是完全清楚的和无可争议的。这就是我要强调的那种威胁。

而恢复面积又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在敖德萨大区,去年由于气候条件的缘故,少种了30%的过冬作物。我们不是预计他们要恢复这30%,而是只要求保障达到去年的水准,也就是说要比草田轮作所需要的少30%。这是对我们的经济在今后也要产生影响的一种威胁。所以我的看法是,对推行秋季的播种运动的态度不应该是这样的,“既然可以做到,我们就给,而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不

给”。如果这些图表和画图上给出的数字是正确的话,那就需要这样来做,就应该是让所需要的种子都能充分满足。应该说,这些数字可能会使我们迷失方向。它们表现出来的是几乎要比去年多5亿普特的收成。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收成要比去年多出5亿普特,而我们在这同时则要减少播种面积算我多嘴吧,我不相信这5亿。但是,即便是收到了这么多,就像现在这些图表上标出的那样,那我们运作起来也还是要感觉非常紧张的。我们应该不仅是保存播种面积,秋季的和春季的,而且要努力把它们扩大。春天我们将不得不和贫农打交道,他们,特别是那些组织到了集体农庄里的贫农,那时将会向我们要求提供种子上的帮助,而我们是应该给他们这种帮助的。不能指望把赌注下在有人会上,在没有我们的帮助下就应把种子播下去了。我们不能指望自发地提高收成,自发地提高粮食产量,而应该积极地促进这些过程的发展,特别是在提高贫农农户方面。这就是在各种粮食收购和使用收购来的粮食的计划中应该得出的和考虑到的基本结论。

还有最后一个意见——关于价格的对应关系。既然我们有的供食用的粮食很少,那么自然应该提高一些价格,而且米高扬同志在这里提出的那些数字,我的看法是,它们是乌克兰可以接受的,如果这是为普通粮食定的价格的话。质量加价的和紧急提供的加价应该另算。但是这里有另外的因素。如果我们把小麦的价格维持在米高扬同志在这里提出的水平上,而玉米、大麦和其他作物的价格还维持去年的,那么我们在中耕作物上就会失败,得到的又将是破坏正确的轮作制。大田作物的价格对应关系应该是这样的,要能不带来对轮作制激烈的破坏。如果在玉米之后播种过冬作物,那就能得到比在大麦之后或者春小麦之后得到高得多的收成。农户家里的轮作制是大田作业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价格的对应关系在这里应该是这样来计算的,要能不破坏正确的轮作制。

畜产品的价格。我的看法是,一些畜产品应该降低价格,但是这里有一个米高扬同志说到的事实,它是将要完全发挥作用的。所以畜产品投入市场将会很难,而且整个问题可以归结为我们在去年使用过的杠杆,其中也包括农业税,今年应该更大胆地和更灵活地利用起来,以便除了粮食外,把畜产品也推上市场。

我们应该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来运作商品储备,以便刺激农民出售自己的产品。需要做的不仅是为粮食,而且也要为技术作物,为畜产品投放工业品。可能米高扬同志会说,丘巴尔没有粮食,所以他鼓动说也要为其他的产品投放工业品。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的,但是我要事先警告的是一种危险。如果我们不给农民的购买力将要靠甜菜、蛋类、畜产品等来增长的地区投放工业品的话,这将

会遏制在粮食和其他大田作业的产品市场上的投放。这是一个危险的因素,是需要考虑到的。

关于工业品的价格。乌克兰的市场行情表明,既然农民在购买能力由于粮食作物的歉收而将会降低,我们将会遇到困难,其中也包括和推行生产性商品有关的困难,因为靴子和衣服他们是一定要买的,而机器——他会想一下就把购买放在以后了。我们这里现在已经有了米高扬同志宣布的关于机器销售的数字,它们并不是完全反映了实际情况的。

**米高扬:**这是在6个月里。

**丘巴尔:**6个月,而现在已经是第10个月了,而我们那里的机器还是销得非常慢,特别是那些不适应季节的机器。甚至连用贷款买都没人愿意冒险,对收成没有信心。我们建议向其他地方卖一部分机器。但是如果我们将这样运作,生产工具和生产性的商品不大能进入农村的话,那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自己将用一只手维持着经济的增长,用另一只手来写发展经济的决议了。这里的运作应该是更灵活的。

关于富农、中农和贫农。当然,不能认为我们已经把富农都剥夺完了,但是对中农的过火行为和贫农由于粮食不够而产生的不满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收购的最后时期。

**李可夫:**是过去还是现在?

**丘巴尔:**现在也有。我们从5月底转向了自负盈亏,也就是说收购到什么就吃什么。

**柯秀尔:**自我供应。

**丘巴尔:**不是,更确切地说是自负盈亏。我们没有储备,而我们有义务要让顿巴斯、克里沃罗格矿区、哈尔科夫、敖德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其他一些地区的无产阶级吃上饭,所以我们就不能不把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办法都用上了,既然有压力,那就也有过火的地方。当然不能认为集市是根据指示或者是谁的命令被取消的。集市被取消是因为对每一个单独的主人施加了压力。绕着农户团团转,一普特、一普特地抠出来,同时还有相应的谈话:你是不是把这一普特留下来搞投机倒把呀,我们是要和投机倒把斗争的。在没有关闭集市的情况下逮捕了出售粮食的人。(笑声,谈话声)

采用这样的办法是因为必须要和哄抬物价斗争。当然,在中央全会上,这是可笑的,但是在实践中,这导致了非常可悲的结果,因为无论是在收购单位的手里,还是在市场上,粮食并没有增加,而在没有给工人足够粮食的情况下,我们也

没有什么东西给贫农。我们做不到给农村的贫农粮食,让他们能全心全意地进一步从富农那里把粮食挖掘出来,这也造成了困难。当然,在第一个时期,当我们开始向贫农供应的时候,这里是按照名单向来的所有人供应的,表现出了慷慨大方,粮食消耗得过多。有过错误和闪失,在农村和在城市里都消耗太多了。为了限制明年的供应计划,当然向所有的党组织提出了方针,不要把我们将要有的粮食都扯光了。但是这里也将会有很大的困难:今年在我们这里,价格遭到破坏的危险要比去年更大,因为在限制供应量的条件下,剩下的就将要向市场要了,而既然市场上的需求将是相当活跃的,那市场价格也就将会脱离计划收购的价格了,接下来便是会影响我们收购的速度。

斯大林:这是完全可能的。

丘巴尔:我要说的是,这是一种威胁。显然我们需要在地方上提供一些运作的条件。我请你们不要把我的话理解成是需要用价格来运作。我主张在年初规定的价格要能指望着坚定地维持到年底,如果我们感到紧的话,甚至也可以采取某些非常措施。否则是转不出来的。但是关于我们的供应计划,关于满足需求,关于地方收购和全苏收购的对应关系——在这里是应该把所有这些问题都研究好的,要做到不是一只手在那里为我们制造威胁,而另一只手好像在表示我们是有成就的。照我的看法,所有这些情况都应该考虑到,而且现在回到最先提出的问题上,我要再强调一遍,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不单纯是粮食问题,而是单位面积产量和正确的经营以及粮食的商品率。达到这个目标要通过贫农和中农农户的合作社联合组织,通过集体化。在几百万的农户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可以让我们一下子就多得到好几亿普特,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我自己联系五年计划研究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问题,发现了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薄弱的地方。有一位教授说过,害虫每年要消灭掉几亿普特的粮食,要知道这是商品粮呀。

有人喊:当然不是沙赫特的害虫吧?

丘巴尔:当然不是,是我们出口的黄鼠,是蚂蚱、小麦矮虫,等等,它们每年要吃掉几亿普特。只是在乌克兰,我们每年由于杂草就有一亿普特的粮食收不上来,而整个苏联有多少呢?我们用坏种子播种了90%的面积,而好的种子在一俄亩的地里就能提高20普特的收成,而这就是说,在粮食播种面积为8700万俄亩的情况下,也能够多收16亿普特以上。如果能够由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提供经过筛选的种子,如果能够刺激农民自己晾晒筛选种子,如果这些种子不是用小提篮而是用机器撒下去,那么单位面积产量就将能提高,粮食的商品率也就会更高。我的看法是,我们可以,我们有能力采取一系列措施,我们应该采取,这样

我们就能够消除我们的粮食经济落后于社会主义建设需求的状况。

**主席:**没有人反对宣布休息吧?休息之后的下一个发言人是奥新斯基同志。

(休息后)

**主席(李可夫):**奥新斯基同志发言,下一个发言的是安德烈耶夫同志。

**奥新斯基:**开始我想搞清楚几个有关事实的问题,然后再转向研究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转向对局势的表述,对局势的评价,然后再搞清楚形成这种局势的原因。

我想,按照我的意见,从造成这种局势的那些原因里,可以相当清楚地引出消除这些原因的相应措施。

现在首先说说有关事实的问题。米高扬同志在自己的报告里没有肯定地说到我们今年在播种面积方面有的是什么,而莫洛托夫同志在你们大家可能都读过的对弗鲁姆金的字条的答复<sup>121</sup>里,引用中央统计局的行情调查表的数据,给出了对这个问题的这样的提法,好像我们这里的播种面积甚至是扩大了,有了相当大的扩大。

**米高扬:**是春播作物吗?

**奥新斯基:**问题不在于春播作物,现在你们就能看见了。

首先是关于播种面积。请允许我向你们宣读以下的对比材料……

**有人喊:**谁的材料?

**奥新斯基:**当然是中央统计局的。1925年谷物粮食的播种面积比1924年扩大了5.6%,1926年和前一年相比扩大了7.8%,而去年它只扩大了2.6%。现在今年得到的是什么呢?专家委员会1928年7月3日的决议把播种面积的数字作为它今年草案的谷类饲料平衡表的基础,根据这个决议,它认为今年农民经济的谷物粮食的播种面积将相当于8462.1万俄亩,而去年是8692.9万俄亩,也就是说减少了2.7%。同时,所有作物的面积并没有减少,而根据专家委员会的意见是将扩大0.5%,但是粮食作物的面积减少了2.7%。这样,我们在最近这些年里有的是一个下降的曲线,它在增长速度逐渐下降的情况下,今年已经转向了减少播种面积,至少专家委员会是可以这样考虑形势的。

现在我来说一说莫洛托夫同志给出的说明。他在那里给出了下列数字:和1927年的春播面积相比的1928年的春播面积,把春天补种的冬播作物的面积也算到了春播的面积里了……

**莫洛托夫:**这是强调了的。

**奥新斯基:**这是强调了的,事先说明了的,但是,莫洛托夫同志,您很清楚,就在您引用数据的那个资料来源里,还有下面这些材料:第一,没有加上补种的1927年的春播作物的面积和1928年的比较;第二,1927年和1928年冬播和春播加在一起的数字。现在为了搞清楚莫洛托夫同志引用自己的数字的那些地区的情况,请您也引用一下这些数字。我将要读出的第一个数字是莫洛托夫同志的数字,也就是包括了用比例表示的1928年和1927年相比的春播面积的数字。第二个数字将是除去补种,只取纯粹的春播地块的数字,最后是冬播和春播加在一起的数字。

我来读一下:乌克兰——莫洛托夫同志的第一个数字是128%,第二个数字是纯粹的春播地块——96%,冬播和春播加在一起是99%。你们看到了,得出的是怎样的差别。

北高加索——莫洛托夫同志的数字——108%,纯粹的春播地块是91%,冬播和春播加在一起是92%。

克里米亚——莫洛托夫同志的数字——86%,纯粹的春播地块是75%,冬播和春播加在一起是89%。

中央黑土州——第一个数字——105%,纯粹的春播地块是101%,冬播和春播加在一起是100%。

伏尔加中游地区——112%,112%和110%。这里没有补种,而且这里的确是播种面积增加了。

有人喊:116%。

**奥新斯基:**我们不要争了,我是从中央统计局的专家委员会的材料里抄来这些数字的。

伏尔加下游地区——莫洛托夫同志的数字——106%,纯粹的春播地块是105%,冬播和春播加在一起是101%。

一句话,如果从莫洛托夫同志公布的材料中取一个平均值的话,得到的是增长了16%。如果得出的是春播和冬播在今年和去年的平均值……

**莫洛托夫:**我在那里说的不是什么平均值。

**奥新斯基:**结果是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增长。我引用这个是为了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他被这样的引证搞糊涂了,或者是由于米高扬同志没有谈到这个问题而搞糊涂了。

**莫洛托夫:**一般性的“平均值”在那里是不可能的。

**奥新斯基:**我引用的是专家委员会的平均值。专家委员会对全苏进行了估

算,就是在它那里,甚至得出的也是减少了。

**莫洛托夫:**您应该把这个问题更好地搞清楚。

**奥新斯基:**我从行情调查表中取出平均值来,不过是为了表明,采用一定的办法是用数字能够得出什么结果,而如果是正确地使用数字则可以得出完全另外的情况。

现在接下来我的结论是什么呢?

**加里宁:**有你们这些过去的统计专家可真倒霉了。

**奥新斯基:**我们有的是播种面积下降的运动曲线,而在今年,我相信肯定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现有的播种面积在减少,当然,这是可以用过冬作物死掉了等等来解释的。

现在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这里说到了储备,并且说出了一些想法,认为中央统计局没有考虑农户中那些看不见的储备的数字。我想,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想,还有一点可能也是没有考虑到的,而且它可能也是影响到平衡表的,可是大家不愿意想想它,——这就是在去年和今年都在起劲地用粮食喂牲口……

**米高扬:**说得对。

**奥新斯基:**由于这样,平衡表也被压缩了。

接下来是第三点。丘巴尔同志说,今年比去年少收了1.30亿多普特。这可能也就能说明为什么困难了。请允许给你们确认一下,去年把1.6亿普特运出国了,而今年是2700万。你们也看到了,两项互相扯平了,显然问题并不在这里。

请允许我在对这些能够把一些基本的东西说清楚的事实做了些说明之后,来谈谈我们有什么和我们是为什么才有的。我们现在所有的,有人已经开始称做是危机。当1927年12月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sup>122</sup>说过,我们没有危机,而有的是粮食收购中的断档。而我当时说了我们有危机,而且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可能会证实这一点。现在我们有的是**粮食经济的危机**,就像米高扬同志所说的那样。

在1927年12月的时候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是这样提出的:如果只是断档,而且是在一个领域里,就是在粮食收购上,那是什么危机呢?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总危机。就是现在我们也还是有一种不慎重的倾向,想把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范围缩小,说是我们只是在粮食经济中有危机。我认为,我们有的是无可争议的危机,不仅是粮食经济的,而且是有着一定的总危机的状态。这个危机状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城乡之间的分离,在于城乡和农村周转中的分离。这个



概念是和结合的概念相对立的概念,是一种高度危险的现象,是应该非常严肃对待的。

有人喊:听不懂。

奥新斯基:有什么不明白的?列宁说过:要关心结合,让城乡的商品周转建立在正常的经济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强迫的基础上,而我们具有的是相反的情况。

有人喊:这就叫做把自己的思想解释到底。恰好是把自己给毙了。(笑声)

奥新斯基:可能这是可笑的。

有人喊:您是用这种解释把自己给打死了。

斯大林:可能打不死。

奥新斯基:我在等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加里宁)来搞清楚他想说什么。同志们,我不倾向于从座位上不断地表示反对,因为我感觉问题是非常严肃的,局势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需要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当成笑料,或者是用俏皮话来打断发言的人。那么,我们就从实质上 and 正经地分析一下,正在发生的事有哪些原因,发生这种分离有哪些原因?对这种情况,我大体上就是要这样称呼的。可能斯大林同志会对这有另外的说法。但是他怎么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呢?斯大林同志在他的小册子《在粮食战线上》<sup>123</sup>里提出了有4个原因,而且这也写进了决议草案:

(1)农业的生产率发展得非常缓慢,比日益增长的需求慢,而且也比工业发展速度慢;

(2)可以说和战前的水平相比,发生了农业的个别社会范畴之间的商品产品的再分配;

(3)“富农搞坏了”。可以简短地这样来表述这一点;

(4)计划调节的错误。

而且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小册子里对价格,对粮食价格和其他作物的价格之间的对应关系,一个字也没有提。这已经写到了决议里。

斯大林:那时候不可能说到这一点。

奥新斯基:也许吧。我同意,为了公布出来,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可能也不需要说到这一点。但是这一点写到了决议里,但是作为其中一段的最后一句话,那里说到了:除此之外,还有机器、播种机、种子等等的供应,而且还有价格,也有影响。

让我们来逐个地分析一下所有这些解释吧。第一,关于富农。显然富农是

对收购形成对抗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时的因素,因为我们对他们进行了打击,虽然没有完全,但是也在相当大的规模上打掉了他们构成作用的基础。

**计划调节的错误**——这也不是主要因素,而且说所发生的一切是“米高扬的过错”当然是完全不对的。当然,商业人民委员部在一些情况下是干过头了,努力过分了,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又干得不够,努力得不够,在一些情况下错过了时机。例如,在1927年的10—11月就错过了时机,那时候,任何一个老的地方粮食委员会工作人员都能看出收购的曲线在急剧下滑,比去年还要低,而且是在收购的曲线应该上升的时刻,也不明白这是因为什么。也就是说警报应该是在11月份就敲响的。这里肯定是有失误的,责任是该落在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头上的,因为它没有及时地向中央施压。但是,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次要的方面。

现在来说说对各个不同的社会范畴重新分配商品产品的问题。

但是要知道,这种再分配是发生在1919年或者1918年的,在1919年就完全形成了,而至今也不是所有都在运转,而在1928年的时候,突然启动了。我想,总还不能把这个因素算是决定性因素。当然,可以在这方面说,数量已经转为了质量,这种情况最终是成熟了,而且成了决定性因素,等等。但是看上去这种状况总还是不大能够得到证明,而且并不完全像是这么回事。

这样,我们就要谈到最后一种论断了:说到农业的生产率发展缓慢,比工业要慢。关于这一点,我应该说,在经济学的著作里,最常见的是用什么和什么之间的比例失调来解释危机的情况。但是马克思早就说了,这样的解释是老调重弹,这只是在用另外的话来描写危机状态。问题在于,比例失调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一个会走得快些,另一个就走得慢了。

**米柳亭**:是关于市场性的比例失调。

**奥新斯基**:要知道,这就是市场性的失调,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你可以这样说。

现在接来说吧。不仅是在我们的著作里,而且在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中,经常地是在利用这些论断本身的时候会把观点改变了。例如李可夫同志,他有两次就这个问题说出了不同的观点。例如,他在一个时期说过,农业的发展和恢复太快了,而工业赶不上;但在另一次却说工业发展得更快。你们可以说,这是在不同的时间,当时有着不同的趋势,虽然这不能完全得到证明。最好是说,他把自己的观点深化了或者转向了另外的解释。

**加里宁**:这好像不是李可夫说的,而是大家说的。

**奥新斯基:**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是这样表述的,你们都看见了,农业生产率的发展是缓慢的。我想,既然在审议纲领的时候,布哈林同志和斯大林同志都竭力把我引向了那个方向,在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决定性的评述是“到市场上去找”,那么,我就想,在这里也是需要这样提出问题的:到市场上去找,这样一来就能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发展得比较慢,而另一个发展得比较快。要知道,要最终解决农业和它的生产率为什么发展缓慢这个问题,总是可以像丘巴尔同志补充提出的那样,把农业生产率落后的概念从形式上分解成各种事实。说是提高收成可以通过采用没有采用过的种子分类,用使用大量肥料的办法,还有一些随手就可以拾到的、更简单的办法,那么,为什么农民就不采用它们呢?同志们,我想,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农民都非常清楚,采用所有这些办法是会有好的效果的。而如果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采用,如果是在扩大播种面积上止步了,那就不该是认准这是由于不理解,从这里下手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就像是不该在机械地扩大生产上做文章一样,而是应该在经济的刺激减少了这方面寻找原因了。最终也就是应该这样来提出问题了。这是要在市场上去寻找的,并且是要从这个角度来回答提出的问题的,而且照我的看法,应该是这样来寻找出对发生的事情的解释,应该在人们已经指出的那些事情以外去寻找。

当然,在解释任何现象的时候,都可以指出许多原因,但是决定性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我看是下面这些。我不是从最重要的,从粮食的价格开始说起,这些价格是在上一次的粮食收购运动时确定的。现在我的感觉是,已经完全清楚了,在这件事上犯了一定的错误。现在最多能说的是什么呢?在运动的半途上改变价格是没有好处的,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就要和贫农争吵起来了。但是如果我们在运动开始的时候提高了价格,那么难道我们就不会和他吵起来吗?很清楚,这里是有错误的——粮食的价格太低了,而且除此之外,粮食的价格是和农业生产的其他比较集约化的作物和产品的价格有差距的,这些产品要比粮食作物的条件优越。接下来可能也不是最主要的,因为我从一开始讲的就不是最主要的,所以我提一下次要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

**主席:**您还需要多少时间?

**奥新斯基:**15分钟。

**臧声:**给他。

**主席:**没有反对意见吗?没有。

**奥新斯基:**是这样的,第二个因素是这样的,情况是这样的。说实在的,就是

在去年发表十月宣言<sup>124</sup>、降低了税收数额等等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是在把事情引导到这样一种状态,其实就是取消了所有非经济的强制手段、非经济的压力,而这些是对我们从农村得到产品有影响的手段,在这方面我们把事情公开了并做出重大的减负。实际上我们下了什么赌注呢?那就是城乡之间商品交换的方法,这一方法当然不是绝对基于商业核算,但又主要是依据商业核算,只是很少地采用非经济因素(我指的是税收等等)。结果怎样呢?特别是在这个宣言发表之后,农民就有这样的底牌:我想卖就卖,不想卖就不卖,如果我在经济上和商业上有好处,我就卖,没有我就不卖。在我们这里是一种什么情景呢?就像是把底片显影了,显现出来的是:对于处于现有状态下的农民来说,对一大批农民来说,对于中农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而这种状况不过是由富农造成,强行促成的)出售粮食简直就是无利可图了。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请允许我把这个情况再继续演绎下去,提出一个最一般的、基本的问题。请允许我为了给它们做一个引言,引用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好像是在我们党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sup>125</sup>或者是在倒数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他在这次讲话里说:“我们的目的是恢复这种结合(就是现在失去的那种结合——奥新斯基注),用行动向农民证明,我们是从农民所理解、所熟悉、目前在他们极其贫困的境况下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而不是从农民看来是遥远的、空想的事情做起;证明我们能够帮助农民,共产党在眼下小农破产、贫困、挨饿的困难时刻,正在实际帮助他们(列宁是在1921年和1922年的饥饿之后说到这一点的——奥新斯基注),要么我们能证明这一点,要么就被农民撵走。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sup>126</sup>

接下来是:“农民是在贷款给我们,他们有了过去的经历,当然不会不给”,“但是这种贷款不会是取之不尽的”。

“应该明白这一点,而且借了钱总得抓紧学。要知道,农民国家不再给我们贷款的日子快到了,那时,如果用一句商业术语来说,农民就会要求现金交易了”。<sup>127</sup>

在下去一点,列宁说:“资本家会做供应工作。他们做法恶劣,像强盗那样行事,他们侮辱我们,掠夺我们。这一点连不谈论共产主义(因为不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一回事)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知道。”<sup>128</sup>

“但是,资本家毕竟会做供应工作,你们会吗?……‘你们这些人倒是很好,可就是不会干你们所抓的事务,经济事务。’这就是去年农民以及一些工人阶层通过农民对共产党提出的最朴实、最致命的批评。”<sup>129</sup>

他最后说的是:“我再重复一遍,应当从头学起。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

那我们考试就能及格,这是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举行的一场严峻的考试,是俄国和国际的市场举行的一场考试,我们受制于这个市场,同它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这是一场严峻的考试,因为在这场考试中人家可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击败我们。”<sup>130</sup>

我想,这是一针见血的,而且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可以说是俄国的农民大众对我们的第一次入学考试,不是富农专门给我们提出来的。富农在这方面是在暗地里推动这场考试,但是在你们给中农提供条件的时候,中农自己做了选择,在简单的经济核算的基础上,他们是出售还是不出售。他们在这里对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考试。

这个考试将是什么样的呢?请允许我给你们宣布几个很好的数字,它们是关于大家都知道的“剪刀差”问题的,但是还是值得再一次很好地研究和好好消化的。这就是商业人民委员部今年第二季度的收购价格指数。价格是和战前价格比较的百分比,粮食产品是125,油料种子是134,技术作物是135,畜产品是172。你们顺便可以看到,为什么不出售粮食的原因是非常清楚的。平均是139。现在来看看行情研究所<sup>131</sup>的一般贸易的零售价格指数。而且事先有一个小资料。商业人民委员部收购了多少数量的什么东西,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什么,是粮食产品、油料种子、技术作物和畜产品,它们在周转中有什么意义?在今年的上半年里,商业人民委员部收购的情况是这样的:粮食和油料种子4.16亿卢布,技术作物(除棉花外)1.92亿卢布,畜产品1.99亿卢布,总共8.07亿卢布。这中间有一半,也就是4.16亿卢布,是粮食产品,是用如此低的价格收购的,然后只是几乎2亿卢布是贵一些的畜产品,比较少些的是指数稍高一些的技术作物。现在请允许我宣布一下,什么东西是怎样出售给农民的。工具是战前价格的226%,鞋是217%,盐是180%,糖是202%,煤油是唯一的例外,表现出的可能是另外的对比关系,是106%。这里在最后列的是商品的零售指数清单,但是我要继续说的是中央统计局的批发指数。这大体上也是同样情况,只是在绝对数量上有差别。钉子(按批发指数)是179%,绳子是201%,而犁,由于我们发了善心,是109%。但是农民至少要5年才买一次犁。这就是我们的非常好的状况,我们在购买生产资料的时候帮助他们,我们让他们可以比较便宜地购买这些。但是要知道,从直接的每年商品周转意义上说,这一点很少能反映出来。而在现在的周转中,我们只是在煤油上是按照战前的106%的指数给了他们的,而其他所有剩下的东西是用了高出一倍的价钱,我们支付给他们的只高出了39%。

现在让我来说一说这个吧。在我还是当反对派的时候,我常常对自己的反对派人士说,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是政治上要正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完完全全地具有这种品质。而且我也说过,在我们的所有工作人员中,在座的斯大林同志是政治上很正派的。现在我就是呼吁这种政治上的正派,要问一问:如果你们在苏维埃政权的十一个年头上面临的是这样的局面,在列宁已经向你们说了农民是在给你们贷款,在等待着你们和他们的结合,这样等待是不可能长此以往的,老乡来买靴子、钉子、绳子,无论拿什么都要付两倍的钱,而且商品的质量还是很糟糕的(所以因为质量也是该打折的),那么就要问一问了,在这种状态下,在第十一个年头上,是不是可以想一想,能让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要知道,列宁说得对。就是这些农民,甚至也还有部分的工人——对工人也可以同样提出这样的问题,只不过是在别的问题上,——这些和我们一起走的农民,他们和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不是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们想更好地生活,而且他们是冲着这个来的,他们不是为了“下一代”做这件事的,而是想要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能看见某种光明,他们也想穿上战前穿过的那种靴子,让他们能够穿上战前那种价格的衬衫。

有人喊:那个时候他们是光着脚的。

奥新斯基:他们不是到处都光着脚的。至少他们现在想要穿上靴子。可是他们现在不能穿靴子走路,因为我们是随便把所有的东西给了农民,但是并不关心让这种最起码的东西能够实现。

喊声:那应该做什么呢?

奥新斯基:这从我现在要说的就可以看到了。我曾对这样一本小书感兴趣:《苏联工业发展五年计划材料(1927—1928年度至1931—1932年度)》,是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出版的<sup>132</sup>。

有人喊:已经作废了。

奥新斯基:不管是作废了没有,但是至少是非常有特点的。我埋头看了这本书,看看我在两年前就已经表示了祝贺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做了些什么,对纺织工业和制革工业都做了些什么,让他们的产品能在出售的时候便宜一些,——因为正是需要这样来实现和中农的联盟,而在经济上这就意味着是“结合”,——在对这个工业的基本投资方面,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做了些什么和有什么打算。原来是这样,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1926—1927年度的评价是“1926—1927年度的失败”,说到“在狭窄的控制数字的压力下,不得不只是给出少得可怜的拨款来维修工厂”,等等。原来是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计划,纺织工业在五

年计划期间应该靠折旧和利润积累 20.20 亿,而对基本工业的投资预计是——现在我在这里找不到准确的数字了——要少得多,而 6.64 亿卢布的差距原来是挪到其他的工业领域里去了。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如果我们看看(我编制了一个清单,有哪些工业部门的基本投资是短缺的,哪些领域是过剩的),原来,除了纺织、化学和食品工业外,所有的工业领域都是短缺的。在总的平衡表上:化学工业有 5 900 万的剩余,食品工业——2 200 万,纺织工业——6.64 亿,所有其他的领域的短缺是 15.67 亿。原来对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说,纺织工业是主要能挤出奶来向所有其他的工业领域拨款的奶牛。

我很感兴趣,便埋头做了分析,看看制糖工业是怎么干的。老乡也是要买糖的,付的钱是战前的两倍。制糖工业也是亏损的,想要在 5 年期间里,在基本建设的总计算里给它增添大约一个亿。

臧声:不对。

奥新斯基:一个亿的基本建设款也要从纺织工业里拿。有这个必要吗?

结果这会导致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认为,五年计划第一年的起点是,出厂价的指数是战前的 193%,而在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它将是 152%,而且该委员会是通过对企业的基本改造和合理化等等来降低这个指数的。在这方面它是这样办的:硅酸盐降低指数 34%,冶金工业——26%,电力工业——44%,化学工业——30%,木材工业——31%,造纸工业——31%,食品工业——27%,纺织工业——16%和制革工业——19%。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由于资金是从纺织工业转移出去的,又不给纺织工业足够的资金,那么在将来也就没有希望降低纺织工业的价格了。他们的情况是,在 1926—1927 年度,按照他们的指数,纺织品的出厂价格是战前的 206%,而在五年之后,也就是在 1931 年的时候,他们还想是战前的 177%。在制革工业,这个指数在 1931—1932 年度时将是战前的 132%,但是纺织工业在 1931—1932 年度还将是战前的 177%!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有的是现在的一种乱七八糟的情况,而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这里起劲要干的是不让纺织工业发展,不投入足够的基本资金,它要这样继续维持纺织品的高指数并阻碍消除今天的危机中的一个成分。

当我读到这个材料的时候,我应该坦白地说,我曾对自己说:我理解 B. M. 斯米尔诺夫<sup>133</sup>的决心是从何而来的,这个纲领的意义何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就是现在也在想降低那些工业本身消费的物品和商品的价格,但是对于那些投入广大市场上的物品和商品,它是要保持高价格的,要得到高额利润,把这种

利润转移到其他的工业领域里去,这样来使工业得到发展。这和斯米尔诺夫的要求有什么不同呢?那个人只是想再提高价格,而这里想要的是制止住降价。这只有一度之差,但是实质上是同样的想法,而且这种想法是和我们应该在农村的商品周转中所做的背道而驰的。

有人问我,我要建议的是什么?我可以非常简短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

**斯克雷普尼克:**这就可以了,而且是再充分不过了。

**И. 柯秀尔:**你白白地拖了时间。

**奥新斯基:**不,不是白白地。

我有什么建议?我的建议很具体,是对那些计划的补充,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计划作基础,在最近的1—2年里投入2—3亿,给那些为农村需求服务的工业部门。

**古比雪夫:**我们是给8亿。

**奥新斯基:**我不大能相信,古比雪夫同志,您能实现这一点。您说的是再加上8亿还是五年总共8亿?

**古比雪夫:**总共给棉纺织工业8亿多。

**奥新斯基:**而我说的就是要再多投入多少。我提出的是这样的口号:至少需要2—3亿在最近的2—3年里投到这件事上来。

**喊声:**那原料从哪里来?

**奥新斯基:**原料的状况是完全令人气愤的。如果开始向你们说明现在原料比战前贵了多少(战前是多么便宜),细纱和成品贵了多少,那你们就会要吓得张口结舌了。而且我要说的是,如果煤油可以按战前的106%出售,那为什么这就能做到呢?因为对巴库的石油工业搞了合理化,搞清楚了我们能够按照战前水平的106%生产。

**洛莫夫:**不完全是因为这样。

**奥新斯基:**百分之七十五是因为这样。我要绝对说的是,如果我们投入的是真正现实的资本,可能它根本就不需要力图从我们自己的口袋里掏,可以试试从国外得到(我特别要说的是,我们在纺织工业里没有试图正经地吸收外国资本),如果我们在最近的2—3年里投进去2—3亿,我们就能争取做到大大降低纺织商品的价格,所以我们应该无论如何要在不多于两年的时间里就做到不要像现在这样提出这个问题了,可以让农民的确能在我们这里得到这些商品,至少涨价的幅度和他所得到的基本食品是一样的。那时这个困难也就将解决了。



现在有人问我:工业化怎么样呢?这样提出问题简直是太好了。我的理解是,当索柯里尼柯夫说到需要先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农业,让我们能够更多地出口的时候,这是针对着工业化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我说到无论如何也要保障工业的相互衔接的部门要有秩序的时候,说到应该是比如说像搞国家的第涅伯河建设那样关注地想一想的时候,这就不是搞工业化了!

有人喊:没有原料能让现有的工厂开工呀。

奥新斯基:没有原料?你们可以照去年的办法到美国去购买原料,按战前的价格加上不大的加价。如果你们给大的工作项目投入,那你们为什么不能做同样的工作,询问一下新的地区,在我们自己这里,在国内得到原料呢?而你们想的只是建设不得不花费2亿的第聂伯工程,然后还要再给它搞8个亿。(喧闹声)我是说,这个问题和关于大的基本工程问题一样重要,如果我们想要正经地抓这个问题,我们是肯定能够解决它的。而且解决的方法之一就是:实实在在压缩我们的国家预算。用财政人民委员部的话说,我们的国家预算总是紧张的。我要说的是,它根本就不紧张,而它不过是一个不量力而行的国家的预算。就拿这样一个局部的事情来说吧:我们大家都要去疗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每年都要到克里米亚、高加索等等地方去,但是有很多人,数以百万计。而且我们在那里生活得很奢华。这件事就要花费我们好几个亿的卢布。我不知道准确的数字,但是我相信这个卢布数字是要以亿计算的。我们追求的是减少我们的行政管理开支20%,同时我们精简编制,减少对文具、对笔墨等等的开支。我们在预算的许多方面现在是入不敷出的。如果我们不是自己来做这件事,也就是说给上述部门拨出更多的资金而不是减少我们的预算,那就是危机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危机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迫使我们做到这一点。这里在座的怀疑主义者可以笑个够。我今天说这个是为了让你们如果今天不做出这样的结论的话,在6个月以后能回忆起这一点来。

主席:安德烈耶夫同志发言。

安德烈耶夫:我想先对奥新斯基同志说几句。他这样轻松地想象解决危机这件事,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该把所有我们在坐的人和中央叫做傻子了,因为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奥新斯基同志所建议的简单的事情。

喊声:对。

安德烈耶夫:在奥新斯基同志那里找到了2亿卢布,在奥新斯基同志那里也找到了为农业大幅度地降低轻工业商品的价格的可能,等等,等等。但是我想,奥新斯基同志只是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和农业相结合的不仅是纺织工业。

**奥新斯基:**我完全没有说这个。

**安德烈耶夫:**我们的工业化路线是建立在争取整个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基础上的,其中也包括了重工业。为什么奥新斯基同志单独提出了一个轻工业呢……

**奥新斯基:**我根本没有把轻工业单独分出来。

**安德烈耶夫:**并且让它能够和农民经济结合,而把所有其他的都忘记呢?我想,奥新斯基同志只想顾到今天。

**臧声:**对。

**安德烈耶夫:**他不想关心明天。我想,奥新斯基的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企图要重新修正我们的工业化计划。我想是这样的。

现在,同志们,我想对提出来的问题说几句话。我想,中央委员会对粮食收购提出了这样展开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决议不仅包括了粮食收购的、狭义上的经济问题,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经济问题,做出了一系列政治结论、一般性的政治方针,等等。我想,甚至这样篇幅的决议也还不够,还有些东西它没有包括进去。首先,我想对如何评价我们和农民的关系状况说两句,因为这个问题在粮食收购的结果中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也是大家都感兴趣的。

**柯秀尔:**是中心问题。

**安德烈耶夫:**是一个我们应该从中得出所有的相应结论的中心问题。而我义务这样做,是因为北高加索是评价这种状态本身最具有特点的了。我应该说,最近的两个月里,也就是5月和6月,我们那里的局势变得尖锐了,和我们在第三季度收购时,也就是1、2、3月时相比恶化了。恶化并不是因为像米高扬同志在这里说的那样,是有过火行为,问题不在于过火行为,我想,在我们这里,过火行为在5、6月里要比在1、2、3月的时候少多了,因为我们利用了在三季度出现工作缺点的经验,为的是不再重复过火行为等等。影响了农民情绪,使这种情绪变坏的基本的东西,是我们在5月和6月用收购触动了中农最真正的保险储备,这是中农不愿意给出来的,特别是他们考虑到了过冬作物播种的失败。总的来说,过冬作物播种面积的巨大失败以及今年收成状况的不明朗使得中农面临着可能要挨饿的前景。就是这一点,在我们那里使得5月和6月的收购状况变得更尖锐了。我们要花费大得多的力气,要用高得多的价格,才能收购到更少的粮食。但是我远不是要对我们在农村所有的状况得出什么悲观的结论来(而且所有和我一起在北高加索工作的同志们在评价农村的时候都是持这样的立场的),好像由于粮食收购的结果,到处都是某种反苏维埃的阵线,中农已经离开

我们了,和中农的联盟已经被破坏了,等等。我想不是这样的。可以勾画出来的情景是这样的:我们为了要在对北高加索现在得出某种结论来,通过各种人对边疆区的全部状况详细地摸了底。在5月和6月的收购工作中,有1000人到1500人在工作,而在前一个季度时,有4500人在工作。通过这些人,我们摸到了各种情绪,通过在我们那里工作得不错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摸到了农民的情绪,还通过搞了两次生产会议<sup>134</sup>也摸到了。这样的农民生产会议是在春播运动之前召开的,就是现在,就是在最近,为的是说说关于播种的情况,搞清楚情绪,让老乡们有可能好好说说,摸到他们的情绪,等等。而且这个经验在我们那里是很成功的。我想,通过所有这些渠道检查农民的情绪,在我们北高加索可以做出这样的评价,那就是富农已经让我们搞得非常恼火了。如果有可能的话,富农是会和我们公开打仗的;会把我们的脖子拧下来,因为我们的确是用了一些东西狠狠地打击了他们。当然不是剥夺富农,离这还差得远呢;他们经受了贫农委员会剥夺富农的各个时期的各种水火冲击和折磨\*,依然还是富农,现在我们没有剥夺他们,但是我们还是对他们有很大的限制。为此,他们对我们恨得咬牙切齿。至于中农,我们的评价是这样的,中农仍然是同情苏维埃的,但是由于在粮食收购这件事上的那种集中的压力,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于是警觉起来,在观望今后会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农的情绪是:受了惊吓,在小心翼翼地看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至于贫农,我想,总的来说贫农是心向着苏维埃的,而且和我们在一起工作。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在北高加索的农村推行任何措施。要说中农背离了我们……如果说在北高加索的条件下真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现在北高加索简直就是处于一种起义和国内战争的状态了。北高加索的富农是最爱闹事的,最有文化的,最文明的和最有影响的,大体上占农户的6%—7%。如果他们有中农站在自己一边,那高加索现在就会炸锅了,就要闹得天翻地覆了。现在,个别的富农阶层、宗教人士等等在一些地方还能够试图搞些乱子;在卡巴尔达有这种情况,是和粮食收购有关的,在那里,一些老的阿訇和残余贵族组成的集团,利用了粮食收购中的困难活跃起来了,在这场运动中提出了一系列政治要求。现在,就在最近时刻,局势的特点是火气大大下降了,因为我们完全是有意识地减弱了各种压力,给出了一定的自由空间,以便投入到新的粮食收购运动中去,要让居民们准备过冬作物的播种。激烈的情绪现在降温了,但是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局

\* 原文如此。——编者注

面对于我们也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还没有和中农的其他阶层把联盟搞破裂,但是应该承认,已经出现了这种破裂的威胁和危险。所以,我们将为未来的粮食收购等等采取的措施,应该是以不重复现在的试验为出发点,现在的试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重演了。如果我们在今年还要故伎重演,继续搞这样的粮食征购,那我们肯定是会把中农丢掉的;如果今年还继续搞这样的粮食收购,那个时候中农一定是会背对我们的。由此而来的任务就是要清醒地评价形势,不要陷入恐慌。要利用好粮食收购向我们提供的所有教训,采用另外的办法,而在这种条件下,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让我们关心的是和中农的联盟,一定要坚决改变中农的情绪。如果他们为未来担心,那就应该向他们证明,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向他们证明,我们在农民问题上没有打算也不会对我们的政策做任何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在这方面,收成的年景给了我们一些帮助。

我想,我们能够改变中农的情绪,我并不怀疑这一点;但是我们当然不可能消除那些困难,今年的困难还将会非常大,这些困难正像有些同志所说的,是由于我们的农业非常缺乏商品性。我们的发展,我们的建设的所有困难就是来自于这里的。农业商品化落后是困难的基本的基础,而第二点是,如果我们将贯彻十五大的决定,好像在坐的谁也没有声明不贯彻十五大的决定,如果我们将贯彻十五大关于进攻富农的决定,那么,这也将会为我们党在农村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难,因为如果我们进攻富农的话,那他们并不是用中国的长城和所有其他的人口分割开来的,他们和中农,和中农这个阶层有一定的联系,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到了军队里,甚至在工人阶级的个别阶层里,也将会有他们的情绪的反映,会有所表现。(主席的铃声)

**主席(李可夫):**还给时间吗?

**喊声:**给! 延长时间!

**安德烈耶夫:**所以我想,在我们这里,不会因为是这样,困难就消失了,我们对这一点应该有准备。特别是北高加索,如果我们要贯彻十五大的决定的话,这些困难将会很大。我要重复说的是,我们这里的富农是很有文化的,非常有影响,非常主动,如果我们要像十五大所说的那样对他们施加压力的话,那是会有困难的,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将会变得更尖锐。

现在我想对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什么地方说几句。我认为,至于我们的组织是不是注意了粮食收购,可能是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这种注意是足够的,可能甚至是过于足够了。主要的问题是要摆脱掉广泛供应粮食的职责。如果我们不摆脱掉由于取消和压缩市场而自己承担起来的这种职责,那我们也就不能从

应该有一项任务,那就是系统地和经常性地做贫农的工作。

主席:舍博尔达耶夫同志发言。

舍博尔达耶夫:先说说播种面积。奥新斯基同志现在给不了我材料说明,他所引用的材料是以哪些资料来源为基础的。但是现在我们在地方上正在补充调查伏尔加河下游边疆区的面积。这项工作的结果说明了,和奥新斯基同志所说的那些数字相比,有了一些扩大。拿去年的、包括了补充调查清楚的面积在内的播种面积数字和事先的统计材料作比较并从中得出结论来,是不行的。更何况这样的态度是不能允许的,改变播种面积的问题是在考虑粮食收购运动的结果时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之一。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分离危机”,就像奥新斯基所说的那样。问题在于,这样严肃的声明是需要证据的。奥新斯基同志对他是用什么来论证自己的断言的,除了令人怀疑地暗示了播种面积外,没有提上一句话。

关于对农村中的情绪的政治评价,可以同意安德烈耶夫同志所说的,因为他对和我们毗邻的北高加索所得出的结论,是和我们的积极分子得出的评价相符的。中农的确警觉起来了,特别是在采用了很大的行政压力的5月运动期间;照我的看法,我们没有能够做到在粮食收购期间加强贫农组织;富农是在公开地发泄怒气。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播种面积在扩大,对收割机器有很大的需求。在边疆区里举不出通常属于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恶化的最初迹象:流氓活动、强盗行为活跃,等等,——正相反,地方集训<sup>135</sup>的情况表明,如果接受奥新斯基同志的提法,就是绝对没有那些本来应该有的情绪。我们对这种情况能做出的解释是什么呢?我们计算了一下,农民在这一年里得到的商品比去年多了。可以给出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数字,说明对各个省提供的商品大大增加了,例如,就萨拉托夫省来说,就是这样的(比去年增加了25%—30%)。为什么在我们那里,和农民的关系状况并不像奥新斯基同志所感觉的那样,这就是基本的回答。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价格。我想,在价格问题上,我们犯了一系列错误。我想给你们描绘一下,从货币形式上看,由于在地方上,在边疆区发生的收成和价格的变化结果,农民今年得到了什么。1925—1926年度是所有作物的总和(包括粮食、豆类等等)为2700万卢布,1926—1927年度为3700万卢布,多出了1000万,而今年是2100万。这样,今年在我们边境区,由于收成减少了,由于最珍贵的作物小麦没有收上来,也由于价格还是在原来的水平上(关于价格我后面再说),得到的情况是,全边疆区的农民由于粮食少得了1500万卢布。

在我们继续把问题搞清楚的时候,原来是由于分配收成的缘故,由于价格是

想,我们是不得不在粮食收购这件事上靠采用非常措施的,这也部分地说明了我们没有能把农业纳入合作社的周转,没有能把个体农户纳入合作社的周转中来,我甚至感觉,我们在很小的程度上也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从对粮食收购状况总的评价上不能不得出的结论是,在粮食收购这件事上,我们的合作社的作用是非常小的。进行粮食收购的常常不是合作社,而是另外的机关:是党在收购,是司法机构在收购,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收购,而合作社是接受粮食的。农民经济和我们的合作社体系还没有结合起来,还没有从属关系。有的时候,贫农和中农对富农经济的依赖性要远远高于对我们合作社的依赖性,比如说,在争取贫农的问题上就是这样的。贫农有的时候不过是动摇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依赖富农的,认为富农在一定意义上是他的衣食父母。例如,如果是找富农要粮食,就会对他们说,我们在挨饿,你们不给我们粮食。对富农,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往往要高于对我们的社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的依赖。

我想,在决议里应该考虑到这种状况,应该更多地注意合作化问题,特别是生产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它们要弱得多,比消费合作社更落后得多,而且同时它们在农村也会是越来越比消费合作社更重要得多,因为我们向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从生产上影响农民经济。

我们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是提高农业的商品率,我们现在应该更加发展国营农场、集体农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通过国营农场、通过集体农庄,那是做不到提高这种商品率的。要解决农业经济更大的商品率问题,还是要靠个体的农民经济,而要提高农民经济的商品率,我们只能是通过生产的农业合作社,通过把分散的农民经济纳入合作社的周转。我想,根据粮食收购的经验和结果,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工作中更加注重这个问题,应该百折不挠地在这一点上使劲,在发展居民的合作化上,特别是在发展生产合作社上,把速度提高到发狂的程度,那么,我们就不用害怕农村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影响了。

我还想涉及最后一个问题,照我的看法,这也是应该写到决议里去的。这就是关于贫农的问题。为了在农村推行我们的任何措施,贫农作为支柱,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进行粮食收购的情况也表明,贫农的状况很不好,只是在一定的季节,只是联系到某种运动,才管贫农的事情。

有人喊:说得对。

安德烈耶夫:只是逼到了头上才做,而一旦运动过去了,季节过去了,就从村子里把人撤走了,把贫农撤下不管了,而富农就把他捡了起来,并且常常是用来对付我们。如果我们想要认为贫农是我们在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柱的话,决议里

人民委员部机构只有一个人。如果我们想要严肃地调节农村的商品周转,那我们就不能放弃更好地统计粮食的问题。

现在说说私人市场,对私人市场的损害。在我们推行那些措施的情况下,对它的一定损害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一点是应该正视的。在推行这些措施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国家收购单位和私人市场之间的价格差距,而这导致了我们要在一定范围内和哄抬价格的私人经营者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

联系到这一点,存在着一个在地方上节约粮食耗费的问题——这是涉及如何向居民供粮的问题。商业人民委员部和党的组织承受着要求得到“便宜的粮食”的小市民群众、担任公职的群众的巨大压力,而且并不是总能承受得了这样的压力的。最近的一个半月里,面包烘烤坊就像雨后春笋似地增加起来,甚至在村子里,在村中心都有(有残废人开的,也有其他人开的)。他们得到的都是付了磨坊收费的面粉,用它来烤面包,卖3戈比一俄磅,可是燕麦在市场上的售价要高得多,麸子的价格大体上也是这样。很清楚,这种经过磨坊收费的粮食在5月之前也是完全没有统计上来的,就这样被偷偷地用掉了。要知道,通过磨坊收费收集的粮食占粮食收购的10%—15%。这数百万普特的粮食分到了小市民的手里,分到了车夫等等人的手里,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珍惜粮食。

还有一个意见:我们应该在这次全会上说的是,需要合作社、收购单位更负起责任来。不能让这些机关成为只是接受现成粮食的机关。需要有心理上的转折,因为人民的情绪是这样的,他们将坐在那里,向党的机构提供信息,而苏维埃的和党的机关将进行粮食的收购。在这方面需要有一个很大的转折。

还有,我认为,需要更广泛地提出收割前收购和搞订购合同的做法,而且必须要把缴纳粮食的期限规定得更紧凑。现在给出的期限是庄稼收割后的两个月。我没有查看文件。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期限,但是这是应该改一改的。

合作社的补加费问题:如果正经地把这件事开展起来,是能够刺激粮食的缴纳的。第一,需要支付已经答应的补加费,而对于新的补加费来说,必须给合作社一些资金,扩大收购粮食的开支,为的是在一定的期限之前有对收受粮食的更多的激励。

我在结束的时候要说说我们进行的运动。我感觉,从奥新斯基同志身上可以看出对这场运动所持的否定态度。至少他在这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表明他对党所做的工作是否定的。我感觉还是应该直截了当地对党所推行的那些措施做出评价,说出它们是不是应该做的。

要知道,可能会有这样的议论,认为如果我们不施加这样的压力,如果我们

按各个省确定的结果,这1500万几乎完全落到了萨拉托夫省的头上,而且今年(1927—1928年度)规定的价格就把个别省的情况搞得更严重了:虽然收成坏得很,但是对于萨拉托夫省来说,一普特的粮食价格只涨了1—2戈比,斯大林格勒今年收购的比去年多,一普特增加了7戈比。我想,需要提出一个总的问题,那就是我们需要更坚决和灵活一些地把我们的价格和收成的结果衔接起来。要知道,收成的多少是一个变量,是要取决于雨水、阳光和其他条件的,是会有很大变化的,这和工业品的数量、经常的和每年总有些增长的数量是相对立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问题是靠提高粮食的价格解决的:粮食市场对收成的反应是非常迅速和敏感的。现在我们当然不能这样来解决问题。对农民的粮食确定价格应该从国家工业化的速度和农业提高的速度的对比关系出发,并且应该是从城乡之间对国家收入也就是对人民收入进行分配的对应关系出发。但是,在确定价格时,应该在更大程度上注意到收成的结果。不应当出现这样的结果:在斯大林格勒去年我们提高了价格,同时它收购的比去年多,而在萨拉托夫却相反。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和从刺激粮食的收入来说,这都是不正确的。当然,在收购的过程中不应该发生价格上的任何动摇。

我所说到的边疆区的粮食收入分配状况中,有一些部分会因为对价格问题的研究不够仔细而受到牵连,在我看来,这会严重地损害农民经济的发展,而且会使得我们更难以处理结合的问题。我想,同志们,对粮食的统计应该比我们现在所做的更严肃些。当然,在上述这些不衔接的地方,也有一部分是奥新斯基同志的过错,他的机构,统计机构,首要的工作是制定谷类饲料的平衡表,对于这些机构,米高扬同志在误算了2.8亿普特的情况下是不得不提到的。如果我们不能多少准确地知道我们有多少粮食,那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解决调整关系到农村的商品周转的问题了。我感觉,我们应该比以往更尖锐地提出统计粮食的问题。米高扬同志指出了美国的粮食平衡表(或者还可以按什么人的,我不知道),误差是10%。我们必须更准确才行,而且这是可以做到的。当我们在做粮食收购工作的时候,我们按照播种的清单做了这项工作,为的是以后可以来找老乡说:你有这么多的剩余,请你缴给国家的粮食基金吧。这项工作应该用另外的做法,但是应该知道我们有多少粮食。

粮食的分配也是同样情况。不能允许像我们这样来考虑粮食的消费。在斯大林格勒有15万居民。决定了减少粮食的消费,决定了要采用监督单据。结果发出去的监督单据是20多万份。这说明我们没有一个考虑这件事的机构,没有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在巴拉舍夫斯克县收购了800万普特的粮食,那里的商业



## 第七次会议

7月7日上午

主席(李可夫):戈洛谢金同志发言。

戈洛谢金:四月全会的决议提出了一个政治方向,它把粮食收购问题和我们所有的经济局势联系在一起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向我们提出的决议无疑是向实现四月全会的决议迈出了很重大的一步。当然,米高扬同志说到了,我国经济生活的所有指标都是积极的,我们只是在粮食收购中有些空白点;如果根据他的报告开始部分判断的话,那么决议的题目就应该改成:“联系到粮食收购论我国的经济形势”,而不是像这里指出的那样。但是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粮食危机问题,或者更正确地说是粮食经济的商品率问题,是粮食收购状况的发端。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这就要求我们能预见到以下的情况。

第一,粮食经济的危机问题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是一年的问题,这显然是一个四五年的问题,而可能由于这一点而出现的粮食收购的困难将要存在相当长的时间。由此而来的是,我们应该在我们的计划工作中和我们的措施中预见到这一点。

第二,决议所说的今年的困难是应该能预见到的。

第三,我认为,在这些年里,联系到粮食收购,由于危机不可能在一两年内解决,所以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那就是我们这里会出现所谓季节性的困难,就像今年1月时那样。

谁能保证我们就能这样预见到一切,我们能把一切都计划得如此之好,把一切都配备得如此之好,以至在这些年里的一个月里或者一个季度里不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呢?如果不能保证,那就很清楚了,也不能排除在这种情况下采取非常措施、推行非常措施的可能的可能。我不是建议把这一点写到决议里去,因为需要的是坚持一个不变的方针,要从非常措施中走出来,这一年自始至终都要通过正常的办法进行收购。所以不需要把这一点写到决议里去,但是需要说到这一

再能容忍一点,粮食就会自己淌下来。我们相信的是相反的情况。当你一个月一个月地,每隔十天都看看粮食收购的进程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在1月接近了零点,在5月初的时候也是一样的。5月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新的经济措施,而只是展开了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于是就多收购了300万普特。如果没有第107条,如果没有压力,我们就不会有这些粮食。边疆区收购到的是3200万普特,如果没有及时地和坚决地展开运动,我们就会少收1200—1500万普特。

除此之外,广大的党员和非党的群众是清楚的,为什么正是现在问题提得如此尖锐,为什么进行了这样的运动:工人没有粮食,应该给粮食,需要进行这项工作。如果严肃地说到和富农斗争,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关于为城市争取到粮食,那这项工作做起来就容易得多了,因为大家都理解,应该和在这个时刻破坏粮食收购的富农作斗争。这个运动是完全必要的,而且这是唯一正确的措施。

**主席:**现在闭会。明天第一个发言的是戈洛谢金同志,第二个发言的是斯捷茨基同志。

前提出粮食问题的时候,就像1月时的那种情况,这个问题不应该是用绝密的密码电报来解决<sup>137</sup>,而应该公开解决,用群众行动的口号来解决。

这是保不了密的,这么大的问题,我们应该是把广大的群众都吸收进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是不可能保密的。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无产阶级面前,摆到农村中的贫农面前,由党和苏维埃政权把它摆出来。

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时刻,在有了问题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的党、苏维埃政权就来到群众面前,说:我们现在面临这样的任务,无产阶级、农村里的中贫农应该解决它。我认为,我们可以更轻松和更好得多地把它解决了,我们也可以保障不出一系列的过火行为。为什么不可以想象这样的情况,加里宁同志和李可夫同志来到地方上,召开一个农民广泛参加的会议,给他们讲话和做出解释,什么是可以做的,需要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这会在农民中间传播得很广。我们的状况就会好得多,我们就可以避免来自我们的党的和苏维埃机关的一系列不正确的做法。

第二个错误源于我们指示的性质。需要明白我们指示的总方向。我们的任务往往是这样的,要求农村中的支部和农村中的共产党员几乎是不完成就不行。中央给边疆区委或者州委发电报,对一定的条款做一番论证:必须给你们这个边疆区或者州下达一定的任务,你们就要在这个月里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所需要的。边疆区委、州委便按照省或者大区来分摊这个总量,在理由上进一步地加码,给出了这样的指示:“你们省”和“你们大区”的任务是这样的。大区委员会或者省委又按县分摊总的任务,而且还要更强调一些理由。当这个指令到了村里的时候,就成了这样了:你们要做到,如果你在一个月里不能完成这样数量的粮食,这样数量的捐献,这样数量的公债的话,你就是反革命。常常得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这就不是中央的错误了,而是我们的错误了,因为我们没有随着这个精神对方法,对他们应该怎样解决问题给出准确的指示。我们是在他们已经犯了这些过火行为之后才说这些话的。这样一来,同志们……

**波斯特舍夫:**并不总是这样的,戈洛谢金同志。

**戈洛谢金:**如果乌克兰的情况好些,那为什么你们那里有过这样的过火行为呢?如果你们给出了这样好的指示,人家为什么不听你们的呢?

**波斯特舍夫:**我们相反的是把四月的指示变得比中央的指示更温和些了。大家都知道那里播种已经开始了。

**戈洛谢金:**我不知道,可能在乌克兰的情况是很好的。

**莫洛托夫:**比哈萨克斯坦要好。

点。正是因为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所以需要更准确地、更好地和更深入地分析过去的运动的正反两个方面。有些同志现在因为我们在农村中的关系紧张,就以此为依据,否定整个过去的运动,我是不同意这些同志的看法的。昨天在奥新斯基同志的发言里就有这样的调子。

**奥新斯基:**正是如此。

**戈洛谢金:**是的,奥新斯基同志。我感觉您的结论不符合您的前提。

**斯大林:**有一点。

**戈洛谢金:**根据您所说的前提,大家都在等着您会说些什么更深刻的东西:大体上“把新经济政策引向深入”。您没有说出您想说的,或者是您不过是首尾不能衔接。但是我认为,不仅是奥新斯基同志,而且许多同志现在由于已经犯过的某些错误或者大错误,情绪上惶恐不安,于是想要抹杀已经进行过的运动的积极方面。要知道这个运动解决了粮食问题,把党内的群众震撼起来了,让苏维埃活跃起来了。

当然,那些把生产力的发展归功于这场运动,就像今天克里茨曼同志在《真理报》上所做的那样<sup>136</sup>,也是不正确的。发展和扩大不是在粮食收购运动的基础上,而是在我们的春播运动的基础上取得的,这一点是不应该忘记的。不看到反面的情况是不正确的,不看到所进行的运动的不可避免性、必要性和积极的方面,也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我认为,现在普遍地把我们在农村里的局势看成一无是处是不对的。

首先,需要区分开的是那些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前进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出现的和将要出现的农村上层的不满。这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这是一种积极的现象。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诉苦,那他就是的确不想和不能理解,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将是怎样前进的。

另一件事情是,农村中越来越广泛的阶层本应该是对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前进持友好态度的,却感到了不满。这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错误了,而且我就是想说说这些错误,因为正像我已经说过的,不能排除在这些年里我们将不得不采用非常措施的可能。

在上一次全会上,我已经说过了昨天米高扬同志说的话:不能把一切都推到基层去。恰巧要说的是,在我国农村的基层,什么因素使得过火行动对我们最为有害呢?我要肯定地说,是富农化了的共产党员。

**米高扬:**说得对。

**戈洛谢金:**但是如果领导上有错误的话,我认为第一个错误就是:在我们面

这类困难中爬出来了。市场是必须要恢复的。要恢复私人商品流通和市场,困难将在于,存在着力图继续执行现在的粮食收购时期的路线的那些个人和组织的惯性。另一方面,农民有些害怕把粮食运到市场上去,害怕成为投机分子,等等,等等。这种旧病复发的现象是存在的。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丘巴尔同志说的那种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市场的影响可能会破坏我们的价格。尽管有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让商业人民委员部能够在自己的工作中,在地方的工作中,有这样一种灵活的路线,保障恢复正常的商品流通和市场,从而能够让我们摆脱掉喂养所有人的义务。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可能会因为对粮食的要求而窒息。

我要指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出口的问题。虽然决议里说到了,出口的粮食将是我国出口的基本部分之一,但是我想,有些同志是对的,他们说,我们在制订明年计划的时候,需要得出更慎重行事的教训:可能甚至不得不把粮食产品勾掉。

有人喊:现在是勾掉了。

安德烈耶夫:很好,因为虽然有些同志说,战前我们的粮食产品出口有7亿普特,但是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说和战前的粮食产品出口有怎样的比较。第一,这些出口是在农民经济有更多的商品性的情况下,是以老百姓吃不饱为代价的,而现在我们有的是已经扩大了的需求,不管怎么说,我们是进行了一场革命,吃的好一些了,而且农民和工人消费更多了,而同时我们又还没有达到战前的收成水平;只要我们的收成还没有足够充分地提高,商品率还有待提上来,照我的看法,在这之前,就应该更慎重地看待粮食产品的出口。如果我们能收购到更多的粮食,那就更好了,这将是我们的储备。

米高扬:对。

安德烈耶夫:还有外汇的储备,还有任何其他储备,而如果要是我们的出口计划成为问题,有被破坏的危险,这是不需要做的,应该集中注意的是另外的事:要更好地在木材的出口上,在其他产品的出口上,争取取得大的成就,在我国国内是有这方面的很多条件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改变我们出口计划的具体项目。

我想引起注意的第三个问题是决议的不足,这里提出的这个决议只是捎带地说到了合作社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缺点,是决议的一个缺陷。关于合作社,决议说了两行字,而我想,从这次的粮食收购运动中得出的基本结论和教训之一,是合作化的程度不够,太弱了,是我们的合作社太弱了。我

戈洛谢金:是这样吗?

斯大林:怎么会是这样呢,你们在克兹尔奥尔达不是有两年的粮食储备吗?

戈洛谢金:是呀,难道在地方上考虑不周的地方还少吗?该说的不是这个。我现在讲的是从逻辑上说来自我们的领导的那些错误,这是我们应该避免的。

最后,我认为,就是现在,我们的错误也还在于我们没有把我们在农村的政策充分地给农民解释清楚,在群众面前讲话还不够,没有把他们区分出来,表明他们和反对派的政策是没有任何共同点的。我敢肯定地说,广大的群众,包括我们的党员群众,在这个问题上 is 糊涂的,他们想的是,这和反对派所讲的一样,可是在所有决定性的问题上——在共产国际领域里,在工人政策方面,在自我批评方面,其中也包括在我们的农民政策上——我们的政策和反对派的观点和政策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证明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轻松和容易的事。而这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不然的话,许多人会在这一点上栽跟头。因为我们在这个决议里谴责这些过火行为,这甚至基本上也是在谴责反对派的政策。它所辩解的,它认为属于它自己的那些东西,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反对派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完全是我们对富农的政策不对头,反对派认为粮食基本上是把持在富农手里的,而我们认为,持有粮食的基本上是中农,粮食收购危机的基本原因是农民经济的商品率低。它认为我们的革命政策没有让富农经济、大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来,这样的政策也是这场危机的基础。这就是我们的观点和反对派的观点之间的区别。

主席:时间已经到了。还有40个人登记了要发言。我们每个人给10分钟。

有人喊:关于粮食问题给15分钟。

主席:对,是这样。您还有5分钟。

戈洛谢金:反对派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要打击的不仅是富农,要打击整个农民(他们的工业品价格政策如果不是打击整个农民,那又能是什么呢),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要打击富农,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触犯到中农。最后,在他们的提法里,没有把打击富农和发展国营农场以及集体农庄结合起来。而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认为,或者是在决议里,或者是在我们的领袖们的讲话里,这个问题应该完全清楚地,在国家面前和群众面前提出来。此外,谁将进行收购这个问题,在决议里应该更清晰地突出出来,如果不是在决议里,那就是在我们的实践中突出出来。这是关系到粮食收购如何才能正常进行的问题。需要明确和清楚地说出,是我们的粮食收购机构在收购。我们面临的威胁是,我们的基层组织对我们向他们施加的压力已经充分领教了,从第一天起就会受惯性的驱使继续

照样做下去,唯恐把事情耽搁了,招来对他们施加强大的压力。所以应该从年初就说到党支部在这件事上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需要说的第二点是我们打算供应的限额,因为地方上怎样编制谷类饲料平衡表将取决于这一点。要知道我们在地方上有可能增加一系列并不是那么需要的限额,而正确地编制谷类饲料平衡表是要取决于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的,而且解决集市问题也要间接地取决于这一点。有这样的一部分居民,他们可以自己储备粮食,国家就不打算承担对他们的供应了,他们自己是不是已经清楚这一点了呢?——粮食集市的正确组织就将取决于这一点。在这两件事上,我认为需要更详细地谈谈。

主席:斯捷茨基发言,下一个是哈塔耶维奇。

斯捷茨基:在米高扬同志提出的对局势的评价中,我们看到了,和四月全会的决议以及现在政治局提出的那个决议提到的所有情况相比,重心发生了某些转移。四月全会的决议里和政治局的决议里说的是,我们现在的困难来源于工业和农业经济之间的市场平衡遭到了破坏,有些属于计划上的错误被富农利用了。米高扬同志把重点放在了另外的方面:重点放在了所谓的客观原因上。而且米高扬同志在这里列举了相当数量的这种客观原因:我们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的落后,粮食作物的危机,农民经济的分散,农业商品率的不足,等等,等等。当米高扬同志列举所有这些客观原因的时候,许多人出现了一个问题,米高扬同志要用这些客观的原因解释的东西是不是太多了,最终把一切都推到了客观原因上。可是,最终还是不能把一切都算在上帝的账上呀。我想,有些东西还是应该留在我们自己的账上的。对于我们来说,看看取决于我们的东西,看看我们犯下的错误,为未来找到相应的路线,才更有益得多。我感觉,米高扬同志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够,而且对这一点我们应该给予最严肃的关注。甚至就拿米高扬同志提到的那些客观原因来说吧,完全不用怀疑的是,在这些客观原因里,有许多是直接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政策的。我们就拿这样一个问题来说吧,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的拓展是怎样被拖延下来的,这个事实恰恰是取决于我们的政策的。就在不久以前,我们有的是另外一种粮食作物和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增长的对应关系。如果我们看看1926年,那么粮食作物和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增长的对应关系和1925年相比是这样的:1926年我们有的是107%的粮食作物和92.9%的技术作物(中央统计局的材料)。这恰恰是在我们给技术作物定了低价的时候。1927年重新审议了技术作物的价格,对应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1927年和1926年相比,我们的粮食作物面积的增长是102%,技术作物是109%。这样我

们就看到了,关于粮食作物的这个问题是最直接地和我们的政策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你们现在来看看农业的商品率这样一个客观原因的话,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同样和我们的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它取决于我们的价格政策,取决于工业品的提供,因为它是商品市场的一个职能。而且我们知道,今年,当我们的粮食作物的价格和其他产品的价格的对应关系不好的时候,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那就是粮食作物不是走上了市场,而是在农民经济中被吃掉了。完全清楚的是,农业的商品率也同样完全是在一定程度上要由我们的政策来决定的。所以我认为,联系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严肃地注意到我们的价格政策。完全自然的是,对于农民经济来说,在我们的市场关系条件下,价格是主要的东西,因为价格决定着农民能够用自己的产品得到多少。而且联系到这一点,当然决议中说到的一点,即商业人民委员部有一定的可能运作粮食价格,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它应该利用这种运作来最仔细地考虑农业的个别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对应关系,用这样的办法调节和指导农业的发展。

我想,在这方面,奥新斯基同志在这里是企图对我们的工业化政策领域里的各种价值进行重新评价,要靠轻工业来支撑,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他提出的总的路线,但是当他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关注到了价格问题的时候,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

**奥新斯基:**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意识到。

**斯捷茨基:**您应该让我有权从您的讲话里选择我认为正确的东西。我认为,您在关注到价格政策的时候是正确的。但是当然,在我们的条件下,光是一个价格政策是决定不了事情的。关于这一点奥新斯基同志没有说;我们能够有很好的指数,提高农业生产的各种指数,而农民又可能是什么也得不到,因为我们在国内面临的是商品匮乏,所以光是有粮食产品的价格本身,远远不能决定农民得到多少工业品。所以我感觉,今后我们不得不在一定的时刻,特别是在进行粮食收购运动的紧张时期,靠压缩城市市场来把工业品派送到农村去。

我想,同志们,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全会上无论怎样也不能把收购问题作为一个狭隘的经济问题、经营技术问题提出来。它总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现在,在这个时期,它纯粹就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也应该是这样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无论怎样也不能绕过那些现在农村存在的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最近采取的那些措施引起的情绪。现在我们的各个报纸的编辑部每天都收到几百封农民的信件,现在有从农村休假回来的工人到这里来,给我们带来农民的情绪。这些信和休假回来的工人说到的农民的情绪是非常令人不安的。弗拉基米尔·伊里



奇教导我们说,我们应该最关切地注视着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的所有情况,以便考虑农民基本群众的情绪和在这个基础上检查我们的政策。我们现在就是应该这样做。休假的工人说了什么呢?农民的信说了什么呢?地方上的工人们又说了什么呢?他们说,如果我们在四月全会上指出了在中农的上层部分有对我们措施不满的话,那么现在要说的就更多了:这种不满的情绪已经传播得更广了;它们不仅感染了中农,而且也感染到了一部分贫农,他们对要把粮食按照收购价格缴给国家感到不满,而现在这些粮食是既不可能从合作社机关的手里,也不可能从富农手里得到的。农村里在议论,说是1919—1920年回来了,粮食征集制回来了,我们的苏维埃政权采取的是反对农民的方针,等等,等等。

有人喊:谁这样说?

斯捷茨基:农民这样说。(大厅里有喧哗声,议论声和鼓噪声)

我这里有一叠子信(如果你们想要的话,我可以把这叠信给你们看),还有休假工人人们的声明。安德烈耶夫同志说得对,他说农村里没有处处存在的反苏维埃的阵线,中农没有扭头离开我们。但是他们对苏维埃和党有一定的冷漠,这是肯定的。如果我说得不正确,如果在农村里一切都很好,那应该来纠正我。但是我的感觉是,我们应该非常清醒地评价局势和避免过分地粉饰局势,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我们得到最坏的结果。还在上一次的全会上,我们就听到了来自北高加索的伊万诺夫同志的讲话,他讲述了在北高加索的农村情况如何好,农民怎样几乎是用鼓掌欢迎我们的粮食收购政策的。可是伊万诺夫同志,后来怎么样了呢?原来是在这些掌声……

伊万诺夫:当时并没有这一切,而且事情是不坏的,您忘记了,从那个时候起,有3个月是在继续施加压力。(喧哗声,喊声,议论声)

斯捷茨基:原来您是把卡尔巴德的枪声当成了鼓掌了。

伊万诺夫:什么?(喧哗声,议论声)

斯捷茨基:我想,我们应该是最注意地盯着现在农村发生的是什么情况 and 农民基本群众的情绪是怎样的。

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到我们对农民的政策的时候,他说了以下的话:

“再愚蠢不过的是在处理中农的经济关系方面采用暴力。

这里的任务不是剥夺中农,而是照顾到农民生活的特殊条件,向农民学习向更好的制度过渡的方法,决不可发号施令!这就是我们给自己定下的规则。”(列宁文选,第16卷第151页)<sup>138</sup>

在最近的一次粮食收购运动中,我们触犯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来的

这个规矩。我认为,我们不仅是在我们的实践方面触犯了——我们对这一点是应该负责的——而且在一些地方还联系着粮食收购运动,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理,说是我们可以吓一吓中农,这样来进行我们的粮食收购运动,我们可以通过采用第107条,通过采用反对富农的坚决措施来进行粮食收购。我感觉,这种心理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应该和它斗争,用这些办法,用强迫的办法,我们是不可能建立起和中农的结合的。我感觉还有一个特别令人不安的情况,那就是我们在七月全会的决议里又不得不重新说到,我们是有过过火行为的,在我们对待中农的政策中有过歪曲的情况,虽然说四月中央全会坚决地指出了这些歪曲和过火行为,说过这些过火行为和歪曲是应该改正的。

这说明了我们的组织还没有足够地准备好反对这些过火行为和歪曲,我们需要进一步做出很多努力,相应地让他们具备这样的心态。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特别是联系到我们现在是在推行向富农进攻的政策。当我们和反对派斗争的时候,其中包括在关于富农的问题上,我们经常说,富农对我们的危险不仅是在于他们本身,而且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在一一定的时刻可以依靠中农,这一点才危险。

**斯大林:**我们没有说过这个。要么是危险,要么就是不危险。

**斯捷茨基:**我们说过,富农本身是危险的,但是正是因为他们可能带动中农才更加危险。我想,这是完全清楚的,富农主要的危险就在于此。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当我们向富农进攻的时候,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避免任何类型的、可能触犯到中农的措施。正是为了在十五大规定的那些方面,实现我们对富农的进攻。

联系到这一点,需要在我们的决议里全力强调的是,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组织有这样的心态,那就是要不仅避免各种歪曲、过火行为等等,而且要花费所有的力气来平息那些已经犯下的错误,并且要改变中农的情绪,让他们能够好好对待我们。

联系到这一点,安德烈耶夫同志所做的声明值得非常严肃地关注。安德烈耶夫同志说,如果再采用非常措施,我们就会失去中农。我想,这个声明不应该被当成耳旁风,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决议里和在我们的实践中都最仔细地考虑这个声明。

**主席:**哈塔耶维奇同志发言,下一个是乌格拉诺夫同志。

**哈塔耶维奇:**斯捷茨基同志的讲话给我个人造成的印象是,他自己对我们党最近时期的农村政策好像是持一种纯粹客观批判的立场,想要以此捞取某种政

治资本。他把报告人米高扬同志和政治局的提纲分开,故意迷惑人,企图形成一个看法,好像在党内,甚至在它的领导人中间,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想要继续在对中农的态度上推行过火和歪曲的政策,想要把非常性的临时措施变成经常性的,等等。

我不知道,但是我至今都在想,我们的党里好像并没有这样的人。他向我宣传说,不需要对中农采用那些曾经对富农采用过的施压方法。但是要知道,这是起码的知识,谁也没有对这一点提出争论。他这是在故意迷惑人,这也就让人有权得出结论,认为斯捷茨基好像是在代表这里缺席的弗鲁姆金同志,我们读过他写的信;那个人把问题提得更清楚了:回到十四大去<sup>139</sup>,或者回到富农那里去……(喧哗声,笑声)请允许我现在就作些解释……弗鲁姆金要求放弃党的十四大对富农展开坚决进攻的路线……(喧哗声)弗鲁姆金同志是这样想的。(笑声)同志们,没有什么可笑的,我不是这样说话流畅、八面玲珑的演说家,所以请你们不要对我说走嘴的话挑刺。我要说的是,弗鲁姆金同志和那些同意他的观点的人是这么想的。他们认为我们以前推行的政策更能让富农接受,于是建议回到这个政策上来。

你们是在和谁辩论,你们是想说服谁不需要对中农施加压力,你们是要说服谁对中农不需要采用和允许采用党并没有建议要采用的行政上的过火行为,你们是在恐吓谁说可能会失去中农,你们是在说服谁不需要粉饰农村的局势呢?谁在粉饰呢?你们不是白白在这里说吗,是你们在从另外的方面进行粉饰,你们把农村的形式描画得太一团漆黑了。你们说整个农村都在议论着我们这里正在回到粮食征集制上去,它们从头到脚都是不满。在弗鲁姆金同志的信里也是写着这个,也是这样的方针。

你们是生活在列宁格勒的,和真正自然的老乡和中农距离很远,而我们是在区里工作的,那里距离更近,这样的距离是可以让我们了解农民情绪的。我们不久前在伏尔加河中游举行了地区性的集会。这是对农民情绪的一种非常好的检查,除了在伏尔加河附近地区以外,在任何其他的军区里,都没有举行过地区性的集会。请允许我报告,伏尔加河流域的地区集会吸引了好几万农民,比去年开得要好多。当然,在我们那里也有一系列的富农积极活动的表现,也有个别的发言表现出了在军队里有这样的、不应该待在军队里的社会成分。但是这些发言没有能抓住农民的心,和我们吸收来参加这样集会的整个农民是没有共同之处的。总的来说,和去年相比,集会进行得更有组织了,安排不妥的地方、不满和冲突要少得多了。

这总还是能够说明一些事实的,这表明我们在整个农村有着稳定的局势,虽然无疑在6月份农村的局势要比4月和3月差一些。3月由于1月和2月搞的加强粮食收购的措施,我们在农村里有了非常好的政治局势。我们有的是贫农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是在基本的中农群众之间总的方面有着良好的局势。现在局势恶化了,但是不该把这一切描写得过于一片漆黑了。我们苏联有1亿农民和2500万农户。如果在他们中间有50万是富裕户,现在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积极,写信的话,那就是一个车厢也装不下了,那就要有一整列火车才能把这些信都装上了,于是你拿了一叠子这样的信,就摇晃着喊起来,说是整个农村都在躁动,都被震撼了。我有所有的证据可以说,您陷入了这样的恐慌之中,就像并不在场的弗鲁姆金同志一样,您就像他一样,被富农已经发出来的恼火和不满吓坏了。我不是想要就一般性的政治题目进行辩论,我想利用自己的10分钟完全只是提出一些纯粹实实在在的意見,现在我就想来谈谈这些意見。

现在许多人提出的问题是,富农和殷实的中农会不会把粮食运出来,不采取非常措施他们是不是会把自己余粮交出来。我们伏尔加河中游州的实践中有一些数据,依据这些不多的数据,我想可以说,没有特别激烈的影响措施和压力,他们是会把自己余粮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交出来的。在我们那里的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sup>140</sup>,现在已经有了许多富裕农民提出来了,希望收购他们还没有割下的粮食,他们有着20—30俄亩的播种面积。到7月1日为止,我们还没有进行这样的收买,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搞粮食收购,而且我们认为把钱带到农村去不方便。

**伏罗希洛夫:**完全不应当不收买呀。

**哈塔耶维奇:**没有收买是因为直到最近这有可能会影响到现在正在进行的粮食收购。到6月15—20日的时候,这样的建议总共达到了40—50万普特。这些建议是来自有着20俄亩播种面积的那些农民,当然也就是那些富裕的农户了。我不知道到处都是这种情况,还是只是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是这种情况,那里的年景非常不错。但是对于我们区来说,我不怀疑,不仅是中农,就是农村里更富裕的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会把自己余粮的很大一部分交出来的,无须重新采取非常性的措施。在我们伏尔加河中游的收成是很好的,如果不会有尘雾、干风等等的话,担心尘雾、干风也就是5—6天的事。

奥新斯基同志昨天对播种面积提供了一个不对的资料。在我们州,播种面积增加了15.6%,而且是秋播和春播加在了一起的。

**柯秀尔:**是混合在一起的数据吗?

**哈塔耶维奇:**提高了15.6%,这是不完全的数据。实际上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是,播种面积的扩大还要多一些。我不久前到过奥伦堡省和我们的其他一些大区,并且相信了有很大一部分的播种面积并没有考虑进去。在奥伦堡省,他们认为自己的播种面积是80万俄亩,而适合播种的土地总面积是360万俄亩。

**有人喊:**这是指整个州吗?

**哈塔耶维奇:**只是奥伦堡省。我们整个州的播种面积是550万公顷。我个人坚信,实际上奥伦堡大区的播种面积不少于90万公顷。我们这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播种面积是被藏起来了,隐蔽起来了,应该把它们亮出来。所以实际的情况……

**李可夫:**那么,你提供的数字里播种面积的扩大是全省的吗?

**哈塔耶维奇:**是全省的。奥伦堡省播种面积的提高是30%,萨马拉省——20%,奔萨省和乌里扬诺夫斯克省是2.3%。平均是15.6%。这是正式数字上的增长,我认为这还是有些缩小了的。

**柯秀尔:**整个播种面积吗?

**哈塔耶维奇:**是秋播和春播加在一起的。应该做一些解释。问题在于,在1927年的时候,就在那个奥伦堡省,播种面积比1926年减少了大约10%。

**喊声:**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伏罗希洛夫:**是和1926年相比吗?

**哈塔耶维奇:**和1927年相比是16%,所以,正是由于这样,我们这里可能会有更好的粮食收购前景。我不知道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情况怎么样,但是至于我们这个地区,我认为农民毫无疑问是会把粮食运出来的。

**伏罗希洛夫:**收成的年景怎么样?

**哈塔耶维奇:**年景是很好的,但是有威胁,由于非常缺乏收割的机械,有一部分收成将会收不上来。弗鲁姆金同志在自己的那封惊慌失措的信里说,农民不要机器,没有需求,而在我们那里正相反,对收割机械有从未有过的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只是35%—40%。我们不断向莫斯科发电报,字面上有很好的回答,但是机器却没有运来和装卸,而在过了几天之后就会晚了。

丘巴尔同志说,他们那里有没有用上种子筛选机的,而在我们那里,日夜三班倒着工作的不仅是种子筛选机,而且甚至还有最不好的、很差劲的选种机。显然是给乌克兰运去了太多的种子筛选机。在我们这里遇到的是某些人对机器供应的调节和计划犯了错误。应该认为,商业人民委员部在收割机械上也调整得过了头,而且这中间不能说没有丘巴尔同志的一番苦心。机器在乌克兰是没什

么事干,而在我们那里有很大一部分种子没有经过筛选,并不是因为农民不愿意筛选,而是因为不仅没有筛选的机器,而且就是最原始的选种机也非常不够用。在鞑靼共和国,3月、4月,地方上的、县里的工作人员就在呼叫了:给我们选种机,给我们筛选机。

再对我们最近两个月里对农村施加的压力说两句。昨天安德烈耶夫同志在这里说了,在他们北高加索,5月和6月过火行为少了些;可是在我们这个区里,最近这几个月里的压力要更严厉得多,农民是不好受的。这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因为不能不被迫对农村中更广泛得多的各个阶层再加些压力,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各种不同的过火行为就不可避免地会更多了,因为能有几千普特粮食的农户已经没有了,于是不能不对那些有200—100普特的或者更少的农户施压了。但是不能因为这些过火行为去责怪基层工作人员。要知道是我们把他们折腾苦了;1月、2月,我们对他们说:加压,拼命地干——而后来在4月和以后的时间稍微喘了口气,可是不仅是谈不上休息了,而且还要更进一步地把所有力气都使出来加强收购。甚至在最后的几个星期里,当时我们是同时对他们说:要开放集市,还要加强收购,这样,我们把他们置于了严重矛盾的境地。现在要提高收购就只能是采用挨家挨户收购的办法了,而挨家挨户地收购就是要搜查了,就是要钻到粮仓里去,就是要压了:你有100普特——运去70普特。从米高扬的报告中得出的是,过火行为的过错在于地方上的工作人员。这是不对的。

有人喊:米高扬没有这样说,相反他是在维护。

哈塔耶维奇:在多数情况下,所有的事实和情况,甚至是最严重激烈的过火行为,都不可避免地来自于党所施加的那种总的压力。

在中央四月全会上,我们写上了不需要非常性措施,——在4月,就在30日,我们得到了来自中央的电报<sup>141</sup>,很长,有3页,它的实际意思就是:加大压力,因为没有粮食,而我们只能是用非常措施来加大压力。

在消费地区和生产地区都有一些类型的居民没有自己的粮食,特别是贫农,对它们的供应情况我说两点意见。舍博尔达耶夫同志在这里已经说到了,而我想强调一下,拨出来为供应贫农的谷物加工费的情况非常糟糕:第一,因为我们无论怎样也安排不好对这笔费用收入的监督。怎么能安排好对每一个出租人和风磨以及其他磨坊主人的监督呢?结果是,这些粮食的大部分还是通过投机的渠道漏掉了。而另一方面,我们得以获得的这些用谷物加工费加工的粮食的利用情况更糟。它都落到了公职人员的手里,随便什么样的公职人员都可以,可是贫农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很少。今后需要放弃靠谷物加工费来保障那些从新的收

成中得不到足够粮食的农民的做法。要让谷物加工费通过粮食收购的正常程序到合作社的手里,到粮食收购机关,到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手里,而在地方上需要把基金建立起来,进行地方上的收购,按照稳定的价格供应给贫农。

关于对消费地区的同样类型的农民的供应。决议草案里说,这种供应需要靠地方上的商品周转来进行。非常好,我支持这样做,因为如果是按照另外的说法,就可能被解释成是我们给私营者向这些地方运送粮食提供了广泛的可能,如果我们允许大的粮食批发商回到跨省的全苏粮食市场上来的话,那是非常不好的。联系到这一点,需要用个什么办法在决议里写上,保留在运输上对粮食货物的经济调节,因为交通人民委员部有一种意见,想要放弃这种做法。需要在运输上保留经济调节,因为不然的话,私人批发商就会钻到全苏的市场上去,就会在粮食市场上把我们的组织搞乱。而在地方上,需要的是在消费地区加强地方上的计划外的合作社收购。

直到最近我们几乎没有在消费地区进行过收购,而那里是有粮食的。今年在粮食收购地区施加了很大压力之后,在大田里一切都非常顺利——没有一垛谷物堆在那里,而在临近的任何一个消费的省份里——下诺夫哥罗德,楚瓦什,维亚特卡,可以看到许多没有磨过的粮食。应该把消费地区的计划外收购铺得更宽些,让合作社去收购,而如果自己的粮食不够内部消费,就到生产地区去从计划外的收购中购买。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明确和有组织的研究。

同志们,中央政治局决议草案里列出了一些建议,它们基本上是完全符合我们需要做的事情的,我看不需要再做任何原则性的和政治性的修正和补充了,不需要再重复中央四月全会的决议里已经说过的了,而我们总是不断要犯写出太铺开的决议的毛病,在决议里重复已经在3个月、半年、一年以前写过的东西。

主席:乌格拉诺夫同志,下一个是乌加洛夫。

乌格拉诺夫:虽然哈塔耶维奇同志建议不要搞政治,——他声明说,来参加党的中央全会不是要搞政治的……

哈塔耶维奇:我没有说过这话。

乌格拉诺夫:我想,这对于一个党的州委书记来说还是少了点。当然,他后来改正了,说到了政治。我认为,对哈塔耶维奇同志来说,关于中农的问题是起码的真理,可这个问题一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对于我们的党,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还是想,不能同意哈塔耶维奇同志推说的理由,说什么既然一切都清楚了,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个问题总是清楚的,理论上也是清楚

的,但同时也还有具体的,正在变化着的情况。米高扬同志的报告,然后是安德烈耶夫的讲话,都明确指出了,在这一年里,在这个具体的环境里,也就是说在工人阶级和农民、和中农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发生了某些变化;我们在这里无论如何不能像哈塔耶维奇同志建议的那样,回避讨论和弄清这个问题。就在米高扬同志说到中农和最贫困的农民有动摇的同时,党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鲍曼同志到巴什基尔和鞑靼走了一趟<sup>142</sup>之后,对农民为什么秋季将不会把粮食运出来以及不得不着手对农民征收实物税说了自己的考虑。这是一件严肃的事,而哈塔耶维奇同志建议说,这个问题是清楚的。是的,在理论上它是清楚的,但是在具体的环境下,关于中农的问题现在形成了怎样的情况,有不清楚的地方,需要在中央全会上充分地和平心静气地搞清楚,为的是通过这样一些详尽的措施和决定,能够把这个具体的环境完全搞清楚,把一部分农民的动摇在很短的期限里克服掉。从这个环境出发,就不能说“我来参加中央全会不是要搞政治的”。

**哈塔耶维奇:**我不是这样说的。

**乌格拉诺夫:**我不就这个问题和您辩论,哈塔耶维奇同志。我认为安德烈耶夫同志指出的是对的,他说,中农现在警觉了,不知道今后会怎么样;安德烈耶夫同志对北高加索的局势给出的第二个定义是:“我们明年不能再这样收购粮食了,否则我们就要失去中农了。”我想,虽然安德烈耶夫同志说,他是在阐述自己的看法,但是他的这个声明依据的是党的边疆区委员会同志们的意见,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如果我们说,对我们全国来说,安德烈耶夫对北高加索得出的这个定义不是典型的,那至少我们是知道北高加索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代表着什么。这个哥萨克的旺代<sup>143</sup>花费了苏维埃政权的多少力气才被平息,所以这个问题是不能不顾的。这不是恐慌,同志们,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评价,为的是从这个具体的评价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为的是克服那些存在的困难。我想,将需要一个党中央的决定,是按照苏维埃的程序通过的,要这样通过它,这样表述它,这样公布它,要让农民群众、基本的中农群众的确清楚地明白,完完全全明白,党的这个决定对他们说的是什么,苏维埃政府对他们说的是什么,要让这个决定不是一个普通的决定,而是政治上重大的决定,能够一下子就开始打破一部分农民存在的那种心理,好像我们正在走向战时共产主义。问题就是应该这样提出的。这些决定是政治局在中央全会上提出来的。我要强调说的是,米高扬同志引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说到了在中农中存在的那些动摇,这些“动摇的力量”是巨大的,而且在其他条件下它有可能给我们带来重大的损失,应该这样按照苏维埃的程序公布这些决定,需要把这种动摇的力量变



成稳定的力量,要在现在这个时期少一些动摇的成分。我们不能脱离工人阶级,孤立地提出农民问题。至少我在内心里是作为一个消费者说这些的,而我们在莫斯科市代表了无产阶级的百万大军的消费者的,我们知道,现在,在我们的多数城市里要么是票证,要么是票证的代用品,要么就是某些限制性的、调节性的消费措施。实质就在这里。让我们扪心自问一下,在我们的革命搞了11年之后,这种状况难道不会在工人阶级中间引起不安和怀疑吗?我要直截了当地对你们说,同志们,——而我们并没有脱离开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工人群众,我们知道有怎样的情绪,——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很使工人群众警觉的。他们在寻求我们遇到困难根源。这就是实质。现在我们在每一个工厂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自然很明白,如果在我们这里这件事被拖延下来了——任何类型的供应断档和食品不足,以及我们的各种代用的调节措施,等等,——它们都是工人阶级所不能赞同的,这是清楚的,而且我说这个是因为我们感觉到了这一点。我一点也不为说到这一点而感到害羞,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说这些,一点也不害怕不愿意搞政治的同志们中间有什么人想要给我挂上有恐慌倾向的标牌。我们不怕这个,我们是对中央委员会有什么就说什么的。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和农村有联系的工人们。要知道,俄国无产阶级的天性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它有很大一部分是和农村有联系的,于是在农村里,在中农中间发生的摇摆的力量或者摇摆的幅度、摇摆的程度,会转移到工人阶级的身上来。我要对你们说的是,特别是俄国中部的无产阶级,特别是莫斯科的无产阶级,它的百万大军的大多数是在俄国中部,从没有粮食等等的地方出生的。在这里,农村中的摇摆会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工人阶级身上来。劲头就是从这里来的。俄国中部的无产阶级天性不好是和农村有联系的,事情的实际状况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依然会是这样的,我们不能不考虑到这种情况。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当工人们从莫斯科向卡卢加、梁赞、斯摩棱斯克、图拉、雅罗斯拉夫尔、弗拉基米尔以及其他的北方省份给自己家里寄去粮食包裹(当然这是暂时的,我们将能克服掉)的时候,农村中的这种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重了。这无疑会给工人的情绪带来变化,而且应该在中央委员会的全会上清楚地说到这一点,而且应该说,这样的现象应该在最短的时期里加以克服。怎样克服这些困难呢?

**伏罗希洛夫:**这是最主要的!

**乌格拉诺夫:**我认为,最近报刊上对我们提高农民经济的措施说得是多了一些。还应该更明确地说到中央政治局的决议里所说的,说说提高农民经济的这

些措施,在决议通过之后,应该在苏维埃政府的决定中说到它们,在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里强调这一点,为的是不出现混乱。而混乱的情况在工人的会议上和在党的会议上都是有的。我自己就碰到过这样的混乱。当我说到我们并没有取消提高个体的农民经济的任务时,有人对我说:您为什么反对十五大的决定呢,十五大确定的是应该指望集体农庄。有这样的混乱。

**斯大林:**有,有。

**乌格拉诺夫:**这一点应该明确地说到。如果这一点我们自己是明白的,那就应该这样说,让大家都明白,清楚地说出来。就拿党的十五大决定来说吧。我想,我们随时都需要记住一个规矩:如果我们,党内具有专业知识的这部分人,党的领导人,党的中央委员会,都懂得这个问题,都对它很清楚的话,那么远不是数百万人的整个党和数百万人的无产阶级都对它也很清楚。在这方面应该更经常地对党和无产阶级进行教育、普及和解释十五大的决定,否则混乱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特别是在像农民问题这样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上。

现在来谈谈克服调节方面的困难的问题。斯大林同志在不久前讲话<sup>144</sup>中(这个讲话已经发表了)承认,国家自己承担的太多了,需要把一些东西从它的肩膀上卸下来。决议承认了,而且在我之前发言的同志们也承认了,我们自己的肩膀上承担的太多了。这是正确的。显然我们做得过头了。显然我们给无产阶级国家的肩膀上堆了一系列的职能,而在我国国家发展的这个阶段上,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没有能对付得了这些职能。拿了许多,可是没有能完成。从这一点出发,越来越严厉的集中化趋势愈演愈烈,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它正在变成官僚主义的东西。

既然我们承认需要放弃一些任务,我认为,在商业人民委员部提交中央委员会和政府批准的那些准备新的粮食收购年份的措施中,应该包括指出要对削减收购计划这件事做出许多重要的改变,安德烈耶夫同志和戈洛谢金同志也说了这一点。

我想我们应该迈出这一步,而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需要从这中间得出相应的结论。削减中央集中的计划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很显然,需要在一定的幅度内让地方机关有权进行收购,还应该让私营者也有这种权利。怎样给和给多大的幅度——这是一个业务上的实际问题,可以把它计算一下,而原则上是需要把这个问题完全搞清楚,需要迈出这一步的。

现在转过来谈谈我们调节的另外一些指标。在最近的一年里,就拿葵花子油来说吧,对城市的供应,就说对莫斯科的供应吧(当然对莫斯科是最关心的

了!),整整一年时间葵花子油的供应达到的水平是居民消费的30%—40%。这是说明了高度集中的供应计划完成状况的许多指标中的一个,这是我们写在了字面上、说明现在我们实际完成的情况的。至于牛油,在一年时间里发生了一系列的断档情况,而现在,在6月1日时,我们莫斯科的收购机关就已经应该为冬季的储备收购大约10万普特的牛油了,可是什么也还没有收购到,可是要知道,现在正是进行油料收购最好的和最富有战斗性的季节了。在这里,没有搞成功是由于我们总的经济方面的原因,是由于总的困难,是由于我们在总的方面犯下的错误和在调节方面犯下的错误。但是我们总还是需要具体地想一想怎样克服它们吧。这就是实质所在。

肉的收购在过去的一年里也是忽高忽低的。米高扬同志说,我们这里的事情是这样进行的:地方上的机关总是要把尽量多的东西抓在自己的手里。这种趋势是有的,但是你们的那种中央集权、限制地方机关的倾向是明摆着的。你米高扬同志要知道,我们和加里宁是怎样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里推翻了你的组织禽蛋辛迪加的想法的。他又拿到了政治局去。开始通过了,可是后来,当大家搞清楚了的时候,大家一个个地,包括斯大林同志,也包括伏罗希洛夫同志,都承认:是的,这是一个错误。

**李可夫:**还有“全苏饲料联合公司”。

**乌格拉诺夫:**这里不能推说是地方机关有一种进攻的倾向,要把私营者都打掉,等等。我们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集权者,但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明白,如果你搞集中和收网不及时,那得到的就会是一锅粥。

**柯秀尔:**你也来不及把网撒开。

**乌格拉诺夫:**在7年时间里,我们积累了许多新经济政策的、正确对待农民的政策的力量,即便是最近半年里出现的困难,如果我们真正地、坚定地、现实地去抓的话,我们是能够克服的。

但是我认为,我们在我们的调节领域里需要做些认真的改变。如果你不是在经济发展的相应阶段上搞集中,那这个集中就可能变成官僚主义的集中,它就会是阻碍经济的发展了。我们这里肯定是有这种缺点的,它是需要克服、改正的。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关于鱼的例子。遗憾的是,我没有拿来关于渔业辛迪加的官方材料。应该说,今天我们捕捞的鱼是很不够的。我和这件事有某些关系,所以对它感兴趣。春天,阿斯特拉罕省执行委员会主席阿莫索夫同志来找我,他原来是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位工人,是一个很好的、非常明事理的同志。他来干什么呢?是为了商量怎样对待渔业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分子。他对我说:我

们的捕鱼计划是1500万普特。我们的物资手段和组织力量可以得到1300万普特。我们想给私营者200万普特,而他请求捕捞500万普特的鱼。我对他说:你就捕吧,反正我们的鱼是不够的,我们能满足的是对鱼的需求的1/3,就让他捕捞吧。他说:我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得到清楚的、泾渭分明的回答。党的决定说:要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要提高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要减少私营者的比重,等等。我们想要降低。针对他的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我们首先需要的是鱼。你要是能捕到1500万普特的鱼,那你就捕吧。私营者能捕500万普特——就让他捕捞好了,因为鱼我们是不够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但是在我们的阿斯特拉罕的渔业战线上,捕鱼是有很大缺口的,我们将会是有里海拟鲤,可是没有鲱鱼。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在我们的负责工作人员的头脑里,存在着怎样混乱的情况。在和私营者作斗争、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问题上,出发点应该是党已经通过的决定,但是需要考虑到怎样推行这些决定。不能放弃这样做,我们应该做到这一点。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些在座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是清楚的话,那么通过一个甚至是非常专业的政治工作人员、很好的工人、省的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例子,我们看到的是,甚至在我们的领导工作人员的头脑中是怎样糊涂的了。

现在我来谈谈米高扬同志在这里谈到的和中央决议中也说到的计划问题。我认为,我们所犯的那些错误就应该称之为是错误,应该就是这样直截了当地说,说是我们堆砌起来的、搞乱了的,都是我们的错误。在这个方面的例子我们是不用到很远的地方去找的。我和古比雪夫同志谈到过关于亚麻的问题。他说他也要说到这个问题。但是我赶在了他的前面,因为这个问题把我们搞得十分恼火。我想要提醒一下,在四月中央全会上我发了言,说到了,不会组织获得原料属于经济计划工作的困难和错误。我们通过亚麻问题就可以看到这方面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莫斯科委员会全会上提出来过。我在自己的讲话里相当详细地阐述了这个问题<sup>145</sup>。纺织辛迪加<sup>146</sup>主席基列维茨同志曾正式声明说,纺织工业的亚麻工厂有10万工人,由于原料不足将停产72天。应该看到这样的事情。这需要算做什么呢:这里有重大的社会经济原因,这里有城乡的对应关系问题,但是同志们,不能都推到这上面去。这样的断档已经持续有3年了。我们的亚麻播种面积下降持续了3年了。在1927—1928年度的时候,我们的亚麻播种面积没有达到1925年的水平。这样的事情难道能绕过去吗?不能绕过去。

我不记得米高扬同志是在自己的讲话里还是在结束语里,曾在四月全会

上回答了我们的讲话,而且在个别谈话中他也说过,事情是有保障的,亚麻将会有的。

**柯秀尔:**是在政治局里说的。

**乌格拉诺夫:**结果是失算了。我们要求组成一个委员会。政治局委托劳动国防委员会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审议这个问题。开始时确定了工厂将停产29天,后来是42天,而现在是72天,而了解情况的实际工作人员坚持说,这样将会超过3个月。这样的问题能绕过去不管吗?

皮革方面的情况也不妙。皮革辛迪加和莫洛托夫同志展开了辩论并且夸口对莫洛托夫的批评说到,它的情况一切都很好。他们关闭了7000个各种小型企业,有手工的也有私营的,通过这种办法收集了原料并且认为自己可以庆贺了,便说将这样继续干下去。我想,如果皮革辛迪加将是把这样的政策继续推行下去的话,那么国家的皮革工业将会是只能让40%的人口穿上皮靴,而60%的人口将是穿草鞋的了。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们将会遇到和中农关系的尖锐化,而且他们未必就会为这个而感谢我们的。

我在路上曾和奥新斯基同志说过,他不该那样把纺织工业的情况搞混了。我们和所有农民群众的相互关系不仅表现在消费这一个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也还在于要不断地和系统地帮助提高农民经济,农业的文明和技术。

**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不仅是消费的需要。

**乌格拉诺夫:**既然任务是提高农业的文明和技术,那么帮助农业和为它服务这件事就应该靠重工业了。在我们的概念里,“重工业”最多的指的就是冶金工业。鲍曼同志在最近的几个月里说,我们显然需要把化学工业也算到重工业里去,我同意他的看法。

**斯大林:**它早就算进去了。

**乌格拉诺夫:**我们是算进去了,但是广大的群众还没有这个概念。

**李可夫:**你也搞混了,在自己的速记记录里把它算到了轻工业里。

**乌格拉诺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会上说到从化学工业中吸取利润的时候,也把它叫做轻工业,我对这个的理解是,它是做梳洗肥皂的,化妆品的,它也需要拨款。这是油脂工业,我说的是各个工业,是应该从它那里为重工业拨钱的。

这样,我们在完成有计划地向农民经济供应设备来提高农民的生产的同时,也应该也关心满足他们的消费需要,这也具有非常迫切的意义。这就是应该坚持

的路线。当你看着这些东西的时候,就需要承认,在调节和计划领域里,我们的情况还并不是很妙的;我们所有的错误不是用蓬勃增长就能掩盖住的。蓬勃增长我们是有的,但是昨天米高扬同志以及一系列发言的人都说到,在我们这里是危机正在发展扩大。在我们的经济有着蓬勃发展速度的情况下,危机正在发展扩大。这就是说,我们有些东西是不正常的。在国内存在的阶级矛盾在发展的情况下,总不能拿这个来掩盖在经济组织领域里明摆着的那些重大的错误吧,应该是想想和找到这些错误的根源。这是问题的实质。

我想,在中央全会上应该说这些,我在政治局里说了这些,在这里也要说。我们需要非常注意地盯住城乡发展的对应关系,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多次的。应该是这样做,要让我们的经济向前发展总是不间断的,同时要让我们总是能够带动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群众。这里所做的一切是不是都对,比例是不是被破坏了,等等,当我们面临着一系列困难的时候,是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要诚心诚意地看待这个问题;有没有错误,如果有,就改正,把事情搞清楚。现在提出来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再重新审议一下问题,再检查一次,搞清楚,把应该走的路弄清楚,——我想,同志们,这是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规矩之一。

**主席:**乌加洛夫同志发言。

**喊声:**休息,休息。

**主席:**我想,让乌加洛夫同志发言,然后宣布休息。休息之后第一个发言的是美尔尼昌斯基同志。

**乌加洛夫:**我想大家都清楚,我们是在恶化了的和比去年我们进入这个运动时更严重的条件下,进入到今年的现今这场粮食运动的。正像我们在米高扬同志的报告里看到的,现在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粮食储备,最近在谈话中和我们的报刊上出现的所有那些情绪和问题,都是由此而来的。我们这里通常的做法是,当我们艰难的时候,我们就起劲地去寻找这个问题的根源,关于农民、中农等等的问题就提出来了。我想,谁也不会在这里说,我们对中农的政策或者是对富农的政策需要改变。这里有党的代表大会明确的指示,我们是要遵循它们走下去的。但是我们现在出现了沉重局面,这是由于我们没有完成我们对贫农的所有允诺而出现的。不能说贫农是反对我们还是赞成我们,但是贫农是主张继续我们在几个月以前推行的那个政策的。贫农没有粮食,你们知道,他们对我们说:你们答应了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了支持你们,把原来不多的粮食储备运出来了,给了你们,而现在我们的确处于了沉重的局面。于是贫农向我们逼来。看得出来,在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给不了贫农什么,由此而来的便是不好的情绪。现在,在农村,情绪当然要比前些时更坏。这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工人的情绪比前些时要坏。我们是在极其严重的条件下推行新的集体合同运动的,在我们结束了这场运动的时候,又增添了另外的问题——粮食收购运动。

不久前我在莫斯科—纳尔瓦区作了关于自我批评问题的报告,当时,给我们递了许多条子,其中多数是关于粮食收购问题和缺粮问题的。

柯秀尔:总之是粮食问题。

乌加洛夫:就是现在,在我们那里,虽然列宁格勒的无产阶级和农村的联系要少些,但是它总还是要到农村里去的,它是和农村有联系的,并且从那里带来了这些农村的情绪。于是这里当然就开始有工人中间的议论了,提出问题来,有着一定程度的警觉了。在农村里没有粮食,于是他们就在城市里努力储备粮食。在我们那里,工人们来找执委会主席科马洛夫同志,说:“请允许我们从这里给农村寄粮食。”我到了一个同志那里,他的一位女工经常到市场上去,这个女工在那里的摊位上看到了自己认识的人,是从60俄里外来到这里买粮食的。这些情绪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的,列宁格勒周围地区的粮食很少。

柯秀尔:收成不好吗?

乌加洛夫:收成不好,天天下雨,所有的土豆都烂了,亚麻的年景也不大好。还可以通过另外的,我们的个别渠道来评断情绪。我不久前到了一个民兵师,是受列宁格勒工人们指导的,是第20师。我和工人们谈话(那里的听众是各式各样的:有工人,也有农村听众),工人们的情绪多少还是比较好的,而农民的情绪就要取决于他们从农村得到什么样的来信了。在这个民兵部队里,常有农民从农村来,并且把自己的情绪灌输给这个部队。我想,当然,没什么可陷入恐慌的。过去还有过更坏的局势呢。

伏罗希洛夫:将来也还会有更坏的局势呢。

乌加洛夫:党是从这些困难中走出来的,但是我想,这里有某种危险,这种危险就在于,在有些同志那里好像闪过了这样的想法,好像一切都好,一切都很顺当。我想,谁也说不上有这样的顺当。这样顺当的情绪是有的。而在另一方面,另一些同志有的是恐慌的情绪。我想,应该和这些情绪作斗争,不让它们继续传播下去。我在决议里读到了这样一点:“坚决扫除掉关于取消新经济政策的反革命闲话……”接着说的就是限制富农了。我想谈谈关于取消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应该看一看,这些议论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在这方面都做了什么。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重新做了调整,重新做了计划。于是在一些人那里造成的印象是,党是

在沿着消灭新经济政策路子走。就拿原本样子的农村来说吧。现在这个农村还剩下什么呢？要知道，我们说新经济政策是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私营者和投机者……

**柯秀尔：**可以养活自己。

**乌加洛夫：**正是这样，“可以养活自己”。但是在农村，新经济政策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在一些地方，你们可以找到，将会找到的，是挂着“茶馆”招牌的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躲起来了。

**乌加洛夫：**我看到了，我围着列宁格勒走了一遭，也到过其他省，我看到的是写着某个商人的“茶馆”，其余的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了。任何小店铺都没有了。

**柯秀尔：**所以老乡们不满。

**乌加洛夫：**可能是因为这样。我们所走的路线是把这个私营者的头给拧下来了，但是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所走的路子不是用经济的途径把私营者排挤出去，而是用另外的办法把他挤出去的，是什么——你们大家都知道。

**柯秀尔：**是通过财政人民委员部？

**乌加洛夫：**是的，是通过财政人民委员部。如果科马罗夫将在这里发言的话，他将给你们讲述列宁格勒的贸易是怎样垮掉的，私营者现在是怎样从市场上收摊走掉的。走到哪里去了呢？我们正在寻找足迹并找到了它们。（笑声）

**有人喊：**转到地下去了。

**柯秀尔：**你是怎么做的，是通过政治保卫总局寻找的吗？

**乌加洛夫：**你知道，我们是有许多办法的。

有人成立一个什么冒牌的劳动组合或者什么冒牌的合作社，想要逃脱我们的财政部机关采用的税收利剑，它们逃脱了国库税收之后就收摊了。农村没有私营者，而我们在城市里是在窒息他们，由此便出现了关于我们的党采取了消灭这个新经济政策本身的议论。我想，这将会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错误。许多同志在这里说，米高扬同志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应该对各种计划有这样的指望和百分之百地相信计划中的一切。米高扬同志写出了计划，它在纸上是很好的，而在实际上它总还是和那些有过的预料对不上茬。如果我们做出了允诺说，我们将拿走所有粮食，国家将垄断地收买它，然后发放给所有人，那么在最近时期内是不会有结果的。这里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有地方上的某种商品周转。贫农靠什么生活呢？贫农的生活靠的是他在秋天准备了全年的粮食，而在这一年里



我们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贫农秋天准备了2—3俄石<sup>①</sup>的粮食,把它储存起来,勉强够吃,而在今年,由于我们推行的那个政策,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此外,曾经有过允诺,说是苏维埃政权和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将让贫农有吃的。

现在关于价格的问题。我不知道将会提高多少,米高扬同志没有说到这一点。

有人喊:说了,20—25戈比。

米高扬:这是预计的,还没有经过政治局批准。

乌加洛夫:我想,不得不提高粮价了,否则我们就走不出严重的局面。

米高扬:是销售价格。

乌加洛夫:现在我还要再说一说一个问题。我们便宜地收购了黑麦,但是,米高扬同志,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在粮食转到消费者手里的时候减少一些常有的社会赘疣呢?这种社会赘疣太多了。能不能把黑麦从生产者转到消费者手里的时候构成的那些加价砍掉,并且靠这个来提价呢……

李可夫:在个人生产的粮食上有苏维埃的赘疣。

乌加洛夫:赘疣是有的,因为生产粮食是无利可图的。这里说到了用粮食喂养马,因为它便宜,而燕麦是8个卢布。今天的土豆也比粮食贵,所以我们的农民就没有了只是生产我们的粮食作物的积极性了。农民转向生产其他的什么东西上去了,不会再生产这些作物了,因为这是无利可图的。

现在,最后一个意见。今年我们这里的收成状况非常不好。我在一个机关里,在苏联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里,担任州的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主席,我们做了下面的事:我们的教授们在北方州的农村里安置了几个农业实验点。不久前,也就是一个月前,有一个教授(他的名字好像是叫瑟京)在我们那里的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主席团里做了一个报告,谈到的是他在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的旗号下在农村进行的那些实验。对农民田里的收成情况和这个教授所做的这些实验的收成状况进行了采样。他的燕麦比农民的长出了半个阿尔申<sup>②</sup>,黑麦长出了四分之三阿尔申。当时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在一块小小的试验田里做出来的,我们能在大块地里这样提高收成吗?

有人喊:是麦秸还是谷穗更长了?

乌加洛夫:麦秸长了,谷穗也长了,都长了。(笑声)

<sup>①</sup> 俄石是旧俄时的容量单位,散装物等于209.91升,装液体等于3.0748升。——译者注

<sup>②</sup> 俄尺是旧俄时的长度单位,一阿尔申等于0.71米。——译者注

什维尔尼克:重量呢?

乌加洛夫:我没有称重量,同志们。(笑声)但是我应该对你说,什维尔尼克同志,这样的黑麦是可以和你的乌拉尔黑麦比一比的。

我们应该走的路线是现在把我们用来提高农业经济的那部分资金更多地投到这个领域中来。

有人喊:投到哪儿去?

乌加洛夫:投到各种化学肥料上。有教授们在那里坐着,找到了一些化学肥料。我对化学不大懂。(笑声)不是那些叫做过磷酸钙的,而是找到了别的。

斯大林:是的,是的。

乌加洛夫:你们看见了,同志们,说是有吧。应该把这个领域里的一切都利用起来,用于提高我们的收成。

斯大林:对。

乌加洛夫:国营农场是好事情,它们是我们的基础,但是我怕的是,我们总是这样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干:整个农村都扑到一件事情上,而把另外的事情忘记了。(笑声)

斯大林:应该是全线出动。

乌加洛夫:我怕的是,我们不要只顾国营农场了,把个体的农业经济给丢了。需要记住的是,我们在几十年里都将是需要靠农民经济供养的。

斯大林:对。

乌加洛夫:所以,为了这个,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这个最主要的任务。

(休息后)

主席:美尔尼昌斯基同志发言。

美尔尼昌斯基:看来,政治局提出的草案是正确的,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因为同志们中间谁也没有对提出来的建议有争论,一些同志只是指出了必须有某些修改。同志们正确地指出了有必要对这些建议按照苏维埃的方式进行加工: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在农民和工人面前把我们党将要推行的路线解释清楚。我完全同意这一点。

但是我想说说米高扬同志的报告中的几点情况。当米高扬同志提出这些或者那些建议、这些或者那些数字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不得不和他争论了,后来我们又不得不为这些数字、失算收拾残局,当然也是和米高扬同志一起。

米高扬同志在报告里把工业局势的问题和粮食收购问题联系在了一起,这

样做是正确的。但是,我感觉他需要做的是再把我国工业的状况问题谈得更深刻一些,因为从他的报告看,形成的是这样一种印象,在我们的工业领域里一切都是很好的——生产率提高了,工资提高了,我们有的危机只是在粮食收购领域里。

米高扬:还有亚麻。

美尔尼昌斯基:关于亚麻我会说到的。我会谈到这个问题的。我想,这里的问题不仅是关于亚麻,而且还有棉花,还有一系列我们的工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米高扬同志说到了亚麻。当米高扬同志在政治局里有信心地声明说,亚麻工业是完全有保障的时候,我们和他是争论的。他那时保证说,可以收到920万普特和向工业提供750万普特亚麻。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指出了不会是这样的,提出了自己的数字并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减少亚麻出口,让亚麻工业能够有保障。但是米高扬同志的信心和声明加上古比雪夫同志的支持,使得一些人多少安心了。古比雪夫同志当时在米高扬同志发言之后也要求发言并说,我们保证向亚麻工业提供750万普特。乌格拉诺夫、斯大林、加里宁等同志在场,可能还记得这种情况。但是结果是工业得到了不是750万,而是550万普特。这里的失算是很大的,有些同志说亚麻工业将停产3个月而不是75天,他们是对的。现在是10万人没有工作和75天将没有工作,而在这次停产之后,各个企业将在很长时间内一星期工作3天。上一年在这方面也有过失算,今年又有了,而且形势更严重。明年的前景现在已经在勾画着了,商业人民委员部已经定下了只给亚麻工业550万普特。米高扬同志在这里做了一个保留:你们看看亚麻是怎样耗费掉的,我们至今是在生产亚麻口袋,要用掉100万普特。劳动国防委员会已经下了指示,今后口袋用黄麻制作。这样的指示的确是有的,但是我应该声明,这在明年是实现不了的。首先因为我们的整个黄麻工业,我们所有的那几个企业,现在生产4100万条口袋。在全负荷地三班倒的情况下,它们能提供的也只是4500万条麻袋,而我们需要的是8100万—8200万条麻袋。除此之外,我们是进口黄麻的,你们不得不扩大购买黄麻的数量,要翻一翻,由此而来的将是相应地变动价格,价格会猛涨起来。但是在这之外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我就不说黄麻麻袋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了。在工业转向黄麻的时候,将要有1.3万人被解雇。当我们在分析亚麻危机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需要严肃地和谨慎地提出建议,给出数字,不要遇到那些有可能破坏整个工作的意外情况。要知道,这个关于亚麻的问题只是在几个月以前才提出来的,要知

道关于亚麻工业停产 29 天,然后是 47 天,后来有时 75 天的问题,只是在两三个星期以前才决定的。当我们要处理棉花问题的时候,我们现在也会是遇到一个争论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把这个问题带到政治局里来,这暂时还只是在苏维埃这个层次上进行讨论的。但是现在可以提供的也是这样数量的棉花,有这么多的棉花,我们的工业将不可能全年都满负荷地工作。按照商业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提出的那些材料,那些数字,我们是不可能将新建成的企业投入生产,是不可能使用新的设备的。

**米高扬:**我们的建议不是这样的。

**美尔尼昌斯基:**我参加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你们的代表在那里发言了,这是明明写在那里的。现在还不清楚,我们将为纺织工业得到多少棉花,纺织工业将如何工作。这是最严肃的问题,是和进一步的棉花收购问题紧密联系的。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保障有 2 460 万普特才能让整个纺织工业吃饱,而且是在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将要转向一日三班地工作的情况下。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今后纺织工业将怎样工作。

拿兽毛的问题来说吧。对兽毛最起码的拨款是多少,这个问题在这里十分尖锐:不是给 9100 万,而是给 8100 万。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削减那些以前规定好的计划。奥新斯基昨天发了言。我应该纠正一下他的说法。我想,作为一个搞统计的经济工作者,不该是这样来到中央全会上并提供这样的数字的,说是有 6 亿卢布用在了纺织工业的基本投资上,实际上的数字是要高出一倍的。

**奥新斯基:**这是其他部门从它这个部门拿走的数字。

**美尔尼昌斯基:**关于其他部门拿走了,我是知道的。我也知道是拿走了多少。您同时说到了需要把投资扩大 2 亿。我们搞纺织工业的人完全支持要扩大的想法。但是问题在于按照五年计划投入了 126.9 万卢布,全苏纺织辛迪加要求的是 148.3 万卢布。按计划看上去,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完成,那纺织工业和国家都将是满意的。全部灾难就在于五年计划规定的数字(我们也不会要求增加 1—2 亿)在遭到破坏,而且将不能完成。当然纺织工业并不是一切。问题并不在这方面,而且我们也明白,如果纺织工业将能提高到相应的水平上,那么和农村以及粮食收购有关的所有重担、所有问题,就将能完全解决了。但是我们认为,纺织工业在这个领域里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能沿着现在所走的路线走下去了。真的是这样。按照五年计划规定了一定的基本建设投资,但是关于这一点已经不再提了,只是紧急在一个月、一个半月之前曾有过预料,已经是 2.52 亿了,而现在又削减了,停留在了 2 亿这个数字上,而且这 2 亿还是没有固

定下来的,没有肯定的。有议论说这个数字将再一次削减。对纺织工业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纺织工业被置于了很大的危险面前。1926—1927年度纺织品的产量占整个工业的34%,而基本投资只有16%,1927—1928年度纺织产品的产量占了整个工业的33.5%,而基本建设投资降到了15%,而在1928—1929年度时,投资已经表现为12.5%了。我们看到的,总是在削减对纺织工业的基本建设和设备改造的投资。这中间肯定蕴藏着很大的危险。我们认为,以前规定的那些措施如果推行了的话,如果这里没有失算的话,当然这就可以使我们大大地站稳脚跟了。罗伊津曼同志问到布匹的价格。我应该对罗伊津曼同志说,不仅是在苏联,而且在美国、英国、德国,到处在世界市场上,现在布匹的价格都不是战前时候的那些价格了,它们到处都提高了,同时粮食的价格也有着我们这里的那些缺点。这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是按照削减对纺织工业的投资这个路子走下去的时候,我们在最近的几年里就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将不能给国家提供我们现在提供的那些东西了。设备的损耗已经到了不能再损坏的程度了,而现在我们的大部分工业是在三班倒地工作着。现在设备的损耗要比以前快得多。现在,在生产率方面也有着相当大的负担。每一个工人有3—4台车床,他现在不像以前那样关照车床了,这些车床损耗得更快了。而我们的设备又是些什么呢?环锭精纺机的纱锭是上个世纪安装的,其中使用了28年以上的,甚至使用了45—50—60年的,我们就有45%。在走锭精纺机的纱锭里达到了64%。这样的织布机有40%,蒸汽锅炉有57%。纺织设备损耗到了如此程度,纺织工业企业的负担是三班倒和一人管3—4台机床,所有这些说明,现在对纺织工业推行的那种削减基本投资的路线是不正确的。我们不是认为纺织工业是唯一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为了解决那些和粮食收购相联系、和城乡结合相联系的问题,纺织工业是起着很大作用的,如果今后还是推行削减对工业的基本投资的那种政策的话,那么,无疑我们在最近几年里就会面临着新的困难。

我还想说说一个重要的方面,我感觉,这个方面是需要引起注意的。当然,政治局的建议是需要尽可能快地和有力地贯彻和开始对它们做出解释,但是应该看看现在我们的企业里存在的那些情绪。我曾经在纺织企业开过一系列的会议,而且了解了其他企业的材料。在研究工人的情绪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清楚的是,我们在农村的粮食收购领域里有些什么情况,那里的情绪相应地会反映到工人的情绪上。我们到处都看到这样的现象,我们的社会工作、联盟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工人们几乎不参加会议,不对决议投票。当你问工人是怎

么回事的时候,回答是这样的——你们先给我们粮食吃,然后再开会吧。当然,在一些地区,有的时候粮食问题并不是那么尖锐的,需要直接提到这一点,甚至纺织工人本身的状况也并不是这样,并不是他们得不到自己的那2—2.5俄磅<sup>①</sup>的粮食,但是有各种困难的事实以及在一些地方实行了证券制度,造成了人们的谨小慎微和恐慌。在最近的几个月里,是有必要对各种情绪和谣言组织反击,有必要相应地加强在进行粮食收购工作以外的地区的各个企业的工作的,但是我们的党组织、工会组织并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点上。如果说向进行粮食收购的地区调派了同志的话,如果说在那里展开了工作加强粮食收购的话,那么在其他地区,在我们的企业里做的工作就很少,或者几乎就没有做什么工作来和那些由于休假回来或者由于各种谣言带到工人中间来的影响做斗争,几乎没有做什么来和现在企业里正在形成的那些影响和情绪作斗争。我想,这里为克服危机规定了一些措施,有必要和这些措施一起,采取措施让党的和工会的组织能够调整好情绪,克服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情绪;更大的困难还在前面呢,应该让我们所有的组织都具备克服这些困难的心态。在企业里无论是和党员中的什么人交谈,都看得出来,许多人并没有能清楚地认识事态的状况,许多人简直就是不知道。你问到他不和谣言斗争,为什么不努力克服工人们的情绪,得到的回答是难办,是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党的措施。从许多地方上的领导工作人员那里也可以听到这样的回答。

主席: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发言,下一个是克利缅科。

索柯里尼柯夫:就粮食收购问题提出的决议草案,在第一部分里涉及了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某些总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直接和粮食收购问题相关的。我想首先说说有关决议的第一部分的问题,关于联系到粮食收购危机的总的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这个引言部分做出的各种论断是向前迈进了很大的一步。决议草案强调了农业作为经济发展基础的意义,强调了恢复农业出口对工业化的意义,强调了农业对于形成外汇储备这件事的意义,这样一来也就恢复了农业应该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这样就是进一步发出了警告,要防止把粮食危机、粮食收购危机搞得更尖锐,要防止让这种情况再度出现。因为我想,造成今天的困难、酿成今天的困难、使得这些困难成为不可避免的基本原因,是我们在最近这些年的经济实践中,在对待农业的态度上有了偏差,使得我们没有能解决好一项任务,那就是和谐地发展农业和工业。而只有在让农业和工业能够和谐地发展

<sup>①</sup> 俄国采用公制前的重量单位,1俄磅等于409.5克。——译者注

的条件下,才能保障类似的危机不致到来。

有人经常地指控我偏向农业,经常地把我说成是反对工业、反对工业化等等的人。我现在不详谈这个问题的细节了。就让我们想象一下过去我是错了吧。当然,我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不可能在某些地方不犯错误。但是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经济实践中,对农业经济,特别是对粮食经济,最近几年有做过了头的情况,而且可能是达到了在对我们党的和苏维埃的政策所作的表述中都没有预见到的程度。

这些做过了头的情况出现了,而我们并没有能为提高我们的经济、加强和扩大农业基础做好准备。我们在几年前首先碰到了而且也不可能不碰到的,是技术作物方面的危机,于是我们看到了,如果我们不是更多地和技术作物方面注意农业经济,我们的工业就不可能提高。但是我们不可避免地应该有所改变,结果是我们又碰到了不仅是技术作物限制了我们的工业的发展,而且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国家里,我们同样没有能够做到足够地提高粮食经济,在我国的工业薄弱的情况下,在农业落后的情况下,这一定会导致比我们在技术作物发展不够的情况下遇到的那种危机更尖锐的危机。

最近这些年,“比例失调”的理论在我们这里传播得非常广泛,我以前对它有所争论,现在继续对它有所争论。人们硬要说,基本的灾难在于我们在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比例失调,表现是农业产品生产过剩,工业产品生产不足,所以问题就在于要让我们的工业赶上农业。我认为,这个公式和这个理论显现出来的实际上的对应关系是完全不正确的。不是说可以否认或者怀疑我们的工业发展得不够,或者是怀疑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必须提高这个工业的任务,当然首先是提高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的任务,但是这个理论之所以把我们搞糊涂了,是因为它歪曲了在我国存在的基本的比例失调,这种失调的表现是,一方面,我国农业是非常落后的、野蛮的、半亚细亚式的,农业文明非同寻常的幼稚,农业技术水平非常低下,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非常低下……一句话,农业基础非常薄弱,不能保障我们国家和我们的经济不忍饥挨饿,不能保障一旦发生歉收和摇摆不会给整个经济、整个建设事业带来打击;另一方面,我们的工业技术发展是高水平的,它是按照资本主义国家最先进的技术样板建立起来的。基本的失调存在于这些农业和工业中蕴藏着的不同的力量和条件之间,工业有着向前发展的可能性,而农业是相当保守的和固定不动的。我们应该消除的,是这种比例失调。消除农奴制的残余,消除这个捆在我们双腿上的重负,是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的任务,这种重负是贫困、落后和我们的农业经济薄弱的基本原因。这是弗拉基米尔·伊

里奇强调的任务,而且我想,他是正确地强调了它。虽然在工业上,我们已经接近了战前的水平甚至超过了它,但是不管我们到今天为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伊里奇在他的最后几篇文章里所做的表述,就是在现在也还是有效的。虽然我们一分钟也没有放弃追求,想要“跨下农民、老乡贫穷的马背”,“骑上大机器工业、电气化的马背”,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骑在农村的老马背上。这是我们活该,现在这个东西在束缚着我们,但是我们还没有强盛到现在就可以跨下这匹农村的老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整个经济如此水平的高涨和强盛,从大工业达到的威力出发,可以直接领导农业了。而且因为我们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做到让分散的农民经济俯首听命,而是相反,我们还要取决于它,于是便拿出了其他的办法,行政影响的办法,行政服从的办法,等等。但是,同志们,只要看看一些起码的数字就足够了——而且现在这些数字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就能够把各种市场困难、季节困难、行情上的困难都统统撇开,切实看到我们基本的比例失调存在于何处了。如果总收成是95%——这是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数字得出来的,他在自己的报告里引用了这些数字,虽然他说达到了战前收成的水平……

**米高扬:**95%不是指收成,是指播种。

**索柯里尼柯夫:**好,就算是播种吧。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状况,因为那样的话,收成将会少一些。总而言之,我们的中央统计局的数字和我们的材料是相当可以引起争议的。按照一种数据得出的是,我们有战前播种面积的92%—94%。但是如果你们拿来的不是总的播种面积,而是粮食的播种面积的话(我们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要知道,那情况就会更糟了,在那里,这个数字就会更少了。而人口呢?斯大林同志没有进行对比的那个方面呢?去年的人口是战前的107%,今年大体上是110%了。我们的人口增长是2%以上。这也就是说有110%的人口,他们想要比在沙皇时期吃得更好些,而摊到他们身上的不得不是战前粮食收成的95%。我们所有的食品基础就是这样的。另一方面是工业。我们在工业上超过了战前水平。我们从这种水平中走出来了。看看煤的产品以及一系列其他部门的产品吧。当我们在工业上超出了战前水平,而在农业上相当多地落后于战前水平的情况下,我们靠什么能做到不顾此失彼呢?你们去问问任何一个搞经济的政治家,他都会告诉你: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应该从消除出口开始做起。在革命前的俄国,在它的那种农业和工业对应关系的情况下,有粮食出口。这种粮食出口现在正在被食用粮的增加破坏掉,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因为工人想要吃得饱一些,农民也想吃得饱一些,他们明白,如果他们把地主推



翻了,那他们是把从他们的嘴里夺去一块面包的人推翻了。但是在人口增长、城市发展的条件下,在没有能恢复到战前农业规模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粮食产品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的情况下,在这些条件下,你们就要经历这样一些阶段了。开始的时候你们就会遇到出口下降方面的困难,然后是喂养工人中心和城市中心方面的困难。这件事就该是这种情况,它也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也就是这种情况。为什么?我在这里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对我们的那些老公式提出争议,我是从今天的经验出发这样说的。我们现在搞经济不是按照办一个大型的社会主义的、有组织经济联合公司需要做的那样来做的。在一个大型的社会主义的、有组织经济联合公司里,完全清楚的是,如果你扩大在冶金业里工作的工人的数量,那你同时就应该关心扩大粮食产品的数量来养活这些工人,就应该扩大原料基地,向它供应经过加工的皮革,经过加工的棉花,等等。

当然,这是一项宏伟的任务,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能够做到,我们在这里就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如果我们没有能解决这项任务,那么,发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是货币经济,我们被摆在了这种货币体系的帐幕面前,这个体系遮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见经济的各个成分现实的对应关系。结果是这样的,既然能够用货币支付冶金业或者基本建设的工人工资,那这也就是解决了问题,而且农业也就会是自动地同时跟上来的。但是这种自动的转变并没有能得到,因为要想自动地,不借助我们有组织地协助,没有我们把农业提高到应有的程度上当成我们注意的重点,为此做出必要的牺牲,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发生。我感觉这就是基本的原因,所以我们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少,变得越来越更加尖锐了,于是我们就落入了这样的境地,当我们一方面全面铺开了,让我们的经济机器全速运转起来了,另一方面我们却走到了没有食品来保障它的进一步正常发展的地步,于是我们在自己的粮食收购实践中转入了采取措施……(主席的铃声)我请求给我延长时间。我需要10分钟。

主席:表决。谁同意给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延长时间?通过。

索柯里尼柯夫:我的感觉是,向中央全会建议的决议在很大程度上承认了一系列能够扭转局势的条款。但是这是在引言部分里,而在实际的总结里却没有由此得出应有的结论,但这是基本的一点。

有人常常对我说:您是反对工业的,您不想让它得到发展,您是反对工业化的。但是还是让我们在有了最近这几个月的教训之后,提出一项任务来吧,看看我们该怎样以更快的速度发展我们的工业,把我们像需要光线和空气一样需要的工业化建立在坚硬的基础上,建立在现实的轨道上。我想,只有在最近的经济

年度里和在我们今后的计划中正确地解决工业高涨和农业高涨的结合这项任务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说起来这是很简单的,可是实际上是困难的。你们知道,我们曾有过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建议要削减农业的机械化,建议在那里停止使用农业机器。

**斯大林:**这是在什么时候?

**索柯里尼柯夫:**这是斯特鲁米林的计划,是倒数第二个五年计划。我曾就这个问题在国家计委的代表大会<sup>147</sup>上发了言。那里有一个直接的公式是这样说的:我们由于农业人口过剩而受苦,没有能给人们的工作。如果我们将要使用机器的话,这将导致出现更多的失业。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强手工劳动上,而机械化是会置我们于死地的。但是很清楚,我们是不能接受这样提出问题的。无论是在以前还是在现在,我都不可能想象,在提高我们的农业对国家经济具有很大作用的情况下,要想提高苏维埃的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可以采用另外的办法。如果有的时候说只有大型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那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公式。大型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而且我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组织起来的国营农场是粮食工厂,就像纺织工厂一样,也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基础。我们这里有的时候是把工业和农业对立起来的,想的是,我们有的只是工业里的社会主义形式在增长,而农业带来的,不可避免地是小商品、个体的和私人的成分的增长,是要转变成为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的,——这是从一开始就不正确的提法。

**斯大林:**绝对不正确的,资产阶级的提法。

**索柯里尼柯夫:**致命的提法,你们以及一系列同志都还记得的那种提法,是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塞进来的那种提法。<sup>148</sup>

**斯大林:**对。

**索柯里尼柯夫:**而实际上是怎样的呢?向这个方面迈出一步也不行。有人会说,这是学术问题,不值得为它们发火。不是,原来是我们在哪里有些迷路了。如果我们能注意到农业,为农业牺牲无产阶级的国家资源,那就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会比在工业里做得差,而且我们不能是片面地解决任务,我们不能在工业里发展社会主义,而让农业放任自流。

**斯大林:**对。

**索柯里尼柯夫:**这会是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形式在农业中的胜利。

**斯大林:**这是城市和农村分离。

**索柯里尼柯夫:**是的,这是城市和农村分离,这是工业和农业的分离,是对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解的破坏,而这种理解并不是把工业和农业对立起来的,它是把农业看成一种以各种化学过程为基础的生产,这些过程是通过一系列对这个农业的产品的再加工阶段把农业生产和工业联系在一起的。

就是这样的理解是我们所需要的,它让我们有可能在农业里加强社会主义的形式,而且我想,如果我们能做出更多的物质牺牲,更迅速地把国营农场发展起来,如果党和苏维埃政权能够更多地注意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是不会损失什么的,我们将会得到工业的和农业的经济高涨和谐的结合,我们将不会碰到原料危机,食品危机,等等。而且同时,当然……

米柳亭:这也就是大经济的问题了。

索柯里尼柯夫:是的,这也就是大经济的问题,完全正确,但是这个大经济的问题不仅是国营农场的问题。伊里奇对农业经济采用的合作社计划是什么呢?它是要正确地向小型的中农经济提供支持,准备生产的合作化的种种进程,要让它引导我们走向那种大经济。这能有争论吗?这是无可争论的。所以我也感觉到,如果我们现在把对农业支持的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而另一种支持是通过对小型经营的支持)迎面对立起来,那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不能不支持、不发展小型经营,它对于今天来说是占统治地位的,它在决定着拿到市场上去的商品的多少。但是在支持、加强这种小型中农经济的同时,难道我们这样就是在做一项工作,一定就会让它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发生矛盾吗?如果是允许这种情况出现,我感觉,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怀疑伊里奇的基本定理。

加里宁:就是应该把这一点吃透。

索柯里尼柯夫:请允许我……(喧哗声,交谈声)

加里宁:总是在这一点上有许多动摇,在这一点上有很多人是有动摇的。(喧哗声,交谈声)

索柯里尼柯夫:我感觉,如果我们支持了小型的中农经济,那我们这样做丝毫也不会破坏农业合作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丝毫不会;相反,我们是在支持它,推动它变得更加文明,教它学会经营,展现出结果来,我们同时也就保障了有可能在更高的文明基础上实现它的合作化。不过这里有一个完全是决定性的“但是”,那就是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达到,那就是如果对小型经济的支持不会变成对小型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支持,只有在我们同时将进行坚决斗争反对富农的剥削倾向的情况下。

有人喊:这是一个严肃的修正。

**索柯里尼柯夫**:完全明显的是,我们今天应该支持小型经济是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可能让它合作化,我们可以在今天教它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我们不能在今天就给它拖拉机;不过我们要教它更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的是明天把它团结到拖拉机的周围来。但是如果我们同时不限制资本主义成分在农村的发展,如果我们不打击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以便使得力量的平衡不致发生对我们不利的扭曲,那么谁胜谁负的问题就会因此而变得尖锐起来。人家就有可能耍弄我们: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就可能把我们不得不做和必不可免的对个体小型经济的支持转过来对付我们。这就是斗争的战场。能不能不走这一步呢?当然不行。谁也不会争论,集体经济和苏维埃经济只有在经过了3—4年之后才能提供大量的粮食。

**斯大林**:甚至会更迟。

**加里宁**:大约要在8年之后。

**索柯里尼柯夫**: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除了让这2000万有商品的农户在提高他们的产品的基础上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联系在一起之外,我们有其他的指望吗?当然,另外的出路是没有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要让小商品生产者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善于把他们保持在从属的地位上。这是我们应该向自己提出的任务。(主席的铃声)

是不是可以再给我5分钟。

**喊声**:给他。

**主席**:报名发言的有40个人。

**索柯里尼柯夫**:我请求给我一点优惠。为什么?关于我散布了太多的神话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不得不在最近很少说话,所以如果您让我有可能说出来,您失去的很少,而却给了我一定的满足。

**伏罗希洛夫**:给他10分钟。现在说得很好。

**主席**:这是唯一的一个有储备的部门。所以他就建议给10分钟了。有没有反对的意见?通过。

**索柯里尼柯夫**:请允许我在以下的部分说得简短些,而且在必要时不那么连贯。

我还想涉及哪些方面呢?首先是米高扬同志在这里说的——关于我们的储备问题,首先是关于我们的外汇储备。这是和什么联系在一起的呢?米高扬同志说出了我们的外汇储备状况的数字,而且正确地把它和我们的出口量以及粮食出口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联系起来。

1924—1925年度我们的黄金储备是〈…〉\*卢布。曾是个歉收的年份,我们进口了〈…〉卢布的粮食。这是对我们的一个预先警告,歉收重创了我们的外汇储备。我们进口的粮食花费了〈…〉卢布。现在它剩下了〈…〉卢布。在经过了3个收获年度之后,这个黄金储备减少到了〈…〉卢布,而如果从中除去财政人民委员部对未来黄金提供的保单数额,除去以后可以用得上的黄金,那么现在大体上有〈…〉卢布,也就是说,我们在最近这段时间的黄金储备减少了一半。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得到了什么呢?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把自己的外国债务扩大了9倍,这是短期债务,现在国外的债务是〈…〉卢布。从这方面说,如果不是说得更激烈的话,我们是陷入了不可想象的严重境地。我们所冒的危险是,在这种状况下,要落到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我们的债主的地步。我们所落入的境地使得他们有可能会对我们做出很大的坏事来。最后,我们正在接近的状态是我们的工业在提高的时候受到了现实的出口规模的限制,因为出口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没有条件花费更多的外汇储备了,如果我们再进一步钻到国外的短期贷款里去,那我们就是目光短浅了。继续沿着这条利用这种外国贷款的路子走下去,就意味着落入用短期贷款的绳索套住我们的债主的绳套。米高扬同志说到了这一点,而且基本上是完全正确的。要扭转这种状况需要做些什么呢,接下来会怎样呢?再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一年也不行,我们已经走到了极点。不能让我们的事业继续靠着惯性在斜坡上滑行了。大家都同意这一点;你们能在这个大厅里找到一个不明白不能继续再花费外汇储备的人吗?这是起码的知识。一年以前我们所知道的也是这种情况。清楚的是,对于我们来说,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发展工业出口。我积极参加了制定加强工业出口的措施,并且认为,这是应该起到自己的作用的,工业出口可以比战前更多一些。但是这不是出路,因为当国内市场上的工业产品不足的时候,我们不能靠损害其他部门来展开出口部门。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农业的状况,我们应该对它给予更多的关注,我们应该把这个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就按照我们会做的那个样子去做。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价格。米高扬同志在这里已经说到了必须要提高价格。这是一个具体问题,但是请允许我用开诚布公谈话的方式说,我的想法是,米高扬同志建议的这个提价12%是不够的。我想,我们维持不了这种状况,这样是办不成事的。我们向农民支付的粮食价格是不够的。如果是粗略地表述和比较一下粮食和商品的指数,那就是说,我们比如是从农民那里买了6亿普特的

\* 可能由于保密的缘故,数字在速记记录里没有包括进去。——编者注

粮食,而支付的最多不过是4亿或者2亿普特的钱,在今天这样的价格对比关系下,我们简直就是在白拿。

有人喊:没有证据。

索柯里尼柯夫:能不能再继续维持工业价格和粮食价格的这种对应关系呢?不行。今天的粮食收购危机的实质何在呢?就在于我们不仅有来自富农的警告,富农当然是想要靠这个发财的,而且还有来自农民中的中农群众的警告。再有就是粮食的指数是110(把战前水平作为100),而畜产品是180,在工业商品的指数在200以上的情况下,这样的价格对比关系是维持不下去的,需要改变它。我们应该提出,我们在政策上不能拖延的任务是为着粮食把各种指数拉平。如果愿意,可以从12%开始试一试,但是这是对自己而言,不要公布出去,也不要宣布,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大幅度地改变对应关系,期限已经结束了——我们应该现在就行动,必须对粮食的价格指数会有更加实质性的提高的前景有所准备。

请允许我不是讨论这个问题,而是说一点情况作为解释。价格问题在现在是名义价格的问题。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要看我们在1924年建立起来的那个金融组织的情况。货币改革等等还剩下什么呢?不是百分之百都要保留下来。这里有些东西是要改变的,而且我想,我们可以用一个正确的经济政策来把事情矫正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条件。安德烈耶夫同志在这里说了,说得非常谨慎,但是是正确的:在我们和中农之间有某种裂痕。我们应该把这个裂痕填补上和扭转过来。我们应该能够做到在不停止和富农斗争的情况下,把中农的信任收回来。如果我们能把它收回来,这样就能保证在未来的秋天里我们能够正常进行粮食收购运动,我们也就用不着听取关于过火行为、关于歪曲和关于非常措施等等的报告了。如果我们不能挽回信任,如果我们做不到在农民中建立起必要的印象,那就不得不再次采用非常措施了,而我们大家都是不同意这些措施造成的反面结果的。

主席:克利缅科同志发言。下一个是茹柯夫同志。

克利缅科:如果说到农民的情绪,那么安德烈耶夫同志对北高加索做出的归纳是正确的,而且对大多数地区,首先是对乌克兰来说,其次显然是对中央黑土州来说,都是典型的。哈塔耶维奇同志的乐观情绪可以解释成是由于今年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收成好于平年的收成。这是唯一的一个州……

柯秀尔:不是收成,而是年景。

克利缅科:我同意,是年景。这是唯一的一个在我们那里到处一片绿色

的州。

柯秀尔:染成什么颜色都是可以的。

有人喊:这里是红色。

克利缅科:这是商业人民委员部。在商业人民委员部里是用别的颜色确定各种指标的,和农业部不一样。

有人喊:更鲜艳一些。

米高扬:好像在数字上没有分歧。我没有看见我们的数字和颜色,而没有见到的就是不存在的……(听不清楚)

克利缅科:我说的是中央统计局的数字,我想根据记者的材料和农业人民委员部实验站的材料中的数据作一些修正。

就是这样,良好的年景让我们能够比较轻松地克服我们在农业方面和在农民方面面临的困难,前者是总的收成提高了,后者是那些能力不大的农户在今年扩大了播种面积,提高了收入。

关于播种面积,春播的面积。如果说到数量方面,我们这里没有减少,甚至有某些扩大。同志们在这里说到的削减是引用了专家委员会的材料,这涉及的完全是过冬作物的死亡情况。但是如果看看在500万死亡的过冬作物中,我们的农民在一周内就补种了大约85%的话,那么这个事实就说明了,我们的农民对经济的复活是有着非常大的能力的。

李可夫:也说明是有畜力的。

克利缅科:当然,所有这些是有限度的。这些能力是和农民现实的条件以及国家的帮助有联系的。现在我们在农业经济领域里面面临的基本任务首先是提高产量。在这里,丘巴尔同志集中精力谈到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由于过冬作物的死亡,我们这里的播种面积减少了一些,而根据中央统计局的计算,我们今年的总收获要比去年多4亿普特。这个数字说明,从农业产品的数量扩大这个意义上说,提高产量是中心问题。但是如果要想在自己的面前强烈地提出产量问题的话,那么这里将会出现一系列一般性的问题,其中也包括了价格问题。要知道,和提高产量有关的,第一是和国家对种子业、机械化、肥料、土地安置和水利以及产品加工企业的投入有关系;第二是必须要有更良好的市场行情;第三是要我们的机构有能力做到上上下下都明白,产量的任务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例如,根据我们实验站的材料,还有那些已经公布的科学材料(不仅是建立在实验站工作基础上的,而且也是建立在农民各种实验的基础上的,而这样的实验在俄联邦大体上有1万个),在农业技术有种种改善的情况下,收成的提高可以通

过以下的方式实现。如果把我们的联盟大体上分成3个典型的地区：中部非黑土地地区，然后是中部黑土地地区，最后是所谓的干旱地区，那么得到的是这样的情况：在所有地区如果都采用经过改良的种子的话，产量能够提高20%—25%。这是针对着所有地区的。如果对非黑土地带进行更好的耕作，收成可以提高25%—30%。在这个地区使用肥料可以提高收成60%—75%。

**柯秀尔**：这是说如果给所有地方都施肥的话？

**米高扬**：是指给肥料的那些地方。

**克利缅科**：在中央黑土州，种子方面的条件是一样的，改善耕作可以提高收成30%—35%，肥料可以提高40%—50%。在干旱地带（我们主要的产粮地带）的数字是这样的：种子上可以提高收成20%—25%，改良耕种可以提高40%—100%，而且在这些干旱地区里，正确耕种土地对于经济在干旱持续的情况下的状况，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有的时候是决定性的作用。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些数据是经过了我们的实际工作的经验检验的，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从这里就需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在种子业、土地安置和水利方面，特别是在消灭远距离耕作和耕地交错的情况方面（在产粮区里，远距离耕作是在切割我们的经济），在肥料、机械化、拖拉机供应方面，必须要加强拨款，要能完全满足需求。在我们这里，拖拉机问题总是处于悬而不决的状态。实际上做的还非常少，特别是在国内生产方面。专业人士们是关心农民问题和粮食问题的。

**柯秀尔**：这是应该欢迎的。

**克利缅科**：而我们这里搞工业的人们不知怎么，就是不吭气。没有什么可以遮掩的，拖拉机这件事就不得不险些要去揪耳朵才有人肯干。我们这里的国内拖拉机制造业发展得非常缓慢。需要更坚决地把普提洛夫厂、斯大林格勒厂、可能还有哈尔科夫厂的状况提出来了。

**丘巴尔**：不是可能，而是一定要这样。

**有人喊**：脱节了。

**克利缅科**：土地并不重要，需要的是拖拉机，需要的是粮食。根据我们的苏维埃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我们要求大体上在全苏联得到15万台拖拉机。

**米高扬**：一年还是总共？

**克利缅科**：五年内。10万台给俄联邦，而给全联盟的是15万台。我说的是大体上的数字，我们从经济上对这些数字进行了论证，在审议计划的时候，我们将会证明这一点的。但是在这整整5年里，甚至还有更长的时间，我们将还是要取决于从国外的进口。我们编造了计划，而福特有自己的计划，他把生产线转到



了其他的生产上去了,我们就在欧洲和美洲到处寻找,收集这些拖拉机。需要有一个向农业供应拖拉机的硬计划。

还有一个关于种子业的例子。政府批准了种子业的计划:在一定的期限内用改良了的纯种取代普通的种子。在这两年按照计划工作的时间里,我们在1927—1928年度里得到的是削减了拨款370万卢布,今年计划预料要削减的不是原来的1000万,而是500万,也就是说,这些措施可以保障我们多少提高一些产量;由于我们的整个机构从上到下没有能足够地意识到,这些措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物质效益,完成为它拨款的任务具有何等意义,结果是把国营农场里的改良种子收下来当粮用了。我感觉,在这方面党的系统是应该发出指令的。

当然,提高产量是和我们更坚决地推行列宁的合作制计划相联系的。而且需要记住的是,集体农庄是作为一个部分算到列宁的合作制计划里的。需要做的,是在实际上推行列宁的合作制计划时把农民的基本群众,把贫农和中农包括进来,不一定是现在就立刻把他们包括到集体中来,但是一定是要经过合作社,因为没有生产上的合作化,没有个别成分的社会化,或者说特别是在大田作业上,我们就不能提高我们的耕作业技术,因为我们这里是小的和极小的农户。但是需要让所有这些都是以在列宁的合作制计划的基础上形成广泛的阵线。

现在是第二个问题,也是和提高产量有联系的——这就是价格。产量的增长和接下来的农业商品率的扩大,今后将要靠生产的集约化来得到,而这就要有消耗,也就是说要有更多的劳动和资本的投入。要知道,如果看看我们的各种指数,我们就会看到,土地从粮食作物得到的收入非常低。有的时候你简直就会想到:为什么农民要种粮食呢?要么是习惯了,要么是需要。

柯秀尔:为什么不生产拖拉机呢?

克利缅科:农民不能生产拖拉机,但是能生产粮食。

李可夫:这就是对你的问题的回答。

克利缅科:在农民经济中,粮食作物是如此无利可图,以至每一个主人都在努力尽可能快地摆脱它。由此而来的,就是粮食作物的商品率增长得非常慢,于是在这里就需要提高价格。例如,我们预料,因为对于北高加索和乌克兰来说,过冬作物是最有商品性的,是最耐旱的和比较有收益的作物,为了更大规模地重新栽种死亡的那部分过冬作物,需要这样来提高价格。我举的是大体上的数字,我们在自己的农业人民委员部里相当注意地计算过,我们的意见还是这样的,这些数字是最起码的。例如,把黑麦的价格从75戈比提高到97戈比。小麦从1.06卢布提高到1.27卢布。

有人喊：靠谁呢？

克利缅科：我要说的。我们给这种算法提供了经济依据。我说的是，这是大体上的数字。燕麦从63戈比提高到70戈比。

伏罗希洛夫：你还是说提高到71戈比吧。

克利缅科：这里有各种计算，但是我说的是一般情况。米高扬同志在这里说了关于提价的问题，但是我的感觉是这将是远远不够的。现在是靠谁呢？根据我们的计算，这样一来将大体上提高农民的收入1.4亿—1.5亿卢布。我们在今年增加了农业税，好像是1亿卢布——这是第一。现在是第二。如果看看我们的各个机构的收购指数，这中间有些可怕的东西。那里有300%—400%的余地。一个麻袋值80戈比，可是以前它只值20戈比。

有人喊：是12戈比。

克利缅科：而现在是80戈比。如果我们是运到国外去，按一个卢布收购，而按2个金卢布出售，这就意味着是我们这种钱的4卢布了。然后是对消费地区的供应。这里我们出售是按1.5卢布和按1.6卢布，甚至更高些。需要在压缩收购指数上更坚决一些，而且如果我们能从国家预算里增加2000万或者3000万用于粮食作物的再生产，这将是很多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价格上。需要把粮食不是简单地看成是一种进入流通的商品，出售它，购买它，得到利润，等等。粮食需要考虑工人预算的利益，需要考虑生产本身的利益。现在我就转过来谈谈亚麻。

主席：您转得有点晚了——时间已经到了。

喊声：让他讲到吃午饭吧。

主席：再给5分钟？没有反对的吗？您还有5分钟。

克利缅科：现在关于亚麻。米高扬同志说应该提价。这很好。米高扬同志说我们向亚麻种植区提供的是便宜的粮食，但是遗憾的是，米高扬同志没有说，他们是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些地区对粮食的需求，他们好像是满足了30%。例如，在亚麻种植区的市场上，黑麦是2卢布一普特。

有人喊：是4卢布。

克利缅科：我说的是谨慎的数字。就算是2卢布吧。当然这里得到多少粮食和多少亚麻的对应关系并不好。要知道种亚麻的农民买粮食不是按生产地区收购粮食的价格，也就是说不是按75戈比，也不是按1卢布一普特，他吃的粮食是2卢布一普特。于是在这个生产地区种植基本的作物不是该种的亚麻，而首先是粮食作物了。由此而来的是亚麻的种植面积没有扩大，而是减少了。由此

而来的是产量也减少了,而在后来就是最主要的了,亚麻的商品率只有50%,而另外的50%留在了农村里。在这里,除了要提高亚麻的价格外,还需要充分供应这些地区的粮食,而且要是的确廉价的粮食,然后就是还要采取一系列经济的和农业的措施,不使我们的亚麻纺织工业处于一种令人不安的状况。它停产75天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大数量的钱,比恢复亚麻生产所花费的要多上好多倍。

最后一个我想说的问题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根据我们在五年计划里的设想,如果在集体农庄上花费5亿,在现有的和重新组织起来的国营农场上,新的国营农场花费3.35亿,老的国营农场花费2.8亿,——总共大约是10亿多,那么我们就能够把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总产量从2%提高到10%,而商品产品从4%大体提高到20%。

有人问:是准确的数字吗?

克利缅科:准确的数字我没有,我说的是相对的数字。

这里完全清楚的是,的确应该让国营农场在最近的时间里从经济上自己站立起来,在大力建设国营农场的同时,在开展建设集体农庄工作的同时,需要注意到个体的农民经济。我将坚决支持决议中关于个体经济的第一点。

米高扬:只支持第一点吗?

克利缅科:我支持整个决议,如果是不同意我的话,我是会说的。我为什么说关于个体经济的第一点呢:第一,在我们这里最近一年很少说到个体经济……(插话没有听清楚)

最近有一个来自乌拉尔的农民代表团来找我,38个人,他们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个体经济的。我们甚至是一时有些忘记了农业合作社——有一段时间我们是这样的(在准备和进行集体农庄的几次代表大会期间)。甚至到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根据对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最乐观的计算,集体农庄所能提供的商品产品大约是20%,而80%是由个体经济提供的。关于可以提高个体经济的指示是很好的。

结束时我要说的是,米高扬同志说,我们有的只是粮食危机,而且是顺便说到了亚麻。我感觉,需要把这个问题更强烈地提出来,意思是说,我们的农业落后于人民消费和工业的增长。而在经过一两年之后,我们在肉类上也将会有这样的危机,因为人民不仅是要吃粮食,而且要吃肉,而粮食、兽毛、棉花、皮革的危机现在就已经有了。从这个局势需要得出的,是更广泛的和更深刻的结论,也就是说,必须要坚决扩大所有农产品的商品量

主席:休息到晚上6点钟。

## 第八次会议

7月7日晚间

**主席(李可夫):**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发言,下一个是茹柯夫同志。

**彼得罗夫斯基:**我本可以不在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就粮食收购问题发言,因为在四月全会上,我已经说出了一些思想和论断,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现在得到了证实。

**有人喊:**不是所有的。

**彼得罗夫斯基:**照我的看法是所有的。添加上的只是一些新的现象,因为生活不是止步不前的,而是在发展的。但是需要发言是因为一些同志对我们工作的批评是不正确的。一方面,同志们想为自己在粮食收购中的所有行动辩解,托辞说在我们这里阶级斗争正在愈演愈烈,——而且在这里当然是我们的反对派在洋洋自得了。它也在叫喊,说是大家到处都睡过头了,阶级斗争把你们搞苦了。不该只是瞄准了这一点,因为这不现实的力量对比。粮食收购机构表明,我们已经能够做到一切,而且国内的阶级斗争起不到它以前所起的那种作用了。(笑声)说这在起着首要的作用就意味着是在给反对派助威。我们有过这样的过火行为,好像所有的粮食都在富农那里,如果是吓唬他们一下,就能得到粮食了。而生活和第107条都表明了不是这样的。另一方面,对客观原因的评断应该是到我国经济的过渡状态中去寻找,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农民正在变成中农。所有的收成储备正在逐渐地分布在这些中农中间了。现在你去试试看能不能从那里把粮食搞出来吧。生活表明这是非常困难的,应该更好地去适应。

在我们这里,政治时局大体上就像是安德烈耶夫同志多少比较正确地描绘的那样,对乌克兰来说,有一些地方要做些改动,在那里,除了中农对我们的粮食收购以及经济政策的不满外,在某些地方还要加上贫农的不满。但是粮食不够用首先是在于客观原因,首先是在于粮食储备在中农中间被分散掉了,而从另一方面说,不要忘记的是,我们今年的歉收是2亿到2.5亿。这就是第二个原因,

它表明我们现在是非常困难的。安德烈耶夫同志描绘了现在这个时刻的严重状况,并说到现在需要这样来制定政策,不要重复商业人民委员部和我们的政策中犯下的错误,在他这样说的时候,不能忘记的是,在四月全会上,伊万诺夫同志唱的却完全是另外的调子。

这里最重要的是:需要让中央总能这样向党内通报,让党能够正确地在所有地方都瞄准方向。不正确的通报、不正确的阐述会导致或者强化行政压力,或者使其变得更加松懈的。同志们,与此同时我觉得,我所说的那种批判也反映在了我们的决议编制上来,我感觉这个决议还需要加工。这个决议应该反映出在经济方面正在发生着什么。关于农业的中农化,粮食是通过中型的经营单位流散的,农民现在更多的是自己在消费粮食——这是人所共知的。如果是根据过去的预测,即便是再有大量出口,也还是这样的:只要是把粮食运出去了,那就要以农民和工人吃不饱为代价。

**斯大林:**不仅仅是这样。

**彼得罗夫斯基:**不仅是这样,过去就是这样预测的:如果在过去要在农民和工人之间正确地和正常地分配粮食的话,那么,为了正常地食用,就要增加从外面运来的粮食。由此而来的该是采取什么措施呢?需要采取一切措施来扩大产量。你们大家可能都清楚最近的一些通报,说是这样的农业危机在国外的许多国家里都有,那里提出了关于农业经济工业化的问题。例如在德国,收成比我们要高出3倍,那里就提出了在最近就把收成提高一倍的问题。如果说在德国这样一个收成比我们高出3倍的国家里,都提出了收成要翻一番的问题,那么就明白了,我们也需要尽快地在自己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来,加紧行动起来,无论如何也要采用所有我们所能采用的措施来提高农户的产量,做到能够对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必要保障的程度。我认为这是基本的一点。

需要谈到的第二点是对商业人民委员部行动的批判。在上一次全会上,许多人说到了,必须要更准确地计算我们的粮食储备,农民那里有多少储备,以便更正确地确定我们在地方上的经济政策和与此相关的行动实践。应该说,至今我们在这方面还是一塌糊涂。但是同志们,我们这里是存在着困难,发生了困难,但是,奥新斯基同志说我们和中农经济的“结合完蛋了”,这样解释是完全不正确的,完全是一下子就陷入了恐慌。斯捷茨基同志则完全是从寄到编辑部的那些信件出发,攻击党的路线,以和休假的人们的谈话为依据形成自己的结论,从总的方面说,说得也不对。要知道,如果实际上的确是这样的话,如果说在这方面他们说对了,那也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

**斯捷茨基**:不仅是在休假人员的信里。

**彼得罗夫斯基**:需要记住的是,从来都是这样的,要是沙皇俄国,只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就会经历一场严重的危机的,贫困的阶层就会挨饿和遭受很大的苦难,而我们现在遇到的是这里说到的那些缺陷,我们有了歉收,播种不足,再加上干风和其他一些情况,所有这些使得我们暂时还战胜不了大自然,困难现在还会对我们有影响,所以严格说起来,不能责怪党在某些地方有了过火行为,它启用第107条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用别的办法是不是就能得到粮食呢?我们知道,现在没有粮食,可是城市和工业中心需要提供粮食。生活已经表明了,我们没有足够的这样的粮食,不得不从国外要来好几百万。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但是甚至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收购粮食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却让中农来提防我们,敌视我们,在一些地方还把贫农也惹火了,因为他们在挨饿。我们大家都眼睁睁地看到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情景,总的来说,看到了中农群众是怎样看待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的。我就看到过这种相互关系的一种很典型的情景,那是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个中农聚集的地区,那里的一个有5000人参加的大会表现出了这种情况。贫苦的农民站出来说了一番话,说他们是打算要随时帮助苏维埃政府的,知道它的难处,将会克服缺点。富农就是另一回事了,他发火了,直接就冲突起来了。

他也是开始的时候表示了欢迎苏维埃政权,但是后来他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曾为自由斗争过的,但是把我们的粮食夺走了,运走了,我们的地都变黄了,庄稼都死掉了,1921年的大饥饿逼到了我们的门口”。长着灰白胡子的富农说得慷慨激昂,他们把大会上四分之三的人都说动摇了。然后非常典型的是,在这个富农之后,中农又把调子调整过来了,发言说:“是的,我们农民的处境困难,但是用不着让富农来搞得惊慌失措,还可以再等等雨水,那就会有收成的。我们需要的是让苏维埃政权善于收购粮食,让它解释清楚,它为什么会缺粮。”这是一个典型的集会,表明了农民中的各个不同的集团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在乌克兰,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当我们从莫斯科得到了指标,我们的书记们以及经济管理人员不知道怎样完成这些指标的时候,不只是一个坐在这里的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在挠头,在想着该怎样完成这个任务。而我们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叫喊,鬼知道有多少反革命的支部在乌克兰已经登了记,现在还会有更多的。需要请求莫斯科,让它把指标减下来,因为这样的指标是不可能完成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商业人民委员部要想完成工作就需要非常谨慎,非常关注才行的,这里需要的是大得多的灵活性和巧妙的做法,应该说,同志们,这一切

并没有表现出来;如果说从四月全会开始执行的是在粮食收购中施加压力的路线的话,那么从现在这次六月全会开始的,就是有些松绑的路线了——我们又是一会儿摆向一面,一会儿又摆向另一个方面。所以商业人民委员部在这里应该制定出一个指示来,不让摇摆的情况再出现。然后需要更好地平衡每个地区的商品量,及时完成那些非常有缺陷的计划,而且一定要做到不要来回来去地改动指标。商业人民委员部在我国的政策中具有了如此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定要用在过去经历过我们这里的大量粮食收购的实践的优秀工作人员来充实它。然后,我的感觉是,同志们,对反对派中那些现在承认了联共(布)十五大决议正确的同志,更多的是需要对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对优秀的经济学家,重新进行审议,让他们参加到领导工作中来。

喊声:谁,谁——不清楚。(喧哗声,交谈声,大厅里有骚动)

彼得罗夫斯基:例如,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他们是很好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不能放在国家计委和另外的工作岗位上呢?(大厅里有喧哗声,交谈声)

你们知道,列宁同志是非常珍惜人才的,我们仍然处于困难的境地:沙赫特事件<sup>149</sup>,还有工业和新的建设中遇到的困难,都要求把所有有能力的力量集合起来,完成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说到提纲本身以及动摇的成分是如何通过提纲反映出来的,一眼可以看到的是,农民成了一切的基础,包括出口,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城市的生存,以及世上所有的一切。我感觉,不能做出这样的评断;我想,在我国,在生产上起首要作用的,总还是无产阶级,如果是把这一切一下子都放在农民身上,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了:富农读到了之后就会对贫农和中农说,你们看看,对你们是怎么说的,可是给你们的是什么呢;而立宪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就会发动反革命了。这一点是需要重新加工。

布哈林:在工业城市里,粮食不会是长在机器上的。

彼得罗夫斯基:但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你知道,在车床上工作的工人的生产率是农村里的农民的生产率的2—3—4倍。这是起码的常识。或者拿德国来说吧,那里27%的农民养活着这个国家。

李可夫:是的。

彼得罗夫斯基:有人说一切都取决于农民。你们自己看看你们是怎样写到这一点的。

李可夫:那你读读。

**彼得罗夫斯基:**你们看看是怎样的矛盾:“同时农业还依然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它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发展速度”。

第二点:“由于农村,特别是它的富裕阶层收入的提高引起了农民有支付能力需求和提供的工业品相比的迅速增长,破坏了市场关系,破坏了市场平衡”。

结果是好像有着低水平生产率的农民……

**加里宁:**就是这样的。

**彼得罗夫斯基:**而且它是落后于工业的,而这里得出的是,农民的资金增多了,支付能力增加了,同志们,这里在我们的决议里是首尾接不上头的。

**斯大林:**有的人是接不上头的,是这样的。

**彼得罗夫斯基:**照我的看法是在决议里。(笑声)

**斯大林:**相反。

**彼得罗夫斯基:**不是,不是相反。我的感觉是,决议需要重新修改,因为它在说到好像所有的一切都在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的时候,首先是给了反对派一个口实,第二是在决议里赋予了农民太大的作用了。

**有人喊:**你是把这一点也算在反对派身上了吗?

**彼得罗夫斯基:**这不是反对派,这是我们现在在摇摆,因为当我们对工业也采取了集体化方针,然后在农业里开始了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出现了怨言,说我们忘记了个体农民经济,而现在它被以非同寻常的大规模突出出来了。

**斯大林:**彼得罗夫斯基同志,那里说的不是“农民经济”,而是“农业经济”。这不是一回事。这里还包括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彼得罗夫斯基:**是的,是农业经济。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需要这样来重新调整提纲,让它们不要制造矛盾,这些矛盾是需要排除掉的,那里一方面指出的是农业发展速度低,而另一方面它又出现了工业没有能力满足的支付能力。

**主席:**茹柯夫同志发言,下一个是卡冈诺维奇同志。

**喊声:**茹柯夫不在。

**主席:**那就请卡冈诺维奇同志发言,下一个发言的是克维林。

**卡冈诺维奇:**我们由于粮食收购所经受的那些困难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就在承受着农村中很多阶层不满的严重压力,以及由于供应困难而在工人的某些阶层中存在的严重压力。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应该以最大的平静心态来对待,分析这些困难和制定相应的措施。我们大家,尤其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应该考虑事实是怎样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是简单地把工人和农民情绪中的



个别事实拍照下来。我们应该消化所有这些事实,对它们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只是在这之后,才得出相应的结论来。就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认为,在这里向我们提出的那个决议是特别有价值的,它从粮食收购的经济困难的事实中得出了一般性的结论,并且向党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有前景的方针。它提出了并且正在从原则上解决粮食问题,扩大商品粮的问题,而且是在按照阶级的方式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它是把发展个体的农民经济和发展农业的社会主义形式——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结合起来的。这就是这个决议的重心所在。

要知道,我要说的是,在粮食收购的那些困难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不仅是我们犯过的错误——税收方面的,商品供应上的错误,也不仅是我们的商品粮不够,而且甚至还有这些商品粮的很大一部分,不是最大,而是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富农手里的。在乌克兰,我们在12月前收购到了我们的计划中的55%的粮食,实际上可以用什么来解释这个事实呢?这些粮食我们是自发地在收购的,相对是轻松的,而在12月,当我们着手收购剩下的那45%的时候,我们碰上了种种非常残酷的抵抗。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感觉是,我们在12月之前收购的那55%,主要是从中农和出售粮食的那部分贫农的储备里收购的。他们是自发地在出售,是自愿运粮来的。中农当然不是把所有粮食都卖了,但是把自己的商品粮中的相当一部分卖了。而当我们刚刚接触到富农的储备时,我们就遇到了困难。富农实质上是宣布粮食罢工,并且开始向我们进攻了。我不是说所有这45%的粮食都是在富农手里,但是至少到运动结束的时候,富农是剩下的商品粮的主要持有者和积压中农剩下的粮食的组织者。这就是决定性的问题。我们不得不采用的非常措施是苏维埃政府对进攻的富农的防御。那些现在扮演“客观”人士角色、指责党所采用的非常措施的同志常常不明白这一点。

当然,我们有过错误,有过过火行为。譬如,我们自己在乌共(布)中央全会上就对这些错误和歪曲做出了尖锐的评价,我们承认将来必须要从根本上避免采用非常措施,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坚决反对和我们犯过的那些错误一起,抹杀我们由于粮食收购运动的结果得到了那些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把全党都动员起来了。我们经受住了非常严肃的考验。党表现出自己是有战斗力的,现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能忘记这一点。在12月之后,我们经历了粮食收购运动的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我们动员了所有力量,施加了压力的时期,那时在贫农中间有过某些不理解,甚至有过慌乱,那是由于不清楚我们施加压力的原因引起的,当时在农村里,甚至我们的干部和机构都有些惊慌

失措了。第二个时期是贫农情绪高涨的时期。这是事实。要知道,当四月全会写到我们看到的是贫农的高涨时,它说的是实情。那些在农村的人可以用几十个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得到的是贫农真正的高涨,阶级的高涨,贫农活跃起来了,组织起来了。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乌克兰贫苦村民委员会表现得好像有些不知所措,但是在2、3月的时候我们有的是有组织的、支持我们措施的群众。否则的话,怎么能解释我们在乌克兰用3个月——1月、2月和3月——就收购了大约9000万普特粮食呢。要知道,光是靠我们派到地方上去的全权代表,是不可能收购到这么多粮食的。我们是在贫农支持和中农不抵抗的情况下收购到了粮食的。在这个时期,中农把自己还在储备的商品粮交出来了。

最后,粮食收购运动的第三个时期的特点是,粮食收购已经涉及了中农的保险储备。在这一点上还应该加上一个情况,那就是和过冬作物的死亡已经可能会导致歉收有关。例如在我们乌克兰,如果不是过冬作物的死亡,未必会有这样严重的困难。而且我们是相对轻松地进行完了粮食收购运动的。

非常措施使得我们轻松地摆脱了在12月份陷入的危机,这些措施也涉及了中农。在我们采用的这些非常措施里,当然有许多消极的方面。不能把它们变成一种制度,而且还需要和那种想要把这些歪曲合法化的思想作坚决斗争。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地方上的工作人员的处境是很艰辛的。要知道,要进行的不仅是粮食收购,而且还有捐献,然后,——还要以相当紧张的速度来进行。

例如,这里说到了集市。我们总是在发出指令:无论如何不能把集市关闭了;我们在集市上进行搜查的现象进行了斗争,但是要知道,价格在不断攀升。譬如在我们乌克兰有许多小城市,小地方,那里的内部市场是相当大的。各个市场上的价格在不断攀升,应该用相应的办法和这种价格的攀升作斗争。很清楚,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把私人投机商抓起来,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因为他们在妨碍我们,不让我们展开粮食收购运动。当然,这里也表现出了许多做得过分的地方。不能把这些措施合法化。但是在一些地方关闭了集市不是由于地方工作人员存心不良,而是因为必须要和投机分子作斗争。在这里,我想说以下的话,虽然可能会和一些发言人的调子不一样,会有人反对。我应该说的是,现在我们听到了根本谴责采用非常措施和过分严厉地批评这些月里进行的工作的调子,不过是已经有些悔恨的调子了。

喊声:对。

卡冈诺维奇:我想,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谴责那些有过的歪曲,我们应该是在将来不再起用这样的非常措施,但是我们不应该屈从于对全党做过的这项工

作进行谴责的那种调子。

臧声:对。

卡冈诺维奇:有一些同志不正确地想要把非常措施变成一种制度,但是另外有些人是陷入了不能允许的极端做法,在这样议论着:“打倒施加影响的行政措施,粮食市场上的纯经济的影响措施万岁”。粮食贸易中的纯经济影响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如果市场上的价格提高了,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停止2—3个星期的粮食收购,看看商人们的忍耐力,看看卖粮食的人的忍耐力。我们应该用相应的方式从经济上和私营者和投机分子的价格搞竞争。如果私营者付一个卢布,我们就付1.10个卢布,私营者付1.50卢布,我们就付1.60卢布,等等。我们不能这样做。譬如,今天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就是开始时很乐观,最后变得灰溜溜的了。

柯秀尔:开始是很虔诚的。

卡冈诺维奇:既然他重复的是一些起码的真理,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结束的时候他说,期限已经结束了——让我们来确定城乡之间“自由的”经济关系吧,并具体地建议对价格采用这种做法。如果说奥新斯基在这里说的是农业指数相当139,工业指数相当220的话,那么索柯里尼柯夫的想法可以归结为:给出等价了,给出可比的价格来。现在从经济上说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无论如何是不能这样做的;这样将是对我们的工业极其严重的打击。我非常尊重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但是我不能不说,这是小资产阶级向工业化、向我们的工业进攻的反映。这就是说,如果走上彻底放开的纯经济竞赛的道路,也就是走向随意的市场的话,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

价值规律虽然也还在我们的经济中起作用,但是远不是那样自由,就像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一样。我们是在用我们的计划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政策逐渐地限制它的作用。价格在我们这里也不是随意的、市场自发性的游戏的产物。要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服务的,不仅是经济的各个制高点,而且在极端需要的时候也要有政策行政措施,甚至有107条。

我认为,在苏维埃国家的条件下,总的提出政策和行政化与“纯”经济的对立是完全不正确的。而且苏维埃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经济是属于私人资本家的,但是国家作为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管家,对资产阶级经济并没有调节的职能,更没有直接行政干预的职能。在我们这里,工业金融经营是直接属于苏维埃国家的,它在允许有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应该调节和指导私人经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里的经济权利是和政治权

利交织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在我们这里,“经营主体”是直接作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的。

行政化应该按照列宁主义的方式去理解,不能滑到把行政职能纯粹理解成是警察职能上去。我们的行政化是一种政治的职能,是服从于政治的。国家机构的所有职能都是用于为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服务的,这就是为什么不能陷入极端,不能否定在经济中采用(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行政政策的影响。我当然不是把行政化理想化,我不想说我们应该用行政措施左右开弓,忽视经济的规律,市场的规律,而且当然应该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和特别是在对待农民经济上,也要否定这种经济上过度行政化的极端做法。

我们现在不得不进行的这种施加压力的做法对农村的政治状态有着严重的影响。在我们那里不久前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有人详细地报告了这一点,但是我应该说的是,有些同志有些夸大了,也有过这样的发言,就像斯捷茨基同志在这里的发言一样。当然,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农被惊动了,但不是所有的,不能把所有的中农群体看成是一样的。应该看看各种不同的地区。譬如在我们乌克兰,就在有的地区表现出了中农不同的情绪,不需要闭眼不见,也不需要抹杀什么:相当一部分中农现在的情绪是和我们对立的,他们有可能会倒向富农的情绪。

但是有没有和中农基本群众的分离呢?这是应该提出的问题。在农村里,中农的热度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他们准备要和富农一起冒险反对苏维埃政权呢?问题是应该这样提出来的。但是首先我想说的是,有些同志准备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以前中农是这样的理想,这样的美好,完全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所有措施都拍手称快的,而现在是强烈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这样想是不正确的。

中农作为一个我们与之实现着同盟的、动摇的群体,一直都是有着一定程度的不满的,因为联盟就意味着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有着一定的矛盾,而且这些矛盾我们是要在建设的过程中克服的。我去年到乌克兰的各大区走了一遭——我走遍了10个大区,在边境地区呆了整整一个月,——当我在农村把农民召集起来并和他们交谈的时候,那些小富农们就说,你们的商品价格是这样的,而粮食的价格又是怎样的呢,你们是在剥夺我们,这时中农是同情他们的。中农常有不满,但是火气并不高,是温火。现在我们应该确定的是温度已经提高了。情绪当然是有了很大的恶化,但是可以完全负责地说,我们在中农那里并没有看到已经把他们推向和富农一起冒险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地步,更何况现在收成的年景是不错的。中农现在不会和富农一起去冒险,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么大的程度上

触犯到他们的社会阶级利益,以至他们要走上这一步。中农和我们的联盟要比他们的某些阶层一时倒向富农方面更强烈些。

我可以就乌克兰的情况举出一些数据来,这是我们的中央统计局提供的,它们表明了农村中的个别社会阶层联系到春季播种运动的粮食收购,对我们党的政策是怎样反应的。我指的是关于播种多少的数据,恰好是对我们的政策最有说服力的总结。我们有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农村的反应是,春季作物的播种面积加上死去的过冬作物的补种面积,比去年的春播面积增加了29%,而总的播种面积虽然有450万俄亩死去了,总共减少了3%。我感觉这是农村对我们的态度最鲜明的表示了,这中间也包括了中农的态度。

对这一点还应该加上一些有关按照各种类型的经营单位的播种面积划分的、很有意思的数据(这些数据是中央统计局抽样调查得到的,是大约的数据)。在乌克兰,没有牲畜的这一类农户总的播种面积增加了6.9%,如果看春季播种这一块,那它在这一类里占的是41.4%;第二类农户是有一头牲畜的农户,总面积的增长是2.2%,而在有两头牲畜这一类里,总的播种面积减少了2.9%,最后是有三头和更多牲畜的这一类——播种面积减少了11.9%。从引证的数据可以看出,比较富裕的这部分农民减少了11.9%的播种面积。相反的是贫农增加了自己的播种面积。大部分中农的播种面积几乎是平稳的。我感觉,我们从乌克兰的例子可以完全有权利得出结论说,农民基本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没有被破坏掉,中农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也没有被破坏掉。

这就是为什么不应该有关于和中农分离的恐慌和议论了。困难是很大的,但是不应该把它们夸大了。按照斯捷茨基的说法,这些困难中有我们的过错,如果不采取非常措施就不会有这样的困难了。这样提出问题是可笑的。结果是,好像中央在一个早晨心情不好或者很好地醒了过来,就决定了要拧紧和松开螺丝。危机是很严重的,我们曾面临着有严酷的经济危机的危险。而我们正是由于有党的努力才摆脱了困难。我们现在有的困难要比12月如果不施加压力可能出现的困难少了。而斯捷茨基同志站了出来,在和中农的关系上教训起来,就好像有人在什么时候忘记了中农的意义一样。他引用了列宁的语录并想用它证明有谁忘记了关于中农的这个真理。请允许我说一下,抽出列宁的一个语录但同时不取列宁对贫农和富农所说的话,——这不是按照列宁的方式行事的。你们是怎样想不联系到和富农斗争的问题和关于依靠贫农的问题来推行和中农的联盟呢?我应该说,斯捷茨基同志的讲话对我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印象。斯捷茨基同志对富农和对农村的阶级斗争几乎是什么也没有说。

斯捷茨基：您读读电报。

卡冈诺维奇：而这个决定性的问题总还是留在了我们这里，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在和我们这里有过的歪曲、胡作非为作斗争的时候，我们现在应该非常尖锐地提出和富农斗争的问题，进一步组织贫农的问题，农村中联合的政治力量的问题。富农现在正在准备着和我们进行一场在未来的粮食收购运动中的斗争，谁要是谴责过去有过的歪曲、谴责胡作非为的情况，但是不尖锐地提出和富农斗争的问题的话，照我的看法，那就是犯下了非常重大的、孕育着各种重大后果的政治错误。

关于未来的粮食收购运动，我想，我们不应该过分地乐观。我应该直截了当地、坦白地说到这一点，可能有人会责怪我，但是我应该说的是：有些同志有了这样的印象，我们将通过决议，禁止所有的歪曲，开始粮食收购运动，一切都会是顺当的，很好的，等等。这样的乐观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不能把全党动员起来。我们应该先对歪曲进行坚决的斗争，取消非常措施。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应该对党说，富农现在已经磨刀霍霍地反对我们了。

我应该说的是，在粮食收购运动的第三个时期，在过冬作物死亡了，我们触动到了中农的保险储备的时候，富农从我们这里夺走了我们在第二个时期赢得的政治资本中的一部分。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触动了中农，他们的情绪变坏了。现在有一部分贫农挨饿，一部分贫农受到原来的工头、警察挑唆，在那些地区，富农是所有麻烦事的挑头人，需要直截了当说的是，富农现在是他们的首领。在未来的粮食收购运动中，我们将会碰到富农极其残酷的抵抗。现在当我们从乌克兰出来的时候，从地方上来的一些中央委员报告说，由于收成的年景不错，中农的情绪提起来了，坏情绪的曲线在农村正在下降。虽然在城市里现在由于我们拖延了供应，曲线是在上升的，工人的情绪暂时是在恶化。我想，如果我们在粮食收购中有一些喘息的话，中农将会把粮食运给我们的，在价格出现某些提高和商品的运入有所增加的话，就更会是这样了。中农对我们把价格提高15—20戈比的反应是很好的。但是不能想象和理想化地认为，富农将会鼓掌和起劲地把粮食运来。我们提高了20戈比，他们就会说：增加50戈比，你要是给他们增加50戈比，他们又会说：增加1个卢布吧。富农和我们的斗争是残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应该对这种情况有所准备。

照我的看法，我们现在应该不仅是局限在我们将在这里通过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决议上。我们应该现在也在经济领域里，在相应地区的商品品种方面，以及总的来说在粮食收购运动的组织方面，制订出一系列的实际措施来。譬如，就

拿粮食收购运动的期限这个问题来说吧。它应该继续多长时间呢?粮食收购运动好像是可以尽可能地缩短,粮食收购的期限可以压缩。需要这样来安排,让我们在12月、1月能够接近于结束对基本粮食的收购。

**斯大林:**这不仅取决于我们,有些事情要取决于农民。

**卡冈诺维奇:**完全正确。很多事情是取决于农民的,但是也有许多事情是取决于我们的。虽然是放任自流的,我们到12月的时候已经收购了55%的粮食。如果我们事先就采取相应的措施,那我们是能够在2月、3月结束这场运动的,而4、5、6月我们就可以剩下来做些扫尾工作了。为了使得我们能够顺利地把粮食收购运动进行完,我们应该通过这里作为我们的工作路线提出来的决议,不要采取非常措施;但是我们应该同时委托中央政治局现在就着手实际研究,更深入地研究所有和粮食收购运动有关的实际问题。要知道,我们是把我们优秀的同志派去搞粮食收购了,把他们从工作中抽了出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里,在莫斯科,把一些政治局委员的同志们解脱出来,用两个星期的时间,不仅由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机构来研究呢——我说这些不是因为我要表示对商业人民委员部的不信任……优秀的力量应该吸收过来,详细地研究问题,让地方上对如何进行粮食收购运动能有实际的指示。

**主席:**克维林同志发言,下一个是梅德韦杰夫同志。

**克维林:**米高扬同志说到了国家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我们的讨论几乎完全集中在了粮食收购问题上,因为正是这个问题现在是我们国家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又一再地面临着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

奥新斯基同志使用了“分离”这个名言警句。就像奥新斯基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他在这里是在咬文嚼字,做概念文章,说得过头了。但是,当我们分析国家形势、和各种类型的农民的相互关系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说,局势是相当严重的,而且一系列同志在这里也是在相当程度上强调了这一点。安德烈耶夫同志对这一点的表述非常好,他说,正像现在完全搞明白的,富农现在比前几年对我们更加敌视了,中农在很大程度上感到了不安,正在等待。但是我想,同志们,对这种表述应该补充,而且卡冈诺维奇同志也部分谈到了这一点。难道不清楚吗,在粮食收购运动的最近几个月里,当我们不仅不得不取消对农村地区,甚至对部分城市地区的供应的时候,当我们这里发现了在对广大群众的供应中,首先是对贫农的供应中,有一定的失算的时候,——难道还不清楚吗,这个事实应该会使很大一部分贫农,那些和我们一起与富农斗争的贫农,感到很大的不安。现

在我们不能给他们饭吃了,因为没有这样的粮食储备了。乌格拉诺夫指出了在工人中间相当广泛传播的那些情绪,难道这不对吗?难道在工人中间没有不安的情况吗?难道在工人中间我们没有遇到戒备的情况吗?如果说相当多的工人和农村贫农的这种不安和这种戒备的态度与中农的戒备态度是一回事,那是完全不对的。这并不是一回事。这里有着另外的细微色彩。这是那些坚定地维护苏维埃政权的那一类人的戒备态度,他们看到了我们处境艰难,在寻找出路和等待着党发话,等待着发话和行动。我们的全会决定的重大意义就在于首先是对工人和农村贫农的这些阶层说出最近的前景,说出我们对农民的经济政策。

我想,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做出了这样的回答。它为政府和党的工作指出了这样的方向,可以保障我们避免和中农关系的进一步尖锐化,避免进一步的紧张和可以保障多少没有危机的发展和满足基本消费群体的需求。但是正是因为全会的决定涉及的是一系列最重要的和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不能不在这里谈到这些问题,为的是不仅有对这些决定统一的表述,而且有对它们统一的解释,统一的理解,因为全会的决议如何贯彻,全党怎样动员起来推行它,我们的整个苏维埃机构在自己日常工作的实践中将怎样推行这些决定,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肯定的是,我们一直会有一系列问题还不完全清楚,是需要完全把它们搞清楚的。

**莫洛托夫:**谁没有完全搞清楚?

**克维林:**许多同志是这样的。

**莫洛托夫:**现在明白了。

**克维林:**关于个体经济问题的解释是各种各样的,难道这不是大家知道的吗?我说的正是最后一个时期,我说的正是党现在应该怎样确定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在一次工人的会议上,有几个工人怪罪我说,我对未来说了许多,也就是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说了许多,而对农民的经营说得少。可见十五大关于大农业的决定和政治局最近关于新的国营农场的决定<sup>150</sup>是不够清楚的。我曾想要试图想象一下,在5年之后(也许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根本不得不在五年计划的范围内考虑),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个体经济在我国的粮食供应方面将是怎样一种具体的对应关系。这样可以使我们对上述经济类型的作用有一个数字概念了。

我们从斯大林的文章<sup>151</sup>知道,现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总共提供6%的商品粮。5年以后这些类型的单位能提供多少呢?如果我们把新国营农场的规划



拿来,我认为,和这个规划一起的,我们应该还有一个老的国营农场的规划,但是关于这一点是需要加里宁同志的报告里说到的,因为现在得到的是这样一种对国营农场的片面的态度,就好像我们需要发展的只是新的国营农场似的。

丘巴尔:这是说在国家计委吗?

克维林:不是这么回事,国家计委有着另一种倾向。而且根据我们的计算,老的国营农场在实现了相应的机械化的情况下,到五年计划末可以提供大约5 000万普特商品粮。这样,在最紧张工作的条件下,如果认为新的国营农场可以提供大约1亿普特的话,那么国营农场老的和新的加在一起,总共就将能提供大约1.5亿普特左右的商品粮。集体农庄在5年之后能提供多少呢?我想,如果从现在集体农庄大约提供5 000万普特的情况出发,在全力以赴的情况下,所有的集体农庄能提供的也不会多于1.5亿普特的商品粮。这样我们将是从这些经济成分得到3亿普特的商品粮。而在5年之后我们需要多少商品粮呢?我想至少是10亿。

丘巴尔:也许那个时候我们能够学会少吃一些?

克维林:我想那个时候我们是不会少吃的。至少应该注意到,我们的人口增长是相当快的。所以我们对粮食的需求就是在不考虑大大发展出口的情况下,也应该是确定为到五年计划的末尾时不少于10亿普特。如果还指望出口有某些提高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有的就是12亿—13亿普特的商品粮。我要再说一遍,在最好的情况下,如果是全力以赴的话,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能够给我们提供的,大约是我们所需要的商品粮的30%左右。这也就是说,有70%—75%的商品粮,我们是应该从个体经营户那里得到。我想,这个材料能够让我们想象到,在我国经济中正在确定的是怎样的对应关系了,从而也就能够让我们想象出我们应该推行的政策了。我再重复一遍,政治局的决议相当好地强调了这一点。必须要全力以赴地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但是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个体农户也将是农业的主要基础。

现在我来谈谈粮食收购。我们有着巨大的困难。这里已经从各个方面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只是谈谈其中的某些部分。这里已经指出,我们作为依据的谷类饲料平衡表有些夸大了。还指出了现在正在重新审议所谓的“隐形”粮食储藏,这是农民那里有的,到1927—1928年度统计有7亿普特。一句话,谷类饲料平衡表上的失算可以归结为实际上农民群众的粮食比我们期待的要少。这是我们存在的那些困难最重要的前提之一。然后是第二点——大的粮食收购计划。如果要在这里说到谁有罪过,应该说,在这方面——在谷类饲料平衡问题上和在

粮食收购的大计划上——国家计委要负完全责任。其中从提出来的谷类饲料平衡表出发,我曾在政治局上竭尽全力地维护了7.40亿普特的粮食收购计划。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是一个错误。但是导致这个错误的是,我们依据了粮食收购的大计划,比我们所能达到的大得多的规模里进行了粮食的收购。在粮食收购计划上,我们得到的是以下情况,我们大体上没有完成的粮食收购计划部分是1亿普特。但是我们大体上减少了1亿普特的出口计划。这样,对于供应国家来说,我们剩下的正是我们的计划上规定的粮食数量,是我们按照粮食供应计划想要有的那么多。那么到底怎么会是我们处于了如此严重的状况,粮食不够了呢?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在扩大广泛的粮食收购计划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求教于那些触及到储存的非经济措施,在正常的条件下,在另外的条件下,这些储存应该是供所谓的农民内部周转使用的。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而这个农民内部周转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数量。当然,和所有其他的计划相比,统计在这里撒的谎要大得多,但是根据计算得出的是,这个农民内部周转的数量,除去加工和所有其他的方面,每年是6亿普特。而如果加上加工,那么农民内部的周转大约是每年9亿普特。所以,既然我们把进行这种农民内部周转的集市破坏了,既然我们压缩了计划外的合作社的收购,还有最后一点是,既然我们几乎把私营者完全从粮食收购中排挤出去了,我们同时也就自己要把正常的农民内部的周转所提供的那部分的责任,甚至是对小城市供应的责任,承担起来了。而这是我们没有能力做到的。同志们,清楚的是,如果说我们靠这种农民内部的周转,作为国家的粮食收购得到的只是1亿普特的话,那么,我们因此得到的要吃粮食的人,就要比1亿多得多了。由此而来的便是差距,便是计划上的不衔接和很大的困难。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采取的那些非经济的措施如果再重复的话,将会非常危险了。当我们说到农民内部周转的时候,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究竟是什么。这里有一位同志,好像是哈塔耶维奇同志,想要这样来表述这件事,说是农民内部的周转是一种像我们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时期采用过的、地方商品周转的东西,也就是说,是铁路运输之外的商品周转。不是这样的,同志们。这种地方的商品周转是不能满足局势的要求的。6亿普特的粮食——这是又一个国家粮食收购计划了,而要知道的是,需要说的不仅是粮食,而是所有的其他农业产品。为了把这样大量的东西处置好,需要有一个庞大的贸易机构。这是一项很大的任务,而且商业人民委员部要摆脱从今年工作实践中自然产生的那种机构的惯性。

米高扬:那是运输上的调节,和机构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我和人民委员会的事。你干什么要扯到机构上去呢?

克维林:我要说到机构是因为,在人民委员会或者劳动国防委员会里,由商业人民委员部提出了要变动已经规定的计划外的和私人的运价。那里是这样说的:“既然现行的经济调节形式对于计划外的收购单位要起到一定的禁止性税率作用,所以,按照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意见,在两种运价表的体系里,私人货物运价表应该具有禁运运价表的形式,而且对于私营者和对于国家的、合作社的计划外的收购单位都要如此”。

这意味着对于所有计划外的收购单位,商业人民委员部设计了铁路的禁运运价表。

丘巴尔:它是想要让全苏粮食公司的消费者受尽折磨吗?

克维林:这个草案是由欣楚克同志签发的,现在放在劳动国防委员会,而且米高扬同志并没有把它拿回去,所以我说,有老做法的惯性,而且应该放弃这种做法,应该找到其他调节经济的办法。

主席:梅德韦杰夫同志发言,下一个是什维尔尼克同志。

梅德韦杰夫:我不涉及工业问题了,因为这个问题在这里已经显得很突出了,而我涉及的是一个基本问题——关于粮食收购的问题。当然,来自政治局的那些建议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能是把同志们所指出的更细节化一些,但是我想请你们注意的是,在我们这里不只一次通过了很好的、原则上是经得住考验的决议,但是在开始推行的时候,它们就被放弃了,搁置在一边了。这才是我们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所有的主要缺点——不是总能完成我们的提纲和决议里规定的东西。

李可夫:好的决议很少能飞起来,而坏的却更经常是到处飞。

梅德韦杰夫:是的,好的决议很少能飞起来,而坏的却更经常是到处飞,但是就是好的决议在实际贯彻中也并不总是能像样地得到贯彻,这该怎样解释呢?需要这样来解释,那就是我们这里最多采用的是突击式的工作方式,要摇晃一下,要推动一下,要施加影响,要给压力,要推行一系列措施,然后才能够采用一般性的和冷静的秩序走下去。如果拿去年的收购来说的话,我就只说说乌克兰的收购情况,那你们就可以看看是怎样逐渐演进的。譬如说我们在7月份收购了600万,8月份——3500万,9月份——4700万,10月份——2900万,11月份——1700万,12月份——1400万,到了最低点,1月份——2800万,2月份——4000万,3月份——2300万,等等。当然这里应该考虑到10月份局势的全部复杂性。10月份我们有了我们尊重的反对派的游行,这在我们的工作上有反映。中央的党组织和所有的党组织在所有的作品中,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我

们党内的思想斗争上。但是要问的是,在这个时刻,当我们在一个战线上进行了打击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降低粮食收购的速度呢?而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是把力量投到了党内的思想斗争上去了。至于粮食收购领域里的总的实际工作,我们就没有注意到了,在12月的时候,把规模降低到了最低点,只是在党的十五大之后才开足了马力。每一个组织都是在凭着良心工作的。反常的情况就是由此而来的,既然没有把问题提出来讨论,那当然得到的就是反常了,而且越是进一步地加大压力,反常的情况就越严重。所以,今后我们的基本任务,不仅是在粮食收购上,而且是在我们的整个工作中,我们都需要系统化地安排我们的基本工作,要避免跳来跳去。

接下来,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确定中农对工人阶级的态度?至于富农,那是不用说的了。既然我们有了对他们的一定的态度,就不用再重复了。我是想自己对如何看待中农给出一个定论。当我们的确是走家串户地查看粮食垛的时候,这种时刻给中农带来的是最沉重的情绪。他们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既然是一个个地在查看垛子,我们是不是要放弃自由买卖了——从城里一下来就一个个地看垛子。中农警觉起来了,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冒火了,于是一部分中农就跟着富农走了,富农利用了我们的困难,正在努力要让中农反对我们呢。在乌克兰是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这里有400万俄亩的冬小麦死了,于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么挨饿,要么就是另外的什么。当然,中央和苏维埃机关的确是竭尽全力地提出了最大限度地提供种子上的帮助的问题,我们几乎是对死去的面积完全做了复种。如果说我们在乌克兰是抛出了1100万普特的种子,那么我们是用这样的做法振奋了贫农和中农的情绪。不幸的是我们消耗的种子太多了。我还是要说到乌克兰。我们是怎样消耗了粮食的呢?去年我们吃掉了4800万普特的粮食,而今年,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和所有其他的听众们,我们吃掉了6300万普特的粮食。

喊声:呀!

梅德韦杰夫:当然,第一眼看上去是吃得太多了。为什么吃掉了呢?我们自己把对工人、农民、市民以及随便什么人的供应都垄断起来了。

李可夫:说得对。

梅德韦杰夫:我们是自己担起了力所不能及的义务:为向所有人供应粮食负责。

李可夫:怎么能不是这样呢?

梅德韦杰夫:不是这样?——应该想一想。我甚至是有斗胆包天地在这

里说,可能有人会敲打我,说我有什么倾向,但是我认为,我们是搞起了粮食收购的垄断,搞起了对所有人口供应的垄断。

**李可夫:**结果是这样的。

**梅德韦杰夫:**我们应付不了这个任务。当然,对大的私营者是需要斗争的,但是,需要搞的是准备合作化,让它能在地方上供应一部分居民和收购粮食。就在这同时,国家的收购单位需要做的是承担起真正的义务了——尽可能地供应工人区,供应城市,而由此应该加强的是让合作社更多地供应地方上的居民,在必要的地方要允许小的收购者存在,严格地给他规定限度,不要破坏了已经规定的国家价格。我说的是小的收购者。我认为,一定的局势迫使了我们要走上这一步。关于这些收购,关于这些供应中的不正常情况,我可以引用在乌克兰看到的典型情况。在我们乌克兰,对缺粮不满的富农和中农都是跑到地头上去,而活跃起来的是妇女们,她们排出了阻拦的队伍,不放收购人员过去,大吵大闹,等等。我认为,当妇女走到台上来,成为了组织居民的力量,这种现象是危险的。

**斯克雷普尼克:**并不是到处都这样,只是在闹饥荒的地区。

**梅德韦杰夫:**我不是说到处,我说的只是在乌克兰的某些地区。如果到处都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是十分危险的。但是这样的征兆是有的,居民的这种倾向是有的。所以今后应该这样提出问题来:从收购年份一开始就应该是有计划地安排工作,对合作社施加压力。当然,还需要推行决议里考虑到的其他一系列措施。但是我只是认为,现在对待这个问题不能是随着农产品价格的提高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有一些同志,其中包括克利缅科同志,举出了这样的对应关系,说是在我们这里现在农业税增加了1亿,由此而来的是能够积存下来的富裕种子就少了。需要考虑的是,今年虽然有些人也送到了收成会降低,但是产量是提高了的,而且农民的余粮将会更多了,和我们的工业的比例失调是有的,所以我们将难以把农民那里将积累起来的过剩的资金抽出来,由此而来的便是我们的粮食收购将会遇到困难。需要准确地计算出来农民会有怎样的剩余,的确可以采用什么样的措施把它们抽出来,在那个时候就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了:农产品的价格应该提高多大的百分比,至于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就不用说了。

接下来我想再提出一个问题。我现在要提出的是关于供应工人的必要性问题。我们没有提出发展蔬菜作物的问题,米高扬同志,而这是比其他东西更需要的。我们需要提出这个问题来,以便能够经常地向工人供应,因为否则我们就会有很大的断档和实际工资的损失。

既然时间就要到了,我就再说一个问题。现在提出了国家在播种上帮助农民的问题,我的感觉是,这个问题应该提得具体。我们的确代表的是一种社会保障,总是在帮助农民。应该是这样来提出问题,要让农民能够一年一年地自己在农村积累剩余,让农民按照老规矩开始建设粮垛。这个问题是需要非常严肃地提出来的,需要让农民为不好过的日子做好准备,也就是按照老规矩建起粮垛来。或者说可能是像捐献一样。可能在法令里需要指出,捐献的一部分是来自钱,一部分是来自种子。这将在是在艰难的时刻可以使用的储备,这种艰难的时刻今后还有可能出现。我认为必须要提出这个问题来,还要想想城市居民的捐献。我在结束的时候应该说的是,我们是通过困难在学习的,我想,最近在我们这里搞清楚的那样考虑不周的情况,在将来是不会再有的。

主席:什维尔尼克同志发言,下一个是埃赫同志。

有一个字条建议晚间的会议不休息了,结束的时间不是在10点,而是改在9点。谁同意这个建议?谁反对?少数。

什维尔尼克同志发言。

什维尔尼克:请允许我谈谈在四月全会之后我们乌拉尔那里的粮食收购的经验。我应该说,在四月全会之后,粮食收购方面的工作条件要比1月和2月时严峻得多了。

喊声:这是对的。

什维尔尼克:这主要还是因为粮食在中农农户那里剩下的不多,而且我认为,这也是难以把粮食收上来的原因。是的,富裕农民那里有粮食,如果是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更积极的反抗的话,我们对这一类人的态度将会有些不同,那么,这类人在四月全会之后的收购中就不会起决定作用了。四月全会之后,我们该是准备播种运动了,这种情况对5月的粮食收购过程有着很大的影响,我们该是动员党的机构推行扩大春播面积,所以粮食收购中的重心转移到了各类粮食收购组织的身上了。我们对它们的工作给予了协助并让它们对完成粮食收购计划负起责任来。我们不得不在5月从农村召回自己的全权代表,因为他们呆在农村决做不到促进创造条件,让粮食市场活跃起来。4月在农村里有全权代表,这就形成了一种局面,没有能让自由市场发展起来,所以我们应该是在5月把他们召回来。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我们看到粮食市场有些活跃了。农民开始向市场上抛售自己的粮食,但是这些粮食的价格过于高了。总的来说,我们5月的粮食收购收效甚微,而且这对向工人供应粮食造成了威胁。乌拉尔不同于其他的州,那里有着一种独特的结合关系:那里有工业,也有农业。我们不仅要靠这个

农业自己吃上饭,而且要把收购来的一部分粮食从乌拉尔运到其他地区去。农业和工业这样的结合状况为发展乌拉尔的工业创造了完全良好的条件。到6月1日时,我们有了总共可以保障乌拉尔月消费量三分之一的剩余粮食。这种状况迫使我们在5月底敲起了警钟。如果我们不是重新动员党的机构的话,那我相信,我们是会陷入非常严重的境地的。到这个时候,我们从中央委员会得到了通报说,乌克兰的过冬作物死掉了,北高加索的过冬作物情况就更不妙了。这样,我们就应该是不仅要在粮食收购中指望自己了,而且我们还应该既对乌克兰也对其他地区提供兄弟般的帮助,特别是向工人地区提供帮助。

6月在我们那里形成的局面大体上就是这样的;很清楚,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把党的力量动员起来加强粮食收购。

在动员党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当然主要注意的是粮食收购的方法,因为在四月全会之后,我们改编了自己的队伍,为的是不违反四月全会的决定。而且这不会不影响到党的机构和被动员起来搞粮食收购的同志们。所以,这里说到我们在党内有一种继续向往四月全会以前的路线的心理,这是不对的。这些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整个机构和党都改变了自己的队伍,只有个别的人曾试图用四月以前的那些方法来进行收购。我要重复的是,这样的人在我们那里是不多的,而且总的来说,党的机构和党员群众是用完全正确的方法在进行工作的。我们在粮食收购中基本上采用了什么样的办法呢?

我们是把在农民中制造社会舆论作为我们的粮食收购工作的基础,而且这是一个中心问题,我们是围绕着它来组织农村的社会情绪的。

在6月的时候是怎样着手进行粮食收购和加强粮食收购的呢?我们第一是召开贫农会议,在这些会议上讲述了我们国家在粮食上的艰苦状况,请贫农帮助我们加强粮食收购和在总的公民会议上支持我们。然后召开总的土地社<sup>152</sup>大会,在会上敞开地讲到我们的联盟遇到的困难。我应该说,在农村中这样提出问题是大有收获的。它第一引起了中农群众对帮助工人国家这件事的同情,并且使得中农群众积极地参加到粮食收购中来。由于农村的这种社会舆论的结果,我们造成了一种局面,使得我们做到了在6月收购332.8万普特,而5月收购的是30.9万。这300多万普特实际上挽救了局面。如果我们没有能收购到这300万普特,那我们当然也就不能指望正常地供应工人人口了,那样也就很清楚了,这会导致发生更大的威胁,导致破坏我们的工业。当然,同志们,我应该有些保留的是,在这项重大的事情中曾有过个别的过火行为。我强调的是有过个别的过火行为,但是我和这些过火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个别地区可以看到

的过火行为受到了极其严厉的回击,而且我们对这些行为迅速做出了反应。当我们开始开展农村工作的时候,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反映为粮食市场的压缩。我们看到,卖到市场上去的粮食开始减少了,因为中农积极参加了我们在6月进行的粮食收购,而且由于这个缘故,粮食的集市价格开始上涨了。我这里有这些价格:5月时,一普特的小麦面粉是2.60卢布,6月上升到了3.50卢布,而现在,7月初,我有的材料说,到了5卢布。黑麦面粉5月是2.7卢布,6月是2.6卢布,现在又高了一点。

通过这样的工作,我们在农村得到了什么样的政治情绪呢?6月开始加强粮食收购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处于了严重的食品状况下的贫农要求我们帮助。我们在5月给了他们这种帮助。我们大约向农村抛出了34万普特的粮食。这是相对不值一提的数字,但是它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马上就造成了另外的情绪。富农在宣传不要把粮食从农村里运出去,因为要不贫农就得挨饿;在个别地区,贫农上了这个当,在两三个地区的个别地方有过贫农阻碍把粮食运出村子的情况,应该说是妇女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我们有一个玛戈尼特村,预想要在那里盖一个工厂,那里收购了150—200普特的粮食,婆娘们把粮垛围了起来,不让把粮食运出来,但是这时我们帮助的粮食来了。

**伏罗希洛夫:**也是200普特吗?运来了200,又运走了200?!

**什维尔尼克:**可能也是200普特,但是这种帮助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们开始向贫农解释说,我们没有忘记他们,但是他们陷入了有可能会饿死的境地。我们向贫农提供了粮食帮助。由于采取了措施,马上就出现了总的转折:甚至在那些以前阻碍把粮食运出去的地区,那里的贫农也开始和我们一起干,帮助我们收购粮食了。女人们说了是谁在不断地鼓动她们不要让把粮食运出去。后来才清楚,在这个村子里有3个过去的村落首领,是他们在制造农村里的社会情绪。侦察的结果是,不得不对这3个人施加适当的影响。(笑声)

虽然富农企图要拉着贫农跟他们走,我们加强了在贫农中的工作,向他们提供了食品帮助,于是贫农便积极地支持我们。当然,在农村里有过,而且现在也有大嚷大叫的所谓富农帮手,他们并不多,但是他们的噪音很大,他们被称做是富农帮手,在大会上积极为富农说话。当富农看到我们挫败了那种不把粮食运出村的情绪的时候,他们便开始在贫农中间分散自己的粮食,这样制造出一种印象,他们是在帮助贫农,他们说:给你10普特,把5普特用了吧,收购人员离村的时候,把5普特还给我们,要么就干活顶上。

我要重复的是,这决不是说我们就有权得出像弗鲁姆金同志得出的那种结



论,他说的是“农村除一小部分贫农外都是反对我们的”。这是一种不可能更坏的胡言乱语了。

根据上述情况,我可以得出结论说,由于努力在贫农中加强了工作,我们做到了把他们组织起来,他们也帮助我们进行粮食收购。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是不可能6月扩大收购的粮食数量的。(主席的铃声)我请求给我延长时间,我们乌拉尔来的只有一个人发言,而来自乌克兰的人有4个发了言。

丘巴尔:收购了多少粮食呢?(笑声)

什维尔尼克:3 800万。

丘巴尔:而我们收购的是2.60亿。

什维尔尼克:我不想争论。

主席:没有反对的吗?给5分钟。乌拉尔有5分钟时间。

什维尔尼克:中农对粮食收购的态度。我认为在四月全会之后我们触动了中农的整个上层。我要强调这一点。我在四月全会上发言之后,有的同志对我说,我有着非常乐观的情绪。但是我要重复并坚持的是,正是在四月全会之后,我们触动了中农的上层,因为中农在总体上是参加了粮食收购的,他们积极参加了大会,他们决定了应该帮助工人的国家,他们自己到委员会来参加了粮食的收集。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中农是1普特、5普特、10普特地给出来的,但是这种收购的结果是,我们在6月收购了340万普特。我认为中农是积极参加了粮食收购的,而且如果要是说中农背离了我们,说他们在反对我们,这就意味着是完全看不到农村的局势。我认为,如果没有中农的帮助,我们是不可能收集到像我们在6月收集到的这样数量的粮食的。

说我们是用粮食收购的措施破坏了工人阶级和中农的联盟,这是不对的。我要重复说的是,我们触动了中农的上层,这是清楚的。事实上在农村得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对富农施加了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在一部分中农身上有了某种反应。为什么呢?因为在对富农施加压力的时候,不仅在富农中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叫声,而且那些人家并没有对他们施加压力的人也会叫起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造成了这样的局面,中农就离我们而去了。我要再说一遍,我们那里没有这种情况,我们不仅是在农村里摸了人们的情绪。我不得不在全会之前走了5个大区和25个地区。我和好多老乡谈了话,我们还在按地域召集的聚会上触摸了这些情绪。在这样的聚会上搞清楚的是,被请来的人中间只有个别的人,而且是他们中间那些和富农或者农村中生活富裕的那部分人有联系的人,企图制造出不健康的情绪来。但是这样的个别人是可以用手指数出来的。总的

来说,在这种按地区找来的人中间,群众情绪是有利于我们的,而且在我们这里曾经采用过的那些手法也表明,农民对这些做法的态度是好的,这甚至也说明了不是对我们不利,而是对我们有利的。

关于富农说上几句。在6月的粮食收购运动中,富农表现出他们自己是在企图制造,而且在一些地区已经制造了农村中对我们的敌视情绪,为此利用了贫农吃粮上的困难。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很有特点的现象,富农甚至是发展到了对贫农个别做工作的地步,让他们反对把粮食运出村去。5月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们没有能力大规模地进行粮食收购。当时正在进行播种,富农在地头上做工作并对老乡们一个个地说教,制造反对粮食收购的情绪。当我们在6月份开始加强粮食收购运动的时候,看到在一部分贫农中有了某些动摇。需要党有广泛的解释运动和对贫农给予无产阶级的帮助,带着贫农和自己一起前进,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贫农和中农在粮食收购中帮助了我们。我认为,富农当然是很恼火的,如果他们有可能公开和我们对抗的话,如果他们在农村里有人支持的话,他们肯定会是立即转入搏斗,但是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农村没有支持他们。中央的决议草案里规定的措施给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正确的路线,因为打击的是在我们中间存在的那些制造混乱的人,同时也打击了那些对和粮食收购联系在一起的所有困难估计不足的同志们。

关于粮食收购的准备说几句。我认为,我们在6月的粮食收购运动中触及到了农民的保险储备,现在我们应该非常小心地对待未来的粮食收购。我们需要让商业人民委员部不是泛泛地作计划,而是针对着每一个地区,考虑到它的特点。例如,我们和西伯利亚投入粮食收购运动要晚得多,因为我们的粮食收割得晚,而给我们规定的是在7月和8月的粮食收购的计划。我认为,我们无论是在7月还是在8月都不可能有计划。我们可以从9月开始实施计划。我们应该让老乡有一个喘息的时间,这是第一。而且还应该把我们投入粮食收购的实际工作和开始收割收成以及收成上市结合起来。我认为,在制定1928—1929年度的粮食收购计划的时候,应该考虑到乌拉尔的这个特点。

再对明年收成的考虑说几句。

考虑收成。1927—1928年度的总收成是2.68亿普特,去年我们在这个数字上和中央统计局没有任何争论。而现在中央统计局对这个数字提出了争议,说是乌拉尔总的收成在1927—1928年度是2.33亿普特。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那里得出的是,我们今年的收成有增长,总收成将会多出5000万普特,而我们的数字说明的是收成增加了500万—700万普特。这种状况应该考虑到和把

总收成的计划搞得更准确。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工人的情绪。我们在工人中间对我们由于粮食收购所遇到的困难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在我们乌拉尔有的粮食是这样的,我们不得不向工人们按定量供应。我们现在是按照合作社的小本子每人发放30俄磅面粉。这些困难工人们是意识到了的。因为我们冬天没有能节约粮食,工人们骂了我们,而且很厉害地骂了,骂得是对的,但是不可能长久地按照这种分配的办法行事,应该是尽一切可能在8月让中央来帮助我们。我们应该在8月初从中央得到100万普特的粮食。我们是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式行事的,我们按照中央规定的份额从乌拉尔运出了700万普特,但是在8月我们就不够吃了,我们应该找到出路,而为了找到出路,我们应该要有100万普特的粮食。

我认为在决议里应该特别强调合作社的作用,就像安德烈耶夫同志说的那样。再也不能容忍合作社继续像现在这样工作下去了。不能总是靠帮忙行走。我们把党内的群众动员了起来搞粮食收购,而合作社却在那里掂量计算它会得到多少的加价,可是自己并不工作。

**斯大林:**想要吃现成的。

**什维尔尼克:**应该是让搞粮食收购的合作社现在就准备好进行粮食收购。

最后一个问题是做贫农工作的问题。安德烈耶夫同志说的对:只要是我们一离开农村,那里贫农的情绪就开始变了。我们应该不间断地做贫农的工作。现在正在开始的是关于农业税的工作,应该是一定要使贫农参加分摊税务的税务委员会。

**有人喊:**要剥夺富农。

**什维尔尼克:**不是什么剥夺富农,如果有个别的过火行为,那我们就和这种行为作斗争,但是并没有大规模的这种现象,我们并不害怕这个。我们也要打击那些想要剥夺富农的人,以及那些对我们由于粮食收购而出现的困难估计不足的人。

我认为政治局的决议完全符合我们现在地方上遇到的情况。

**主席:**埃赫同志发言。

**埃赫:**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论断,我认为是不正确的。他建议要给粮食收购加码,考虑的是在12月就把粮食收购运动结束了。这是不能接受的,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等价的东西来对付我们将从农民那里收来的那些商品粮。第二是如果我们这样给粮食收购过程加码的话,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卡冈诺维奇同志正确指出的那些过火行为中的某些行为。所以

我感觉,这个建议是不能接受的,也是不正确的。但是我感觉,什维尔尼克同志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所说的是,商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需要更多地离开无线电线路。有些措施是对我们这个庞大的联盟的个别省和地区适合的,而商业人民委员部用无线电把这些措施传播到了整个联盟去了。

在西伯利亚,我们只是在6月半的时候才能结束某些地区的播种的,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收到的是魏采尔同志签字的威严的电报:“根据商业人民委员部所有的材料把1928—1929年度的谷类饲料平衡表交上来”。只能是耸耸肩膀。这是一个具体的小例子,但是它是很典型的,说明是在按照图表领导并不考虑个别地区的特点。需要的是把领导更具体化。当我们看待明年的粮食收购工作的时候,不能用对待俄国中部、东南部、乌克兰这样的要求来对待西伯利亚和乌拉尔。这些东部地区只是在10月初才能提供粮食,而如果你们用无线电线路来要求8月或者9月初就拿出粮食来,那我们是拿不出来的。

接下来,我感觉,很久前的那个时期,我要说的是1919年那个时期,发生过的情况如果重新出现的话,也应该算是这种不正确的领导:最近商业人民委员部好像有一种时髦的做法,就是从莫斯科派出了许多全权代表。当同志们来到我们这里工作和在工作中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很满意的。但是如果他们是以凌驾于所有地方组织之上的超级全权代表的身份出现,手里拿着委任状,说是他们有权推行自己的决定而不同地方上的组织商量的话,那么我感觉,我们在这方面是后退了一步,这甚至是一种在1919年推行的做法,地方上的所有工作人员很早就对这种做法提出过抗议了。我指的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信和米高扬同志签署的委任状,根据这封信和这个委任状,一个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有权不和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商量就做出自己的决定,而这些决定是地方组织必须要执行的。

丘巴尔:如果是什么时间收和什么时间交,他们是没有这样的权利的。

埃赫:需要在什么时间收,那也是需要从地方上有工作人员坐在那里这一点出发的,这些人遵循的不仅是这个地域的利益,也不仅仅是地方工作的利益,坐在那里的是遵循整个联盟、整个国家的利益的工作人员,而且不可能指望用这样的全权代表就能够把我们的工作做好的。在这里有过的所有发言里,昨天特别让我吃惊的是奥新斯基同志的发言,他说了关于分离和关于结合危机的、带有威胁性的话。我的感觉是,这个发言使得全会的所有成员都感到了吃惊。我是在西伯利亚工作过的,记得我们西伯利亚的所有经验,也曾试图找到材料来比较一下,我们的经济中有些什么,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可以用这种经济上的分离来形

容。我的感觉是,并没有这样的状况,我要说的是,奥新斯基同志在这里是夸大了、歪曲了我们那里的局势。

正像你们看到的,后面挂着米高扬同志所展示的剪刀差的图解。要知道,这也就是对现在我们国家存在的那种经济状况,那种经济上的对应关系的评断。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1925—1926年度的差距要比现在大得多。我们根据西伯利亚的材料进行过计算,今年由于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农民赢得了2000万卢布,而整个农业税收上来的是2200万卢布。这就是对于农民来说出现的那种局面的鲜明的指标了。在现在我们这里存在的局面下,走上这个讲台来并从这个讲台上说结合的危机,说分离,说是过去是结合而现在发生的是分离,这至少是奇怪的。

我不知道奥新斯基那里发生了什么,但是在这里走出来并且说出这样的话,那至少是失去了很多的理智。应该考虑到现在存在的局面,应该考虑到已经发生了的那些变化。我们有的并不是农业价格的下降,而是一些类别的农产品价格的提高。最近好像有了一种时髦的做法,用不知道是谁的信,不知道是属于什么阶层的农民的信来炫耀。在这里,斯捷茨基同志就企图用这种信来说明农民的情绪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的。我想,用这样的信来看待如何评价农民中间存在的情绪是不对的。

我感觉,我们地方上的工作人员需要向政治局呼吁的是,在未来的粮食收购运动中,应该是把那些坐在中央机关里和现在只靠来信吃饭的工作人员派到地方上来,让他们试着和我们一起工作,进行粮食的收购。他们来到我们这里呆上两个来月,和我们一起工作,可以在许多方面帮助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发生的是什么情况,生活中发生的是什么情况。

臧声:对。

埃赫:我想,那时候,他们现在所有的那些不正确的观念中有许多就会很容易地消除了。我应该说,在西伯利亚,我们在来参加中央全会之前曾企图对农村发生的事进行一次仔细的分析,看看西伯利亚的农民中有哪些政治情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在边疆区委常设局提出了一个关于农民情绪的报告,吸收了这个时候在边疆区中心的所有执委会主席来参加边疆区执委会全会并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应该说,在这方面,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斯捷茨基同志对农民情绪所得出的那些结论。这些结论是不正确的,不能反映真正的情况。现在,在西伯利亚,我们在正在进行的粮食收购中施加了不小的压力,不少采用了第107条。我们有过火行为和错误。这是应该承认的。在分析农村中的情绪时,不说

那些令人不安的方面是有害的,但是一味夸大也同样是有害的。而我的感觉是,有些同志在这里是夸大了。

我来说一说几个典型的事实,它们是能够说明西伯利亚农村的政治情绪的。我们在去年的粮食收购时没有采用第107条。今年我们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而且第107条也使用过不少次。关系的尖锐化,富农对我们的敌视态度现在是最厉害的,和去年相比简直是大得没法比。富农对我们非常敌视,而且准备做出任何危险的事情来。如果情况是这样的,中农和富农联合起来了,那我们在农村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呢?我们在农村就会遇到大量的恐怖行动,就会普遍出现殴打我们工作人员的情况。而实际上我们在西伯利亚的农村里有的是什么呢?去年发生过打死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事情,怀疑是有富农参加的,一年里总共有23起。

今年我们在上半年里有过6起。殴打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情况在去年是98起,今年上半年是50起。难道这些数字不能部分地说明农村的局势,不能证实虽然有富农搞的各种诱惑和整个敌对的鼓动,中农并没有离开我们,中农并没有跟着富农去了吗?当我们分析农村的政治情绪和确定了中农有某些谨慎的态度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我们关闭了非常多的手工业企业时,地方上犯的那些错误。

**罗伊津曼:**不该把手工业作坊关了。

**埃赫:**关于播种面积。这里有许多同志,也包括奥新斯基同志,企图要证明,我们在农村的情况不好是因为播种面积没有扩大。我没有关于全苏联的数据,说不了这种情况,但是我有关于西伯利亚的数据,关于对农业税上税户的统计。对西伯利亚所有经营单位中的20%,我们有截止到6月15日的数字,这些数字表明,和去年相比,播种面积增加了10.9%。

**斯大林:**是过冬作物和春播作物加起来吗?

**埃赫:**是总共的。我们不是把这个数字完全算成是播种面积的增加,而是部分地把这个数字算成了更清楚地查找出来的那部分增加了的面积,但是可以肯定的和地方上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能证明的是,我们的播种面积扩大了。

**斯大林:**这是指春播的面积吗?

**埃赫:**在西伯利亚,冬季播种的面积是很少的,基本的播种面积是春播的。特别是在整个西部地区,那里几乎全部播种面积都是春播的。所以,预料说我们的播种面积减少了,按照我们的数据,是不可能得到证实的。

关于贫农的情绪。当然,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在5月或者6月有可能投放粮

食,让贫农有饭吃的话,贫农的情绪会好些。当然在我们没有能够提供粮食的时候,这就使得富农有了机会进行鼓动,于是一部分贫农的情绪恶化了。无疑是这样的,但是我想,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在冬天做过的工作——我们在贫农中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使得我们有了可能大大地向前推进。安德烈耶夫同志和什维尔尼克同志说得对,我们对贫农的工作还是断断续续的,这种状况应该改变。但是,并不是最大限度地把贫农吸收到我们的工作中来的方针,总是能正确地反映在我们各个部门的指示里和法律里的。就说农业税运动吧,是需要最大限度地把贫农吸收进来,搞清楚富农和中农的收入和正确地征税。在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指示里,对这一点说的是,应该吸收贫农参加到委员会里来,甚至是应该给他报酬。但是财政人民委员部为了支付贫农又给了什么呢?不要忘记了,贫农是应该夏季在委员会里工作的,那个时候正像常言所说的,是一年就看这一天了,是雇农能够挣到一个卢布或者更多的时候。为支付参加这项工作的贫农,财政人民委员部给的是半个卢布。当然,在最忙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用半个卢布就找到一个贫农和雇农到委员会里来坐着的,于是这里便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吸收贫农和怎样实际上贯彻这一点之间的差距了。实际上我们贯彻得不够,应该注意的是让我们的议论不要和我们所做的对不上号。

还有两句是我们怎样工作。照我的看法,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里说得非常正确,那些为过火行为哭泣的同志忘记了,如果党没有对粮食收购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是会发生其他困难的。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两种可能:要么是我们采取一系列措施,这样就能避免各个工人中心的危机了,要么是另外一条路——做出更大让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富农有好处的,但是解决不了粮食问题。我们是在被推着走上了这条路。我们收到了弗鲁姆金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发来的电报。他向我们建议说:“在乌拉尔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无论缴粮食的人是不是加入了合作社,我们都是供应紧缺的工业品的,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按收条发放给缴粮食的人,建议在西伯利亚也这样进行,其他的路子是没有的。”

我们回答说,这是恐慌的表现,这是在破坏我们的货币,这条路对我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拒绝了走这条路。我感觉,党走的路线是对整个机构施加压力,是动员我们的全部机构,是对富农施加压力并且用这样的做法避免了威胁着我国经济的危机,做的是对的,是完全对的。

当大家发言说到情绪不好、局势不好的时候,忘记了我们有过四月全会,当时我们听了关于粮食收购的报告,除了四月全会通过的那些建议外,谁也没有提出过其他的建议。<sup>153</sup>

主席：科马罗夫同志发言。

喊声：他不在。

主席：那就是米柳亭同志吧。

喊声：他不在。散会吧，宣布休息吧。

主席：宣布散会。



## 第九次会议

7月9日上午

主席(柯秀尔):科马罗夫同志发言,下一个是米柳亭。

科马罗夫:我想给你们讲的是,在我们那个州是怎样消耗粮食的。我们在今年除列宁格勒外已经在农民地区消耗了2 000万,而且看来到秋天还不得不消耗大约300万。这样大量消耗粮食在我们州是从来没有过的。

现在要说的是,引起这样起劲地消费的原因有哪些呢?在过去的年份里,我们在合作社和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粮栈的出售价,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参照着市场的。如果那里粮食是2.50卢布的话,那么我们的组织就卖2卢布;而在今年,黑麦从秋天开始就是按1.20卢布卖的,土豆的价格也是1.29卢布,燕麦是2卢布到2.5卢布,而草料从秋天开始是60戈比一普特。如果农民自己有富余的,他们有30—40普特的黑麦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那么,凡是这样的农民都是不出售黑麦的,而是宁肯把土豆、草料等等抛到市场上去,用粮食来喂猪。从秋天起,我就向同志们指出这一点,说到了在我们的州里正在发生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我们得到消息说,价格的这种对应关系是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政策,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不要减少亚麻的播种面积,因为我们这里有三个区是生产亚麻的。在过去的年份里,农民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总是指出价格的对应关系完全不正常,我们不能发展和播种亚麻,而且我们一直都是在争取降低面粉的价格。但是如果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话,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据,说明在亚麻的价格是5—6卢布一普特的情况下,粮食不能按一普特2.50卢布的价格出售。当农民缴出一普特的亚麻总共只能收到2普特面粉的时候,他们当然就不种了。

我们今年收购到了100万普特的亚麻。如果我们为这些亚麻只是支付粮食的话,那就需要400万普特的粮食了。但是农民从我们这里拿走的不仅是粮食,他还拿了衣服,鞋子,布匹,生产工具等等。有50%我们支付的是粮食,应该为

亚麻花费的是200万普特的粮食。那么价格又怎么办呢？要知道价格不是那么容易就矫正的，如果明年要压缩对农民的粮食供应的话，那就要更难得多了。需要从秋天开始，让我们做粮食买卖的合作社组织就把价格拉平一些。我们预料在市场上的价格是3—4卢布，而且这个时候需要把一定数量的粮食抛到市场上去，为的是把粮价降低20—30戈比。只有这样的路子才有可能，否则谈论恢复市场还有什么价值呢？哪个傻瓜会在到处的合作社都是一普特面粉1.20卢布的时候出售粮食呢？

所以米高扬同志，和农民按照这样的粮价签订合同吧，就让他们按照这样的价格把亚麻卖出来，剩下的供应就按私人市场来找平吧。在我们州从来就没有过这样大量消耗粮食的情况，在今年以前也没有过这样低的价格，是按1.20卢布一普特把粮食卖出去的。我们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除列宁格勒外，整个州消耗掉2200万普特粮食的情况。

我是想要指出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从秋天起就把它纠正过来。

现在我想说说斯捷茨基同志的讲话。今天我读了他的讲话的速记记录，和一些同志，也就是我们的契卡工作人员交谈过，我要声明的是，斯捷茨基同志关于评价局势的讲话可以算是他个人的意见，不是列宁格勒组织的意见。

主席：米柳亭同志发言。

米柳亭：我想说的是，我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第一是对局势的评价，第二是从这个评价得出的结论，第三是过去的粮食收购运动的教训，和从这中间得出的对农民的态度评价和从这种评价中需要得出的结论。

关于对局势的评价。有一次在春天的时候，我曾经对李可夫同志说过，我担心收成不好，我们将来可能要面临收成不好的状况。在这之前的三年里，我们有的是好收成，然后是很坏的春天已经出现了，看来正像我说的，有人已经在预言我们这里将是歉收了。这种悲观的评价没有得到证实。根据我们至今掌握的材料，将不会是歉收的。

但同时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这里形成的还是一种严重的局面，虽然像米高扬同志报告说的那样，我们这里的结果是按照谷类饲料平衡表，根据6月15日的等级评价得到的，是比去年有某些提高。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我应该事先说到的是这些数据的纯粹相对性。很清楚，在6月份对收成给予评价是非常困难的，而现在我们有的数据未必能成为关于收成的准确数据。我们还不能说在我们那里收割运动将会怎样进行。要知道，只要回忆一下1925—1926年度收成的情况就够了，当时根据国家计委的统计，雨水把我们5%

的总收成冲走了,这就是说,把我们要出口的粮食搞湿了一点儿。现在和去年相比,在食用粮食上,我们暂时是少了3 600万,至少是已经少了3 600万。这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第一项内容。

第二点是收成的地理分布。实际上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商品粮是一回事,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提高了的收成是另一回事,不能把这两件事混淆起来。要知道,米高扬同志可以说是通过电话知道乌克兰的情况的,而在哈萨克斯坦粮食的销售有非常大的困难。虽然今年在哈萨克斯坦有非常好的收成,比去年提高了一倍,但是由于哈萨克斯坦所处的地理位置,由于交通上的困难,销售这些粮食有着非常大的困难。西伯利亚的收成的销售情况也一样。所以我们暂时有的是一张牌——年景很好的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在乌克兰,与去年相比,就是在收成方面,在涉及到播种的方面,我们也大大不如去年。在北高加索,我们的年景稍微好一些,但是播种面积减少了。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为了明年,我们应该对这种形势做出的评价是,在进行粮食收购运动和向全国供应粮食这件事上,这是一种可能会带来巨大困难的局势。

在我们这里,最困难的月份是7月和8月。和我们现在所具有的情况相比,中央统计局制订出来的和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报告的那个推测的平衡表所描绘的,是一种逐渐恶化的状况。在9月的下半月我们可能会轻松些。这是因为去年在8月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当年的收成上市了。今年因为春天推迟了,而且收成也有些拖后,我们销售粮食要比去年迟上两三个星期,而这将意味着我们至少要迟一个月,而且由于这个缘故,得到的结果是,农民会把他们去年没有吃掉的那么多的粮食都吃掉,而去年储藏剩下的粮食用来喂牲口了。现在我们有什么呢?当然,我们有的是比去年更坏的状况。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状况。但是,我要再说一遍,从我们的事先估价看,我们这里没有歉收,这就是我们所能说的。

现在我们从这个评价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经济结论呢?首先**收割运动在今年**具有的特别意义。遗憾的是,如果我们看看我们的报刊,那么你们看到的是,那里忘记了收割运动,而且我们从这个讲坛上听到的那些抱怨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我们在这里关心着下一个1929—1930年度的秋季运动——这是正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收割运动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整个农业年度来说,今年将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迅速地进行收割运动能够给我们挽回的,不止是一亿普特,因为如果迟了的话,潮湿的秋天也将是一种危险的前景。所以收割运动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而我们这里收割机器供应不足,对这种状况并没有注意到。我应

该在这里把这种情况说出来。

第二是在今年,粮食储备基金具有了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不得不在明年有比去年更大的运作。我应该说,我们说到储备已经有好几年了,在代表大会上说,在全会上说,可是至今关于储备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也没有实现。这真是光走形式,太不像话了!规定了数字,规定了储备,然后在收购的时候得到了基金——关于这些决定就都忘记了,把所有的一切都用到消费上去了。我感觉,我们自己不得不扪心自问地承担的基本错误就是我们没有组织储备,我们在前3个月里吃掉的太多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在第三季度吃掉的要比去年多出27%。我们是真正把那些基金给吃了,而且如果说我们现在储存的有5000万普特的话,那我们就不用企求我们现在采用的那些非常措施了,状况就会好多了。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是可以的。从所有资源来看,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当然,如果我们在前3个季度里不是这样敞开吃,那么结果会是可以有一个平静和平稳得多的整年粮食供应的过程的,而且如果我们在明年不这样做的话,那将是最十足的犯罪了。

现在说说农民。我认为,农民的不满是一个不能不确认的事实,但是解释这个事实,分析它,需要非常慎重,而且我感觉,已经有过的发言指出的是,对农民不满这个事实的分析方向不对头。可能农民的不满有两个原因。或者是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也就是党的十五大规定的政策根本就不正确,提出了农业的基本任务是向大经济转变,——可能是我们太激烈地采用了集体化的方针,这是一个错误;或者是错在我们不正确地提出了我们在市场上的各种关系的方针,——这就是另一项任务了。

奥新斯基同志在这里发言的时候,他想证明的是,在我们这里发生的是根本和农民分离了,而且他是从生产的各个因素出发来证明这一点的。他说,分离正在发生,你们看,农业生产是怎样一种情况。播种面积的曲线在下跌。于是奥新斯基得出的结论是:在整个生产战线上发生的是分离,可以说这种不满不是随着行情而来的,而是一种深刻的不满,他把它说成是分离。这是一种根本错误的提法,是没有事实材料能够证实的,因为奥新斯基对播种面积进行的那种分析是不正确的,是不对的。

奥新斯基同志做了一件怪事。可以说,他是把播下的过冬作物的自然死亡算到了我们政策的头上。的确,奥新斯基自己引用了这些数字,如果你在那些没有发生播种的过冬作物死亡的地方拿到了这些数字的话,那我们看到的又会是怎样的情景呢?无论是秋播还是春播,播种面积都有很大的增长,虽然我应该

对这些数据事先说明一下:这是不完全的数据,我们对这些数据是有保留的,但是因为在没有发生还是发生了过冬作物死亡的地区都是采用了这些制订平衡表的方法,所以得出的情况是共同的。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在没有发生播种的过冬作物死亡的地方,过冬作物和春播作物的播种面积都增加了。你们可以看看伏尔加河中游地区,这里没有发生过冬作物死亡的情况。我们看到的是,过冬作物的面积是去年的104%,春播作物是112%。两者都有增加。伏尔加河下游州过秋播种的面积不到93%,春播面积是105%。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的过冬作物面积是104%,春播面积是100.1%。

当我们转向发生了过冬作物死亡的那些地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景呢?就说乌克兰吧,那里原来是播种的过冬作物面积达到了104%,比去年增加了4%,死掉的是42%,剩下的大约是60%。在乌克兰发生的是典型的从春播向过秋播种的过渡。冬小麦播得更多了。如果说春小麦是前一年的95.8%的话,那么春小麦加上重播的就是128%了。从政治上可以怎样评价这一点呢?农民在春播时花费的力量要比去年多了30%。奥新斯基同志把这一点看做是生产领域里的减少,对我们的信任的减少,是播种面积的下降。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分析,由此而来的是不正确的态度。实质上我们在北高加索得到的也是这样的情景,那里也同样是有某些下降的。那里的春播是91%—92%和108%。所以根据我们所有的数据,不能说是我们的生产路线对老乡的影响是使他们开始减少播种面积了,就像是在战时共产主义的时候一样,不能说是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危险。

我认为,我们的**集体化路线**,搞大型农业的路线是正确的,而且我们在帮助农民的时候,推行了这种路线的地方,播种面积的百分比是有了很大程度提高的。需要的是从我们的市场政策上找原因,应该是从这上面找原因。由此而来的是我们的粮食收购运动的发展不平衡,我们没有储备,日子过得非常紧张,过于紧张了,而且我应该声明的是,遗憾的是,我们所有的州都是在推行这个过度紧张的政策,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当我们这里的粮食、畜产和技术作物的价格没有协调好的时候,我们这里是一种过度紧张的状况。

老乡今年是把自已多得多的农产品卖给了我们,比去年要多得多。不能再向老乡要求,让他们遵守我们提出的比例了,我们是不能要求他们这样有计划性的。他们在今年出售的农产品比去年多了许多,得到了更多的资金,但是粮食他们要把持到新的收成下来的时候。贫农和中农是在前两个季度里缴出了自己的粮食的,现在到了该更富裕的分子和富农上缴粮食的时期了。这肯定也影响

到了粮食收购。粮食的价格是低廉的,这一切都有影响,这是事实,因为我们降低了价格,这引起了不满,但是如果从此得出结论和这样的决定,认为我们是不是该放弃坚决采用的集体化路线,转向个体经营了,这是不正确的。

我应该说,可能在这里将会有人为我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的关于土地使用和土地安置法的讲话而攻击我。

**李可夫:**这是我告诉他的,他先下手自卫了。(笑声)

**米柳亭:**问题在于,我有一部分说的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我们的大型化的生产单位,分析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向大型生产单位过渡。我说,在我们这里两条可以向大型生产单位过渡的路线:通过资本主义的路线,建立大型的富农农场的路线和集体化的路线。发展农业中的生产力就意味着是向大型生产单位过渡,而且我说,在我们这里,这种过渡是在贫农和中农农户普遍提高的背景下完成的。这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在集体化的形式下进行的。问题在于,在这之前,在我们为这项法律召开的会议上,马卡罗夫教授反对我,并且声明说,在我们这里,生产力的发展应该和可能是在美国类型的农场经济意义上的完善。我在自己的发言里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我们这里,生产力的发展是以农业集体化的形式完成的,不可能以其他的形式完成。所以现在改良技术、提高技术同时也就是改善集体化。大型化的经营单位不是培植新的富农农户,而是培植新的集体的、协作的、劳动组合的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农业集体化。这是我们的农村发展的基本道路”。

在这之前我也说了:“我们在通过集体化引进了新技术的同时,加强了、扩大了我们的经济地位、我们的经济福利、农民的基本群众——贫农和中农的经济和政治分量。”

这就是我提出来的那个方针。这意味着在我们这里,集体化不同于战时共产主义,是在提高整体,提高所有数以百万计的贫农、中农,所有的基本经营大众的基础上进行的。集体是从下面成长起来的。我是说,今年在农村里有2.6万个集体成长起来了,这是我们的政策唤起的农民表现出的信任和他们对这个政策的回应。我担心的是,我们把这些群众召唤起来、震撼起来、推动起来,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之后,做不到足够地为这个巨大的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潮流提供服务。我们在建设拖拉机厂上动作迟缓了,现在我们在建设收割机械等方面迟缓了,我们的农业机器总量大大高于战前,可是这样的数量还是完全不够的。

**柯秀尔:**可是奥新斯基建议把钱转给纺织工业。

**米柳亭:**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无论如何要为农村的生产需要提供服务。只

是在俄联邦就已经有 2.6 万个新的集体诞生了,我们能不能今年向他们提供拖拉机以及其他的这种或那种生产上需要的东西呢?我们做不到。

**斯大林:**纺织和机器是两者都需要的。

**米柳亭:**对,纺织和机器都需要,但是在这里,斯大林同志,我们主要的灾难,主要的漏洞,不是在纺织上。如果按照现在有的纺织商品的价格向农村提供足够的商品的话,农村是能把它消化掉的。

**奥新斯基:**除了集体化之外,通过其他的形式到底能不能完成生产力的发展呢?您说:能还是不能。

**米柳亭:**奥新斯基同志,不能这样用哲学的方式来提出问题。

**布哈林:**用哲学的方式?

**米柳亭:**提高农民经济在我们这里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发展生产力,如果您把它解释成是大型化,是向大型生产单位过渡的话,那只能是通过两条路来完成:或者是建立农场、富农经济,或者是集体化。第三种形式您是想不出来的。

**臧声:**国营农场。

**米柳亭:**是的,国营农场当然是。如果您要想出第三种发展形式来为个体经营单位恢复名誉的话,那您就会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了。

**布哈林:**上帝呀!

**斯大林:**这是什么话?!

**米柳亭:**向大型经济过渡只能是两条路:要么是走向集体经济过渡的路子,要么就是走向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过渡的路子。所以我感觉,我们需要的是继续执行我们在生产关系上已经确定的路线,但是在市场关系上——在这方面我同意,在这里我们应该做必要的调节,可以把它归结为确定和提高价格以及农产品的价格的对应关系,而且要让老乡能感觉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在这里只是做小的修正,我们在这里就达不到一定的效果。这是第一。

第二——需要让老乡能够提高产量,提高他们的生产,这是必须要强调的。顺便说说,决议里把这个问题绕过去了,我说的是关于产量的问题。

第三,必须建立储备基金,在中央是全国性的,另外还要有地方上的。

**主席:**克里茨曼同志发言,下一个是李可夫。

**克里茨曼:**在这里的辩论中抛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词,说到了城市和农村的分离,农业和工业的分离。这当然是一个基本的、根本的问题。我来尽量向你们证明一下,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如果拿农业总的情况来说的话,今年在我们这里看不出有经济上的分离。在我们这里今年不仅没有农业的下降,甚至对它的

提高也没有延缓,如果从农业总的情况来看,如果不仅仅是看粮食作物的话。但是在说到这一点之前,我想就这种提高的意义说两句,做些解释。

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里引用了一些事实,它们表明,我们的农业提高了,而且这种提高就发生在今年的春天,就是在推行了十五大的各项决定之后。《真理报》编辑部对我的文章做的注释说,“联系粮食收购说到农民经济的提高时,明显过高评价了我们的成就”。我的文章说的是1928年(今年)上半年农业的提高,这也包括了粮食收购时期,但是我并没有说到正是粮食收购引起了农业的提高。《真理报》编辑部的注释本身说得不清楚:它是要否认我们的农业提高了,还是要否认(我并没有说的)提高正是来自粮食收购运动,来自我们这里采用的那些粮食收购方法呢?我也听到过这样的议论,说是好像在我的文章里说了,正是由于非常措施才得到了农业的增长,说是那么由此而来的便是需要继续采用我们曾采用过的那些非常措施。

我没有说过任何类似的话。既然农业有了提高,那么一般说来,如果是一方面联系到推行十五大的决定,另一方面联系到我们的粮食收购运动以及在这场运动中采用过的非常措施来看这个现象,那就可以预料到会有以下3种想法。要么是由于推行我们的政策,由它产生的积极影响超过了非常措施引起的消极影响;要么是可以预料,我们政策的积极影响由于非常措施的积极影响而加强了;最后是第三种,这是一种抽象的和完全荒谬的可能性,那就是我们的政策得出了消极的结果,那就恰恰是非常措施超越了它们,得出了积极的结果。这是明显荒谬的。如果把它抛弃,那么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农村的政策在十五大之后的结果是农业的提高,而绝不是农业的衰落。我在自己的文章里得出的正是这个结论,而且这个结论针对的是那些对十五大政策不满和号召后退,回到十四大去的那些同志的。他们肯定会对我的说法提出争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并不是站在这样立场上的同志开始把农业的提高和实施我们的十五大的政策联系起来,提出争论,那就奇怪和不可理解了。曾经采用过的那些非常措施是我们陷入的那些困难造成的结果。既然这些困难已经克服了,当然就不可能说到这些非常措施还要继续采用了,我感觉问题并不在于继续还是不继续采用非常措施。完全清楚的是,不能再采用它们了,而且也没有必要;问题在于要用多大程度的顽强精神来推行从党的十五大决定所产生的那种政策。

现在,在提出了这些意见之后,请允许我来谈谈提高农业的速度问题。这里已经引用了关于播种面积变化的数据。需要说的是,还没有最近5年的完全可以比较的数据。有的是可以比较的1924—1925—1926年用同样方法计算出来



的、可以比较的数据,1927年是用有些不同的方法计算出来的数据,所以不是完全可以比较的,最后是用第三种方法计算出来的1928年的数据,所以要把所有的都拿来比较,是需要非常慎重的。如果我们还是要拿它们来比较的话,那我们得到的是,我们在1925年播种面积增加了6%;1926年是6%多一点;1927年只有2%,而如果是加上相应的修改,那这个百分比就可能提高到4%。1928年播种面积的增加只是0.5%。当然,这里也需要作很大的改动,这些百分比就可能大体上提高到2%—2.5%。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的百分比应该算到过冬作物的死亡上,因为四分之三的面积结果是没有复种的,而且复种所需要的大量劳力的耗费也不可能完全把春播作物的扩大算到春季播种的地块里去。总之,事实是,最近两年我们的播种面积的增长速度是有了一定的下降,虽然并不是像这里引用的、从各种不同来源得到的播种面积数字所直接表现的那么大。

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个事实。这里应该指出两点。1925和1926年在进行播种运动的时候,我们有的是远还没有恢复的播种面积。当时,在1924年的时候,还有18%的播种面积没有恢复,而在1925年时是13%,1926年就只有7%了,1927年是5%。在1927年的时候,大多数地区已经恢复了自己战前的播种面积了,或者甚至超过了这个面积。自然在这些地区播种面积的扩大速度不可能很大,因为这里要说的已经是开发新的土地了。在那些我们的播种面积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的地方,就是今年,在那里也可以看到有很大的增加:譬如,在萨马拉——奥伦堡地区,今年我们就扩大了整整19%。但是在播种面积已经恢复了的地区,就不可能期待着播种面积会有很大的扩展了。这是第一点。

现在说说第二点。我们来看看粮食作物的面积和其他的面积。如果把那些我已经说过并不完全可比的和需要做一定修正的数字拿来比较的话,那么在粮食作物上得到的情况是这样的:1925年粮食作物面积的增长是5.5%,1926年是不到8%,1927年是大约2%,而如果做出修改,那么减少的大约是1%。这可以用过冬作物的死亡来解释,也就是说,1928年我们所有的,更多的是粮食作物的稳定。所以说,我们有的是粮食作物面积的增长下降或者是增长的停止。同志们,这是事实,但是不能仅限于这个事实,所以我要转向其他的非粮食作物——集约化作物和技术作物。

**奥新斯基:**说说亚麻的情况吧。

**克里茨曼:**好吧,好吧,我就来说一说亚麻。在非粮食作物方面,我们的情景是这样的:1925年增长了8.5%,1926年减少了1.5%,1927年增长了4%,实际上可能是还要多一点,而1928年根据不完全的材料是增长了18.5%,而实际上

可能是20%，也就是说，是非粮食的、技术的和集约化的作物从没有听到过的、巨大的增长，如果你想要搞清楚农业正在发生什么情况，这是绝对不能忽略的。要知道，拿一俄亩的非粮食作物、技术作物和集约化作物来和一俄亩的粮食作物比较，这是完全无知的表现。根据1925—1926年度的数据，一俄亩的非粮食作物、技术作物和集约化作物的产量要超过一俄亩的粮食作物5—6倍。如果注意到这种情况，如果注意到一俄亩的非粮食作物、技术作物和集约化作物平均相当于哪怕是6俄亩的粮食作物的话，那么对于种植业来说，得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关于畜牧业还没有数据。它的情况好像相对还不坏（特别是多亏了饲料粮的收成）。

我说的是这件事的粮食方面的情况。如果是说整个种植业的情况，以一俄亩的集约化和技术作物平均等于6俄亩的粮食作物来计算的话，结果我们在1925年的增长将是7%，1926年是3%，1927年是不到4%，1928年几乎是9%。这样，我们今年在种植业上不是增长速度降低了，而是提高了，甚至是比1925年我们的播种面积恢复得还不太多时候提高得还要多。

我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说农民制约了自己经济的增长是绝对没有根据的，他们没有制约自己经济的增长，而且今年正相反，他们是更拓宽了自己的经济。

还有一点要补充。这种增长是单方面的，当然需要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片面性，因为这威胁着粮食作物的播种。但是没有发生结合遭到破坏的情况；因为当我们向农民发出邀请，让他们生产某种作物的时候，他们是会大量提供这种作物的。

接下来是，这种增长恰恰是体现在商品作物上。需要指出的是，在任何一个地区，增长最多的恰恰是最具商品性的作物。我要说的是，遗憾的是要向奥新斯基同志说，我们在莫斯科的工业地区，所有非粮食作物、技术作物和集约化作物的增长是6%，而亚麻这种在这个地区最具有商品性的作物增长了11%。在维亚特卡区，所有集约化作物和技术作物提高了5%，而亚麻提高了12.5%。其他地区的其他最具有商品性的作物的状况也是类似的。

所以，1928年农业的增长同时就是它的商品性的增长，也就是说，恰恰就是城乡经济结合的增长。如果我们不是过于片面地看待农村中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就不会为这一点感到吃惊了。有过非常措施，它们当然对被触动的那些人的经济有不良影响，但是这些措施主要是集中在了富农这一面，我们在那里的播种面积有所减少，可是在另外一面集中的是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帮助。我在文章里表明了这种帮助有多么巨大的影响。这种帮助也广泛地涉及了中农。当

然,使得整个农业有增长的不是贫农,而基本上是中农提供了这种增长,而我们能提供这种增长就表明了,我们的政策从总的来说是完全有道理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是在我们这里发生了分离;相反——正在发生的是和农民在经济上的结合更加强了。

主席(李可夫):我要发言了。记一下时间,柯秀尔。

柯秀尔:我会注意的。(笑声)

李可夫:一些发言的人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在共产党的中央全会上是在对一个日常的、每年都要重复的关于粮食运动的任务问题进行着通常的讨论。我想,对现在提出来在全会上讨论的问题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当然,可以对这些或者那些说明现状的专有名词进行争论,但显然的是,在对现在国家所处的那种社会和政治状况的各种不同表述文字上的差异背后,隐藏着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政治局势恶化了,和农村的关系紧张起来了。一些人问到我们这里是不是和农民分离了,另外一些人说中农走开了,第三种人补充说有些地方的贫农也反对我们。

柯秀尔:而且这甚至也传到了工人中间。

李可夫:甚至也传到了工人中间,说是有一定的不满情绪传出来了。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表示感叹,显然是在暗示有这样制造混乱的人,他们是这样说的。如果斯坦尼斯拉夫想对自己的话赋予这样的意思的话,那我应该完全明确地把自己算到这些“制造混乱的人”之列,而且从这种状况中看不到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执政的工人政党应该和工人、农民有直接的交往,应该研究他们的情绪。和工人、农民群众的交往发生在群众大会上,代表大会上,通过工人通讯员,等等——应该是对工人群众在想什么,农民以及他的各个阶层在想什么非常关注的。不发现现在的各种政治情绪,不试图去对这些情绪做出清醒的评价,那就是政治上的近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在工厂里转过,有的时候是秘密地、静悄悄地,为的是听听工人们在说些什么,他还读这些工人的信。从这些和工人、农民的谈话中,他也善于非常富有洞察力地引出总的局势来。同志们研究农民或工人的信件,注意地倾听在工厂和农村说些什么,这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坏处!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是不是有许多人最近到过工厂的会议上,在那里谈论了关于粮食的事情和与农民的关系。我很满意的是和工人们有过这方面的交谈,而且根本不能说他们认为我们在整个苏联的领土上的一切都是很好的。我们将从信件、谈话或者另外的途径搞清楚工人们的这种不满并且加以考虑,这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的耻辱。

见鬼了,我们是工人政党呀!但是不能把问题仅仅归结为应该还是不应该根据信件、谈话、群众大会等等来评断国家的政治状况。我要重复的是,可以争论专用名词和个别的表述,但是所有这些都解脱不了我们的一种义务,那就是要搞清楚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是处于革命的第十一个年头了,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这段时间里,第一次大规模地对生产粮食的农民施加了行政压力。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这个时期里,我们没有过大规模对农民采用行政影响的这种经验。所以可以而且需要分析一下这个经验,做些总结,找到它的正面和反面的特点,但是绝不是把事情都归结为没有针对性的相互谩骂:一个人说什么做得不好,另一个就要反驳,说你是制造混乱的人,你不能这样做。但是为什么是“制造混乱的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我们好像已经不是最后一年在做执政党了,可能还会不止一次地碰到粮食收购上的困难。所以我们有义务对这场运动进行正面的和反面的总结,企图进行这样的分析没有什么不好,也不可能是不好的!至于非常措施的好处超出了不好的方面,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这不是说就不能说这些不好的方面。卡冈诺维奇在这里把非常措施和第107条从价值规律及其在我国经济条件下的有限作用中抽了出来(!),为采用非常措施的实践做出令人怀疑的理论论证,从他的发言中得出的,是完全为这些非常措施本身进行辩解(而不是分析)。而对于我们来说,采用非常措施的问题是选择一种最小的危害,而且我们认为这些措施是危害最小的。但是如果设想人们会问到我,我们在1月推行这些措施时,是不是预见到了所有现在我们在实际上发生的那些结果和消极的后果,那我要开诚布公地说,没有,而且我也不认为这样开诚布公有什么不好。而且我所说的非常措施不仅是我们从中央下发的那些指示,而且还包括了中央和地方下发的所有指示,以及由于推行这些指示在农村建立起来的那整个制度。譬如,如果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请您说说,有多少粮食你们是因为执行了指示得到的,又有多少是因为“扭曲”而得到的,那么我是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称做是扭曲的许多东西是存在于这些措施的体系里的。还有就是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不能推卸掉对我们称为扭曲的那些东西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是党的中央委员会,是要为自己的地方组织负责的。

斯大林:说的对。

李可夫:譬如说,我不能在群众大会上声明说,搜索农民的院子是违反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指示的。我不能不在任何一个农民的集会上维护这些搜索,因为我们是要为它们负责的。怎么会不是这样呢?如果我们在说非常措施,那把

它们和“扭曲”分开是不对的。有的时候把个别人在粮食收购过程中犯下的刑事罪行和半刑事罪行也归到了扭曲中,这是完全不对的——犯罪就是犯罪。而一系列的“扭曲”是从1月开始采用的整个粮食收购体系中的有机部分。可能政治局提出了一些指示,而如果没有广泛的补充措施,这些指示是无法推行的,这样做是错误的。但是事情是清楚的,如果再要——上帝保佑不要这样!——推行类似的措施,那我们也有责任考虑到指示应该相应地有所不同。

而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里发言的时候,照我的看法简直就是在一系列问题上把这次全会和四月全会搞混了。他到处都是说的扭曲,不是整个的非常措施。在卡冈诺维奇的速记发言记录里,说到对政治局交全会审议的各项决议做总的评价的时候,说了以下的话:“我们应该通过那个向我们提出来的和我们现在要通过的决议,作为一般性的前景,作为和扭曲现象的斗争”,也就是说,卡冈诺维奇的出发点是,非常措施还应该保留下来,而我们将只是和扭曲作斗争。卡冈诺维奇发言的整个意思就在于维护这样的非常措施,随时随地都要这样。

**卡冈诺维奇:**不是这样的。您所引用的那个地方我说的是这些非常措施是不能变成一种系统的。

**李可夫:**我现在很愿意引用您关于行政措施的话:

“苏维埃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区别是,我们的政治是和经济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行政也是和经济交织在一起的。”

就好像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没有这种情况。而在资产阶级国家是怎样的呢?显然的是,那里的政治和行政也是和经济交织在一起的。

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卡冈诺维奇为了深刻地提出非常措施的问题,出乎意料地开始议论起价值规律来并从中“引出”了刑事法典的第107条……卡冈诺维奇同志要这些干什么呢?他的整个论述的基本任务是要证明行政性的和非行政性的经济措施之间是没有区别的。但是要知道,新经济政策的有些东西和战时共产主义是有区别的!当然,如果我们在个别情况下起用了行政措施,那我们实行这些措施是为了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在和小生产者的关系中,基本的作用是要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从经济上改造小生产者的广大群众,把他们吸收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系中来,而行政措施并不是要起这样作用的。当然,就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我们也给自己提出了一定的、产生于无产阶级革命性质本身的政治和经济任务。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党当然是不仅不会放弃十月革命本身提出来的、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的,而是相反,是要顺利地解决这些任务,只是为此采用的是另外的方法。在战时共

产主义时期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我们都是在追求同一个最终目标,但是从这里得出的,绝不是在这些不同的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手段和方法是完全一样的。相反,新经济政策体制和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就像战时共产主义在理论上不排除采用经济方法一样,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可能有些经济以外的(行政的)施加影响的情况。但是这完全不是说,从行政上和从经济上施加影响是同样的。卡冈诺维奇的整篇发言第一是建立在一种说法的基础上的,那就是行政的和经济的措施之间没有区别——“证据”就是,在我国条件下,要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要把苏维埃的经济体制和资产阶级的经济体制对立起来;第二是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的,那就是我们的全会应该做的是谴责“扭曲”,而不是进一步采用这些非常措施的问题和分析过去运动的结果。我们在采用非常措施上走得相当远了,现在已经可以而且应该对走过的路进行总结了。

我不能夸口说,我们采用非常措施完全达到了我们想要的一切。我个人曾相信,行政措施将会导致消除粮食危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就像我们和贫农及中农的关系没有受到破坏的状况没有发生一样。应该完全开诚布公地承认这一点。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像这里对某个人的指责所说的那样,我还另有所图呢?

我是发生过的各种事件的主要责任人之一,至少我不会用什么东西把自己和党所做的一切分割开来。我们集合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可以批评自己也批评别人,照我的看法,这中间不可能有什么可耻的和会引起反感的東西。非常措施有自己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如果我们没有采用这些措施的话,我们面临的状况就会更糟了,因为如果在工人地区发不出粮食的话,那很清楚,是会引起更大的复杂情况,会是一场总危机的。有必要采用非常措施是肯定的。但是我在这里不能像发言人中的某一位那样,成为一个盲目的崇拜者,为了论证采用非常措施的必要性,说不得不按另一种方式在年中提高粮食价格了,而这是非常不好的。

如果哪怕是在年中提高粮食价格能够给我们一个出路和彻底解决粮食危机的话,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任何地方,任何一个宪法里都没有规定根本不能在年中变动价格。对于我们来说,某种水平的价格不是某种终点。譬如,我在1月反对提高粮食价格根本不是由于出于某种不可逾越的“自然规律”,根据它,7月规定的价格就应该直到下一年的7月都不变。我的出发点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可靠的保障,能做到由于这样提价就可以解决粮食问题。为了描绘一下在粮食价格问题上的盲目崇拜的态度有什么害处,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看,在

反对1月改变粮价的政治论据中,有一个论据实际上出现了怎样的情况,这是一个主要的论据:必须在春天按低价向贫农提供粮食。春天买了粮食的贫农需要缴出低价的粮食。这是正确的。有人说,如果我们是在年中提高粮价,那么就是这样的结果,秋天在贫农那里按低价买了粮食,我们就要迫使他在春天按高价买粮食了,我们向富裕阶层支付的就要比向贫农支付的多了。可是实际上我们是不是按低价给了贫农粮食呢?没有给,不仅是按低价没有给,而且根本就是按什么价也都没有给!贫农现在不得不按投机价买粮食,受富农的奴役。这样一来,无论是从什么地方也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盲目崇拜价格,不允许对价格有任何变动。我们在那个时候不能提价,是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加紧粮食收购的期限剩下的时间非常短了,而价格的变动总是会引起农民的警觉的。他们大体上是这样议论的:开始对价格做点什么事了,已经加多了,我们等等吧——还会再增加的。但是如果问我是不是我们在1月对一普特增加20戈比会更好些,粮食收上来的会多得多的话,我会毫不怀疑地回答说:最好是增加。但是问题就在于,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保障能说会出现这种情况,而相反的是有许多论据是不利于这种期待的。

在看到各个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州的委员会关于粮食危机问题的争论情况的时候,我碰到了这样的议论:我们在过去(显然是指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经历过很大的困难,用了很大的压力和这些困难斗争,但最后总还是光荣地战胜了它们。我感觉,这样的类比是不对的。它们的错误在于,农民现在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不一样了,实施非常措施的社会环境也不一样了。一些年来,我们教会了老乡革命的法则,自我组织等等,力图提高他们的觉悟。在推行强制措施的每一个小小的环节上,农民面临的都是这个战时共产主义的整个制度。

莫洛托夫:还有土地。

李可夫:老乡知道他们是在进行一场争取土地的国内战争。但是现在他们想的是,这个土地已经拿到了。至少在他们的意识中,没有来自力图要把土地夺回去的地主的直接威胁了。

斯大林:已经烟消云散了。

李可夫:对他们来说,是烟消云散了。他们相信是稳稳地坐在地上了。所以在现在这种和老乡的经济联盟而不是军事联盟的条件下,想去起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那一套就完全不对了。在现今条件下,采用战时共产主义式的措施,就会得出比以前更加消极得多的后果。有一种夸大的乐观的看法,认为既然中农的天性就是动摇的,那就让他们去动摇吧,这也是非常错误的。(笑声)有人

说,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就是这样写着的。中农今年就动摇了。你们有什么可以吃惊的呢?要知道,到处都说了,中农是动摇的阶层,所以他们就动摇了呀。而如果你们怕这个,那你们就是制造混乱的人,就是对中农的社会天性什么也不懂。但是问题的实质恰恰就在于,要不断地让他们的动摇越来越更多地向我们这边摆动,减少向相反方面摆动的可能。如果这个中农的摆针将向着另外的方向摆动,向富农、资产阶级方面摆动的话,那么,这就将会导致中农和我们的分离。对中农来说,什么能够引起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高涨、加强和扩展呢?那就是巩固和贫农以及中农的联盟。我们应该在全面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越来越更牢固地让他们和我们联在一起。有一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将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也就是说,要通过过渡性的社会阶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工匠们、中农的破产来达到,这种理论在我们这里从来就没有任何“声望”。对这些阶层我们采用的是完全另外的办法,是从列宁提出的那个合作化计划出发的,是要用合作社组织把这些普通的商品生产者阶层包括进来,通过这种组织改变他们的整个“生存方式”。当然,从这些过渡性阶层中生成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将会随着我们对他们的限制,越来越更冷酷无情地进行抵制、反抗并和我们斗争。我们应该越来越更加牢固地让这些过渡性的阶层和我们站在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推进是和改善除富农、资本家和耐普曼外的广大的各阶层人民的状况联系在一起的,而富农、资本家和耐普曼将会随着我们对他们的进攻而进行顽强的斗争的。

粮食收购过程中,地方的和中央的各个机关都犯了一系列错误,在分析粮食收购的经验时,大部分发言的人得出了什么结论呢?结论是,如果要继续推行非常措施,那实质上就意味着国内的政治危机,非常措施应该取消。同时,一些同志在分析农民情绪的时候说,应该让老乡们有一两个月时间“喘口气”。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他们喘了口气的时候,我们就又可以采用1月采用过的那些措施了,可以再让喘口气,然后再采用这些措施。老乡们是不会容忍这样的政策的!

决议草案里有专门的一段说到了两种倾向。其中一种是力图把非常措施看成是我们政策的经常性原则。米高扬已经指出了,譬如说,托洛茨基分子就认为这些措施是在实行“新的方针”,也就是说,是他们自己一直想要强加给党的政策。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什么人上了托洛茨基分子的这个当了?我引用西伯利亚边疆区委三月全会速记记录上的一段话,是基西斯同志说的,他是瑟尔佐夫同志的副手,西伯利亚边疆区委第二书记,他是这样说的:“粮食收购(指的正是用



非常办法进行的粮食收购——李可夫注)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我们整个工作中的某种新的东西。许多人想,粮食收购是临时性的停顿,虽然是很大的停顿,但是当我们对付了它的时候,它就将过去,一切又都会是照旧的。不是的,同志们,任何东西都不会是照旧的。粮食收购(非常措施!——李可夫注)是在十五大上所说的我们工作新阶段的开始”。

你们看到了,犯有这种过错的不仅有托洛茨基分子,——在我们党内开始形成一种相关的思潮了。我想,这不是基西斯同志根深蒂固的想法,如果说他已经有了某种倾向,以此来诋毁他,那是不正确的……

C. 柯秀尔:无中生有地读出东西来也是不对的。

李可夫:我要再说一遍的是,这是印在1928年的出版物第94页上的(1928年3月3日—7日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全会。速记报告,第2册)。我是照本宣科地读了那里印出来的东西的;我没有对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全会的速记记录做编辑,对任何东西也不可能做出解释,也不可能为这个集子里印的所有东西作任何辩解。

舍博尔达耶夫同志在这里发表了一种议论,可以算是这种思潮的另一个不大鲜明的例子。舍博尔达耶夫同志举了一个残疾人组合的例子,这个组合享受了优惠,得到了面包并把这些面包转卖了去喂马,从中获得丰厚的利益,因为豆饼比烤好的面包还要贵。任何一个在行的经济学家从这个例子都可以看到,国家正在经历的是怎样的危机现象,并且会由此得出某些经济上的结论来,那就是必须要这样来安排事情,让马不去吃烤好的面包,让豆饼不要比烤好的面包贵出一半到一倍的价钱。而舍博尔达耶夫同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需要考虑到人和马的需要。这就意味着他是按照战时消费经营的方向,凭着惯性的思路在思考的。思维的方式是寻求直观的手法来对消费进行统计,可是基本的经济事实是马在排队等着粮食,豆饼比烤好的面包还要贵,这才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再鲜明不过的危机呢,而这一点却完全被忽略了。

雅罗斯拉夫斯基:但是考虑到还是有必要的呀。

李可夫:甚至如果我们这里现在是战时共产主义,而且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和舍博尔达耶夫同志一起,把所有的方面都完全准确地考虑到了,一方面是所有的马和它们需要多少豆饼,另一方面是所有的人和他们需要多少面包,规定出了这样一种规矩来,让豆饼比面包还要贵一半到一倍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有了最准确的“统计”,也不可能做到有任何正确的分配。卡冈诺维奇在这里的发言中也显露出了有上述那些思潮的某些痕迹。

在我们党内有着另一种类型的倾向。譬如说,弗鲁姆金同志在他的信里就有这样的表述:“每有一百万普特的粮食,无论是从哪个集团搞来的,都是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我们党的政策的总原则来说,这是完全不正确的。

明显的是,在危机时期,我们可以为了避免发生国内战争而做出相当大的让步。

**斯大林:**我们是向资本家购买。

**李可夫:**我们也向资本家购买。用社会主义的办法得到的、在社会生产中建立起来的每一百万普特的粮食,和从私人所有者那里得到的一百万相比,表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如果从社会主义成分得到的粮食有所增加,那就是最好地表现出了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了。所以,不仅是在总的平等条件下,必须要社会主义的粮食而不要资本主义的粮食。在需要有选择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分清这种主次关系。在没有选择的时候,我们一直是在向资本家收买粮食,甚至是从国外把粮食运进来。

在和农村的关系变得紧张的时候,就像绷得很紧的弦,完全可能会绷断的时候,是不能排除让步的。清楚的是,如果要在国内战争和这些让步之间做出选择的话,那么需要选择的是后者。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被放在了这种非此即彼的境地。如果我们经历的是“喀琅施塔得状态”的话,那就不能排除要采取大规模的临时性策略,把所有力量都聚集起来并重新按照既定的道路前进。从正面去攻占农村无论如何往往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就不得不选择迂回的办法了。接下来弗鲁姆金同志对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议论也是不正确的。很清楚的是,我们在十五大上做出决定的时候,并没有从而取消十四大的决定。但是在十五大上做出一系列决议,在我们获得了的优越条件基础上,提出了农业工作的新方向。

**有人喊:**对。

**李可夫:**有些人想,十五大取消了十四大的决定,这样的议论是不正确的。但是完全无可怀疑的是,十五大对我们和农村的关系加进了新的一页。

**米高扬:**说得对。

**李可夫:**你们大家可能都记得,在十五大的决议里是怎样修改了基本论断的:“在现在这个时期,把小的个体农户联合起来,改造成为大型的集体应该是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

现在,当我听着米柳亭发言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这里的提法不是非常慎重的,因为这样的提法使得米柳亭同志有可能简直就是在做出这样的声明(在他

要用什么来为自己辩解这一点上,我不会去反驳他的,因为整个全会都完全清楚的是,他要想为自己辩护是做不到的):“在我们这里,生产率的发展是以农业集体化的各种形式进行的,也不可能是其他的形式进行。”

他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例会上——上来就向非党的农民宣布了这一点,而在这里又企图证明他做得完全正确。上帝呀,这是不能允许的!要说是现在我们这里,在每一个阶段上个体经营的生产率都不可能得到发展——这可是无中生有的!

米柳亭:这是不正确的。

布哈林:而且这恰恰是建立在修正主义的土壤逐渐瘠薄论的法则基础上的。

李可夫:可能这是建立在许多其他方面的基础上的,但是我可以同意米柳亭同志的,是他并不想这样做。(笑声)

但是他不可能不仅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例会上,而且是在全国,向每一个农民解释清楚,不应该像他所说的那样理解,而应该是作相反的理解。(笑声)要这样说,那就只能是对十五大的决定做这样的解释,说是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只限于集体化。米柳亭也就是从这样的解释出发的。

斯大林:这样的解释是绝对错误的。

李可夫:这样的解释是绝对错误的。农业是需要集体经济、国营农场和个体经济这三条线上都得到发展的,如果说我们在开完了全会之后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大家就会惹出更要大得多的危机来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整个农业产品中占有的比重是微不足道的,这个事实应该能唤起党竭尽全力提高这个社会成分,但是不能忘记,这暂时是不可能达到的,90%多的粮食我们是要从个体农户的手里得到的。要把农业改造成另外的样子,将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这样的错误看法不仅是米柳亭同志有,其他一些同志也有。我好像是曾经请人看看,是不是能给我拿来新的人民委员库比亚克这样的讲话,说到考虑到农村中的社会主义萌芽还很脆弱,对中农和贫农的个体经济的发展不能忽视或者采取中立的态度。遗憾的是,我并没有能达到这个目的。需要采用一切措施提高农业集体的作用,但是不能是费尽脑汁地和中农的个体经济进行残酷的斗争,或者是对它全然不在乎。只要是还没有用集体化的原则把农业全部改造过来,那么,整个这段时间还将是要靠个体经济来养活我们的。有些同志说,再过5年我们就能从国营农场得到1亿或者2亿普特的粮食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和农民捆在一起的那根绳子大大地松开了。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国营农场将能大大改善我们在推行粮食收购中的正确政策的状况,它们将

会使得我们在粮食市场上的运作变得更轻松,将能提高农业,但是它们不能解决上亿农民和工人之间的相互阶级关系问题。这是关于人的问题,而不是多少普特的粮食问题,解决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没有和农民的联盟,我们就不可能建设起新的社会,不可能建设起社会主义来。至于国营农场将会扩大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优势,那是对的,但是用关于国营农场的问题无论如何是改变不了加强和农民联盟的基本路线的。

决议里说到,农业太落后于工业了。联系到这一点,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开始用希腊文说起话来,讲述了阿尔发和欧米加<sup>①</sup>。(笑声)

柯秀尔:你今天怎么火气特别大。

李可夫:我想对这一点说上几句是为了避免有不对头的解释。

如果我们用同样的速度发展农业和工业的话,那么这将意味着国家要经历一个农业化的过程。可是我们是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工业的发展速度应该超过农业。问题在于为这种速度上的差别设定一个正确的度。如果我们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农业将要落后,而且接下来也还应该是落后的,但是现在它落后得太过分了。所以在决议里写上了“非常”这个词,它意味着需要促一促农业。但是绝不能由这一点就得出结论说,需要让它优于工业。

奥新斯基同志恰巧是企图在我这里找到矛盾。我应该承认,奥新斯基同志责怪我这一点是对的。我几乎是每一年都要说到经济问题,1923年的时候,工业是战前水平的30%,农业是70%,我说:农业超过了工业。照我的看法,在那个时期就是这样的。而奥新斯基同志要求我的是,在所有的年份里都要像鹦鹉学舌一样地对所有情况说一样的话。(笑声)这一点我做不到。谁也不会否认,从引证的这种关系中——农业是战前水平的70%,工业是30%——可以得出来的是,必须要加紧让工业尽可能快地恢复起来,要把工厂里的工人集合起来。但是奥新斯基同志在自己的发言里提到首位的是什么呢?他硬是说我们的预算太膨胀了,应该把它压下来。而当我们把它压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是比迄今为止更多地投向轻工业和农业。如果我们从更少的资金里,从更少的预算里给轻工业和农业的更多些,这会导致出现什么情况呢?照我的看法,会是导致从总的方面重新审议我们国家的整个工业化计划。

喊声:说得对。

<sup>①</sup> 阿尔发和欧米加是希腊文字母表上首尾的两个字母,转义为事情从头到尾的全过程。——译者注

斯大林:说得对。

李可夫:奥新斯基把这两个提法作为主要的东西提了出来,在这之后又说是站在党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基础上的。这是不对的。这就像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声明不对一样,这个声明实质上可以归结为必须在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交换中建立对等的关系。在这方面(但不仅仅是在这方面!),没有同意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卡冈诺维奇同志是绝对正确的。从农业和私有成分里把一定数量的资金“倒到”社会主义的成分中去,在今后也还应该继续下去。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了,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做出了一系列改变了整个政策基本原则的让步。

斯大林:那就是要把工业关闭。

李可夫:把一部分资金从私有成分(农民在其中占有主要的位置之一)倒到社会主义成分里去,就是在今后也还应该继续这样做。价格体系就是从这种转移中产生的,而且这里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现在我们大家都认为,转移的具体尺度,也就是产生这种转移的抽力,显得对于农业成分来说是它力不能及的,需要减弱这种抽力。对于怎样减和减多少,我们这里可能会有争论,但是这不是说要放弃转移本身。

有人提出了建议说,要增加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拨款,要更多注意农业,要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等等,所有这些建议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什么呢?和以前的情况相比,这意味着要这样来重新分配资金,让农业比以前少些委屈。这是要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分配国民收入。但是这种重新审议的界限是要在农村和在城市,对工业,特别是对国家的工业化,都保持整个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基本路线在这里应该是完全保留的。

可以说是只要读过农民和工人的来信,到群众集会上去走走,光着手就能摸到危机的,我们是不是将能走出这种危机呢?是不是有可能平安地走出去呢?我看是有这种可能的,米高扬同志说的对,他指出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积极的指标,其中包括良好的年景和他所说的,有一切经济的前提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里消除危机。这里也包括了工业的增长,预算完成的情况好,还有硬通货和相对良好的信贷体系状况,成本的降低,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商品总量的增加,等等。所有这些都奠定了从这场危机中走出来的条件。但是在这里的一系列发言里显露出了这样一种没有说出来的问题,如果不能在全会决议的基础上把粮食收购上来,那将会怎样?卡冈诺维奇在一定程度上说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应该是这样来办事,要在12月前结束我们的收购运动。

卡冈诺维奇:在3月前。

**李可夫:**开始的时候您说的是12月前,而当有人从座位上插话的时候,您在两页之后(我这里有速记记录)说了——在3月前。

**卡冈诺维奇:**我说的是粮食收购的基本部分。

**李可夫:**在我们要通过的那个决议基础上,我们到12月的时候还做不到完成我们的粮食收购计划。由此而来的危险是,我们可能会再次遇到要采用非常措施的情况,会出现安德烈耶夫同志说到的那些后果,它们将意味着要和中农分离了。而和中农分离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现在没有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群众斗争,这说明了现在和中农还没有完全分离。

**柯秀尔:**你是说没有完全分离吗?

**李可夫:**虽然这种分离的某些成分已经有了,也就是说,有了农村中的一定阶层离开我们的成分了。完全分离指的是一种接近于国内战争的状态,或者是国内战争本身。另一个出路将是在国外购买粮食。我想,如果认为现在已经是到了非此即彼的地步,使得许多同志已经把非常措施的单子握在了手里,可以在一分钟里就毫不费劲地启动它们,这样的状况未必是可能会出现的。无论怎么说,非常措施的政治结论是这样的:党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避免采用这种措施。

**斯大林:**对。

**李可夫:**如果我们决定了这样做,而且我们是应该这样做的,那么我想,安抚农民,转向新的轨道,转向新经济政策的轨道,需要一段相当的时期。可能在最初几个月里,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在由于采用非常措施给那些农民的情绪造成的压力下进行收购,可能人家不会是马上就把所需要的数量的粮食都缴出来。所以在贯彻提请全会注意的那个决议时,需要表现出相当的耐心来。

如果还是搞清楚,我们将做不到顺利地进行收购,那就必须要召开中央全会,专门由大家一起确定我们将采用什么样的措施。

照我的看法,推行决议是不是能成功,决定性的基本因素之一是价格。为了避免在粮食收购上可能出现新的失败,未必需要对粮食价格的提升特别吝啬。不可能是让确定的价格达到等价的程度,但它应该能够保障工业的优越性。不过,我们离这个界限还有很大的余地。

在结束时,我想说的只是,这里有过对我们政策的分析,对党和苏维埃领导机关活动的批评,其中也包括对我作为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困难时期的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批评,但还完全不够。我认为,所有在这里发过言的同志们的讲话里都有一个消极的成分,那就是全会成员中没有一个人走上讲台

来批评一下我们,哪怕是我或者鲁祖塔克同志,我们曾在一起制订了所有的经济计划。在自我批评的时候,我感觉这样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因为譬如说是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我也好,布哈林同志也好,斯大林也好,所有其他人也好,如果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做的都是正确的,那么难道由于完全正确的决定和正确的领导会冒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样的危机吗?这样的看法表现出来的是,对事业的粗枝大叶和听天由命的态度。难道我们一定就应该是通过我国经济中的危机才能做出我们现在做出的这些决定吗?难道就不能事先预见到什么和及时采取某些措施吗?我们是由于危机才做出了新的决定的,这就指出了,在我们的政策中并不是一切也不是在所有时间都是推行得完全正确的,因为否则的话,就不会有现在形成的这种非常困难的局面了。

**斯大林:**决议里说到了。

**李可夫:**在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里,把国家引导到这种状态的政府是要受到猛烈攻击的,会出现要更换它的问题的。在我们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批评,更多的活思想和更少的心安理得和装点门面的一切正常。

**有人喊:**您自己批评一下自己吧。

**李可夫:**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我们都会继续犯错误的。而且中央和中央委员们如果纠正我们越少,我们犯的错误就会越多。如果你们譬如说要求我在随时都要解决的一大堆问题中的作为是完全没有过错的,你们又不是非常积极地去想这些问题,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批评错误,那么,错误将会更多。要知道,我要重复的是,其他国家,特别是在农业国家里,在这样的条件下,在3年的中等收成之后造成的局面下,当豆饼要比面包贵上一半的情况下,耐普曼可以在莫斯科随便买多少面包,而农村里的贫农不可能买到粮食,也不可能得到粮食,去受富农的奴役的话,许多政府是会被赶下台的。

而且如果想象这样的危机是经济生活的领导对我们所有问题的决定都是完全正确造成的结果的话,那是完全不正确的。我要再说一遍,如果我们能分析已经造成的局面,这没有什么不好。如果我们做不到这样,我们就将会再不止一次地回到这种危机状态上来。这是由此得出的一个基本的结论。好像斯捷茨基同志说过,我记不太准确了,推到客观(原因)上的太多了,自己承担的太少了,有人从座位上对他喊道:“他瞄准的是更远的什么地方”。我想:他可能瞄准的是我,因为我在经济问题上干得很多了,而且向全会报告了控制数字。在想了想这一点之后,我并没有发现在这种“瞄准”中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因为提出这样的

批评是党中央和它的每一个成员的任务。

(休息后)

主席(李可夫):雅科夫列夫同志发言,下一个是茹柯夫同志。

雅科夫列夫:我只想提几点意见。首先是关于奥新斯基同志所说的话。

如果是把奥新斯基同志的每个建议单个拿过来并同时尽可能少地审议奥新斯基同志的每一个建议的实际尺度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些建议里除了看到对我们的实践中的那些技术上的修正外,什么也看不到,类似于这些修正的东西我们是不得不在我们机关的日常工作中非常经常地审议的。如果总的审议奥新斯基同志的建议,把它们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行动纲领的话,那就不能不承认,从奥新斯基这里得到的纲领太像是、十分令人怀疑地像是我们不久前在康德拉季耶夫主办的财政人民委员部行情研究所周刊上读到的东西了,这个研究所现在被关闭了。实际上你们可以得到他的一份完整的纲领。构成它的是:第一,坚决缩减资金从纺织工业向重工业的需要转移;第二,坚决压缩疗养院——在这个“谦虚的”建议名下,在行情研究所的周刊里隐蔽地阐述了关于压缩工资的建议;第三,吸收外国资本;第四,比中央委员会更坚决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也意味着最终要削弱现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对工业拨款的来源之一);第五,暗示了不应该夸大在我们的困难中阶级成分的意义。

奥新斯基:我在什么地方说了?一句话也没有。

雅科夫列夫:读读自己发言的速记记录您就能看见了。如果你们把这些建议一个个地比较一下并从总的方面看看它们的话,就能得到一定的“产品质量”了。我没有时间和奥新斯基在这一点上争论,但是我能够用一个有根有据的材料向他证明,奥新斯基在非常大的程度上照搬了行情研究所的纲领。你们在行情周刊上可以找到奥新斯基同志的每一个建议和这些建议总体上的整个体系。

奥新斯基:可能你们能找到个别的话。

雅科夫列夫:现在来说一说下面的意见。什么是制约农业发展的基本成分,这是一刻也不能回避做出直接回答的问题。十四大和十五大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并没有改变:工业发展不够是制约农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正是通过加强发展工业我们才能得到基本保障,最终让我们能够消除农业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些困难。农业发展能够有多快,主要取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农业对机器、肥料和加工的需要。换句话说,我们由于缺乏农产品所面临的困难可能最终得到解决,只有靠发展工业,这种发展要能够满足农民经济中的技术革命和社会改造



的基本要求。

在这里还必须说到一点,那就是如果不正确地解释这次全会的决议的话,可能会在我们面前出现什么危险。这些天,我在和莫斯科的一些工人交谈时,遇到了一些想法,我想,如果我在这里把它们说出来是正确的。大体上人们是这样问我的:“现在发生的不是向右转吗?”我对这一点感到吃惊,于是便盘问道,你们这是从何说起的呢?

**乌格拉诺夫:**你还是要说清楚,这是莫斯科的工作人员,而不是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雅科夫列夫:**无须做这样的说明。谁也不会怀疑这一点。我不知道和我谈话的同志们是根据什么有了这种担心的。但是如果将要通过的全会决定在一些人那里引起了右转的担心,那就要知道,另外的人就可能会把它们理解成就是这种转变,也就会相应地安排自己的实际工作。所以为了避免在那些支持中央委员会路线的工人中间出现不正确的关于右转的概念,也为了让那些真正希望有这种转变的人不会出现认为他们的手脚被松开了,必须要非常清楚地强调抹杀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对富农的路线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

我们的农村实际状况怎样呢?首先,对富农来说,基本的事实是:富农肯定在粮食收购时是会对我们施加压力的。虽然我们的错误对困难的尖锐化肯定起了作用,但是基本的情况是,当然是由于一系列条件的作用,其中也包括我们的错误所起的作用,富农在今年有了可能对我们施加相当大的压力。他是在坚决削减出售粮食的时候对我们施加压力的。我们给了他们坚决的回击。

同志们在描写北高加索农村的局势时,大体上是这样说的:“富农不久前在北高加索的大街上威风凛凛,现在把尾巴夹得老老实实的了。”

**罗伊津曼:**把粮食缴出来了。

**雅科夫列夫:**缴得相当彻底。但是同时还需要记住,春天的时候,在一些地方富农还是利用了粮食不够的情况,把一些失去的阵地又夺回去了。

所以,总的平衡状态是这样的,我们对他们的压力比他们对我们的压力大,他们得到了我们方面很强的反击的时候,他们就相信了我们不是一个能够开玩笑的政府,——可是,春天的时候富农又把一些阵地夺回去了。同时正是在春天的时候,在一系列地区,其中也包括在做到了相当清楚地让贫农和中农与富农对立起来的地方,春天的时候富农和贫农之间关系的尖锐化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必须完全考虑到在农村开展起来的和富农斗争的这种事实。而且应该是从这种状况出发。为了让我的思想更清楚些,我给你们读一读农民来信中的几

段话,它们可以勾画出贫农和富农的这场斗争的尖锐程度。

来自库斯塔奈区(亚努谢夫斯克村,沃罗比约夫斯克村委会)的信中说道:“农村的富农有余粮,但是不卖,而是说:让所有的贫农都死绝了吧,这不关我什么事,让政府去供应给你们吧。”

来自萨拉托夫省(彼得罗夫斯克县,布雷基诺村)的信中说道:“富裕人家有粮食,但是他们装成是喀山的流浪儿。”

来自西伯利亚(巴拉宾斯克区,穆辛斯克村)的信中说道:“富农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在倒腾粮食。6月6、7号,富农克利亚琴·彼特罗和富农波尼勃拉坚科·格里高利倒腾了整整两夜的粮食。如果是自己村里的农民来说‘大叔,你有没有哪怕是一普特的小麦呀’,——那他就回答说:‘没有,我自己都在挨饿呢’。可是整整一夜打着灯笼在那里搞交易。这样的富农该用刑事法典的第107条给宰了。”

来自沃洛格达省和县(科夫什诺村)的信中说道:“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无论如何要把贫农从富农的爪子下解救出来。而对比较明显的隐藏余粮的可恶分子应该采用刑事法典的第107条,而在危机结束后,在这个基础上,所有搞清楚的富农和贫农被迫进行的交易都应该解除,并且不能让富农把贫农的劳动据为己有。”

来自乌拉尔州(伊什姆斯克区,马拉霍沃村)的信中说道:“在我们马拉霍沃村,富农不喜欢贫农,宁愿把他们咬死。今年春天决定要把贫农饿死,连一普特的粮食也不卖给自己村里的贫农。由于这样,贫农非常艰难。难道就不能从富农那里拿到粮食吗?”

来自库班区(季霍列茨克区,霍别尔斯克村)的信中说道:“在富裕的菲利普·科兹洛夫那里发现了大量的余粮,是分散在各个不同地方的。这样的分子在我们村里很多。例如伊万·科瓦廖夫就是。富农们,第107条正在对你们哭泣呢。”

来自卡卢加省(米亚特列夫县,尤赫诺夫斯克乡,斯图比诺村)的信中说道:“粮食到哪里去了?原来粮食都被富裕的富农储存起来了。最近地方政权让一个农民卖了许多粮食,而且把他关进了监狱;顺便说说,他有这么多的粮食,还去排队买5俄磅的面粉,但是去的目的是要转移乡里的视线和表现出他没有粮食。在我们乡里,特别是在尤赫诺夫斯克乡的合作社里,有的是这样的现象。”

来自塞米巴拉金斯克省和县(卡林斯克乡)的信中说道:“富农不运出粮食来,而他们有2000—3000普特。这就是为什么收购到的很少。我的意见是:

拿富农的来周转和在实际上采用能够适合贫农的做法”。

来自库尔斯克省(雷里斯克县,格雷什科夫斯克乡,莫尔多科第二村)的信中说道:“在我这个区里有3个剥削者卖了很大的力气,他们是瓦西里·列申科、康斯坦丁·列申科和德米特里·切尔巴科夫(最后这个是被吊销了选举权的)。这些齐特·齐梯奇<sup>①</sup>租用了苏维埃政权很好的园子,但是他们只缴了一普特的燕麦,而他们是有许多普特这样的粮食的。”

来自切尔尼戈夫区(斯诺夫斯克区,波边尼亚村)的信中说道:“粮食收购进行得很不得力,因为富农不把自己的粮食运到粮站去。应该把这些顽固分子都根除掉,让他们不要妨碍我们铺设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来自北高加索边疆区(萨利斯克区,别洛哥林斯克区,茹柯夫斯克村)的信里写道:“茹柯夫斯克村恼火的贫农再也忍受不了了。可也是的,看着把粮食运到粮站的时候怎么能不爆发出来呢。富裕人家在这件事情上的动作也实在太笨拙了,很不乐意把余粮运去。苏维埃政府反对富农计划的措施不对他们的胃口。但是富农在我们这里失算了。贫农很好地搞清楚了,必须要完成国家计划,于是竭尽全力地让这个计划能够完成。无论富农怎样卖劲,他们还是不得不把粮食运出来,虽然说当然远不是全部的。”

来自克里米亚(斯拉布斯村,斯帕斯—科罗加半岛)的信中说道:“我们区里去年歉收。但是我们这里有这样的农民,他们的小麦储藏不是几十,而是几百甚至几千普特。但是这些老乡不打算把粮食运到粮站去。”

所以我的意见是:不需要再和这样贪得无厌的人客套了,需要压一压他们,让他们把自己的余粮卖给国家。他们如果能越快地把这件事做了,那就越会对贫农和中农更好些。”

来自哈尔科夫区(扎基切夫斯克区,安德烈耶夫卡村)的信中说道:“在我们这里是谁在运粮食呢?贫农和中农。富裕人家的粮仓都要装不下粮了,但是他们连一普特自己的粮食也不运出来。这能允许吗?无论如何不能。我们的贫农和中农不能允许有这种情况。为了让贫农和中农能有粮食,需要迫使所有富农都把这些粮食缴给国家。”

接下来我就不再读了。要把所有这些信都读完,那得要整整一个小时。这

<sup>①</sup> 齐特·齐梯奇是俄国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的喜剧《无端遭祸》中的一个主人翁。他是一个商人,贪婪成性,刚愎自用,专横霸道。后来这个名字便成了野蛮粗暴、愚蠢冥顽、作威作福者的同义词。——译者注

些信的实质只有一个,那就是无论是在怎样的程度上把农村中的阶级斗争略而不记,那都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是最危险的。如果我们的决定被贫农理解成是对富农的让步,或者是放弃十五大的路线,或者是缓和这个路线,那么就会成了这个贫农和富农斗争是我们鼓动的,而且没有能得到我们的支持,可是贫农在和富农斗争的时候,是指望得到这种支持的。

我们的责任不是去扼杀贫农对富农的仇恨,而是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同时要把这种仇恨纳入这样的形式,要能够加强贫农作为我们的支柱的意义,要和我们的政策相符合。如果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决议草案的话,那么就需要专门就贫农的问题对它做出补充。由此可以得出的是,我们需要马上针对着富农对于我们的“退却”可能做出的种种议论,针对着富农庆幸获胜的姿态,针对着反对派可能会做出的种种挑衅,直接做出我们的决定,同时需要千方百计地加强组织贫农,加强对他们的政治动员,因为这最终是让中农和我们在一起的决定性条件之一。不然的话,中农是很容易发生动摇,倒向富农一边去的。我们不久前通过苏联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这条线专门检查了在贫农中的工作。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对贫农的组织程度落后于从行政这条线上对富农施加压力的程度。甚至在通过苏维埃等等这些线对富农施加的压力太“过于”卖劲、出现了过火行为的地方,对贫农的组织也直接是落后的。甚至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的也是对贫农的组织规模不能适应从行政上对富农施加压力的规模。我们需要消灭和取消的是一系列扭曲,放弃一系列单纯行政的调节手段,但是同时需要从阶级的意义上对这一点进行补偿,为贫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和千方百计的加强奠定基础。否则的话,我们肯定会遇到危险,我们的决定会被富农做出歪曲的解释,当然富农会向贫农解释说,这些决定是我们的退让,是他们富农的胜利。应当考虑到富农是会企图抬头的,会企图再对贫农施加压力的,——应该用加强贫农的组织来对付这种情况,不然的话,虽说将会有更好的经济前提让中农向我们靠拢,阶级的对应关系将会发生对我们不利的变化。

我要很简短地讲的这件事的另一个方面,可以归结为以下的内容。我的感觉是,粮食问题现在比整个农业的问题更大。企图用整个农业的发展问题来换取粮食问题未必是正确的。

如果把粮食从我们的出口中抽出来,就会极大地压缩了我们的出口资源,我们出口的这种状况强调的,正是粮食问题的尖锐性。技术作物,特别是亚麻和棉花的进一步发展,也要首先取决于相应地区的粮食保障程度。这就是为什么首先要说的是粮食问题。我认为,在这里,我也要重复我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过的

话,那就是发展粮食产品的问题首先是提高产量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这里的状况糟透了。关于产量增长的前景,所有现有的指标(6%—9%—11%)都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提出来都是由于完全不理解提高农业的那些条件,而这些条件是在我国条件下由生产的合作化和农民经济的技术革命提供的。

在这方面,农业人民委员部(包括以前的和现在的)的工作有一个非常实质性的缺陷。在国家对农业有相当大量投入(今年大体上有2亿从预算里投到了农业上)的情况下,没有一个目标明确的利用这些投入的方针,没有一个目的明确的、可以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把关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整个问题带动起来的方针。我们常常像一个浪费挥霍的人,搞得很分散,不会在必要的规模上解决这样一些任务,通过解决这些任务的确能够在十年时间里把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一倍。

我要像在党的十五大上那样,绝对肯定地说,在十年时间里把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一倍的任务实际上是可以解决的。解决这个任务的条件是越来越快地实现生产的合作化,其中包括加快集体农庄的发展速度,要联系到农民经济的真正的技术革命,在这场革命的基础上进行。

我的感觉是,决议的这一部分表述得有些不大够。说到单位面积产量和合作化的地方完全是一带而过。但是整个问题就在于,如果没有合作化和最终没有生产合作化,我们就得不到我们所需要的提高农民经济的速度。我不止一次地已经引用了小农民经济的效率和大型农民经济的效率的比较数据。

如果拿小型的和最小型的经济和大型的、富农的经济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么这种比较表明的是,小型的和最小型的农民经济和我们的那种绝不是文明样板的富农比起来,一俄亩的收成要少一半,单位产量的成本却要多出半至一到两倍,而且这还是在小经营者要比富农在一俄亩地上花费的体力劳动要多出一半到一倍的情况下。如果你们有的是这种从事小生产的小型 and 最小型的农户的话,那么,提高他们的单位面积产量问题最终就会首先变成合作化的问题的。正是合作化能够向小型的和最小型的经济单位在某一方面提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富农才能享有的那些优越性。这也就是我们应该加以利用的。所以我想,对政治局决议的这一部分应该做些修改。应该是清楚地说出,正是走合作化这条路,走小型和最小型的农户逐渐在生产上联合起来这条路,哪怕只是在某些方面向小型的和最小型的农户提供大的生产单位所能拥有的那些优越性,我们才能在我们必须要有规模的规模上取得成绩。

最后一个意见是关于我们应该用来替代今年已经失效的那些手段的调节市

场的手段。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米高扬同志几乎一个字也没有提,发言的人中间也没有一个人谈到这件事。要知道,我们是不能放弃调节的,这是完全清楚的。完全清楚的还有,今天在按一普特6—8卢布出售粮食的富农也不是那么轻易地就会放弃这样做的。所以就必须是想好那些取代我们放弃的手段和办法的调节办法和手段,坚决消除所谓的非常措施。其中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停止在集市价格非常高的地区购买粮食。我们在所有地区都是最大的买主。如果我们将用老乡制服我们的那种耐性来把老乡制服的话(在我们没有粮食储备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很大范围内做到的,但是在国家的某些部分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么我们就能够达到不小的目的了。

接下来是关于利用我们的商品基金问题。富农曾企图在粮食上用纠缠的办法对付我们,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某些地方试着在商品问题上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呢?当然,同样是在今天粮食储备不足的情况下,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在今天粮食不足的情况下,在特别广泛的范围里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但是在某些地方这是可以试试做的。我还想到,在我们需要的某些地区搞粮食投资是一个要实事求是对待的问题:至少收购上来的5%是可以投到这上面的,为的是这样一来,可以在某些关键性的点上把市场条件搞得更健康些。这样一来,就需要立刻实际讨论一系列的调节手段了:我们如何停止收购粮食,我们如何实现粮食投资,怎样才能紧急运送和停止运送工业品。

我想,在这部分需要对决议做出特别的补充,这个决议哪怕是事先规定一下那些在今年必须要采取的调节形式也好。

主席:有人建议改变一下发言人的名单。现在已经叫到了茹柯夫同志。请他发言,在他之后讨论建议。现在茹柯夫同志发言。

茹柯夫:我想请你们注意一个或者是几个纯粹的实际问题。今天这些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明天它们还会在我们面前再冒出来,而且只要我们不把它们完全消除的话,会是一直摆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物价问题。今天是不是有人会有这样的问题,说是我们能不能继续按照以前的价格得到粮食呢?当然,谁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清楚的是,粮食的价格已经提起来了,但是如果只是把粮食的价格提起来了,无论我们想还是不想,如果对这一点没有一个态度,其他产品的价格总还是会提起来的。而既然是这样……

喊声:为什么,为什么?

[罗伊津曼:肉和粮食有什么关系?

茹柯夫:肉和粮食也是有关系的,燕麦、甜菜、白菜等等,如果你不知道这一

点,那就应该多少分析一下,而既然所有这些都是和粮食有关系的,食品的价格会提高,工业和工人阶级就会面临一个提高工资的问题。而如果这个问题提出来了,那我们今天就将需要审议提高工资的问题了,不得不把它也和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和规划,和工业财政计划等等联系起来……所有这些都需要和工业品的价格衔接好。如果出现了一个问题,要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工资,那这个问题能怎样解决呢?我认为,这对我们将是非常大的困难,因为这不是简单重新计算数字或者把工业财政计划的数字衔接起来的问题,而是我们将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所有这些钱从哪里来。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如果黑麦的价格和小麦的价格或者黑麦面粉的价格比我们今天的价格提高一点的话,那么给剩下的粮食饲料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这对我们列宁格勒州来说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因为工业财政计划标出的数字和控制数字是大家都知道的,给我们绘制的场面是更大量地展开木材收购,更大量地展开个别的工业部门,它们将不仅是为国内市场工作,而且要为出口服务。这里就有一个我们的出口问题。如果我们不首先调节与燕麦的价格有关的问题,那么木材收购的问题就会非常尖锐,也就无论如何也谈不上什么出口了。

丘巴尔:照这个图表看,燕麦是提供了希望的。

茹柯夫:你们看到了,同志们,米高扬同志过去也有过其他的希望,但是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结果。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米高扬同志的希望,我们需要的是得到他的回答并实实在在地去争取。发表希望是一回事,而做到是另一回事。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将和它紧密联系的不仅是粮食价格问题,而且还有这些价格如何与粮食饲料的价格衔接的问题。否则的话,就会出现科马罗夫所说的那种情景,我们将不得不用粮食来喂马,我们将不得不往这里投入更多的粮食,而按照我们现在所有的前景来说,我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将是很难做到的。

如果提出关于木材和其他产品的出口问题,那我表示怀疑的是,如果不动一动现在领导这件事的机构,是不是一切都能顺利。如果说在国内我们有相当大的党,有相当大的工人阶级,还有像沙赫特案件那样的事情,那么在我们要出口的地方情况怎样呢,我们的驻外机构的情况又怎样呢?

罗伊津曼:说的对。

茹柯夫:在那里,我们不断地会碰上这样的情况,事情本来是可以做成的,但是没有做成。而且我们所有的抱怨、叫喊和呼叫有的时候能够得到回答,可是有的时候就得不到。当我们提出问题,说是这件事应该加紧,要安排等等的时候,我们得不到回答,不知道所有这些措施实际上是怎样推行的。所以,我要向米高

扬同志提出一个问题:他是不是想实际上能用什么办法纠正一下该管这些事的、我们的贸易代表机构,迫使它们做该做的事呢?

我要向米高扬同志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对我们在地方的地方上能够按已知的期限如数得到这些粮食和饲料,地方上是不是有具体的强力保障,而不只是简单的声明。因为在我们那里,没有可能让我们有信心,说是我们能够在地方上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听到的不过是说说没有什么可不安的,我们会给你们面包的,照我的看法,这多少有些少了点儿。应该能够听到的是更现实的措施:实际将能做成什么,在一定的必要期限内能让地方上有粮食。这一切将会对所有其他东西的价值有很强烈的影响,因为今天的燕麦价格,甚至如果有的话,至少也是不少于8—9卢布一普特。清楚的是,任何一个农民都不会用这样的燕麦去喂牲口,而是将会用通过所有合法的和非法的途径得来的面包去喂它。[这就是我想在米高扬同志面前提出来并请给予答复的那些问题。]

主席:发言人的名单有49人,其中有25人已经发了言。有建议说让下列同志发言:鲍曼、斯大林、布哈林、莫洛托夫和托姆斯基。[接下来登记的有:安德烈耶夫、斯克雷普尼克、斯克沃尔佐夫……

斯克雷普尼克:我没有登记。

主席:我们现在按部长来登记,不知道谁登记了。在建议上签名的有6个人。]谁想就这件事发言?

安采洛维奇:我还是不明白,建议的发言人名单的根据是什么。

有人喊:调节。

安采洛维奇:要说这种调节,如果用辩论的语言来表达的话,是使得发言人的名单带有了一些行政命令的性质了。这里对发言人的名单采用的是类似非常措施的办法,而这样的做法也就破坏了对报了名的全会成员的党内民主。(笑声)我不认为让一些同志失去按照辩论的规矩说出自己意见和在他们的掌握的材料的基础上阐述某些问题有什么道理。

斯大林:我支持这位同志,让他说吧。

安采洛维奇:譬如说,我现在按照名单是有发言权的,为什么不让我发言,从而也就不给我机会说出雇农们的情绪和对其他的问题说出自己的观点呢。如果提出一个考虑,说是时间宝贵,那可以根本就停止讨论。

有人喊:把安采洛维奇也加上。

安采洛维奇:我坚持要发言并不是因为我想开辟什么“美洲”,但是我想向全会说出自己对讨论的问题的意见。



主席:有谁想发言?

米高扬:我建议把泽连斯基加上。

主席:谁同意这个基本上通过砍过的名单?谁反对?少数。有人建议在名单里加上泽连斯基同志。

斯大林:我要发言。我建议把安采洛维奇同志加上,然后是来自各个州的同志。有没有谁是来自中央黑土州的?

有人喊:瓦雷基斯。

斯大林:应该把瓦雷基斯同志加上。

主席:安采洛维奇、泽连斯基、瓦雷基斯,是这样吗?这里登记的还有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也许我们加上古比雪夫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有没有反对的?

喊声:没有。

主席:安采洛维奇同志发言,下一个是泽连斯基。

安采洛维奇:首先,同志们,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我想联系到粮食收购对雇农的情绪问题说几句。我认为在这样做的时候,适合的做法是利用农林工人协会中央和《雇工报》掌握的许多来自农业和林业工人的信件。虽然斯捷茨基同志在农民来信的基础上做出了不正确的和粗鲁的概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来信的基础上就不能对这一类或者那一类劳动人民的情绪有正确的议论。当然,只是信笺对于评断这些情绪是不够的。我们这里有的信件和材料,还有协会中央工作人员到地方上的走访,说明了什么呢?首先需要考虑的是,雇农的情绪就是在以前也不是特别好的。是的,他们是属于苏维埃的,但是雇农的整个生活局面不是能让他们特别满意自己的处境的。(笑声)这是在农村工作的或者关注那里工作的人都知道的。联系到粮食收购,这些情绪需要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四月全会以前。雇农的信和地方同志提供的消息说明,在这个时期,许多雇农,特别是协会的成员,非常积极地参加了粮食收购运动。他们参加了揭发属于违反第107条的富农的粮食储藏,他们在集会上讲话,帮助了加强雇农、贫农和中农反对富农的联合。我认为,在这些情况下,雇农是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气来的,是拿挣来的钱和最后的一点面包在冒险的。要在集会上发言和说出来(常常是对着雇佣自己的人):“不要相信他,他在撒谎,他有的不是50普特,而是500普特的粮食”,这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

柯秀尔:这可不比批评李可夫。

安采洛维奇:是的,这是难办的事。接下来是第二个时期了——在四月全会

之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雇农的情绪变得很坏了。首先是由于我们没有能在这个时期保障对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阶层最起码的粮食供应。从许多来信和地方上的同志们的报告可以看出,雇农感觉到自己受骗了。他们中间的有些人说:“见鬼了,我们给苏维埃机关指出了哪里藏着富农的多少粮食,我们揭发了富农在扯谎,可结果是我们连一块面包也没有了。”对这一点还应该补充的是,就是合作社本身——农业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在一些地区对满足农村中这个阶层的劳动人民的需求根本就不闻不问。而如果是在合作社有粮食的时候甚至也拒绝卖给雇农或者他们的老婆,而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缴上份子钱,那他们能有怎样的情绪呢?而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是没有入股的,如果是在考虑到这种情况,那就完全能够解释为什么雇农的情绪变坏了。我要再说一遍,雇农的情绪总体上是向着苏维埃的,特别是有了职业组织的那部分人中间。但是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情绪大大地恶化了。只是现在,在这些天,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才和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一道,想起并打算下达一个指令,无论雇农和贫农是不是入股了,合作社和其他机关都要为他们服务。对雇农采取这样的态度,在他们中间消极的情绪越来越普遍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可是要知道,在一系列地区(北高加索、乌拉尔、西伯利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地),这是农村中相当广泛的阶层。正像我已经说过的,这些情绪是和没有采取最起码的措施来保障农村中那些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己没有粮食、靠买来的粮食过日子的阶层得到粮食联系在一起。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和合作社没有采取最起码的措施,帮助那些在粮食收购的第一个时期里曾积极帮助我们和富农斗争的人们。可以理解的是,这里有许多人的解释是,有客观困难;但是也有主观的困难: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机关粗枝大叶,合作社不关注贫农,特别是雇农。结果我们得到的是,贫农和雇农本来就处境很艰难,现在,在一些地区更加恶化了。我的感觉是,仅就过去的月份我们有的那些储备而言,我们也可以做到,第一,在向雇农供应粮食上做点什么,哪怕是在那些粮食有相当积累的地方;第二,在第二个时期对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阶层更好地进行解释工作。当然,用话是填不饱肚子的。但是在这样做了之后,在贫农之间就可以少些惊慌失措了。如果不在雇农和贫农中间做解释工作,我还要说,如果甚至在可能的范围内也不关心粮食供应,话说得粗鲁一点,我们造成的局面就会让农村的穷人们感觉到自己是个傻子了。他们能帮着把粮食从农村运出来,可是自己却没有粮食吃。

柯秀尔:你怎么老是看着米高扬,好像是他的罪过似的。

**安采洛维奇:**在第一部分(关于解释工作)时,我是看着柯秀尔的,而在第二部分时,在说到关于粮食供应时,虽然有一些地方聚集着很多农业和林业工人,他们有成千的人在那里工作,我的确是在看着米高扬的。可以理解,说的不仅是个人的责任。

但是我不同意一些同志这样来概括农村的情况,得到的结果不是把情况说清楚了,而是更多地产生了一片惊慌。除了同志们在这里说到的信件和集会外,和个别同志的交流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可以评断农民和工人中,甚至是党员中的情绪。

**李可夫:**你是在挨着个地看所有的人:先是看柯秀尔,然后是看米高扬,现在是看我。

**安采洛维奇:**问题不在这里。我在斯摩棱斯克省呆了大约有10天。参加了几个党员和非党员的会议。回到了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会。一个同志,是一个负责人,问我:你说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回答说:是这样的。“事实准确吗?”——他问。我说,要更坏上10倍呢。“那么就是说需要把政权交出去了”。同志们,如果不是惊慌,这又是什么呢?

这是惊慌,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话。在各个不同的阶段上,在各个严峻的时期,一些人的特点就是这样的,他们……

有人喊:事先就准备好了这种情绪。(笑声)

**安采洛维奇:**有的人说,这是某些雇农所特有的情绪。是的,一部分雇农是有这种情绪的,但是有的时候某些中央委员也有。

**伏罗希洛夫:**雇农中间也有中央委员。

**安采洛维奇:**我认为,如果不是惊慌地评价局势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不要陷入公式化的乐观,不要粉饰局势,而另一方面也不要夸大。但是首先是不能低估困难。需要记住的是,以后还可能会有更大的困难。所以需要随时准备着克服这些困难,需要把党内的意识动员起来,在遇到更大困难的时候让党员们不要惊慌。照我的看法,在粮食收购时期,村里的、乡里的和其他一些地方上的党组织有不少是惊慌的。有的时候由于这种惊慌而不是由于什么恶意,一些地方上的党组织做了一些过火的举动。

现在请允许我简单地谈谈下面的问题,这是关于农业发展道路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某些同志搞糊涂了。有些同志说,不需要忘记个体经济。这是对的,但是主要的危险不在这里。可能在《真理报》上写文章的人中间,有像卡尔平斯基或者是另外的同志那样的人,在一篇文章里说漏了嘴或者是说错了话,说

是发展个体经济的潜力已经挖掘完了。

**柯秀尔:**布哈林就站在旁边。

**安采洛维奇:**在生活本身,在实际工作中,对个体经济的意义估计不足的这种危险是不大的。更多的是另一种危险——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意义估计不足。我是在农林工人工会五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说这一点的。我认为,如果我们将只是继续在宣扬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而不是在建设它们的话,是有危险的。瞧,这就是危险。我要再说一遍的是,我们忘记了个体经济并没有什么危险。它自己是会强烈地让人们想起它的。在农业中加强社会主义成分的问题就是另一回事了。我非常重视党的决议。但是在那个经验的基础上我知道,我们常常写的是祝愿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万寿无疆,可是实际做的确实让它们寿终正寝。

**柯秀尔:**这就是你没有看管好了。

**安采洛维奇:**这是另一回事。如果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自己承担责任,那我在我那个更小的工作领域里就更要为这种说法承担责任了。(笑声,喧哗声)

**伏罗希洛夫:**更何况你又不需对这负任何责任。说了,明天也就忘了。

**安采洛维奇:**不是这么回事,而是在革命了11个年头的时候,我们还继续在消灭国营农场。可以做某些结论了。关于这一点,我打算就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的报告详细地说说。在过去的年份里,我们失去了大约100万俄亩的国营农场土地,消灭了几百个国营农场,而它们并不总是不好的。而且这不是在农业革命的时候干的,而是已经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我要再说一遍,失去了大约100万俄亩的国营农场土地。

**李可夫:**怎么失去的?

**安采洛维奇:**参照的办法是表现出地方主动性和独立性来,每一年平均都要消灭掉20到30个国营农场。国营农场消灭了,土地转交给了农民。

**有人喊:**因为是有一些雇农把它们吃光了。

**安采洛维奇:**不是,情况远不是这样的。但是与此同时我认为,如果提出我们国家在三五年内简直就可以实现国营农场化或者集体农庄化,那么,任何一种这样的提法都是没有意义的。采用这种提法说明缺乏健康的思维。谁要是了解农业,他就不会说我们这里的个体经济资源已经消耗完了。当在一些地区还需要把木犁换成铁犁的时候,当需要引进最起码的改良农业文明的措施的时候,怎么能说这些资源已经消耗完了呢。但是与此同时我要再说到的是,我们实践的重点不在于某个人(卡尔平斯基或者米柳亭)不明白这一点。问题不在这里。

整个问题在于,不要贪图沿着遇到的抵制最少的路线走下去。我认为,丘巴尔同志提出的关于单位面积产量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不是政治方针。

丘巴尔:请原谅。

安采洛维奇:是的,丘巴尔同志,请原谅。

丘巴尔:如果你有的是分散的经济,那你就不可能把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需要的尺度。

安采洛维奇:这是对的。但是,譬如说,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并不是政治口号,虽然提高我们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是需要的;不提高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是不可能发展经济的。但是不能把单位面积产量问题和在我们的条件下发展农业的总路线对立起来。

丘巴尔:不能彼此对立。

安采洛维奇:正是这样的。发展我们的农业在最近这些年应该是走越来越增加社会主义成分的路子。

丘巴尔:对。

安采洛维奇:但是,理所当然的是,单位面积产量是应该提高的,而且首先是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达到最大程度的单位面积产量。不然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就不能成为典范,成为同样是农民如何正确经营的样板。

有人喊:对。

安采洛维奇: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丘巴尔同志,实际上,在实践中需要对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做的事情要比现在多得多,譬如说在乌克兰就是这样。要多得多。

丘巴尔:对。

安采洛维奇:但是为此首先需要的是正确地对待国营农场建设本身。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正确评价了国营农场在沿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发展我们的经济中的作用。但是,当然,与此同时,他在自己发言的末尾没有把头绪理好。如果同意他在末尾说的,那不仅在国营农场的发展中,而且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发展中,就什么也做不成了。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如果是认真对待国营农场的问题,像我们对待化学工业和纺织工业那样的话……

托姆斯基:我对集体农庄什么也没有说。

安采洛维奇:对农业无产阶级的问题也需要采用另外的态度。需要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对农业工人提出很多要求,但是与此同时要非常严肃地提出关于他

们状况的问题。我认为,在国营农场问题上,我将有可能对加里宁的报告发言。现在请允许我们强调一下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提出正确方针的重要性。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整个问题并不在于个别成功或者不成功的文章和演说。我要再说的是,危险并不在这里。更大的危险在于,我们把加强老的国营农场和建设新的国营农场的问题搞得太琐碎了,在这个领域里只是限于一些手工业的农艺措施,没有加强农业的社会主义成分。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就是这样也是落后了好几年。最大的危险是我们今后也还会是落后的。但是当然不能是让发展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彼此对立起来。谁要是在搞对立,那他就是不懂得发展社会主义成分和发展整个农业之间的有机联系。显然这些同志也不懂得在农业中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展社会主义成分之间的联系。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出口问题。我想联系到木材出口,简短地谈谈这一点。最近已经不可能靠粮食来加强出口了,我认为这是对的。也许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这种不可能做到的情况。但是要知道,说起来轻松——我们将不出口粮食了。但是要知道,没有出口,要想发展国民经济是难上加难呀。怎么办呢?不能只是限于出口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产品,譬如说是剧组等等。出口是一定需要大大扩大的。为此就首先必须在最近时间内把重点放在林业上,更好地为此利用我们的森林财富。不久前,苏联人民委员会已经讨论过关于林业的问题了。但是在最近的将来,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也应该关注这个问题。

同志们,对于我们的国民经济来说,其中也包括出口,下面的数字难道不是耻辱吗:苏联在最近的一年里运出了400万立方米的木材,而芬兰是900万,瑞典是500万,捷克斯洛伐克是400万立方米。我们国家有着非常大量的森林财富,但是当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如此重要的时候,却不能把它们利用起来。要知道,过分挤压农业是有害的。可是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过分地挤压,而不善于挤压我们的森林财富。很明白,这不是说,为了这一点需要做的只是通过一个决议。这说的是要对林业投入些什么,需要为在林业中组织生产和劳动想好一系列措施,把它们和全力加强林业出口衔接起来。首先需要更好地考虑具有如此价值的财富。在我们这里的林业出口地区要砍伐2700万立方米的木材,而在这些地区我们少砍伐的是2300万立方米,木材出口本身正像我们看到的,少得可怜。森林财富在我国是腐烂掉了和被强盗式地砍伐了,对事业没有什么用途,甚至是在那些构成军事战略危险的地区被砍伐掉的。我想,用几分钟的时间是不可能像样地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但是就是已经说过的这些,也足够让我们同意,加强木材出口的问题应该提出来并加以解决了。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

更好地彻底解决安顿苏联林业的一系列组织、经营和财政问题。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在最近就由政治局加以讨论。列入政治局日程的,常常是一些远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关于林业和木材出口的问题需要推行更严肃和激进的措施。需要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对林业的态度就像是坐在草地上不吃草一样。(笑声)关于林业、林业恢复和木材出口的问题应该成为党讨论的对象。我们应该从林业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我要重复的是,为此需要投入一些钱,注意地和像样地好好考虑一下组织林业的形式和从事林业的方法。比我们在林业里所有的那种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更严重的情况,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找不出来的。

**奥新斯基:**他说这些是反对工业化。

**安采洛维奇:**不是,这是为了工业化。至于工业化,奥新斯基同志,我应该对您说的是,您昨天说得不对,您说制糖工业是亏损的。制糖工业不是亏损的。它在最近几年一直是能提供几千万卢布的利润的,虽然要付土地的租金,要按富农的税率支付农业税。除此之外,国家通过消费税得到很大的收入。为什么您要为自己工业问题上不是特别有分量的想法启用不是特别有分量的论据呢?至于奥新斯基同志的基本思想<sup>154</sup>,在和农民分离的问题上,正像他说的,或者换句话说说是尖锐的和无可救药的和农民结合的危机,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明显夸大的了。

**奥新斯基:**而我说的不是尖锐的和无可救药的。

**安采洛维奇:**我认为,说了完全的或者尖锐的危机还是只是说了“分离”——这是一回事。至少是如果我没有明白您的意思,那您提出的关于分离的说法普通党员就更不明白了。分离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但是正是因为这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才不应该拿这些话当儿戏和进行夸大,在并没有这种情况的时候说什么在工人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之间的分离。这种夸大其词无疑是有害的。

**主席:**泽连斯基同志发言,下一个是瓦雷基斯同志。

**泽连斯基:**我的感觉是,在评价这种状况和党应该联系到粮食供应和粮食收购采用的那些措施方面,需要提出下面这个问题:我们如果采取了或者没有采用这些非常措施而没有能收购到粮食的话,那会是怎样的情况?现在我们会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是处境更好还是处境更坏呢?如果我们没有能收购到粮食,可以想象的状态将是下面这种样子。在消费地带,在农民地区,反正在这个时候我们有的还是粮食不足。在旧的粮食储备就要完结、新的粮食还没有能收上来

的时候,在这样的时期,我们如果不从外面运进粮食来,那么肯定是在粮食危机尖锐化的同时,粮食的价格会发疯似地上涨。而且这种价格的上涨不仅仅是由于我们采取了行政措施。在没有采用行政措施的一系列地区,甚至在没有在多么大的规模上进行过粮食收购的地区,由于粮食不够用,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有季节性的粮食危机的加剧和粮食价格的上涨。对工人的粮食供应的尖锐程度也会不小。关于这一点这里说得已经够多的了。在这样的基础上,无疑我们有的的是极其激烈的政治危机,我们要走出这场危机就得比现在,比由于我们采用了那些粮食收购的办法要有更多的困难。

我感觉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不采取非常措施,我们未必能够收购到足够数量的粮食和保障不间断的经济生活过程。

我不可能在这里和你们分享我们区粮食收购的经验,因为在我们区没有粮食收购工作。我们恰恰是属于消费粮食的地区……

有人喊:粮食吃得很顺利的地区。

泽连斯基:粮食是吃得很顺利的地区,但是这绝不是说,我们不能对如何进行粮食收购有看法,不能对联系到这些粮食收购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有看法。在我们中亚,经济是各种各样的,和粮食收购地区相比,我们那里的阶级力量的布局也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我们应该说的是:由于今年正确地推行了粮食供应运动,我们有了可能预计会把棉花生产的产量比去年扩大22%—23%。如果商业人民委员部没有完成粮食运进的计划或者是有些断断续续地完成了计划的话,局面就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虽然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走上台来并号召进行自我批评和批评,不要只是骂自己,而且要骂他人,我还是应该说,今年在我们那里完成了确定的那个最起码的定额,这是平衡边疆区的经济生活所完全必须的,而且这样也就可以保障我们中亚的经济生活有迅速的提高和经济作物有所增长。

有人喊:可是你说在完成计划的情况下也将没有增长。

泽连斯基:每个人都是靠自己的储备生活的。我是在秋天时说到了这一点的。

卡冈诺维奇:他是想多少有点储备。

泽连斯基:现在我想谈一个米高扬同志略微提到的问题,而且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曾涉及了它。米高扬同志认为今年有可能大量地减少向中亚运送粮食。这将是一个大错误,米高扬同志。错就错在我们提出了明年把棉花的播种面积扩大15万—18万公顷的目标,没有对棉农的粮食供应,没有足够的粮食资源,



我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最好不是吝惜 300 万到 500 万普特的粮食,还是以此来保障进一步发展棉花生产的可能吧。

我认为,决议完全正确地把提高粮食经济的问题放在了中心位置。但是我也感觉到,在提高粮食经济的问题上,有些同志发出了这样的腔调,有可能会引导我们在提高粮食经济的同时将降低技术作物的增长速度。无论如何是不能这样做的。我在一些同志那里看到了这样的倾向,他们没有提出要把粮食经济问题区域化的问题,没有提出让粮食经济问题最紧密地和粮食价格政策衔接起来的问题。我们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已经有过这样的情况,粮食产品的高价反映出来的是,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减少了和产品规模也缩小了。如果我们对粮食作物给出的是不合尺度的高价,不把它们和技术作物地区的价格协调起来的话,我们将是在打击另一个领域,在我们的经济战线的其他领域里会出现梗阻,这样的危害将不会比粮食作物不够更小。从这个意义上说,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说他要求比现有价格提高 25% 是不对的。这样提高价格,除了上面提到的会把资金从工业中抽到农业中去之外,还会由于技术作物增长速度的下降而打击农业本身。

**李可夫:**出售价格我们并不想提高。

**泽连斯基:**李可夫同志,这里不仅是消费问题,为吃到嘴里的面包要花多少钱,农民是作为生产者在关心这个问题的。我们需要的是让他们感觉到生产粮食不划算,而更划算的是生产技术作物。

**有人喊:**是在个别的地区。

**泽连斯基:**关于必须要进一步让个体小农经济得到增长和发展,决议里也有完全正确的一条。有 2 000 多万个体农户,在最近时期内只有一条发展道路,那就是提高他们的个体经济,把这一点略而不计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找到把农民的计划、个体经济计划和国家经济计划衔接起来的形式。这里的情况是这样的:在提高农民经济的时候,农民是有自己的经济计划的,他们有而且也应该有自己的经济前景。但是在这种增长中,并没有足够地使得个别的小农经济和我们的计划,和国家的计划衔接起来。这样的结果是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要在我们的计划领导中犯错误,会有失误,等等。譬如说,正像经验和我们的实践所表明的,在粮食这件事上的错误给我们造成的威胁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情况更加复杂了。所以我认为,决议里应该加上一条,那就是怎样在个体农民经济的生长过程中,最好地把农民的计划 and 我们的计划衔接起来。我们在中亚做到了充分把我们的计划和农民的经济计划衔接起来,在这里,完整地利用我们所有

的经验是有意义的。中亚农民产品的商品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国家的合同包揽了。由于是这样,农民知道他们该生产什么,国家也大体上知道它在某个时刻能够有多少数量的原料和其他产品。我们今年就有可能在最重要的原料方面,用我们的合同把很大比例的农民产品的商品部分包括进去(棉花的98%—99%,其他原料的70%)。我们是由于运进粮食的计划完成了才有了这种可能的。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能保障按照计划避免任何失误了。但是我们当然是在天气和水的使用上还没有保障。但是我们做到了把农民的计划我们的计划完全衔接起来。我想,当我们提出开展粮食经济的问题时,我们应该找到把个别农户和我们的国家计划衔接起来的办法。这是避免错误和失算所必须要做的,否则的话,错误和失算就不可避免。我认为,应该更坚决和彻底地贯彻十五大对签订合同的做法做出的决定。签订合同的问题应该看成不仅是在播种前夕提出的任务,仅仅是和播种运动联系在一起。关于签订合同的问题是组织农业、把这个农民经济和国家经济衔接起来的问题。但是只把签订合同看成是农民经济和国家之间的货币关系的一种制度是不够的。签订合同应该能为我们用国家和农民经济之间的一种硬性的合同制度取代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我们应该一分钟也不忘记一种状况,那就是至今合作社上缴粮食的这种办法并不总是最有利的一种出售商品的办法。从市场价格的观点看,这种办法在当前时刻并不总是最有利的。在粮食市场上,私人的粮食价格要更高些。我们应该通过签订合同对农民经济施加影响,让农民甚至是在低于私人的市场价格出售上缴粮食也能得到好处,让这种好处能够反映在提高他们的经济上。我们应该把签订合同与供应种子材料、肥料以及得到农业工具等方面的优越条件联系在一起,那时我们就能得到一个明确和坚实的基础,把我们的计划和农民的计划衔接起来了。我感觉,如果我们能在今年提出从秋天起签订500万俄亩粮食播种的合同(而我们是有可能的),我们在进入明年的粮食收购工作时就有足够坚实的基础了。如果我们现在就通过我们的收购机构开始推行这项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在多得多的程度上完成这项工作,而且能够得到更大的成果了,因为我们的农业合作社对于完成这项工作来说有足够的力量。

最后一个问题是:又要谈到提高小型经济这个问题了。自然,这种提高是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是,同志们,谁也没有能证明,在提高小型经济的问题上,特别是在粮食的基础上,是有一定限度的,过了这些限度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提高这种农民经济了。

李可夫: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些限度。

**泽连斯基:**我们在一些地方还是达到了,而且我认为,关于这些限度的问题是存在于这些地方的。我们有小型个体经济增长的限度,这些限度存在是不是有可能适当地利用农具和牲畜的问题中。一个没有农具的经营单位是不可能指望更快地提高的,而适当使用农具的问题是扩大、加强农民经济的问题。我认为,在农民经济问题上,在粮食经济基础上加强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方法中,能够起到这样巨大作用的,将是能不能在农民经济的内部使用劳动力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的。小型农民经济的播种面积小,不可能建立起正确的草田轮作,而如果它是在播种面积大小的基础上建立起草田轮作的话,那就会有多余的劳动力解放出来,没有地方使用了。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小型和中型经济的问题应该与加强集体农庄建设速度密切结合的问题。

**主席:**瓦雷基斯同志发言,下一个是鲍曼同志。

**瓦雷基斯:**首先请允许我对米高扬同志提供的谷类饲料总平衡表提几点意见。

**米高扬:**不是平衡表,是草案。

**瓦雷基斯:**就算是“草案”吧。我感觉这个草案距离实际情况很远。

**布哈林:**是对不上号的。

**瓦雷基斯:**我不知道是不是对得上号。如果米高扬同志有某种打算要搞成这样的草案,那它也是非常不成功的。我认为,考虑到我们现在农村具有的一般经济状况,无论如何不能从这样的计算出发。农村有的是这样的收成状况,我们并没有可能对未来的谷类饲料平衡状况建立如此乐观的看法。我认为,收成,可能也包括谷类饲料的平衡状况,将不会多于去年。我应该认为,今年在一系列地区收成将会是更低,这也包括了我们的中央黑土州,也是根据草案,我们的谷类饲料平衡表将比去年低8750万。这样一来,应该承认的是,这里提供的平衡表是有很大的夸张的。如果还能注意到老乡们的流动储备比去年少了,如果是从稳定的储备出发,那这将会更清楚,这样,是可以事先说出一个大体上的计划的。米高扬同志在作报告时的出发点是,我们今年在农民那里有着稳定的储备。这是不对的。最近这个月在我们这里有过收购上的困难,也就正是由于我们从农民那里把原来的储备夺过来了。现在农民的储备比去年要少。在粮食收购中,我们夺走了所谓的保险粮,这是每年有流动的。所以这些储备比去年农民所有的要少。这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我认为必须要说出这些意见呢?因为在编制粮食收购计划的时候,需要从这一点出发。你们认为需要编制一个7亿—7.2亿普特的粮食收购计

划。但是我认为这样的计划是夸大了的,因为夸大了的计划是刺激发生各种错误和各种过火行为的巨大来源之一,会引起对地方上施加过度的压力。这是肯定的。因为在地方上收到计划的时候,就应该完成它。我们是守纪律的人,大家都学会了准确地完成党的指示。当然,每一个人都力图能尽可能完成得更好、更快,因为这是符合总的经济利益的。但是提出来的计划常常是非常不现实的、夸大的。在四月全会之后展开的粮食收购的第二阶段上,商业人民委员部的计划就是过分夸大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米高扬同志有的时候给出的计划简直就是显然多出了一倍、两倍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有的时候给出的计划显然是超出一倍的。我可以肯定说:这样对待计划的态度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路线教给人的,要么是马马虎虎地对待各种计划,要么就是把人推向搞过火行为,推向过度的紧张。我们是非常守纪律的。就说你们那里可以在什么州里收购到200万普特吧。你就给出200万的计划来。我们将会去收购的。但是当给出的计划不是这样的,而是要700万—800万普特,这会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地方上动员起上百的人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犯下重大的错误。应该是这样对待总计划的。我认为,我们可以草拟的是一个6.5亿普特的大体计划,把地方的收购和将要进行的国家和合作社组织的收购都包括在里面。

现在请允许我在我们的全会辩论的问题上,就农村政策的基本问题说几点意见。我认为,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在说到卡冈诺维奇同志的立场时,太夸大了,是有丑化的意思。当然,这种丑化就在于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把卡冈诺维奇同志说成是只拥护非常措施所决定了的那种政策和措施的人了,他好像就只是主张对这些非常措施做正面的修正,而且要把它们变成对将来来说是合法的。而显然是把自己算做了拥护另外一种立场的人了。遗憾的是,我到底也没有足够准确地搞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和在与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些分歧上,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大体是什么样的一种立场?我的感觉是,问题并不在于好像卡冈诺维奇主张保留非常措施,而李可夫则主张立即废止它们<sup>155</sup>。难道卡冈诺维奇不主张立即取消非常办法吗?

人们在说粮食收购的错误。究竟错在哪里,请问,是在政策上还是在实践中呢?问题大体上就是这样的。卡冈诺维奇同志好像在这里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说是我们有与过火行为有联系以及来自于它的错误,等等。他说,这总体上就是我们应该揭示和取消的那些东西。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不满意,于是说:应该看得更深刻,应该是来看看,直截了当地说我们错在哪里了。那好,我们就这样来提出问题。我们错在哪里?领导错在哪里了?在这里发言的阿列克谢·伊万

诺维奇又错在哪里？我感觉李可夫同志应该说的是，他认为什么是错误。我是这样想的，他应该说他认为我们在农村的政策错在哪里了。如果是把分析他的讲话作为出发点，那么就是说，非常措施是个错误吗？但是他说，不是，而且声明说：没有非常措施我们就不能收购到粮食。我要提醒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1927年12月18日，在党的十五大召开的时候，根据他的倡议召开了有我们地方上的工作人员参加的会议。照我记得的情况是，当时我发言建议要提价。李可夫同志发言时是这样说的：“瓦雷基斯所说的应该坚决禁止。”

什维尔尼克：他说：“应该不仅是不要说了，而且不要想了”。

瓦雷基斯：那个时候我们说了，如果我们把价格提高了，那我们确实能够更轻松收购粮食了，这部分是对的。

奥新斯基：这还是在1927年7月的时候。

瓦雷基斯：这是在12月说的，当时我们面临的事实是无论如何也要搞到粮食。当时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当时李可夫同志说：“要么我们应该在最近就面临着必须从国外运进粮食来，要么我们就是应该这样收购粮食，让我们不致于没有粮食。”当时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如果李可夫同志承认对当时局势的评价完全清楚地表明采用这些非常措施是正确的，是一种痛苦的必然，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不可避免的，不采取这些措施我们就不可能走出正在我国成熟起来的粮食危机，那么这里又有什么错呢？采用的非常措施虽然不是完全地，但是实质上解决了任务，这些措施虽然不如以前、不如过去的运动所采用的形式，虽然在解决的时候我们有某些错误、过火行为，中农和一些上层集团的不满加剧了，就像卡冈诺维奇说的那样，但是任务总算是解决了。任务解决了。我们没有另外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波斯特舍夫：说得对。

瓦雷基斯：这是基本的，也应该是从这一点出发的。而现在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走到讲台上（而且请允许我说，是非常简单轻松地、事后聪明地）声明说：“审判我们吧，我们犯了错误！”但是所有坐在这里的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工作在农村是不会那样顺当的。这其中也有我，当我不得不在今年1月初根据中央的指示跑了一系列地区的时候，我那时给中央送去了一封信，提出了意见，说我们在农村有一系列的困难，这些困难将会导致我们最终引起农民的某种不满和与中农关系的尖锐化。但是难道推广“自愿和强制的农民公债”<sup>156</sup>不是部分地对中农施加压力吗？整个财政手段体系是把粮食从农村中弄出来和同时相应地把商品从城市里弄出来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难道这不也是部分地对中

农施加压力吗？我记得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发表了自己的宣言，说是在推广公债的时候不施加压力，可这是在推广公债的期限过了之后。

**李可夫：**我一知道就发表了。

**瓦雷基斯：**不是，对不起，您看来在这之前是在等待时机，而我认为您当时做的是对的，您在政治上做的是对的。您在4月2日答应了，可是4月1日推广运动就结束了。这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笑声）

我感觉，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说得不对，因为他在这里没有说到主要的东西：我们所经历的粮食困难的根源、中心是什么？当他说到我们犯了很大的政治错误和由此出现了所有的困难和农村局势的所有复杂情况的时候，——他把关于困难来源的原因这个根本问题给抹杀了。要么粮食收购困难的原因是我们的错误政策、我们不正确的计划工作、我们巨大的闪失的产物，要么它就在于决议里所说的：

“……因为由于整个内外局势的要求，由于在社会主义工业不可避免地要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农业特别是它的粮食部门水平非常低，这就隐藏了社会主义的城市和小农的农村之间出现隔离的危险，这可能会成为破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条件。”

这是不是事实呢？这就是危机的来源所在。

**李可夫：**它非常落后，这是我和你的罪过吗？

**瓦雷基斯：**我们的罪过就在于没有足够的手段。奥新斯基同志在这里很开心地发言，说到：“把资金抛到这里，把资金又抛到那里”。有的时候聪明人会说出简直荒唐可笑的东西来。你们想想：现在我们在实行基本建设计划。你们知道——我们无论怎样也是不能完全完成的，我们已经开始的某些大工程是不能最后完成的，在工作过程中，在最后要建成的时候，我们要把它们暂时停下来，要在一定时间段上不可避免地提供资金才能建完。国外不给我们钱。现在，在今天这种对于得到资金来说是非常不好的国际局势下，要到那里去找这些钱是可笑的。奥新斯基同志，人家不给您钱，您没有钱，而您还在那里寻找神话中的几百万来投给纺织工业和农业。（笑声）从客观上说，我们当然是对国内发生的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有过错的。我们是领导无产阶级专政、领导整个建设的党。

**李可夫：**不仅是客观上，而且是主观上。

**瓦雷基斯：**是的，而且如果领导不好，我们也是有罪过的，谁也没有异议，我们有政治错误，也有工作中的缺点。但是不能是走到讲台上来说，所有该做的善事就是该坚决地“批评一下领导”。我想，批评领导我们随时都可以做，而且总

是可以从这方面在我们中央委员会找到不少心软的人。应该是针对着基本的东西,而基本的东西就是决议里说的,这是基本的东西,也就是说,农业的发展太落后了。我想,卡冈诺维奇同志说得对,对于我们主要的是要放弃过火行为,在农村里放弃和中农的相互关系中的不正确的实际做法,今后努力这样来推行政策和农村中的实际工作,让政策保障我们的确能在我们所处的农村形势下和中农有多少正常的牢固关系。我的感觉是,有些同志想,只要是放弃了非常措施体系,马上就会出现农村中消除阶级矛盾的状况,他们的这种空想是非常莫名其妙的。

李可夫:对。

瓦雷基斯:你们错了,同志们!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时期是矛盾在不断尖锐、阶级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的时期。通过某个决定就能把这个阶级斗争平息下来,那当然是可以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两种立场:要么是我们现在譬如说就取消向富农进攻的口号,这样就可以对富农让步,对农村的资本主义成分和中农的上层让步,让他们可以自由地进行积累和发展,我们再给他们一个广泛的竞选指示,在这样的基础上就可以部分地把阶级斗争平息下来了,这可能吗?可能。这会导致平息吗?会的,但是这也会导致多少已经站起来并且最近这些年在农村里代表着独立的阶级力量的贫农(而且这也成为了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前提之一,因为农村的贫农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开始着手真正领导苏维埃了)加强自己在那里的作用,开始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了。而这样的贫农将会因为这样的转折而变得沮丧起来,会失去已经在农村中夺得的阵地。我想,这样的决定从根本上就是不正确的。要么是第二种解决办法——和富农斗争,在加强和中农结合的条件下把贫农组织起来。应该从一个事实出发,那就是现在农村的阶级斗争是在更高的和更尖锐化的基础上发生的。这种状况要求我们要迈出一些新的、更多的实际步骤,组织步骤和政治步骤。我认为,雅科夫列夫同志说得完全正确,组织贫农的问题正在具有首要意义。

有人喊:雅科夫列夫总是对的。

瓦雷基斯:希望所有在这里发言的同志在更多的时候也是对的,这样是非常好的。关于组织贫农的问题,关于组织农村中的阶级基础的问题……

有人喊:对工人也该更好地解释清楚。

瓦雷基斯:(这个问题)现在是基本的和主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不可能取消进一步进攻富农和进攻资本主义分子的口号的问题。

当雅科夫列夫同志在这里说到工人来问他:“是不是右转了?”的时候,我应

该说,甚至负责的党员也在这样说:“在四月的中央全会上是向左走的,而现在,在六月全会之后,我们要向右走了。”

我想,对中央的路线、对党的政策的这种观念的确是一种小市民的观念。那些想着可以在农村里用今天通过一个决定明天又通过另一个决定的办法解决政治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的人错了。我们应该从粮食收购运动的经验中走出来时得出的信念是,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农村的确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它有了很大的变化,农村中的矛盾要尖锐得多了,发展得也更露骨了,所以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阶级力量布局当然应该是这样的,要更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更紧密地依靠贫农,对富农进行有系统的、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进攻,想方设法对中农让步,甚至在说到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下作出牺牲。

主席:鲍曼同志发言。

喊声:该吃饭了,3点了。

主席:在批准了的名单里,我建议做出修改:把古比雪夫同志从名单上去掉,根据和他达成的协议,建议把他换成卡明斯基同志,卡明斯基是领导集体农庄和农业合作社的。我看需要让他能够发言。没有反对意见吧?没有。休息后第一个发言的是鲍曼同志,第二个是卡明斯基同志。



## 第十次会议

7月9日晚间

主席(李可夫):鲍曼同志发言。

鲍曼:李可夫同志号召我们批评领导。我想,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遵守了自我批评的口号,而且在自己的决议里指出了一些方面,那是属于要纠正领导的。向中央委员会全会提出的那个决议也指出了在商品运进和征税方面的计划领导上的错误,以及收购组织、党和苏维埃组织的缺点、粮食价格不好的对应关系,等等。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进行了这种自我批评。还可以指出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我们可能在农业进行结构改造方面做得比较迟了,我们本来是应该更早就注意到这个方面的。无疑的是,1923—1924年度把土地分给了一部分国营农场,但是根本就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加强国营农场,现在应该说,这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有很多的东西取决于我们领导和我们的计划的话,那么,如果不是宿命论者,我还是应该说,即便有最好的领导,也不可能避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我们是有可能减轻这些困难的,但是完全避免它们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我们的整个经济是落后的,农业又是特别落后的。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和米高扬同志的报告都完全正确地集中注意到了这个基本原因——我们农业的分散性和落后性。我感觉这是属于对整个时期的这些年而不是对这次的粮食收购运动做出的结论,当然,统计和在这次粮食收购运动中进行的实际检查以及总的考虑都证明了,这样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奥新斯基同志所维护的那种观点,主要而且首先是在市场关系领域里看到了我们所有困难产生的基本原因,也是不正确的。当然,市场是和生产非常紧密地联系着的,但是总还是有各种不同时期,而在不同的时期就需要有不同的重点,不同的应该着重的方面。如果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阶段,这个重点恰恰是市场的话,如果列宁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阶段直接号召我们要学习做生意的话,那么现在,在结构改造时期,当然重点就该是越来越多地转向生产领域了。当然,我们应该继续学习做生意,我们对这

一点还学得不够好,虽然说是学会了一些,但是我们需要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学习生产。

我们在零售方面,在把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拉近方面,已经能够做很多事了,但是我们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在生产本身上降低成本了。在农业领域里和在消除城乡相互关系中的困难领域里,正在变成中心问题的,就是通过建立大型国家农业、开展农业集体化、提高个体农户和在城乡交换中更增加计划性,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当我们在十五大上和和十五大各项决定的基础上强调集体化的口号的时候,个别同志就力图把这描绘成是扼杀这些或者那些提高个体经济的措施。如果我们是由于集体化而忘记了个体经济的话,这当然是一种完全愚蠢的事。除了个别的文章和个别并不成功的表述等等以外,我不认为在党内实际上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完全清楚的是,当我们这里还在大规模存在着三期轮作制的时候,当大田的单位面积产量往往只相当于80年代水平的时候,也就是说相当于40年前,当我们还有那么多简陋的木犁的时候,那么,我们直接面临的就是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因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涉及的是一大群人——几千万的个体农户。我们有这样的例子,个别的个体农户甚至比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收成都要高。在我们莫斯科省就有这样的个体农户的例子,每俄亩的收成达到了200普特。但是如果看看这些农户是怎样前进和达到单产200普特收成的,那我们马上就能发现,在销售、供应和生产合作方面,他们已被吸收到了我们的合作社网里。我们就举德米特罗夫县的农民沙雷金为例吧,他在自己村里是社会活动最多的人,参加了各种类型的合作社联合组织,他在自己的经营中使用集体的机器,他和农业站有联系,他在去年达到了亩产220普特。然后再看看一般的、引证得相当多的数字吧,——例如,在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出版的、由雅科夫列夫编辑的文集<sup>157</sup>,还有工农检查院的材料,——都完全清楚地表明,联合到合作社里的农户是怎样有了比没有联合的农户更巨大的劳动生产率和更高的单产量。

所以,当我们说到必须要提高个体经济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就直接涉及了达到这种提高的途径问题。这个提高的途径肯定就是,主要地和基本上要通过开展合作化,要通过实现列宁的合作化计划。对于贫农农户来说,这是特别正确的。要知道,就在不久前,在党的十五大上,引用了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材料,根据这个材料,在800万个缺少帮助的农户里,甚至马也是不能赢利的,马的使用也不能收回成本。这里应该直接提出一个问题:怎样改变才能让马在这800万缺少帮助的农户里能够把成本收回来。我们这里有许多这样的情况,我们给贫农

农户贷款买马,可是这个贷款收不回来;甚至经常是由于这样的贷款,贫农农户陷入了更为艰苦的处境。我们应该更大程度地学会利用这个贷款来搞生产合作,那时我们可以把这样数量的贷款更正确地用在拖拉机、马和奶牛上——这样是为了使得这个贷款通过总体上的措施能够真正提高贫农农户。

就拿这些年,这5年没有马的农户的发展状况来说吧。在中央黑土州,我们开始了改组,发放了相对比较多的贷款,1922年,没有马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7.3%,而1926年是36.5%,也就是说,你们看到了,在5年里,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限内,我们得到的是,没有马的农户没有什么减少。在一系列地区,我们有的也是类似的数字。当然,也有的地区,无马农户减少得比较快。李可夫同志在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里引用的数字也说明了无马状况的下降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如果我们将以这样的速度前进的话,如果我们想给每一个贫农一匹马,而且还要加上农具的话,那么真的就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和物质福利了。

我认为,农业人民委员部政策中的重大过错之一是,发放用于对中央黑土州改组的贷款实际上并没有充分地推行生产合作联系在一起。当然,我们由此得到的就是整个基本的贫农和中农农户没有得到足够的提高,而且往往得到的是拉平了富农和半富农的水平。

现在接下来。我认为必须要强调一个无可争论的论断,那就是,如果合作的过程和提高个体农户是不可分的话,那么合作化也就是和列宁的合作化计划不可分的了,它是这个计划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全党都承认的一个无可争议的论断。完全清楚的是,由此而来的是,无论怎样,把集体化和提高个体经济对立起来是愚蠢的。这里是不可能对立的。必须要把它们最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对集体化的理解上有一些倾向。我的感觉是,它们主要是企图把集体化运动看成是贫农的运动,几乎完全是贫农的运动。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倾向。我们应该把集体化运动看成不仅是贫农群众,而且是广大的中农群众的运动;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无疑是完全清楚的。我们有一系列的向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过渡的阶段,通过个别的生产过程的社会化走向最终的集体农庄的过渡阶段;譬如说,采用拖拉机和进行共同耕种,购买复杂的脱谷机并在一起脱粒,或者建设公共的草棚和公共的保暖圈棚。通过组织加工企业(农业工业),农民向共同加工产品过渡。要知道,这一切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准备农业生产的各个过程的社会化和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建立基础。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规模会越来越大。在实践中,譬如在乌克兰,就已经真正在实现着整个村子的个别生产过程社

会化的想法了。你们都相当清楚地知道报刊上介绍的经验,这就是舍夫琴科国营农场的经验<sup>158</sup>,在这个地区开展了农户采用拖拉机队共同耕种土地的做法,或者在莫斯科省的一个村里,我们有70个农户的400俄亩土地,其中100俄亩采用了共同耕种,而这100俄亩被用作了提高个体农户、采用农业技术创新、采用机器作业和帮助贫农等等工作的基础。这是一件非常重要和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是这个村里的一种社会主义成分。当我在巴什基尔的时候<sup>159</sup>,有一个村子非常穷,每年都要得到我们很大的贷款买种子,我在那里说,难道你们不能一起耕种哪怕是50俄亩的土地(他们有相当多的土地是闲置的),用它们建立起一块示范田,作为建立种子基金的基础吗?于是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还有一些先进的农民,同意这样做了,在那里肯定是可以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的。我想用这个来说明的是,集体化的成就不能只是用建设大型的、完整的经济联合体来衡量的。我们在这里有的是各种形式和各种途径的集体农庄成长的漫长过程,它们是极大地提高农民经济最有利的形式。

下面我想对预约合同制<sup>160</sup>说几句。当然,无论是从给城乡交换带来更多的计划成分,还是对于提高农民经济的生产来说,它对于我们都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想方设法地鼓励我们已经有的那种实际做法,其中也包括在粮食作物方面。根据全俄农业合作社协会和全俄农业合作社育种协会的数据,在1927—1928年度里,签订了预约合同的春播面积已经是180万公顷,其中大约有2/3是粮食作物,预计可以得到4000多万普特的产品。这些农户是把自己生产出来的所有粮食都缴给我们的。

**斯大林:**这不包括和集体农庄签订的预约合同吗?

**鲍曼:**是的,不包括和集体农庄签订的预约合同,而且今年已经着手实际签订不仅是纯种种子的预约合同了,而且也在实际签订普通种子的预约合同了。肯定的是,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地鼓励发展预约合同制的实际做法。我想在这里引用列宁的一小段话,它说到了必须要支持能真正把居民群众组织起来的那种合作社的流转:

“……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一种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而且必须付诸行动。但是支持合作制度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支持,就是说,把这种支持仅仅理解为支持任何一种合作社的流转是不够的,而应该理解为支持确实有真正的居民群众参加的合作社的流转。奖励参加合作社流转的农民,这种方式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应当检查农民参加的情形,检查参加的自觉性及其质量,——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论合作社》,《列

宁全集》第18卷,第2册,1925年版,第131页)<sup>161</sup>

而且无可争议的是,整个村落的播种面积的预约合同是合作社流转的最好形式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由政治局倡导组成的委员会<sup>162</sup>,作为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批准一系列措施,在预付款和价格奖励方面都应该让签订预约合同的实际做法有所扩大,哪怕是规模不太大也罢,因为签订了预约合同的农户会把自己的全部产品有组织地缴给我们。

而且还必须在种子和机器供应方面给予协助。我们当然可以而且应该着手搞长期的预约合同,而且为了开展长期的预约合同,特别是整个村落的合同,必须在这方面通过一个条款,说到我们要满足整个这样的村落对农业机器,首先是化肥的订货。

丘巴尔:化肥没有呀。

鲍曼:没有,这很可惜。应该开展化肥的生产。在未来的过冬作物的播种运动中,我们应该广泛地开展预约合同制的实际做法,为这件事更大量地利用拨给农业的一般性贷款。如果我们今年通过预约合同能够得到4000万普特的话,那么再过两年,我们就能通过这样的办法得到2亿普特或者更多了。

现在来说说对富农的进攻。必须要进攻,要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无可争议的,而且可能有争论的只有一点:我认为,问题的争论点在于,应该怎样进行这种对富农的进攻。

我认为,我们这里在对富农的这种进攻中也有歪曲,那就是和富农的斗争既有进行得不够的地方,也有在这方面过火的地方。譬如,在巴什基尔的米亚普托夫斯克县,州委全权代表下了这样一个指令:不仅要剥夺富农,而且要把富农剥个精光。当然,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而且我们的基本任务不在于今天就“把富农剥光”,不在于要采用所谓的剥夺富农的方法行事,而是要限制富农的剥削意图,通过组织贫农和中农群众,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里,向着实现列宁的合作制计划前进。要开展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正面规划——这就是我们在现在这个时期向富农进攻的关键所在。

在提出提高农业的问题时,我们也必须要更坚决地让工业转向农村。一些同志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且乌格拉诺夫同志引用我和他的私下谈话说到了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尽可能多地发展农业机器制造业和化学工业,而且特别是生产化肥,它对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有着如此重大的意义。发展这些部门同时就能提高从事农业的几千万人的劳动生产率了。我们现在总共能生产20万吨

化肥,而如果要想完全满足农户需要的话,我们就应该生产不少于2 500万吨。我们在这里有着非常远大的前景。在机器制造业领域里,我们必须特别加紧生产更复杂的机器。如果想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木犁,那我们开始时就一定要向铁犁过渡,然后才是向拖拉机过渡,这是不对的。我们必须现在就向大规模生产拖拉机和与它配套的工具过渡,当然也不要停止用铁犁代替木犁。接下来,同志们,我感觉地方上的预算不够注意提高农业。帮助主要是通过撒开农业网,但是当然也可以通过利用新的土地、闲置的土地来给以支持,用这样的办法来扩大播种面积。这样做的时候,在从地方预算资金里给不多拨款的同时,必须要把居民自己的资金和他们的劳动力组织起来。

现在我来谈谈如何评价农村总的状态的问题。我应该用几句话来说这个问题,因为乌格拉诺夫同志已经涉及这个问题了,说到我在莫斯科市委常设局的秘密会议上通报了我的巴什基尔之行。我的基本结论是,由于我们没有给贫农吃的,他们有些离开我们了,由于我们在一系列地区对中农的态度上过于耍官腔了,他们也有些离开我们了,因此富农加强了自己的后方,加强了自己在农村的阵地。但是,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和中农已经分离了。由于粮食收购,我们是有些冷淡了,和中农的关系有一定程度的紧张。我们看到了富农的阵地有了一些加强,他们加强了自己的后方,这为结合这件事造成了不安。但是,这当然远不是奥新斯基同志所说的和斯捷茨基同志部分说到的,已经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了。我想要强调的是,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因为我们的群众工作中有弱点。我们在农村的群众工作是非常薄弱的,而且我们在一系列情况下是在用行政压力来进行运动的。不是到处都是这种情况,但是在一系列地方是有这种情况的,而且有的时候忘记了必须要吸收中农。什维尔尼克同志讲了这方面的情况,说到他们是在吸收中农的,但是有一系列地区对这一点利用得很少。活跃苏维埃的工作则完全退居次要的位置了。命令的调门在许多地区成了主调,毫无疑问的是,现在,在我们要进行自我批评和吸收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劳动农民群众来参加国家管理的时候,我们需要进行矫正和在农村开展群众性的政治工作。

现在来谈最后的一个问题:老乡们肯不肯缴粮。乌格拉诺夫同志,我这样说并不是提出老乡根本就不会缴粮的问题。我提出的是关于贫农、中农和富农的问题。我说的是,在第一个时期贫农将不会像去年那样快地缴粮,因为我们没有供应给他们,他们有些害怕了,怕是春天他们不得不用很高的价格买粮;富农在第一个时期将会把持着粮食,中农将会把自己的粮食卖出来。我是在贫农的、中

农的和富农的粮食之间做了一些区分。

[乌格拉诺夫:你只是在今天这样做的。

鲍曼:不是,乌格拉诺夫同志,我不是对一个人说到了这一点,我是在农村工作部的会议上说的,做了通报的,所以我想,许多同志是能够证明这一点的。]

C. T. 柯秀尔:是这样的。

鲍曼:我从巴什基尔回来后向柯秀尔同志还有其他同志说过这一点。这里需要对乌格拉诺夫同志的讲话做个修正,虽然他已经修改了自己的速记记录中关于好像我有采用粮食税的方案的说法。我没有建议用粮食税代替农业税,说的是要从富农的上层那里没收粮食,但不要像今年这样,和中农发生种种复杂情况。这里你对自己的速记做了修改是对的,我说的是,没收这些粮食是把富农上层的一部分农业税变成了实物,但是要保留用货币计算的上缴的数额,而且不是总的对农民都这样做。而且这是我在和你的私人谈话中和一系列的方案一起顺便说的,还谈到了是不是有可能以某种形式和富农推行预约合同制,是不是有可能提前3年确定农业税的数量,并且同时我们要责成产粮户,最大型的和最为资本主义的产粮户,按照固定的价格向我们上缴一部分自己的粮食产品。而且我在提出了赞成的理由的同时也说了反对的理由。这是私下的交换意见,完全是不成熟的、非正式的,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乌格拉诺夫同志把它拿到中央全会上来了。要知道,如果我认为这个方案是考虑得足够周全的话,那我在通报自己的巴什基尔之行的时候,就可以在莫斯科市委的秘密会议上说到这一点了。但是我没有说这一点,因为我不认为可以把一个自己都认为不够清楚的什么草案正式提出来。我不过是提出了问题,如果富农不会自愿缴出粮食的话,用什么办法能够最方便地从富农上层那里得到粮食。能不能允许有这样私下的思考和不要把与同志们的谈话拿到中央全会上来呢?我想是允许的。

伏罗希洛夫:也还可能是说出了不该说的话呢。

鲍曼:李可夫同志在自己的发言里也没有排除一个问题,那就是可能在下次全会上,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来,如果在粮食收购中出现困难,那我们该怎么办。如果一切都将顺利,我是非常高兴的。这将是很好的。我举双手赞成决议并希望一切都非常顺利,我们能得到8亿普特的粮食或者更多些。但是我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得不到足够数量,如果富农上层顽固不化,不缴粮食,那个时候需要对富农采取什么措施呢——107条,或者是从国外运进来,要么是把农业税的一部分变成实物,要么是以必须执行的方式或者私人的方式推行和富农签订预约合同的特殊政策?所有这些问题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

冒出来。

斯大林：一定会的。

鲍曼：我和一些已经开始坚持该从国外不断运进粮食来的特殊理论的同志交谈过。他们是这样说的：如果有困难，就从国外把粮食运进来。但是要知道，我们的外汇储备现在很紧张，而且我们说的是有必要出口而不是进口粮食。这是应该注意到的，不能指望不断地从国外运进粮食来。我们将会遇到困难，而且不能排除有可能我们不得不想想，是否必须采用某些经济的和行政的措施。当然，如果没有困难，那是非常好的。那时也就没有什么可想的了。

李可夫：想还是要想的。（笑声）

鲍曼：我说的是可以想这个问题和交换意见，但不一定要把这些非正式的意见拿到全会上来。

李可夫：对。

鲍曼：现在来说说对我们方针的歪曲。我在这里不完全同意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所说的，我们要为所有的歪曲负责。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要为歪曲负责的，因为有一系列的歪曲是有机地来自于我们的方针的。但是就拿麦里托波里区来说吧，那里动用107条惩罚的，更多的是中农，而不是富农。这种歪曲绝不是来自我们的方针的，因为我们的方针是要对富农、富农农户采用第107条的，而这里是针对中农采用了第107条。我想，今后我们需要一定避免使用在采用107条时出现的那些形式，因为它们肯定会影响到我们和中农的联盟和把中农从我们身边推开。所以这些形式是需要消除的。至于总的立法和行政的调节措施，如果有必要，还得采用它们，但是要这样，不要威胁到与中农的结合，这一点是需要考虑的。我想，如果我们在组织贫农和中农群众方面开展群众工作并能对富农进攻的话，那么肯定我们的粮食收购工作和我们最近一次的粮食收购运动相对就会轻松得多了。

主席：卡明斯基同志发言。下一个是斯大林同志。

卡明斯基：我们大家都同意必须立即取消非常措施。但是与此同时必须要准确地做出回答，用什么来取代这些非常措施，怎样保障过渡到正常的粮食流转上来。在这方面应该起到重大作用的是增加工业品，改变农业税的条款和缴纳的期限，更积极地吸收小农的积累参加到合作社和国债中来。在最近时期，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感觉，米高扬同志在这个部分提出的建议显然是不够的。10%—15%的提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有人喊：那什么能解决问题呢？



卡明斯基:需要做到让价格有显著的差别,要让这种差别的确能产生影响,扩大粮食经济的商品率。

有人喊:大体上是怎样呢?

卡明斯基:我想,价格应该提高25%—30%。

有人喊:那实际工资又该怎么办呢?

卡明斯基:当然,需要尽一切可能不让价格的提高带来实际工资的降低。在这方面,有许多是可以通过粮食收购机构的进一步合理化和降低贸易和储藏的开支来达到的。但是,肯定在一些地方不得不也提高销售价格。不能闭眼不见的是,在一些地方,实际上按照我们规定的那种价格已经做不到对工人和农村贫农的正常供应了。要知道,贫农不得不在一些地方为一普特的粮食支付4—6卢布,甚至10卢布,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要知道,事实是,工人们不得不排队等面包或者是几乎要用票证或者社员手册得到面包了。问题在于要对粮食确定出这样的收购和销售价格来,虽说是比今年我们曾企图做到的略高一些,但的确能够保障按国家价格不间断地向工人供应。应该直截了当地承认,我们在价格问题是犯了很大的错误。在第二季度粮食收购开始下降的时候,就完全清楚了,运动开始时确定的价格是农民基本群众不能接受的。粮食作物和工业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张开的幅度很大。在调节价格的实践中没有灵活性,其中包括价格的确定没有考虑到个别地区的收成状况。在收成好的和不好的地区,价格是一样的。低价格对粮食收购进程的影响有多大,可以通过黑麦收购的例子看到。大家知道,今年黑麦的收成特别高,而小麦的收成特别低。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大家都预料完成收购小麦的计划有困难,指望着能顺利地完成了收购黑麦的计划。结果相反。我们正是由于在黑麦的收购上比小麦的收购上缺口更大而没有完成计划。这是因为黑麦的指数特别低(101)。

在革命前的出口中,燕麦占有很大比例,可这种作物在我们这里几乎消失了。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说得对,在价格问题上,可以看出许多同志有某种盲目崇拜,但是需要直说的是,在很大程度上,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就是这样的盲目崇拜者。我想起了在党的代表大会时,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是怎样把我们召集起,讨论粮食收购进程问题的。当瓦雷基斯和我提出物价问题的时候,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的回答好像是,谁要是说到提高价格,就应该把他的嘴用铅铸死。

李可夫:不是用的这些词,但是意思是接近的。

古比雪夫：对。

卡明斯基：是的，至少是这个意思。

柯秀尔：是巴不得要人家来批评。

卡明斯基：至少我应该承认，我们搞清楚了粮食市场上的危机，却提出不改变价格，我并不完全相信，这样的决定是正确的。我的感觉是，我们未必可以持有这样的观点，如果说我们在7月确定粮食价格的时候犯了错误，那么我们就一定应该把这个错误坚持到明年的7月。当然，更好的办法是在年初确定正确的价格，而不是在年中改变价格。当然，在年中改变价格会直接打击农村中的贫农那部分人，而且对富农特别有利。但是总不能是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是我们的整个政策就不允许在年中改变纠正价格上的错误吧。我不相信不应该改变价格。古比雪夫同志插了一句说“对”。

古比雪夫：我说的是李可夫说得对，他是说当时是不能提高粮食价格的。

卡明斯基：我感觉，如果我们有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价格的决定的话，我们就能更好地保障工人阶级和农村中的贫农，而且至少我们可以更成功地甚至采用为了加强粮食收购而不得不起用的那些非常措施。

有人喊：粮食反正还是没有运来。

卡明斯基：粮食是没有运来。我根本就不是想说可以用提高价格来解决加强粮食收购的问题，但是我感觉，可以使得推行运动更容易些。

有人喊：贫农也会感谢的。

卡明斯基：要知道，贫农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在一些地方不得不用贵出两倍的价钱买粮食，他们现在不是到处都在说感谢的。

我已经在上一次全会上说过了在供应贫农方面已经看得出来的困难了。这些困难在最近这个季度里变得特别大了。到处的贫农都不得不到城里去搞粮食。

斯大林：他们不是从我们这里得到了一些种子吗？

伏罗希洛夫：3 200万普特——这是不是可以说明点什么了呢？

卡冈诺维奇：结果是在乌克兰贫农扩大了7%的播种面积。

卡明斯基：我觉得你们的插话说的是另外的事。我绝不是想闭口不谈今年在帮助贫农这件事上取得的巨大积极成就。我说的只是，如果我们在采取其他措施的同时及时地改正了价格政策中的某些粗鲁的错误的话，我们克服粮食收购市场上的危机、和富农斗争、帮助农村中的贫农等方面的措施可以进行得更加顺利。

现在来谈第二个问题,关于个体农户的问题。最近这些天对个体农户说的和写的都很多。形成的印象是,一些人在指责另一些人对个体农户估计不足,想要跳过个体农户,等等。就在这同时,提高个体农户的措施通常是和集体化的措施相对立的,于是得出的印象是,我们沉醉于集体农庄之中却忘记了个体小农经济。

首先来说一说沉醉于集体农庄。我感觉,这样的声音出现得完全不是时候,没有任何根据。现在,当我们已经完全搞清楚了建设集体农庄的工作速度缓慢得不能让人容忍的时候,难道可以说沉醉于集体农庄吗?在革命的第11个年头上,集体农庄才包括了不到2%人口,难道能说沉醉于集体农庄吗?我们是在今年第一次严肃地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的。我们在加强集体农庄运动上走出的是最初的几步,就已经开始发出警告的声音和开始谈论沉醉于集体农庄运动了。这从根本上就是不正确的。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说,我们的困难是对集体农庄注意得不够,是集体农庄发展得很少。

在总结今年的粮食收购运动的时候,我们应该一次又一次地呼吁,应当极大地加强建设集体农庄、巩固现有的集体农庄和建设新的集体经营单位的工作。

现在来说一说个体农户。在我们的条件下,不看到有巨大的可能提高小型的个体农户是愚蠢的。完全可以不用争论的是,就是在小农经营的基础上,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商品化也是有可能极大扩展的,而且我们应该加紧工作来完成这项任务。但是,问题在于怎样提高个体小农经济。在这方面我应该直说的是:只有通过合作社才有可能大面积地提高小农经济。只有通过实现列宁的合作制计划才有可能,这个计划不可分割的部分就是集体农庄运动。不说合作制就谈不上提高小型农户的个体经营。甚至为了给没有马的农户提供贷款买马,也需要贷款合作制;为了给他们改良的种子就需要有种子合作制。为了提高小农经济,需要把他们从高利贷者和富农的桎梏和剥削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合作制,这一切就不可想象。可是,许多同志在这里说到了必须要加强提高个体农户的工作,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到农业合作社。

合作化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将通过广大的农民群众最能理解和最懂得的途径,也就是农业合作社的途径,走向群众性的农户集体化。把提高个体农户的问题和农业合作社的问题分割开来是根本错误的,就像把集体农庄运动和农业分开是不正确的一样。当我们说到提高个体农户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可能是一个:通过合作化和集体化提高分散落后的农户的贫农和中农群众。

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针对我说了一句话:“这就

是把集体化问题搞混了的人”。

**斯大林:**谁提旧事……

**卡明斯基:**我现在需要讨论问题。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责怪我把集体化的问题搞混了,正是因为当我说到预约合同制是逐渐把农户吸引到集体化的过程中来的一种大众形式的时候,没有把集体化和列宁的总的合作制计划分开。现在应该说,从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的发言中,我没有感觉到他把提高个体农户的任务和合作化计划联系起来。没有合作制不可能得到发展,不仅是个体的富农农户,而且是众多的我们应该关心的小型的和微小型的贫农和中农农户,他们只有在合作制的框架内才能提高和发展。

我担心的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某些议论已经开始反映到我们的工作实践上了。譬如说,关于预约合同制的问题。我们显然在这里没有能够得到苏维埃机关应该给予的,也是这个工作方法应该得到的那种支持。鲍曼同志任主席的委员会研究好关于准备秋播的问题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问题在劳动国防委员会就卡住不动了。但是我们就要赶不上秋播运动了。我们说要提高农民的粮食经济,但是,尽管有今年的沉重教训,就是现在也还是为真正地提高农民粮食经济采取的实际措施太少。

在这里我又该回到合作制问题上来了。我们从今年的教训应该得出的基本结论,安德烈耶夫同志和另外的一些同志已经说到了,那就是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提高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农户的商品率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里的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缓慢得不能容忍。需要直接说的是,我们对真正的合作化还是做得太少了。列宁在自己的文章里写到合作制,说到某些同志对合作制估计不足,鄙视合作制,至今还几乎完全是这样。我们有一系列非常好的决议,有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其中包括1926年8月19日的政治局决议<sup>163</sup>,也有苏维埃机关为实现政治局的这个决议通过的决议<sup>164</sup>——劳动国防委员会和经济会议<sup>165</sup>的决议,但是我们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这些非常好的决议并没有在生活中得以贯彻。在合作社人士中,现在8月19日的决议被称做是失效的公文。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和党中央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各种决定和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那些调节、贸易等等机关对农业合作社的态度之间,有着令人惊叹的差距。我本可以举出几十万个事实来说明,许许多多我们可敬的机关简直就是在嘲弄列宁的合作制计划。

**有人喊:**这是谁对您说的?

**卡明斯基:**我们的全部经验和我们的全部实践都是这么说的。

我们有许多人用农业合作社数量上增长的数字安慰自己,但是一分钟也不该忘记的是,虽然在数量上增长了,但是农业合作社还非常薄弱,合作社的自我活动以及居民从物质上参与合作社的流转还是薄弱得简直不能容忍。在改组农民生产方面,合作社只是迈出了最初的几步。农业合作社面临的是改造小型的和微型的农户的巨大任务,如果没有真正的帮助,没有真正的支持,没有来自全党和全体苏维埃机构每天的支持,它还没有能力完成这些任务。

**米高扬:**说得对。

**有人喊:**为什么粮食收购得不好?

**卡明斯基:**而且是不得不总是要推倒某些墙壁,凿穿冰层。

**柯秀尔:**就像在极地一样。

**斯大林:**可是你不要生气。

**卡明斯基:**我们大家都算在内,还都对收购粮食学得很差。但是至少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应该责怪农业合作社。需要说的是,虽然在合作社的工作中各种极其重大的缺点,农业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在这场运动中还是表现出了,它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收购到了更多的粮食,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适应这个工作。要知道,事实是,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掌握了很大的资本,很大的技术基地,有着老练的、有经验的机构,可是在今年的粮食市场上占了不到10%的份额。

我们肯定能够更快地提高个体农户。我们合作社工作每天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现在正在召开粮食合作社代表大会。地方上来的工作人员引证了一系列非常有意思的事实。譬如,来自顿河的一位代表说:一个叫“斯杰潘尼丁达尔”的村落在农业合作社的影响下,全村和它签订了合同,转向了播种纯种,整个播种面积上都种了经过选种的加尔诺夫卡麦种,经过选种的玉米和向日葵,组织了公共的脱粒并且在准备组织拖拉机队。

**丘巴尔:**那你们给了预付款吗?

**卡明斯基:**预付款给了。我们给居民的是纯种的种子。我们给贫农,此外还给了耕种土地的贷款,包括与居民签合同,根据这个合同,所有土地社都有义务用良种种子播种所有的土地并采用改良的生产方法,按照合同规定的数量和规定的期限上缴农业合作社的全部产品。

**丘巴尔:**那里有多少没有马的农户?

**卡明斯基:**我现在没有这方面的准确数字,但是这是普通的和典型的村落。这绝不是唯一的情况。我们有一些地区是整个转向了根据和农业合作社签订的

合同完全播种纯种种子,转向了新的、经过改良的农业生产形式。我们在这项工作中是不是有应有的支持呢?需要直说的是:没有。例如,现在几乎是在700个点上,在有磨坊和粮仓的点上,农业合作社事实上没有可能直接进行粮食收购。这些企业被授予了收购的垄断权,而农业合作社不得不在这里处于完全不正常的条件下,所做的工作是向居民发路条,指引他们到有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工作人员提供服务的这些公司的粮仓去。合作社失去了和居民的联系,而且粮食工作的技术基础越是得到改善,粮仓的建设越是得到更多的发展,粮食农业合作社的工作就会变得越困难。商业人民委员部甚至做到了这样的程度,认为小型的、道路沿线的粮仓和机械化的仓库是制高点,只应该掌握在国家收购单位的手里。

柯秀尔:而你们的哥们儿是不会允许进入这些制高点的。

卡明斯基:可是我们说的很多的是合作社的工业化,而且党的十五大指出了合作社的工业化是农业工业化的基本途径之一。在实践中是,发展合作社粮仓的建设是得不到调节机关的支持的,相反,碰到的是巨大的抵制。在其他一系列情况下也是这样的。(主席的铃声)我只请求给我两分钟。

主席:可以吗?

喊声:可以,可以。

卡明斯基:我还想请全会注意一点。斯大林同志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好像说到了这一点。最近在我们这里,好像是开始在农村中抹杀国家机关、党的机关和合作社的界限。不知道合作社到什么地方结束,党的组织又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

调节机关至今都是顽固地不去区分合作社和国家机关之间的界限。不得不又一次说到过行政化和不能允许的行政对农业合作社基层环节工作的干涉。

有人喊:我们自己都长出胡子来了。

卡明斯基:当然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反对调节,但是我们要反对在调节领域里的一系列扭曲的状况,这些扭曲实际上导致了事实上消灭任何合作社的自主权和在合作社组织工作中的经济核算。需要确定调节机关对农业合作社干预的极限,在调节机关和合作社机关之间划分职能,确定它们中的每一个的责任。

有人喊:你们不要搞竞争。

卡明斯基:我请你们不要这样理解,好像我是要和商业人民委员部搞什么部门之间的争斗。

加里宁:也应该斗一斗。

**卡明斯基:**我这样说是为了不要被人不正确地理解。我认为在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有许多困难,我也不想对所有这些可以听到的对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抱怨上再添油加醋了。

**李可夫:**米高扬是罐蜜,而他是焦油。

有人喊:不上点油是开不动的。

**斯米尔诺夫:**焦油作为润滑剂是很有帮助的。

**卡明斯基:**是的。把商业人民委员部想象成是蜜不大合适。但是如果在中央,我们虽然也很困难也不能每每都能做到但还谈拢的话,那在地方上发生的又会是什么情况呢。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引用地方调节机关的实际工作中的事实。在一系列有磨坊的地方,农业合作社的收购点被关闭了。农业合作社被迫要服从各种调节机关规定的、人为的计划,采取了所有的措施让它不能超出这些计划。实际上得到的情况是,合作社没有权利从老乡那里接收粮食,而老乡也不可能把粮食缴给自己的合作社。我感觉,调节的方法问题,调节机关和经济机关之间,首先是和农业合作社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形式问题,是最头疼的和最没有调节好的问题之一。

我在结束的时候想要请求全会:必须要在最近一次的全会上提出农业合作社问题。我们现在的农业合作社的工作中有非常多新的东西,而且我感觉是许多有意思的东西。农业合作社从数量上说是成长起来了,在国家的商品流通中开始占据首位了,而且开始直接触及到如何组织农民生产的任务了。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农业合作社现在正处于转折点。它正在进入自己发展的新时代,农户真正进行生产合作的时代。我感觉,建设农业合作社的问题——它的工作方法和它的建设组织形式——应该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会上加以讨论。

**主席:**斯大林同志发言。

**斯大林:**同志们,在谈到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具体问题之前,请允许我谈一下有理论意义的和在全会的辩论时在这里出现的一些总的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问题,关于保障工业今天的发展速度的途径问题。奥新斯基同志和随后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直接触及到了这个问题,可能他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想,滋养着我国工业的主要源泉在我们这里有两个:第一是工人阶级,第二是农民。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通常工业化的发生除了国内的积累外,要靠对其他国家的掠夺,靠掠夺殖民地或者战败国或者是靠着重要的外债。你们知道,英国几百年来是从所有的殖民地和世界上的所有地方榨取民膏的,这样给自己的工业投入附加

的投资。而且这也就解释了英国为什么一时变成了“世界工厂”。你们也知道,德国是靠在法普战争之后从法国得到的50亿战争赔偿发展了自己的工业的。大家还知道,美国是靠欧洲的债务发展了自己的工业的。德国现在也是靠债务,主要是在美洲的债务,恢复自己的工业的。我们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就在于,它不能,不应该掠夺殖民地和剥夺别的国家。可以说这条路对我们来说是封死的。但是我国在外面也没有债务。所以这条路对我们也是封死的。在这种情况下,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只有一个:靠国内的积累发展工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在资产阶级的秩序下,在我们这里工业、交通等等的发展靠的是借债。就说建设新的工厂或者改造老厂吧,就说铺设新的铁路或者建设大型电站吧,——没有一个这样的企业不是没有用外债的。在苏维埃的秩序下,我们这里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在铺设长达1400俄里的土耳其斯坦铁路,需要几个亿。我们在建设第聂伯河国家工程,也需要几个亿。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什么外债呢?没有,我们没有。所有这一切在我们这里都是靠的国内积累。但是这个积累的主要来源在哪里呢?我已经说过了,它们,这些来源,有两个:第一是创造价值 and 推动工业前进的工人阶级;第二是农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农民的状况是这样的:他们不仅是向国家支付通常的税、直接和间接的税,而且他们还要以比较高的价格为工业的商品多支付——这是第一;在农产品价格上少收,这是第二。这是为了提高服务于全国(其中也包括了农民)的工业对农民的附加税。这是某种“贡赋”,是某种超额税,这是我们暂时不得不收取的,为的是保持和进一步提高今天工业的发展速度,为了国家而保障工业,继续提高农村的福利和然后根本消灭这个附加税,这个城乡之间的剪刀差。怎么说呢,这是一件并不愉快的事。但是没有这种对农民的附加税,遗憾的是,我们的工业和我们的国家暂时还是不行的,我们如果抹杀事实和对这一点闭眼不见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布尔什维克了。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索柯里尼柯夫和奥新斯基看来不懂得这个无可争议的东西。他们把自己的发言建立在了这样一点上,那就是农民在商品上支付得过多,这是对的,为农产品给农民支付的并不够,这也是对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和奥新斯基同志要求的是什么呢?他们要求的是采用恢复性的粮食价格,是要把这个“剪刀差”,这些支付不够和支付太多在现在就消灭掉。但是,比如说在今年或者在明年消灭“剪刀差”,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国家的工业化,其中也包括农业的工业化,要刹车,把我们还没有壮大起来的年轻工业搞垮并且这样来打击整个国民经济。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很清楚,我们不能。是



不是需要消灭城乡之间的“剪刀差”，所有这些支付不够和支付太多呢？是的，当然是需要消灭的。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在不削弱我们的工业，也就是不削弱我们的国民经济的情况下，把它们消灭呢？不，我们不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策应该是什么呢？它应该是逐渐地减弱这个“剪刀差”，让它在不降低工业品价格和提高农业技术的情况下，一年一年地接近，这就不可能不导致粮食生产越来越廉价，为的是然后，经过一些年之后，根本消灭对农民的这个附加税。农民能不能承受得住这个重担呢？当然是能够的：第一，因为这个重担将会一年一年地减弱；第二，因为不是在农民群众注定是要贫困和受剥削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征收这个附加税，而是在苏维埃秩序的条件下，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对农民的剥削被排除了，支付这个附加税是在农民的物质状况不断改善的条件下进行的。

奥新斯基同志问：那么中央的路线和反对派的路线有什么区别呢？回答是清楚的：在中央的路线和反对派的路线之间有一道鸿沟，这是和反对派的争论的全部过程和结果证明了的。至于奥新斯基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路线，那它确实没有什么，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和反对派的路线有所区别。不该忘记，立即采用恢复性的粮食价格是反对派的要求。这是一个事实，不承认倒是奇怪了。这可能显得不大可能，但这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有人可能会问：怎么可能把反对派的主张超级工业化的人们的那种愚蠢的东西和要求采用恢复性的粮食价格混为一谈呢？是的，是这样的，从逻辑上说，是不能把它们混在一起的。但是在反对派的纲领里，它们是混在了一起的。问题在于反对派有两个灵魂：一个是大声喊叫的、“左倾革命的”、企图揭露中央不愿意支持工业化的；另一个是蛊惑性的、实际上的机会主义的，目的在于在是不是有必要采用恢复性价格上挑逗农民和随波逐流的。第一个灵魂是呼吁所谓的“左派”分子的，为的是把他们聚集到反对派的周围。第二个灵魂是向“右派”分子呼吁，也是为了把他们聚集到反对派的周围。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这里，在我们关于反对派的决议里，才说反对派是最五花八门的各种分子，从“极左”到“极右”分子的堆砌。奇怪的是奥新斯基没有发现反对派有这第二个灵魂。不然他就会知道他在这里实质上重复的是反对派“极右”分子的要求。这里有一个反对派的文件证明了他们是有第二个“极右”的灵魂的。我指的是H.穆拉洛夫1927年4月23日在苏联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团会议上的声明。

“粮食收购运动应该不仅是按收购到的粮食数量和年平均价格来评价，而且应该根据这个运动是否符合无产阶级和农民结合的利益来评价。粮食价格的

政策应该符合以下的基本原则：第一，生产者应该为自己的粮食得到恢复性价格，第二，必须力求让没有什么实力的各类农民得到和富裕类型的农民同样的粮食价格”。

如果考虑到穆拉洛夫的声明是以整个联合反对派的名义提出的，这个声明被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完全一致地否决了，被认为是与我们党的路线根本背道而驰的话，那么你们就明白了，奥新斯基同志以及随他之后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在这里是上了什么样的当了。

现在我们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基本源泉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情况。

第二个问题关系到的是和中农结合的问题，是这种结合的目的和手段的问题。我要再一次涉及奥新斯基同志的发言了。照他的说法，城乡之间的结合，工人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的结合完全是通过纺织、通过满足农民的个人消费这条线进行的。这对不对呢？这是完全不对的，同志们。当然，通过纺织这条线满足农民的个人需求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也是从这里开始在新的条件下建设和农民的结合的。但是依据这一点说在纺织方面的结合就把这个事情都包含了，说从农民的个人消费上的结合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经济联盟的基础的全部内容，这就意味着要犯非常严重的错误了。实际上，城乡结合不仅是要通过满足农民的个人需求，不仅是在纺织上，而且也要满足农民作为农业产品的生产者的经济需求。我们给农民的，不仅是印花布。我们给他们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机器、种子、铁犁、肥料，等等，这是对提高农民经济和对农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所以结合的基础不仅是纺织，还有金属。没有这些，和农民的结合就是不牢固的。奥新斯基同志忘记了这一点。

如果想结合的目的是保持阶级，特别是保持农民阶级，那是错误的。这是不对的，同志们。结合的目的根本就不在这一点上。结合的目的就在于要让农民把工人阶级作为我们整个发展的领导者和它接近，是要加强农民和工人阶级的联盟，把工人阶级作为这个联盟的领导力量，要本着集体主义的精神逐渐地改造农民、他们的心理和他们的生产，这样来准备消灭阶级的条件。纺织上的结合很少能触及到农民经济的生产方面，所以一般说来，对于用集体主义精神改造农民，对于消灭阶级，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而从金属上的结合就相反了，涉及的首先是农民经济的生产方面，是它的机械化和它的集体化，而且正因为这样，这种结合的结果应该是能逐渐改变农民，逐渐消灭阶级，其中也包括了农民阶级。

总的来说，怎样才能用和工人阶级的心理相接近的精神，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原则改造和改变农民、他们的心理、他们的生产呢？为此需要首先在农民群众中

进行集体主义精神的广泛宣传。第二,为此就需要培植集体所有制和越来越更广泛地用我们的供销合作社组织把数百万计的农户包括进来。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是,如果不是广泛地发展我们的合作制,我们就不会有现在我们在农民中可以看到的那种有利于集体农庄运动的转折了,因为我们的条件下,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就是为农民向集体主义过渡的准备。但是,要改造农民,所有这一切还远远不够。在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农民这件事上,基本的力量是农业中的新技术,农业的机械化,农民的集体劳动,国家的电气化。

奥新斯基同志在这里引用了列宁的话,摘取了列宁的著作中关于和农民经济结合的著名段落。但是在这里把列宁描绘成是一个农民哲学家,拿来列宁的一部分话,不愿意完整地引用他的话,这就意味着是歪曲。列宁完全明白,在手工工业商品上和农民结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就此终止,因为与此同时他还坚持要也在金属方面,在向农民供应机器方面,在国家的电气化方面,也就是说在所有那些有利于按照集体主义的精神改变和改造农民的方面,也和农民结合。譬如说,难道不能听一下列宁著作的这一段语录吗:“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电气化,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才能像人们所说的使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地和非常迅速地改造小农。”(《列宁全集》第18卷,第1册,第139页)<sup>166</sup>

问题很清楚:如果纺织上的结合没有金属上的结合来补充的话,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结合就不可能是牢固的和长久的,它就不可能达到自己逐渐改造农民、让他们和无产阶级接近和把他们转到集体主义的轨道上来的目的。

列宁同志就是这样理解结合的。他这样理解这种结合是因为他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而不是像有的时候某些可以说是“列宁主义者”的人把他描绘的那样,是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哲学家。

第三个问题涉及的是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首先必须确定的是,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不是像有些同志所说的,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提出来的,而是在它之前,还在1918年初,当我们第一次有了可能开始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的时候,提出来的。我可以引证1918年初出版的伊里奇著名的小册子《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那里阐述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在武装干涉结束后引进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党把它规定为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它,这个政策本身,被武装干涉中断了,我们只是在武装干涉之后,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才有了可能推行它,和战时共产主义相比,新经济政策的确是

一个新的经济政策。

**布哈林**：当时在一定时间内把它忘记了。

**斯大林**：为了证实这一点，我认为需要引用一下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著名决议<sup>167</sup>，好像是关于列宁的报告，那里白纸黑字写着，还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前就已经阐述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奥新斯基**：我并没有反对这一点。

**斯大林**：可能您没有反对，但是其他的人反对。

**奥新斯基**：我甚至自己说到了这一点。

**斯大林**：您也许总还是能允许我从这个决议里引用一段话吧。1921年末，也就是在宣布了新经济政策后几乎一年的时候，在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这个决议里……

**伏罗希洛夫**：这是在1920年初。

**斯大林**：这是在1921年末，12月，在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上……

**伏罗希洛夫**：对，对！

**斯大林**：在这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预先总结”里，说到了以下内容：

“还在第一次喘息的时候，在1918年春天就准确确定了基本原则的所谓新经济政策，是建立在对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力量的严格考虑的基础上的。实行被俄罗斯地主、资产阶级和欧洲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势力对工农政府的配合进攻中断了的这个政策，只是在从军事上消灭了反革命的各种企图之后，到1921年初，才有了可能”（见《第四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第16页）。

这样，你们就看到了，一些同志说，党好像只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才意识到有必要在允许市场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和总的来说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是多么不正确的。

而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可以得出的，首先是不能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一种后退。接下来，由此可以得出的是，新经济政策预料到了社会主义要对我们经济的资本主义成分进行胜利的和系统的进攻。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反对派想的是，既然采用了新经济政策，那我们剩下的就只有一条了——一步一步地后退，就像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候退步那样，“扩展”新经济政策和缴出阵地。

**布哈林**：直到“国际革命”的到来。

**斯大林**：完全正确——直到国际革命的到来，它能使我们摆脱进一步的后退。托洛茨基所说的党在农村采用土地租赁和雇佣劳动的做法，好像是在“扩

展”新经济政策和从列宁的立场上后退的说法,也就是建立在这种不正确的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上的。听一听托洛茨基是怎么说的不好吗:“而苏维埃政权最近在农村的措施是什么呢——是允许租赁土地,雇佣劳动力,——我们所说的扩展农村新经济政策的一切……但是能在农村不扩展新经济政策吗?不能,因为那样农民经济就要枯萎了,市场就要缩小了,工业就要止步不前了”。<sup>168</sup>这就是如果把新经济政策是后退而且只是后退的不正确的思想装到自己的脑子里,会胡诌到什么样的程度。

能不能说党在农村采用了雇佣劳动和土地租赁就是“扩展”新经济政策,是从列宁的立场“后退”了等等呢?当然不能!说这种蠢话的人和列宁以及列宁主义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我可以在这里引用列宁1922年4月1日写给奥新斯基同志的信,他在那里直接说到了必须要在农村采用雇佣劳动和土地租赁。这是在第六次代表大会末尾的时候,那次会上代表们广泛讨论了农村工作问题,新经济政策及其后果问题。这就是向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们提交决议草案的那封信里的一段话:

“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电气化,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才能像人们所说的使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地和非常迅速地改造小农。”(《列宁文选》第4卷,第396页)<sup>169</sup>

你们可以看到了,说什么在农村中引进土地租赁和雇佣劳动的时候是“扩展”新经济政策,是从列宁的主张“退后”的种种议论,是多么愚蠢和空洞的了。

为什么我要说这些呢?因为那些议论新经济政策“扩展”的人们是在这种胡诌中为自己向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退让找理由。因为我们这里在党内和在党的周围产生了一些人,他们从新经济政策的“扩展”中看到了对工人和农民结合的“拯救”,由于取消了非常措施,就要求放弃对富农的限制,要求为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松绑……为的是结合。所以就必须要用全力和一切手段来让党不致受这样的反无产阶级的情绪侵害。

为了不走得更远,我引用一位同志写的字条,他是“别德诺塔”的工作人员奥西普·切尔诺夫,他要求对富农搞一系列的减负,这不是别的,而是真正的和没有休止的“扩展”新经济政策。我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党人士。

**布哈林:**看来现在是共产党员。

**斯大林:**感觉他还是一个非党人士,但是从对苏维埃政权忠诚这件事上看,

另外的共产党员可以嫉妒他了。

加里宁：对！

斯大林：就是这个同志，维护苏维埃政权和工农联盟的奥西普·切尔诺夫，在农民问题上糊涂到了这样的程度，甚至很难把他和农村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区分开来。他认为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原因何在呢？他说，“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渐进的所得税制度……第二个原因是竞选办法在法律上的改变，把谁算是富农的指示不清楚”。为了排除困难需要做些什么呢？他说：“首先是要取消现在这个样子的渐进的所得税制度，用征收土地税来取代，对牲畜和大型农具略征一些税……第二个措施也很重要，那就是改变选举办法，对有剥削的富农经济从什么地方算起要标得更粗略些”。

这就是“扩展”新经济政策。你们看到了，托洛茨基没有白白地撒下种子。对新经济政策不正确的理解产生的是对“扩展”新经济政策的胡言乱语，而对“扩展”新经济政策的胡言乱语又制造出来各种各样的报告、文章、信件和建议，说是要给富农自由，要取消对他们的限制和让他们能够自由地致富。

在这方面，在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上，我还想指出一个事实。我指的是彼得罗夫斯基同志所说的，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联系到粮食收购的阶级斗争好像只是有着再次要不过的意义，这场阶级斗争好像在我们的粮食收购这件事上的困难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严肃的意义。我应该说，同志们，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我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多少严肃的政治或者经济事实不是反映了在城市或者农村里存在着阶级斗争的。难道新经济政策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吗？当然没有！相反，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和工具。而难道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吗？

喊声：对！

斯大林：粮食收购的时候富农反对苏维埃政策，苏维埃政权联系粮食收购，对富农和投机商采取了反措施和进攻行动，在这之后，怎么能说在这样重要的政治或经济事实中，阶级斗争起到的是再次要不过的作用呢。在粮食收购危机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子对苏维埃政策的首次严重的攻击，难道这不是事实吗？难道农村就再也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吗？列宁关于依靠贫农、和中农联盟、和富农斗争的口号是我们在农村工作的基本口号，难道这不对吗？如果这不是反映了农村中的阶级斗争，那这个口号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的政策不是煽动阶级斗争的政策。为什么?因为既然我们是掌握政权的,既然我们巩固了这个政权,所有的制高点都集中在了工人阶级的手里,我们关心的是让阶级斗争不要采用国内战争的形式,要让我们有可能在多少比较平静的环境下继续自己的建设工作。但是这并不是说,因此阶级斗争就被取消了,或者这个阶级斗争就不会变得尖锐了。这更不是意味着阶级斗争不是我们前进的决定性力量。不,不能这样说。我们常常说,要在商业领域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营形式。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是这样把成千上万的中小商人从流通领域里挤出去。能不能想象这些被从流通领域里挤出去的商人将会沉默地坐着,不企图组织反抗呢?当然不能。我们常常说,有必要在农村限制富农剥削的蔓延,应当向富农征很高的税,应该限制租赁的权利,不能让他们有权参加苏维埃选举,等等,等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是在逐渐地挤压和压缩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子,有的时候把他们逼到破产的程度。能够预料富农将为此而感谢我们,他们不会企图组织一部分贫农或者中农来反对苏维埃的政策吗?当然不行。我们所有的向前推进,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里取得的每一个多少严肃的成就,都是我国阶级斗争的反映和结果,这还不清楚吗?

从这一切可以得出的是,随着我们不断地前进,资本主义分子的抵制也将增长,阶级斗争将会更加尖锐,而力量越来越大的苏维埃政权将要推行孤立这些分子的政策,完结工人阶级敌人的政策,最后是镇压剥削者反抗的政策,为工人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进一步前进建立基础。

不能把事情看成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形式将在排斥工人阶级的敌人的情况下得到发展,而敌人将会沉默地后退,为我们前进让路,我们又将是前进,而他们又会是退步,工人和资本家都会“突然”地、“无影无踪”地、没有斗争和焦急不安地落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怀抱。这样的童话是没有的,也根本就不会有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行将寿终正寝的阶级从没有,也不可能是自愿地,不企图组织反抗就缴出自己的阵地的。在阶级社会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向社会主义前进,也将不会是没有斗争和不安的。相反,向社会主义前进不会不导致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抵制,而剥削者的抵制不可能不是导致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尖锐化。这就是为什么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次要作用的议论来迷惑工人阶级。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对富农和投机商的非常措施问题。不能把非常措施看成是什么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东西。非常措施是在一定的非常条件下,当我们没有其他的措施来运作的时候所必须的和适宜的。在另外的条件下,当我们有其他灵活的措施在市场上运作的时候,非常措施是不需要的和有害的。有些人想,

在任何条件下非常措施都是不好的,这是不对的。应该同这样的人进行系统的斗争。但是有些人想,非常措施总是必要的和合适的,这也是不对的。和这样的人应该进行坚决斗争。

在粮食收购危机的条件下,采用非常措施是不是一个错误呢?现在大家都承认这不是错误,相反,是非常措施从整个经济危机中拯救了国家。是什么迫使我们采用这些措施的呢?到今年1月的时候,粮食缺少了1.28亿普特,这是我们在泥泞到来之前就应该补上的,而且同时要创造出正常的粮食收购速度。在粮食储存缺少大约一亿普特的情况下,为了期待和干预市场,或者在没有足够的外汇的情况下要从国外运进大量粮食,我们能不采用非常措施吗?很清楚,不能。而如果我们补不上这个缺口,那会怎么样呢?现在我们这里是整个国民经济有非常严重的危机,城市在挨饿,军队在挨饿。如果我们能有一亿普特的储备粮熬过去,然后通过干预市场和富农苦苦周旋……

**伏罗希洛夫:**将来一定需要有储备。

**斯大林:**我们当然就不会采用非常措施了。但是你们很清楚,我们没有这样的储备。如果当时我们大约有1亿到1.5亿卢布的外汇储备从国外进口粮食,我们可能也就不会采用非常措施了。但是你们很清楚,我们没有这样的储备。我应该声明,在我们一定的对外贸易条件下,我不认为进口粮食是耻辱。我完全能够想象这样的情况,一个种类的粮食,一种作物我们可以进口,而另一种我们可以出口,在平衡表上我们还是有赢利的。

**有人喊:**对!

**斯大林:**但是我们没有这些储备。正是因为没有这些储备,我们就不得不采用非常措施了。未必能否定的是,没有这些措施,我们现在有的就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非常严重的危机了。

**喊声:**对!

**斯大林:**这是不是说,我们将来也还要没有储备和再一次企求非常措施的帮助呢?不是的。相反,我们应该采取取决于我们的一切措施来积累储备,排除采用任何非常措施的可能。想把非常措施变成我们党的经常性的或者长期的方针的人们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是在玩火和为结合制造威胁。

是不是由此可以得出,我们应该一劳永逸地放弃采用非常措施呢?不是,不是的。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说,在某个时刻不会再出现非常状况,需要采用非常措施。这样的说法是空洞无物的咒语。列宁奠定了新经济政策,但是他不认为可能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一定的条件和一定的局势,要放弃甚



至是当年的贫农委员会<sup>170</sup>的做法。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放弃采用非常措施,更何况贫农委员会的做法是这样一种和富农斗争的尖锐形式,非常措施是不能和这种做法同日而语的。可能回忆一下在我们党的十一大上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发生的一个插曲并不多余,这个插曲和这件事有直接的关系。大家知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在自己关于农村工作的提纲里,曾企图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一劳永逸”地放弃用贫农委员会的方法和富农斗争的政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自己的提纲里写道:“不接受这个阶层(富农和富裕的农民)和用1918年贫农委员会的方法对它进行粗暴的、非经济的镇压,是一个极其有害的错误”(№2)。大家知道,列宁对这一点是这样回答的:“第2节的第二句(反对‘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做法’)是有害的,不正确的,因为,例如战争就会迫使我们采取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做法。关于这一点,应该用全然不同的说法,比如这样说:鉴于发展农业和增加农产品的极端重要性,目前(强调的标记是我加的。——斯大林)无产阶级对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政策主要应该是限制他们的剥削趋向等等。我们国家应该怎样限制和能够怎样限制这种趋向,应该怎样保护和能够保护贫苦农民,全部实质就在于此。这应该研究,而且必须在实践中去研究,泛泛谈论毫无意义。”(见《列宁文集》第4卷,第391页)<sup>171</sup>

清楚的是,需要辩证地看待非常措施,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时间和地点的条件。

同志们,在讨论的时候冒出来的一般性问题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现在请允许我直接谈到粮食收购政策的问题。

我想,有一些同志,包括奥新斯基、斯捷茨基同志和克里茨曼同志,在自己的文章里都有一个毛病,把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各种原因都堆到了一起,把暂时的和行情变化中的(特殊性的)原因和长期的、基本的原因混在了一起。粮食困难的原因有双重性:有长期的、基本的原因,消除它们需要很多年,也有特殊性的、和行情变化有关的原因,如果采取和推行一系列必要措施的话,它们是现在就能消除的。把所有这些原因都堆到一起就是把整个问题给搅乱了。

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基本含义和基本意义何在呢?在于它们在我们的面前把粮食、粮食生产、总的农业上的问题,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问题,全部提了出来。

总的来说,粮食问题在我们这里是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呢?当然是。只有瞎子才可能怀疑,现在总是粮食问题在冲击着苏维埃的社会公众。我们不可能像茨冈人那样生活而没有粮食储备,没有防备歉收的储备,没有某些出口的储

备。甚至是小农经济,它虽然很可怜,也不能没有储备,没有一些储藏。一个占据了陆地六分之一的大国是不能没有粮食储备用于国内和国外的运作的,这难道不清楚吗?

就算是我们在乌克兰没有秋播作物的死亡,我们可以不多也不少地结束粮食收购年份,那是不是就能认为,这对我们就足够了呢?不,不行。我们不能今后还是这样“不多也不少”地过日子。我们如果想要在国内和在国外都能维护住苏维埃政权的阵地的话,我们就应该自己掌握一定数量的最低限度的贮备。

第一,我们不能保障不会受到军事上的攻击。你们是不是想,如果没有为军队准备一定的任何粮食储备,我们就能保卫国家了呢?李可夫同志说,今天的农民已经不是6年前害怕丢失了土地让地主得到好处的农民了,他说的完全正确。农民已经把地主忘掉了。现在他们要求的是新的、更好的生活条件。一旦发生敌人的进攻,我们能不能既和波兰人在战场上打仗,又在后方为了紧急得到军队的粮食而同农民打仗呢?不行,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这样做。为了保卫国家,我们应该有一定的储备供应军队,哪怕是在最初的6个月里。为什么要有这6个月的喘息呢?为的是让农民能够醒悟过来,适应战争的种种危险,搞清楚事态和为了保卫国家的共同事业振作起来。

有人喊:早就该建立储备了。

斯大林:如果我们满足于“不多也不少”地过下去,我们就永远不会有任何备战的储备了。

伏罗希洛夫:你听听,米高扬。

米高扬:用不着你说我也知道。

斯大林:第二,我们并不能保障粮食市场上不会发生复杂情况。我们当然需要一定的储备来干预粮食市场上的事情,来推行我们的价格政策。因为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每一次都求助于非常措施。但是如果我们每一次都是在走钢丝,满足于可以“不多也不少”地结束收购年度的话,我们就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储备了。

第三,我们不能保证不发生歉收。我们绝对需要一定的粮食储备,是为了在发生歉收的时候能够对饥饿地区提供保障,哪怕是在一定程度上,哪怕是在一定的期限内也好。但是我们如果不扩大商品粮的生产,不是坚决和彻底地放弃没有储备地过日子的老习惯的话,我们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储备了。

最后,我们绝对需要有出口粮食的储备。我们需要为工业进口设备。我们需要进口农业机器、拖拉机和备件。但是如果不出口粮食,如果不靠出口粮食积

累一定的外汇储备,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战前的时候,每年出口的粮食是5亿—6亿普特。能出口这么多是因为自己并没有吃饱。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应该明白,不管怎么说,战前我们的商品粮是现在的两倍。正是因为现在的商品粮少了一半——正是因为这样,粮食现在不能出口了。而粮食不能出口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失去了一个源泉,我们本来是可以而且应该借助于它来引进工业设备、拖拉机和农业机械的。

能不能这样继续生活下去而不为出口积累粮食储备呢?不行,不能这样。

我们的粮食储备状况就是这样没有保障和不稳定的。

我们不仅是没有这4个方面的粮食储备,我们甚至也没有足够的、一定数量的最低储备,让我们能够没有痛苦地从一个收购年份过渡到另一个收购年份,在6月、7月这样困难的月份不间断地供应城市,对这一点我就不再说了。

在说了这些之后,还能否认粮食问题的尖锐程度和那些政治性的困难吗?关于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的,同志们。我指的是一部分农民、一部分贫农以及中农中间的不满,这在我们这里是有的,而且对结合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当然,说我们这里有的已经是分离,就像奥新斯基同志说的,或者是弗鲁姆金在他的那个著名的报告里所说的那样,是完全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同志们。分离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分离如果不是国内战争本身的话,也是国内战争的开始。不应该用“可怕的”话来吓唬自己。不该陷于慌乱。布尔什维克是不该这样的。分离意味着农民和苏维埃政权的分道扬镳。但是如果农民的确和作为农民粮食的基本收购者的苏维埃闹翻了,他们就不会给你扩大播种面积了——无论如何是不会的!但是我们在所有的粮食产区都毫无例外地看到,春播的面积扩大了。这是什么分离呢?难道能够比如说像弗鲁姆金所说的,把这种情况叫做农民经济“没有前途”吗?这是什么“没有前途”呢?

我们如果指的是长期的和基本的而不是暂时的、在一时的行情上表现出来的原因,那么我们在粮食上遇到的困难的原因何在呢?

我们在粮食上遇到困难的基本原因是农业越来越更加分散和零散。这是事实,农民,特别是粮食经济,变得越来越零碎了,越来越没有赢利和商品化程度更低了。如果是我们在革命前有大约1500万到1600万农户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有的是2400万到2500万了,而且分散的过程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这是事实。我们现在有的播种面积比战前的播种面积少不了多少,整个粮食的生产差不多要比战前少5%左右,可是我们商品粮的生产却比战前要落后一半。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这是因为小型农户比大型经济赢利少,商品性小,更不稳定。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论断说到,小生产比大生产的赢利小,这个论断在农业中也还是完全有效的。农村中的富农经济的力量和经济意义就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出路在哪里呢?

正像政治局的决议中说的,我们这里有3条出路。

1. 出路在于提高中小农户的生产率,用铁犁代替木犁,提供小型和中型的机器,提供肥料,供应种子,提供农业技术帮助,农民的合作化,和整个村落签订合同,贷给他们良种和这样来保障给农民的集体贷款;最后是通过租赁站租给他们大型机器。

卡尔平斯基同志说,小农经济已经耗尽了自已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可能不值得进一步帮助它们了,这是不对的,是完全不对的。个体农民经济还有不少发展的条件。只是应该善于帮助他们和最大限度地发展这些条件。

《红色报》<sup>172</sup>说的也不对,像布哈林同志告诉我的,它说个体农户在销售和供应上的集体化计划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这是完全不对的,同志们。相反,供应和销售上的合作化计划完全证明了是正确的,为在农民中出现彻底转向集体农庄方面创造了现实的基础。无可怀疑的是,如果不发展供应销售的合作社,我们就不会有农民对集体农庄态度上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现在我们有了,而且帮助我们进一步进行集体农庄的建设。

2. 接下来,出路还在于要帮助贫农和中农逐渐在新设备和集体劳动的基础上,把自己分散的小农户联合成大型的集体经济,要更能赢利和具有商品性。我指的是把小农户联合成大型的、社会性的经营单位的所有形式,从简单的互助组到劳动组合和公社,它们比分散的小型农户有着大得多的商品性和生产能力。

米柳亭同志在主张集体农庄的同时,指责同志们在为小型的农户“平反”,这是不对的。米柳亭同志显然想的是,集体对个体农民经济的态度应该是斗争和消灭的态度,而不是帮助和吸引到自己这边来的态度。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同志们。个体农民经济根本不需要“平反”。它是很少能赢利的,这是对的。但是这还不是说它就是完全没有好处了。如果我们站到了与个体农民展开经济斗争和把它消灭光的观点上,脱离集体每时每刻都要支持个体农户的列宁主义立场的话,我们就会破坏了结合。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在夸耀集体农庄的同时宣布说,个体农民经济是我们“该诅咒的”东西,就更不对了。这有要和农民经济直接宣战的味道了。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农民经济是“该诅咒的”,那怎么

解释工人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的联盟呢?工人阶级和“该诅咒的”结成联盟——难道世上有这种没有道理的事情吗?怎么能说这样的事情而同时又宣扬结合呢?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想起了列宁说过,我们需要逐渐从农民的劣马转移到工业的钢马上去。这是很好的。但是难道能是这样从一匹马的背上转到另一匹马的背上去么?宣布农民经济是“可诅咒的”,又不建立像分布广泛的集体网络这样的广泛和强大的基础,这不意味着要没有任何基础了吗?

喊声:对,对!

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把集体和个体农民经济对立起来了。但是我们想要的,不是让这两种经济形式彼此对立,而是彼此结合,为的是在这种结合中,集体能够帮助个体农民,帮助他们逐渐转到集体主义的轨道上来。我们想要的不是让农民把集体农庄看成自己的敌人,而是把它看成现在就在帮助他们,而且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朋友。

米柳亭:对。

斯大林:如果这是对的,那就不应该说为个体农民经济“平反”,或者农民对我们来说是“该诅咒的”。应该说的是,小农经济和大型的集体经济相比,是不能赢利的或者甚至是最不能赢利的,但是还不是没有一定的不小好处的。而在你们那里得到的是,小农经济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而且可能甚至是有害的。列宁不是这样看待小农经济的。他在自己的小册子《关于粮食税》里,对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如果农民经济能够继续发展,那么还应当为进一步的转变提供可靠的保证,而进一步转变就必然是使效益最差的、最落后的、细小的、单干的农民经济逐渐联合起来,组织成公有的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对于这一切,社会主义者一向都是这样设想的。我们共产党也正是这样看的”(第18卷,第1册,第189页)<sup>173</sup>。

原来是个体小农经济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当经济的高级形式在和低级形式斗争并要摧毁它的时候,这是一回事,而当经济的高级形式在帮助低级形式提高、转向集体主义的轨道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列宁是这样说到集体和农民的个体农民经济的相互关系的:“特别应当做到切实执行并彻底执行苏维埃政权的法律,这个法律要求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和一切类似的联合组织对周围的中农给予迅速的和全面的帮助。只有给予这种实际帮助,才能实现和中农的妥协(强调的标记是我加的。——斯大林)。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并且一定会取得中农的信任”(第16卷,第160页)<sup>174</sup>。

所以,这样看来,是集体应该帮助作为个体的农户。最后是列宁的第三段语录:“只有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了公共的、集体的、共耕的、劳动组合的优越性,只有用共耕的、劳动组合的经济帮助了农民、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正确,才能真正可靠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第16卷,第391—392页)<sup>175</sup>。

列宁就是这样高度评价集体农庄运动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意义的。

非常奇怪的是,奥新斯基同志和斯捷茨基同志在自己的长篇讲话里,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关于个体农户的问题上,对提高集体农庄这个我党迫切的任务没有说上一句,真正是没有说上一句话。

3. 最后,出路在于要加强老的国营农场和提高新的国营农场,把它们作为最能赢利的最具商品性的经济单位。

这就是3个基本任务,我们如果完成了,就有可能解决粮食问题并从而消除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

当前时刻的特点是,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第一个任务仍然是我们工作的主要任务,但对于解决粮食问题来说已经不够了。当前时刻的特点是,要用两个新的任务,提高集体农庄和提高国营农场的任务,来补充第一个任务。无论是从供应国家商品粮上说,还是从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改造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说,没有这些任务的结合,没有在所有这三个渠道上的顽强工作,就不可能解决粮食问题。

列宁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呢?我们有一个著名的文件说到了,请全会注意的政治局决议是和列宁在这个文件中勾画的发展农业的实际计划完全吻合的。我指的是列宁亲手写的“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sup>176</sup>

米高扬:1921年8月。

斯大林:它是在1921年5月颁发的。列宁在这个文件里把实际问题分成了3类:第一类涉及的是商品流通和工业的问题,第二类是提高农业的问题,第三类是各类经济会议和州的调节经济会议。在那里,在这个文件里,关于农业说了什么呢?这就是从“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里摘的一段话:

“第二类问题。农业的发展:(1)农民经济;(2)国营农场;(3)公社;(4)劳动组合;(5)合作社;(6)其他形式的公有经济。”(第18卷,第1册,第247页)<sup>177</sup>

你们可以看到,政治局关于解决粮食问题以及总的农业问题的决议的实际

结论是完全符合“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阐述的列宁的计划的。

指出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就是列宁这个能够搬动大山并让它们彼此相撞的巨人,是带着纯真的、少年的喜悦迎接每一个关于建立一两个集体农庄或者从某个国营农场派来了拖拉机的小消息的。譬如,在《致技术援助苏俄协会》中有这样一段话:“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的报纸上登出了一些非常可喜的消息,报道了贵会会员在坦波夫省基尔萨诺夫县和在敖德萨省米季诺车站附近各国营农场工作的情况,以及顿巴斯一批矿工的工作情况。……我要提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授予最出色的农场以模范农场的称号,并给以顺利开展所必需的特别的额外帮助。我再一次代表我们共和国向你们表示深切的谢意,并请注意,你们帮助我们用拖拉机耕地对我们是特别适时和重要的。我有机会在你们打算组织200个农业公社之际向你们致贺,感到特别高兴。”(第18卷,第2册,第78—79页)<sup>178</sup>

还有《致苏俄之友协会(美国)》中有这样一段话:“亲爱的同志们:我刚才特地向彼尔姆省执行委员会查对了我们报纸上发表的关于以哈罗德·韦尔为首的贵会会员的拖拉机队在彼尔姆省‘托伊基诺’国营农场工作情况的非常可喜的消息。……我要提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授予这个国营农场以模范农场的称号,并在建筑工程方面和在供应汽油、金属以及建立修理厂所必需的其他材料方面给予特别的额外帮助。我再一次代表我们共和国向你们表示深切的谢意,并请注意,对我们共和国来说没有一种帮助能像你们给予我们的帮助那样适时,那样重要。”(第18卷,第2册,第77—78页)<sup>179</sup>

列宁就是这样高兴地捕捉到每一个微小的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发展的消息的。让这成为那些想要把列宁从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变成农民哲学家的人的一个教训吧。

现在请允许我转到那些把我们的粮食困难变成了收购危机的暂时的、市场行情上的困难上来。

决议里对这些原因说得已经够清楚的了。列举了4个主要原因:市场平衡受到破坏,计划领导的错误,收购机构和党与苏维埃机构的缺点和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富农和投机商人)利用困难。因为关于所有这些这里说得相当多了,我想,就不值得对这些原因展开谈了。

我想就彼得罗夫斯基同志的意见说几句。我拿的是第一个决议,那里说到市场平衡遭到破坏,整个农村,特别是农村中富裕的阶层和富农阶层提高了自己的收入,提高了对商品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破坏了商品需求和供应之间的平

衡。彼得罗夫斯基同志不想承认这个定义是对的。他说：一方面说农村的收入提高了，另一方面决议又说农民经济是最落后的，——他说，这里有矛盾。我想，这里没有任何矛盾。问题在于，说到农村收入提高时，说的是今年的收入和以往年份的收入相比，而且没有疑问的是，今年农村的收入的确是提高了，至少从3年的收成看是这样。如果这是不对的话，那么就没有可能增加农业税了，就没有可能一个劲地大搞捐献等等了。至于决议的另一条，那里说的是从发展速度上，和工业相比，农业是非常落后的，这也是正确的，因为无疑的是，农业的发展速度的是非常落后于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很清楚，这里并没有任何矛盾。所以需要认为的是，决议的这两条是正确的。

我想，对引起粮食战线上困难的暂时原因应该加上一条，那就是——粮食消费过多，我们的供应机关没有正确地使用粮食。

有人喊：一定就是这样的。

斯大林：不要在这方面把矛头指向商业人民委员部，在这一点上不只是它一家有过错，我们大家都有错。

喊声：对！

伏罗希洛夫：但首先有过错的是商业人民委员部，因为它是管这件事的。  
(笑声)

斯大林：所以在决议里必须要加进去关于粮食消耗过多的一条。

关于需要采取措施排除必须采用任何非常措施，——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了，所以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展开说了。

我想只是说一说3个来自产粮地区的同志们在讨论的时候在这里指出的、纯粹属于实际发生的问题。

第一，应该承认，在粮食收购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党组织手伸得太长了，把苏维埃组织和合作社组织挤到后面去了，而有的时候甚至是自己取代了它们。

有人喊：不这样就什么也做不成。

斯大林：我懂得这一点，说这些不是为了要责怪谁。这种现象是由于一种状况引起的，那就是把我们的收购组织动员起来太困难了，因此也就有必要由党的组织进行最大限度的监督了。

有人喊：指令也是相当吓人的。

斯大林：指令的确是很严厉的，因为党的组织动员起来也是缓慢的，而且粮食的局势是严厉的，再迟缓下去是不行的。无论怎样也应该记得，今后党组织不应该取代合作社和苏维埃组织。



有人喊:对。

斯大林:应该永远记着,党组织的领导是一回事,而把苏维埃和合作社组织挤到后面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前者是绝对必要的。后者是不能允许的和有害的。前者无论如何,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也不该变成后者。否则我们会断送了我的建设事业。

第二,是谷物加工费问题。我想,舍博尔达耶夫同志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关于谷物加工费的实际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大约有10亿普特的粮食是农民在磨坊里磨了之后供个人用的。这些粮食有一部分是用风磨加工的,一部分——有人说是这个数量的大约一半——是在我们国家的和合作社的磨坊里加工的。通常支付是一普特要3—5俄磅的实物。对于合作社的和国家的磨坊来说,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这就构成了大约5000万普特的粮食。这些粮食到哪里去了呢?能不能建立起严格的监督,让这些粮食进入到我们收购组织的公共基金呢?

米高扬:对!

斯大林:应该记住,5000万普特的粮食是完全有保障的和无可争议的基金,在编制我们储备的时候,是应该考虑到的。

米高扬:可以而且应该。

有人喊:现在就干起来。

斯大林:第三,梅德韦杰夫同志在这里提出的社会商店问题。开创这样的商店是极其合适的,那里可以积累一定数量的最低限度的储备,用于在收购年份最困难的几个月里为贫农和实力不强的中农阶层提供服务。

我说完了,同志们。我想,粮食上的困难对于我们来说是不会白白过去的。我们的党是在学习中前进的,在克服困难和各种危机。我想,今天的困难将能锻炼我们的布尔什维克队伍,让他们能够抓紧解决粮食问题。而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排除了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上的最大困难之一。

主席:现在休息。第一个发言的是布哈林,下一个是莫洛托夫。

喊声:那就是说到明天了?(喧哗声)

主席:同志们,请大家坐下。

喊声:现在是9点半。(喧哗声)

主席:现在是9点10分,我们通过的日程表是到10点。我是按这里的表说的,我不可能看到你们的口袋里去。根据日程我们应该工作到10点。这里有的同志明白了,我们是宣布了休息到明天。表决。谁同意宣布休息到明天上午?

谁反对? 大多数。就是说今天布哈林发言。

(休息后)

**主席(李可夫):**布哈林同志发言。

**伏罗希洛夫:**需要确定他说多长时间。

**喊声:**我们坐坐,没什么。

**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发言。

**伏罗希洛夫:**我建议确定一下布哈林同志需要多少时间。我们总是说要合理利用时间等等,可能在这里我们能是合理的。如果布哈林需要一个半小时,他可能要上说两个小时,那最好是挪到明天。如果他需要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那可以在今天。

**布哈林:**我请求给我一个小时。

**喊声:**这就是说是两个小时。

**布哈林:**无论是桌上的还是同志们口袋里的表,包括伏罗希洛夫同志的,都是一个小时。但是我要请你们,从我这方面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要打搅我,而如果情绪是这样的,听众就会急躁不安,着急,那最好还是挪到明天。

**主席:**再表决一次。谁赞成把后面的讨论挪到明天? 大多数。(笑声)

## 第十一次会议

7月10日上午

**主席(李可夫):**布哈林同志发言。

**布哈林:**同志们,我想在自己的讲话里不仅涉及直接和粮食收购有联系的问题,而且还有我国的经济政策的一些一般性问题。我认为,在讨论和粮食收购有关的问题时,我们实质上可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在对我们在一定的全新的时间段里的工作做一定的平衡。正像大家都早就已经知道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改造的时期,而粮食收购问题实质上是在一个问题上展开的,那就是我们有多大的能力解决改造时期的任务。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我首先想说几句话。对我们在恢复时期以后的这段时间以及接着在改造时期(我要在括号里表示的是,我非常明白这些界线是假设的)迈出最初几步时的工作做出总结的时候,我们可以断定的,首先是苏维埃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巨大的成就表现在非常不同的各个方面。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是,在技术改组方面,我们虽然有所有的漏洞和错误,但还是向前推进了很大一步。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是,从生产力的增长和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发展看,我们可以指出最无疑问的和非常大的成绩。接着,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是,从为农业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角度上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我们农业中的社会、集体形式发展快得多的阶段(这是无论如何不能低估的!);最后,同样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是,从培养我们的人员构成的干部队伍来说,我们也有一些可以在世界历史面前“为自己辩解”的东西。但是,同志们,与此同时(而且我感觉,这一点也就构成了现时刻的特点),我们肯定有所前进和有巨大的积极方面,我们可以记在自己的历史账上,但与此同时,改造时期的经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已经走过的改造时期这一段时间的经验,暴露出了这样巨大的、张着大口的窟窿,这样完全的失败,它们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一般经济政策上的严肃问题。当我们进入了改造时期的时候,党在自己的决定中,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了,而且党也强调了一个口令:有储备的经济!

如果你们看看我们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决定,联系到国内的局势也联系到国外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尖锐的局势,那你们就将能看到,我们总是在向自己提出有储备地经营的任务:外汇储备,商品储备,粮食储备,黄金储备。我们没有完成这个基本的指令,而且我们在这方面处于了一种极其沉重的状态。

臧声:对。

布哈林: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低估这一点的,特别是如果我们将有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外部复杂情况的话。同志们,我感觉这是一个并不需要讲述出来、要做到能家喻户晓的题目。它是这样的扎眼,以至只是我们在一些短期债务上欠债的两三个数字和我们的黄金储备减少的情况(再加上和西欧国家,首先是德国的黄金储备的飞速积累相比),就足以对这个战线上的局势做出全面评价了。它,这个状况,是如此这般,当然不能不让我们感到一定的担忧,不可能不在我们面前非常尖锐地提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根本任务。由于没有完成关于储备的指令所产生的困难,粮食出口被排除了,我们的基本建设遭到巨大的失败,这些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而且我们大家都要为它们承担责任,反革命势力在这个基础上团结起来反对我们,还有在粮食收购这件事上遭受的非常巨大的失败,这就构成了需要在这次全会上讨论的经济问题的题目和政治中心,——所有这些向我们发出了某些涉及我们经济政策的一般性任务的信号。

首先,同志们,我想在中央委员会全会提出一个一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在开始的时候会让同志们感觉到过于学术性了或者几乎是多余的,我想完全开诚布公地和坦诚地在我们自己面前提出的是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由于粮食收购而出现的巨大动摇和这样规模的困难,以及伴随着这种动摇的巨大的社会政治动荡——所有这一切是不是源于改造时期的实质本身,源于它的天性本身呢?国内的社会政治动荡幅度这样巨大,这是不是来自于改造时期的总的困难呢?这些困难是不是我们在改造时期发展的总规律呢?这是不是事务发展的进程本身强加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无论如何和在任何条件下也摆脱不掉呢?我应该说,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所遇到的这种规模的困难根本不是直接来自于改造时期的总的困难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需要严格区分两个彼此不相重叠的东西。客观困难有一定的增多是事实。如果我们想要赶上西欧(而我们是想这样的),如果我们想加快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累速度(而我们是想这样做的),如果我们能注意到我们总的经济背景,我们的落后,我们的贫困,那就完全明白了,从所有这些得来的,是我们建设的巨大困难。我们想一下子就解决一系列的大任务:在社会主义工业中要有最大限度的积累;农业要

有最大限度的提高；工人阶级以及整个劳动人民要有最大限度的消费，他们要有最大限度的提高，等等——我们到处都想达到最大限度。不难明白，第一，采用这样的表述，要想这些任务能够同时解决，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在部分地解决它们，一会儿侧重这面，一会儿又侧重另一面，并且在不断修正自己。我们这里不可避免地会是过分地偏向一个方面，就会招致对立面做出反应，而且我们总是在矛盾中前进的。当然这样的困难的确是来源于我们的改造时期的本性的。我要请你们注意，譬如说，这样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我们抱怨经济上的比例失调，但这种抱怨一会儿是从这一头来的，一会儿又是从另一头来的。

**伏罗希洛夫：**拿出你的灵丹妙药来吧。

**布哈林：**我不想给出灵丹妙药来，而你最好不要激我。

我想说的是，改造时期会引起一系列的复杂情况和困难，这是完全自然的。但是同时对于我来说，无可怀疑的是，**困难和困难不同**，用斯大林同志在昨天的讲话里的表述说，这种一定会为与农民的结合带来威胁的困难，不一定是来自改造时期的性质的。而且我感觉，当列宁给我们留下自己的政治遗嘱的时候（他在留下这个遗嘱的时候，当然是很清楚我们将在某个时刻要进入改造时期的），他完全准确地表述了对于我们来说是可以允许的和有可能在我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那些困难的界限。我感觉他对这些困难从数量上给出了一个准确的表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内并不存在必然发生这种分裂的基础，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密切注视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注视情况！——布哈林）并防止这种情况发生”。<sup>180</sup>

当我们现在用斯大林同志的表述说：“我们有对结合的威胁”的时候，这和“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的范畴是不是一致呢？当然是一致的。对结合的威胁就是“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列宁非常明白，无产阶级和农民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当然，它们之间有阶级分歧，因为不可能有两个彼此之间没有阶级分歧的阶级。但是列宁写道，我们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和我们的全党一样，它们的任务在于不让这样的分歧发展到“严重的阶级分歧”的程度，也就是说，发展成可能引起威胁结合的那样的分歧。如果我们现在说对结合有着一定的威胁的话，那么完全自然的是，在这里，阶级分歧正在开始从数量上升为“可能产生分裂”的分歧，于是按照列宁的政治遗嘱，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密切注视这种情况和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如果我们对事情的评价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我们认为改造时期的本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发生对结合构成威胁的那种社会政治动荡的话,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某个时候托洛茨基得出的那个理论了,也就是说,在发展和其他一些事情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西欧无产阶级的国家帮助的话,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冲突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对我们是不是进入了非常复杂和困难巨大的时期这个问题,我应该回答说:我们进入了。我们是不是进入了特别是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失算、错误等等的条件下有可能会引起一定的动摇的非常复杂和困难巨大的时期(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失算等等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不是什么都懂得的,我们的错误是我们自己缴的学费)?这样的动摇是不能排除的。

**伏罗希洛夫:**就是你学好了,也还会犯错误的。

**布哈林:**但是,另一方面,那种会导致不断再生出对结合威胁的困难客观上不是不可避免地来自这种本性的。同志们,我还要请你们注意到列宁的另一个论断,在我们的党的会议上,一系列同志提出过这个论断,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十五大上,一些发言的人说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我们缺乏管理的文化和技巧的论断。

**伏罗希洛夫:**这说的对!

**布哈林:**当我们现在对我们的各种估计不足进行总的平衡的时候,我感觉,我们应该做出的主要结论之一是,我们还没有学会从经济上进行管理,也还没有达到从改造时期的客观要求来说我们必须达到的那种经济文明程度。

**伏罗希洛夫:**对!

**布哈林:**不久前,一位杰出的德国教授发表了一篇关于苏联的长篇文章。他对我们布尔什维克写道:非常好的一流政治家,很好的政治战略家,非常出色的鼓动家,很了解该怎样从政治上改造人的导师;但是他们没有经济上的训练,没有经营文化,虽然有那么一两万的布尔什维克在经济战线上,简直就是在工作中、在英勇的劳动中累死了,倒下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足够的经营和文化的练习、计算,没有计算的本领和那些必须的经营美德来做经济上的大事业。

只要是看看我们做过的大小的事,看看我们是怎样在建设马路和房子以及我们是怎样对付着使用我们的进口设备的,就足可以说:这种评价离真实情况差不了多远。

**有人喊:**可是我们的钱少呀。

**布哈林:**是的,同志们,如果我们用这种观点来看待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最后

平衡表的话,那么现在从策略上和政治上说,发动一场运动反对所谓的“失算理论”未必是正确的。当我们在上一次全会上讨论我们的收购危机的原因时,当我们在从我们的过去寻找这些原因的时候,你们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当时是怎样论证的。譬如说,米高扬同志在上一次,也就是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四月全会上说过,米高扬同志在自己的报告里直接提出了以下的论断,他说:“我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确认,如果我们能及时从经济领导和在组织上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这些困难中的三分之二我们是能够排除掉的”。(黑体是米高扬同志用的)

米高扬:说到今年困难的特殊原因,这样说是对的。

布哈林:四月全会的决定你们大家可能都还记得,谁也没有取消它们,在这些决定中有两个地方:其中一个地方说,这些困难的原因不是偶然的,它们是和快速准备国家的工业化的困难,和经济的计划领导等等联系在一起。这是绝对正确的……

但是如果我们说到特殊原因的话,那么我们在四月全会的决议里也有对困难的特殊原因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我手上有的这个四月全会决议的版本的第12页上说到了粮食收购的困难,这些困难“如果在及时正确地平衡经济的基本成分和排除经济和党的机构考虑不周的话,就不会有了”。这是写在了四月全会的决议里的,而且这个地方也和米高扬同志的话一样,是完全正确地**从特殊原因的角度**解释了我们的困难。

政治局建议全会注意关于粮食收购问题的那个决议。在这个决议里,非常详细地和完全正确地归纳出了两组原因。一大组原因,或者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出现困难的**条件**,那就是:我们的经济落后,农业分散并具有小农性,我们的贫困,等等。另一方面完全正确地指出了,这些一般性的原因把困难的**条件变成了现实**,在一系列特别的、特殊的原因基础上,把困难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决议也说到了这些特殊的原因:

(1)提高农村特别是它的富裕阶层和富农阶层的收入,引起了农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增长比工业品的提供增长快**,致使市场平衡遭到了破坏和这种破坏变得更尖锐了。

(2)**粮食价格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有一种不利的对应关系**,这减弱了对销售余粮的刺激作用,但是党如果不想和农村中的弱势阶层发生冲突,在收购年度的下半年就无法改变这种对应关系。

(3)**计划领导的错误**,主要存在于能否及时运入商品和征税方面(对农村的

有产阶层征税低)。

(4)收购组织和党与苏维埃组织的缺点(没有统一战线,缺乏积极性,放任自流)。

(5)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富农、投机商)利用所有这些缺陷破坏粮食收购。

在得出这个结果的时候,决议也从社会阶级的方面审议了这个过程,说到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利用”了所有这些弊端。这是完全正确的表述。但是如果我们问问自己,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是不是客观存在的(从它们是不是取决于我们的政策这个意义上说),那我们应该是做出否定的回答。我们来一个个地看看这些因素。“由于工业品的供应不足破坏了市场的平衡”——就对农村中的上层征税不足来说,这是和我们的错误有联系的。“粮食市场上的价格对对应关系不良”——这不是上帝规定的数额,它也是取决于我们的政策。而接下来指出的是:“计划领导的错误”和“收购组织和党与苏维埃组织的缺点”,——所有这些也不是上帝规定下来的,而是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决议(我希望全会将会全体一致地通过它)说:这就是一系列特殊的因素,而且正像你们看到的,它们都是和我们的经济政策有着最密切的关系的。由此得来的是,既然产生困难的特殊原因取决于这些因素,那么就清楚了,如果能有更聪明的经济领导,我们得到的就会是另外一种特殊的结果了,而且我们也就不会让带头把反对我们的力量组织起来的、赤裸裸的和越来越逞强的富农能像现在这样折腾了。

我完全同意对问题的这种提法,说是粮食收购上的困难完完全全尖锐地把这种双重性的困难摆在了我们面前并提出了双重性的任务:一是摆出了一般性困难,与之对应的是一般性的前景和长期性的任务,需要我们有一个要数年坚持的总方针(也就是来自我们的落后、我们农业生产的分散的困难,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我们的方针、加强农业集体化工作的路线也就是这样的方针和路线);二是提出了特殊性的而且是非常尖锐的困难,这些困难构成了狭义的所谓时局的实质,而且需要我们有专门的回答(取消非常措施,等等)。当然,这些问题直接和阶级斗争问题有联系。任何一个经济问题总的来说不会是“纯粹”的经济问题;纯粹的经济问题,也就是说和阶级斗争问题没有联系的或者是不反映这个阶级斗争的另外方面的经济问题,本来就是没有的(我在四月全会的报告里详细地谈到了这个问题)<sup>181</sup>。

具体说的就是阶级社会,在无阶级社会里是没有阶级的。完全清楚的是,无论如何不能把阶级斗争的问题和我们的经济问题分割开来,这在方法论上是完全不正确的,是错误的,是需要全力以赴地和最坚决地反对的。



米高扬:对!

布哈林:但是当我们分析我们出现危机的特殊原因的时候,当我们从讨论我们的一般任务问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总路线问题、向富农进攻问题等等转向特殊的原因、“小规模”的原因的时候,就很明白了,用一般性的原因我们解释不了今年我们的经济体制经历的那种激烈的和痉挛性的震荡。实际上我们去年运出了2.77亿卢布的粮食,而且喂饱了所有的人,今年我们不仅什么也没有运出去,而且除此之外还感觉到在一系列地区有着极其严重的消费不足的迹象。事情很清楚,富农不可能在一年里就变得这样有力量,在一年里也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分散过程,以至引起我们的整个经济这样迅速的和危机性的震荡。正是因为如此,决议才提出了关于特殊原因的问题,这些原因把基于我们一般性的缺点、由于我们总是落后的和分散的而可能发生的困难变成了现实,这些原因把可能发生的富农的进攻变成了现实。由于这些特别的、新添的特殊原因,富农也就能做到把其他的农民阶层带动起来。如果也把私人的收购考虑进去,那么在去年,由于私人支付的价格比我们高,所以平均起来,总的粮食价格对农民来说要比今年高一些。去年不能用技术作物缴税,而今年是用技术作物缴税;去年没有像今年这样数量的由建设得来的更多的钱。现在,在粮食市场上,粮食被放在了一个完全是绝无仅有的、非常不利的地位。正是因为这样,对出售粮食的激励被极端地降低了。正是因为这样,恰恰是在今年,富农也就能在价格问题上(不是在其他的问题上,而是在粮食价格问题上)带动农村中的一定阶层了。正是因为这样,今年我们在粮食上也经受了我国经济机体的震荡。

所以,在这里起到最主要作用的问题是价格问题。缩小这个因素的作用是不对的,而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这样来议论,说是价格在我们这里起的根本就是有限的作用,在我们这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在我们这里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价格根本就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也没有这样的决定性意义,那也是完全不正确的。是这样,可又不是这样。当然,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圈子里,价格或者价值的形式可以说是一种假象;你也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种集中计算的办法,而不是无政府经济的一种表现。这一切都是对的,但是在我们和小农圈子之间的对应关系上,在那里,市场关系是决定性的(我们大家在这里是结成了反对奥新斯基同志和部分反对瓦尔加同志等人的统一战线的),在那里,价格范畴也是决定性的,那里不可能是价格不是生产的调节者。如果这样来想象,好像是在完善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根本就没有价格这种形式,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指定”随便什么样的比例,那也是不正确的。如果任何一个生产部门,是

农业也好,是工业也好,或者是这些大的部类中的个别分支也好,它要是付出的劳动比它所得到的多得多的话,如果它不能支取自己的劳动消耗的话,那么,这个生产部门就不得不缩减。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将没有任何市场,没有任何价格。但是从此绝不能得出,共产主义的计划领导可以随便对待某一个生产部门。如果你们“得罪”了它,它就不再发展了。价格规律是要消亡的,但是还会剩下均衡的劳动消耗的规律,而如果是任何一个生产部门得不到来自总体的经济机体的营养的话,它就会萎缩。这个规律是无论如何也跳不出去的,所以,如果是把非常学术性的关于价格和价值之间关系的问题,关于价格上升为某种另外的东西的问题等等放在一边的话,还是需要说:如果某个生产部门从资源分配的观点上说“受了委屈”的话,它不可避免地会后退,而在我们这里,正像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对我们的力量和资源的总体分配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进行的:通过价格政策和通过税务政策。

我应该说,虽然正确的统计是正确的经济政策起码的前提,但是得到需要的数字是非常困难的。我想表明的是,对经济政策的领导依靠的是我们的统计部门完全奇怪的数据。我曾咨询过粮食价格问题,咨询过这件事的真正情况是怎样的。我从俄联邦国家计委、中央统计局得到了关于一些地区的统计数字,对它们我可以说,它们说明了这里是一个疯人院。只能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他们说的并不完全正确,——这里说的就是价格。我走的是一条非常普通的路子。在粮食方面,我们这里有一个最不体面的地区,那就是北高加索。我从头到尾看了北高加索的数字,我的出发点是,农民不仅是从一普特的小麦,而且是从一俄亩的地,能得到多少收入,也就是得到多少钱,因为任何一个人人都知道,对农民经济来说,一亩地能得多少收入的这种算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如果我得到的是正确的话,——我不能为数字负责,——那么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些困难怎么没有在以前发生。

我得到的关于北高加索的数字是:

1925—1926年度小麦的亩产是69.9普特,1926—1927年度是37.9普特,1927—1928年度是29.8普特。(喧嘩声)

喊声:不可能。

布哈林:是的,是的。

有人喊:数字是对的。那里3年歉收。

布哈林:我又查对了其他数字。中央统计局的手册。数字除了不大的差别外,是吻合的。

现在,同志们,我们来看看,从无政府的市场的角度看,情况会是怎样的呢。无政府的市场为这次的粮食收获是会提一些价的。

[米高扬:不对。不可能是“一些”。

布哈林:你不要强加给我,我是说“可能会提一些”。]所以,同志们,如果看一看我们对这种状况是怎样作出反应的,那么,原来我们的反应是这样的,在每亩收到69.9普特的时候,农民每一普特得到的是115戈比,而在收获37.9普特的时候(当收成几乎少了一半的时候),价格降了几乎整整10戈比——是1卢布2戈比。而如果我们看看这种情况,就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来了,农民的所得在这些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如果把把这些数字连乘起来并扣除他们在种子上的消耗的话,那就是在1925年他们从每亩地得到的赢利是72卢布,在1926—1927年是32卢布,在1928年是24卢布。

有人喊:亚麻也是这种情况。

奥新斯基:美国的农场主总是这种情况。

布哈林:我不知道是不是总是这样。

伏罗希洛夫:可你应该知道,你是报告人呀。

布哈林:我非常清楚,如果你们在某一个地区提高价格,那这就会对其他无需做任何调整的地区有影响。所以,从一个地区的指示出发,根据一个地区的情况,就把价格拉平,或者是对所有其他地区都从一个规律出发,那完全是胡来。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还是应该按地区采用不同的做法的。米高扬同志在自己的报告里也送到了,我们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那就是如果我们要提高价格,我们应该按照地区,根据在某个地区发生的各种事情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变化。我们没有这样做。所以我感觉,今天的全会这样顽强地提出粮食问题,同志们这样顽强地说到价格,这是绝对正确的。我感觉这是产生于目前经济状况的实质本身的。

当然,现在粮食上出现了这些事情(在税收上和在价格上都有),又没有粮食储备,我们几乎从最开始时就自己过多地揽下了由国家机构供应的项目,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我们就不能不采用非常措施了。我应该完全坚决地声明,现在对非常措施无论有什么样的忏悔的调子,都是不应该的。不可能说是在事后对这些措施唉声叹气,或者说是在事后说不该采用这些措施。完全清楚的是,过去失算了,被搞得不知所措了,我们就得企求非常措施。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么把工厂停了,要么就是把粮食拿下(在很大程度上就不是购买,而是拿下了)。

臧声：不对。

布哈林：这根本就不是不对，而照我的看法，这是非常对的。但是我认为，甚至是在我给出的这种措辞中，这些措施也还是正确的。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了。而在事后，现在在这里宣布休战，说是“哎呀，我们干的是什么事呀，哎呀，我们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措施呀，哎呀，我们闯了什么祸呀，哎呀，我们怎么就这么胡闹呀”，——这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为对怎样摆脱这种状况谁也没有开出另外的药方来。我感觉，如果在更早些时候想到了这一点的话，如果在几个月之前能这样的话，我们有可能企求另外的药方。但是在十五大之后，当采取任何其他的运作方法的时间都已经错过的时候，当我们几乎是被各种事件搞得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没有可能采用另外的运作方式了。而动摇这种运作方式，对这些非常措施下绊，哭泣，说它们带来的是严重的后果，——这就意味着加害于从当时的状况产生的唯一可能的措施。

臧声：对。

布哈林：这是需要大声疾呼的。这里不可能有这方面的任何修正。但是我感觉，根本就没有必要把我们争论的中心、讨论的中心转移到这个层面上来。问题的中心现在不在这里。不在于我们的过去，而在于我们的现在。在这里，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集合起来了，在我们的经济政治生活中的某种困难的转折点上集合起来了；什么是中央全会现在应该抓住的那个政治环节呢？政治局向全会提交的我们的那个决议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它的政治含义是什么呢？政治含义就是要取消非常措施。所以，完全明白的是，当人们走出来并提出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他们首先应该说出的，正是取消非常措施的理由。因为党应该知道，为什么全会在困难的形势下集合起来，承认非常措施曾是完全正确的，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为什么这次全会又提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是取消非常措施，把这当成是当前政策对今天的行情做出的回答。

在这个问题上，全党应该是完全清楚的，而且我们应该这样说：我们现在应该取消历史上被证明是对的、我们完全正确地起用的非常措施。我国应该取消这些非常措施是因为它们已经成长得超出自己了，它们从历史上说已经耗尽了自己的能力了，在经济上它们已经几乎不能给我们更多的任何东西了，如果说在经济上它们有什么结果的话，那么这个结果就是加强了那些还不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在发展着的趋势，这些趋势是在引向战时共产主义方面去的（引向过渡到票证，食品在市场上消失和一系列其他的会自动发展起来的现象）。

另一方面，从政治上说，它们给出的是非常强烈的、巨大的、但是遗憾的是负

面的效果,让我们和越来越广泛的农民发生争吵。所有的同志都同意这一点,这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召开的全会提出了要取消非常措施的根本原因,全会在自己的决议里提出了理由并论证了,为什么需要取消这些非常措施,虽然我们完全地、百分之百地认为这些非常措施是有道理的。

同志们,我绝对同意关于阶级的问题是应该非常尖锐地提出来的。但是关于阶级的问题,关于阶级的一整套问题,首先要归结到我们和中农的关系问题上。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的政治遗嘱里写到必须要珍惜我们和农民的联盟,和所有的群众一起前进等等的时候,在这样做的时候,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富农,那么,事情就清楚了,他没有提到富农根本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富农的危险,而是因为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中农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决是不是能够和富农进行战无不胜的斗争的问题。我们现在说,我们需要分析阶级、阶级的对应关系,因为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策都要求准确地分析阶级的地位,分析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而在我国条件下,就是分析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对应关系。那么,我们当然首先应该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在无产阶级的政权和中农之间发生了什么。我应该在这里首先为那些被某些同志在这里加以反对的信件恢复名誉。不久前,我们为了夸奖工农通讯员、农村通讯员、军事通讯员等等“记者”们,曾不惜使用响亮的和隆重的言辞。我们在这里犯了错误。

柯秀尔:不能只是根据信件评断局势。

布哈林:这当然正确。但是,小看信件的意义是完全不合适的。我们正确地说过,这是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它是我们和群众结合的中介。就拿我们的任何一位“领导人员”来说吧,他很少到地方上去,而我们的领导同志中非常多的人是属于这样的人。如果不是通过党的系统、工会系统传来的消息,通过这些在真正的群众中间活动的工人通讯员、农村通讯员和军事通讯员,我们怎能知道地方上的种种事情的状况呢?事情很清楚,如果我们对群众的深层传到我们这里来的东西堵住耳朵,我们就将暴露出一定的官僚主义的片面性。因为就是这样,我们已经被工作搞得头昏眼花了,我们看不到活生生的人,我们只是彼此见见面,就是这样也不是总能做到的。我们作为活人就和群众离得很远,而为了让我们在政治上不至于脱离他们,我们需要某种众多的导线把群众当中做的事情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来。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地看看每一封信,知道它是假的还是要诬赖的,或者是真正好好写的,我认为,在我们有这样的经验的情况下,这是我们极其重要的消息来源,有的时候它能比官方的来源更真实地传达事实,我们不能

把它们挥之远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把这个来源挥之远去。

**莫洛托夫:**对。

**布哈林:**你知道你鼻子底下发生了什么,但是你不知道在我们联盟的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

**波斯特舍夫:**各种情绪都写给您了呀。

**布哈林:**我们应该是在已知的事实基础上回答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的问题的。同志们,我不打算说所有的事实,这样会很麻烦的,而且会让我们扯得太远,但是我要总的说一句,我们肯定曾面临过一定程度的群众不满的浪潮。总的来说,在我们联盟的许多地方,大约发生过150件各种不同的行动:在乌克兰,在北高加索,在哈萨克斯坦,在西伯利亚,等等。

**伏罗希洛夫:**在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地方。

**布哈林:**我们知道有几十起各种恐怖事件,埃赫同志也已经声明了,他认为状况的改善表现在枪杀我们的同志的情况少了。我们有过塞米巴拉金斯基的暴乱或者暴动<sup>182</sup>,我们有过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交易所里的哄抢<sup>183</sup>。我们有过卡巴尔达的起义<sup>184</sup>和其他许多事情。

**斯克雷普尼克:**所有这些都是去年发生的,只是现在更尖锐了。

**布哈林:**去年不完全是这种情况,因为去年没有发生过像乌克兰中央全会上说到的事情。在乌克兰中央全会上,有一些说法是在乌克兰中央的上一次全会上没有的。请允许我给你们从一些发言中摘出一些片段。

例如,巴列耶夫同志说:“我们在农民中有很重大的政治上的复杂情况。我们不得不遇到村子里反对我们的统一战线。这对我们来说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是应该考虑的。如果在犯了所有这些错误之后我们不得不躲起来的话,那也会把我们从躲藏的地方拖出来的。”难道哪怕是有一个同志在去年说过什么类似的话吗?

萨波夫同志说:“在我们这个区里,大体上有过50来起这样的事(群众性的行动),有过农民在市里的游行,而且根据最准确的、最客观的和经过检查的文件,我们到处都确定了,到处领头的都是富农。”去年在城里有农民的游行。

**有人喊:**5月1日。

**布哈林:**(继续读引用的话)“城乡关系的一定损害在我们这里有,在工人和农民的联盟里也有”。“这里有一定的裂痕。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中农从联盟中离开,走向富农那边去了,我们有这样的情况,特别是在中农的上层中间”。

特卡琴科同志说:“现在散布乐观,乐观地看待村子里的情绪是不行的。现

在村里的情绪要比4月的时候坏多了……我认为现在已经需要采取非常的措施来对待一切,把农村中的这些情绪平息下来了。”还有一段是这样说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被破坏了,而且我认为,对这一点应该给予严肃的关注。”

切尔尼亚夫斯基同志说:“我们有的是这样的局面,贫农在城里的游行中不是去找代表着苏维埃政权的人,而是去找工人——找自己的领头人,去找企业。”

还是那个切尔尼亚夫斯基同志说:“我们这里有老游击队员和革命者的行动,他们来找苏维埃政权,来找军事委员会说:‘怎么,给不给我们面包?我们的状况非常严重,我们在粮食收购中帮助过你们,我们在富农那里、中农那里挖出过粮食,帮助过你们进行了捐献的大量工作,还有其他的事情,而现在我们落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吃的。我们夺得了政权,我们也可以把它给摧毁’。同志们,这不是在敖德萨区唯一的事实——这是大量存在的现象”。

伊克斯同志说:我们在喀琅施塔得的日子<sup>185</sup>听到了第一遍铃,第二遍铃是在格鲁吉亚动乱<sup>186</sup>的时候听到的,而且当时我们在农村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现在我们是不是要等着第三遍铃,或者是历史已经把第三遍铃取消了呢?我认为,用动乱作为依据是很容易摆脱这些老是缠身的问题的。但是那些看到过1924年农村的人和那些看到过现在农村的人应该能够得出无法辩驳的结论,现在农村的局势要比我们抛出了“面向农村”的口号的那个时期更加严重了。

古雷伊同志:“完全同意伊克斯(前一个发言的人)的发言。不能光是说我们这里树立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传统,说是在上层有着战斗的和平静的心态就算完事了,而关于地方上在做什么的准确的消息就被认为是慌乱。我认为,这种战斗的平静需要结束了,而且任何准确的消息都……”

卡冈诺维奇:但是战斗性的慌乱就更糟了。

布哈林:(准确的消息)被认为是慌乱——这是对党非常有害的”。

“萨波夫同志,当你走到讲台上来说,在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与农民的裂痕,这是不对的……”

卡冈诺维奇:他没有这样说。

布哈林:(继续读引用的话)“这意味着您现在是在从这个讲台上蒙蔽党的眼睛”。

我还可以读出相当多的在乌克兰中央全会上的这样的发言。

卡冈诺维奇:那里还有其他的发言,应该也引用那些发言。

布哈林:那里是还有其他的发言。但是我并不认为我现在读过的就是对局

势的正确评价。我认为,可以说,关于“第二遍铃”和“第三遍铃”的议论的确是说得太过火了。但是,同志们,如果在一个组成我们的党的兄弟党的中央全会上发出这样的讲话来,那这总还是某种征兆吧。

**斯捷茨基:**而总书记卡冈诺维奇同志到我们这里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却对我们什么也没有说。

**卡冈诺维奇:**给我两个小时,就像给布哈林同志一样,我可以把所有情况都告诉你们,并且可以引用讲话。

**柯秀尔:**来自列宁格勒的斯捷茨基比谁都看得远。

**布哈林:**我是说,总不能说“去年”有这样的发言吧!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制造混乱的人的时候,他说制造混乱的人应该枪毙,需要有统一战线等等。但是他从来不要事实不要说话。相反,他要求的是正确地阐述。事实是需要事先知道的,每一个这样的事实都是需要调节的。

**伏罗希洛夫:**谁否定这一点了?你是在说服谁呢?

**布哈林:**我不知道谁否认这一点,但是只是知道我自己是昨天才知道这一点的。

**伏罗希洛夫:**我是一个半月以前从你那里知道这一点的。你也告诉我了。

**布哈林:**我告诉你的是我知道的那部分内容;专门为这件事,需要我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里坐了两天工夫。

**伏罗希洛夫:**而我知道这一点是根据职责。

**柯秀尔:**您为什么把他关进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里呢?(笑声)

**缅任斯基:**因为惊乱。(笑声)

**布哈林:**所以,如果我们在自己面前提出了关于我们现在的处境的问题,可不可以这样来评价我们现在的处境呢,说我们已经有了两遍铃了,第三遍铃就要响了……

**柯秀尔:**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第三遍铃。

**有人喊:**在铁路上取消了第三遍铃。

**布哈林:**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能说,我们有着对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结合的现实威胁呢?可以,而且我们应该从确认这个事实出发……

**莫洛托夫:**在继续非常措施的情况下。

**布哈林:**在进一步继续采用非常措施的情况下,这是对的。也就是说现在有这种威胁,而如果我们继续采取非常措施的话,威胁会增加;所以我们现在要取



消非常措施。

有人喊：永远取消吗？（喧哗声）

布哈林：等一等，我会回答你的所有问题的。

伏罗希洛夫：看来你是憋足了劲要讲3个多小时的，难怪把你的发言挪到今天了。

布哈林：应该依据的是，当我们在过去那段时间里采用非常措施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过程的确可以说是某种非常措施上升为可以称之为“趋向战时共产主义”的势头。这是不能否认的。我们刚才在讨论纲领的时候确定了，战时共产主义这种制度的目标是在削减对小生产者的个人激励的情况下，在采用征用、剥夺等等手段的情况下进行合理的消费。不用说，这样的成分在我们今天的体制中是有的，而且在继续非常措施的制度的情况下，这些成分是有可能发展的。

同志们，我只是请你们注意三点，其中的两点在这里已经提到了。如果我们不取消非常措施的话，我们就会加强这种会自动发展的趋势，会从一个部门传到另一个部门去。这就将是战时共产主义的制度了，但是，第一是没有战争，第二是正像一些同志指出的那样，对于农民来说，“土地”的证据消失了。我还想要指出一件在将来的所有情况下都要记住的、非常重要的事。这就是：当我们在过去的年代采用战时共产主义的措施时，我们这里有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平均的贫困”，也就是说，我们工作人员的骨干也是吃配给粮的，而当现在我们采用了票证制度的时候，生活、消费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条件不同了，因为那些实行票证制度的人是不吃配给的。

有人喊：可以让他们吃配给。

布哈林：我现在说的是有的。所以完全自然的是，这样的事态变化孕育着非常大的社会危险，这是需要考虑到的。而结果是怎样的呢？总结一下我们有什么，我们说：非常措施已经过时了，它们起到了非常大的历史作用，完全被证明了是有道理的，现在它们的作用正在变成自己的对立面——所以我们要取消它们。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的已经是关于前景的问题，关于下一步的前景问题，而且我感觉这个问题将会更加困难。这里就有了弗鲁姆金同志著名的信里表述的第一个建议，一系列其他的文件也重申了这样的建议。

鲁祖塔克：是重复，但不是重申。

布哈林：斯大林同志读了一个文件，我可以读读一系列其他的文件，譬如雅科文科同志的信——它表达了一大套非常完整的观点。我应该说，对这一点是

不能忽视的,因为从我国的阶级力量的布局来看,这孕育着很大的危险不是因为有一些同志提出这样或者那样的措辞,而是因为惯性的力量,由于在这方面还留下的、摇摆着的尾巴,这不是我们的后备力量,不是我们的阶级后备力量,在国内只要有一个什么很小的借口,就说是恢复到我们已经取消了的选举指令吧,那就意味着会在更大程度上把富农的自发势力动员起来反对我们,还有许多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还有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阶层等等。在我国,这些势力储备的力量经常是非常大的,在党的队伍里对这个问题非常小的动摇都会有着不成比例的巨大的政治意义。在当前这种严重的局势下,在各个阶级这样动摇的情况下,只要是走出一定的小步骤,只要是对富农等等的权利做出一个暗示,在党内就会掀起一股巨大的势力,所以用一个严密的阵线反对这种危险和回击这种危险是绝对正确的,在战术上是正确的,在政治上是必须的。

关于回到十四大去——这不是这样简单的问题。十四大通过了一系列决定,回到十四大的口号是有着完全明确的政治意义的。回到十四大的口号就不是为十四大的决定恢复名誉或者重申这些决定。它的政治含义是取消十五大的决定。

有人喊:对。

布哈林:从政治上说,问题就是这样的。所以,在提出“返回到十四大去”的口号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和非常清楚地看到,就事情的实质而言,这是“打倒十五大及其决定”的口号。

有人喊:对。

布哈林:我应该说,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永远是要在实践中检验的,在我们这里,代表大会的决定不是被盲目崇拜的,而且如果我们看到了十五大的决定是不正确的,党就会在中央全会上决定建议召开代表大会和重新审议这些决定。

有人喊:非常代表大会。

布哈林:但是甚至是对我们最高级别的决定,在我们这里也绝对没有任何的盲目崇拜。在完全客观地分析事情的状况的情况下,我们说:十五大的决定需要的不是重新审议,而是更加紧地贯彻下去。

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用向富农做出什么让步,取消加紧向富农进攻来纠正由于粮食收购而形成的局面呢?绝对不是,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现在的中心问题在于要让我们能够消除我们这里存在的、有可能会同中农分离的那种威胁。我们要取消非常措施,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非常措施和十五大的决定等同

起来。我感觉这是需要死死地钉到我们所有党员的脑子里的。我们党的十五大决定提出的是总方针,不是随行就市性质的方针;要把我们的农业搞成大型的农业,要加紧从经济上包围富农,不是采用剥夺富农的办法,而是通过新经济政策的轨道,要不断加大调节和国家干预因素的影响。而非常措施是另当别论的。这是狭义上的对行情的反应,是对特殊困难的反应,就像现在取消非常措施一样。对长期原因的反应就是提高我们的农业,就是提高个体经济,就是加强集体化、国营农场、农业工业化和进一步向富农进攻的方针。联系到这一点,我应该说,米高扬同志做的是对的,他在抨击右的趋势的同时也抨击了另一种右的(我不认为它是左的),右的托洛茨基倾向。这种危险的确是存在着,关于这种危险的确也是无论如何不该忘记的。

同志们,情况是这样的,的确需要竭尽全力地反对许多同志在这里展开谈到了的、这样一种关于个体经济发展的界限的理论。关于反对个体经济发展的条件已经竭尽的论断,一些同志从经济上做了论证,但是还有与经济上的论证并行的政治上的论证。如果说昨天斯大林同志说到了必须竭尽全力反对关于我们这里的个体经济已经封闭了的成见并且从经济上对这一点进行了论证的话,那么,我应该说,还有这件事的政治方面。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农民说,你作为苏维埃条件下的个体生产者完蛋了,你不可能再前进一步了的话,他会说:“谢谢这样的条件,我顺从地感谢苏维埃政权”。这是一个可以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这样把这个中农推开,把他赶走,让他离开我们有几公里远。正是因为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会给出非常尖锐的提法,警告我们在今后的许多年里不要对中农犯下任何愚蠢的错误。你们大家都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这样非常强烈的措辞:“我们曾经需要拼命跳跃,不管怎样要赶紧摆脱使我们遭到破坏的帝国主义战争,需要拼命努力把资产阶级和要打倒我们的力量打垮。这一切是必需的,不这样,我们就不能胜利。但是,如果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中农,那就是愚蠢,迟钝,毁灭我们的事业,只有别有用心的分子才会有意这样做。”(《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的工作报告》,第16卷,第150页)<sup>187</sup>列宁是这样令人信服地提出了这样的措辞,有些人可能会因此连头发都要吓得竖起来了。

柯秀尔:那要看是谁了。

布哈林:你不可能,我也不可能。(笑声)

有人喊:那我们就没有危险了,让米高扬去害怕吧,他有几根头发。(笑声)

布哈林:但是,同志们,我应该说,当我们强调发展个体经济的重要性的时

候,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应该抓住的是对发展这个个体经济的个人刺激。这里也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这样提出这个问题的,他说:“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有人对我们说:‘同农民的个人利益结合,就是恢复私有制。’不对,我们从来没有废除过农民对消费品和工具的个人所有制。我们废除的是土地私有制,而农民并没有私有的土地,他们是在租来的土地上经营。在许多国家里都存在过这种制度。这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办不到的地方。困难在于如何同个人利益结合。”(《在政治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第18卷,第1册)<sup>188</sup>

这在今天也仍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是这样来理解抓住对农民个人的个人主义刺激的这些方法,好像这些方法不是用抓住个体经济、把它引导到社会性经济上去的方法,而是认为这些抓住的方法和从个体经济向社会经济过渡没有任何关系,那就不正确了。认为这个目的本身是不正确的。所以,把提高个体经济和建设集体的任务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需要这样提出问题:集体化本身是建立在提高个体经济的基础上的。我们对个体经济的政策就是,一方面要提高它,在它的基础上建设,而另一方面不能忘记对这个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社会化,而且相反认为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不是要在生产力下降而是在它提高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化。对那种认为个体经济越穷它就越容易走向集体化的评价,列宁是直截了当地表示反对的。他直接提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能在无产阶级政权支持下发展小农的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把小农组织起来;或者是资本家控制小农,——斗争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此。在以往几十次革命中也碰到过这种情形,但是像我们这样的战争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见过……在创造这种经验时,我们只能依靠工农的觉悟。这就是我们的格言,也是任务的最大困难所在。”<sup>189</sup>

列宁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以,一些同志,特别是米柳京等人说,个体农业增长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这是绝对不正确的。这是绝对胡说八道的。我应该在括号里指出,这个规律是以土壤的肥力越来越少的规律为基础的,而且如果说在这块土地上不可能发展下去了,那么在转向更大型的经济的条件下,则有着一系列巨大的优越性。需要千方百计地反对对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怀疑态度,反对说这好像只是说说而已,这相对来说是小事一桩等等。这不是小事一桩,而是我们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同志们,现在请允许我联系到我们的前景,谈谈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我应该说,对于前景,我个人不是像在这里发言的人那么乐观。例如,我们就拿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流行数字来说吧,说是我们将会高于平均水平的收成,要比平

均水平多——几乎是要增加5亿普特。

**缅任斯基:**这是小事。(笑声)

**布哈林:**缅任斯基说这是小事,虽然缅任斯基并不是一个经济学家。

**有人喊:**他是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

**布哈林:**我们应该看看,这4.74亿是由什么构成的。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数字,它们可以增加整个谷类饲料平衡表。

而如果你们看看黑麦和小麦的话,那么你们在黑麦和小麦上将要得到的是比去年缺少3600万普特。黑麦比去年少3.15亿普特,小麦比去年多2.79亿普特,总的平衡起来比去年少3600万普特。但是,这是事先的评估。6月15日用比例计算的 actual 收成通常是要少些的:1924年是预测的92%,1925年是一个例外,是104%,1926年是94%,1927年是96%。所以,实际上的收成如果和6月的估算相差5%的话,那么所有粮食总收成提高的就不是4.74亿普特了,我们提高的就将是2.24亿普特了,而如果相差是2%的时候,那就只是3.25亿普特了。而如果拿粮食作物来说的话,那么,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将有的小麦和各种粮食要比去年少1.30亿普特了,而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的话,那就是少1亿普特了。所以我们大体上应该考虑到,明年将要比今年少得1亿普特。这是另外添加的、非常大的困难。

我说的那些困难在增加,所以,就黑麦和小麦来说将有的粮食资源要减少1亿普特的。

现在,同志们,我应该说,这个问题在我们面前提出了关于前景的问题。我们在我们未来的政策中应该以什么为方向呢?今年我们有困难。我们在明年不会有这样的困难呢?可能会有。那么,如果明年将会遇到这样的困难的话,我们的政策将有怎样的前景,我们将如何对这种情况做出反应,我们是不是将以采用非常措施为方向呢?如果我们将采用这些措施,那么是大体上在这样的规模上还是不在这样的规模上呢?怎样把这个前景全都考虑到呢?我感觉这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最痛苦的和最主要的问题。

同志们,我事先想引用这样的一种考虑或者是完全类似的想法,初看起来,这可能会让人感觉惊奇或者是在开玩笑。你们自己可以想象一下,你们这里有的是小资产阶级国家里的无产阶级政权……

**伏罗希洛夫:**这很容易想象。

**布哈林:**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这不是无产阶级政权在把农民赶到公社里去。

**伏罗希洛夫:**你是说像在1918—1919年时那样?

布哈林:那样你们就将得到这样的状况了:你们将得到的是富农穷追不舍的、组织起来的和有领导的农民起义。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会起来反对无产阶级,打它的脑袋,由于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专政会消失。你们在这种情况下能得到什么呢?

斯大林:可怕的梦,可爱的上帝。(笑声)

布哈林:也许能找到聪明的人,他们会说:这里是怎么啦?这里是不是有过阶级斗争?是的,有过。是的,小所有者把工人阶级打倒了。富农是不是在领导小所有者了?是的,小私有者是由富农在领导着,而且由于阶级斗争的结果,小所有者在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富农的领导下,推倒了无产阶级专政。所以说,一切都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如果这样的“无产阶级领导者”看看镜子的话,那他看到的就不仅是无产者了,而且是无产阶级的糊涂虫了。

正是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竭尽全力地警告说:是要无产阶级的政权,但是要和基本的农民群众一起前进。当我这样来看待问题的时候,当我在听取这里全会上的某些发言的时候,比如说安德烈耶夫同志的发言或者是斯大林同志总的表述的时候(安德烈耶夫同志声明说,局势是相当严重的;斯大林同志声明说我们现在有对结合的威胁),而我对整个问题做了思考,我想也要为明年把这个问题好好考虑一下。那好,如果我们在经过了几个月后又重新面临了这样的困难,如果我们还在那种程度上采用非常措施的话,你们认为怎样,这些非常措施应该是更激烈些还是更不激烈些呢?它们将不可避免地会是更激烈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这要取决于各种情况。

有人喊:取决于行情的变化。

伏罗希洛夫:这是在胡思乱想。

布哈林:不,这不是在胡思乱想。我想从这中间引出的是一个论断,它应该成为我们政策的基础。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朝着允许不断再更多地制造出非常措施来的方向发展。

柯秀尔:这是正确的。

洛佐夫斯基:现在这并不取决于我们。

布哈林:所幸的是还有许多是取决于我们的。所以我们政策的中心,我们应该对自己,对我们的党和对其他等等的人说的主要的一点就是:无论如何不应该允许威胁到结合——否则我们就完不成列宁同志的基本遗训了。

伏罗希洛夫:加紧向富农进攻。

布哈林:而且这是绝对正确的事。

伏罗希洛夫:那样结合就更牢固了。

布哈林:我是把和中农的结合和你所希望的和富农的结合区分开的。

伏罗希洛夫:是的,我是“渴望”这个结合的!

布哈林:我们的状况是矛盾的,生产力的增长带动的是富农的增长,而且我们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增长是不行的。这种客观的矛盾是在采用不打击中农的措施的情况下能够排除的。譬如,我们有税收政策这样的杠杆,它能够让我们几乎在不触动中农的情况下剥夺富农,但是我们只是很少想到,该是通过怎样的计算和怎样把这个杠杆使用起来,才能经常地把富农积累中坐享其成的那部分剥离下来,把它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所用,而同时又不得罪中农。所以我觉得,这里并没有什么走投无路的状况,所以我们主要的任务,我们主要的、决定性的任务,是用这样的方法,这样来进攻富农,要让中农不会因此而受害。

莫洛托夫:但是中农还是应该缴税的呀,而这是不少于整个税收的四分之三的,这是要对他们略有“触动”的。

布哈林:而谁对不得不有所触动这一点有争议呢,但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对中农提高的税率是一回事,而对富农提高的税率是另一回事,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在这里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非常简单。如果我们认为农民经济,甚至是个体经济,应该得到发展的话,如果我们想要的是昨天斯大林发展了的那个正确的想法的话,如果我们想建立起的结合不是建立在细纹布和印花布之上,而是在农业肥料和钢铁之上的话,那你们要想到的是,中农应该是能够购买这些肥料、这些机器等等的东西。

如果他们应该购买这些东西,他们自己应该有剩余的东西,不仅是为了把过去的东西恢复了,而且应该是让他们有可能得到一定的实际积累,因为购买机器或者肥料是农民经济的积累。用经济语言说,购买机器或者肥料是积累,是扩大再生产。

这就是说,你应该对农民推行这样的政策,让农民能够站起来。这就提出了价格的界限和征税的界限……

有人喊:也是为了捐献。

布哈林:这完全是另一个话题了。这个东西提出了界限,所以,虽然现在从当量的理论出发是不正确的,但这绝对是对的,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出发也是不正确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口号是:从农民那里把“技术上能达到的”一切都拿过来,不让他们有可能发展生产力,这最终也要打击到工业(通过粮食,通过原料,通过市场)。我们需要记住的是,社会主义工

业中的积累是一种要取决于农业中的积累多少的职能。而富农我们是限制在这样的界限里,给他们留下不多的东西,而所有剩余的则要拿走。

有人喊:他们会满意的。

布哈林:如果你是想走到这样的结果,我应该说的是,同志们,富农非常不满,而且他们将会越来越更加固执地反对我们。但是他们反抗的力量实际上取决于他们能带动起什么样的后备力量来。如果他们谁也带动不起来,如果中农群众不跟他们走,他们对我们就不可怕,他们可以发动起随便什么样的阴谋来,我们可以用机关枪扫射他们,但他们对我们来说没有危险,而且也不会让我们的国家震荡起来。

现在我们的局势是这样的:的确,当马在吃烤好的面包,而人们在一些地方吃的是糠秕的时候,当一部分农民不得不在临近的城市里买粮食的时候,当一个农业国要进口粮食,而运出去的是工业产品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是够吓人的了。清楚的是,这种吓人的经济可能会让各个阶级也变得吓人,而为了不出现这种情况,为了让经济不把各个阶级也变得吓人,那就必须要纠正这种吓人的经济。我在这里应该说到我在开始的时候所说到的事,并且以此作为结束。

当我们说我们是不是经受住了结构改造时期的考验的时候,我们应该回答说:我们考得非常不好。对于解决这个时期的任务来说,我们的文化素养不够。当我们看到在西欧结构改造的过程现在进行得如何快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那里发生的简直就是技术变革。在这方面我们不应该自我安慰。在两年时间里,柏林的周围成长起来了一系列和它连接在一起的城市。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欧洲的其他国家,还是在美国,我们看到的是技术增长这个意义上的巨大变革,这种增长的速度现在正在超过我们的速度。与此同时应该说,这里还有一个情况,那就是如果譬如说在德国增加了一百万的积累;我们这里也增加了一百万的积累的话,这并不是一回事。那里的一百万具有的完全是另外的意义,因为那里有的改善是另外样子的改善,像巨型的、更加完善得多的机器。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改善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多么土里土气呀。为了赶上他们,我们必须有效地利用、使用我们的所有力量和所有经济因素。

我们现在应该提出经济领导方法和经济管理方法的问题。我感觉我们的中央机关和党的中央委员会自己承担的负担太多了:“小的”、“中的”和“大的”领导都有。我们不是把领导限制在一系列考虑和掂量得很好的、制定得很好的基本经济问题上,而是几十次地解决一个小工厂、一个小的租让合同。但是在粮食上失算了,这是我们大家现在都承认的。我们在粮食的分配上失算了,斯大林同



志说到了,虽然对于米高扬来说有着一系列可以原谅的因素;在出口上我们失算了,等等。或者说在另外的方面(我绝不是在这里指私有者)。但是在对我们的经济机关的态度上,在对我们的自己的机构的态度上,我们用单一形式的、来自国家的和完全是来自上面的倡议,取代了所有类型的倡议。我们把基层合作社的倡议、地方的倡议和各种其他的倡议都遏制了,而且既然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高度集中化了,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高度集中化的官僚主义机构和这种上面负责的状况,它也就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了。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想一想,因为只有放开这种地方的倡议、合作社的倡议、工厂和托拉斯等等方面的倡议,只有在所有这些组织之间有正确的比例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得到更加机动、更加灵活的和富有成果的经济因素。

不久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朋友”丘吉尔出了一部文集<sup>190</sup>,其中写道,在战时他被召来执政的时候,当他开始履行自己的大臣职能的时候,他的部里有50多个部门,集中了如此庞大的责任和权力,致使他在战争还在进行的过程中,第一件事就是改组和减少了这些部门的四分之三;实行了这个机制的业务部分的非集中化。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需要以这样的比例搞非集中化,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让我们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向着非官僚化的方向发展的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里说到了合作制,但是对我们的经济管理,其中包括工业管理,也可以说同样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它是需要解决的。

总的来说,粮食收购问题是关于我们的国家机构和与这个国家机构的官僚主义斗争的大问题的一部分。而且我感觉,如果我们能正确地解决这个有关粮食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将沿着解决这个问题的路线正确地走下去的话,我们迟早应该在一个更广泛的规模上,从更宽的角度,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而且应该是能同样准确地解决这个问题。

主席:现在休息。

(休息后)

主席:莫洛托夫同志发言,下一个是托姆斯基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们,我一开始要谈的问题是,联系到对粮食收购问题的讨论,这次中央全会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这个基本任务显然就是以下的内容:第一,决定怎样结束现在的粮食收购运动;第二,规定出应该确定将来运动进程的措施。从现今的整个形势出发可以得出的是,对如何结束1927—1928年度的粮食收购运动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坚

决消除农村中的非常措施,而且应该是立即消除。但是这次全会不光是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应该保障推行已经开始的新的粮食收购运动而不采用非常措施,而且联系到这一点,应该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准备新的运动的基本的东西。我也要回答这个问题,也是简短地回答:这里基本的东西是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

当然,对未来的粮食收购运动的准备和推行远远不是仅仅可以归结为收购价格的问题。但是关于粮食价格的问题,关于黑麦和小麦的价格问题,在这里是基本的,而且丝毫没有怀疑的是,在现在这个时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具有了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

现在应该更从根本上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我们应该首先在自己面前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正是在今年,我们在粮食收购战线上出现了这样巨大的困难? 政治局提出的决议对困难的原因问题做出了回答,指出这些困难的基础是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粮食生产的分散、零散和落后”,“小农类型的粮食生产以及与之联系的这种生产的半自然性”)。同时决议也指出了一系列特殊的原因(由于满足提高了自己收入的农村已经增长的需求,特别是通过农村中富裕的那部分人和富农表现出来的需求的工业品的缺乏,市场比例失调加剧;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相比,粮食价格的不良对比关系;计划工作的错误;收购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的缺点;富农和投机分子利用了困难),正是在今年,粮食战线上的尖锐困难是和这些联系在一起的。

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把今年粮食收购中的困难原因和下面这个问题对比一下,那就是怎么才能解释,为什么去年农民是用同样的价格出售粮食的,今年按同样的价格他们就不想出售了呢?这该用什么来解释呢?不该解释成是今年我们在农村的粮食比去年少了,而我们想比去年收购的要多吧?不是,当然不能用这样的理由来解释。今年农村的粮食不是比去年少了,而是多了,因为我们有的是第三个丰收年。现在的收购计划也不比去年的多。可是,尽管是这样,尽管保留了去年的粮食收购价格,我们在运动的前半段,从10月开始,就已经碰上了粮食收购的严重困难。

这个事实要求我们更加关注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说是,今年我们好像是在计划调节工作中犯了特别多的错误,有特别多的失算,用这些来解释这个极其重要的事实的含义。这些错误和失算是有的,而且当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局势的尖锐程度,但是和去年相比,它们的作用绝不可能如此之大,以至使得它们(错误和失算)成为了今年的粮食收购与去年相比有了严重恶化的基本原因。所有这些导致了需要更严肃地谈到价格问题,更准确地说,是粮食价格

和整个农业价格为一个方面,与另一个方面的工业价格的对应关系问题。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需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问题同时又是政治问题,从它的阶级内容的观点出发,把它提出来。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虽然今年国内的粮食并不比去年少,为什么今年掌握着粮食的基本部分的中农没有在去年他们出售粮食的条件下出售粮食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基本上在于农村,而且特别是在于从经济上说,它的富裕的和富农的上层已经强壮起来了,而且这个社会经济事实决定了,在农村和城市结合的领地上(在粮食领地上),迄今为止对农村来说,价格的对比关系是对农村最为不利的,现在农村有了可能更顽强地维护农村的利益。农村,特别是农村中富裕的阶层和富农阶层的收入增加了,这就使得农民,特别是他们的上层,有了更灵活地和更有利地进行经济运作的可能,在这种条件下,也就是说在工业品缺乏、计划工作有错误、对有产农民征收很低的农业税等等情况下,造成了农村比去年大大减少出售粮食,而很愿意出售其他农产品。这个事实也反映出,今年,已经加强了自己的经济阵地的农村小所有者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必须要改变粮食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对应关系,提高粮食的价格。这并不意味着加强我国小所有者的经济阵地相对要胜过加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经济阵地。相反,事实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在始终不变地而且是快速地增强着的,表现为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在持续不断地上升。但是另一方面,农村的经济在提高,特别是它的上层的收入在增长,否认这个肯定的事实也是荒谬的。而这个事实(提高)不可能不使它(农村)在市场上能够更轻松地进行经济运作,从而也就能够更轻松地和更好地保护它的那些落后了的领域,也就是说,会更敏感地触及到农村从经济上和城市结合的那些领域。这在我国条件下是完全自然的。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下,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在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基础上发生的,也就是说,苏联的社会主义阵地越来越巩固不是靠农民群众的破产和贫困化,而是通过加强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和提高小所有者的农村经济,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保障城乡社会主义大经济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样的条件下改善农民群众的状况,把这一切结合在一起的,这本身又是和从根本上改造农民经济、逐渐创造条件完全消灭阶级联系在一起的。

今年不仅是第三个丰收年,而且是农民的非农村工资增长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农村,特别是农村中的富裕阶层和富农阶层的收入的增长,比过去时期的任何时候都大。而且农业税对于经济上已经强壮起来的阶层来说,在今年是很低的,工业品非常匮乏,特别是由于这些产品运到农村去的时间晚了,而粮食的收

购价格依然是比其他农产品的价格获利要少许多。在这种状况下,富农和投机分子在破坏粮食价格方面的进攻不可能得到支持苏维埃政权政策的中农应有的回击。由于收入的提高和另外一些已经指出的因素(总体上明显削弱了对按去年的价格出售粮食的刺激的那些因素)的作用,基本的粮食持有者比去年减少了向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机关出售粮食,他们是通过出售其他农产品和自己的其他收入来完成自己对国家和对贷款等等的支付的,而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富农)则是在千方百计地竭力按照自己的方式利用小所有者的基本群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直接向苏维埃政权进攻。富农企图把这些对苏维埃政权来说已经形成的困难变成对苏维埃反攻的起点。我们的责任是对富农和投机分子的这种进攻给予坚决反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采用非常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在实践中往往也触及到了中农。现在取消非常措施当然不可能是意味着停止向富农进攻,相反我们应该系统地发展对富农的进攻,但是要用另外的方法,要考虑到中农群众的利益。我们有这样做的足够的条件。

但是最后一次粮食收购运动的经验清楚地说明,为了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推行粮食收购计划,我们应该从多少“纠正”一下粮食收购价格开始。现在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对粮食产品价格的规定意味着什么?同志们,这意味的不外是实际上工人阶级对中农的让步。现在推行的在农村提高粮食价格的意义就在于此。

有人喊:对!

莫洛托夫:是的,这对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来说,是一种对小所有者阶级,也就是农村的中农阶层做出的必要的实际让步。在工业商品和农业商品价格对应关系的背后,是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也就是说,首先是和中农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而中农是粮食以及总的农产品的主要占有者,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中基本的和主要的一点。当然,同时工业和农业价格的对应关系问题也是和对待富农的态度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我们的条件下,从前一个问题就能看清楚,这首先是无产阶级和中农的相互关系问题。

党的政策是要通过系统地降低工业价格来拉平现有的工业和农业价格之间的“剪刀差”。这个政策是不是正确呢?当然是正确的。实际推行这个政策就需要我们在每一个具体的时刻都能注意地斟酌和确定可能的,也就是无产阶级国家力所能及的、降低工业价格的措施。这当然并不需要特别的解释。但是恰恰是在现在的局势下,“剪刀差”问题显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和以一个特殊的侧面

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在现在这样的时刻,压缩“剪刀差”的问题不是要降低工业的价格,而是要提高农业的价格。在这件事上,现在我们应该走的是对工人国家不大有利的路子,也就是提高粮食作物价格的路子,在最近时期让工业价格保持稳定,而且也不排除部分地降低工业价格。通过推行降低工业价格的措施还是提高农业价格来使“剪刀差”接近,这中间的区别是大家都看得清楚的。降低工业价格不仅是对农村的贫农和中农有利,而且也对作为消费者的工人阶级有利。提高粮食价格是对主要持有粮食的人有利,最多能做到的只是通过国家的一系列紧张的措施(严格地节约机构开支,更加合理地安排事务,等等)对于作为消费者的工人给予补偿,但是在极大地提高收购价格的条件下,可能也就要无产阶级国家做出一定的牺牲了。如果记得牵动着粮食的收购价格和其他农产品价格的那根连线的话,这是容易理解的。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应该走提高一些粮食价格的路子——整个局势就是这样的。虽然这个拉平“剪刀差”的路子对无产阶级国家来说是不大有利的,但是我们应该在现在走这条路,为了加强农民对增加农产品的关注而对中农做出让步,没有这一点也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快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本身。当然,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子(富农)将会竭力按照自己的方式利用苏维埃政权迈出的这一步,而且首先是通过最大限度地把粮食价格哄抬起来,以此来破坏苏维埃的粮食价格政策。对于富农对我们的这种不可避免的进攻,我们应该用我们这方面协调一致的和坚决的反攻来对付。当然我们是会这样做的。不这样就不可能正确地推行和中农结成联盟的布尔什维克政策。

现在应该说说两种可能出现的对这个政策的扭曲。的确在实践中,现在会遇到在这个问题上的多少已经完全表现出来的双重性错误。

一种类型的错误是这样议论的:因为在两三年里已经给粮食作物确定了一定的价格,也因为无产阶级国家如果没有某种兴盛就不可能提高这些价格,那么,在这件事上就不应该有退步了。这种错误可以归结为是不愿意对中农做什么实际的让步,在现有的条件下,由此而不可避免的,就是要在农村采用非常措施的“经常性的或者长期性的方针”。这样的错误推导出来的结论是:如果农民不按原来的价格向我们缴粮,那么我们就将要在农村踏上非常措施之路!而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在实际上意味着要用对中农施加暴力的政策取代和中农结盟的政策。很清楚,这样的路线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只有不相信在我国可以在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有可能滑到这种政策上去。

我们有权利把这种政策称之为失败主义,实际上,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就是这样的。站在不允许对中农做出任何实际让步的立场上,就意味着滑到了与布尔什维克格格不入的、导致分裂与中农的联盟的政策上去,滑到可以以托洛茨基失败主义命名的政策上去。

另一类型的错误是这样议论的:因为在粮食收购中我们碰到了很大的困难,现在必须提高粮食的价格,那么我们在这件事上的让步应该是不仅要满足农民的基本群众,而且要满足要求所谓“恢复性的”粮食价格的资本主义上层。大家知道,在苏维埃的上一次代表大会上,反对派在代表大会党团的会议上提出了这个要求。当然,类似的要求也有可能渗透到我们党的队伍里来。但是,如果是不仅要保护“恢复性”价格,而且要维护立即提价50%—70%的话,在现在的条件下,这就代表了要在富农和投机分子的压力下直接退出阵地了。这是我们党能够接受的政策吗?不是,绝对不能接受。沿着这条路线走就意味着让富农牵着鼻子走,从而也就会破坏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阵地。现在还有“阶级分歧”(列宁语),而且这种分歧有的时候还会变得尖锐。既然通过工人阶级力所能及的、对小私有者(中农)基本群众的某些让步可以平息这种分歧,这样的路线是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并因而也符合列宁的政策,那么,在资本主义分子(富农和投机分子)的压力下,特别是在有了尖锐的经济困难的时刻,如果是面对不断加强的、旨在直接破坏苏维埃的物价政策和靠着损害社会主义的阵地来加强资本主义分子阵地的压力而惊慌失措地退让,这样的路线就是和这个政策根本对立的了。这条路线(无论有的时候是怎样把它的实质伪装起来)是要导致向富农和投机分子交出无产阶级的阵地,而有的人可能由于天真而也把它描绘成是加强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路线。有这么一条路线,它的实质可以归结为这样的议论:既然要对粮食的主要持有者,而且是我们的同盟者——中农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也满足富农投机地哄抬粮食价格的那种掠夺性的要求;即便是有所保留,党也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这样的路线是正确的。谁要是滑到这样的路线上去,那他实质上就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偷换布尔什维克与中农结盟的政策,这种小资产阶级政策至少不能代表工人和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结成联盟的政策。这样的路线在实际上是会导致在工农联盟中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这实质上也就暴露出了它是一种取消主义的主张。布尔什维克应该和这种在党的政策上的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取消主义的路线进行经常的和无情的斗争。

上面指出的这两种错误都是和党的路线不能相容的。在这件事上,就和在

所有政策上一样,我们的政策是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们的教导为出发点的。我们应该在一定的情况下对中农做出实际的让步,因为这是来自于他们的实质性的经济利益的,而且因为这是和无产阶级国家推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符合的。联系到这一点,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让步的尺度,这些让步应该是无产阶级国家力所能及的。实质上这也就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实现和中农联盟的政策。

如果有人对这件事说,这是“黄金中庸”的政策,这是“中派”政策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就像不止一次对托洛茨基反对派说过的那样,完全平静地对这一点做出回答:无论托洛茨基分子先生们对我们说什么,这就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政策。我说到了两种基本错误,可以有条件地把第一种称做左的类型的错误,把第二种称做右的类型的错误。对这两种错误都要进行往往被托洛茨基说成是“中派”反对“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同时,托洛茨基是把自己算做“左派”的,甚至还留在联共(布)的队伍里的时候,显然是从一种没有道出的预料出发的,那就是他是处于社会民主党内,他所面对的不是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而是社会民主党人(当然,在他们中间,他暂时是“左派”)。明白的是,在联共(布)里,这种“左派”早就已经被揭发出来是用“左”的言辞和“红色”的姿态掩饰起来的、真正的社会妥协主义的右派了(所有这些“左的”和“红色的”只是从小市民的观点上说的!)。这只能证明,托洛茨基尽管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里待了几乎10年,依然是忠于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关于党的观念的,甚至就是现在的联共(布),托洛茨基也还是在无望地企图把它描绘成是中派思潮,因为他是反对对列宁主义路线做任何歪曲,特别是反对所谓的“左”的类型、而实际上是用迷彩掩盖着各种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错误的。现在用不着证明的是,托洛茨基的“左派”实际上是用左的言辞掩盖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企图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找到位置的机会主义。企图把联共(布)的列宁主义政策和社会民主党这种意义上的“中派”等同起来,是已经破产了的政治家典型的翻版,这些政治家是在力图用对联共(布)无力的攻击来掩盖自己的毁灭,因为实际上联共(布)的“中派”,也就是说反对“左”派失败主义分子和反对右派取消主义者的斗争,恰恰一直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代表的,一直也应该就是由真正的列宁主义的政策代表的。

**斯大林:**布尔什维克的政策。

**莫洛托夫:**这也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它是要反对两方面的歪曲的,也就是说,要反对实际上不外是代表了来自“左”的和右的、小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

克政策的歪曲。

我接下来想从最近这些年来价格的历史沿革角度谈谈关于让步的问题。

我只举4个数字,其中的两个是从在我们这里并不那么特别普及的来源得到的,那就是从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为我搞到的财政人民委员部的行情研究所的数据中得到的<sup>191</sup>。特别重要的是要谈谈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而且是转折的时刻——1923—1924年工业和农业产品的价格上的转变。从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的角度看,1923年末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这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苏维埃政权为了迎合自己的盟友——农村的小资产阶级中农群众,做出了实质性的实际让步,就是在这个时期。

**加里宁:**说的不坏!

**莫洛托夫:**1923—1924年是怎样的情况呢?我要引用的关于粮食产品的收购价格根据的是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数字,而关于工业品价格的数字根据的是行情研究所的数字,遗憾的是,后面这些数字完全是从私人商业中的价格出发的。但是因为1923—1924年以及后来的一年里私营商业还在很大程度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农村里当然是起着主要作用的,所以这些数据基本上是能够给出关于那个时期的工业和农业价格的对应关系的准确概念的。这就是能够提供1923—1924年度与下一年度,也就是1924—1925年度对比的那些数字。原来是1923—1924年度粮食收购的指数相当战前水平的0.78%,而1924—1925年度就已经达到了1.23%;同时工业价格的零售指数在这些年里是这样的:1923—1924年度是战前的2.73%,而1924—1925年度降到了2.43%。这就意味着,在一年里,农业产品的价格提高了0.5倍,而工业品价格在同一个时间里略有降低。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对应关系的这种重大变化包含了一个内容,那就是无产阶级国家认为在当时,为了加强城乡的经济结合,为了保障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在工农联盟中的领导作用,是有必要这样做的。

从1923—1924年度这段时间工业品和农业品价格对应关系的这种重大变化中,不能不看到无产阶级国家是对中农做出了重要的实际让步的,因为无产阶级国家要这样做就应该做出某些牺牲(例如,失去一部分工业利润)。不仅如此,正是从这个时刻开始,党特别更加突出地关注系统推行工业价格的政策了,目的是更快地进一步地缩小“剪刀差”。众所周知的是,党的这个政策一直受到以所谓的1923年反对派为首的一部分同志的坚决反对。但是,正像现在每个人都清楚的,这个政策已经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推动了农业的进一步提高并且同时也加强了整个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经济基础。1923—1924年度工业



和农业价格对应关系的重大变化的例子只是强调了党是如何珍惜和中农的联盟的,无产阶级国家为了保存和加强这个联盟做出了多么重大的让步。我在上面引用的4个数字所表明的价格的重大变化好像是强调了一点,那就是从无产阶级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可以说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价值”有多高。那个时期的这种价格的变化是工人阶级对中农做出的一定让步,是在要求工人阶级为了加强和农民的联盟而做出一定的暂时牺牲——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能有什么怀疑的。过去的5年表明,这个让步对于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把让步就看成是让步,不要偏离了,也不要抹杀了无产阶级国家的相应措施的阶级实质。

再回到现在来。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关于提高农业价格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斟酌与这个决定有关联的一些结论。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茹柯夫同志这样固执地要搞清楚:他说,你们说说看,通过这个决定会变成什么样?你们计算过了没有,这对工人来说,将会怎样反映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上?在工资上,我们的外汇上和整个经济形势上,联系到这一点会是怎样的情景?从掌权的工人来说,提出这些问题是再合法不过了。我们的工人不可能不要求国家机关在通过提高粮食价格的时候算计好了这要花什么样的代价。为什么有必要这样做是清楚的。茹柯夫同志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从保护正在展开的工业、保护并且尽可能进一步扩大工业化的速度的愿望出发的,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本来我们就很知道,实现党所采取的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方针是很困难的。在我之后托姆斯基同志将要发言,他作为工会领导人,应该特别明白,在粮食价格上的重大让步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和重大的困难相联系的。

我们应该是事先就从提高粮食价格的决定中对一系列具体的任务得出结论来。

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提高粮食作物的收购价格,但是尽可能不要提高供给消费者的粮食的价格。我们应该争取做到这一点,即便可能是我们因此将不得不吃灰色的粗面包,不是吃白面包。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直截了当地告诉工人们,工人们是会理解我们的。

**伏罗希洛夫:**完全正确。

**莫洛托夫:**如果为了不提高粮食价格,我们应该用灰面包取代白面包的话,工人们是会理解我们的。

为了在莫斯科保持农产品的价格指数,我们在这里可能要出售的不是鲜肉,

而是冷冻肉。这种情况也是应该能做到的。接下来是应该加强节约收购机构的开支。在这里应该是狠狠地压缩,要争取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提高收购价格对消费市场的影响。这一切都连着一个总的问题,那就是最大限度地节约所有的国家开支。奥新斯基同志说我们在国家开支的节约上做得不够,这是绝对正确的。[这是绝对正确的,这是源于列宁主义对问题的整个提法的:向中农让步,但是在涉及机构的所有方面都要节约,如果需要的话,要减少维持这个机构的费用,疗养院。]

在这件事上,情况再一次向我们提醒了这一点,这也是列宁曾坚决指出过的。

**伏罗希洛夫:**甚至对全会的会议也说过:不要一开会就是两个星期,开四五天就行了!

**莫洛托夫:**减少漫天胡扯——同样不能不承认,这种状况是存在的。从这里说到的所有情况出发,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对于我们在工业上、生产上的工作来说,需要再一次强调的任务是要更多地降低成本,更多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既然我们不得不让步,那就要加把劲。这就是我国的领导阶级的状况。他们不是剥削者,他们是用自己长了老茧的手在拖着无产阶级国家前进,他们不是简单地在进行着泛泛的领导,他们是在驾驶着这台机器,但是不是一个人,而是和中农一起。这也就是联盟。]

有人说,斯大林同志说老乡是要纳贡的,应该给国家付钱,这些话是不好说出口的。这是绝对正确的话。工人阶级、中农和农民都在纳贡。

**伏罗希洛夫:**是在给自己纳贡。

**莫洛托夫:**我们把资本家和地主赶走了,我们靠什么维系呢?我们不能指望提高城乡资本的收入,这个阶层在我们这里正在消亡,我们在让它消亡和把它赶进坟墓。我们可以指望谁呢?我们可以指望的只有自己、工人和农民,所以他们就要纳贡。]

1923年列宁说过,我们是骑着农民的马前进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对于现在来说,应该考虑到,和1923年相比,工人阶级在发展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中的比重加大了而且在继续加大。工人阶级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自己工作的强度做到这一点的。没有这一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巩固。这个事业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用自己的肩膀扛着的。

**李可夫:**强度是这样的,但是生产率不是这种情况。

**莫洛托夫:**我们这里正在发生的是劳动生产率在提高,这也是和工人的劳动

强度的提高联系着的。<sup>192</sup>但是工人和农民的状况不同就在于,虽然两者都是支付给同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而领导国家的是工人阶级。不能忘记的是,虽然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为基础的,但是掌权的阶级只是无产阶级。

这并不排除工人阶级在履行自己的领导作用的同时,又是两个基本阶级中的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是在这两个阶级劳动的基础上开展的。无产阶级国家区别于任何一个另外的阶级的国家政权的地方,就是只有在无产阶级国家里,掌权的是劳动人民阶级,而不是寄生虫阶级,也不是剥削者阶级。同时,与社会主义建设相联系的,不仅是工业中的工人数量在扩大,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提高,同时在发展苏维埃国家经济的整个事业中,从事大工业的工人的劳动比重在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在工人国家里掌权的无产阶级不可能不是生产的最积极的参加者。在苏维埃制度下,无产阶级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应该是劳动的头号范例,是社会主义建设全部工作的榜样。这就是工农联盟、工人阶级为什么不可能不是起领导作用的联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这就是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的“价值”。

现在我回到1923年的例子上来。

当时,在1923—1924年的时候,我们对工业价格和农业价格之间的对应关系做了重大的、有利于后者的调整。大家也都知道,从1924年夏天起,就已经在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倡议下,进行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紧张运动。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是和工人阶级应该在这个时期的农产品价格方面做出的让步联系着的。虽然在价格的对应关系上有了重大的、有利于农业指数的变化,但是为了不仅不减少国家工业化的速度,而且要更多地加强提高工业的工作,也包括了通过提高农业来达到新的提高,苏联的无产阶级应该以特别的激情着手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工人阶级在对中农做出这样或者那样的实际让步的同时,不能不对自己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样一来,每一个工人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国家,对社会主义事业要承担起什么样的新责任。

现在,对于轻工业的工人们来说,我们这里正在形成一个特殊的局面。

在当今这个时刻,我们不得不把资金从轻工业转移到重工业上去。在现有的条件下,由此而来的是什么呢?由此而来的是,一方面,轻工业的工人明白,他们的工业是有赢利的,他们的状况可以更快地改善,而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并没有能做得像希望的那样快。我们不能不考虑到由此而不可避免出现的轻工业工人中的某些不满。除此之外,应该考虑的是,这个工业的工人和农村有更多的联系,所以会更多地反映出的农村的情绪。虽然我们都记得所有这些,但是我

们还是应该坚定地 and 明确地在轻工业工人面前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必须要最大限度地加强重工业。轻工业工人的状况往往还是非常艰苦的,我们应该改善这种状况。但是与此同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现时期工人阶级基本的任务,不能忘记恢复和最大限度地发展重工业的任务。如果是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的话,轻工业工人当然是会理解我们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起保障作用的是我们的工人的高度觉悟和他们对基本的阶级利益清楚的理解。当然,就是把资金从轻工业转移到重工业上去也应该是有限度的,应该是按照正确的国家计算来做这件事。但是在最近的整个一个时期内,这样把轻工业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转到重工业,转到冶金业、煤炭工业等方面去,是绝对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国家迅速工业化的方针。我们在粮食收购上经历的困难再一次提醒了我们,必须要彻底贯彻党采取的国家工业化的方针,在这个方针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快速提高整个工业以及加快提高农民基本群众的经济,其中也包括通过农民经济,越来越广泛地实现集体化和过渡到使用新的、更高级的技术。

现在转到在提高农业价格上做出让步的界限问题上来。具体从数字上解决这项任务需要考虑的,不仅是事情的经济方面,而且还有它的政治方面。这件事的政治方面自然是和如何评价现在农村的政治局势联系在一起。

从这里说出的各种意见中,应该指出的是安德烈耶夫同志对北高加索的局势做出的评价。对于大多数粮食收购地区来说,这个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就像许多在这里发言的同志所承认的那样。安德烈耶夫同志说,再在农村采用非常措施会使得我们和中农吵起来,但是他并没有粉饰现实,也没有惊慌失措地夸大现今农村政治局势里反面的东西。当斯捷茨基引证说《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部收到了工人信件,那里说到某些工人对这些措施不满的时候,他也没有说到什么可怕的事情。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是有一部分工人对最近农村中的非常措施不满。斯捷茨基同志从编辑部收到的信里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并且说了政治倾向显然不正确的话,这是另一回事。政治上不正确的倾向是什么,我们就说它是什么,而事实终归是事实,我们对待这些事实是完全平静的,并且是权衡了它们真正的政治含义的。

全会对今天农村的政治局势应该给出什么样的评价呢?

我感觉,大体上可以用这样的话来简单表述这个评价:在农村,由于非常措施造成的结果,政治局势无疑是恶化了,但是和中农的联盟并没有被破坏。在许多地区,政治局势无疑是恶化了,但是没有人能证明,和中农的联盟在我们这里已经被破坏了。谁要是基本上脱离这样的评价,那他就不不可避免地会偏离正确

的道路和犯下一大堆错误。能够证明和中农的联盟没有被破坏的,是农业还在继续提高。虽然有非常措施,今年的春播面积还是扩大了。这个事实是无论如何也无可争议的,而这当然是基本的证据之一,说明农业在继续提高,也反映出了中农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

克里茨曼同志在《真理报》上用无可争议的数据证实了这个事实,但是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在党的农村政策的基本结果,包括对富农开展的坚决进攻和最近的这些非常措施对农村的直接影响这两者之间划出清楚的界限。《真理报》在他的文章加注的时候竭力要纠正这个错误。但是《真理报》的这个纠正显然是不够的和片面的。《真理报》编辑部的注说:“作者在说到农民经济由于粮食收购而提高了的时候,显然是过高评价了我们的成就。”这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注里,应该还要直接指出的是,农民经济的提高在我们这里是历历在目的。注里没有补充上这一点,所以这里对问题的提法就不清楚了,有了某些片面性。接下来在编辑部的注里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克里茨曼同志说的是对的话),那么无产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的联盟在最近几个月里就变得更巩固了。”编辑部说作者对由于最近在农村采取的措施而政治局势恶化的事实估计不足,这是对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说无产阶级和中农的联盟加强了是不正确的,不过说和中农的联盟没有被破坏掉是正确的,而且清楚地说上这一点很重要。但是编辑部的注在这一点上什么也没有说,所以在这件事上,编辑部的注还是有些不清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片面的。接下来《真理报》说,克里茨曼同志“把由于非常性的困难而不得不采取的暂时性的非常措施和建立在十五大决定基础上的向富农进攻的长期方针混在了一起”。在这一点上编辑部也是对的。但是从它那方面说,为了完全搞清楚,最好还是说,虽然作者把非常措施和开展对富农的进攻的基本方针“混在了一起”,作者正确地指出了,党在农村的政策是正确的,虽然有非常措施,我们在今年也提高了农业,而且特别是扩大了春播面积,正是这个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而这是中农正面看待苏维埃政权的极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如果《真理报》在自己的注里指出了这一点的话,那么真正的局势就说得更加充分和更准确了,而且这样一来,编辑部的注也就没有任何片面性了。

对农村政治局势的评价现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因为党内有这样一些分子,他们明显地滑到了错误的政治结论上去了。

联系到这一点,不得不说说弗鲁姆金同志的那封著名的信。他声明说:“我们的力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削弱了,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向苏联进攻的基本的

和决定性的事实。”弗鲁姆金同志是用这样的论据来加强这个思想的：“农村除不大的一部分贫农外，是和我们敌对的”。接下来是：“同盟者——中农背向我们了”。在我们中间，对于弗鲁姆金同志的这些声明看来是不会有两种意见的。我们中间谁也不会想要回避对弗鲁姆金同志的立场做出这样或者那样的评价。至少应该对这个立场争取做到排除任何模棱两可的看法：要么它是正确的，那就需要在党所推行的农村政策中有某些大的改变，要么它就是不正确的，那么它就应该受到一定的谴责。

在这里发言的克维林同志说的对，最近有些同志对现在的政治局势的评价中有些不清楚的地方。事实总是该承认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应该把不清楚的地方称做是不清楚的，动摇就该叫做动摇。我希望克维林同志会认为这是正确的。

但是现在我们应该说说这个问题，因为克维林同志对农村政治局势的评价甚至在这次中央委员会的全会上也得到了个别同志的支持。在这里发言的人中间有两位这样的同志。

第一是奥新斯基同志。

我从他的发言中引用两个典型的地方。第一是“这个危机状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城乡之间的分离”。奥新斯基在他的发言中的一个地方是这样说的。后来他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上，并且引用列宁关于必须恢复结合的话，针对这件事指出：“是那个已经完蛋了的结合”。这就是奥新斯基同志对结合的状况问题的评价。中央全会无论如何是不能同意这个评价的。不能同意是因为，如果我们这里的结合真的是“完蛋了”的话，那么在现在的条件下，在今天农村已经在经济上多少强健些了的情况下，一个发生了和农民分离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处于残酷的国内战争的状态。而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如果奥新斯基同志在这里引用的话里是偶尔说漏嘴的话，当然这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是可能发生的，如果他在自己所处的“我们这里的结合完蛋了”的状态下不再坚持的话，那么这样一来，奥新斯基同志和弗鲁姆金同志的团结一致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他将维护上面提到的发言中的那些地方的话，那么别的就不说了，我们简直就应该嫉妒他精神上的那种平和了。如果他在说了和农村的“分离”，说了我们这里的结合“完蛋了”之后，只不过是提了如何削减疗养地的开销，说了个微不足道的实际建议(笑声)，在提了这样一个“实际的”意见之后，就静悄悄地离开了中央全会的讲台，那怎么能不羡慕奥新斯基同志呢？在这件事上的确可以“羡慕”他在对我国的局势做了最悲观的评价之后仍保持这种极平和的心态。

奥新斯基:甚至在您对我的观点做了这些歪曲的情况下,我还是保持着精神上的平和。

莫洛托夫:当我是从您的发言中引用准确的言辞,说这是歪曲、是荒谬的时候,甩出这样的话来是何苦呢?

无论怎么说,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党都不能允许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在和农村的结合问题上,有不清楚的地方。

而且不得不遗憾的是,在我前面发言的布哈林同志涉及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却很少谈到这个基本问题,而它的重要性是相当清楚的,是我们特别能理解的,因为最近我们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农村中的政治局势问题。应该说,如果党内对这个根本问题搞得越清楚,这对我们今后的整个工作就将会越好。

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得不说说另一位中央委员的发言了,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明显是不正确的立场。我指的是索柯里尼柯夫同志。

联系到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发言,我们有根据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中间的某些人无疑有一种恐慌。

李可夫同志说,如果有人说的是实话,尽管是十分不愉快的,即便被称之为恐慌的人,那也没什么可怕的。李可夫同志的这些话是不能不同意的。实际上如果不是在自己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完全说实话,那还在什么地方说呢?在这里说至少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尽管是最不愉快的实话也好,没有什么可以抹杀实际中的反面情况的。在中央委员会里更要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需要直截了当地和诚实地用党的语言说出所有真正的困难,说出我们工作中所有真正的错误和不成功的地方。这中间将不会有任何恐慌而言,这是符合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基本职责的。

但是你们看看,在索柯里尼柯夫同志那里得到的是什么情况呢。他的发言这里已经批评过了。我要说的只是这个发言的最后部分。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说:“今天的粮食收购危机的实质何在呢?……这样的价格对比关系是维持不下去的,需要改变它”。接着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声明说:“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大幅度地改变对应关系,期限已经结束了——我们应该现在就行动”。

米高扬:“期限已经结束了”。

莫洛托夫:于是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声明说:必须“大幅度地改变(价格的)对应关系,期限已经结束了,我们应该现在就行动。”你们说说,怎么称呼这样的哲学呢:这是惊慌还是不是惊慌?实际上“期限已经结束了”的提法和“布谷已经叫过了”的提法有什么不同呢?这两种提法对政治局势给出的是同样的评价,

虽然这些评价是属于不同时期的和不同人的。这样的评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的,不仅是对农村的中农基本群众的一定的实际让步,而且是对对我们逼近的富农的危险让步。

**索柯里尼柯夫:**这就是您自己臆想出来的了。

**莫洛托夫:**谁要是现在对我们说“期限已经结束了”和农业和工业的价格对应关系应该“大幅度地改变”,那他就明显是处于了惊慌的状态,是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的惊慌。带着这样的心态和对政治局势的这种评价,是很容易被向我们进攻的富农俘虏的,因为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结论是从对国内已经形成的局面的评价得出来的,是迎合了富农对农产品的“恢复性”价格的要求的。如果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没有预先看到这一点并且同意现在不能允许实行“恢复性”的或者是接近于这些价格水平的农业价格的话,那他就应该接下来对他所说的话做出相应的解释。遗憾的是,他的整个发言说的是另外的事。他在这次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充满了对无产阶级力量的不信任,不相信我们能够在党规定的实际措施的基础上走出困境。他的发言充满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困难的恐慌,特别是对当前这个时期的困难的恐慌。但是恐慌是困难时刻的一个坏顾问。在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发言之后,部分地也是在奥新斯基同志的发言之后,不得不说的是,对我们中间存在恐慌的警告根本就不是空穴来风。这些警告是从我们应该在这次中央全会上的这些发言中指出的那些东西中不可避免地得出来的。

同时,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刻,我们必须在评价政治局势的时候和在通过实际决定的时候有最大程度的平静。

个别的同志想要更鲜明地强调这种政治局势的消极方面,在自己的发言里把主要的重点集中在了这一点上,他们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有的时候这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适宜的,如果是必须要强调那些没有能引起应有关注的事实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强调一下这些事实,用相应的压力这样来做……

**柯秀尔:**更多一些感情。

**莫洛托夫:**你可以说是“更多地”投入“一些感情”,为的是更尖锐地提出新的问题来,直截了当是必要的。这本身是一种好的品质。但是就是好的品质也是在合乎分寸的时候才是好的,因为对一个片面地、一门心思想要强调困难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在这方面又走得太远的同志来说,就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了:在遇到大得多的困难的时候,他会怎样呢,他那时是不是能找到需要说的话呢?

**有人喊:**他那个时候可能将会更平静一些的。

**莫洛托夫:**如果他将会更平静一些,那很好,但是如果是在遇到起先的困难



就有悲观的情绪,这并不总是预示着在以后遇到更大的困难时会有必要的沉着。同志们,不能忘记的是那样的状况: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牧童,在没有狼的时候,好几次叫喊狼来了,让别人来帮忙,可是在狼来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帮助,因为在真正来了危险的时候,这一次人们简直就不再相信他的呼唤了。

**A. П. 斯米尔诺夫:**往往也会有另外样子的牧童。

**莫洛托夫:**会有各种各样的牧童,但是我说的是用狼来吓唬人的牧童。(笑声)

至于无产阶级在提高农业价格方面可能做出的让步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拿今天的状况和1923年比较一下是有好处的。有一些同志企图对今天农村的状况采用“分离”、“完全分离”、“开始分离”等等的提法。应该提出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怎么样,现在的局势是比我们在1923—1924年时的情况更好些还是更坏些了呢?

**斯大林:**格鲁吉亚的起义。

**莫洛托夫:**一个格鲁吉亚起义实际上又值什么呢?要知道这是一件要比不久前富农和贵族在卡巴尔达的行动更严重得多的事件。而我们在1923年年底遇到的所谓农民对购买工业品的“罢工”事实呢?大家知道,现在虽然有着仍然相对高的工业指数,农民是敞开腰包在购买工业品的。难道在1923年有过这样的状况吗?可是我们在当时并没有得出像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所说的“期限已经结束了”这样的悲观结论来。1923年的困难正像大家知道的,引起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和所谓的“工人真理”和“工人集团”这样腐朽的小集团的复活,它们实际上反映出了孟什维克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现在的困难是不能低估的:如果党低估了它们的重要性,它们就有可能导致破坏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但是未必可以怀疑的是,在这种环境下,克维林同志所说的现有的动摇和不清楚的成分是和1923年时期我们所有的那些东西不能相比的。我们不能低估现在这个时刻的困难,还有今后将面临的不小的困难。但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是,党是不会跟着现在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说到的以及奥新斯基同志说到的那些部分结论走的,而且没有一个我们的党组织是会同意他们的意见的。

但是必须要转到中心的实际问题上来。

虽然我们现在为准备新的粮食收购运动做了一切,还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今年能不能得到无产阶级国家所需要的那么多的粮食?粮食收购运动还没有开始,但是我们不能不现在就考虑这个运动可能得到的结果。每一个党员现在都在深入思考着这件事的前景。

联系到这一点,正像这里已经说到的,鲍曼同志在个别同志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今年是不是有可能对农村中的上层用相应的实物税取代货币税。但是清楚的是,在这件事上责怪鲍曼同志是不对的,因为他只是在和两三个同志的个别谈话中提出了这个问题<sup>193</sup>,而且根本就没有提出相应的建议,把它作为从自己对现状的评价得出的结论。

在这里发过言的克维林同志也在照自己的方式寻找能够和其他的措施一起保障完成国家所必需的粮食收购计划的途径。他的思想可以归结为必须要给市场松绑,但是他做得正确的是,他是非常慎重地对待了这件事。实际上不可能寄希望于通过给市场松绑和扩大私人对现在的周转的参与,就能更轻松地保障向城市供应粮食。在现在的条件下,在苏联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上,不能把保障改善对工人中心和城市的供应的很大希望和这种措施联系在一起。在这件事上,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扩大私有者的作用上是错误的,是一种在经济政策上的不正确的政治倾向。

这并不是说,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就是现在也不能暂时扩大私有者在个别的经济地区的作用。

我举乌格拉诺夫同志关于阿斯特拉罕渔业的例子。他曾指出,如果对阿斯特拉罕的渔业个体户采用多少有些不同的态度,我们就有可能在今年的市场上多有好几百万普特的鱼。既然这件事是这种情况,那么,我感觉,乌格拉诺夫同志关于在阿斯特拉罕的渔场上对个体户采用了不正确做法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在这件事上让私有者比去年甚至更多一些地提高自己参与收购鱼类的比重,这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加里宁:**然后就把这个渔民哄抬起来。

**莫洛托夫:**我要再说一遍的是,乌格拉诺夫同志的实际结论是,在这件事上可以多少扩大一些私有者的比重,条件是扩大市场上的鱼的数量,我看这是正确的。应该更多地揭示出我们的经济调节的具体错误和在这件事上偏向官僚主义集中制的过火行为,今后可以少重复这些错误。

但是,谁要是想从个别的错误和从具体的改正这些错误转向一种概括性的口号,要提出扩大私有者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那他就犯了不可宽恕的政治错误了,他在政治上就是走上了一条明显错误的道路了。党不可能不站起来反对类似的总结论(不是改正个别具体错误的结论),也不可能不警告这种类型的结论的危险。

但是应该回到我们对未来的粮食收购运动规定的决定上来。

我们大家都认为必须要排除在新的粮食收购运动中采用非常措施,而且同意要多少提高一些收购的价格。要保障我们所必需的粮食收购计划,这是不是足够了?不,是不够的,而且是特别不够的,因为我们应该想的,不仅是最近的一年,而且还有接下来的各个年份。所以必须要说说,哪怕是简短地说说那些基本的、不执行就不可能顺利进行粮食收购运动的实际措施。

对实际措施的问题我们还是关注得太少了。我们这里的一般性议论还是太多了,而对地方机关极其丰富的实践研究得完全不够,而在规定新的实际措施的时候,我们往往更多地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而且往往看不到实现自己任务的那些工具,而它们就在我们的身旁,我们对它们的意义估计不足,因此也就不能完全充分地把它们利用起来。

向全会提出的决议指出了解决粮食问题和消灭粮食战线上可能出现的困难的根本方面的3个基本任务。这3个基本任务是不可分割地和推行国家更快速的工业化联系在一起,这3个任务是:第一是要进一步提高个体的中小农民经济及其大规模的合作化;第二是要开展建设大型集体农庄的群众工作;第三是要发展现有的和组织新的国营农场,特别是粮食农场。有的时候有人说,最近我们忘记了个体农民经济。这是不对的。可能有些人在某些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言论里,专门针对个体农民经济的问题说的很少,但是要知道,问题并不在这里。我们对个体农民经济的关注一直是实际工作的中心,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几乎有十分之九的国家资金是用在了这方面的,是用在了促进个体经济发展上的。

而且党的十五大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一个战斗口号,那就是要开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但是有些人,甚至是党内知名的党员——比方说那位弗鲁姆金同志的信——总是很愿意抹杀和收起十五大的这个口号。弗鲁姆金同志甚至说到了要宣布一个新的口号:回到十四大上去!但是那些想要把我们向后拉,企图忽视党的极其重要的指令,特别是十五大的决定的同志的类似思想,当然是应该得到毁灭性的回击的。对那些现在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强调必须要支持个体农民经济的人,我们应该说的是:支持和发展个体中小农民经济的生产是今后一些年我们在农村的主要任务。这是对的。与此同时不该忘记的是,只有在大规模的农民合作化的帮助下,真正大规模地提高个体经济的任务才能实现。这样,提高农民群众的经济就是和真正的农民群众的真正合作化,也就是和全面开展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实现列宁的合作制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开展大型集体农庄的建设。没

有广泛地展开农民经济向大型的、建立在机器设备基础上的集体生产实际过渡的措施,就没有农业生产力得到真正强有力的提高的前景,对于实力不强的农民阶层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十五大在自己的决定中也说的是这个。与这一点相适应的,也有党关于开展国营农场网的决定。实际上,实现广泛展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现在已经被列为了党在农村中的最基本的和不可推延的任务。这就是说,这件事,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件事,不能仅仅是从最近一两年的情况来看待。比如,如果说对于最近的粮食收购运动来说,开展大型的粮食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还不可能具有重大意义的话,那么在最近几年的将来,在这件事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就肯定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了。

既然李可夫同志在这里引用了十五大《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中的一个地方并说出了一种意见,认为决议的这个地方有可能会为不正确的解释提供依据,那就也得说说这件事了。李可夫同志从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引用的是下面这句话:“在现在这个时期,把小型的个体农户联合起来并改造成大型集体的任务应该是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可以很容易地就表明,这段引语和《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联系起来,完全正确地表达了十五大决定在农村问题上的主要思想。

首先应该考虑到的是,在代表大会的决议里,被引用的这句话所在那一章最开始说的是:“社会主义的城市只有通过这样的道路才能带领农村跟着自己走(也就是说,从决议的前一句话可以看出,是通过提高农村的生产力的道路。——莫洛托夫),想方设法在这样做的时候,促进从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将是整个农业基础的个体所有的经济向它的集体形式过渡”。这样,在李可夫同志引用的那句话的前面,就直接指出了**个体的农民经济“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将是整个农业的基础”**(加重号是我加的。——莫洛托夫)。看来是清楚的,十五大准确地和正确地提到了个体经济的意义,也提到了农村中的集体农庄建设的意义。十五大指出了建设大型集体农庄的任务应该是党的各项基本任务中的一个。

**李可夫:**基本任务!

**莫洛托夫:**是的,是基本任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是唯一的任务。而且在这之前还清楚地说了关于农村中的个体经济的作用。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的误解是不该有的。

接下来更详细地说说具体的措施,它们应该对于完成今年的粮食收购计划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这样的措施中,摆在首位的当然应该是向农村发去工业品。关于这项措

施的重要性,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展开谈了。粮食收购机构对运动的应有准备也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也不需要特别的解释了。

我要说说的是其他措施。

国家每年都要以货币贷款和实物贷款的形式给农村大量的资金。我们为此得到的是什么呢?只有钱。现在这当然是太少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来安排事情,让发往农村的机器、肥料、贷款等等能够伴随着为我们的工业,为我们的工人从农村得到原料和粮食呢?为什么就做不到这一点呢?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会为着自己的剥削利益,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资本主义方法,对农民经济施加广泛的影响呢?我们的国家为提高农民的经济,对劳动农民给了巨大的帮助,为这个事业付出巨大的国家资金,为什么它却不能在农村很广泛地推广自己的措施呢?要知道,这些措施完全是迎合了劳动农民利益的,而且是能够更好地保护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在这方面,主要的事当然应该是由农村的合作社来做的。而它(合作社)在这里还远没有能把自己的所有条件都利用起来。如果是能把合作社的工作和农产品的预约合同的广泛措施联系起来,而且是用各种不同的、灵活的形式来推广这种预约合同,结合着向农村发送机器、化肥和种子,采用预约合同的做法时又相应地保持慎重和渐进的态度的话,那就可以不用怀疑了,进行粮食收购就将由于有了这些措施而变得轻松多了。联系到这一点,合作社应该肩负着巨大的新任务,它才刚刚开始着手实行这些任务,而我们的国家组织和党的组织对完成这些任务所给予的帮助还实在是少得可怜。

现在说说调节市场的问题。

今年在调节市场这件事上,我们犯了一系列大的错误,而且我感觉,得到的教训不应该是白白地就这样过去了。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在经济调节的实践中要克服官僚主义的成分。其中包括应该加强反对这样对市场施加影响的方法,像是会导致我们的经济工作的官僚主义集中化的方法,没有足够考虑到合作社工作的特殊作用和性质的方法,等等。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削弱无产阶级国家在市场上,包括在粮食市场上,加强调节作用的总路线。联系到这一点,应该强调的是,今后也必须要系统地 and 粮食市场上的投机作斗争。

粮食收购运动在农村具有特别巨大的政治意义,我们不能不联系到党要开展对富农进攻的方针来看待这场运动。党坚决停止了采用和粮食上的非常困难有联系的非常措施。但是在自己的整个农村工作中,党现在是从开展对富农进攻的任务出发的,而且这个路线应该在与粮食收购有联系的全部工作中有所

反映。

我们现在不能提出剥夺富农的口号,这是完全正确的。这在1918年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应该破坏掉的是富农在农村中的根基。现在,一方面虽然富农成分在最近几年里有某些增长,但是我们的阵地比1918年的时候要强得不能相比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在自己面前提出立即消灭富农这样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所以在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要胜利的方针,也就是消灭阶级的方针的同时,对于现在这个时期,我们提出的任务是开展越来越多地限制富农成分增长的措施和越来越大地从政治上孤立农村中的富农。与这一点相联系的是,要加强党在组织贫农方面的工作。最近几个月,我们向富农进攻的方法上的缺点是,在许多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在采取对付富农的严厉措施的同时,没有进行组织贫农成分的工作作为后盾。只有贫农可能是党在农村里的支柱,但在组织贫农这件事上,我们暂时做的非常少。最近,我们应该在所有地区的粮食收购运动中,在我们的农村工作中,全面地着手真正做好对贫农的组织和对他们的工作。

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指出,我们对富农的进攻不应该触及中农。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中农都将是现在就满足于我们规定的、提高了的粮食价格。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今年进行的提高农业税也会局部涉及中农,中农阶层将会对此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满。但是无疑的是,我们的任务是,要防止发生会给中农群众加上力不从心的重负,而且同时我们应该争取的确不要让直接针对富农分子的那些措施落在了中农的头上。

所有这些都要求在我们的农村工作中削减采用狭窄的行政手段的规模,要靠的是最大限度地 在农民群众中开展社会政治工作。

把贫农组织起来,再加上加强在农民群众中的整个社会政治工作,这应该能够保障我们加强中农和贫农以及工人反对富农分子以及总的反对国内资产阶级的同盟。虽然联系到最近的这些次粮食收购,在地方党组织进行的社会政治工作中有许多缺点,但是我们在一些地区还是有成绩的。我们在西伯利亚、乌拉尔、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工作的同志,对于这一点是可以说出许多重要的情况的。当然,在最近几个月里,我们对年初通过加强在农村里的社会政治工作所取得的成绩遭到了相当大的破坏,也就是说,在最近的几个月里,触动了一部分中农的所谓粮食“保险储备”,同时,还在一些地区,对这部分中农采用了非常措施。但是在今天粮食收购比较良好的条件下,农村社会政治工作的作用应该无论如何也要有很大的提高。我们在农村有的不仅是苏维埃和合作社,而且还

有几千个党支部,还有更多数量的团支部,相当数量的农妇代表会议,最后还有支援组织的工作。我们应该在它们的帮助下,在这次粮食收购的运动中,坚决地把我们的社会政治工作推向前进。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我想再一次强调一下,现在工会在农村中可以而且应该起到重大的作用。在十五大上,联系到开展农村中新形式的支援活动,已经说到了这一点。在最近这段时间,工会好像已经开始着手完成这项任务了。但是在这方面所做还是这样少,甚至可以毫不动摇地说,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可以立即在农村开展工作,规模可以比现在我们所做的大上十倍。无可怀疑的是,对于改善我们在农村的工作来说,工会的这项工作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对农村援助的形式来做,可以具有巨大的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反映到粮食收购进程上。工人的工会组织的作用应该在最近就在农村有很大的提高,而且这会以最好的形式产生影响,改善我们在农民群众中的社会政治工作的方法,加强对富农的进攻,加强党在贫农阶层中的支柱,加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

还要说一点。我们面临的状况是,从思想上击退任何活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企图的任务变得更加尖锐了。今年我们这里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聚集在财政人民委员部的行情研究所里的某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企图在这个研究所的刊物上,公开地集体发表自己特殊的、明显是资产阶级的纲领。大家知道,中央在这之后改组了整个行情研究所。恰好应该指出的是,《经济生活》完全正确地理解了自己对党的政治责任,十分有力地反对了在我们的刊物上公开为资产阶级观点辩护的企图。<sup>194</sup>

从所有这一切应该得出的看法是,我们在坚决取消非常措施和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的同时,应该在一些方面开展更强有力的工作。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到以下的措施:想方设法提高农民经济,在实际上实现真正的农民的真正合作化这项任务;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特别是支持新的粮食国营农场;最大限度地开展预约合同;把我们向农村供应农业机器、肥料和种子与我们得到所必需的农产品之间实际上联系在一起;向农村供应工业品;在加强组织贫农和雇农分子的工作的同时,开展对富农的进攻;在农民群众中想方设法加强社会政治工作,而且联系到这一点,要把苏维埃和合作社作为基本的而且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村群众组织,让它们真正活跃起来。所有这些措施可以而且应该保障我们不必采用非常措施就能进行新的一场粮食收购运动并且进一步加强工人阶级和贫农与中农的联盟。如果我们不采取或者延缓采取这些措施,在这方面做得很少的话,那我们就应该事先看到,这会导致重新采用非常措施的危险。我们应该避

免这样做,而且我们可以在紧张地进行整个实现党所提出的各项实际任务的工作的同时,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从今天的整个局势看,特别重要的是,要完全搞清楚政治路线,必须要真正坚定地坚持各项原则。特别是联系到今天的经济困难发生的原因,就不得不说到这一点了。

不能不看到的是,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把今天的困难完全或者主要解释成是我们计划工作的缺点、失算等等,这是一个不该犯的错误。虽然说,完全有必要看到,在我们的国家计划调节工作中的失算和错误是危险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些现象的阶级背景,就像我们看待粮食收购中的困难一样。

作为对这件事,对解释我们的困难这件事的错误态度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举出我们在这里听到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所说的话。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在这里可以说是大体上描绘出了这样一幅“匀称”的图画:他说,如果我们对待我们的经济生活就像对待工业加上农业的“经济联合公司”一样的话,如果我们给这个经济联合公司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对应关系加上“和谐性”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将不会有很大的困难了,就将不会有经济危机了。但是这幅图画是画给孩子们看的。它在纸上可能很好看,但是它不符合生活。在这幅画里没有主要的东西,没有阶级,没有阶级矛盾,而不理解它们是不可能搞明白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我们的经济发展现在不可能没有一定的矛盾,而相应的也就不可能没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们还没有转入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国家大多数的居民是由小所有者——农民阶级构成的,在有这样的事实的情况下,我们还不可能转入这种经济。在这件事上,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显然是触犯了马克思主义,忘记了现在的困难的阶级背景。

不能不看到现在的困难基本上是和实行国家工业化的快速方针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方针是党推行的,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说是必须的,它是从我们的整个国内和国际局势中产生的。

在执行工业化方针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冒进,我们不应该采用我们的力量达不到的速度,这是无可争议的。在个别的时刻,对于个别的部门或者对于个别的地区来说,我们应该对我们规定的速度做出改变,这也是无可争议的。但是问题不在于细节上。问题在于,基本上党所采用的国家工业化方针是这样的一个方针,在国内反对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在对外部的帝国主义世界胜利地捍卫我们的社会主义阵地中,只有这样的方针才能保障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加强



自己的阵地。如果在这个基本方针上允许动摇或者后退,那就意味着是要犯致命的错误。同时,过去的年份也表明,在党采取的工业化方针的基础上,苏联正在不断地加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而且工人阶级虽然不时有些间断,但也是越来越多地在加强和农民基本群众的联盟。所以我们应该不断地继续沿着党规定的道路前进。这也是党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肯定下来的道路,在这些决定中,和原来的任务一起,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任务,其中也包括了针对农村的任务。

一些同志的错误就在于忘记了现在困难的阶级背景,联系到他们犯下的错误,现在不得不特别说到这方面的情况。对于我们大家都清楚的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富农在农村生活中的作用。现在,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了最初的几年之后,当农村里的资本主义分子多少有些强壮起来了的时候,不妨特别要记住这一点。最近这些年,党的决定里对这一点说得够多了。联系到粮食收购,已经足够说到了富农分子在这方面起了什么样明显的作用了。

另一方面也还会遇到这样的议论:就今天的困难而言,也不能把一切都算在富农的头上!既然他们是想用这一点来指出,必须特别考虑到我们自己的错误在经济困难中的作用,在我们工作中的那些失算对这些困难变得更加尖锐所产生的影响,不能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一些同志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一种好像是完全合法的、符合党性的自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大家都不可能不记得,就在不久前,党为反对反对派对富农的恐惧,进行过一场斗争。这些同志自然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现在得到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在解释今天出现困难的原因的时候,当我们强调阶级成分的时候,特别是说到富农在今天农村的条件下的作用加强了的时候,是不是步原来的反对派的后尘呢?但是,如果说这样提出问题多少有着一些合法的“党性的自尊心”,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还是不能不指出:当一些同志在与党一起反对反对派对富农增长的恐惧的时候,没有足够地考虑到另外的危险——忘记最近几年发生的农村资本主义分子有所加强的情况,这里可能触及了这些个别同志的党性的自尊心。党没有忘记这第二种危险,所以在这件事上,在它的面前也不可能存在关于“党性的自尊心”的问题。党在自己的所有决定中,其中也包括在和反对派集团进行最激烈的斗争时,都是始终不变地指出两方面的危险的。党一直是而且将来也还是要既反对低估阶级成分包括富农成分在经济困难中的作用,也反对低估我们的错误在这些困难变得更尖锐时所起的作用。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情绪,它们要么是曾经,要么是现在,总把党的路线和根本与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路线混为一谈,布尔什维克应该

坚决反对这样的情绪。布尔什维克应该坚决反对在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问题上对阶级成分估计不足的路线。由于和“联合”反对派进行的斗争,某些同志可能会产生某种与反对派相反的片面性,因此我们也就只能是更坚决地反对各种不同的对党的路线的歪曲了。

这就是说,在这件事上,我们也是应该避免两种错误、两种对党的路线的歪曲。

**第一个错误:反对派的错误。**它是什么呢?反对派还在1925年就说了,在我们的经济困难上,富农是有过错的,但同时又添上了一句:**富农正在战胜我们!**这就是富农在最近两三年里的路线。这个路线导致反对派得出了和中农建立牢固联盟的政策不能相容的结论。它反映出来的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信任。这条路线明显反映了对最近几年正在发生的富农增长的恐惧。而我们的工人很了解,不是富农在战胜我们,而是我们在打击他们和越来越顺利地准备着他们的最终死亡。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在增长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一点得出的是,反对派的路线从根本上一直就是虚假的,根本就是党所不能接受的。

我们也应该避免**另一类错误**。这第二个错误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以下的结论:因为我们取得了胜利,也因为我们在越来越多地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阵地,那么我们好像就可以不注意富农成分的增长,可以“忘记”阶级成分,特别是富农在我们的经济困难中所起的作用了。党在自己所有的关于农村的决定中总是,而且在最近的几年里特别是一直在警告说,不要走上这条不可靠的路线,谁想遵循这条路线都可以,反正列宁主义者不行,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行。这条路线不外是要把无产阶级的阶级阵地、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拱手交出,去迎合非无产阶级成分的幻想,是对小资产阶级对这些阵地施加压力做出原则上不能允许的让步。这虽是采用了另外一种形式,但是反映出来的,还是不相信无产阶级能够完成自己根本的阶级任务,不相信工人阶级能在我国取得社会主义胜利。这条路线在实际上会导致对农村的资本主义上层要把价格哄抬到“恢复性”价格等等掠夺性的要求做出不能允许的让步,是在推动我们**直接向富农的施舍投降**。

所以,在如何评价富农作用的问题上,必须要避免两种错误。只有在我们的党的路线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这一点。

党考虑到了我们在国家计划调节工作中犯的那些错误和失算在今天的困难中所起的一定作用。但是把现在的困难都归结为计划中的这些失算和错误就意味着忘记了今天的困难的阶级基础,意味着忘记了,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

说,对巨大的经济现象必须要做出社会经济的解释。在记住计划机关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的同时,在事情涉及问题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地方,不能夸大国家计委的作用。托洛茨基主义在当年就夸大了计划和国家计委本身的作用,忘记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所要取决的基本条件(经济、阶级)。从理论的角度说,这种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是理想主义性质的错误。这种理想主义的错误我们不能犯,因为它会导致背离马克思主义。

如果我们开始抹杀我们的错误,如果我们开始甚至对我们自己掩盖我们在国家工作中的闪失对评价某些经济困难的作用,那是非常不好的。但是在解释巨大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如果忘记了客观条件(经济,阶级)——那就意味着忘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的理论责任。[有人说:可是米高扬怎么在上一次的中央全会上说,三分之二是取决于我们的呢?这是对的,我想,三分之一是取决于我们的。

有人喊:对。

莫洛托夫: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应该考虑到,这不仅仅是取决于国家计委,而是取决于中央,取决于党。当然,如果去年及时对中农做出了让步的话,甚至如果是没有犯价格(农业价格和工业价格)上的那些错误的话,也就是在粮食价格和其他价格之间的那些错误,如果是机构工作得更好一些的话,那么,当然我们会避免现在的困难,但是那时我们应该考虑到的,首先是国家计委没有考虑到而党是考虑到了的那种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的,我们应该考虑到,哪里可能有错误,在哪里这些错误的的确是取决于我们的,改正它们取决于我们的觉悟,取决于我们对事情做出的政治评价。]

正像列宁说过的,我们的出发点是,工农联盟遭到破坏并不是我们的制度不可避免地奠定下的。相反,最近这些年的经验说明了,我们是能够巩固而且实际上也是在巩固这个联盟的。这并不排除在工农联盟内部会有一些的暂时矛盾。不能不明白的还有,我们的经济计划中的错误不可能不把工农联盟内部的关系搞复杂。所以顺便说一下,我们必须特别要注意改善计划和调节机关的工作。但是任何计划机关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准确地考虑到,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些计划机关调节的经济发展的结果,会形成怎样的阶级关系,现在还有的“阶级平衡”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一种形式,而这也就意味着,阶级斗争的各个成分将会变成什么样的形式。本来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计划机关,能够把一件事涉及阶级内容的方方面面都准确地考虑到。只要有阶级——而存在着小所有者农民群众这个事实就相当有分量地向我们提示了这一点! ——

就会依然有一定的阶级矛盾,它们的作用并不是总能准确地事先考虑到的,不仅计划机关是这样,就是政治领导机关也是这样。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有着非常多的政治经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说它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也是一句空话。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正确地考虑阶级关系才有可能,那就是当它们已经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客观经济的和政治的现象中反映出来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不能不看到客观成分(经济、阶级)在我们现在经历的这种困难中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又不能要求计划机关能够事先就准确预见到这些成分具体的作用,预见到它们在一定时期的年份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只要是还存在着阶级,如果是忘记这个基本的客观成分在现在这样的困难中的作用,那就意味着是“忘记”了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说的我们的责任,这是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

但是不得不引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甚至我们的中央机关也犯过这种类型的错误。《真理报》很情愿地给克里茨曼同志的文章做了注释,而这篇文章是有某种片面性的。但是遗憾的是,《真理报》没有给阿斯特罗夫同志的一篇文章写注。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论当前时局》。<sup>195</sup>我的感觉是,这篇文章至少值得写上几个限制条件,要是做得更好些,就是根本改正这篇文章犯的 error。虽然在《论当前时局》这篇文章之后,阿斯特罗夫同志应该是在第二天发表题为《在两条战线上》的文章<sup>196</sup>,把他的第一篇文章中的某些片面性改正过来的,但是这种改正是不够的。阿斯特罗夫同志的文章《在两条战线上》改正了《论当前时局》一文中片面说到非常措施和支持个体农民经济的那一部分。作者在这件事上考虑了斯大林同志在对自己的文章《列宁和中农问题》<sup>197</sup>所做的注,而斯大林同志的文章恰恰是登在了也出现了阿斯特罗夫同志的文章《在两条战线上》的那一期上。但是阿斯特罗夫同志没有改正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他说到今天的经济困难的原因的那部分。在这方面,《论当前时局》一文的作者至少如果不是完全,那也是主要把事情归结为计划工作中的失算和错误了。在上面说过的情况之后就清楚了,阿斯特罗夫同志在这里犯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可惜的是《真理报》没有改正阿斯特罗夫同志的这个错误。

**斯捷茨基:**这和反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有何相干?

**莫洛托夫:**斯捷茨基同志,让我把话说完,在这次会议上指出党不能熟视无睹的那些个别错误。斯捷茨基同志,您应该想想您关于卡巴拉达的那个虚假的腔调和“掌声”该有多么不自在。至于阿斯特罗夫同志,虽然他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工作人员和好同志,但是对他的错误是不能就这样放过的,特别是当这些错误是在我们的中央机关里犯下的时候。同样我们也有义务把事实就称做事实,就

像我们应该把错误就称做错误一样。阿斯特罗夫同志如果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他会做得更好的。

**斯捷茨基:**干什么要用反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甩来甩去呢。

**莫洛托夫:**没有什么人在这里甩什么,但是虽然你在这件事上不满意,错误还是不得不称做错误。《真理报》也登了我在莫斯科市委全会上的讲话<sup>198</sup>,我在那个发言里对上面指出的阿斯特罗夫同志文章中的那些地方坚决地进行了争论,虽然由于不愿意把事情搞得尖锐起来,我不得不放弃了说出文章的题目和作者的姓名。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对于党的中央机关报来说,印发对重大的政治事实有对立评价的文章是很尴尬的。结果是《真理报》让自己的读者来选择对经济困难原因的解释:按照阿斯特罗夫同志的文章来解释或者是按照莫洛托夫的发言来解释。而且问题是有着严肃的政治意义的。所以,更好得多的做法本该是更坚决和更迅速地改正阿斯特罗夫同志所犯的错误。阿斯特罗夫同志写了不少非常好的文章,但是绕过他犯下的错误是不对的,因为这些错误有可能会通过党的中央机关报得到传播。且不说其他的一切了,这将对阿斯特罗夫同志也是有好处的,虽然斯捷茨基同志对这一点是如此不同情。

**斯捷茨基:**我只是反对平白无故地拿反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甩来甩去。

**莫洛托夫:**所以我们是不能容许有什么原则性的让步、路线上的让步和理论上的让步的。在事情涉及维护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地方,应该是特别坚定的。要考虑的是,现在理论问题正在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我们大家都不得不比近些年来更多地研究这些问题。

我们在中小农民上的实际让步应该和对错误的政治路线的不让步联系在一起。托洛茨基主义就不用说了,就是对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路线,也该这样说。在这次全会上,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托洛茨基主义路线的代表,但是更需要的是对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错误路线给予回击,这条路线虽然是从另一端来的,但是也是脱离党的道路的。我们的路线是反对反对派,争取和中农的联盟。没有和中农的联盟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路线也是反对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路线的,他的路线可以归结为对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的意义估计不足。我们应该记得,除了一个保障了工人阶级领导的联盟外,是没有另外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可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的。所以掌权的无产阶级在对自己的同盟者中农做出他力所能及的让步的时候,是不可能做出农村中的资本主义上层——富农要求他做出的那样的让步的,否则无产阶级就保持不了自

已对农民的领导作用了。

在结束的时候,我要引用列宁说过的一段话,这段话强调了在和农民结成联盟的问题上的这个方面。列宁说:“……和农民的联盟。当我们说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理解是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sup>①</sup>这就是列宁对与中农的联盟所说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结合就是这样的——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结合。党是在这面旗帜下走过来的并将继续走下去,克服了和将来也要战无不胜地克服在它的道路上遇到的所有障碍和困难。

主席:休息到6点。

---

<sup>①</sup> 原文未注明出处。——译者注

## 第十二次会议

7月10日晚间

主席(李可夫):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发言,下一位是托姆斯基同志。

克鲁普斯卡娅:我只想说几点意见。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在我们这里,任何一个政治问题都会上升到组织问题,反之也是一样。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的恰恰是组织问题,关于粮食收购的问题,上升到了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升到了在我们这里应该是还会出现多次的问题,每一次当我们这里形成新的局面的时候就都要提出来的问题。这是从我们的国家——一个在资产阶级的包围中的农民国家和正在走着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国家派生出来的问题。在十五大上,这个问题就完全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在十四大上讨论的是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各个阶层的关系问题,所有坐在这个大厅里的人都费了许多口舌,说到了结合的必要性,说到了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没有对立的利益,说了,重复了,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语录,他说过,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大家一起走下去,面向整个农民,可能前进得要慢得多,但是一定是大家一起前进。关于这一点说得够多了,无需再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了。如果我们看看十四大和十五大之间的这段时间,那就需要说,在这段时间里向前迈进了很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当你们自己在夸自己的时候,这没有多大意思,而当老乡们在夸你们的时候,当农民在夸你们,工人在夸你们,说道:是的,这比旧制度好的时候——这就是成就了。

在庆祝十月革命的日子里,我们进行了总结,看到了贫农和中农在说:“是的,我们赞成苏维埃政权。”这就是在苏维埃制度自身中出现的那种结合,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结合,它在十月革命的那些日子里表现得特别鲜明,而且可能是由于有对苏维埃政权和党表示满意的广大群众的压力,我们的整个党内问题解决得比可以期待的更要顺利得多。

但是接下来。能不能说需要“回到十四大上去”呢?当然不能。如果可以

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说我们是沿着党为我们勾画的艰难道路前进的话,那么到了十五大的时候,这条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拓宽了,于是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能够已经是用另外的速度,更快的速度,走向我们一分钟也没有放弃过的那个目标了,也已经可以依靠这个更广泛的基础,依靠群众的信任,更深刻地提出计划工作的各种问题,已经可以更扎实地提出农业的合作化的问题、集体化的问题了。我感觉,争论小型经济是已经耗尽了还是没有耗尽是一件徒劳的事。这里是不能用平均数字来说话的。我们非常经常地说到平均数字,对非常不同的地区用同样的尺度去衡量。譬如说,如果我们拿出北高加索和中部黑土州来,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州,有着不同的性质。譬如说我们拿来中部黑土州,那我们就应该说,在那里,虽然有大量的农业移民,虽然土地有了极大的消耗,虽然分得的土地很少,虽然农民拿到了地主的土地,虽然说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那里的情况是,对集体主义的经营方式,对公社的自发追求越来越强烈。当然,这种追求不是到处都有的,也不都是同样的。在库尔斯克省的一个村子里,就并排存在着这样的情况,照一个农妇的话说。连“公社”这个字眼都不让说出来,可是旁边就在建立公社,它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永远结束“只有一根稻草的”所有制。而且这是在许多地区都存在的情况。到了十五大的时候,已经感觉得到来自下面的、越来越强烈的对集体主义的经营形式的追求。可以见到的,不仅是我们对大经济必要性的理解,也不仅是我们有宣传这种大型经济的愿望,而且在群众中间,在某些地区,也已经开始更加自觉地对待这个问题了。当然,不能说这是一种群众性的现象,到处都有的现象,但是集体化运动的萌芽已经处处可见了。如果我们看看我们最近是怎样宣传大型经济,宣传我们在十五大上提出的任务的,那么,我感觉就需要说,我们对这种宣传进行得不够有力。我不去说那些经济上的措施了,它们当然是基本的,但是在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鼓动上,在应该做的指导、帮助方面,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够,已经开始的事情应该继续做下去。

就拿另外一个问题来说吧,就说关于工人阶级和各个阶层的农民的关系问题。不能认为5年以前的东西,那个时候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那种关系依然没有改变。它们甚至在十四大的时候就改变了。要知道,该说的问题不仅是阶级斗争了,而且还有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对农民的影响问题。正在发生的是对各个阶层农民的改造,是对贫农的组织,是提高中农的觉悟。如果我们把十四大和十五大的时候的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状况做一个比较的话,那我们就看到有一定的变化,比如说,工人阶级的组成就有变化。工人阶级变得更



多一些农民的特点了,农民的骨干融入在那里去了。这是什么——是好还是不好呢?这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这要取决于我们怎样利用这一点。在什么方面是好的呢?好在通过这些途径,通过和农村的联系,工人阶级对农民的影响增强了。不好的是经过锻炼的工人阶级骨干有些削弱了,融合到了农民的构成中间。所有这些应该是会影响到我们斗争的方法和性质的。所有这些我们都应该考虑到。这也关系到和富农的斗争。我总是对和富农的斗争持这样的观点,即需要尽可能有力地进行这个斗争,而且也不止一次地在这方面发表了讲话。但是斗争就是斗争。有我们要限制富农的剥削意图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中农和贫农是和我们在一起的;当我们不给富农选举权的时候,在某个运动中限制富农表现出自己的剥削者的压力的时候,当我们在供应中给贫农和中农优惠的时候,那时,农民群众,中农和贫农,是和我们在一起的,但是如果我们这样来组织和富农的斗争,仅仅是让富农经济破产,而且还触动到中农和贫农经济的话,那我们在阶级斗争中就只是打乱计划了。

所以我觉得,在说到现在的时局,说到采用的非常措施的时候,我们应该说,我们对剥削者和好的当家人之间的界限划分得不够清楚,于是乎我们打乱了计划。我们并不是总能发现这一点。瓦雷基斯同志对与富农的斗争谈得很起劲。他想,在他工作的萨拉托夫省进行的只有和富农的斗争,而那里的情况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我知道,正像那里常有的,从相当客观的信里,工人们信里,有的时候是一带而过地,在小孩子的调侃中,可以得出一幅非常生动的画面,看到实际上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小孩子是不做评价的,而只是给出一幅图像来。在萨拉托夫省,那场指向富农的斗争也触及了贫农。小孩子是这样描写的:谁有钱就向他要钱,那个人就付钱;如果没有钱,就拿他的“牛犊”和“羊羔”,而且还描写出一种场景,怎样在村苏维埃里把羊放在桌子上,大家都站着哈哈大笑,而贫农,羊的主人,在哭,农妇也在哭。这好像并不是非常像是在打击富农。我不想做概括,我不想说这是萨拉托夫省的一般情况,但是我们这里有过火行为和施加压力的情况,这是没有疑问的。还在1926年的时候,我们进行了争取革命法制的斗争,它还没有融入我们的血肉里,而现在,当我们提出施加压力的口号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过火行动将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一匹马,听到了吹号的声音就要开始用一定的步子跳起舞来,号召施加压力就会使得老的办法又起死回生。而另一方面,施加压力会感觉特别痛苦,这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农民已经不习惯压力了,当把夺走的羊放在桌子上和大笑的时候,他对这样的嘲弄的感受特别敏感。这会带来许多我们不愿看到的東西,会破坏关系。我不想说分离,我不想说工人

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被从根本上破坏了。这是夸大的说法,这是从车站上的闲谈中,从带着一定的略施压力的愿望进行的谈话和写的信里得出的老的印象。有一次我和一位女工谈话,她说:他们对待工人并不关注,他们这个没有干成,那个没有干成;于是我问她:你对我说这个是为了让我施加些压力还是怎么着?她笑了起来,说道:那干什么呀?有的时候在这里这种情况本来就是司空见惯的。不是像人们描绘的那样悲惨就是了。所以,当然不能说是关系从根子上被破坏了,至于说是有了些破坏,那还是有的。施加了一点压力,搞得过头了,压力太大了。而如果说是确定一下中央在这里的罪过占多大的比例,地方上又占多大比例,——我想,不必说这个了。这里的情况是清楚的。

既然莫洛托夫同志说了应该清楚地提出问题来,非常措施今后不会有了,我想,这是应该欢迎的,不是因为在困难的时刻不能采用贫农委员会的方法了,但是在可以不破坏的地方去破坏和农民的关系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划算的。莫洛托夫同志所说的我们将停止施加压力的这些话,好像是在让人想到本来是可以略微轻些施加压力的。当然,无论是用任何秤,也秤不出来轻了多少和在什么地方轻了些。现在问题并不在于要说谁有多大的责任,而整个问题在于,今后应该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党的十一大上以及在他以后所有的著作中说的那样,要谨慎:要十分谨慎地推行自己的路线。如果拿1922年和今年相比,那就应该说:国际局势依然和以前一样,我们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我国的经济水平依旧是低的,落后的,有了一点进展,但是没有到可以从根本上不再谨慎的程度,在这里,要非常缓慢地和非常谨慎地前进,但是一定要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的那样,和所有群众一起,和所有农民一起,这也是今天的局势所要求的。在这里,莫洛托夫同志和其他同志都部分地说到了,虽然不及需要做到的程度,他们说到了,在我们这里,采用鼓动的方法还不够普遍。而且鼓动的方法和说服的方法都是这样。一位来自北高加索的同志对我说,我没有考虑地方上在这方面正在进行的是多么大量的工作。我对这一点有些怀疑。就说1917年,四月代表会议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讲话中详细地说了该怎样对待关于战争的鼓动。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sup>199</sup>在出现了新的形势的时候,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每次都要讨论宣传形式和方法的问题,而这次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必须要明确提出的。在全会上的讨论本身就指出了,同志们是认为需要强调事情的各个方面的。而且在我们地方上的宣传和鼓动中,没有在困难的时候特别重要的那种条理性 and 明确性。在这里我同意奥新斯基同志说的,我们有的时候是在白白地挥霍钱。在需要30万卢布为农村里的阅览室小屋提供宣传材料的时候,

工农检察院和所有的财政人民委员部就都站起来说,不能给这些钱;而在说到要600万建设列宁图书馆新大楼的时候,这是欧洲都没有的大楼呀,我们就不能等到更合适的时间,而是说:“好吧,建吧。我们是有文化的人呀,是该做好这件事的。”照我的看法,在这里应该更多地计算一下,而且对宣传鼓动和文化工作不应该吝惜钱。说服的办法可能是复杂的,但是不能是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走,而是需要把所有的努力都放在一件事上,那就是不要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打进去楔子。我说这个当然不是说有什么人想要这样做,但是我们的方法应该是十分慎重的,老乡夸我们的是我们尊重农民,——应该是尽可能地保持这一点。那时我们就将能有大成就了。要知道问题并不只是在价格上。为什么常常不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呢?我们展开了广泛的宣传,说邻国有可能要进犯我们,非常尖锐地、带有鼓动性地提出了有可能发生战争的问题<sup>200</sup>,于是许多农民就竭力要把持一些储备以防战争,有的人是要防备自己的家人挨饿,有的人是希望能大捞一把。宣传问题,创造一定气氛的问题——这当然是应该想方设法强调的、非常实质性的问题之一。

主席:托姆斯基同志发言。

托姆斯基:我想谈谈围绕着对这个决议的讨论产生的几个特点。政治局的决议一致通过了,它的提法我们一致通过了,而且我们没有对它提出任何补充的修正。好像是这样的吧。

喊声:是这样的。

托姆斯基:所以,围绕决议进行的那些讨论特别有意思,特别让人感兴趣,应该谈谈这些讨论。非常有特点的是,这些讨论是在3个问题上进行的,这是些老的、我们熟悉的问题,正像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正确地说到的,是在我们的决议遇到困难的时刻每每都要展开的问题:关于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关于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方法问题,关于农村的阶级斗争问题。所有这些都是老问题,是在每一个困难的阶段上都会遇到的问题。也难怪,在这里,在这些外表上普通的、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问题上,当我们听着个别发言者的发言的时候,常常不得不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好像你是在上政治启蒙课,而且虽然这里分析的问题很简单,还是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把所有这些问题都要过一遍,为的是搞清楚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分歧。

在这里,第一是发现了好像对我们的时期有两种评价,而且无疑是对这种分歧有所夸大。那些对现在的时期做出了比较悲观的评价的人被称为另一方“制造恐慌的人”。第二方指责另一方估计不足。我想,只有当我们在上面学会了

同志式地进行辩论并同时不掩盖你想的是什么的时候,下面的自我批评才有可能开展。总的来说,扣上“制造恐慌的人”、“官僚主义者”、“局限性”的帽子是不合适的。我们在中央委员会里生活已经不是第一年了,我们的头上已经刮过不少的风暴了,用可怕的言辞彼此辱骂对我们来说是不体面的。这是第一点。

我们都同意一点:这个时期至少是严重的。我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在严重的时期,在重要的时期,我个人认为,只是保持一种冷漠的态度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善举。冷漠本身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像其他所有的善举一样。拿着一根棍子是冷漠的,但是由此谁也得不到什么有道理的东西,它也反映不出什么东西来;从来不动摇,从来没有任何反应,这是一根木头!制造恐慌的人通常有两种:一种人是没有道理地喊叫,另一种人就更危险了,他们表现积极,由于被吓坏了而忽左忽右地打来打去。这也是制造恐怖的人,他们想,他们进行的是富有朝气的活动,而实际上他们是在忽左忽右地打来打去,可能闯出的奇迹就是灾难,小心点吧!

我们在这里说到了结合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想,虽然有过争论,这里还是有一些模糊不清的东西,同志们,如果你们在开始的时候感得我好像是在政治启蒙学校里讲课的话,就不要把我搞糊涂了吧,我要提出的问题是这里已经提出过的。

第一个问题是,在现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内,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是保障社会主义的实际建设,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保持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保持和农民、中农的联盟——这是这个时期的基本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其他的问题都是围着这个转的,这个问题就像我们不止一次说到的,是所有问题的问题。当我们说到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结合的时候,当然就有权利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人阶级需要这种结合?而且我们对这一点的回答是非常简短的:因为在一个农民的国家里,在与我们敌对的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在一个农民的国家里,有的是在数百万和数千万的小生产者的海洋里的落后经济,工人阶级只有和农民群众手拉着手,带领他们跟着自己走,才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专政和保障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有不仅是靠工人阶级的双手,而且还要有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的双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正如你们可能记得的,这直接就是列宁的提法,我是靠记忆说出来的,但是它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这样,需要结合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说的,而是为了完全保障无产阶级专政和顺利地实际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首要的真理。但是可以怎样想象实现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这个结合呢?它是怎样实现的呢?这个结合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

下实现的,但这样说是不够的。说它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实现的是不够的。需要说的是,它是怎样实现的。这是什么——是工人阶级拉着中农的脖领“领导”他们吗?不是的,这个结合不是这样实现的。它是通过工人阶级对农民基本群众经常的、一定形式的让步实现的,一方面要考虑到他们作为小生产者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他们作为劳动者的利益。这不是我提出来的说法,而是某个另外的人说了这一点的。这好像就是列宁说过的。能够想象有另外的形式保障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联盟,没有工人阶级对这个中农的一系列让步吗?不,不能想象。我们可以试图这样来说:和农民基本群众的联盟是必须的,但是因为我们认为更有必要的是农业的集体化,所以给你们的指令就是——劳驾,加入合作社吧。这样是干不成的。所以虽然我们认为,与个体、分散的经济形式相比,集体形式是高得多的形式,是更直接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还是要对小生产者做出让步并且让这个庞大的集体化计划去适应他们的落后,既包括技术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落后。事实是第一位的。来自我们方面的这种让步是有的。

你们明天试试去说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技术作物,你们去试试指示图拉省的农民说:这一块地种亚麻,这一块地种其他作物,这样如何好。但是,同志们,不管这有多么美好,我们大家是在做出让步,是在让这个农民自己成为我们计划中的例外,按照他认为有利的样子经营自己的经济,是在鼓励他的追求,是在用另外的办法调节农民经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结合是这样实现的。好像是一切至今都是没有争议地在进行着的。但是它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工人阶级对农民基本群众的这种领导是什么呢?它表现为工人阶级通过它的政党领导苏维埃国家的整个政策;这种领导会分解成为一系列的枝杈,一系列的个别范畴。这个领导表现为对国际政策的总的领导,这种政策是通过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态度实现的,是在对待落后和弱小国家的政策中实现的,是在对待殖民地的政策等等中实现的;这种领导是通过我们的国际政策,通过对对外贸易的垄断等等实现的;它表现在我们的金融体系中;它表现在我们的经济领导中,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工业化的方针上;它表现在对经济的调节上,因为工人阶级不能,也没有权利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局势下调节它,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是不能想象这样领导一个庞大的经济的,我们是不能允许这样做的。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和计划整个国民经济。调节本身要分解成这种调节的一系列环节,物价是通过一些价格的提升和另一些价格的降低,通过及时的运进和商品的运作等等来调节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就是这样,

以这样的形式,通过它对国家的整个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领导来实现的。正如我们知道的,政治和经济是彼此不可分割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止一次地证明了,政治和经济实质上是同样的。当施略普尼柯夫说中央委员会应该负责政治,而工会应该负责经济的时候,列宁说:不能是另外的情况吗——你们去负责政治,而我们负责经济。没有经济的政治就是彻头彻尾的空谈了。

工人阶级是怎样通过自己的共产党实现对农民基本群众的领导呢?这种领导是在工人阶级对中农做出一系列让步的条件下,在一定要保持实现社会主义和实际上在我国建成它的条件下进行的,要通过把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指挥要冲——对对外贸易、我国的金融体系、国有化的工业等等的垄断,也就是对我们经常称做制高点的那些东西保持在自己手里并加以巩固。在这些方面我们是不能做出任何让步的。

中农是不是有可能会要求我们在这个路线上做出我们不可能做出的让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工人阶级和中农之间的危机就不可避免了。但是列宁对我们说,在我国的经济中,在我国的整个政治制度中,并没有不可避免地奠定了事先就一定决定了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和中农分离的基础。这就是下面所说的真实情况。

是这样的,在我们的经济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有了能够保证胜利建设社会主义所必要的要冲和制高点,如果我们出于对小所有者、对他们的利益的关注而做出了一系列可以允许的让步,如果我们保持了和保障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把它作为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的话,那么,实际上,建设社会主义就有了保障,保持我们的整个原则路线就有了保障。但是存在着阶级,各个阶级都有它自己的利益;各个阶级是要维护这些利益的,阶级斗争在不同的时期是按照不同的方式和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着的。富农和其他的资产阶级分子在进攻,在企图进攻工人阶级。这是斗争吗?是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削弱我们和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呢?不应该削弱,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削弱,在这里,我们是要战斗到致命的最后一刻的。

但是这场斗争应该怎样进行,我们的困难何在,危险何在呢?对于我们来说,国内的资本主义分子,其中包括富农,在两种条件下是危险的。第一个条件是:当他们以封锁、武装干涉等形式得到国际资产阶级、外部力量的支持的时候。第二个条件是:当他们带领着小生产者、中农的基本群众反对我们的时候。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分子,其中包括富农,能够带领农民基本群众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当我们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党从自己方面没有正

确地实现结合的时候,当我们破坏这种结合的时候,当工人阶级通过它的政党和苏维埃政权没有表现出足够正确的、足够关注的领导来保障这种结合的时候。我们来看看3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们和农民的冲突最大、最尖锐的阶段;第二种是比较缓和一些的情况,是在有不满情绪的时候;第三种随便你们怎么说,我同意所有的措辞,让我们把它称做和农民的关系有些紧张吧,这就是今天的情况。能不能这样称呼呢?第一种大的分离是喀琅施塔得式的分离。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由于工人阶级的领导在一个阶段上耽搁得太久了,对小生产者压制得太厉害了,把他们通向商品周转的路子全都堵死了,把他们的经济封锁了,把他们变得孤立了。我们做出了让步,认真和长久地转向了新经济政策,这是各种情况的要求。这是巨大的分离和巨大的让步。第二种是在1923年。在1923年的时候,莫洛托夫同志把事情描绘成是当时老乡对我们施加了一些压力,而我们对老乡做出了一点让步。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对谁施加了压力,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在1923年的时候,老乡们在乌克兰把装着小麦的车子拉来了,换到了靴子,而且并不是总能买到的,各种指数的对应关系就是这样的。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商业机构把商品运到农民那里的时候是加了300%的附加价的。你们回想一下那些美妙的图表吧,那里标出了火柴是怎样从莫斯科运到14个地方去的,在还没有运到目的地的时候,组织上的开销就增加了200%—300%。如果由于这样的领导老乡渐渐变得说什么也不干了的话,我们这方面除了通常的转向采用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商业机构正确的领导方法外,除了我们把商业机构中的多余环节取消了,把价格降低了,把指数更拉近了,还能有什么特别大的让步呢?

转过来看看现在的情况。今天的这个时刻是什么引起的呢?我认为,一致通过的政治局决议对所给出的东西做出了详尽的评述:它不仅说到了整个农业的落后,它还说到了粮食经济特别落后。它在客观条件中指出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分散、零散和总的水平低下,它指出了价格的不相适应是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它也指出了这一次危机的特点,那就是由于有一系列的原因,而且如果把这些原因揭示出来,那就是调节不正确,计划不正确,当然,在这一点上不能只怪罪米高扬同志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计划和调节的,而且说到底,从我们这方面说,把我们的错误都归到米高扬一个人身上是愚蠢的和不正确的。我们是大家一起在调节的。米高扬的政策不是和政治局的政策对立的。这样看来,这是我们的调节和计划的错误,而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这本身是党所代表的工人阶级的领导的错误。我们关注得不够,再早一些我们本就应该看看农业中是在干些什么了。我们在分析现在的这场危机时说:那你们说说,

为什么老乡们去年用这样的价格就把粮食运来了,而今年就不运来了呢?为什么?就是因为去年他们是运来了,而今年他们核算了一下,在这样的条件下,粮食经济对他们是不划算的,于是在一年时间里,他们调整了自己的经营,于是产生了不适应,就像莫洛托夫同志在分析这个决议时所解释的那样,只是用阶级斗争来解释是不行的;我想,他们给出的是自己对这个决议的解释。照他们的看法是这样的:农民强壮起来了,中农和小生产者的地位加强了,于是他们就开始更精力旺盛地、更顽强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了。我要给自己提一个问题:他们是在针对着谁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呢?是针对着富农?不是,他们不是针对着富农在维护自己的利益,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他们。是针对着工人阶级维护自己的利益吗?看来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农民强壮起来了,而这种强壮使得他们有可能转向更好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了,那么就让我们还事物的本来面目吧。转向更好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这就叫做进攻。进攻谁呢?进攻工人阶级。请问,工人阶级的阵地在这段时间里是不是加强了呢?如果它是加强了,那么富农和小生产者的地位对工人阶级的地位的优势又在哪里呢?如果它们是平行加强的,那么地位加强的就只是小生产者了,而不是工人阶级了。而这是绝对不正确的,这是对小生产者的地位的一种危险的理论。如果说它们加强了,那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是在生产的基础上还是仅仅在农村中的上层有些致富的基础上呢?如果它们是在生产的基础上加强了,那么我们写道农业的落后是不是对呢?我想,莫洛托夫同志的这个新理论是一个不正确的理论。我同意莫洛托夫说的,如果阶级力量的布局有可能使得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变得尖锐起来的话,使得工人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的关系尖锐起来,而这种尖锐化可能转化成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分离的话,那么,当中农在离开贫农,离开无产阶级并开始跟着富农跑的时候,我要看到的是由于什么原因发生了这种对工人阶级不利的阶级状况的变化。在这样的时候,这种变化是危险的。富农本身,如果没有中农,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可怕。他们对我们危险是因为,从农村的最深层说,他们是和中农,和这些最小的生产者群众息息相关的,而且在决定性的时刻,由于我们领导上的错误或者由于国际上的复杂情况,在农村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痛点上,他们将会成为的确能够带动这些农民基本群众的一种力量,当然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当有这样危险的时候,当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结合多少有一些危险的时候,这里蕴藏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威胁,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有义务看看,应该怎样和用什么样的方式重组阶级力量,走出这样的境地。我们应该不怕要用可怕的名字彼此称呼,应该是直接面对危险,——谩骂不



是证据。

当列宁和他的政党面前出现类似问题的时候,他是怎样下决心的呢?类似的策略问题可能有两种解决的方法。如果是我的阶级有危险,一个阶级可能反对我的阶级的专政的话,那我就应该要么打它的耳光,要么就是顺从,或者是我应该和它达成协议。中农是这样的一个阶级,是不能打耳光的。可能今天可以打它,但是如果只限于这样做的话,那么明天它就可能刺我们一下。所以列宁总是对中农让步的。这根本就不是缴出我们的制高点,这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对让步问题的提法。

现在来说说是什么样的让步吧。从我所说的那个理论出发,这就是正确的,但是从莫洛托夫同志所发展的那个理论出发,我怕这是不正确的。

**莫洛托夫:**但是我们是胜利的:在我们这里是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在不断增长。

**托姆斯基:**维亚切斯拉夫同志,你是知道的,我有些耳聋,你不会怀疑我听不见你的插话,我对这个插话没有法子回答。但是我认为,如果后来在速记记录里放上一个我没有听清的插话的回答是不大合适的。所以我请不要对我有什么插话。(笑声)

有人喊:可以提问题吗?

**托姆斯基:**在我讲完了的时候,提问题是可以的。如果主席特别给我发言的机会,那我就回答你提出的所有问题,无论它们有多少。

言归正传,从莫洛托夫同志在这里发展的那个理论可以得出的是,错误是危险的。为什么?我们来看看他的思路。他是这样说的:小生产者中农强壮起来了,有力量了,他们开始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了,那么就让我们让步吧。但是那时由于我们的让步,他们就更强壮了和能够开始更有力地进攻了。而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让步就是一个加强小生产者和他们无产阶级进攻的因素了。

我害怕这样的理论。我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有一系列深刻的经济因素,一系列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没有必要对它们保持沉默。没什么可说的,人们都是把责任推到某个人身上的,——我可以到任何一个非党的会议上承认,这是我们的错误,其中也包括我在内。我们是那些犯错误的人,工人阶级从来也不会对我们提出这样严格的要求,让我们成为罗马的神甫或者罗马的教母一样无可挑剔,需要做的,不过是诚实地承认它们,不然的话,接着这个来的,就会是再次犯这样的错误。所以当工人阶级发现自己的领导有错误的时候,

应该改正它们,就像列宁所做的那样,而且应该这样做,不是作为对进攻的阶级的让步,而是作为对它的领导不满的、自己的盟友的让步,因为这个领导过分厉害地触及了这个盟友的经济利益。

我不同意莫洛托夫提出的那个论断。他的那个论断是这样的:阶级斗争在继续,我们打击了富农而且还将继续打击,但是要做到不同时也打到中农身上。但是我是反对这个理论的,而且第二次声明说,如果我们将这样打击富农,顺便也会把中农捎带上的话,那就将是一个不好的联盟,因为富农到底是相对少的,而中农要多好几倍,可能挨打的中农要多得多。即便是在和富农打架,也不应该是这样挥动双臂,触及到中农。所以,总是在我们要么是用自己的领导或者是用自己的斗争触及到了中农的利益的时候,就会开始威胁到联盟的,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就有可能被破坏,而我们进行这种斗争的时候,总是有一种特点,总是会用胳膊肘碰上中农的牙齿。而这也就是领导的缺点了,因为我们是领导阶级,是我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在领导着和富农的斗争。这也就是说,是我们的领导有的时候触及到了中农,他们开始抗议了,于是就需要对他们让步,需要改正自己对农民的领导。

在实际上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要说到非常措施的问题。我欢迎斯大林同志的声明,它是绝对坚决的,绝对详尽的,说到了我们应该消除非常措施,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不再企求非常措施了。我要说得更多一些。我们对过去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非常措施是我们大家一起采用的,当然不是因为日子过得好,但是非常措施是绝对必要的。不过我在一些同志的发言里看到了一种危险的腔调:这些同志说,非常措施的确非常不好,但是也没有必要发誓不再采用它们了。干什么要把它们束之高阁呢?说是让我们再看看新的粮食收购将进行得如何吧,说是我们暂时还将不会放弃非常措施。

我回想起了安德烈耶夫同志的发言,大家的基本提法都可以归结到这个发言上。他说:中农是非常警觉的,也就是说,形象地说,我们和中农的关系是绷得很紧的,第二份非常措施他是不愿意接受的。

我想从另外的方面,从一个特殊的方面来看看,为什么在现在和最近的时刻,非常措施是危险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刻我们需要特别敏感地对待这样的发言。

我怕的是什么呢,同志们,而且我乐不得自己说错了,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犯错误是一件愉快的事。我怕的是,在我们这里,农民对我们不满的第一个浪潮几乎是在我们虽说是采用了非常措施,但收购到了粮食的地方——在北高加索

和乌克兰发生的。而现在,在我们这里将要开始不满的,是那些因为我们不供应而没有粮食的消费地区。

**米高扬:**早就开始了。

**托姆斯基:**就是在这些地方将要开始出现不满。而因为我们这里,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无产阶级都是从各个消费的省份而不是生产粮食的省份里招募来的,那么,这就将会在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的身上有所反映,而且可能是波浪形地反映出来。我想,如果我告诉你们说,在工人阶级的某些最落后的阶层身上,譬如说在烧砖工人、泥炭开采工人的身上,在建筑工人的身上,这种状况已经有反映的话,你们是不会对我生气的。就是我不说,你们也是知道这种情况的。我怕的是这些困难。

我完全同意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说的,和1920年相比,工人阶级的组成,对应关系和组成集团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在发生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时候,我们这里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在发生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时候,在我们的各个城市里留下的只有无产阶级的核心。由于饥荒的缘故,和农村有联系的工人都跑到农村去了。当时我们这里是这样的情况,最有专业水平的冶金工人们反映出来的是喀琅施塔得最先出现的情绪,你们很清楚地记得这种情况。到了1923年的时候,我们把工厂里的老工人召集了起来,工人们在一系列的罢工中反映出来的也是那个时候农村的情绪。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完全正确地说到了,我们有很好的、出类拔萃的无产阶级骨干,但是由于新来的一些年轻的、没有干过革命、没有为革命斗争过、没有上过前线的工人,他们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被冲淡了,这些年轻的工人不习惯把工厂看成是自己的战利品,屁股还是坐在农村的,我们暂时还没有能把他们调教过来,而且调教他们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工人阶级对农民的影响增强了,这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从这个观点看,无产阶级在农村的阵地是加强了。譬如说,在1920年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种地的和在森林里工作的工人的联盟,在1923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这个土地和森林工人联盟的萌芽。现在我们有的是一个弱小的土地和森林工人联盟——而且请安采洛维奇同志能原谅我,——但是这个联盟已经联合了50万雇工,而且在它的影响下,有了大体上300万的雇工群众。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如果无产阶级对农民的影响加强了,那么相互的影响,农民的某些情绪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的反应也加强了。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情况的话,那就是在重新审议了生产率标准和计件单价的标准之后,也还是没有能把我们在一系列工厂里留下的痕迹抹平,为推行降价我们做出了努力,并在起初得到了好的

结果,可是后来这些结果化为了乌有,我们现在有的指数只比去年低了1%。我在这里说的是预算的指数组合,它只降低了1%。工人的工资又有了提高,但是这将是靠提高名义工资,而不是靠降低指数。还要记得的是房租的增长。当然可以鼓起勇气来说,一切都是顺利的和良好的:工人阶级是没有动摇地属于苏维埃的,农民并没有背离了苏维埃政权。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企图重新采用非常措施,再略微把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搞得尖锐一些的话,那就不难预见到,这种做法会得到怎样的回答。而回答将是这样的:如果在两三个城市里采用票证的话,那么就不得不在所有的城市里都采用。当然,从哲学上可以说:票证,有了票证又怎么样!当然,如果是有了战争,票证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在那个时候让所有人都用了票证,而且那个时候大家都理解这个措施,认为这个措施是必须的。但是如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11个年头上,我们大家让人们使用票证,并且说我们这里的一切都是正常的,说我们这里的领导是正确的,说是富农把一切都搞糟了,——那这可就太不像话了!问题在于,画上怎样的一条线就能保障我们把富农从中农中孤立出来,保障我们和中农的联盟呢?应该为粮食而给农民添加最后的几个戈比,可是钱在哪里呢?当这里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谁也没有说出具体的数字来——这将是15戈比、20戈比还是30戈比。我想,应该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需要非常准确、细致和巧妙地进行调节的问题。在这里要知道,我们可能也会犯偏向另外方面的错误。如果在1928年,就像在这里嘲笑的那样,马要吃烤好的面包而没有燕麦的话,那么明年如果是计划不正确的话,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面包将不会有了,我们要不得不吃燕麦了。(笑声)关于价格的问题,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实际的方针。危险在何处:是让步太多了呢,还是让步不够,然后就要在压力下再第二次让步呢?这个应该投到这里或者那里去的、决定性的几个戈比到底在何处呢?我要坦诚地说,你们管我叫什么都可以,哪怕是投降分子也好,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错的是几个戈比的价格或者甚至是多了几个戈比的话,我们可以有上百种的办法来纠正,我们可以提高糖的价格或者煤油的价格,于是立刻就能把错误减少了,但是如果给的不够多,不能满足农民,然后不得不再加上几个戈比的话,那时他们就会说:可以再加些压力,还会再添的,让他们加到没法再增加的程度吧!这是非常严肃和危险的事情,而且这个问题是需要好好地 and 认真地加以核算的。

关于粮食的价格。我不同意一些同志对粮食价格的说法,其中包括莫洛托夫同志的说法。我想,米高扬同志不会起来争论,反对这一点的。如果我们承认

我们把太重的负担放在了自己的肩头上,我在这中间没有见到有什么不体面的。如果在莫斯科每一个耐普曼、每一个烤面包干的投机分子在早晨起来的时候有权利要求苏维埃政权按照廉价、按成本价给他们面包的话,那么同样地在苏联的每一个角落——在察列沃—科科沙伊斯克,在科泽列斯克,到处的人们都可以起来就要求商业人民委员部:给我们便宜的面包。不能略微减轻一些负担,不要让所有的都压在我们的肩上吗?而且这里已经说到这一点了,需要用一种什么方法给地方上的商品流通松松绑了。

**莫洛托夫:**对!

**托姆斯基:**对?我怕的是什么——我们大家都赞成新经济政策,但是从某些发言中总是略微可以闻到这样的一种味道:如果这是新经济政策但是没有耐普曼、没有富农、没有承租的人,那就好了。那这就是非常美妙的新经济政策了。(笑声)但是请允许我向你们说,这样就不是新经济政策了。如果你们问我,你主张什么样的新经济政策:是带承租者的、富农的和私有者的吗?我要说的是,我主张没有承租者,没有富农,没有私有者的新经济政策。但是要让这是一个为和农民基本群众结合服务的新经济政策,而且是要从而能保障无产阶级专政有一个不可动摇的支柱的新经济政策。但是因为这样的新经济政策天生下来没有,那么就不得不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拿来,同时不忘记他当年曾经说过:如果你们至今都是无产阶级的很好的组织者,善于带领它去参加极其伟大的阶级搏斗的话,如果你们善于组织工会、党,发表演说,呼唤起受压迫的人们对剥削者神圣的仇恨的话,——现在你们就要学会做买卖了。我怕的是我们忘记了这一点。这是第一。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给农民提高价格,忍受亏损,向所有的莫斯科小市民们、高官们和所有其他的人都供应粮食,把亏损都转移了,把亏损都由自己承担了的话,在我们的国家里将会有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这是一个绝对不正确的路线。

**米高扬:**怎样区分开呢?

**托姆斯基:**我要建议的是,如果我们增加的数额是如此之大,是这里谁也没有提出来过的,一普特加40戈比的话,那么这将总共只是一俄磅的粮食增加一个戈比。如果我们不是悲观地对待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在我们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的话,也就是说对品种低的粮食维持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但是对品种高的粮食给予相当多的加价的话,那么得到的就是如果谁爱白白的、柔软的面包的话,就付得贵一些,那时工人们就看到了在我们这里粮食的价格中有阶级政策的。(大厅里喧哗)

罗伊津曼：工人自己是喜欢白白的面包的。

卡冈诺维奇：那么工人就会说，资产阶级在吃白面包，而我就该吃黑面包。

罗伊津曼：那我们斗争是为了什么呢？

托姆斯基：好极了，我高兴的是你们现在张口了。你们这样说，工人自己喜欢吃白面包，于是问道他们是为什么而斗争的了，但是不要认为，当我们让他们转而吃黑面包，这就是理想，就是简单的事情。不要认为这是一种英雄壮举。不是因为生活好了才转向吃黑面包的。

有人喊：对。

托姆斯基：你们给他们贵一些的，但是，是白面包呀。

有人喊：不对。

托姆斯基：你们也是按照成本给他们的，而差价是靠工资补上的。我想象这件事是这样的——可能这些数字不符合实际上表现出来的，——但是我认为，对粮食的加价看上去要大体上有5 000万卢布的亏损。是不是这样呢？而且我把职员也算到这里面了，当然，这是大体上的数字。在这个数量上再加上工人的工资，我们可以提高粮食等等的价格。我可以在这里变一个说法，我可以给工业工人的下层多提高一些，我可以完全不给高级职员提什么，对于他们来说，每一俄磅面包提一个戈比对他们的预算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至少我在提高了面包的价格之后，就从耐普曼那里，从高级职员那里，从卖面包干的商人那里，从政委那里把它的成本要回来了。所以我反对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面包。

柯秀尔：你说了不应该骂街，而你在骂街了。

托姆斯基：不，我谁也没有骂，我是说：应该从政委们那里，其中也包括从我和你那里拿取。我并没有把你同我自己分开。

我还想谈一个问题。我想，当然，列宁在他给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信<sup>201</sup>里的论断是正确的，这个论断说，无论是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没有人看到过，在这样的震荡之后，重工业的恢复靠的是国内的资金，没有对外的借债。列宁的思想是这样的：外国资本家中谁也不会借债给我们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需要用自己的双手建设自己的经济。这是绝对正确的思想。我们不得不用农民的双手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恢复整个被破坏了工业，实现对一个落后国家的改造和工业化，而且我们已经是以相当快的速度做了许多。当然，这个建设的重担将压在所有劳动者的身上，压在工人阶级的身上，压在农民的身上。但是我不想建议从这里得出一个冒险的结论来，至少我认为，如果我们说中农和工人是在为恢复工业和实现工业的改造上贡的话，那么，这将是一个危险的表述。他们不过是在用自

己的双手,要克服非常大的困难,用非常大的花费,恢复和建设起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采用这样的方法都没有能恢复和建设过的那些东西。在这里是要求工人阶级做出牺牲的,这是完全对的。我们以前也要求过要做出这样的牺牲,我们在今后也将会要求做出这样的牺牲,而且丝毫不害怕这一点。只要说说今年的运动也就够了。其中甚至是负责经济管理的同志们也不可能说,在今年的第一个时期,我们工会工作人员没有号召工人做出牺牲。我说的是重新审议生产定额。这里对个别类型的工人来说,牺牲是极大的,非常大的。应该说,在最近这段时间里已经做到的事情中间,有许多并没有能很好地利用起来:自我批评采用得不正确,没有对经济管理干部等等进行培训,他们的队伍变得涣散了。这些我们当然是要纠正的,而且在今后,工人阶级的这些牺牲和自我约束也还是需要的。但是,主要将是靠什么来对这些做出补偿呢?什么将是我们的生产力进一步大步发展的源泉呢?如果我们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11个年头上说,这将要靠增加劳动的紧张程度,这就是不对的了。我要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应该说,要通过我们在合理化方面的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11个年头上,应该不光是说合理化了,而且要开始严肃地搞合理化了。要知道,我们是在出产新的机器,我们应该让这些机器工作起来。我们应该善于正确地组织生产,正确地组织劳动,该是着手做这件事了。我们应该,而且我完全支持最大限度地把所有无用的开支砍下来,要学会更简朴得多地生活,不能是在像俄罗斯这样寒酸地生活的时候却摆出美国那样的派头来。

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全会想要的是什么?我非常注意地听了这里进行的所有辩论,于是我想到,非常重要是要明白,这次全会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共同的心态是怎样的。

我想,我们大家都明白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不然的话,我们干什么要用3天时间在这里唠叨一个普通而且清楚的问题呢?

**斯克雷普尼克:**您就来解释清楚吧。

**托姆斯基:**问题就在于困难,如果说有细微差异的话,那么这些差异就在于对这个时期有多大的危险性和多么严重的评价上。至于说这是一个困难的、严重的时期,谁又会否定这一点呢?要否定这一点,那简直就是活见鬼了。这个时期是非常严重的和非常困难的。各种关系剑拔弩张。你们要考虑到,今年经济上的困难将再一次摆在我们的面前。石煤工业要推行6小时工作日,——这并不是这么容易做到的。在所有的其他工业方面我们大家应该是一起推行7小时工作日。负责经济管理的人员提出的是这样的规划:加上已经转到了7小时工

作日的企业,我们在今年应该达到转向7小时工作日的企业占总数的10%。我想,这样的效率并不符合我们曾郑重宣布的。我想这会给我们造成某些困难并且会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开支,我怕在我们宣传的影响下,这会变成自发地向7小时工作日过渡。困难是很大的,而且这一切需要非常昂贵的花销。我们大家都明白,只有在保持工人阶级和农民结合的条件下,才可能想象克服所有这些困难,我们也非常明白,在我们的力量非常团结和统一的情况下,对我们所面临的任務有统一认识的情况下,在整个党的意志和追求统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才肯舍出3天时间,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考虑这些问题。但是我想,这种统一本身,这种统一的必要性,它也就事先要求我们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按照不同的方式,从头到尾地,在忍耐的和同志式的气氛里,把我们之间所有的细微分歧都揭示出来,如果有的话,指出它们表现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在政治局里,在两天时间里已经谈妥了一个一致的协议的话,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说我们有什么重大的原则分歧的话,那是完全不严肃的。更何况从我们这方面说是应该表现出耐心来的,表现出对别人的思想的关注和忍耐来的,更何况是在我们这样的环境里,在一个最文明的党内环境里,最有水平的和最精粹的环境里,是应该做出同志式辩论的榜样、容忍的榜样来的。为了能够这样,每一次,在每一个困难的时刻,在党所面临的每一个严肃问题上,都有共同的愿望,应该同志式地把整个局势和我们党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搞清楚,不互相扣帽子,说什么“制造恐慌的人”、“右倾”、“倒向富农”等等可爱的修饰语。如果我们是像现在有的时候表现的那样行事的话,这就不好了;相反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党里,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内部,能够有耐心地和同志式地改正个别的错误,我甚至可以说是动摇,那它们对我们来说,恐怕就不会那么危险了,而且我们相反就能达到最大限度地友好工作了。上帝保佑,我不认为如果一个人活了60岁,40年来一直在从事政治活动,从来就没有犯过错误,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或者是从来就没有说过一句有条理的话,从来就没有张开过嘴。(笑声)所以说,我不认为这样从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是一个理想人物。我认为相反,当我们完全平静地,一点也不害怕什么人会说你有什么倾向,说出我们每一个人所想的東西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最高成就了。中央委员会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有义务说出我们所想的。我有义务说出自己的担心来。如果我们将采用另外的方法,如果我们满腹狐疑地寻找在什么地方有倾向,去抓挠人们最敏感的地方的话,那我们在自己的圈子里就将会有各种倾向的人,既有右的也有左的。这将是党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时,这将不能保障获得时局所需要的东西。时局是非



常严重的,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友好工作。

**波斯特舍夫:**这说的对!

**托姆斯基:**看看这里有过的所有争论吧。它是这样礼貌的腔调进行的,人们甚至不直呼其名。“有一个这样的同志说过,许多同志想”,然后就开始用礼貌的形式扣帽子。(笑声)我不欢迎这样的辩论。

**彼得罗夫斯基:**然后就开始一点点地把假名揭开了。

**托姆斯基:**我也应该同样开诚布公地说:莫洛托夫同志发言的末尾让我产生多少有些奇怪的印象。我搞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书记莫洛托夫同志对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不满意,要知道,《真理报》是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这个中央机关报的责任编辑是尼古拉·布哈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在我们中央的全会上,作为党的书记被选到这个位置上的。我们没有在政治局里讨论过关于《真理报》的路线问题。如果它是不正确的话,好像这是需要在政治局上加以讨论的,也可能我们也会达成一致的意见,就像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这个决议一样达成统一的意见。如果阿斯特罗夫同志或者另外的什么同志在《真理报》上写了什么和有什么东西没有完全说出来,难道这需要用不是通常的政治局的方法来改正吗?难道从这个错误中(这是不是错误还值得怀疑呢)需要提出这样大的问题来吗?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义务要在这个全会上做出这样的反应,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就像您所提出的问题那样:需要说出是我还是阿斯特罗夫说的对。我应该说,您在发言的过程中有几个措辞犯了错误,把这场危机的原因说错了,说是“更好地开始维护自己的利益”,等等。但是我是不能由此做出什么“大的”结论来,给您扣上一个倾向。上帝保佑,我们不止一次地“错”过,您错过,我也错过,是不是需要把阿斯特罗夫同志的错误问题搞得如此尖锐和这样提出问题:是我错了,还是阿斯特罗夫错了?

**斯大林:**也许是你搞得尖锐了?

**托姆斯基:**我并不怕变成为阿斯特罗夫说话,而且用这个吓唬不住我的。  
(笑声)

有人喊:斯大林同志并没有这样说,他说的是“你把这个搞尖锐了”。

**托姆斯基:**我跟你讲,不要插话。斯大林同志说:可能我把问题搞尖锐了。你们看见了吗,同志们,有政治局,我们在这里应该是解决在另外一种讨论的体制下有可能会变的尖锐的问题的,是有这种情况的。

**莫洛托夫:**还有中央全会。

**托姆斯基:**可能其他的政治局委员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不知道这一点,

没有参加讨论过关于阿斯特罗夫的问题。但是对维亚切斯拉夫给出的那个方针,我应该说,我不能对这一点视而不见,当他要求几乎是谴责阿斯特罗夫的时候,这样做是不正确的。要么就是对我来说,这是不可理解的。好吧,就算是在政治局开会的时候可能维亚切斯拉夫会解释这是由什么引起的,为什么从粮食收购就会得出这样的看法,需要打击阿斯特罗夫。我同意一点,那就是他是一个好小伙子,文章写的好,但是从这一点无论怎样是得不出一个看法,说是如果他犯了错误,那就一定需要在中央全会上进行打击,并且把几百份速记记录分发到所有的组织中去。要知道,这是为了速记稿说的。

**莫洛托夫:**是的,看来是为了速记记录。

**托姆斯基:**这是不该做的。

**梅德韦杰夫:**可是点到的不止是阿斯特罗夫。

**托姆斯基:**当人们是在进行同志式的厮打的时候,当一个平等的人打另一个平等的、可以在这里对答的人的时候,这并不那么可怕,但是像现在这个样子,我看就不好了,因为你们知道,没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这意味着什么呢,任何人也解释不清楚这种情况,谁也不可能有板有眼地解释清楚,为什么需要这样做。我想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在这里基本上制定出了决议。我个人听到了李可夫、斯大林、布哈林的声明,说他们自始至终支持这个决议的所有提法。我也同意自始至终地像表决的时候那样对待这个决议,没有任何的修改意见。

请允许我表达一个小小的愿望,让我们大家都自始至终地、一字不差地,像写出来的那样,开始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为了问心无愧,去执行这个决议吧。那么我们就把所有这些困难克服掉了。我们就将能履行这个决议了。

**主席:**现在休息。

(休息后)

**主席(柯秀尔):**米高扬同志发言。

**米高扬:**同志们,中央全会用了4天讨论粮食收购。既然现在这是所有经济问题的症结,那自然就很明白,我们在就这个看上去是局部的问题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涉及到了我们党的经济政策的所有基本问题。在十五大之后,我们从没有过以这样的深度和这样的广度,不仅是从实践的角度,而且是从用我们的布尔什维克理论阐述这种实践的角度,涉及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所有问题。我想,不时地,当我们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时候,从理论的角度审议一下问题,从理论上对它进行阐述,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为了不犯错

误,理论的阐述是我们越来越需要的。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讨论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大约有30位发言的人发表了意见,而且全会聚精会神地听取了,这个事实说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多么有意思和重要。虽然对于中央委员们来说,许多论据、语录和理论论断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汇总起来,形成对问题的总的提法,这中间有非常多重要的和有意思的东西,照我看来,这是为我们的党,为那些将要读到速记记录的各个层面的人,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可以对党在这个困难时刻的经济政策得出更正确的和清楚的概念,而这将成为今后工作的基础。

我个人对讨论是满意的。我认为,的确,无论是从时间的角度说,还是从理论的角度说,党未必能要求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对问题做出更详尽、更全面的阐述了。我想,在我们的讨论中,措辞激烈的地方并不是那么多的。托姆斯基同志抱怨说,在讨论中有许多措辞激烈的地方。我想,甚至在布尔什维克的圈子里,通常可以料想的是会有更多的措辞尖锐,但是这种情况却是如此之少。

**雅罗斯拉夫斯基:**要看是在什么时候。

**米高扬:**我想,在通常最平和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说得要比在这里的全会上更激烈的。我们布尔什维克如果害怕激烈的情况,那是最坏不过的了。危险将在于,由于彼此之间的礼貌,我们就不会清楚地,有的时候是有些粗鲁地,但是清楚地提出所有的原则性问题了。照我的看法,最好还是抛开人们的自负、礼貌的表面形式,但是实质上不让步,任何不清楚的地方也不放过。当然,托姆斯基同志是对的;要少一些激烈的做法。总的来说这是对的。但是这不是主要的。不能因为这个就牺牲哪怕是一点理论上的真理,哪怕是布尔什维克路线的任何一小点。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他指责莫洛托夫同志在中央全会上,在自己的发言里“竟敢”刺了阿斯特罗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的这种发言我是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又是因为什么能够触及到卡尔平斯基同志、克里茨曼同志和其他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而托姆斯基同志对这一点却不表示反对,但是认为中央委员不能批评阿斯特罗夫同志的文章和改正他的错误呢?奇怪。为什么没有政治局的特别允许就不能在全会上批评阿斯特罗夫同志,我不明白这一点。

为什么对中央委员在这里可以说,而且可以写进速记记录,而对一篇发行了几百万份而且是不正确的文章,对这篇文章就不能吭气呢?在这里的全会上可以说中央委员并且载入速记记录,可以批评他们。而对文章的作者,的确文章是没有写在速记记录上的,但是有几百万份已经散发出去了,——就不能说。为阿

斯特罗夫同志要求的这种特权是任何一个党员、任何一个中央委员所没有的。让个别的党员享用这样的特权对党来说是一种极其巨大的危害。我们应该支持像阿斯特罗夫这样有能力的和正在成长的同志,但是我们如果把他们的错误遮遮掩掩,不及时改正它们,那我们就是完完全全地在断送他们——这样我们会更多地破坏了我们的党,而它是应该通过自己的错误和个别同志们的错误来学习的。完全不能允许的是,让个别人的自负和党的理论纯洁性的利益对立起来,让他们在党的机关报上写文章,在党内扩散自己的错误。从一致通过的政治局提纲的角度看,莫洛托夫批评阿斯特罗夫不符合这些提纲的文章,也就是说批评背离了党的路线的文章,是做得对的。我们在这里也批评了克里茨曼同志,虽然关于这一点政治局并没有通过任何决定。

尽管有这一切,我认为讨论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非常有价值的,通过这些讨论,党将按照列宁的方式决定经济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从中央委员那里得到了非常多的、有价值的实际指示,就不用说能够帮助我们今后在困难的条件下前进的理论阐述了。

如果转向讨论的实质,我应该首先说的是斯捷茨基同志的发言,因为他是发言人中唯一抱怨我背离了自己报告的提纲的。我应该正是从这一点开始,因为如果这话说得对,那这就是对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的人的一种非常严重的指控了。但是从全会上对报告的整个讨论以及从同志们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得清楚的是,我并没有背离提纲,而是斯捷茨基同志自己背离了,而且看来为了掩盖自己的背离,他开始说好像是我背离了。

**斯捷茨基:**我并没有掩盖的习惯。

**米高扬:**我不了解您个人的品质和习惯。您是一个好小伙子,这我知道。但是如果您不同意提纲,为什么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算到我的头上呢?您在这个问题上说了以下的话。这是没有经过修改的速记记录,我没有另外的速记记录了,但是这不会改变事情的情况。这就是斯捷茨基同志说的:

“在米高扬同志提出的对局势的评价中,我们看到了,和四月全会的决议以及现在政治局提出的那个决议中所有的情况相比,重心发生了某些转移。四月全会的决议和政治局的决议说的是关于我们现在的困难来源于工业和农业经济之间的市场平衡遭到了破坏,有属于计划性的错误被富农利用了。米高扬同志把重点放在了另外的方面:重点放在了所谓的客观原因上。而且米高扬同志在这里列举了相当数量的这种客观原因:我们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的落后,粮食作物的危机,农民经济的分散,农业商品率的不足,等等,等等。”

斯捷茨基同志在这里把许多东西搞混了,没有明白四月全会和七月全会之间的差别。它们之间是应该有某些差别的,哪怕是因为第一,那个时候是4月,而现在是7月;第二,如果是没有任何差别的话,那在四月全会之后我们干什么在7月还要为同样的问题坐上4天呢?这就是说,是有些新东西的,有斯捷茨基同志没有发现的東西的。在4月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是粮食收购在运动的前半段时间的特殊困难,我们确定了有特殊的原因并且对它们做出了评价。而现在我们把问题扩展开了,分析的不仅是今年困难的特殊原因,分析的不仅是爆发了粮食困难的特殊环境,特别也分析到了使这些困难得以扩展的国民经济的那个基础。这是提纲和我的报告都说清楚了,这是斯捷茨基同志所不想搞明白的。这就是为什么他既不同意我的报告,也不同意提纲的原因,而且还徒劳地企图在这两者之间制造离间。斯捷茨基同志慷慨激昂地声明说,成为困难基础的那些客观的困难也是取决于我们和我们的意志。他声明说:难道农民经济的分散不是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吗?如果说因为社会关系将取决于人,对于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提出问题是正确的话,那么在一个正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级社会里,这样提出问题就意味着不再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的理解阶级社会里的现象的武器了。如果我们料想一下,在完成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不破坏地主和富农的大型经济的话,那么,这样就可以把农民经济的分散和低下的商品率算作是取决于我们的意志了,这当然是荒谬的。或者说我们曾有一切条件在这段时间里建设许多国营农场并把很大一部分农民转移到集体农庄中去,但是这一点我们没有能做到,就该算是在领导上犯了错误。所有这些都是不对的。大家都知道,存在着剪刀差和工业品的高价,这对我们和农村的关系和对农业的发展是有着有害后果的。认为这也是我们的错误或者罪过,那是不正确的。如果从斯捷茨基同志的新方法出发,可以说:难道有剪刀差和工业品的高价不是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吗?当然,我们是有力量明天就完全消除剪刀差的,但是如果不想完全放弃国家的工业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话,这是做不得的。这就是为什么把一切都归为我们的“意志”,忘掉了我们的贫困和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些客观因素对这种意志的限制,那就是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的了。

斯捷茨基同志对计划的意义、客观错误和客观困难的方法的议论隐藏着一种危险,那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滑到唯心主义的、民粹派的主观主义的意识形态上去了。

经济领导的错误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尖锐了,缩小这些错误的意义是不对的。

当然,在今年的特殊原因中,有三分之二是可以归结为领导的错误的。关于这一点,我在四月全会上说的已经够多了。但是在说到困难的时候把一切都推到错误上,一句话也不说有阶级,有他们之间的斗争,不说甚至就是在最大限度地改善了领导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不犯任何错误,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不可能完全预见到对手的所有步骤和力量。斯捷茨基同志,您完全忘记了有阶级,在您的这个发言里,甚至连“阶级”这个词都没有。

**斯捷茨基:**您读一读速记记录吧:我说了,我们的困难被富农利用了。

**米高扬:**从你那里得出的是,一切全都是取决于计划的,困难只是计划工作、计划领导的错误造成的结果。照您的看法,只要我们有一个好的计划,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困难了,一切就都会顺当地走向社会主义了。

我们有过什么样的计划领导的错误呢?商品的运作没有做好。没有及时进行对农村上层的征税。粮食收购机构、行政机构和党的机构有缺点。注意得太少了……

**斯大林:**粮食消耗得太多了。

**米高扬:**关于消耗太多我接下来要说。要知道,斯捷茨基同志,到四月全会的时候,我们超过了计划的预料,从农村收取了2.5亿卢布的公债和捐献。向农村投放了商品。增加了轻工业产品,从而恢复了供需之间遭到破坏的平衡。我们改正了机构,把党动员起来了,但是还是有困难。这就是说,粮食困难的原因不仅在于有这些特殊的原因和领导的错误了,而是在于什么另外的东西,这是七月全会应该说到的。困难的基础是粮食经济的危机。在您的提法中,对这个问题却什么也没有提到。从广泛提出的研究粮食困难的原因和基础中,才能得出广泛的结论。而您是从狭窄的基础出发的,只是围着特殊原因这个圈子转,所以您也就没有可能得出广泛的结论来,而这些结论不仅是要排除今年的特殊原因,而且是要用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和在很长的时间里起作用的措施来解决粮食问题的复杂任务。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在评价计划工作在过渡经济中的作用时,也犯了这样的错误,忘记了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也忘记了计划是不能取代阶级斗争的,忘记了计划是我们这个阶级的战略计划,不是取代而是考虑和反映经济中的阶级力量的具体对比状况的。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说:“我们不是按照办一个大型的、社会主义的、有组织的经济联合公司需要做的那样来搞经济的。”

这样说就意味着忘记了在我们这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联合公司,

因为还没有完全的社会主义,而有的是过渡性的经济,在它的内部,社会主义的成分在和资本主义的成分斗争,逐渐地把它们排挤出去。

这里还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怎么会是这样,要知道富农不是在今年才成长起来的,农业的分散也是以前出现的,而困难却正是在今年而不是去年表现出来了呢。

斯米尔诺夫:在十月革命前就有富农了,不仅是在今年。

米高扬:我们在四月全会上就已经确定了,富农比以前增长得更多了。有人 would 提出问题:要知道富农不是在一年里成长起来的,分散也不是在一年里出现的,而去年一切都是进行得很好,很顺利的。

我认为,这样提出问题完全不像是一种辩证的提法。难道阶级的力量只要一出现就马上会表露出来吗?无论如何不是这样的。一个阶级的潜在力量是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刻表现出来的。每一个阶级都有隐蔽的力量,是谁也看不见的,是逐年积累起来并且在特别有利的时刻展开的。我们去年在农村没有过尖锐的冲突吗?没有过。这些资本主义分子的力量是在我们的力量更快增长的条件下更多地成长起来了。今年的行情是供需之间有了很大的差距,再加上我们犯的错误——这一切对于搞清楚所有力量的行动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因素。阶级的潜在力量逐渐地在积累,可能会在特殊的、能够促使它们表现的时刻暴露出来。忘记了这一点就意味着不再是一个辩证看问题的人了。

在讨论中涉及到了关于阶级和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在新经济政策的现阶段,我们对阶级的态度表现为要排挤私人资本家,限制富农和把小生产者吸收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我们党的所有决议都说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是要排挤资产阶级,要把小生产者吸收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采用的做法是和他们就这种吸收的办法达成自愿的协议。这就是对各个阶级的不同态度,因为和一个阶级——和小生产者——我们有着联盟,我们不是要排挤他们,而是要吸收他们。而对公开与之斗争的阶级,对城乡的资本家阶级,我们是要排挤的。

有人说,在我们这里的一些农村里,没有私有者,所以那里就没有剩下什么新经济政策了,在描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这样说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一个村子里,可能是商品的流通完全被合作社掌握了,没有一个私营者了,但是新经济政策在那里是有的。例如,在购买甜菜方面是不是有新经济政策呢?是有的。而且在制糖工业和生产甜菜的农民之间并没有一个私营者作为中介。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靠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来维系的。难道在棉花经济中

就没有新经济政策了吗？有的。虽然在棉花的收购中，私营者作为中介是完全没有的。要知道农民的棉花种植业要比农业中的所有领域都成长得快。而难道十五大没有说，在一系列领域里，我们是垄断性地包揽了农产品的销售吗？但是代表大会并没有说过一句带有这样意思的话，说这就是破坏新经济政策的事实或者是取消了新经济政策。

关于富农经济和富农，十五大做出了决定，我们应该把这些决定毫不动摇地贯彻下去。但是丘巴尔同志否认我们把富农打翻在地和剥夺他们是绝对正确的。我们没有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我们想对富农的上层采用第107条，甚至不是对所有的富农，也不是在所有条款上，而是在关于粮食的条款上。最近有一些事实说明触犯到了中农，这不能认为是正确的。

**斯大林：**稍稍把富农打翻了，可是后来他们进行了某种报复。

**米高扬：**我们有过一些情况，我们的非常措施也涉及到了中农，触动了他们。关于富农，应该说，我们也没有想要把他们剥夺了。富农是存在的，一些年里他们也还将存在，他们发展的条件还是有的，虽然我们将极大地限制这些条件。

**斯米尔诺夫：**有的地方把农具夺走了。这可是真正的破产呀。

**米高扬：**今年我们对富农上层的触动是很大的，但是只是在粮食这方面。而谁能说在棉花种植、饲养牲畜、甜菜种植等等方面就没有富农呢？这是谁告诉你们的？谁也没有这样说过。我们触动的只是富农的上层，而且只是在粮食上。而且我想，说富农完全被打翻在地了，他们已经没有了，这是不对的。富农还有，富农的危险还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应该向富农进攻，不可能从十五大的决定上有任何后退。看来那些在面临了困难就要改变党的方针的人，包括弗鲁姆金同志在内，想的是十五大的决定是一种对付反对派的灵活手腕，我们是想临时抛出一个好的口号，而在我们打击了反对派之后就不执行这些决定了。但是只有反对派的敌人才可能这样想我们的党。我们通过决定应该是为了坚定地推行它们，否则我们就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了。或者这些人是这样被吓坏了，想要在这个问题上越过十五大的决定，建议十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破坏十五大的这些决定，用国家的语言说，就是发动政变，因为我们是有义务履行把我们选举出来的代表大会的决定的。而且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后，整个工作实践完全证明了十五大的路线是正确的，这样的声音是在这个时候发出来的。

四月全会对富农在农村中的经济权威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声明。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权威在中农和贫农中都是很高的。中农和贫农不会这样轻易地就跟着富农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甚至在对它有一定不满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富农由于不具



备在农村中的政治威信,便利用在农民基本群众中很大的经济权威,因为在农村里,最好的经济是富农经济,它的收成很多,经营得比我们好。我们在农村中的支柱是贫农,他们还不会经营得让其他的农民都来向他们学习。做不到这一点也就不可能有像样的经济权威。党应该从承认这个事实中得出结论来。由此而产生的结论是什么呢?向你们提供的提纲和党的十五大的决议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体现出来的、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权威来和富农在农村中的经济权威对抗。当中农看到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能够比富农户得到更多收获,采用更好的机器和提高集体农庄庄员的生活水平等等情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将能在农村里不仅从政治上超过富农,而且在贫农和中农中间的经济权威也将更强了,可以把富农的权威压下去。所以,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不仅是解决粮食问题和农业的商品化问题的手段,而且它们也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权威在农村里对付资本主义经济权威的手段。

但是,与此同时,当然清楚的是,无论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发展有多快,在一些年里,个体的农民经济将是农业基础的基础。所以需要提高这些个体的农民经济,需要发展它们。所以卡尔平斯基和米柳亭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贬低甚至直接否定个体农民经济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条件,这是不对的。他们的立场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我们这个党是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国家里工作,在我们党内,未必需要详尽证明的是,认为个体的中小型经济没有进一步发展条件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条件很多,而且我们还远远没有把它们利用起来。米柳亭和卡尔平斯基错在了什么地方呢?小型经济是有可能提高的,而且如果是通过合作化、通过集体农庄、通过社会形式,可以比分散着提高得更快。如果这样说,那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走到了极端,认为如果没有集体农庄,小型的经济就无路可走了,所有的路在他们面前就被堵死了。这是不对的。

布哈林同志在正确地批评这种观点的同时声明说,这种否定小型经济有可能发展的观点,从根子上说,遵循的是土地会日益瘠薄的反动规律。照我的看法,布哈林同志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要知道这些同志并不是根本否认农业有发展的可能;他们否认的是小型经济发展的可能,同时认为大生产会快速增长和获得双倍的收成。怎么能把土地越来越瘠薄的规律算到他们头上呢?自然,在有大经济帮助的情况下,会有更多的条件提高农业和它的收成的。越来越瘠薄的规律说的是:任何基本投资和任何技术手段都不可能有助于相应地提高这块越来越瘠薄的土地的状况。但是那些持有不正确观点的同志们引来了正确的动机,说是我们需要更多注意通过合作化来提高农业的可能。要想把收成提高

一倍就应该走上这条路。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这种观点和越来越瘠薄的规律联在一起。越来越瘠薄的规律和我们的立场,甚至和这些同志不正确的观点,都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事情是很清楚的,大型的经济将有更多的机器,可以更快地使用机器,将有更集约化的经济,也能有更高的生产率。

十五大提出的我们的任务是非常重要的,是从整个局势引出来的。与此同时十五大还提出了新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农业领域里的大型经济的问题。这是我们已经有了的和我们应该非常关注的、新的东西。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是在党的农业领域里的所有任务之上新加的一项任务,是党应该非常顽强地实现的任务。一方面我们在组织集体农庄和建设国营农场,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扩展所有其他农民的集体化事业。这就是为什么卡明斯基同志的提法是对的,他把重点放在了我们应该争取扩大合作化运动和更多地用合作化把农民包括进来这一点上。

在这里,照我的看法,克利缅科说我们忘记了个体农民经济,这是夸张了。这是一种很大的夸张。它是从哪里来的呢?要知道我们把9/10的资金给了个体经济,用在了提高它,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看见了,我们是在提高和组织这种经济。我们没有忘记它,也不可能忘记它。

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个体农户呢?我们应该向他们建议的合作化和联合的形式应该是最简单的,是这些农民能够接受的,在他们中间应该能够成功,能够把农民经济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组织水平上去。我们应该在对待农民,对待他们的各个阶层以及相应地对待他们的成见、素养和习惯的态度上表现出有组织的渐进性,能够根据实际上合作化成功的大小,把他们从一个层次提高到另一个层次上。

在这样一个链条中,签订播种预约合同的实际做法具有很大的意义。什么是预约合同?这就是伊里奇所说的和农民的合同关系,——是关于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的合同。合同的实际做法表明,可以在一年之后就取得农民的信任,在这一年里,为他们用纯种种子播种提供服务,更好地耕种他们的土地,在实际上取得成绩的基础上,通过合同转向更多的生产过程,这样,一个方面接着一个方面地、逐年地把农民拉到我们的经济发展计划上来,把我们国家的计划和农民的计划联系在一起,并且通过这样的途径实现国家对分散的、众多的农民经济的影响。

我们面临的的就是这样的任务,我想,在技术作物方面,我们有签订预约的经验,这种做法得到了很大的传播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应该把它转移到粮

食作物上来,虽然我应该说的是,粮食上的预约合同和技术作物上的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无论是在市场这方面还是在预约合同以及生产过程方面,我们在技术作物上能有很多成绩呢?因为在这里消费者只有国家这一家,没有另外的消费者,没有另外的工业,除了国家以外,这种产品没有另外的购买者了。但是粮食是大家都要购买的。这里就有着特殊的巨大困难。在我们的工作中,在和富农争夺中农的时候,为了加强和中农的联盟,我们所有的实际步骤都是力图不要让我们的措施触及到了中农,不要把中农推到富农的怀抱里,所以我们就应该更加加强在贫农中的工作。安德烈耶夫同志在说到我们常常是按季节做贫农工作的时候,强调了这一点,这是对的。只有当我们系统地帮助贫农和经常提高他们的组织性的时候,我们才能做到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这边来。这是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最近几个月在地方上得到的经验必须要更多地加以改善、总结,让贫农成为党在农村中的牢固支柱。

在转到评价局势的时候,我应该说,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说道,在评价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得罪了中农和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他们不满的时候,可能有各种不同色彩的评价,他说的是对的。当然,没有这样的药店天平,借助于它能够准确说出在多大程度上得罪了中农:这里对得罪的程度总是会有各种不同的评价的。但是一定的界限是有的,如果超过了这个界线,对局势评价中的细微差别就会迫使我们得出不同于政治局拿来让我们批准的那些结论。我想,奥新斯基同志,特别是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就超出了这个界限。

我在自己的报告里警告过了,我们需要对局势做出清醒的评价,不要粉饰我们曾有的那些反面的事实,为的是改正错误更容易些。但是我也警告过,不要对局势做出惊慌的评价。奥新斯基给我们做出了自己的评价。奥新斯基同志说了什么呢?他说:“这个危机状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城乡之间的分离,在于城乡和农村之间周转中的分离。”

奥新斯基同志是这样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面临着国内战争了。事情很清楚,并不是这样的。而在做出这样惊慌的评价的时候,奥新斯基同志就滑向了不正确的结论、惊慌的结论、要求重新审议党的整个经济政策的结论上去了。奥新斯基同志可能并不是想说这个的,他在私下的谈话中说:“我根本就不是说,我想要削弱重工业,我甚至是主张要汽车的。”问题也就在于,奥新斯基同志,您是前言不搭后语的。如果接受您的评价,就需要重新改变整个政策。如果我们面临的事实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破裂的话,那就需要有很大的根本改变来争取消除这种破裂了。但是,我们所有的只是有发生这种破裂的威胁,如果

那些把中农推开的事实将有系统地继续下去的话,这种破裂有可能会加强。如果在今后还将采用非常措施的话,这种危险将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张要改正这些错误,坚决排除任何非常措施,以便不增强这种危险。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就比奥新斯基走得更远了。党是知道的,奥新斯基同志并不总是坚持自己的错误的,而且会努力在讨论的过程中和通过实际工作的经验努力改正这些错误。他并没有一种长年推行不同于全党政策的政策体系,让他不能放弃,不能与之割断联系。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情况就相反了,他总是有自己的政策的。他的发言中有许多正确的东西,是可以同意的,但是照我的看法,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所说的所有那些正确的东西,是一种遮掩,是为了掩饰他的发言中不正确的东西的。而不正确的是最重要的。他同意我们的那些东西将是留给我们的,而他自己又添上的——这就是在蜜罐里加上了不是一勺而是好几勺煤焦油了。他甚至是这样开始的,就好像是想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这是什么样的错误——他没有说。他加上的是,在党内有关于他的立场的神话。我不知道,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为什么在您的错误已经由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确定了的时候,您要把真正是您的错误说成是臆想的神话呢?这对您是神话吗?这不是神话,而是实实在在的错误,您不是去改正它们,而把它们说成是神话。他接下来说了什么呢?“最近几年”(看来是当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不再管经济的时候)<sup>202</sup>“在经济领导的实践中出现了过火行为”。我们知道在粮食收购这件事上的过火行为。原来是有新的过火行为:有三四年的时间,我们有经济领导的过火行为。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您就不能告诉我们您说的是什么过火行为,以便把它们纠正过来吗?但是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各个声明中最主要的,是他说的下面这句著名的话:“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大幅度地改变对应关系,期限已经结束了——我们应该现在就行动。”这不是简单的惊慌的评价,这是一个口号:退步吧,收摊吧,一分钟也不要损失了,所有的期限都已经到头了。这就好像是安采洛维奇在某个人说到斯摩棱斯克事件<sup>203</sup>的时候所引用的:那最好是交出政权。你们看见了吗,是要干什么?在我们所想的正确思想扎成的许多花束里,他是多么灵活地善于自己改正,把这样的一朵小花隐藏起来!你们明白完全取消“剪刀差”意味着什么吗?虽然他在自己给中央全会的信里说,他不要求立即取消“剪刀差”,但是我给你们读过的东西,是每一个人都清楚和明白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要知道我们在价格方面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大约是10亿卢布。如果接受索柯里尼柯夫和奥新斯基的建议,我们就应该从我们的积累里把10亿卢布刨掉。但是你们明白,只有放弃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采用马马虎虎的态度,直等到国际革

命的爆发,才有可能这样做。就是这样的立场。照我的看法,这非常像是投降主义,是一种投降式的倒退,是不相信我们的力量和夸大我们现有的那些危险。

当然,我们是应该完全把剪刀差取消的。

**索柯里尼柯夫:**您现在说的是主张保留剪刀差。

**米高扬:**我和你说,我有的时候说话很粗,但是我是直截了当地说我所想的。剪刀差我们是应该消除的,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可能在最近这些年取消剪刀差,如果我们还不想放弃利用国际资产阶级给我们的喘息机会,快速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话,我们就不能取消。这个喘息是重要的,每天都可能有人会把它中断了,我们应该把所有资金都动员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制高点。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主张的是逐渐缩小的、但是能够让社会主义工业增长的剪刀差。

**奥新斯基:**“剪刀差”英雄。

**索柯里尼柯夫:**您主张粮价提高12%,而我主张提高25%——这就是差别。

**米高扬:**您等一等,我是一字不差地照念了你的话。就是在去年中央二月全会<sup>204</sup>上,我们就已经面临“剪刀差”和这种“剪刀差”农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容忍的问题了。索柯里尼柯夫在这次全会上的发言中说到1927年2月时他的战友和上司托洛茨基说过的话。托洛茨基引用了农民在价格上向我们多支付了的一系列数字,说道:“对阶级是不能欺骗的。在我用两个数字所描述的对对应关系的基础上不仅不能‘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而且也不能长期维持住无产阶级专政。”<sup>205</sup>

不仅不能在这种对应关系上建设社会主义,而且长期掌握政权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托洛茨基的立场。索柯里尼柯夫说,所有的期限都已经结束了——需要根本改变这些关系。上面的提法和索柯里尼柯夫的这种声明有什么区别呢。这里没有任何区别,立场是完全吻合的。我想,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到我们这里来,不是为了要把我们的路线转到反对派的道路上去,不是为了悄悄地把反对派的建议塞进来,而是为了和我们一起前进的。在1927年的二月全会上,我是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人。我不得不批评了托洛茨基对我的报告所做的这个发言。我认为有必要向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再说一次我在当时对托洛茨基做出的回答。我说了下面的话:“工人阶级应该将建设社会主义的所有消耗摊放在所有阶级的肩上——把大部分放在耐普曼的肩上,摊在农民身上的要在能够使得和工人阶级的合作对农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限度之内”<sup>206</sup>。

如果不是把很大一部分负担转移到其他阶级的身上,也包括转移到农民身

上的话,什么样的国家和什么样的政权能够以我们这样的速度把国民经济恢复起来呢?关于这一点,托洛茨基忘记了,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也忘记了。而且不同于您的另一位原来的战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是,我们反对疯狂地和没有限度地从农村中抽调资金;我们主张有一定的比例,我们主张的是这样的标准,这样的尺度,要从需要出发,从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可以接受的程度出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逐渐在缩减剪刀差,在减少从农村中的抽取,保持着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牢固性。这就是可能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没有明白的那个基本思想,也可能是明白了但不同意。

我的一个论断说,我们不可能在一年里既提高粮食的价格又降低工业价格,奥新斯基对这个论断提出了争议。他说这好像是一种反对派的方针。这是不对的,奥新斯基同志。

**奥新斯基:**您在胡编乱造什么?

**米高扬:**奥新斯基同志,当我引用您所说的话的时候,您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坐立不安和感到委屈,把这当成是个人的恩怨呢?

**奥新斯基:**我没有感到委屈,但是您不要去想象并没有过的事情。您着重说的并不是过去有过的和斯大林同志说过的事情。

**米高扬:**您在自己的发言里说了,在不降低价格和反对派建议的提高价格之间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奥新斯基:**我没有说过任何类似的话。

**有人喊:**米高扬同志,不要再搞辩论了。

**柯秀尔:**你们现在是两个人在对米高扬一个人。

**米高扬:**你们不要太激动了,我可以从您的发言里引用准确的一段话。您就是这样说的:

“我理解 IO. 皮达可夫和 B. M. 斯米尔诺夫的幽灵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这个纲领的意义何在。我们开始降低那些工业本身消费的物品和商品的价格,但是对于那些投入广大市场上的物品和商品,我们是要保持高价格的,要得到高额利润,把这种利润转移到其他的工业领域里去,这样来使工业得到发展。这和皮达可夫和斯米尔诺夫的要求有什么不同呢?那些人想提高价格,而这里是在制止提价<sup>①</sup>。这将是降了一度,但是实质上是同样的想法。”

---

<sup>①</sup> 参见本卷中奥新斯基在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其中“提价”两字在那次会议的记录上是“降价”。——译者注

您的这个声明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的提法和反对派的提法之间的区别很大。我们降低了价格而且将要不断地降低,我们说的只是我们不可能同时提高粮食价格,给农民 1.2 亿卢布,而同时把工业价格降低 5%—10%——如果是 5%,这将是 4 亿;如果是 10%,那就是 8 亿。——我们不可能一下子给农民 3.2 亿—5.2 亿卢布。在粮食价格提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在一段时间让工业价格保持稳定的话,我们就是很大地缩小了剪刀差,我们就是在向缩小剪刀差迈进了。皮达可夫的建议没有向我们提供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而奥新斯基同志是绝对错误的了。

我想,同志们,奥新斯基和斯捷茨基完全集中到了市场上,建议从市场上去寻找困难的所有原因,而且只是通过市场来解决这些困难,这都是不对的。当然,市场是所有阶级的和所有经济的矛盾都集中反映出来的焦点。这是所有矛盾都聚集在了一起的结合部。但是不可能是通过市场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市场是从各个生产的因素派生出来的。既然是派生出来的,市场当然会对生产产生反作用。

**奥新斯基:**这是和共产国际的纲领相矛盾的。

**米高扬:**没有任何矛盾,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论断,——通过市场去医治一切是不正确的。这里在辩论中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说是价格是整个生产的调节器。这对于纯粹的经典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说是对的,但是对于苏维埃的经济就是不对的了,对当代资本主义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除价格外还有另外的生产调节器。

布哈林同志在自己的发言里涉及到了劳动消耗是生产的调节器的问题。在一个纯粹计划性的、社会主义的、无阶级的经济中,生产是由劳动的消耗来调节的,也就是说,向什么样的生产部门投放社会劳动和投放多少,是由计划决定的。但是不能忘记的是,在阶级的经济里,劳动消耗的概念是不能由价格问题取代的,而且价格不是唯一的调节器,并不能把劳动对经济的投入的所有渠道都包括进去。所以不仅是价格,而且是整个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在决定着某个领域里的劳动消耗的多少,在我们说到的这个情况下,决定着物价的,有税收政策、机器的供应、基本投资和农业贷款等等,等等。棉花种植发展的具体事例是我的这个思想的一个明显的证明。

这就是为什么价格虽然是市场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囊括了基本的问题。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这就意味着要犯错误了;说是粮食危机可以用提高价格这一种办法来消除,不用采用其他措施了,这是不正确

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提高价格的同时,我们还提出了供应机器、肥料和贷款的任务,提出了预约合同的办法以及其他的措施,它们综合起来,应该能够对提高粮食经济和对提高农业产生影响。

托姆斯基同志批评莫洛托夫同志的发言,看来是由于没有正确地理解莫洛托夫,因为在托姆斯基同志的阐述中,莫洛托夫同志的观点变得不像是莫洛托夫同志所发挥的那个样子了。当莫洛托夫同志说到中农经济已经成长起来,它的地位加强了的时候,他首先是联系到这一点说到了我们的阵地也加强了,我们的力量也增强了。莫洛托夫同志说,整个农民的经济,特别是富农的经济成长起来了,而富农利用了中农地位的增长来组织中农维护粮食的高价格和要求提高价格。当莫洛托夫说到对中农的让步时,他说到这一点是作为我们加强的一种手段,因为在向中农做出让步的时候,我们对富农的进攻就会轻松些。在粮食价格问题上和富农的斗争——这是最危险的一个斗争阵地。应该不是在这个问题上,迎战富农;这是和富农斗争最少可能获利的阵地,因为生产地区的农民基本群众对高的粮食价格是关注的。应该是把这场斗争从这个层面转移到另外的层面上去。当我们按照我们能够接受的尺度在价格上向中农做出让步的时候,我们这样做也就是在挖掉向我们进攻的富农脚下的土壤。

在这方面,我没有看到莫洛托夫同志有任何不正确的地方。

现在说说粮食价格。先说几句关于粮食价格的历史。有些同志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好像存在着的粮食低价不过就是一个误会,不过是计划失误的结果,好像是由于过去谁都不知道这是低廉价格的结果。在这样提出问题的時候,他们忘记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计划上的失算,而是提高价格就意味着要向农业投入几个亿的卢布,这是要能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要靠什么人拿出来,做出对农民有利的重新分配。提高粮食价格——这不是签一个字条就完事了。这意味着现在就需要另外再找出1.5亿来给农民,要知道,这一点是需要想想的。在研究粮食价格历史的时候,我认为李可夫在1月的时候和在今天都是绝对正确的,他说到,我们不应该是在冬天和春天发生危机的时候提高粮食价格。我们在1月没有提高价格做得绝对正确。难道埃赫同志说到的、柯秀尔完全证实了的那个例子你们不是记忆犹新的吗?他们说到了在1924年的时候,春天在西伯利亚提高了价格,我们和接近苏维埃政权的农村各个阶层发生了尖锐冲突,当时共产党员在农村里不能露面,而粮食还是没有能拿出来,收购也没有能提高。

另外有些同志说:我们应该从运动开始的时候就提高收购价格。当然,这样的可能性曾经有过,但那是在一个条件下。如果在去年7月的时候,我们决定了



要真正提高粮食价格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像我们做过的那样,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了,否则需求和供应之间的比例失调就会更大了。在低廉的粮食价格和降低了的工业价格条件下,在需求和供应之间有着巨大的比例失调的情况下,是不能同时这样大幅度地提高粮食价格的。比如说,可以有这样的运作:我们把工业价格降低5%而不是10%,可是把粮食价格增加10%。这是有可能在不破坏市场平衡的情况下做到的。

奥新斯基同志批评我是对的,我同意他说的,我在10月、11月的时候提出粮食收购困难的问题时不够尖锐和及时。这是对的。需要做的是及时地发出信号和对中央施加强烈的压力,虽然代表大会前的局势是一个严重的障碍。但是在粮食价格领域里,我发出的信号是及时的——在去年的7月就发出了。说到这个自己总有些不好意思,但是既然说到了信号,我想讲一个有教育意义的事情。

当我们在把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补上的时候,在同样像这个一样的大厅里,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sup>207</sup>联席会议请来许多地方上的经济管理人员,讨论了粮食价格政策。在这之前,在国家计委的控制数字委员会里(当时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在休假,在国家计委领导的是克维林和格林科同志)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需要降低粮食价格,否则我们就不能做到供需之间的平衡了。克维林同志来到鲁祖塔克同志这里开会并且问道:怎么办?我们说,让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但是它未必会支持这样做。我经劳动国防委员会同意,对粮食做了某些提价,克维林和格林科同志提出建议,要立即取消提价,并且要争取做到价格的完全稳定,而在今年粮食质量更好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直接降低粮食价格了。国家计委中的少数人以格罗曼同志为首,提出了每普特粮食降价4戈比的建议。而在这之前,我们在劳动国防委员会里,在李可夫同志参加的情况下,通过了一个决定,对质量优良的粮食加价3%—4%,对各个地区和作物的价格调整是3%—4%,也就是说,结果是大约6%—7%,贯彻下去的就是这种情况。

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联席会议在李可夫同志缺席的情况下同意的不是我的意见,而是国家计委的意见,而且建议商业人民委员部立即把价格拉平,让平均提高的\*年价格完全和去年的价格相适应。我在政治局提出了问题,政治局没有支持我,而是同意了国家计委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我接着就没有再插手了。这是在8—9月南方收购在自发地进行并出乎意料地成功了的局势下

\* 原文如此。可能是“平均经过斟酌的”。——编者注

决定的,这种局势让做出这样决定的那些人感到可以安心了。

即便通过了我的建议的话,收购的困难还是会有,因为除去所有其他的原因外,由于工业产品的增长不够,由于已经进行的降价,商品的匮乏可以更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不能不影响到粮食收购。

在讨论已经确定的价格的方法的时候,布哈林同志指出了从理论和时间的角度说都是很有意思的方面:是不是无论亩产多少都对一普特的粮食给予一个价格,或者是让价格水平取决于收成的多少?商业人民委员部的许多经济学家和舍博尔达耶夫都在我面前提出过这个问题。这个想法可以归结为,在确定价格的时候,每一年在每一个具体的地区不仅要从给出一个普特的粮食价格出发,而且要从每一亩能得到多少收入出发,而且要根据收成来改变价格。布哈林同志举了北高加索的例子。虽然他掌握的收成下降的数字是不对的,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他指出,那里的收成下降了,价格也下降了。但是问题在于不能让收成好的和不好的地区的价格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如果差距很大的话,收成好、价格低的地区的农民将会把粮食运到收成不好、价格高的地区去出售。不能不考虑到市场的某些规律。我们不可能用相应的一个地区的价格提高来补偿由于歉收出现的收入下降。虽然在整个国家歉收的情况下,价格将要比中等收成的情况下高一些。

各个地区和各种作物之间的校正将是需要做的。各种作物和地区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我们这里还不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该注意地调整这种情况。

托姆斯基对价格提高的幅度说到,我们这里谁都还没有最后的数字,还需要做更多的计算,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指望没有限度地提高。我们在这里应该知道我们不能逾越的某些界限和限度。虽然现在的局势非常困难,但是我担心的是,要改变它,就像我们在价格问题上那样,会莽撞,而在之后又要宣布作罢。如果我们提高价格会使得技术作物、小麦和甜菜、小麦和烟草、小麦和棉花都没有竞争力了的话……

**斯大林:**工资。

**米高扬:**关于工资我下面要说到的。

如果我们是这样行事的话,那就可能是两条出路:要么是保留技术作物原来的价格,这显然就意味着无须闭上眼睛,无须然后建立新的理论,也无须有什么失算,就会发生技术作物的危机,也就是工业原料基础的危机。要么就是随着粮食作物之后也要提高技术作物的价格。但是这就意味着也要提高工业价格,破坏工资,破坏我们的整个金融体制,在国内引起总的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

该知道提价的尺度。当粮食少的时候,当存在着粮食上的骚动的时候,当然神经衰弱的人很难遵守尺度,保持平静和耐性。托姆斯基同志对政策的坚定和平静态度表现出了一种鄙视,声明说,就是木头也是坚硬的。干什么要和木头相比呢,要知道也可以和橡皮相比呀。要鄙视坚定和平静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遗憾的是,即便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在地狱般的困难条件下,在危险的局势下,保持平静和坚定的。这些品质对于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是非常可贵的。

**柯秀尔:**是的,这和木头不是一回事。

**米高扬:**完全正确——不是一回事。平静、正确地评价局势,清醒地考虑物质手段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有更多的敏感性和耐性——这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也是革命者的品质,不该那样受到鄙视。我也害怕我们没有足够必要的坚定性;在今天的困难的影响下,我们这样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的价格,将会没有能力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同时我们没有权利哪怕是一分钟忘记工人的工资。如果我们提高粮食的价格,销售价格也会过分有力地抬高起来,就会打击工人的工资,恶化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

**斯大林:**还有商品的价格。

**米高扬:**于是就不得不破坏我们整个工业品的价格政策。我们想要确定的是,这样提高粮食的价格,要能够使得工业品的价格保持稳定,要能够把工业价格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要能够保持经济的平衡,要能够不至于重新面临需求之间差异的扩大,因为在所有相等的条件之下,粮食价格提高的幅度也就是工业品紧缺程度增加的幅度。

**有人喊:**那么捐献呢?

**米高扬:**捐献我们应该还要搞,但是要善于搞,不要有今年的过火行为。虽然有这一切,困难也还将是很大的。如果甚至把粮价提高 10%—15% 的话,我们还是不得不对销售价格做某些提高,照我的看法,即便是在基本的工人区也要这样做,或者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提高或者不得不在非常微不足道的程度上提高一些烤好的面包的价格,以便在其他地区提高价格。

照我的看法,科马罗夫同志说我们(关于亚麻我将在后面说)要搞一个向亚麻地区供应粮食的方针没有成功,他说的完全对。去年,当我们在重新审议亚麻价格的时候,没有更多地提高价格,因为这些价格对于亚麻种植也还是更有利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向这些地区供应廉价的粮食,以便在这些地区鼓励生产亚麻,因为粮食是可以和亚麻竞争的。我们确定了硬性的国家出售价格,在离开铁路线 15 俄里以内的地带里,规定黑麦的价格应该不高于 1 卢布 15 戈比。而

因为亚麻分散在许多省里,也因为我们的低价粮供给的不仅是种植亚麻的人,而且包括了所有居民,更何况是没有限制的,那当然就会极大地扩大这些地区的粮食消费,我们就做不到没有间断地向他们供应粮食了。科马罗夫同志这样说是对的。需要把亚麻的价格提高20%,但是那样也就需要提高粮食的价格。在各个生产地区也需要做同样的事情。

托姆斯基同志说的对,我们不应该向城市的有产阶层供应廉价的粮食。耐普曼在我们这里是按照廉价买到好的粮食的,而如果我们没有票证制度,我们怎么能消除这种情况呢?要知道我们这里是开放的市场,开放的商店;任何一个人都是可以买,同时甚至不是耐普曼自己在购买,而是他的仆人,女性的无产者。

**罗伊津曼:**他穿着不好的衣服在商店里买东西。

**米高扬:**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规矩,不把东西卖给穿着好的人。除去票证制度外,没有办法可以不让耐普曼用低价买到好的商品。可能像托姆斯基同志建议的那样,给白面包规定高一些的价格,给黑面包规定的价格低一些?就是现在我们这里的大麦面包就已经亏本了,而小麦面包是赢利的。如果我们规定白面包卖给耐普曼,黑面包卖给工人,那么是可以采用托姆斯基的这个建议的。而且譬如说在莫斯科,消费的面包大约有70%是小麦做的,30%是黑麦的,而你们知道吗,工人们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是想要吃白面包加香肠的?我们不能规定这样一种阶级的原则,把黑面包给工人,而白面包给资产阶级。你们去试试看对工人说,让他们不要吃白面包了。

**斯大林:**这说起来比做起来容易。

**米高扬:**我和工人们说过。在谈话中他们会这样对你说的:以前吃的黑面包多,现在吃的是白面包多。我们干革命是为了不光吃黑面包。现在如果黄油不够的话,那就已经要骂娘了。可以对工人说:等等,还有别的东西呢,就让耐普曼去吃白面包和黄油吧。工人会是完全有道理地说:如果我们不能吃饱黄油、鸡蛋和白面包的话,那干革命有什么用呢?甚至就是我们转向生产混合面的面包这样的事实,就已经在工人中间引起一定的不满了。但是莫斯科的面包坊不好,在列宁格勒,巴达耶夫用同样的面粉烤出来的面包要好看得多和好吃得多。于是我们在莫斯科盖了面包工厂,可能到那个时候,莫斯科的面包会好些。

我想对播种面积,特别是对莫洛托夫同志和奥新斯基同志之间展开的关于春播状况的争论,对进展情况,说上几句。我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审议。如果从播种面积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需要直截了当说的是,它是不能满足的,它是不够的。这是没有什么可争

论的。但是,莫洛托夫同志在自己的信里不是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的。他是从在党联系到粮食收购而采取了那些措施之后是不是面积缩小了的角度看待春播面积变化的情况的。也就是说,农民是不是用自己的春播面积的多少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是不是对我们的政策表示了抗议?换句话说,也就是是不是发生了和农民的分离,因为如果有这种分离,那农民首先就会是缩小播种面积。莫洛托夫同志是从这样的角度看待问题的。为什么我在自己的报告里没有举出播种面积的最后数字呢?因为没有这样的数字,再等上十来天我们就能得到最终的数据了。有一点是最终确定下来了,那就是春播的面积有了很大的扩展。

奥新斯基同志犯了这样一个错误,那就是他把复播和春播分开了。当然,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不能忘记的是,奥新斯基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不给春播的成长造成损失就不能在很大的规模上进行复种,因为复种是需要花费更多的畜力和劳力的,需要有更多的种子等等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复种从春播的总面积中刨除掉。

为什么我们的春播面积扩大了昵?当然,如果说我们采用的非常措施越多,扩大的播种面积就会越多,这样说是不对的。这是不正确的。问题在于,在采用非常措施的同时,我们在春天进行了大规模的支持贫农和中农扩大播种面积的运动。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扩大贫农和中农的播种面积,以此来覆盖可能出现的富农播种面积的缩小。我们提供了3000多万普特的种子,加强了机器供应,降低了为机器贷款的条件,增加了农业贷款,一句话,启动了扩大春播面积的所有杠杆。由于党的这个政策的结果,我们扩大了春播面积。正是党的政策帮助了春播运动,有了可能扩大的播种面积。怎么还可能有另外的解释呢?如果有非常措施但是没有党的扩大播种面积的运动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播种面积的扩大了。在联系到粮食收购说到党在农村的政策的时候,有些人看到的只是非常措施和过火行为,忘记了党顺利进行的春播运动。但是如果我们要客观地评价我们这里春天在农村发生的事情的话,把这些分开或者是对立起来都是不对的。照我的看法,莫洛托夫同志说,在我们的帮助下,春播面积扩大了,这是绝对正确的,而且是很重要的,而且很重要的是贫农和中农的经济播种面积扩大了。

转到供应政策和今年供应上的错误以及我们对未来的估量的时候,我应该说,当然,这里是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错误是有的,而且需要把它们指出来。我们本来能够更节约地消费我们这里所有的粮食,而且有些是可以节省下来的。这是对的。但是把这一切都看得这样幼稚,说是把粮食都挥霍掉了,可以不去喂

养,可以把这些粮食扣下,等等,这是不对的。这是非常幼稚的议论,是在放马后炮,因为还在10月的时候,就排着大队买粮食了,许多人已经很不安了,而且节约粮食是很困难的。一方面,你们有下列困难:譬如,并不总是限制消费就能减少对粮食的浪费。有一些时候是在城市里采用票证制度来限制粮食的消费,而消费的要比采用票证制度之前更多了。另一方面,我们这里没有票证制度。我们没有禁止,没有限制粮食的消费。第三方面是,小店是开着的,那里没有站着警察,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走过来购买。于是就形成了排队。要么是需要把排队的人赶散,要么就是需要采用票证制度取消排队的情况,或者是需要满足需求,把这种局面淡化了。当我们开始收购粮食运动的时候,看来我们是有些太全神贯注了,决定要加强自己的消费地带的后方阵地,以便在粮食收购上能够更安心地活动。

我对铁路工作人员说:把你们发给自己的铁路工作人员的免票购粮券废除了吧,我们供他们吃多少都可以,但是让他们不要背着口袋去倒卖,不要破坏我们的价格和粮食收购了。当然,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所属铁路工作者消费合作社全苏中央独立管理部挥霍了许多粮食。但是我们争取做到了没有发生破坏粮食收购的“背着口袋进行倒卖”的现象。我曾经到过奥尔洛夫省。那里对我说:卡卢加省的乡亲们成千入地跑到我们的集市上来破坏我们的收购。他们有道理地说道:最好是用我们收购的粮食在卡卢加省供应给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为了平息收购市场和保障后方,我们不得不做到不要在供应上节约粮食。在这样困难的局势下,对付这些现象的出现是不容易的。

或者说我在北高加索吧,那里得到的是这样的情况:刚刚打击了富农,他们马上就变了个花样,不再在农村里出售粮食了。价格猛涨上去了。在高加索的一个镇上,排队买粮要等上两天才行。贫农没有地方能买到粮食。我们不得不对富农采取了反措施,从我们用低价收购的粮食中在农村向贫农出售粮食,为的是打掉富农的阵线。当然,由于这样做,我们不得不消耗很多粮食,但是我们做到了保障对贫农的支持。1月、2月、3月我们用低价向他们供应了粮食。5月和6月我们没有坚持住这样的路线,我们的粮食不够了。地方上的粮食周转量的减少导致了大量粮食的过分消耗,当我们计算我们的粮食过分消耗有多大和在哪些地区发生了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更多部分的过分消耗是发生在生产地区的——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在乌克兰,我们有过相当大量的过分消耗,而且在下半年就比计划多消耗了950万普特,比去年多消耗了1500万普特。在北高加索,上半年消耗的比较少,而在下半年就比去年多消耗了400万普特。

在莫斯科,虽然提供的粮食比以往的年份都要多,7、8、9三个月还是要排长队。买烤好的面包没有排队的现象,但是买白面粉是要排队的。当时就这个问题向各级组织都发了文,组织了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会,在政治局里也讨论过好多次<sup>208</sup>,我当时说过,面包比需要的要多,买老百姓想要储备的面粉要排队。伏罗希洛夫同志排了一整天的队才相信了,不是饿着肚子的人在排队,买面粉是为了储备。

在粮食的过度消耗方面,我们从中央统计局得到了什么样的材料呢?中央统计局说,今年城市居民紧急地、超出自己正常消费地购买了2 600万普特的粮食,而去年是1 800万普特,结果是多了400万普特。我们在莫斯科多耗费了300万普特。我们没有能避免这种过分的消耗,这是非常难以做到的,因为政策要求在十月革命节的日子没有任何排队的情况。我们是用停止出售面粉的办法消除了排队的。只要我们一停止出售面粉,排队的情况就没有了,而烤好的面包是随便买的。在列宁格勒,这项工作组织得要更好。那里没有发生排队的现象,虽然提供的粮食比莫斯科要少。

在所有这些困难的情况下,当工人集中的中心和工会提出自己的要求的时候,是很难节约的。在乌克兰,如果我们在那里不是过分地收缩集市的话,我们是能够少些消耗粮食,能够有更多一些粮食的。

我们对未来制定了什么样的计划呢?我想,我们的计划应该是能够大体上包括了80%的收购。总的来说,今年的计划可能将大体上就像去年的计划一样。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商品粮收购大体上包下80%,让地方上的收购单位和地方上的商品流通占有20%。这中间也包括了私有者。这就是我们的所有想法。

瓦雷基斯同志在这里批评了可能的计划。我说我们还没有计划。但是我想,如果收成的年景将像是现在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能够收购到7亿—7.2亿普特的各种粮食作物。当然,对我们来说,完成这样的计划将不是轻松的。如果年景将要比现在差的话,我们当然就不得不拿出一个小一些的计划了。但是我想,我们不应该像瓦雷基斯同志所说的那样,提出减少了的收购计划。我们应该更节约地消费粮食,应该在计划中有一定的余地。所有这些在我们的计划里都应该考虑到。

瓦雷基斯同志抱怨说,我们的月度收购计划给出的太夸大了。但是瓦雷基斯同志,您要想到的是,不这样做是非常困难的。为了有保险,我们应该给出的是一个多少要大一些的计划。

瓦雷基斯:几乎是大了一倍。

**米高扬:**不是大了一倍。但是我们是应该多少扩大一些计划的,为的是有某种保险。第二,应该记住的是,在制订计划的时候,我是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的。地方上建议我全年收购5.9亿普特。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联席会议<sup>209</sup>建议收购7.4亿普特。我该怎么办呢?我提出了6.75亿普特的计划。我认为这个计划是紧张的,但是总的来说是现实的。如果不是春天很特殊的话,我们是能够收购到6.5亿到6.7亿普特的。

**有人问:**收购了多少?

**米高扬:**如果与去年相比较计算的话,我们在1927—1928年度收购了6.25亿普特。

克维林同志激烈地批评了计划。但是要知道,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相信的不是我,而是他,说是7.4亿是可以收购到的,而且从这中间可以拿出来用于出口、供应等方面。党瞄准的正是根据克维林同志的建议,坚持要收购7.4亿普特。于是在这样做了之后,便是克维林同志的确很大的计划上的失误,我整年都是反对这样做的,而他则开始批评起别人的错误了。克维林同志最好还是说说,他准备怎样不再犯这样的失误了。

这里涉及到了粮食的储备和出口问题。我们应该有储备,这说的的是对的。但是我在自己的报告里说了,我们的粮食不够用,保持储备非常困难。我们没有能把储备保存住。去年我们运出去了6500万普特。我们能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储备没有,外汇不够。而如果把粮食卖掉,外汇就有了,但是粮食就将没有了。所以首先落空的是出口计划,外汇不够用。应该纠正局势。

[**斯大林:**数学上不只有一种规则。

**米高扬:**是的,不能从一个数字得出两个比基本数字更大的东西。这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来的。]从外部局势和所有的困难出发,不能没有粮食基金,首先是对出口来说是这样的。把出口排除掉是不对的。今年我们把它排除了,但是如果明年也排除,那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不在很大的规模上进行粮食出口的话,我们就未必能做到完全恢复我们战前的出口。我们不一定必须要做到完全恢复到战前的6—7亿普特的粮食出口量。如果我们能每年运出去2—3亿普特的粮食的话,这对我们就是完全可以的了。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到战前的粮食出口水平。因为随着国家工业化的成就,我们的人口将会增多,城市将会发展,工业将会发展,个人和工业消费的粮食也会增加,于是未必就能有剩下来用于出口的6—7亿普特了。但是我们应该指望得到并且瞄准每年2—3亿普特的出口,以便有外汇储备,粮食储备和正确地解决进口问题,这是我们工业的薄弱



环节。

在谈到调节问题和我就要结束自己的结束语时,我应该说,在讨论中有许多正确的意见。不可能在调节的实践中没有错误。不断有过过火的做法和倒卖的情况。埃赫同志转给我一份公文信件,是莫斯科商业局的机构给某些村的执行委员会发的,说到要让它们开始调节牙刷的价格并且争取把私有者从这个领域里排挤出去。当然,现在对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是愚蠢的。当然调节的事情是一件大事,是复杂的,机构没有什么专业水平,经验也不够。应该支持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机关,用有专业水平的工作人员充实它们。在调节领域里,我们应该改正这些过火的做法,而且只有在党的帮助下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争取让党的机关更接近调节市场的各种问题。

在转到各个具体建议的时候,我应该说,某些发言的人说,商业人民委员部自己承担的太多了,但是举出的例子是不成功的。我们承担的只是党通过中央和苏维埃通过劳动国防委员会交给我们的那些责任。我应该特别谈谈乌格拉诺夫同志关于家禽蛋类出口辛迪加的发言,因为这是作为商业人民委员部调节的不正确路线的一个例子提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乌格拉诺夫同志是不对的。首先说几个情况。说中央执行委员会把我的建议搞掉了是不对的。这样的建议是在3年以前由瞿鲁巴同志第一个提出来的,当时他是贸易人民委员。今年是我提出的问题。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了我的建议,决定组织蛋类家禽出口辛迪加。这是在几乎没有反对的情况下通过的,我不记得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上有过反对的意见。

**斯米尔诺夫:**不对,我反对了。

**米高扬:**你是在家里的,而且我并不知道你想的是什么。

**斯米尔诺夫:**我在委员会里表示反对了。这就是说,如果斯米尔诺夫反对了,这对您来说是小事一桩了。

**米高扬:**你没有在那里,你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里表示反对的。

**斯米尔诺夫:**报告的记录还有,我可以把它拿出来。

**米高扬:**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组织家禽蛋类辛迪加的建议,而且这个建议不是作为贸易人民委员会的建议,而是作为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议,送到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的<sup>210</sup>。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维护的不仅有我,还有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瞿鲁巴同志。在李可夫和他的副手们的会议上通过了我提出的那个建议,而且对政治局提出了一项建议,认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推翻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议是不对的。是的,在执行委员会里,乌格拉诺夫、斯米尔诺夫和另外一些人

坚决反对我们的建议。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妥协的建议,但是没有批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这是对事实的说明。

接下来作为自我批评和为自己辩护,我要自己说上两句。我认为,我们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政治局没有通过它,那是它在这个问题上错了。

有人喊:解释一下。

米高扬:可以,我来解释。这里说的不是要组织一个新的、全联盟的蛋类和家禽的收购辛迪加,不是的,收购的单位还是原来的那些,这里说的是在国外市场上苏维埃国家要作为一个主人行事,是一个卖主,要知道,我们用这些蛋和家禽可以挣得6200万卢布,比我们开采的黄金还要多。在我们这里的对外贸易中和在对外关系上,没有任何的新经济政策。在我们这里有的是国内的新经济政策。我们反对在国外市场上的各个苏维埃机关之间展开竞争。在柏林的市场上对付10个德国公司的,是8个苏维埃的官僚,他们彼此之间在竞争,给德国的公司带来好处,难道能够否认这个所有人都证实了的事实吗?这是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内线证实了的事实,是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人员和在国外的共产党员证实了的事实,这是了解了这个问题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同志证实了的事实。政治局是妥协性地做出了决定。政治局没有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边,也没有站在商业人民委员部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一边,决定不应该马上就联合起来,中央执行委员会想要把一切都搞分散也是不对的。于是政治局决定暂时把这件事交给2—3个组织。这就是说,提出来的基本的、原则性的路线是得到了政治局的赞同的,被作为基础。只是给了一个缓慢地实现这条路线的速度。这就是为什么我请求不要把这个例子算做是我们的歪曲或者过火的做法。

斯大林:不该只是生气。

米高扬:我认为这样的状况对对外贸易的垄断是一种威胁,我将要斗下去,反对一切破坏或者削弱垄断的做法。谁能否认在我国,在我们的经济中,有着破坏对外贸易垄断的危险呢?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可是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对付这种危险呢?这种危险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说,这种危险的具体表现就在于:我们的经济机关彼此相互竞争,正在破坏着这种垄断。

我们和乌格拉诺夫同志在蛋类家禽出口辛迪加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在渔业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关于乌格拉诺夫同志举出的关于阿斯特拉罕的渔业的问题,早在3个月以前,当人们向我要指令的时候,我就做出了回答,就像乌格拉诺夫同志在这里说的那样。

彼得罗夫斯基同志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批评意见,要求商业人民委员部更准

确地考虑到农民的储备。我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拒绝把农民的储备考虑进去,我也不会这样去做。

埃赫同志提出对各个州的地区性领导应该不是一个模式的,而应该是有区别的,要适应这些地区的特点,他说的对,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是他想用来证实这一点的一个例子是不成功的。他引证说我通过魏采尔同志下达了指令,要求所有的州在6月15日之前报告自己对收成和可能的收购情况的预测。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中央全会规定在25日或者20日,我应该拿出提纲,谷类饲料平衡表要由中央统计局在月底拿出来,而且我想在全会召开之前能有地方上的意见和材料。我们收到了这些预先的材料。<sup>211</sup>

埃赫同志反对给全权代表的委任状,但是他没有能引用一个例子说明,全权代表中哪怕是有一人利用了这个委任状。那些有了委任状的人有了最高的联邦机关的委任状没有什么妨碍。我们党的最优秀的领导人员是根据中央的决定派出的,而且是受了委任,拥有商业人民委员部自己拥有的那些权利的。我们认为需要把我作为人民委员所拥有的权利转交给我们的中央全权代表。我们在这里做的是不是正确呢?是正确的,是不是在1918年和1919年,这是无关紧要的。在1928年也不妨有委任和权利。事情办得很好,我们通过党的委员会进行了我们的工作,在全权代表和州的机关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分歧。

卡明斯基同志抱怨对合作社的调节中的过火行为。我不否认有许多东西是需要消除的,调节这件事是要改善的,要更多地利用合作社作为一个调节的因素,要提高调节工作,但这将要根据合作社的组织性的增长程度,根据它内部的经济运作能力的提高程度。而且这不应该理解成是要把合作社和国家机关分割开来。绝不是合作社应该让自己和国家对立起来,和国家分离开来。我们应该改善国家机关对合作社的领导,为的是让国家的任务能够由合作社更好地而不是更差地完成。需要让合作社摆脱开烦琐的领导,摆脱领导上的混乱和加强内部纪律和合作社的主动性。卡明斯基同志说,我们没有执行政治局的一个决定。他说有一个中央的总的决定说到,对合作社不能赋予亏损性的任务,说是这样我们会把合作社搞垮的。卡明斯基同志,请您说说,在这两年里什么样的合作社被搞垮了?没有一个合作社被搞垮了,虽然有一些是该有这样的命运的。相反,事实是在这两年里合作社系统加强了。

接下来。在一个城市里出售粮食获得很大的赢利,而在亚麻地区却没有粮食,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粮食不够,我们建议启动农业合作社,它不愿意,因为这里没有利润。你们说说,什么样的商人,甚至是私商,能卖所有东

西都是有利润的？一个合作社是赢利的，另一个是赔本的，可总的来说是得到利润的。我们保障的是总的利润。它说这就是违反了中央的指令。我认为这不是违反，让人们向我们证明吧，因为中央从来就没有给出过指示，说是任何一个合作社都不应该是亏损的。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我们应该是体面的苏维埃商人，而不是搞投机倒把的奸商。当然，在对合作社的调节中有许多东西是应该改善的，我准备分析每一个具体的上诉并且把一切能够改正的都排除掉。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克维林同志提出来的，这是关于从运输上调节粮食转运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北高加索有三年，在国家的所有基本地区已经有两年，存在着运输上的调节限制了私人和计划外的收购粮食转运的自由了。

克维林同志反对这种做法。我应该说，我主张取消用有差别的价格表来进行调节的这种做法，但是只有在粮食市场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才能够这样做，而暂时我们这里的粮食市场上是失调的状况，我们不能做这件事。

接下来，如果说到改善对经济的领导，当然它在很多方面是需要改善的，这是对的，但是我想，对国民经济的集中计划和支配基本的原料、粮食、燃料和其他资源应该和经济业务机关和地方的独立性结合起来的。发扬主动性无论如何不应该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挥霍掉，不能是既没有帆也没有舵，不从计划上把整个国民经济的最重要部分都包括进去和从计划上把它们都联系起来。我想，应该防备相反方面的危险：从计划性滑向无计划性。地方上的合作社的活动和主动性应该和计划领导的集中性结合起来。我想，在这里是没有任何分歧的，而且我们在实际建议的基础上也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分歧。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我认为自己有义务请你们注意到特别是在最近的几个月里我们还面临的那些困难，我们需要做到的是，无论如何要避免不得不采用非常措施，现在就把它们和与它们有联系的实践中的过火做法排除掉。为了顺利地完成任务，在新的收购运动中，应该充分地考虑到机构的所有缺点，应该提高我们的组织的积极性和组织性，应该正确和灵活地运用我们对粮食市场施加影响的所有杠杆，像工业品，对农民的所有各种征收，预定合同的做法，等等。在我们把所有的力量都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的情况下，是有一切条件能说明党能够应付这个任务的。

讨论表明，中央全会完全赞同政治局提出的决议草案。只要是争取正确的、列宁主义的政策，扫除歪曲这个政策的任何企图，争取在两条战线上反对这些歪曲和偏离，我们就能够光荣地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基本问题。

主席：接下来对粮食收购的决议怎么办呢？基本通过和选举委员会来审议和提出修改，或者是不用委员会在这里就最后通过它呢？

有人建议做个别的修改：对合作社的，对收成情况的，对粮食分配的修改。这些修改是相对涉及面狭窄的。

让我们先表决基本上通过的问题，然后再看是不是把它交给委员会，而且如果不交的话，那就可以这样来通过：批准决议并委托政治局做编辑，考虑到进行过的讨论情况和关于粮食分配、关于收成情况、关于合作社的修改意见。

卡冈诺维奇：我想，不把编辑决议委托给政治局，而是把这里建议的所有实际措施转交给政治局在制定措施的时候考虑。

主席：表决。谁赞成把政治局提出的决议作为全会决定的基础？谁反对？谁弃权？一致通过。

[我这里有几个文件是同志们递交上来在全会上宣读的。]

柯秀尔：是受了害的人中间提出来的。

主席：3个同志：索柯里尼柯夫，克里茨曼同志和西伯利亚的人对我在自己的发言中引用的语录的意见；这里不全是受害的人——奥新斯基没有提出任何东西。请允许我不宣读它们了，建议作为速记记录的附件。没有反对的吗？通过。]

第二个建议——是不是最后通过还是组成委员会。谁赞成组成提出修改意见的委员会？很少。谁赞成最后批准？实际的修改意见根据讨论的情况在政治局里提出来。表决。谁赞成这样做？一致通过。

明天11点加里宁同志报告集体农庄的情况。

## 第十三次会议

7月11日上午

主席(李可夫):请加里宁同志做关于国营农场问题的报告。

加里宁:凭良心说,我没有一点做报告的兴趣。(笑声)我这是严肃地给你们说,没有撒谎。要知道,我三天以前就考虑做报告,但报告拖了又拖,我就像被判处死刑的人,在死之前要比执行死刑的当时还要痛苦。现在有很多同志对我说:不要拖了。(笑声)你们自己可以设想一下,当全体听众的主要想法是不要再拖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心情。

臧声:决议是简短的,可以简短一些。

加里宁:是的,决议是简短的。这是对的。但不管怎么样,总得要转到正题上来。(笑声)

臧声:可惜了。

### 关于组建新的(谷物)国营农场

加里宁:我的报告从政治局的下列决议开始<sup>212</sup>。你们听到过关于组建新国营农场的决议。这是斯大林同志的提议。决议“通过如下提议:在四五年内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的一些不致因建立新的国营农场而触动农民‘份地’的地区建立新的大型谷物国营农场,要使它们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年产商品粮食1亿普特”。

这是“a”款。其下有“6”项:“委托由加里宁、库比亚克、莫洛托夫、米高扬、克维林(国家计委)、鲍曼和雅科夫列夫(工农检察院)组成的委员会全面研究这个问题。由加里宁同志负责召集委员会会议”。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成了在这里做报告的人(笑声),也就是说,由我召集这个委员会。

从外表看,这个决议没有超出政治局的大量决议。如果有人要研究政治局

的记录,比方说,未来的党的年鉴编写人……

伏罗希洛夫:他应当首先看一看特别公文夹。

加里宁:他将会感到惊奇,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要花掉3亿多卢布,在政治局审理一次就全面彻底地解决了。这是不同寻常的,或许至少是政治局工作中相当不一般的现象。在政治局,这类问题一般要提出几次;它们要经过反复加工,对这些问题会有许多分歧意见,往往要有2—3个月不会从议事日程上擦掉,而后才最终得以解决。例如第聂伯河工程的问题就是如此。现在突然提出要耗资3.5亿卢布的建议,政治局一下子就通过了。人们可能要想,政治局没有经过讨论,或者是至少没有经过大争论就通过了这个决议。但是,要是党的年鉴编写者这么想的话,那他在这个问题上可就错了。实际上,这个问题已讨论了多次,但不是直接讨论的国营农场,而是在确定合作化的途径和方法、研究提高商用农产品产量的办法时,讨论的这个问题。当斯大林同志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在心理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准备。所以,以前我们已经详尽地谈论了这件事情,当问题提出时,在政治局全体委员的思想中已经是水到渠成,因而也就一致通过了。文件中从来就没有规定过要进行这种内部的,或者准确些说,是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工作,但是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为通过这个问题作了准备。

是的,我忘了告诉你们,政治局关于国营农场的决议是在1928年4月23日提出的。从这一天起到今天为止,政治局组建新国营农场委员会一共召集了8次会议。委员会的材料相当多,你们大家都知道,要谈论所有的材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只涉及在我看来具有重要意义的、有限的决议。

我现在引用委员会会议第一次记录中最为重要的决议。这里有这样一款说:“根据所提供的资料,认为从保障新国营农场拥有大片土地、国家的财力条件、这些农场的经济合理性和盈利条件看,在未来3—5年期间内,从新组建的国营农场土地上取得一亿普特的商品粮的计划是可能的和适宜的。”

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很自然地提出了一个原则性问题:政治局下令在一定时期内组建具有如此生产能力的国营农场,不禁要问,这能做得到吗?委员会讨论了在指定时间内实际完成这个工作的物质能力并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它认为,国家在经济上是可以做到的;它认为,这是适宜的,在经济上是有利的。这是在相当多的人进行了大量讨论之后得出来的认识。

在这个第一次的记录中还做出一个决定:“核算和安排计划的出发点是,农业应当是谷物生产型的,其中的畜牧业只能是副业”。

这里的记录写得十分枯燥无味。这很明白,在提出这个决定之前,曾进行了大量辩论,论证了与农业相比,从事畜牧业有什么好处,有多么先进,等等。这里记录了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意见。

在委员会的决议中还有以下一款:

“认为必须向农业人民委员部指出,必须研究苏联以及美国和普鲁士典型谷物经营单位的组织工作经验,为此,必须将必要数量的领导干部派到这些单位出差。吸收国营农场领导人,从美国和德国吸收有声望的农业生产专家参与组建新国营农场。”

这就是政治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做出的决议<sup>123</sup>。委员会的任务有:第一,在苏维埃和党的上层进行大量解释工作,以便引起他们对国营农场建设的好感。第二,促进协调领导国营农场组建工作的机构。在记录的第4项里我们可以读到:“为领导新国营农场的业务活动,组建名为‘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的全联盟性质的托拉斯。全联盟‘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董事会由劳动国防委员会确定”。我再引用一个非常简短的决议。对于具有丰富的日常工作经验的你们来说,这个简短的决议是很好理解的。你们知道,在成文之前,需要对此进行很多的加工。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讲述了阿尔法和欧米伽,而我讲的却是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两个妖怪的故事<sup>①</sup>。(笑声)

伏罗希洛夫:你同自己的同事搞起了比赛——讲开了神话。(笑声)

加里宁:瞧你们笑的!

伏罗希洛夫:开始炫耀您的学问。

加里宁:我这是对古代史做的一个简短的回顾,用来说明组织活动史,以便听得轻松一些。

斯大林:这也无妨。

加里宁:我们这里插入的一段回顾是一个好的征兆,说明我们这些老人经受了良好的教育。您可要记住这个。

伏罗希洛夫:您现在不需要文化革命。

加里宁:得啦,有些文不对题了。(笑声)这没关系,当然应当大胆一些。

臧声:说得好。(笑声)

加里宁:还有,最后,同志们,我想再给你们引用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记录中的

<sup>①</sup> 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希腊神话中的两个妖怪,居住在一条狭窄海峡的两岸,溺死来往的航海家。——译者注



一段(我不再老是用引文让你们心烦了)。这段引文非常重要：“(1)认为有必要组建以局长为首、由五人组成的‘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管理局。”

你们看到了吧,组织核心是如何逐渐地、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地孵出来的。(笑声)

伏罗希洛夫:你还是言归正传吧。

加里宁:当然,可能这一切本来是在一次会议上就可以决定下来的。(笑声)

梅德韦杰夫:而您安排了八次。

加里宁:昨天伏罗希洛夫向我推荐了一位很有意思的人。他想要在国营农场工作,并把他自己工作的书面计划交给了我。他在计划里说,为了能够取得成绩,我应当能够自由地雇人和自由地解雇人。

丘巴尔:支付工资也是自由的吗?

加里宁:我回答他说,您忘记了,我们是在苏维埃国家里。而苏维埃国家的原则是什么呢?需要做到的不止是完成交给您的工作。如果是您完成了交给您的工作,别的就没有了,那您还没有做完所有的一切。必须让群众参与完成交给您的工作。您也要学会做到这一点,而不是您单纯地完成了,而是要让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感觉到,让他们都积极地参与了完成这件工作。顺便说一下,我就是这样教导持有另一种世界观到我这里来工作的人们的。十分自然,如果我是这样教导别人的,那我就该在自己的实际行政工作中也运用这个方法。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喊声:明白。

伏罗希洛夫:明白了,怎么能不明白呢。(笑声)

加里宁:因此,当我把这个决定拿到第七次会议上的时候,不是我决定了要这么办,而是我周围的同志们下决心要这么做的。(笑声)如果我是在第一次会议上就通过了这个决定(这是可以做到的),那么,这就是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了(笑声),而现在这里实行的,已经是经过锤炼、经过磨炼、得到公认的方法了。

李可夫:而且是带有自我批评的。

加里宁:是的,也是带有自我批评的。

所以,第一项是以董事长为首的董事会。第二项是“董事会是国营农场整个系统的法人”。

第三是“谷物国营农场,加上它所有的经济部门,是一个生产经营单位,有一套完整的报表制度和独立的资产负债表”。

第四是“对谷物国营农场要建立一个集中的管理体系。谷物国营农场管理局直接从董事会获取组织计划、生产计划、概算和年度预算,对董事会做年度决算报告”。

第五是“谷物国营农场根据专门的国营农场管理条例进行组建和管理”。

第六是“在新建国营农场的初期,适宜的做法是,由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以及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部任命全权代表来协助国营农场的土地划拨和履行组织工作手续”。

还有一个决议规定,在其他共和国的这类国营农场没有组建起来之前,“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暂时由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代管。

于是从实质来说,基本的组织工作,或者说是组织工作的骨干、框架,就是这样的。自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进行了实际的建设工作。正在渐渐地、小心谨慎地挑选人。然后,在地方上,当人们感觉到在这里可以闻到钱味的时候,就开始越来越积极了,这是毫无疑问的。(笑声)

喊声:这完全正确。

加里宁:我也知道这是正确的。这很好,但我们也不能忘记,物资意味着什么。组织工作总是要进行调整的,但同志们,我应当直接告诉你们,这是十分困难的工作。当你调节什么实际东西时,不是简单地在写决议,任何决议我们都会写,而且写得很快,要是调节具体事务,则需要大量时间。

我想谈谈委员会的两次非常有趣的会议。一次会议是由教授、农学家、多少有些名气的农业活动家和熟知国外农业的专家参加的<sup>214</sup>。而我也应直截了当地说,这个会议提供的成果要比预期得少。第一,正是这个会议十分明确地表明,我们从旧的地主制度接受下来的农业遗产是何等简陋的组织形式和何等少得可怜的专家。没有任何技能,绝对没有。甚至没有任何科研力量和技术设备,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留在了大学里,只是些搞理论的。不但如此,从政治局在理论上拟定的建设国营农场的工作来看,当我们面向国外,探讨可否从那里获取这一领域的什么指标,了解能否往国外派遣人员去学习的时候,正像有人说的,如果那里有现成的形式、现成的组织,为什么我们自己还要费尽心机去发明人家早于我们想出来的、非常容易掌握的东西呢,结果发现,国外在这方面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其实,外国在谷物生产方面,在整个农业生产方面,几乎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因为它们的农业生产依靠的是中型农场,准确些说,是这类农场起着比较大的作用……

伏罗希洛夫:也就是私人的主观能动性。

加里宁:这更多的是比较狭隘的、有局限性的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伏罗希洛夫:对,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加里宁:完全正确,是狭隘的、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过对于建设新国营农场来说,我们在外国还是有所得的。那边挂着地图,大概大家都看到过,所谓的肯普别尔大型农场就在那里。这几乎是唯一的在技术装备的组织上接近国营农场的企业。当然可以再找,但不管怎样,这样的农业企业在世界上是很少有的。绝不能说,这样的企业有很多,可以把它们拿来作为样板,等等。

臧声:要知道,这不是国营农场。

加里宁:当然,应当说,这是资本主义类型的企业。因此,既然我们没有建设大型国营农场的任何经验,那我们就不得不既从组织机构、又要从科研和技术上自己来建设了。不管怎么说,我再强调一次,这个会议给我们的比我们对它期待的要少,而根据我们了解的多少,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是经验丰富的。

之后,又开了第二个会。这第二个会是由各个生产拖拉机的工厂的厂长参加的<sup>215</sup>。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也弄明白了,在拖拉机生产方面,当然也有成绩,但实际上只有普季洛夫工厂一家的做法是成功的,而所有其他厂只进行批量生产,还不可能说到有向流水线生产过渡的想法。自然,当拖拉机不是成千台地生产,而是150台、180台、100台,比如哈尔科夫厂的“公社社员”牌拖拉机的最大产量为180台的时候,那么请问,应当如何办呢?它们的生产,就像蒸汽机车的生产一样,是机械的、单个的批量生产。

我同一位厂长谈过话:他说,他们可能可以增加20台。但这没有意义。至少这是谈不上流水线生产,大批量生产的。

普季洛夫厂大概能较快地向这一方面转变,它现在正在经受着分娩的痛苦,已经忙碌了5个年头。它今年将生产1200台,这已经是由批量生产转向了大批生产。

我们工厂主要的组织错误在哪里呢?我觉得,错误在于,普季洛夫厂如果要生产拖拉机,它就认为这些拖拉机的所有部件都应当由它自己来生产,与此同时,我发现,在美国生产拖拉机,是令人惊奇地把各种工作方法联合在一起。为什么小部件不能在莫斯科或者哈尔科夫生产?我想,如果我们能够采用这个方法,那就太好了。当然可以说,我们的厂长们是热爱自己的事业的。

斯大林:每个人都想自己把所有的事情都揽下来。

加里宁:现在他们明白了这一点,不管怎么说,这个技术问题已经提上日程了。我觉得,我们应当推动一下,不要吝惜资金,要让普季洛夫厂今年能生产

出3 000台。我有这么个印象,当斯大林同志在会议上对厂长施加点压力时,他不管怎样推托,也会说,如果给我们14种现成的零部件,我们能生产出2 000台。我觉得,古比雪夫不得不向他们施加压力了。我们已经写出来了:明年生产3 000台,我们认为,普季洛夫厂的拒绝在技术上是站不住脚的。

为什么我这个政治局谷物国营农场委员会主席对拖拉机生产,对俄罗斯的拖拉机生产,表现出这么积极的要求呢?

丘巴尔:您对其他事情也表现出了这样的积极性。

加里宁:在什么事情上?人家可能以为是在什么不好的事情上。

丘巴尔:不止是在生产上,而且也表现在挑选拖拉机上。

加里宁:瞧您说的,这可是中央呀,它就是要“挑选”的呀。这也是好事:中央“拿走”的拖拉机越多,这意味着它“越强壮”、“越能自立”,地方越是“绝对”服从中央的决定,它们就越会被认为是“健康的”。(笑声)您自己也是同意把它们拿出来的。

我还是在想,依靠进口设备来建设我们的国营农场是危险的、不可靠的,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有可能遭到危险,都有可能会失掉这些设备。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尽最大的可能在我们的条件下发展拖拉机制造业。我们已经同军工部门谈好,我们从它们那里拿拖拉机,问题只是在价格上。我认为,不能让军工部门吃亏,价格应当是实在的。

伏罗希洛夫:怪事!你还想按便宜价格得到这些拖拉机!

加里宁:我什么都不想,就想给你谋取好处。

总而言之,一句话,建设新的国营农场和生产拖拉机的问题是两个不可分割的问题。如果我们确实想要拿到一亿普特的商品粮,那我们就应当生产拖拉机,把拖拉机制造业安排好。

伏罗希洛夫:新组建的国营农场需要多少拖拉机?

加里宁:2.5万台。好了,同志们,用学者的表达方式说,这就是我们委员会简短的、就事论事的述说。

李可夫: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二位主席是用希腊语进行的谈话。

加里宁:这话该怎么翻译呢?

奥新斯基:实打实的。

加里宁:不过有意思的是:在我做完报告之后,就会有人问,加里宁为什么说“就事论事的”?这就是说,凡是感兴趣的人将都能知道我的报告说的是什么。

现在我从这种就事论事的述说,或者说是从这种实打实的述说直接转到谈

问题的原则方面上来了。我已经向你们宣读了政治局的决议。决议是一致通过的,可是在其他问题上,在需要大量支出的时候,我们几乎从来就没有过一致意见。(笑声)

**李可夫:**请你注意,表决总是一致通过的。

**加里宁:**在需要大量支出的地方,几乎从来没有过一致意见,因为一部分人觉得必须给,另一部分人觉得需要等一等。而这一次是一致通过的,尽管政治局委员们都非常清楚,我们这个决议决定的是3.5亿卢布的支出。因此,当我说“一致通过”的时候,这是在证明,所有的客观条件都成熟了,一致决定这个问题的良好条件已经具备了,思想上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决议是通过了,我们是不是提出了新东西,有没有冒进,哪怕是超出了我们的计划呢?

我也提醒你们,其实,这个决议的通过,仅仅是我们刚刚开始真正实际执行我们的计划。现在恰好可以告诉你们这个计划的第10项。这一项说的是什么?“苏维埃政权在全面取消土地私有制之后,已经转向实行一整套组织大型社会主义农业的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有:(1)建立苏维埃农场,也就是建立大型社会主义经济单位;(2)支持各个团体以及共耕社耕种土地;(3)对所有的未耕地,不管是谁的土地,一律实行国家播种”。这里不妨提醒一下,让你们能把决议吃透。这就是在第10项有一个第3分项,说的是:“对所有的未耕地,不管是谁的土地,一律实行国家播种”。这就是说,不要去争论中农和富农的问题了,来执行这个决定吧。(笑声)下面是:(4)国家动员所有农业力量采取有力措施来提高农业耕作技术;(5)支持农业公社这种庄稼人完全自愿的联合会来管理共同的大型经济。联共(布)把所有这些措施看做是绝对需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唯一途径,……联共(布)力求尽可能比较全面地贯彻这些措施,把这些措施推广到我国比较落后的地区,并在这一方向上继续采取措施。正像你们看到的,政治局做出这一决定说明我们只是在着手切实完成我们的任务。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着手这么做呢?这里有什么新东西?加里宁为什么要做这方面的报告?要知道,我们实际上有国营农场,必须直截了当地说,国营农场在发展,虽然没有工业的动静那么大,但它们的商品化一年比一年大,它们在总产量中的百分比一年比一年高,但这个总产量中的百分比眼下还很低。组织机构在成长、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建造无产阶级。这样说吧,实际上不是无产阶级,苏联已经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了。(笑声)不过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下一项去说吧。在我们这里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为什么是非常明显的!我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而你们自己在心里回答:这是为什么。为什么非常明显!当前的这

个形势为提出组建新国营农场的问题创造了极其良好的时机。工业对农业的需求、对原料和食品的需求一年高于一年。这个需求在大幅度增长。最后,我们粮食产品的缺口越来越大。不止是粮食不足。要知道,粮食的不足最为尖锐,而我们对肉就完全满足了吗,我们对奶制品就完全满足了吗?要知道,在我们这里奶酪一俄磅是80戈比,而在战前,同样的奶酪25戈比一俄磅。这确实是事实。如果我们现在把奶酪的价格、油的价格和禽蛋的价格像粮食那样,定在战前的票面价格上,那么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就会大幅度增加。现在,这些产品的昂贵,怎么说呢,掩盖了它们的不足……

**伏罗希洛夫:**限制了对它们的消费。

**加里宁:**掩盖了它们的不足。这个问题十分清楚。因此,当在这里,在我之前,争论有没有危机,是联合还是分离的时候,这是政治家的争论,而我在这里,在这件事上,是作为经济工作者、生产工作者在你们面前讲话的。我暂且假定把这个问题的所有政治方面的东西都抛在一边。我说,粮食不够。哪一位能说粮食够用呢?

**柯秀尔:**而这与政治毫无关系。

**加里宁:**我现在不是从政治,而是从生产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有哪一位,即便是一个人也好,能说粮食够吗?没有人敢说,也没有人说过。缺多少?我们最少需要5亿普特左右。

所有这些议论,说什么富农把粮食藏了起来,什么有粮食,他们不交出来,所有这些都是议论,仅仅是议论而已,因为我们有办法把富农的粮食拿走。要教卡冈诺维奇或丘巴尔如何拿走这些粮食,那是可笑的。他们会有办法拿到手。瓦雷基斯以前就是这么一个疼爱百姓的人,如果他都学会了拿走粮食(笑声),那你们还想怎样呢?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假如富农有很多粮食,那我们就会有这些粮食。是不是这样呢?你们凭良心说,如果富农有很多粮食的话……

**喊声:**要多少有多少。

**加里宁:**如果富农的粮食要多少有多少,难道我们的粮食能不够吗?没有这么多粮食。然而这是不是,我们根本就没有粮食呢?如果我们能用称药的天平分配粮食,那么我们的粮食是足够用的,而且还有剩余,但是,我们和他一起计算过了(指C.柯秀尔同志)。我是自己计算的,你也是自己计算的。如果在我们这里每一家能有50普特的储备,那么,全联盟就将是12亿普特。“聪明的”统计学家说,战前有6亿普特,而现在有8亿普特,是可以随意拿到的粮食,是富农把它们掩藏起来了,可是要知道,战前有1600万农户,而现在则是2400

万户。

李可夫：对。

加里宁：这是多大的差别，有了这么大的差别，所有老的计算方法都没有用了。

李可夫：对！

加里宁：这些办法一点也不管用。而他拿了25普特。如果是25普特，那就是6亿普特。除了共产党的政权以外，你们能不能在世界上给我找到这样一个政权……

丘巴尔：除了我们以外，世界上没有共产党政权。

加里宁：在农村，我们就是力量，这对不对？您去拿这25普特，试试看，除了粮食征集制以外，用任何方法也都是拿不到的。这里的根本问题是生产率不高，粮食不足，而这个粮食不足就要逼着我们去组建国营农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需要寻找出路，重大出路之一就是组织国营农场。

我不知道，斯米尔诺夫同志在不在这里。他认为，我刚刚当上了组建国营农场委员会主席就背叛了他。（笑声）他说，我写了这样的提纲，通过这些提纲去把萨普罗诺夫拉到了自己的身边。（笑声）但是，我依然是要保护个体经济的人。但不仅仅是斯米尔诺夫，还有奥新斯基也尖刻地问：而你的农民在哪里？

奥新斯基：你的富农在哪里？

加里宁：你的富农在哪里？“我的”富农在哪里？他以为，我害怕说出“我的”富农在哪里？

斯大林：你的富农是在原地坐着的。

加里宁：我认为，奥新斯基在这里冒出来的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笑声），因为他没有弄明白，这个加里宁怎么既“支持”富农，而同时又支持国营农场。老布尔什维克怎么竟“支持富农”……于是他便想，这说不清，这不正常。

他当然要想：加里宁是马克思主义者。而这意味着什么？我全身心地支持大型农场，我觉得，基础是大型农场。为什么“我要支持”富农。（笑声）你们怎么想，凡是“支持”富农的就都代表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吗？

奥新斯基：不，不是的，是资本主义的。

加里宁：说得好！问题是如何支持富农？可以是支持，也可以是带引导地“支持”。可以是马克思主义地“支持”富农。（笑声）伊里奇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要把地主作为地主消灭掉，而对富农只……他是怎么说的？……我们要施加压力。

喊声：我们要限制。

加里宁：不是的，他用的词要更重些。他说：我们要镇压。我们不是消灭，而是要镇压。

雅罗斯拉夫斯基：难道这意味着“我们要支持”？

加里宁：等一等，等一等，别超前。我经常“支持”富农。以前不止是我“支持”，不久以前政治局全体“支持”了斯摩棱斯克省的富农。（哈哈大笑声）

喊声：我们原来可不知道这事。

加里宁：斯摩棱斯克省执行委员会做出迁移富农的决定，而政治局则决定<sup>216</sup>：只迁移贵族地主，不迁移富农。这意味着政治局支持富农？如果说，政治局在这种场合支持了斯摩棱斯克的富农，那么我也“支持”富农，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当您执行不正确的政策的时候，我就要“支持”。您看怎么样？现在我就给你们解释，仁慈的先生们。（笑声）

我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们多“关照”一下富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有什么了不起的灾难的。政治局在对斯摩棱斯克省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依据是什么？政治局所遵循的是，它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出发。就是这么回事。你们现在明白了吧，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政治局认为迁移富农在政治上是不合适的？然而，我们这里有这类倾向吗？总的说来，是有的。不久前波鲁扬告诉我，他那里有两位代表，一位来自梁赞省，著名的富农省份；另一位来自特维尔省，也是富农比较多的省份。他们询问，征求意见，是不是可以把富农从这几个省份迁移出去。从哪些省迁出去？从“富农最多（?!）”的省份。让诺索夫同志站出来说吧。波鲁扬问：怎么办？我说，首先需要请他们写出书面文件，这些文件将是这些省的历史文献。

你们是地方领导人，你们说，没有粮食。而实际上，当你们破坏富农经济的时候，你们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我们如何替代富农的这个生产基层组织、富农的这个巢穴？每一位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在迁移富农、破坏富农经济的时候，最好事先成立一个由3个人组成的委员会，大体上提出如下任务：只要你们还不能百分之百地把它生产部分利用起来；如果不是你们中的每一位都能向我保证，你们能保留和弥补富农应该完成的那部分生产，那我就不能迁移富农，那我就要说：我坚决反对这样做。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你们就把富农打死、吊死、枪毙好了。你们是如何想的，如果是破坏了经济，不考虑如何弥补这个部分的生产，

\* 原文如此。——编者注



你们心痛吗？你们对这一点考虑过没有？我要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太欠考虑了，我要指责的是你们所有的人，因为谁都没有来找我，一次也没有来过，谁都没有说：加里宁同志，我们那里下了命令，要迁移地主，让我们缓一下；我们希望更好地利用这个经济；我们要是把这部分人迁走了，就播不上种，经济就要下降，那怎么办呢，让我们缓2—3个月，让我们把这部分经济利用起来吧。是的，从来没有人来过，一个人也没有来过。可是却有人曾找上门来，要求迁移富农。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不管是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还是省委书记，对本省农业生产力哪怕是最小的责任也不承担。但这恰恰是最大的责任。你们是怎么想的，难道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或者省委书记对农业生产率下降不承担责任吗？你们如何看，如果特维尔省没有了亚麻，诺索夫同志，亲爱的，你在这个事情上就没有过错吗？

**诺索夫：**有过错。

**加里宁：**这就是非布尔什维克的做法，是没有成效的做法。布尔什维克尽管是男人，应当“会”生孩子。（笑声）你们是布尔什维克，还说这不取决于共产党……

当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讲话的时候，在我看来，他的辩论有点说过了头。他手里握的是什么牌呢？他说，他们把播种面积扩大了27%。

**卡冈诺维奇：**扩大了29%。

**加里宁：**是的，扩大了29%。我是说，卡冈诺维奇同志，这张牌是应当重视的，可是您不会用。可是，诺索夫同志，您说，那和我们无关。

**诺索夫：**不是的，我说过，我有过错。

**加里宁：**这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把播种面积扩大29%，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还是“有关系的”。

**诺索夫：**我已经说过，我有过错。

**加里宁：**不，对不起，要是您对中央委员会负责，要是柯秀尔同志每年都催促您，找您询问收成如何，向您询问，您知不知道产量情况，为什么亚麻没有了，要是今年仍然催促您，明年还催促您，那时，您的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就不会来迁移富农了。他就会“爱惜”每一个富农，他就会说：“活见鬼，是应当把他迁移出去，可他拿出了20普特亚麻，因此，应当暂时把他留下。”（笑声）

现在我们正在驾驭农业，但这种驾驭是落后的，困难的，应当提高这种驾驭的水平。你们都来试一试吧！所以我说：当富农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应当弄明白，给富农以什么样的支持。为什么我敢说，我要“支持”富农？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的朋友伏罗希洛夫同志完全同意我的做法。（笑声）

因为我们支持的不是富农,而是我们希望生产部分能够更好地保留下来。

我们希望生产部分能更好些,因为生产部分现在已经被拿过来了。所以我认为,中央委员会要对这个安排负起责任来。怎么会这样?你们看到没有,柯秀尔同志坐在我的面前,要知道,他要为生产负责,那么执行委员会主席和省委书记为什么就不对播种负责呢?应当改变这种做法,斯大林同志!而且我认为,这个部分比优质粮食更重要,因为执行委员会主席要是知道他要为黑麦负责的话,他就会把粮食弄干净了。(笑声)到那时,他就不会来找我们了。现在你们就会明白,怎样才能把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

我为什么主张搞国营农场?也不止是我赞成搞国营农场,我同莫洛托夫一起,是站在为国营农场增加拨款的最前沿的。听听斯大林同志是怎么说的吧:“我完全同你们站在一起,因为没有其他出路。”(笑声)既然加里宁和莫洛托夫都这样,那怎么办,我也必须支持国营农场吗?为什么?我有一个想法,全部问题就在农业生产。大型富农经济垮了,没有代替的东西跟上,要驾驭又得不到响应;搞分散,我们大家都是好手,而搞生产我们就很差了。因此,我赞成对集体经济和国营农场给予最大限度的拨款。从这一点出发,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要支持国营农场和集体经济。我也知道,个体经济,即便是在我们的条件下给它最理想的安排,也不会让我们满意的。在最近的5—6年内,它可能可以让我们满意,可是以后就不能让我们满意了,因为我们的需求将会有大幅度的提高。我们应当做好准备,而国营农场是未来的基础。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我成了狂热的组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拥护者,同时也迫使我珍惜每一个重要的生产单位。我希望你们也能有这样的认识,如果你们有了这样的认识和理解,你们不必担心,你们是不会感染上富农习气的。这只能意味着,你们受到感染的是重视生产效益。但是,你们要是在这方面有一点点做得过头了,在我们的条件下,那就有害了。如果你们以为,周围环境会自动保证顺利实现所有的意愿,那就太天真了。这样的话不要说!与此相反,如果一个人不去追求生产效益,那么事情就会很糟;如果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和省委书记不站在扩大生产运动的前头,那么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糟糕。

但是为什么要搞新的国营农场呢?我们要建立的是新的组织,而同时我们这里还有旧国营农场的组织。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在旧组织上,发展它,不是更简便些吗?支持这个路线的人确实很多。我以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提法,同志们。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旧国营农场的组织机构,我把它称为乡村的工业组织或者叫农业工业组织,效益很小:它的管理方法是指令式的,这与农村的社会舆论

息息相关,其中有很多政治上温情脉脉的情况,它又是与农业人民委员部联系在一起的。十分自然的是,既然与农业人民委员部有联系,又要按照农业人民委员部的路子走,它就面临着一系列教育任务和其他附属任务。而旧国营农场是以前的地主农场。它们不是建立在有利可图的地方,而是完全凭着偶然建立的。我认为,我们国营农场的基本建设方针是另一种方针,我们的国营农场是另一种组织形式。形象地说,可以这样来表述……埃赫同志,您不要走。他害怕,因为我们想让他当国营农场场长,瞧,他躲出去了。我的设想是,现在,用工业技术和科学全副武装起来的城市正在向土地进发,城市在前进,明白吗?城市里的技术没有半点农村的温情。柯秀尔,技术在前进!

C. 柯秀尔:哪一个柯秀尔?

加里宁:不是你,柯秀尔。如果你去,不会有任何成效,因为他不是生产者。正在进行的是工业化。工业化在前进,带着的是机器和技术,正在向土地走去,没有带上任何庄稼汉的那种……

臧声:浪漫。

加里宁:土地产生的浪漫,带去的是技术,除去技术,除去机器加工,它什么都不懂。问题就在这里,新方针的价值就在这里!我们能不能这样提出来,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必须要提出来。

因此,当国营农场转交给谁的问题提出的时候,我咬着牙同意将委任状转交给农业人民委员部。实际上,我所希望的是把它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或者商业人民委员部,交给谁都行,就是不要交给农业人民委员部。(笑声)这是为什么呢?这不是因为对农业人民委员部不尊重……

臧声:为什么不交给邮电人民委员部,那里也很好?

加里宁:也可以交给邮电人民委员部。你们听明白我的想法:因为管理方法、管理态度不一样,也应该不一样。如果农业人民委员部能够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那时有可能会是朝着另一个方面做得过分了。而我们是懂得这一点的。因此,我说,我们是在有充分的技术准备的情况下做这件事,不要有任何感情用事的地方,因而集中化的问题也就在这里清清楚楚地显现了出来。当需要集中化还是非集中化的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安德烈耶夫同志说:

“大概只有您不愿意实行集中化”。我再一次强调说:必须实行全联盟范围内的集中化。当我遇到了美国建设糖厂的问题时(你们记得吗,丘巴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过争辩:他说,你们把一切都集中起来),我应当说,那里的优秀企业是集中起来的,这谁都知道。

臧声：人家是按另一种方式集中的，人家会集中。

加里宁：瞧，你们真会说，这就是实质所在！

现在，我作为组织者，有这样一个问题：我感到，我觉得，我还没有触摸到地方本身的工作，我离它太远。我是政治局委员会的主席，总是在想，当你建设的是一个集中化的组织的时候，总是想要能直接感触到地方上在干什么：能够想象得到正在运转的每一个螺丝钉在它所在的地方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是当前非常困难的工作。

臧声：也是不可能的。

加里宁：我们可以下达命令，但这些命令是放空炮。当我看到，这个螺丝钉转动起来，这项工作在进行的时候，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在中央可以感触到地方上每一个螺丝钉的转动，这将是集中化的机关，而没有这个集中化的机关，这里将不会有结果了。看一看列宁是如何对待组建国营农场的，将很有意义，十分有趣。这就是农业问题提纲草稿：“由于俄国的经济落后，主要是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使用，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土地留作办所谓‘国营农场’”。是的，我现在就充满感情地、有声有色地朗读：“国营农场由无产阶级国家自己经营，并把以前的雇佣工人（即无产阶级）变成执行国家委托的工作人员。”<sup>217</sup>

同志们，你们记得，反对派说过，是不是社会主义工业？无产阶级是不是受剥削？你们都知道，列宁时期的国营农场是什么样的，他说：不是受雇佣的工人而是“执行国家委托”的工作人员在国家工业和国营农场里创造产品。在这个报告的开头我就提到，我们这里说的不可能是无产者了：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按照国家委托、享有全权的工作人员。正因为如此，可以要求他们更多一些。你们看到了，那些说列宁不重视国营农场的人是不对的。他极其深刻地理解建设国营农场的必要性。

为结束这个话题，我谈一谈弗鲁姆金同志对列宁的不正确的解释。他说，列宁在对瓦尔加<sup>218</sup>的一书所作的评论中写道，在俄罗斯，对城市供应食品问题的重点，在专政存在的最初年代对农民进行了沉重的试验之后，就转向了国营农场，列宁写道——这是胡说八道。弗鲁姆的引文是正确的，但他把引文解释成，似乎列宁认为国营农场完全是胡说八道。列宁是说过，如果把给国家供应粮食的重点转向国营农场，那是胡说八道，但列宁根本就没有说建设国营农场是胡说八道。

斯大林：列宁说的是：“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之后经过2年”。

斯米尔诺夫：当然，要是在那个时候把向国家供应粮食的重点转向国营农

场,那是可笑的。就是现在,假定说,我们做出决定要把对国家的供应重点转向国营农场的話,我们就是现在也会说,这是胡说八道。

**斯大林:**而且这么做就对了。

**加里宁:**现在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国营农场在很长时期内将只是辅助的经济,而且在更长时期内,主要的和基本的对国家供应的重点还将要放在个体经济上。

**斯大林:**正确。

**加里宁:**我现在就引用斯大林昨天引用过的引文;我只是要比斯大林同志更带感情地读这段引文。我这里有这段引文,他在我之前,没有带感情地读了这段引文,而我要带感情地读。

在这里,在这段引文里,我和斯米尔诺夫同志表示我们的爱慕。列宁说:“改造小农的事业,改造他们的心理和习惯的事业——是需要几代人的事业。”请你们记住。当然,很多人可能要滥用这段引文,说什么需要几百年。

**斯米尔诺夫:**看来,他们不知道布尔什维克的速度,我们用4年时间就可以了。

**加里宁:**瞧,这就是带着感情朗读意味着什么!“只有物资基础、技术,在农业上大规模使用拖拉机,才能解决这个涉及小农经济的问题,才能调整它的心态”。这就是问题所在。“只有用物资基础才能”“解决这个涉及小农的问题,调整它的心态”,也就是说把小农变成集体主义者,只能用物资基础!因此,技术,在农业上大规模使用机器,对我们的各项决议和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一种决定性的帮助。就是这些才能从根本上快速改造小农生产者。在读了这段引文之后和在读这段引文之前,斯大林同志就描绘出了小型经济的景象。我完全同意,完全赞同他的所有看法。

**喊声:**彻头彻尾地赞同。

**加里宁:**但是他很机敏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提一下他说的话),小型经济将在更长久的时间内是我们的生产基础。这是对的。我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它将在很长的时期内不止是基础,以后,在很长的时期内,将要完成一系列辅助功能。如果10年后,我打个比方,国家为我们获取50%的粮食,那我认为这是有可能做到的。但要想在10年后让国家生产出禽蛋、水果等产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的个体劳动太多了。因此,谁要是想随便就把个体劳动甩掉,那是不对的。

**奥新斯基:**美国证明,这完全不正确。禽蛋和水果是由大企业生产的。

斯大林：瞧，一下子蹦到美国去了！（笑声）

加里宁：我说的是，个体经济将在很长时期内依然存在下去，谁要是想耀武扬威地把它甩掉，我看他做得就十分不对了。斯大林同志做了分析，对这个分析，我一点补充也没有，没有什么好补充的。这个分析完全符合我的想法。他说，我们有帮助农民的手段。我认为，手段是有的，毫无疑问是有的，但他为什么没有说出，这是些什么样的手段呢？

臧声：各种各样的手段。

加里宁：当人们说“各种各样”的手段时，这就是说几乎没有什么手段。斯大林同志在红色教授学院所做的报告里列举了所有的技术手段。我认为，同志们，我们需要个体经济，我们应当提高它。但请你们告诉我，个体农业发展或者进步的最为重要的基础，整个基础的基础是什么？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不管我们把多少黄金撒给它，也无论我们给它多大的帮助，这种经济是绝不可能前进的。

臧声：利润率。

加里宁：不止是利润率。当斯大林说，切尔诺夫是苏联人的时候，应当补充说：他自己毕竟是主人，他知道，个体经济的主要症候在哪里，他说：请给权利吧。你们听仔细了，不管你们怎么说，只有个体经济具有最低法律保障的时候，它才能好好地工作。要是不这样呢？如果你有两三头母牛，还要向你征税，征收你收入的35%，而你总共收入了600卢布，你怎么能发展你的经济呢？而且还要把他列入富农行列？这样的个体业主甚至不知道，何时会把他列入富农的行列。有些地方不把富人列入富农，而另一些地方却把贫农看成富农：这都要看丘巴尔、诺索夫、卡冈诺维奇的赏识了。同志们，问题是严肃的。如果你们不是开玩笑，是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那就应当把个体经济调理好，拿出一个框框来，清楚地把它勾画出来。我没有说，拥有十头母牛的富农不算是富农，而是要给农民一个框框，让他们知道可以把经济扩大到什么界限，拿出法制，用法律限制富农的剥削势头。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同志们，个体经济是以个体的首创精神为基础的。我们能够帮助个体经济吗？我要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在物质上帮助的能力是非常低的。

其实，要是现在有人向我提议：我们眼下有一亿卢布，这个钱给谁对我们有利呢，给个体经济还是给国营农场？我知道，斯米尔诺夫同志会说，个体经济将提供较大的效益。假定说，我们现在有一亿卢布，请问，把这些钱是交给个体经济呢还是交给国营农场，我要说，不，对不起，这个钱要给国营农场，因为一亿卢布在农民经济中就会分散得无影无踪了，效益可能提供出来，但也可能提供不出

来。总起来说,这是模糊的效益,非常模糊的效益。我们不能毫不在乎地把自己的资金乱撒,我们不能完全只依靠个体经济。我们应当具有基地,我们应当准备保障。现在我们应当把拖拉机转交给谁,转交给国营农场还是个体经济?当然,我不同意现在把已经交给农民的拖拉机再从他们手里拿回来,但是我也反对在必须调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现在,在这个时刻,把拖拉机交给个体经济。这没有好处,拖拉机的利用率将会较少。我们首先要把工具供应给谁?当然是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我们不能有另外的做法!

臧声:正确。

加里宁:因此,个体经济在我们这里不可能完全获得物质基础。我知道,我们每年都要扩大我们的帮助,但绝不要以为,我们能够满足个体经济的需要。因此,我们能够给出什么呢?我们应该给出我们能够拿出的东西。法律我们能拿得出来吗?我们能!我们能早一些拿出法律来吗?我想,在苏维埃建设会议上同我们坐在一起的卡冈诺维奇同志不会反对,必须具备某些保障以便让农民相信,当他们用劳动的方法扩大自己的经济而同时又不变成富农的时候,不会被剥夺权利。而我们这里发生的是什么情况呢?我们许多很好的农户得到了发展,户主得到了奖金,他们在4年前的展览会上就得到了奖金。而现在怎么样?他们现在都成了富农。在这个基础上,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你们不可能把经济发展起来。因此,我还认为,必须使中农合法化,让中农放心,这里指的正是中农。当然,我认为,我们的农业税不高。我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农业税不高,但是它毕竟占所谓的标准收入的35%。要知道,人不可能这样生活。

臧声:要知道这是对标准收入进行征税。

加里宁:我们自己明白什么叫标准收入:这是标准收入,而不是货币收入。这是什么样的收入呢?如果我割了400普特的草,把这草用来喂母牛,那么这就是割草的收入,除此以外,母牛提供收入20卢布。对割来的草是按每俄亩割了多少收税的,对母牛要特别征税,因为它是收入的客体。但要知道,这草我是用来喂牛的。因此,当丘巴尔谈到标准收入时,那么这个收入与真正的收入毫无共同之处。

C. 柯秀尔:这样说来是一点共同点也没有了?

加里宁:因此,我认为,必须把农户纳入法律的框架。

斯大林:建立革命的法制。

李可夫:而且富农农户也不是非法农户。

加里宁:李可夫同志,这一点我们当然明白。那么就其实质而言,这个东西

可以称之为个体经济。

我认为,如果我们确实要把经济安排好,我们就应当注重地方上的实践;我凭良心对你们说,地方上的工作说来说去还是和我们的指令衔接不上。我们也明白,我们的命令是正确的,但是在实践中,有的时候并不是按指令要求的那样去做的。实际上,农业的下滑是地方实践的结果。这就是我们的实践。我仅就一个问题举一个例子。

在近两年里,我们赶出了1.5万名地主。农民们看到,我们把地主赶出去了,当然就把土地抢光了,大部分是按亲属关系分配的。这是事实。我们的机关不但因此没有什么长进,反而堕落了。我明白,莫洛托夫在讲同富农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有非常深刻、正确的思想,他是想在这个问题上让地方工作人员明确阶级路线,强化阶级路线,不要让他们陷入小资产阶级的泥潭。这个问题本身提得是对的,当人们陷入泥潭的时候,阶级路线就会脱离他们的视野,革命路线就会被他们忘得一干二净。而当同富农的斗争变得空洞无物的时候,差别是巨大的。我们与反对派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我们说的似乎是同一些话,而差别就在于,反对派滑向了同富农进行空洞无物的斗争:喊的是富农,富农,和富农斗争的问题,没完没了,而对于我们来说,和富农斗争的问题,是一个目的明确的路线,是指望获取一定的政治结果和经济结果的。

**伏罗希洛夫:**难道我们不是按原则进行斗争吗?

**喊声:**反对派讲的是空话。

**加里宁:**如果策略条件要求摧毁富农,我们就这么做。斯大林同志完全正确,他引用列宁的话说,当形势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贫农委员会的方式猛烈进攻富农。如果策略上的需要要求摧毁富农的话,我们就摧毁它。一切取决于当前的策略环境。当一个人把同富农进行无谓斗争当做自己的基本目的,忽视了全部的综合条件和我们是一个国家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脱离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在不久以前,发布了似乎是鲁祖塔克签署的命令,要求以全部力量促进建设私人房屋。我对最近一年收到的声明做了摘录:喀山收到了要求把1065处建筑物收归市有的建议,这是在那里实行了国有化等等情况之后发生的事情,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建议对166处建筑物实行国有化,科斯特罗马省执行委员会建议对28处建筑物实行国有化,梁赞省——21处,喀山省——19处,莫斯科苏维埃——18处,沃洛格达省——13处,北高加索省——1056处,斯大林格勒省执行委员会——370处,斯摩棱斯克省——120处,萨拉托夫省——180处。请看,一条路线是促进发展建设私人房屋,另一条路线是对它们实行国有



化。你们有什么看法,在这样做了之后,你们的命令能起作用吗?

喊声:那是滥用职权。

加里宁:还不仅仅是滥用职权,我要说,同志们,地方政权自己对自己也不尊重。

有时会有这种事:打比方说,穿着不整的人有一间价值1500卢布的破烂房子。这间房子房前房后加起来一共值1500卢布,住在这间屋里的是75岁的寡妇。同这个老太太进行争吵的是10个不同级别的机关,当地方当局的人来到我这里的时候,我说,你们是地方当局,让人们怎么能尊重你们呢?你们代表的是占地球面积1/6的共产党政权,你们竟敢代表这个政权同老太太争吵。你们不懂你们所代表的是什么人。要知道,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政权遭到如此严重的诋毁了,而且伴随着的还有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歪理和各种法律上的诡辩。一个政权能这样干吗?我要说的是,必须坚决改变这种做法。

柯秀尔:这与国营农场有什么关系?

加里宁:我说得太远了,我说过,我要来一个声东击西,这个事情我做完了。

斯米尔诺夫:如果国营农场按这条路走下去,那么国营农场就该倒霉了。

加里宁:我是国营农场的政治代表,因此我可以这样说,那里是一些真正的建设者。

斯米尔诺夫:要是大家突然都像你说的例子那样搞起政治来呢?

加里宁:现在还是回来谈国营农场。这就是说,建设国营农场的原则是:第一,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土地不是农民已经开发起来的土地,而是难于开垦的土地。原因很清楚:如果我们在靠近农民容易开荒的地方建设国营农场,那我们立刻就会和农民对立起来。我们对培育新土地的需求增长很快。因此,如果我们现在做出牺牲,那么这些牺牲在将来会得到补偿,因为我们所培育的土地将毫无疑问地会增长。之后,国营农场将应当成为工业中心。

不容置疑,在国营农场附近,在国营农场的帮助下,有可能形成新的移民点,而国营农场将会成为工业中心,在这些中心,既可发展集体的,又可发展国家的农产品加工工业。我们现在把国营农场称之为谷物工厂。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混合国营农场的利润率可能是比较高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所感到的主要不足,是粮食的不足;因此,主要的和需要着重注意的,就是要建立谷物工厂。这里有一个决定,它驳斥了,或者说是打消了所有其他有关可以建设非谷物国营农场的议论,在这里,重点应该是放在谷物国营农场上。那里将会建设一部分畜牧业国营农场,但这部分将要起到的是辅助作用。我已经说过,总耗费将要达到大

约3.5亿卢布。在今年,我们打算用去1700万卢布。现在正在准备既要派遣农学家,又要派遣个别的组织工作者到德国和美国去,到那里的大型农业庄园去。

**柯秀尔:**那将需要多少钱?

**加里宁:**将需要4000万卢布左右。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降低产品的价格,这是最让人头痛的问题之一。我想,在最初几年,产品将是昂贵的,大概小麦一普特要两个来卢布。但是,同志们,粮食的价格正在上涨。不管怎么说,今年粮食的价格将要上涨。而后,按所有专家的推测,经过5年,他们认为粮食的价格将要由90戈比增长到1个卢布,准确一些说是由88戈比增长到1卢布。

**臧声:**是在地方上吗?

**加里宁:**是的,在地方上,一普特小麦的价格将要由88戈比增长到一个卢布。

明年,1928年的工作计划安排了4个区。北高加索的两个区划拨出20万公顷,随后,萨马拉省的布古鲁斯兰县、普加乔夫县、布祖卢克县划拨出四块土地,总面积达9.7万公顷。萨拉托夫省拿出两块土地,6.4万公顷。最后在哈萨克斯坦,一开始只是想在一个地方干,但现在已经是想在三个省干起来了。他们想今年总共开垦12.5万公顷。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耕作起来了。在这方面,北高加索走在了前头。他们把那里的旧国营农场改成了新国营农场。但只是还叫做旧的国营农场,因为原来的国营农场种的是5000公顷,他们又给它划过去了4万公顷,这样一来,这个小单位还是原来的,而实质上这已经是新的国营农场了。我们得到了570台拖拉机。拖拉机我们已经派到了地方上。得到了250万的资金,部分资金已经分配出去。

这就是我们在建设新国营农场方面的大体情况。

当然,我一点也不是像斯大林同志所说的那样,把国营农场与个体经济对立起来。我认为,个体经济寿终正寝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因为我们仍然大量缺少粮食和农产品,不管我们用多大精力去建设新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去发展个体农户,我们的农产品将总还是不足的。因此,我认为,应当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国营农场的建设上。应当把最优秀的人派往那里。令我惊奇的是,当这里有人建议埃赫同志去领导国营农场时,他坚决反对:说什么我也不去。我觉得,同志们简直是没有考虑到建设国营农场的巨大重要性。同志们,只要国营农场的经验能够成功,而且这个经验也不可能不成功,那我们就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根

本问题。问题在于,我们会没有理智地要投入多少钱。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需要小心行事。但最终国营农场的建设事业是不可能不成功的。这一问题只能是得到积极的解决。这意味着什么,同志们?这意味着要解决农村的社会主义问题。这个问题远比国营农场的建设大得多。我们将通过这种办法在农村扎扎实实地建成社会主义。我们通过这种办法在那里实现工业化,采用技术装备,对待这个问题必须要有原则,我简直不明白,在这个时刻,为什么共产党员会拒绝这个工作。一般来讲,我们应当努力到那些当前局势最为紧张的地方,到那些当前最需要、最重要的地方去,令我奇怪的是,这位埃赫同志不想到那里去。我们认为,必须克服这种情绪,埃赫必须去担当这项工作。

**雅罗斯拉夫斯基:**也必须把他扭过来。

**加里宁:**我是非常随和的人,我不能一下子把他改变过来,最好用说服的方法,用公众的舆论。(笑声)我以为,不要用中央委员会表决的方法,不要搞成是非去不可,而是要把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变得强而有力,让埃赫不可能下决心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并说:好吧,既然全体中央委员会都坚持这个观点,那我就得去做这个工作。因此,我觉得,同志们,应当派最有责任心的同志来从事这个工作,我还觉得,李可夫同志在资金的花费上不应该刹车。我不是说,他现在刹车了,不过你们知道,他是掌管资金的……

**李可夫:**我喜欢数钱。

**加里宁:**是的,钱是需要数的,但总归要大力发展这项事业。

我不知道,这位军人同志是不是要讲话(指着伏罗希洛夫同志)……

**伏罗希洛夫:**我考虑一下。

**加里宁:**但是,如果我国将来要发生战争,那么一亿普特的粮食储备摆在我们的粮仓里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储备,很好的物质储备,因此,我呼吁同志们参加这项工作。应当挑选优秀的工作人员参加这项工作,因为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原则性问题,要知道,正在解决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就将建成,我们那个时候就可以不再依赖个体经济了。最终又将使我们得到一个优越性。会得到的,正像斯大林同志在私下谈话中完全正确地说到的,如果我们把国营农场发展起来,我们就能够比较自由地对待个体经济了。(笑声)那时我们就将不会那么贫穷,也就不会再那么残酷了(是贫穷迫使我们变得残酷的),我们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将更加巩固,因为我们将不会再依赖小型的个体经济。因此我说,政治局的决议,一致通过的决议,不是偶然的,它产生于我国对这些国营农场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需求。

我觉得,这个思想应当深入到每一位中央委员,特别是埃赫同志的头脑中,关于他,我想他应该当这个主席。

我就讲到这里。

主席:宣布休息。

(休息后)

主席(李可夫):按顺序,请柯秀尔同志讲话。

柯秀尔:我建议改变程序,给每一位演讲人的讲话时间由15分钟改为10分钟。

喊声:对!

主席:对柯秀尔的建议,有人要发言吗?

奥新斯基:同志们,问题十分复杂,我肯定,10分钟不可能把事情说清楚。如果只是单讲一些具体障碍,那10分钟还可以干点什么。要是着急,可以停止辩论。要是进行辩论,那10分钟不可能把话讲完,因为这不仅仅是一般的政治问题,而是具体的经济问题,这里有大量的技术方面的事情。因此,应当保留以前的工作规程。

米高扬:我建议,作为例外,给奥新斯基多一些时间,因为他想利用美国的经验。

主席:提的是工作规程的问题,而不是工作规程的例外的问题。

对柯秀尔同志关于把发言人讲话时间缩短到10分钟的建议进行表决。

谁赞成这个建议?谁反对?人很少。通过。

请安采洛维奇同志发言,下一位发言的是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安采洛维奇:我认为,政治局关于组建新国营农场的决定和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但我觉得,在这个如此重大事业的开端,也就是我们要着手进行真正的农业基本建设的时候,需要的不仅是振奋人心的思想,还需要及时关注有可能破坏这个特殊事业的危险。十分自然,没有全党意志的集中,没有组织者们的热情,这个伟大事业不会成功。但是,不仅需要组织者们在党在这个事业上表现出热情,还需要他们能估计到困难。我认为,我们将遇到的困难,要比我们在沃尔霍夫河工程和第聂伯河工程等建设中所遇到的困难多得多。我们在工业建设中的经验远比在农业中的多,但也犯了重大错误。在农业基本建设中,我们既很少有自身的经验,也很少有其他国家的经验。

我想提请全会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应当把农业基本建设的任务,也就是建设新国营农场的问题,变成某些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不应当给自己同时提出既解决大型国营农场问题又解决干旱问题这样的任务。也不要以为,即便不能及时得到拖拉机和适应这种经济水平和类型的其他农业机器,也可以建成新的大型国营农场。

我们为自己提出了非常复杂、责任重大的任务。因此,对这项建设的拨款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决不能忘记,农业特别承受不起中断。比如,任何间断,比如说由于不及时拨款而造成的中断,都可能对国营农场建设及其利润率产生最为消极的影响。

如果不能明确理解我们所想的是什么,同样也不能完成这项任务。譬如说,如何认识政治局的决议?是否对这个决议是这样来认识的,认为是必须一次性地获得一亿普特商品粮,还是说要把整个经济组建成每年都能获取不少于一亿普特的商品粮呢?

**柯秀尔:**当然是每年。

**安采洛维奇:**但给我的印象是,在国营农场建设领域实际实行的工作方针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可以一次性地获取一亿普特商品粮,但不可能以这种方式保证连续每年获得如此数量的商品粮。在几百万俄亩的土地上,一次获取一亿普特商品粮不太困难。而硬要使农业,硬要在新国营农场的土地上每年获取一亿普特或者一亿普特以上的商品粮,那就困难得多了。

如果是这样提出问题,那就必须比某些同志所持的态度更为认真地对待国营农场的建设。

在中央全会面前,我认为必须表明对一系列问题的担心。譬如,整个事业的农艺学原理问题。我觉得,在各种实际方案中,存在着对某种农业经济无知的成分。我不认为,召开有学者、专家参加的会议,把他们召集起来参加一个晚会,让他们同我们一起开始议论国营农场,这会有什么特别的益处。更何况又没有邀请诸如威廉斯等权威到会。我作为农业工作者联合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经常在业务工作的会议上同农业专家们打交道。特别是我曾就新国营农场的粗放经营方针和集约化经营方针询问过某些专家。所有这一切促使我要对中央全会讲述以下的看法。我觉得,譬如说,不能像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土地计划局的阿尼西莫夫同志谈到这些经济单位的十年工作方针问题时表现得这么自信,但同时又是那么不完全内行。例如,阿尼西莫夫同志在一份杂志中写道:“这样就可以在5—10年内,通过主要是播种珍贵的粮食作物来利用土壤肥力,不用组

织草田轮作或者作物轮作了。”

如果说我的这种说法不那么在行,这样做可以使最近这些年的国营农场建设变得非常轻松的话,我当然会很高兴。但是我觉得,那些把宝完全押在未来多年粗放经营上的同志们是要犯错误的。因为如果是以这种制度为基础,那就会是今天耕地、播种,明天就把这块地扔掉;接着又是耕地、播种,再换一个地方。在我们的条件下,如果是这样干,土地是不够用的;要么就是该在未来的年份让新的经营单位专门生产粮食,但是要搞草田轮作,要有畜牧业。但是必须要记住,决不能像阿尼西莫夫同志所写的那样,在十年内光是在干旱土地上年复一年地播种小麦,指望一俄亩平均能收上来50普特或者更多。不能不担心的是,在这种耕作条件下,我们将会颗粒不收。农业人民委员部土地计划局的一位相当负责的工作人员断言说,如果使用这样的耕作制度,在未来10年里,对于国营农场\*建设将是有利的。我觉得,如果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纯粹的粗放经营上,即便是用10年的时间,我们将得到的结果也不可能把本收回来。就该是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提出来。我反对建设不赢利的国营农场。在农业工作者联合会工作的5年期间,我对国营农场的态度是这样的,可以按下列方式来表述:我搞国营农场,把大家都搞烦了。不过我认为,不应当建设显然不能赢利的国营农场。不论是什么样的国营农场,如果不能赢利,人们是不会原谅的。在北高加索所做的一切,可以算是这种不能赢利的状况。在北高加索,新国营农场的土地是用农民的小马耕耘的,使用的是农民的劳动。一句话,就像在地主们那里干活时一个样。您用这个能骗谁?

加里宁:这不错。

安采洛维奇:而我以为,这不好。我以为,任何大型农场,如果不能在我们的条件下实现机械化,当工人或者农民的劳动代价非常高的时候,就不可能是赢利的。土地本身并不具备优势。大块土地要与良好的生产工具相结合,使用最新的科技和农艺学成就,才对小块土地具有优势。因此,不要以为,我们得到了大块土地,用农民的劣马或者犏牛进行耕作,结果就是大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了。我认为,即便是旧的国营农场的经验,那里大多数农场的这类耕作方法已经被淘汰,也不能成为样板。在新的农场应当最大限度地使用机器劳动。使用机器耕作的大型农场,农业工厂,这样的企业才是能够赢利的。但是,这仍然不够。必须进行至少从第二年起就要准备好,在一系列区域(我说的不是所有的区域)要

\* 原文如此。——编者注

再加上养羊,或者谷物型的农场每年都要多搞一些草田轮作和畜牧业。如果不是这样,新国营农场就将亏损。这就是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必须要保持最大限度的平和心态,考虑到一切现有的科技成就,以这样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农业的基本建设。我们今年就开始耕作新国营农场的土地了,这很好。但是,如果我们今后还是这样耕作下去,譬如说像某些伏尔加河沿岸地区那样,那么这些农场的前景就不会是特别光明的了。这里有一份联合会中央委员会昨天收到的来自伏尔加河沿岸的电报:“请给我们至少1 000头犏牛。”我们以谈论机器耕作、拖拉机开了头,却要以谈论犏牛、驴收尾。(笑声)

臧声:没有犏牛您怎样建设农场?

李可夫:你把谁当成驴了?

安采洛维奇:这些用来替罪的驴和山羊,如果需要的话,那有的是。在我看来,这样提出组建国营农场的问题实际上是不正确的。新国营农场从一开始起就一定要是实行机械化运作的单位。在这种条件下,需要的不只是拖拉机,而且还有其他复杂的机器。这对于国营农场建设具有首要意义。决不能忘记,在苏维埃的土地上,不能允许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地主对工人的剥削。这些单位的雇佣劳动不可能不受到劳动法典的管束,这些人也不可能不受到联合会的保护。工人自己,不管他们来自何处,不符合劳动法典的规定就不要去工作。只好如此。国营农场的组织者应当考虑到所有这一切。但是,由于苏维埃政权的存在,也由于发生了十月革命,就存在着与这些情况有关的开支,必须是把这些开支和技术熟练的、自觉对待自己义务的农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结合起来,和农场广泛使用拖拉机、复杂的割草机等机器结合起来。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保障在实际上显现出大型农场对小型农场的优势。

而我们总是走极端。如果要进行粗放经营,那就搞哪一个国家都不实行的那种粗放经营,如果要进行集约化,那就实行哪一个国家也不搞的那种集约化。我认为,就是苏维埃条件下,组织者也应当把握住分寸。

柯秀尔:你的这番话好像是在审理沙赫特案件时说的一样。

安采洛维奇:是的,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是从一开始就警觉地、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件事的话,在这项建设中就可能埋下未来的沙赫特案件分子,数量之多,会是哪里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奥新斯基:正确。

安采洛维奇:是的,我要重复的是,如果我们不能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件事。那么沙赫特分子有可能出现在农业问题上。可能把最不好的土地塞给我们,而

把好的土地扣留下来。

臧声：谁？

安采洛维奇：谁？比如说，土地管理机关。

臧声：全俄农林工作者工会的成员吗<sup>219</sup>？

安采洛维奇：要是你们这么想的话，也有全俄农林工作者工会的成员。我们在斯摩棱斯克省就见到过这样的土地规划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人为地搞起了田庄，还有的把部分田庄逐渐为自己建起了地主庄园。你们是怎么想的，我把专家们理想化了？必须考虑到所有的情况。有可能有意识地把最坏的土地塞给我们。这个危险是有的。因此必须最细心地对待土地问题，最认真地对待建设新国营农场的地区问题。我们自己不能犯懒，必须出去跑一跑，去检查地方委员会的工作。土地，这是新国营农场建设中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最为重要的资本。除此而外，有可能把破烂不堪的、不能产生效益的机器偷偷地处理给我们。

臧声：谁？

安采洛维奇：遗憾的是，我们本国的工厂也不反对销售效益不好的机器，在国外，外国公司不会不利用我国商业机构和经济机构不大懂行的弱点。这种倾向在当前也已是显而易见的。不是为国营农场建造单一类型的机器，而是已经开始把国营农场变成百货商店，就像是缪尔和梅里利兹公司一样<sup>220</sup>；购买“БД”、“巴黎公社社员”、“国际主义者”、“福特”等等牌子的拖拉机。结果是，每一种拖拉机都需要一个专家。结果是成了某种生产工具的大杂烩，不能正常地向国营农场供应必需的机器设备。自然，并不需要采用单一型号的拖拉机，但这种向国营农场供应拖拉机的做法也不合适。

其次，在着手建设国营农场的时候，不考虑某种生产工具的利润率，这算什么样的政策呢？要知道，必须让同志们牢牢记住，在新国营农场中，成本应当是低的。在新国营农场工人中间安排工会工作的时候，应当考虑到这一点，但这个低成本问题也应当在生产层面上加以解决。但从哪里开始呢？从向国营农场供应价值2.1万卢布的“巴黎公社社员”牌拖拉机开始。如果这个拖拉机是按这个价格向国营农场出售的话，那么最好还是让它留在军事部门。当需要的时候，让它用这2.1万卢布去摧毁我们国内的敌人吧。（笑声）我已经指出了“巴黎公社社员”牌拖拉机可能对国营农场成本造成的影响。但也应当指出，按照一些专家的意见，拖拉机对国营农场的日常工作总的来说是有害的：太重，这对土壤结构会产生有害影响。结果如何呢？国营农场花2.1万卢布购买拖拉机，之后……这个农场用不上它。把“巴黎公社社员”牌拖拉机转运到新



的地区去,运费又太贵。我要问你们,为什么要从搞废旧拖拉机停放场开始做起呢?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同新国营农场打交道不少,他记得,有一次几台废旧拖拉机停放场已经转交给了旧国营农场。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我们这样对待向新国营农场供应拖拉机的工作,我们将要得到的也就是废旧机器停车场,令人悲惨的结果。我要再说一遍,为什么要向新国营农场供应用任何收成都不能够补偿价值2.1万卢布的拖拉机呢?

这就是为什么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在国营农场委员会工作过程中对这件事投入的精力和热情是值得欢迎的,但需要考虑的是,党的这个委员会所能管的,自然只是制定组建新国营农场的一般指令。但这是不够的。必须根据这些一般指令表现出经营的能力来,而且要能够考虑到国营农场建设方方面面的实际因素。应尽快物色人选、组建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董事会,我希望,这个董事会不会接受价值2.1万卢布的拖拉机,尽管它们是“巴黎公社社员”牌的。如果压制组建新国营农场的优秀思想,对它施加如此的重压……

丘巴尔:这是它自己施加上的。

安采洛维奇:是的,一方面,某些地区的干旱是压力;另一方面,如果谷物生产在未来几年不能与侧重草田轮作和畜牧业相结合,如果农场要用价值2.1万卢布的拖拉机干活,再加上出现其他个别和成堆的未知因素,搞谷物生产是不合算的。我们大家都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如果我们为自己提出了任务,那就非要用它制造问题中的问题不可。我认为,正是由于新国营农场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所以首先就要尽可能减少未知因素,尽可能少给这个事业带来偶然性和风险。不要忘记,同志们,除了这些诸如组织者和专家的素质、机器是不是适用以外,还有大自然的影响、气候这些未知因素……

政治局通过了非常重要的决议。但我认为,非常严肃的决议应当用非常严肃的实践来执行。(主席的铃声响了)

请再给我几分钟,让我说说原来的国营农场。

主席:给两分钟?

安采洛维奇:5分钟。

主席:谁赞成给两分钟?谁赞成5分钟?大体相当。3分钟。

安采洛维奇:决议应当像常说的那样,要有利于穷人。再对新国营农场说几句。这正好是我用来反对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的论题。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说,大家对建设新国营农场的意义在认识上都有心理准备。是的,政治局委员们都有准备,而普通的党员们,我不是说,普遍都是这样,但在心理上还没有完全

做好准备。我认为,对强化集体农庄建设问题的认识状况要比对建设新国营农场问题的认识状况好一些。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党,但是在党内,不管多么奇怪,应当直截了当地说,事到如今,对巩固旧国营农场和建设新国营农场这件事,很盛行的还是怀疑,而且往往根本就是不相信。是的,这令人惊奇,但确实是这样。还在几年以前,说到必须加强国营农场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笑。并非所有的地方都根除了对国营农场建设半开玩笑的态度。党中央宣传部和所有的党组织应当好好地干一下,让党内认识到国营农场的的作用,认识到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为重要的道路之一。这不只具有意识形态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只有这样才可以向他们解释清楚,直到现在,譬如说在像萨拉托夫这样的一些省里,有2 000—4 000俄亩的国营农场的土地租赁给了私营企业者。在一个省里,租给私营企业者的国营农场不是一个,甚至是2—3个。这样做是为了什么?难道说,时至今日,当我们已经提出建设新的大型国营农场问题的时候,还不会组织经营4 000—5 000俄亩土地的国营农场吗?要知道,这是有相当像样规模的大型国营农场了。但问题不仅仅在这里。斯摩棱斯克省的事例给我们讲的是另一回事。这个省的土地管理机关和其他机关(直接或间接地)相当顽强地维护的是把地主的农场保留下来,而且非常轻而易举地取消了国营农场。一说到几百亩的地主或者半地主的农场的某块地段时,就要写信给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来请求、抗议,提出头头是道的依据,得出同样是头头是道的结论来。而对于取消国营农场、缩减国营农场的土地面积或者没收国营农场的农具,只要是地方官员大笔一挥,便能自动生效了。

[加里宁:你也在帮忙。]

安采洛维奇:恰恰相反,在这件事情上,我从未帮过任何人。在各个委员会里,我一直在抗争,几乎到了险些要把我从一个委员会里赶出来的程度。你否认不了这件事,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安采洛维奇:自然,个别英雄和捍卫者拯救不了国营农场,但在无产阶级国家生存的第11个年头上,最终必须明白,它不能不在农业里建立起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国有成分来。必须让人们明白,对待这件事情应当像对待化学工业、纺织工业或者哪怕是制砖工业一样。要让计划机关和财政机关明白这一点。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在他的报告里大量地讲述了农业。这是他的权利。他是继续按照议事日程的前一个论题阐述问题的。关于农民的经营他是讲了,但关于原来的国营农场,他却只字未提。他说,那里保留着某种“多愁善感”,但他忘记了除了包括“多愁善感”在内的不足以外,那里还有可能在今年增产

2 500 万普特粮食。在我们的粮食收购工作这么困难的时候,某些同志,如弗鲁姆金同志,甚至提出了在富农经济那里收取的每一普特粮食对于我们都十分昂贵的时候,怎么能这样马虎地对待旧有的国营农场呢?对他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可以进行争论,但是从国营农场获得的每一百万普特粮食,应当说确实是很珍贵的。现在,我们正经受着粮食危机。那我要问米高扬同志:他在今年夏末秋初将从哪里拿到第一批2 000 万普特粮食呢?从国营农场那里拿到。要是没有这个可能,那应该怎么办?那我们就不得不再花外汇进口粮食。

这就是为什么,同志们,我讲话这么激烈的原因。我讲话激烈并不仅因为这是我的天性,还因为,必须从这次全会起,开创我们对待国营农场的态度上的新时期。

最后,我再一次强调:我不担心我们会忘掉个体小经济。这个倾向党克服起来比较容易。但是我担心是,我们只是在口头上讲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如果我们想要坚定地强化农业的社会主义成分并逐步沿着这个方向改造整个农业,那么,需要的是生龙活虎的工作,而不是夸夸其谈。

主席:请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发言。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觉得,加里宁同志谈到了一系列问题,但对主要问题——国营农场问题,关注得过少。而且我觉得,他在这些一般性的议论中,比如说,在论证为什么有必要组建新国营农场的时候,说到他总体上是支持大型农场的,就犯了一系列错误。在这样说的时侯,他宣称“支持”富农经济,当然,这是就一定意义而言。但他在这里援引列宁的话是没有用的,列宁从未说过他支持富农经济;他说过要同富农经济进行斗争,说过要镇压这些富农经济,说过要限制富农经济,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说过支持富农经济。

从这里,从加里宁同志的这个不正确的观点出发,他关于我们对待富农的态度和反对派对待富农的态度有何差别的议论也是不正确的。我认为,他所做的对比,简直就是送给反对派的礼物——似乎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富农,而这个礼物我们是不能送的。因此,关于斯摩棱斯克地主事件的引证我觉得也是不对的。我个人觉得,政治局关于斯摩棱斯克地主的决定是错误的。那里说到,应该迁出470人。省农业委员会详细研究了全俄执行委员会和县执行委员会所提供的迁移资料,认为758人中应当迁出的有470人,其中包括以前的非贵族地主172人。为对后一类指定该迁出的人做出评价,必须指出,那时被迁移的前贵族平均占有土地(当然是在革命前)150—170俄亩,其他类别的被迁出人占有的土地是250—260俄亩,其中非贵族中有原来占有1 000—2 000俄亩土地的人,等等。

我们都知道,在革命爆发的前夕,很多破产的贵族经济都已转移到富农、商人手中,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不再是地主,——要知道,我们讲的是与阶级的斗争,而不是说的阶层。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加里宁同志对这件事情的引证是不正确的原因,这个引证被人为地同国营农场问题扯在了一起。

我要求发言是为了让党能够注意到:组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所必需的和适宜的几万俄亩土地现在是掌握在反动组织的手中的,这是直接意义上的反动组织。现在有500多个教堂、寺院掌握的集体农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第11个年头,在我们的苏维埃国家里,掌管着几万俄亩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他们按照他们应当做的方式组织农场。我现在就给你们举出这种集体农庄中的一个,它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先进的州——列宁格勒州的集体农庄;那里有一个名叫“比奇”的丘里科夫斯克集体农庄,有土地725公顷。

农场的章程里有这样的条款:“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发的所有指令应当绝对执行,和上帝的教义相悖的除外。公社的所有决定都是最终决定,不得向苏维埃司法行政机关提出控诉。公社社员不得去剧院、俱乐部、电影院和其他公共娱乐场所。”

请看,我们这里有的是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集体农庄。

喊声:卡卢加省也有这样的机构和集体农庄。

雅罗斯拉夫斯基:不止是卡卢加省有。莫斯科省不久以前取消了4个这样的农庄,在莫斯科省共有12个相当大的农场,土地面积很大,近1500俄亩,而且人均(其中包括只为修道院教堂服务的、寄生的僧侣和修女)占有土地的亩数,要比我们莫斯科省苏维埃集体农庄所有工作人员人均占有土地的数目多。我可以为你们列举一系列省的事实,可惜我的时间太少。

喊声:讲吧。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就给你们讲特维尔省的奥斯塔什科夫斯克县吧。譬如,那里有一个日丹诺夫斯克修道院,现在它改名为“莫吉列夫卡”集体农庄了,458公顷土地养活着85个修女。那里是个模范集体农庄吗?没有这么回事!但当它需要购买拖拉机的时候,国家农业银行为它发放了2000卢布的长期贷款。我们这里的任何一个农业联合组织是否容易得到购买拖拉机的长期贷款呢?你们知道,一点也不容易。我要再一次强调:请注意这个州在做什么,在我们苏维埃法律的掩护之下,这个州的反革命组织禁止自己的成员去俱乐部、剧院,禁止自己的成员参加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就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和同志们进行过交谈——像他们所说的,我们应当把这些组织看做有益的经济

联合体。但这些经济联合体对我们到底有没有益呢？那是需要重新审议的。我不建议立即就在今天做出决定，关闭所有这些集体经济并把它们改造成为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类型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我的建议可以归结为，每一个大区和每一个省的组织都应该极其关注地重新在自己那里审视一下，这是些什么样的组织，有无必要保留它们，有无必要帮助它们，有无必要支持它们，或者相反，如果不能把它们转变成没有神父的苏维埃集体农庄，是不是把它们转交给农民，就算是必须支持穷人和甚至是帮助某些地方土地很少的中农，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土地转交农民，至少是在份地很少的莫斯科省这样做呢？这在政治上会有20倍的好处，是比较合适的，在经济上也是有益的。我可以举出几十个例子，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到，那里搞的是手工业经济，落后的经济，这些“公社社员”要让居民相信的是，农业帮不了忙，只有上帝才会帮忙。我不仅是无神者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就这个问题发言的，既然新国营农场问题提出来了，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你们关注阵线的这一部分，很难说你们中的哪一位在什么时候注意过这个问题。我应当提醒你们一件事，我们不久以前在政治局研究了一个问题，某位普罗哈诺夫，全苏福音派农民委员会主席，利用农业人民委员部官员的支持和某些经济机关办事人员的马虎，得到了国家的汽车，跑到阿尔泰，为建设福音城、太阳城选择地址，福音教徒应当从那里对郊区居民宣传福音教义。我们不能为在苏维埃国家出现的这类创举提供支持：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关于进一步农业集体化的话题具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斯米尔诺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我已经给您提供了情况，人民委员部没有给予支持。是一个官员给他们提供的情况，说是有土地。

雅罗斯拉夫斯基：你们为什么要那些对什么都不负责任的官员呢？就应该是委派那些不会支持全苏福音基督教徒委员会的官员。

谈谈新国营农场。我认为，安采洛维奇提醒注意在这个新事物中可能出现的某些危险是对的。当然，错误不可避免，我们也不应发誓不再犯错误，但是我们在这里应该预先防备，不要再犯在工业基本建设中犯过的那些错误。

我们在工业领域具有的经验要丰富得多，同时也还是犯过不可饶恕的错误，在基本建设方面出现过失败，如果我们还要建设各类工厂，那么在于这件事的时候，还有可能犯错误、出风险。就说我们如何培养与挑选专家干部、为某些地区筹备有关的技术设备和为此而必须发展化学工业的问题吧，还有就是组织自身的问题，我们都将会看到，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对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当然，我们应当把这个工作同机器制造和拖拉机制造联系在一起，首先要把它同钾

矿托拉斯联系在一起,可是关于这个钾矿托拉斯,我们在《真理报》上看到了什么呢<sup>221</sup>?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们工业的这个最主要的部分——化学工业上了吗?当然没有。其次,如果我们这样来对待这件事,在挑选像埃赫这样的干部上如此固执,那么我们将挑选不到真正工作的干部。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个事情上的任何失败都要比工业中的失败更能明显地显现出来,因为这个经验将是对千百万农民具有意义的;农民们将会注视着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因此这里的失败极其危险。

当然,我认为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说他没有把国营农场与个体经济对立起来的说法是走了嘴,是不正确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而在于国营农场是要领导个体经济的,是要彻底消化个体经济的工具,是彻底改造个体经济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必须从人员挑选、技术设备、研究与集体农庄有关的组织问题上认真关注,确保我们党和所有苏维埃机关的全面重视。

主席:请奥新斯基同志发言。下一位是伊万诺夫。

奥新斯基:我要事先说一下,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了,用十分钟时间我怎么也是讲不完的。我要求半个小时。

主席:表决。谁赞成给奥新斯基半个小时?谁反对?少数。

奥新斯基:在直接讲到国营谷物农场之前,我在开头至少要用5分钟的时间对一系列说不上是反对意见,但听起来是反对我以前有关农业问题讲话的说法做某些回答。既然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在自己的报告中谈到农业的哲学,那么我认为,我也有权谈谈这个哲学。

喊声:离国营农场近一些。

奥新斯基:国营农场也要讲。另外,我需要这样做,是为了不至于对我提出这个问题,关于新谷物国营农场的问题,有不正确的理解。我想明确的是以下内容。有人发言把我的观点描绘得滑稽可笑。我只例举雅科夫列夫同志的发言,把他的说法同我的建议做个比较,来看看差别。雅科夫列夫同志甚至把我同康德拉季耶夫教授相比,把我的发言描绘成似乎我建议通过停止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移资金、通过克扣中央社会保险局来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拨款。另外,似乎我又建议改变当前我们对农村中的各类人员的政治方针。如果所有这些都放在一起,而且是按这样的分量的话,那么当然也就成了康德拉季耶夫教授了。但所有这些都是雅科夫列夫发明的,而这件事的前前后后的情况首先是,我没有说过一句涉及改变我们对农村中的各类人员的政治方针的话。我认为当前的方针是正确的。

其他的人,其中也包括斯大林同志,指责我,说我没有讲过对农业的投资,说是我说过话里缺少这一点。而雅科夫列夫同志则相反,又给我增加了一条:似乎我建议不要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移资金,而是要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支出。我考虑不周的可能是我对此什么也没有说,也可能这是缺点。我确实认为,加紧发展对农业的拨款根本就没有必要。所以,康德拉季耶夫教授在这里毫无关系,这不过就是雅科夫列夫同志在政治上恶作剧罢了;把他完全无法证明的东西扔来扔去。我也根本就既没有提出停止从纺织工业抽调资金,也没有提不给轻工业提供资金的建议——我讲过的是相关的工业部门和企业的事。这样的部门和企业既不是轻工业的,也不是重工业的,但是既把轻工业也把重工业都包括进去了。我并没有建议由于一个简单的理由,那就是规定了要从纺织工业向其他行业转移近6.6亿,就该停止转移资金,我说的是给“相关的部门”补足2亿—3亿。我取了2.5亿的平均数字,我从6.6亿中减去这个数,得到的是4.1亿,这些资金将继续转移到其他部门。这就是说,我没有建议不转移任何资金。除此而外,我没有建议把纺织工业留下的2.5亿都拿走。我还指出以下几点:第一,必须缩减预算中的消费支出并从这里拿到钱;第二,我说过,无论如何要争取到外国贷款。而且我断言说,可以办成这件事,可以得到3年左右的贷款,用美国的机器重新装备纺织工业和皮革工业。第三,我谈到过重大的基本建设项目。我也断言说,如果我们已经开始建设第聂伯河工程,那就是我们开始建设得早了,对待大的项目我们根本就应该更加小心行事。这是我对谷物国营农场进行论证的一个方面,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的,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至少等于两个第聂伯河工程。而且有这笔资金,要是您试试提出给工业的相关部门掏钱的话,人家会说——没有。人家会说:您想什么啦,要把钱从重工业转移出去?那我可能要说:斯大林想拿重工业的资金去发展国营农场。这就是说,他要通过发展农业来压缩工业化。我可以这样提问题……

**斯大林:**不能这样提问题。

**奥新斯基:**我是一个更有良知的人,是不会这样提出问题的,因为这是不对的。如果你想把演讲人弄糊涂,打乱他的思路,那你就这么去说。

但这说明什么呢?资金来源是有的,只要你想找到,就有条件。结果是,可以为森林工业找到,也可以为谷物国营农场找到,而对于相关的生产项目就办不到了。

为了把我以前的议论说清楚,我接下来要提出什么建议,说些什么呢?我根本就没有提出过:第一,在今年降低价格。有人这么理解我,说我想在今年提高

农产品价格,也在今年,在生产合理化之前降低商品价格。而我的建议是:现在对工业相关部门投入补充资金,然后用这种办法降低成本,不减少利润,反而有可能增加利润。所以结果是,尽管你们得到的是降低价格,资金的转移也将能保留下来。顺便说一下,我反对的是不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资料、不按他们的五年计划方案降低价格,但有的人却理解成我在反对中央委员会在今年不降低价格的决定。这是不对的。我谈的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资料。在他们那里客观上形成的是这样的路线:他们没有搞轻工业的合理化,在采用没有经过完善的生产方法的条件下,甚至是在使用旧锅炉的条件下,却要维持原来的利润,想要在这种条件下,不通过降价就能挣到钱。而在那里是应当实行合理化的,只有那时,在降低价格的情况下,才能甚至是挣到更多的钱。我认为,为了说明我以前所讲的话,这就完全够了。这对与不对,是另一回事,但应该是就其实质对此进行争论。

我还要做一个这样的声明。斯大林同志问我,请告诉我们,您对问题的提法与恢复性价格政策之间的差别在哪里?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对此做出回答。我认为,您自己非常明白这一点,只是您不愿意说而已。差别就在于,对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您提议提高15—20戈比,我完全同意,再没有更多的要求了。回答清楚吗?所以,差别就在于我同您的建议完全没有分歧。如果我对这个十分荒谬、毫无道理的“恢复性价格”的说法有什么看法的话,这就是说,给老乡付钱不是为了让他能够收回他的经营的日常开支,而是为了让他能够把自己的生产恢复到更高的水平,恢复到“战前的”或者某种还有更高一些的、“正常的”水平。这在实质上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不是把剪刀合上,而是张开,但是向着相反的方向,是让老乡通过张开剪刀能够额外多得到一些并且恢复自己的经济。我自然不仅不会去鼓吹这类东西,而且我还认为,这个提法是绝对荒谬的,它与反对派本身对问题的其他种种提法是相矛盾的,反对派为了在农民问题上能够敷衍过去,于是提出了这样的蛊惑人心的提法。我在任何情况下当然都不可能赞同这类蠢事的,无论是从任何意义上说,我都不能对其负责。我认为,要求我回答这个提法与我对问题的提法的区别在哪里,这简直就是一个误会。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给我提出的问题是,您对于集体化的想法什么也没有讲。斯大林同志,对此,我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已经讲过了<sup>222</sup>。我说过,为了进行集体化,特别需要动员足够的人力。顺便提一下,我坚信,没有无产阶级分子的直接领导,我们不可能成功地进行真正的集体化,甚至也搞不成拖拉机公司,贫农自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时至今日,我们还



没有看到采取这些措施,在这里,关于集体化问题的轻率提法仍在继续,对这一问题依然没有严肃的组织态度。这就是对我关于集体化有什么想法的回答。如果你们愿意,请询问坐在这里的卡明斯基同志。在1927年夏季,召开党的第十五次之前,我同他交谈过,那时我从沃罗涅日省回来,我去那里是解决统计工作问题的。当时我对他非常展开地谈到了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当时的提法就是,现在我们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集体化。他大概记得这件事并能够证实,当时就是这样。

关于国营农场。我甚至觉得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有点儿可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中有谁该去问谁对国营农场是否抱有好感呢?我记得,先是我,而在我之后是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斯米尔诺夫,在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时候,我们为这些国营农场到处奔走,遇到的简直都是嘲弄的态度。我当时是这样说的:要么就取消这些国营农场,要么就该认真地对待它们,而且就该给它们资金。但是人们对此只是讥笑。在这之后又来问我:您如何对待国营农场?我要说的是:过去我对国营农场要比很多其他同志好得多,现在我的态度和过去一样。(笑声)

现在我来直接说说与新谷物国营农场有关的问题。现在大家开始高声呼喊:我们支持国营农场,我们支持集体农庄,我是竭力欢迎的。这是一桩好事,但往往都是这样,当我们开始射箭的时候,要么箭飞不到靶子,要么箭飞过了头。我们现在规定了飞过新国营农场很远的目标。我们的旧国营农场都被毁坏了。安采洛维奇在这里的断言是对的,只要是有了相应的轮作,尽管我们在这些国营农场中将生产的不仅是谷物,而且还有其他作物,一亿普特谷物是可以得到的。

**安采洛维奇:**额外生产。

**奥新斯基:**是的,我请你们稍加注意,《经济观察》第6期有一篇优秀专家利亚先科教授写的、总的从经济观点看谷物生产问题的文章。他在文中引用了有关在德国这样一个高度发达国家用于粮食作物的面积占有多大比例的数据。在经济的集约化程度很高的德国,而且是在这里的所有其余田地集约化程度也很高的情况下,粮食作物面积占55%,粮食作物产量很大,你们的一俄亩能生产40普特的新谷物工厂算什么!与此相比,他们所能给出的又是什么呢!所以,我要想方设法欢迎的是,提高旧国营农场的产量,而且我认为,需要做的正是把重心转移到这上面来。

现在谈新国营农场。首先请允许我发表如下观点:正像安采洛维奇正确表达的那样,阿尼西莫夫在一份杂志中所表述的对问题的提法,不仅仅是农艺学上的无知,而且我要断言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类对谷物工厂的看法,认

为这类工厂是农业的圆满结果,是农业中大型农场的最高形式,也是非常明显的经济学上的无知。什么叫谷物工厂?那么现在让我们直接转到正题上。谷物工厂,亲爱的同志们,除了北美合众国以外,加拿大也有。在后者,一个很大的农场可以这样称呼,但是说到这个就走题了。所谓的谷物工厂存在于北美合众国,一是在雷德河河谷的北达科他,二是在加利福尼亚。在过去,谷物工厂是怎么回事呢?我为什么要说在过去,而不说在现在呢?当我到达北美合众国的时候,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让我最感兴趣的是,那里有什么样的大型经营单位,它们在做什么,等等。

**斯米尔诺夫:**这是农业人民委员部规定的任务。

**奥新斯基:**对。我来到北达科他,雷德河河谷。买了一份1914年贝德克尔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旅行指南,以便了解所有的信息。我看了一下,在一个车站附近有一家世界著名的谷物小麦工厂,名叫达尔里姆普尔,距铁路20英里,于是上车跑啊跑啊。我以为,在北达科他,这家工厂是最有意义的见证,是北达科他州最有意思的名胜。当我乘车来到了北达科他,来到了法戈,该州的农业首府的时候,去找当地农业学校的农业经济部主任。我问到那里怎么走。他说这个工厂早就不存在了。

**雅罗斯拉夫斯基:**贝德克尔弄错了?

**奥新斯基:**贝德克尔没有弄错。这家工厂在1914年是存在的,但后来解体了。我特意做了询问,才知道,在整个北达科他州,一个谷物工厂也不存在了。我自己乘车去“阿米尼阿·舍隆”(《Аминия Шерон》)公司以前的第二个谷物工厂。你们读一读我的那本小书,上面记着我在美国的旅行,那是我的日记,记录着我到过哪里,做过什么事,同谁谈过话。我了解到,这个工厂早已划分为大小不等的经济集约化程度更高的小厂。这就是事情的实质。

**安采洛维奇:**按照几千公顷划分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为什么要划分开?

**奥新斯基:**如果你们对农业经济感兴趣,我可以单独向你们解释为什么要划分开。

**斯米尔诺夫:**这些农场的规模有多大?

**奥新斯基:**现在的规模为650英亩(250俄亩),而以前在“阿米尼阿·舍隆”公司是27000英亩。它是如何成立、如何生存的呢?“阿米尼阿·舍隆”土地公司成立于1875年,当时北太平洋铁路破产之后,该公司债券的部分持有人得到了土地形式的补偿,以土地来保证债券。铁路公司获得了联邦政府以“赏

赐”形式给予的土地,这是向人烟稀少地区铺设铁路的资助……“阿米尼阿·舍隆”截走了26 880英亩(10 000俄亩)这样的土地(奥新斯基:《北美的农业州》,第63页)。

换句话说,这家工厂像所有其他工厂一样,靠的是资本家铺设铁路的机会,廉价获得了大量肥沃的土地。现在,为了表明那里如何管理经济,我告诉你们,加利福尼亚是怎么做的。在加利福尼亚,90年代时谷物工厂的经济是这样进行的:在整个农场的中心有一处唯一的建筑物,很大的机器棚。冬天,这个建筑物里留下一个看守人看护这些机器。在仲夏时节(秋天播种),大量工人牵着马匹出现在这家谷物工厂,把机器等等东西开出来,进行一系列作业,主要是用混合收割脱粒机同时进行收割和脱粒。然后在秋天进行翻耕和播种,再往后,就离开了。对这一制度的描写你们可以在克日维茨基的《农业问题》里找到<sup>223</sup>。雷德河区的谷物工厂建设得要复杂些,在那里,冬天留守的有12个人左右,而夏天在这里工作的有200—300人。总的来说,大体上也是这样的过程。这些土地是廉价买来的,或者在铺设铁路时作为捐助品获得的,从不进行任何轮作,一年接一年没完没了地“种”麦子。为什么工厂后来散了呢?第一,如果连续20年在同一个地方“种”麦子,即便是雷德河的黑土地也要开始贫瘠,必须改行某种轮作。第二,人口逐渐稠密,出现了对集约化程度比较高的产品和作物的需求。因此,那里耕作比较小的地块要比继续经营谷物工厂合算。在那里要在这样的空间内组织比较好的集约化经济,需要干这件事的人有多好几倍的资金,但是他没有这么多钱。简言之,美国农业史上的谷物工厂是什么呢?它是在那段农业发展史上,在实行原始的粮食生产的地方,资本主义渗透进农耕作业的一个形式。这一阶段一经结束,这个形式就被取消,用辩证的语言来表述,那就是产生了那种资本主义再次渗透进农业的新立场、新方法。认为谷物工厂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完美结果的说法完全是废话。资本主义发展的完美结果必须在别的地方寻找。这样的例证可以在考茨基的《农业问题》里找到<sup>224</sup>。那里描述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一些田庄,在这些田庄里,有酿酒厂、甜菜糖厂、淀粉糖浆厂和搞得很好的畜牧业,这些田庄把林业和农业结合在一起,庄园的各个部分之间实行劳动分工,等等,是一个巨大的联合工厂。在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利用起来,合理地进行田间作业,这里有的不是雷德河河谷谷物工厂的野蛮制度,而的确是处于高级发展水平上的企业。从农艺学观点、经济观点、资本主义向农业发展的观点看,这都是一种高级形式。但是,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立场,认为谷物国营农场实质上是大型农场发展的范例的话,我可以肯定,这有着一种经济无知的味道,不应该

采取这样的立场。最好还是说,我们希望生产更多的粮食,解决粮食危机,等等,再多的话就说不上了。

是的,还有一句话。我们这里都说著名的肯博尔农场是北美合众国现在唯一的谷物工厂,它是个什么样子呢?请允许对这个农场提供一些情况。我可惜没有机会访问那里,但当我到了蒙大拿州的时候,我说过这个农场。下面就是肯博尔农场的情况。我摘引一段:“格尔曼对我讲述了位于大霍恩(与怀俄明州交界的一个区,在该州的东南部中心)的、巨大的肯博尔农场。这里小麦面积7万英亩,亚麻面积4万英亩。”顺便说一下,同志们,给小麦地补种亚麻,这不意味着什么轮作:亚麻在处女地上生产得很好,而且播种亚麻就会把新鲜的土地上的精华吸收去了。接下来说的是:“这块土地是洛克菲勒在战争期间出于爱国主义的动机买下来的。企业破产之后,这块土地被肯博尔买下了,代价是用30美分购买价值一美元的土地。但不是所有的土地都由自己耕种,部分播种的土地出租给尼拉”(《北美的各农业州》,第89页)。换言之,洛克菲勒在战争期间为了投机买了土地,但是在战后的危机时期,他的企业垮台了,肯博尔廉价买了这块土地,这就像以前的谷物工厂一样。

对此,可以做点补充,除此而外,肯博尔还是一个广告商,或者是他的企业是一个做广告的企业——用于展示有关工厂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器。不管哪一个,他得来的都便宜。这就是肯博尔小麦工厂的状况。

现在,转过来专门谈谈我们的前景。我们打算做什么呢?我们打算组建大量的谷物国营农场。在这些国营农场实行不实行轮作呢?正式的消息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从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的报告中没有看到对问题有任何认真的提法和认真的建议。因此,我们应当开始的是一场讨论,我们在讨论中还应该问问他:“对于轮作、成本和资本投入等等您有何建议?”而他只是在讲话的最后才给我们回答,并说我们没有正确理解他,等等。由此可见,对他是不能批评的。我也知道,农业人民委员部准备在这里散发关于自己计划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是有的,但不知为什么不发给我们。因此,我不得不把利亚申科教授的那篇讲述了一大堆最有特点的事物的文章作为凭证。他对这个计划是这样叙述的。规定要做的轮作,要我说的话,这是“副轮作”、“替代轮作”,是这样的轮作,一开始要播种硬粒小麦,之后播种软粒小麦,再之后是大麦,之后是燕麦,也就是说连续播种的都是谷类作物。每一位农学家都会告诉您,这不是轮作。轮作指的是用豆类作物、根茎作物、中耕作物替代粮食作物——这完全是另一码事。如果总是播种小麦或者谷类作物,那么这就是野蛮的耕作制度。

**A. П. 斯米尔诺夫:**它不会恢复土壤肥力。

**奥新斯基:**土壤的生产力得不到恢复。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我们提出实行轮作的问题,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播种草本豆类植物。而谁来吃草呢?这当然要有牲畜来吃草。这样你们就要花大钱了。以后我要种饲料用甜菜——还要有牲畜可喂;或者制糖用甜菜——我就得建工厂;我种马铃薯——我还得建工厂。这件事又要花钱,甚至是大钱。甚至从财政的角度也能看明白(没有这方面的拨款),他们老是在单纯的谷物经济上围着野蛮的耕作制度转。

亲爱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如果您硬要说,您正在发现什么美洲,您正在造就农业的先进阶段,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我不久以前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战前俄国和苏联的国际移民和跨洲移民》<sup>225</sup>,讲述的是我国出人的移民和国内人口迁移的情况。我研究这个历史已经半年了,十分清楚这个事情的经过。

**斯大林:**您知道得十分清楚?

**奥新斯基:**斯大林同志,您要干什么——事先要给我捅出些娄子来,让我拿不出好的论据吗?我像常人一样了解这个问题,像一个相当明白事理的普通人一样了解这个问题,极其紧张地研究了这件事,有6个月没有离开过写字台。因此,我应该并能向你们讲述以下的事情。顺便说一下,这里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了解的,因为我要引用的是极为普通的客观统计。

我国的移民浪潮有过一个怎样的过程呢?在60—70年代时,是这样行动起来的:过剩的居民移向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后来,当土地显得紧张的时候,便开始向东方运动。要知道,我讲的是起码的常识。人们开始向西西伯利亚转移,在向西西伯利亚运动的同时,也还在向北高加索转移。后来,走出西伯利亚的森林草原向南方哈萨克的草原进发,对现在称之为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地方开始形成强大压力,与此同时,移民大量向阿尔泰移动。我说这些干什么呢?大约到了1905年的时候,就发现对哈萨克斯坦草原出现了强烈的、过多的移民压力。不得不进行谢尔比纳的统计考察。我要照直说,这个考察用欺骗的办法低算了保障游牧民族土地的系数,以此来证明还有闲置土地。接着发生的是居民迁移愈演愈烈,结果不得不又派出第二个考察队。这次考察纯粹欺骗性地确定了游牧民族的土地保障标准。我可以绝对准确地说,1916年哈萨克斯坦发生的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里的移民问题和牧民丧失了土地保障而引起的。

现在继续往下讲,这些移民定居在哪里了呢?自然,首先要定居在好的、比

较好的黑土地带。他们把哈萨克人排挤出去,从而(哈萨克人)自己的牧场也不得不改变了。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在移民活动又重新搞起来的时候,原先的草原边疆区和突厥斯坦把原来在他们疆域内的那些区又拿到了自己的手里,在那里发挥着原来的作用,一度曾把接受的移民最多是扩大到了30%,而现在又缩减到了10%—12%。于是对远东的向往开始了(准确些说是增加了),因为那里还有闲置土地。远东现在被认为是可以安置移民的地区,1927年,有28%的移民迁到了那里。总之,移民运动简单的经验表明,在哈萨克斯坦,移民或者同游牧民族争夺土地的那些人已经得到了良好的土地。(响起了主席的铃声)

**斯大林:**一个完整的报告。

**奥新斯基:**我可以就此结束我的发言,如果您愿意的话。

**主席:**您还有一分钟。

**奥新斯基:**我还想讲述以下几件事:指出他们规定出了多大的成本,要投入多大的资本,实际能够得到多大的收成和铁路网的状况如何。我需要10—15分钟。

**主席:**谁同意再给他10分钟?谁反对?多数。

**喊声:**给5分钟。

**主席:**谁同意给5分钟?大多数。

**奥新斯基:**如果从纯气候角度来说,那么在这里可以引证利亚先科,但是本来就已经清楚了,如果有350毫米的降水,在那里多少就已经可以搞起靠得住的经营了。在这些半干旱的地区,我们正好处在年降水量300—350毫米地带的边沿上。现在的问题是,国营农场能不能越过这个边沿?问题在于,今年要翻耕的土地还到不了这个边沿,但明年要翻耕的土地就处于这个边沿的范围之内了。美国人判断能否耕作的标准是,会有多少次的歉收和这种歉收间隔多少年发生一次。如果在3年中就会有一年歉收,这就意味着,这个地方不适于发展农业。因此,必须告诉你们的是,希望建设大批国营农场的地方处在这个地区的边沿或者这个地区的边沿之外。如果是粗浅地了解一下向东移民的历史,这种状况就很容易解释了:要知道,好一点的土地已经被人家占去了。

下面,我推荐你们读一下利亚先科的一篇文章,他讲述了农业人民委员部打算向新国营农场投入多大的固定资本:一俄亩土地投入70卢布。换句话说,预算是这样制定的,要过多地减少必要的开支,因为利亚先科提供了以下资料:在美国,农场主要投入的固定资本是从90卢布到260卢布;在我们这里,按国家农

业托拉斯审议委员会的计算,支出为:在北高加索为80卢布,在西伯利亚为99卢布。这里的平均数为70卢布。可以事先就断言,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是压低了的。当我们开始着手做的时候,我们将在这里投入的不是3.9亿卢布,还要把流动资本算上(而在这里你要看到的是,并没有把流动资本计算进去),而是5亿卢布。

而成本的状况如何呢?在计算成本方面,情况是这样的:农业人民委员部计算的平均产量为53普特,利亚先科是特别谨慎的人,他说,最大的收成可能是45—50普特。这就是说,成本产生于这53普特的产量,用了那么些支出,降低一点吧,看来,成本要高得多。利亚先科得出结论说,谷物的价格要……

**加里宁:**歉收年算进去了没有?

**奥新斯基:**当然要算歉收年,否则谁去算。这样的谷物要比西伯利亚收购的贵。这是第一眼看到这件事时的情况,如果您要在这上面再加上我们希望能在4年的时间内结束类似事情时会遇到的情况的话,那么我就可以想象出,在一般情况下,这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了。可能出现的是,我们不仅会丢脸,而且会把大量的人民的钱投在这上面,而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从经济的观点和农艺学的观点出发,这将都会是得到负面的结果。(主席的铃声)

我这就讲完,我要说的是:第聂伯河工程方案研究了几年,我不甚了解,这一工程方案传闻了40年,研究了25年,制定了4个方案,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委员会审议过这些方案,它们消化了多少时间,等等,只是在最后才着手进行。而在这里,用两个月的时间安排了日程,一个委员会开了8次会议。而加里宁同志说,一次就足够了,不必进行任何议论就可以着手工作了。我要说的是,现在就应当完成以下的事情:把这个方案拿给首先是农业学家,还有就是所有专家,进行广泛讨论。而且对他们不要施以政府给以支持、已经通过了等等的任何压力。因为我们的专家对这种情况的反应往往是非常强烈的。各个方面应当最仔细地把这个问题吃透,应当最为认真地把拟定的地区调查好。因为所有挂在这里的地图,上面画出了降水量、土壤品质的各种曲线等,曲线归曲线,但这个地方应该得到实实在在的研究,对此应该采取最认真的措施。要知道,这个地方是由旧的移民局“零零散散”地研究过的,后来就没有好好研究过了。我们在那里可能会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而这很可能会是致命的。我以为,现在不能就以这样的方式通过方案。如果我们通过了,那么就可能预言,不仅要犯一般的错误,而且要犯更严重的、对于我们来说代价很高的错误。

**主席:**请伊万诺夫同志发言,下一位是丘巴尔同志。

**伊万诺夫:**我觉得,建设大型谷物农场、苏维埃式的经济单位的意义和必要性,从在中央委员会全会对前一个问题的讨论中已经可以看清楚。克服我国经济在谷物市场上的困难的可能性之一,就是建立大型国营农场。因此,我觉得,组建苏维埃大型谷物农场合适不合适的讨论本来就不值得提出。但是,在奥新斯基同志发言之后,又不得不再谈谈这个问题。奥新斯基所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在我们的政策中,我们要么做得“过了头”,要么做得“不到位”,似乎什么都不应当做。

他说,政治局关于建设大型谷物农场的建议是经济学和农艺学上的无知,西欧和美国的经验教导我们,不可能有大型谷物农场,大型谷物农场生产的粮食是昂贵的,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奥新斯基怀疑建设大型苏维埃谷物农场是否合适。我认为,这毫无根据。首先是对西欧和美国经验的引证。在我看来,十分明确的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型谷物农场长久生存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了追逐利润,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正在推动,而且将来也要继续推动所有的大型谷物农场走向发展更集约化的作物的道路。而我们在实施建设大型谷物国营农场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另一种方针。对于我们来说,在当前的场合,在现在的形势下,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重要的是尽可能较快地在最短的期限内增加商品粮方面取得一定的效益。这是压在我们头上的首要任务,这就是为什么说,建设大型谷物农场对于我们极其迫切的。

在大型谷物国营农场发展的第一阶段上,十分可能的是,将不会完全遵守正确的轮作制,粮食价格将会略贵于我们从农户那里收购来的粮食。这些因素有可能要发生。但是它们能迫使我们放弃大型国营农场的建设吗?这种农场在增加商品粮方面能给我们提供巨大的效益。如果说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是粮食将要贵一些,那么我们的总体经济形势巩固了,特别是与加大谷物储备有关的经济形势更巩固了,难道这不能补偿因此而出现的花费吗?

**李可夫:**正确。

**伊万诺夫:**需要提出的是这样的任务,但奥新斯基同志是抽象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忘记了,我们3—4天讨论的问题是如何走出由于粮食的商品率减少而出现的困境。奥新斯基忘记了当前的任务而抽象地提出了问题:这就是你们的不产生利润的大型农场,这样的农场在西欧和美国经不起任何批评,垮台了,因此我们不值得建设大型国营农场。不能这样提问题。需要考虑的是让国营农场的粮食便宜一些,需要提出尽量少地野蛮使用大型国营农场土地的问题,应当提出这些任务。但对于我们来说,最迫切的任务是获取新的几亿普特的商品粮。



我觉得,应当抛弃奥新斯基所描绘的担心,应当为我们提出这些任务有些晚了而感到惋惜。这本来应当是我们的长处,我们在这件事上已经有了实际成果。

由于大型国营农场的建设与尽快克服谷物生产中的困难有关系,我们应当在短期内从国营农场获得尽可能大的实际成果,而这这就要求我们尽最大的努力,花费最大的精力和以最快的工作速度开展我们大型苏维埃农场的建设。

我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什么时候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为解决所规定的任务取得最大的效果,取得最大的实际结果呢?只有在整个党的、整个苏维埃的社会舆论都被吸收到这个事业中来的时候,只有地方上的注意力、精力集中到这个事业上来的时候,只有地方上的主动性完全被利用起来的时候,只有为地方上的创举提供某种自由发展空间的时候,才能取得这样的成果。为此,首先需要确立对地方上的信任。然而也有危险,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那就是从一开始就对这个生气勃勃的、急待解决、非常需要极大的关注和社会监督的事情过分地实行集中。加里宁同志在做报告的时候说过,我们要“逐步加深”集中化,并强调指出,一切都应当在逐渐加强集中化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不反对生产计划和总的领导掌握在一个中心,实行集中化。但我们反对监护,反对束缚地方上的主动精神,而这种危险已经开始显现出来,这将会导致地方组织减弱对新国营农场建设的注意力。绝不能弄到像委员会的某些工作人员所搞的那样荒唐,要求指出在哪里建什么样的草棚、要求指出草棚在地图上的位置。这无论如何不行,这不会产生任何结果,这样你们就会打消地方组织积极参加这项伟大建设的愿望。但是没有对他们的社会监督,没有地方党组织贴心的参与和领导,我们在这个大规模建设事业上很难预防沙赫特事件的发生。

我们同意按一定的集中程序进行建设。但是,现在必须预先说明,需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来防止监护和束缚地方的任何主动性。需要规定国营农场的权利。这些权利无论如何都不应当比为托拉斯规定的那些权利少。在工业方面,我们在汲取了某些教训之后,已经走上了为有关生产单位提供更多经济自主性的道路。而我们在开始建设新事业、建设国营农场的时候,却扭向了相反的方面。以后不得不进行改正。我们可能要稍后些时候才能认识到有必要做出这种改正,但是那就得要有所付出了。

安采洛维奇同志在这里讲到与加快建设新国营农场有关的某些事情,我想再补充一个内容,特别是关于拖拉机,因为牵引力问题对于苏维埃农场来说是个根本问题。而我们为这些农场提供的是牵引力很小的拖拉机,这就加大了土地耕作的成本,提高了粮食价格。

我觉得,安采洛维奇同志关于旧国营农场的意见应当得到同情与支持。我们的同志不久以前把俄罗斯联邦农业银行第四季度的贷款计划交给了我,其中标出为现存的国营农场提供的只是区区5.7万卢布的贷款。我们的这个办法为它们制造了显而易见的巨大困难。它们不是生产谷物的国营农场,我们不能对它们实行我们现在对新建设的国营农场所实行的那种方针,但也不能实行会加大现有国营农场困难的路线,不应当完全忘记和缩小旧国营农场的作用。

联系到建设大型国营谷物农场的任务,必须切实提出、推动对于获取建设新的大型国营农场所必需的土地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问题。在这里,我指的是关于北高加索亚速海附近的荒滩问题,它可以为轮作增加20万俄亩良田。

**臧声:**为排水需要花多少钱?

**伊万诺夫:**这里主要的是,我们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随着这块土地排水的进展,对它实行轮作。你们今天排水1000俄亩,我们今年就可以对它实行轮作。

**臧声:**这是亚速海荒滩吗?

**伊万诺夫:**是的,关于生产谷物的大型苏维埃农场的问题值得我们的党给予重大的关注。安采洛维奇同志说,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得不到同情,得不到支持,这个问题“遭到的是四面阻击”,他这样说是不对的。在我们这个几百万人的党内,不可能没有怀疑论者,没有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也就很难有一个几百万人的党。重要的是党的社会舆论。这种舆论朝向哪里?它应该是朝向把建设大型苏维埃农场的任务贯彻到生活中去,落实到生活中去。党内有的正是这种情绪,而这就是我们能够胜任这项任务的保障。

我觉得,在谷物农场遇到的种种困难的背景下,加快建设大型国营谷物农场的任务是极其迫切的,它能加强无产阶级领导,帮助无产阶级领导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对自己的整个经济做出计划。有可能,我要强调的是,有可能,那时斯捷茨基们就会镇静下来,不再像惊弓之鸟到处乱窜了,因为不可能不把“关于卡巴尔达炮声”和“鼓掌”的张皇失措或者蛊惑人心的废话说成是乱窜(他们大概胡说这些东西是想为自己无力的论据增加点儿分量)。

**主席:**请丘巴尔同志发言。

**丘巴尔:**我觉得,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不会对建立大型农业生产的思想持否定态度。不管他怎么怀疑,怎么犹豫,如果他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话,都不可能维护这种立场。因此不应该提出建立新国营农场的问题,把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转移到捍卫建立大型农业生产的思想这样的层面上来。更正确的做法是在报告

和讨论中提出或者说明,应该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很多事情要取决于高质量地完成这个任务,从经济成果上说是如此,就政治效果而言是如此,在解决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一系列任务上,也是如此。而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在他的报告里有两次或者三次强调说,随着这个任务的解决,社会主义在农村就建成了。我觉得,他是在制造幻想,以后他是要为这些幻想付出代价的。十分清楚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東西,将要比解决从大型苏维埃农场获取一亿普特粮食这样的任务所要求的東西多得多。

加里宁:这是清楚的。

丘巴尔:那您为什么要再三重复呢?建立大型国营农场,这是加强社会主义阵地的极其重要的一步,这是对的,但我们为了捍卫这些步骤和我们组建国营农场的纲领而去制造幻想,那么经过一年或者两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干旱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两手一摊,不知所措,会说,社会主义建设失败了。

我认为,任务的提出是完全正确的——通过大型农业生产获取一亿普特商品粮,这个任务是正确的,现实的,是可以完成的,全部问题在于,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因此,在全会的决议中,在决议的草案中,应当指出伴随着解决这些任务将要出现的那些困难,我们打算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如果不指明存在这些困难,我们就可能不正确地引导党,一旦遇到困难的时候,怀疑的人就会恶毒地说风凉话,说我们失策了。不看到困难是不行的。

我不是要解决技术问题、农艺学问题、国营农场应当具备什么样的规模和怎样组建国营农场的问题,因为我过去不是具体从事这些工作的,因此我想,奥新斯基同志更正确些的做法是在相应的计划机关或者在粮食托拉斯董事会里做些事情,把自己的实际经验运用到这个大事业中去。

但是,既然我有幸同乌克兰的国营农场打交道,我认为,大型苏维埃农场的概念丝毫没有排除一种必要性,那就是要找到大小最为合适的面积,让机器和人力的使用都能做到最合理、最有效。可能这将是1 000或者2 000公顷为好,我觉得,不要再大了。在大型农场里,需要找到能够提供最大生产效益的生产单位,不要让拖拉机和机器行驶到几十俄里以外去,把人运送到几十俄里以外去干活。要把这些单位纳入大型农场,因为大型农场是由若干个单位组成的,就像工厂是由车间组成的一样。

关于国营农场的主导影响,我觉得,为了吸引党的注意力,为了消除苏维埃农场与农户经济的对立,应当提出这样一条,其中说道,苏维埃农场的主导作用将被用于提高千百万农户经济。

斯大林:这一点那里讲了。

丘巴尔:这里是泛泛地说了,但应当说,我们能够而且将来也应该从苏维埃农场获取必要数量的改良种子,当然,为此用不着拿走所有的粮食,只是拿走一部分。经过改良的种子将能更快地增加商品粮节余,不只是为了苏维埃农场,而且要从农户经济的耕作面积上获取,我们希望从农户经济那里多获取一些,因为,农民经济、集体农庄等等使用了改良种子就可以提高商品率。来自国营农场的改良种子是提高全国商品粮节余的重大手段。如果从500万—700万普特的收成中拿出100万或者200万普特的改良种子给农户,这部分粮食我们就不是吃掉,而是用于再生产更多的商品粮了。这个任务必须交给国营农场,因为与第二款里提出的任务相比(其中包括了乌克兰舍甫琴柯国营农场的例证),这个任务要更巨大得多,从政治上说,农民们也能够更好地理解。我应当说,这个国营农场具有很好的成果,其中包括改造农民经济,但是并不一定非要和国营农场联系起来。我们之所以把这联系在一起,只是因为我们使用了同一些组织者,因为为农民耕地的拖拉机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为国营农场耕地。这就是说,国营农场要具有一定数量的拖拉机,也已经这样做了,它还要有完全是为周围农村的农民服务的拖拉机队。在这方面,我们受到了差距、劳动力和耕作成本等方面的束缚。可以在国营农场之外组建拖拉机队,但要有一定的维修车间、维修基地。

臧声:这将会更坏。

丘巴尔:我不知道,在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不是确实更坏,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给国营农场本身提出这样一个任务:从地里该收获的不是52普特,而是153甚至253普特,那么国营农场的人员就没什么可开着机器跑来跑去为农民服务了,他们就应当把所有的力量用来解决给他们规定的任务了。为建立拖拉机队,需要划拨新的资金、使用新的人力和物力,因为这是农业生产社会化的强大杠杆。但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对经验品头论足,而是为了做比较,看看我们使用国营农场的种子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效果,把国营农场本身还不够用的农具用来为农民服务又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在我们乌克兰,要想正确地和能够有赢利地进行生产,尽量获取土地所能给予的收成,国营农场农具的保障率尚低于50%。我们的计划只是规定到第五年的年末,才能完全配齐畜力和农具,百分之百地满足需求。根据我们莫斯科州国营农场联合公司和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sup>226</sup>的计算,仅此这一项就将提高产量大概为80%。

从这一观点来看,我认为,在讲述新国营农场的决议案中还应当谈到旧国营农场,谈不应当降低对旧国营农场的注意力,应当从旧国营农场得到比现在更多

的粮食。必须讲明这一点,以免造成实行混合经济的旧国营农场不好、只有新的谷物国营农场才好的印象。

我认为,在某些地区,可以在5—6年的时间内野蛮地使用土地,能得到很大的效益,获得粮食,但风险也将很大,因为在野蛮使用土地的同时,大自然,从害虫到干旱,会突然发作,如果在这种条件下收成只有40普特,势必要弥补亏空,而且是不小的亏空。

在新国营农场,我们把宝押在粮食上,我们在初期可以局限在这一点上,但是在以后就得进行补充投资了。现有的国营农场在集约化作物、集约化经济的方向上发展,并没有把粮食作物甩掉,而是提高它们的利润率,在一系列情况下,不大的投资就可以产生比较有保障的成绩。这就是为什么也要特别关照旧国营农场,对它提出扩大商品粮的任务,给它们保障相应的拨款。

对于第七款,我觉得,既然政治局已经批准了1928年的工作计划,对它进行了审议,那么在加里宁同志做了报告之后,全会就不能批准这个工作计划了,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得到全会的批准才能修改计划。工作计划不在于取得500万—600万,工作计划是具体的业务计划,在全会上我们不能对它进行详尽的讨论,因此无须批准。我认为,我也强调,如果对规定建立国营农场的条款一条一条地细心研究,认真考虑在什么地方组建国营农场,在什么地方考虑过渡并且考虑到地方的情况,这个工作计划的具体规划可以确保我们规定要取得的那些成果。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您过分看重了集中化,这样孕育的危险是,说如果中央犯了错误,会扩大到所有国营农场,地方的首创精神,地方经验,地方上的人会被全面地吸引过来效仿正在做的事情,错误将会比伊万诺夫同志所讲的那种情况增大10倍。我们是在乌克兰,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取消移民业务划拨出部分土地,因为在这种条件下,给移民拨款,投入不足以使他们定居下来的资金是不合算的。这些投入产生不了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允诺的那些资金或物资援助可以得到的效益。移民在多数情况下不会扎根于他们的新条件,经过二三年他们还是要回去的。我们希望,在组建国营农场时,国家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会更好地使用这些土地,这要比把这些土地分散给个别移民更好些。

最后一个意见是关于奥新斯基同志和第聂伯河工程的。奥新斯基同志在这里涉及了这个问题。我同意伊万诺夫同志所做的评价,奥新斯基抽象地谈论大型生产,不谈我们面临的具体形势和必要性,不把这一行动同我们现在正在采取的步骤进行比较。其实,应当更多地是同这些行动进行比较,不是同美国的那些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垮台的谷物工厂比较。

加里宁:再过10年,它们在我们这里将会变成其他东西。

丘巴尔:所以,他是抽象地谈论这个问题。他提到,过早地开始了第聂伯河工程的建设。我认为,我们根本没有过早地开始建设,因为当前我们准备要大量生产汽车和拖拉机,正像这里所说的,我们面临的是,农民需要的与其说是手工工厂,倒不如说是钢铁和机器。

斯大林:忘记的正是这一点。

丘巴尔:然而,我们既没有足够数量的、高质量的钢,也没有足够数量的铁。没有这些东西就不可能真正地搞工业化。我们应当制造机器、发展化学工业。我们不可能从国外进口我们为此所必需的所有的东西,而没有电力我们自己又得不到这些东西。您说,我们应当放弃美国的规模。您恫吓我们说,我们过早地开始了第聂伯河工程的建设。而我要说,我们的建设开始得晚了,因为我们是这样的状况,我们应当加快建设冶金厂,在每个工厂应当建设自己的发电站,我们应当建设化肥厂,每一个工厂都要不可避免地建设自己的发电站。我们需要钢铁,需要铝,等等,我们需要发展机器制造业,这一切您都没有提到,钻到死胡同里去了。您在这里采取的是肤浅的态度,争论那些做得完全正确的事情和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到底的事情。每一个巨大的行动必须毫不动摇地去做,做到底,当然要检查工作的每一个阶段,以便尽量少犯错误。

主席:闭会。在晚上的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哈塔耶维奇,第二个是彼得罗夫斯基。

## 第十四次会议

7月11日晚间

**主席(李可夫):**请哈塔耶维奇同志发言,下一位是彼得罗夫斯基同志。

**哈塔耶维奇:**我完全支持丘巴尔同志关于把旧国营农场的专门条款加入决议案的建议。加里宁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只是附带地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大概是这样说的,在旧国营农场,在它们的组织里,在它们的工作安排中,有情感因素,于是在这方面就把旧国营农场与应当有经营头脑地和合理地加以安排的新国营农场对立起来。凡是看过这个报告的人都会不由地从中得出结论,认为旧国营农场已经该寿终正寝了。要是地方上从加里宁同志的报告中得出这个结论,这对工作是极其有害的。在我们伏尔加河中游地区,旧国营农场有26万公顷的土地面积,而用于播种的面积不到6万公顷。我们打算组建面积为50万公顷的新国营农场。我们的老国营农场在1927年末的亏损是100万卢布,这个亏空不仅是工作很糟糕的结果,而且也是由于很少对它们给予重视和帮助的结果。中央政治局1926年12月30日做出的关于国营农场的决议<sup>227</sup>落实了不到15%,如果落实20%,这大概就算多的了。实际上,所有谈到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发展旧国营农场的决定都没有落实。新国营农场是按每俄亩80卢布的固定资本组建的。我们这里的旧国营农场一俄亩的固定资本为21卢布,21卢布50戈比。很明显,在具备这样的固定资本、在完全没有流动资金的情况下,要求最好的工作人员好好地管理旧国营农场,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进行如此巨大的组建新国营农场的工作时,让旧国营农场寿终正寝,这是完全不对的。

现在,我们旧国营农场的状况是这样的,它们的收割面临着被中断的严重威胁。它们应当收获几百万普特粮食。由于它们已经两个月没有发工资,由于它们连一个戈比都没有,非常值得担心的是,它们能不能成功地收获庄稼?在俄罗斯联邦经济会议上提出了发放贷款,为收割庄稼发放专门的短期贷款的问题。尽管斯米尔诺夫同志下达了指示,俄罗斯联邦经济会议还是决定不发放,这或者

是因为米柳亭同志在那里主持,财政人民委员部根本就反对拨款,还是有别的原因,但总归是决定不放贷。这威胁着庄稼的收割,尽管为此仅需要10万—20万卢布,但就是不同意作为短期贷款提供资金。我们今天一做出决定就要发放几亿卢布,为的只是希望在未来能够获得粮食。我不反对新国营农场,但我不同意奥新斯基同志的说法,他实际上是建议现在就取消政治局就这个问题做出的决议,但我认为在采取诸如组建新国营农场这样大规模的措施的时候,应当同时保障能够更果断地落实以前做出的使旧国营农场处于良好状态的决定。

不管是旧国营农场,还是新国营农场,它们的工作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人。旧国营农场的人们现在状况很不好。在所有的国营农场联合公司里坐着的那些人都不会安排这些事情。我认为,关于人的问题,在决议案中应当更坚决地突出出来。应当进行专门的动员。必须让中央委员会检查新国营农场和旧国营农场联合公司领导班子的所有领导成员,必须向那里专门派遣善于安排这种工作的200名合适的和强有力的人员。必须迫使地方党组织、中央机关安排这200名最能干的、最可靠的人员来做这项工作。没有好的人员这个事业就不会前进。

在组建新国营农场的工作中,我们已经遇到了许多危险和混乱。在我们州,我们需要耕作1.8万公顷土地。为此应当提供144台拖拉机,但在我们接到任务之后一个月,又通知我们说,你们拿到的将不是144台,而是80台,而其余的,对不起,去找犍牛吧,使用犍牛翻耕土地。我不知道,就是这80台拖拉机我们还能不能得到。如果将来这样继续下去,这项事业不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接着出现的是移民问题。用于移民的基金正在划拨给国营农场。能干的人那里已经有了,土地已经划拨出来,但现在这一切又将取消,我们在地方上真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显然,这个问题不止在我们这里有,在其他区也有,我们已经把最方便的、离铁路最近的土地让给了国营农场。显然,这些地块是以前划拨给移民的。这是具有政治意义的问题,因此应当就这个问题向组建新国营农场的所有的区下达普遍适用的指示。

既然加里宁同志和其他同志在这里不仅涉及了国营农场问题,还总地谈到了发展农业的任务,那么,我想就我们秋播运动的前景说几句。我觉得,这场秋播运动正处于威胁之中。我们在春天大干了一番,我们使劲地翻了春播地。这是实施那些在这里遭到很多人议论和污蔑的紧急措施所产生的部分成果。在这里有的是这样的危险,在春天我们大干了一场,而在秋天又要必须巩固和扩大这一成绩。我们需要的是提高扩大播种面积工作的速度,但存在着相反要降低发



展速度的危险。这个危险是非常严重的、现实的。因为直到现在还没有政府关于签订秋播合同的任何决定。几乎不往这里拨款或者拨款太少。有制定好的签订秋播合同的政令草案。我听说,李可夫同志几乎是像常言所说的要埋葬这个草案。需要签订秋播合同的贷款。当我们自己讨论准备秋播运动的问题时,正式通知我们说,只能签订精选种子的播种合同;在伏尔加河中游区的范围内,播种面积为600万公顷,我们这里精选种子播种面积只有10万—15万公顷。如果我们在这样的规模上签订合同,那么,同春播运动开展的工作相比,这个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将是极其微不足道的。

**李可夫:**您是说我埋葬了什么人吗。

**哈塔耶维奇:**我听说,鲍曼同志的委员会同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一起拟订了秋播合同草案,您把这个草案压下了。现在有很大的威胁……

**李可夫:**鲍曼同志要求在全会之后听取草案,而我满足了他的要求。

**哈塔耶维奇:**有对秋播运动不发放任何贷款的危险。有这样的议论,如果这种说法是真实的,那么就存在着一种威胁,我们在春播运动中得到的进展今后就不会得到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农业发展速度不但不会加快,反而要向后倒退。如果说要发展个体经济,那么,更多要做的将通过推广签订合同这样的措施和扩大对这件事的拨款来达到这个目的,这要比马列茨基等人的文章<sup>228</sup>好得多,有益得多。光有《真理报》的社论,秋播运动是搞不起来的。需要的还是钱和贷款。我认为,应当顺便回忆一下这件事,保证秋播运动取得更大的成就,要为其奠定一定的基础,哪怕发放最起码的物资。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发言。下一位发言的是克利缅科同志。有一条建议要求停止辩论。应当决定,下一位发言者是否要做准备。

很多同志在要求停止辩论的声明上签了字。在发言人名单上还剩下相对不多的同志,彼得罗夫斯基同志之后还有5人。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听完他们的讲话。问题本身是重要的,我认为还用不着停止辩论。如果我们将能控制在10分钟内,我想,穆拉洛夫一个人作为例外,因为他领导这件事情的实际工作,如果其他人严格地只给10分钟,那么,我们在晚上休息之前就可以结束辩论,并听取加里宁同志的闭幕词,在休息之后听莫洛托夫同志讲话。

有谁赞成结束辩论的建议?

**喊声:**没有!

**柯秀尔:**建议冻结发言人名单。

**主席:**现在表决。谁赞成冻结发言人名单?大多数。

请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发言。

**彼得罗夫斯基:**关于组建新国营农场的问题,毫无疑问是提得晚了一些。遗憾的是,由于原先国内战争的条件,而主要的是,由于农业革命的条件,我们没有能有计划地在苏维埃大地上组建这些国营农场,让这些国营农场把所有的州和区的农民都包括进去。现在这些国营农场是在狭窄地带,似乎是在不为人瞩目的边远地区发展的。但是,需要向国营农场大量拨款,要拨去3.5亿—4亿卢布,而且应该记得的是,我们常常会失算,所以对这件事就需要特别小心谨慎了。于是我想,在这里该给政治局的决议案增加一条,第八条,这一条说,第一,期限要略微延长……

**斯大林:**对。

**彼得罗夫斯基:**而后,在可以看到最大投资利益的时候,投入第一笔拨款。那时,推动这一事业前进的热情就可以出现了。

我的出发点是,当我们强调什么事情的时候,往往得到相反的结果。比如,我们现在说,必须帮助个体农民经济,因为它在我国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中占有90%的份额。但是,如果从我们的资金中拿走4亿卢布,那么自然而然的是,我们对个体农民经济的帮助就很微弱。而现在又非常想要、非常需要帮助它。

你们大家都知道,现在正在发生的是一个组建简单的农民集体的大浪潮。在我们乌克兰,这样的集体正在成百个地组建起来,几乎每一个这样极其简单的集体都要求购买拖拉机。如果我们把很多资金、拖拉机都交给国营农场,那我们就不能支持在整个苏联已经广泛展开的组建农民集体的浪潮。你们大家都知道,支持私人个体农民经济毫无疑问将能带来很大的好处,会增加农民经济的产量,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快地走出我们现在所处的粮食生产危机,这要比国营农场来得快;如果我们现在支持农民集体浪潮,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组织它们,也就是说,把资金用于更好地组织它们,而主要是能够更好地进行生产。你们知道,帮助农民经济的事情处于刚刚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拿出足够的农业生产工具,使用木犁耕地的农户有几百万,贷款工作很弱,数量微不足道,而且可能只有在一年半以后,我们才能够安排好把这批贷款交给贫农和中农,要不,他们就会跑到富农那里去了。

**李可夫:**贷款从莫斯科运抵农村要用7个月的时间。

**彼得罗夫斯基:**要把整个农民经济更好地组织起来,我们才刚刚开始一点点地运作起来。一个是自然灾害,另一个是我们的宣传鼓动,掀起了当前农民组建集体的运动浪潮,这些集体正在到处寻找出路,以便摆脱已经形成的艰难的危机

状态。饥饿是无情的,现在全体农民们经受的危机着实地教会了他们去寻找出路,摆脱掉国家经常反复出现的这种状况。如果我们对于这种集体化的浪潮不给予支持(而我们是不善于给予这种支持的),如果我们把这4亿卢布都投放在国营农场的组建上,从而给农业砍去这些资金,那么,我们就会极大地伤害农民通过自己的组织和国家的援助改进自己事业的热情,而这种国家的援助本来是应当有助于农民经济的成熟,而且这样我们的各个城市就不会有失业的麻烦事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必须认真对待组建农民经济集体的浪潮,必须更严肃地注意到像安采洛维奇同志和斯米尔诺夫同志这样有威望的实践家在这里的发言里提出的意见。我没有说奥新斯基同志,他是对所有问题的一贯的怀疑者,但是像安采洛维奇同志和斯米尔诺夫同志这样的实际工作人员,他们说……

**安采洛维奇:**恰恰相反,我说的是要把资金用在这个事上。

**彼得罗夫斯基:**〈他们说〉,需要更为认真地着手这件事,更好地研究它。因此,需要做的不是把这4亿卢布马上都抛出去,而是要更为细致地进行观察,第一批先把1亿投到这件事上,如果它能提供效益,那时再赶紧动用第二批拨款,调动起农民对这个事业的最大愿望和最大热忱。对于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是,引起农民对组建集体的这种愿望。大家都知道,很多农民把我们的巨资投入看做是压在他们背上的赋税,对第聂伯河工程,对同样的另一个大型建设项目的巨大投资,都看做是基本建设中的失算。已经有几封农民来信说,能不能停止建设第聂伯河工程,因为把所有的资金都投放在工业上,农民的经济就得不到支持,取得贷款就十分困难,而你们还要想搞新的建设,等等。

**臧声:**您如何看待这些说法?

**彼得罗夫斯基:**你们用不着像考试似地给我提这类问题。我的态度你们可以在我所进行的工作中、我所写的东西、我的讲话中进行检查,而不是在这里发表议论。我们有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的决议,我是捍卫这些决议的,而我如何对待国营农场的建设,我现在就是在阐述我的想法。

对于农民现在反对我们巨资投入这件事,应当用强大的宣传给以反驳,因为在这方面支持农民的,是主张我们停止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反动的残余地主和富农阶层。但为了使农民,特别是中农尽可能少的受到有害宣传的感染,我觉得,我们应当对这个问题采取这种态度:逐步地、连续不断地把期限进一步拉长一些,确定那些可以立即定下来的国营农场,展示它们良好的利润率,并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向前进。

**主席:**请克利缅科同志发言,下一位发言的是克维林同志。

**克利缅科:**政治局关于建设国营农场的决议是正确的决议,如果这个决议做得早一点,那就更好了,我们就有可能把那些用于移民的土地,也就是那些好地,用来建设国营农场。

**臧声:**对。

**克利缅科:**现在应当从实际的观点来看待国营农场。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呢?首先是人的困难。我们现在正在物色托拉斯经理,我们几乎谈了2个月,但仍然没有挑选出来。我们需要100名能干的工作人员来做这些土地面积为2万—5万俄亩的国营农场的经理。还需要至少1000名经济管理处主任,这些经济管理处的土地有3000—5000俄亩。然后,我们还需要大约5000名各种技术水平的农艺师。因此,人的问题是主要的问题。正确地选拔人、安排人,就把事情做成了一半。个人在国营农场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臧声:**这要比历史上更大。

**克利缅科:**要是说乌克兰国营农场的实践、马尔克维奇同志的工作,那么他确实是劳动英雄。他做了大量工作,堪称整个联盟的模范和榜样。

**丘巴尔:**你别太夸奖了,不然人家可能会把他拉走的。

**克利缅科:**如果要去干大事,为什么不能拉走?这没有什么关系,他干成大量的工作。我们只是谈论了工作,但在实质上,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国营农场的工作研究好,还没有做出评价。而这些国营农场确实是在实践中,在改造,在对我们的农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过程中,也就是在建设公有农业中,开始担负起主导作用了。可惜的是在我们俄罗斯联邦,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好夸口的,但也有可能是由于我还没有进行很好的研究。

**安采洛维奇:**有好的、优秀的国营农场。

**克利缅科:**国营农场是有比较好的,但是如果它们亏损,那么它们再好,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处呢?

**安采洛维奇:**已经有不亏损的了。

**克利缅科:**如果看一看我们的国营农场固定资产的结构,那么,占重要地位的是建筑物,其次是农具,实际上有50%是用不上的东西,其次是役畜,只有需求量的1/3。

**安采洛维奇:**这里实际上就是一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状况。

**克利缅科:**亏损在一定程度上就表明了这一点。对资产负债表的分析说明,我们俄罗斯联邦的国营农场的处境极其严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减少在建设新国营农场上花费的精力。我们总是迁移农民。首先,从开拓的观点看,移民是有

效益、合算的。远东——这是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应当开拓远东：那里人力不够，日本人、朝鲜人，等等，正在对这里进行反向开拓。远东的谷类饲料平衡状态不好，我们必须远距离向那里运送粮食。

就说西伯利亚吧。这里首先是林业工业，这里首先应当铺设联通西伯利亚和突厥斯坦的道路。而对于其他地区来说，在大部分情况下，移民是最不合算的，因为迁移每一个农户我们大体上就需要花费大约1 000卢布。然后，我们要为农户负担一到两年，因为农户甚至还没有自己生产的口粮，再后来，农户开始周转经营起来了，然后就变成了富农，我们便开始同它们进行斗争，等等。所以，从经济上、原则上看，建设新国营农场的问题提得是非常正确的；这里只是仍然需要进行精确的计算，因为我们每搞成一项建设都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我们拟订了计划，可后来建设费用要翻一番。我不相信，我们能用3.35亿卢布就可以完成这项建设。这只是对这件事情的粗略概算、控制数字。如果有人问我：如果这项建设价值5亿卢布，您会不会签这个项目？我会签的，只是不要更贵了，因为组建新国营农场要比一般的农民迁移更有利。

丘巴尔：我们给的较少。

克利缅科：我们会给的较少，但总体来说，我们需要1 000卢布。

李可夫：国营农场为什么要搞没有必要的移民呢？

克利缅科：因为我们要开垦可以经营的荒地。

柯秀尔：这是个体经济无力做到的。

李可夫：要知道，迁移的是生活不下去的农民。

克利缅科：农业人口过剩的问题不能用移民办法来解决，应当通过改革经济本身的结构和资本投入来解决。

李可夫：但也不能用国营农场来解决。

克利缅科：不，不能用国营农场来解决。国营农场解决不了农业人口过剩的问题，移民也解决不了问题。

加里宁：但它们会减缓。

克利缅科：某些地区在减缓。但移民只是能在很不起眼的程度上解决农业人口过剩的问题。在这里，问题的根源完全在别的地方。

安采洛维奇同志在这里讲话的时候，说阿尼西莫夫同志的文章欠缺基本常识。

安采洛维奇：不是文章，而是某些论断。

克利缅科：我和安采洛维奇是同样的农艺学家。阿尼西莫夫同志是真正的

农艺学家,是共产党员,有威望的工作者。他写道,在新国营农场里,粗放的谷物生产可以进行5—10年。这是对的,因为我们翻耕的是撂荒多年的土地。

**安采洛维奇:**某些地区是什么样的土质——壤土,沙土?

**克利缅科:**壤土、沙土?在那里的草原上黑土居多。我们翻耕撂荒多年的土地,是为了开垦它,作好准备,好好地哪怕是进行谷物生产,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因为,如果现在就要翻地、播种,那么长出来的不是小麦,而是冰草。要是在这片荒地上获取以粗放方式甚至野蛮方式生产的一切,那我们至少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播种5年,而且只耕种粮食。这是农艺学家们和学者们说的。

**安采洛维奇:**每年的收成都要减少。

**克利缅科:**我同安采洛维奇是同样的农艺学家。

**托姆斯基:**他是正派的农艺学家吗?

**臧声:**他是农艺学家的领袖。

**克利缅科:**我认为,这片土地以野蛮方式至少可以耕作5年,但与此同时,应当准备实行比较文明的谷物经营制度。问题是实行草田轮作还是玉米地轮作。玉米可以清洁土地,从农业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可以更新土壤。这个问题需要研究。

**安采洛维奇:**您是想只有在5年之后才转向草田轮作或者其他轮作。

**克利缅科:**您可以在杂志或者报纸上发表文章同阿尼西莫夫进行辩论,而在这里发表这样的言论是十分大胆的。(主席的铃声)我该怎么办?我还什么也没有说。请给5分钟吧。

**主席:**表决一下,谁赞成给克利缅科5分钟?谁反对?请继续讲。

**克利缅科:**现在向报告人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同志说两句话。他准备把建设新国营农场的工作随便交给什么人都可以,唯独不要交给农业人民委员部。

**加里宁:**这是对的。

**克利缅科:**他说,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国营农场的工作中,感情因素和其他道德因素占上风。用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的话来说,如果对农业人民委员部有这种“感情”关系,当然是不可能让农业人民委员部站立起来,完成它们所面临的重大任务的。例如,没有一位有声望的专家愿意到我们农业人民委员部来工作,从物资保障的意义上看,我们与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等部门相同,优秀的农艺学专家都是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司法人民委员部、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去工作的。如果我们从地方上招聘来比较不错的农艺学专家,他刚适应和熟悉了莫斯科,就离开了,因为专家的工资要比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少一半。

我认为,这是个重要问题,这也关系到国营农场。

至于说到也面临着巨大的任务的旧国营农场,它们也具有很多的条件。由于对旧国营农场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它们至今仍处境严峻。不能采取这种态度。例如,1926年对国营农场的投入为583.4万,预算提供了100万,其他资金是贷款,其中包括短期贷款。

**安采洛维奇:**常常是按苛刻的条件发放贷款。

**克利缅科:**在下一年中,900万中只有300万是从预算中拨给的,其余资金是贷款。在最近一年,1600万基本投资中,只有400万来自预算,其余的资金来自贷款。与此同时,我们的农具保障率为56%,役畜保障率为32%;中伏尔加河地区的耕地为58%,其余为荒地,在下伏尔加河地区——50%,在北高加索地区——37%。在旧国营农场方面,我们有巨大的能力,但我们过去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因为必须投入资金、制订计划、安排人员。要是不能产生预期的成果,那就必须追究他们的责任,否则,除了决议和产生利润的良好愿望之外,将一事无成。所以,必须根本改变对旧国营农场的态度,它们应当在最近两年内站立起来,要让它们切切实实逐步起到社会主义企业的作用,也就是说,它们应该在对农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开始起到主导作用。

现在对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讲话提供两点情况。关于各个宗教公社的问题,当然这是个重要问题,可以、而且必须把它提出来,但是,我觉得,它与建设国营农场没有关系。

**雅罗斯拉夫斯基:**那是因为,我们的土地不足,而您却在给他们提供土地。

**克利缅科:**这些公社的土地是分散的,那里没有大块成片的土地。但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应当加以讨论。关于福音城。第一,现在和过去都从来没有过什么福音城。其次,农业人民委员部没有给予任何协助去组建这个不存在的城市。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来了几个福音教的代表,他们请求说:请允许我们移民到遥远的地方去,到西伯利亚或者远东区,我们要在那里组建一个大型农业公社。

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一位专家把公函交给来者本人,说是有什么样的人要去看看建设大型公社的土地,请求给他们以协助。仅此而已。这样的协助我们提供给所有的人。(笑声)当然,我们提供给没有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提供给被认为是劳动分子的人。我想,从这份文件到莫须有的福音城差远了,人们是从杂志上知道那个地方的,人们在杂志上写到过要建一座福音城的地方。我们哪里知道,他们打算干什么呢?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问题带有政治性质,就把一切取

消了。

**主席:**请克维林同志发言,下一位是穆拉洛夫同志。

**克维林:**政治局关于建设国营农场的决议,关于实际组建这些国营农场的问题,关于组建国营农场计划的问题,都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如果我们在这里犯了重大错误又不采取一切措施来正确修改的话,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把这件好事即便不是葬送,也有可能至少是造成很大的损害。因此,我认为,正确组建新国营农场的问题首先关系到的是旧国营农场的问题。我曾在加里宁同志的委员会里提出过这个问题,但那里把我给驳回来了。大体上形成了这样的状况:我们还有旧国营农场,就让它们照原来的样子保留下来,把整个工作的重心转向建设新国营农场。我想首先向你们列举几个数字材料,表明我们的旧国营农场的状况、它们现在的样子、从它们那里能够得到什么。我们现在有6000个国营农场,用地350万公顷。其中耕地总共有150万公顷,播种面积有120万公顷。你们看到了,这些国营农场组织得多么不好。这里还包括了甜菜国营农场。要是正确地组织这些国营农场,正确地扩大它们的播种面积,正确地按我们在新国营农场所要搞的机械化的规模开展工作,我们可以轻松地在旧国营农场播种250万公顷,这250万公顷可以向我们提供5000万普特商品粮,而且如果我们是从旧国营农场得到这5000万普特的商品粮,消耗要远远少于从新国营农场得到同等数量商品粮支出的消耗。

**缅任斯基:**而且还快得多。

**克维林:**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会自然而然出现要最大限度扩大旧国营农场的问题。要知道,这是我们向每一项基本建设提出的最起码的要求:首先要向效益最大的企业投入资金。效益最大的当然是旧国营农场。因此,除了具有必须落实的新国营农场的计划之外,还应当具有发展旧国营农场的计划和必须保障它们的资金。在正确组建旧国营农场和新国营农场的条件下,经过5年,我们得到的不是1亿而大概是1.5亿普特的商品粮。但不能只是保障对它们的拨款。我认为,断然把旧国营农场和新国营农场分割开是不正确的。我在加里宁同志的委员会上说过,现在再重复一遍,我们应当把旧国营农场中可以扩大的那些农场拿来,把它们用来作为新国营农场的基点。我们有这样的国营农场,我们就是现在也有占地面积大约1万—2万公顷的国营农场。应当把这样的国营农场拿来作为新的大型国营农场的基础,用附近的闲置土地来扩大它们。这样的可能性在许多地方都有。在这里,应当为第一批新国营农场奠定基础,其实,这项工作已经在进行。但进行得十分荒唐。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从刚刚从萨拉



托夫省和萨马拉省回来的戈连多同志那里听说的,他到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走了一趟,讲述了这样的事情:在萨拉托夫省布加乔夫县阿尔扎诺夫斯克国营农场,有一个旧国营农场占地1.4万公顷。决定把这个国营农场转为新国营农场。但在这个国营农场里有原来的管理局。这是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国营俄罗斯农业辛迪加的国营农场。在这里,1.4万公顷土地中,播种面积为1500俄亩,有150匹马和500头公牛。但是,因为农业人民委员部有命令,旧国营农场和新国营农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合并,那么,阿尔扎诺夫斯克的这家旧国营农场就得收缩,它打算把牲口、马匹、公牛赶往另一家国营农场。而新国营农场来了一位新人——管理处主任,他从旧国营农场那里租了一间房子,尽管旧国营农场有150匹马,他还是给自己买了一辆三套马的马车,为自己雇了一个马车夫、一个看门人,就这样蹲了下来,开始组建新国营农场。他是怎样组建新国营农场的呢?他还没有拖拉机,但他必须耕地。他就雇用附近的农民。他雇用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当然是富足的农民,因为只有富足的农民才能有马给他耕地。需要翻耕的是生荒地,因此需要不少马匹。

**李可夫:**4—5匹。

**克维林:**不管怎么说,这些农民为耕地要了高价,得了大钱。这就是说,翻耕的指示是完成了,但完全不是按我们建议的那种办法去完成的。我们打算建立使用拖拉机的机械化国营农场,但得到的是,旧国营农场的150匹马、500头公牛不干活,却为新国营农场雇用马匹。

**罗伊津曼:**必须进行调查。

**克维林:**我不反对。罗伊津曼同志说,必须进行调查。(笑声)可以假定我们已经接近必须调查新国营农场的时期了,不过还是早了一点。

我提醒一下,同志们,有人在发言中已经提到过,在萨尔斯克专区也有雇用农民的事情,所以,这显然不是个别情况。

**喊声:**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克维林:**是呀,同志们,这当然没有什么可怕的,但如果我们开始通过这种途径来组建国营农场,可同时我们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组建……

**伊万诺夫:**那6.5万俄亩……

**克维林:**看到了吧,伊万诺夫同志,如果您通过雇用农民的途径来组建它们,那它们不会为国民经济增加任何好处,因为耕地的那些农民如果不是给国营农场耕地的话,他们是可以为其他农民耕地的。

**李可夫:**他们还要耕种新土地。

克维林: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问题不在于土地不够,而在于他们是凭着有利的条件拿到了钱。因此,我认为,同志们,为了建设国营农场,应当好好地提出、好好地制订计划、按照设想好的计划发展这项事业。如果过分拖延,可能要错过时机,那可能得到的不是成就而是失败。因为我的时间用完了,我就此结束。

主席:请穆拉洛夫同志发言(30分钟)。

穆拉洛夫:我要说的是与政治局关于国营谷物农场有关的实际问题<sup>229</sup>。农业人民委员部收到政治局的决议是在4月底,当时就立即着手讨论如何执行这项决议并且独自确定了任务的规模。任务是在最近的3—4年中组建新的国营谷物农场,生产1亿普特的商品。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已经说过,这项任务是可以实现的,是适宜的。除此之外,还有涉及组织这些新建国营农场的速度的补充任务,3—4年内的任务不在其内。新任务是,在近期内,在近几个月内,做准备工作,新建的国营农场要在1928—1929年度生产出不少于500万普特的商品粮。因此,作为第一个任务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我们掌握多少数量的土地。从土地统计数量的角度来看,我们具有足够数量的土地:有900万公顷的国家土地基金的土地。但从土地的位置和是否便于谷物生产的角度来看,具备这样条件的土地没有这么多。为进行谷物生产,我们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关系到土壤的质量状况——黑土还是栗钙土,关系到经济条件——土地与最近的火车站或者码头的距离,关系到收成的保障——也就是保障一定数量降水的水文气象条件。我们拟定了这样的计划,为使谷物农场能够生存,我们所需要的肥沃土地应位于具有交通线、铁路线或者水运线的地区,距这些交通线的距离最短为25俄里,最长不应超过50俄里,要有最低限度的降水,年降水量最少为300毫米。没有这样的标准,就不能保证谷物产品生产获得成功。于是我们就用这样的标准开始调查国家土地基金的土地(有过一项命令说,不能触动农民的份地,要走开发新土地、生荒地或者撂荒地的路子)。我们在三个地区规划出了符合这三个基本条件的土地: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和伏尔加河沿岸。当然,地方组织的主动精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们火速地提供了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所需要的信息,特别是在规划这一年的土地、保障下一年提供500万普特商品粮的生产计划方面的信息。我们研究了北高加索萨尔斯克专区西育马厂的土地,完全放弃了东育马厂。在伏尔加河地区,我们看上了萨马拉省和萨拉托夫省,还看上了哈萨克斯坦。在这个期间,在全会召开期间,又从乌克兰和乌拉尔送来了资料。我们又制定了克里米亚的工作计划。这样,我们就有了在数量上满意的

计划。但从地区的地理位置、土地的地理位置的角度看,略有一些困难,因为很多好的土地是属于其他组织的。我们把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也编入了这里,因为这些地区是谷物成熟最早的地区。

对于我们来说,极其重要的是具有生产早熟作物的农场和地区。在必须具备的近300万—350万俄亩土地中,哈萨克斯坦占了近150万—200万。我们需要生产谷物产品的优质土地。从经济观点、连片土地的要求看,我们所拥有的土地有很大一部分是被破坏了的国家土地基金的土地。萨马拉区、萨拉托夫区的情景是,移民土地基金原先是按照移民的选择分配、安排的,因此,我们所拥有的不是固定的大块土地,而是零星的地块,一块有500多俄亩。对此必须加以调整。总的来说,土地似乎很多,但必须使它们连成一片,规模合适,保障费用支出限制在最低水平。毫无疑问,我们应当调整这个事情,从移民组织、开拓组织和经济组织中选择土地。另一方面,我们的困难是,在分配这些土地、把这些土地交给生产企业和经济组织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我们会在什么时候需要把国家土地基金的土地用于谷物生产,而谷物生产只有在一定的土壤质量条件下才能进行。盐碱地不能进行谷物生产,但可以放羊、放马,如果善于组织,会取得大的成就。在非常干旱的地区不能进行粮食生产,但可以从事畜牧业。在我们这里,根据地方组织提出的倡议,实际上也不断出现一些问题,能否做些调整,给养羊人、养马公司和其他单位做些调整?要是把好的黑土地或者栗钙土拨给了养羊人,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拨给他们其他土地,而把这一块地用来生产粮食。我们必须用好的土壤条件、气候条件和一定的降水来保证解决粮食生产问题,保证不出现歉收,何况这些国家土地基金的土地位于干旱地区。

有人会问,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地区?为什么在北方不能这么做?这个问题我们同专家们进行过讨论。奥新斯基同志是不对的,他提出问题说,我们没有接受任何咨询。我们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加里宁同志那里召开了有知名专家参加的两次会议,参会人数各有30人,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多亚连科教授建议向北走,但问题在于,在北方所有其他条件都涉及大量投资。我们讨论了亚速海附近的荒滩,但这个问题涉及更多的大量投资。我们必须对每一俄亩预先投入100卢布,而后从国家土地基金总量的50万俄亩中只能得到18万俄亩。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在现在对这件事大投入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从头来,从砍树根,从大量的土壤改良工作开始做起,这需要预先投入几百万。因此第一个指示是这样的:应当接受决议案中的规定:为建国营谷物农场,必须根据土壤和气候等条件详细认真地挑选地块。与此相关的还有涉及地块调整、财产、资金等

的补偿问题。

对于有没有土地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有土地。在具备土壤、经济和气候等条件的情况下,质量方面是有保障的。但是我们应对谷物农场提出什么样的任务、我们应当实行什么样的经营——粗放经营还是集约化经营?就这个问题我们同专家和同志们进行过讨论,研究了为什么在头5—7年有可能实行粗放而不是集约化经营的问题。因此,如果安采洛维奇同志和奥新斯基同志这样提出问题,说在头5年实行粗放谷物生产的方针是农艺学上的无知,那么我就要向你们搬出这一领域的农艺学著名权威了。在这一方面我们得到了干旱地区的专家图拉伊科夫的意见。这是位大权威。他直截了当地说,在这些土地上,在我们划拨作为谷物生产的土地上,可以在7年内进行粮食生产,实行粗放经营。布钦斯基教授也说,可以在这块土地上进行工作。讲到这一点的还有马卡罗夫、恰亚诺夫、斯科尔尼亚科夫等著名专家和行家。

现在我再讲一讲,我们有哪些经验。奥新斯基同志在这里搬出了美国,并说,美国不是组织粗放粮食经营的范例。

柯秀尔:他对美国的了解比对我们自己的苏联还清楚。

穆拉洛夫:他更了解美国,但他不了解自己,因为他依据的是自己的书,他所讲的是这本书里的例证。我肯定地说,可惜他不在这里,奥新斯基连自己的书也不了解,我要用他自己的书批驳他。他说,按贝德克尔的说法,存在过某个庄园,即地主经济,当他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庄园已经不存在了。但同时他又提供了一份资料说,这个庄园作为生产谷物的庄园,存在了整整20年。这中间能不利于谷物生产的论据吗?他自己承认,庄园存在了20年。在他的那本书的第87页,这些材料中引用的引文和文件说,在类似于我国地区的美国的地区,在蒙大拿州的干旱农业区,实行的是两段轮种制,而且一半土地用于春耕绝对休闲地,另一半播种小麦……但是,干旱地区的农场只把不到1/4—1/3的土地用于这种耕作,其他的土地要么连年播种小麦,要么播种3季休耕一年。这是他在书中讲到的!奥新斯基同志对自己所写的关于美国的著作过于草率了,而他被派到美国是为了研究大型农业的。他显然把自己的书忘得一干二净。如果他坐在这里,我要当面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和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向世界市场提供粮食产品的是美国和加拿大。什么样的经营方式,是粗放经营还是集约化经营,提供了这样的粮食产品呢?当然是粗放经营。他想反驳这个人人皆知的事实,但没有成功。说什么我们最近5年谷物生产的方针是农艺学上的无知,我认为这正好暴露了他奥新斯基不懂经济和他对研究对象的无知。在

这里,他对待事业没有采取认真的态度。

奥新斯基同志进而转向资金计算问题。资金的计算问题成了我们的最大的工作,我们曾计算过这整个问题的结果。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就这个问题做一个预先的说明,这是粗略的、大致的评估。但是,我们拿来了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献以及专家那里所能找到的一切,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最为认真的办法得到的经验。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就对此不再一次地、甚至几十次地进行鉴定了。我们于5月底组建了委员会<sup>230</sup>,到地方上对我们大体上规划的土地进行了调查,在他们把材料带回来以后,我们就根据这些资料编制我们真正的生产财务计划。这项工作已经开始,能够完成。

粗略的计算得出了什么结果呢?得出了这样的评估,我们想对一俄亩投入70卢布,按基本建设费用、农具和牵引力等等项目来分配这70卢布。

臧声:对于粗放经营来说,这够多了。

穆拉洛夫:在这里,我们进行过争论,大体上粗略地提出了70卢布的数字,这有可能是多了。我们对我们农场的最佳规模做了计算,认为,国营农场的大片土地应为3万—4万俄亩,庄园应为3000—4000俄亩。最终实施我们生产计划的生产基地应是面积为3000—4000俄亩的庄园。于是,由于注意到了这是干旱地区,不得不在供水等措施上有所花费,特别是在安排哈萨克斯坦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认为,70卢布大体上是足够的。对于乌克兰的估计略微高一点,1俄亩87卢布,但我认为,如果说是70卢布,从平均数上看,我们没有错。当然,也不能发誓,拿脑袋做担保,说这70卢布一点也不差。但我可以说,根据表明这件事的状况的数据,根据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研究,我们是以最为认真的办法计算出这些数字来的。这还要看我们的组织管理原则向哪个方面变动,当然,如果有变动,那么规模、费用也会变动。如果我们把最佳规模设计为3万—4万俄亩,可是大多数国营农场的实际规模不是3万—4万俄亩,而只有1.5万俄亩,那么每亩费用的成本就要增加,成本就要扩大。有一个问题,如果不回答它,就不可能得出结论来,那就是这件事赢利不赢利的问题。从我们做的初步评估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件事是能赢利的。就是从奥新斯基同志所引证的那位作者——利亚先科教授的观点出发,这件事情也经得起这类观点的批评。我要从《经济评论》上的文章中援引一下利亚先科教授的意见,奥新斯基并没有把他的意见读完,没有认真对待这位专家的意见。我们没有从最大的计算数字出发。我们用的不是1俄亩70普特的产量,当然这个产量可以达到,而是用的53普特,因为这些地区农民经济的平均总产量为35—40普特。我们用的是53普特的普遍

产量,用的是略高于农民经济平均产量的修正数字,这一修正数字表明了国营农场有比农民经济更好的工作方法,将要在经过翻耕的土地上播种,等等。是不是需要拿出一个比53普特更高的总产量呢?我想,这样我们就不够慎重了,因为提高了产量,我们是证明比得到53普特时获得更高的收益,但这还只是看上去会如此。

我们有意识地确定为53普特。我们提出了高于这一地区近30年农民经济平均收成的某些修正;我们计算过,如果这5年当中包括有一年的歉收,这个数字也完全可以达到。这样,正像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同志所断言的那样,我们的这件事就是赢利的,赢利90戈比左右。利亚先科教授是怎样说的呢?奥新斯基同志摘引了利亚先科教授发表在《经济评论》上文章中的意见,似乎他反对这个结论。他引证利亚先科是针对我们这个事情能够赢利的结论的,但是他没有读到教授这篇文章的结束语。教授说:“在我们甚至是十分谨慎地进行计算的时候,我们总还是认为,这个国家粮食基金的成本不仅可以提供推动市场所必需的那些商品,而且从经济核算角度来看,这个业务是在不会亏本的情况下完成的。”

他拿的是我们的所有计算并对这些计算进行了修改。这就是专家的意见。奥新斯基同志在这里描述的惊慌现在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我们没有任何专家的文件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好的意见。我们在农业人民委员部认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就这个问题单独召集了专家。

现在谈拖拉机问题。我们的安排是通过使用拖拉机大体实现平均60%的机械化。当然,我们希望实现得更多一点,我们会尽力实现更多的机械化。但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想在现在,在我们工作的3个月内得到所有的拖拉机,这意味着不了解实际情况。光凭一个决议不可能给我们提供拖拉机,任务是有的,这个任务就是保证在明年提供不少于500万的商品粮。这具体的是指什么?这是指,现在就要耕地。如果有熟荒地,最好在5月、4月、6月就耕地,不要再晚了,因为要给土地沤熟的时间,因为土壤要有一个氧化过程、硝化过程。因为这都是从未耕种过的熟荒地。同志们可能要惊奇,没有拖拉机怎么耕种。没有拖拉机,拖拉机应该是会有的,拖拉机已经到了新罗西斯克,然而为了保证产品,我们必须翻种熟荒地。如果我们翻地迟了,就得到春天再播种,那么我们就将使明年的收成受到威胁,因此,不能再拿没有拖拉机,要用犍牛、驴和马耕地开什么玩笑了。能用驴耕地就很好了。

**安采洛维奇:**形成的是驴的,而不是机械化的社会主义经济。

**穆拉洛夫:**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组织时期。不要以为我们有的是东西可以向这个粮食农场提供。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拿到所有的东西。没有给我们进行准备工作的时间,因此所有指责地方组织开始耕作的议论全都是些不正经的说法。必须进行耕作,否则指示将不可能完成。要知道,上了前线就得厮杀,如果没有武器,就是用草叉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也得厮杀。指示已经下来了,谁也不能改变它,谁也无权改变它。既然需要耕田,地方组织就开始了耕作,这是正确的做法。

**李可夫:**对。

**穆拉洛夫:**在这一方面,绝不能指责地方组织使用懒驴进行耕作。

关于旧国营农场的问题。不能说农业人民委员部忘记了旧国营农场。我们在农业人民委员部研究了规划,要在2年内使旧国营农场播种面积达到一定规模,让它们在未来5年内提供1亿普特的商品粮,这将毫无疑问是贡献,是额外贡献,因为国家缺少1亿,应当再给它1亿,因为除了新国营农场以外,没有其他议题可谈,我就不谈这个议题了,旧国营农场的问题要在八月全会上单独讨论。我现在来谈谈实际问题,如何认识旧国营农场和新国营农场。

为什么大家议论的恰恰是:在国家农业仓库<sup>231</sup>的第5号国营农场没法耕作。我们现在的处境是这样的:北高加索、萨马拉省和萨拉托夫省在当地主动提出来的前提是:国家土地基金有4万俄亩,这是新的国家土地基金,而旧的国营农场耕种的是这4万俄亩中的7000俄亩。为什么不耕种?给他们下达了指示,无须去理睬名称是什么,是新国营农场,是国营俄罗斯农业辛迪加,或者是旧国营农场,要做的是无论如何必须耕作,这个组织上的混乱状况我们之后再来分析,那时再来看什么该属于谁。现在的指示是要耕作。不管是什么,用不着说废话。下达的指示就是进行耕作,无论如何都要耕作,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国营农场。不管怎么样,必须耕作,克维林同志。这是指示,没有颁发任何新的指示。只有官僚们才可能会说,这是旧国营农场。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在我们统一的苏维埃政权下,不管是旧国营农场还是新国营农场,就不能从事谷物生产呢?这是胡来,这是对这项任务的官僚主义的高谈阔论,是扼杀具体的事业。必须完成政治局关于进行耕作的指示。我们现在得到了完成政治局指示所必需的拖拉机,但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品牌。安采洛维奇同志谈到了这个问题,并说,我们希望得到按老规矩挑选出来的品牌,希望按老办法使用机器。

**安采洛维奇:**哪怕是能够赢利的拖拉机也好,可不是谁都不需要的机器。

**穆拉洛夫:**这是最圆满的计划。我完全同意,我们愿意要这样的品牌,但是,

当这个最圆满的计划不能完全得到保障时,当我们有可能得到“公社社员”牌拖拉机去耕种十几万俄亩土地、在明年获取500万商品粮时,我们具体地应当怎么做?用什么耕地?用这个“公社社员”牌的拖拉机吗?

**安采洛维奇:**拒绝了“B. Д.”牌?

**穆拉洛夫:**后来我们拒绝了“B. Д.”牌。如果伏罗希洛夫同志给我们“公社社员”牌,我们就要“公社社员”牌,因为可以用它工作,那里将会有军事教官。

**安采洛维奇:**可是每一辆拖拉机价值2.1万卢布呀。

**穆拉洛夫:**问题是,它的价格将是2.3万卢布。

**米高扬:**国家将不得不补偿差价。

**穆拉洛夫:**国家将不得不给以补偿。

**柯秀尔:**军事部门给钱。

**穆拉洛夫:**应当给这些拖拉机列出清单来,这是清楚的。我说的是,我们愿意要所有的品牌,愿意要好的拖拉机。当生活中没有这种东西的时候,要我说,总得要用“公社社员”,用所有手头上能够用的随便什么东西耕地,因为我们应当把今年看做实验年,应当把这一年的所有情况都考虑到,然后在这个经验的基础上,顺利地进行来年的工作。在实验年里,我们应当试用所有牌号的拖拉机,造成的环境可能会比实际情况更困难。还应当考虑到有可能出现危险、发生战争和武装干涉,到那时,就得能怎么耕种就怎么耕种了,就是使用马、驴来耕地,我们也得干了。

**安采洛维奇:**尽管驴不像“公社社员”拖拉机那么贵,值2.1万卢布,但是在国营农场里把它作为牵引力使用总不大合适吧。

**斯大林:**不要诋毁驴了,不能这样。

**穆拉洛夫:**只是在一个问题上,我同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有分歧:谷物国营农场应当由谁来管辖?他说,由哪个部门管辖都行,就是不要由农业人民委员部来管辖。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我想,就农业的组织工作而言,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处境是有困难的,它既不属于人民委员会,也不属于劳动国防委员会。拖拉机问题,涉及整个农业的所有问题,在组织上都没有被纳入联盟政府的整个工作体系。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巨大的组织缺陷。决不能脱离整个联盟的农业来看待我们俄罗斯联邦的农业。

[李可夫:这是各个友好民族的自决权。]

**穆拉洛夫:**但是从组织上说,农业是最为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劳动国防委



员会、人民委员会必须要和它衔接起来。我们是在千方百计地保持衔接。我们在俄联邦范围内保持着这种衔接,我们同乌克兰保持着衔接。

[李可夫:我想列入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但丘巴尔和卡冈诺维奇声明说,要是那样的话,他们就退出联盟。]

穆拉洛夫: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在组织上如何处理,但是这个问题应当提出来,应当得到解决。

主席:请卡巴科夫同志发言。

卡巴科夫:就粮食收购进行的辩论就预示了需要解决组织大型谷物苏维埃农场的问题。

喊声:声音大一点,听不见。

柯秀尔:乌拉尔毁了他的嗓子。

卡巴科夫:某些发言人的讲话里流露出与政治局决议案对立的情绪,奥新斯基同志的调子尤为突出。他用3亿—3.5亿的大量花费、可能突然爆发的歉收会扼杀新组建的苏维埃经济的萌芽来恐吓中央全会。他在讲话中引用的所有证据都是竭力要使中央全会与粮食问题的解决背道而驰。把新的苏维埃谷物农场转变为农民经济的作物中心的建议也是朝这一方向发展的。

恢复旧国营农场、不要组建新国营农场的建议也是这么回事。克维林同志为支持他的建议引证了一个奇闻,它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创造性的工作,而是毫无生气的计划,是一个将来进行组织的模式,但解决不了今天的问题。按照他的建议,那就必须先制定计划,研究问题,进行计算,然后才能着手进行实际工作。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靠不住的,因为它没有动员中央全会去解决今天的困难,而是让人们离开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

在我看来,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的报告有一个小疏忽,如果考虑不周,这个小疏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他过多地谈论了各个委员会的有效工作形式,过少地关注可以组建苏维埃农场的各个地区以及选择某些地区将以什么作为前提的问题。这个问题应当在中央全会上予以阐明。

报告苏维埃农场的合理化应当更多地侧重实际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不会有什么坏处,特别是应当研究新国营农场选址中带有标志性的科学前提和经济前提。如果委员会不去开八次会议,而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比如说,在哪里组建苏维埃农场有利、如何有效地利用某些地区的收成缓解粮食危机、如何利用苏维埃农场的粮食改进粮食采购,把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得出的计算结果提供给中央全会,会更有益一些。我想,已经提出的尽快组建新国营农场的任务应该

是首先解决对工业区和城市的供应问题。

苏维埃农场面临的任务,应当是在7月、8月能够获得粮食,用我们苏维埃农场的粮食供应城市市场和工业区。我们在完成这个任务的同时,也就有可能事先决定全年整个粮食征购运动的进程了。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是不能忽视的。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说,在能闻到钱的味道的时候,民主就会在地方上开展起来了,既然是这样,他在这里所说的那种态度……

柯秀尔:那就是表现出热情来。

卡巴科夫:也只有在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申请将会从各个地方、各个地区纷至沓来,大家也都需要大型苏维埃农场了,而这样一来,为大型苏维埃农场选址也就有材料了。我认为,要解决如此重要的问题,很难说这就是一种不容辩驳的科学态度,也很难说这就是一种科学的计算方法,因为在这里主要考虑的,只是如何才能获取资金。他从这一点出发,又犯了第三个错误:地方越是无条件服从中央,他们就越能得到健康的发展。从这一方面说,我要从我们乌拉尔的实际情况中举一个例子。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拿不出一个例证来说明乌拉尔的组织不服从中央、乌拉尔的组织不听从中央组织的意见。而且我们也曾认为,用科学数据武装起来的政治局的委员会将能确定什么地区应当组建苏维埃农场,它会说到:这里组建苏维埃的农场是为了什么,在这里组建这些单位是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在这里组建这些单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得到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一个结论:整个州都被排除在组建大型苏维埃农场的计划之外了。

喊声:你真走运。在图拉欺负过你,在乌拉尔也一样。

柯秀尔:很不幸,瞧你那一副可怜相。(笑声)

卡巴科夫:我认为,如此对待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的,并且很难说这样的突破口能够成为改进和巩固地方组织的手段。

如果我们看一看大型苏维埃农场所表现出来的任何一个特点,那么这些特点乌拉尔州都具备。如果你们想要冻土带,那么在北冰洋旁边就有这样的地域。你们想要另一个与吉尔吉斯草原接壤的边疆区,那么您在这里愿意得到多少阳光就能得到多少阳光。略微往北一点,到乌拉尔的中心地带,这里的自然结构的结合注定了,就是该在这里组建大型苏维埃谷物农场。

就拿我们州的人口密度来说吧,您在这里可以找到这样的人口密度,在特罗伊茨基专区,1平方公里有7个人,再说秋明专区吧,大体上也是这种状况,1平方公里有9个人,别的地方也是这样。浩瀚的空间,广袤的草原,没有人烟。毗邻是大型冶金工业,这里具有一系列十分重要的其他行业,工会会员在50万以

上。有大的城市,有殷实的乌拉尔农民。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对乌拉尔州的粮食收购工作的巨大威胁。

我们乌拉尔的农民用不着跑两三百俄里去卖粮食,他们直接把粮食运到等待粮食的工人区,农民们用不着等粮食收购队来买他们的粮食,因为他们的旁边就居住着直接消费者。想想看吧,50万工人,他们每人只要买1—2普特粮食,一个州就是100万普特。而这最终将导致整个州的粮食市场的大混乱。每个人都知道,乌拉尔州比其他任何地区都更需要粮食储备,要用这些储备在粮食收购运动初期保障对粮食市场的供应,要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建立隔离墙,用经济方法防止市场自发势力的蔓延。

在乌拉尔要解决这个问题,这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我们焦急地等待来自中央的协助,因为从乌克兰和北高加索调运粮食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未必有利。这些粮食毫无疑问应当在当地找到。大型苏维埃农场与我们的工业紧密结合,毫无疑问将决定着它们会有一个良好的组织形式,同时这样的农场也是解决重要工业区粮食危机的强有力的手段。为在乌拉尔组建苏维埃农场的事,我们向农业人民委员部,向穆拉洛夫同志打了报告,但结果是,所有的地区都有拖拉机,乌克兰也有了拖拉机……

丘巴尔:没有。

卡巴科夫:哈萨克斯坦有……

臧声:总共给了我们一台。

卡巴科夫:为北高加索配备了拖拉机。但没有找到一台为乌拉尔配备的拖拉机。很难说这是对地方的公正分配和帮助。但尽管如此,尽管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仍然认为,应当在乌拉尔建立大型谷物农场。毫无疑问,这需要鼓足干劲——我们已经动员了所有的潜力并着手用自己的力量组建大型苏维埃农场。

加里宁:这非常好,这很好。

卡巴科夫:在需要等待的地方,我们正在组装农具,但我们没有就此罢手。乌拉尔的组织正在努力用自己的力量解决最困难的问题。我认为,农业人民委员部应当考虑并积极解决现在已提出来的在乌拉尔组建大型农场的问题。

主席:请诺索夫同志发言,下一位发言的是斯大林同志。

诺索夫:我想,在中央全会上提出了有关国营农场的问题,这肯定值得这次全会给予更大的关注和进行更多的讨论。

国营农场的问题涉及的不仅是组建新国营农场。我认为,决议案中缺少一条,这一条应当果断、坚决地要求我们的地方组织不仅要关注组建新国营农场,

而且要关注旧国营农场。

我在一些省工作的时候,有机会观察到我们对旧国营农场的态度。在我看来,所有组织的态度都非常不象话。对它们根本不关心。对省里一个100人的小厂的关注远比对该省几十个国营农场的关注大得多。

全会决议案指出对国营农场的这种态度,在决议案中必须提到旧国营农场,要让地方组织更严肃地关注它们。

其实,就拿为国营农场挑选人员来说吧。难道我们挑选这些人员能够像挑选厂长或者某个机构的主任一样吗?没有那么回事。而事实上,很多事情取决于挑选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从实践中看到,如果国营农场的经理不好,那么这个国营农场干什么都不行,如果经理好,那么国营农场就能进步。这里不止应当具备物质手段,而且要有组织能力和对事业的热爱。

现在,我们的国营农场里有什么?流动资金没有,技术改进措施没有,能够帮助国营农场进行工作的良好的生产管理机构也没有。

我以为,必须要想着,我们似乎过于迷恋新国营农场了。穆拉洛夫同志在这里讲的那种旺盛的精力和那种信心,如果能推广到我们全党,那就好了。我想,必须使党全部接受穆拉洛夫同志的这种精力和信心。这是有好处的。但也不能这样迷恋新国营农场,而把旧国营农场丢之一旁。应当首先关注现存的国营农场。那里多少有些东西,有些基层组织,而且我认为,应当给他们一些资金、技术和组织上的帮助,把它们提高到应有的高度。

我认为,这个问题,关于旧国营农场的问题,应当在决议案里提出来。

十分明白,关于国营农场的劳动力问题,安采洛维奇同志,我们这里的情况不是这么好。国营农场是劳动力的穿堂院。组织这一工作非常困难。在那里的劳动力身上,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比我们企业的多,来自农民的新力量流入到那里,搀和了进去,纪律性就下降了。国营农场中的那种大量的散漫、无组织无纪律,是别的地方见不到的。在国营农场中实行劳动法要比任何一个企业都困难得多,因为那里资金不足,组织性不强。我们的国营农场不能赢利,薪金发不出来。因此,在国营农场工作的人怎么也不愿意长期在那里工作。今天他们在这里工作,下个季节就到其他地方干活去了。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对它应当严加关注。国营农场的劳动力问题值得关注。我们应当造就在国营农场长期工作的工人骨干。

其次,在我们这里,指示和实际工作之间有很大的差距。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从事实际工作的组织者,让他们把我们的好思想、好决定贯彻到生活当

中去。为此需要进行大量的内部组织工作。任何一项新事业都需要给予重大关注,都需要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不进行这种实际的组织工作,我们只能是把我们的好思想和好决定变得庸俗化。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在这里一下子就倒向了特维尔省。日丹诺夫同志说得完全正确,有一个同乡在中央并不好,因为他关心的不是他应当关心的地方。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说:如果需要的话,应当生下来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臧声:让他试一试。

诺索夫:当然,这是非常困难的事,尽管一心想要这样,但是不可能做到。(笑声)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看来是想说,尽管我们面前有许多困难,我们还是应当无论如何要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臧声:你说说,你为什么没有亚麻?

诺索夫:加里宁同志提到过这个关于亚麻的问题,问得非常好。我有一些关于亚麻播种面积和亚麻外运的统计数据。在1913年,我们省播种亚麻14万俄亩,外运亚麻纤维483.4万普特,也就是说,合计1俄亩运出35.5普特。在最近几年我们播种了多少,外运多少呢?在1925年我们播种了12.45万俄亩,外运310万普特,也就是1俄亩合24普特。1926年我们做了下调,播种11.29万俄亩,外运222万普特,也就是1俄亩合20普特。1927年,我们播种11.24万俄亩,外运207万普特,1俄亩合18普特。这样看来,我们的每俄亩亚麻产量下降了50%。显然,这给整个经济带来很大损失。但是,请你们看一看,面积实际上没有多大变化,播种面积的差别在1.2万—1.5万俄亩之间,而单位面积产量的变化却很厉害。

臧声:那是为什么?

诺索夫:我现在就讲。需要看价格对比。如果说在1925年1公担亚麻能给59卢布,那么1926年就开始给39卢布,而今年则给43卢布。与1925年相比,1926年我们少拿20卢布,1927年少拿16卢布。

加里宁:那个时候是投机价格。

诺索夫:那个时候是投机价格吗?如果你去年说:请降低价格!于是我们就把价格降下来了,而春天又说,需要提价。结果如何?现在就拿我们的亚麻种植业来说,富农拿到了钱,而贫农却拿不到。我认为,对此应给予最大的关注。如果责备省执行委员会很少关注,那也应该责备党组织。我们的过错大小是和全党一样的。我们没有关注作物,我们的亚麻工厂就因为缺少亚麻,今年停工72天。我有一份农艺学家的报告,对亚麻业讲到了如下情况:“如果我们现在是正

在按照完全新的方式建设整个国民经济机体,在苏维埃经济的每个部门都提出了大量刻不容缓的任务的话,那么对亚麻业提出的这些任务如果今天不能完成,明天再来解决就晚了。

所有这些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农村现在正在经受的亚麻业危机状况提出来的,而且这样的危机多半是隐蔽的、深入内部的,因此它的危险性并不那么扎眼。”

接下来说的是,“这一现象说明,稳定发展亚麻业的牢固基础尚未建立起来。如果我们不使用更多的矿物肥料和首先是包括泥炭在内的其他肥料,在近几年内就不可能把这个基础建立起来”。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要知道,我们居于亚麻业生产的第二位。特维尔省占有大块地方,我们拿出了450万普特,而今年联盟的工厂需要的是750万普特。我们值得给以关注。我同意,为此可以责骂我们,责骂我们的党组织,但如果把降低成本作为党的工作缺点算在我们头上,写进决议案里,那我们同样也应当提出农业问题,其中包括技术作物问题。1俄亩生产多少,为什么生产得少?如果1俄亩的产量减少,这应当看做是党组织的缺点。我对此完全赞同,为了使地方组织积极起来,我们必须这么做。

主席:请斯大林同志讲话。

斯大林:同志们!我今天本不想讲话。但奥新斯基同志和其他同志让我不能不讲了。我总共用10—15分钟,不会多。

奥新斯基同志在自己关于国营农场的讲话中回到了昨天就粮食收购问题进行的争论。也好,我们就回到昨天的争论吧。我们昨天争论的是什么?首先是城市和农村的剪刀差。这里说的是,农民仍然是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钱,而在出售农产品时少收钱。这里讲的是,这个多付钱和少收钱构成了对农民的类似于某种“贡赋”的超级税,有利于工业的附加税,如果我们不想破坏我们的工业,破坏我们为整个国家工作、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工业已有的发展速度,类似的税我们一定要取消,但现在我们仍然不能取消。某些人对此不喜欢。对此不喜欢的还有奥新斯基同志,看来他怕承认真理。有什么办法,各有各的口味。有些人认为,在中央全会上不应当全部讲真话。而我认为,在自己党的中央全会上应当讲全部实情。不要忘记,中央全会不是农民大会。当然,“超级税”、“贡赋”是令人听了不高兴、有些呛鼻子的字眼。但,第一,问题不在于字眼。第二,这些字眼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第三,这些让人不高兴的字眼的出现正是为了呛人的鼻子、迫使布尔什维克极其严肃地去从事消除这个“超级税”、

消除剪刀差的工作。怎样才能消除这些让人不高兴的东西呢？通过对我国工业实行系统的合理化和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通过逐步提高农业技术和农产品产量、逐步降低农产品价格。通过对我们的商业机构和采购机构逐步实行合理化。诸如此类，等等。当然，所有这些在一两年内是完不成的。但是，如果我们想摆脱各种不愉快的东西和呛鼻子的现象，我们就必须在若干年内完成这件事情。奥新斯基同志昨天非要现在就实行消灭剪刀差的路线，实际上要求恢复性的农产品价格。我与其他同志一起反对这样做，我说奥新斯基同志的要求与当前我国工业化的利益背道而驰，当然也与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这就是我们昨天争论的东西，奥新斯基同志。今天奥新斯基同志承认说，他反对恢复性价格。好，这很好。由此可以说，奥新斯基同志丢掉了昨天他所犯的片面性。结论是什么？结论只有一个：昨天的批评对于奥新斯基同志来说并非无益。

第二个问题涉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我在我的发言中指出，奥新斯基同志在自己的发言里，联系到收购谷物大谈特谈了发展农业的措施，却只字未提诸如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类严肃的措施，这种情况有一些不自然和奇怪。奥新斯基同志感到委屈，认为这是对他吹毛求疵。这是不严肃的。奥新斯基同志在他的长篇大论的发言中只字未提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任务，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发展个体农民经济的任务上，难道这不是事实？怎么能“忘记”诸如发展农业中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任务这类重要的东西呢？难道奥新斯基同志不知道，尽管在当前发展个体农民经济的任务很重要，但这个任务已经不能尽如人意，如果对这项任务不切实补充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新任务，不管是从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也意味着对农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上讲，还是从保障国家一定的商品粮储备的意义上讲，我们就不能解决谷物生产的问题，不能摆脱困境。在这之后，怎么能够绕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问题，对它避而不谈呢？奥新斯基同志昨天显然低估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意义。昨天或者前天的事情就是这样。今天的状况略有变化。奥新斯基同志今天声明说，他以前就支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现在和将来仍然支持。好，这很好，奥新斯基同志。

奥新斯基：如果给我两个小时，我会把这件事说得更加详细。

斯大林：很好，奥新斯基同志。昨天的批评对于奥新斯基同志来说并非无益。

第三个问题涉及所谓的衔接工业。在这里，在这个问题上，奥新斯基同志又完全犯了老错误。他今天像昨天一样，认为只有纺织工业是衔接工业。

**奥新斯基:**只有纺织工业?不是这么回事。

**斯大林:**显然,您发言的时候连自己讲的话都不听,奥新斯基同志。

**奥新斯基:**请允许现在就读速记记录。

**斯大林:**在您今天讲话的时候,同志们当场纠正了您对纺织工业问题的讲话,而丘巴尔同志在他的讲话中也纠正了您,他指出,衔接并不限于纺织工业,冶金业以及整个重工业也是衔接的基础,而且它是以集体主义精神帮助改造农民经济的基础。奥新斯基同志是否认为,所有这些同志在批评奥新斯基同志涉及纺织工业和衔接的片面性时,都错了?如果现在奥新斯基同志在刚才的插话里承认,衔接不仅是要满足农民个人需求(纺织品等),而且也还要满足他们生产的需求的话,那就更好,因为昨天在这个领域所做的批评没有白费。

现在转向国营农场问题。奥新斯基同志认定北美不存在大型谷物农场的样板,这是不对的。其实,这样的农场既存在于北美又存在于南美。我可以引证见证人图拉伊科夫教授的话,他在《伏尔加河下游》(第9期)杂志上发表了他们对美国农业的研究成果。请允许引用图拉伊科夫文章中的一段话。

**奥新斯基:**这篇文章我说过。

**斯大林:**您是说过这件事,但您在自己的发言中那么唾弃了图拉伊科夫引证的、堪称样板的肯博尔小麦农场,造成了根本不符合实际的假象。请允许我从图拉伊科夫文章中摘录几句:“蒙大拿州的小麦农场属于‘肯博尔农业公司’。其面积95 000英亩,约合32 000俄亩。农场位于一条地界上,分为四个作业区,类似于我们的村庄,每个部分由一个领导人管理,整个农场由这个公司的经理——托马斯·肯博尔一人管辖。今年从报纸上的消息看,当然这些消息来自这个农场,一半的土地播种了作物,可望收获近41万蒲式耳(约合80万普特)小麦,2万蒲式耳燕麦和7万蒲式耳亚麻种子。企业的总收入预计为50万美元。这个农场的马和骡子几乎全部被拖拉机、卡车和汽车所代替。耕地、播种和整个大田作业,特别是谷物收割,昼夜进行,夜间机器在大田里工作时有探照灯照明。大面积播种使得工具可以不拐弯地长距离工作。如果根据植物状况可以使用收割—脱粒机的话,那么收割—脱粒机按照24英尺的宽度行走20英里,即30俄里多一点。以前为进行这项工作需要40个男人、40匹马。割捆机跟在拖拉机后面并排4辆一起向前走,占据的宽度为40英尺,行走的长度为28英里即42俄里左右。如果谷物不太干,可以同时收割、脱粒时,则使用割捆机进行收割。这时就把黏合器从割捆机上拿下来,在特殊传送带的帮助下将捆扎好的谷物一排一排地摆放好。这样摆放好了的谷物放置24—48小时,在这段时间里谷



物将会晒干,晒裂的谷穗上种子与杂草同时落到地上。然后开动收割—脱粒机,这个机器不是用刀片而是用自动装料器把落在地上的晒干了的谷物直接送进脱粒机的滚筒。工作就这样进行,一台机器上只有一个人工作,脱粒机上也是一个人工作。机器上再也没有其他人。粮食从脱粒机下直接倒入容量为6吨的大车厢里,而后由拖拉机、10节车厢组成的列车运到粮食收购站。短讯指出,每天这样工作,可以打1.6万—2万蒲式耳禾谷类粮食。”(见《下伏尔加河》第9期第38—39页)

这就是给你们描述的一个典型的大型小麦农场。这样的大型农场在北美有,在南美也有。

奥新斯基同志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这类大型农场的条件并非总是适宜的,或者不完全适宜,因此,这些农场有时分裂成为规模比较小的大型单位,每个1000—5000俄亩。这完全正确。奥新斯基同志根据这一点认为,在苏维埃的条件下,大型谷物农场也没有前途。这就完全不对了。奥新斯基同志看来不懂得或者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和苏维埃制度之间在条件上的差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着土地私有制,这意味着还有绝对地租,这会提高农业生产成本,为农业的重大进步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苏维埃制度下,既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也不存在绝对地租,这不能不减低农业产品生产费用,不能不为农业在技术进步和其他方面进步的道路上前进减轻负担。其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型谷物农场的目的是获取最大利润,或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获取符合所谓平均利润率的资本利润,得不到这些利润,这些农场总的说来就不可能发展。这种状况不能不增加生产费用,从而在大型谷物农场发展道路上制造某种障碍。在苏维埃制度下,大型谷物农场同时也是国营的农场,根本就既不需要为了自己的发展去获取最大利润,也不需要获取平均利润率,可以只要最小的利润(有时可以不需要任何利润),在没有绝对地租的情况下,为大型谷物农场的发展创造绝对好的条件。最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存在为大型谷物农场提供的优惠贷款、优惠税收,可是在全力支持社会主义经济部门的苏维埃制度下,现在有这样的优惠,将来也有。

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条件创造着苏维埃制度下(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为进一步推动国营农场这一大型谷物农场事业的发展所必需的、非常良好的形势。

最后,关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问题,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是巩固衔接的支撑点,是保障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支撑点。我们需要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不止是为了保障实现我们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未来目的。我们需要集体农庄和国

营农场还是为了**现在就有经济支撑点**,而这种支撑点是在农村具有巩固衔接所必需的,也是保障工人阶级在衔接的内部起到领导作用所必需的。我们是不是现在就能指望建立和发展这样的支撑点呢?我一分钟都没有怀疑过,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对此抱有希望。全苏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和销售农业合作总社联社通知说,它同集体农庄、劳动组合和合作社签订了合同,根据这些合同,它可以得到2亿—2.5亿普特粮食。至于国营农场,资料说,我们的旧国营农场、新国营农场在今年也应当提供2亿—2.5亿普特粮食。

**安采洛维奇:**要多一些。

**斯大林:**安采洛维奇同志说,要多一些。而我为了更慎重起见,用了比较少的数字。如果对这个数字再加上农业合作社从个体农民那里通过签订预约合同而得到的3000万—3500万普特粮食,那么我们就可以拿到完全有保障的近7000万—8000万普特的粮食,这至少是国内市场上的一种储备。这毕竟是件东西了。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我们农村的生产支撑点提供的**第一批成果**。我想,如果我们在今年1月有这样的储备,当我们遇到粮食采购危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比较灵活地在粮食市场上运作了,就能够抵消哄抬价格的游戏所起的作用,就能够用其他手段抑制富农和投机分子,甚至有可能就不必使用非常措施了。

**柯秀尔:**至少用不着再动用这些措施。

**斯大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首先需要国营农场、集体农庄、供销合作社和各类合作社这样的农村生产支撑点的原因。

而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从这里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有些同志想,工人阶级在农村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是无助的,工人阶级的出路似乎只有一条:无限制地让步、不断地让出自己的阵地,这些同志是不对的。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工人阶级决不是像肤浅的观察家所感觉的那样,在农村束手无策。这类丧气的哲学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工人阶级在农村有着国营农场、集体农庄、供销合作社这些形式的一系列的**经济支撑点**,它依靠这些支撑点可以巩固同农村的联合、孤立富农和保障自己的领导。工人阶级在农村还有苏维埃、组织起来的贫农这样的一系列**政治支撑点**,它依靠这些支撑点就可以巩固自己在农村的阵地。

因此,我不赞成托姆斯基同志昨天的讲话。照托姆斯基同志的说法,工人阶级在联合的事业中只掌握着一个后备手段——让步的后备手段。今天让了步,明天让步,后天让步,无休止地让步,——据说联合将要巩固、工人阶级将要强大

的保障就在这里。不,同志们,这不对。这个丧气的哲学同我们党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我们需要的不是随便什么样的联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有自己独特的城乡联合。这个联合的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我们需要的是加强工人阶级和保障工业阶级领导作用的联合。我认为,在富农分子组织来自农民的压力条件下,不断让步的政策只能削弱工人阶级和破坏工人阶级的领导。

**臧声:**正确。

**斯大林:**不断让步的政策不是我们的政策。

要是我们的后备手段只局限于让步,那我们的事情就糟糕了。那时,特别是如果坚持不断让步政策,我们就完全成了小资产阶级自发性的俘虏。举例说,说轻一点,农民的某些过分要求。某些阶层的农民不只是要求提高一些粮食价格。他们在富农分子的纵容之下,还要求实行全面的商业自由、取消国家机关的调节作用、取消收购价格等。你们知道,大多数农民并不反对这样的要求。好吧,那就实行让步,宣布现在实行完全的、无限制的商业自由?但那就得取消新经济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新经济政策意味着贸易有受到无产阶级国家的调节作用限制的自由……受到富农纵容的农民可能进而要求我们取消海关限制、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以便得到外国生产的最便宜的商品。你们知道,这一要求在相当一部分农民阶层,特别是在边境地区的农民中,十分普遍。是不是可以就这样做出让步,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呢?那个时候,就得压缩我们年轻的工业,扼杀工人阶级……最后,农民可能要求我们给予组建“农民联盟”的自由。你们知道,富农所纵容的相当一部分农民阶层已经几次提出过这个要求。那好,可以做出让步吗?那么,到那时,我们就得宣布政党自由并为资产阶级民主奠定基础。

这就是不断让步的理论所导致的结论。

事情是清楚的。一定的让步是必须的、适宜的。但如果把一切都建立在让步上,而且是连续不断的让步上,那就可能扼杀全部事业。

关于我们的制度并没有奠定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必须分裂的基础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为了把这一正确的论断贯彻到生活中去,就必须对农民实行这样的政策:强化(而不是削弱)工人阶级,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不是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保障(而不是破坏)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可以确信,将来不会分裂,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将会保存下来。

为此需要做什么呢?可以实行连续让步的政策吗?当然不能!这一政策只能扼杀联合的事业。首先,为此就需要发展工人阶级在农村的、以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为形式的、以广泛的供销合作社和各类生产合作社网络为形式的经济支

撑点。其次,为此就需要经常不断地活跃农村的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这样的政治支撑点,它们能够在工人阶级周围创造出广泛的非党的农民积极分子。最后,为此就需要想方设法加强我们在贫农中的工作,组织对贫农的帮助,把贫农自己组织成工人阶级在农村的牢固的支撑点。依靠在农村的这些经济和政治的基地,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所掌握的所有手段和力量(制高点,等等),党和苏维埃政权就能够有信心地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步一步地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一步一步地巩固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

应当特别关注对农村贫农的工作。应该认为这是一条规矩:对贫农的工作做得越好、越顺利,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威望就越高,反之,我们对贫农的工作做得越差,苏维埃政权的威望就越低。因此,我想,该对我们的决议案进行修改,提出要全面加强我们在农村贫农中的工作。

喊声:正确!

彼得罗夫斯基:只是这样做需要钱。

斯大林:这是对的。但是对这一点不应当害怕。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想把农村的共产主义工作做好的话,就应当认真地组织帮助贫农这件事。我们常常谈起同中农的联盟。但为了在我们的条件下巩固这个联盟,应当同富农,同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加强对富农进攻的口号是完全正确的。但能不能在同富农进行顺利斗争的时候,不加强对贫农的工作、不发动贫农反对富农、不给予贫农经常的帮助呢?显然不能!中农是动摇的阶级。如果我们同贫农的关系不好,如果贫农还不是苏维埃政权的组织上的支撑点——富农就会感觉到自己有力量,中农就会摇摆到富农一边去。反之,如果我们同贫农的关系好,如果贫农是苏维埃政权组织上的支撑点,富农就会感到自己处于包围之中,中农就会向工人阶级一边摇摆。

想一想今年1月至3月粮食收购运动初期的情景吧,当时我们有能力以某种最低限度的廉价粮食支持贫农。那时我们几乎拥有所有的贫农来反对富农,大多数中农跟着贫农走,富农被孤立了。4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指出,我们在1月至3月间得以改善了我们在农村的工作,把富农孤立起来了,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再回想一下4月至6月粮食收购运动第二个时期的情景吧,当时我们没有能力用廉价的粮食去帮助贫农,富农自己把自己的部分储备粮食分发给了贫农。这一状况是不是成了我们的贫农工作做得不好、农村的政治状况不尽人意的原因之一呢?

为了在粮食收购年度的艰难岁月里帮助贫农,需要很多粮食吗?经验说明,

总共需要1 000万—1 200万普特就够了。这合2 000来万卢布,不会多。

今天我们在价格上向中农做出让步,会有什么代价呢?这可不是什么小事。这也不是昨天某些同志给我们说的那种事:要是官僚主义少一点,计划多一点,据说一切就都会好的。不,同志们,我们向中农让步的事情不这么简单。只有漠不关心的人才会这么看待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向中农的让步,如果是把粮食价格提高15%的话,需要我们付出的大约是1.4亿卢布。要是按托姆斯基同志所建议的那样提高40%……

托姆斯基:我不是建议,我说的是大概。

斯大林:要是把粮食价格大概提高40%,像托姆斯基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每年至少要付出3亿卢布。这些钱从哪里来?你们自己知道,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为了拿到这些钱,就得或者从工业中,或者从商业中挤一些出来。你们看到了,向中农让步的事情不像某些肤浅的观察家所感觉得那么简单。现在你们把1.4亿和3亿卢布同必须帮助贫农的2 000万卢布作个比较,你们就会懂得,组织对贫农的长期帮助,这对我们会多么有利。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加强对贫农的工作,组织安排对贫农的长期帮助,最后,把贫农自己转变成工人阶级在农村的组织上的支撑点,是我党最重要的迫切任务之一。

主席:请加里宁同志发言。

加里宁:我只对辩论中的某些讲话做一些解释。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指出的完全正确,我的某些措辞可以说是不正确的。但我认为,解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总归就好像我说伏尔加河在流入黑海的时候带走很多泥沙一样。

喊声:这不会触犯任何人,可是关于富农的话是触犯了。

喊声:伏尔加河流入的不是黑海,是里海。

加里宁:瞧,又纠正我了,伏尔加河流入的不是黑海,而是里海。

柯秀尔:要搞准确不妨这样。

加里宁:这不,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也做了所谓的纠正,说伏尔加河注入的不是黑海,而是里海。一下子就纠正了。人们在寻找很大的准确性。(笑声)是的,在措辞上必须有很大的准确性。但是,你们当中要是有人曾经经常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过交道,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做一件事的时候,那里的情况不好,那里的人们有些事情没有干好,——那个人知道,比如说,列宁会说:你们去看看,就地枪决,枪决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枪决!如果你们不了解他,还真地相信,确实必须枪杀这些人。要说一字不差,那就该是这样理解。但要是这个人去

了并准确地执行了任务……

[米高扬:他也就被枪毙了。]

加里宁:这是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委托任务的绝对歪曲。我在这里不是针对准确的措辞说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全会速记记录是全体党员都要看的。

加里宁:而对于速记记录,对不起,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对我的速记记录您可别去找茬挑毛病。(笑声)对于速记记录我要全面周密地考虑,当我在讲话的时候,我希望我的思想能够更充分地让人们能够理解。当您说是在纠正我的时候,这是不对的,您这是在对词句进行挑剔,因为加里宁有的是另外的思想。这一点,现在每一个人都能很好地理解。由于没有从实质上掌握我的准确性,您在确定形式上的准确性的时候,在我看来您是在违背我的意愿,在我要灌输到全会的意识当中去的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想法面前横了一条杠子。而我说的的是什么?——应当“爱惜”生产单位,因为我们不能不这样做。当要毁坏它们的时候,总要设想一下:毁掉了这些农场,拿什么来代替,用这个办法完全消灭它们,将来怎么办呢?当我给你讲必须“爱惜”的那个片刻,您立即回答说:尊敬的同志,我们有宗教生产公社,应当毁掉它们。这意味着,从一个中央来了两个领导。我说:应当“爱惜”,而您对此回答说:应当毁掉。当然应当毁掉!我知道,您要毁掉它们,用不着逼您,您就会去干这件事的。我感觉到,干这样的事情您是热情十足的。但是怎样毁掉?如果情绪是相反的呢——人们非常珍惜富农,而且是确实是在维护富农,维护任何一个这样的组织的话——那我就说了:这是绝对不合适的。我会说相反的话,但完全是出于另外的动机。我这是从具体条件出发。有人说,这些公社推行的是宗教的、反动的思想,等等。而您想干什么?您想让丘里科夫派<sup>232</sup>来建设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吗?您希望他们能脱胎换骨吗?

要知道,我们这里是一个国家,那就让我们把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全部敌人统统杀光吧。(笑声)否则怎么办呢?把他们都淹死。(笑声)

速记记录当然需要修改,对于这一点我知道得比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清楚得多。但是,您不要忘记,我们是领导者。您还记得吧,托洛茨基还在的时候,当时我们进行过辩论,有人不是就说什么富农是我们的财产,虽然名声不好,但总归是苏维埃政权的财产吗?(笑声)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我们不能这么做,您自己知道,如果把苏维埃政权的所有敌人都排除出去,——要知道他们是数以几十万计的人,如果全部禁止他们工作,——我们就

造成了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庞大组织。与此相反,应当强迫这个阶层的人为苏维埃政权工作。想一想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是如何提出问题的。他说:“仅仅战胜资产阶级、给资产阶级致命打击是不够的,这不过是事情的一半,还必须强迫他们为我们工作”<sup>233</sup>。

如果您说:可惜啊,世代相传的工人不干活,比方说~~不去~~耕地,那您这是小资产阶级观点;而当迫使过去的伯爵去耕地的时候,您又说:让他从地里滚出去,再让工人来干活吧。这是奇怪的、非无产阶级的观点!我们应当让他们工作,让他们耕地,让他们打扫厕所(笑声),去干所有特别艰苦的活儿,在这些劳动中进行自我改造,使他们的心理状态变得高尚起来。因此我说:同志们,当我们建设共产主义的时候,应该更多地关注宗教公社,有时必须研究它们:为什么它们能坚持得住,为什么它们没有解散,为什么我们的公社解散了?应当研究宗教公社,利用有益的东西,研究他们具有的那种纪律和那种组织经验。只是简单地摧毁它们,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这是不行的<sup>234</sup>。务必费心把它们利用起来,然后予以克服和根除!当然,雅罗斯拉夫斯基是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用不着给他说得~~太~~详细。

柯秀尔:他是反宗教委员会主任。

加里宁:还是反宗教委员会主任。

斯克雷普尼克:那么,您是不是支持宗教公社呢?您就照直说吧!

加里宁:怪事,似乎在这里发言的人还有比我说得更直截了当的。(笑声)至少在私下谈话中大家都说,所有的发言都是模棱两可的。可是突然有人要求我在一个涉及局部的问题直截了当地说。(笑声)我想,我的思想很明白,眼下还没有人说得比我直接了。因此硬要我更直接地回答是没有根据的。

同志们,我就不回答奥新斯基了,因为人们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回答了他。我只极其简短地回答几个人,因为他们指责我说,我在我的报告中提出的有用的具体材料不多,准确一些说,是没有拿出技术资料,在哪些地区建设国营农场,为什么用这些土地而不用其他土地,一句话,没有展示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一直是在有意识地绕过这些问题。如果我是展开来谈,在农业专家的帮助下做好准备,宣读一遍,从技术方面提供一些情况,那你们会说什么呢?你们该说:加里宁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变成专家了。(笑声)我认为这是对这件严肃事情的一种亵渎。需要的是这样的报告吗?我想,这个报告中央委员会是用得着的。

但是,当然我不会这么做。我的事情,是在政治上捍卫建设新国营农场的必要性,捍卫我们赋予这一事业的突击性。这就是我的任务!然而在组织和技术

问题上我仍然有自己的观点：譬如说，我赞成按全部机械化的原则建设这些国营农场，我赞成在国营农场的初期实行粗放经营，——我主张这一点。但是，要向你们证明这一点，我就不好意思了，我不知道我应该如何做。我们开过一个专家会。会上进行了大量争论。我说，我赞成某个观点，但是，要是让我拿着在会议上搜集来的这些“知识”来说服你们，那就简直不像话了，这不是我的任务。在这里，我是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的，所以我绕过了这个问题。我的任务就是从政治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并保护这个问题。要知道，从实质上来说，并没有明目张胆地反对国营农场的人，大家都是国营农场的维护者。就连克维林也是国营农场的维护者。当然，他是委员会的委员，不能不保护。但大家都说，请关注旧国营农场。而诺索夫同志甚至建议关于旧国营农场在决议案里特别加上一款。我以为，没有任何根据这么做。但这决不是因为我们不关注旧国营农场。不是这么回事。你们知道，中央委员会对劳动国防委员会在贷款问题上，针对改进国营农场状况、更多关注国营农场、更多地向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划拨贷款等方面的问题，对所做出的决议进行了大量修改。你们看到了，中央委员会做了相当大的改动。随后，就这个问题又下发了一系列补充指示，在半年或者一年以前，委员会在莫洛托夫同志的主持下通过了一个决议草案，后来由中央委员会公布了，提出了必须关注这一问题，并且规定了一系列实际措施。因此，现在把旧国营农场和新国营农场混淆起来的做法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因为从实质来说，用这种做法把对新国营农场的注意力吸引开来并不能帮助旧国营农场，因为在有了中央委员会对旧国营农场的这种关注之后，仅仅加上一个条款是无助于事的。

臧声：这个决议没有执行。

加里宁：如果决议没有得到执行，那就应该是争取执行。中央委员会有的是一个完整的决议，而你们说，如果增加一款，这个决议就能执行了。我不想用这个补充把对新国营农场的注意力吸引开来。实际上，我完全同意关注旧国营农场。对此，我完全同意。

其实，这就是我想提出的意见。我应当说的只是，卡巴科夫同志所说的报告当然应当更加具体一些，我以为，要作这样的报告，非要经过半年或者一年才行。我们这里正进行着多方面的进程：正在弄清楚哪些地区可以用于建设国营农场，正在研究国营农场的形式、建立国营农场的组织，与此同时还正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我认为，经过半年或者一年时间，这项工作就将产生结果，那时中央委员会大概要听取的，就已经不是政治性而是更带有技术性的报告了，那将是关于在国营农场的研究领域和建设领域里取得的实际结果的报告了。



有人在这里还指责我,说我过分夸大了建设国营农场的意义和作用,因为我说过,如果我们解决了建设国营农场的问题,那我们就将解决农村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我在讲这话的时候,我指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国营农场将是使农业实现集体化和机械化的重要杠杆之一。我是在这个意义上继续坚持国营农场在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重大意义的。请想一想,列宁是如何提出关于物质基础的问题的。这个物质基础可以而且应当由国营农场来奠定。乌克兰的经验——是给你们最好的证明。

还指责我不重视合作化。我讲国营农场,但丝毫没有贬低合作化工作在农村中的作用。我在自己的报告中没有讲这些事情,是为了把国营农场这个突击性问题说透。

我还是要说,如果我们把农村国营农场的建设问题解决好,这就意味着我们做到了把技术、技术工人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使得他们实际上能把这样宏伟的任务解决好。如果农村的大型苏维埃农场的问题得以解决,那么一系列文化技术方面的任务同时也就都能解决了,而且不可能解决不了。组建起积极的农业无产阶级的任务也就同时能够解决了。

喊声:全权代表的任务。

加里宁:我们还不习惯使用这个术语。有可能我们以后会研究出新词来,而现在习惯给我们的压力太大了,因此,我们把工人阶级叫做无产阶级。

你们知道,在国营农场这一基本问题真正解决的同时,一系列其他问题也在顺便得到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是我党采取的重大社会政治和经济措施之一的原因。

打个比方说,夏季,有500—1000名,也可能是1500名大学生,在国营农场从事实际工作。当有1000名大学生在教授们的领导下在大型农场进行实验的时候,那么教授也要来到这1000名大学生工作的国营农场,您要看明白,这将展现的是什么样的情景啊。然而可惜的是我这笨嘴拙舌描绘不出这样的情景。如果卢那察尔斯基在,他会给你们描绘这样美丽的景象,我的描绘,我对通过建设国营农场来解决社会主义的问题所说的话,在你们看来就太平庸、平淡了。

好啦,同志们,今天从我平淡的讲话中已经能够得到一些成果了。柯秀尔同志不是说了吗:“我一定要去农村当国营农场领导人”,而这在我看来已经是大有成绩了。(笑声)

主席(柯秀尔):建议基本通过决议草案。谁同意?基本通过决议草案。这

里有已经提出来的很多修改。首先是涉及期限的修改。这里指出的是：3—4年的期限。有人建议：4—5年的期限。现在表决。谁赞成原来的期限？少数。谁赞成4—5年？通过4—5年的期限。

**彼得罗夫斯基**：有没有可能6—8年？

**主席**：那就对8年进行表决。谁赞成8年？一人。

第7款，最后一款。这里写的是：“批准1928年的工作计划，总耕地面积为”等等。有建议说，不批准这个计划。

**丘巴尔**：可以这样说：“批准1928年的任务，总面积为”等等。

**主席**：有反对的吗？通过。而后是丘巴尔的一项修改，把国营农场帮助周围农民居民的一款加进来。

**丘巴尔**：我对第2款有这样的提议：“新国营农场应按以下计划进行建设，以便……”等等，同时，要把以下内容加进国营农场工作计划：国家对农民经济，首先是对集体农庄用优良种子更换不好的种子的工作施加最大的影响。这应当能促进大力提高广大农民经济的产量，而集体农庄也将生产质量好的粮食。

**主席**：改什么明白了吗？要辩论吗？

**加里宁**：看到了吗，同志们，我为什么要反对？第一，我们的这条建议可以说是减弱了采用工业生产方式的突击性，并把自己科班教学的东西加了进来。第二，这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吹牛：连1普特粮食还没有生产出来，粮食只能在来年生产出来，我们就承诺帮助农民。在这个问题上总得要保持适度。

**臧声**：那政治上呢？

**加里宁**：政治上的事情是这样，当我们实际的东西还一点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向农民下保证，农民要说：瞧这些吹牛大王，粮食还没有生产出来，他们就给了许诺。（笑声）这事最好放一放。到了明年我们有500万普特粮食的时候，我不会反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或者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在农民中间进行分配的特别决议。（笑声）

**主席**：要表决吗？谁赞成丘巴尔同志的修改，请举手。谁反对？多数反对，少数赞成。

**丘巴尔**：那么我有另一条修改。我建议删掉第2款，因为这一款在加工部分做出的允诺要比在5年之内所能做的多得多。这个给周围农民居民的农产品进行工业加工的中心将在什么地方呢？而且在这些地区没有农民居民。这种允诺将只会造成误解。

**加里宁**：这里提出的是远景。（笑声）

丘巴尔: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规定。我建议把第2款删掉。

安采洛维奇:我有一条建议,去掉加进来的建议。我建议加进一款:全力支持旧国营农场,把巩固和组建旧国营农场和新国营农场的工作同在合作道路上改造农民经济的任务结合起来。

主席:我想,应当对丘巴尔的修改进行表决。安采洛维奇的建议与这里没有关系。谁赞成丘巴尔删去第2款的建议?谁反对。很少。这就是说,这一款保留。

关于旧国营农场——这一问题已经做了解释,似乎斯大林同志也谈过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讲的是新国营农场。请允许不经辩论就举行表决?

现在对把旧国营农场加进来的修改进行表决。我建议不经辩论就对这一修改进行表决。谁同意不经辩论进行表决?通过不经辩论进行表决。

斯克雷普尼克:我有一条建议:重申政治局原来关于旧国营农场的决议。

主席:谁同意把关于旧国营农场的一款加进来?16人。谁反对这一建议?大多数。这个修改被否决。关于旧国营农场的问题就是这些。对整个决议案进行表决。谁赞成通过整个决议案?谁反对?没有。谁弃权?丘巴尔同志。

请允许在这里对议程提出建议。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明天开始,会议决定提前一小时,在10点。

喊声:在11点!应当做些准备。

主席:现在表决。谁赞成11点?通过。闭会。

## 第十五次会议

7月12日上午

主席(李可夫):莫洛托夫同志发言。

### 关于改进高等院校对新专家的培养

莫洛托夫:同志们,由于出了沙赫特事件,关于改进培养专家的工作问题摆在了中央委员会的面前。当然,沙赫特事件只是一个推动,它只是再一次提出了我们党的那项任务,它已经不是第一天,也不是第一个月,而是实实在在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关于我们的工业、交通技术干部的问题,以及整个关于经济干部的问题,不只是经济方面的,而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干部问题,是苏联当前最主要和最尖锐的问题。现在党应该是从各个方面去抓这个重要的但尚未得到尽善尽美的解决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这一问题尤其尖锐地反映在了技术领域,反映在了工业和农业生产领域。

我们至今很少抓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这样的!——而且目前关于培养我们国家工业和其他领域的专家的状况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对于我们来说,所有这些情况算不上是新的东西了。特别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工作正在大踏步前进,所以我们就不能认为,有关技术干部问题的状况多少还能令人满意。尽管我们在类似最新技术这样的工作方面还十分落后,尽管在科学的各个领域里实际使用最新成果这种问题上,我们还极其迟缓,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我们是在胜利前进的。我们的主要优越性在于苏联制度的体制本身、我们进行建设的社会条件是极富生命力的,不管怎么说,苏联经济发展的强大潜力正在得到空前的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需要有组织能力的干部。我们需要社会主义的组织方面的干部,他们对自己事业的精通并不比外国专家逊色,同时他们又与劳动大众的利益血肉相连。我们在

中央四月全会的决议中联系到沙赫特事件,指出了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弱点,我们经济工作中有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那就是无论任务多么复杂,我们还是同往常一样,在经济领域里工作,使用的还是革命初期的方法,以致实际上往往变成了“泛泛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管理人员就变成了“坏政委”(参见《中央四月全会决议》),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应该是专心致志地着手实现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建立起一支新的、真正的苏维埃专家的干部队伍来,应该着手把做实际工作的共产党员和来自共产党和工人的、重新成长起来的干部变成真正的、内行的专家和领导者,在一切工作领域里尽快地消灭“坏政委”的残余。目前我们应该将这项工作作为全党最重要的任务来抓。

在工业方面,干部问题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目前,对于工业部门来说,专家干部的问题不仅是老的专家干部的问题。当然,工人阶级出身的新专家目前还很少,毫无疑问,在专门知识领域里,老专家们还是应该起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实际上也还是这种情况。但现在已经是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源源不断的新的专家了,可是目前他们还少得可怜。不过,我们是具备培养这些新的、具有各种专门技能的专家干部的条件,如果我们真正着手去做的话,我们是能够大大地推动这项工作的。对于工业来说,现在这简直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我们给自己提出“赶上而后超过”先进的工业国家的任务,那么,很清楚,我们只有在最新技术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需要:第一,通过使这些成果转为我用和吸收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各阶层的专家;第二,通过最大程度地加强培养来自工人阶级和一般来自我国劳动群众的专家的工作。对于工业来说,关于专家的问题已经成为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彻底地解决它,我们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进步,就不可能使我们在苏维埃建设方面,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里取得的重大胜利得到真正巩固。

事实上,只要列举出关于基本建设增长的数字,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工人阶级目前已经投入这项工程的资金有多么巨大。在工业和交通方面,近几年来基本建设投资是以这样的步骤进行的:1924—1925 年度,我们对这项工程的投资是 6.09 亿,下一个年度——11.07 亿,再下一个年度——14.30 亿,最后,在今年——18.78 亿。然而,仅此一点就需要大批真正具有专门技能的专家,这样才能使工人阶级不会白白地把自己的物资耗费在提高经济上。我从工业五年计划中抽出了几页纸,它们说到的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已经开始和正在设计的新建设项目方面的计划。这本书就在我的手上。你们看,同志们,仅最新的五年计划已经开始并正在设计的工程项目单在这本书里就占了 50 页!这就是说,基本

建设领域里新工程的一个项目单，——还只是工业部门！——就占了整整一个册子！对这个计划的修改当然是要做的，但不能怀疑，这个工程项目单基本上是我们应该执行的，是我们应该实施的。而这项工作是如此之艰难，以至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值得去看一看这个项目单，这样就可以明白专家干部的问题是苏联最为尖锐和最为紧迫的问题了。这就是说，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是资产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老的专家干部的问题，而且还有新的专家干部的问题，关于我们应该按照现代技术要求和按照苏联新的社会条件去培养的那些干部的问题。

在我们的工业领域里，目前这个问题的情况到底怎样呢？

我不详细谈相应的数据了：我们中的每个人对自己工作中的具体事例了解得够多了。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工业部门有一定数量符合当前专业化要求的工程师和技师就夸口。在工业领域里，现在有1.55万名工程师和同样数量的，也就是1.55万名技师。但还要补充的是：除了处在工业部门的关键技术职位上的3.1万名工程师和技师外，还有2万名实习生，这足以让人明白，我们是处于这样一种局势，已经明显地爆发了尖锐的危机，也就是真正具有专门技能的专家严重不足。这些数字告诉我们，每一个好的老专家——不管他按其信仰是铁杆反革命还是铁杆白匪！——只要他还没有犯罪，只要他不搞破坏，只要是能利用他的专业为无产阶级国家哪怕是做一点点工作，我们都应该把他用起来。我们同意暂时使用这些与我们敌对的但在无产阶级的监督之下在自己的领域内能做些有益工作的专家，尽管他们为苏维埃工作是要把牙咬得咯吱直响的！我们有的、具备高度技能的工程师和技师是如此之少，以至我们应该珍惜他们中的每个人，最大程度地使用每个人，但是不言而喻的是，对于来自这个旧的专家制度的所有企图向无产阶级国家动手，或者在苏维埃经济机构中进行破坏工作的人，都要坚决地清除掉，就像清除腐烂的东西，清除已经腐烂的布料一样。

我曾试图将我们工业部门的专家状况同外国工业部门的专家状况作个比较。遗憾的是，这再一次表明的是，我们在技术上知之甚少，我们对自己实际工作中最起码的任务是漫不经心的。谁都做不到就这个问题提供哪怕一点点可靠的数据——教育人民委员部做不到，这对它来说是难以办到的；劳动人民委员部也做不到，它也是该知道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也做不到，而它似乎至少该是关心这件事的。我们的各个人民委员部中，没有一个人掌握这样的数据。我只能冒着一定的风险引用一些负责的经济管理人员的具体说法，这些说法基本上证实了我们是严重落后于外国的。似乎没有什么必要去证明，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我们的工厂是严重落后于外国技术的。然而，遗憾的是，我们没

有确切的比较数据。

下面的例子可以勾画出一些情景来。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同志们,特别是在这个领域里工作的克拉瓦利同志,列举了我现在使用的这些数据。

请看他们有关我国工业部门的技术力量状况的数据。在我们这里,每一百名工人只能拥有0.98名工程师和同样拥有0.98名技师,而除此之外,还有1.28名所谓的“实习生”。总的来说,我们每百名工人只能拥有3.24名有技术职务的人员。

有人喊:也包括机构,例如,托拉斯的机构吗?

莫洛托夫:是的,包括整个技术机构。

至于其他国家,在任何情况下,每一百名工人所拥有的仅中等水平的专家就不少于2—4人。在一些很发达的工业领域里,他们的数量达到每百名工人所拥有的专家为10人、15人和20人,而在机器制造业领域,例如在瑞典,甚至达到50人,李可夫同志在上次中央全会上谈到过这一点。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在保障向我国工业部门提供专家的问题上,我们是明显落后的。上述数据表明,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状况是极其严重的。

这些干部里还包括了这种被迫为苏维埃政权工作而且有时直接在中途会搞点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人员,就像我们在沙赫特事件中看到的那样,这些已经不必再说了。我们在这方面的情况至今要比资产阶级国家的情况差,因为专家总体上是属于资产阶级阶层,尽管他们总体上无疑在这些年发生了转折,这是有利于为苏维埃政权奉公守法地进行工作的转折,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没有真正的热情,诚然,到目前为止,他们中不多的一部分人仍在隐蔽地或者甚至公开地敌视苏维埃政权。

培养新专家的工作情况又如何呢?

我应该详细地谈谈这方面的问题。首先我要援引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所做的对这项工作情况的评述。

6月28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工业与高等技术院校》<sup>235</sup>的文章,对这个问题谈到如下的看法:“俄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给各级机关发送了无数证据、文章、报告和讲话,只要是这些机关能够对它有帮助,同时也诉诸社会舆论,说到了对高级专家,特别是对工程师的培养工作极其不顺,这些材料我们可以一一列举出来。”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在文章里是用斜体把“极其不顺”几个字特别强调出

来的。

正如你们看到的,这是十分尖锐的评述,但是它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的,我们培养专家的工作,特别是为工业部门培养工程师的工作的状况,极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无疑是不妥当的。我们的决议也谈到了这一点,诚然,这比起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说的这些话来,在语气上要较为柔和一些。例如,我们的决议里没有提“极其不顺”,而只简单地说“不顺”。而这样说是对的。

毫无疑问,在评价这项工作的情况时,我们应该考虑到我们的高等技术院校工作的客观环境。毫无疑问,这件事的物质状况在这里有着极其重要的,而且对初期来说是直接的决定性意义的,这会对培养新专家的工作产生极其不利的影晌。除此之外,尤其应该考虑到的是,高等技术院校新生的构成本身就要求高等技术院校的工作方法能有一个根本的、并且是十分复杂的改革。我们把大批来自工人和部分来自农民的新干部推荐到了高等技术院校,这是一些没有经历过高等学校课程培训的人。在从根本上改变高等院校学生的社会成分之后,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帮助这个新的学生阶层掌握和尽快地通过高等学校的课程。现在仍然有人想要说服别人,说什么在我们高等技术院校里,工人们并不落后于后进生,应该承认,这显然是落后于现状了。这样说简直是可笑的,因为我们向高等技术院校推荐的年轻的工人干部不仅一点不比其他学生差,而且在许多方面正在更好地、更顽强地钻研科学,尽管他们在这方面要克服“超额的”困难。毫无疑问,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了巨大成绩的。

接下来,这些年来,我们在高等技术院校的教师成分方面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现代要求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教师成分远非令人满意。而且就其政治倾向来说,它的多半成员是和我们有很大距离的。

但就所有决定我们的高等技术院校状况的基本方面来说,我们在最近几年中还是有很大成绩的。如果总的来谈我们的高等技术院校的主要业绩的话,那么,我认为可以概括如下:我们彻底改变了高等技术院校的社会成分。现在,在我们的高等技术院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工人们,虽然他们在我们的学生中还不占多数。这方面的工作还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很顺利,但是,无论如何,经过对学生成分的改革,已经有了决定性的变化。在发展我们的高等技术院校方面的总成绩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那就是我们在组织这项工作方面大致达到了战前的水平。尽管物质条件和生活条件极其艰巨,尽管学生的社会成分有了根本的改变,尽管教师干部的状况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在总的方面和整体上还是达到了战前的水平。不能不承认这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教



育总局,在工作中取得的重大成就。

但是我们在这一领域仍然存在着许多缺点。在这里,我只谈一谈最主要的。在转入专门的高等技术院校问题中最尖锐的因素之前,我还要再提两条意见。

我们发展了高等技术院校网——这是最大的成绩。但与此同时,在各个学校里,在许多情况下,存在着同类系的平行重复现象,而且有时还是人数并不十分多的系。我们有的系开设的一些课程只有两三个人上,而在两三个地方都有这些系。如果拿电工技术学院、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和列宁格勒工学院的照明电工课程来举例的话,那么,除后者外,只有不多几个人在相应的同类系里学习,然而我们是在三个高等技术院校里培养照明电工方面的专家。这是需要消除的许多不协调现象中的一个。

可以举出一系列其他不协调的例子来,它们碰上了一个共同的关于计划的问题。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培养专家的计划。到目前为止,就是在有关这个计划的问题上,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一直在争吵不休。这些部门——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应该说是“部门”——直到现在仍在无休止地争论:我们没有培养专家的计划是谁的过错。从形式上来说,在这里首先犯错误的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它作为客户,应该提出自己的符合经济计划的相应要求来。而如果不是从形式上来看待这件事的话,那么,很清楚,在缺乏经济上的五年计划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什么即便是凑合成的培养专家的五年计划的。当然,这是非常糟糕和非常让人恼火的事情,但这是事实。如果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这样的条件下为培养专家下发为期5—10年的“订单”的话,那么,由于缺乏总的经济计划,这就会是“空洞无物的文件”。谁要是首先指责教育人民委员部缺乏培养专家计划,那他就更要犯错误了。到目前为止,教育人民委员部是有“自己的”建设高等技术院校的计划,但从以上所说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个计划。我们只是正在向真正的计划靠近,而且还在摸索,在逐渐地制定由个别部分组合起来的真正计划,直至目前,还只有整个这项工作最笼统的目标。要知道,就是对实际经济建设来说,我们也不是马上就抓五年计划的,而是先要用几年的时间研究每年的控制数字<sup>236</sup>。

**斯克雷普尼克:**一知半解怕是搞不出计划的。

**莫洛托夫:**斯克雷普尼克同志不想考虑的是,我们至今没有党和苏维埃国家应该确定的经济的五年计划。本来很清楚,这是我们工作中的重大失误,但是,只是现在我们才能专心致志地实际解决这个问题,在适当的时候从一年一度的计划开始。在围绕主要问题(五年计划等)进行的计划工作方面,我们的进展非

常缓慢,可是要知道,还应该记住的是,能管若干年的、好的经济计划只能以我们全国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成就作为依据,而这些成就只是我们在近些年来才取得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不应该从形式上,不应该从部门关系问题的角度,从“是谁的错”的角度,对待培养专家的计划,我们应该能够做到的,而且现在也完全能够做到的,是制定这种近期的计划,把这项工作同最近五年经济发展的总规模联系起来。

当前,从实现“赶上并超过”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的观点出发,对高等技术院校的安排,最主要的是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培养专家的速度;第二,所培养的专家的科学水平;第三,对生产的了解及其与这种生产的联系;第四,当然是为使这些人成为真正的红色专家。我认为,这就是与培养新专家计划紧密相连、只能在具备这一计划的条件下才能正确地得到解决的四项战斗任务,缺了它们,我们就无法再继续在这个领域工作了。

接下来谈我所提出的主要问题。

关于培养专家的速度问题,情况怎么样呢?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目前,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在我们的高等技术院校里,学制是6—9年,而平均为7年多。从这些数字已经可以看出,这项工作进行得明显不正常。另一个数据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每年毕业的新专家目前只占学生总数的7%。正好我很了解,像列宁格勒工学院这样如此宏伟的学院,原来每年只有学生总数3%的人毕业。如果我们今后也还是用这样的速度来培养新专家的话,那么,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同意的。当然可以说,总的来说,战前也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同志们,对这件事我们有权说:这种陈芝麻烂谷子事情,有什么好说的!战前的水平多少比较接近我所列举的每年度毕业生的数字,但是这种战前的水平对我们来说又不是什么不可冒犯的东西。如果在这方面(不过是如同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将与战前的水平相比的话,那么,我们如何能“赶上并超过”远远走在前面的资本主义国家呢?

不能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在科学地培养新干部的工作上,要加快这种培养的速度,无疑有着许多障碍,但是我们无论如何应该去克服这些障碍。大学生物质方面的和其他方面的生活条件应该得到改善。纲领和计划应该进行修订,要让它们能够适用于以更快的速度培养专家。不管教育人民委员部在修订纲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谨慎是多么令人不解,不管在1926—1927年最后一次对纲领进行过修订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现在对新的修订和变化有多大的担心,这种修订现在是必要的。当然,要逐渐地,不是马上,不是冒失地去进行,但是,我们应该把

这件工作看做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使之从新的视角出发,使之符合整个高等技术院校方面出现的根本变化。

再举一个关于培养专家速度方面的例子。在莫斯科成立了一所建筑中等技术学校,它已经存在五年了——是从1922年开始的。我们的委员会收到了来自这个中等技术学校党支部书记的特别声明。我来读一下这个声明中的一段。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在拥有7个分部(系)的建筑中等技术学校里,共有在校学生1500人,每年的毕业生为250人,在其建成后的五年中,没有一个通过职业技能测试的学生。”

很清楚,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的速度来培养我们的建筑工程师的话,那么,我们就超过不了任何人,而将比乌龟还要落后。

最后,从培养专家速度的角度来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除课程设置为5—6年的现有的高等技术院校之外,能否建立学制稍短,即大约为3—4年的新型高等技术院校呢?为什么在西方和美国有这样的速成高等院校,而我们就不能这样做呢?难道我们能在这项工作上比这些技术上先进的国家还要更多地等待、还要更多地拖延吗?当然不能。我们所面临的局面要比他们糟得多,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关于新型的高等技术院校、关于学制设置较短的高等技术院校的问题,绝对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我们需要具备所谓“博学习型”的专家,也就是受过尽可能多的科学培养的专家,但是我們也需要专业面较窄的专家。经济管理人员和教育人民委员部之间经常出现的那种争论,就是需要什么类型的专家:是“专业面窄”的,还是“博学习型”的问题——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院式的争论。

有人喊:对。

莫洛托夫:不管怎么样,认为我们只需要这两种中的一种专家的说法是绝对不正确的,对于工业来说,这两种专家我们都需要。我们需要尽量多的最优秀的、最出色掌握专门技能的专家。但是,如果有关培养最优秀、最出色掌握专门技能的专家的工作进行得缓慢,而我们可以培养专业面较窄的专家干部,靠这一点部分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利用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在实现培养所有领域掌握专门技能的专家的任务同时,去培养专业面较窄这一类型的专家并在这方面争取速度呢?为什么要拒绝建立学习期限为3—4年的高等技术院校呢?只有用不可容忍地忽略解决最要害和最迫切的问题这一条理由,才能得出解释。党是不能允许这种不重视工业部门的需求的态度的。

第二个不足是高等技术院校中目前的科学培训水平落后。

是否可以对此提出异议?不,不能。我们在这方面大大地落在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好证明的。首先,我们的设备一点都不管用,因为它们早已过时。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设备中,有1847年生产的机床;那里至今还在按照一些1895年编制的教材上课。在许多情况下,设备和教材都已经十分陈旧不堪了。

伏罗希洛夫:教材是过时了,但在英国也有1847年生产的机床。

莫洛托夫:我不否认,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设备中,有些是不错的,可是1847年的机床是不适合作为教学用的。这样明显的混乱在我国多得无法计算,这是我国革命最初时期艰难的客观条件所造成的,首先是资金不足的结果。如果我们不去同我国在技术上的绝对落后、同我国科技发展的低水平作斗争的话,我们再也无法这样忍受下去了。而应该承认的是,我们一年到头忙于最困难的实际事务,却至今来不及真正地去着手同我国技术问题中的文化水平低的现象作斗争——这种文化水平低的现象在我党的队伍里还如此普遍地存在着。在共产党员们的工作里,科学暂时还未占主要的位置,而现在它应该得到重视了。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

以教师为例。尽管我们拥有非常专业的一级科学家,他们并不亚于,有时甚至在某些领域还要超过国外的优秀人才,但是,我们有大量的教师不仅原先接受的教育不够,而且近年也还比较落伍,这是由于我们在战争和革命时期同最新成就之间脱节了。

以现在我们在生产部门任工程师职务的“实践家”为例。在这方面,我们的状况也极其严重。

我应该列举一些表现现有的高等技术院校教学水平低下的例子。

我们的委员会<sup>237</sup>向四所高等技术院校派出了专门的小组,调查当地的实际情况。这些小组的成员首先是中央委员、全苏工会理事会成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实际工作上说,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同志。他们调查了四所高等技术院校: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克里尼茨基和И.柯秀尔)、矿业学院(曼采夫和多加多夫)、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施米特和А.科罗斯捷列夫)和卡甘-沙布沙伊<sup>238</sup>学院(С.柯秀尔、克拉瓦利和霍多罗夫斯基)。

我们从这些调查中得到了许多突出的和珍贵的材料。现在我来谈谈有关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材料。甚至在我们最好的高等技术院校之一,即莫斯科高

等技术学校,我们每走一步就能得到有关我们技术落后的令人发指的材料。

我们来看看工程建筑系的例子。我们的调查人员这样说(引用克里尼茨基同志报告中的一段话):

“甚至像新材料和新构造这类的科目都是选修的。对于购自国外并在苏联使用过数年的新的建筑机械,学生们不了解。学生们的毕业设计的特点是极其抽象,在设计中很少反映外国技术的经验。”

就化学系而言:

“化学系的大纲要修改,用化学界的最新成果来补充。存在着极端落后于实用化学最新成果和同工业部门共同的组织上和经济上的任务脱节的现象,而缺乏这些东西往往使得一个现代的工程师在我国无法开展工作。”

有关学生们的教材方面,调查人员是这样说的:

“十分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了学生们用来作为教材的东西。首先是图书馆。图书馆是老的,新的文学作品非常少。图书馆是1835年的样式。课本已经使用得破烂不堪,以至最需要的几页已经不能再读了。例如,在书里贴着1847年的邮票。可以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教学设备来组织起一个不坏的博物馆。新的教学设备不仅没有从国外运来的,而且也没有我们苏联的工厂生产的,这些设备根本就没有。”

这就是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学生们所学习的东西,这是我们在苏联所拥有的最大的技术学校。

C. 柯秀尔:学科最多的学校。

莫洛托夫:是的,学科最多和责任最重大的学校。

现在来看看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负责人鲁德同志所谈的关于交通部门工程师的培训情况:

“没有考虑到学生们不了解我们现代的企业拥有新设备的情况。学生们还指出了在授课时不重视像合理化生产这样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学生在我们荣获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的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也是这样接受培训的。至于授课情况,在这里也有材料证明,大多数教师是大大地落伍了。施米特同志在调查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后这样说:

“由于只有为数不多的教授和老师在研究科学,大多数人只是用自己的知识来换得额外的薪金(通过辅导、兼职等),大多数教授在科学界里严重落伍,这一切对培养学生和专家的成效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克里尼茨基同志在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就教学方面也谈到过同样的

问题。

但我认为,一名德国工程师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一位名叫茹柯夫斯基同志的工作人员在报告记录中所说的,是就这个问题说得最有意思的文件。

我们对这份记录特别感兴趣的是对专家状况的评价。德国工程师凯林,一个客观的非党人士,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主要优点在于他远离政治,同时并未受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所迷惑,毫无成见地、只是从实际的观点出发,从实际的生产状况出发,对我们的经济部门的工作做出了评价。同时应该指出,凯林并不是唯一的德国工程师,而是德国专家中的一员。这名工程师是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邀请来为我们的一批建筑企业提供咨询的。他到过正在建设中的下诺夫哥罗德发电站——在那里他主要能了解到发电站建设的状况,他到过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到过哈尔科夫……

**И. 柯秀尔:**到过哈尔科夫发电站<sup>239</sup>。

**莫洛托夫:**到过哈尔科夫发电站。他最后还去过顿巴斯、国营什捷罗夫区发电站<sup>240</sup>。关于他在这些企业看到的,他到底说了些什么?特别是他是怎样评价他在那里见到的那些专家的呢?

他是这样说的:

“早在柏林时我就听说,在整个苏联只有一个大型的试验材料的国家实验室,这就是在莫斯科。我给自己提出的第一个任务是寻找这个试验材料的实验室。在这里我感受到了第一次震惊。我被带到了地下室,它由两个或三个不大的、阴暗的和简陋的房间组成。这里有两台压力机和其他一些不大的工具。在一个角落里,我发现堆放着几个水泥立方块,一下子就可以明白,它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在我访问这个所谓的实验室期间,里边没有任何人;是拉赫京教授给我打开通往这个地下室的门,我是在另一个研究所里找到他的。拉赫京在俄罗斯被认为是这一领域最杰出的专家。”

而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一领域我们最优秀的专家——拉赫京教授的情况怎么样:

“当我们转而谈到技术问题时,拉赫京先生问我,我打算怎样在当地组织材料试验。谈判的时候,我非常吃惊,发现拉赫京先生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这样一个专家怎么会是这种情况呢。在实验材料的时候,我想采用的那些方法他是知道一些的,他也读过一些东西,但是总的来说这对他来说完全是新的东西。这里说的是借助于筛选来进行分析,让水泥的混合物的成分能够正确地计算出来,说的是测定稠度,以便在建设的时候掺加进去的水大体上是同样的。这些问题

在水泥建筑物中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些问题的理论论证大体上用了3—4年的时间,而在最近这两年里,这些问题已经广泛为人知晓了。在国外的建筑项目上,并不是到处都注意到这一点的;所以如果我能在建筑工地上找到实际操作的工程师不够熟悉现代的试验材料的方法,我就会认为这是问题,但是我还是能理解这种情况的,因为这里说的是新的方法。但是,我会非常吃惊的……”

伏罗希洛夫:莫斯科的公共事业管理局不妨把这件事做起来。

莫洛托夫:(读)“如果我遇到了一个人,他就像说到的那样,是整个国家最优秀的实验材料的专家却实质上对这些问题一窍不通的话,(这是令人吃惊的)。从后面发生的情况将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应该给他上一通课,并且让他看看这些工作是怎样进行的。同时我要强调的是,材料的实验不是我的专业。”

柯秀尔:这是凯林说的吗?

莫洛托夫:(读)“关于实验的方法我是从Y.格拉夫的书和其他著作中知道的。原来拉赫京教授有这本书,但是就像他自己说的,他还没有来得及把它读完,虽然他的德文很好。”

同志们,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了我们甚至在和一位优秀的、有名望的、显然当年曾经由于在科学领域里的严肃工作获得了这种名望的专家打交道的时候,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里还有一个评语,是凯林工程师在自己的这个每日的报告里给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的工程师下的。让来自罗斯托夫的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一点吧:

“当地的工程师的观点是非常陈旧的。他们简直就不想发现,时代在前进,战争在国外也引起了重大的变化。有人也对我说过,那里的工程师对各种著作的态度是非常挑剔的,他们的工作是各自为政的。这种现象照我的看法是不能允许的。”

你们看看,这是一个德国的资产阶级工程师说的!凯林继续说:

“当然,不可能在保持军营纪律的条件下完成各项技术工作,但是要知道,存在着许许多多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而且如果有谁要是想干这件事的话,他可以在业余时间里做这件事的。”

最后还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的是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的机关——位于莫斯科的动力工程建设托拉斯。凯林工程师是这样说的:

“我和苏什金教授谈过并且告诉他说,我并不受巴拉赫纳管理局的欢迎。他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指出,管理局并不是反对我本人的,而是根本反对国外的帮助。管理局相信,它自己有能力同样好地完成建设项目。”

但是关于动力工程建设托拉斯还有更离奇的事情,我们可以从凯林报告后面的部分得知:“苏什金教授说,斯图平工程师是巴拉赫纳下诺夫哥罗德区电站<sup>241</sup>的站长,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工程师,是俄罗斯最好的建筑工程师之一。我不能不做出修正,据我所知,斯图平工程师并不是建筑工程师,而是电力工程师。苏什金不愿意相信这一点,于是出现了争论。苏什金去问过了什么人,人家对他说,斯图平工程师作为一个军事工程师,在战争期间曾观察过一些建筑项目,但是现在他是电力工程师。苏什金这时非常吃惊地指出:‘但是要知道他对电力技术什么都不懂,我可以心平气和地证实这一点,因为我是电力工程师’。我笑着反驳他说:‘关于建筑工作他没有任何概念,我可以心平气和地证实这一点,因为我是建筑工程师’。如果苏什金称斯图平是杰出的建筑工程师,在这些谈话之后我可以想象,这里的建筑工程师是怎样的中等建筑工程师。”

而我们,同志们,在干着的是什么呢?我们干的正是建筑,而且还不是什么普通的建筑,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得不用凯林工程师做出了如此鲜明评价的工程师的双手来做这件事,而且更好的我们暂时还没有。

**喊声:**应该公布出来。

**莫洛托夫:**公布出来就好了,因为这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件。

**奥新斯基:**小心点,这样可别得罪了凯林。

**莫洛托夫:**这说得对,应该特别好好地想想一个问题,可以用什么形式和怎样公布这件事。在公布的时候我们不能点名道姓,因为这样会得罪我们的一些专家工作人员,而且这还是我们的优秀力量,我们的优秀工作人员。所以我们应该明白,从我们的技术的科学水平来说,我们是多么无助……

**波斯特舍夫:**谁在教书呢?

**莫洛托夫:**他们同时也在教书。所以我们应该非常严肃地想一想,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是一个什么样极其困难的任务。

现在联系到波斯特舍夫提出的问题,我应该哪怕是用两三句话再说一个问题,而且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这里培养新的科学和工程技术干部的状况如何?原来是,对于所有技术领域的状况来说,此时此刻我们在俄联邦所有的高等技术院校里培养的年轻的科学力量总共是117人,除此之外,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各个科研所里培养的所谓进修生是170个。

**有人喊:**研究生。

**莫洛托夫:**前者是研究生,后者是准备上研究生的进修生。还有非编内的研究生104人。如果把他们都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培养的年轻的科学力



量只有 391 人,而这是为所有工业部门培养的!这是一个可怜的,对我们是可耻的数字!你们还要想到的是,现在的这 170 名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科研院所里培养的人中间,在 1927—1928 年度之前只有 24 人,——只是在最近的一年里,我们才来得及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各个科研院所里多少推动了一下这项工作。而在这之前,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科研管理局虽然早就这样称呼了,在这个领域里并没有干什么“管理”的事。我们年轻的科学技术力量就是这样的状况:

难道还需要证明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已经落后了吗?我认为,无须再证明这一点了。需要承认的是,我们在这里的状况是糟透了。我补充一点,在高等技术院校里,教授们带这些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是没有任何人给予任何报酬的。剩下的就是从这种状况得出结论了,那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不能把培养专家的事情就这样放着不管了!

第三个问题——关于和生产的联系问题,关于我们的年轻专家是不是懂得培养他要去从事的那种生产的问题。

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呢?为了对这件事有个评价,可以从我们的委员会得到的材料中举出许多例子来。我只说很少的一些情况。

还是那个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这里有乌克兰的冶金工程局关于这个学校的教学计划的声明(这份声明不久前刊登在了《贸易工业报》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声明说:

“本局承认培养有发达的社会知识和高水平的专业知识的工程组织人员是该校正确的基本任务,但是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机械系还是化学系的各个不同类别的教学大纲,都有十分重大的缺陷。专门的培训课程不是向年轻的工程师介绍他将工作的那个工厂的情况;对这些课程所涉及的那些生产项目和生产过程的组织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情况介绍得不够充分。”

乌克兰的冶金工程师们的声明结尾有这样一段话:

“本局认为,机械系和化学系的个别课程和课题的大纲应该根据现在对年轻的工程师提出的那些要求重新进行根本的修改。”

这说的是大纲。

现在来举例说明一下,我们的那些从事培养专家的工作人员,从名气最大的那些人开始,是怎样评价这种状况的。我们最著名的专家之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巴赫教授,曾说过,“我们的工业就像你们看到的,还没有成长到科学的高度”。

喊声：这不是巴赫！

喊声：是巴赫，巴赫！

莫洛托夫：同志们证实说这是巴赫说的。巴赫教授无疑是忠于苏维埃政权的，而且无疑是一位专业水平最高的学者，但是他是俯视我们的工业的，而且大体上是这样说的：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人站得高，而你们这些搞工业实践的人没有成长到我们的高度。我感觉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评价。而且在政治局里已经说过了，在某些方面现在更应该说的是，我们的科学没有成长到生产的高度。我们是知道的，在一些部门里，生产是按照国外的样式安排的，有着最新的技术成果，我们也有非常新的设备，遗憾的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技术力量还不是搞得很懂。

而且夸耀说：“我们搞科学的站得如此之高，生产还没有达到我们的高度”根本就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要把生产放在最高水平的科技基础上。同时我们特别需要尽快地和尽量多地使我们的科学力量的工作接近工业。但是我们的学者们往往不明白这个任务，老是尾随着科技思想脱离生产实践的这种在旧俄罗斯存在的不良传统转。

我应该再从这个领域里举出一个例子来。我要引用的是奥萨德奇教授的声明，而且在这件事上，他不是教授，而简直就几乎是一个趾高气扬的人！他是这样评价局势的：

“生产技术上的进步之快是培养生产的技术人员上的进步所不能相比的。由此而来的是，对离开课桌的技术人员的不满意和不断出现高等技术院校毕业的专家不符合工业要求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革命前是这样，革命后也还继续是这样。”

这就是一个非常让人尊重的教授对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为工业培养专家的问题，说出的一个老生常谈的、众所周知的公式：原来是，如果相信他说的这番话，那么过去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而且我们好像就该认可这种情况了！

但是，我们中间任何人都一刻也不能屈从于这种“泰然自若”，更准确地说，不能屈从于这种对“命运”无限度的俯首帖耳。我们应该在这里也用最激进的方式摧毁沙皇俄国给我们留下的传统，而且无论怎样也要能在实际上保障科技和工业的那种富有活力的和日益增强的联系。我们特别必须做到的是，要让那些工作人员，那些有着技术科学思想的工作人员，把握住这一点——能不能提高我们的技术教育事业首先就要取决于他们。

我应该说，我们眼睁睁地看到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自己正在这方面迈出一个个前进的大步。霍多罗夫斯基同志有一篇文章是不久前出版的一本

书《我们的高等技术院校培养什么样的工程师》的前言。他在那里还心安理得地说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现在他自己也已经不会再说的话。这里有霍多罗夫斯基同志的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

“在考察列宁格勒高等技术院校的时候，我们顺便向陪同我们、同时也就是工业和这些高等技术院校的代表工程师提出了一个问题：高等技术院校和生产的联系足够了吗？我们得到的始终是肯定的回答，而且这些肯定的回答马上就有事实加以证实。”

接下来是：

“当我们企图要对高等院校和生产的联系提出问题的時候，人们不过是耸耸肩，他们不懂得这是在问什么——是在问高等技术院校和经济生活的联系有多紧密吗？”

但是应该说，委员会<sup>242</sup>开始是由安德烈耶夫同志担任主席的，后来是C.柯秀尔同志，当我们大家和霍多罗夫斯基同志一起，深入了解这件事的时候，得出的结论是，就是在这里，我们的状况也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这个领域里，党的不只一次的指令并没有完成。这是谁的过错呢？但是就是在这里，如果说过错，那就意味着把事情狭隘地归结为提出问题了。在这里有过错的首先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但是同时也有教育人民委员部。不过有过错的不仅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而且还有党中央，它早就做出了要把高等技术院校和生产联系起来的决定，而且在1925年年底再一次专门强调了高等技术院校必须要和生产密切联系，但是并没有做到保证在实践中执行这个指令所必须做的事情。

应该更详细地说说和生产实践有关的这件事的实际情况。

现在这里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呢？现在的规定是，生产实践继续是平均只有暑假期间的两个半月。生产实践变成了夏季旅游，变成了暑期作业，这与大学生要掌握生产情况是一点也不相符合的。我有列宁格勒州国民经济委员会有关一些工厂的材料。这里的生产实践有多长时间呢？这种实践有的时候只有一个月，非常少的情况下是4—5个月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而平均是2—3个月。这是在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已经做出决定要把这种时间持续10个月<sup>243</sup>并且要让它不单是夏季的休息，而要是真正严肃的生产实践之后。这个关于10个月的生产实践的决定并没有执行。

把在这件事上的所有罪过都推到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身上，是愚蠢的。但是也不能是闭眼不见在这件事上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我从生产实践方面的许多可

笑的事情中举出一件事来。有一个大学生在《红色大学生》杂志上对自己的夏季实践写了这样的情况：

“形成了一种并非干事情的气氛,导致的结果是,学生们成群地从作坊里跑了出去,有一些人到了作坊里,在工作开始之前挂上了自己的工作号码,就回家去了,只是在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冒出来,为的是取下自己的号码回家……或者是好一些的:三五成群地走到作坊所在地上堆着破机车的地方,‘集体躺下’睡觉去了”(沃罗涅日交通中等技术学校——《红色大学生》杂志,1927—1928年度第7期,第61页)。

这就是沃罗涅日交通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们的生产实践。生产实践能给这些人什么东西呢？

**柯秀尔**：而且还该加上,这所中等技术学校是属交通人民委员部管的。

**莫洛托夫**：是的,这所中等技术学校是属交通人民委员部管的。但是问题不在于是哪个部门负责,而在于我们这里有许多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应该对它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这个任务只是通过加强经济机关在教育人民委员部、该部的职业教育总局等等地方的代表性就能够解决吗？不行,这是不行的。这样做是一种对待困难任务的官僚主义态度,这是无助于事的。这种办法应该能起一定的作用,但是要想争取得到根本改善,要想在这件事上把杠杆转过来的话,我们不能只限于加强经济机关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各个机关里的代表性,而是需要在这里,在实际上有着活生生的联系,和这些机关共同工作。

最后,第四个问题——关于我们的高等技术院校的构成。

它现在是不是能够保障培养出的确是红色专家呢？我感觉,基本上我们正在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个任务,虽然这里也还需要有很大的改善。在俄联邦的高等技术院校里现在有42%的工人,在乌克兰是48%；在俄联邦共产党员占24%,在乌克兰是16%。在中等技术学校里,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工人子弟和工人在俄联邦占32%,在乌克兰是44%；共产党员在这两个地方都是占6%。我们所有的干部越来越多的是出身于工人,除此之外,在高等技术院校里,共产党员的比例在增加。做到最后这一项也就是相当大的成就了。我们应该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但是基本的路子已经走出来了,基本的成绩已经摆在面前了。

就是在这方面,我们也还是有缺点的。这就是工人子弟的状况。如果说通过工人速成班我们让工人大量地进入了高等技术院校的话,那么工人子弟入高等技术院校的情况就非常不好,因为高中并没有能适应这种状况。例如,莫斯科

高等技术学校的所有学生中,只有2.7%是工人子弟。在我们的共和国里,这种状况实在是不像话的,我们应该立即加以消除。教育人民委员部明白这一点。这里主要的事情是要让高中能够跟上。必须要创造一系列专门的简便措施来培养工人,特别是工人子弟,保障他们有可能进入高等技术院校。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就像克里尼茨基和И.柯秀尔同志在调查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时搞清楚的那样,要想进入高等技术院校,往往要花费100、200卢布,有的时候是400卢布。另外,对高中的毕业生进行补充培训,而这是工人负担不起的。这种状况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进行急剧的改变。

从政治工作的角度看,高等技术院校的状况也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我们的大学生组织从事的主要是行政方面的事情,大学生中间的群众工作做得不好,在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没有党的领导。我们应该也要极大地改善这种情况,因为这里的状况显然是不好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措施来严肃地推动专家的培养工作呢?

整个决议说的就是这些措施。

委员会规定的和得到政治局赞同的措施<sup>244</sup>涉及了这件事的各个基本方面:加快专家培养的速度,提高这种培养的科学水平,加强这件事和生产的联系,为大学生创造相应的学习条件。所有这些加上改善大学生的社会构成的进一步步骤,是在高等技术院校里保障培养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红色专家干部所必需的。

在苏联的情况下,有着极其良好的条件达到这里提出的目标,保障我们需要的对红色专家的培养。整个这件事掌握在国家的手里;所有的科学力量都是由我们支配的。我们在经济上变得强壮了,我们的高等技术院校的学生的社会构成是好的。我们现在有可能从国外得到我们的高等技术院校所需要的教材等等。我们的高等技术院校和生产的联系可以轻松地确立,因为两者都是在国家的手里。现在,我们的高等技术院校的在校学生数量已经比战前多出了1倍。最近这些年成立了一系列新的院校,建立了一系列新的、以前在俄罗斯没有的系。一句话,我们有了一系列极其良好的条件,可以争取在最近的时间里从根本上改善这件事的状况。我们只是应该真正把这件事抓在自己的手里。

但是也应该说说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劳动交易所里登记的失业工程师有2500人(也包括农业类的)是最近两年毕业的。这种情况该怎样解释呢?一方面我们非常缺乏力量,“实际工作者”在工业的各种技术职位上占有了39%,而另一方面是2500名最近两年毕业的失业的工程师!如果只是而且首先是用他们不想到地方上去来解释,那么这就太表面化和不正确

了。当然,这里基本的原因在于对他们的培养和工业的需要不对口。如果这是工业需要的那些技术力量,他们就能在生产中找到位置。这是第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第二,在这个可悲的事实中也有劳动人民委员部的过错,它没有能安排好年轻专家们的分配工作。最后,问题还在于我们的地方上对年轻工程师的工作来说,物质条件非常差,所以他们不到地方上去。什维尔尼克同志说得对,年轻的和相应培养起来的专家们的物质条件,特别是在地方上,是需要严肃地加以改善的。

现在我来说一说高等技术院校的物质基础。

政治局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在这个领域里通过并于现在提交给全会批准的决议<sup>245</sup>,是能够改善培养我们的专家的整个事情的物质基础的。这中间有一系列的措施:提高助学金,特别是针对高等技术院校的;严肃改善教师的状况,特别是在高等技术院校里;扩大对设备、建筑、学术出差的拨款,等等。所有这些(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拨款一起)将能大体上比去年增加5500万卢布。如果除去助学金和教授们的工资问题的话,那么像设备和建设这些已经荒废到了极点的事情,今年得到的拨款是去年的4.5倍!这是一个重要的和非常大的变化,这是改善整个这件事的基础。

除此之外,政治局规定了<sup>246</sup>对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基本工作的拨款要相当于对国民经济领域里的基本工作的拨款,把用于这些需要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耗费转移到预算的全联盟部分上去了。这样就保障了对技术教育的资金投入是严肃的,和对我国工业基本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成分一样。

今年我们显然是没有能力在这个领域里再进一步扩大开支了。我们给出的是最大限度了。自然很明白的是,必须要正确使用这些资金,党要十分重视地关注整个这件事。在我们现有的国家资源的条件下,我们已经最大限度地迈进了,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给最初级的教育增添的不该比这少。否则的话,人民教育事业就显然是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事业衔接不上了。

同志们,请你们批准的决议当然没有完全把安排技术教育的问题都包括进去。这个决议是从当今状况的角度写的,而且同时它的方针是要极大地改变高等技术院校现有的状态。但是在当前培养专家这件事上的基本问题,决议强调得很清楚,而且照我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实现决议提出来的实际任务,物质基础将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问题不仅在这里。我已经引证了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他写道,对于高等技术院校来说,正是这件事的物质方面具有主要的和几乎是绝对的

意义。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这个声明有夸大的地方和明显的片面性。如果不能极大地改善事情的物质状况,我们当然就改善不了高等技术院校的状况,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改变教育人民委员部本身工作实践中的某些东西。而且在这里,我想说说一些考虑不周的地方,遗憾的是,这在现在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典型情况。

有两个例子说明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考虑不周。

我已经说了,我们早就应该哪怕是开办几个新型的、缩短学习期限的高等技术院校。但是你们问问看,教育人民委员部是怎样对待这项任务的呢?它至今还没有明白这项任务,至今在这个问题上还在坚持不仅是保守的,而且简直就是反动的观点。既然决议指出了在安排培养专家这件事上存在保守,那么教育人民委员部最终也该自己承认,在它的工作中存在着保守主义是事实,可是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不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需要马上就把现在所有的培养专家的组织都打破。而且相反。在这里,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这个领域的创新,只是我们应该严格地把我们想要推行的那种新的做法考虑周全,而不是又害怕新的东西,特别是不能允许害怕那些新事物,因为它们正在高等技术院校的生活中为自己开辟一条独特的道路,而且在国外实际培养专家的工作中,这些新事物已经得到了良好的结果。在我们这里,和技术先进的国家相比,当然是要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吸取最新的东西,因为我们更落后,而且更尖锐地感觉到缺乏专家,特别是那些“专业面窄”的专家。

联系到这一点,我不得不说说卡甘-沙布沙伊学院的例子。

这个学院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的,但是没有得到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任何钟爱 and 任何支持,而且可以说是“从另外的方面”得到了所有这一切。这是很容易证明的。卡甘-沙布沙伊学院是一个怎样的学院呢?它的任务是培养电机制造业和电器安装业工程师,他们要很熟悉生产,而且需要在最短的期限内培养出来。这个学院的学制直到最近一直总共是两年,而且每个星期学生都要有四天从事生产,两天在学院里。从学院里毕业出来的是知识面很窄的专门人才。不可能拿他们去和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出来的学生相比,也就是说,不能和那些受过广泛的科学培训的工程师相比。当然,他们的科学水平要低于那些比如说是从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毕业出来的专家。当然,两年的期限也是不够的;至少需要在这个高等技术学校里学上3—4年才行。一个星期只有两天在学校里上课,而其余的四天学生要从事生产,这样太极端了。要把事情办好,可能是该倒过来:两天让学生从事生产,四天留在学校里,或者至少是两个地方各三天。做这

样的改正是有可能的,也是适宜的。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样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那就是卡甘-沙布沙伊学院就是处于这种状态的,学制是两年(而在实践中的教学年限是两年半),已经为工业培养出了几百名有专业知识的专家,他们的专业面狭窄,但是,这是现在非常珍贵的专业。该学院是不是真正培养出了这些专家呢?我自己就不评价这一点了,而且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在这件事上也不是专家,而工厂和托拉斯的经理们说,这是些用得上的专家——专业面窄,但是需要。他们中间没有失业的工程师,在劳动交易所里没有一个是卡甘-沙布沙伊学院的毕业生。现在已经就有经济机关在向卡甘-沙布沙伊学院要人,而且一部分是还没有毕业的学生。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是大好事!遗憾的是,至今教育人民委员部还不明白这一点,而是在傲然地看待这件事:按照它的意见,这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人,这是技术人员,这不是工程师,你们看,他们“还没有长大成人”呢。

**伏罗希洛夫:**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是真正的工程师。

**莫洛托夫:**我不能说这是一些全能的专家,但是可以说这是我们需要的专家,这对我们来说,就对生产的工程技术领导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帮忙了——在我看来,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只有非常保守的人,只有光是向后看而不向前看的人才会发现不了生活中存在的东西。我认为,卡甘-沙布沙伊学院的经验如果能做出相应的改变,应该是也可以在一系列其他学院里采用的——首先是在建筑和纺织中等技术学校里采用,那里对专家有着特别迫切的需求。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做下去,而对教育人民委员部,我们应该无论如何也要说服它、鼓动它或者“说动”它,要争取让它能积极地对待这些新的实际措施。

这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改进对专家的培养这件事不仅取决于物质条件。

第二个例子是把几所高等技术院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这件事。

如果说到教育人民委员部,那它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不仅是不能允许的保守,而且是狭隘的部门主义。在过去的全会上,这个问题变得有些尖锐了,但是这绝不是事情的实质引起的。这个问题没有必要作为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提出来,这是一个实际问题。谁都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把职业教育总局拆散,要把它取消。

**斯克雷普尼克:**而你们自己在拆散它!

**莫洛托夫:**如果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哪怕只是对工业的高等技术院校成立一个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职业教育总局,而不是今天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



职业教育总局的话,那么,这在现有的条件下也是一件冒险的事。现在我们未必已经准备好了推行这个措施。我们应该要更慎重得多地对待这件事,但是事情总是不能老拖延下去。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现在说的不是要承认一个原则:所有高等技术院校都应该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而是说纯粹从实际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来。应该承认,只用一个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双手,而且要快速地改进这件事,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应该把其他的机关也吸收进来干这件事: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吸收进来。

为什么就不能把几所高等技术院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呢……

**斯克雷普尼克:**干什么要这样?

**莫洛托夫:**为的是让它们和生产联系起来,要争取最快地让我们的新专家们掌握最新的国外技术的所有成分,而和这些新技术打交道的,现在正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而不是教育人民委员部。还有,最后一点是为了让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能够给出一个新的速度和在这件事上引进国外的经验,帮助教育人民委员部改造和极大地改进整个这件事。在这里的确应该说“期限已经到了”,绝对不能再拖延根本改进培养红色专家这件事了。

**斯克雷普尼克:**说得对!

**莫洛托夫:**所以,除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外,也应该吸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参与这件事。让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所有高等技术院校的4/5。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整个培养专家的系统都改造过来。但是就让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也来在这件事上帮助教育人民委员部,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全党的监督和观察下,为这件事带来新的成分吧。

**斯克雷普尼克:**可是决议里的什么地方说到了这一点呢?

**莫洛托夫:**在决议里说到教育人民委员部从方法上和规划上进行监督和领导的地方提到了这一点。

甚至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也曾迈出过冒失的一步。1920年颁发了把所有高等技术院校转变成3年制的命令。<sup>247</sup>在形式上,这个命令的这个部分并没有废除,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采用它,因为很快大家就都明白了,这一步走错了。这是企图要一下子,顷刻间,就把整个事情都完全毁掉。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最后的几篇文章里不是没有缘故地说道,现在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建设的期限和速度问题,现在,我们在当年碰了这项工作中的

许多钉子之后,学会了更好地对待实际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进行激进的改革的话,那么,如果我们除了教育人民委员部,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作为新的组织者吸收到这件事中间来,是不是会有好处呢?当然,好处是会有有的。在有了这样的决定的情况下,是不是能够吸收新的力量、新的资金和新的经验参与这件事呢?是的,是能够的。我们应该保障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的统一,不能允许对高等技术院校进行各种没有经过周密考虑的实验。但是当前在这件事上,新的成分的注入是缓慢的、不顺利的,没有应有的速度,而且这绝对不符合无产阶级国家的迫切要求。所以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现在一定要不仅利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力量,而且要利用我们的经济机关的力量。害怕迈出小小的一步来加快培养新专家的速度,改善他们和生产的联系,加强把国外的科学技术经验转移到我国的工业上来,害怕为此迈出一点小小的步子,害怕做某些改革而不是事先就决定要激烈地把整个事情都破坏掉,这是不正确的,而实际上现在要做的事情涉及的就是小小的一步。可能在经过了一两年或者五年之后,一切又都要还给职业教育总局了,但是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可能想象是这种情况,那就是职业教育总局在那个时候将已经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它自己也将得到激烈的改造,而且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和所有的基本经济任务联系在一起了。但是如果由于有了这样的预料,我们就放弃政治局的决议建议进行的、绝对已经成熟了的改革的话,那么我们就将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的那种人了:“在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所有领域中,我们是‘极端’革命的。但在尊敬上司,遵守办公的形式和礼节上,我们的‘革命性’往往被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取而代之了。在这里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极其有趣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的跃进和对极小的变革令人吃惊的畏怯两者兼而有之。”<sup>248</sup>

我们应该考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个意见。而且如果一方面我们应该防止在这部复杂的机器里立即进行激烈的破坏的话——更准确地说不是是一部机器,而是整个一个大型机械,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立即着手严肃地改进这件事,我们应该把新的力量吸收到这里来,并且要推行在改进这桩事情中的竞赛原则,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经济机关之间进行竞赛,当然是在党的监督之下。我们应该而且有义务做到这一点。

应该指出的还有两点。

第一,和现在正在从事生产的实际经济工作者及工程师的再培训有关的各项任务,决议反映得很少。我们这里有红色经济培训班,不仅是在莫斯科,但是

我要承认的是,对于我来说,要说我们这里好像在各个省城里已经有了完整的红色经理培训班网,这倒是一件新鲜事。我们需要把这件事抓起来,开展起来。我们这里也有对现有的工程师进行再培训的培训班。现在有5个培训班,规定了要组织56个新的培训班,现在要能够对在工业领域里工作的2500名工程师进行再培训。

但是,同志们,整个这件事是用手工作坊的办法进行的,这里没有国家的计划,也没有系统的物质帮助,没有用科学的方法锻造这件事。而我们是应该在这个领域里迈出更坚决的步伐的,我们这里已经有不少非常出色的工厂和托拉斯的领导人从这些人中间成长起来了,但是这些人极其需要从技术上和一般理论上提高专业水平,需要向这项事业投入资金,给从事实际工作的经济管理人员提供长期的休假。我们在过去的全会决议里把一部分经济管理人员骂成是“坏政委”,而且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在给许多经济工作人员做出了这样刺人的评断之后,党有义务尽一切可能让他们中间的那些优秀的干部,那些在我国的经济中工作得很出色的人有可能(比如说有长的假期)来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他们应该一定要有空余的时间读书,特别是读有关技术方面的著作。为此,我们应该促进为经济工作人员建立相应的物质条件和一般的生活条件,这不仅不应该导致他们脱离工人,而且应该能够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可能更多地关注把工人吸收到生产管理中来。那时,现在的这些无产阶级的优秀经济管理干部就将会真正成为我国经济的红色组织者,并且率先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出色的组织。

还有一件事。

在过去的全会上,我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说过的那样解决专家为苏维埃政权工作的问题,不仅是用资产阶级的方法,而且要用无产阶级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对我们都还是绝对需要的。我们需要“资产阶级的方法”,也就是说用相应的高工资等等办法,在工业中和在我国经济的所有领域里吸收专家来工作。但是我们也需要用“无产阶级的方法”,也就是说,为资产阶级专家的工作创造这样的条件,要保障对经济的所有成分进行应有的、无产阶级的统计,在所有这些事情上都要有广大的工人群众参与,这是和无产阶级的公众舆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和展开生产会议的工作,和加强工会在工程技术人员中间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必须把我们的专家提高到新的社会水平上来——已经该在这个领域里取得重要的成绩了。上述两种办法都是正确的,而且在现在的条件下,都是我们所绝对需要的。在过去的全会上,我强调了必须要加强对工程师干部施加影响的无产阶级的办法。我就是现在也还是坚持一种观

点,那就是必须要更鲜明地强调这一点,而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非常少。在这里,特别是工会,还有党的组织,应该通过基层的生产会议——首先是通过工会——从总体上展开巨大的工作。

关于专家的物质状况说几句。这里有一些做得非常不好的地方。

在我们这里,总的来说,对高级技术工作人员的物质保障是令人满意的,而且从提高工资方面来说,除个别情况外,特别是对外国工程师,我们在这里未必能再做出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而且凯林工程师根据自己的观察也看到了,对于高级技术人员来说,和德国的工资相比,我们的工资是令人满意的,而且并不认为必须要提高了。但是,我从了解到的情况得出的一种完全坚定的信念是,对于中级技术干部来说,我们这里的物质保障状况至少在某些情况下绝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于年轻的科学工作者的物质保障状况也非常不好,这再一次表明,我们,我在这里指的是党的干部,是落后的,而且普遍还不理解高等技术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极大地改善这个领域里的状况——在我看来,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在翻阅高等技术院校的材料时,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原来从莫斯科交通学院,也就是这里的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毕业的的大学生中,只有1/3的人是留在交通部门里工作的,而2/3的人分散到了各种其他的经济机关中去了。不仅是这样。原来我们这里有这样一条铁路,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是叶卡捷林宁斯卡亚铁路,在那里,两年里有57%的工程师离开了工作岗位,——而我们却在容忍这种情况的存在!怎么解释这种状况呢?对这种状况的解释完全是因为交通人民委员部对工程师干部的物质状况问题采取的是一种完全不能允许的态度。

有人喊:还有就是老的工程师对年轻工程师的指手画脚。

莫洛托夫:当然是这样的,但是在这件事上,这是次要的问题了。交通人民委员部在中级技术干部的物质待遇上犯了错误。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但是,所说的这些证实了我们在交通业上对我们专家的非常典型的状况,正是在那里,如何对待专家的问题表现得非常之尖锐。

我要说完了。我们在决议里没有涉及许多高等技术院校状况的一般性问题。从一方面说,不能把高等技术院校的状况和整个高等院校的状况分开;从另一方面说,也不能和高中的状况分开,这也是对的。高等技术院校的问题超出了它们本身的范围,涉及到了高等院校的一般情况的时候,我们没有涉及与这种状况有关的问题。例如,对高等技术院校的管理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应该是联

系到对高等院校的管理的一般性问题把它提出来的,因为我们的高等院校常常是至今还是处于大学生组织的手中。年轻人自己在高等院校里,也包括在一些高等技术院校里“发号施令”,这还是常有的情况。有的时候,就是好的技术院校,实际上也是由学生们在领导的。但是在我们这里,职业教育管理总局的管理体系还是如此脆弱,甚至生产实践至今通常还是处于学生的领导之下!由于这种状况,应该学习的那些人自己在管理自己学习和生产实践等方面的状况。

**柯秀尔:**而且甚至是在授课。

**莫洛托夫:**在学生学习的那些高等院校里,至今有些学生自己还是社会学科的教师。这不是学生们的罪过,不是学生组织的过错。但是这种状况使得我们这里成了现在学生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行政机构,但是群众工作做得并不好。当然,关于大学生组织在高等学校的管理中的作用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所以在决议里,这个问题可能只是部分地提到了。

我在结束的时候特别想要强调的一点,那就是工业中的共产党专家干部的状况怎样。目前我们遇到的状况是这样的。在高等技术院校里学习的人中间,现在有22%是共产党员,11%是共青团员,也就是说,在现在的各个高等技术院校里,有1/3是共产党的。但是,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所有在编的研究生中,共产党员只有129名。在这里,我们的阵地明显没有年轻的干部作保障。还有一个例子:在苏联的所有企业里,共产党员工程师总共有138人,而如果再加上经济学家,那么在工业领域里工作的共产党工程师总共只有大约200人。这就是我们确实很可怜的共产党阶层,在老专家的海洋里,他们就销声匿迹了。我们的革命已经有11年了,而在整个工业领域的专家中,我们这里只有共产主义的沧海一粟。这种状况能继续容忍下去吗?当然是不能容忍的。我们能不能极大地和迅速地改善这种状况呢?是的,当苏维埃在苏联执政了11年之后,我们如果推行现在规定出的这些措施的话,是能够极大地和迅速地改善这种情况的。

对于我们来说,清楚的是,技术和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彼此分割开的。所以应该认为,坚决地扩大共产党员专家在领导生产的专家整体中的比重是党的最终任务之一。如果说我们已经学会了为党的、工会的和合作社的工作培养干部的话,——无论说现在还多么需要把这项工作的水平提高!——那么,我们的共产党员技术干部的状况简直就是非常糟糕的。党不能再继续允许这种状况存在下去了。现在总的来说,从年轻人中间和通过对现在的经济管理工作人员进行再培训来培养无产阶级专家这件事,是共产主义的基本事务,是最尖锐和最重要的一件事了,可以把它称为建设者干部的问题,社会主义的组织者干部的

问题。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要说说关于日程的问题。

**Г. И. 彼得罗夫斯基**：同志们，我们的全会好像要拖延了，所以也许可以规定这样的计划，今天晚上一定要结束会议，哪怕是到4点多钟。

**主席**：登记发言的有12位。我想，在午饭前结束是困难的，不得不在晚上结束了。

**喊声**：减少发言人名单。

**主席**：如果是在午饭前结束，那就应该或者限制发言时间为5分钟，或者是发言者的名单砍掉一部分。彼得罗夫斯基同志的建议可以归结为晚上不再开会了。谁赞成晚上不再开会了？大多数。谁赞成晚上开会？少数人。

**瓦雷基斯**：我建议要么开到4点，要么如果做得到的话，最多开到5点。

**主席**：全会不能这样做：“如果不是到4点，那就到5点。”表决建议：把这次会议延长到5点。谁赞成到4点？大多数。谁赞成到5点？少数。那就开到4点半吧。（笑声）

（休息后）

**主席（李可夫）**：同志们，现在登记要发言的人已经不是12个人，而是14个人了。我们剩下的时间是两个半小时。

**有人喊**：每人5分钟。

**主席**：程序规定10分钟。请严格掌握在10分钟内。如果有谁需要更多的时间，全会可以给他延长。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发言。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们，虽然我想作很短的发言，不想把讨论拖延下去，但我还是请求给我半个小时。我想，这总不算是太多了。

**主席**：表决。谁赞成给卢那察尔斯基同志30分钟？大多数。程序完成了。（笑声）

**卢那察尔斯基**：我想，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可能对它在自己的上一次会上通过的决定是完全满意的。当时我们想有些匆忙地把一定数量的高等技术院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管当时是不是这样做了，如果当时已经通过了最后的决定，那我们就不会有现在所有的这种委员会对高等技术院校状况详细讨论的结果了。至少是，无论从什么角度说，得到的是很大的好处：和以前相比，党更好地了解了我国建设的这个极其重要的领域里的状况，而且我们做出了一致的决定，它包括了向全会提出的9/10的决议。无论如何，无论还有争论的那

些细节解决得怎么样,不能否认的是,这个决议将是培养专家的事业大大前进的一个起点。

在仔细研究专家培养这件事的情况时,我们得出了一系列共同的结论,比如说,我们确认,在我们这里既没有一个确定的计划,提出完成我们的经济建设五年计划总体上需要多少工程和技术方面的专家,也没有一个多少比较确定的方针,说明各种不同部门的工程师和技术员的分配该有怎样的比例。

莫洛托夫说的完全正确:问题不在于是谁的罪过。该说的并不是这个。完全必要的是,要争取让我们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我们的其他要人单位一起着手,详细地制订计划,而在这些要人单位中间,有些单位在制订要人的预约计划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同意莫洛托夫同志说的,这是一项令人头痛的任务,它所基于的那些材料,有2/3是我们不了解的,我们多少有些处于黑暗之中。但是就是在黑暗之中,也还多少能够触摸到局势,不致自己撞头、盲目行动。也只有有了这样的制订计划的方针的情况下,可以认为,我们在额头上碰出这样的包将会是有限的。

谁也不会怀疑,从理论上说,教育人民委员部非常懂得,安排生产实践的任务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引用证据来证明,如果不是依靠实践,任何教学也不可能内容丰富,实践应该在发展的所有阶段上都和理论教学联系在一起。这个论断是我们的 credo(信条)之一,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针对着我们的这种说法,人们说我们是在搞封闭,我们有些在凭空设想地提出问题。只是在最近,经济管理人员才开始反复地说,我们长期以来所说的话是安排好人民教育事业应该提出的基本要求。他们开始说:回到综合技术学校上来吧。他们在这里得出的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但是问题在于,回到综合技术学校上来将需要大量资金。我说出了这样的担心,认为这项任务是我们承担不了的,而且引起了共青团的一些不满,它认为我没有足够地相信我们在这件事上的建设力量的威力;但是我还是在想,我们将要慢慢地走向综合性的技术学校。

但是,教学问题和活生生的实践相联系的一般原则一直就是我们坚持的原则,而且这个原则是无可争议的。我们总是希望,而且现在还是希望贯彻这个原则。我不想去搞部门间的争论,并不想证明国民经济委员会不懂得通过实践培养专家的必要性,根本就忽视了关于通过实践来培养专家干部的问题,甚至在有了人民委员会关于10个月的实践的决议之后,我们也没有能从他们方面得到足够的回应,至于说对这件事这样不关注的态度,有一个例子是说明这一点的,那就是莫洛托夫在这里引用的一个十分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它说到了大学生的暑

期实践是怎样利用的。这个例子涉及的是交通人民委员部管的中等技术学校,实习是在铁路车间里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同样属于交通人民委员部的企业里搞的。如果这个部门不能像样地安排好自己的学生的实习的话,那么,你们就可以理解了,对于教育人民委员部来说,这就要更困难得多了,因为正确地安排好这件事的所有条件都掌握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手里。我们大家,搞生产的人和经济管理人员以及我们,共同得出的是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不能再容忍这样的状况存在了,实习应该实事求是地搞,实习应该更广泛,它应该和理论教学衔接起来。这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自己办不到的,也是教育人民委员部自己办不到的。这个任务只有通过有关的主要机关经常协商和监督,只有通过这些机关共同努力,才能够解决。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正确地安排实习。实习是经济活动,这是让一个年轻的专家进入到经济企业的环境中去。但是另一方面,在实习的时候,学生还要继续自己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他是在这种实习中学习还是在游手好闲。

最后是关于物质基础的问题。莫洛托夫同志抱怨我说,我们多次对这件事上越来越可怕的情况发出信号是在小题大做。但是他自己也未必对这件事的状况能够说得更轻松些。他没有说这种状况越来越可怕,但是他说,我们在这件事上的落后是魔鬼式的,说这件事的状况很糟,这里显然是一塌糊涂。谁不明白,成绩和教学,还有得到需要的专业技能,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取决于学校的设备呢?目前最大的好处是,党自己对这种状况的评价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很穷,用于培养专家这件事的资金所占的比重,对培养专家、培养我国经济的组织者这件事给予的关注,小得不像话了,非常糟糕,是根本就说不过去的。

**莫洛托夫:**问题的实质并不在这里。

**卢那察尔斯基:**我没有说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此。我说的是实质是什么。但是,物质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不相信那些已经允诺的、伟大的和丰富的怜悯能够完完全全地落实,但是我们知道,在通向我们的高等院校的路上,有多少重要的物品丢失了,甚至是被盗窃了……

**柯秀尔:**是从一个不好的马车夫那里盗窃的。

**卢那察尔斯基:**任何一个马车夫都可以把嘴给他堵起来,把他扔到树丛里去。我们曾不只一次地成了盗窃的牺牲品。我要说的是,现在即便是我们的马车能够完完整整地到达目的地,我们的高等技术院校也不可能得到资金的保障,可以让我们骄傲地说,我们至少是把它们摆在了西欧院校的水平上,所以可以要求它们造就出能够帮助我国的工业赶上西欧工业的工程师来。但是我完全同意



莫洛托夫同志的意见,而且我并不想要求有任何增加,因为我知道,在我们今天的条件下,为了把不正确的预算路线拉平,已经花费了很大的力量,而且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我只是关心一点——让我们不要再进一步挨宰了,因为向你们提供的数字,对照委员会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已经是被砍过的数字了。政治局不该完全接受这些数字。

我现在不去细谈历史了。现在事情就是处于这样的状态。从已经阐述的观点看,我认为,这个决议有一个很大的长处;但是遗憾的是,如果这不是一桶,那也是一定数量的蜂蜜,可是委员会也浇进去了相当数量的焦油。它所接受的决议中的这一点,是和所有的原则,和我们进一步工作的所有前景背道而驰的,而且最终是要破坏我们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关系的。所以,就让人们去说我们保守,说我们本位主义吧(我们并不怕这些绰号和定义),至少我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要确定,从实际上和原则上说,这个问题的解决都是不正确的。如果你们认真地读读决议的话,那就能马上看到,有一段话说,为了积累和工业联系的经验,和为了加速培养专家,有必要把6所高等技术院校和6所中等技术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2所高等技术院校转交给交通人民委员部管理,把它们从教育人民委员部分离出来。这一条就是从这个基本原则派生出来的。论证并没有联系到决议里所说的东西,而是单独存在的,而且所有的一切都归结到这一点上了。是应该试图加速培养专家,而且应该积累和工业联系的经验。我要确认的是,如果培养专家的事情完全留给教育人民委员部来管的话,压缩学习期限的条件和积累这样的经验的条件绝不会有什么损失。

请允许我简短地反驳一下主张决议中阐述的那种观点的权威拥护者们引用的所有基本论据。

第一,在两个部门之间建立起一种竞争有好处;可以让它们每一个都自己发展那些委托给它们的高等院校,这样可能会更出色。在这种条件下,这个原则是一个致命的原则。为什么呢?我们刚才得出的结论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应该关心的是培养所有的专家,因为没有工业方面关注的态度,这件事就不可能得到推动。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自己的范围内有足够数量的高等院校,如果它在这个领域里得不到这样的支持,如果在这件事上不能投入足够的精力和力量的话,那它是不可能向前推进的。一个人如果哪怕是不仅多少知道政治心理,而且也知道人的通常的心理的话,他就应该明白,如果你们说“高等技术院校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手里比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手里会发展得更好”,那你们怎么能要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去全神贯注地把自己的院子、自己的菜地看好,和

邻居们去竞争,在自己这里培养出尽可能好的果实和蔬菜来呢?无论如何是不能这样要求的。这样一来,就会使得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的最为友好地和最为协调地工作这样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在所有方面都受到威胁。克拉瓦利同志在这里也总是这样说到这一点的。但是难道我们在什么时候否认了在所有方面都需要一切高等和中等技术院校和相应的地方工业企业之间建立联系吗?如果我们一直都在争取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又为什么要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点上,错误地评述这个问题呢?有人说:除此之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应该关注的只是6个高等技术院校,而且是有必要特别关注它们,而且竞争可以使得他们得到比留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里更好的发展。这算是什么呢?照我的看法,这是一种毫无用处的、破坏组织的想法。我要说的是:尽管我们有愿望,但是无论是谁来领导教育人民委员部,是斯克雷普尼克同志也好,古比雪夫同志也好,或者是另外的什么人,尽管我们有愿望,如果你们把竞争原则作为基础的话,那我们就不可能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建立起真正亲善和友好的关系来。那时它们各自都会是按照党的命令彼此赶超,而且最后是把马儿赶得筋疲力尽。

**李可夫:**那就要换马车夫了。

**卢那察尔斯基:**是的,如果过了一年之后你们说:6所高等技术院校应该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转到教育人民委员部去,那就更糟了,而且如果你们在把这些马都饮坏了,把它们的脚都搞坏了之后再这样做的话,那就特别不好了。

第二个论据。有人说:这件事很难,这件事很复杂。需要把这件事交给两个人民委员部来做。这个考虑乍看上去好像是好的,而且是非常正确的——一个人的脑子好,两个人的脑子更好,但是党为什么就不能给教育人民委员部派来相应数量的人,不是给两个,而是给22个最优秀的、一流的工作人员呢。能不能说因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状况根本就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它的基本建设搞的甚至不能打3+,而教育人民委员部有高等学府,可以培养所有领域的专家,为了保障建设,应该把一部分这样的专家从教育人民委员部抽调出来,转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呢?我丝毫没有意思要自己作为苏维埃的甜点师,却要去缝苏维埃的靴子。

**有人喊:**这样是不严肃的。

**卢那察尔斯基:**不,同志们,这是非常严肃的,如果说你们搞不明白这种思想的全部严肃性的话,那是非常可惜的。我要说的是,我们这里到处担忧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和困难,但是我要说,我们从来都不是从这样一个原则出发来改善工作

的:从一个部门、一个领域里把一部分抽出来,拨给另外一个实际上不应该管这件事的部门。

**莫洛托夫:**千万别这样!

**卢那察尔斯基:**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可是你们正在这样做,你们从教育人民委员部里把相应数量的单位抽了出去,给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并且说是给我们减轻负担。我所要反对的,正是这种“减轻负担”的原则。可以这样说,在原则上,教育人民委员部应该把整个教育事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是从人员的组成上说,它是脆弱的。那就改变一下教育人民委员部吧,在这里安排有足够教育水平的人,但是不要把一个完整的事情扯成两个部分,而且还是在竞争的条件下,这种竞争肯定是有害的。

第三,有人说:我们应该利用所有条件来加速大学生完成课程的速度。我不知道,为什么莫洛托夫同志没有提到,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我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谈到我们的委员会里曾讨论过的一点,对于一个客观的人来说,这一点表明了,如果要想争取的确缩短教学期限,应该怎样行动。是的,在我国,往往在高等技术院校里要待上7年,但是,通过对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和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的调查,可以确定,也有例外的情况。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有一定数量的大学生是5年毕业的。这是些什么人呢?这是得到了邮电人民委员部支持的那些大学生。邮电人民委员部给他们很多的助学金,于是他们无论是有力量的还是没有力量的,凡是得到了更多钱的,都在5年内毕业了。可能这是独一无二的情况吧?不是的,同志们。在其他的高等技术院校平均是7年毕业的情况下,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是5年。为什么呢?因为交通人民委员部给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的学生很多助学金,甚至考虑到他们的家庭状况,等等。如果医生医治病人时看到,病人吃了这药见好的话,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寻找其他的药呢?这里也是这种情况。凡是拿到助学金的都是5年毕业的,而在没有助学金的地方,毕业的年限就延长到了7年。能不能规定少于5年呢?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的是真正的工程师,那就不能这样做。西欧的经验(当然还有些不大清楚的地方)证实了这一点。在最近的3—4年里,德累斯顿大学、慕尼黑大学以及其他一些学校,都把自己的教学从4年延长到了5年,因为他们认为,在这样短的期限内,他们培养不出工程师来。当然,要看是把什么样的人称为工程师了。在英国是把任何一个冶金工人都称为工程师的……

**奥新斯基:**在美国把任何一个司机都称为工程师。

**卢那察尔斯基:**是的,在美国是把任何一个司机都称为工程师。可以随便把

什么人都称做工程师,但是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培养出我们现在作为干部需要的这种工程师。我要向你们指出的是,整个世界的工业已经进入了一个进化的、突变的时期,所有的办法都在迅速地改变,所有的时间都要进行再学习,而用莫洛托夫同志的话说,我们是落后得可怕了,而且在我国,合理化和改革的过程应该是进行得快得多。这里将要进行一系列的实验。我们的教授们说,一个理论家通过参加生产,可以在一定的年限内把任何一种实践研究透,但是在不能足够地了解基本的科学、理论原则的情况下,让一个知识面狭窄的实践者完全懂得新的实践,那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的工业的全部工作就是一些初级的、照葫芦画瓢的工作的话,我们是可以让工程师,而且可以让工人做到自动化。但是我们不得不适应新的条件,关注科学的发展,而一个不懂得化学、物理和数学的基本原理的人是做不到关注科学的发展的,他在这种情况下是赤手空拳的。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员和工人,各种各样的中等水平的专家,但是谁应该对他们进行再培训呢?如果一个工厂需要进行一场新的改革的时候,谁能让他们完全派得上用场呢?那是工程师们。我们需要培养的就是这样的工程师。我们非常害怕的是,如果你们把任何高等技术院校或者是某些数量的这种院校的学制减少到5年以下的话,那我们在一定的时候就不得不承认,这种减少给我们带来的是实际的危害。请你们注意,我们的工程师大多数是说俄语的——而俄语的技术文献要比德语的少,而我们的那些从工人速成班或者高中毕业出来的大学生不会任何一种外语,他需要在高等技术院校里学习外语。除此之外,我们给大学生加上了各种社会工作。如果我们缩短学制,我们在培养社会主义的专家方面将会出现断档的情况。要知道,他们必须要学好一定的最低限度的社会学科,而且所有这些他们应该在5年里掌握!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中小学校的培养是少于10年的,而我们国家是9年制的中小学培养,而且我们对一个学生的花费只是沙皇时期花费的六分之一。你们想一想,对培养专家来说,这不是一种可怕的、让人感到压抑的状况吗?而且如果我们这样削减对专家的培养,你们还能说我们可以超过西欧吗?这意味着我们降低对工程师的要求,结果是我们可能会没有了高级骨干,迎合了某些工业领导人有些近视的估价,从而失去了这种类型的骨干。这里有人说,工业并不总是可以和愿意接受我们的新工程师的,即便他们有了一定的培训,但是人们会说这种培训“不像样”。什么是“不像样”呢?我可以列举出无数的例子来,说明对工程师的培养是这样的,当他进入了工业领域的时候,还成不了一名好的工程师。他需要一年或者至少半年的工作期限。但是我们的工业不愿意理解这种情况,它要找的是来自卡甘-沙布沙

伊学院的工程师,是提前两年就已经站在了机床前,并且因此很快就能熟知此道的工程师。此道他倒是熟知了,可是一旦发生什么情况他会怎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培养的工程师是自己能够进行再培训、在新的条件下能够辨别方向、有着相当的、很好的科学培训的工程师。加速培养是一件好事。我们想要让我们国家的教学不是7年,而是5年,如果提高由你们保证的助学金,也许可以导致出现这种情况。

斯克雷普尼克:不行,还为时过早。

卢那察尔斯基:但是通过减少理论基础来加速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劝你们不要搞这种加速,因为这将是对我国工业的一个很大的打击。

接下来。既然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委员会和莫洛托夫同志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就应该说,除此之外,和斯大林同志在上一次全会的演说中所说的情况相比,这个观点大大地恶化了这个特别的方面的状况。

实际上那个时候斯大林同志形象地说了“3—4个高等技术院校需要转交”,而在座的古比雪夫同志说:“可能是5—6个”,但是斯大林同志明确地说:“3—4个”,甚至带着一定的停顿。这就要问了,是不是能够指望斯大林同志的这种允诺呢?原来是不行的,因为现在已经增加到了6所高等技术院校了。

柯秀尔:更多,是8所高等技术院校。

卢那察尔斯基:你们看看,6所高等技术院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2所交给交通人民委员部。这根本就不就是莫洛托夫同志说的“小小的一步”了,这相当于我们的高等技术院校的一半了,而如果是按比重算起来,那就更多了。

莫洛托夫:不对,请您证明一下。

卢那察尔斯基:这要取决于您选择的是什么样的学校了。我们俄联邦有17—18所高等技术院校。

莫洛托夫:可是我们还有苏联的,而不仅是俄联邦的。

卢那察尔斯基:对俄联邦的教育人民委员部来说,你们拿走的是一半。

莫洛托夫:请举出数字来。

卢那察尔斯基:在乌克兰你们只要了一个。我们是处于这样的状态的,你们拿走的是我们事实上和实际上现有的所有高等技术院校的一半。这样就不是迈出“一小步”,而是划走了很大的份额,完全不是全会的上一次会议规定的了。

斯大林:你们当时也没有让步,而委员会现在搞清楚并且要求得到更多。

卢那察尔斯基:我们当时没有,现在也不可能让步。决定这个问题是你们的

事,我们的事是提出我们的论据,在我们看来,这些论据在客观上是正确的,是能够防止发生错误的。

委员会对交通人民委员部做了什么呢?我感到吃惊的是,政治局通过了委员会的决定,把两个高等院校都交给了交通人民委员部。但是,除了高等技术院校外,职业教育一直就是完全由交通人民委员部自己管的,可是,它自己是否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呢?对这方面的情况是不是已经调查过了呢?交通人民委员部是不是知道需要按照什么样的比例培养各种类型的专家呢?它会不会计划这件事呢?它能不能安排好实习呢?你们把两所高等技术院校都给它了。当你们把两所高等技术院校都给出去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 and 交通人民委员部竞争呢?当你们把这件重要的事情完全转交给了交通人民委员部的时候,甚至没有调查一下它是怎样在办这件事的时候,这还有什么“分工”可言呢?但是这里也还有另外的、逻辑上说不通的地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凭什么要求把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高等技术院校交给自己呢?它说和这些高等技术院校的联系不够,但是我想,苏利莫夫同志不会否认,他自己就曾声明过:我们要求转交是因为我们和它们联系太多了,实际上是我们在那里说了算,而教育人民委员部只是在做一些表面文章。我抗议这种说法,而且可以证明我们在那里是干着大量的工作的。但是苏利莫夫同志是有过这样的说法的。有人说,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几乎所有的教授都是和交通人民委员部没有联系的,而苏利莫夫同志说,几乎所有的教授都是“我们的”工程师,但是只可能一种说法是对的。什么是对的?论据是如此站不住脚,剩下的动机就只能是一定的胃口了。胃口是可以随便加以论证的,克雷洛夫的寓言表明了这一点,但是胃口终归还是胃口,对于事业的客观好处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突如其来地冒出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问题来,甚至在这方面没有经过一点点的调查,真是太奇怪了。我们将特别反对这种没有理智的措施。

正像我已经说过的,决议无论是以什么样子通过,它将是有一定好处的,它都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高等技术院校。但是它的根本弊病就在于,它是在追求为把一定数量的高等技术院校转交出去的计划进行辩解和论证的。就实质而言,没有找到能够证明有必要采取这个措施的实际材料,所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出有必要把高等技术院校转交出去的结论。为了不把这作为对问题的一种重大决定,可以限制在一定的最低限度上,但是这个最低限度又非常大,而且是打着这个最低限度的旗号,想要几乎把高等专业技术教育整个都转交出去。我的论据是以了解事情的状况为基础的,要想相当有力地对我的论据严肃地提出争

议,那未必是能做得到的。

最后一点。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不应该做这种试验的意见的话,如果你们还是想要把这件事扯散的话,那么至少还是该回到实验规定的范围中来。把所有的高等技术院校都交给交通人民委员部和把俄联邦一半的高等技术院校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不是试验,不是一小步,而是跳了一大步,可能要让工业付出相当昂贵的代价。

**主席:**谢列布罗夫斯基同志发言。

**谢列布罗夫斯基:**当我们需要为我国的工业制作设备、车床或者机器的时候,谁也不会争论的是,工业本身应该为自己把它们制造出来;而当我们需要应该领导工业发展的工业领导人员的时候,就出现争论了:谁应该培养这些领导人员。

**斯克雷普尼克:**粮食也是从地里得来的,不是从工厂得来的。

**谢列布罗夫斯基:**我们不是说的粮食,日程上提到的问题不是关于土地,也不是关于粮食,而是关于工业的领导人员。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工业的领导人员,那些将要贯彻今后应该怎样发展我国工业的进程的想法的人,应该是由工业自己来培养的。这是肯定的。

现在来说一说关于培养的期限。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说,我们不能限制在短期的学制上,需要有长的学制,让工程师成为多面手,让他能够成为工业上的将军,为此需要7年,至少是6年。我不是这样想的。我们还不是这样富有,也不是处于这样的状况,让我们可以慢慢来,可以奢华地给出很长的期限来培养我国工业的指挥人员。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今天的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技术员、工程师是不是适合工业?现在高等院校培养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对实际工作是不适用的。他从高等院校走出来之后还要重新在工厂里再学习,因为没有一个是像他所给出的那个样子,没有一张他画的图纸是适合在作坊里不经过修改就能用得上的,没有一个方案是可以用来加以细节化和交给作坊去完成的。为什么?因为当他待在高等院校的时候,向他教授的各种科目都是远离实践的,而且有许多是根本就不需要的;它们只是在给他的脑子做按摩,扩展他的学问,为的是让他能够掌握自己的高等工程观念。我完全不能同意这样提出问题。我想,譬如说在德国,那里有他们的各种财富,这样提出问题是可行的,而在我们这里,这样提出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需要的工程师是这样的,他从离开学校的书桌时起就应该能够走进企业、矿山并在那里带来一定的、马上见效的益处来。在德国,高等学府

的毕业生可以到矿井来坐上2—3年并且再学习。而在我国是没有这样的时间的,我们这里没有工程师。这里有人说工程师占1%,但是是不是知道在一些工业部门里,譬如在黄金工业里,远没有这样比例的工程师呢?在赤塔大区,整个黄金工业地区里就没有一个工程师。在斯列坚斯克区有6000名工人,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工程师,是去年得到的。6000名工人一个工程师,怎样工作呢?这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到处看到的黄金工业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有人会对我说,这个工业是最落后的,最衰败的。对,这是对的。至今这个工业很少关注对工作人员的培养以及对这件事的状况的改善。但是还有什么地方也很少关注这种情况呢,那就又是高等院校了。我这里有巴尔博特·德·马尔尼的一封信,他是列宁格勒一个学院的系主任。他写了什么?他写道,如果说我们将能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得到支持,那么我们在明年就能够提出关于矿石浮选法的问题了。但是请你们注意,要知道,在矿石的加工中,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了,而且矿石浮选法问题对于我国的工业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矿石加工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就面临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就将能用机械的办法和浮选法来加工矿石了,而且不仅是在黄金工业中,在任何一种其他的工业中,比如说在锡矿、锌矿工业以及其他一些工业中,都能采用它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计划,我们应该是把几千万用在浮选法上,但是至今在我国也没有浮选法的教研室。有的只是机械加工的办法,就是这种办法,也还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两年前提出来的。我们也没有关于采掘业方面的课程。没有教研室,没有专家,没有干部。没有人培养他们。而关于采矿业呢?在采矿业上,就说黄金开采吧,讲授的又是些什么呢?情况也是同样的。我这里有一份教学大纲。原来我们并没有关于室内研制的概念。我们至今还是靠石英来加工富矿,而并不知道美国在开发贫矿是采用的哪些方法,而贫矿则是最经常出现的,就像在霍姆斯特克<sup>249</sup>,在茹诺等地所做的那样。我们这里至今没有这种东西,而且在矿业教程里,关于对贫矿进行铅室加工也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关于矿石提升的机械,我们这里教吗?这是很奇怪的,但是我们有的是老领导,讲的课程是在大规模地加工矿石时完全用不上的,因为在加工像别列佐夫斯基矿这样的贫矿的时候,需要特别的设备,特别的机械。关于化学加工矿石。至今在我们的矿业学院教授的课程里,除了5个氰化罐和奇数的锌过滤器外,什么都没有了,而这些在美国早就不使用了。什么是“欧利威尔”——我们根本就不提,可能是谁对这个都不感兴趣。我这是说的矿业、黄金工业以及任何其他采用浮选法的工业。怎样来精选矿石呢——也没有足够的教程和指南。



我了解石油工业的某些工作。我曾在莫斯科矿业科学院,也在别的高等院校里工作过。那里的情况比较好些。那里培养的是石油工作人员,他们不会因为那里有很大的压力——很难调节各种阀和闸,而害怕钻井机,也不会因此躲闪汽油蒸馏釜,裂变。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是因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把莫斯科矿业科学院所有有关石油的授课工作都抓在了自己的手里,因为在那里讲课的教授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程师,而且简直就是所有石油教研室的实际工作都是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的。

这里有人说,很难把实践转向创新。当人们想要把工业转向新的轨道的时候,好像原来那里已经习惯了老的一套了,工作人员是守旧的。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如果不是实际工作的人,那又有谁来把工业推向新的轨道呢?您是在想教授、理论家们能做到这一点吗?只有当一个经过了培养、懂得数学和物理的人在实践中感觉到自己就像是在家里一样,当他对生产上的事情是如何安排的能背得滚瓜烂熟的时候,当他以此为生的时候,才能够推动这件事前进。理论家不可能创造出这个东西来,而且他的发明可能会是脱离实践的,可能会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我们不需要的和不感兴趣的。我们知道,我国的工业正在重新安排和向前迈进,在以美国和其他生产事业有很高水平的国家为榜样。而且我们需要让它的向前发展能够影响到高等院校。我不想归罪谁,但是我要直截了当地说:我国的工业现在已经非常美国化了,它在许多地方和领域里采用了许多西欧和美国技术的样品。但是,在我们的学校里,这种情况还看不到。所以需要在我国的学校里也做同样的事情。至少我有权根据我所了解的事情,根据采矿业的情况这样说。

接下来说说勘探。例如,我们需要提高黄金工业、金矿、矿床等等。可是我们是不是有勘探人员呢?你们是不是知道在下科雷马的新矿藏不是勘探人员,而是淘金的人勘探出来的呢?<sup>250</sup>没有能派去任何一批人。为什么不能派去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勘探工程师可以担任这批人的领导,而今年我们安排了四年级的大学生担任了几个勘探队的领导。你们看看美国是怎样对待勘探单位的,那里是怎样培养勘探工作的人员的,而我们又是怎样工作的呢?我们没有工程师,没有地质工作者,没有勘探人员。一个大学生,他算什么勘探人员呢?当我们需要对矿区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把挖矿机放在哪里,怎样断开剖面,我们是在黑暗中一面摸索一面工作的。我们不仅是在黄金这件事上是这种情况,而且在矿业的其他部门也是这样的。

我在结束的时候要说的是,既然工业是摆在了首位的,既然对它表现出了如

此大的兴趣,既然它正在转向美国化的轨道,那么,为了使自己更扎实,它就应该从所有方面都得到锻造。只要领导干部本身不是在同一个工业领域里培养出来的,而且是照着它需要的样子培养出来的话,任何基本建设都是不可能正确地进行下去的。

**主席:**克里尼茨基同志发言,下一个是克拉瓦利。

**克里尼茨基:**我只说几个一般性的意见。先是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通常提出的问题。在说到人民教育事业中的这些或者那些缺点的时候(不仅是关于高等技术院校、中等技术学校,而且是在社会主义教育的整个体系方面的问题上,在高中的教育方面,等等),我们一般听到的是同样的东西:一切事情都要归结到物质基础上,所有事情都是资金不足,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预算少。当然,人民教育中,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有很多东西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是这种情况。但是问题不仅在于物质基础。我感觉,在关于高等技术院校这个问题上,教育人民委员部有很大的错误;今天从讨论一开始,在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的发言里(我不怀疑,如果雅科夫列娃同志将是始终如一的和忠于自己原来作过的发言的话,在她的发言里也一样)的错误就在于,同志们不明白,安排人民教育这件事,其中也包括安排高等技术教育,不仅要取决于资金,取决于这样或者那样的物质基础状况。党的领导的缺点,首先是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本身的党的领导的缺点,也有着不小的意义。低估工作中的保守主义的影响和巨大力量也是不正确的。

问题在于,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不同于一系列国家机构,实质上和我们并不志同道合的机关成员的压力之大,是从未有过的。造成了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以及它的整个系统工人占的比例最低。这不足为怪,因为无产阶级是最后才开始占领文化空间的阵地的。除此之外,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自己工作中集合了最完备的老知识分子骨干,其中包括职业教育总局中的专业水准很高的专家。这些干部中的大部分是沿袭老传统的,这样一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老的传统、守旧思想和僵化古板的作风——所有这些缺点,在推行党所需要的路线时就可以充分地感觉到。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中的许多人不明白这一点,而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结为物质基础的问题。这就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遗憾地常常犯下许多错误的根源。

而提交到中央全会上来的决议的基本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决议在说到困难的时候,指出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路线中的总的错误。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说,决议里的一切都是好的,其中只有一点搅进去了杂质——关于高等技术院校和中

等技术学校转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这件事。要知道,决议并不仅仅是谈到了这个转交(转交是从对事情的整个评价得出来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也不仅仅是加强物质基础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纠正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整个路线,正确地批评了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中还可以强烈地感觉到的那种僵化和保守,指出了加强总的路线的实际措施。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关于把一些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转交出去的基本论据,这种论据是从草案中给出的对技术教育的总的的评价出发的。我通过一些同志的材料和报告了解了一些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情况,而且在И.柯秀尔的委员会里,我们直接了解了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各种事务安排的情况。研究材料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高等和中等技术教育的安排上的主要缺点是,它们脱离生产,脱离对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任务。

有人喊:也脱离了经济工作的经验。

克里尼茨基:是的,也脱离了经济工作的经验(我就不说严重脱离了最新的国外技术成就了)。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一位积极的工作人员在一张便条里基本上正确地写道:“在教学大纲的问题上,指出它们不适用是完全正确的。它们是把过去的大纲再抄一遍和照本宣科。需要指出的是,在实际上落实这些大纲的时候,甚至那些在重新审议过程中加进去的不多的修改,由于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教师和教授们的古板、习惯、保守,也都遭到了破坏:他们还是照老规矩宣读,——一个字都不差。”

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这个最大的技术高等学府里,如果说到它的毕业论文的话,那就可以确认有这样的缺陷:题目的范围太大,太抽象,各个项目都很少能反映出国外技术的经验,对技术经济方面提出的询问做出的阐述完全是表面化的东西,等等。就工程建筑系的材料看,缺乏明确要面向利用新的建筑材料的方案。这样的例子可以列举出许多。实习安排得也很糟糕,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做详细的描述了。非常典型的是,一般来说,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实用经济,也就是具体的经济问题,而如果是没有考虑到它们的话,那是不可能培养出工程师、真正的社会主义工业的组织者来的。在这个问题上,直到最近也没有听到有什么警钟。这里说的不仅是高等技术院校了;如果看看像工业经济学院这样的高等院校,看看那里教授的是什么是按什么样的教科书和教材,什么样的大纲讲授的话,那么,所有这些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些陈旧的东西,对于一个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所需要的经济学家来说,是完全不适用的。这个缺点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这样的高等技术院校的工作中,反映得就更多了:在

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各种教学大纲里,更多的部分不是具体的经济教程,而是很经不起推敲的、很不深刻的、描述性的课程,没有那些和工程师的技术知识和改造的任务、有发展前景的计划、电气化的任务等等联系在一起的科目。这当然是全党的很大的罪过和灾难。党的理论工作者还正在转向一系列具体的、非常迫切的、需要研究的经济问题。显然,共产主义学院必须要开始在这个领域里进行系统的工作。

我的感觉是,技术学校是脱离当代的经济问题和一般性的建设任务的,这在一个例子中可以反映出来,这个例子可能太刺激人了,但是它说明了对这种脱离的事实不够重视会导致发生什么情况。这个例子就是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的两个大学生就设计罗斯托夫深水码头提交的论文方案。专业水平评定委员会的决定认为,这个方案是“特别优秀”的;委员会认为,方案的经济部分研究得“最充分”,“非常有意思”和“完成得非常出色”。方案被作为需要学习的范例存入了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的主图书馆里。这个草案里说:“1917年的十月革命安排执掌政权的政府认为,并不需要改变沙皇对农民群众所关心的码头和国内水路推行的政策。苏维埃预算中关于水路交通的部分,原先的各个部的官员们是会不假思索地签字的。现在的政府追求的是加强臭名昭著的无产阶级专政,甚至从它的观点出发,忽视农民的利益对国家来说也是致命的。当然,有许多关于所谓城乡‘结合’的美丽辞藻在震撼着大气,压盖着数以万计的状告,但是实际上农村从这种结合得到的只是在忍饥挨饿的肚皮上更拉紧腰带”。

有人喊:谁写的?

克里尼茨基: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的两个大学生——拉伊科和利夫希茨。在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和“写得非常出色的”毕业论文里,得到认可的正好是方案的经济部分。当然,这个事实说明了我们的领导有很大的缺口。但是这个事实在一种意义上说是非常典型的,那就是它表明了,在一系列的工作环节上,我们还在多大程度上没有能够足够地把握好领导权,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培养如此需要的专家的工作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这里需要说的就不是物质基础了,而是应该实现的领导和监督,而首先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高等技术院校局等机构应该实现的领导和监督了。

主席:时间到了。

克里尼茨基:我请求给我5分钟到7分钟。

主席:有15个人登记发言。谁赞成给克里尼茨基同志延长5分钟?大多数。谁反对?少数。程序是要遵守的。(笑声)

**克里尼茨基:**挑选教学人员的办法也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里的保守主义的直接后果。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委员会遇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管理委员会的共产党员们讲述道,有一些不合适的教授(说出了3个名字),很长时间就是没有能把他们撤下来。原来是存在着这样一个法则,根据这个法则,一个教授被评选出来后,任期是10年,而要想在这10年的期限满了之前把他撤掉,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管理委员会需要过许多关卡:学科会议、系务会议、系主任、职业教育总局,最后还有国家学术委员会。在国家学术委员会里,要通过这样的问题是很困难的,因为那里掌握着科学技术部门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老教授们。存在一种特殊的公式——“请求教授申请退休”。(笑声)

**柯秀尔:**劝退。

**克里尼茨基:**当共产党员做到了把这样不合适的教授“劝退”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

**有人喊:**劝退的总是不合适的人吗?

**克里尼茨基:**当高等院校的管理委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合适的人。

我的感觉是,这种挑选教师人员的制度突出地反映了旧的传统(不好的传统)还是怎样牢牢地把持着高等院校的,这种陈旧的灰尘还是如何牢固地覆盖在那里的。

从各种考虑不周的情况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必须要首先克服在整个中等和高等技术教育中的保守主义和脱离生产和改造任务的状况,并且首先要相应地改变教育人民委员部和职业教育总局的工作;其次必须要把一部分高等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列举了一系列好像是很重要的转交的根据:需要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之间展开“竞争”,这件事非常复杂,光有教育人民委员部一家的领导是不够的,等等。他在列举的时候,对问题的提法是不正确的。主要的还不是这一点。按照我的理解,决议主张转交的主要精神在于,在非常需要专家而事情的安排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需要尽可能更多地丰富培养这种专家的经验,以便找到安排这件事的途径,好在最短的期限内得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所需要的工程师、组织人员和技术人员。我个人认为,把更多数量的(也许是全部的)高等院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把制定大纲和对它们进行领导的方法留给教育人民委员部是适合的。想必这样是能够得

出最积极的结果的。但是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没有研究好,所以需要把这个巨大的试验进行完,就能得出这样或者那样的结果和结论来了。

现在把一部分高等技术院校转交出去,应该是能够得出积极的和完整的经验的,这正是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保障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能够有最多的保障,可以对教学计划和大纲的制定有决定性的和直接的参与,而且能够最详尽地组织和所有学习与生产有着直接联系的生产实习。绝大多数的科研所是掌握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手里的,这样就可以达到学生的工作和这些科研所的直接联系了;学习和这些科研所的联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转交的条件下,也可以更轻松地加强高等技术院校的教师队伍,在这样做的时候,不仅可以拥有老的教授,而且可以更轻松地多让工业上的有专业技能的技术人员也更直接地和高等技术院校的工作联系在一起了。

除了直接改进培养人这件事之外,这种转交将可能在最丰富的新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最积极地帮助教育人民委员部消除保守主义和僵化的成分。

最后的两个简短意见。当然,对于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提出的各种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和高中的状况联系着的。关于高中,只是最近才在党内和在共青团内发出了警告。也必须对这一部分情况开始动员全党的力量来研究、检查和安排人民教育事业。

第二个意见关系到农业的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那里的状况比培养工业方面的专家的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情况更糟糕。这就是为什么决议的那个部分说到了需要把涉及工业的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路线也推行和推广到农业的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去是完全正确的了。

主席:克拉瓦利同志发言。

克拉瓦利:在直接谈到高等技术院校问题之前,我想提一个建议,这对我国的高等技术院校的无产阶级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伊里奇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说,如果战败者的文化高于战胜者的文化的话,战胜者也可能被战败。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要让工人阶级在文化上以比我们这个联盟的其他阶层的人无与伦比的更高速度成长起来,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有被战败者更高的文化吞噬的危险。在我们这里,工人阶级文化的增长速度和其他阶级文化的增长速度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拿高中的情况来说,那么在高中,我们的状况是,上高中的无产阶级的孩子的数量总共是13.6%。在这方面,莫斯科州的情况最好,几乎一半是工农的孩子上高中,也就是说,有50%的上高中的孩子是工人和农民的孩子,而50%是其他人的孩子。但是如果我们拿来的不是入学孩子,而是毕业

的孩子的比例数的时候,那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了。在被录取上学的孩子中,工人的子弟毕业的只有 5.2%,而在其他人中间,这个比例达到了 22%。

**斯克雷普尼克:**好像这里并没有要讨论把高中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问题呀!

**克拉瓦利:**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关于高中的社会成分问题是和这件事有直接关系的,因为我们的高等技术院校的无产阶级化是取决于高中的社会成分的,而且在我国工业的工程师队伍中现在存在的一系列的考虑不周,又是取决于我们的高等院校的无产阶级化的。所有这些是和工程师干部的无产阶级化有着最直接的关系的。上高中的人中间,不属于工人和农民的人要多出 3 倍,而我们是落后了四分之三的,这个事实说明,这种状况是应该根本改变的。遗憾的是,这也关系到了我们的高等院校。最近 4 年,我们从高等院校里培养出了 8 000 人,这些培养出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用在了工业上,而在苏联工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工程师的数量总共是 139 人,这包括了老的和新的工程师。这说明,在我们的大学里,入了大学的无产阶级基本部分,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被洗刷出去了,而且至今大学毕业的,不是我们的人,不是无产阶级的人。

工业技术类型的和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之间的对应关系状况也是不好的。如果拿所有高等技术院校、农业院校、工业院校、交通院校的比重来和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作比较的话,那么就学生的数量而言,工业技术教育的学生数量不到其他高等院校学生数量的三分之一。从俄联邦的情况看,10.6 万名高等院校的学生中,高等技术院校的学生(不包括农业学院)只有 3.4 万人。我们是用不到三分之一的注意力在关注对交通人民委员部、邮电人民委员部,对工业和对国民经济中所有保障工业化的其他部门的专家的培养。对于为我国的国民经济改造工作、保障我们非常需要的那种速度的那些部门,我们总共只是分出了我们的三分之一的注意力,而三分之二的注意力放在了一般性的培养有教育的人上面了。我们感觉,需要放弃这种做法,把注意的中心转移到为工业和为交通运输进行工业和技术教育上来,因为我们的实际情况是,在我国的工业中充实工程技术人员的状况是非常差的。要知道,在我国,没有受过专门教育的实际工作者占据了工程技术职位的 40%,其他的人也没有足够的工程技术教育来解决改造时期的极其困难的任務,但是在这剩下的一部分人里,大多数是年轻的专家,只有相对不多数量的老的工程技术人员,而且他们已经大大落后于最新的科技成就了,而实际工作人员在技术上的落后就更不用说了。而在纺织工业中,实际工作者对工程师的比例是 320:1,冶金工业还要比这多出一半来,在化学工业里是 278:1,在

电力工业里是55:1。在我国,实际上没有足够的、经过培养的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在工业的决定性部门——电力、冶金、化学和纺织工业里,能够维持这样的状况吗?我们有一些托拉斯的情况是,譬如说在纺织工业里,6万人有3个纺织工程师。在这样的状况下,培养的速度问题是决定性的问题之一。在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下,一个大学生一般要在我们的大学里读6年,7年半,而我们有很大比例的学生要读上8年、9年,——在这种情况下,在大型的高等院校里,譬如说在列宁格勒综合技术学院,毕业生在学生总数中占有的比例是3.1%,而国外每年的比例是18%—20%,——这一切说明,如果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一个决定性的转变,那么用技术人员充实工业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对于我们来说,实质上培养工程技术人员是对基本建设极其重要的投入,不仅是对基本建设极其重要的投入,而且是最能有赢利的投入。

如果真的是要让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基本建设负责的话,那就需要保障它在培养进行这种基本建设的干部方面能有决定性的影响。工厂的建设是基本建设的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为解决我国基本建设中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干部的培养情况又怎样呢?不算设备的成本,在我国的五年计划里,对这件事的投资达到了40亿卢布。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这个极其重要的部门来说,在我们的整个大体上有10.6万人学习的高等院校和高等技术院校的体系中,每年只有17人是工厂建设方面的专门毕业生。更多的我们就没有了。当我们在职业教育总局的局务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说到应该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应该搞清楚必要的需求和重新进行改组,把重心转移到这里来的时候,当我们提出要消除一系列高等技术院校的过分重复,把这个系统扩展开来的时候,人家对我们说,我们的专家培养得如此好,在我们这里,搞交通专业的、搞水运的以及所有其他部门的专家都能建设工厂。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工厂将是由所有的人人在建设,既有搞交通专业的,也有搞水运的,等等,而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在建筑业上使用的工程师,有四分之三以上是交通高等技术院校毕业的,——我们是不可能廉价和合理地进行建设的,因为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独立的专业。

(主席的铃声)

主席:剩下一分钟了。

克拉瓦利:我尽量现在就说完。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里提出的、现在实际上需要给予非常大的关注的一个极其大的问题,是和生产实习相联系的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说,他一直是理解生产实习的重要性的。可能在理论上是这样的。可能他的确在理论上非常理解生产实习的重要性,但是当问题涉及实际上



推行这种生产实习的时候,在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做。原来在刚刚过去的1927年制定的各种教学计划里,在这些计划里,这种必定要进行的10个月的生产实习却没有得到体现。理论上你们是明白这一点的,但是当问题涉及实际执行的时候,要保障在我们的教学计划里有10个月的实习的时候,原来是在大纲里却没有规定。如果有决议说一个大学生应该实习6个月<sup>251</sup>,可是在四年级的时候却成了他按照大纲同时应该进行理论研究,结果是两者中间只能是选择一个:要么他该学习理论,不能在工厂工作;要么是他该在工厂工作,就要放弃对理论问题的学习。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不能衔接的。

理论上懂得生产实习的重要性是不够的,应该落实这项工作。无论是教育人民委员部还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这件事都很少关注,虽然这个问题对于培养工程技术人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建设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的。这里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如果与生产的联系能安排得很好,这将会怎样反映到对毕业生的培养上以及他们的素质上。我们就拿国家电力机械学院来说吧。它的培养要用两年零六个月的时间。劳动人民委员部没有给任何助学金。到了这所学校学习的工农速成班的学员没有这样的助学金。大学生只是能得到一些经济机关的支持,那就是对生产实习支付的报酬。虽然这些工作的物质条件之差是没法比拟的,没有实验室,但是这个学院培养出了140名适用于我国工业的工程师,他们能够适应工作。

所以基本的问题不仅是高等技术院校的物质基础的问题,而且是在高等技术院校和生产联系方面正确安排我国的大学系统中的整个教学工作的问题。

主席:雅科夫列娃同志发言。下一个发言的是斯克雷普尼克同志。

雅科夫列娃:我首先想说说我们的这种保守主义。但是在说到这件事的实质之前,我想请你们给自己提这样一个问题:就算是这种保守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话,如果专业教育不是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手里,而是在我们为它们培养专家的那些人民委员部的手里的话,那么到了现在,到了1928年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情况呢?我们听到了,莫洛托夫同志在他的报告里强调了这一点,说是直到最近,负责经济的各个人民委员部的特点是完全不理解为自己培养专家的问题。

[莫洛托夫:原来是他们在技术上知之甚少。]

雅科夫列娃:就是在各个人民委员部对这件事抱着这种态度的情况下,你们想象这件事该是放在它们的手里。我想,你们应该承认,在这方面我们未必就能从原来的状况,从原来那些学校的老样子向前迈出很大的一步。但是就在这段时间里,教育人民委员部做了非常多的事。我们进行了一次很大的实验,进行了

一系列的实验。但是整个事情在于你们不愿意考虑我们的经验,不愿意研究它,不愿意承认它是我们党的经验。

就拿培养专家的3年期限来说吧。莫洛托夫同志说,这个命令没有采用。这是不对的。这个命令采用过;我们把我们的高等院校,其中也有工业高等院校,转到了三年制的教学上,而且我们有3—4年的时间维持了这种状况。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程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多尔戈夫教授对我们说,对于工程师来说,3年的学制是不行的,需要改用另外的、更长的学制。而且我们现在的各种教学计划是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代表一起制定的。

我们再接来说。有人说需要积累培养专业面狭窄的工程师的经验。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曾经有过3年制的、实用的学院。但是工业部门不接受这些工程师,对我们说,“这不是专业面狭窄的工程师,而是技术员,而且你们不要搞成非驴非马的”。于是我们把实用的学院,有两三个,改变成了高等学校,而把所有剩下的都变成了中等技术学校。这种经验是有过的,但是你们认为它是不存在的,而且不愿意考虑它。

甚至这两个事实也都表明了,并没有任何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保守主义。所有这些我们都尝试过了。我们放弃了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回到了旧的形式上去了。如果你们看看我们这里是怎样安排教学的,那么你们就能看到,譬如说,如果说在过去,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这样一个我国高等院校中最落后的学府里,授课时间和讨论实习课程之间的比例关系是150:100的话,那么现在这个关系的比例是96:100,也就是说授课已经不是比实习课程多一倍,而是甚至至少了。但是不仅是这个变化;高等教育的整个体系在这段时间也改变了。如果说以前高等教育根本不是一定专门化的话,那么现在我国已经没有非专门化的高等教育了。同志们,所有这些你们都不愿意看到。而当我们把我们工作的经验拿到国外去的时候,在那里参观我们的教学展览的人们马上就发现了这一点。譬如说,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一位作家,不久前参观了我们在布拉格的展览,而且详细看了我们关于职业教育机构的展板,后来作为自己的评价写道:“我所看到的一切表明,苏联需要专家,所以在自己的学校里甩掉了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学校里的所有包袱。对学校任务的这种理解导致了高等院校也发生了专门化的变化……这样好的和广泛铺开的教育体系我们从来连做梦都没有见到过!”(会场上的一句插话没有听清楚)

就是在我们这里,也还有不少累赘的地方,我同意这种看法。但是你们总还是看到了,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旁观者马上就发现了我们绝不是把所有都照旧

保留下来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我们的高等学校,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它们。

而你们硬说我们有保守主义!我对这一点要提出抗议。我认为,你们一定该接受并且研究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不是白白做了这个实验的;我们是作为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作为党员做这个实验的,而且如果你们想再一次重做这个实验的话,那就不要忘记了,它是需要国家花钱的。而你们顽固地不想顾及这一点,想说我们所干的和旧学校里的情况完全一样。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也对这样做表示抗议。

而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的呢?这就让我要再一次回到物质基础上来吧,而且我完全不害怕克里尼茨基同志的责怪,同志们,他说:“只要你们动一下教育人民委员部,他们就会说起物质基础来。”同志们,我要说的是,当你们现在要说到人民教育问题的时候,你们自己也将会每一次都说:“主要是钱的问题。”你们直至今日是怎样对待其他机构和我们的呢?我们的工资远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教授得到的是战前工资的30%,中学教师是31%,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得如此多的小学老师,至今,在苏维埃政权的第11个年头上,得到的是战前工资的70%!

有人喊:说得对。

雅科夫列娃:在我们的高等院校里养活一个学生要多少钱呢?是战前的20%—25%!而你们希望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给你们出产更高的结果来?!为什么?你们回想一下,你们是怎样对待其他部门的?就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说吧。这些因素的对应关系在我们的工业中又是怎样的呢?到处的工资都要比战前高,而产品的质量,劳动生产率——这些和战前的标准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莫洛托夫:现在说的不是这个,是错误。

雅科夫列娃:我同意承认所有的错误。但是我还是要声明,在人民教育中,其中也包括在高等教育中,安排得不好的基本的东西是物质基础。

有人喊:完全对。

雅科夫列娃:你们自己也完全知道这一点,你们在委员会里说:“有罪,有罪”,于是有人就指责我们说我们没有叫喊。但是如果你们并不注意我们的喊叫的话,我们又能怎么办呢?你们一时把耳朵堵起来了。而刚一把手拿开,就抱怨我们说,我们要打破这些阻塞的东西,声音还不够大。

柯秀尔:哦—哦—哦!

雅科夫列娃:同志们,你们生气是徒劳的。我是有什么说什么。在你们现在要回到学校的问题上来的时候,你们用什么来结束这个问题呢?是用钱!只是提到了这件事就让你们给出了4500万来。

莫洛托夫:总还是有些呀!

雅科夫列娃:但是如果你们没有说这些,没有给钱,而只是做出了这个漂亮的决议的话,它不过也还是一纸空文。我们就什么也干不成!所以我要说:如果你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高于战前水平的东西的话——我们是应该能够给你们的,——那就不该用迟钝的武器,破烂的武器,用吃剩下的鱼骨头来武装我们,而是要让我们有一切条件生活和工作。你们给我们钱来引进新的科技成果了吗?我去年一整年都在奔波,为的是在这件事上再多拿到100万。可是新来的高等教育的捍卫者鲁祖塔克同志在政治局里说了话,表示反对这样做,主张取消这100万。虽然克里尼茨基同志很有能力,才华出众,但是我要承认,如果把他放在我们的位置上,也给他我们一直在享用的那种剩鱼骨头的话,我想他也做不出多大的成绩来。要知道在这些年里,我们的确是学会了用很少的钱做出事半功倍的事情,而且就是这样,我们也还是在为没有能干出更多一倍的工作来而感到痛苦,为我们因此还将受到别人的斥责而感到痛苦不堪。

现在来说一说转交的问题。我们要转交什么呢?我们在俄罗斯联邦有16所工业高等院校,其中有5所要从我们这里拿走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2所给交通人民委员部,也就是说是7所。这几乎是我们所有的高等技术院校的一半。如果这是一种试验的话,那就是一种很大规模的试验了。给这些被夺走的高等院校的拨款是对高等工业教育所有拨款的45%。这已经超过了试验的界限了。这说明是在确定某种新的、我们应该从今以后为之生活和工作的体制。于是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当你们注意到了这件事的时候,当你们看到了情况非常严重的时候,当你们得出了结论,需要给钱而且你们要给这笔钱的时候,你们就把这件事从我们这里夺走了!我们在这段时间里的确是把整个教育体制来了一个大翻身——建立了新的制度,建立了工农速成中学的体系,让所有的高等院校都接纳工人。就在我们把这个房子已经盖起来的时候,你们要从我们这里把这件事拿走,而且丝毫也没有证明一下,你们将要转交给的那些人将会比我们干得更好,更能省钱!我想这是有害的。我想,根据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在这里展开说到的那些理由,这是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的。

我现在想说说克里尼茨基同志在这里说到的事。他说到了教授的组成没有变化,说这是老学校的一种传统。这是不对的!根据老学校的传统,教授班子一

经选出,它就是不可改变的。而我们这里是这样的,教授班子是每十年一定要改选一次的,无论这个班子有多好。难道这是老学校的传统吗?这是在打破老学校的传统。说是要把任命教授的制度变得简化,这也是不对的。

臧声:对。

有人臧:为什么要经过十年呢?(主席摇铃)

雅科夫列娃:我要求给我3分钟。

主席:没有反对的?请讲。

雅科夫列娃:不能让高等院校自己去更换和任命教授。他们还远不是我们的人,把这件事转交到他们自己的手上并不总是好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还将会是冲着我们来的。克里尼茨基同志的胆量简直无法描述。他说,他认为自己所见到的那份毕业设计对于所有的方案来说是典型的。他有什么根据这样认为呢?他看见了所有的方案吗?他并没有详尽地涉及过这件事,说得轻些,却斗胆说这个方案反映出了整个事情的情况。这样来对待这个事情,这样来阐述问题,我们是不能有助于事情的解决的,我们不可能在我们党的最高机关里对这件事树立起正确的观念。

尽管是这样,但是我认为,转交高等院校是不正确的,特别是如果以建议提出的那种范围来进行的话,是不正确的。我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一样,认为现在我们的工作能够轻松得多,而且许多障碍是能够从我们的道路上清除掉的。这些年来,在最近的3—4年里,我们知道的只是要争取保存高等院校和工业中等技术学校的体系。就在不久以前,就在几天前,俄联邦工农检察院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文件。在那里,就是在这个送到人民委员会的文件里,恰恰不多不少有一项建议,莫洛托夫同志,要把矿业学院关闭掉。这个方案建议从70个高等院校中要关闭11个……

有人臧:这是误会。这关系到的是罗伊津曼。

雅科夫列娃:通过把各种不同的高等院校合并,把22个高等院校变成了9个。其中在莫斯科建议把门捷列夫学院、普列汉诺夫学院和罗蒙诺索夫大学合并成一个高等学府!还建议对列宁格勒的三所院校也这样做。这个文件指责教育人民委员部和莫洛托夫同志建议的决议针锋相对,指责我们说,我们针对工业提出的专家数量的计算所瞄准的方向,是针对着要赶上西欧工业中存在的工程师和工人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个问题的。因为中央的决议提出的是最近这些年的最重要的任务,为这一点还嘲笑我们。

我就要说完了。我引用这个事实只是为了表明,我们至今是在什么样的条

件下工作的。党最终注意到了这件事,这种状况现在的确是真正让我们可以在受到关注的情况下,而不是在需要不断地为我们的事情而搏斗的局势下工作了,上帝知道,我们需要在多少个战线上搏斗呀。

**主席:**我这里有10个人签了名的一张字条,建议停止讨论,另一张字条建议在斯克雷普尼克的发言之后停止讨论。这张字条有7个人签名,而且其中不仅有现在的、来自乌克兰的人,还有原来来自乌克兰的人,像И.柯秀尔。我赞成这7位同志的建议,在斯克雷普尼克发言之后停止讨论。

**莫洛托夫:**可能还该让古比雪夫发言。

**古比雪夫:**让莫洛托夫发言,说出该说的话。

**莫洛托夫:**我建议让中央大学生局的代表发言。

**喊声:**没有必要。

**主席:**中央大学生局的代表和科学工作者工会的代表都登记发言了,那么就需要让两个人都发言。谁赞成在斯克雷普尼克发言之后停止讨论?

请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发言。

**斯克雷普尼克:**在委员会的各项建议里和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里,主要的是,需要找到一些新的途径,让现状能够发生转折。我完全同意委员会的这些建议,而且是无条件地同意。是的,需要找到新的途径,需要有转折。原先的途径造成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和我们在新的技术力量的产出方面的分离。需要走什么样的路呢?莫洛托夫在这里说的主要的一点是,我们现在不可能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在这方面要能按计划工作。我一点也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

**莫洛托夫:**您不能同意什么?

**斯克雷普尼克:**不能同意在我们的技术力量的产出上我们不能提出有计划性的任务。我不能同意这一点。

**莫洛托夫:**我没有这样说。

**斯克雷普尼克:**我想您是这样说了,不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您还可以在自己的结束语里说。我有权对您说的话有不正确的理解!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技术力量的产出发生转折这件事上是采取这样的态度,事先就放弃了提出计划性的任务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事先要对自己说,我们什么也干不了,我们走不出我们现在陷入的泥潭。

我们要提醒一下,在我们那里的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sup>252</sup>,在讨论人民教育状况的问题时,我们说过,人民教育的任务应该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论断应该是我们所有议论的出发点。

在讨论委员会的报告时,政治局的决议里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但是,是在没有纳入决议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那就是:“对高等技术院校、中等技术学校的基本建设工作的拨款,新的高等技术院校的建设,现有院校的扩大,实验室的建立,都要与国民经济领域里的基本建设工作的拨款持平。”这是一个正确的论断,是对的论断,但是需要把它写到决议里去,必须是以它为出发点。如果不是这样,那会是怎样的情况呢?不是这样,那就会是空喊一通,就像委员会的建议向我们提出的那样。更新和补充设备是一项任务。莫洛托夫同志,说说这一点是不够的,这是应该计算的,要好好计算的,要列入计划的。可是时至今日,建议的是什么呢?政治局的决议说:今年要为高等技术院校追加4 500万。我们来计算一下就搞清楚了:2 300万是用于提高助学金和提高教授工资的,而2 200万是提高设备水平的,也就是工业教育的基地的。这对于发放给基本建设的总额来说是多少呢?今年我们对工业的投资是18个亿,明年指望可以提高3.5亿—4.5亿,我取个平均数,那就是4个亿。这就是说,在即将到来的明年,我们对我国工业的投入是22亿卢布。对工业的基本消耗来说,对技术力量的产出的基本投入相当于1%。同志们,你们怎么想的呢,用这1%你们能培养出我们所需要的力量来吗?你们错了,你们是在自欺欺人。如果你们不能以适当的方式提出对我们的活的力量的基本投入问题的话,那么你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你们是怎么想的呢?难道用1847年的机器能够培养出真正的工程师来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应该提出的任务是以适当的方式购买和获取必需的设备、新的机器,好让我们能够有合适的产品。在这方面,提出决议是不够的。

第二点,这里要搞清楚的一个特殊问题是:在这里发言的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和委员会的报告在专业面狭窄的专家问题上的分歧。我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同意委员会的看法。我只是认为,我们在乌克兰有自己的、培养专业面狭窄的专门人才的经验,做得好还是不好姑且不说,但是我们在自己的技术学校里,相当广泛地为生产的个别部门培养着专业面比较窄的专门人才,这样的学校在我们那里是高等院校;为什么这个委员会在说到新经验和新的类型的学校时,光是引证卡甘-沙布沙伊学院的经验呢?在这个问题上,乌克兰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联邦的教育人民委员部有一场很大的争论。我们认为,工业的发展,工业的专业化本身要求有组织能力的工程师的同时,也需要有大量的专业面比较狭窄的专业工程师。好在委员会提出的决议从原则上提出了这个问题。需要指出的,不仅是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使用卡甘-沙布沙伊学院的经验,而且还应该指出我们这里有乌克兰的经验。这个经验里有许多错误,有许多是需要改正的,但是有

一个健康的核心,那就是要接近工业的需求。

在这方面,苏联的和我们俄罗斯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我们反对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的斗争中和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提出了人民教育体系统一化的问题,这是很好的。这是必须做的事情。在我被任命为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之后,在全苏的教育人民委员部会议上,我很快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当说到“从1928—1929学年开始要着手实现苏联的技术教育系统的统一化”的时候,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实际的建议。着手就意味着要改造和制定出一个统一的系统,就意味着要从各种不同的体系中取来健康的、好的东西,要检查乌克兰的经验,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不小的事情。与这一点相适应的,就要重新研制各种大纲,而重新研制大纲可不是像烤饼、打鸡蛋那么简单的事,这就意味着要进行严肃的工作,不仅要吸收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各个机关参加,而且也要吸收工会组织和各个阶层的工人参加。

接下来这里说到了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要取消进修(第12页,第二部分,第一点)。引进用于取代进修制度的是,经济机关必须要安置高等技术院校的毕业生。莫洛托夫同志,用什么样的程序能够保障必须这样安置呢?保障必须这样安置,就像党和苏维埃政府原来的决议规定要给高等院校毕业的进修生提供位置那样吗?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虽然有这种必须执行的决议,但是他们中间有相当数量的人没有工作。你们并没有提出措施来让这一切一定能够付诸实践,而是提出了一个建议:给每一个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规定了必须根据经济机关的指示有3年的工龄。

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以前工龄是1—2年,而现在是2—3年必定要提供的工作。区别就在于,我们要检查所有这些大学毕业生,看他是工作了1年、2年,还是3年。在给他相应的工作之前,我们应该对他进行检查。在给一个毕业的大学生分配相应的生产方面的工作之前,在给他工作之前,需要对他进行检查,而几十个人的生活和整个企业的成就好坏要取决于是不是给他这个工作。只是在生产上对他进行了检查之后,在经过了一定的检查之后,才给他发放有权从事负责工作的证书。只要是他还没有经过检查,就不发给他证书。他可以从事辅助性的工作,但是不能把那些几十个工人的生命和工厂取决于他的决定的那些部门交到他的手上。

就拿矿业来说吧。你们不是想改变矿业监管的状况,让它取决于某个丑八怪吗!这个人刚刚从学院里毕业,过了半年就想从事负责工作了。不行,我谢谢你们了,你们还是让他在学院毕业之后工作上一两年再检查他一下,到那个时候



再给他工作吧。

现在来说一说关于移交高等技术院校的事。我想,在这里提出理由,赞成或者反对把一些高等技术院校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同志们忘记了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可以用乌克兰的一句谚语来表述:“哪怕更糟,也别像现在这样。”这就是现在赞成移交高等技术院校的基本想法。如果说莫洛托夫同志对这个问题的发言说到的是加里宁同志的方法,说的是直接谈话和间接谈话的方式的话,那么,克里尼茨基则是用了一个宣传鼓动家所特有的表达方式阐述了这一点。我认为这里不多不少,正是万事开头难。我认为把高等技术院校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是错误的。但是为什么就不能试一试呢?让我们来试一试吧。(笑声)但是为什么莫洛托夫同志在这里要说,过上一年我们再看看,可能我们是会转回来的呢?

**莫洛托夫:**也可能不是这样的。

**斯克雷普尼克:**是的,我们听到了有人说,比如在制定苏联宪法的时候,说是联盟的人民委员会要经过一些时间的尝试,可能要分出不同的层次来。但是对于这一点并没有听到什么风声,而中央各个机构的工作人员搞联盟化的胃口却越来越大了。为什么要说过上一年我们再看,可能要转回来呢。不行,看来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是长久的事。(笑声)就说移交吧。我的想法是,如果是要移交的话,为什么就要交给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呢?请允许我问一下。好像在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总的领导下,这件事让俄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是完全正常的,而我们这里是乌克兰联邦共和国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呀。可能委员会并不愿意在我们这里让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两个俄联邦矿业学院移交的同时把在斯大林诺的矿业学院,如果是用库班人的话说,搞成非乌克兰化了,如果用俄语来说,就是俄罗斯化了吧?为什么我说是“用库班的话说”呢?当塔干罗格区属于乌克兰的时候,那里是有乌克兰学校的。在塔干罗格区转交给了北高加索的时候,那里就有了搞非乌克兰化的指令,用俄语来说就是把学校俄罗斯化。我要说的是,是不是委员会有打算,要把位于我们国家领土上的矿业学院再搞成非乌克兰化的和俄罗斯化的呢?好像是并没有这样的打算。所以我认为,如果大多数人都主张把这些高等技术院校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那就必须是在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下,但是要有加盟共和国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参加。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在这里说,“无缘无故地把两所高等技术院校转交给了交通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是第三个感到高兴的。它并没有去争夺就

得到了两个高等技术院校,为的是因为它并没有去争斗。按照斯大林同志说出的理论是,如果争论,那就不会让你得到更多。(笑声)但是,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您忘记了一件事,您没有看到倒数第二段,那里说了:“在经济机关里——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部、邮电人民委员部里,在各个总局、经理部和大型的托拉斯里,挑选专家、监督对专家的培养、提拔和使用应该成为经济机关的理事会(部务会议)的成员在党的领导下的基本工作。”所以您要记住:除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外,还有正在等着的邮电人民委员部呢!总的来说,结果是,如果再争论下去,那么事情就会进一步发展,还会有其他的高等技术院校从您那里被移交出去。

莫洛托夫同志在这里发言说:需要找到新的途径,走新的、非官僚主义的道路。这个声明我是欢迎的。这是一个好的声明。只是我应该说,无论是在报告里还是在委员会的材料里,都看不到新的道路,好像对它们说得很少。这里得到的是某种重新洗牌:从一个部门移交到另一个部门。这里哪有什么新的、非官僚主义的途径呢?这样从一个部门转交到另一个部门未必就能够做到改善事情的状况,消除官僚主义的特点,而且这种从一个部门转交到另一个部门的做法本身就有着官僚主义的特点。为什么在决议里对人民教育事业要有工人群众更多的监督只字未提呢?

**莫洛托夫:**整个决议说的就是这个。

**斯克雷普尼克:**为什么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让我们能够更近距离地监督高等院校呢?我要说的是,正在发生的是这样一种现象:高等技术院校在招生,参加招生委员会的有:高等技术院校的校长,一名来自共青团支部的大学生和各种经济机关、工会的代表,等等。结果怎样呢?在我们乌克兰,去年没有一个招生委员会不是经济机关的代表宣布缺席的。在我们那里,没有一次不是工会的代表在招生委员会的工作结束后向工会做出报告的。没有一次是在大学的招生结束以后校长要对高等院校做出报告或者是在执行委员会里,在工会,在工作会议上,在省委等等地方做出报告的。实际上是并不想有工人群众的监督的。这件事是需要引起严肃关注的,需要改变我们现在的这种官僚主义的态度。而且,莫洛托夫同志,在决议里不是这样说的,请看看倒数第二行:“按照该决议指出的方向,在国家建设的所有领域里改进对红色专家的培养。”不对,不是要按照该决议指出的方向,而是应该这样,要让这件事实际上落实下来。在文化领域里,我们不是需要空洞的良好祝愿。这样的良好祝愿在文化领域里,在人民教育领域里,要多少有多少,我们的实际情况就像是地狱一样,良好的祝愿可谓多矣,有

些含沙射影的说法在你们的决议里也可以看到。考虑问题要从实际的可能性出发,从保障把这件事推行下去所必需的一切出发,要和发放的资金和付出的力量相适应,要有极其严格的监督。我同意,对指派来干这件事的人应该剥下三层皮来。为了得到贷款可以扒掉他的一层皮,但是要让生活能够有所保障,要让生活所必需的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一切都能有所保障。我们需要的不是给我们拨百分之一,而是拨给我们充分的资金。而且需要把党的注意力组织起来。你们用这个决议是在引起党的注意,而应该做这件事的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我认为,对党的组织需要补充上这样的决议。

主席:莫洛托夫同志发言。

莫洛托夫:同志们,我先来回答斯克雷普尼克同志提出的那些意见。不能不同意斯克雷普尼克同志的说法,说是对我们的年轻专家的培养必须要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要置于整个工人组织,特别是党的监督之下。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决议说得相当明确了。在引言的结尾部分说道:“根本改进对新的专家干部的培养这件事不仅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各个机关最不可推卸的任务,而且是经济机构等等不可推卸的任务。工会应该也根本上改变自己对此件事的态度,最积极地参加到培养红色专家的整个事业中来。培养新专家正在成为全党最最重要的任务。”

除此之外,在决议的第三部分里,对大学生的社会政治教育提出了一系列实际的指示,而且联系到这一点,指出了工会和党的组织应该做什么。如果有建议要把决议的这个部分展开,我们中间未必会有什么人反对这样做。

接下来是进修的问题。斯克雷普尼克同志说,决议里提出了要根据经济机关的指示,必须从事生产上的工作,用这种做法取代进修要么是没有新的东西,要么就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能一下子就把生产上要负责任的工作委托给要毕业的大学生。这一点是不能同意的。虽然斯克雷普尼克同志显然是作为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对各个教育人民委员部为工业培养出来的专家评价并不高,但是在这件事上他过于悲观了。如果不是让高等技术院校的毕业生在走出学校之后立刻就去领导工厂,而是让他们去当技师或者车间主任等等的助手的话,那么,斯克雷普尼克同志的担心就会失去根据了。现在存在的这种进修既不能让工业满意,也不能让学生满意。实践表明,在经过一年的进修之后,企业总是想方设法地努力要摆脱掉“进修生”。政治局的决议建议的是不这样做,而是建立起这样的办法来,让考进高等技术院校的人事先就知道,自己有义务根据经济机关的指示,至少要有3年时间从事生产。在现在的条件下,这样可以在向我国工

业注入新的专家方面得到很大的改善,因为这样就可以迫使经济机关更走近对专家的培养这件事了,而高等技术院校也就不得不更好地满足工业提出的要求了。从原则上说,在我国条件下,必须从事3年的生产工作也是不能不鼓励的事。在这中间有着某种劳动惩罚的成分,但是现在这种形式是完全合适的和可以接受的。无产阶级的国家不会是白白地把大量资金投到培养专家这件事上的!

至于这件事的物质方面的情况,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引用的简直就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数字。我该做的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提供更准确的情况了。

政治局关于物质方面的决定可以归结为以下内容:和去年相比,增加的总数大体上是5500万卢布。这里包括了从工业利润中提成的百分之三,这是决议里规定了的。在这个百分之三中,有一半纳入了教育人民委员部预算的相应部分,另外一半留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支配,但是它只能是把这笔钱完全用在技术教育的需要上。对第二部分工业提成的使用(数量大体上是1000—1200万卢布)应该是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进行协调,从更好地促进教育人民委员部在培养专家这件事上适应工业的真正需要的观点看,这是很重要的。众所周知的是,决议规定了要提高所有大学生,特别是高等技术院校和工业技术学校的学生的助学金。除此之外,规定了要提高教师的工资(在高等院校不低于15%,在高等技术院校不低于30%)。从总数上看,助学金和工资上增加的开支大体上是1750万卢布。剩下的3750万卢布将用于设备、建设和其他一些事。结果是对高等技术院校本身的物质需要的拨款比去年大体上将增加4倍。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在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物质方面以及在助学金和工资方面,迈出了多么大的步子。为了要把这个决定贯彻下去,我们不得不狠狠地勒紧裤腰带。我们听到了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悲观意见,但是,如果中央全会通过政治局的建议的话,我们将会争取没有任何削减地完成这些决定。

其他的东西就不说了,斯克雷普尼克同志指责我说,好像我反对培养专家的计划。我不打算回答这种反驳的意见,因为它显然是不符合我在报告里说的。

现在来说一说移交高等技术院校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一直引起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人的反对。我们拿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的论据来看看吧。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说,在培养专家这件事上企图引起各个部门之间的竞赛将会导致不好的结果。为什么?因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将会忘记所有的高等技术院校,只管移交给它的那一批高等技术院校。这种担心不能认为是根据

的。首先,这次全会的整个决定说的不是某一部分的高等技术院校,而是极大地改善所有高等技术院校的状况。既然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和雅科夫列娃同志认为特别重要的是要改善高等技术院校的物质方面的状况,那么恰恰是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的决议规定了毫无例外地对所有高等技术院校平等的条件,所以,从这方面说,没有理由说削弱了对那些没有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高等技术院校的关注。所以,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的第一个反对意见是站不住脚的。

接下来。我不得不提供实际的情况,根据政治局的决定要从教育人民委员部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管理的是什么。遗憾的是,教育人民委员在阐述的时候,在这里引用的是不符合实际状况的数字。准确的数字是这样的。在高等技术院校里,也包括在这个决议涉及的各个物理数学系里学习的,一共有5.4万名大学生,其中有4000名是在交通高等技术院校里学习的。

**卢那察尔斯基:**在几所高等技术院校里?

**莫洛托夫:**我现在说的不是高等技术院校的数量,而是学生的数量。要知道,在确定培养新专家这件事的个别部分之间的比例时,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要知道,我们的决议说的是专家干部,而不是高等技术院校的“干部”。从5万名学生中(不包括4000名学交通专业的学生),我们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是几所高等技术院校,一共是1.1万名学生;就所有高等技术院校的学生总数来说,这是22%。如果拿高等技术院校的整体情况来说,也就是说把交通专业的院校包括在内的话,那么,在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院校里的学生,就是在高等技术院校里学习的学生总数的28%。

**卢那察尔斯基:**您把物理数学系的学生也算到这里了吗?

**莫洛托夫:**这里引用的数字是我从俄联邦职业教育总局得到的,可以认为是完全准确的。

**李可夫:**可是物理数学系的学生包括在这里吗?

**莫洛托夫:**是的,在总数5.4万中,也包括了物理数学系的学生。

再对事情的实际方面的情况说两句。准确的数字说明,在俄联邦,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是总数为1.07万名学生的高等技术院校,它占俄联邦高等技术院校学生总数的27%。如果把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高等技术院校的学生加在一起,那么,这就占了俄联邦所有高等技术院校学生总数的34.5%。这就是说,即便是计算在除俄联邦以外的其他所有共

和国里的高等技术院校学习的学生数量的话,根据我们的方案,建议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管理的,总共大体上是高等技术院校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不是一半。遗憾的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们在类似的情况下讲的并不是事实,而是凭了自己的想象和潦草的计算。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反对把一部分高等技术院校从职业教育总局转交出去的另一个理由是,把一件事,甚至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处”分成两半是不合适的。原来是这样,如果我们想要在某个部门把某个让人起敬的处的职能削减了,这简直就是和布尔什维克的基本组织原则背道而驰的。也不大可能期待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能提出更奇怪的理由来了。这样的理由是没有必要去驳斥的。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还提出了这样一个理由:如果两个交通方面的高等技术院校都转到了交通人民委员部,那还有什么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之间的竞赛了呢?但是在这件事上,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把关于竞赛问题的提法搞得简单化了。的确,在经过了特别的讨论之后,政治局认为有必要把两个高等技术院校放在一家,也就是交通人民委员部的手里。但是在事情只涉及两个高等技术院校的时候,说严肃的竞赛是可笑的。教育人民委员部最好还是现在,当大体上有四分之三的高等技术院校和所有其他的大学都留在他们那里的时候,在培养专家的工作上能够加一把劲,并且能够证明今后在这件事上不会落后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那么多。就是在把几个高等技术院校移交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之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还是有着非常广阔的天地。更何况我们的工作开展得是最差不过的了。

我想在这里向教育人民委员会的代表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党的十五大之后,比如说从季米里雅泽夫农业科学院培养合作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工作人员角度看,为了改进科学院对这件事的安排,教育人民委员部做了些什么呢?我知道的是,非党的专家涅克拉索夫作为霍多罗夫斯基在职业教育总局方面的副手,向高等院校下发了一份引用了十五大的公文。但是难道这就够了吗?这只是能证明,事实上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个领域里还没有动起来。为什么为了竞赛起见,它不在这件事上也表现出它是善于把党的决定贯彻下去的呢?要么就是教育人民委员部,而且遗憾的是,在这件事上还有农业人民委员部,甚至还没有能认真地落实这项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有能认真地对待为合作社和集体农庄培养干部,为国营农场培养专家这件事。就我自己而言,我要说的是,如果其他的一些部门,比如说农业人民委员部,对为合作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培养干部更感兴趣的话,那我看,吸收农业人民委员部更密切地干预这件事,直至把

季米里雅泽夫农业科学院移交给农业人民委员部管理,就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了。要知道,提高农业这件事就要全靠技术和化学了,而且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正是要全力把技术和化学推进到农业中去,把这项工作和建设大型的农业生产结合起来。正是因为这样,如果不能真正地提出相应的专家干部问题的话,那么在农业上就没有干好主要的事情。这里所说的相应的干部,就是那些可以把广泛传播技术和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用化学并且把这些技术和化学方面的任务和农业生产的大型化的任务、和建设大型的农业原料加工的合作企业的任务、和组织大型集体农庄的任务、和开展国营农场的建设的任务结合在一起的干部。

现在再来说说新型的高等技术院校和缩短学习年限的问题。

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们说,建立这样的高等技术院校会导致培养专家的状况恶化。他们说,“你们看,西方正在从3—4年学制向5年制过渡”。但是要知道,谁也没有建议把所有现在的高等技术院校都转变成缩短学制的学校。建议做的是另外的事。建议的是哪怕创建几所学制缩短的高等技术院校,因为这样做我们将会加速向工业供应专家。而要知道的是,加速培养专家,特别是用这些技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已经经过试验的方法,对于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不能忘记的是,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现在应该记住一个谚语:“就是过不好,也得过得去。”教育人民委员部高高在上,企图无视实际情况。但是这种“高高在上”并不能吸引我们。我们应该走的道路是更广泛利用卡甘-沙布沙伊学院采用的那种方法。在乌克兰,好像是在组织高等技术院校这件事上走的是这条路,虽然我并不想用这一点来说,在乌克兰,对高等技术院校的安排这件事上,所有的方面都是做得很好的。至少我们知道,学制缩短的这种类型的高等技术院校在西方和在美国是存在的。

有人喊:在德国有学制3—4年的高等院校。

莫洛托夫:就是嘛,对德国是合适的,而在我们这里就好像一切都是顺利的,如果同意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看法,就应该和这种类型的高等技术院校作斗争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发生是因为教育人民委员部脱离了我国经济真正富有生命力的需求。经济管理人员要求建立新型的高等技术院校,而教育人民委员部并没有找到什么更好的办法,只是能和经济管理人员的这些要求斗来斗去。但是不管怎么说,谁更懂得经济呢,是教育人民委员部,还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呢?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是,经济机关能更好地理解经济的需要。我们没有义务也不应该是在所有方面都跟着经济管理人员走,但是在他们的要求真正符合经济最实质性的要求的那些方面,我们有义务千方百计地去

适应经济机关的要求。

决议对建立新型高等技术院校说了这样的话：“为了最快地培养出新型的专家和积累技术教育适应工业需要的经验，把6所高等技术院校和5所中等技术学校转交给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把2所高等技术院校转交给交通人民委员部管理。”

当然，把一些高等技术院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目的，在于加速培养专家和让这种培养能更多地适应工业的利益。除此之外，决议的这一部分特别强调了工会要积极参与对这些高等技术院校的领导。这中间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有什么不能接受的，有什么与党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呢？对于反对成立这样的高等技术院校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的盲目，只能表示惊讶。

另一方面，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是，对于被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那些高等技术院校来说，它们应该接受教育人民委员部总的领导和经常的监督。关于这一点，决议里已经说到了，而且这不可能引起任何怀疑。应该考虑到的是，在对培养专家这件事的安排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完全可能会有党所不能接受的倾向。如果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了让培养专家适应今天工业的需要，的确推行的是一条降低专家培养的科学水平的路线的话，那么，当然，对这种现象需要进行坚决斗争。在基本的高等技术院校里，我们不仅不应该降低培养专家的科学水平，而且应该千方百计地关心提高这种水平。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既需要“面宽”的，也需要“面窄”的专家。我们绝对必须要把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和主管经济方面的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结合起来，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时候。这也就是建议由中央全会批准的政治局决定的基本点之一。

对于转交高等技术院校问题还有一个意见。在我们的委员会里。开始的时候有相当多的同志反对转交。但是在委员会工作结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同志，除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外，可能还有委员会的2—3位成员，我们一致主张把几所高等技术院校转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开始时，大学生中央局的代表和整个大学生中央局是反对转交的，但是在深入了解了实际状况之后，他们主张转交。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现在对大学生中央局的同志们不满不是没有缘故的，这从今天的《真理报》刊登的他的文章<sup>253</sup>中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说在中央四月全会上要求注意讨论高等技术院校的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话,那么我们的委员会现在可以说,它在工作中对这件事的关注态度是完全得到了保障的。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关注了解高等技术院校的问题导致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表示了反对根本打破对新专家的培养。但是我们变得绝对理解了经济管理工作同志们对这件事要做出严肃修正的要求。就经济管理工作人员在这件事上的心态来说,在这次全会上,谢列布罗夫斯基同志的发言是非常典型的。来自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同志们可能就是现在也还是把这种讲话当成了耳旁风,但是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错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们应该明白,谢列布罗夫斯基同志是这样重要的经济管理工作,他对各个工业领域都具有专业知识,如果像他这样的内行简直都在对专家的培养大声吼叫的话,那就应该以一种最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些声音了。我们应该在这方面也加把劲,但是也要对我们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做些“宣传”,让他们能正确地对待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那些已经成熟了的问题。

有一点是清楚的,虽然教育人民委员部把相当像样的力量、智慧和经验投到了这件事里,但无论怎样,现在对新专家的培养不能让我们满意。虽然现在不得不指出国外专家的优秀质量,但是,我们总还是不能认为,国外对专家的培养状况就是我们的理想。在我国条件下,国民经济和工业是掌握在国家手里的,而且在最近这些年里是掌握在已经强壮起来的国家手里的,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利用国外经验中所有合适的东西,争取在这件事上有根本的改善。联系到这一点,在培养专家的制度中,不能不反对现在教育人民委员部身上相当消极地表现出来的那种保守主义。

对我们的新专家培养得不好,这是谁的罪过呢?在这一点上抱怨教育人民委员部是很容易的,但是,这样对待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就太狭隘和不公正了。

当雅科夫列娃对批评教育人民委员部做出了神经质的反应时,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用说,教育人民委员部不得不在困难得难以想象的条件下工作。而且对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批评的人没有足够地考虑到这一点,他们粗鲁地对这个领域里优秀的工作人员采取了不公正的态度。这些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合法地针对这一点说:“现在批评我们,这很好,可是当支持是这样微乎其微的时候,特别是对这件事的物质上的帮助是这样微乎其微的时候,批评我们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而且虽然教育人民委员部有所有这些缺点,虽说苏维埃机关、工会机关和党的组织对这项工作并没有严肃地加以关注,他们在这个领域里还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我们对培养专家的问题关注得迟了,是因为我们中间广泛存在的

是技术知识的贫乏,对这种状况,我们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再容忍了。如果说到“罪过”,那么该对这件事上的缺点负责的,不仅是教育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其他的人民委员部,而且还有联共(布)中央。

但是这无论怎样也不能为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在对待现在安排技术教育上的各项任务中过分的保守开脱。无论我们怎样珍惜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对提高技术教育这件事的忠诚态度,我们不能不批评教育人民委员部过分地热衷于这件事上的一些不良传统了。我们不能容忍的是,现在还能够看到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对经济机关公正要求的那种态度。不能容忍的还有过分地依赖这个领域里已经习惯了的各种套路,直到今天,这些东西还在束缚着教育人民委员部一些领导人的创造精神。在高等技术院校安排上克服一些老办法的残余,打破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某些工作人员的保守倾向,这是我们为发展高等技术学院走上新路所绝对必需要做的。

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在抵御关于保守主义的指控。他们有这样做的权利,而且在这里,在中央全会上,他们特别应该有可能把自己的意见说透。但是,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并没有以此为限,而是对中央说出了相当多的“不该说的”话。我指的是今天刊登在《真理报》上的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写道:“在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交通人民委员部规定了更多的助学金,学制是5年还要多一些。那为什么还要打破脑袋地用各种说法讲教育人民委员部‘保守’呢?让这个保守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给所有大学生都发更多的助学金,那所有的学生就都能5年毕业了。就大多数专业来说,少于5年时间是培养不出工程师来的。”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非常有感染力地防止我们去做“打破脑袋”的试验。这个劝告是好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并不完全合适。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发表上述文章是在政治局通过了决议之后,而且是在他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之后。而决议里说到了,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里有“一定程度的保守主义”。这样,同志们,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用自己的文章瞄准了谁,是很清楚的。可能明天在报纸上就将会出现全会关于高等技术院校的决定,而且我们并不怀疑,全会的决议会保留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件事上有“一定程度的保守主义”的提法。结果会怎样呢?今天人民委员讽刺地反对那些指控教育人民委员部有保守主义的人“打破脑袋”,而明天就会公布的中央全会决议又恰恰说到了这种保守主义。

伏罗希洛夫:这要靠自我批评来消除。

莫洛托夫:当然这可以靠自我批评来消除,但是我想,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在

《真理报》读者的眼里会变得非常尴尬的。他是不是该在党的决定上,在中央全会的决定上“打破脑袋”呢?

对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今天的文章再说上两句。文章写得很有战斗性,而且简直就是用了挑衅的口吻。比如说,文章里说道:

“甚至对卡甘-沙布沙伊学院的经验最怀有嫉妒心、对把这所中等技术学校变成高等技术院校哈哈大笑的朋友们,他们像是在按照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里的士兵药方行事的。你们记得吗,士兵是怎样用钉子熬汤的……”

于是接下来便挖苦地叙述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好像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故事是适用于那些为把卡甘-沙布沙伊学院转变成为高等技术院校而“忙碌”的人。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认为非常合适的做法,是在有他参加的情况下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把卡甘-沙布沙伊学院转变成为高等技术院校的决定<sup>254</sup>之后说这些故事。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直接发起进攻,针对的是在最近几天里作为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发表的东西。所以说,难道从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这方面说,在这个问题上去搞一个关于士兵的故事,不是很轻率吗?当故事并不会使讲故事的人处境尴尬的时候,这种故事才是合适的。好了,不说这些了!

剩下我该说的,是我在报告中由于偶然没有说到的东西。

我们这里也有在科技事业发展中令人高兴的事,需要在这次全会上说说的。虽然总的来说,我们落后于世界科技水平,但是在1926年的时候,我们这里发行的技术文献要比1910年多得多;1910年这种文献的发行量是177种,而在1926年是1384种。在同样的时间里,科技文献的页数相应的是264.4万页和1300万页。

伏罗希洛夫:质量呢?是不是一堆废纸?

莫洛托夫:关于质量我自己不敢说。我只能引用某些事实来解释这个问题。我从教育工作者工会下属的科学工作者部的卢波尔同志那里得到的材料说,很明显,国外的一系列科技杂志刊印了我们的科学工作者相当多的文章。在一家德国的化学杂志上,苏联专家学者的文章占了12%,而在另一家杂志上是19%。在德国的一份物理杂志上,1927年就刊登了我国学者的68篇文章,而在我们这里,却堆了一大堆没有发表的这样的文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科技文献出版和我国高等技术院校的教科书出版状况是糟糕的。我们这里有国家出版社,也有国家技术书籍出版社,可是大学生是从私人手里得到需要的教科书的。相当大部分的教科书至今是由私人出版社出的。难道这不是标志着我国的技术领域里和我们的国家出版社没有文化吗?虽

然最近这些年我国有关技术和化学方面的杂志是增多了,但是整个这件事的情况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需要立即有根本的改善。联系到这一点,我认为巴拉诺夫同志的建议是对的,他对决议中的一点做了这样的补充:“保障科技杂志和科学研究所和苏维埃学者的科学著作的出版。”巴拉诺夫同志的这个建议必须要写到决议里去。

对这一点应该补充的是李可夫同志在上一次中央全会上说到的,要最大限度地关注那些在发展科技思想方面有某种特殊表现的个别专家。应该扩大这样的专家的知名度。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个领域里的社会舆论的作用。各个经济机关、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工会都应该千方百计地帮助实现这一点。我们的飞行员找到了诺比列考察队<sup>①</sup>的一部分,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让广大的群众都知道我们有杰出的技术人员。对于那些在国家的技术发展中取得这样和那样的成就有关的、技术和化学领域的专家、工作人员,我们的报刊应该特别敏感。对于提高我们国家的科技工作水平来说,这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结束的时候对共产党员说几句。从我对企业的共产党员工程师所说的话里可以得出的是,决议建议的一点,那就是要动员1 000名有很好的经济、专业或者党的工作的实践的共产党员。对这1 000人来说,应该尽可能地让他们具有良好的物质条件,要让他们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需要的一支共产党员队伍。我们必须无论如何也要迅速地扩大共产党员专家的队伍,特别是从那些有着很好的革命工作实践锻炼的同志中间扩大这个队伍。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且是技术人员——这可能是现在我们最需要的一种共产党员。至少这是现在我们感觉最缺乏的那种类型的共产党员。

关于决议。我建议做这样的补充:第一,在决议里加上巴拉诺夫同志的建议;第二,根据斯克雷普尼克同志的建议,在决议里加上政治局的决定,即高等院校基本建设上的消耗应该列入基本建设开支一项内并把大部分开支挪到联邦预算中去。全会赞成政治局关于改善物质基础的决定将意味着,和去年相比,对高等院校的拨款将增加5 500万卢布,我们应该对这笔专款专用,并且要完全保障的确是合理地使用这一大笔钱来改善对新专家的培养。

主席:讨论结束。谁赞成基本通过决议草案?通过。做出了某些补充和建议。让我们先来表决没有疑问的——巴拉诺夫同志关于技术文献和报刊服务的

---

<sup>①</sup> 翁伯托·诺比列(1885年出生)是意大利的飞船制造者和北极探险家。1928年他曾领导了一支探险队乘“意大利”号飞船到北极探险,在斯匹次卑尔根以北处遇难。——译者注

修正。谁赞成通过巴拉诺夫同志的修正？通过。第二个建议：在决议里加上政治局关于把技术高等院校的基本建设工作和工业化的基本建设工作拉平的记录决议。这是斯克雷普尼克同志的建议。谁赞成这样做？通过。

**莫洛托夫**：需要这样做，同时要指出，全会同意政治局在改善物质基础问题上通过的措施。

**主席**：这里要指出联共（布）中央赞成政治局通过的改善物质基础的措施。

**卢那察尔斯基**：还有一个修正：我建议只限于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移交高等技术院校，放弃把高等技术院校移交给交通人民委员部。然后要限制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移交的高等技术院校的数量。

**雅科夫列娃**：我建议解决基本的问题：我建议把移交高等技术院校这一点从政治局的决议中去掉。

**主席**：现在表决。谁赞成把说到从加盟共和国的各个教育人民委员部把高等技术院校移交给各联邦人民委员部管理的那一段从政治局的决议中去掉？7个人。谁反对？大多数。

现在表决阿纳托利·瓦西里也维奇的修正。谁赞成移交限于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方面？少数。

谁赞成委托政治局重新审议削减应该转交给联邦人民委员部的高等技术院校名单？少数。还有什么修正吗？

**斯克雷普尼克**：在说到转交给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地方，要说是：加盟共和国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主席**：表决。谁赞成这个修正？一个人。

安采洛维奇提出的问题是，决议说的是不是所有的高等院校，这里也包括了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或者只是说的高等技术院校？它说的是高等技术院校，从中不能得出结论说，农业高等院校将会处于不好的条件。当然，各民族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和个别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应该把这个决议看成是关于特殊类型的高等院校的决定。

**卢那察尔斯基**：莫洛托夫同志说，物理数学系被认为是高等技术院校一类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所以我建议确定一下，的确，培养化学家的物理数学系应该列入高等技术院校的系统。

**主席**：我建议不讨论这个问题，而是转交给政治局最后解决。现在表决。谁赞成把这个问题转交给政治局？通过。

**科罗斯捷列夫**：莫洛托夫的委员会曾指出，要在决议里指出，我们指望的不

仅是培养年轻人,而且也需要注意再培训,提高教授队伍里真正是我们的基本干部的知识水平。遗憾的是,这个指示在决议里没有得到反映,虽然莫洛托夫同志在委员会里支持了这一点,而且说到了应该指出这一点。

**主席:**也就是说,在决议里要加上必须进行对已有的企业中的技术员和教授进行再培训和改善专业水平。我们加上这一点吗?通过。

**雅科夫列娃:**这个决议的最后版本里丢掉了整个讨论中的一个实质性的部分——这就是需要极大地在最近的年份里扩大工人夜校网。我请求把这一点加进去。

**主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是可以加进去的。

**斯克雷普尼克:**这里在决议里用了“技术学校”这个词。在俄罗斯这里是用“技术学校”表示中等学校的。在我们乌克兰,这是高等学府,是培养面比较窄的专家的。我建议在说到“技术学校”的地方说:“中等技术学校”。

**主席:**我建议,我们只讨论最主要的问题。

更大的修正还有吗?没有了。现在表决最终形式的决议。谁赞成这个决议?谁反对?谁弃权?

决议一致通过。我们还必须通过两个决定:一个是关于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联共代表团组成。上一次我们委托了政治局组织这个代表团。你们是不是可以在全会上讨论代表团的组成或者是委托政治局组织代表团?

**喊声:**委托政治局。

**主席:**谁赞成委托政治局?谁反对?谁弃权?通过。

政治局认为有必要让全会通过它的下列决定,我们在本次全会工作期间已经讨论了这个决定,那就是:

(1)满足卡冈诺维奇同志关于解除他在乌克兰的工作并建议全会批准他担任联共(布)中央书记。

(2)推荐C.柯秀尔担任乌共(布)中央第一书记,解除他的联共(布)中央书记的职务。

**喊声:**通过!

**主席:**关于这个建议有没有人要发言?没有。谁同意政治局的决定?通过。

建议还通过下面一个决定<sup>255</sup>:让卡冈诺维奇同志加入组织局和解除柯秀尔同志组织局委员的职务。

**喊声:**对!

**主席:**请允许我认为这是通过了。

还有没有什么建议？

喊声：全会闭会！

主席：全会闭会。

## 附 件

### 1

## 1928年7月4—12日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全会会议记录№3

### 出席人：

#### 联共中央委员：

阿库洛夫, А. А. 安德烈耶夫, 安季波夫, 巴达耶夫, 鲍曼, 布哈林, 伏罗希洛夫, 加马尔尼克, 戈洛谢金, 多加多夫, 茹可夫, 泽连斯基, 卡巴科夫, 卡冈诺维奇, 加里宁, Э. И. 克维林, 基尔基日, 基洛夫, 克诺林, 科洛季洛夫, 科马罗夫, И. В. 柯秀尔, С. В. 柯秀尔, 科托夫,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Н. К. 克鲁普斯卡娅, 库利科夫, 古比雪夫, 列普谢, 洛博夫, 洛莫夫, 柳比莫夫, 马努伊尔斯基, 梅德韦杰夫, 缅任斯基, 米高扬, 莫洛托夫, 莫斯科温, 奥拉赫拉什维利, Г. И. 彼得罗夫斯基, 波斯特舍夫, 皮亚特尼茨基, 鲁祖塔克, 鲁希莫维奇, 李可夫, 斯克雷普尼克, А. П. 斯米诺夫, 索柯里尼柯夫, 斯大林, 斯捷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 斯捷茨基, 斯特里耶夫斯基, 苏利莫夫, 瑟尔佐夫, 托洛孔采夫, 托姆斯基, 乌加洛夫, 乌格拉诺夫, 乌汉诺夫, 丘巴尔, 丘多夫, С. 施瓦茨, 什维尔尼克, В. 施米特同志。



**中央候补委员：**

阿列克谢耶夫,安采洛维奇,巴拉诺夫,布留哈诺夫,瓦雷基斯,格伊,格里亚金斯基,日丹诺夫,В. И. 伊万诺夫,伊克拉莫夫,卡雷金娜,卡明斯基,А. С. 基谢廖夫,克利缅科,Т. 康德拉季耶夫,克里尼茨基,列昂诺夫,洛佐夫斯基,洛卡茨科夫,洛米纳泽,马尔科夫,美尔尼昌斯基,米尔佐扬,穆萨别科夫,尼古拉耶娃,诺索夫,奥新斯基,В. И. 波隆斯基,К. 鲁缅采夫,伦金,留京,谢苗诺夫,谢列布罗夫斯基,索博列夫,斯特罗加诺夫,苏霍姆林,温什里希特,乌雷瓦耶夫,哈塔耶维奇,齐洪,丘维林,丘茨卡耶夫,埃利亚瓦,埃赫同志。

**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З. М. 别连基,А. С. 布林,П. М. 维克曼,А. З. 戈尔茨曼,Н. К. 贡恰罗夫,格里亚泽夫,С. И. 古谢夫,А. С. 叶努基泽,В. П. 扎东斯基,Р. С. 泽姆利亚奇卡,Н. И. 伊利英,М. М. 卡冈诺维奇,М. И. 卡尔马诺维奇,П. Н. 卡拉瓦耶夫,М. Н. 科科维欣,Г. А. 科罗斯捷列夫,И. И. 科罗特科夫,Т. С. 科里沃夫,Д. З. 列别德,Ф. В. 连格尼克,Н. В. 利西岑,Т. И. 梅德韦杰夫,米利恰科夫,В. П. 米柳亭,А. Х. 米特罗法诺夫,Г. 莫罗兹,А. М. 纳扎列强,И. П. 帕夫卢诺夫斯基,Я. Х. 彼得斯,В. А. 拉杜斯—津科维奇,С. Ф. 列坚斯,О. Л. 雷夫金,Е. Ф. 罗兹米罗维奇,Б. А. 罗伊津曼,М. С. 谢尔古舍夫,С. Н. 斯米多维奇,А. А. 索尔茨,Я. Э. 斯腾,捷列霍夫,М. И. 乌里扬诺娃,Ю. П. 菲加特纳,С. И. 菲勒,Ф. А. 齐利科,В. П. 舍博尔达耶夫,П. С. 舒什科夫,А. 雅科夫列夫,Я. А. 雅科夫列夫,Е. М.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贝金,里亚比宁,斯捷潘诺夫,尤列维奇同志。

**总共出席：**

中央委员 64 位,中央候补委员 44 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48 位,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4 位,总共 160 位同志。

## 听取并决定：

### 1928年7月4日的决议

#### 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问题(曼努伊尔斯基同志)

注意到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通报。

### 1928年7月6日的决议

#### 二、共产国际纲领(布哈林同志)

(一)基本通过纲领草案。对提出的关于修改纲领文字的建议在全会上不做决定。

(二)建议在全会上提出修改意见的所有同志将意见以书面形式递交给联共(布)代表团。

(三)建议联共(布)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保障尽可能在修正意见作者参加的情况下,在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委员会审议这些修正意见。

### 1928年7月10日的决议

#### 三、在总的经济局势下的粮食收购政策(米高扬同志)

(一)批准政治局提出的米高扬同志关于在总的经济局势下粮食收购政策的报告决议草案。

(二)将中央委员就讨论米高扬同志的报告提出的实际建议转交给中央政治局研究。

### 1928年7月11日的决议

#### 四、关于组建新的(谷物)国营农场(加里宁同志)

批准政治局提出的加里宁同志关于组建新的(谷物)国营农场的报告决议草案及随后的修正。修改第1段里的数字:用“4—5年”取代“3—4年”。在第7款里用“任务”的字样取代“工作纲领”的字样。

### 1928年7月12日的决议

#### 五、关于改进高等技术院校对新专家的培养(莫洛托夫同志)

(一)批准政治局提出的莫洛托夫同志关于改进高等技术院校对

新专家的培养决议草案并做出以下修正。

1) 在第 2 部分第 2 款末尾补充上一点:

ж) 保障科技杂志发展事业和科研院所的学术著作的出版。

2) 在全会的决议中加上政治局关于拉平对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与国民经济领域的基础工作的财政拨款(政治局记录第 32 号,第 2—B 款)

3) 接受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的建议,在决议里(第 2 部分末尾)加上关于保障提高对专家的科学理论培养水平一款。

4) 在决议里指出必须要对现在已有的干部,包括企业里的技术人员和教授,进行专业再培训和专业化水平的改善。

5) 在决议里加上关于扩大工人夜校网一款。

6) 把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提出的将数学物理系纳入该决议适用的高等院校范围的建议转交给政治局最后解决。

六、关于联共(布)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团的组成委托政治局制定联共(布)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团名单。

七、关于卡冈诺维奇和 C. 柯秀尔同志(1928 年 7 月 7 日政治局记录第 33 号,第 1 款)

(一) 批准政治局决定:

1) 同意卡冈诺维奇同志的请求,免除他在乌克兰的工作和批准他任联共(布)中央书记。

2) 建议 C. 柯秀尔同志任乌共(布)中央第一书记,解除他的联共(布)中央书记职务。

3) 吸收卡冈诺维奇同志作为联共(布)中央组织局成员,解除柯秀尔同志组织局委员的职务。

## 2

## 声 明

亲爱的布哈林同志：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洛米纳泽同志的意见是完全不公正的，而且完全歪曲了美国共产党在选举运动中的政策和活动。

简言之，事实是这样的：

(1) 竞选机构中的一位工作人员制定了一个愚蠢的、非共产党的公文，对怎样得到签名来在选举中帮助我们党提出了建议。

(2) 这份公文是在没有得到批准和破坏了党的整个政策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3) 它在有可能在党的各个支部传播之前就被我压住并取消了。

(4) 向党的各个支部散发了信和公文，阐述了党的政策并强调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参加选举运动的目的是传播共产主义的宣传和争取我们党的新成员和支持者。

(5) 从来就不是我们党的政策或者这种政策的某个部分的作者和非共产党的文件受到了我们的政治委员会最严厉的一致谴责。

(6) 我们党的整个竞选政策的基本内容是阶级斗争，而且是顽强地对工人阶级提出我们最终的基本目标和近期的要求。

我抗议这样显然错误地描绘我们的党，而且我请求把我的声明放进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的记录。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杰伊·洛夫斯顿  
美国工人(共产)党书记

## 3

米高扬同志在 1928 年 7 月 4—12 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关于在总的经济局势下的  
粮食收购政策的报告图表

一、“剪刀差”。工业价格指数高出农业价格的收购价格指数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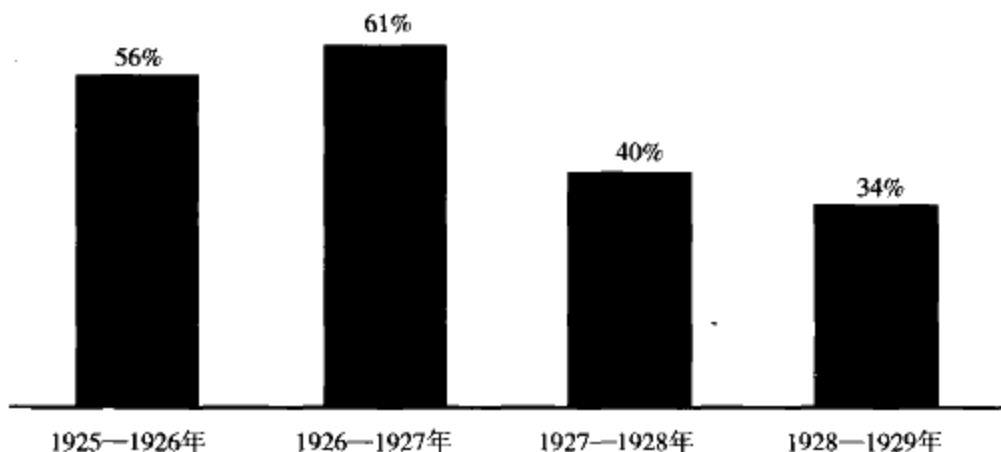
二、年平均指数的变化情况。

三、1928 年预计收获的粮食总量和 1927 年实际得到的粮食总量的比较。

图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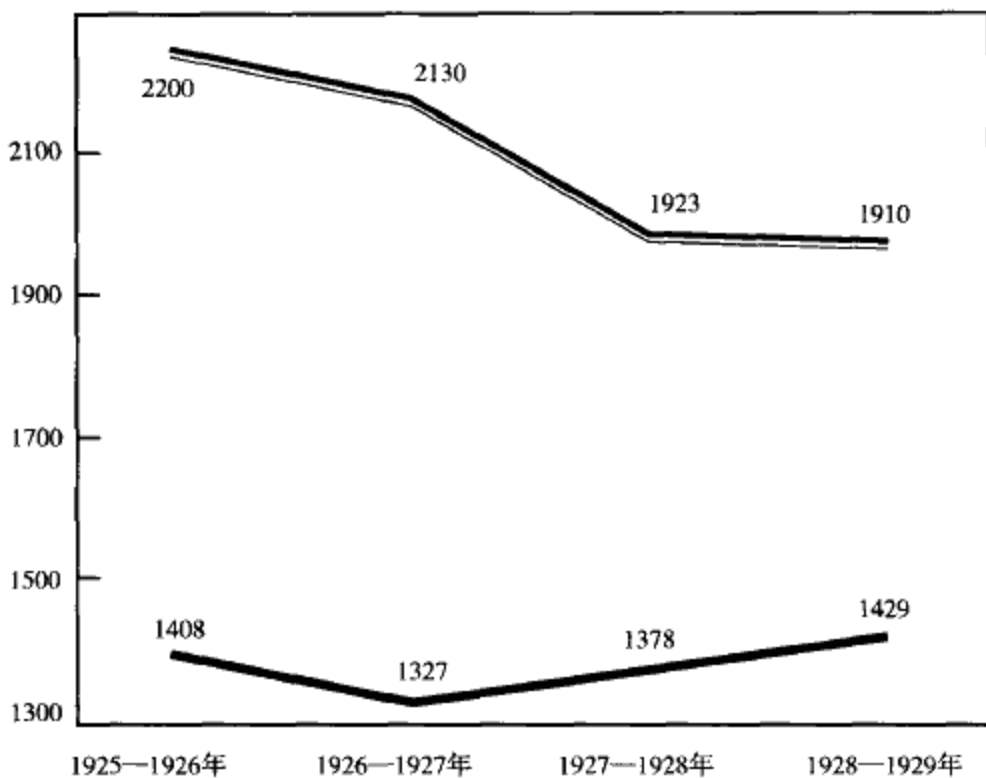
## “剪刀差”

工业价格指数高出农业价格的收购价格指数的百分比(%)



图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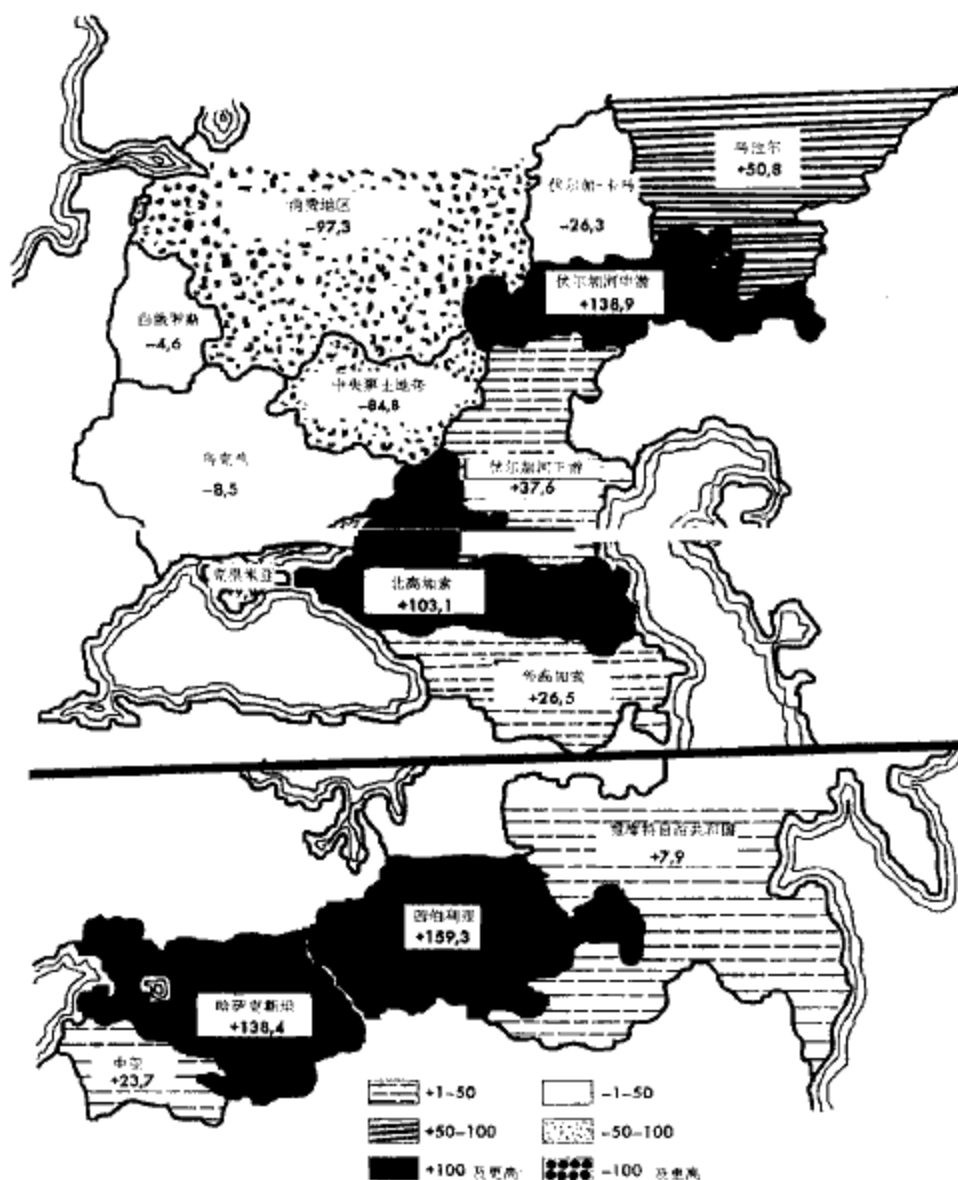
年平均指数的变化情况



注:上线为中央统计局公布的工业品合作社零售指数变化状况(农业年);下线为收购价格指数变化状况。

图表 3

1928 年预计收获的粮食总量和 1927 年实际获得的粮食总量的比较  
(百万普特, 6 月 15 日统计数字)





## 4

## 在总的经济局势下的粮食收购政策

1928年7月10日联共(布)中央全会  
根据米高扬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事实是：社会主义大工业在新技术(改造)的基础上获得迅速的发展,整个建设事业(包括电力建设业)也在发展,城市和工业中心不断增长,工人阶级的数量增加了,质量也提高了。

但是,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仅限于工业一方面。要使社会主义建设完备而全面,就必须包括农业,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提高农业的发展水平。然而农业现在仍然处于极低的水平,它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工业。

工业本身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上对农业进行改造的巨大动力,而农业则是工业发展的基地,是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是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不但如此,工业生产资料的进口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产品首先是谷物产品的出口量,而工业生产原料的进口量对于工业的发展速度有着一定的影响。最后,维持经济的机动能力十分必需的外汇后备积累的可能性也大大取决于农产品的出口量。

因此,在整个国内外形势迫使社会主义工业必须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农业的特别是谷物部门的极低的水平包含着使社会主义的城市和小农的农村发生破裂的危险,因而也包含着使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条件遭到破坏的危险。

这种危险由于谷物生产的落后(谷物生产的增长落后于国内市场和发展出口对粮食的需求的增长)而特别明显了。谷物经济无论在生产率(单位面积产量)或商品率方面都是农业中最落后的部门。这方面最突出的情况是：尽管播

种面积已达到战前的 95%，谷物生产的商品粮却仅及战前的 50% 稍强。因此，战前每年出口粮食达 6 亿—7 亿普特的情況现在几乎已完全不可能了。

谷物经济的这样落后及其商品率的锐减（与战前比较），其根源就是农业生产的散漫性、分散性和普遍低下的水平，谷物生产的小农形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谷物生产的半自然性质。在这里起着不小影响的还有下列情况：一方面，没有充分利用一切足以提高中小农民经济生产率，特别是提高谷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的办法和可能（纯种种子、机器、肥料、土地规划、农艺宣传）；另一方面，谷物价格低于其他农业部门的产品价格。

因此，谷物问题是经济政策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为了解决谷物问题，消除城乡之间破裂的危险，铲除粮食战线上可能产生的困难的根源并从而保证国家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必须：

1. 保证帮助在相当时期内还将是我国谷物经济的基础的中小个体农民经济的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从价格、机器、矿质肥料、纯种种子、谷物预购合同、土地规划等方面给予帮助），日益广泛地把它包括在合作社组织中并促进农民经济的生产过程的联合。鉴于在吸引农户参加合作社流转，特别是在农业生产合作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全会特提醒全党注意：具体实现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对于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商品率以及逐步把它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轨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 坚定不移地实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起来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这种集体经济是建筑在新技术基础上的自愿联合，它无论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或从保证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商品率方面来说，都是高级形式的谷物经济。

3. 发展现有国营农场和建立新的国营谷物农场作为“社会主义大经济”（党纲），这种农场能保证最高的商品率，并且和集体农庄同样，都是协助农民经济进行改造的据点。

谷物经济的散漫性、分散性和落后性是粮食战线上可能产生的困难的根源，而这种可能性就在今年已经变成了现实，其结果再加上一些特殊原因就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这些特殊原因是：

（1）由于农村收入增加，特别是农村富裕阶层和富农阶层的收入增加，农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增长超过了工业品供应的增长，于是市场的平衡遭到破坏，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加剧。

（2）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比价不合理，因而减弱了对于出售余粮的刺激；但

是,党在收购年度的下半年还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因为这样做会损害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的利益。

(3)计划领导方面有错误,主要表现在商品运送不及时,对农村有产阶层收税低。

(4)收购机关、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有缺点(没有统一战线,缺乏积极性,听其自流)。

(5)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富农、投机分子)利用这一切缺点来破坏粮食收购工作。

由于这些缺点,到1927年年底,和前一年比较,国家就缺粮12800万普特,这就使整个国民经济遭到危机的威胁。

由于及时地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中一部分是带有非常性质的),党和苏维埃政权才得以防止了这种威胁,在1月至3月内弥补了收购年度上半年的缺额,使粮食收购量在4月1日前达到了去年的数字,如果进一步完成粮食收购计划,就能保证满足国内市场在新谷收割前的需求。

但是,由于粮食主要供应地的乌克兰南部和北高加索部分地区的秋播作物遭受灾害,乌克兰完全不能供应粮食,北高加索部分地区不能供应粮食,这不仅使国家在新谷收割前的粮食收购量减少约2500万普特,而且需要给予种子帮助以供再播之用,同时国家还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提供3000万普特的春播种子帮助。这种情况加上粮食因超计划供应(消费者增加)而使支出过多,使收购机关不得不加紧其他产粮区的收购工作并动用农民的防荒粮。

这一切使收购地区重新采用非常措施和行政命令的方法,为破坏革命法制和部分地采取余粮收集制方法(挨户巡视、封闭市场、非法搜查等)造成了基础;而在消费区,由于大大缩减供应计划,使得一些地方产生“排队”和部分地实行粮食配给制的现象。

这种情况引起了某些农民阶层的不满(这表现在一些地区对强迫命令提出抗议),使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得以利用这种不满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使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局部地活跃起来并为废除新经济政策的论调提供了根据。党中央委员会在采取非常措施时曾坚决指出这些措施是临时性的,虽然如此,还是有人把这些措施解释成是从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加紧进攻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决定中有机地产生出来的,这只是说明党内一部分人直到现在还是处在与党敌对的思想影响之下。党的政策的出发点应当是:既要对那些表现我国资产阶级倾向的和企图避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的决定的分子作坚

决的斗争,又要对那些力图使非常的临时措施具有经常的或长期的方针的性质、从而使工人同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受到威胁的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中央全会坚决驳斥关于取消新经济政策、要求取消对富农权利的限制的反革命滥调,完全反对那种违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的路线,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绝不是用所谓“剥夺富农”的办法),同时声明:新经济政策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列宁)<sup>①</sup>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政策。中央全会指出: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的发展,不会使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削弱,而只会使它加强,同时,苏维埃政权及其群众基础也更加加强起来,但这并不排斥某些基层在整个形势紧张时发生一定的动摇。“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和向富农进攻的政策”(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应当是党在农村的基本的阶级方针。如果说社会主义形式的发展会引起资本主义分子加强反抗,那么,计划领导方面的错误和我们政策中的缺点则会增加这种反抗的程度,会让资本主义分子把城乡小资产阶级中的动摇阶层拉过去。因此,在即将开始的粮食收购运动中,党应当注意的是,采取一切办法来消灭这些缺点和错误而避免采取任何非常措施。

这些办法是:

1. 立刻制止挨户巡视、非法搜查以及任何破坏革命法制的行为。
2. 立刻制止各种各样重新实行余粮收集制的行为和任何封闭集市的企图,同时保证由国家机关充分灵活地调节商业。
3. 根据不同的地区和谷物种类,酌量把粮价提高一些。
4. 在分配工业品方面不容许重犯错误,同时要保证及时地把工业品运送到粮食收购区。
5. 把收回贷款、征收单一农业税的政策和粮食收购的利益结合起来,保证及时归还贷款和缴纳农业税。
6. 不断地对酿造私酒作斗争。
7. 合理地组织粮食供应工作,不准有超过原定计划的支出,地方商业和收购机关应负责供应未纳入国家总计划的消费者的需要。
8. 一定要建立国家的粮食(口粮和种子)后备。

苏维埃政权在种子方面所给予贫农和中农的巨大帮助保证了春播面积的大大扩大,这种情况和苏联中央统计局在6月15日的统计材料中所估计的良好收

<sup>①</sup> 原文未标出处,系自译。——译者注

成(中上等)景象是完全符合的。所有这一切加上工业产品的增长和收购机关的改组,再结合上述措施,就能够使收购工作在秋季以前(虽然机动粮还缺乏)达到正常的速度。

要实现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继续进攻农村资本主义分子方面的决定,需要全党和全体党员坚持不懈地经常地提高贫农的政治积极性和组织性,并发展他们的经济。

全会深信党一定会光荣地克服目前的困难。

全会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集中全力胜利地贯彻党的粮食收购政策。

## 5

给全会主席团的便条<sup>256</sup>

## 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处

我们请求把该声明附在全会的速记记录上。

李可夫同志在自己昨天的发言里把西伯利亚边疆区委第二书记基西斯同志算做是把粮食收购时候采用的非常措施变成经常性制度的思想家。

这个完全不正确的说法依据的是从基西斯同志在边疆区委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断章取义地抽出来的一句话。

[最近根本就好像是确定了一种实际做法,凭着随意从西伯利亚的个别工作人员的讲话和文章中抽出一句话或者一段话,根据它们来评断西伯利亚组织的活动。采用这样的实际做法,要把不正确的路线(而且也包括甚至是彼此相互排斥的路线)归罪于他们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在边疆区委全会上,基西斯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没有说到非常措施,也没有建议把它们变成一种制度。他的发言涉及的只是调节性的经济措施和社会主义成分对农民的自发性施加影响,以及用旺盛的和有活力的速度取代松懈的速度。

在这样的上下文里,基西斯同志的那句话(“粮食收购是十五大上说的我们工作的新阶段的开始”)就有了完全不是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由于误会加在了基西斯同志头上的那种意思了。

总的来说,如果李可夫同志是想打击主张过火行为和歪曲的人,那他显然是走火了。而且在边疆区委的这次全会上,李可夫是可以找到合适的对象的。库奇明和季明同志在全会上维护的是这样的论断:107条的任务是向中农指出,他们的经济不应该朝着个体方向发展,朝着变为富农经济的方向发展,完成粮食收

购计划直接取决于有多少按107条处理的事件,边疆区委在采用107条时做的那些限制是在破坏粮食计划。

基西斯非常有力地表示了反对上述同志(在伊尔库茨克区)的这些论断和实际做法。库奇明和季明对私人资本的路线表明,一种过火行动和歪曲多么容易和另外一种类型的歪曲结合起来。库奇明和季明领导的伊尔库茨克区委员会常设局(不是全体)委托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请求私有者帮助恢复地方工业。而且这是以这样的形式和这样的表达方式做出的,使得伊尔库茨克的私有者认定新一轮新经济政策正在开始,政府有了新的方针,于是在写给大区执委会主席的报告里,在欢迎这种“新的方针”的同时提出了政治性的要求:商人和私营企业者的公民权,让他们的子女能够自由地进入高等学府,在商业和工业上取消对私有者的限制,等等。

没有什么可说的,现在上述同志的“有益”活动在西伯利亚已经被停止了,但是他们的这种把所谓的左派分子和右派分子结合起来的“过火行为”的经验(如果这可以叫做过火行为的话),比起从基西斯的发言中偶然抽取的一段话,要更有教益,基西斯在粮食收购时期的所作所为是无可指责的。]

瑟尔佐夫 埃赫<sup>257</sup>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717号案卷,第74张。)

## 致李可夫同志

请把下述声明附在中央全会关于粮食收购的速记记录后。

李可夫同志在自己的发言里把我关于必须更好地考虑谷类饲料平衡表、关于在地方上消耗谷物加工费的时候对粮食计算上的缺点、关于在斯大林格勒市企图推行票证制度时的错误的考虑(见发言速记记录)说成是某种“战时共产主义”的倾向,导致了必须要考虑所有的消费和在消费者之间直接分配粮食。

我坚决反对这样述说和解释我的发言,它们无论如何不是来自我的发言的,也是任何一句话都不能证实的。相反,我指出的是,对付粮食收购的困难的一个基本措施是必须更灵活地运作粮食价格和创造一系列条件(预购合同、合作社的附加支付等)来刺激农民出售粮食。

关于对农村局势的政治评价,我同意安德烈耶夫同志的评价,所以也认为必

须立即取消粮食收购方面的非常措施和不能允许在未来的粮食收购中再推行这些措施。

**Б. 舍博尔达耶夫**

1928年7月10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717号案卷,第63张。)

### 致全会主席团

请宣读以下内容。

卡冈诺维奇同志说我建议必须要把粮食价格增加一倍。这显然是出于误会。我说的是确定价格的对应水平时要增加一倍。但是,虽然我认为提高贸易人民委员会建议的12%是不够的,当然不可能是建议,而且也没有建议要提高100%。同时我想,消灭所谓的“剪刀差”依然是我们的任务,而且在今天的局势下,增加粮食价格是沿着减少存在的“剪刀差”差距的道路迈出的正确的一步。

[2)斯大林在自己的发言里声明说,我把小经济称做是可诅咒的。实际上我的发言的速记记录里(没有修改过的)说的是:“我们不得不坐上木制的马车,这是我们该诅咒的,这把我们给捆住了,但是我们没有足够地强大到现在……就能从这个木制的马车上爬下来。”正像从这一段里可以清楚看到的,该诅咒的不是小经济,而是我们对农民经济的依赖。照斯大林的解释,我是忽视小型经济的意义的,别的不说,这是和我的发言的意义相矛盾的。]<sup>258</sup>

**Г. 索柯里尼柯夫**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717号案卷,第70张。)

### [致联共(布)中央全会主席团

因为在讨论中指责我说,我自己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里没有单独说清楚非常措施的影响,我认为必须要让全会了解到,在我所掌握的(关于秋播和春播的)统计材料里只能够搞清楚在1928年上半年展开的那一切的总的影



我所说的正是在1928年上半年发生的一切的总的的影响,这是我的文章所说的。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下面的问题:“农村中阶级关系的尖锐化有了鲜明的表现,在过去的1928年上半年里,特别是在(我要强调。——Л.克里茨曼)粮食收购运动中,它在农业上有怎样的反映呢?”,也就是说,为落实十五大的决定对富农的进攻,以及困难引起的非常措施加在一起,有什么样的反映。

我由于没有材料,没有能够客观地分别说清楚两种情况的影响。

正像我在这里的全会上发言的时候展开谈的,我所引用的材料证明了,贯彻十五大的决定并没有导致农业的衰退。我所要证明的就只是这一点。

Л.克里茨曼] <sup>259</sup>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717号案卷,第64张。)

### [致联共(布)全会主席

我请求宣读以下内容。

我今天说到,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与商品和货币的范畴平行地还保留着工资和利润的范畴,这样说的时侯,对这个思想的表述不够准确。

前面的两个范畴的确是保持着实际的存在,后两个范畴只是在形式上存在。它们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和直接的生产者的分离,生产资料变成资本——消失了。一方面,它们(工资和利润)的形式继续存在,因为生产过程的参加者对新的生产关系在心理上的适应还没有过去,另一方面是因为商品交换和用货币计算还在继续。

因此,在新经济政策的经济形式中,列出的“经济联系的市场形式,货币体系”中,不能加上“工资”的字样,而可以加上的只是“工人参加分配的产品的货币形式”。

奥新斯基]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717号案卷,第58张。)

## 6

## 关于组建新的(谷物)国营农场

1928年7月11日联共(布)中央全会  
根据加里宁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同意政治局为执行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依靠改进农业技术、广泛采用新式机器和农具,利用闲置土地以及增加商品粮食产量来加强农业中社会主义成分的决议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并批准政治局发布的下列具体指示,“在四五年内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的一些不致因建立新的国营农场而触动农民‘份地’的地区建立新的大型国营谷物农场,要使它们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年产商品粮食1亿普特”。

中央全会建议在今后建立新的国营谷物农场的工作中遵循下列原则:

1. 必须极其慎重地为新的国营谷物农场选择场址,要在气候、土壤和经济条件都很适宜的地区建立农场,以保证这些企业能够尽量避免亏损,而获得最大限度的盈利。

2. 建立新的国营农场时必须预计到使它将来能成为周围农民的农产品加工的工业中心,并成为农业公有化的有力杠杆(例如乌克兰的舍夫琴柯国营农场)。

3. 设法筹集建立新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资金,并预计在建设时期结束时能获得1亿普特商品粮食。

4. 区域委员会、省委员会和工会机关应特别注意慎重地挑选建立和管理新的国营谷物农场的领导干部,把工作经验丰富的优秀专家和最果断坚定并富有组织能力的政治领导者派去担任这一工作。

5. 应采取一切办法以足够数量的农具、首先是拖拉机供应新的国营谷物农场,以便使农场的工作完全机械化并保证田间工作的机械化达到最大限度。

6. 在建立新的国营农场时,必须广泛地学习和研究在外国和在我国原有的国营农场中建立大农场的经验,以保证最大限度地节约资金和缩减非生产开支。最好通过根据包工合同把个别农场的建设包给外国建设人员的方式部分地吸收他们参加农场的建设。

7. 确定 1928 年的总耕地面积的任务是:保证在 1929 年得到 500 万到 700 万普特商品粮食。

## 7

## 关于改进对新专家的培养

1928年7月12日联共(布)中央全会根据  
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党提出的“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赶上然后并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这一任务,要求在我们的生产中不仅尽量采用我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最高成就,而且要采用外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最高成就。这个任务同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进行的工业改造以及工业的社会主义合理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要实现这个任务,必须使科学、技术和生产密切联系起来,必须坚决地促使科学工作去协助解决工业、运输业和农业所面临的各种任务,并保证供给它们足够的受过相当训练的技术干部。

然而目前我国工业状况的特点是:工程师的百分比非常低,技师的百分比尤其低,做技术性工作的“实践家”的百分比却异常高(39%),新的青年专家增添得很少,而且他们的科学技术修养不高;能够保证适应苏联的经济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合理化的、直接参加生产的新型工程师极为缺乏。沙赫特事件表明,虽然绝大多数专家都能忠实地工作,但在他们当中,特别是在过去享有特权的分子当中,至今还有直接带头怠工和破坏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这就更加尖锐地向我们提出为工业和运输业培养新的红色专家的问题。

虽然高等技术院校的工作有了一些成就(根本改变了学生的社会成分,其中无产阶级成分已占有决定意义的比重;扩大了学校网;多少整顿了学习生活,如此等等),但是整个说来,应该承认目前培养专家的工作还是不顺利的。培养专家的制度没有同工业有机地联系起来,没有同工业发展的要求和速度相适应。这个制度不能保证青年专家掌握我国和外国的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现有的教员和教授非常不够,而且水平很低,他们往往落在最新的成就的后面。目前,

技术教育同生产脱节。生产实习组织得不能令人满意。高等技术院校学习期限过长(6—8年),毕业生人数太少,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高等技术院校里的学生通常都不学习有关的工业部门的经济学。至于高等技术院校在对新专家的社会政治教育方面,尽管学校里有各种学生组织广泛进行活动,但是情况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培养中等技术人员方面,上述的缺点大都表现得更为严重。此外,中等技术学校的数量更是少得可怜。

所有这些缺点是和我国一般的技术经济落后有关的,是和我国在战争和革命年代与外国的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脱节有关的。高等技术院校工作的物质条件很差(尤其是革命初期),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在培养新专家的工作中所产生的极严重的缺点,也反映出我们还存在着同生产脱节的旧的高等技术院校的残余,在培养新专家的组织工作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保守思想,对广泛采用培养专家的新方法缺乏应有的注意。目前经济机关不重视培养熟练工人的工作,特别是培养新的工程师和技师的工作,同时缺乏发展工业的远景计划,这就使毕业的青年工程师和技师的数量(尤其是在纺织和建筑等生产部门中)远远赶不上工业的需要,因此,必须从速消灭这种不协调的现象。

这样,一方面是正在进行技术改造的工业和日益展开的基本建设对熟练专家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现有的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对新专家的培养——二者之间显然是不相称的。为了消除这个矛盾,必须坚决改变培养新专家的全部工作的速度和方法,同时使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同生产建立有机的联系,并保证大大扩充其物质基础。

彻底改进培养新专家的工作,不仅是教育人民委员部所属机关和经济机关等的最迫切的任务,工会同样也应当彻底改变自己对待这一工作的态度,最积极地参加培养红色专家的全部工作。培养新专家是全党的极重要的任务。

## 一、培养新专家的规划

1. 根据发展工业的远景计划,到五年计划终了时,大工业中工程技术人员的比重要增加1倍,以进一步保证满足下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的更大需要。

2. 自1928年起,要建立若干新型的高等技术院校,特别是要为缺乏专家的部门(如建筑业等)建立高等技术院校,学习期限定为3—4年。

3. 增加中等技术学校学生名额,扩大中等技术学校网,以便到五年计划终了时工程师和技师的比例至少为2:3。

4. 贯彻大大提高现任工程技术工作人员中受过科学培训的技术人员的百分比的方针,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工人出身的实际工作者有更多的深造机会。
6. 自 1928—1929 学年起开始统一苏联的技术教育制度。

## 二、教学工作及其同生产的联系

1. 为了加强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教学工作同生产的有机的和经常的联系:

(1) 把各高等技术院校(或高等技术院校的系和科)和中等技术学校分别划归有关的管理总局及企业管理部、托拉斯和大企业,使经济机关和工会一起对教学的组织工作给予决定性的影响;

(2) 规定生产实习期限至少为 10 个月,要做到整年连续不断地有实习生在企业中进行实习,并在高等技术院校(教育人民委员部)同意之下由有关经济机关负责领导生产实习;

(3) 经济机关必须给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分配固定的工作,以代替见习制度。不准在企业中用裁减工程技术人员的办法来实行节约。必须为企业中(尤其是在边远地区)的工程技术人員创造更好的条件;

(4) 利用经济机关的科学研究所和实验室来进行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教学工作,同时利用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来研究经济机关技术方面的工作;

(5) 增派青年专家出国留学(今年至少派遣 360 人)。

2. 为了培养能真正掌握科学和技术最新成就的、保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合理化事业的专家:

(1) 在有关经济机关和工会参加下逐步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2) 大量增加专门从事(不兼职)科学和教学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科学熟练程度的教员和教授,保证他们的科学著作的出版,保送他们出国学习等等;

(3) 在最短期间增加青年科学工作者(研究生),彻底改进研究生的选拔工作和对他们的科学工作的领导,改善研究生的物质条件;

(4) 为在企业中工作的工程师和技师制造更多的条件,使他们能够提高专门技能和熟悉国内外生产中的最新成就;

(5) 邀请外国著名的专家来讲学,并有系统地翻译和出版外国技术方面的主要参考书;

(6)更新和补充设备,降低教科书、参考书价格,不断地以最新的技术书刊供应图书馆(其中包括增加外国设备和书刊的进口);

(7)保证科学技术刊物的发展和科学研究所的科学著作的出版;

(8)必须使高等技术院校的学生至少掌握一种外国语。

3. 在高等技术院校修业以5—6年为限,学习时间为4—5年。

4. 选拔卓越的党员经济工作人员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专家担任高等技术院校的领导者,同时必须使他们摆脱其他一切职务,以便专做高等技术院校的工作。

5. 为了最迅速地培养新专家并在技术教育适应于工业利益方面积累经验,把6所高等技术院校和5所中等技术学校交给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把两所高等技术院校交给交通人民委员部领导。工会必须积极参加对这些高等技术院校的领导,教育人民委员部必须积极在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上参加对这些学校的领导。无论继续由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的高等技术院校,或者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高等技术院校,其物质条件必须一样。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高等技术院校,委任教授时需经教育人民委员部同意。

6. 对那些能够在较短期内培养出具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工程师和技师的新型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发展,必须予以支持。

7. 尽量加强生产教育在培养专家的总的过程中的作用,同时要保证进一步提高专家的科学理论水平。教育人民委员部必须经常注意生产教育和理论教育的正确配合,必须确立它们之间的关系,使生产教育能巩固学得的理论知识并使理论知识能迅速地运用到实践中去。

### 三、关于学生的社会政治教育

1. 学生组织应当注意学生群众的社会政治教育,注意创造条件来提高学生的专门技能,以及广泛吸引非党学生(特别是无产阶级成分的学生)参加自己的一切工作。加强工会对学生组织的领导,设法简化学生组织的机构。

2. 行政职能(助学金的分配和生产实习的领导等)应当确实交给高等技术院校管理委员会,学生组织对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应当尽力予以协助。

3. 尽力鼓励科学技术小组的工作,把它们的工作和社会主义合理化的实际任务联系起来,解除积极参加小组活动的学生(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社会

工作。

4. 为了使学生更顺利更迅速地修完课程,解除第一年级和最高年级学生的各种社会工作,参加党和工会的会议除外。

5. 扩大吸收高等技术院校的学生参加校外工作,尽可能让他们参加与自己的专业相近的那些企业的生产会议工作和其他工作。广泛吸收学生参加工农检查院各机关的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不应影响学业。

6. 把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对社会科学的一般课程数量要加以限制,开设有关工业部门的具体经济学课程。动员一批有科学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编写各工业部门的具体经济学课本。

#### 四、关于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招生

1. 保证进一步加强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中的工人核心,使 1928 年高等技术院校招收的新生中工人至少占 65%。为了使工人及其子女能做好进入高等技术院校的准备,各高等技术院校应附设预备班。

2. 在最近两年内,工农预备学校(日校)除现有人数外,至少应再招收 3 000 名工人。大量扩充工农预备学校夜校,并保证从事生产的工人在其中占最大比重。

3. 力求使二级中学的毕业生能进入高等学校。在工人区应着手发展七年制和九年制的学校网(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应发展职业学校),保证各校拥有较好的物质条件,保证优先录取工人子女。

4. 今年至少派 1 000 名曾在党组织、苏维埃或工会工作中受过真正锻炼的共产党员进入高等技术院校,并保证他们的物质条件。最近几年内年年都应如此。

#### 五、毕业生的分配

1. 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应根据劳动人民委员部的总的分配计划,在工会、劳动人民委员部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参加之下,通过各有关经济方面的人民委员部来进行。

2. 规定高等技术院校或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必须按照经济机关的指示在生产中工作三年。



3. 在经济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部,邮电人民委员部、各管理总局、企业管理部、大托拉斯)中,挑选专家以及监督对专家的培养、提拔和使用,应该是经济机关管理委员会(部务会议)的一个委员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项主要工作。

## 六、技术教育经费和学生的物质状况

同意政治局关于保证大量增加技术教育经费和改善学生的物质状况(助学金、居住条件和医药治疗)的决定。

全会认为,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基本建设(建设新的高等技术院校、扩充现有的高等技术院校、建设实验室等)的拨款,应同国民经济部门中基本建设的拨款同等看待,同时这方面的用款的绝大部分应列入全苏联预算之内。

由于目前对工业方面的新专家的培养工作特别重要,特做出以上决定。同时中央委员会指出,根据本决议来改进对国家建设各个部门的红色专家的培养,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55—375、715—717号案卷。)

## 补充材料

### 1

## И. В. 斯大林和 Н. И. 布哈林就共产 国际纲领草案的往来信函

不迟于1928年1月12日

斯大林的便条

- 1) 我看最好任命我们的审议和修改纲领的委员会(政治局的委员会);
- 2) 这可以在星期一或星期二的7人会议上做;
- 3) 我有关于草案的几个意见,既有结构上的,也有实质性的;
- 4) 现在改变些什么是不是方便,因为草案就要由第六次代表大会基本通过了。

布哈林的便条

虽然有代表大会的批准和伊里奇的批准,但是一定是要改变的。主要需要另有表述的是:

- 1) 资本主义的危机(需要更灵活的表述);
- 2) 新经济政策(现在许多东西更清楚了);
- 3) 苏联;
- 4) 殖民地(?)
- 5) 一些部分的要求等。

斯大林的便条

是的,而且需要有专门的一章论述“在个别国家和民主的‘夺取政权’途径

相对立的无产阶级专政”。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137号案卷,第3—6张。手写的。)

## 2

## И. В. 斯大林关于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意见

致布哈林、李可夫、莫洛托夫同志

关于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简短意见

虽然布哈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我认为有必要对它们补充以下一些意见。

(1)我想,不得不重新写纲领了,因为从共产国际现在的需要看,第五次代表大会基本通过的纲领草案不能认为是令人满意的。

(2)现有的五大的纲领草案的“引言”不能令人满意。最好是不用“引言”了。如果不能不用,可以给出这样一个“引言”,论证一下在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有单独纲领的同时,必须要有一个共产国际的共同纲领。

(3)按照我的看法,纲领应该在开始时(第一部分)分析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泛泛的资本主义社会,从世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着的危机的角度进行这种分析。当然,说的不是基本上已经在消除的那个1919—1921年的战后危机,而是在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的那个世界资本主义的更严重的危机,是通过建立了苏维埃的经济制度这个事实得到了最鲜明表现的危机。清楚的是,只要存在着借助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并和它并列发展的苏维埃制度,虽然资本主义有局部的稳定,这个危机将会存在和发展。照我的看法,也该是从这个危机的角度来阐述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在这样做的时候,最好是评述一下发展的经济和政治的不平衡性,揭示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基本矛盾和军事冲突的不可避免性,按照布哈林的“意见”的精神论证社会主义有可

能在个别国家取胜等等思想。

(4)在下一部分里可以对世界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做一个评述,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物和解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的唯一方法。我想,这件事是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所以不必展开谈它。

(5)第三部分应该谈过渡时期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的专政形式、“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问题等等。在评述过渡时期的时候,特别是说到在这些或者那些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的时候,应该说的不是一般性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是在其中一个国家,也就是在我国,有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的过渡。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这个事实正在改变着在其他国家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局势。在这样做的时候,我看应该把国家起码分成3种范畴:帝国主义国家范畴、殖民地国家范畴和苏维埃国家(共和国)范畴,指出对这些国家范畴中的每一个的过渡时期问题的特殊态度。必须这样做是为了在共产国际的各个不同支部制定单独的纲领时,在这些纲领的总的部分和在土地和农民的部分,都能提供某些前提。

(6)第四部分应该谈苏联,它的政策(无产阶级专政),它的经济(社会主义建设),它的世界革命意义,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对苏联的责任问题。如果能够做到足够充分和清楚地把这一部分制定出来的话,它将在整个纲领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7)最后一部分可以谈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则,把它作为一个整体,代表着所有支部共同的和基本的东西。

(8)关于“战后危机”问题(见《布哈林关于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意见》的第14点),我已经在自己的意见的第3点里说了。

(9)关于“军事协议”问题(见《布哈林关于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意见》的第15点),我想,应该把这一段根本从纲领中去掉。

(10)关于“保卫祖国”问题(见《布哈林关于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意见》的第16点),我想,应该严格区分开帝国主义祖国和反帝国主义的祖国,还有不可能和它有任何协议的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在和资本主义斗争的情况下,允许和希望一定的条件下和在一定的期限内和它有协议。这个提纲不得不在关于共产国际的战略和战术的基本原则那一部分里展开来谈。

(11)我想,不值得在纲领里涉及关于积累的理论(见《布哈林关于共产国际

纲领草案的意见》的第 13 点)。

1928年3月24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136号案卷,第8—10张。)

## 3

## H. И. 布哈林关于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意见

1928年3月24日前

关于纲领草案的意见  
(重大的补充和修改)

1. ——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总的分析里,没有对土地农民关系说任何东西。必须简短和扼要地谈到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作用,在这里采取完全确定的立场。第二国际的一系列政党最近已经制定出了农业纲领(德、奥、LP\*等),所以这就更有必要了。

2. ——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失调增长,物价昂贵和农业危机,土地租赁和金融资本的作用,农村的资本主义农业上层,农场主的“赢利同盟”,农民的欠债,土地改革,等等),也该说是同样情况。

3. ——联系到这一点,必须做大的改动和补充上一部分,解释本来意义上的农业纲领(具体的口号,过渡时期的农民土地问题,等等)。必须对照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提纲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决议,检查一下相应的提法(布哈林的报告提纲当时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的)。

4. ——必须对谈到战后危机的所有段落做大的改动。这里主要的是,文中

\* 看来是指英国工党。——编者注

集中注意的是战后的解体。现在必须要在正在形成的新的关系的基础上,展开谈资本主义的新的矛盾(以及指出新一轮帝国主义战争)。当然,所有这些需要用足够一般性的形式说出来。

5. ——联系到第4点,必须要突出和清楚地提出资本大规模的托拉斯化(以及生产的合理化,这一点在草案里没有提上一句),提出资产阶级上层有组织的聚合等等。

### 三

6. ——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各节必须相当彻底地重新写过。

这里应该添上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各点,它们是在过去的年份里搞清楚的,而在纲领草案里完全没有:

- 1) 工业和农业之间完全是另外一种对应关系;
- 2) 从利润原则向满足需求的原则过渡(降低价格、提高工资的政策等);
- 3) 计划的有机发展问题;
- 4) 社会主义积累(工业化)问题;
- 5) 可能还有和官僚主义斗争的问题等。

7. ——也应该以某种形式提出所谓“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苏联和外部之间的对应关系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Programm und Organisation der Österreichischen Sozialdemokratie》,“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向社会主义社会秩序过渡”一节中的第21点)涉及的这个问题的,不是针对苏联,而是针对奥地利的。

8. ——也还应该提出殖民地的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尽可能地在这里把握住最接近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提法。

9. ——在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必须要发展关于制高点的提法(譬如,在草案里对贷款的作用就什么也没有说),同样也要改动某些老的表述。

### 四

10. ——在关于共产主义敌人的各个章节里,必须第一要更多地谈到法西斯主义,做出对它的评述,对它的“理想”、它的各种类型、它的历史“意义”的评述。



11. ——必须更充分地描绘出阿姆斯特丹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作用(纲领里对这一点没有任何叙述)。其中必须要指出积极支持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建设、拒绝(而且在理论上)阶级斗争,宣扬“工业和平”、肯定国联、殖民主义的实践等等方针(这样,在这些方面就需要还顾及到社会民主党的实践,顾及到他们最近通过的各个纲领\*)。必须强调社会民主党出卖性的对外政策(苏联,殖民地,国联,保卫祖国等等)。

## 五

12. ——对草案的各种表述总的方面的一般性意见。照我的看法,更具体地强调转折、共产国际的目标等等的世界性将是没有害处的。这大体上可以用这样的形式来做:

(1)在分析“最终目标”(共产主义)时,强调我们最终要建设的是世界经济,有世界性的分工,世界性的各个民族、种族的联合,等等;

(2)在分析现在的资本主义危机时,更具体地强调说的不是抽象的资本主义,而是今天的世界经济(要标志出各个大国的重新组合:大西洋彼岸国家和欧洲,苏联和殖民地,把所有这些都按名目开列出来);

(3)在分析十月革命的后果时,要列出所有的危机点(包括殖民地的起义:摩洛哥、印度尼西亚、中国;民族解放战争,例如土耳其;一句话,要给出更具体的国际危机的图景);

(4)在表述共同任务时,在一些地方要把对各个帝国主义中心的态度、对苏联的态度和对小国的态度以及对殖民地的态度都放在一起,要这样做,把国际性方针(从意义上和规模上都是国际性的)说清楚;

(5)在表述共产国际的国际性时,要从强调组织的规模大小的角度直接列举出最重要的民族、种族等等。

## 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13. ——是不是需要谈再生产、积累等等的理论——联系到有关帝国主义各点?问题在于,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德国人”坚持罗莎·卢森堡的观点

\* 例如,奥地利党的纲领直接说到了联合和对这一点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编者注

(积累,销售的理论,——对帝国主义的解释)。我想,现在“罗莎主义者”被碰得头破血流了。所以,可以给出准确的表述而不致冒任何危险了(如果谁表示反对,是会百分之百要挨打的)。但是由于这个问题纯粹是理论性的,我决定不了是不是要这样做。可能更好的做法是把它放一放?

14. ——是不是需要更深入地表述特殊的、战后特有的危机和正在发展起来的新的矛盾之间的对应关系?问题在于,看来,就像几年前所看到的那样,战后危机所特有的特点将会越来越多地成为过去。是不是需要在这里做出准确的评价?或者限于最一般的表述?

15. ——纲领草案里有一点是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允许和资产阶级国家妥协,“直至军事上的”(第四部分前的最后一点:“通向专政的道路”)。关于贸易等等说得非常不够。需要展开吗?还有对“军事协议”怎么办?

16. ——明显地可以看到,各个共产党对保卫祖国这一点有一种简单化的观点,不是像列宁说的。列宁对帝国主义祖国和一般的资产阶级祖国是有严格区别的(例如,可以比较一下印度,但是也有一些更敏感的情况)。这里怎么办?提出这个问题还是绕过去?

大体上,这就是我在研究了最近这些年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之后形成的主要问题。

非常希望同志们对这些(以及可能还有其他问题)做出反应。一下子写不出来。所以我想先给出一个草稿,把同志们的愿望加进去,以便然后讨论文章本身可以更轻松些。

H. 布哈林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136号案卷,第2—7张。)

## 4

## Н. И. 布哈林和 И. В. 斯大林关于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就共产国际 问题作报告的人选的便条和建议

1928年6月23日

政治局各位委员：  
布哈林给中央的便条如下：

就在全会上的报告人问题(共产国际问题),我在自己这里召集了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会议(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我要读两个报告当然将是非常繁重的。我向科巴提出了让他读关于纲领的报告,——他建议我另外找人。我们在彼此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得出结论,最好的办法是：

第一个报告(选举的结果,欧洲的局势,“转折”等等)——曼努伊尔斯基。

第二个报告(关于纲领)——布哈林。

我们的考虑是这样的:曼努伊尔斯基是从现场来的,知道这些问题的实际情况以及所有细节,有西欧局的直接实际经验。

**Н. 布哈林**

### 我的建议

1. 接受布哈林同志的建议；
2. 认为不一定要把布哈林和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提纲交到政治局了。

***И. 斯大林***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558 号全宗, 11 号目录, 138 号案卷, 第 17 张。)

## 5

## И. В. 斯大林在 1928 年 7 月 5 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发言的速记记录

(原始记录)

**李可夫:**斯大林同志发言,下一个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

**斯大林:**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纲领草案的长短。有人说,草案太长了,太累赘了。要求压缩掉三分之二。要求在纲领里只给出一个一般性的公式并仅限于此,把这些公式叫做纲领。那些要求把纲领压缩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简直就是不明白起草纲领草案的任务是什么。要知道,这不是以前,在帝国主义的时代制定的那种纲领草案,不是那种纲领。当说到纲领的时候,通常指的是文明国家,并不包括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的人民和所有民族。你们看看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任何一个纲领草案和草稿——文明国家在那里是基本的对象。也就是说,对象是被缩小了的。再看看我们的纲领,它也涉及先进的国家,不是概括地涉及所有国家,虽然它也有一种要包揽一切的倾向。从纲领今天具有的规模,从它包括的面上看,它和我们至今在共产主义思想史上所有的任何其他草案有什么不同呢?不同就在于,这是唯一的草案,它的目的和任务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人民和民族,是把东方和西方联合在一起的。这就是迫使纲领委员会要扩大纲领的长短的一个基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要求压缩纲领,不能把纲领压缩一半或者三分之二。

但是这个纲领草案的特点不仅在于此,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它,这个纲领,在抓住所有国家的共产党工作中的基本需要、基本路线的同时,从总的任务的观点看,它,这个纲领,应该同时规定出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某些指导路线,否则它就太抽象了。所以,你们看到,纲领应该是概括了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的工作总路线,而同时,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来说,它又应该多少是具体的。这样的

类型是基本的,能够提供一个基础、一个领导线索,就单个国家的共产党,东方的和西方的共产党来说,它们是单独存在的,对它们的工作和任务进行了分类,应该把这些都把握住。这样的双重任务,不同类型的任务,不允许一下子把纲领压缩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二。对于所有那些要求我们采用一般性提法的人来说,要反驳他们的是,这些人没有顾及到,纲领起草委员会面临的是一项特殊的任务,既要在工作的总的路线方面把所有国家都包括进去,同时又要要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作类型也都包括进去。

最可笑的是,那些建议把纲领压缩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同志提出的建议,有着要把现在的纲领草案再扩大两倍甚至三倍的意向。实际上如果在纲领草案里要多少有根据地说到工会、合作社、文化和欧洲的少数民族等等的话,就是现在的纲领的三倍也是不够的。有人要求纲领是指令,但谁也从来没有说过纲领应该是指令,这是不对的。另外一些人要求它能解释一切。纲领也不可能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来。纲领的任务就在于,它要突出工作的基本路线,指导西方和东方的所有共产党的工作,这是一个基本的路线,但并不是要逐点进行论证。为此并不需要做出解释。纲领也不可能是规定基本的工作路线而同时又对这些路线进行解释,所以这些矛盾的特点是,一方面要求压缩纲领,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一定要把纲领扩大一倍的建议,出现这些矛盾的原因,是同志们对纲领委员会面临的那些任务和目标把握得不好,——这是关于纲领的长短和大小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纲领草案的各个章节的排列顺序和篇幅大小的问题。奥新斯基同志好像要求,除奥新斯基同志外还有一些其他同志……

**布哈林:**米柳亭!

**斯大林:**还有在报刊上,好像是要求把关于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体系的第四章挪到纲领的最后。这样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奥新斯基同志怎么就看不到这一点呢?奥新斯基同志是这样想象的。先是引言;在引言之后——分析资本主义的具体的帝国主义形式的发展。在这之后,他同意放上关于战后危机的一章,也就是说到战后形式的资本主义危机,这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是起跑,结果只是在我国取得了胜利,在说了这些之后转向说过渡时期。向什么过渡?当人们向什么过渡的时候,需要知道他们应该向什么过渡。既然这里在过渡时期和当代的资本主义危机之间没有对要过渡到的那个社会的描绘,那你们在这里就不会有任何的过渡。从教学法的观点出发,这个纲领应该是把读者从未知引向已知。在我们这里就应该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包括资本主义的历史,也包括它不可避免的死亡。这是第一章。你们那里有世界革命的第

一阶段,是和帝国主义战争相联系的,这是这场革命的起跑点。这是第二点。于是提出了夺取政权的问题;有危机,资本主义的危机在成熟,在深化。于是又提出向社会的下一个阶段过渡的问题——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但是应该把这个共产主义社会在纸上描绘出来,为的是让后来人能够知道我们从资本主义向什么过渡。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就是它的第一阶段过渡。这就是为什么从教学法上说和从逻辑上说,在前两章之后都必须要有第三章,说到共产主义。这是从纲领内部各章的安排说的。

洛佐夫斯基同志在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把它称做纲领的结构问题。他说,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一段不应该放在纲领草案第二章里,因为那里说的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二章是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和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在这一章里不应该加进描述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特点、根源、目标、任务以及可以说是它们的行动缺陷的那些段落。他把这叫做结构问题。这是不对的,同志们。第二章解释的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在十月革命后,在各个国家无产阶级对夺取政权有过哪些尝试,这些尝试是怎样被消灭的,以及政权是怎样只在我们这里,在我国得以巩固的。在我们面前出现的问题是,世界革命的第一个浪潮第一次在其他国家退潮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在我们国家,而是在其他国家。而且确定了两个原因:法西斯主义的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加强,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恰恰是该在这一章里说到这一点,洛佐夫斯基同志,否则您就解释不了,为什么革命的第一次起步没有能在几个国家取胜。

在一系列国家,在保加利亚,在匈牙利,在拉脱维亚等等国家,得到的是倒退,由于这样,造成了某种新的局部稳定时期。

您用什么来解释在世界革命的新阶段上一些国家的某些失败,局部的失败呢?在这里就不能不说到社会民主党了。所以这里提出的不是结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您显然是低估了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和意义,它的反革命已经到了何等程度,它反对无产阶级已经到了何等程度,而且在谈到反革命、谈到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这一章里,不明确它的作用是不行的。我在这里看到的是,洛佐夫斯基同志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和意义估计不足。在纲领里,这一点好就好在,它集中注意到了社会民主党在工人运动内部是主要的敌人,这是它的力量所在,正因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的敌人、共产主义的敌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敌人,是资产阶级基本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所以我们称它是资产阶级的工人政党。这就是我们这里的稳定时期还在持续的重要原因。对于整个世界的革命运动发展来说,对这些成分估计不足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说,洛佐夫斯基同

志没有搞明白,第二章里关于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不是结构问题,而是非常重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

这是关于各章的排列顺序。现在来单独谈谈各个问题。

总的意见。当然,纲领草案不是全部都表述得很好,当然它无疑是可以而且需要改进的。应该说有一系列错误和闪失。修辞上应该做得更好,而且是可以做到的。应该把它变得更简化些。这是对的,同志们。个别的修改意见是可以接受的。个别的修改在发言人的讲话里有了,可以采用。但是我不同意接受这里说到过的那些原则性的修改意见。

关于新经济政策或者战时共产主义问题。战时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反面,瓦尔加同志,当您说到战时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不可避免的阶段的时候,您那里得出的结果就是这样的情况。您应该知道,更加不可避免的阶段是新经济政策。应该证明的是,哪怕是有一个国家,哪怕是在一个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可以没有新经济政策的这些或者那些成分。如果您能证明这一点,瓦尔加同志,那我就同意说战时共产主义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新经济政策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这里有个别同志没有放弃这种看法,他们反驳说,可能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不要新经济政策。我们依据列宁的观点驳斥了这种说法。如果想象在英国或者德国,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可以在第二天就确立直接的商品交换,而且可以随意大张旗鼓地放手没收和剥夺处于中间的和处于下层的阶级,那就是一种奇谈怪论,是一件怪事了。要知道,需要明白的是,不可能想象无产阶级在掌握了政权的时候,第二天就马上确定起、组织和建立起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分配农产品和工业品的机构,这是第一;第二是在自己国家和外部的其他国家之间建立起这样的机构来。要是这样就怪了。相反,革命的开始,夺取政权的开始,是国内战争的最高形式。在这里,各种联系都被破坏了。在这里,需要重新按照新的方式建立经济机构,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合作组织,对于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不是商品,而是产品不经过市场的直接流通来说,是更为重要的机构。

如果说到战时共产主义,想象第二天就能够不通过市场,不借助市场安排好城乡之间的直接联系,安排好城乡之间以及一个夺取了政权的国家和外部的其他国家之间的直接分配,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那就意味着是发疯了。如果这样的联系是存在的,它们在革命时期就会被破坏掉,需要重新安排它们,而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时间的。

再说了,马上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掀起一个广泛



的浪潮,大张旗鼓地搞没收和剥夺。这就意味着让上百万的中小阶层吃不上饭。这就意味着把这种无力承担的重担套到自己的脖子上,套到无产阶级国家的脖子上。不能想象,就说是英国吧,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天,无产阶级就能够做到把整个工业都拿下来和安排好,让它像钟表一样工作起来。不能这样设想,无论如何不能。而如果不能设想是这样的,那么,难道就能设想无产阶级一下子就可以安排好直接的产品交换吗?战时共产主义是没收,是禁止贸易活动。我们这里是怎样搞战时共产主义的,你们知道吗?连包子都不能偷偷摸摸地卖。在所有一切都是这样干的时候,我们让成百万的人失业了,没有可能给他们工作,因为大工业还没有安排好。无产阶级把这样的沉重包袱加在自己的脖子上是愚蠢的。

不,同志们,为了从夺取政权转向安排城乡之间、一个国家和外部世界在进出口方面的直接联系,也为了不在自己身上压上像是剥夺大城市里数百万的各种小阶层、小商人、手工业者、官员、职员和个体人员这些上百万的中小阶层的多余负担,我说,预料在第二天就可以用直接联系的办法把这一切都安排好,那是不理智的。在这里,没有市场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无论是从工业是不是能够全部消化失去了生产资料的中间阶层来说,还是从安排好城乡之间、一个国家和其他有进出口关系的外部国家之间联系的机构这一点上说,都是不行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里,无论它是多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取得了政权后的第二天,新经济政策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在我们这里,新经济政策将继续更长些时间,在英国应该是短一些,在德国也应该短一些,但是它在到处都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就是这样的,瓦尔加同志,您应该同意这一点。如果您同意这一点,那您就不会把反面的东西算做是不可避免的阶段了。新经济政策就是在市场的基础上安排贸易。无产阶级国家从资产阶级那里拿来的,是一些组织经济的工具。

伏罗希洛夫:国内战争打了两三年了,在这个时候,经济将是什么样的呢?

斯大林:我在后面要说到这一点的。我想先对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做一个原则上的论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同时认为新经济政策是绝对不可避免的阶段,战时共产主义也是不可避免的阶段,因为它们是两个相互对立的类型。无论如何不可能是这样的。这是和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的概念不相符合的。您是通过市场,利用资产阶级的工具——货币、市场、商品,在组织经济,为的是让这些工具在发展的过程中变成克服资产阶级残余的工具。那么,您就只有一条路,就是我们在革命的第二天就在我们这里,在我们国家里走上的这条道路。要知

道,在我们这里,是在最初曾试图发展某种像是新经济政策的东西之后,战时共产主义才开始的。就是这种情况。您应该读过列宁的小册子《论苏维埃政权的任务》。虽然我们这里有国内战争,但我们不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开始的。瓦尔加同志的错误在于,他把国内战争的任何一种形式、任何一个步骤都和战时共产主义等同起来了。这是不对的。完全可以想象出没有战时共产主义的国内战争的一定阶段和一定步骤。在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们是在夺取政权。夺取政权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发生战争的最高形式。武装干涉的形式我在后面要论述。我们粉碎了资产阶级,但是我们在努力要按照新的方式,而不是按照战时共产主义的路线,建设我们的经济。我们有列宁的小册子《论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他在那里阐述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的纲领。所以并不是国内战争的每一个成分,不是国内战争的每一个步骤都相当于瓦尔加同志所想象的战时共产主义。

**伏罗希洛夫:**问题在于称谓吗?

**斯大林:**不是,不是在于称谓。按照新经济政策的办法组织经济就意味着是通过市场来组织它。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来组织经济,如果是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的话,这就意味着是不要市场地组织它,按照直接产品交换的办法组织它。这就是基本的差别。采用战时共产主义这个条件被提高到了金科玉律的高度,是在外部对我们攻击之后,是在无产阶级的一半从工厂走上了前线之后,必须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无产阶级本来人数就不多,在这样的条件下,安排新经济政策的最初步伐被打乱了,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是环境所迫。但是我想要说的是,不要把新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混淆起来。它们是彼此对立的类型。在战时共产主义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经济是越过市场,采用直接的产品交换的办法组织起来的。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经济的组织是借助于资产阶级经济的工具的:借助于市场、货币、商品。这就是两种经济制度之间的差别,就是瓦尔加同志忘记了的差别。

为了弄清楚两种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我就必须要展开谈到所有这些论据,而在这之后,我就可以承认了,在纲领里对军事共产主义的论述比应该说的更慎重了一些。

**有人喊:**对。

**斯大林:**我坚决反对这样认为,既然无产阶级这样快地就在那里掌握了政权,那么战时共产主义就像新经济政策一样,对于任何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来说,是一个同样不可避免的阶段。但是我赞成我们也承认战时共产主义,指的是武装干涉将是一个很可能的因素,指的是很可能有来自内部、来自资产阶级的爆

炸,指的是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吸引到前线去一定会破坏对生产的组织,指的是一系列其他的因素,我认为在纲领里应该说到,战时共产主义应该是一个也许会有有的阶段,但不是不可避免的,不是一定会有的阶段。用“也许会有”来代替“可能的”这个词。我还想把局势中的某些差别说清楚。瓦尔加同志有保留地说:被孤立的局面不可能没有战时共产主义,但是在在我们这里已经存在着苏维埃国家之后,孤立的革命就将没有了,也不会有了。

**布哈林:**对!

**斯大林:**请想想,我们曾是一个被孤立的国家,因为在其他国家没有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在我们这里有了苏维埃共和国之后,在另一个国家的什么地方如果有革命,无论怎样就不能认为是孤立的了。不能把距离混淆了。无论如何不能说在我们俄罗斯,在我们的国家是苏联,而在另一个半球的什么地方是一些共和国。

**瓦尔加:**在匈牙利,共和国是被孤立的。(交谈声)

**斯大林:**请你想想,在匈牙利,共和国的出现是在1919年。而现在我们是在1928年,这是需要考虑到,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共产党。现在它们有了,这也是需要考虑的。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军队,现在有了。那个时候——这是主要的一点——我们没有经济管理干部。要知道,如果在哪个国家发生了革命,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有能够组织政治斗争的、能够组织经济的、能够提供机器设备的领导人提供帮助。我们是显然在做这些事情的。我不想展开来谈了,但是,我可以提醒同志们的,是1923年德国发生革命的时候我们曾经打算采取的那些措施。我们曾打算在那里提供物质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援助。瓦尔加同志应该知道这种情况。能说哪一个革命是孤立的吗?

**奥新斯基:**法国被孤立的革命,在法国和德国之间被孤立了。

**斯大林:**您混淆了空间上的远近和政治上的被孤立。

**奥新斯基:**经济空间是有意义的,人家会把运送去的东西给您截断了?

**斯大林:**无论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步骤打击资产阶级最为要害的地方,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彼得堡的什么地方得罪了英国的话,照您的看法,它就一定要在彼得堡报复吗?它可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报复我们,也可以在巴统报复,要知道组织是同一个,国家是同一个。如果资产阶级在法国向工人阶级扑过来、压过来的话,我们可以在法国的另外一个什么地方打击它。这是一回事,法国的机体是同一个。不能把地域上的远近和政治上的接近概念混淆起来。我们彼此总是很接近的。我国的工人有政权,其他国家的工人没有政权,但彼此是接近的,而共产

国际应该是能代表某种力量的。我认为,不能把帮助理解成是说来就来到了法国,转交了帮助。不能这样理解,在我们这里将不会有孤立的革命,同志们,因为我们这里有苏维埃国家,因为我们很快就有了可以依靠的苏维埃国家的力量。这就是我想对新经济政策和对战时共产主义说的话。

关于土地国有化问题。有些同志建议不要提无条件的土地国有化——要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所有土地实行国有化。我不同意这些同志的看法。我在这里指的是洛佐夫斯基同志。我也不同意那些同志,比如说奥新斯基同志提出的,说是根本就不谈所有土地的国有化。可能是可以不提,但是你们那里有的是另外的方案。可以说在保障土地使用的条件下的所有土地的国有化。我接受这样的修改。

**奥新斯基:**我也是这样说的。

**斯大林:**不是,您的说法是另外的样子的。

**奥新斯基:**我读的正是这个地方的速记记录。

**斯大林:**那更好了,那就是说我听错了,没有听清楚。

洛佐夫斯基同志的想法是,资本主义国家越是发达,那里就越容易实行所有土地的国有化,这是不对的。最终你们可以把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提纲拿来读读,他在那里直接说到了,在私有制原则已经扎根于人们头脑中的那些国家里,推行所有土地直接的国有化是不理智的。就拿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吧,几百年来,那里的农民就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难道可以一下子就推行,说是我们要在保障土地使用的情况下把土地国有化了吗?如果是私有制原则在农村没有完全扎下根来,或者是不久前才开始扎下根来,那是另外一回事。否则的话,你们怎么解释列宁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所有土地国有化问题,对私有制原则在老乡的脑子里扎得很深的地方,是那么谨慎,而对俄罗斯他就不是很谨慎的,是在括号里说的,建议还在十月革命前的民主革命条件下,就要搞土地的国有化呢?这是事实还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怎么解释?那就是我要再说一遍的,那就是私有制原则还没有那样深入到广大的农民阶层的意识中间去。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对于殖民地国家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在共产国际里常常搞混,而且不知道在波斯是不是存在着土地的私有制原则,人们不能直接回答农民是否有对土地的私有制,而是说土地是国家共有的,在俄罗斯则是说——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

**有人喊:**土地是上帝的。

**斯大林:**就是这样,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同志们,在历史上,私有制原则是

不是在农民的头脑中扎下根了,扎根有多深,于是由此便有了差别,所以论据恰恰是对您不利的,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越是老一些的国家,马上实行土地国有化就越困难。纲领中所说的是灵活的、正确的。如果加上奥新斯基说的,那就更好了。

接下来,没有人提到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是的,关于普遍性的问题。我想说说关于普遍性的问题。有些人认为纲领带有俄罗斯性,过分的俄罗斯性,可能是因为有苏联的专门一章,也可能是因为苏维埃的国家管理形式被说成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典型的形式。这个论据,同志们,我认为,如果说得缓和一些的话……

有人喊:并不好。

斯大林:是极其草率的。说纲领带有太多的俄罗斯性是什么意思呢?显然是有人认为,我们的革命是民族的,而且只是民族的革命。按比重、性质和类型来说,苏联的革命是民族性的,而且仅此而已,一些人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这里的反对派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翻了车,在这一点上扭了他们的脖子,说是我们的革命只是一个国家的革命。但是,这场革命主要是一场国际主义的革命,从比重上说,从革命的类型上说,都是一场在全世界把所有的相互关系都翻了个底朝天的革命。要知道,事实上是,我们的革命是新的时代、民族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开始的基础,要知道,这就是事实,列宁说了这一点,是新的时代……

伏罗希洛夫:完全正确。

斯大林:苏维埃时代——难道这不是事实,难道这只有民族意义吗?

关于类型。既然我们很快就说了苏维埃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对所有国家来说,我国革命中基本的东西都是典型的,难道这不对吗?而我们是点到这一点的,而且是不可能不说的。

第三,是的,如果从我所说的这些出发,今天我们国家的状况能够为未来提供一种情景,说明对一个正在走向和已经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是第三。

第四,在我国革命具有这样的性质,在它基本上是具有国际主义性质的条件下,难道我们的国家能够不顾对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负有的那些特殊的义务吗?要知道,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可以算是某种杠杆,我们把所有的措施都看成是在所有国家加强、发展和推动革命前进的某种杠杆。列宁是这样说的:“夺取了政权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是尽一切可能发展其他国

家的革命”<sup>①</sup>，这是我们对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义务。而且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义务。但是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对我们国家也是有义务的。既然我们这个无产阶级共和国的领导人在革命危急的一定时刻，比如说在1923年的德国，表现出了准备把整个共和国的生存孤注一掷，既然我们想到了动员300万人的军队，——这就意味着我们是一个特别的国家，是为了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孤注一掷的国家。难道除了苏维埃国家外，有任何一个另外的共和国，难道有另外一个什么国家，能够做出这样的牺牲吗？既然我们在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面前提出了一旦发生战争就该转到我们的共和国一边来，——难道这不是一种特有的、特别的东西吗？哪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或者哪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能在自己的军队面前提出转到敌人一边去的任务呢？世界上是没有这样的共和国的。没有这样的政党，没有这样的国家。我们这个共和国里所有基本的东西，我们这个共和国的整个精神和整个工作路线是国际主义的。在说了所有这一切之后，怎么能在共产国际的纲领里，不把哪怕是一章用来讲述一个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新时代的国家呢。我要再说一遍，只有那些滑到了反对派立场上去的人才能说，在这个纲领里，俄罗斯的东西太多了，显然他们认为我国的革命是民族革命，只是民族革命。

现在有几个小意见。我马上就结束。

我认为，斯克雷普尼克建议在第20页上改写关于跟着无产阶级专政走的农村劳动阶层的那句话是对的。这句话是明显的误会，或者是校对上的错误。它应该改过来。但是他说到纲领里关于专政的定义是完全不对的。（笑声）恰恰不是照这种形式，根本就不是。在第52页上有关于专政的定义：“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反对外部的资本主义敌人、反对国内的剥削阶级残余、反对在还没有克服的商品生产基础上出现的新资产阶级的萌芽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有好几个定语，至少有5个定义。所有这些定义、提法，斯克雷普尼克同志都放过去了，所有他的批评是空穴来风。

**斯克雷普尼克：**列宁的提法中的一个漏掉了，的确是这样的。

**伏罗希洛夫：**斯克雷普尼克不会漏掉的，你们不用担心。

**斯大林：**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有好几页呢。如果所有这些都要加到纲领

<sup>①</sup> 原文未注引文出处。——译者注

草案里去,我担心它起码要再增加两倍的篇幅了。

**A. II. 斯米尔诺夫:**不是两倍,而是千倍了。

**斯大林:**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关于共产党说得不是地方的意见也是不对的。这是在吹毛求疵了。关于中立的说法也是吹毛求疵了。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里直接说到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在走向专政的时候,在专政的第一阶段上,共产党不可能指望得到比中立中农更多的东西了。列宁是直接说到这一点的。只有在加强了苏维埃政权之后,只有在中农相信了政权变得巩固了之后,才会出现和中农联盟的时期。读一读列宁同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吧。在制定纲领草案的时候,我们不想和列宁有不同的意见。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这样想,而斯克雷普尼克同志不过是挑刺了。

接下来,斯克雷普尼克同志说,纲领里关于民族问题没有说什么。我们认为,殖民地问题是任何民族问题的基础。可能应该专门说到中欧存在的民族问题的特殊形式,那是可以说的,但是不是用斯克雷普尼克同志的那种提法。民族问题、殖民地问题的基础已经说到了。关于民族自决的问题,关于他们的分离——所有这一切都有了反映。

关于波兰,关于在各种不同的国家发展的类型,或者说是方法,无产阶级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我不同意斯克雷普尼克同志的想法,而且认为划定出那里存在的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三种类型是绝对必要的。这三种类型反映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三种不同的速度。

**斯克雷普尼克:**但是波兰算不进去,您这是在和自己争论。

**斯大林:**波兰算得进去,罗马尼亚也算得进去,您不要用某一个来自波兰的同志说了什么把我搞糊涂。应该遵循的是已经知道的理论和政治的考虑。既然在波兰有封建残余,既然在罗马尼亚有封建残余,既然在1917年前的俄罗斯也有过封建残余,那么就已经给出了一定的国家类型,在那里,很明显的是,你不可能直接——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能走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在那里明显的是,起步的时候将要带有通过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专政走近的性质。在我们这里,也有许多人在二月革命前夕时是这样想的。你们知道,托洛茨基就是这样想的:政府是工人的,至于农民,我什么也不知道。而在二月革命后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自己是最强的政党,认为所有的一切都会转到我们的手里,而走上舞台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破烂货。整整8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是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微不足道的政党代表了最严肃的力量,而且是完全出乎意料地走上了舞台,在国家的全部政治生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在二月革命的时

候,堤坝刚一被冲破,在这个没有了沙皇的国家里,不是组建了工人的政府,而是组建了一个完全另外的政府,虽然我们这里的条件是成熟的,我们正在走向接近社会主义革命。条件已经大量地来到了,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百万群众走上了舞台,拿起了盾牌,但不是保护我们,不是保护共产党人,而是保护反共产主义的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而且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大吃一惊:怎么会是这样,这两个微不足道的小党怎么突然变成了国内的统治力量呢?这对我们是突如其来的,但是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这又什么也代表不了。在像是波兰和罗马尼亚这样的国家里,也是这样的情况,农民处于封建资产阶级的压迫之下,堤坝刚被冲破,他们就登上了舞台并安置上了自己的人。这就是我们在二月和十月之间这段时间被置于的那个阶段和那种突如其来的状况,我们用了8个月的时间,流着血在加以克服,而8个月的革命如果不是更长的一段时间的话,也几乎相当于8年的通常生活了。这件事是不能忘记的。有一种做法是迅速的,那是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用直接的办法。也有另一条路——需要起跑,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要有一段或大或小的起跑,就像是在我们这里的情况:一个革命上升到另一个革命,如果波兰依然是它现在的这种样子,那又该怎样呢?在罗马尼亚这样的国家可能也将是这样的情况。还有第三种类型,殖民地类型,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时期将会比我们这里更长,在那里,在新旧力量的斗争过程中,我们的无产阶级将会成熟起来,成为事实上的国内所有群众的真正的领导者,而不是书本上的那种领导者。所有这些突如其来的东西都应该考虑到,斯克雷普尼克同志,不然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到过渡类型的这种特点的话,这将会是怎样的一个纲领呢?我们会是把人们策动起来搞冒进,让他们——我们的共产党——在其他国家搞冒进,结果是摔跤,就像托洛茨基让我们冒进一样:他说政府是工人的,没有沙皇,可是把农民忘了,把小资产阶级忘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把这个忘掉。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要把规定了各种不同的国家夺取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同速度的这三种类型保留下来,而且要在波兰的后面加上罗马尼亚,等等。

**斯克雷普尼克:**但是不是在波兰的后面。

**斯大林:**这就是全部意见了。

**布哈林:**等等,那里还有各种国家:南斯拉夫,等等。

**主席(李可夫):**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发言,下一个是留京同志。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1032号案卷,第31—60张。原文。)



## 6

## B. M. 莫洛托夫致 И. В. 斯大林的信

1928年6月4日

亲爱的科巴！

我写两句话解释一下我们建议的中央全会日程的第4点。

前两个问题是国际问题。这是合适的——恰好是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前夕。同时，第一点（共产国际委员会问题），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要在报告的时候阐述这样的问题：法国和德国最近的议会选举，还有即将在英国举行的选举。联系到这一点，必须要解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策略上的“转折”。

关于粮食收购的问题在4月就已经提出来了，而且可能在7月初提出关于新的运动的前景过早了。但是它在现在这个时刻变得很尖锐了，需要加强注意对未来运动的准备，而且也有助于展开秋季的播种运动。

关于大学和新的国营农场不用说了。

我个人认为，希望能够而且也必须提出一个关于普及教育的报告——不然的话，我们将又放过一年，没有为这件事拨出必要的资金就把预算扯平了。

“计划”的其他问题最好是挪到以后的各次全会上去。

就是这些了。

还有一件事。我想度假到6月20日（而根据决定是可以到6月15日的）。是不是反对？

向所有朋友问好。

**B. 莫洛托夫**

关于 A. И. 瓦尔加，决定他应该最近转到莫斯科来：那里现在的气候对关节

炎比较好,而且在那里可以进行电疗。我们这些现在住在这里的中央委员同意这一点。傍晚的温度还在 37 度左右。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 号全宗,11 号目录,767 号案卷,第 83—84 张。)

## И. В. 斯大林致 В. М. 莫洛托夫的信

1928年6月10日

莫洛托夫同志！

(1)我只是偶然从柯秀尔那里得知，——而且这是在关于卡明斯基的决定做出了之后——原来你是反对任命卡明斯基领导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的。库比亚克(以及整个农业人民委员部)反对安采洛维奇是能令人信服的。库比亚克总是倾向于把集体农庄搞掉(不顾集体农庄是合作社类型的自愿组织)。这最后的一种情况迫使我主张用合作社的人——卡明斯基。

(2)我们想让埃赫领导新的国营农场。西伯利亚人反对(关于这一点是不久前去过西伯利亚的柯秀尔说的),但是不得不坚持。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需要在这里有一个很有分量的工作人员。这个问题不得不在你来了以后决定。

(3)事态的发展是这样的,可能对于卡冈诺维奇和对于事业来说,比方说,如果我们用柯秀尔取代他,都是最好的做法。不久前在柯秀尔在场的情况下,丘巴尔对我是这样说的(一而再地!)。其他的“证人”也送到了这一点。柯秀尔不反对这样的组合(我感觉他在内心里是高兴这样的,因为他想“在地方上”工作)。我作为可能的前景和卡冈诺维奇说了这一点,附加条件是,如果他离开的话,更合适的做法是他能进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他不仅不反对,而且根据我的感觉,现在,当他们那里是“一片寂静”,对他的“进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离开,他甚至是高兴的。在你回来之后不得不谈谈这件事。

(4)去了伏尔加沿岸地区(在萨拉托夫召集了伏尔加的两个州的各省书记处和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会议)。他们的收成高于中等水平。春播面积(还有过冬作物的播种面积)在他们那里肯定扩大了(5%—10%“并更多些”)。为了不把多余的粮食卖掉,老乡们原来是在疯狂地进行播种、并不怀疑价格将会提高,

而在今年采用的非常措施是暂时的。老乡有自己的逻辑……我的感觉是,在6月和7月,不包括乌克兰,能够收到不多于2 000万,最多是2 500万普特。我们之间已经说过——这样总的来说对于基本的需要是够用的。现在清楚的是,商业人民委员部(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在向我们的基本消费者供应粮食上骗了我们:在3月,2月原来我们是按一个月5 000万—5 500万普特的标准供应的,而现在通过的标准是一个月2 300万普特,——为什么不能在所有这些月里都按3 000万—3 200万普特的标准供应呢?至于粮食的价格,现在不得不把它提高10—15戈比一普特,同时要对肉和蛋的价格有一些降低,但是这是必须要做的。

(5)柯秀尔说,西伯利亚的收成年景是好的,春播的面积在扩大,等等。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播种面积有些下降。

你20号在莫斯科吗?

握手。

**И. 斯大林**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2号全宗,2号目录,1420号案卷,第196—197张。)

## 8

## B. M. 莫洛托夫致 И. В. 斯大林的信

1928年6月13日

斯大林同志！

你6月10的信收到。

1. 我在6月21日早到莫斯科。我也到政治局来。

2. 关于卡明斯基我只有一个反对意见——担心会削弱农业合作社联社。我认为他作全俄农业合作社联社的候选人是好的，而且也应该派一个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到联社里去。兼职是不合适的。派谁去联社？我想到的是埃赫。

3. 埃赫对中央联合国营农场是合适的。但是在我看来还有争议的是，哪里更需要埃赫：进联社还是进中央联合国营农场。对于后者来说，可能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更合适。回来后我们再谈谈这一点。至少我对又有新的契卡工作人员调动到农业工作领域来是完全赞同的。

4. 关于卡冈诺维奇和柯秀尔的调换问题可能是及时的。虽然柯秀尔留在中央是合适的，而且总的来说是一个好的工作人员，但是乌克兰的局势也需要“调整”。看来不能指望卡冈诺维奇、丘巴尔和彼得罗夫斯基能在一起工作。在中央将有一位熟悉乌克兰情况的同志大有裨益。

5. 就是说我们在粮食上是能闯过去的。这很好。但是现在的供应标准显然是很艰难的。你说得对，我们忽略了供应计划。本来应该早些着手把它砍下来。关于粮价——不得不提高，但是在收成平平的情况下，我想，不能多于10戈比（要先多少降低一些蛋和肉的价格）。

好像收成看好。这是非常好的。

6. 沙赫特案件是不是拖的时间太长了？最好在进行的期限上给出一个可

遵循的方针(例如在6月10日前结束\*)。对于我们的专家们来说,办理这个案子要客观,这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应该考虑,不要让社会上对“沙赫特”的关注,对这个案子的意义的关注变得迟钝了。如果案子再拖上一两个月——我担心的是,人家是不是会不再去读有关它的材料了。就是现在,《真理报》已经有的时候用两三个小品文替代关于审案的报道了。

我的休假过得很好。开始热了。天气很好。

握手!

你的 B. 莫洛托夫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767号案卷,第85—86张。)

---

\* 原文如此。可能莫洛托夫想说的是7月。——编者注

## 9

## И. В. 斯大林在 1928 年 7 月 9 日联共(布) 中央全会上发言的速记记录

(原始记录)

斯大林:同志们,在谈到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具体问题之前,请允许我谈一下有理论意义的和在全会的辩论时在这里出现的几个总的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关于我国工业发展的主要源泉问题,关于发展我国工业的途径问题,关于形成它的源泉问题。奥新斯基同志和随后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直接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可能他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想,滋养着我国工业、让它能够快速发展的那些源泉,基本的和首要的当然是工人的力量,是工人阶级。但是只有一个源泉是不是就足够能让我国的工业迅速发展了呢?这就是问题。通常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业的发展和工业化发生是以极其巨大地和系统地掠夺其他的国家为基础的。

你们知道,英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它从所有的国家榨取民膏,投入附加的资本,最终变成了“世界工厂”。你们知道,德国是靠 70 年代掠夺了法国把自己的工业向前推进了的。法国现在是靠掠夺德国和从它那里得来的战争赔款来推动自己的工业的。是不是有其他的道路,在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被历史上奉为神明的道路呢?这就是新的道路,德国的道路,它是靠从美国得到的借债推动自己的工业的。这条路并不是全新的,这样的道路以前也有过。通常,各种不同类型的道路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这样的工业在这个或者那个国家是通过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得到快速发展的。

从工业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得出这样的一般性规律来,那就是,只靠自己的国家工业几乎没有在任何地方能够得到快速发展。一个国家要是抱定了工业化的目标的话,它要么就要有系统地掠夺其他国家,要么就是能够得到非常

多的债款,靠这个来发达起来。在我们这里,在沙皇时期,也有过工业化。你们知道,我们的债款也相当不少,你们也知道,在我们这里没有一条铁路不是靠了大笔的债款建设起来的。现在正在建设的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全长1400俄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你们说不出任何一种情况,在原来的俄罗斯,像这样大型的项目,只是靠国内的资金建设的。你们说不出来。我们建设的第聂伯国家建筑工程是如此大的工程,它需要大得可怕的钱。你们能说出旧的、资本主义的俄罗斯有过哪怕是一种情况,像这样庞大的工程只靠国内的力量就建设了吗?你们说不出来。我们不能掠夺别人,我们不想为自己建立一个喂养工业的危险源泉,别人又不借债给我们。剩下的是什么呢?靠国内的力量。这个国内的力量在哪里呢?这就是农民。如果不是向农民收取一部分,相当大的一部分贡赋,——我说的要粗鲁些,为的是更清楚些——我们就没有能力继续快速地推动工业,我们就做不到,就没有可能做到。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和奥新斯基同志看来不懂得这个最简单不过的东西。他们把自己的发言建立在了这样一点上,那就是农民在商品上支付的过多了,这是对的,我们为农产品给农民支付的并不够,这也是对的。我要回答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和奥新斯基同志的是,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不能不这样做。这是把我们的工业推向前进最重要的源泉之一。所以谁要是想现在就把支付不够的部分支付给农民,把价格提高到恢复性的水平上的话,谁要是想同时不从老乡那里为城市的商品收受更多,把价格降下来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的話,谁就是在这个阶段上把我国工业化的源泉从我们这里夺走。同志们,问题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它对于我们有着某些理论上的意义,但它同时对于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最大程度的实际问题。这个剪刀差是不是该扯平呢?当然,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所在。我们现在能不能就把这个剪刀差削平呢?不可能也不应该。我们的工业薄弱,它还没有合理化,为了今后的发展,它没有外部源泉。只有工人阶级这样一个源泉太少了,而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如果不想垮掉的话,就应该向前推进,因为没有工业的发展我们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站住脚跟。“剪刀差”我们是应该缩小和消灭的,但是不可能是在今年,也不可能是在两三年之后,因为我们的工业还年轻,还薄弱,还没有合理化。谁要是不想理解这一点,那他就是在反对国家的工业化。正是这一点,奥新斯基同志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并不想搞明白。奥新斯基同志问道:既然事情是这样的,那么,中央的立场和反对派的立场之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奥新斯基同志,我要劝你相信,有根本的区别,是根本的区别。他可能会对我的回答感到吃



惊。我要说的是：他在形式上是**有权吃惊的**。的确，为什么是这样呢？反对派本来是**超级工业主义者**，但却是他们要求在我们这里采用农产品的**回复性价格**。怎样才能把这两种极端的看法中和起来呢？非常简单。反对派有两个心思，原来就有两个心思，现在剩下来的还是两个心思：一个心思是**扭曲的**。给我一个超级的工业化！这是愚蠢的，当然也是很怪的。但是，他们这样喊是为了引起关注，“揭发”我们，好像我们是反对我国**高速度工业化的**。但是这是一种虚假的和**扭曲的心思**。另一个心思是**实际的心思**，那就是要求实行农产品的**恢复性价格**。为了作为所谓的**极左派**，反对派需要这种叫喊出来的心思，而作为**极右派**，它需要的是这种实际的心思。要知道，我们总是在说，反对派是所谓的**叫喊的左派和所谓实用的右派的混合物和乌合之众**。

**米高扬**：是投降派。

**斯大林**：是投降派，半孟什维克，如果你们想这样说，也可以算是半社会民主党人，而我们总是说，反对派左边叫喊的这一翼是在掩饰右翼所干的事情。你们是不是愿意，我这里手上有一份整个反对派在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党团会议上关于收购问题的声明。他们要求什么呢？是穆拉洛夫代表他们发的言。他是整个反对派派出的人。你们听听看：“粮食收购运动应该不仅是按收购到的粮食数量和年平均价格来评价，而且应该根据这个运动是否符合无产阶级和农民结合的利益来评价。粮食价格的政策应该符合以下的基本要求：第一，生产者应该为自己的粮食得到生产价格；第二，必须力求让没有什么实力的各类农民得到和富裕类型的农民同样的粮食价格。”

当然了，当一个人想要出卖工业化的话，他一定会拿结合的问题做文章，但这是借口，我们对这一点是很了解的。奥新斯基同志，您的立场和这种立场之间有什么差别呢？没有任何差别。这就是对您所提出来的中央的立场和反对派之间有什么差别的问题的回答。没有任何差别。

第二个问题关系到的是和中农结合的问题以及为什么需要这种结合，我们用它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再一次涉及奥新斯基同志了。照他的说法，城乡之间的结合，工人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的结合是通过纺织、通过满足农民的个人消费这条线进行的。

这对不对呢？这是不对的，完全不对的，同志们。当然，通过纺织这条线满足农民的个人需求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是从这一点开始的。我们是从这里开始，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加强结合的。但是说事情就此完结了，说这构成了结合的基础，对于结合来说是足够的基础，这是完全不对的。城

乡之间的、工农之间的结合不仅发生在满足对纺织的个人需求上,而且发生在满足农民作为生产者的需求上。你们给他们种子,给他们小型和重型的机器,给他们铁,给他们肥料,把他们作为生产者,给他们贷款。所有这些都是把结合变得牢固的成分,不仅是在纺织方面,而且也包括在钢铁方面,奥新斯基同志把这个方面忘记了。可是这是不能忘记的,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的。如果我们只是在纺织上推行结合,这就意味着是要俄罗斯农民个体小型经济停留在它现在的这种状态。它的生产被抛弃了,小农经济的联合组织的机械化被作为次要的东西抛弃了,于是重心就转移到了只是满足农民个人的需求上来了。这不是能够让我们满意的那种结合。

结合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是让它,让这个结合本身,能够加强工人阶级,给中农带来好处并加强工人阶级;是让它,让这个结合,能够在这个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联盟里保障工人阶级的领导。结合往往是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也能和农民有结合,但是在这个结合里的领导是资产阶级,而在工人和农民的结合中,领导是属于工人的。如果有人建议一种不是用工人阶级当领导的结合,那么这样的结合就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结合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把各个阶级固定下来。完全不是这样的。结合的目标是为消灭阶级做准备。我们想和中农结合并不是为把中农作为一个阶级,让它永远存在,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结合是为了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中农。因此,需要结合是为了消灭阶级,不是为了把他们固定下来。谁要是想只在纺织方面推行结合,那他就是要将阶级固定下来。谁要是想在生产上推行结合,那他就是在准备土壤来改造老乡,引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和走上消灭阶级。

一般来说怎样才能改造农民,我们逐渐改造中农、消除他们的那些旧的心理和让他们走上新的轨道所要借助的那些手段在什么地方呢?为此需要鼓动和宣传,它们是有意义的,所有这一切之所以需要,是为了给社会主义准备土壤。当然,奥新斯基同志是对的——在销售和供应方面,合作社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些我们也就没有合作社的基础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农民才发生了向合作社的转变,向合作社这方面的转变,有利于合作社的转变。

但是基本的手段到底是什么呢?是技术。农民的心理是通过新技术而彻底地得到决定性的改造的。

奥新斯基同志引用了列宁的话。他想用列宁把自己装扮起来,这很好。但是在这里把列宁描绘成是一个农民哲学家,拿来列宁的一部分话,不愿意完整地引用他的话,这就不好了,奥新斯基同志。

你可以看看这一段语录,它提出的问题是,无产阶级的工人国家应该怎样逐渐地争取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改变农民:“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电气化,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才能像人们所说的使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地和非常迅速地改造小农。”列宁是在什么地方说到这一点的呢?也许是在新经济政策之前?关于这一点,列宁是在一本论证新经济政策的小册子里,在《论粮食税》这本小册子里说的。

如果奥新斯基同志善于引用列宁关于需要进一步发展小农经济的语录的话(这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就不能只限于这样的语录,应该是完整地把列宁的话都拿过来。您想要完整地引用列宁的话,那就请完整地引用,我可以再引用另一条语录,说的是不能在搞结合的时候只顾了消费方面而忽略了这件事的生产方面。如果我们不用金属上的结合来补充纺织上的结合的话,就不可能有任何牢固的和扎实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结合,也就不可能逐渐改造农民、让他们和无产阶级接近和把他们转到集体主义的轨道上来。

第三个问题是新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关于新经济政策,还在讨论共产国际纲领问题的时候……同志们,很抱歉,但是30分钟不够用。

喊声:再给些时间。

斯大林:这些一般性的问题我在这里只能简短地涉及了,因为这些问题是在讨论的时候在这里出现的,必须做出回答。

当时我曾经说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不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提出来的,而是在它之前,在1918年初,当我们第一次有了可能开始真正进行建设的时候,提出来的。我可以引证1918年初出版的伊里奇著名的小册子《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那里阐述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建设所需要的那种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个政策被称为“新”的,是因为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才有了可能推行它。

布哈林:当时在一定时间内把它忘记了。

斯大林:奥新斯基同志没有表示反对。我不想争论,但是我想引用一个著名决议,那是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就列宁的报告做出的决议,白纸黑字写的是我和布哈林同志所说的,还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前,就已经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奥新斯基:我并没有反对。

**斯大林:**就算是您没有反对,但是其他的人将会反对。

**奥新斯基:**我甚至自己说到了这一点。

**斯大林:**您也许总还是能允许我引用几句话吧。在1921年末,就是在新经济政策过了一年的时候,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这个决议里……

**伏罗希洛夫:**这是在1920年初。

**斯大林:**这是在1921年末,12月,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

**伏罗希洛夫:**对,对!

**斯大林:**我是这样说的——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那时通过了一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总结和关于共和国工业的决议。是一个著名的决议,我建议同志们读一读。“还在第一次喘息的时候,在1918年春天就准确确定了基本原则的所谓新经济政策,是建立在对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力量的严格考虑的基础上的。实行被俄罗斯地主、资产阶级和欧洲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势力对工农政府的配合进攻中断了的这个政策,只是在从军事上消灭了反革命的各种企图之后,到1921年初才有了可能”。我说这一点是针对着这种情况的,如果说,甚至人们认为……——而我应该承认这一点,就是奥新斯基同志也没有反对,在共产国际内部和在我们党的内部,有一系列人们的想法是,我们只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才明白了,必须要在允许市场和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不对的。还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前,列宁代表的党就知道这一点了。这就是我想要说的。我说这一点还因为反对派对采用新经济政策的评价也是有些不同的。它也只是这样理解的:我们拓宽新经济政策的范围是后退了,而且还要继续后退。

**布哈林:**一直倒退到“国际革命”的到来。

**斯大林:**倒退到“国际革命”的到来,退到这场革命将会兴起并且拯救我们,让我们不用再后退了。你们知道,我们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允许在农村采用土地租赁和雇佣劳动力的做法,你们知道,可以这样说,允许这样做成为了反对派的一系列进攻的借口和原因。我们扩大了新经济政策的范围,背离了列宁,——他们是这样说到这一点的。后退吧,但是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人是为此负责的。我们要对你们说的是——你们背离了列宁,但是在合适的时机我们要打击你们。反对派就是这样说的。托洛茨基就是这样评价的。你们看看:“而苏维埃政权最近在农村的措施是什么呢——是允许租赁土地,雇佣劳动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扩展农村新经济政策的一切。”“但是能在农村不扩展新经济政策吗”——他问道。他说:“不能不扩展。”我要问:这是扩展,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从列宁的立场哪怕是后退了一点点吗?我要说的是,一点

也没有背离列宁,新经济政策一点也没有扩展。要知道,扩展新经济政策意味着什么?那是要把权利送给富农,恢复耐普曼,无条件地取消市场上现在存在的、将总是作为国家在市场上发挥调节作用的那些限制,等等。我要说的是,早在1922年初,在十一大上,列宁就明明白白地指出了,应该沿着这条路线走,沿着允许租赁土地的路线,沿着雇佣劳动力的路线走。可以援引1921年末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著名决定,那里对土地租赁和雇佣劳动力也是说得明明白白的。有一个有趣的事实,我觉得不好意思的是,这是最近这些天我才在各种著作中发现的。你们看看,关于允许租赁和雇佣劳动力的问题,列宁同志在1922年4月写给奥新斯基同志的信里就说到了。你们应该记得这一点,这是“致奥新斯基同志的信”,他在第三点里写的是:“在采用雇佣劳动和土地租赁的条件问题上(希望党的代表大会能通过这样的决定),党的代表大会建议这个领域里的所有工作人员不要受这两种现象的各种过分的形式约束,只是限于推行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即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研究可以用什么样的具体措施能够更适宜限制上述关系中极端的做法和有害的夸大。”<sup>①</sup>你们瞧,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扩展。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只是按照党的规矩,表述了1922年4月列宁对我们的指示。为什么我要说这些呢?因为现在有些人认为,我们把一切都收缩了,如果我们想要前进的话,现在应该扩展。

现在我有一个人的一份文件,谁都不会怀疑他的诚实,他和我们靠得很近,是甘愿为苏维埃政权牺牲的。他是切尔诺夫,一位来自“别德诺塔”的农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

**布哈林:**看来现在是共产党员了。

**斯大林:**感觉他还是一个非党人士,但是要比一些共产党员更强,头脑很清楚。

**加里宁:**对!

**斯大林:**他赞成中农,反对富农,但是这个人的脑子搞得如此之乱,老是要把一切都扩大了。想要给农村的资产阶级完全松绑,把选举权还给他们。这个文件没有印出来。它是通过高尔基送到我这里来的。他请我和他谈谈,当然我要和他谈谈,但是就是有这样一些想法在一些人的脑子里转,当然,这是一些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有些甚至是党员。难怪在1月份,在收购运动的时候,在第一

---

<sup>①</sup> 列宁在1922年4月曾给奥新斯基写过一封信,但在俄文版《列宁全集》中未见这段引文。——译者注

次受到压力的时候,不得不把一些同志开除出党,因为他们不想着手进行收购。既然你们是工农政权,就应该是提高粮价,否则的话,农民就不会缴粮。

请允许我引用两个地方,因为我要再说一遍,这些想法在人们的脑子里打转,必须要做出某种澄清。“第一,基本的原因当然是渐进的所得税制度。第二个原因是重新选举的指令改得不对,指示不清楚。”他要求什么呢?“第一是要取消现在这个样子的渐进的所得税制度,取代征收土地税,对牲畜和大型农具略征一些税”。

第二个措施也很重要——“改变选举办法,对有剥削的富农经济该从什么地方算起,要画出另外的标记来”。

第三个措施他没有表述,但是他在文字中指出了我们对农村中的租赁压缩得太厉害了,应该扩大租赁,而且这不是只对富农,而是对全体居民都有好处的。而在出现斗争的时候,他将会在街垒上为苏维埃政权而战,对这一点我是不怀疑的。

在这方面,在关于新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我还想指出一个事实。我指的是在座的一位同志所说的,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联系到粮食收购的阶级斗争好像只是有着最为次要的意义,它,也就是这场阶级斗争,解决不了问题。同志们,我认为这个声明是绝对不正确的,不对的,在我们的全会上提出来是带有侮辱性的。我们对这一点也是说过的,只要我们掌握着政权,只要制高点在我们的手里,我们一直也都要说到这一点。鼓动和煽动阶级斗争不是我们要干的。当我们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让我们能够采用那些对我们特别有利的阶级斗争形式,不是煽动起阶级斗争来,而是把斗争的成分吸收掉,把它们消除掉。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政策呢?因为我们掌握着政权,我们有力量,我们有制高点,我们没有必要给自己制造多余的麻烦。对资本主义成分的进攻主要是在经济措施方面,我们从敌人的营垒里把一些分子中立化了,的确是中立化了,而不是煽动起阶级斗争,我们把这些分子中立化了,减缓了斗争的气焰,把我们敌人中的那些最好斗的分子、那些最起劲的和最不服输的分子化解了,孤立了——用经济斗争的和平方式把敌人的军队拖开、冲散和孤立了,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这是我们的任务,这是我们的政策,可能彼得罗夫斯基想要说的是这个,但是要知道,我们的政策不是我们的敌人所需要的。我们给出指令来——不要煽动起阶级斗争来,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本来就这样强大了,我们应该用经济的措施来进攻、排斥、削弱对手,中立反对的分子,孤立最起劲的那些人,但是敌人是不听我们的。就拿沙赫特事件来说吧,我们是怎样对待那些组织了阴谋活

动反对我们的专家呢？这些专家是些什么人？这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是我们的敌人的一部分，我们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是建议合作——这是事实。把专家吸收过来，给他们提供保障，对他们说——为我们工作吧，给你们钱，可以过着像样的生活，反正我们是有力量的，你们该和我们……（听不清楚）。我们对他们是采用了合作的态度，可是他们干了什么呢？他们这些拥护旧制度的人看到了，我们的前进意味着要排斥资本主义成分，削弱旧世界，加强新的社会主义世界，于是他们投到了外国资本家那里去了，投向了这里的资产阶级，组织了阴谋，要向我们进攻。要知道，这是事实。我们要和他们合作，而我们要和我们打仗。显然，我们在经济方面每前进一步，都会引起我们的敌人，最好斗的分子们的反抗。

不可能想象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这里的社会主义形式在前进，我们在前进，在用经济的办法排斥自己的敌人，而他们一直在后退。我们又用经济的办法前进，他们还是一直在后退，然后一看，我们就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任何反抗。这种情况是不会有。这种情况从来就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是走向消亡的阶级会不声不响地交出自己的阵地，没有反抗，没有厮杀，也不组织对抗。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在前进，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这种前进都在压迫着、挤压着我们的敌人，他们就要反抗，因此阶级斗争就会尖锐起来。富农的情况或者粮食收购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在1月的时候，在1月之前，我们是怎样开始粮食收购的呢？就拿去年的8月、9月、10月来说吧——是放任自流的。我们绝对没有采用任何非常措施，任何非常措施都没有。这你们是很清楚的。一个卢布就一个卢布——拿去。价格当然是你不满意的，它当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伏罗希洛夫：**而且远远不是恢复性价格。

**斯大林：**但是你去年就是用这个价格卖的粮食，别固执了，现在还这样卖吧。于是他卖了。8月、9月勉强卖了，甚至在10月以前也还算好，在10月里就开始减少了，在11月的时候就更少了，而在10月的时候甚至到了总共只有3900万。这是我们挤压的阶级，也就是农村的富裕阶级的一定形式的反抗。我们是挤压了，是这样的，我们没有让他们能敞开地干，没有让他们能回过头来，没有让组织成粮食辛迪加，拿价格做文章，没有让租赁扩展开来。所有这些都是事实。对他们征收了很高的税，是累计税，这是真的。当然，对这种反抗我们是应该打击的。不这样不行。我们不想发生这样的战斗，但是人家强加给我们了。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这样的，我们前进了，在城市和乡村里，我国经济的社会

主义形式发展了,在这种前进的过程中,无论我们想要如何和平地进行,它肯定会压迫资本主义分子,压缩他们的规模,它会挤压他们,于是他们就不得不有组织地抵抗我们,这样阶级斗争也就越来越尖锐了。苏维埃政权的每一个行动,没有一个是不能恰恰完全或者主要地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得到解释的。在做了这样的解释之后,又怎么能说阶级斗争不是起着首要的作用呢?不,它是决定一切的。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继续。

喊声:对!

斯大林:斗争的形式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是会改变的。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我们想让这些形式具有和平竞赛的形式。虽然我们是这样希望的,但是敌人不想这样,因为这种形式会削弱它,于是它就要反抗,这样,阶级斗争也就会不断增长。情况就是这样的,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不能说联系到新经济政策,在粮食收购的条件下,阶级斗争具有次要又次要的意义。不能说,也不能对立起来,说是我们奠定了新经济政策的轨道,我们是沿着这条轨道前进的,而我们前进迎面对着的那些人都是在后退,都是处于一种和平生存的状况的,没有任何的波动。我们是在前进,他们是在后退;我们再向前进,他们又在后退,你瞧,于是就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了。不是也不可能是这种情况,即便是我们这里有了一次又一次的新经济政策,也不可能是这样的!阶级斗争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对此应该有所准备。应该让工人阶级对此有所准备,不要再让我们遇上粮食收购这方面的意外情况,或者是像沙赫特案件这样的意外情况。

一般性问题中的第四个问题,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对富农的非常措施问题。不能把非常措施看成是什么绝对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说,这些措施“一般来说”是好的,或者“总是”好的,或者它们一般来说是不好的或者总是不好的。从思想上说,不能这样来对待这个最最重要的问题,绝对不能允许这样来对待。

在粮食收购危机的时候,采用非常措施是不是我们的一个错误呢?现在大家都承认这不是错误,这是局势强加给我们的。李可夫同志说的完全正确:我们在1月面临的某些坏事中,这是最小的一件了,但总还是坏事,是一种我们不可能回避的手段。你们自己真的也可以评断一下。1月来了,收购下降了,和去年相比,我们缺了1.28亿的粮食。可以说,通常施加影响的所有措施都不起作用了。如果我们有1亿左右的粮食储备,可以让我们再等一等,把持有粮食的人围困起来……



伏罗希洛夫:将来一定需要有储备。而且不把这些粮食给人民委员部。

斯大林: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储备;或者我们有1亿—1.5亿卢布的外汇储备从国外进口粮食。我不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进口粮食是耻辱。我完全能够想象这样的情况,一个种类的粮食,一种作物我们可以进口,而另一种我们可以出口,在平衡表上我们还是有赢利的。

有人喊:对!

斯大林:但是我们没有这些储备。正是因为没有这些储备,我们就不得不采用非常措施了。未必能否定的是,没有这些措施,我们现在有的就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非常严重的危机了。

伏罗希洛夫:对!

斯大林:有的时候会是这样的,如果粮食不够了,应该进口,这没有什么耻辱,而如果没有外汇,那该怎么办呢?那就要无论用什么办法也要摆脱出来。人家不把粮食运到市场上来,没有粮食储备,没有外汇储备,剩下的只有一条了——企求非常措施。现在谁也不能说非常措施就是错误的。这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措施,它拯救了……

有人喊:对。

斯大林:〈拯救了〉国家免遭整个国民经济极其严重的危机。

伏罗希洛夫:当然是的。

斯大林:你们自己评断一下,我们缺了1.28亿粮食,这是赤字。我们应该把它补上,到地里泥泞的时候剩下两个半月了,大约是3个月的时间。我们应该在这段时间里把丢失的补上。弗鲁姆金同志在他的信里做了计算,如果我们提高了价格,一个月可以收到6000万,也就是说,3个月是1.8亿,而我们收到的是2.75亿,而且这还是不够。

伏罗希洛夫:也就是说都吃掉了,如果还有的话,也都是全吃掉了。

斯大林:我将会说到,我们是怎样把用了这样的力气收集到的粮食没有理智地和不能允许地分散掉了,我会说到这一点的。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在今后也还要采用非常措施呢?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采取一切措施,为的是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用采取非常措施了,不仅是在这场收购运动中,而且是永远。我们应该采取所有措施来达到排除必须采用任何的非常措施,至少是在将进行的收购运动中要能做到这一点。一些人说,非常措施一般来说是非常好的东西,这些措施是我们随时随地都需要的,他们的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是绝对不对的。也有人说,采用非常措施是一个错误,应该谴责这些措

施,这也是不对的。同志们,还有这样的说法,这也是不对的。在这里应该两面出击:既要打击犯了一种极端的人,也要打击犯了另一种极端的人。我要再说一遍的是,我们应该采用一切措施,在未来的粮食收购运动中排除采用任何非常措施的任何必要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在这里就发誓说,我们什么时候也不会采用它们。不是这个意思。和剥夺富农以及贫农委员会的做法相比,这样说非常措施意味着什么呢?放空炮。列宁甚至对贫农委员会也没有发誓说,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将永远不会采用它们了。相反,他认为可能会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将不得不甚至采用贫农委员会的办法。同志们,这些情况你们可能不清楚,但是有些人是应该知道这一点的。请允许我能让同志们回忆起这一点来。你们知道,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制定出了一个所谓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决议《关于农村工作》,这是他提交给代表大会批准的。你们知道,列宁狠狠地批评了这封信,把它批得体无完肤。那里有关于贫农委员会的方法问题,是针对富农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道:“不接受这些阶层(即富农和富裕的阶层)和用1918年贫农委员会的方法对它们进行粗暴的、非经济的镇压的政策是一个极其有害的错误。”也就是说,是富农和富裕农民不能接受的政策;而且他鼓吹说,这是非经济的镇压措施。他说的是用贫农委员会的办法,说这种政策是不能允许的。列宁对他的回答是:“第二句(反对‘贫农委员会的做法’)是有害的,不正确的,因为,例如战争就会迫使我们采取贫农委员会的做法。关于这一点,应该用全然不同的说法,比如这样说:鉴于发展农业和增加农产品的极端重要性,目前无产阶级对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政策主要应该是限制他们的剥削趋向等等。我们国家应该怎样限制和能够怎样限制这种趋向,应该怎样保护和能够保护贫苦农民,全部实质就在于此。这应该研究,而且必须在实践中去研究,泛泛谈论毫无意义。”你们看到了,列宁知道什么是贫农委员会的方法,他甚至也不想坚决放弃这些做法,并没有发誓无论何时都不采用这些做法。我们就更不能事先就发誓永远不采用非常措施,不能采用这些措施了。我们的政策就在于,我要重复的是,让我们工作的环境能够完全排除采用任何非常措施的必要性,但是如果形势可能会迫使我们的话,我们就要聚在一起,决定一下,是不是没有另外的出路了,而且我们可能要采用某些非常措施。所以,如果是辩证地看待问题的话,如果是从总体上看待问题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到的那些倾向、那些极端的做法,无论是要绝对主张采用还是绝对反对非常措施,都应该抛弃。

在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请允许我谈谈粮食这件事。我想,有一些同志,包括奥新斯基、斯捷茨基同志和克里茨曼同志,在自己的文章里都有一个毛病,把

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各种原因都堆到了一起。

我们的困难原因中,有长期的、基本的原因,这是不可能在一两年就克服的,消除它们需要很多年,也有和行情变化有关的、特殊性的、暂时的原因,我们现在就能消除。把所有这些原因混淆起来,都堆到一起,是不行的。一些同志,包括我提到的那些同志,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困难的含义何在呢?就在于它们在我们的面前把粮食、粮食生产、总的农业上的问题,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问题,全部提了出来。

总的来说,我们是不是存在粮食问题呢?这里有些人表示怀疑。当然存在。我们不可能像茨冈人那样,每年都是对付着过日子——比如说,缺了1 000万,或者多了2 000万,就凑合着够了。没有出口的粮食,没有军队的粮食,没有防备歉收的储备,这个没有那个没有,——我们是不能这样过日子的。甚至是小农经济,他们的家里总共也只有少得可怜的东西,就是他们也不能没有储备。比方说,我们这一茬的过冬作物在乌克兰没有被毁掉,甚至是在北高加索也没有遭殃。就算是我们勉强可以过关了,难道这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吗?当然不是。你们是怎么想的,同志们,要是打起仗来,能够一方面在前线和波兰人打,而同时又在后方和富农打吗?当然不行。李可夫说得对,一旦战争打起来,富农就不是那样子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强制他们拿出粮食来的。他们是要调皮捣蛋的,还有中农,还有贫农,但特别是富农。他们会说:去你们的吧,谁知道战争会拖多久。你们不是想给军队搞到粮食吗——那好,可我们怎么过日子呢?也许会有歉收,会没有保险基金了,我们是不习惯没有保险基金过日子的。而且他们是对的。人家就会这样说了。如果和打仗相比,今天的困难是很小的(粮食上的困难当然是不大的),如果说在今天有这种相对不大的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在政治的地平线上看到的是乌云和国内会发生某些分离的威胁,如果是威胁已经形成的话,那么我就要问了,如果发生战争又会怎样呢。敌人就会把头抬得更高了,就会去找军队、贫农、中农和落后工人的某些阶层了。他们是会去找的——这是肯定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储备了,如果打起仗来,就需要有5 000万到6 000万,为的是在最初的6个月或者可能是更多一些时间里,在打起仗来的时候,在关于战争的议论传播到全国的这段时间里,在国家看到战争是因为什么开始的,看到有人在进攻我们,看到我们是正确的、不是他们正确的这段时间里,直到这整个浪潮平息下来(按照公认的道理计算,要能够传播到全国去,需要3个月的时间),而关于打仗的传说会产生一大堆的风言风语,而这一切平息下来需要有6个月的时间,因为我要重复的是,我们不可能是战场上和波兰人打,

在后方又和富农打。富农不是原来的富农了。他们是不会白给东西的。他们不会再害怕地主把他们的土地夺走了,他们已经忘记这一点了。他们会说这是过去的事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你们把这件事忘了吧,来点什么新的东西吧。

伏罗希洛夫:他说的也对。

有人喊:早就该建立储备了。

斯大林:如果我们满足于“不多也不少”地过下去,我们就不会有备战的储备了。

伏罗希洛夫:你听听,米高扬。

米高扬:用不着你说我也知道。

斯大林:将不会有防备歉收的储备了,不会有国内的储备了,而没有这些是很难周转的。我们的粮食今年不能出口了,可能明年也不能出口了,要知道,我们是不能长期这样生活下去的。要知道,我们应该努一把力,让粮食能够列入出口的清单。不这样是不行的,同志们。现在我们大体上要有3 000万用于进口粮食,而我们要节省下这些钱是为了进口拖拉机的。那你们就看看,怎么才能支配得开吧。粮食不能出口了,相反我们不得不进口,外汇的储备非常少,还不得不用在粮食上,而进口它我们就不能进口拖拉机了。这就是不能出口粮食意味着什么。在早先的时候,在资产阶级的条件下,运出的是5亿—7亿。不够吃,这是对的,但是还是出口了。不能否定的是一点,安德烈耶夫同志,那个时候的商品粮比现在多。我们不能在老的基础上扩大商品粮,但是在新的基础上,在改善农民的物质状况的基础上,我们还是应该建立起商品粮的储备的,因为如果不出口粮食,就得不到设备,就得不到农业用的机器。这就是四种类型的储备。出口粮食是为了进口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而这是我们所没有的。在说到了这些之后,又怎么能否认,说是没有粮食问题呢?不是的,同志们,它在我们这里是主要的问题,粮食问题在我们这里是基本的问题,它已经成为了一系列例行任务中的一项基本任务。

基础,基本原因,基础……\*。在转到这上面之前,在评论了粮食战线上的困难之后,在这之后,我想要涉及的是政治性的困难。我刚才说了粮食上的困难,这些困难在我们面前提出了关于总的粮食生产和总的农业方面的一个基本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这里出现了政治性的困难。

---

\* 原文如此。——编者注

这一点,同志们,是不能否认的,同志们,相当多的一部分农民的情绪被破坏了,富农在政治上用这一点赢得了一些东西,这种情绪开始传播到一定阶层的工人那里,甚至是在粮食足够的地区,甚至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为结合制造了某种威胁,——这是不能否认的。布尔什维克之所以是布尔什维克,就是因为你们应该善于正视危险。但是我不想说这就是分离,这是不对的;说“我们这里有的已经是分离”,就像奥新斯基同志说的,是在做文字游戏。这是不对的。分离如果不是国内战争的话,也是国内战争的前夕,也是国内战争的开始。难道我们这里是这种情况吗?如果我们这里是分离的话,难道农民将会是像这样生活吗?难道在基本的工人地区将会是像现在这样,有那种相对的平静吗?从来就不会是这样的。对结合构成的威胁当然是有的,分离则是怎样的都没有。如果分离有的话,如果农民想要和苏维埃政权斗一下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扩大春播的面积了。当工人对政权严重不满的时候,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话,他们至少是要罢工的。当农民对政权严重不满的时候,他们就不会为你们扩大春播面积了。当然,不能像奥新斯基同志那样,把两个东西混淆起来,把春播面积和过冬作物的面积混淆起来,把这一切都推到我们采取的非常措施身上。这是不对的,同志们。过冬作物的播种面积是去年秋天播下的,那时非常措施还没有呢。如果你们想要解释清楚,说是非常措施能够影响或者已经影响了播种的增长的话,就应该把春播的面积拿出来,而且只是把它拿出来,因为它是在非常措施采取了之后播下的。当然,像一些同志那样,像克里茨曼同志的文章那样得出结论来,夸大地想象到,好像是非常措施推动了农村,刺激农村扩大了播种面积,这当然也是太做作了。克里茨曼同志没有这样说,但是得到的印象是这样的,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编辑部的评述是正确的。要不就不对头了,但是问题不是这样提出来的。问题是这样的:农民是不是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地步,已经对苏维埃政权丧失了信心,要分离而不要结合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要准备讨伐苏维埃政权了,而且由于这一点,就像克里茨曼所说的那样,农民的经济计划已经没有前途了。这是不对的,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我要再说一遍:当工人想要讨伐政权的时候,他们至少要开始罢工。当农民想要讨伐苏维埃政权,而且是要整个和政权对着干的时候,他们至少要等待,而且至少不会扩大春播的面积。而我们这里得到的是怎样的情况呢?至少他们应该是让播种面积保持不变,至少是该缩小播种面积。可是要知道,在我们这里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拿来的不是奥新斯基提供的那些混乱的数字,那些没有用处的材料,而是我们所有的那些实际的材料,如果拿来的是伏尔加河下游、伏尔加河中游、西伯利亚,可能还有乌拉尔的材

料,那么到处……——我不说北高加索了,那里有复种,会把整个情况都搞乱的;我也不去说乌克兰了,那里也有复种的情况,而且规模更大,我说的是5个地区的情况,而且其中有4个是主要的产粮区。

**斯克雷普尼克:**为什么不拿复种的材料?这也是能表现出农民的积极性来的。

**斯大林:**春播的面积扩大了,这是事实。清楚的是,如果农民怀疑,准备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话,如果他们已经恼火到了要分离的程度,如果他们感觉到已经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局面,不知道明天会带来什么的话,这样的农民如果有要分离的想法,他们是不会扩大自己的春播和过冬的面积,这就是不正常了。这是一个证据,说明不可能谈上什么分离,需要说的有分离的威胁,这种威胁已经存在了,我们应该把它排除掉。这就是粮食上的经济困难。

这些困难的基础是什么?这些困难越来越大的基础是什么呢?决议里说了,我不做任何补充了。基本的一点是农业越来越更加分散和零散。这是事实,农业变得越来越零碎了。如果说我们在革命前有大约1500万—1600万农户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有的的是2400万—2500万了,这就意味着,农民经济越来越小型化,所以它变得不能赢利了。

经济单位越小,它的盈利就越小,它的商品率就越小,而我们需要的恰恰是商品粮。播种面积几乎还是那样,大体上比战前的标准低了5%。粮食生产几乎也还是那样。如果说粮食的话,那就是要比战前落后大约5%、6%,而商品粮的数量几乎要落后50%—60%,因为小农经济盈利少,商品率低,和50亿的粮食相比,生产出来的几乎少了3亿,而提供的商品粮要比在资产阶级经济时期少一半。我们有大约6.3亿—6.5亿普特,大约7亿普特的商品粮,这太少了;从农村的周转中抽出来的粮食要比沙皇时期少一半。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受的基本困难。

如果说到长期的原因而不是行情造成的原因的话,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何在呢?关于行情造成的原因,我在下面要谈到。如果不是指出这样的原因,而是向自己提出消灭这些困难的根本原因的话,那就像决议所说的,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应该是提高中小个体经济。当然,说个体农民经济已经耗尽了自己发展的所有条件,这是可笑的。这是不对的。条件有很多。这当然是不对的。可以采用改良的种子,可以采用农具,还有肥料,总的来说,可以有上万种条件能够把农民经济的收成提高一倍。这是事实。我们的倒霉之处就在于,我们没有像样地利用这些条件,关注得太少了。

有人喊：我们不善于这样做。

斯大林：部分原因也在于我们不善于这样做。卡尔平斯基同志证明说，农民经济已经耗尽了发展的所有条件，这是绝对愚蠢的。

我不能同意的，不仅是有些人对小农经济的条件估计不足，而且也不能同意有些人过高地估计这些条件。还是应该注意到，中小农民经济发展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限的，而且这是应该加以注意的。这就是为什么要说，要是我们真正严肃地想要把原料经济以及整个农业向前推进的话，在我们这里，把小农经济转移到集体化的轨道上来的问题就是最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必须要抓住的和必须要贯彻的第一个出路，就是进一步提高中小个体农民经济，提高它的收成，供应肥料，供应机器和良种，等等。

有一种手段，借助于它可以更轻松地提高这种小农经济。这就是合作化。非常奇怪的是，有些同志最近在不懂得列宁的合作化计划是什么的情况下，开始批判性地评价这个计划。不久前，布哈林给我看了从列宁格勒的《红色报》上摘录下来的一段话，说是以前我们是在生活和供应上用合作化的办法把农民联合起来的，而且是用这样的办法把这种经济提高到社会主义的形式上来，集体化的形式上来的。

现在看来，这是不对的。这是愚蠢的，怎么能允许这样做呢？我搞不明白。要知道，如果我们这里没有那种在最近这些时间建立的那种合作社团体，如果我们没有把个别的农民经济收拢到共同生活和供应的组织里的话，那我们这里就没有任何集体农庄运动了。既然在我们这里可以说是已经为农民转向集体农庄，转向协作组织的经济单位创造了心理基础和物质基础的话，那么，这就是说，在生活和供应上的合作社组织正在我们这里得到发展，并且将要继续发展，把小农经济逐渐转向集体经济的轨道会变得更加容易了。这也就是第一个出路。

第二个出路就是决议所指出的，逐渐地把小农经济转移到集体化的轨道上来，这里指的是这种集体化的所有形式，从最简单的机器上的、土地耕作上的协作组织，劳动组合等等开始，直到集体农庄，公社。

我不能不指出的是，当一些同志说到例行任务是发展集体农庄的时候，一些人，远不是所有的人，通常是背朝着小农经济的，说是现在我们有的新的任务——集体农庄，而小农经济是枷锁，应该尽量快地摆脱它。当我听到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和米柳亭同志说的话时，感到很吃惊。米柳亭同志威胁说，“如果想要给小农经济恢复名誉，那没有你们的好”。这是很怪的。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走得更远了，说是小农经济是我们该诅咒的东西。我不明白。如果是该诅

咒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和它们联盟呢?这怎么能放在一起呢,原来我们是和这种该诅咒的东西,和小农经济搞联盟,而且已经有10年了,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而且我们有根据在今后还要维系这个联盟。怎么会是这样,哪里会有这样的情况呢?一个列宁主义者怎么会是这样看待小农经济呢,我们并不是要努力把它从自己身边推开,我们并不是要竭力摆脱它,就像要摆脱枷锁,要摆脱该诅咒的东西一样,我们要有它并不是为了给它恢复名誉,因为它并不需要恢复名誉,而是相反,我们是要把它转移到集体化的轨道上来。难道您,米柳亭同志或者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为了要发展合作社,就将提出一个口号,或者即便不是口号,那就是指示,或者哪怕是一种暗示,说是小农经济对于我们是枷锁,是该诅咒的东西或者是什么最后要垮掉的东西,不值得我们给去给它恢复名誉,也不能由我们给它恢复名誉吗?而我所担心的是,在你们能够勉强让合作社站立起来之前,你们就已经把我们和农民有的那个联盟破坏掉了。

喊声:对,对!

斯大林:我们和小农经济是有着联盟的,你们却在灌输这样一种鄙视和轻视它的情绪,那你们将立足于什么呢?那么,这个联盟还有什么用呢?这根本就不是在帮助合作社经济,完全不是。我们不是把两者对立起来,而是说:我们要通过为集体农庄提供基础的合作化来解决第一项任务。我们希望的是,让农民不是把集体农庄看成自己的敌人,看成要把他们搞得忍无可忍的东西,而是要让他们把集体农庄看成是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朋友。

米柳亭:对。

斯大林:如果这是对的,那我们就没有必要为小农经济“恢复名誉”和把它说成是我们的经济中该诅咒的东西。应该说的是,和大型的合作经济相比,小农经济是没有多大好处的,不大能赢利的或者甚至是最没有好处的,——但是总还是有一定好处的,而且该说的是,为什么应该逐渐把小农经济转移到集体化的轨道上来。列宁不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你们看看,他是怎样从我们今后的发展的角度评价小农经济的。如果农民经济能够继续发展,那么还应当为进一步的转变提供可靠的保证,而进一步转变就必然是使效益最差的、最落后的、细小的、单干的农民经济逐渐联合起来,组织成公有的、大规模的农业经济。我们一直就是这样看待这种评价的,我们的党也正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米柳亭:我并不是这样说的。

斯大林:按您的说法就是,它,小农经济,不仅不是有利的,而且是有害的。按您的说法就是这样的。否则它就不需要恢复名誉了。按列宁的说法,它是最



少有利的,——但还总是有一些利的,——比起大型的合作社经济来说,当然是很少有利的。接着列宁说到了个体农民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应该确立的相互关系。他接着是这样说的:既然提出了合作社的任务应该是什么,那么合作社是应该和小农经济斗争,还是应该把它们拉过来呢——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既然你们面临的是两种形式的经济,如果是一种在和另一种斗争,这样就是一种关系,而另一种关系是两种经济形式,高级形式和低级形式,一种是在帮助另一种提高。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列宁接着说:“特别应当做到切实执行并彻底执行苏维埃政权的法律,这个法律要求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和一切类似的联合组织对周围的中农给予迅速的和全面的帮助。只有给予这种实际帮助,才能实现和中农的妥协。只有这样才可以而且应该得到它的信任。”

这里没有说到恢复名誉或者说这种经济是我们该诅咒的。这里说的是一种经济盈利少,另一种盈利多,更有利的经济应该帮助不大有利的经济提高,而不是把它从自己身边推开,应该把它作为个体经济,给它帮助。就说集体农庄吧,它的周围是农民,其中也包括中农。一件事是帮助小农经济活下去,另一件事就是要把它作为小农经济,给它帮助,让个体农民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这种天长日久的组织上的帮助下,比较容易地,不用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加入到集体农庄里来。

米柳亭:我没有否认这一点……(这句话的末尾没有听清楚)

斯大林:第一段语录说到小农经济是最落后的,盈利最少的,应该逐渐地把它们联合起来。这段语录我是从列宁《论粮食税》的小册子里引来的,它论证了执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在《论粮食税》这个小册子里,恰恰首先说到的是关于个体的小农经济,而且他也没有忘记提到集体农庄。

第二条语录我是从他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摘下来的,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这里制定出了我们和中农结成牢固联盟的政策的基本原则。

还有第三条语录,是从集体农庄运动的观点解释我国发展的前景的。“只有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了公共的、集体的、共耕的、劳动组合的优越性,只有用共耕的、劳动组合的经济帮助了农民,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正确,才能真正可靠地把千百万还没有集体化的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这次讲话他也是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同志们,这就是方针:千方百计地发展作为个体经济的农业经济,利用所有的条件,而它们是很多的,在农业的发展中,这是一项基本的,这是现在的一项主要的任务,因为正像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说的,还要有相

当长的时间,小农经济依然是农业的基础——这一点是不该忘记的。像奥新斯基同志或者另外的什么人那样的人,对这一点的估计不足,他们是反对我们的政策的。那些过高估计和看不到除了小农经济外还需要建立大型的集体经济的人们,他们也是反对我们的政策的。我们既不需要指责个体农民经济的人,也不需要为这种经济唱赞歌的人,这两种人都应该刮他们的鼻子。而且从这方面说,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有一系列同志在这里发言,说到小农经济和中农经济,说到对它支持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说到集体农庄,就好像根本不存在这项任务一样。我把奥新斯基同志的讲话看了三遍,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到,在我们面前,除了提高个体农民经济外,有另外一项任务——这就是发展集体农庄。一句话都没有说到这一点。斯捷茨基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布尔什维克,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忘记了这件事,讲了话,也咬了什么人,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除了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任务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发展集体经济。照我的看法,对这样和那样的人,都应该当场就向他们指出,除了农民经济这项任务外,还有一项任务是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关于国营农场我就不说了。发展国营农场的任务——这是一项无可争议的任务,加里宁同志会说到这一点,我就不展开说了。这就是3项任务。

从农业角度看,当前时刻的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提高个体农民经济是一项老的任务,现在它也是一项新的任务,但对我们来说,完成这项任务已经不够了。在这个任务之上,还要加上两个实际任务,提高所有形式的集体农庄和提高国营农场,包括老的也包括新的国营农场的任务。谁要是不理解这一点,谁要是想,总的对于农业来说,特别是对于粮食经济来说,用这样的一项任务,也就是说用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任务,就能把我们的任务全部说清楚了的话,那他就是对我国现在的局势一窍不通。应该是把所有这三项任务都看成是例行的任务,而且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解决农业问题的话,如果我们想要这样来安排我们的事情,让我们有对内和对外的需求的储备的话,在这三个方面都要有所前进。我说的是粮食的储备。

有意思的是,列宁同志是怎样看待这三项任务的结合问题的呢。你们可能读过列宁同志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命令——这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列宁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呢?我们有一个著名的文件说到了,请全会注意的政治局决议是和列宁在这个文件中勾画的发展农业的实际计划完全吻合的。我指的是列宁亲手写的《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

米高扬:1921年8月。

斯大林:他是在1921年5月颁发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命令。

布哈林:还有经济会议。

斯大林:在推行了新经济政策之后,他给出了纯粹实用性的、没有废话的、实实在在的指令,说到了怎样在实践上扭转我国的经济政策,沿着新经济政策轨道前进。列宁把这个命令里的任务分成了三类任务和三类问题。第一类涉及的是总的商品流通和工业的问题,包括了除国家工业外的其他所有类型的工业的所有相互关系。第二类涉及的是提高农业。第三类是组织掌握市场的制高点所绝对必要的经济会议和各种这样的经济领导调节机关。我来说一说第二组问题——是这样说的。发展农业。就是这样说的——第二组问题——发展农业:(1)农民经济;(2)国营农场;(3)公社;(4)劳动组合;(5)合作社;(6)其他形式的公有经济。还是在1921年,在7年以前的时候,当我们这里可以说还是手里拿着蜡烛一台台地寻找拖拉机的时候,当我们这里的集体农庄还少得可怜的时候,他作为一个领袖,一个真正的领袖,是怎样评价我们的实际任务的呢?他没有把两个任务对立起来,他没有把任务的一个部分和另一个部分扯开,他是从总体上看,于是说:如果你们想要发展农业——发展农业,那就发展农民经济,发展国营农场、公社、劳动组合和其他类型的协作耕种土地的组织。在我们这里,决议所作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决议认为,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就在于我们要在三个方面前进,在发展个体农民经济方面,在发展国营农场方面,在发展集体农庄和其他类型的社会生产方面。

非常有意思的是,列宁这个能够搬动大山,让它们彼此相撞的巨人,怎么能像孩子一样高兴地迎接关于建立每一个并不起眼的集体农庄或者从美国发来了几台拖拉机的每一个小消息的。这就是27日(听不清楚)……的一封信,我来读读。《致苏俄技术援助协会》。亲爱的同志们……(译)

雅罗斯拉夫斯基:可惜没有帮上他们。

斯大林: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他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在看待我国农业未来的组织,他对从不大有利的和落后得可怕的个体经济这样一种生存的基础向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过渡理解到了什么程度,重要的是,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像这里的某些人引用他的话时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农民哲学家。

现在请允许我转到那些暂时的、市场行情上的困难上来,对这一点说上两句,因为这里有许多要说的,我就要结束自己的话了,拖得太长了。

决议里说了,产生我们的粮食困难危机的暂时原因、特殊原因有4个。在这里列举的是:市场平衡受到破坏,价格的对应关系,计划领导的错误,收购机构和

党的机构的缺点以及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利用了所有这些结论。

我想就彼得罗夫斯基同志的意见说几句。我要说的是第一点,关于破坏市场平衡和关于农村中富裕的富农阶层以及总的来说农村提高了自己的收入,提出了过多的需求,我们没有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并且在这种差距的基础上造成了困难。他不想相信这一点,于是说:“怎么是这样呢?一方面你们那里说农业是最落后的,另一方面它又积累了,提高了自己的收入,工业不能满足它。”我想,这里没有任何矛盾。我们那里说的是农业的落后,是它和工业相比非常落后,而这里说它前进了,不是和工业相比,而是和前些年相比。这也是正确的。这是事实,和前些年相比,农村成长了,而且提高了自己的收入。否则的话,干什么要提高税收,干什么要一个劲地大搞捐献呢?农村是积累了钱。这是当然的。这些年它提高了自己的收入,而且特别是它的富裕的富农成分提高了这种收入。这是事实,这里说的是农村今天的收入和它以前的状况的比较,和它过去的收入的比较,而那里说的是农业、它的速度和工业速度的比较,——这里是两个不同的层面,是不能把它们混淆起来的。所以决议是正确的。

我想,在这里开列的造成今天收购危机的特殊原因里,在这个清单里,还缺一条:应该在这5条原因里再加上一条,那就是我们错误地消耗了粮食。

有人喊:一定要加上。

斯大林:不要把矛头指向商业人民委员部,在这一点上不只是它一家有过错,我们大家都有错。(笑声)

伏罗希洛夫:当然是大家都有错,但首先有过错的是商业人民委员部,因为它是管这件事的。(笑声)

斯大林:我们大家在这里都有错。在3个月里收到了2.75亿普特,但是显然我们看花了眼。

有人喊:收了很多!

斯大林:那就分配吧。不是像一个真正精打细算的主人,知道除了好日子外还有不好过的日子,不是一点点地分配,我们开始把粮食都分散了,给了一个区,又给了另外的一个区。为什么在3月份就该是把5500万都分出去供应了呢?难道是为了在5月或者6月只能分配2300万吗?你们看看,是怎样的差距呀,有那么一个月,我们是从大家的锅里拿出5500万来供应分配给消费者的,可是到了紧的时候,就变成2300万了。为什么不能在那个时候,在3月份的时候,和现在,在6月份的时候,都拿出3500万来呢,那我们就能省下1500万了,而这样做是有很意义的。照我的看法,这一点应该写到决议里去。

关于需要采取措施排除必须采用非常措施的任何可能,——关于这一点我就不在这里更多地展开说了。我只想说说从实际工作的同志们这里指出的、我也想强调的3个事实。

第一,我们的粮食收购运动的缺点之一,无论是在第一个时期,在1月到4月这段时间,还是在后半段时间,在5月和6月的时候,是我们的党组织手伸得太长了,把苏维埃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完全取代了。

有人喊:不这样就什么也做不成。

斯大林:我懂得这一点,说这些不是为了要责怪谁。是由于什么原因,把党的组织这样推到了前面呢?你们都知道,苏维埃组织和合作社组织没有能动起来,应该把它们动员起来,应该监督、领导和帮助它们。

有人喊:指令是相当吓人的。

斯大林:指令是很吓人的,因为大家都是火急火燎的,但是我们总还是应该避免发生这段时期在我们这里发生的那些事,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避免让党的组织取代合作社和苏维埃组织。

有人喊:对。

斯大林:要让农民不是一定要找区委书记来告状,而不是去找执委会主席,去找收购单位,去找一个什么合作社的主席告状——农民不认他们,他们就是要找区委书记。这样是不行的。非常的局势,非常的措施,然后就是局势恶化,出现一系列的扭曲——所有这些造成了这样的气氛,当然就需要有人来有力地把事情推动起来。党的工作者们便出头了。照我的看法,不该再这样下去了,应该采取措施,不要让党的组织这样出头,让它们替代了苏维埃组织、合作社组织以及其他的组织。不能允许这样,否则苏维埃组织、合作社组织和其他组织将不能得到发展,将不能强壮起来,它们的威信将会降低,而且党将会在这上面栽跟头。需要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的政权形式就是为了有一个可以向老百姓交待的外壳。党要打交道的是自己的党员和围绕着它的、党的无产阶级积极分子,也就是说100万的党员和党的周围的200万积极分子——党是要和他们打交道的。而我们打交道的不仅是这些人,而是所有的老百姓,而我们有1.5亿的老百姓。谁能和他们打交道呢?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党应该是在内部领导、帮助,但不是取代。见鬼了,我们为夺取苏维埃政权,为苏维埃的形式进行了斗争,是为了什么呢,要知道,我们在十月革命的时候是在争取得到它的,为的是建立能够从内部进行领导的管理形式的。如果我们将老百姓那里把它们消灭了,自己伸头太多,取代它们,那我们就会断送事业的。这就是我想要指出的。我明白,

当时是需要的,是由于需要才不得不这样做的,但是总还是应该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要避免出现这种扭曲的情况。

第二个问题是谷物加工费问题。我想,舍博尔达耶夫同志在这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有10亿多普特的粮食是农民在磨坊里磨了之后供个人用的。这些粮食有一部分是用风磨加工的,有一半是在我们国家和合作社的磨坊里加工的。而且所有的人——农民,贫农、富农和中农,都承认,应该为此支付十分之一或者二十分之一,大体上是这样的。结果是多少呢?

有人喊:一普特交3俄磅。

斯大林:一普特支付3俄磅,而有的地方是4—5俄磅粮食。按照懂行的人的计算,合作社的和国家的磨坊大约可以拿到完全有保障的、完全没有问题的5000万普特的粮食。

米高扬:对!

斯大林: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些粮食没有受到监控。我的感觉是,商业人民委员部有一个决定,我知道得不准确,说的是把这些粮食的一部分交给贫农基金,而另一部分用做……\*收购。至于这些粮食是不是一点点地用在了私人的市场上去了,没有任何监督和任何把握。要知道,往往是这样的(请合作社的人员不要见怪),有一定数量没有控制的粮食是放到了私人市场上去了,因为合作社想要把平衡表扯平,给这部分粮食支付的钱要多出一倍,这样的诱惑是非常大的。能不能把这些粮食控制起来呢?既然数量达到了不少于5000万普特,这可是我们有保障的和完全无可争议的粮食呀。

米高扬:可以而且应该。

有人喊:现在就干起来。

斯大林:这个问题应该从实际上得到解决。

第三个问题是梅德韦杰夫同志在这里提出来的,是关于社会商店的问题。好像您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吧?这一点不可能写到决议里去,但是显然这个问题将对我们的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既然我们在1月、2月、3月已经把贫农动员起来了,吸引到我们这边来了——这是事实,这是大家都明白的。我们在1月、2月和3月已经把夺来的粮食的一部分给了贫农,他们的情绪是好的,在这里,就情绪而言,情况是越来越好些了,而且只是在4月、5月和6月被搞坏了,只是因

\* 原文如此。——编者注

为没有可能给贫农挪出更多的800万—1000万普特粮食作为消费基金。那么,该怎样安排,在这样困难的时刻,在新的收购之前,在收成打下来之前,能够让贫农有一定数量的储备呢?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商店当然是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的。

有人喊:那里也有中农参加。

斯大林:实际上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是最好不过的了。

我说完了,同志们。关于主要的困难已经说了。关于特殊的困难也说了,所有这些困难的意义就在于,它们迫使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最终要注意到农业了。遗憾的是,历史总是这样教训我们的。只有经历了困难我们才学会了纠正局势。只是由于在东部战线上,当高尔察克少许触动了我们一下的时候,我们才得以建立了步兵。只是通过在南部战线上和邓尼金的斗争,我们才明白了必须要建立炮兵。只是在遇到了与沙赫特案件有关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明白,不培养自己的工人知识分子、技术知识分子,不培养来自工人阶级的人们的新知识分子,能够自己推动事业的技术方面前进的技术知识分子,我们就不行,我们没有他们就会完蛋。现在是新的困难,粮食上的困难,只是到了现在,布尔什维克才严肃地抓起了农业。在此之前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搞的是工业和一般意义上的合作社,只是议论了农业,只是泛泛地随意抓了一些事。应该利用这些困难来严肃地、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抓农业和粮食经济这件事,采取一切措施来解决粮食问题,消除我们困难的那些特殊原因和向前迈进。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1032号案卷,第115—178张。原件。)

## 10

## И. В. 斯大林在 1928 年 7 月 11 日联共(布) 中央全会上发言的速记记录

(原始记录)

**斯大林:**同志们!我今天本不想讲话。但奥新斯基同志和其他同志让我不能不讲了。我总共用 10—15 分钟,不会多。

我们昨天争论的是什么?说到的是城乡之间存在剪刀差,农民购买商品时多付钱,而在出售农产品时少收钱。这里讲的是,为了工业,为了更快地前进,必须要有两个基本条件——用自己的脊梁支撑着工业的工人和支持这个工业的农民。这里所说的是,农民购买商品时多付的钱和在出售农产品时少收的钱,它们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对农民的附加税,而且我把这叫做某种贡赋。某些人不喜欢这种说法,其中也有奥新斯基同志。当然这是各人的口味。但是应该给各种东西一个正名——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们在自己党的中央全会上,不是在农民大会上,应当照直讲出实情。这有些呛鼻子——贡赋,附加税。

就算这是呛鼻子的字眼。我们就应该是更多地和更快地努力结束这种贡赋,发展工业,把它变得合理,把商品的价格降下来,这样来把“剪刀差”消除。说的就是这个。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但是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走,越是到后来就应该越是更多地这样做。需要多少年才能消除“剪刀差”,我不知道,但是无论是在今年还是在明年,也无论是在今后的年份里,如果我们不想把我们的工业搞垮的话,我们做不到消除“剪刀差”。这里说的是这个。奥新斯基同志非要在最近就消灭剪刀差。我与其他同志一起,把这称做是农产品的恢复性价格理论。今天奥新斯基同志承认说,他反对恢复性价格。这很好。也许奥新斯基同志丢掉了他所犯的片面性。结论是什么?结论是这样的:批评没有白费。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问题。我和其他人一起,特别是我,强调的是,我们党最著名的活动家奥新斯基同志在这里的发言中大谈特谈了发展农业的途径问题,谈了应该按照什么渠道快速发展农业,特别是粮食经济,却只字未提诸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是不能允许的。他说到了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决议承认个体经济长时间内仍将是农业的基础。发展和提高它是一项主要的任务,虽然光这样是不够的。奥新斯基同志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整个发言都用在这个问题上,而完全不提我们所面临的全新任务,不提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呢?我说了,奥新斯基同志对这件事保持了沉默。奥新斯基同志今天声明说,他以前就支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现在和将来仍然支持。这很好。

**奥新斯基:**如果给我两个小时,我会把这件事说得更加详细。

**斯大林:**很好。可能又是批评没有白费。

第三个问题是衔接工业的问题。在这里,奥新斯基同志犯的还是原先的错误。他今天和以前一样,只认为纺织工业是衔接工业。

**奥新斯基:**只有纺织工业……不是这么回事。

**斯大林:**显然,您发言的时候连自己讲的话都没有听。

**奥新斯基:**请允许我现在就读速记记录。

**斯大林:**有人当场就喊了,而且丘巴尔在自己的发言里纠正了您,说是不只是纺织工业代表了衔接工业,还有冶金业以及整个重工业。如果奥新斯基同志没有听自己在说什么并且承认说,衔接不仅是在消费品上,而且也还有给农业的商品的话,那我们之间就没有分歧了。这很好。

同志们,现在我来谈谈国营农场问题。有一些意见,又是关于奥新斯基同志的一系列申明的。当然,说在美国没有大型粮食经济的样板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奥新斯基同志不可能不知道图拉伊科夫的著名著作,他不久前去了美国,转述了自己的印象。奥新斯基同志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那里描写了几个粮食类型的大型农业经济单位中的一个,这是一个还在生存并发展着的单位。可以就这方面的情况读上几段话。

“蒙大拿州的小麦农场属于肯博尔农业公司……”

**奥新斯基:**我说的就是这个。

**斯大林:**您是这么唾弃了这个公司,简直就没有剩下什么可以从这个公司拿来例子效仿的了。

“它的面积是32 000俄亩。农场位于……(漠)它的总收入是50万美元”。这样的大型农场在美国的北部有,在南部也有。它们生存着,但是他们在那

里生存得比较差；对于这样大型的粮食经营单位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良好的成分要比我们这里少。我的意见涉及的问题是，奥新斯基有些脱离开了一点，那就是对于大型经营单位来说，我们的环境，苏联的环境，和资本主义环境的差别。就拿这一点来说吧，那里有的是绝对的私有制，在那里，土地是应该买来的，而在我们这里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土地是国家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再说了，那里对土地是要上很高的税的，而我们可以向自己的大型经营单位提供优惠，当然是优惠的地租，总的来说，可以列举出一系列因素，通过它们可以揭示出苏维埃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基本差别来，这种差别不是不利于，而是有利于大型粮食经营单位的。

现在来总的说一说国营农场。我不是仅仅从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看待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而且首先是从加强结合的角度，从在农村里为加强结合建立经济支撑点的角度看待它们的。同志们没有从这方面看待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自己有权从这个方面说上几句。

全俄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联合会通知说，它同集体农庄、劳动组合和合作社签订了今年耕种土地的合同，可以得到2亿—2.5亿普特粮食。资料说，我们的国营农场，老的和新的，在今年可以提供不少于2亿普特粮食。

**安采洛维奇：**要多一些。

**斯大林：**安采洛维奇同志说，要多一些。而我用的是比较少的数字。这就是4000万普特的粮食了。这是非常好的储备。如果我们在去年的收购运动中能有这样的支撑基础或者这样的储备来等待时机，压价，保持价格和平息市场上的发热状况的话，可能我们就不必使用非常措施了。很可能是这样的。

**柯秀尔：**至少用不着再动用这些措施。

**斯大林：**我们的粮食经济的支撑点是和农业合作社有合同的各种类型的集体农庄，乃至机器联合组织；还有国营农场，包括老的和新的；然后是合作化的、用预约合同联系在一起的和与合作社联系在一起的个体农民，而在今年，你们要记住，我们是有4000万普特的合同的。如果我们能够争取到，如果我们通过这三条渠道能够得到一些储备，可能不是很丰厚的储备，大体上有8000万到1亿的话，那我们也就不需要用任何非常措施去触动中农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支撑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竭尽全力和千方百计地推动这些支撑点前进了。我们并不像昨天托姆斯基同志所说的那样，在维护结合的事业中是那么无助的。听着托姆斯基同

志所说的话,我得出的印象是,见鬼了,难道我们的处境就那么无助吗?难道我们在维护结合的问题上就那么束手无策吗?原来我们剩下的就只有一种维护的储备手段了——让步。今天让步,明天让步,后天还是让步。照他的说法,这样可以加强我们。我非常怀疑,在农民施加了压力之后,在富农组织施加了压力之后,就不断地对他们让步,就不断地对中农让步,以便他们能大大加强苏维埃政权,——对这一点我是非常怀疑的。

有人喊:正确。

斯大林:不,我们所具有的储备办法,不仅是为保持结合而做出的让步,而且还有组织起经济的支撑点,那就是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合作社,还有就是在农村建立起能够提供政治支撑的政治储备。什么是政治的支撑呢——关于这一点我要说两句。如果除了让步的储备外,我们在农村不加上像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各种签订预定合同形式的合作制这样的、不断发展的储备的话,如果是除此之外我们就没有了像是在贫农中间开展工作(这项工作应该成为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牢固的支撑)这样储备的话,如果在农村没有这些牢固的支撑点的话,——我们的处境就的确是没有指望了。我们就只有退让了,但是这些退让是不可能无止境的。难道我们能在所有方面都退让吗?今天退,明天再退,后天还要退,而如果要求我们开放不要有国家的调节性影响的自由市场,如果要求我们组织农民联盟,——要知道有人已经在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了,——如果是要求我们取消关税壁垒、对外贸易的垄断和为商品的最低价格开辟道路(而这样的价格顷刻之间就会扭断我们工业的脖子的),那我们是让步还是不让步呢?而如果是所有人都要求这一点,如果是已经没有指望了,苏维埃政权是不是就完全无望了呢?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有的不仅是像集体农庄这样的支撑点——我们要发展它们,不仅是以国营农场的形式发展它们——我们将千方百计地发展它们,不仅是用农业合作制预约合同的办法——我们要想方设法把它们扩展开来,而且我们还有对中农施加政治影响的支撑点——这就是加强在贫农中间的工作。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里,除了我们这里说到的那些修改之外,完全有必要在关于收购的决议里再加上一条展开的修正,说到关于在贫农中间的工作。

喊声:正确!

彼得罗夫斯基:只是这样做需要钱。

斯大林:对,关于钱我现在就要说到。你们自己瞧瞧,2月、3月——收购搞得热火朝天,收来的粮食有一部分给了贫农。贫农转向了我们。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大家都这样说。贫农是支柱——农村感觉到了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

和

中农的表现又怎样呢？是反对富农的，不赞成富农。5月和6月，收购降下来了，我们没有了储备，没有什么可以给贫农了。他们是不是需要很多才能拖到新的收成下来呢，在6月、7月的时候，是不是需要给最需要的贫农很多呢？最多是1 000万、1 200万、1 500万。而如果像托姆斯基说的，提高40%的话，1 500万又算得了什么呢……

**托姆斯基：**我没有建议，我说的是“大体上”。

**斯大林：**如果大体上提高40%，这就是大约3亿——2.8亿了。从哪里能拿到它们呢？你们计算一下：要么我们是用一切办法建立贮备基金，用一切力量为贫农得到大约1 200万粮食，为的是在新的收获年份开始的时候，能够有一点东西给他们补充一下，要知道他们是不会平白无故地要求的，贫农想要的是比较便宜地得到粮食，——这就需要我们花费3 000万左右，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给出这些来——3 000万卢布，——那我们就得每年给中农1.4亿。事情就会变成这样了。

同志们，我在结束的时候要说的是，我们的事情不是像一些同志的发言所表现出来的那么糟糕。我们有储备来保持和中农的联盟，但是这些储备不仅仅就是退让，它们还在于要全面展开农村中的经济秩序的支撑点，要有储备和保持物价水平，要等待。它们在于要建立起政治秩序的支撑点，为的是加强在贫农中的工作，从而迫使中农向我们这边摇摆。中农是一个摇摆的阶级。如果我们的工作不是像此前那样，凭着一时的印象进行，而是天天都是在系统地进行的话，那么，贫农就将会是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牢固支柱。而且工作不仅应该是宣传鼓动——这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而且应该表现在物质方面。请你们相信，中农将会倒向我们这一边，而富农的日子将会不好过的。中农是听信力量的。谁要是胆小怕事，他就不可能把中农拉到自己这边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国营农场，不光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也是为了通过它们能够建立起支撑点来，依靠着这些支撑点，我们就能够让中农倒向我们这一边。这样就可以在没有重大的原则性让步的情况下保持结合。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中农要求我们组织农民联盟。有过这样的时刻。我们是怎样把这种打击挡回去的呢？是通过加强贫农的工作，通过贫农向中农群众进行劝说，说是这样是不行的，这是富农的诡计。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们的工作体系中的这种劝说的成分几乎从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被排除掉了。在这方面，过错可能在于各种非常状态吧？同志们，应该把贫农工作中的这种说服的成分再拿起来，要知道，有的时候中农会说：你们的调节见鬼去吧，把自由的市场打开

吧。中农一直都是会围绕着这个问题动摇的。你们开放自由的市场看看。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投机商给出的是1.5卢布，我们就该是给出1.6卢布，如果投机商给出的是2个卢布，你就该给出2.1卢布，就像是人们实践工作中所说的那样——该啐口唾沫把这个投机商淹死。如果是这样下去，同志们，如果是这样办事的话，如果在这里拱手托出的话——这就意味着要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出去，因为那样就得把工资提高两倍；这就意味着要提高工业商品的价格，把一切都来个底朝天。我们怎样把这一切挡回去呢？要通过加强对贫农的工作，用这样的办法把中农拉到我们这边来。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我们才能说服他们。应该让他们能够有所准备，让他们知道，采取这样的措施——取消国家机关的所有调节职能，建立自由的市场，将会导致加强富农的力量，这可能会使得期限更加延长。富农可能会去拉中农，但是能够教训中农，鼓动他们去让人家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的人，在我们俄罗斯有很多。

我们在这里要确认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说，联盟的分裂已经来临，我们就要撒手不管了呢？不是的，我们要斗下去。要通过贫农去说服中农，说明这样做是会导致我们的国家丧命的。我们不仅是在让步上有储备的手段，而且在发展我国经济的领域里建立起我们的支撑点上，我们也有储备的手段，而且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结合将是牢固的。

**李可夫：**加里宁同志发言。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1033号案卷,第59—72张。原件。)

## 11

## Н. И. 布哈林关于 А. И. 米高扬在 1928 年联共(布) 中央七月全会上的报告的札记草稿<sup>260</sup>

### 经济建设和党的任务

(决议草案)\*

## 一

1. 改造时期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在建设经济工作以及阶级斗争的经验基础上,这段时间既揭示出了这个时期所特有的一系列困难,也揭示出了经济领导及其领导人的一系列根本缺点。属于客观困难的,有来自外部的资本主义包围的困难(金融经济封锁的种种企图),也有直接来自于国家技术经济落后的困难(积累,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累,其中包括在重工业中的,特别是化学工业和电力建设中的积累的限度)。改造时期的各项任务的新颖和复杂,与此相关对经济领导提出的新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更复杂的要求(宽广的视野,对所有经济联系的理解,科学专业水平,技术知识,实践经验,等等),在恢复时期的要求和改造时期的要求之间划出了一个明显的鸿沟。在这种复杂化了的局势下,就是阶级斗争、各种不同的经济形式之间斗争的问题,也以一种新的方式提了出来,因为每一个计划上的失误都有着深刻的实践后果,都不可避免地会构成阶级敌人更顺利地运作的基础。

2. 由于过去那段时间已经有过的经济实践造成的结果,在肯定总的、毫无疑问的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确认有一系列非常巨大的和非常危险的经济失误;至今虽然代表大会不止一次地做出了决定,中央也不止一次地做出了决议,关于

\* 在文件上方,布哈林用铅笔写了:“意见”。——编者注

储备(商品的、外汇的、黄金的、粮食的储备)的指令都没有完成。基本建设虽然有很大的投入,运作得要比可以做到的缓慢,原因是建设价格高昂,在经济的日常活动中出现了使用“报废的”(也就是从美国和西欧的观点看是陈旧的)技术设备和建设手段,领导中的混乱和官僚主义的拖拉。虽然“剪刀差”有所减少,但城乡之间的结合调整得不够迅速,而在最近几个月里正在发生着完全不能允许的经济分离的过程,其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基本群众之间关系在剧烈恶化,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在减弱。出口和进口问题也同样远没有得到解决。必须要完全客观和没有畏惧地确认,政权和党的整个机构显得还没有足够成熟文明,还不能马上就把握住改造时期的各项巨大任务。只有随着的确把群众吸收到建设过程中来,只有随着和阶级敌人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和提高无产阶级国家整个领导骨干力量的专业水平,这些任务才有可能解决。

3. 改造时期本身并没有蕴藏着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一定要发生的和不可避免的阶级冲突,因为这些阶级之间的分裂绝不是苏维埃经济的本性所奠定的(列宁和托洛茨基是针锋相对的)。列宁关于这一点曾写道:“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内并不存在必然发生这种分裂的基础,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密切注视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并防止这种情况发生”。<sup>261</sup> 改造时期的困难的限度当然是要不致引起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严重的阶级分歧”。

改造时期的困难不可能完全由党和国家的计划政策来消除,因为在有着为数众多的个体经济的情况下,计划工作本身适用的限度被压缩了。但是——困难的这种规模有着造成“严重阶级分歧”的危险,但绝不是不可避免的,有可能而且也应该用党的政策来消除。按照列宁的说法,这也正是“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

4. 粮食供应出现非常巨大的困难,城乡之间开始出现分离,这是不能用一种情况解释的,好像是用在工业上的花销总的超出了国民经济以及它的农村部分的能力。粮食收购中开始出现困难是和农村中的货币过多以及农村中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商品的提供之间极大的不相适应(既包括质量上的也包括数量上的不相适应)同时发生的。就是从工业和农村经济之间的分歧、它们之间的失调可能增大了来解释这些困难,那也是不行的,因为最近以来,剪刀差的幅度不是在增大,而是在减小。最后,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虽然有它的特点,但是也不能从农民经济分散这样的事实得到解释,因为这种分散在以前也是可以看到的,

但绝没有导致发生今年这样的结果。粮食收购的危机可以用一系列农业的其他部门(畜牧业、家禽养殖业、奶业、技术作物,等等)中的粮食生产的状况非常不好\*来解释,从平均价格(去年私营者的收购价格)和从征税的角度看,这种状况正是在今年大大地恶化了。没有考虑这个决定性的因素是计划领导的主要错误。正是计划领导的这个错误使得富农能够在价格问题上联合了一定数量的中农群众(然后在另外的基础上也联合了贫农),并且对国家的粮食收购计划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抵抗。冲突正是在粮食价格上发展起来的,因为恰好是在这里,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起码必须要有有的基本的经济比例遭到了破坏。

5. 从发展前景的角度看,必须想方设法促进提高农业特别是它的粮食部门的生产力。从国内的经济周转(工业的原料基础和粮食)的观点和从与资本主义外部世界的正确关系的观点看,这都是必须的。苏联的工业化要做到的是:(1)提高农业产品在很大程度上的粮食经济产品的出口,苏联用它可以支付机器设备的进口;(2)扩大自己的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粮食消费的原料基地;(3)农业本身的工业化,这本身也要求在农业里有实际的积累(也就是说把赚来的钱变成农业机器、牲畜、肥料、灌溉管道,等等)。所以,从总体上提高各个农户,提高他们的技术装备和坚决把他们变成只有在各种集体的经济形式基础上才可能有必要规模的大型经济单位,是我们的经济政策最重要的任务。

6. 社会主义工业可能而且应该成为改造农民经济的工具。总的从供应无产阶级和城市的角度上说,建设国营农场非常重要,但是这样解决不了改造数千万农户的任务。国营农场应该是这种改造的杠杆之一,而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从政治和经济上“摆脱”农民的手段。另一方面,集体农庄只能是随着向它们供应比个体经济的生产手段更高级的生产设备的坚实基础上才有可能成长。正因为这样,苏联的工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是更坚决地转向农民经济,对它进行技术上的改组和经济上的改造。

7. 在整个计划工作问题上,特别是在物价的计划工作问题上,必须从注意考虑再生产的条件出发。价格是生产的调节器,它是自由的还是由国家规定好的价格。通常来说,调节价格的限度应该是生产消耗的多少,保障扩大再生产还需要多少附加,这是要和相互竞争的各个生产领域相比较的(因为要考虑到有这样的一些生产领域,在价格的压力下,小所有者经济的生产力有可能会“转移”到那里去)。价格的下降要是落到了这些界限之下的话,这就意味着要发生

\* 原文如此。——编者注



生产力的再分配,这个生产领域就要实物化了。机构的压力和迫害的机械力对这些经济法则的冲击不可能不意味着非常深刻地震撼正确的经济政策基本原则以及由此也震撼整个苏联的经济机体的基本原则。

8. 城乡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基本联系形式应该是市场联系。如果无产阶级国家应该随着为此建立起牢固的经济基础而全力鼓励和发展直接调节的各种可能形式(例如预约合同)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必须记住,国家生产力增长的前提是农民经济基本群众的商品化,没有这种生产力的增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长久)发展(虽然并不是生产力的任何增长都意味着这种发展)。非常措施有一种趋势,就是可能演变成战时共产主义性质的措施,虽然能提供一定的、暂时的效果,但从长期来说,带来的是破坏生产力、农业的实物化,而从政治上说,是破坏工农联盟和在采用这些措施的一定阶段上削弱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

9. 所以,在商业(购买和供应)领域里,以及在另外的领域里,健康的集中化是明晰地以生产力的增长、商品流转的增长、扩大了收购、改善供应、群众日益增长的福利状况为基础的,而且最后是建立在牢固的、从经济上排挤私有者的基础上的;而机构的和官僚主义类型的战时共产主义的集中化是建立在减少供应的基础上的,供应越少,它便越会起劲地发展,这种集中化是让商品周转的主体消失,是用“交给国家”的制度、各种征收和相应的其他方法取代正确的买卖。必须要把这两种集中化区分开。应该坚决取消后者采用的那些方法和那种“贸易”制度,这一切要么是很快就会不再直接需要了,要么就是很快开始起到反面作用。

10. 从前景上说,党所面临的是国家的整个经济的进一步社会主义化的任务。首先,属于这种情况的是工业中的基本建设(包括电气化),特别要把重点放在重工业、化学工业、农业工具和建筑的基本资料的生产(砖、水泥)上。属于这种情况的还有集体农庄的建设和国营农场的建设,这绝不能排除提高个体经济,也不能排除他们在采购、供应和信贷上的合作化。关心“和小型的与更小型的农户”一起前进,实现他们的合作化,通过销售、收购和信贷,通过和加工农业产品的工业企业的联系,通过把小的储蓄集中起来等等,系统地把他们吸收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依然是党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农民的生产合作和更坚决地与资本主义富农经济进行更坚决斗争(税收、贫农和中农的合作,等等)的问题,现在也越来越多地正在和这个任务结合起来了。

11. 只有在这样的政策基础上,才可能保障国内的发展有最大的速度和通

过与资本主义的外部环境的联系来加速这种速度。发展这种联系就需要有一系列的出口业务,它们本身又代表了农村中的生产力的快速增长,而这要靠更快的社会主义工业发展速度系统地产生的。

12. 改造时期应该是意味着从总的方面加强无产阶级和农民(贫农和中农)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可能是建立在逼迫政策的基础上的。它不可能建立在什么抽象的原则上。对于它来说,光是现在农民掌握了原来地主的土地这个事实是不够的。按照列宁的说法,这种结合应该建立在工业的廉价生产基础之上(要比资本家生产得更多和更便宜),建立在克服“剪刀差”、在实际上帮助贫农、支持合作化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小生产者私人的兴趣和社会主义工业的兴趣相互关联的基础之上。

13. 富农无疑是有了发展,凡是苏维埃政权处境困难的时候,他们都要企图成为农村中的霸主,这种情况就使得党必须要加强这条战线上的斗争。但是这个领域里的决定性问题是斗争方法的问题。长期来说,这样的方法不可能是战时共产主义那样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在不同的程度上也触及到中农经济。要发展中农和贫农经济就要有购买和出售,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周转自由,要有正确的征税、坚定的法律、革命的法制。和富农进行斗争应该有规矩和采用征收税务的办法(可以把对富农的这种征收提高到最大限度),应该最严格地遵守法律的限制(取消苏维埃、村社里的选举权利,取消合作社的被选举权,保存雇佣劳动的法律,关于租赁的法律,等等,等等),最后是用全力支持合作化的、集体农庄的、贫农小组等等的方法。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长期采用“非常”措施、战时共产主义那样的措施是有害的。

14. 改造时期要求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这种改善不可能在不正确的城乡关系基础上取得。在苏联不可能有建立在争吵的基础上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力量的任何团结,不可能有这样的团结是因为,削弱和农民的联系就意味着工业上会遇到困难,对城市的供应会不可避免地变得复杂,甚至是在无产阶级将在农村有一定的国家生产基地(国营农场)的情况下,也将是这种情况。在和农民有正确关系的基础上,在工业增长的基础上,必须要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和文化水平,坚决地和大量地把他们吸收到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来。

## 二

15. 现在国家正在经历着严重的危机,它在经济方面表现为粮食收购、城市

供应等等方面的危机(采用票证制度,供应中断,排长队,实际上非法粮食市场上的价格高得可怕,等等)。播种面积大体上是稳定的,但是(由于过冬作物的死亡,各种类型的农民变化不定,用玉米顶替小麦,等等)黑麦和小麦的总产量将很可能要低于去年。在社会方面,危机反映在相当广泛的各阶层农民不满,这是和粮食收购以及紧急措施,还有所谓的“过火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表现为一部分挨饿的贫农强烈不满,供应不好的城市中的工人和广大的市民群众不满。

16. 因为没有别的出路,“非常措施”曾不可避免,而且对于一定时期来说是说的过去的,但是现在,这样的措施正在自动地发展成一种趋势,要上升为一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体系。它们狭窄的经济和政治作用(获得粮食)正在变得微不足道,而它们在政治上的负面作用正在变得十分巨大。它们的作用已经耗尽,正在变成自己的对立面,变成一种和农民争吵、让商品消失、极大地哄抬“非法的”自由价格等等的手段。所以中央决议:

(1)取消一切非常措施(征用、没收、采用第 107 条,等等);

(2)坚决开辟自由的粮食市场,取消对购买和出售粮食的障碍;保障国家和合作社的粮食收购机关的强大阵地;放弃供应的超集中化,让地方组织有自己的权利;

(3)粮食价格每普特提高 25 戈比;

(4)启动 2 500 万普特作为运作的基金。

17. 在集体农庄建设领域里和在国营农场的建设中一样,要牢记的是,计划要有根据,工作要有严格的组织。必须坚决反对“按征集制原则”组织集体农庄(一个镇要有多少个)。在组织集体农庄时,应该充分地利用工业领域里的基本建设的教训。必须记住,集体农庄牢固的组织需要既有劳动工具,又有相应的人员和相应的劳动组织。党的和社会的注意力重新转向农业和特别是转向集体农庄的建设,这所表明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农业正在进入改造时期,对它的“基本耗费”应该产生最大的效益。必须从一开始就和轻率的投机倒把、哄抢资金作斗争,而且常常也要和富农分子渗入集体农庄的现象作斗争。

18. 在基本建设和整个工业建设领域里,必须要争取推行以下最重要的措施:

(1)缩短基本建设的战线长度和提高哪怕是少量新的工厂的建设速度,因为这样并不需要中止已经开始了的各项工作;

(2)更加注意化学工业和农业机器制造业;

(3)采用新的建设方法,和墨守成规、造价高昂的现象作坚决斗争;

(4) 扩大科学实验,派遣工程师和专业水准高的工人到美国去,科研院所和生产要有密切联系,消灭所有多余的生产环节。

19. 在对外经济联系领域里:

(1) 加强和北美合众国的贸易以及其他的经济联系;

(2) 采用租让承包的做法(由外国人建设,然后转交给苏联);

(3) 采用首先发展农业出口的方针。

20. 在储备积累领域里,在执行极大限度地节约的政策的情况下完成党的指令和最严格地监督这些指令完成的情况。

21. 在计划领导(以及整个经济领导)领域里必须推行激进的改革;要从这样一点出发,那就是在已经变得更加复杂的条件下,起码的阶级方针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它是不够的,需要有对事物的完全了解、懂得各种成分之间的联系,等等。必须要提高领导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必须要摆脱没有止境的琐事,要在根据完全客观的情况制定出来的基本任务集中的情况下实现工作的非集中化。必须坚决把工程师和经济领导人员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地方上去,压缩“上层”,消灭各种多余的传递字条和公文俗套,用忠诚和内行的领导人员建立“思想中枢”。必须用立法的办法让经济机关摆脱上报无数的报表、报告,等等。要责成经济领导人关注相应的西欧和美国的文献资料,要定期派他们到国外出差。要特别注意培养红色专家、中等技师等等。

22. 在吸收群众方面必须要坚决执行生产会议和全力促进群众主动精神的情况下,最严格地推行工人民主、自我批评,等等。和官僚主义斗争值得特别注意。只有在动员群众,吸收群众,把最富有天才的工人推举出来的情况下,党才有能力克服改造时期的巨大困难。

### 三

23. 中央确认,由于是这样的情况,坚持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加强对富农的进攻、全党更加突出地关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问题的方针,和一度必须采取的非常措施是绝对没有什么有机联系的。

24. 中央认为,改变党的路线,回到党的十四大的立场上去是不正确的,对于十四大来说,十五大是向前迈进的必要的和可能的一步。进一步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是在当今时刻唯一正确的政策。

25. 另一方面,把党在现在采用的、暂时的非常措施看成是正确方针的“实

质”的任何倾向,都应该受到坚决回击。认为这样的方针,让我们和农民(农民的基本群众)发生争吵、压缩工业的原料和粮食基础并恶化一度改善了的工人阶级状况的方针(Н. Н. 斯米尔诺夫的“提纲”——也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提纲)是正确的,这是令人发指的反列宁主义的愚蠢,党应该与之进行坚决斗争。

个别的司法案件(塔什干案件、沙赫特案件等等)、基本建设的经验和粮食收购的经验向党鲜明地显示出的,不仅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怠工者和破坏分子、富农等)干了些什么,而且还有群众的文明水平不足,机构有毛病,计划领导的专横跋扈和非常大的缺点。提高整个机构和整个群众的这种文明程度,对发号施令的上层领导提出特别严格的要求——这是需要解决的一项主要任务。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329号全宗,2号目录,9号案卷,第43—60张。手写的。)

## 12

## Н. И. 布哈林 中央全会 关于 А. И. 米高扬报告的决议草案

## 一

1. 粮食收购的危机在党的面前也突出了一系列与城乡关系有关的根本问题和一系列需要党立即解决的任务。

粮食收购危机在党的面前首先提出了国家的粮食经济问题。党在以前的决定里就已经特别注意到了发展粮食经济的必要性。由于非社会性质因素(乌克兰的过冬作物死亡等等)的缘故,粮食出口没有了,收成不稳定,城市里的供应不行了,不够了,农村里的各类贫农没有粮食,有的地方变成了接近于闹饥荒的状况,——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不得不特别尖锐地和特别坚持地提出粮食生产问题。

2. 农民经济的产出少,这一点反映出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农民经济不断变得越来越零散和微小,再加上农民经济内部的积累不足,这种状况就使得它的经济增长、扩大它的商品率和降低粮食生产的消耗从根本上变得极端困难。这个过程在粮食经济上表现得特别明晰是由于另外还有一些不良的成分在起作用(粮食和其他作物的价格比,比较高的征税,等等),这就引起了农民经济的生产力的再分配恰恰不利于粮食生产。

3. 所以,中央认为,必须作为经济政策极其重要的指令之一,提出全力发展整个粮食经济,特别是发展各种集体和国营农场的大型化经济。在系统地、越来越更坚决地用经济上排挤的方法和富农进行坚决斗争的情况下,在系统地推行列宁的合作制计划的情况下,推行个体经济的集约化和机械化,提高它们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发展它们的商品率,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现在,当无产阶级

国家出现了一定的条件,可以对农业生产的社会部分进行投资的时候,当农民经济的分散过程非常明晰地提出了关于农业大型化的问题的时候,——直接支持、组织和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就越来越变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

4. 总的发展农民经济,特别是发展集体农业经济,只能是随着社会主义工业特别是化学工业和农业机器制造工业进一步增长,才有可能做到。改造阶段要求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户基本群众的经济结合有一种特别的形式:只有随着满足农户的生产需求,只有随着农民经济本身的工业化才能得到发展,才能达到工业无产阶级和贫农—中农群众之间真正牢固的联盟。

## 二

5. 现在国家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危机,它是可以用总的经济困难的背景下发生作用的一些特殊的、专门的原因(基本建设的困难,农民经济的分散和它的商品率低,消费的增长,等等)解释的。和其他作物以及牲畜的生产者相比,在工业品的提供和农村中存有的货币总量之间不相适应的情况下,今年粮食生产者的处境特别不好(在价格和征税上都是如此),这就导致出现了粮食危机的始发点。

党用一系列有力的非常措施促进了粮食收购,虽然收购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无产阶级的城市和小资产阶级的农村之间正确的对应关系。这样一来,党就制止了经济危机的扩展及其灾难性地扩散到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生产部门上去,不然的话,就会导致破坏所有工业计划,引起联盟的整个经济的极大震动。

6. 但是,继续采用非常措施会最终导致出现已经明显的反面结果。这些措施的直接效应(得到粮食)正在变得极为有限。这些措施的政治结果完全是消极的。除此之外,采用这些措施正在越来越更自动发展成一种趋势,把这些非常措施以及甚至所谓的过火行为变成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制度(征集制,没收和征用,关闭集市,等等)。这个过程的自动发展会导致执行票证制度,导致越来越多的商品从市场上消失,使得对城市的供应开始变得没有组织。另一方面,这种事态也正在开始对一系列其他领域产生影响(造成亚麻、木材等等收购的中断)。

7. 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看,这种状况的表现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明显受到破坏,中农越来越不满,一部分贫农由于根本不可能按照哄抬得令人害

怕的价格购买粮食而挨饿表现出了强烈不满。供应不好的城市里的工人和广大市民群众也不满。这样一来,农村里的富农就能够拉着一部分中农和贫农跟他们走,这不能不意味着国家的政治局势的恶化,而这首先是由苏维埃政权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恶化所决定的。

8. 由于上述情况,中央全会决定: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329号全宗,2号目录,9号案卷,第9—12张。手写的。)



## 13

## 政治局会议第 21 号记录摘要

1928 年 4 月 17 日通过对政治局委员的征询决定

〈听取了:〉

第 33 点。关于中央从培养和正确分配红色专家和经济管理人员出发采取措施改进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问题组成的委员会成员\*。

〈决定:〉

33. 决定关于改进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措施和把一些高等技术院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并有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参加的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莫洛托夫(主席),  
柯秀尔(副主席),  
克里尼茨基,  
莫斯克温,  
卢那察尔斯基(由雅科夫列娃代替),  
霍多罗夫斯基,  
鲁希莫维奇(由 И. 柯秀尔代替),  
克拉瓦利,  
波柳多夫(交通人民委员部),  
叶戈罗夫(共青团),  
施米特(劳动人民委员部),

---

\* 在工作过程中,委员会的组成有过变动。——编者注

斯克雷普尼克，  
多加多夫，  
科罗斯捷列夫，  
洛博夫。

中央书记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4号目录,76号案卷,第2张。  
是在中央委员会的公文纸上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复件,没有经过查对。)

## 14

## 政治局关于高等技术院校问题 委员会会议记录№1

1928年5月12日

出席人：莫洛托夫、С. 柯秀尔、И. 柯秀尔、卢那察尔斯基、霍多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娃、斯克雷普尼克、克里尼茨基、莫斯克温、埃德曼、多加多夫、米尔赫、克拉瓦利、叶戈罗夫、施米特、曼采夫、科罗斯捷列夫。

主席莫洛托夫。

### 听取了：

#### 1. 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 做出决议：

#### 1. 将委员会的工作分成以下问题：

- (1) 向国外派出已毕业的高等技术院校学生；
- (2) 安排教学事务和高等技术院校与生产的联系；
- (3) 高等技术院校学生的配备、组成、分配和毕业生的使用；
- (4) 高等技术院校的物质基础；
- (5) 关于把几所高等技术院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
- (6) 关于中等技术学校；
- (7) 关于根据工业发展计划培养工程师和技术员的计划。

#### 2. 确定上述问题的报告人

#### 2. 对上述问题规定以下报告人：

- (1)向国外派出已毕业的高等技术院校学生——分委员会成员是：霍多罗夫斯基、斯克雷普尼克、克拉瓦利和埃德曼(召集人：霍多罗夫斯基)；
- (2)安排教学事务——霍多罗夫斯基、斯克雷普尼克、克拉瓦利；
- (3)①高等技术院校学生及其毕业生组成的配备——霍多罗夫斯基、斯克雷普尼克；  
②高等技术院校毕业生的分配和使用——施米特和克拉瓦利；
- (4)物质基础——分委员会的成员：И. 柯秀尔(主席)、霍多罗夫斯基、斯克雷普尼克、克拉瓦利、埃德曼、科罗斯捷列夫、库兹涅佐夫(财政人民委员部)；
- (5)关于中等技术学校——霍多罗夫斯基、克拉瓦利；
- (6)关于把几所高等技术院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克拉瓦利、霍多罗夫斯基。

### 3. 委员会最近的工作

3. 规定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在5月18日上午10时召开,在这次会上提出以下问题:
  - (1)关于派遣高等技术院校毕业生出国;
  - (2)关于联系生产安排教学事务。

责成霍多罗夫斯基、斯克雷普尼克、克拉瓦利和埃德曼组成的分委员会不迟于星期三提出派遣高等技术院校学生出国的计划,选拔出不少于200—250名学生。

认为有必要让委员会成员了解一些高等技术院校的情况,这些院校是:

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院校——克里尼茨基和 И. 柯秀尔;

卡甘-沙布沙伊学院——C. 柯秀尔、克拉瓦利、霍多罗夫斯基；

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施米特、多加多夫；  
矿业研究院——曼采夫、多加多夫。

责成上述同志向委员会报告了解情况的结果。

主席:(签名)

莫洛托夫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4号目录,76号案卷,第10—11张。)

## 15

## 政治局关于高等技术院校 问题委员会会议记录№9

1928年6月27日

参加会议的委员会成员有：莫洛托夫、克里尼茨基、莫斯科温、卢那察尔斯基、И. 柯秀尔、多加多夫、施米特、科罗斯捷列夫、埃德曼、苏利莫夫、克拉瓦利、洛博夫、曼采夫、日丹诺夫、戈尔茨曼、米尔赫、雅科夫列娃。

特约人员有：库兹涅佐夫、拉琴科、格兰特、斯特鲁米林、亚纳乌、格拉诺夫斯基、切利亚波夫。

秘书(签名)

听取：

1. 向中央全会提出的《关于改进对专家的培养》的报告的决议草案(莫洛托夫)

决定：

- (1) 连同提出的修改和补充总的批准向中央全会提出的《关于改进对专家的培养》的决议草案；
- (2) 不把向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拨款的具体建议写进决议，将它们提交政治局批准，在向全会提交的决议里加进一条建议——同意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做出的决定；
- (3) 否决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的把莫斯科矿业研究院从分委员会规定的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高等技术院校名单中删除的

建议;

(4)委托莫洛托夫最大限度地压缩决议。

2. 关于卡甘-沙布沙伊电机制造学院(莫洛托夫)
  - (1)必须承认卡甘-沙布沙伊电机制造学院是一所高等技术院校;
  - (2)交政治局批准。
3. 关于青年工程师到国外出差(莫洛托夫) 把青年工程师到国外出差纳入委员会下一次会议(星期五,6月29日上午10点)日程。

米尔赫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4号目录,78号案卷,第37张。)

## 16

## 苏联副财政人民委员 C. M. 库兹涅佐夫给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便条

不迟于1928年6月29日

莫洛托夫同志的委员会通过了下列关于向技术教育和大学生的物质状况拨款的决议：“从1928—1929年度起，与前一年相比，在苏联的国家预算中把对高等技术院校和工业中等技术学校的拨款增加5 500万—6 000万卢布（这里也包括增加其他高等技术院校和非工业中等技术学校的助学金和教师工资）。规定从1928—1929年度起，用于技术教育需要的拨款占工业利润的3%，以便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各种预算能考虑这些拨款的一半。”

这样，如果认为工业利润大约是8.5亿—9.0亿卢布的话，除上面说到的5 500万—6 000万卢布外，莫洛托夫同志的委员会通过引进工业利润3%的提成用于职业技术教育，就把教育人民委员部预算的相应开支扩大了2 500万—2 700万卢布。根据同一个决议，工业利润的一半提成要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预算中加以考虑。而由于在对高等技术院校和工业中等技术学校扩大的拨款5 500万—6 000万卢布中（包括增加其他高等技术院校和非工业中等技术学校的助学金和教师工资）没有考虑大约是1 300万卢布的工业利润50%的提成，那么，用于上述需要所扩大的总数额就不是5 500万—6 000万卢布，而是6 800万—7 300万卢布了。

从莫洛托夫同志的委员会设计的扩大5 500万—6 000万卢布开支的数额里，2 000万卢布是要用于提高助学金的，750万卢布用于教师的工资，而在剩下的2 750万卢布里，1 500万卢布是要只用于工业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建设和修缮的，而且1 200万卢布是用于这些学校的教学设备的。

在今年的预算年度里，对工业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基本教学设



备要用大约 250 万卢布。联邦财政人民委员部认为明年可以把这个数额增加到 760 万卢布,也就是说增加 2 倍,或者说是比增加 1 200 万卢布要多出 510 万卢布,而不是莫洛托夫同志的委员会建议的 1 200 万卢布。

用于这些教学单位今年的建设和修缮的钱是 280 万卢布。联邦财政部预计明年把这个数目扩大到 830 万卢布,也就是增加 550 万卢布,或者说是比莫洛托夫同志的委员会计算出来的 1500 万卢布多出一倍。

莫洛托夫同志的委员会规定俄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教育总局的所有学校的教员工资的开支要增加 750 万卢布,和今年相应的拨款相比,就是增长 20%。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设计为这种需要扩大支出 450 万卢布,这将能保障上述范畴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增加 12%。

这样,莫洛托夫同志的委员会规定了上述所有措施要扩大开支 5 500 万—6 000 万卢布,这是今年对同样这些措施的开支扩大 70%(1927—1928 年度总共拨款大约是 8 500 万卢布)。除此之外,从工业利润中的 3% 提成中,要有一半是要用于委员会完全没有具体化的技术教育的需要的。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认为,可以做到的是,在最近的一年里,总的对上述措施的开支扩大拨款不多于 3 500 万卢布,其中 2 000 万卢布用于改善学生的物质状况,而且在上述的 2 000 万卢布里,有 1 300 万—1 400 万卢布将用于按照莫洛托夫同志设计的规模增加助学金,而剩余的 600 万—700 万卢布用于高等技术院校的住房建设,1 050 万卢布用于基本的教学设备、修缮和建设,450 万卢布用于提高教员的工资。

考虑到必须要扩大对国民教育的拨款,联邦财政人民委员部认为可以把教育人民委员部预算的开支在 1928—1929 年度提高到 2.6 亿卢布,也就是说增加 4 200 万卢布,或者说是比今年规定的提高 20%,虽然根据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控制数字,1928—1929 年度各个加盟共和国预算开支的总增长是 2.11 亿卢布,或者说是和今年的相应开支相比增加 13.9%。从增长的 4 200 万卢布里,可以有 2 500 万卢布用于上述目的,靠联盟再多增加 1 000 万卢布。

在统一的国家预算和各加盟共和国的预算增长的情况下,不对国家经济的其他部门的利益产生实质性的破坏,不压缩对一些已经开始实施的经济需要的拨款,要想更多地扩大对教育人民委员部预算的拨款,是做不到的,而且这些需要是由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的发展速度所决定的。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总的同意莫洛托夫委员会的观点,认为必须要极大地改善我国学校,特别是技术学校的状况,但是它认为,与此相关的更多的开销应

该在以后的若干年的预算中得到考虑,因为把所有这些对于预算来说非常巨大的开销归到一年的预算里,一方面会对国家经济的其他部门的利益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在一年时间里实施像莫洛托夫同志的委员会设计的这样大规模的扩大拨款,是不是合适,值得怀疑。

**苏联财政副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715号案卷,第78—79张。)

## 注 释

- 1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有来自57个国家的532位代表参加。原先曾计划在1927年初举行这次代表大会。
- 2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在莫斯科举行。大会讨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活动、世界经济形势、苏联的经济状况和联共(布)的争论、法西斯主义、工会运动中的策略、生产支部的问题,个别国家的党的问题,以及纲领、民族、农业等问题。
- 3 1923年秋天,在鲁尔被占领之后德国出现全国危机的条件下,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开始准备夺取政权。共产党人参加了萨克松和图林根政府,但是在打算宣布10月21日举行全面大罢工时,没有得到工会的支持。只是在汉堡发生了工人和警察的武装冲突。对“德国的十月革命”失败原因问题的讨论导致了联共(布)领导层内“三架马车”和托洛茨基集团之间的尖锐冲突。
- 4 1927年5月4—24日举行了日内瓦经济会议,有包括苏联在内的4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关注的中心是贸易自由问题。由于英国和德国的抵制,会议没有接受法国代表团提出的关于调节海关税率的建议。
- 5 《泰晤士报》是自1785年开始在伦敦发行的英国日报;《每日电讯报》是1855年创办的英国报纸。
- 6 托洛茨基著:《欧洲和美国》,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
- 7 指的是英国、美国和日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 8 香港冲突即省港大罢工——中国大规模的和最持久的罢工之一。始于1925年6月19日,为抗议上海对游行队伍开枪,是1925—1927年革命的开始。
- 9 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由于维尔诺州发生的冲突是由于波兰军队1920年10月占领了该州而出现的。1921年,波兰和立陶宛在日内瓦谈判时,国联的代表提出了一个调节冲突的方案,规定把维尔诺州移交给立陶宛,条件是签订成立广泛的波立经济、政治、军事联盟,这就意味着要由波兰占领立陶宛。苏联认为这个方案是协约国企图在苏维埃国家周围建立一个东欧国家的联合组织。
- 10 第二国际是社会党的国际联合组织,1889年在巴黎成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国际形式上恢复了,而在1923年和维也纳国际合并后,取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 11 指的是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右翼1927年7月在武汉进行的政变。由于政变的结果,共产党员被从国民党中开除。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工会和农会被解散。国民党中的领导权转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所谓“南京帮”手里。1927年9月,南京帮占领了武汉,解散了汪精卫政府。1928年6月,蒋介石占领北京,在此之后,先是美国在7月,然后是

- 其他欧洲国家,先后承认了国民党政府。由于这些事件的结果,苏联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变得极端尖锐了,导致发生了中长铁路冲突。
- 12 1911年5月20日,中国的清政府和英国、法国、德国及美国银行财团签订了不正当协约,把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出卖给外国资本的手里。一场抗议把铁路修筑权出卖给外国人的运动在四川演绎成了反政府的起义,推动了其他省份的起义。辛亥革命开始了,结果清王朝被推翻。
  - 13 西蒙领导的英国政府宪法委员会成立于1927年,旨在研究在印度的管理体制和为国内的宪法改革提出建议。印度的代表没有成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印度国大党1927年要求给予印度完全的民族独立并号召抵制西蒙委员会。抵制运动具有了广泛的规模并引起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西蒙委员会在印度活动(1928—1929年)的结果是在1930年公布的。
  - 14 英国的大罢工是由于政府和企业主企图解散矿工工会和靠解雇工人搞煤矿工业的合理化而引起的,发生在1926年6月,涉及了大约400万人。矿工们的罢工持续了半年时间。
  - 15 这里说的是1927年7月15日维也纳工人的行动。行动的理由是维也纳警察袭击了工人和平游行,这些工人当时是向议会行进,要求取消法庭对1927年1月打死几名工人的法西斯分子做出的开脱性的判决。
  - 16 1920年,H. 萨科和 B. 旺策基被逮捕,于1927年8月23日被用电椅处死。对他们的审判过程在美国以及在苏联都引起了抗议运动。
  - 17 指的是保加利亚农民在农业人民联盟的领导下争取进行土地改革的运动,结果在1921年通过了关于劳动土地所有制的法律。
  - 18 帮助革命战士的国际组织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于1922年成立的,是为了支持在自己国家遭到迫害的革命者的。
  - 19 红色前线人员联盟是1924年德国共产党成立的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老战士的军事化组织,是为保卫共产党的大会、游行和其他活动的。领导这个组织的是台尔曼。
  - 20 从1928年初起,加入共产国际的体育国际展开了准备国际工人运动会的活动,设想是和“资产阶级的运动会”相对立。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禁止了在布拉格举行运动会之后,大约有600名外国的“革命体育组织”代表参加了1928年8月14—2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苏运动会。
  - 21 1918年11月14日,捷克斯洛伐克临时全国大会批准了剥夺哈布斯堡王朝对捷克土地的所有权利并宣布捷克斯洛伐克为共和国。马萨利克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他在1920年、1927年和1930年几度连任总统。
  - 22 1928年4月,库恩·贝拉在维也纳被捕,被指控组织“秘密社团”和用假证件登记,被判3个月的禁闭。匈牙利政府曾企图争取把库恩·贝拉移交给匈牙利当局,但是在国际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他被释放并到了苏联。

- 23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是1927年12月2—19日召开的,听取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代表大会审议了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令和农村工作问题。
- 24 总委员会是英国工会(工联)的领导中心。
- 25 在“工业和平”口号下的社会伙伴关系制度的出现是由于英国工会总委员会和以阿·蒙德为首的企业家集团在1928年达成协议的结果。作为满足工会的温和要求的补偿,企业家们保证公司的繁荣和劳动人民的福利。
- 26 指的是中心设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工会联合会,它是1919年成立的,思想上受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影响。
- 27 在巴塞尔工会中心里,从1920年初起,共产党人占有大多数。在1927年9月发生了一系列冲突之后,这个中心被处于社会党人影响之下的瑞士工会联合会开除。对巴塞尔协议的失败,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都进行了活跃的讨论,这成为了这些组织转向“阶级对阶级”策略的因素之一。
- 28 希腊劳动人民总同盟第四次代表大会在1928年4月举行。该组织的领导做到了把代表大会443名代表中的213名主张共产主义方向的代表开除,从而保证了自己得到必要的支持。
- 2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于1928年2月9—25日举行,它的决定加强了共产国际转向“阶级对阶级”的策略,这意味着要放弃竞选集团与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合作。
- 30 1925—1926年法国在西班牙支持下进行的反对宣布成立独立共和国的摩洛哥部落的殖民战争。
- 31 总工会是靠近社会党的法国工会联合会,在20年代末有64.4万成员。
- 32 1925年,在选举德国总统过程中,德国共产党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而在第二轮是放弃了支持“魏玛联合政府”的代表,结果是兴登堡元帅当了权。
- 33 《前进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该报曾在1891—1933年间发行。
- 34 指的是站在保守主义立场上的德国民族党。
- 35 支持波兰总理约·皮尔苏茨基元帅的人,他是1926年5月执政的,在波兰建立了所谓的“萨纳齐亚”<sup>①</sup>政权。
- 36 指德国共产党领导中支持P.费舍尔和A.马斯洛夫集团的人,他们在1926年被开除出共产党并组织了所谓的“列宁主义联盟”。
- 37 科列斯地区是边界地区;在波兰是这样命名在1921年的罗马和平协议后并入它的版图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领土的。
- 38 1920年夏天,红军在苏波战争过程中逼近华沙近郊。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布尔

<sup>①</sup> 意为“健全化”、“改善”、“整顿”。——译者注

- 什维克领导人指望有波兰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但是8月16日皮尔苏茨基部队的反攻把红军的部队赶出了波兰领土。
- 39 1927年夏天,有70名著名的法国共产党员被指控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遭到逮捕,被投入监狱。1927年9月进行了审判,他们被判处了不同期限的监禁。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他们被释放了(RobrieuxPhilippe. Histoire intérieure du parti communiste. 1920—1945. 1980. C. 292)。
- 4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是于1927年5月18—30日在国际局势尖锐化的条件下召开的。全会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制订措施减少战争威胁和动员国际工人阶级保卫苏联。
- 41 对苏联驻波兰商务代表A. C. 利扎廖夫的暗杀是白卫军组织成员Ю. 沃伊采霍夫斯基1928年5月4日干的。他是杀害苏联驻波兰全权代表П. Л. 沃伊科夫的组织者之一。1928年12月法庭判处沃伊采霍夫斯基10年监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莫斯科1966年版,第294—297页)。
- 42 1926年5月发生的国家政变导致了皮尔苏茨基当政,在这个时刻,波兰的共产党人采取了中立的立场,而这种立场起先是得到季诺维也夫支持的。
- 43 指列宁在1908年11月撰写的著作《对目前时局的估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第255页)。
- 44 1927年12月,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特使Г. 海曼和B. 洛米纳泽的领导下,曾试图在中国南方,在广州市采取革命行动,被国民党部队镇压下去了。
- 45 指的是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上作的俄共(布)中央政治总结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76—280页)。(原文如此,经查应为第九次代表会议。——译者注)
- 46 在共产国际的中国革命战略范围内,中国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党结成了联盟。1927年春、夏,国民党的首领拒绝了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让中国共产党人遭到了迫害。
- 47 在国联裁军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1927年11月30日—12月3日),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了全面彻底裁军的宣言,这个计划在1928年被西方大国推翻了。
- 48 指列宁在1916年写的《论“废除武装”的口号》(《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171—181页)。
- 49 爱尔福特纲领是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总的来说,它包含了对世界发展前景和工人阶级任务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虽然也由于有一系列错误的策略条款受到了恩格斯的批评。
- 50 农民国际(红色农民国际)是革命农民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1923—1937年),联合了欧洲、亚洲和美洲的一系列农民组织。农民国际靠近共产国际,主张没收所有的地主土地并把它们转交给农民。农民国际的领导机关是国际农民委员会。

- 51 在修改过的速记记录里是：“在法国——在17—19个区里”。
- 52 工会国际(红色工会国际)于1921年在莫斯科成立,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国际工会联合组织。
- 53 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是1928年3月17日至4月3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它的决定肯定了各个国家受共产党影响的工会组织的“左转”。
- 54 美国劳联是美国主要的工会组织,成立于1881年,基本上联合了有专业技能的工人阶层。劳联的左翼在约翰·路易斯的带领下于1938年分离出来,成立了一个独立的中心——生产工会代表大会。1955年劳联和生产工会代表大会又联合起来。
- 55 以约翰·路易斯为首的美国矿工工会。
- 56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是在1926年11月22日—12月16日召开的。审议了中国革命发展前景问题、工会问题,一系列共产党的局势问题。在全会上发生了联共(布)党内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和联合反对派之间的尖锐冲突。
- 57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是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举行的。
- 58 1928年2月29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上,举行了联共(布)代表团和德共代表团的会晤,讨论了德国共产党内的局势。会晤的决定中提出了“右的危险”是主要危险的观点和“调和主义”的说法,这不仅决定了德共后来的斯大林化,而且也决定了将要开始一场从1928年秋发展起来的在联共(布)党内和“右倾”的斗争。
- 59 根据英国共产党人的倡议,在科隆新闻国际展览会(1927年5月25—30日)范围内举行了苏联之友代表大会,讨论了在战争危险日益增长条件下协调各国和苏联友好协会的行动。1927年6月22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向欧洲各共产党散发了一封信,对他们在筹备科隆代表大会和宣传它的决定上的消极态度提出了尖锐批评。
- 60 反帝同盟是于1927年2月在布鲁塞尔反对殖民压迫和帝国主义代表大会上成立的,目的在于加强共产国际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它一直存在到了30年代中期。
- 61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12月)曾号召共产党人和先进的工人“到处建立革命的和改良主义的工会成员的统一委员会,以便共同进行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共产国际文件汇编·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决定(提纲)》(1919—1932年),莫斯科1933年版,第651—652页)。这样的委员会、小组曾在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荷兰等国出现。在德国,争取工会统一的运动聚集在了《统一》杂志的周围,这个杂志是在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参与下,于1926年组建的。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其中有合作。但是在1928年11月的时候,洛佐夫斯基就已经在写给德共中央政治局的信里表示担心“在现在的局势下,统一集团可能会对党起到非常危险的作用。那里发生的是右翼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联合……这个集团可能会成为敌视党的势力聚集的中心”(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495号全宗,18号目录,620号案卷,第75张)。
- 62 1926年夏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向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提出了关于帮

- 助反对殖民制度的武装起义问题。印尼共的方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支持,执委会坚持的是要保留国内的民族阵线,但是1926年11月起义开始了,而且被荷兰的部队镇压了。
- 63 共产国际西欧局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决定在柏林成立的,是为了具体解决与这个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有联系的问题的。
- 64 太平洋书记处是1927—1936年存在的工会国际地区代表处,设在了海参崴,后来改在了上海。
- 65 自治主义者是1923年在印度国大党内部组成的一个派别的成员,他们主张印度在大英帝国的范围内取得自治领的地位。
- 66 192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苏联之友代表大会,前来参加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的43个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出席大会的各国组织的国家委员会于1928年5月在科隆召开会议,建立了“苏联之友国际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奥地利、比利时和阿根廷的委员会代表。柏林成了该委员会的常驻地点。
- 67 在1922年强化的行动浪潮之后,国大党执行委员会在巴尔多里开会,通过了所谓的巴尔多里决议。其中包括了号召停止群众性的公民不服从行动,停止所有列队行进和集会,责成地方委员会要向农民建议交纳地租和其他税收。执行委员会还让地主们相信,国大党不主张剥夺地主们占有土地的权利。
- 68 洛米纳泽是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反对洛米纳泽的人,包括布哈林和曼努伊尔斯基,都倾向于认为这次起义是没有准备好的上层暴乱。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中强调“必须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定阶层中的暴乱主义,反对拿起义做游戏”(《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年)》,莫斯科1933年版,第765页)。
- 69 1928年4月南京被宣布为中国首都并成为了蒋介石政府所在地。
- 70 1928年4月23日,政治局就斯大林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权的决定》,建议为了显示共产国际是独立于联共(布)领导的,“在一定时期内禁止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同志除外)在共产国际的正式机构公开发表讲话”(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2号目录,6号案卷,第70张)。
- 71 1920年10月12—17日在哈雷举行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日程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共产国际的报告和接纳加入共产国际的21条。代表大会用记名投票的方式(237票赞成,156票反对)通过了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条件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1920年12月在柏林的联合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德国共产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翼的合并;组成了德国统一共产党。
- 72 国家工人党的工人即波兰国家工人党党员,该党持温和的改良主义立场。
- 73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在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召开的,会上第一次讨论了这个组织的纲领问题。布哈林为代表大会准备了第一个纲领草案,后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纲领委员会加工并通过,作为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各个支部讨论的



基础。

- 74 指1925年出版的布哈林的著作《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
- 75 实际上建立由斯大林、李可夫、莫洛托夫、瓦尔加和布哈林组成的“内部纲领委员会”的决定在1928年1月12日,也就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前一个月,就由政治局采用征求意见的方式通过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68号案卷,第10张)。共产国际新的纲领草案是在布哈林的办事机构里制定的,4月3日分发给了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李可夫。文件的附信里写到,只收到了斯大林对草案的建议。1928年5月7日,政治局批准了纲领草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86号案卷,第7张),由布哈林和斯大林签名提交给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后,这个文件被公布,以便讨论(《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共产国际纲领委员会1928年5月25日通过,莫斯科1928年版)。后面在全会的速记记录里引用的就是这一版的文字。
- 76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海德堡代表大会是1925年举行的,通过了党的新纲领。
- 77 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27年5月22—23日在基尔召开的代表大会,主要的报告人是O.维里斯和希法亭。
- 78 孙中山主义是孙中山的系统观点。孙中山提出的改造中国的纲领像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它期望能越过资本主义,通过实现“三民主义”——民族、民权和民生,向社会主义过渡。  
甘地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的和宗教的哲学学说,是以其奠基人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名字命名的。甘地主义的目标是用和平手段获得印度的独立,在遵守非暴力原则、拒绝和不列颠当局合作和公民不服从的条件下把广大群众吸收到解放斗争中来。
- 79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15—35页。
- 80 指列宁1918年1月撰写的著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229—327页。
- 81 显然布哈林是在讽刺,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德意志共和国总统(从1925年起的海军元帅兴登堡)拥有了广泛的宪法职权。
- 82 《国外通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新闻通报。
- 83 蔡特金的文章:《对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几个批评意见》(《共产国际》,1928年第25—26期,第40—51页)。
- 84 正在流放的托洛茨基给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发去了声明,展开地论证了反对派的立场,这事实上是对共产国际纲领的反草案(托洛茨基:《列宁之后的共产国际——各次失败的伟大组织者》,莫斯科1993年版)。中央秘书处于7月7日收到了文件;7月9日分发给了政治局委员(俄罗斯社会和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82号全宗,2号目录,218号案卷)。
- 8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95页。

- 86 1919年3月21日在匈牙利宣告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依靠的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经验。共和国存在了133天。
- 87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是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举行的。
- 88 为对农业采用工业工人的组织经验,根据和全俄工会委员会的协商,1919年2月在农业人民委员部下设“工人促进委员会”,由它从有经验的工业工人中派出全权代表到省和区的管理局和个别的经济单位中去。
- 89 指《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前言,《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362—363页。
- 90 指《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12页(加重号为发言者所加——译者注)。
- 91 在联共(布)党内不断争论期间,以Ю.连斯基和B.科斯特舍娃为首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企图成为双方的调解人,后来导致发生了在波共党内的经常性清洗,最终造成了波兰共产党在1938年被共产国际解散。显然布哈林(原文如此。——译者注)说的是波共中央对1926年5月的皮尔苏茨基国家政变采取的中立立场,这次政变按莫斯科的评价是军事法西斯政变。
- 92 显然指的是斯大林在1927年5月2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就中国问题所作的讲话,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7—282页。
- 93 红色教授学院是为高等院校培养社会科学教师和为党和国家的中央机关培养工作人员的专门高等学府。学院成立于1921年,由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实行总的领导。1928年学院设有历史、党史、经济、哲学、法律、自然科学、文学部和预备部。
- 94 20年代初以土耳其革命领导人阿塔丘尔克·基马尔命名的运动。
- 9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50—188页。
- 96 1923年8—9月,政治局曾不止一次地做出决定,一旦德国革命开始,要对德国共产党提供军事技术、财政和食品援助(参见《资料来源》杂志,1995年第5期)。
- 97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5—23页。
- 9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116页。
- 99 小农经济是家庭一个体的农民经济,是在奴隶制度和封建主义时期从事实物消费生产的一种形式。
- 100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是于1919年3月18—23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大会的日程包括以下内容:1. 中央的总结报告;2. 俄共(布)党纲;3. 成立共产国际;4. 农村工作;5. 组织问题;6. 选举中央委员会。(原文有误,列出了7条,但少了第4条。——译者注)
- 101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是1926年10—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

- 102 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有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参加,是在1928年4月6—11日召开的。全会上审议了当年的粮食收购和组织1928—1929年度的粮食收购运动问题和政治局委员会关于“沙赫特案件”的报告。
- 103 1928年5月17日政治局会议听取了米高扬的报告《关于加强出口的措施》。但是关于贸易人民委员部的报告的决定被搁置了。由于出口的落后已经到了危机的状态,制订扩大出口的措施拖了好几个月。政治局几次再度审议这个问题是在1928年8月2日、8月16日和9月20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98号案卷,第5张;700号案卷,第121张;705号案卷,第133—134张)。
- 104 在未经修改的全会速记记录上,在这里有大厅传出的一句插话:“木材的情况不好”。在对报告的文字进行修改的时候,米高扬把它划掉了,加上了自己的一句话(见下文)。
- 105 1927年5月27日,英国政府照会苏联驻伦敦临时代办,通知说它解除1921年3月16日苏联和英国签订的贸易协定和停止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10卷,莫斯科1965年版,第247—248页)。
- 106 斯大林和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谈话是在1928年5月28日(《斯大林选集》中文1979年版,下卷,第42—53页)。
- 107 见注102。
- 108 《俄联邦刑事法典》第107条规定:“用回扣、隐瞒或者不向市场投放商品的办法恶意抬高商品价格判一年以下监禁并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或者不没收财产。同样行为并确定有商人勾结的情况者——判3年以下监禁并没收财产”(《俄联邦刑事法典》,莫斯科1929年版,第64—65页)。1926年通过的《俄联邦刑事法典》第107条针对的是投机倒把者。1928年1月,斯大林建议对“粮食持有者”采用这一条,其中包括对拒绝按照对农民不利的、压低的“硬性”价格向收购人员上缴粮食的农民生产者。斯大林的这种把这一条变成对农村施压的手段来完成粮食收购计划的立场,是得到政治局委员支持的。按照第107条受到审判的不仅是有余粮的人,而且还有有粮食保险储备的贫农。A. И. 李可夫曾引用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材料指出,1928年4月,在按照第107条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富农和商人没有超过2/3(《真理报》1928年7月15日)。
- 109 指的是瑟尔佐夫和埃赫1928年6月27日通过直通线向联共(布)中央斯大林报告的关于粮食收购的进展情况的报告(《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莫斯科1999年版,第312页)。
- 110 联共(布)十五大的决议说:“在当前时期,改造个体小农经济并把它们联合成大的集体应该作为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提出来。”
- 111 《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126—127页。
- 112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莫斯科1962年版,第1432页。
- 113 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第四次全会是在1928年6月29日至7月3日召开的。会上审议

了关于纺织工业的状况和关于国民教育问题。莫洛托夫 1928 年 6 月 30 日在这次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曾于 1928 年 7 月 4 日在《真理报》上发表,题目是“党的路线和经济实践”。

- 114 全俄皮革辛迪加的活动是从 1922 年 4 月 1 日开始的,章程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 1922 年 4 月 13 日批准的。组织辛迪加的目的是为了协调完成推销产品的国家任务以及从财政、物质和技术上供应国家皮革工业的各个联合公司和企业。辛迪加的成员是皮革方面的国家工业的企业和联合公司、股份公司、合作社和私人企业。辛迪加在以下方面从事活动:接受军队和其他方面必定要完成的国家订货和在辛迪加成员以及其他没有加入辛迪加的国家企业中进行分配;接受其他订货和在辛迪加的成员中根据和它签订的合同进行分配;协调收购活动;组织进口;向自己的成员提供法律和仲裁帮助。到 20 年代末,辛迪加化的工业企业的生产占了俄罗斯整个皮革工业产品的一半以上(《俄罗斯工业》,圣彼得堡 1923—1924 年版,第 265 页)。
- 115 《联共(布)十五大总结报告》,莫斯科 1962 年版,第 1432 页。
- 116 米高扬指的是政治局 1928 年 7 月 7 日的决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695 号案卷,第 1 张)。
- 117 苏联国家计委提交的 1927—1928 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曾在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7 年 9 月 9、13、14 日的联席会议上讨论过。在这次会上还讨论了农业收购问题——粮食收购的总规模、收购价格,等等(俄联邦国家档案馆,P—5446 号全宗,4a 号目录,218—224 号案卷)。1927 年 9 月 15 日政治局做出决定:“1)由于收成的年景比以前预料的要好,认为必须要把 1927—1928 年粮食收购计划的总数字增加到 7.40 亿普特粮食。2)在价格方面坚持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提出的数字。在坚持总的方面要保持粮食和特种作物的价格的同时,认为有必要在个别的作物和各种不同的生产地区之间确定价格上更适宜的相互关系。为消除农业商品的收购价格和出售价格之间的差距,首先是粮食的这种差距,必须争取做到降低商品生产系统的开销,这样不仅要能补偿某些作物和个别地区的收购价格的增加,而且要能保障进一步降低销售价格”(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651 号案卷,第 3—4 张)。10 月 4 日,这些指示形成了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俄联邦国家档案馆,P—5446 号全宗,1 号目录,32 号案卷,第 43 张)。
- 118 1928 年 6 月 28 日,政治局审议了关于秋季粮食收购运动的准备问题,批准了劳动国防委员会下设的施米特任主席的专门委员会准备的人民委员会的相应决定,规定要建立苏联贸易人民委员部支配的工业品储备并在合作社的商业业务中心里建立这样的储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693 号案卷,第 2,9—12 张)。
- 119 第八次全苏冶金工作者代表大会是于 1928 年 2 月 15—28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
- 120 指联共(布)中央的(1928 年)四月全会。
- 121 指的是副财政人民委员 М. И. 弗鲁姆金 1928 年 6 月 15 日写给政治局的信,他在其中

- 指出了,由于在农村采用了非常措施,经济上比例失调和不平衡的情况有所增长,是危险的,并且呼吁:“应该回到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上去”。信里也包括了放弃加紧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议。6月20日和25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弗鲁姆金的信发表了公开声明(弗鲁姆金的信和莫洛托夫的回答发表在《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第290—294页、297—301页;斯大林的回答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01—110页)。
- 122 1927年12月12日,李可夫在联共(布)十五大上作了题为《制订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示》的报告(《联共(布)十五大速记报告》,莫斯科1962年版,第855—880页)。
- 123 指的是1928年6月2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在粮食战线上》。
- 124 10月15—20日在列宁格勒召开了庆祝十月革命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纪念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致苏联全体工人、劳动农民和红色近卫军,致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宣言》,宣布工厂工人在最近几年内从8小时工作日向7小时工作日过渡。
- 125 指的是列宁于1922年3月27日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69—113页)。
- 12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76页。
- 127 同上。
- 12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76—78页。
- 129 同上。
- 130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82页。
- 131 农业人民委员部下属的行情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是在彼得洛夫农学院下属的农业经济和政策高等师范学院的农业行情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的。1923年(根据其他材料是在1922年底)研究所转交给了财政人民委员部。研究所负责研究经济行情和登记价格。在1928年以前,研究所所长是H. Д. 康德拉季耶夫。行情研究所和财政人民委员部下属的经济调查研究所一起出版发行《经济通报》,从1925年起出版发行《行情问题集》。所内设有指数和价格,农业市场行情,工业、商业和交通、货币流通、信贷和预算,俄罗斯和世界行情等研究室。1928年初,H. Д. 康德拉季耶夫被解除了研究所所长职务,任命替代他的是П. И. 波波夫。1930年,由于受准备对所谓的劳动农民党的审判的牵连,研究所被撤销了,康德拉季耶夫被指控领导了这个党(H. Д. 康德拉季耶夫《特殊意见》(两卷集选集)第1卷,莫斯科1993年版,第448、521页;第2卷,第530—531页)。
- 132 《苏联工业发展五年计划材料(1927—1928年度至1931—1932年度)》,莫斯科1927年版。
- 133 在最初的发言里,奥新斯基是同时提到了斯米尔诺夫和皮达可夫的,在修改自己发言的过程中,他把皮达可夫的名字去掉了。
- 134 农村苏维埃的生产会议是在1928年出现的。在1929年初扩展到了全苏联。在农村的

- 生产会议上讨论土地布局、多块土地的轮作制问题,制订播种运动的计划,等等。根据官方材料,在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下游和中游边疆区,生产会议涉及的农村人口有50%。
- 135 根据1923年8月8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指令,由于军队的改组,从1924年起,在苏联推行地方警察建制体系并于1925年在义务兵役法里肯定了下来。基干军队保存下来,但是只招收25%—30%的应征人员。75%以下的步兵,一部分炮兵师和另外一些部队是按照地方警察的体系形成的。这种组成人员不断在部队里更换现役的做法持续了5年,包括了在居住地、在部署在这个军区或者地区的部队里进行短期集训。
- 136 1928年7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Л. Н. 克里茨曼的文章《谈我们的政策对农业的影响问题》。
- 137 是指1927年12月14、24日和1928年1月5日和2月13日联共(布)中央就粮食收购给党组织发出的指示(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第113—114、136—137页)。
- 138 《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1919年3月23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90页。
- 139 联共(布)十四大是1925年12月18—3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宣布了国家工业化的方针,通过了党的新章程和关于俄共(布)改称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决议。
- 140 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是1923年5月14日登记注册的。它的活动范围是收购面包及其他农作物产品,运出和买卖这些产品。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总裁在1927年时是И. С. 洛巴切夫。
- 141 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8年4月25日通过并以中央关于加强粮食收购指示发给了所有民族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州委、省委和大区委员会的电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84号案卷,第18—20张)。
- 142 为监督粮食收购的进展情况,根据政治局1928年5月28日的决定,鲍曼曾被派往巴什基尔和鞑靼出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89号案卷,第8张)。
- 143 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份,在法国革命和五人执政内阁时期是保皇主义叛乱的中心。转义常用来表示一般的反革命。
- 144 指1928年5月16日斯大林在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是1928年5月16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
- 145 乌格拉诺夫曾于1928年6月30日在莫斯科市委全会上发言,他的讲话曾发表在1928年7月5日的《真理报》上,标题是《经济建设问题》。
- 146 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全苏纺织辛迪加组建于1925年10月25日,目的在于协调和

- 联合纺织工业的国家联合公司和企业的贸易、收购和财政活动。
- 147 国家计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国家计委主席团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于1927年3月25—3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大会听取了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斯特鲁米林关于国民经济发展五年前景计划的报告和关于国民经济个别部门发展计划的副报告,关于制订总计划工作状况的报告和关于俄联邦国家计委工作和地方经济的报告(《苏联经济生活大事记(1917—1965)》,莫斯科1967年版,第167页)。
- 148 联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是1924年5月23—3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
- 149 1928年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制造了在顿巴斯的沙赫特地区的原矿主和老专家的反苏维埃破坏组织案件。该案成为了“反破坏分子”广泛运动的起点。1928年4月6—11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审议了专门问题:“沙赫特事件和与经济建设的缺点作斗争的实际任务”。
- 150 指1928年4月23日和5月17日《关于组织新的国营农场》的政治局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84号案卷,第4—5张)。
- 151 指斯大林1928年5月28日和红色教授学院学员的谈话,1928年6月2日曾以《在粮食战线上》为题在《真理报》上发表。
- 152 土地社是土地使用者的基层联合组织。1922年的《俄联邦土地法典》、1926年的《农社示范章程》和1928年的《土地使用和土地安置的一般基本原则》从法律上奠定了它们存在的条件。土地社是农户在地域上的联合组织,对自己成员的土地使用和土地关系的调节实行直接领导,决定进行土地安置、草田轮作制的问题,进行土地的重新分割和扩展,直接安排使用共同不可分的可耕地,确定和改变对这些地的使用,实行对土地利用的监督。所有18岁以上的土地使用者都被承认是正式成员,而农社的最高支配机关是正式成员大会。1928年时,那些被剥夺了苏维埃选举时的选举权的人也被剥夺了在大会上的发言权(见B. П. 达尼洛夫著《集体农庄前的苏联农村:居民,土地使用,经营》,莫斯科1977年版,第95—106页)。
- 153 原先在速记记录里写的是:“关于下一个情况,在斯捷茨基发言并说到不好的情绪,不好的状况的时候,我是想问斯捷茨基同志这一点的——在四月全会的时候他是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没有给决议提出比四月全会通过的更多的东西呢。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决议了,另外的建议也未曾有过,而且斯捷茨基同志也没有提出过自己的建议。现在这样做,在为那些实行过的措施把我们骂了一通,说是这样今后是不能允许的就算完事了,——这是不正确的路线,不对的路线,不对的方针。”
- 154 最初的速记记录上记下的是:“……我在阿勃拉莫维奇的文章《关于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里找到了和奥新斯基的思想相吻合的思想,那就是:‘由于上述原因的结果……’  
伏罗希洛夫:而达林的文章和你的论据是吻合的。而且思想也是吻合的。  
安采洛维奇:阿勃拉莫维奇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国家工业生产的少,不好,又贵。官僚主义的机构让商品交换瘫痪了。由此而来的是和农民结合的尖锐的,而且看来是无

可救药的危机。”

- 155 可能瓦雷基斯指的是李可夫致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边疆区、州和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信，该信发表在1928年4月1日的《真理报》上，题目是《与强制摊派加强农民经济公债作斗争》。
- 156 “加强农民经济的国家内部有奖公债”发行的条件是1927年12月30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议确定的。公债发行1亿卢布，面值10卢布，期限为1928年2月1日至1931年2月1日，债券持有者支付的年利率为6%。规定要开6次奖（从1928年10月开始，每年的1月和10月）。得奖者有权不排队购买得奖数额的农业工具。分配到每个区或者乡的公债数额的10%应该转到区或者乡预算，用于满足地方上的农业和文化需求（《苏联法令汇编》，1928年第3期，第24页）。1928年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再发行5000万卢布的债券（《苏联法令汇编》，1928年第14期，第118页）。那时，第一期债券从10月推到1928年6月（《苏联法律汇编》，1928年第14期，第117页）。1928年4月，第一期推迟到了5月中旬（《苏联法令汇编》，1928年第22期，第192页）。
- 157 可能是指以下材料：《1. 两年间（关于联共（布）中央的组织报告）》，《2. 联共（布）中央各部的报告》，《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
- 158 敖德萨区的舍夫琴科国营农场在1927年春实现了以和农业社的合同关系为基础，用拖拉机耕种农民土地的首次实验，这些地被归并成了统一的地块。由于用国营农场的拖拉机耕种农民的土地，中农和贫农都比个体农户得到了多得多的收成。1928年，舍夫琴科国营农场已经为26个村提供了服务，总的土地面积是2.4万公顷。联共（布）十五大责成所有国营农场通过组织租赁的拖拉机队加强对农户的帮助。
- 159 见注142。
- 160 预约合同制是合作社或者国家组织为一方与农民为另一方之间的合同，规定生产者要订购生产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农产品并按照规定的时间上缴。签订预约合同的组织有义务根据预先规定的价格收购产品并预先向农民支付预付款、种子和生产工具并对他们提供农艺帮助。这种预约合同可以是和集体经营单位，也可以是和个体农户签订。在苏联，预约合同制是从1922年开始采用的，但是作为一种基本的收购形式，是在1928—1929年间开始引用的。
- 161 《论合作社》，《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3页。
- 162 根据政治局1928年6月7日的决定，组建了一个委员会（以鲍曼为首），制定对秋播的准备措施，“首先是集体向农民（整个村子为单位）贷给种子等（即预约合同），条件是要保证能集体向国家和合作社缴出粮食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582号案卷，第13—25张）。
- 163 指政治局《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其中指出了农业合作社应该按照保障实际上可以吸收所有农民阶层参加自己的流转的原则建立自己的经营活动，首先要把贫农和中



- 农群众组织起来;加强生产合作和贫农农户的集体化已经成为这个领域里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582号案卷,第13—25张)。
- 164 指1927年2月26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巩固和发展农业合作社制的决议》和1927年4月29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改变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措施的决议》(《苏联法令汇编》,1927年第14期,第156页;第32期,第337页)。
- 165 经济会议是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下属的最高经济机关。1927年8月12日成立了俄联邦经济会议。经济会议主席是相应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从经济领域的国家管理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委、供应人民委员部、商业人民委员部等)的领导人中任命经济会议成员。经济会议批准工业、农业、贸易发展计划,检查它们完成的情况。经济会议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只有各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以及各加盟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或者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才能改动和取消。1921—1923年间还有过省的和州的经济会议。
- 166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集制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53页。
- 167 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是1921年12月23—28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列宁做了关于内外政策的报告。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俄联邦的国际地位的决议,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命令和一系列关于工业和农业的决定。
- 168 见Л.Д.托洛茨基《8年。结果和前景——1925年11月8日在基斯洛沃茨克庆祝十月革命8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16—17页。
- 169 在俄共(布)十大上的报告《关于用实物税取代粮食征集制》,《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53页。
- 170 贫农委员会是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和白俄罗斯农村贫农的组织,是根据1918年6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和供应农村贫农的命令》成立的。在许多地区,贫农委员会事实上成为了国家权力机关:分配土地和农具,征收富农的粮食,为军队征兵,决定农村生活中的日常问题。1928年底,村苏维埃取代了贫农委员会。
- 171 列宁:《就〈俄共目前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提纲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3页。
- 172 《红色报》是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和列宁格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机关报。存在于1918—1936年。
- 173 斯大林搞错了,这段话引自《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和负责代表会议上关于粮食税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140页。
- 174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98页。
- 175 《在农业公社和农业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

卷,第360页。

- 176 《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59—285页。
- 177 《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74页。
- 178 《致技术援助苏俄协会》,《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31页。
- 179 《致苏俄之友协会(美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30页。
- 180 《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7页。
- 181 布哈林指的是他的报告《粮食收购工作和沙赫特案件的教训和党与任务。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全会的结论》(见《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第1卷,莫斯科2000年版)。
- 182 1928年5月15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一群妇女冲进了市执行委员会的大楼,要求发面粉。当天在城里摧毁了面包店,砸了两个商店的窗户,抢了4辆载粮食的车。各个街道上聚集了五千多要求帮助的失业人员。塞米巴拉金斯克事件只是波及国内一些地区的、由于粮食困难发生的群众性行动和游行的一部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85号目录,307号案卷,第31张)。
- 183 1928年春,在苏联的一些城市里,失业人员展开行动。4月19日,在列宁格勒,2000人的人群砸了副业劳动交易所。5月30日,在莫斯科(卡兰切夫)交易所,大约有3000名建筑工人参加了各种骚动。有警察被打死,莫斯科农村工业管理局的帐篷被砸烂。从5月20日至6月15日,在各劳动交易所共发生了13起冲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85号目录,307号案卷,第14、15、22张)。
- 184 1928年6月6—15日在卡巴尔达发生的行动在当时的官方文件里被称做“富农—伊斯兰教派行动”,是由当局在推行粮食收购过程中的强硬措施、对居民供应粮食有困难、关闭清真寺、在村里用暴力组织幼儿园并伴随着有传言说要把孩子送到中国去“补偿”1919年在小卡巴尔达被打死的中国人。
- 行动开始的导火线是通知巴克桑区吉兹布伦村的居民要在6月上缴4000普特的计划外的粮食。在动乱的过程中捣毁了巴克桑区执委会,打伤了区委工作人员和警察,冲了军营并夺了武器。1928年14—15日进行了消灭动乱的行动,结果逮捕了160名“最积极参加暴乱和凶恶的挑唆者”。在暴乱者企图占领隐藏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地方分局工作人员的巴克桑城堡的情况下,有8人在对射中被打死,20人受伤。
- 185 指喀琅施塔得暴乱,这是1921年3月在对苏维埃政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满基础上发生的喀琅施塔得防卫区和波罗的海舰队一些军舰的舰上人员反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动乱。
- 186 指1924年8月的格鲁吉亚农民起义。起义是因关闭教堂、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行政化政策和他们脱离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引起的。报刊上把它解释成是孟什维克准备和策划的

- 一次起义。
- 187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89页。
- 188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在政治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90页(引证不准确)。
- 189 同上书,第189页(引证不准确)。
- 190 看来布哈林指的是威·丘吉尔的五卷文集《世界危机》,这是从1923年开始若干年里陆续出版的。布哈林提到威·丘吉尔在1917年担任军事装备大臣时的活动。军事装备部是一个庞大的部,有大约一万两千名官员。由于进行改组和减少部门数量的结果,该部的活动更有效率了(特鲁汉诺夫斯基著:《温斯顿·丘吉尔》,莫斯科1989年版,第153、190、191页)。
- 191 原来速记记录上写的是:“……我也曾积极参与改造和消灭财政人民委员部行情研究所的资产阶级核心的。但是这些人还是有文化的,他们的数据有些是非常有价值的,是我们应该从我国的经济史上得到的。我从这个来源取得的是我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得到的数据,也就是说,我拿到的是价格的历史和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在最困难时刻,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在1923年时的对应关系。”
- 192 莫洛托夫把整段都改动了,换了几个对话。原来在速记记录上是这样的:  
“莫洛托夫:也有生产率,但是这引起了工人阶级方面新的紧张,否则这也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有一个差别,那就是工人是给自己支付,而农民是向另外的阶级支付。  
莫洛托夫:工人支付给无产阶级国家,农民支付给无产阶级国家。  
伏罗希洛夫:也是支付给自己,也是给社会主义国家。”
- 193 在没有修改过的速记记录里,莫洛托夫提到了自己、柯秀尔和乌格拉诺夫的名字。
- 194 《经济生活》报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主管经济的各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报,后来又成为了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苏联国家计委和银行工作人员联合会中央的机关报。曾于1918—1937年在莫斯科出版发行。
- 195 阿斯特罗夫的文章《论当前时局》是发表在1928年7月1日的《真理报》上的,谈的是1928年上半年的粮食收购的结果和党在农村中的政策。
- 196 阿斯特罗夫的文章《在两条战线上》刊登在1928年7月3日的《真理报》上,谈的是对新的粮食收购运动的准备和联系到前一次运动的结果谈党的任务的。
- 197 1928年7月3日《真理报》刊登的斯大林文章的正确名称是《列宁和中农联盟的问题(答C同志)》<sup>①</sup>。
- 198 见注113。
- 199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俄代表会议是俄历1917年4月24—29日(公

<sup>①</sup> 原文如此。与正文中的文章标题不统一。——译者注

- 历5月7—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
- 200 联系到苏联的国际处境复杂化(1927年发生了和英国断交,中国革命失败了,驻华沙的全权代表沃伊科夫被杀害),国内加强了对“战争威胁”提法的宣传。
- 201 全俄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于9月17—22日在莫斯科召开。代表大会审议了以下问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总结报告和检查委员会的报告;推行新的工会政策的总结和工会运动的例行任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工业形势的报告,劳动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工会的组织建设;工资的调节和集体合同,工会的文化教育工作;社会保险;关于工会在帮助饥饿人员方面的工作报告;工会国际的报告;选举。列宁的《给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信》是在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宣读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11—212页)。
- 202 1928年4月23日根据政治局的决定,索柯里尼柯夫被解除了在国家计委的工作(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84号案卷,第7张)。
- 203 1928年5月9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关于斯摩棱斯克党组织状况的决议》,5月18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省党组织的领导被指控发生蜕变、在政治上和富农结盟、官僚主义和破坏苏维埃法制。1928年5月14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这个决议并“认为必须不迟于今年6月底召开省代表会议,重新选举省委和省监察委员会,而且事先要进行乡委、区委和县委的重新选举”。由于“斯摩棱斯克的脓肿”是一系列类似事件整个链条上的一环,组织局做出了关于准备就斯摩棱斯克、索契、阿尔乔莫夫斯克、斯大林诺、梁赞事件的教训向所有党的组织发出呼吁,编辑这个呼吁书的工作交给了一个委员会,成员包括:柯秀尔、布哈林、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奥尔忠尼启则、雅科夫列夫(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22号案卷,第1—12张)。委员会准备的呼吁书正文征求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于6月2日得到了批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90号案卷,第6张)。1928年6月3日《真理报》发表了联共(布)中央《就开展自我批评致全体党员和全体工人的呼吁书》。
- 204 联共(布)中央全会是在1927年2月7—12日举行的。在全会上审议了下列问题:关于信贷体系,关于铁路交通状况,关于基本建设,关于降低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关于苏维埃的重新选举进程和即将召开的苏联和俄联邦苏维埃代表大会。
- 205 托洛茨基1927年2月9日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276号案卷,第15—16张)。
- 206 米高扬1927年2月10日在上述全会上的发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276号案卷,第15、45张)。
- 207 见注117。
- 208 关于粮食市场上的状况,政治局在1927年7月讨论过几次。在7月21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采取措施强化粮食收购的决定,特别是在南方地区(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向

消费地区的党组织发去了公文电报,指出必须要节约消耗小麦面粉:“……和保持必要的耐性和镇静”(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45号案卷,第3张)。

209 见注117。

210 1927年底到1928年初,根据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倡议,苏联人民委员会审议了关于组织出口蛋类、家禽、野味和其他家禽养殖业产品股份公司的问题。在各种委员会里经过了长期的讨论之后,人民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必须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机构在国外推销蛋类和家禽。1928年1月10日举行了奥尔忠尼启则(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委员会会议,有彼得斯、米高扬、施莱费尔、科米萨罗夫参加,讨论了关于组织向国外市场出口和销售蛋类、家禽、野味和其他家禽养殖业产品股份公司的问题。委员会决定不反对组织公司(俄联邦国家档案馆,P—5446号全宗,645号案卷,第4张)。根据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代表处和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的抗议,问题转到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它在1928年2月29日认为,组织在国外市场上出口和销售蛋类、家禽、野味和其他家禽养殖业产品全苏股份公司是“不合适宜”的(俄联邦国家档案馆,P—5446号全宗,3号目录,1697号案卷,第4张)。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于1928年3月在政治局抗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这个决议。从政治局转出的抗议1928年3月13日在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副主席参加了会议,做出了决定:“认为有必要组织在国外市场上销售家禽养殖业产品的辛迪加。建议商业人民委员部保障这个辛迪加的活动有足够的灵活性,特别是要让它在不同的国家能够以那种由苏联和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引出的形式(农业合作社、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或者是某些国家机关,等等)进行活动”。3月15日,问题给了政治局委员传阅表决。政治局会议的原始记录保存了征求意见的子和这次表决的结果,从中得出的是,赞成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会议决定的是斯大林、莫洛托夫、鲁祖塔克、托姆斯基、古比雪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布哈林、李可夫。最后一个表决的是乌格拉诺夫,他表示了特别的意见:“我认为不合适。我表示反对并建议在会议上提出来,因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所有的合作组织都反对这样的组织。”由于乌格拉诺夫的要求,3月22日问题提到了政治局的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决定:“1)认为组织蛋类家禽联合公司是不适宜的。2)认为有必要把蛋类的外运集中在以下3个组织里:消费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和国家进出口贸易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3号目录,721号案卷,第19、20张)。

211 原先在速记记录上记的是:

“丘巴尔:但是数据是不对的。

奥新斯基:他们不是从自己地方上的统计机关给出来的。

米高扬:我想要得到它们,而且我也得到了。”

212 政治局关于建立委员会的决定是1928年4月6日通过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

- 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84号案卷,第7张)。
- 213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28年5月8日召开(委员会的资料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28号全宗,7号目录,109号案卷)。
- 214 加里宁指的是1928年5月16日召开的大型农业组织问题专家会议。会议是在联共(布)中央讨论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组建大型农业企业草案委员会的工作框架内进行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78号全宗,7号目录,109号案卷,第174—232张)。
- 215 系指1928年6月26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大型国营农场组建委员会会议,会上研究了向新建的国营农场供应拖拉机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拖拉机制造厂的厂家有:哈尔科夫拖拉机厂、红色普季洛夫拖拉机厂、布尔什维克拖拉机厂等(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78号全宗,7号目录,109号案卷,第75、99—146张)。
- 216 1928年6月14日政治局研究了“关于斯摩棱斯克省地主”的问题,并批准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党团于6月11日经斯大林修改的决定。决定提出,“禁止迁移富农和其他并非贵族的富人”,“彻底迁移以前的地主(贵族)”(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91号案卷,第3—4张)。
- 217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73—174页。
- 218 同上书,第238页。
- 219 全俄农林工作者工会是全俄农业工作者工会和林业工作者工会合并之后于1920年9月成立的。1925年又有糖业托拉斯和森林采伐国营农场的工作者加入。在1926年1月召开的全俄农林工作者工会第五届代表大会上改名为苏联农业工人和林业工人联合会。
- 220 缪尔和梅里利兹——莫斯科的商行和商店。该楼是1906—1908年间由建筑师P. И. 克莱因建成的。1922年起为中央百货商店。
- 221 1928年7月11日的《真理报》刊登了尤利娜题为《索利卡姆斯克发生了什么》的文章,文章研究了钾矿井事故发生原因的几种说法和消除事故后果的途径。
- 222 指B. B. 奥新斯基在1927年12月17日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莫斯科1962年版,第1353页)。
- 223 Л. 克日维茨基:《农业问题》,圣彼得堡1906年版(译自波兰文)。
- 224 K. 考茨基:《农业问题》,圣彼得堡1905年版(译自德文)。
- 225 B. 奥新斯基:《战前俄国的国际移民和跨洲移民》,苏联中央统计局,莫斯科1928年版。
- 226 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属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营制糖工业联合公司,成立于1921年。到1926年时,它的固定资本为2.475亿卢布。在全国设有7家分公司、29个办事处和多家代表处(见《全苏联——1926年参考手册和通讯录》,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47页)。

- 227 系指1926年12月30日所做的《关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设结果的决议》(见《苏共决议》,第8版,第3卷,第416—430页)。
- 228 指Д.马列茨基发表在1928年6月30日《真理报》上题为《不真实的东西》的文章。马列茨基在回答B. A.卡尔平斯基发表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题为《集体农业》的文章时,批评了他对农业发展前景的解释。
- 229 指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于1928年4月23日通过的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农民未耕种的闲置土地上组建新的大型国营谷物农场的决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84号案卷,第128张)。
- 230 政治局“组建新的大型国营谷物农场”委员会于1928年5月通过决定,委托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实施建设国营农场的全部具体工作。委托农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穆拉洛夫领导这项工作(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28号全宗,7号目录,109号案卷,第83张)。5月24日,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建设新国营农场组织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成立土地基金调查委员会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78号全宗,7号目录,110号案卷,第10—11张)。
- 231 国家农业仓库指的是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农业仓库管理局。
- 232 丘里科夫派,俄罗斯的一个宗教运动,戒酒流派之一,以其创始人И. А.丘里科夫(1862—1930年)的名字命名,宣传道德,主张通过戒酒、戒烟进行宗教拯救。
- 23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95页。
- 234 最初的速记记录是这样写的:“而简单的摧毁,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关于摧毁,不能这样指控布尔什维克,说是布尔什维克没有在摧毁;在莫斯科转上一圈看看也就足够了。”(笑声)
- 235 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工业与高等技术院校》发表在1928年6月27日的《真理报》上。
- 236 1926年10—11月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首次讨论了1926—1927年间国民经济发展的前景。所有后来的一年一度的控制数字是由联共(布)中央全会确定下来的(З. К.兹韦兹金著:《从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到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的形成》,莫斯科1979年版,第133—185页)。
- 237 委员会的详细材料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4号目录,76—81号案卷。
- 238 卡甘-沙布沙伊电机制造学院曾按照速成的和最接近生产的计划培养专家。学制为2年至2年半。每周学习期间,学生们四天参加生产实践,两天在学校里学习。学院的经验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广泛支持。
- 239 国营丘古耶夫区发电站(原称哈尔科夫发电站)的建设始于1925—1926年。
- 240 什捷罗夫区发电站(乌克兰卢甘大区)的建设始于1926年末。后来进行了扩大电力的工作。
- 241 下诺夫哥罗德区电站是在1925—1926年度投产的。后来又进行了扩大电站能力的

工作。

- 242 根据1927年10月7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成立了由A. A. 安德烈耶夫任主席的中央委员会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委员会。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委员会开过几次会。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最后阶段,领导它的是C. 柯秀尔(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336号案卷,第2张)。关于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委员会的工作,详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4号目录,74、75号案卷。
- 243 俄联邦人民委员会1927年4月2日《关于为指定的学校的高等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分配实习和实践地点的办法》规定,对于高等技术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来说,实践的最少持续时间将为10个月(俄联邦工农政府法令和规定汇编,1927年,第33期,第218页)。
- 244 关于莫洛托夫委员会的工作和政治局对它所研究的各个问题做出的各项决定的详细情况,参见本卷《序》。
- 245 政治局《关于改进高等技术院校对新专家的培养的决议》是1928年7月2日通过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94号案卷,第2—4张)。
- 246 同上。
- 247 指1920年6月4日人民委员会《关于高等技术院校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高等技术院校里的学习年限规定为3年(《苏维埃政权的命令》,第9卷,莫斯科1978年版,第22—24页)。
- 248 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87页。
- 249 霍姆斯特克是美国的金银产地,位于南达科他州。
- 250 1928年春曾派了以比利宾为首的勘探队到科雷马区,在那里找到了非常丰富的矿藏和金属。1928年在科雷马得到了11.5公斤黄金。后来,在成立了国家建设局远东分局和广泛使用了犯人的劳动之后,科雷马的黄金开采量急剧增加了。
- 251 克拉瓦利可能有误,他指的是10个月。
- 252 乌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是于11月20—29日在哈尔科夫举行的。
- 253 1928年7月12日《真理报》在《红色专家的培养》总标题下,刊登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对高等技术院校问题再说几句话》和克拉瓦利的文章《再谈对工程技术干部的培养》。
- 254 这里说的是1928年7月2日的政治局决议,政治局在这个决议中委托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审议把卡甘-沙布沙伊电机学院转变成高等技术院校是否适宜的问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94号案卷,第3张)。
- 255 政治局关于满足Л. М. 卡冈诺维奇解除他在乌克兰的工作并任命他担任联共(布)中央书记以及任命C. B. 柯秀尔担任乌共(布)中央第一书记的决定是1928年7月7日通过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95号案卷,第1张)。



- 256 不是所有递交到了全会主席团的字条都附在了速记报告上。在准备出版速记报告的时候,有一些字条被部分地分开了,有些字条,譬如克里茨曼和奥新斯基的字条,根本就没有附上。
- 257 在速记报告中,这个字条没有完全公布。根据莫洛托夫的建议,关于取消一部分文字的问题和埃赫协商过。在文件的空白处写有:“莫洛托夫同志建议和瑟尔佐夫、埃赫同志谈好,这部分不印了,因为库奇明和季明没有参加全会,而且也没有谈到他们。”
- 258 索柯里尼柯夫的字条的第2点被勾掉了,在文件的底下写了:“由于这不是事实的说明,而是辩论,莫洛托夫认为加到速记记录里是不合适的。”索柯里尼柯夫的声明在速记报告里公布的时候没有第2点。
- 259 字条上有一段话:“考虑到这不是事实的说明,而是辩论,莫洛托夫同志认为放在速记记录里是不适宜的。”
- 260 在保存下来的原件上,文件下方的右面有整齐地裁下来的一条(大约1×2.5厘米)。可能这里写着文件的日期。这对作者未必能构成妨碍,但是斯大林对只提到“七人”会议这件事也感到不快(В. П. 丹尼洛夫注)。
- 26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7页。

## 人物简介\*

阿德勒,弗里德里希(Адлер Фридрих,1870—1960)——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所谓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阿尔巴里,Д. (Альпари Дьюла,1888—1944)——在柏林出版的(德国)主要刊物《国外通讯》领导人。

阿库洛夫,И. А. (Акулов И. А., 1888—1937)——1907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年起任全乌克兰工会理事会主席,1929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和主席团委员。

阿列克谢耶夫,П. А. (Алексеев П. А., 1893—1939)——1914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0年任列宁格勒州工会理事会主席。

阿莫索夫,Г. Н. (Амосов Г. Н., 1891—1953)——1918年入党。1927—1928年任阿斯特拉罕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8—1930年任萨拉托夫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阿尼西莫夫,Я. А. (Анисимов Я. А., 1897—1939?)——1918年入党。1926—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农业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同时为农业经济科学研究所研究生。

阿斯特罗夫,В. Н. (Астров В. Н., 1898—1995)——1917年入党。1926—1929年任《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1929—1931年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下诺夫哥罗德的大学任教。

阿塔丘尔克,基马尔·穆斯塔法(Атаюрк Мустафа Кемаль,1881—1938)——1919—1923年土耳其民族运动领导人,1923—1938年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统。

埃韦特,阿图尔(Эверт Артур,1890—1959)——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自

\* 简历材料基本上限于本卷涉及的年限范围。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多数参加者均死于恐怖年代。——编者注

- 1925年起任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1930年任德国国会议员。  
1928—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 埃赫, Р. И. (Эйхе Р. И., 1890—1940)——1905年入党, 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9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  
1929—1937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第一书记。
- 埃利亚瓦, Ш. З. (Элиава Ш. З., 1883—1937)——1904年入党, 自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自1927年起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
- 埃斯蒙特, Н. Б. (Эйсмонт Н. Б., 1891—1935)——1907年入党。自1926年起任俄联邦贸易人民委员和苏联副内外贸易人民委员。
- 艾伯特·弗里德里希(Эберт Фридрих, 1871—1925)——1889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自1913年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1919—1925年任德国总统。
- 爱尔科里(Эрколи)——见陶里亚蒂, 帕。
- 安采洛维奇, Н. М. (Анцелович Н. М., 1888—1952)——1905年入党, 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0年任农林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
- 安德烈耶夫, Л. Н. (Андреев Л. Н., 1871—1919)——俄罗斯作家。
- 安德烈耶夫, А. А. (Андреев А. А., 1895—1971)——1914年入党, 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1930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书记。
- 安季波夫, Н. К. (Антипов Н. К., 1894—1938)——1912年入党, 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1931年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
- 奥尔忠尼启则(谢尔戈), Г. К.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Серго] Г. К., 1886—1937)——1903年入党, 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1934年起再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6—1930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苏联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 同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自1930年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 奥拉赫拉什维利, М. Д. (Орахелашвили М. Д., 1881—1937)——1903年入党, 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 奥萨德奇, П. С. (Осадчий П. С., 1866—1943)——俄罗斯、苏联电机工程领域专

- 家,教授,彼得格勒电机工程学院院长,自1921年起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 奥新斯基,Н. (奥博连斯基,В. В.) (Осинский Н. [Оболенский В. В.], 1887—1938)**——1907年入党,192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8年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局长,1929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所务委员会主席。
- 巴达耶夫,А. Е. (Бадаев А. Е., 1883—1951)**——1904年入党,1925—195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1929年任彼得格勒(列宁格勒)消费合作社主席。
- 巴尔博特·德·马尔尼 Е. Н. (Барбот де Марни Е. Н., 1868—1939)**——列宁格勒矿业学院地质教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济总局矿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
- 巴赫,А. Н. (Бах А. Н., 1857—1946)**——苏联生物化学学派的奠基人。1920—1935年任卫生人民委员部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自1928年起领导全苏科技工作者组织。
- 巴枯宁,М. А. (Бакунин М. А., 1814—1876)**——无政府主义理论家,革命民粹派思想家之一。
- 巴拉诺夫,П. И. (Баранов П. И., 1872—1933)**——1912年入党,自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24—1931年任工农红军空军司令。
- 彭吉尔(Бонкур, 见保罗—彭吉尔)。**
- 鲍曼,К. Я. (Бауман К. Я., 1892—1937)**——1907年入党,192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1930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1928年任莫斯科委员会组织部部长,1928年任联共(布)农村工作部部长,自1928年11月起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第二书记。1929—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和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
- 鲍威尔,О. (Бауэр Отто, 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
- 鲍德温,С. (Болдуин Стэнли, 1867—1947)**——1923—1929年任英国首相。
- 贝京,Я. Б. (Быкин Я. Б., 1888—1938)**——1912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sup>①</sup>。1927—1930年任联共(布)雅罗斯拉夫尔省

<sup>①</sup> 本书第1卷、第4卷、第5卷为1927—1934年。——译者注

委书记。

贝尔,托马斯(Белл Томас,1882—1940)——1920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20—1929年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1—1922年和1926—1928年任英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28—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倍倍尔,奥古斯特(Бebelь Август,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共产国际奠基人和领导人之一。

彼得罗夫斯基,Д. А. (Петровский Д. А., 1886—1937)——1919年入党。1924—1929年任共产国际英美列宁格勒书记处领导人。

彼得罗夫斯基,Г. И. (Петровский Г. И., 1878—1958)——1897年入党,1921—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9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19—1938年任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自1922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

彼得斯,Я. Х. (Петерс Я. Х., 1886—1938)——1904年入党,1923—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32年任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党组领导人。

贝德克尔,卡尔(Бедкер Карл,1801—1859)——享有盛誉的世界各国旅行指南出版社奠基人。

别连基,З. М. (Беленький З. М., 1888—1940)——1905年入党,1928—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8年任全苏工会理事会运价经济部长,1928—1931年任工农检察院部务委员。

保罗—彭吉尔,Ж. (Поль—Бонкур Жозеф,1873—1972)——法国国务和政治活动家,1924—1926年任法国代表团驻国际联盟成员,1928年任法国社会党领导人。

波利特,Г. (Полит Горри,1890—1960)——1920年加入英国共产党,自1922年起任英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1924—1929年领导英国工会“少数派运动”。自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自1928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

波隆斯基,В. И. (Полонский В. И., 1893—1937)——1912年入党,自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8年任莫斯科罗戈什克—西蒙诺夫斯克区委书记。自1928年起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

波斯特舍夫,П. П. (Постышев П. П., 1887—1939)——1904年入党,1927—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乌克兰共(布)政治局委员

- 和中央委员,同时任乌克兰共(布)哈尔科夫专区区委和市委书记。
- 伯肯黑德,弗雷德里克·埃德温·斯米特(Биркенхед Фредерик Эдвин Смит, 1872—1930)——英国保守党极右活动家,自1906年起为议员。1924—1928年任印度事务秘书。
- 布哈林,Н. И. (Бухарин Н. И., 1888—1938)——1906年入党,1924—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8—1929年任《真理报》主编。1924—1929年任《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1919—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自1929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部门负责人。
- 布勒蒂亚努,Й. (Братиану Йон, 1864—1927)——罗马尼亚政治和国务活动家。1908—1910年、1914—1919年、1922—1926年和1927年任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1924年他领导的政府禁止了共产党的活动。
- 布兰德勒,亨利希(Брандлер Генрих, 1881—1967)——1918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德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23年任德国共产党主席。1924—1929年为联共(布)党员,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民国际工作人员。1928年建立德国共产党(反对派)。1929年被开除出联共(布)。
- 布林,А. С. (Будин А. С., 1894—1938)——1914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莫斯科军区政治部主任。1928—1934年任工农红军政治部副主任、白俄罗斯军区政治部主任。
- 布留哈诺夫,Н. П. (Брюханов Н. П., 1878—1938)——1902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
- 布钦斯基,А. Ф. (Бучинский А. Ф.)——农艺家,烟草种植实验所教授。
- 蔡特金,克拉拉(Цеткин Клара, 1857—1933)——德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奠基人之一。自1921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仓科夫,А. (Цан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1879—1959)——1923—1926年任保加利亚总理。1932年创建国家社会运动党。
- 邓尼金,А. И. (Деникин А. И., 1872—1947)——沙皇军队将军,俄罗斯白色运动领导人之一。自1920年4月起流亡国外。
- 东克尔,格尔曼(Дункер Герман, 1874—1960)——1893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小组领导人之一。1918年参加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
- 杜克洛,雅克(Дюкло Жак, 1896—1975)——法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 多尔戈夫, Г. И. (Долгов Г. И.)——教授,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多加多夫, А. И. (Догадов А. И., 1888—1937)——1905年入党, 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1929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第一书记。
- 多亚连科, А. Г. (Дояренко А. Г., 1874—?)——季米里亚泽夫农业学院教授, 《农业通报》编辑。
- 恩德勒, 奥古斯特 (Эндерлз Август, 1887—1959)——1905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自1919年起加入德国共产党。自1924年起任《红旗》报编辑, 1928年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 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的奠基人之一。
- 菲加特纳, Ю. П. (Фигатнер Ю. П., 1889—1937)——1903年入党, 1924—1934年<sup>①</sup>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8年任苏联商业职员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 菲勒, С. И. (Филлер С. И., 1882—1954)——1910年入党, 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巡视处书记。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组成员。
- 菲緬, 叶多 (Фиммен Едо, 1875—1842)——国际工会运动活动家, 自1919年起任国际工会联盟(阿姆斯特丹国际)书记, 自1921年起任国际搬运工人联盟书记。
- 菲舍尔, Р. (Фишер Рут, 1895—1961)——1923—1926年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6年6月根据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建议被解除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负责职务。1926年8月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
- 弗鲁姆金, М. И. (Фрумкин М. И., 1878—1938)——1898年入党。1926—1929年任苏联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和副财政人民委员。1929—1930年任全苏鱼品工业联合公司托拉斯主席。
- 伏罗希洛夫, К. Е. (Ворошилов К. Е., 1881—1969)——1903年入党, 1926—1960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5—1934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
- 福斯特, У. (Фостер Уильям, 1881—1961)——自1901年起参加美国社会主义运动, 1921年加入美国共产党; 自1924年起先后任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

<sup>①</sup> 原文如此。本书第3卷、第4卷、第5卷为1925—1934年。——译者注

- 员、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自1928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
- 福特, Г. (Форд Генри, 1863—1947)**——美国工业家,美国汽车工业奠基人之一。
- 甘地,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 (Ганди Мохандас Карамчанд, 1869—1948)**——印度民族运动领导人之一,印度国大党领导人。
- 高尔察克, А. В. (Колчак А. В., 1873—1920)**——沙皇海军上将,1918—1919年为白色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
- 高尔基, А. М. (Горький А. М., 1868—1936)**——作家,政论家。
- 戈尔茨曼, А. З. (Гольцман А. З., 1894—1933)**——1917年入党,1927—1933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 戈连多, М. С. (Голендо М. С., 1894—1936)**——1916年入党。1926—1929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局副局长。
- 戈洛谢金, Ф. И. (Голощекин Ф. И., 1876—1941)**——1903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3年任联共(布)哈萨克斯坦边疆区委书记。
- 格里亚金斯基, Ф. П. (Грядинский Ф. П., 1893—1938)**——1912年入党,自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28年任贸易人民委员部驻列宁格勒州特派员。1928—1929年任中央黑土区州执行委员会主席。1929—1930年任苏联副内外贸易人民委员。
- 格里亚泽夫, И. Я. (Грязев И. Я., 1882—?)**——1905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乌克兰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
- 格林科, Г. Ф. (Гринько Г. Ф., 1890—1938)**——1919年入党。自1926年起任苏联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1929年任苏联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29—1930年任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
- 格罗曼, В. Г. (Громан В. Г., 1874—?)**——俄罗斯社会民主工人党(孟什维克)党员,俄罗斯社会民主工人党第四次联合代表大会党的土地纲领草案起草人之一。自1921年起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苏联人民委员会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
- 格伊, К. В. (Гей К. В., 1896—1939)**——1916年入党,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自1926年起任乌拉尔州委书记。1927—1929年任工



- 会国际组织部部长。1930年任白俄罗斯共(布)中央书记。
- 贡恰罗夫, Н. К. (Гончаров Н. К., 1886—1970)——1904年入党, 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7年起任苏联工农检察院巡视员。
- 古比雪夫, В. В. (Куйбышев В. В., 1888—1935)——1904年入党, 1927—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 古谢夫, С. И. (德拉布金, Я. Д.) (Гусев С. И. [Драбкин Я. Д.], 1874—1933)——1896年入党。自1928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人员, 自1929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哈塔耶维奇, М. М. (Хатаевич М. М., 1893—1937)——1913年入党, 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1930—1937年任中央委员。1925—1928年任鞑靼州委书记。1928—1930年任联共(布)中伏尔加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 霍多罗夫斯基, П. И. (Ходоровский П. И., 1885—1940)——1903年入党。1922—1928年任俄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1928—1932年先后任驻意大利、土耳其商务代表。
- 基尔基日, К. О. (Киркиж К. О., 1888—1932)——1910年入党, 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9年先后任乌兹别克斯坦共(布)中央书记、苏联商业职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 基列维茨, Ф. Ф. (Килевич Ф. Ф., 1884—1939?)——1919年入党。1923—1931年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纺织工人联合会中央主席团委员。1923—1930年任全苏纺织辛迪加主席。
- 基洛夫, С. М. (Киров С. М., 1886—1934)——1904年入党, 自1926年起任政治局候补委员。自1930年起任政治局委员。自1926年起任列宁格勒省委和市委第一书记以及联共(布)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 基西斯, Р. Я. (Кисис Р. Я., 1896—1981)——1913年入党。自1926年起任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第二书记。
- 基谢廖夫, А. С. (Киселев А. С., 1879—1937)——1898年入党, 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37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加拉赫, 威廉 (Галлахер Уильям, 1881—1965)——英国工人运动积极分子, 1920年加入英国共产党, 自1921年起任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自1924年

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加里宁, М. И. (Калинин М. И., 1875—1946)**——1898 年入党, 1926—1946 年任政治局委员。1919—1938 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同时, 自 1922 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加马尔尼克, Я. Б. (Гамарник Я. Б., 1894—1937)**——1916 年入党, 1927—1937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8 年任联共(布)远东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1928—1929 年任白俄罗斯共(布)中央第一书记。1929—1937 年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

**加米涅夫(罗森费尔德), 列·波·(Каменев [Розенфельд], 1883—1936)**——1901 年入党, 1919—1927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9 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局长, 1929—1932 年任中央租让委员会主席。

**坚格尔, 菲利普(Денгель Филипп, 1888—1948)**——1919 年加入德国共产党。自 1929 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工作者之一。

**捷尔任斯基, Ф. Э. (Дзержинский Ф. Э., 1877—1926)**——1895 年入党。自 1924 年 2 月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捷列霍夫, Р. Я. (Терехов Р. Я., 1889—?)**——1912 年入党, 1924—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30 年任乌克兰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sup>①</sup>

**卡拉瓦耶夫, П. Н. (Караваев П. Н., 1894—1952)**——1903 年入党, 1927—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8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巡视员、党组成员。自 1928 年起任莫斯科市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党组书记。

**卡巴科夫, И. Д. (Кабаков И. Д., 1891—1937)**——1914 年入党, 1925—1937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7 年任联共(布)图拉省委第一书记。1928—1929 年任联共(布)乌拉尔州监察委员会主席。自 1929 年起任乌拉尔州委第一书记。

**卡尔马诺维奇, М. И. (Калманович М. И., 1888—1937)**——1917 年入党, 1927—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29 年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理事会主席, 1929—1930 年起任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

<sup>①</sup> 本书第 1 卷为 1927—1930 年任此职。——译者注

- 卡尔平斯基, В. А. (Карпинский В. А., 1880—1965)——1898年入党,自1927年起任《贫农报》主编。
- 卡弗, 托马斯·尼克松 (Карвер Томас Никсон, 1865—1961)——美国经济学家,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理论的创始人。
- 卡冈诺维奇, Л. М. (Каганович Л. М., 1893—1991)——1911年入党,1924—195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1957年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1925年4月—1928年7月任乌克兰共(布)中央总书记。1928—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
- 卡冈诺维奇, М. М. (Каганович М. М., 1888—1941)——1905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0年任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卡雷金娜, А. С. (Калыгина А. С., 1895—1937)——1915年入党,自192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妇女部副部长。
- 卡明斯基, Г. Н. (Каминский Г. Н., 1895—1938)——1913年入党,1925—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28年任农业合作社联社联合会主席和全苏农业合作社粮食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和销售联社主席。1928—1929年任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主席。
- 凯杰里, 瓦尔特·冯 (Кейдель Вальтер фон, 1884—1973)——德国民族人民党活动家。1927—1928年任德国内务部长。
- 凯洛格, Ф. Б. (Келлог Фрэнк Биллингс, 1856—1937)——1925—1929年任美国国务卿。
- 凯末尔 (Кемаль)——见阿塔丘尔克。
- 康德拉季耶夫, Н. Д. (Кондратьев Н. Д., 1892—1938)——农业学者。自1918年起为莫斯科农业学院教授,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下属的行情研究所所长。
- 康德拉季耶夫, Т. К. (Кондратьев Т. К., 1892—?)——1913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任沃洛达尔斯克区委书记,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和州执行委员会委员。
- 考茨基, 卡尔 (Каутский Карл, 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和理论家之一。
- 柯秀尔, С. В. (Косиор С. В., 1889—1939)——1907年入党,自1924年起任联

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28—1938年任乌克兰共(布)中央总书记。

柯秀尔,И. В. (Косиор И. В., 1893—1937)——1908年入党,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7年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科科维欣,М. Н. (Коковихин М. Н., 1883—1965)——1903年入党,1924—1934<sup>①</sup>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自1927年起在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自1928年起任中央黑土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科罗斯捷列夫,А. А. (Коростелев А. А., 1887—1938)——1905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2—1929年任教育工作者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科罗斯捷列夫,Г. А. (Коростелев Г. А., 1885—1932)——1905年入党,1924—1932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4年起任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主席。

科罗特科夫,И. И. (Коротков И. И., 1885—1949)——1905年入党,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组成员。

科洛季洛夫,Н. Н. (Колотилов Н. Н., 1885—1937)——1903年入党,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任联共(布)伊万诺沃省委书记。

科马罗夫,Н. П. (索比诺夫,Ф. Е.) (Комаров Н. П. [Собинов Ф. Е.], 1886—1937)——1909年入党,1921—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列宁格勒市和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

科斯特舍娃,В. (科舒茨卡娅,М.) (Костшева Вера [Кошутская Мария], 1876—1939)——1918—1930年任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科托夫,В. А. (Котов В. А., 1895—1937)——1915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8年任莫斯科委员会书记。自1929年起任联邦劳动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局长。

克拉瓦利,И. А. (Краваль И. А., 1897—1938)——1919年入党。1924—1930

<sup>①</sup>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为1923—1930年。——译者注

- 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全权代表。1928—1930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克里茨曼, Л. Н. (Крицман Л. Н., 1890—1938)——1918年入党。1925—1929年先后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副局长、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自1928年起任农业学院院长和农业革命研究委员会副主席。
- 克里尼茨基, А. И. (Криницкий А. И., 1894—1937)——1915年入党, 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29年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
- 克里沃夫, Т. С. (Кривов Т. С., 1886—1966)——1905年入党, 1926—1934年<sup>①</sup>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3年任俄联邦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 克利缅科, И. Е. (Клименко И. Е., 1891—1937)——1912年入党, 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任俄联邦副农业人民委员。1929年任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各中心机器拖拉机站联合管理部主席。
- 克鲁普斯卡娅, Н. К. (Крупская Н. К., 1869—1939)——1898年入党, 自1924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自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自1920年起领导俄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自1929年起任俄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
- 克诺林, В. Г. (Кнорин В. Г., 1890—1938)——1910年入党, 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7—1928年任白俄罗斯共(布)中央书记。1928—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 克日维茨基, 路德维希(Крживицкий Людвиг, 1859—1941)——波兰学者、政论家。1921—1939年任苏联国民经济学院院长。
-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Г. М.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 Г. М., 1872—1959)——1893年入党, 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国家计委主任。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
- 克维林, Э. И. (Квириг Э. И., 1888—1937)——1912年入党, 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0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同时(1927—1928年)兼任第聂伯国家建设工程局局长。
- 肯博尔, Г. Ф. (Кемпбелл Г. Ф.)——美国农业活动家, 1929年出版的《俄罗斯是市场还是威胁?》一书的作者。1929年曾会见斯大林。

<sup>①</sup> 本书第4卷、第5卷为1924—1934年。——译者注

库比亚克, Н. А. (Кубяк Н. А., 1881—1937)——1898 年入党, 1923—1934 年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8 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28—1931 年任俄联邦农业人民委员。

库克, 亚瑟·詹姆斯 (Кук Артур Джеймс, 1889—1931)——英国工会左翼积极分子, 1921—1924 年任矿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自 1924 年起任该联合会总书记, 1926 年领导了矿工们为时 7 个月的罢工。

库利科夫, Е. Ф. (Куликов Е. Ф., 1891—1943)——1910 年入党, 1925—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8 年任莫斯科市莫斯科河南岸区委责任书记。1929—1930 年任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理事会理事。

库西宁, О. В. (Куусинен О. В., 1881—1964)——芬兰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1922—1936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委员。

库兹涅佐夫 С. М. (Кузнецов С. М., 1891—1938)——1915 年入党。1926—1929 年任苏联(副)财政人民委员。

库恩, 贝拉 (Кун Бела, 1886—1939)——在俄罗斯作俘虏期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20—1936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人。

拉狄克, К. Б. (Радек К. Б., 1885—1939)——1903 年入党。1924—1927 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1927 年任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

拉迪奇, 斯捷潘 (Радич Степан, 1871—1928)——克罗地亚农民党(1904—1941 年)奠基人之一。

拉杜斯—津科维奇, В. А. (Радус—Зенькович В. А., 1878—1967)——1898 年入党。1925—1929 年<sup>①</sup>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

拉赫京, И. К. (Лактин И. К., 1861—1935)——交通工程师, 国家高等美工学院材料学教授。

兰斯伯利, 乔治 (Ленсбери Джордж, 1859—1940)——英国工党领袖之一, 1912—1921 年任《每日公报》编辑, 1929—1931 年任公共工程大臣。

劳合—乔治, 大卫 (Ллойд Джордж Дэвид, 1863—1945)——英国国务和政治活动家, 工党领导人, 1916—1922 年任英国首相。

<sup>①</sup> 原文如此。本书第 1 卷是 1923—1930 年, 第 3 卷、第 4 卷、第 5 卷是 1926—1930 年。——译者注

- 雷夫金, О. Л. (Рывкин О. Л., 1899—1937)——1917年入党, 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18—1924年任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自1924年起从事党的工作。
- 雷梅列, 格尔曼 (Реммеле Герман, 1880—1939)——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 1923—1933年任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雷涅尔, 卡尔 (Реннер Карл, 1870—1950)——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
- 李卜克内西, 卡尔 (Либкнехт Карл, 1871—1919)——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德国共产党奠基人之一。
- 李可夫, А. И. (Рыков А. И., 1881—1938)——1898年入党<sup>①</sup>, 1922—1930年任政治局委员。1924—1930年任苏联和俄联邦(1929年前)人民委员会主席, 同时于1926—1930年任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 李维诺夫, М. М. (Литвинов М. М., 1876—1951)——1898年入党。1923—1930年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 里亚比宁, Е. И. (Рябинин Е. И., 1892—?②)——1917年入党, 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 利西岑, Н. В. (Лисицын Н. В., 1891—1939)——1910年入党, 1923—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年任俄联邦工农检察院副人民委员。
- 利亚先科, П. И. (Лященко П. И., 1876—1955)——教授, 苏联农业经济、农业关系和国民经济史领域的专家。
- 利扎廖夫, А. С. (Лизарёв А. С., 1893—1977)——1920年入党。自1927年起任驻波兰商务代表。自1929年起任国家进出口贸易局领导成员。
- 连格尼克, Ф. В. (Ленгник Ф. В., 1873—1936)——1893年入党, 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自1926年起任中央交通和邮电检察院主席。1927—1928年任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8—1929年任标准化委员会领导人。
- 列昂诺夫, Ф. Г. (Леонов Ф. Г., 1892—1938)——1914年入党, 1927—1930年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3卷、第4卷、第5卷的入党年份为1899年。——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为1892—1941年。——译者注

- 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任莫斯科市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1929—1930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第三书记。
- 列别德, Д. З. (Лебедь Д. З., 1893—1937)——1909年入党。1926—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1930年<sup>①</sup>同时任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 列坚斯, С. Ф. (Реденс С. Ф., 1892—1940)——1914年入党, 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8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秘书, 1928—1931年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全权代表, 外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
- 列普谢, И. И. (Лепсе И. И., 1889—1929)——1904年入党, 自192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5年起任冶金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团和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
- 留京, М. Н. (Рютин М. Н., 1890—1937)——1914年入党, 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8年任莫斯科市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1928—1930年任《红星报》副主编, 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集体化问题全权代表。
- 柳比莫夫, И. Е. (Любимов И. Е., 1882—1937)——1902年入党, 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消费合作社联社中央理事会主席。
- 卢波尔 И. К. (Луппол И. К., 1886—1943)——1920年入党。1925—1931年任莫斯科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教授。
- 卢那察尔斯基, 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1875—1933)——1895年入党。1917—1929年任俄联邦教育人民委员。
- 卢森堡, 罗莎 (Люксембург Роза, 1871—1919)——波兰、德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女活动家, 德国共产党奠基人之一。
- 卢舍尔, 路易 (Лушер Луи, 1872—1931)——1919年在巴黎和平大会上任顾问, 财团主, 1928年在法国政府任贸易部长。
- 鲁缅采夫, К. А. (Румянцев К. А., 1891—1932)——1916年入党, 1925—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自1927年起先后任阿塞拜疆国营石油联合公司副主席、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委员、阿塞拜疆共(布)中央委员。

<sup>①</sup>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第5卷为1924—1934年。——译者注



- 鲁希莫维奇, М. Л. (Рухимович М. Л., 1889—1938)——1913年入党, 192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 鲁祖塔克, Я. Э. (Рудзутак Я. Э., 1887—1938)——1905年入党, 1926—1932年任政治局委员。1924—1930年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1926—1937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 路易斯, 约翰(Льюис Джон, 1880—?)——英国工会运动活动家。自1920年起任矿工工会主席。
- 伦金, К. В. (Рындин К. В., 1893—1938)——1915年入党, 1924—1930年任中央候补委员。自1927年起任乌拉尔州委书记。1928—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巡视员, 莫斯科委员会第二书记。
- 罗易, 马纳本德拉·纳特(Рой Манабендра Нат, 1892—1948)——印度政治活动家, 1921—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候补委员、委员。1929年因“右倾”被撤掉在共产国际的工作。
- 罗伊津曼, Б. А. (Ройзенман Б. А., 1878—1938)——1902年入党, 1924—1932年<sup>①</sup>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2年任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 罗兹米罗维奇, Е. Ф. (Розмирович Е. Ф., 1886—1953)——1904年入党, 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8—1930年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 洛博夫, С. С. (Лобов С. С., 1888—1937)——1913年入党, 192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俄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 洛夫斯顿, 杰伊(Ловстон Джей, 1898—1974)——美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27—1929年任美国共产党书记,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年由于右倾被开除出共产党。
- 洛卡茨科夫, Ф. И. (Локацков Ф. И., 1881—1937)——1904年入党, 1927—1930年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1925—1927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乌拉尔州执行委员会主席。
- 洛克菲勒, Дж. Д. (Рокфеллер Дж. Д., 1839—1937)——美国最大财团之一的

<sup>①</sup>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第5卷为1924—1934年。——译者注

奠基人。

洛米纳泽, В. В. (Ломинадзе В. В., 1897—1935)——1917年入党, 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1930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副院长。1925—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洛莫夫(奥波科夫), Г. И. (Ломов [Оппоков] Г. И., 1888—1938)——1903年入党, 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管理委员会主席, 乌克兰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自1929年起任全苏国营石油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 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洛佐夫斯基, А. (德里佐, С. А.) (Лозовский А. [Дридзо С. А.], 1878—1952)——1901年入党, 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37年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

马尔科夫, А. Т. (Марков А. Т., 1877—?)——1917年<sup>①</sup>入党, 1927—1930年任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9年任纺织工人工会中央主席。

马尔科维奇, А. М. (Маркович А. М., 1888—?)——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工人运动活动家, 1907年加入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 1919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 自1920年起任党总书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年被开除出党, 不久回南斯拉夫。

马尔克维奇, А. М. (Маркевич А. М., 1893—1938)——1921年入党。1923—1928年在国营农场托拉斯工作。1929—1932年为全苏农业机器站中心领导人之一, 同时, 任第一个在苏联成立农业机器站的舍甫琴柯国营农场场长。

马卡罗夫, Н. П. (Макаров Н. П., 1886—?)——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和沃、罗涅日农业学院教授。俄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农业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马列茨基, Д. П. (Марецкий Д. П., 1901—1937)——1919年入党。1928年前在《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社工作。1929—1932年任列宁格勒科学院计划委员会学术秘书和科学院经济室主任。

马萨利克, Т. (Масарик Томаш, 1850—1937)——1918—1935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sup>①</sup>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第4卷、第5卷为1898年。——译者注

- 马斯洛夫, А. (Маслов А., 1891—1941)——1918年加入德国共产党,自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6年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1927—1928年加入列宁崩得(左派小组拥护者联盟)。
- 麦克唐纳,詹姆斯·拉姆赛(Макдональд Джеймс Рамсей, 1866—1937)——英国独立工党和工党的奠基人和领导人之一,1924年、1929—1931年任首相。
- 曼采夫, В. Н. (Манцев В. Н., 1889—?)——1906年入党。1924—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曼努伊尔斯基, Д. З. (Мануильский Д. З., 1883—1959)——1903年入党,自1923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4年7月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8—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 梅德韦杰夫, А. В. (Медведев А. В., 1884—1937)——1904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1929年任乌克兰共(布)中央书记。
- 梅德韦杰夫, Т. И. (Медведев Т. И., 1885—?)——1919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年为第一模范印刷厂车间技师。
- 梅克斯顿,詹姆斯(Мэкстон Джеймс)——自1928年起任英国独立工人党主席。
- 美尔尼昌斯基, Г. Н. (Мельничанский Г. Н., 1886—1937)——1902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9年任纺织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1929—1931年任全苏纺织联合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蒙德,阿尔弗雷德(Монд Альфред, 1869—1930)——英国化学和镍业托拉斯主。1906—1928年任英国议员(有间断)。
- 米尔赫, Л. Р. (Милх Л. Р., 1896—1938)——1917年入党。1923—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自1928年起任乌里扬诺夫专区区委书记。1928—1933年任联共(布)中伏尔加边疆区委委员。
- 米尔佐扬, Л. И. (Мирзоян Л. И., 1897—1939)——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任巴库市委书记。1925—1929年任阿塞拜疆共(布)书记。
- 米高扬 А. И. (Микоян А. И., 1895—1978)——1915年入党,1926—1935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
- 米利恰科夫, А. И. (Мильчаков А. И., 1903—1973)——1919年入党,1925—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8年任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央总书记。1928—1929年在苏联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

米柳亭, В. П. (Милютин В. П., 1884—1937)——1903年入党, 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8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8—1930年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局长、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米特罗法诺夫, А. Х. (Митрофанов А. Х., 1870<sup>①</sup>—1941)——1903年入党, 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小组领导人。

缅任斯基, В. Р. (Менжинский В. Р., 1874—1934)——1902年入党, 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4年起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

摩根, 约翰 (Морган Джон П., 1867—1943)——美国工业家, 银行家, 财团奠基人。

莫罗兹, Г. С. (Мороз Г. С., 1893—1940)——1917年入党, 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书记。1929年任贸易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贸易工作者工会中央主席。

莫洛托夫(斯克里亚宾), В. М. (Молотов [Скрябин] В. М., 1890—1986)——1906年入党, 1926—195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1921—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 同时, 1928—1929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

莫斯克温, И. М. (Москвин И. М., 1890—1937)——1911年入党, 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分配部部长。

墨索里尼, 贝尼托 (Муссолини Бенито, 1883—1945)——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领导人, 1922—1943年为意大利国家元首。

穆拉洛夫, А. И. (Муралов А. И., 1886—1937)——1903年入党。1923—1928年任下诺夫哥罗德省执行委员会主席, 自1929年起任俄联邦农业人民委员。

穆萨别科夫, Г. М. (Мусабеков Г. М., 1888—1938)——1918年入党, 自192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8年任阿塞拜疆人民委员会主席。1929—1931年任阿塞拜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纳扎列强, А. М. (Назаретян А. М., 1889—1937)——1905年入党, 自1924年

<sup>①</sup>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第4卷为1879年。——译者注

- 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4—1932年任苏联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 诺伊曼, Г. (Нейман Гейнц, 1902—1937)——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 1927—1929年先后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24—1928年任德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
- 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 1808—1918)——俄罗斯末代沙皇。
- 尼古拉耶娃, К. И. (Николаева К. И., 1893—1944)——1909年入党, 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1930年任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宣传鼓动部部长。
- 诺根, В. П. (Ногин В. П., 1878—1924)——1898年入党。自1921年起任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 诺斯克, 古斯塔夫(Носке Густав, 1868—1946)——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1919—1920年任德国国防部长。
- 诺索夫, И. П. (Носов И. П., 1888—1937)——1905年入党, 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1年任联共(布)特维尔省委书记。
- 帕夫卢诺夫斯基, И. П. (Павлуновский И. П., 1888—1940)——1905年入党, 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0年任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 佩尔谢利, 阿尔伯特·亚瑟(Персель Альберт Артур, 1872—1936)——国际工会联合会(阿姆斯特丹国际)主席, 1925—1927年任英俄工会联盟委员会奠基人之一。
- 佩珀, 约翰(波加尼, 约瑟夫)(Пеппер Джон [Погани, Йозеф], 1886—1938)——1918年为匈牙利共产党奠基人之一, 1927年任美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代表。
- 彭加勒, 雷蒙(Пуанкаре Раймон, 1860—1934)——法国政治活动家。1926—1929年任法国总理。
- 皮达可夫, Ю. Л. (Пятаков Ю. Л., 1890—1937)——1910年入党。1927年被开除出党, 1928年被恢复党籍。1928年任苏联国家银行副行长, 自1929年起任行长。
- 皮尔苏茨基, 约瑟夫(Пилсудский Юзеф, 1867—1935)——元帅, 波兰社会党右翼活动家。1926—1928年、1930年任波兰总理。
- 皮亚特尼茨基, О. А. (Пятницкий О. А., 1882—1938)——1898年入党, 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4—1927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

- 员。1921—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人员、书记、主席团委员。
- 片山潜(Катаяма Сэн, 1859—1933)——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自1922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 普尔曼,列昂(Пурман Леон, 1892—1933)——波兰工人运动参加者,俄罗斯十月革命后,与共产党人联合。1918年为波兰红色近卫军组织者之一。自1927年起任波兰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自1928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 齐洪,А. М. (Цихон А. М., 1887—1939)——1906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28年任莫斯科鲍曼区委书记。1928—1930年和自1933年起任建筑工人工会中央主席。
- 齐利科,Ф. А. (Цылько Ф. А., 1894—1937)——1919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 齐特林(Цитрин)——见西特林У。
- 恰亚诺夫 А. В. (Чаянов А. В., 1888—1937)——经济学家,农业问题专家。1922—1930年任俄罗斯社科研究机构协会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 切尔诺夫,О. И. (Чернов О. И., 1886—?)——《贫农报》编委会委员。
- 丘巴尔,В. Я. (Чубарь В. Я., 1891—1939)——1907年入党,1926—1935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3—193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
- 丘茨卡耶夫,С. Е. (Чуцкаев С. Е., 1876—1946)——1903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7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3—1927年任苏联工农检察院副人民委员。1927—1929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远东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9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预算委员会主席。
- 丘多夫,М. С. (Чудов М. С., 1893—1937)——1913年入党,192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年任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1928—1936年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
- 丘吉尔,温斯顿·伦纳德·斯潘塞(Черчилль Уинстон Леонард Спенсер, 1874—1965)——1924—1929年任英国财政大臣。
- 丘维林,М. Е. (Чувьрин М. Е., 1883—1947)——1903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自1923年<sup>①</sup>起任联共(布)卢甘斯克区委

① 与本书第1卷人物简介中的年代不符。——译者注

书记。

**瞿鲁巴, А. Д. (Цюрупа А. Д., 1870—1928)**——1898年入党, 1923—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8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让, 雷诺(Жан Рено, 1887—1961)**——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曾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和第六次大会。

**日丹诺夫, А. А. (Жданов А. А., 1896—1948)**——1915年入党, 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下诺夫哥罗德省委第一书记。

**茹奥, 路易(Жуо Луи, 1879—1954)**——法国总工会领导人, 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领导人之一。

**茹柯夫, И. П. (Жуков И. П., 1889—1937)**——1909年入党, 192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8年任列宁格勒电力托拉斯总经理。1928—1929年任列宁格勒州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9—1930年任莫斯科国营电工器材托拉斯总经理。

**萨克拉特瓦拉, Ш. (Саклатвала Шапури, 1874—1936)**——1920年加入英国共产党。印度在英国议会中的代表。

**萨普罗诺夫, Т. В. (Сапронов Т. В., 1887—1939)**——1912年入党。1920—1921年任建筑工人联盟中央主席。1927年12月被开除出党并流放到北部。

**瑟尔佐夫, С. И. (Сырцов С. И., 1893—1937)**——1913年入党, 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9—1930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29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委书记。1929—1930年任俄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

**沙茨金, Л. А. (Шацкий Л. А., 1902—1937)**——1917年入党, 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8年任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少共国际书记。

**舍博尔达耶夫, Б. П. (Шеболдаев Б. П., 1895—1937)**——1914年入党, 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8年起任联共(布)下伏尔加边疆区委书记。

**舍夫洛, 奥拉夫(Шефло Олаф, 1883—1959)**——挪威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自1922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年中断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

- 施米特, В. В. (Шмидт В. В., 1886—1938)——1905 年入党, 1925—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8 年任苏联劳动人民委员。1928—1930 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 施瓦茨, И. И. (Шварц И. И., 1879—1951)——1899 年入党, 1924—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1930 年任苏联煤炭工业职工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 施略普尼柯夫, А. Г. (Шляпников А. Г., 1885—1937)——1901 年入党。1926—1929 年任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五金进口公司理事会主席。
- 什维尔尼克, Н. М. (Шверник Н. М., 1888—1970)——1905 年入党, 1925—1970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9 年任联共(布)乌拉尔州委书记。1929 年任五金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 舒什科夫, П. С. (Шушков П. С., 1889—?)——1917 年入党, 1927—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 1927 年起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 斯大林, И. В. (Сталин И. В., 1879—1953)——1898 年入党, 1917 年 10 月和自 1919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自 1922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总书记。
- 斯捷茨基, А. И. (Стецкий А. И., 1896—1938)——1915 年入党, 自 1927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西北局和列宁格勒省委宣传鼓动部部长。
- 斯捷潘诺夫, С. И. (Степанов С. И., 1876—1935)——1895 年入党。1925—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25—1930 年任图拉省执行委员会主席。
- 斯克雷普尼克, Н. А. (Скрыпник Н. А., 1872—1933)——1897 年入党, 自 1927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2 年任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自 1928 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 斯列普科夫, А. Н. (Слепков А. Н., 1899—1937)——1919 年入党。1924—1928 年<sup>①</sup>任《共青团真理报》编辑、《真理报》编辑之一、《布尔什维克》杂志编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部部长。
- 斯米多维奇, С. Н. (Смидович С. Н., 1872—1934)——1898 年入党, 1924—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成员。

<sup>①</sup> 原文如此。本书第 3 卷、第 4 卷、第 5 卷为 1924—1928 年。——译者注



- 斯米尔诺夫, А. П. (Смирнов А. П., 1878—1938)——1896年入党, 1922—193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8年任俄联邦副农业人民委员、人民委员, 同时任农民国际总书记。1928—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
- 斯米尔诺夫, В. М. (Смирнов В. М., 1887—1937)——1907年入党。1926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1927年被开除出党, 后被捕并被流放到乌拉尔。
- 斯米尔诺夫, И. Н. (Смирнов И. Н., 1881—1936)——1899年入党。1923—1927年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由于从事派别活动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
- 斯特里耶夫斯基, К. К. (Стриевский К. К., 1885—1938)——1902年入党, 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9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自1929年6月起任全苏工会理事会组织局局长。
- 斯特鲁米林, С. Г. (Струмилин С. Г., 1877—1974)——1923年入党, 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苏联科学院院士。1921—1937年在俄联邦、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
- 斯特罗加诺夫, В. А. (Строганов В. А., 1888—1941)——1905年入党, 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0年任斯大林诺区委书记。
- 斯腾, Я. Э. (Стэн Я. Э., 1899—1938)——1914年入党, 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28—1930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副院长。
- 斯图平(Ступин)——机械工程师, 基辅工学院教授。
- 苏霍姆林, К. В. (Сухомлин К. В., 1886—1938)——1905年入党, 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0年任乌克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苏利莫夫, Д. Е. (Сулимов Д. Е., 1890—1937)——1905年入党, 1923—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7年任乌拉尔州执行委员会主席, 联共(布)乌拉尔州委书记。1927—1930年任苏联第一副交通人民委员。
- 索博列夫, С. М. (Соболев С. М., 1900—1939)——1917<sup>①</sup>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任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西北局书记。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第4卷、第5卷的入党年份为1918年。——译者注

索尔茨, А. А. (Сольц А. А., 1872—1945)——1898年入党,自1920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3—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主席。

索柯里尼柯夫, Г. Я. (Сокольников Г. Я., 1888—1939)——1905年入党,1922—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年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1926—1928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8—1929年任苏联石油辛迪加总经理。1929—1932年任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

塔尔盖默,奥古斯特(Тальгеймер Август, 1884—1948)——“斯巴达克同盟”和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1924—1928年在苏联工作。1928年成为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的奠基人之一。

台尔曼,恩斯特(Тельман Эрст, 1886—1944)——自1925年起任德国共产党主席。1924—1943年先后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委员和主席团委员。自1925年起任红色前线战士协会主席。1924—1933年任德国国会议员。

陶里亚蒂,帕尔米罗(爱尔科里,马里奥·卡连季,罗德里戈)(Тольятти Пальмиро [Эрколи, Марио Карренти, Родриго], 1893—1964)——意大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自1922年起任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1928—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自1926年起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1927—1928年任意大利共产党在法国和瑞士的国外中心领导人。

特里利谢尔(莫斯克温), М. А. (Триллсер [Москвин] М. А., 1883—1940)——1901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外事局局长、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

图拉伊科夫, Н. М. (Тулайков Н. М., 1875—1938)——1930年入党。农艺学家和土壤学家。萨拉托夫实验站站长,萨拉托夫国家农业和林业学院教授。

托夫斯图哈, И. П. (Товстуха И. П., 1889—1935)——1913年入党,1924—1926年任莫斯科列宁研究院院长助理。1926—1930年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任机要处处长。

托洛茨基(勃朗施坦), Л. Д. (Троцкий [Бронштейн] Л. Д., 1879—1940)——1917年入党,1917—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19—1926年任政治局委员。1925—1927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中央租让委员会主席。自1923年起为俄共(布)和联共(布)左

- 翼反对派的领导人和思想家。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被逐出苏联。
- 托洛孔采夫, А. Ф. (Толоконцев А. Ф., 1889—1937)——1914年入党, 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军事工业总局局长。1929—1931年任中央执行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委员。
- 托马, 阿尔伯(Тома Альберт, 1878—1932)——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之一, 1919—1932年任国际联盟国际劳动局领导人。
- 托姆斯基(叶夫列莫夫), М. П. (Томский [Ефремов] М. П., 1880—1936)——1904年入党, 1919—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2—1930年任政治局委员。1922—1929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自1929年起任全苏化学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 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 瓦尔赫尔, 雅各布(Вальхер Якоб, 1887—1970)——“斯巴达克”小组积极分子, 1919—1923年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党中央工会部领导人, 1928年为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的奠基人之一。
- 瓦尔加, Е. С. (Варга Е. С., 1879—1964)——匈牙利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1906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 1919年加入共产党, 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 1920年加入俄共(布), 1928—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1947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 瓦雷基斯, И. М. (Варейкис И. М., 1894—1938)——1913年入党, 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8年任萨拉托夫省委书记。1928—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黑土区委第一书记。
- 维克曼, П. М. (Викман П. М., 1890—?)——1906年入党, 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27年起任俄联邦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小组领导人。
- 威廉斯, В. Р. (Вильямс В. Р., 1863—1939)——土壤学家, 白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894—1939年任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业学院土壤教研室主任。
- 威特利, 约翰(Уитли Джон, 1866—1935)——英国卫生大臣。1928年任皇家劳动委员会驻印度领导人。
- 韦尔, 加罗尔德(Вэр Гарольд, 1819—1935)——美国共产党党员, 农业学校教师, 农艺学家。多次赴苏联, 就组织大型国营农场提供咨询。

韦耶尔,加罗尔德(Веер Гарольд)——见韦尔·加罗尔德。

魏采尔,И. Я. (Вейцер И. Я., 1889—1938)——1914年入党。1925—1929年任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并同时兼任粮食、饲料管理局局长。1929—1930年任乌克兰国内贸易人民委员。

温什里希特,И. С. (Уншлихт И. С., 1879—1938)——1900年入党,192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苏联副陆海军人民委员。

乌格拉诺夫,Н. А. (Угланов Н. А., 1886—1937)——1907年入党,1923—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1929年任中央书记兼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1928—1930年任苏联劳动人民委员。

乌汉诺夫,К. В. (Уханов К. В., 1891—1939)——1907年入党,1923—1937年任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主席。自1929年任莫斯科州执行委员会主席。

乌加洛夫,Ф. Я. (Угаров Ф. Я., 1885—1932)——1905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9年任列宁格勒州工会联合会主席。

乌雷瓦耶夫,М. Е. (Урываев М. Е., 1887—?)——1917年入党,1925—1934年任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任国家航空工业托拉斯主席。

乌里扬诺娃,М. И. (Ульянова М. И., 1878—1937)——1898年入党,自1925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17—1929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和任秘书。

西蒙,约翰·奥尔斯布鲁克(Саймон Джон Олсбрук, 1873—1954)——1915年在英国政府担任各种职务。

西特林,沃尔特(Ситрин Уолтер, 1887—1982)——英国工会领导人之一。1926—1946年任英国职工大会总书记。1928—1945年任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主席。

希法亭,鲁道夫(Гильфердинг Рудольф, 1877—1941)——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以及第二国际首领之一。

萧,G. В. (即萧伯纳)(Шоу Джордж Бернард, 1856—1950)——英国作家,并入了工党的费边社活动家。

谢尔比纳,Ф. А. (Щербина Ф. А., 1849—1936)——地方统计学家。

谢尔古舍夫,М. С. (Сергушев М. С., 1887—1930)——1904年入党,1924—

- 1931年<sup>①</sup>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成员。
- 谢列布罗夫斯基, А. П. (Серебровский А. П., 1884—1938)——1903年入党,自192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自1926年起任有色金属、黄金和白金管理总局局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 谢马尔,皮埃尔(Семар Пьер, 1887—1942)——法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24—1932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30年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
- 谢苗诺夫, Б. А. (Семенов Б. А., 1890—1940)——1907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任联共(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区委书记。
- 欣楚克, Л. М. (Хинчук Л. М., 1868—1944)——1920年入党。1926—1930年任苏联驻英国贸易代表、苏联副贸易人民委员。
- 兴登堡, 保罗, 冯(Гинденбург Пауль фон, 1847—1934)——1925—1934年任德国总统。
- 雅科夫列夫, А. И. (Яковлев А. И., 1900—1937)——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 雅科夫列夫, Я. А. (Яковлев Я. А., 1896—1938)——1913年入党,1924—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9年任苏联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同时兼任《贫农报》编辑(1924—1928)和《农民报》编辑(1923—1929)。1929—1934年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
- 雅科夫列娃, В. Н. (Яковлева В. Н., 1885—1941)——1904年入党。1922—1929年任俄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自1929年起任俄联邦财政人民委员。
- 雅罗斯拉夫斯基, Е. М. (Ярославский Е. М. 1878—1943)——1898年入党。1923—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书记。
- 亚戈达, Г. Г. (Ягода Г. Г., 1891—1938)——1907年入党。自1924年起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
- 叶戈罗夫, М. С. (Егоров М. С., 1903—1985)——1921年入党。1926—1928年

<sup>①</sup> 此处原文有误,应为1930年。——译者注

- 任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学校部部长,1928—1930年共产主义学院马列主义进修班学员。
- 叶努基泽, А. С. (Енукидзе А. С., 1877—1937)**——1898年入党,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2—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和主席团成员。
- 伊克拉莫夫, А. И. (Икрамов А. И., 1898—1938)**——1918年入党,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自1925年3月起任乌兹别克共(布)中央书记,1929—1937年任乌兹别克共(布)中央和塔什干市委第一书记。
- 伊利英, Н. И. (Ильин Н. И., 1884—1957)**——1910年入党,1925—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1927—1930年任俄联邦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
- 伊万诺夫, В. И. (Иванов В. И., 1893—1938)**——1915年入党,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1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二书记。
- 尤利乌斯(Юлиус)**——见阿尔巴里, Д。
- 尤列维奇, Э. И. (Юревич Э. И., 1888—1958)**——1913年入党,1924—1934年任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6—1929年任联共(布)巴什基尔州委书记。
- 泽连斯基, И. А. (Зеленский И. А., 1890—1938)**——1906年入党,1922—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自1924年10月起任联共(布)中央中亚局书记。
- 泽姆利亚奇卡, Р. С. (Землячка Р. С., 1876—1947)**——1896年入党,自1924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1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巡视员、部务委员。
- 扎东斯基, В. П. (Затонский В. П., 1888—1938)**——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7—1933年任乌克兰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乌克兰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 柴鲁尔, С. (Загнул Саад, 1857—1927)**——1924年任埃及首相,1926—1927年任议会议长。